編 者 的 話

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論和辯証法是無产阶級的世界观和方法論。列宁善于运用这种唯物論和辯証法指导無产阶級革命，解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最困难最复杂的一些問題，并在建設布尔什維克政党方面做出了榜样。中国共产党在毛澤东同志的領导下，創造性地运用了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兩次偉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应当指出，毛澤东同志不仅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設的实踐中卓越地运用了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依据中国革命和建設的实踐經驗从各方面發展了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点是有重大意义的，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設能够取得胜利，我們党能够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同时，毛澤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也是对于整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偉大貢献。我們党的整风运动，是具体地运用和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措施。整风运动表明我們党的建設發展和巩固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与离开辯証唯物主义的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頑强斗爭的过程。

毛澤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高度集中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它反过来又成为进一步啓發人民的智慧的鑰匙。現在广大群众掀起了学习毛澤东同志著作特别是毛澤东同志哲学著作的热潮，这一点不是偶然的。这种哲学思想运用得越普遍越成熟，对于改造人們的头腦、發揮人們的主观能动性，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發展、貫徹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促使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現，將成为一个無可比拟的物質力量。

为了适应当前学习毛澤东同志哲学著作的需要，我們專門編輯了这一部学习文件。这些文件是为了帮助讀者理解毛澤东同志的"实

踐論”、“矛盾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这三部著作而編的。其中，除“矛盾論”按原文的分段編輯学习文件外，“实踐論”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都是提出几个方面的問題，并按这些問題編輯文件。这里提出的問題未必适当或未必完全，只是作一个初步的尝試而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的学习，因为已經有了一部“社会主义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彙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我們在这里主要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若干問題，选編了一些文件。其他有关的經典著作和党的文件都是圍繞着这三部著作来編輯的，以便扩大閱讀范圍和讀者的知識領域，易于理解三部著作的精华。“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和“論持久战”，是毛澤东同志运用辯証唯物論来研究中国革命战爭和抗日战爭而写出的兩部名著，需要精讀，因此，將这兩部著作全文收入。此外，为了端正学习态度，將毛澤东同志的“改造我們的学习”一文放在前边，代序言，同时，收了几篇学习文件。

因为时間倉促，編輯工作一定有許多缺点（例如本書所收有关經典著作的各种譯本，其譯文、人名、名詞和規格等，不免有些出入），希望各方面提出意見，以便下版改正。至于每个問題的学习文件，讀者自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和需要加以增減，不受拘束。

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

目　录

毛澤东：改造我們的学習(代序)

学　習　文　件

毛澤东：整頓党的作风 …… 9

毛澤东：反对党八股 ……24

列　宁：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第六章第四节"哲学上的党派和哲学上的無头腦者"）……38

列　宁：論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49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58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宣言 ……65

展开对資产阶級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78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論）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摘录） ……83

陆定一：教育必須与生产劳动相結合 ……86

陈伯达：在毛澤东同志的旗帜下 …… 102

理論战綫上的新气象 …… 120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論）

毛澤东：实踐論

学習文件

第一部分　关于認識依賴于实踐，認識論的唯物論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第二部分）……138

馬克思：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154

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第五章第二节"思辨結構的秘密"）……157

列　宁：卡尔·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部分）……162

列　宁：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第一章）……165

列宁在"哲学笔記"一書中論認識和实踐……221

毛澤东：关于糾正党內的錯誤思想（"关于主观主义"部分）……223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从实际出發……224

毛澤东同志論从实际出發……227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中的作用……229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科学历史摘要〕"部分）……241

中共中央关于各級領导人員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243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論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結合……247

科学并不神秘……253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論）

土專家和洋專家的經驗汇流……256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論）

刘少奇：人的阶級性……259

是不是立場問題?……263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論）
再論立場問題 ……266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論）

第二部分　关于認識过程，認識論的辯証法

毛澤东：关于領导方法的若干問題 ……271
毛澤东："农村調查"的序言 ……276
中共中央关于調查研究的决定 ……279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
列　宁：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第二章） ……282
列宁在"哲学笔記"一書中論認識过程的辯証法 ……326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辯証法〕"部分中"〔(乙)辯証邏輯和認識論。
关于'認識的界限'〕"）……330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第九章） ……352
毛澤东同志論全面观点和从本質看問題 ……363
毛澤东：反对党八股（关于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狀）……368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試驗田的
經驗的通知 ……370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
【附一】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員会关于各級干部种試驗田
的报告 ……371
【附二】种試驗田——又紅又專的道路 ……379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論）
一篇生动的馬克思主义的报告 ……383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論）
【附】中共湖北省委員会：依靠群众力量，排除万难，大兴水利 ……387
百聞不如一見 ……398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論）
現場会議——馬克思主义的領导方法 ……401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論）

第三部分　关于主观能动性，思想必須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反对右傾保守思想

毛澤东：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第一章第四节“重要的問題在善于学习”）……405

毛澤东：論持久战（“能动性在战爭中”和“主动性，灵活性，計划性”兩部分）……406

毛澤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407

毛澤东：必須学会做經济工作……410

毛澤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416

毛澤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435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書編者按語兩則（“这个乡兩年就合作化了”和“一个違背領导意願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兩文的按語）……438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費反保守运动的指示……440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日）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443

鼓起干勁，力爭上游！……474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社論）

力爭高速度……479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論）

譚震林：論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483

第四部分　关于改造主观世界

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决議……493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屆中央委員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議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531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二十周年紀念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毛澤东：关于糾正党內的錯誤思想 ……534
毛澤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 ……544
毛澤东：反对自由主义 ……569
毛澤东：为人民服务 ……572
刘少奇：論共产党員的修养（第二章） ……574
中共中央宣傳部关于在延安討論中央决定及毛澤东同志
整頓三风报告的决定 ……611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
陆定一：紀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 ……61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631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635
* * *
学习毛澤东同志的"实踐論" ……664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論）
"实踐論"开辟了我們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 ……673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論）
論毛澤东的著作"实践論"（苏联眞理报編輯部） ……678

目　录

毛泽东：矛盾論

学　習　文　件

第一部分　关于兩种宇宙观

列　宁：談談辯証法問題…… 719
恩格斯：反杜林論（"引論"第二章"概論"）…… 724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十二、十三章）…… 737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第四部分摘录）…… 760
列　宁：卡尔·馬克思（"辯証法"部分）…… 766
列　宁：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关于辯証法的要素）…… 768
列　宁：再論职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政治与經济。辯証法与折衷主义"和"辯証法与折衷主义。'学校'与'机关'"兩部分）…… 770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論反对詭辯論…… 787
斯大林：無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辯証方法"部分）…… 795
普列汉諾夫：Cant 反对康德，或伯恩斯坦先生的精神遺孀（第二部分）…… 805

第二部分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文摘录…… 811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一、八部分摘录）…… 816

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第一、二、三部分）…… 825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
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宣言（第二部分）…… 826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关于在莫斯科
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的决議…… 827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批判…… 834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論）
普列汉諾夫：論一元論历史观之發展（第一章摘录）…… 839
柯庆施：在上海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上的总結
發言（第二部分摘录）…… 843
工业也要"今年看明年"…… 847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論）

第三部分　关于矛盾的特殊性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物質的运动形态。科学分类"部分摘录）…… 850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眞理
必須同民族的、地方的特殊情况相結合 …… 859
斯大林：論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部分）…… 865
斯大林：答阿·霍洛波夫同志…… 871
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第一、二、三部分）…… 876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
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宣言（第四部分）…… 877
毛澤东：中国的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878
毛澤东："共产党人"發刊詞…… 886
毛澤东：学习和时局（第二部分）…… 897
毛澤东：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第一章第一节
和第三节，第三章）…… 903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政治报告（第一、二、四部分）…… 904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第一部分）…… 929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关于过渡
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步驟問題"）…… 930
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决議（第四部分）…… 936
陈伯达：毛澤东論中国革命（"近代中国是东方許多矛盾
的焦点"部分）…… 937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一般和特殊 …… 942

第四部分　关于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列宁、斯大林論抓住历史鏈条的中心环节 …… 946
毛澤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51
毛澤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民族矛盾和国内
矛盾的目前發展阶段"部分）…… 960
毛澤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三节）…… 968
毛澤东：論軍队生产自給，兼論整风和生产兩大运动
的重要性…… 977
毛澤东：在晋綏干部会議上的講話（第五部分）…… 981
毛澤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
紙老虎（人民日报編輯部）…… 986
于兆力：新生力量一定战胜腐朽力量……1004
为动員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
斗爭（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綫的学习和宣傳提綱）（摘录）……1012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第一部分）……1014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書編者按語一則（"誰說鷄毛

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語）……1015
江　华：坚持党的正确路綫，爭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綫上
全胜（第一部分）……1017

第五部分　关于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

列　宁：談談辯証法問題……1023
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
批判（第四章第四节摘录）……1024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辯証法〕部分中〔(甲)辯証法的
一般問題。辯証法的基本規律〕摘录）……1026
斯大林：論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問題（“‘平衡’論”部分）……1029
斯大林：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摘录）……1032
毛澤东：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034
毛澤东：統一战綫中的独立自主問題……1056
毛澤东：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时局好轉……1059
毛澤东：团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頑固派……1062
毛澤东：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战綫……1067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坏事能否
变成好事？”部分）……1069
陈伯达：毛澤东論中国革命（“又联合又斗爭的广泛
統一战綫”部分）……1070
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1078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論）

第六部分　关于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馬克思：哲学的貧困（第二章第五节摘录）……1083
列　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經济”一書的評論（摘录）……1085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兩类不同性質的矛盾"部分）……1086
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关于根本立場部分）……1087
中国共产党第七屆中央委員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議的公报……1088
刘少奇：論党内斗爭（第三、四、五部分）……1094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第四部分）……1116
毛澤东同志論批評和自我批評……1121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第一、二部分）……1125

* * *

毛澤东：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1126
毛澤东：論持久战……1183

* * *

陈伯达：毛澤东同志論革命的辯証法……1245

目　录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学　習　文　件

第一部分　关于阶級斗爭，民主和專政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資产者与無产者"部分）……1292

列　宁：卡尔·馬克思（"阶級斗爭"和"無产阶級阶級斗爭底策略"兩部分）……1305

列　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五章第二节）……1311

列　宁：無产阶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資产阶級民主和無产阶級民主"和"被剝削者能同剝削者平等嗎？"兩部分）……1329

列　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騙人民（第三、四部分）……1342

毛澤东：中国社会各阶級的分析……1359

毛澤东：論人民民主專政……1366

关于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1377

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1389

恩格斯：論权威……1414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第四部分）……1418

文汇报的資产阶級方向应当批判……1419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論）

这是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423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論）

周恩来：在第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上的政府

工作报告（第一、四部分）……1429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1445
关于所謂"輿論一律"（"关于胡風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書中"人民日报"的編者按語）……1446
在肃反問題上駁斥右派……1449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論）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1457
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設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第一部分）……1458
从团結的願望出發……1470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論）
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發展……1474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論）

第二部分　关于社会發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層建築的矛盾

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一書序言……1479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部分）……1484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諾夫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1503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諾夫論基础和上層建筑……1511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1520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对于德国工人党綱領的几点意見）……1550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的信……1569
（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恩格斯致亨·施塔尔肯堡的信……1572
（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再論无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第二部分）……1575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政治报告（第二部分）……1576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第二部分）……1577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書編者按語一則（“劳动妇女
投入生产，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的按語）……1578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决議……1579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583
（“紅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七期社論）
高举人民公社的紅旗前进……1587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社論）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1591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中央委員会第六次全体会議通过，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
有历史意义的綱領性文件……1610
（“紅旗”一九五九年第一期社論）
发动群众打破陈規……1617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論）
改进工业、商业和財政的管理体制……1620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論）
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措施……1625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論）
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創举……1629
（一九五八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論）
【附】中共黑龙江省国营庆华工具厂委員会：关于干部参加生产、
工人参加管理和业务改革經驗的初步总結……1634
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現……1652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論）

第三部分　关于人民群众的作用，群众路綫

列宁論人民群众……1656
毛澤东：关于領导方法的若干問題……1664
毛澤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665
毛澤东：論联合政府（第五部分）……1670
毛澤东：介紹一个合作社……1675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書編者按語兩則（“所謂落后多村并非一切都落后”和“書記动手，全党办社”兩文的按語）……1677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議上的祝詞……1680
刘少奇：論党（关于党的群众路綫問題）……1686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第二、三部分）……1699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第二、三部分）……1715
把总路綫的紅旗插遍全国……1716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論）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1720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論）
大企业必須大搞群众运动……1725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論）
駁工业战綫上群众路綫的怀疑派（“紅旗”杂志評論員）……1729
陈伯达：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兩种方法論”部分）……1738
馬克思、恩格斯对馬尔薩斯人口論的批判……1745
普列汉諾夫：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1756

第四部分　关于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毛澤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792

毛澤东：大量吸收知識分子……1799
丟掉幻想，准备斗爭……1801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新华社社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806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
“紅旗”杂志发刊詞……1813
周恩来：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报告……1815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第二、三、四部分）……1816
教育者必須受教育……1817
（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社論）
投入体力劳动——共产主义的大熔爐……1821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論）
搞臭資产阶級的个人主义……1826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論）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爭鳴……1829
陈伯达談“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是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
方法之一……1848
范文瀾：历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1850
范文瀾：破除迷信……1856
周　揚：文艺战綫上的一場大辯論……1862
列　宁：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1894
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批判……1902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論）
对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斗爭到底……1903
（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社論）
欲盖弥彰——評鉄托六月十五日的演說（“人民日报”評論員）……1909
陈伯达：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1915

第五部分　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工農关系

毛澤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1925

毛澤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1926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第二部分）……1927
关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議的报导……1928
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鋼产翻一番的偉大任务……1931
（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論）
关于一九五八年十月至十一月全国工业書記会議的报导……1934
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1939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向技术革命的偉大目标进軍……1942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人民日报"社論）
文化革命开始了……1948
（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人民日报"社論）
陈伯达：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1952
【附一】中共鄂城县委会：旭光一社用土办法办小小工厂……1956
【附二】中共鄂城县委会：旭光一社是怎样領导和管理
小小工厂的……1961
农民問題仍然是根本問題……1965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論）
多快好省地发展地方工业……1969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論）
* * *
偉大的一年……1975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論）

学习文件

第一部分

关于兩种宇宙观

談談辯証法問題

列　宁

統一物之分解为兩个部分以及对其矛盾着的各部分的認識（参看拉薩尔所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書第三篇"認識論"开头所引用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話㊀），是辯証法的实質（辯証法的本質之一，如果不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那末也是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問題的（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經常在这周圍兜圈子，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爭）。

辯証法內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須由科学史来檢驗。对于辯証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普列汉諾夫）沒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做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

㊀ 这段話的原文是：《因为統一体是由兩个对立面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为兩半时，这兩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用古希腊人的話来說，他們的偉大而光荣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这个原理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并作为一个新的發現而引以自豪嗎？》（見列宁"哲学笔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二五至三二六頁）——本書編者注。

格斯也这样做过。但那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被当做認識的規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規律)。

在数学中,+和-,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离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級斗爭。

对立面的同一(它們的"統一",也許这样說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統一这兩个名詞在这里并沒有特别重大的差别。在一定的意义上二者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內)的一切現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傾向。要認識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內部的开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它們当做对立面的統一来認識。發展是对立面的"斗爭"。兩种基本的(或兩种可能的?或兩种在历史上見到的?)發展(进化)观点是:認为發展是減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認为發展是对立面的統一(統一物之分为兩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們之間的互相关联)。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視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認識"自己"运动的泉源上。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貧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現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鑰匙,才提供理解"飞躍"、"漸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轉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鑰匙。

对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暫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爭則是絕对的,正如發展、运动是絕对的一样。

注意：主观主义（怀疑論和詭辯等等）和辯証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辯証法中，相对和絕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辯証法說来，相对之中有着絕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詭辯說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絕对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資产阶級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換。在这个最簡單的現象中（在資产阶級社会的这个"細胞"中）这一分析揭示出現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們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其各个部分的总和中自始至終的發展（和生長，和运动）。

一般辯証法（因为資产阶級社会的辯証法在馬克思看来只是辯証法的局部情况）的闡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从最簡單的、最普通的、最常見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題开始，如树叶是綠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經有辯証法：个别就是一般（参看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施維格勒譯，第二卷第四〇頁，第三篇第四章第八至九节：《因为当然不能設想：在看得見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这就是說，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論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列入一般之中等等。任何个别經过千万次的轉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現象、过程）相联系。諸如此类等等。在这里已經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等的因素、萌芽、概念了。这里已經有偶然和必然、現象和本質，因为当我們說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我們就把許多特征作为偶然的东西抛掉，把本質和現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

可見，在任何一个命題中，好像在一个基層的"單位"（"細胞"）

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發現辯証法一切要素的萌芽，由此可見，辯証法根本就是人类的全部認識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則为我們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簡單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質，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轉变，偶然向必然的轉变，对立面的轉化、轉換、相互联系。辯証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正是問題的这一"方面"（这不是問題的一"方面"，而是問題的本質）普列汉諾夫不曾加以注意，至于其他的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說了。

* * *

不論是黑格尔（見《邏輯学》），不論是自然科学中現代的"認識論者"、折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的敌人（他不懂黑格尔主义！）保尔·龐尔克曼（参看他的《認識論原理》㊀）都把認識看做一串圓圈。

> 哲学上的"圓圈"：〔人物的年表是否一定需要呢？不！〕
>
> 古代：从德謨克利特到柏拉圖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辯証法。
>
> 文艺复兴时代：笛卡兒对伽桑狄（斯宾諾莎？）。
>
> 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經过貝克萊、休謨、康德）。
>
> 黑格尔——費尔巴哈——馬克思。

辯証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認識，其中包含着無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現实、接近現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發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無比丰富的內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辯証法应用于反映論，应用于認識的过程和發展。

从粗陋的、簡單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說。相反地，从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認識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过分地（狄慈根）發展（膨脹、扩大）为脫离了物質、脫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絕

㊀ 見列宁"哲学笔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七二頁。——本書編者注

对。唯心主义就是僧侶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確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經过人的無限复杂的(辯証的)認識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侶主义的道路。

人的認識不是直綫(也不是沿着直綫进行的)，而是無限地近似于一串圓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綫。这一曲綫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綫，而这条直綫能把人們(如果只見树木不見森林的話)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侶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統治阶級的阶級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綫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認識論根源。而僧侶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認識論的根源，它不是沒有根基的，它無疑地是一朵不結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長在活生生的、結果实的、眞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絕对的人类認識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結果实的花。

注意这个警句

(一九一五年或一九一六年。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九月出版的列宁"哲学笔記"排印)

反 杜 林 論(摘錄)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

恩 格 斯

引　論

一 概論

現代社会主义就其內容說来，首先是一方面对那支配于現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無产者、資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間的阶級对立的認識之产物；他方面对于那支配于生产中的無政府狀态的認識之产物。可是就其理論形式来說，現代社会主义开始时表現出只是十八世紀法国偉大啓蒙学者們㊀所提出的諸原則之往前的、表面上更为一貫的發展㊁。現代社会主义的根源虽深刻存在于〔物質的〕㊂經济的事实中，可是它和任何新的学說一样，首先得从在它之前已經积累的思想資料出發。

㊀ 这是指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前夜的法国資产阶級在哲学上和科学上的代表們。著名的啓蒙学者有伏尔泰、盧騷和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書派等。——譯者注

㊁ 在"引論"的草稿中，这一段表述如下："現代社会主义，虽然主要是由于对現存社会中有产者和無产者之間的阶級对抗的認識而产生的，在它的理論形式上，却是起初表現为十八世紀偉大的法国啓蒙学者們所奠定的原理的更透徹的和更进一步的引伸，社会主义的最初代表摩萊里(Morelly)和馬勃里(Mably) 也是屬于啓蒙学者之內的。"——俄文版編者注

㊂ 方括弧內的文句，是恩格斯在將本編这章及第三編第一、二兩章修改成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發展"小册子时所作的增补。——譯者注

在法国为行將到来的革命而开导人們头腦的那些大人物，本身也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等一切都受到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来，或者辯明自身存在的理由，或者放棄自己的存在。思維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現成事物的唯一尺度，这正是像黑格尔所說的：世界用头站立着的时代㊀；起初是在这种意义上，即：人的头腦以及头腦通过思維所發現的原則，要求成为一切人的行动与社会关系的基礎；然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說：与这些原則相矛盾的現实，事实上是被从头到底顛倒了。所有以前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傳統的观念，都被当作是不合理的东西，被抛到垃圾箱里去了；直到如今，世界只是被成見所支配；已往的一切，只值得憐憫和鄙視。現在呢，曙光第一次出現了，〔理性的王国〕来临了；从今以后，迷信、偏見、特权与压迫应当讓位于永恒的眞理、永恒的正义、从自然界本身所产生出来的平等、以及不可剝夺的人权。

我們現在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是别的，正是資产阶級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正实現于資产阶級司法之中；而平等則归結为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且資产阶級的所有权被宣布为最根本的人权之一；理性的国家，盧騷的"社会公約"㊁，在实踐上已經成为、

㊀ 〔黑格尔关于法蘭西的革命这样說道："关于法权的思想，法权的概念，立即取得公認的地位，無权狀态的腐朽支柱对它不能作任何的抵抗。現在已在法权的思想上建立了宪法，从此以后一切都得以此为依据。自从天空中照耀着太阳，而行星圍繞着太阳运行以来，从来沒有見过人用自己的头腦站立着，就是說，人根据思想，按照思想去構造現实。安那克薩哥拉斯（Anaxagoras）第一个說，理性統治着世界；只在現在，人們才第一次承認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現实。这是一个光輝的日出。一切能思想的生物，都欣然地欢迎这一新时代的到来。高尚的热情充滿了这个时候，全世界被一种智慧的热忱所浸潤，仿佛神意同塵世之間的調和現在才达到似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一八四〇年，第五三五頁。）难道現在不应当立即就用反社会党人法令去反对已死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險的、危害公共治安的革命思想嗎？〕（恩格斯注）

㊁ 盧騷（一七一二至一七七八）是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法国大革命准备时期的革命小資产阶級的代表。他認为社会和国家最初是为自由的、独立的人們訂立自

而且只能成为資产阶級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們也与其先驅者一样，总不能超越他們本身时代所形成的界限。

但是除了封建貴族和［出来作为社会上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的］市民阶級之間的对立，还同时存在着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富裕的游惰者和劳动的貧穷者之間的一般的对立。正是这种情形，使資产阶級的代表能够标榜自己不是某一个别阶級的代表，而是全部受苦的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从其产生时起，資产阶級就帶着它的对立物以俱来：資本家沒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当中世紀的行会的师傅發展成为近代的資产阶級时，行会的帮工和行会以外的零工，也以同样的程度轉化为無产者。虽然整个的說，市民阶級在和貴族斗爭中，曾可以認为自己有权同时代表当时各个劳动阶級的利益，可是在每一个大的資产阶級运动中，作为近代無产阶級的多少發展的先驅者之阶級，也已經爆發了本阶級的独立运动。例如，德意志宗教改革和农民战爭时代［再洗礼派㈢和］苗彩尔(Thomas Münzer)的运动；英国大革命㈣时代的平均派 (Levellers)㈤；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巴貝夫(Babeuf)㈥。伴随着这个尚未成熟的阶級的革命武裝起义的，还有

由的社会公約所組成的。可是这种公約所建立的社会秩序，被以后社会不平等的产生而歪曲了，但是人类按其天性是自由的与平等的。所以他們应当拥有同样的政治权利，而且在一切問題上，在法律上应当是平等的。按照盧騷的学說，要恢复这种平等，也只能夠而且应当根据于人們相互間自由的社会公約。——譯者注

㈢ 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爭發生于十六世紀初，参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發展"一書的"英文版序"。再洗礼派是一五二四至一五二五年間在德国西南部因受宗教改革的刺激而兴起的一个农民运动教派，提倡人間平等和財产共有的观念。——譯者注

㈣ 英国大革命，發生于十七世紀(一六四二至一六六〇年)，这是反对君主專制，反对封建地主統治的資产阶級革命。——譯者注

㈤ 平均派是对在一六四八年英国革命中提出最急进民主要求的城乡平民分子运动的代表們的称呼。——俄文版編者注

㈥ 巴貝夫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平等的思想之上的。巴貝夫及其信徒認为要实現共

与之相适应的理論的表示；在十六世紀与十七世紀，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烏托邦的描写㊁；在十八世紀，簡直已有共产主义学說了（摩萊里和馬勃里）。那时平等的要求，已經不再限于政治的权利，而扩大到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証明了应該消灭的不仅是阶級的特权，而且是阶級区别的本身。这种新学說的最初表現形式是〔斥責一切人生享乐的〕、禁欲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后来出現了三大空想家，聖西門，他除無产阶級的傾向外，还同时有資产阶級傾向的某些影响；傅立叶和欧文，欧文居于資本主义生产最發达的国度，在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各种对立对他的印象之下，有系統地并且和法国唯物主义直接相关联地制成了他的消除阶級区别的种种方案。

上述三人的共同点，是在于他們不是出来作为当时历史所已产生的無产阶級的利益之代表。他們和啓蒙学者一样，要〔立即〕解放全人类，而不是〔首先〕解放某一确定的社会阶級。他們也和啓蒙学者一样，要建立理性的、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們的王国和啓蒙学者的王国相較实有天壤之别。在他們看来，根据啓蒙学者的原則而建立的資产阶級世界同样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所以应該和封建制度及一切以前的社会形式一样的被抛到垃圾箱里去。眞正的理性与眞正的正义之所以迄今尚未統治世界，其原因只是在于它們还沒有被人們所正确認識。所缺少的仅仅是个别的天才人物，这样的人物現在已經出現了，并且也把眞理認識了。天才之所以到現在方才出現，眞理之所以到現在方被認識，这点在他們看来并不是历史發展总的进程的必然結果与不可避免的事件，而簡單地是一件僥幸的偶然事件。这样的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以順利地产生，这样

产主义制度，就須要由共产主义者組織一个不大的陰謀集团，来实行陰謀与政变。巴貝夫共产主义的这种特点，正反映那个成为近代無产阶級前身的阶級之不成熟的狀况。——譯者注

㊁ 恩格斯在这里是指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湯麦斯·摩尔（一四七八至一五三五）和康班尼拉（一五六八至一六三九）著作中关于沒有私有財产的理想社会制度的描写。——譯者注

也許就可以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誤、斗爭和痛苦了。

上述的思想方式基本上都是法国的、英国的以及初期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包括魏特林)所共有的㊀。〔在所有他們这些人看来〕，社会主义是絕对眞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現，只要一把它發現，它便能够以自身的力量去征服全世界；因为絕对的眞理是和时間、空間以及人类的历史發展無关的，所以它在何时何地被發現，乃是純粹偶然的事。而且絕对眞理、理性和正义在各学派的創始者看来又各不相同；每一学派創始者的絕对眞理、理性和正义的特殊形式是被各派創始者的主观認識、生活条件、知識广度及思想發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在此类絕对眞理的冲突之中，解决的办法就只有將他們相互間的矛盾磨去。从这上面所得出的，只能是某一种折衷的、中庸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直到今日事实上正支配着英、法兩国大多数的社会主义的工人的头腦；这种折衷的社会主义是非常龐杂的、包容各种各样派系的混合品，包含比較不引人注目的批判論調、經济原理以及各学派創始者对于未来社会的描繪，——这种混合品的个别組成部分在論辯的激流中像石塊在河床中一样，愈加迅速地磨光其鋒稜尖角，那么这种混合品的形成也就愈加容易。为着要使社会主义变成科学，首先必須使社会主义立足于現实的基础之上。

这时与十八世紀法国哲学一道并且繼之于后，兴起了新的德意志哲学，它在黑格尔身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的最大功績在于回复到辯証法，以之作为思維的最高形式。古代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証論者，他們中間最淵博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甚至已經研究了辯証法思維的最基本的形式㊁。在近代哲学中，虽

㊀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發展"一書中，这一句措辭如下："烏托邦主义者的思想方式長久地支配了十九世紀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部分地还支配到了現在。不久之前，所有英国的、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早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包括魏特林在內，都采取这种思想方式"。——俄文版編者注

㊁ 在"引論"的草稿中，这个地方是像下面这样表述的："古代希臘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証論者，亚里士多德，古代世界的黑格尔，甚至已經研究了辯証思維的最基本的形式。——俄文版編者注

然也有辯証法的哲学的代表(例如笛卡兒和斯宾諾莎)，可是他們却日益被束縛于所謂形而上学的思維方法——特别是在英国哲学的影响之下，这种思維方法差不多完全統治了十八世紀的法国人，至少是他們的專門哲学著作。可是在严格意义的哲学之外，他們却也能作出一些辯証法的范例，我們只要指出狄德罗的"腊摩之侄"("Rameau's Nephew")和盧騷的"人类不平等起源論"就够了。在这里簡短地說明兩种思維方法的要点，以后我們还要更詳細地研究这个問題。

当我們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們自身的精神活动时，在我們面前首先呈現的是种种联系和交互作用的無限錯綜的圖画，其中沒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这样我們首先看到一个整体的圖画，在其中个别部分还多少是被隐蔽着的；我們对于运动、过渡和联系，比較对于什么东西在运动、在过渡或在联系要更注意得多。]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質上是正确的世界观，是古代希腊哲学所固有的，它第一次由赫拉克利特明白地列述出来：一切都存在着，同时又不存在着，因为一切都在流动着，一切都在經常变化着，一切都在不断产生与消灭的过程中。然而無論这种見解怎样正确地抓住了現象的整个圖画的一般性質，可是要解釋整个圖画所由構成的个别部分，則它实在是不够的；但若我們不知道这些个别部分，那么整个圖画对我們也是不清楚的。为了認識个别部分(詳細部分)起見，我們不得不把它們从其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取出来，按其本性、按其特殊的原因和結果等等加以分别的研究。这本来是自然科学及历史研究的任务——这些科学部門，因为极显明的理由，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着次要的地位，因为希腊人首先須要搜集[这种科学]所必需的資料。[只有当自然科学的和历史的資料，在一定程度內搜集起来以后，方才能够加以批判的分析和比較，并依此而分列为各个門类、次序和种屬。]所以对于自然界的精密研究的开端，是在亞历山大时代㊀才由希腊人起始展开的，往后在中世紀时代，进一步为阿拉伯人所發展。可是眞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紀后半期才开始，从这时候起，它不断地获得日益迅速的进

展。自然界之分解为它的个别部分，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事物之分成一定門类，按其多样的解剖形态，来研究有机体的內部構造——所有这些都是最近四百年来对自然的認識大踏步前进的基本条件。可是这种研究方法同时也傳給我們一种习慣，去孤立地观察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把它們置于一般的大联系之外——因此不是从运动中去观察，而是从靜止狀态中去观察；不是看作本質上变化着的事物，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事物；不是作为活的事物，而是作为死的事物。这种思想方法，由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上，它造成了上世紀来(十八世紀。——譯者)特有的局限性——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不变的、硬化的、永久如此的研究对象，是应当一个一个地、彼此独立地被研究的。形而上学者思維于絕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之中。他的說法是："是則是，否則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話。"在他看来，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样地，某一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其他事物。正和反是絕对互相排除的，原因和結果也彼此处于固定的对立之中。这种思想方法，我們初看起来似乎是很有理的，因为它正是合乎所謂常識的。可是人的常識在家庭四壁之內的生活范圍中，虽是极可尊敬的伴侶，但是一踏上广大的研究的世界时，它立刻就会經历最可惊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虽然在某一多少寬广的領域中(寬广程度要看研究对象的性質而定)是合用的，甚至必要的，可是迟早它总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这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局限的、抽象的，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了。因为它只看到个别的事物，而看不見它們相互的联系；只看到它們的存在，而看不見它們的产生和消灭；只看到它們的靜止狀态，而忘記了它們的运动；只見树木而不見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确信地說，某种动物

㊀ 科学發展的亞历山大时代，是指公元前三世紀到公元后七世紀之間的时代，这一时代是因当时埃及的亞历山大港(地中海海岸的港口)而命名的。这海港那时是国际經济关系的最大中心之一。在这时代，自然科学如数学、地理、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得到了頗大的發展。——譯者注

存在或不存在，可是在更精确地研究的时候，我們看到这常是极度复杂的事，像法学家所熟知的，他們苦心焦虑想發現在母亲子宮內杀死胎兒，究竟超出哪一种合理的界限才算是謀害，可是結果总是徒劳。同样的，死的时間也是不能明确地确定的，因为生理学說明，死亡并不是一种突然的、倏忽完成的事件，而是一种延續的过程。同样的，每一有机体在某一瞬間既是这，又不是这；在每一瞬間，它消化着那些从外界吸取来的物質，而排泄别种物質；在每一瞬間，它的机体的一些細胞死亡着，而别一些新的細胞則又产生着；所以在經过或長或短的时間之后，这个机体的体質，是完全更新了，为别的原子的構造所代替了。因之每一有机体常常是它自身而同时又不是它自身。同样的，在更精确地研究之时，我們看到某种对立的兩极——正与反，彼此不能分离，正如他們彼此互相对立一样，而且不管它們之間的一切对立，它們总是互相滲透的。同样的，原因和結果是这样的一种概念，它們作为概念来說，只在应用于特定的个别場合时才有意义，可是，我們如果从它們对于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上去研究这些个别場合，那么这些概念就混合起来，并溶化为普遍的交互作用的那种概念，其中原因和結果經常交換位置，在此时此地是原因，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結果，反过来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过程和所有这些思維方法，是不能容納于形而上学的思維的框子內的。反之，对于辯証法——它主要是从其联系上，从其錯綜上，从其运动上，从其产生和消灭上去把握事物以及它們在思想上的反映的——，則上述的过程，正是証实自己的研究方法。自然界是辯証法的試金石，而且我們应当說，近代自然科学对于这种証明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而且日益增加的資料，它証明在自然界中，一切終究是辯証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进行着的，〔自然界不是在永久單調的、經常重复的循环中运行着的，而是經历着眞正的历史。这里首先应当指出达尔文，他給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以最有力的打击，証明了整个近代的有机界，植物、动物、因之也包括人类，都是几千百万年之久的發展过程的結果。〕可是因为直到現在，学会用辯証法去思維的

自然科学家，还是屈指可数，所以已得的科学成果和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的思維方法之間的矛盾，充分說明着現在統治于理論自然科学上的那种無限的紊乱，这种紊乱使教員和学生，作者和讀者，都同样陷于絕望的地步。

所以关于宇宙，关于它的發展和人类的發展，以及这种發展在人的头腦中的反映，关于所有这些如要得到精确的概念，只有运用辯証方法，經常注意到产生和消灭，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間的一般的交互作用。新的德意志哲学是一开始就在这种精神下出現的。康德的科学生涯的开始，就是把牛頓所說的、自从其有名的第一个冲击以来便是永久不变的太阳系，說明为历史的过程：太阳系以及一切行星是由旋轉的星云狀物形成起来的。并且他已經由此作出这样的結論，即：太阳系的起源也就指明了太阳系在將来不可避免的毀灭。半世紀后，他的見解被拉卜拉斯用数学說明了，再过半世紀以后，分光鏡証明了在宇宙的空間，存在着种种濃度不同的灼热的气团。

新的德意志哲学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达到了頂点，黑格尔的最大功績是在于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都看作是一种过程——即永恒的运动、变化、轉換和發展的过程，并且企圖去揭示这些运动和發展的內在联系㊀。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經不再是無意义的暴力行为的杂乱的糾纏——这种暴力行为在当时已經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之前是一概应受申斥的，是能愈早忘却愈好的——，而是人类本身發展的过程。現在思維的任务，是在于从一切迷乱中追蹤这一过程的依次發展的阶段，并在一切似乎是偶然的現象中証明出过程的內在規律性。

㊀ 在"引論"的草稿中，关于黑格尔哲学是这样描述的：

"就哲学是超越一切其他科学的一門特殊科学来說，黑格尔体系乃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成的形式。一切哲学都因这个体系而崩溃了。不过还留下了思維的辯証方法以及关于自然、历史和精神世界处在产生和消灭的不断过程中無尽止地运动着和变化着的观念。不仅是哲学，而且是一切科学，現在都要在各自的特殊領域內去發現出这个不断的轉变过程的运动規律。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給它的繼承者的遺产。"——俄文版編者注

黑格尔〔的体系〕沒有解决〔它所提出的〕这个任务，这对于我們在这兒是沒有关系的。他的历史功績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而这个任务永远不是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虽然黑格尔——和聖西門一起——是当代最淵博的学者，可是無論如何他总是受限制的。第一，他为自己知識的不可避免的界限所限制；第二，为他那时代的知識和見解之范圍与深度所限制。此外还得加上第三个原因，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說，在他看来，他的头腦里的思想不是現实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而是相反的，事物及其發展，在黑格尔看来，只是某种在世界产生以前就已存在于某个地方的"理念"所体現的映像。这样，一切都被顚倒过来了，世界現实的眞实联系完全被曲解了。〔所以〕黑格尔虽然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現象的某些个别联系，可是由于上述原因，他的体系的細节，就有許多不能不是补綴的，文飾的，虛構的，一句話，是被歪曲了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說来，是一个巨大的流产，可是也是此类流产的最后一个。实在說，他还包含着不可救藥的內在的矛盾。一方面，黑格尔体系的基本前提是这样的观点：認为人类历史是一种發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按其本性說，是不能由所謂絕对眞理的發現而达到智慧上的終极的；可是他方面，黑格尔体系又妄想自己就是这样的絕对眞理的完成。包罗万有的，永古完成的自然和历史的認識体系是和辯証思維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不过这种情形并不是排斥而是認可这种見解，即：对于整个外面世界的有系統的認識，可以逐代地得到更偉大的进步。

了解了历来的德意志的唯心主义是完全錯誤的以后，就必然归趋于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这不是單純的归趋于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十八世紀的唯物主义。和那种素朴革命地、簡單地抛棄全部以往历史的旧唯物主义相反，現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是人类發展的过程，而自己的任务就在于發現这种过程的运动規律。在十八世紀的法国人那里，以至黑格尔那里，統治着的是这样的自然观，以为自然界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运行于同样的、有限的循环之中的統一体，有永恒的天体（如牛頓所說的），有不变的有机体的物种（如林耐

所說的)——与这种观点相反，現代唯物主义綜合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根据这些成就来說，自然界也有自己时間上的历史，各天体也和所有在适当条件下生長于各天体的各种有机物体一样，同样是生成着，消灭着，而其循环圈——如果它們一般地存在的話——也將拥有無限地更加偉大的規模。在这兩个場合上，現代唯物主义，本質上說来都是辯証的；而再不需要任何凌駕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既然对于每一个别的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們闡明自己在事物的以及我們关于事物的知識的总联系之中的地位，那么，关于它們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变成多余的了。这样从全部以前的哲学中，还保存独立意义的只有关于思維及其規律的科学——形式邏輯和辯証法。其他一切都归屬于自然的和历史的实証科学之中了。

如果自然观上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科学研究之获得相当的实証的認識資料而逐步予以实現的話，那么，在很早以前，已經發生了一些历史事件，它們引起了历史观上的决定性的变革。一八三一年在里昂發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㊀，在一八三八到一八四二年間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运动，英国的宪章运动㊁，达到了自己的頂点。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發展的程度，他方面随着資产阶級不久以前所获得的政治統治权的發展程度，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的阶級斗爭开始在欧洲最先进国度的历史上进居于前列了。事实日益明显地証明資产阶

㊀ 一八三一年里昂工人要求規定最低限度工資而实行罢工和示威，在示威时遭受槍杀，于是工人举行起义。起义的工人在全城建立起街壘，在几天內，掌握了城市，只在政府派常备軍帮助里昂資产阶級之时，起义才被鎮压下去。——譯者注

㊁ 英国的宪章运动，發生于十九世紀的三十至四十年代，包括了英国工人阶級的極大多数，而成为無产阶級的第一个独立的政治运动。在这一点上，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指出的，正表示这一运动的巨大历史意义。运动之所以名为"宪章"，是因为工人在一八三九年向国会致送了宪章，提出了他們的基本要求：(一)二十一岁以上的男子都有普选权；(二)每年改选国会；(三)国会議員都应領薪俸；(四)选举議員时举行秘密投票；(五)平均的选举区；(六)取消国会議員候选人的財产条件。英国的工人阶級在好几年內，用罢工、示威和武装行动，来为实現这些要求而斗爭。——譯者注

級經济学說的虛伪性——这些学說，說資本和劳动的利益是一致的，說自由竞爭的应有結果是普遍协調和普遍的人民幸福㊀。同样的，对于法国的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它是这些事实的理論的表現，虽然是极不完全的表現——也再不能置之不理了。可是旧的、尚未排除了的、唯心的历史观，是不知道任何依据于物質利益之上的阶級斗爭的，而且是一般地不知道任何物質利益的；生产以及一切經济关系只是被附帶提到，作为"文化史"上的次要因素。

新的事实使人們对于全部以往的历史不能不作一番新的研究，于是就發現了全部以往的历史，〔除原始社会之外〕，都是阶級斗爭的历史，这些互相斗爭的社会阶級，常常是一定的生产和交換关系的产物，一句話，就是自己时代的經济关系的产物；因之，每一时代的社会經济結構，成为眞正的基础，而各該历史时代的法权制度的、政治制度的，同样，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念的上層建筑，归根到底都应当由这个基础来說明。〔黑格尔使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下面解放出来，他使历史观变成了辯証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質上是唯心主义的。〕現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隐蔽所里，即从历史观里被驅逐出去了；現在历史观成为唯物主义的了，并且發現了以人們的存在去解釋他們的意識的方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以人們的意識去解釋他們的存在了。

〔所以社会主义現在已經不被看作是这个或那个天才的灵智的偶然發現，而被看作是兩个历史地形成起来的阶級——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的斗爭的必然結果。社会主义的任务，已經不是在于構思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在于研究那种必然产生上述阶級及其斗爭的历史經济过程，并在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經济狀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方法。〕可是以前的社会主义不能和这种历史唯

㊀ 在"引論"的草稿中，这里还有下面这几句："在法国，一八三五〔一八三四〕年的里昂暴动也同样地宣布了無产阶級反对資产阶級的斗爭。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論获得了历史的重要性，而且也必然会在德国得到反响和批評，虽說在德国，工业还剛剛开始从小生产的阶段爬起来。因此，現在与其說在德国还不如說在德国人中形成起来的理論的社会主义，只有从外国輸入它的一切材料……"——俄文版編者注

物主义相容，正好像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能和辯証法及近代自然科学相容一样。以前的社会主义，虽然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結果，但不能說明它，因之也就不能克服它，而只能簡單地把它作为邪惡来擯棄。〔以前的社会主义，对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包含的剝削工人阶級的这一点，愈表憤恨，它愈不能清醒地陈述这种剝削的內容如何，以及它是如何产生的。〕可是任务却是在于一方面要說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历史联系中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对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必要性，因之，也說明这种生产方式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要揭露这一生产方式的一直尚未被發現的內在性質。而以往的批評則涉及其有害的后果者多而論及事情本身的实質者少。这一任务因剩余价值的發現而完成了。它証明了無償劳动的占有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于工人的剝削的基础，資本家即使按照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劳动力既是商品，所以在市場上也有它的价值）来購买工人的劳动力，他也总是从这劳动力榨取着比他所付的数目更多的价值；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就形成有产阶級手中所从而积累其日益增加的巨量資本的那种价值。这样就同时說明了資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以及資本产生的过程。

这兩个偉大的發現——历史唯物主义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資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我們应归功于馬克思。由于这些發現，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而現在事情首先是在于进一步研究它的細目〔及其相互联系〕。

当杜林先生大声喧嚷地出現于舞台上，来宣告他在哲学、政治經济学和社会主义上所作的完全的变革之时，理論的社会主义上以及現在已成过去的哲学上的情形大体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来看杜林先生对我們允諾的是什么，而……他是怎样来实行他的諾言的。

（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二月出版的吳黎平譯本第一三至二七頁；个別譯文和段落参照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發展"作了改动）

反 杜 林 論(摘錄)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

恩 格 斯

第一編 哲 学

十二 辯証法。量和質

"关于存在的基本邏輯特性的第一个和极重要的原理,就是矛盾的排除。矛盾是一个范疇,它只能同思想的組合有关系,而决不能同現实有关系。在事物中沒有任何矛盾,或者換句話說,認为矛盾就是实在,这是荒謬絕倫的…… 按相反方向互相抗衡的諸力量的对抗,甚至是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諸因素和諸个体的力量在方向上的抗衡,和荒謬的矛盾观念絲毫不符合…… 在这里我們可以引为滿足的,就是我們在弄清楚了眞实矛盾的眞正荒謬性之后,就驅散了通常从臆想的邏輯的神秘把戏中产生的迷霧,我們并且揭露了各处对于矛盾辯証法这个雕刻粗糙的木制神像——被用来代替对抗的世界圖式論的木制神像——焚香頂礼的無益。"这差不多就是"哲学講义"中关于辯証法所說的一切。但在"批判史"中,杜林先生对待矛盾辯証法,特别是对待黑格尔,却完全不同了。"按照黑格尔的邏輯学,或确切些說,按照邏各斯学說,矛盾并非存在于思維中(思維按其本性只能被看做是主观的和自覚的),它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与过程本身中,并且可以說是能以肉体感触到的,这样,荒謬就不再是不可思議的思想組合,而成为实际的力量。荒謬东西的現实存在,这是黑格尔邏輯与非邏輯的統一的第一項信条……

越是矛盾越是眞实，或者換句話說，越是荒謬越是可信。正是这种箴言——甚至不是新發現的，而仅是从啓示神学和神秘主义中抄襲来的——赤裸裸地表現所謂辯証法的原則。”

上面所引兩段話的意思可以归納如下：矛盾等于荒謬，所以它在現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在其他方面具有足够常識的人，也許会認为这一見解像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的說法一样，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微分学却不管人的常識的一切抗議，而在一定的条件下，使直綫等于曲綫并因此达到人的常識（它固执地認为曲直相等是荒謬的）所永远不能达到的那样的成果。由于所謂矛盾辯証法从古代希腊人直到目前在哲学中都起着重大的作用，因此，在反对辯証法时，甚至比杜林先生更有力的敌手，也必須提出别的論据来，而不能只憑無稽之談和無休止的謾罵。

当我把事物看作是靜止的，沒有生命的各个單独的、相互并列的，或先后相繼的时候，我們在事物中自然会碰不到什么矛盾。我們在这里看到一定的屬性，这些屬性，一部分是相同的，一部分是相異的，或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可是在后一个場合下它們是分别存在于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們內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在我們的观察限于这种范圍的时候，我們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也就行了。可是当我們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观察事物时，那么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們就立刻碰到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連簡單的机械的移动之所以能够实現，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間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連續的产生及其同时的解决，就是运动。

所以，这里我們看到的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与过程本身中，并且可以說是能以肉体感触到的”矛盾。但是杜林先生对此怎么說呢？他断言，一般說来直到現在，“在合理的力学中沒有从严格的靜止到运动之間的桥梁”。現在讀者終于可以看到隐藏在杜林先生这个慣用語句后面的究竟是什么，这不是别的，正是：按形而上学来思維的头腦絕对不能从靜止的观念轉到运动的观念，因为上述的矛盾在这

里正擋着他的路。对他来說，运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运动是矛盾。可是他既断言运动是不可理解的，那末也就是違反自己的意志而承認这种矛盾的存在，因而也就是承認：矛盾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中的，而且是一种現实的力量。

既然簡單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質的更高級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發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像我們在上面所已經看到的，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間是它自身，却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亡就到来。同样，我們看到了，在思維的范圍以內我們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內部無限的認識能力与此类認識能力仅仅在那些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認識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实現二者之間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無穷的——至少对于我們实际上是無穷的——連續系列之中解决的，是在無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我們已經說过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即在一定条件下，直綫与曲綫应当是一回事。在高等数学中还有另一个矛盾，即在我們跟前相交的兩条綫，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是平行綫，就是說，应当是兩条即使無限延長也永远不会相交的綫。可是，高等数学通过这些矛盾以及其他一些更加尖銳的矛盾，达到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效果。

但是連初等数学，也充滿着矛盾。例如說，a的根等于 a 的冪，这就是一个矛盾，可是毕竟$a^{\frac{1}{2}}=\sqrt{a}$。負数可以是某种数的平方，这也是一个矛盾，因为每一負数經自乘就得出正数。所以－1的平方根，不但是矛盾，而且甚至是荒謬的矛盾，是眞正的荒謬。可是$\sqrt{-1}$在許多場合毕竟是正确数学运算的必然結果，再說如果不准运用$\sqrt{-1}$来計算，那末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將怎么办呢？

数学本身由于研究变数而进入了辯証法的領域，而且很明显，正是辯証法哲学家笛卡兒使数学有了这种进步。变数数学对常数数学的关系，一般說来是和辯証思維对形而上学思維的关系一样的。可

是，这絲毫不妨碍大多数数学家只在数学領域中承認辯証法，也并不妨碍他們中的許多人仍完全按照旧的有局限性的形而上学方式去运用辯証法所得出的方法。

要对杜林先生所說的力量的对抗和对抗的世界圖式論作比較詳細的分析，只有在杜林先生对这个問題不是只說空話，而給我們多提供些东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可是杜林先生在說了一陣空話之后，無論在其世界圖式論中，或是在其自然哲学中，一次也沒有說明这种对抗起作用的情形，这就再好沒有地供認了：杜林先生对于"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絕对不能說出任何肯定的东西来。这很明显：既然把黑格尔的"本質論"降低为关于按照相反方向运动而不是在矛盾中运动的力量的一种陈辞濫調，那么当然对这种泛泛的一套最好避免作任何的运用。

馬克思的"資本論"給了杜林先生进一步發泄他反辯証法怒气的机会。"缺乏自然的和明晰的邏輯，这是辯証法的詭誕的結構与杂乱的思想的特点，…… 对于現已問世的那一部分㊀不得不应用这样一个原則：从某方面說，或者甚至一般地(!)根据人所周知的哲学偏見，可以在每一个东西中找出一切，而在一切中找出每一个东西，根据这种混乱的观点和曲解，归根到底一切都成为一样的东西了。"杜林先生的这种对人所周知的哲学偏見的理解，使他能够确信地預言馬克思的經济学的哲理有什么样的"結局"，就是說，預言"資本論"的往后几卷有什么样的內容，而且所有这些話都是紧接在他的那个声明的七行之后講的；他的那个声明是："眞的，用人类的和德意志的語言来說，究竟往后兩卷包含些什么，預先是猜不着的。"

再說，杜林先生的著作已經不是第一次表現出自己屬于"矛盾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可以說是能以肉体感触到的"那种"事物"之列了。可是这完全沒有妨碍他得意洋洋地繼續說下去："但是应当希望健全的邏輯將战胜那对于邏輯的諷刺…… 矯揉造作和辯証法的神

㊀ 指"資本論"第一卷。——譯者注

秘的廢話决不能誘惑稍有一点常識的人，使其……陷入这种思想与风格的混乱中。随着辯証法蠢見最后殘迹的消失，这种欺騙手段……也丧失自身的欺詐的影响，誰也不再認为应当使自己苦思焦慮，到那里去寻找一种深刻的智慧，在那里，奥妙事物的核心一經剝去外壳，就会暴露出即使不是單純的泛泛的一套，至多也只是平庸理論的一些特点……　如果不褻瀆健全的邏輯，那末完全沒有可能去复述那种根据邏各斯学說的規則树立的（馬克思的）詭誕的結構。”照杜林先生看来，馬克思的方法是“为自己的信徒創造辯証法的奇迹”等等。

我們在这里还完全不是談馬克思研究出的經济結論正确或不正确的問題，現在只是談馬克思所用的辯証方法。無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資本論”的大多数讀者現在靠了杜林先生才知道他們讀的究竟是什么。在这些讀者之中也有杜林先生自己，他在一八六七年（“补編”第三卷，第三分册）还能够提供对他那类思想家还算比較合理的关于馬克思著作的叙述，那时他还不認为必須一开头就把馬克思的思想翻譯成杜林的語言，而現在則他声明必須这样做。虽然他在那时已經犯了錯誤，把馬克思的辯証法同黑格尔的辯証法混为一談，但毕竟他在当时还沒有完全丧失把方法与通过方法所获得的結果区别开来的能力，那时他还懂得，一般地攻击方法，并不因此就把結果一一推翻。

可是，最使人吃惊的是杜林先生所說的这样的話：似乎根据馬克思的观点，“归根到底一切都成为一样的东西”，这样說起来，像資本家和雇佣工人，封建主义的、資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在馬克思看来，“都成为一样的东西”，而且最后甚至連馬克思和杜林先生也“都成为一样的东西”。要說明为什么会有这种明显的胡說八道，只能这样設想：光是“辯証法”这个字眼就已使杜林先生陷入如此神志不清的境地，以致于对他来說，由于肯定的曲解和混淆概念，無論他說些什么，做些什么，归根到底“都成为一样的东西”。

在这里我們还可以看到杜林先生所称为“我的崇高风格的历史

記述"或称为"总括方法"的例子，这一总括方法"充分考虑到类和型，而不屑于通过詳尽無遺的暴露去垂顧被休謨称为学氓的那类人；只有这一具有崇高尊貴的风格的方法，才是和完全眞理的利益相符合的，才是和对于摆脫了行会束縛的公众所承担的义务相符合的。"的确，这种崇高风格的历史記述和这种充分考虑到了类和型的总括方法，对于杜林先生是极其方便的，因为这样他可以把一切确定的事实当作瑣碎微末的事实而加以蔑視，可以把这些事实和零等同起来，并且可以不去証明什么而只須說些空泛的話，毫無根据地論断和簡單地嘲罵就行了。此外，上述的方法还有这样的优点，就是他不使爭論的对方得到任何实际的立脚点，所以对方为着回答杜林先生也几乎沒有别的办法，只得同样以崇高的风格和总括的方法作出完全空洞的論断，說些空泛的話，而最后也給杜林先生一頓嘲罵——一句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是这不是合乎每个人的口味的。破例地杜林先生丢掉崇高尊貴的风格，而給我們至少举了有关馬克思的錯誤的邏各斯学說的兩个例子，为此我們应当感謝他。

"例如，根据黑格尔关于量轉化为質的这种糊塗混乱的观念，所以款項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單單因为这个量的增加而变为資本，——这話听来难道不滑稽嗎！"

当然，經过杜林先生这样"洗刷过了的"叙述中，这种思想看来是极其离奇的。可是我們来看看馬克思的原文上是如何說的。第一卷第三一三頁上("資本論"第二版)㊀，馬克思从前面关于不变資本与可变資本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得出結論說："不是任何一个随便的貨幣量或价值量都可以轉变为資本。这种轉变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个别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里掌握一定的最低限度的貨幣量或交換价值量。"为了用实例說明，馬克思这样假定：在某一劳动部門里，工人为自己，就是說为再生产自己工資的价值，平均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其余的四小时則为資本家工作，生产那种直接装入資

㊀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参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三六二頁。——譯者注

本家腰包的剩余价值。在这种場合，如果誰要使每天装入自己腰包的剩余价值量能足够供他过着不較其工人为差的生活，那么他就必須拥有使他能够供应兩个工人以原料、劳动資料和工資的这种价值量。可是資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單是維持生活，而且还要增殖財富，所以雇用兩个工人的主人，还未成为資本家。因之为使自己生活比普通工人好一倍，并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轉成为資本，他就必須有雇佣八个工人的能力，就是說，拥有相当于第一种場合的四倍的价值量。只有經过这些說明，以后还經过更詳尽的論述——其用意是在闡明和論証，不是任何微小的价值量都足以轉变为資本，在这方面，每一發展时期，每一工业部門都有自己最低限度的界限——只有經过所有这些說明之后，馬克思才指出："在这里像在自然科学中一样，黑格尔在其'邏輯学'中所發現的关于純粹量的变化到达某一点便轉变为質的差别这个規律的正确性得到証实了。"㊀

現在讓讀者来贊賞杜林先生的崇高尊貴的风格吧，杜林先生就是靠这一风格把那种和馬克思实际所說的相反的話加到馬克思身上的。馬克思說，只有当价值量达到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数量(这个数量虽然因条件的不同而各有不同，可是在每一个場合都是一定的)时，它才能轉变为資本——这一事实是黑格尔規律的正确性的証明。而杜林先生却硬說馬克思有这样一种思想，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規律，量轉化为質，"所以款項达到一定的界限时，就……变为資本"。——可見和馬克思講的完全相反。

"为着完全眞理的利益"和"为着对于摆脫了行会束縛的公众所承担的义务"而作出不正确的引証的习慣，我們已在杜林先生对待达尔文学說时看到过了。越往后，越發現这种习慣成了現实哲学的內在必然性，而且实在是非常"总括的方法"。关于下面一点更不用說了，杜林先生硬說馬克思講的是随便什么"款項"，而其实馬克思講的仅仅是用于原料、劳动資料和工資上面的款項；这样杜林先生就居

㊀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参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三六四頁。——譯者注

然把純粹無稽之談强加于馬克思身上。然后，他还厚顏無耻地把他自己編造的無稽之談叫作滑稽！他制造了虛幻的达尔文，以便向后者施展自己的手段，在这里，他也同样地制造了虛幻的馬克思。"崇高风格的历史記述"原来如此！

在上面当我們說到世界圖式論时，已經看到，由于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交錯綫——即量的变化到一定的点便突然發生質的轉变——，杜林先生遭遇了小小的不幸，就是說，他自己在势穷力竭之时承認而且运用了度量关系的交錯綫。我們在那里举出了一个极著名的例子——水的凝結狀态变化的例子，水在标准大气压之下，在攝氏零度时从液体轉变为固体，在攝氏一百度时，从液体轉变为气体，在这兩个轉变点上，温度的單純的量变引起水的狀态的質变。

我們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中举出成千成百的这样的事实来証明这一規律。例如，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整个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从协作、分工和手工制造业，机器生产和大工业等方面举出無数的事实，在那里量变改变事物的質，同样地，質变也改变事物的量，因此，如果用杜林先生所異常痛恨的話来說，这就是量轉化为質，質轉化为量。例如，有这样的事实，許多人协作，許多个别力量溶合为一个綜合力量，造成了——用馬克思的話来說——"新的提升了的力量"，这一力量和組成它的全部的个别力量有本質的区别。

而且，在"資本論"中，就在被杜林先生为着完全眞理的利益而顚倒叙述的那个地方，馬克思作了如下的注解："在現代化学中被应用的和最初为劳倫和热拉尔所科学地發展的分子說，正是以这一規律为基础的。"㊀可是这对杜林先生有什么关系呢？他反正知道："在半吊子科学和某种冒牌哲理为了給自己裝出博学的外表而凑成一副破旧行头的那个地方，如在馬克思及其对手拉薩尔那里，正是缺少自然科学思維方法的卓越的近代組成因素的"，至于在杜林先生那里，則

㊀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参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三六四頁，附注205a。——譯者注

是以"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精确知識的主要的不可动摇的原理"为基础的，等等。这个基础究竟怎样，我們已經領教过了。可是为了使其他人也能对此有自己的意見，讓我們更切近地考察一下馬克思的上述注解中所举的例子。

这里所說的是关于碳素化合物的同素系，其中很多已为大家所知道，它們每一个都有自身成分的代数式。如果，我們按化学上的通例，用C来代表碳原子，用H来代表氫原子，用O来代表氧原子，用n来代表每一个化合物所包含的碳原子的数目，那末对这些系中的某几个系我們可以列出如下的分子式：

C_nH_{2n+2}——寻常石蜡系

$C_nH_{2n+2}O$——初級酒精系

$C_nH_{2n}O_2$——酸脂酸系

如果我們以最后一个系为例，并連續假定n＝1，n＝2，n＝3等等。那么就得到下述的結果(除去同分異構体)：

CH_2O_2——甲酸	沸点	100度	溶点	1度
$C_2H_4O_2$——乙酸	沸点	118度	溶点	17度
$C_3H_6O_2$——丙酸	沸点	140度	溶点	——
$C_4H_8O_2$——丁酸	沸点	162度	溶点	——
$C_5H_{10}O_2$——戊酸	沸点	175度	溶点	——

等等，一直到$C_{30}H_{60}O_2$蜂酸，它到八十度才溶解，而且完全沒有沸点，因为它如果不分解，就根本不能气化。

所以这里我們看到了由于元素的單純数量增加——而且总是按同一的比例——而形成的一系列在質上不同的物体。这一現象在化合物的一切元素都按同一比例变化其量的那种系中，如在寻常石蜡C_nH_{2n+2}系中，最純粹地表現出来，在这里，最低的是甲烷CH_4，是气体，已知的最高的是十六烷$C_{16}H_{34}$，是一种無色結晶的固体，在二十一度溶解，在二百七十八度沸騰。在这兩个系里，每一新的化合物都是由于把CH_2——即一个碳原子和二个氫原子——加进前一化合物的分子式而形成的，分子式的这种量的变化，每一次都引起不同質的

物体的形成。

这几个系仅仅是特别显著的例子，在化学上，差不多在任何地方，例如在各种氮的氧化物中，在各种燐酸和硫酸中，都可以看到如何"量轉化为質"，黑格尔的这个所謂糊塗混乱的观念，可以說是在事物中能以肉体感触到的，并且除了杜林先生之外，誰也不会弄不清楚。既然是馬克思第一个注意到这个事实，既然杜林先生讀了这个指示之后，甚至还不懂得它所說的是什么（否則，他自然不会不加惩罰地放过这样的罪行），那么这就足以使人們甚至不用回顧一下有名的杜林的自然哲学而完全清楚地确定，究竟誰缺乏"自然科学思維方法的卓越的近代組成因素"，是馬克思还是杜林先生，他們中間誰沒有充分了解"化学的……主要的不可动摇的原理"。

在結束这段話时，我們还想找一个人来当量轉化为質的証明人，这就是拿破侖。拿破侖描写过騎术不精而紀律严明的法国騎兵和当时無疑地善于單个作战而紀律不严的孟美留克 (Mamelukes) 騎兵之間的战斗，他写道："兩个孟美留克人無疑地胜过三个法国人，一百个孟美留克人同一百个法国人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人多半胜过三百个孟美留克人，而一千个法国人則总是能够打敗一千五百个孟美留克人。"正好似馬克思所說的，为要使交換价值量能轉变为資本，就必須有虽然是变化着的、然而是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交換价值量，同样，照拿破侖說来，要使表現为队列严整而行动有計划的这种紀律性显出力量来，要甚至胜过馬匹較好、騎术劍法較精、勇敢至少相等而人数更多的非正規騎兵，就必須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騎兵队的数量。但难道这是一个反对杜林先生的例証嗎？难道拿破侖在同欧洲的斗爭中沒有被徹底击潰嗎？难道他沒有节节敗退嗎？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把糊塗混乱的黑格尔观念引用于騎兵战术之中！

十三　辯証法。否定的否定

"这个历史的概述（所謂英国原始資本积累的产生），算是馬克思書中还比較好的一部分，可是如果他除了倚据科学的拐杖之外，不

再倚据辯証法的拐杖，那么或許更要好些。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在这里——由于缺乏較好的、較明白的方法——起着接生婆的作用，因它之助，便从过去的胎中产生了將来。十六世紀以来，通过上述方法达到了个人所有制的消灭，这是第一个否定，之后跟着产生另一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同时被称为是'个人所有制'的恢复，但这种个人所有制是具有高級形式的，是在共有土地和劳动工具的基础之上的。如果馬克思先生把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同时也称为'公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現出黑格尔的高級的統一，在这种統一中矛盾被揚棄，用黑格尔的游戏文字来表达，这就是矛盾同时既被克服又被保留……　这样，剝夺者之被剝夺，好像是历史現实在其物質的外部条件下的自动产物……　不見得会有一个理智的人，憑着对黑格尔戏法——类如否定的否定——的信仰就会确信共有土地和共有資本的必然性……　其实，馬克思的糊塗而又拙劣的观念，并不能使那些知道用黑格尔辯証法这种科学材料能够作出什么来（或者說得更确切些，从它中間能够得出怎样的無稽之談来）的人感到惊奇。对于那些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該明白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起着从基督教教理問答中剝窃下来的墮落这一概念的作用，而第二个否定則是起着引向贖罪的高級統一的作用。事实的邏輯当然是不能建立在这样的抄自宗教領域的类比的戏法之上的……　馬克思先生滿足于那种个人的同时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乱七八糟的观念，而讓自己的信徒們自己来解决这一意味深長的辯証法之謎。"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說的。

这样說来，馬克思如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無法証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以及建立土地公有制与生产資料(劳动所生产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从宗教那里抄襲来的这种类比戏法之上树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論，并做出这样的結論，說在未来的社会里將存在既是个人的同时又是公共的所有制，以作为黑格尔的揚棄了的矛盾的高級的統一。

我們現在暫且把否定的否定放在一边，而来看一看"既是个人的

同时又是公共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作“糊塗”，他在这点上——很奇怪——眞的是对的。不过很可惜，“糊塗”的根本不是馬克思，而却是杜林先生自己。正好像以前因为他善于运用黑格尔的“胡思乱想”的方法，而能够毫不費力地肯定尚未写完的几卷“資本論”中会包含些什么內容，同样地，在这里他也不費大的力气，就可以按照黑格尔来修正馬克思，給馬克思加上他所从未道过只字的什么所有制的高級的統一。

馬克思說：“这是否定的否定。它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資本主义时代的成果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就是說，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土地的共有和他們所生产的生产資料的共有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从那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变为資本主义的私有制，自然是比从事实上已經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資本主义私有制轉变为公有制長久得多、困难得多、艰苦得多的过程。”㊀全部就是如此。这样，剝夺者被剝夺后所創立的制度就是以土地公有和劳动者自身所生产的生产資料的公有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任何懂得德文的人都可以理解，这意思就是說，公有制普及于土地和其他生产資料，而个人所有制則普及于其他的产品即消費品。为了使得甚至六岁小孩子也懂得这点起見，馬克思在第五六頁上提出一个“用共同生产資料来劳动的，并且有計划地把他們各个人的劳动力作为社会的統一劳动力来使用的自由人們的联盟”，也就是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則組織起来的联盟，并且說：“这个联盟的全部劳动产品是公共的产品。这产品的一部分重新被用来作为生产資料，它仍然是公共的。可是另一部分作为联盟成員的生活資料而被消費。所以这一部分应当分配給他們。”㊁所有这些，甚至对于杜林先生的被黑格尔主义弄糊塗了的头腦，也应当是足够清楚的了。

既是个人的同时又是公共的所有制，这种糊塗拙劣的观念，这种

㊀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参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九六四至九六五頁。——譯者注

㊁ 同上書，第六二頁。——譯者注

从黑格尔辯証法中得出的無稽之談，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馬克思讓其信徒自己去解决的这种意味深長的辯証法之謎——这一切又是杜林先生的随意揑造和臆想。被杜林当作黑格尔派的馬克思，不能不提出眞正的高級的統一以作为否定的否定的成果，可是由于馬克思作得不像杜林先生所要他作的那样，所以杜林先生只得又表現出他的崇高尊貴的风格，为着完全眞理的利益而把他自己的貨色冒充是馬克思的。这种甚至毫無例外地絕对不能正确引証的人，自然对于别人的"高深莫測"又憤塡膺，而这些别人却毫無例外地总是正确地引証，也就正因为如此而"很拙劣地掩盖自己对于当前所引証的作者的全部思想之缺乏理解"。杜林先生眞对，崇高风格的历史記述万岁！

直到現在我們总是这样地假定，就是杜林先生堅持作錯誤的引証时至少是实心实意的，这或者是由于他自己完全不能正确地理解事物，或者是由于崇高风格的历史記述所特有的只憑記忆来引証的那种习慣——通常被称为草率馬虎的习慣。可是好像我們已达到了这样的一点，这一点在杜林先生那里量已經轉化为質。如果我們估計到：第一，这点在馬克思書上叙述得完全清清楚楚，而且在同一書上的别的地方还补充了絕对不容誤解的說明；第二，不論在上述的登載于"补編"的对于"資本論"的批評中，不論在"批判史"第一版所載的批評中，杜林先生都沒有發現"既是个人的同时又是公共的所有制"这样一个怪物，而只在他的書的第二版上，就是說在三讀"資本論"之后才發現了这一怪物；最后，只是在这个按照社会主义精神修訂的第二版上，杜林先生才把关于未来社会組織的尽可能多的荒唐意見硬挂到馬克思名下，以便使自己能够与之相反地更加庄严肅穆地提出"我在自己的講义中从經济上和法律上予以描繪的那种經济公社"（他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我們估計到这一切，那么就会得出一个結論，而且几几乎是杜林先生逼使我們得出这样的結論，即杜林先生在这里是故意地来"有利地扩展"馬克思的思想，就是說对杜林先生自己有利。

可是否定的否定究竟在馬克思著作上起了什么作用呢?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七九一頁及以后几頁㊀上,馬克思綜述了前五十頁中所作的关于所謂資本的原始积累的經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結論。在資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对自己生产資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所謂資本的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在于剝夺这些直接生产者,就是說,消灭那种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消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狹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圍和社会范圍相适应,而在一定的發展阶段上,这种小生产自己就造成本身消灭的物質基础。这种消灭，这种从个人的和零散的生产工具到社会地集中的生产工具的轉变，就構成資本的前史。当劳动者轉变为無产者,而他們的生产資料轉变为資本的时候,当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起来的时候,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及其他生产資料的进一步轉变为資本,因而对于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剝夺,便采取了新的方式。"現在必須加以剝夺的，已經不是自己經营的劳动者，而是剝削許多工人的資本家。这种剝夺是由于資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由于資本集中的結果而發生的。时常是一个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和这种集中并行或者和这种少数資本家对于許多資本家的剝夺并行的,就是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不断扩大,科学日益被自覺地应用于生产技术过程中，土地日益被有計划地共同耕种，劳动資料日益变为只能被共同使用的資料，一切生产資料因当作联合起来的社会化劳动的共同生产資料使用而日益获得有效利用。随着攫取和壟断这种轉变中全部利益的資本巨头的不断减少，貧困、压迫、奴役、墮落、剝削却不断增加，而同时为資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結構本身所訓練、联合和組織起来的并日益壯大的工人阶級的反抗也在不断增長。資本成为那种与自己一起并在自己庇护下成長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資料的积聚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与它們的資本主义外壳不能并存的地步。这种外壳就要破裂了。資

㊀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参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頁。——譯者注

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鐘响起来了。剝夺者就要被剝夺了。"㊀

現在我請問讀者：哪里有辯証法的詭誕的花样和杂乱的思想呢？哪里有把一切差别都化为烏有的概念的混淆和曲解呢？哪里是为忠实信徒創造的辯証法的奇迹呢？哪里是辯証法的神秘玩意和按照黑格尔邏各斯学說要的把戏（据杜林先生說，沒有这些，馬克思便無法自圓其說）呢？馬克思只是从历史上予以証明并在这里簡短地概述，說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發展而必然产生自身消灭的条件，即小私有者被剝夺的条件一样，現在資本主义生产自身也产生了使它一定归于灭亡的物質条件。这是历史的过程，如果它同时又是辯証的过程，那么这已經不是馬克思的过錯了，尽管杜林先生覚得馬克思是注定要犯錯誤的。

馬克思只是在提出自己的历史的和經济的証明之后，才繼續說道："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以及資本主义的私有制，是那种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資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由它自己循着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而实現的。这就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所已經引証过的）。

所以当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想也沒有想到要以此来証明这一过程的历史必然性。相反地，在他以历史观点証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已經眞正实現，部分往后还一定要实現以后，他才指明，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是按一定的辯証法的規律發生的。全部就是如此。由此可見，杜林先生說否定的否定在这里起了接生婆的作用，因她的幫助而从过去的胎中产生了將来，或者說好像馬克思要求誰憑着对于否定的否定規律的信仰而去确信共有土地和資本的必然性（而这后者本身已經是杜林所說的"徹头徹尾的矛盾"）——所有这些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純粹的揑造。

下面的事实也足以說明杜林先生完全不懂辯証法的本性，他認为辯証法是某种單純証明的工具，正像由于狹隘的理解可以把形式

㊀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参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九六四頁。——譯者注

邏輯或初等数学看成是这样的工具一样。可是甚至形式邏輯首先也是寻找新結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辯証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处在更高的阶段上罢了；而且，辯証法突破形式邏輯的狹隘的眼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广大的世界观的萌芽。在数学上也有相同的相互关系。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至少就总的說来，是在形式邏輯的范圍內活动的，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按其本質来說也不是别的，而是辯証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在这里，簡單的証明同这一方法在新的研究領域內多方面的运用相比較，肯定地落到了次要地位。可是高等数学中从微分学的最初的一些証明开始，几乎所有的証明，从初級数学的观点来看，严格地說都是錯誤的。同样，像在这里那样要用形式邏輯去証明辯証法領域中所获得的結果，那么情况也必然如此。企圖仅仅用辯証法去向杜林先生那样的愚蠢的形而上学者証明什么东西，那就正好像莱布尼茲及其門生向当时的数学家証明微积分定理一样，都是枉費气力的。微分在这些数学家中間所引起的痙攣，正好像否定的否定在杜林先生身上所引起的痙攣一样，其实在否定的否定中，我們可以看到，微分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先生們，只要当时未曾去世，到了最后就嘟嘟噥噥地投降了，这并不是因为他們被說服了，而是因为所得的解答总是正确的。杜林先生，如他自己所說的，現在还不过四十来岁，如果他高寿——我們这样希望着他——那么他也会經历同样的情形。

可是，使得杜林先生的生活如此难过并且在杜林先生眼中起着好比褻瀆聖灵在基督徒眼中所起的那样罪大惡极的作用的、可惡的"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这是非常簡單的、到处、每天發生的过程，如果清除掉它上面的、被旧时唯心主义哲学蒙上的、而且無能的形而上学者如杜林先生之流为着自身利益还想繼續蒙上去的那層神秘的翳障，那么它是任何小孩子也都可以理解的。举大麦粒为例来說，亿万粒的麦被磨碎、煮熟、做酒，以后被消耗掉，可是如果这样的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条件，如果它落到适宜的土壤

里，那么在热和水分的影响之下，它就發生特有的变化：它發芽生長，而麦粒本身停止存在，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由它生長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这种植物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生長、开花、結实，最后又产生麦粒，麦粒一成熟，麦稈即形枯萎，它也被否定了。这里我們又有了原来的麦粒，它是这一否定的否定的結果。可是它不是一粒，而是加了十倍、二十倍或三十倍。谷类的种，变化得非常緩慢，所以現代的大麦差不多和一百年以前的大麦一样。可是如果举一种容易变化的观賞植物为例，如大丽花或蘭花，假使我們以园艺家的技巧去培育种子和由种子長出的植物；那么經过这个否定的否定，我們得到的不但是更多的种子，而且是品質改良了的，能开更美丽的花朵的种子，这个过程的每次重复，每一新的否定的否定都提高了这种完善性。像我們在麦粒上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过程也在大多数昆虫——例如蝴蝶——那里發生，蝴蝶通过卵的否定而产生出来，它們經过各种变化阶段而达到性的成熟，它們交尾并又被否定，就是說，在完成繁殖过程和雌蝴蝶下了很多卵之后，它們就归于死亡。至于其他动植物，这个过程的实現不是采取这样簡單的形式，它們在死亡之前，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地結子、下卵或生育后代，但这些在这里是無关紧要的；在这里，我們只是要說明，否定的否定眞实地發生于有机界的兩大界中。再次，全部地質学，正是自身遭到否定的否定的系列，正是旧岩層的不断破毀和新岩層的不断形成的系列。起初，由于灼热液体冷却而产生的原始地壳，經过海洋、气象及风化等等的作用而碎裂，这些碎裂的物体，一層層淤积在海底，有些地方海底高出海面，于是又使这种最初冲积層的一定部分，再次經受雨水、四季变化的湿度、大气中的氧和碳酸等的作用。从地心冲破地層爆發出来、而后冷却凝結的熔岩，也經受同样的作用。这样，在亿万年間不断地形成新地層，而它們大部分又重新破毀，又成为構成新地層的材料。可是这一过程的結果是极为积极的：它造成了由最复杂的化学元素所構成的、并且处于自然地被粉碎的狀态中的土壤，这样就使得极其丰富的和各式各样的植物可能生長起来。

在数学上也是这样，試拿任何一个代数上的数，把它称作 a，如果我們否定它，我們就得出 −a(負a)，如果我們否定这一否定，以−a乘−a，那么我們就得出 $+a^2$，就是說，得出了原来的正数，可是它已处在高級的阶段，即乘方的阶段。至于我們通过把正 a 自乘得出 a^2 的办法可以得到同样的 a^2，那在这里是無关紧要的。因为这种已被否定的否定如此牢固地存在于 a^2 中；使得 a^2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有兩个平方根，即 $+a$和 $-a$。不能摆脫这种被否定的否定，不能摆脫平方的負根；这种情况，在二次方程式中已經具有极其显著的意义。——在高等分析中，即在杜林先生自己称为最高数学运算、而通常称为微积分的"求無限小总和"的运算中，否定的否定更触目地表現出来。这些計算是如何进行的呢？例如，我在某一习題中，有兩个变数 x和y，兩者之中一个变化之时，另一个也一定要按照习題中的条件所規定的关系同时变化。我把 x 和 y 化成微分，就是說，把它們当作無限小，使得它們同任何一个無論怎样小的实数比較起来都成为烏有，使得 x和y 除了它們那种沒有任何所謂物質基础的相互关系之外，什么都沒有，这样，剩下的就是沒有任何数量的数量关系。所以 $\frac{dy}{dx}$，x和y 的微分之間的关系等于 $\frac{0}{0}$，可是这 $\frac{0}{0}$ 是 $\frac{y}{x}$ 的表現。我仅仅附帶指出，这兩个已經消失的数的关系，它們消失的确定的一瞬間，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可是这种矛盾并不怎样困扰我們，正好像它差不多二百年来根本不曾困扰数学一样。可是这难道不是說我否定了 x 和 y 嗎？只是这否定的意义并不是說我和它們沒有什么关系了——形而上学者正是这样否定的，而是說我根据条件予以否定了。这样，在这些公式或方程式中我得到了 x和y 的否定来代替 x 和 y，即 dx 和 dy。往后我繼續运算这些公式，把 dx 和 dy 当作是实数——虽然是服从某些特殊規律的数——到了某一点上我否定了否定，就是說，把微分式予以积分，于是代替 dx和dy 又重新得到实数 x和y，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不是簡單地回到了出發之点，而是解答了使普通的几何和代数碰壁的那种习題。

在历史上的情形也并沒有兩样。所有文明的各族人民都是从土

地的公社所有制开始的。各族人民經过了原始狀态的一定阶段之后，土地的公社所有制在农业的發展进程中变成为生产的桎梏，它被廢除、被否定，并且經过了較長或較短的中間阶段之后轉变为私有制。可是当农业由于土地的私有制而达到較高的發展阶段时，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像目前在小土地占有制和大土地占有制方面所看到的那样。由此就必然会提出否定現在已經是私有的土地占有制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指恢复原始的土地的公社所有制，而是指建立远为高級的，發达的公有制形式，它不仅不成为生产的障碍而且相反地第一次使生产从阻碍它發展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使生产有可能充分利用近代化学上的發現和力学上的發明。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古希腊罗馬哲学是原始的自發的唯物主义。作为自發的唯物主义，它不能闡明思維对物質的关系。可是，弄清这个問題的那种必要性，引起了关于脫离肉体的灵魂的学說，而后引起了灵魂不死的說法，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的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在哲学的繼續發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現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現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簡單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兩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發展中的全部思想內容以及这兩千年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內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巩固基础上去。一般地說这已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門現实的科学中得到証实，并表現出来。这样哲学就被"揚棄"了，就是說，"同时既被克服又被保留"了；在形式上被克服了，而在其眞实內容上被保留了。因此，在杜林先生認为只是"文字游戏"的地方，只要比較仔細地研究一下，就会發現眞实的內容。

最后，甚至盧騷的平等說（杜林先生的平等說只是它的貧乏的、伪造过的复写）如沒有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尽接生婆之劳，恐也不能建立起来——而这还是黑格尔誕生之前二十多年的事。盧騷的学說远沒有因这种作用而覚得可恥，它在自己最初的闡述中，可說是精

采地显示了自己的辯証的起源。人在自然的未开化的狀态中是平等的；由于盧騷已把語言的产生看成是对自然狀态的歪曲，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把同一物种范圍內动物的平等也加到动物—人的身上，近来海克尔在分类中把动物—人假定为 alali——沒有語言的人。可是这些彼此平等的动物—人与其他动物相較有一种特長即具有趋于完善和往前發展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就成了不平等的原因。这样，盧騷就看到了不平等的产生是进步。可是这种进步包含着对抗，它同时又是退步。"所有向前的进步（与原始狀态相較）只是个人完善化方向上的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們引向人类的沒落。金屬的鑄造和农业是这样的兩种艺术，它們的發現引起了这一巨大的革命"（把原始森林地变为耕地，但同时由于財产的确立而产生了貧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沒落下去的东西，在詩人看来是金和銀，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鉄和谷物。"文明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进一步。随文明一起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各种机構，轉变为同它們原来的使命相反的机構。"人民設立王公是为着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着毀灭自由，这是無可爭辯的事实，这也是整个国法的基本規律。"可是这些王公必然地成为人民的压迫者，而且他們把压迫加重到这样的地步，使得达到极端的不平等又重新向自己的对立面轉变，成为平等的原因；在專制暴君之前大家都是平等的，就是說大家都等于零。"这里是不平等的頂点，这是結束了循环的終极点，它和我們所由之出發的起点相遭遇：在这里一切个人之所以是平等的，正是因为他們都等于零，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沒有别的法律。"但是專制君主只在其尚能使用暴力之时，才是主子，因此"当他被驅逐之时，他是不能抱怨暴力的……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都按照正确的自然道路前进"。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轉变为平等；可是不是轉变为沒有語言的原始人的旧的自發的平等，而是轉变为更高級的社会公約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的否定。

所以，我們在盧騷的書上，不但已經可以看到那种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論述同出一轍的議論，而且还可以看到盧騷所詳細叙

述的一系列和馬克思运用得相同的辯証的說法：本質上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朝向它的对立面的轉化，最后，作为一切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因此，虽然在一七五四年盧騷还不能用"黑格尔的慣用語"来說話，但無論如何他在黑格尔誕生前二十三年就已經深刻地傳染上了黑格尔主义、矛盾的辯証法、邏各斯学說、神学邏輯等等的瘟疫。当杜林先生为着把盧騷的平等說庸俗化而擺弄自己的兩个应当享受荣誉的男人的时候，他已經摔倒在斜坡上，而無可挽救地滾到否定的否定的怀抱中。那种被形容成理想制度的、其中盛行着兩个男人平等的制度，在"哲学講义"的第二七一頁上被称为"原始制度"。在第二七九頁上說这种原始制度必然为"掠夺制度"所推翻——第一个否定。可是在我們时代，托現实哲学的福，我們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使得我們能够廢除掠夺制度，而代之以杜林先生所發明的、以平等为基础的經济公社——这是否定的否定，高級阶段上的平等。这是一个有趣的、有利于扩大我們眼界的場面：杜林先生亲自犯了否定的否定的滔天罪行！

所以，什么是否定的否定呢？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因而也是非常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維的發展規律；这一規律，像我們所已經看到的，表現于动植物界中，表現于地質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对于这一規律，就是杜林先生自己，不管他如何頑强抵抗，也总是不知不覺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遵循的。当然，譬如在我說麦粒的發展过程是否定的否定时，我还絲毫沒有講到麦粒从發芽起到麦株死亡为止的特殊的發展过程。而积分的演算也同样是否定的否定。这么說来，要是我限于这种一般的論断，似乎就会得出这样一个謬論，說麦穗的生活过程就是积分演算，或者說就是社会主义。这种謬論正是形而上学者常常强加到辯証法身上的。当我說到所有这些过程是否定的否定时，我是用这一运动規律把所有这些过程概括起来，因此我就不去注意每一特殊过程的各别特点。辯証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維的运动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学。

可是或許有人反駁道：这里所發生的否定不是眞正的否定；如果

我把麦粒磨碎，我就否定了麦粒；如果我把昆虫踩死，我就否定了昆虫；如果我把正数 a 涂掉，我就否定了正数a，等等。或者，我說玫瑰不是玫瑰，我就把玫瑰是玫瑰这句話否定了，那么当我說玫瑰終究还是玫瑰而又重新否定这一否定时，这里能得出什么来呢？——事实上这些就是形而上学者反对辯証法的主要論据，它們是完全与形而上学思維的狹隘性相称的。在辯証法中否定不是簡單地說"不是"或者宣布事物不复存在，或者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斯宾諾莎早已說过："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即任何的限制或規定同时就是否定。再說，否定的方式在这里第一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質，第二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質。我不但应当否定某个东西，而且应当重新揚棄这个否定。所以我应当这样地实現第一个否定，即要使第二个否定可能發生或者將有可能發生。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这就要以每一个别場合的特殊性質为轉移。如果我磨碎了麦粒，或者踩死了昆虫，那么我虽然完成了第一个否定动作，可是却使第二个否定成为不可能了。所以，对于每一种事物以及对于每一种观念和概念，都存在着自己特种的否定，即借之以获得發展的那种否定。在微积分中的否定不同于从負根得出正数乘方时的否定。这点和其他一切一样，是应該学习的。仅仅知道麦穗和微积分被"否定的否定"这个概念所概括，我还不会把麦子种好，也不会求微积分，正好像仅仅知道音調取决于絃的粗細長短的規律，我还不会演奏提琴一样。可是，如果把否定的否定当作兒戏——順次地写上，又塗掉，順次地說玫瑰是玫瑰，又說玫瑰不是玫瑰——那么在这样的否定的否定中除了于此种乏味勾当的人的愚蠢以外，什么也看不出来。可是形而上学者却要我們确信，如果我們要作否定的否定，那就应当采取这种似乎是正确的方式。

所以，把我們弄得神秘莫測的，又不是别人，而是杜林先生，他断言否定的否定似乎是黑格尔所發明的、从宗教領域抄襲来的、按照犯罪与贖罪的故事而作的奇怪的类比。人們远在知道什么是辯証法之前，就已經按照辯証法来作論断了，正好像人們远在"散文"这一名詞

出現以前，就已經用散文說話一样。否定的否定这个規律在自然界和历史中起着作用，当它还沒有被認識之前，它也在我們头腦中不自覚地起着作用；这个規律只是被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出来。如果杜林先生悄悄地自己干这件事，而仅仅不喜欢这个名称，那么他可以找出更好的名称来。但如果他要想从思維中排除这件事的本身，那么請他先把它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排除出去，并請他發明 $-a$ 乘 $-a$ 不等于 $+a^2$，而微分和积分在受处罰的威胁之下被禁止使用的那种数学来。

（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二月出版的吳黎平譯本第一二二至一四七頁）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摘錄)

恩 格 斯

四

施特劳斯、鮑威尔、施蒂納、費尔巴哈，就他們沒有放棄哲学的立足地說来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后裔。施特劳斯在写了"耶穌傳"和"教义学"兩書以后，就只致力于芮南(Renan)㊀式的哲学的和教会史的文学作品。鮑威尔仅在基督教起源史方面做出了一点可观的事情。施蒂納甚至在巴枯宁把他同蒲魯东結合起来而給这个混合物取名为"無政府主义"以后，依然是一个宝貝。惟有費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可是他不但不能越过那冒充为一切科学的科学、即凌駕于一切專門科学之上而把它們联系在一起的哲学的界限，——这个哲学在他看来始終是不可侵犯的神聖东西，——而且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也是停留在半路上的，他下半截是个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个唯心主义者。他沒有用批評的武器克服黑格尔，而只是把黑格尔当做一种不适用的东西簡單地拋在一旁了；同时，他本人除了浮夸的愛的宗教和貧弱無力的道德以外，再不能拿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来和黑格尔体系的淵博而丰富的內容相匹敌了。

但是在黑格尔学派解体的时候，还形成了另一个学派，即唯一眞正产生結果的学派。这个学派主要是同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㊁。

㊀ 芮南(一八二三至一八九二)，法国的資产阶級历史学家、折衷主义哲学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一書，企圖依靠伪科学的論斷，保护宗教和唯心主义。他反对巴黎公社和民主主义。——譯者注釋

在这里，跟黑格尔哲学的分裂，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的观点而發生的。这就是說，这一学派的人們，决意把現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理解为它本身在每一个不帶唯心主义成見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現的样子；他們决意毫不痛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上而不是从什么幻想的联系上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的虛構。而唯物主义的意义一般来說正不外于此。新的学派特出的地方，只是在于这里第一次眞正严肃地对待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把这世界观徹底地（至少在主要特征上）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識領域里去了。

黑格尔不是簡單地被抛棄了。恰恰相反，上面所說的他的哲学的革命方面，即辯証方法，是被抓住了。但是这个方法依照黑格尔的形式是不适用的。黑格尔的辯証法是概念的自我發展。絕对概念不但永久存在着（不知是在哪里），而且構成了全部現存世界的眞正的、活躍的灵魂。絕对概念通过那在"邏輯学"中詳細考察过并完全包含在这个概念自身里面的一切預备阶段，而向着自己本身的方向發展着。然后它使自己"異化"，轉化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并沒有意識自己本身，而是采取天然的必然性的形式，經过新的發展，終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識。在历史上，这个自我意識又从粗野狀态掙脫出来，直到絕对概念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又完完全全地达到自己本身为止。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辯証的發展，亦即通过一切迂迴曲折和一切暫时退步而由低級到高級的漸进运动的因果联

㊀ 我在这里要作点个人的說明。近来有人不止一次地指出說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論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說几句話，把这个問題弄明白。我不能否認，我与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个时期以前和这个时期以內，無論在創立这一理論方面，或特别是在闡發这一理論方面，我都作过某些独立的参加。但是絕大部分的基本的領导思想，特别是在經济和历史領域內，都是屬于馬克思的；而且对这些領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更是屬于馬克思的。凡我所提供的，也許除了兩三个專門的領域外，馬克思沒有我也能很容易地作到的。至于馬克思所做了的，我却永远也不能做到。馬克思比我們一切人都站的高些，看的远些，观察的多些和快些。馬克思是天才，我們至多是能手。沒有馬克思，我們的理論，远不会有現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論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平的。（恩格斯原注）

系，在黑格尔看来，只是概念自我运动的痕迹；这种概念的自我运动是永远不知在什么地方發生的；但無論如何，是永远同任何能思維的人的头腦完全無关的。这种思想体系上的歪曲是应該排除的。我們回到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后，重新把人的概念看做現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把現实事物看做絕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辯証法便归結为研究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維的一般运动規律的科学：兩个系列的規律，它們在本質上是同一的，但在表現上却是各異的，这只是因为人的头腦可以自覚地应用这些規律，而在自然界中（到現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也是如此）这些規律是不自覚地、以外界必然性的形式、在無穷的表面上的偶然性中間为自己鋪設道路。这样，概念的辯証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現实世界的辯証运动的自覚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辯証法就被倒轉过来了，最好是說，使它兩脚着地了，因为以前它是用头着地站着的。并且，値得注意的是，不仅我們發現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們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鋭利的武器——唯物主义辯証法；德国工人狄慈根㊀也不依靠我們，甚至不依靠黑格尔而重新發見了它㊁。

这样，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被恢复过来，同时也被解除了那曾經妨碍黑格尔把它貫徹到底的唯心主义鐵边。一个偉大的基本思想，即認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总和，而是許多过程的总和，在这一总和中，各个似乎毫不变易的事物以及人的头腦所攝的它們的思想的模像、概念，都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有的在發生着，有的在消灭着，并且，一种前进的發展，不管有怎样表面上的偶然性，也不管有暫时的倒退，終究会給自己打通一条道路，——这个偉大的基本思想，从黑格尔的时代起，就已經深入一般人的意識，現在未必有人还会出来从它的一般形态上来反对它了。不过，口头上承認这个思想

㊀ 狄慈根（一八二八至一八八八），德国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哲学家，独立地得出辯証唯物主义的基础。虽然他在一些概念上有若干混乱，但像列宁指出的，狄慈根是个唯物主义者和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信仰阶級和不可知論。——譯者注釋

㊁ 見“一个体力劳动者所闡述的人的脑力劳动之本質”一書，汉堡·麦斯漢尔出版局出版。（恩格斯原注）

是一回事，而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每一个别場合和每一具体研究領域，却是另一回事。要是我們在研究工作中經常抱着这种观点，那末凡要达到最終解决和永久眞理的要求就永远失去意义了；我們永远不要忘記，我們所获得的一切知識，是必然受到我們在获得这些知識时所处的环境的局限和制約的。同时，那些在旧的、但还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学看来不能克服的对立，如眞理和謬誤、善和惡、同一性和差别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等等，再也不能使我們对之表示过度的尊敬了。我們知道，这些对立仅有相对的意义：凡今天被承認是眞理的东西，都有現时隐蔽着而过些时候会显露出来的錯誤的方面；同样，凡現在被承認是謬誤的东西，也都有眞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認做眞理；那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种种純粹的偶然所構成的，而被認为是偶然的东西，則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法，即黑格尔称为"形而上学"㊀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这种方法的残余至今还牢牢地

㊀ 形而上学有兩种意思：1.在十八世紀末叶以前，是一种哲学名称，似乎是研究感官所不可达到的一切东西，即超經驗的东西，如神、不朽、灵魂等；2.是一种与唯物主义辯証法相反的世界观——思維方法，它的特征是把事物和現象看作是彼此隔絕、無关、一成不变的。

形而上学一詞起源于古代希臘对亞理斯多德一些著作所起的名称。亞氏逝世后約三百多年（即約在公元前六十至五十年），安得罗尼克在整理出版亞氏的著作时，把他的論究世界本原即有关哲学基本問題的著作放在論究自然科学的"物理学"以后，叫做"物理学之后"或"超物理学"。因此，后来产生一种习慣，把玄妙地推究世界本原的論断或学說，便用"物理学之后"一詞来表示。因之，我国便直譯为"形而上学"，或意譯为"玄学"。

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人类認識發展上的一个必經阶段。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發生和發展需要發展自然科学。而在自然科学發展初期，人們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整体分割开来，把自然現象分成一定門类，对物体的形式和内部結構作了描述，对动植物进行了解剖。这使自然科学从十五世紀下半期以来获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却造成一种习慣，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看做是孤立的、沒有普遍联系的，因而也就把它們看做不是处在运动中，而是处在靜止狀态中，不是把它們看做是根本变化着的，而是看做是不变的，不是看做是活的，而是看做是僵死的。后来培根和洛克就把这种研究方法搬到哲学上来，形

盤据在人們的头腦中，但是这种方法在它产生时是有重大的历史理由的。在着手研究某种过程以前，应当先研究事物。应当首先知道这一事物是什么，然后才可以研究其中所發生的变化。自然科学方面的情形，正是这样的。那認为事物一成不变的旧的形而上学，就是从这种把自然界的無生物和有生物都当作一种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成長起来的。当对个别事物的这种研究已經进展到可以向前作出新的决定性步驟的时候，也就是說，已經可以着手有系統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發生的变化的时候，于是在哲学領域內就响起了旧的形而上学的灭亡的丧鐘。的确，在上一世紀末以前，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即研究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紀，自然科学在本質上已成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即研究过程、研究这些事物發生和發展、研究那把自然界这些过程結合为一个偉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了。研究动植物有机体种种过程的生理学，研究个别机体从胚芽狀态到成熟时發展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漸形成过程的地質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們这一世紀的产兒。

对于自然界中所發生的种种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認識，特别是由于以下三种偉大發現而大步地前进了：

第一、是由于細胞的發現，即發現細胞是一种單位，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这一單位的繁殖和分化而發展起来的。这一發現，不仅使我們相信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着一个共同規律發育和生長的，而且它指出細胞具有变異能力，从而就說明了引起有机体物种变異的道路，由于这种变異，有机体才能实現一个比起單純的个体發育

成一种孤立地、沒有联系地观察問題的思維方法。

首先把形而上学用于"反辯証法"一义的是黑格尔，他批評了十七和十八兩世紀的形而上学，包括康德的見解在內。他認为旧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缺点是在于它不是把事物看作运动的，使本質与現象、形式与內容脫离。但是这位唯心主义者并沒有使这一名詞的意义得到应有的論証和正确的揭露。

馬克思和恩格斯才賦予"形而上学"二詞广泛的意义，把"形而上学"当作与唯物主义辯証法相反的世界观这个概念来使用。他們概括了科学的論据和社会發展的經驗，表明了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弱点，不能使人滿意，而以科学的唯物主义辯証方法与它对立。——譯者注釋

更重大的發育过程。

第二、是由于能的轉化的發現，这一發現表明了那一切首先在無机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所謂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力，所謂位能、热、放射（光和輻射热）、电、磁、化学能等，都是万有运动的各种表現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数量关系由一个轉变为另一个，因此当一种形式的某个数量消灭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数量代之出現，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归結为一种形式轉化为另一种形式的不断过程。

第三、是由于达尔文初次提出的有联系性的証据，这些証据証明現在我們周圍的一切有机体，連人也在內，都是由于少数原先为單細胞的胚芽經过長期發展的結果而發生的，这些胚芽又是由那些借化学作用而發生的原形質或蛋白質所形成的。

由于有这三个偉大發現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成就，我們現在不仅能够發現那存在于自然界个别領域內种种过程之間的联系，而且整个說来也能發現那把这些个别領域結合起来的联系了。这样，依靠实驗的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材料，就可以用頗有系統的形式描繪出自然界这一有联系的整体的全貌。描繪这样一种自然界的全貌，在以前是所謂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繪，就是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它还不知道的現象的眞实联系，用虛構来代替所欠缺的事实，仅仅从想像上来填补事实上的空白。这样，自然哲学也說出了許多天才的思想，預測到了許多未来的發現，然而也有不少謬論。当时是不能不这样的。現在，我們只要用辯証法去观察一下自然研究的結果，而从这些結果的自身联系的观点去观察一下，就足以制成一个現代令人滿意的"自然体系"，并且現在对这种联系的辯証性的意識，甚至已不顧自然科学家們的意志而滲入到他們的形而上学的头腦中了，所以現在自然哲学也就完結了。凡想使它复活的任何企圖，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后退一步。

（一八八八年。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十月第三版張仲实譯本第三一至三六頁）

卡尔·馬克思(摘錄)

列　宁

辯　証　法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黑格尔辯証法这一最周到、最富有內容和最深刻的發展論，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他們認为其他一切表述發展原則，表述进化原則的說法，都是片面性的和內容貧乏的，都是把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实际發展过程（往往有突变，剧变和革命發生的过程）弄得殘缺不全的。“当时差不多只有我和馬克思才救出了自覚的辯証法（使其不致与包括黑格尔主义在內的唯心主义同被粉碎），并把它改变为唯物的自然观”。“自然界是辯証法底証实，并且正是現代自然科学指明这种証实非常丰富”（这是在鐳、电子以及元素变化律等等尚未發現以前写的呵！），“每天都提供出大批新的材料，証明自然界中的現象归根到底是辯証性而不是形而上学性的”。

“偉大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写道，——即認为世界不是由什么一成不变的物象所構成，而是許多过程底总和，其中各个似乎毫不变易的物象及其反映于人腦中的意象或概念，都是处在不断变化的狀态中，时而發生，时而消灭的，——这个偉大基本思想，从黑格尔时代起就已深入于一般人的意識，現在未必还有人会去根本表示反对了。可是，口头上承認这个思想是一回事，而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每一具体場合和每一具体研究部門，却是另一回事”。“在辯証哲学看来，根本沒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絕对的，神聖的东西。它認为一切和任何現象都含有必然崩溃底迹象，除了不断發生和消灭的过程，由低級升

至高級这一毫無終极的上升过程外，再沒有什么东西能避免这种崩潰。辯証哲学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維的人腦中的反映”。因此，馬克思認为辯証法是“論外部世界运动以及人类思維运动一般法則的科学”。

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这一革命方面接收过来，并加以發揮了。辯証唯物主义“并不需要有什么临駕于其他科学以上的哲学”。先前的哲学只留下了“論思維及其法則的学說，即形式邏輯和辯証法”。依照馬克思底理解，以及据黑格尔看来，辯証法本身就包含有現今所称呼的認識論，这个認識論同样应当用历史眼光去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归納認識底起源和發展，从不識进到認識的过程。

在現今这个时代，發展观念，进化观念，差不多完全透入了一般人的意識，但不是經过黑格尔哲学，而是沿着另一途徑透入的。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而加以闡發了的这个观念，要比流行的进化观念周到得多，內容丰富得多。發展好像是重复着已往的阶段，但却是用另一种方式，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着已往的阶段（“否定底否定”）；發展不是按直綫式而是按所謂螺旋式行进；發展是突变式的，剧变式的，革命式的进程；“漸进过程底間断”；數变为質；因有作用于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現象范圍內，在某一社会內發生作用的种种力量和趋势相互矛盾或冲突而造成的內在的發展基因；每个現象底一切方面（而且历史日益揭示出各种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存，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离的联系，形成为統一的，規律性的，世界的运动过程；——以上就是辯証法这一內容（比之通常的）更丰富的發展論底几个特点（参看馬克思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致恩格斯的信，其中嘲笑了史騰所提出的“死板的三段式”，而認为把这种三段式与唯物辯証法混为一談是很荒謬的）。

（一九一四年七月至十一月間。摘自苏联外国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第二二至二三頁）

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摘錄)

列　宁

……

大概这些就是辯証法的要素。

或者可以較詳細地把这些要素表述如下：

辯証法的要素

(1)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論，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

(2)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

(3)这个事物(或現象)的發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

(4)这个事物中的內在矛盾的傾向(和方面)。

#

(5)事物(現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統一。

(6)这些对立面的斗爭或展开，各趋向的矛盾性等等。

(7)分析和綜合的結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計。

(8)每个事物(現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現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

(9)不仅是对立面的統一，而且是每个規定、質、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 的轉化。

(10)揭露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無限过程。

(11)人对事物、現象、过程等等的認識从現象到本質、从不甚深刻的本質到更深刻的本質的深化的無限过程。

(12)从幷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

(13)在高級阶段上重复低級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幷且

(14)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否定)。

(15)內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內容的斗爭。抛棄形式、改造內容。

(16)从量到質和从質到量的轉化。

((15和16是9的实例))

(一九一四年。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列宁"哲学笔記"第二〇九至二一〇頁)

再論职工会、目前形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摘錄)

列　宁

政治與經濟。辯證法與折衷主義

令人不得不重新提出这样初步的、常識性的問題，是很奇怪的。不幸得很，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却使我們不得不这样做。他們兩人責难我，說我"轉移"問題，或者說，我是"从政治上"处理，而他們却是"从經济上"处理。布哈林甚至把这一点放在他的提綱里面，企圖"提高"到駕于爭論双方之上，据說：我在把兩方統一起来。

理論上的錯誤是一目了然的。政治是經济的集中表現——我在自己的演說中曾經重复說过，因为我在以前就已經听到这个完全不恰当的、在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口中完全不允許的、对我的"从政治上"处理的非难。政治对經济不能不占第一位。想用别的方法来議論，这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义入門。

也許我的政治估計是錯誤的吧？那末，就請你說出来并証明这一点吧。但是，說(或者即使是間接地容許这样的思想)政治的处理与"經济的"处理有同等的价值，"二者"都可以采用，那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义入門。"

換言之，政治的处理，这就是說：如果不正确地处理职工会，那末，这就会使苏維埃政权，使無产阶級專政灭亡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度里，党与职工会的分裂，在党做得不对的条件下，一定会使苏維埃政权顛复的。)可以(而且应当)在本質上来檢查这种議

論，这就是說，分析、研究、决定这里所提出的处理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說：我"尊重"你的政治的处理，"但是"，这只是政治的处理，我們則"还"需要"經济的"处理，这就等于說：我"尊重"你的議論，說你在采取这种步驟时，你就会砸破你的腦袋，但是，也請你权衡一下，飽食和暖衣总比餓肚子和赤身露体要好些。

在宣傳把政治的处理和經济的处理結合起来时，布哈林是在理論上滾到折衷主义立場上去了。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事情描写成这样，据說我們所关心的是生产的增長，而你們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这种說法是錯誤的，因为問題只是(而站在馬克思主义者的立場上也只能是)在于：如果对事情沒有正确的政治的处理，則該阶級，便不能保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自己的生产任务。

更具体地来說吧。季諾維也夫說道："你們犯了政治上的錯誤，把职工会弄到分裂的地步了。关于生产的增長，我早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就已說过和写过了，我曾举出建筑澡堂为例子。"托洛茨基回答說："想想吧，拿澡堂的例子写一本小册子，那确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呵！(第二九頁) 但是，你們却沒有"只字"、"半語"(第二二頁)提到职工会应做些什么。"

錯了。澡堂的例子——請原諒我說句双关話吧——抵得上十个帶有若干"生产民主"的"生产气氛"。澡堂的例子，恰恰对群众，恰恰对"底層"，簡單而明了地說明：职工会应做些什么，而"生产气氛"和"生产民主"，則是遮住工人群众眼睛和使他們难于理解的垃圾。

托洛茨基同志也非难我說："列宁只字未提"(第六六頁)，"那叫做职工会机关的杠杆起着怎样的作用，和应当起怎样的作用。"

对不起，托洛茨基同志：我从头通讀了普得苏塔克的提綱，并同意了他的提綱之后，我关于这个問題所說的，比你的提綱及你的整个报告或副报告以及你的結論要更多、更完善、更正确、更簡單、更明白。因为，我再說一遍，实物奬金和同志紀律审判会，对于掌握經济、管理工业、提高职工会的生产作用，比"生产民主"、"联合"等諸如此

类的完全抽象的(因而是空洞的)話，意义要大过数百倍。

在提出"生产"观点(托洛茨基)或克服政治处理的片面性及把这种处理和經济的处理結合起来(布哈林)的借口下，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

一、忘記了馬克思主义，这表現在对政治和經济的关系所下的理論上錯誤的、折衷主义的定义上；

二、辯护和掩飾表現在整副政策上和貫穿于托洛茨基整个政綱小册子中的政治錯誤。而这种錯誤，假如不去認識它，不去改正它的話，就会引导到無产阶級專政的崩潰；

三、在純粹生产的、經济的問題方面，在怎样提高生产的問題方面倒退了一步；即从提出了具体的、实际的、切身的和活生生的任务(展开生产宣傳，好好地学会分配实物奖金和更正确地使用同志紀律审判会形式的强制办法)的會得苏塔克的实事求是的提綱，倒退到抽象的、脫离現实的、"空虛的"、理論上錯誤的、知識分子說法的、一般的提綱上去，同时忘記了最实事求是的和最实际的东西。

在关于政治与經济的問題上，一方面季諾維也夫与我，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与布哈林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就是如此。

因此，当我讀到托洛茨基同志十二月三十日所作的对我如下的反駁时，我不能不覺得可笑："列宁同志在苏維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我国形势报告的結論中曾說到，我們需要少来一点政治，而多来一点对于經济的关心，可是在关于职工会的問題上，他却把問題的政治方面，提到了第一位。"（第六五頁）托洛茨基同志以为这些話是"极其中肯"的。而实际上，这段話正表現了对于某些概念的极端的糊塗，表現了眞正不着边际的"思想上的混乱"。自然，我經常表示过，現在也表示，將来还要繼續表示一种願望，即我們要少搞些政治，而多搞些經济。但是不难理解，为了实現这种願望起見，就必須不發生政治上的危險和政治上的錯誤。托洛茨基同志所犯而由布哈林同志加以扩大和加深的政治錯誤，却使我們的党离开了經济的任务，离开了"生产"工作，不幸迫使我們耗費时間于糾正这些錯誤，消耗于同

工团主义的傾向(它会引导到無产阶級專政的坍台)作爭論，消耗于反对对职工运动的錯誤处理(这种錯誤的处理，会引导到苏維埃政权的坍台)的爭論，消耗于作一般"提綱"的爭論，以代替实事求是的、实际的、"經济的"爭論，誰最好地、最成功地分配了实物獎金，組織了审判会，根据十一月二日至六日全俄职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議所通过的魯得苏塔克的提綱，实現了"联合"：是薩拉托夫的面粉厂的工人呢，頓巴斯的矿工呢，还是彼得格勒的五金工人等等。

就拿"广泛討論"的益处問題来說吧。在这里，我們同样可以看到，政治的錯誤如何使我們离开了經济的任务。我曾反对过所謂"广泛"的討論，我过去認为而且現在还認为，托洛茨基同志破坏职工委員会(在这个委員会上，本来是应进行实事求是的討論的)，乃是一个錯誤，是一个政治錯誤。我認为以布哈林为首的緩冲集团的政治錯誤，是在于他們不懂得緩冲的任务(在这里他們以折衷主义代替了辯証法)；他們正应从"緩冲"的观点，用猛力出来反对广泛的討論，而爭取把討論移到职工会委員会里面去。請看一看；結果是怎么一回事吧。

十二月三十日布哈林竟說出了如下的話来："我們宣布了一个工人民主的新的神聖的口号，工人民主就在于一切問題不是在狹小的事务会里討論，不是在小型的会議上，也不是在自己的什么团体里討論，而是把一切問題提到广大的会議上去討論。所以，我断言，把职工会作用的問題，提到像今天这样大的会議上来，我們并不是倒退了一步，而是前进了一步。"(第四五頁)这个人竟責备季諾維也夫为空洞和夸大民主！完全空洞和"乱說"，完全不懂得形式上的民主主义应当服从于革命的适宜性！

托洛茨基也不見得好些。他提出这样的譴責："列宁想不惜一切地取消和破坏关于問題实質的討論。"(第六五頁)他宣称："为什么我不参加委員会呢？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央委員会上已經明白地說过了：在沒有允許我同所有其他同志一样，將这些問題全部提到党报上之前，我并不期待于这些問題的秘密討論的任何益处，因此，也不期

待于委員会工作的任何益处。”(第六九頁)

結果如何呢？自从十二月二十五日托洛茨基开始“广泛討論”时起还不到一个月，在一百个負責的党工作者中，几乎找不出一个人沒有感覚到这一討論的討厭，沒有認識到这一討論的毫無益处(如果不是更坏些的話)。因为托洛茨基將党的时間，浪費在关于字眼、关于坏提綱的爭論上面了；他偏偏責罵委員会里的实事求是的审查是“秘密”的审查，而这个委員会本身的任务正是研究与檢查实际經驗，以便从这一經驗里学习，在眞正的“生产”工作中前进，而不是从活生生的工作，后退到各种各色的“生产气氛”的僵化的煩瑣哲学上去。

拿有名的“联合”来講吧。关于这个問題，我曾經在十二月三十日，劝告采取緘默的态度。因为我們还沒有研究过我們自身的实踐經驗，而如不具备这一条件，則关于联合問題的爭論，將不可避免地会变成空洞，把党的力量从經济工作方面，無益地抽出来。托洛茨基的提綱在这一点上，建議把国民經济委員会委員中职工会的代表从三分之一增到二分之一，和从二分之一增到三分之二，我曾把这一提綱称之为官僚主义的沒有根据的計划。

为了这件事，布哈林对我很气憤，我从报告第四九頁上看到，布哈林曾很周密而詳尽地向我証明：“当着人們聚在一起商談某个問題的时候，他們是不应当裝聾作啞的。”(在这一頁上印的正是这些字！)托洛茨基也憤怒了，他喊叫道：

“我請你們每一位，都在記事册上記下，列宁同志在某月某日把这一点叫做官僚主义；而我敢于預言，經过几个月之后，不論在通知上，在指示上，这一点，都將被采用；那时在全俄职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經济委員会、五金工会中央委員会与五金部等等中，都將会有一般工作人員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第六八頁)

在讀过这段話之后，我請求米留亭同志(最高国民經济委員会副主席)將关于联合問題現有印好的报告送給我。我自己这样想：我就开始一点一滴地来研究我們的实踐經驗吧，因为空空洞洞，既沒有材

料又沒有事实，只是揑造意見分歧、揑造定义和"生产民主"，枯燥地从事"一般的党內空談"(布哈林的用語，第四七頁，这个用語也許会成为"慣用語"，不下于有名的"整刷"一語)，是不能忍受的。

米留亭同志給我送来了几本書，其中一本是"最高国民經济委員会向全俄苏維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二〇年，莫斯科版，序言注明为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九日)。該报告第一四頁上，載有一个表示工人参加管理机关程度的表格。原表录后（只包括国民經济省委員会和企业底一部分)：

管理机关	总数	其中工人		其中專家		职員及其他	
		名額	百分比	名額	百分比	名額	百分比
最高国民經济委員会和省国民經济委員会主席团	187	107	57.2	22	11.8	58	31.0
各总管理处，各部，各中央机关和各总委員会的參事会	140	72	51.4	31	22.2	37	26.4
參事制和一長制的工厂管理处	1,143	726	63.5	398	34.8	19	1.7
总　計	1,470	905	61.6	451	30.7	114	7.7

由此可知，目前工人参加管理的，平均已达百分之六一·六，也就是說，几乎达到了三分之二，已超过半数了！托洛茨基同志在其提綱中关于这个問題所写的东西的官僚主义毫無根据的性質，已經得到証明了。談論、爭辯、写作"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或"从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綱領，所有这些，都是最空洞的"一般的党內空談"，都会把人力、物力、注意力、时間从生产工作方面轉移开来，只是一种沒有眞正內容的政客行为。但是在委員会里，那里可以找到有經驗的人，那里不会同意不研究事实就要写提綱，所以在那里对于从事檢查經驗的工作是有益的，比如，向十几个别人(从几千个"一般工作人員"中）詢問，將他們的印象与結論，同客观的統計材料加以比較，設法为將来求得实事求是的、实际的指示；在总結某种經驗后，現在还是朝着原来的方向向前推进呢，还是稍稍改变一下方向、方法和态

度，并且又該如何改变，或是为了事业的利益起見，暫停下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檢查經驗，或者对于某些地方加以改造等等。

同志們，一个眞正的"經济工作者"（讓我也来做些"生产宣傳"吧！），他一定知道，即使是在最先进的国度里，資本家和托拉斯的組織者，都要費許多年的工夫，有时甚至十年或十年以上的时間，去研究和檢查自己的（和他人的）实踐經驗，糾正与改作已經开始了的事情，轉回头去，多次地糾正，以便获得完全适合于某种事业的管理制度，遴选高級与低級的行政人員等等。在資本主义之下，就是如此的，資本主义在整个文明世界中，把自己的經营工作建立在几个世紀的經驗与习慣上面。而我們則是在新的地基上进行建設的；这种新地基要求我們对于資本主义所遺留給我們的只有逐漸逐漸才能加以改造的习慣，进行長期的、頑强的和耐心的重新教育的工作。对于这个問題，像托洛茨基那样的来处理，是根本錯誤的。他在十二月三十日的演說中喊道："我們的工人，党和职工会的工作人員，有沒有生产訓練呢？有还是沒有？我答复道：沒有。"（第二九頁）这样地来处理这一类的問題，是可笑的。这正像你这样問：在这一师里有沒有足够数量的毡靴呢？是有还是沒有呢？

我們就是經过十年之后，我們还会說，党和职工会的所有工作人員，还沒有足够的生产訓練。这正如經过了十年之后，党、职工会和軍事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員，不会有足够的軍事訓練一样。不过我們生产訓練的基础已經造成了，因为約有千名左右的工人、职工会会員和代表們，已經参加各管理机关，并管理着企业、总委員会及其他更高的机关。"生产訓練"的基本原則，訓練我們自己老的秘密工作者和职业政論者的基本原則，就在于依据"量七次，裁一次"的規則，我們自己动手并教会别人动手，去极仔細和詳細地研究我們自己的实踐經驗。坚决地、緩慢地、愼重地、实事求是地和切实地去檢查这一千人所做的事情，并更愼重地和更实事求是地糾正他們的工作，只有在一定的方法，一定的管理制度，一定的比例，一定人的选擇等等，其效用已充分証实以后，再向前推进。这就是"生产訓練"主要的、根本的

与絕对的規則，而正是这个規則，却被托洛茨基同志以其所有的提綱、所有处理問題的方法破坏無遺了。托洛茨基同志所有的提綱和整本綱領小册子恰巧是这样的，就是，它們由于錯誤而把党的注意力和力量，从实事求是的"生产"工作轉移到进行空洞的、毫無內容的爭論上去。

辯證法與折衷主義。"學校"與"機关"

布哈林同志許多极可宝貴的品質之一，就是他的理論上的能力，以及他在任何問題上寻覓理論根源的兴趣。这是一个很可宝貴的品質，因为某人由自覚采用的一定命題出發犯了錯誤，如果不找出他所犯的錯誤的理論根源，那就不可能充分地認清楚任何錯誤，包括政治錯誤。

根据他这种在理論上鑽問題的嗜好，布哈林同志，从十二月三十日的討論开始——如果不是更早些的話——也就把爭論轉移到所指出的这一領域內来了。

布哈林同志于十二月三十日說道：

"我認为是絕对必要的——此处所謂'緩冲派別'的或其思想体系的东西，其理論的实質正是在这里，——并且在我看来是完全無可爭辯的，就是不論这种政治的因素也好，或經济的因素也好，都不能把它們丢掉……。"（第四七頁）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錯誤的理論实質，在于他以折衷主义暗中偷換了政治和經济間的辯証的相互关系（这是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們的）。"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的理論立場。这也就是折衷主义。辯証法要求在相互关系的具体的發展中对它們加以全面的估計，而不是从这边摘取一塊，从那边摘取一塊。我在政治和經济的例子上已經指出这一点了。

在"緩冲"的例子上，这也是毫無疑义的。如果党的列車从斜坡下降走向顯复时，那末，緩冲器是有益和必要的。这是無可爭辯的。

布哈林曾經折衷主义地提出"緩冲的"任务，他从季諾維也夫那兒摘取了一塊，从托洛茨基那兒又摘取了一塊。作为一个"緩冲者"，布哈林应当独立地确定：这个人或那个人，这些人或那些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上犯了錯誤，是犯了理論上的錯誤，还是犯了政治上失策的錯誤，或犯了言論上的派别活动的錯誤，或犯了夸張的錯誤等等，然后应当用一切力量来抨击每个这样的錯誤。布哈林却沒有理解他的这种"緩冲"的任务，显明的証据之一是：

运輸工会中央委員会(鉄路和水路运輸工会中央委員会)彼得格勒常务局的共产党党团是同情托洛茨基的一个組織，它公开申言：据它所見，"在关于职工会的生产作用这个基本問題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兩位同志的立場，乃是同一观点的变相"。这个組織曾經在彼得格勒把布哈林同志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三日在彼得格勒所作的副报告，印成一个小册子(布哈林："論职工会的任务"，彼得格勒，一九二一年)。在这个副报告里面，我們讀到：

"起初，托洛茨基同志曾經这样地說：必須撤換职工会的領导人員，必須选拔适当的同志等等，更早一点，他甚至抱着'整刷'的观点，現在他是抛棄了这个观点了，因此提出'整刷'作为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論据，那是絕对荒謬的。"(第五頁)

我不来說这种叙述的許多实际上不精确的地方。("整刷"这名詞，是托洛茨基在十一月二日至六日举行的全俄职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議上使用的。关于"选拔領导人員"，是托洛茨基在他十一月八日提交中央，并由托洛茨基的一位信徒印成傳單發表的那个提綱第五节中說的。托洛茨基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职工会的作用和任务"整个小册子，徹头徹尾地浸透着我在前面早已指出过的那种同一的思想方式，同一的精神。"抛棄"，表現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事情上，根本不知道)。現在，我的主題是另一个。如果"緩冲"是折衷主义的，那末，这种"緩冲"就是放过一个錯誤，而却提到另一个錯誤；对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于莫斯科在几千名来自全俄的俄共工作人員面前所犯的錯誤一字不提；而提出一九二一年一月三日在彼得格勒的錯誤。如

果"緩冲"是辯証的，那末，这种"緩冲"就应当以其全部力量来抨击他在双方或在一切方面所看出的每一錯誤。这正是布哈林沒有作的。他甚至不想从"整刷"政策的观点去分析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他对它干脆保持緘默。在緩冲起着这样的作用时，惹起大家的笑，那是不足怪的事情。

其次，布哈林在彼得格勒的同一演說的第七頁上，我們讀到：

"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在于他沒有充分地辯护共产主义学校这一因素。"

在十二月三十日的討論会上，布哈林这样說道：

"季諾維也夫同志說，职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而托洛茨基同志却說，它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我看不出有任何邏輯上的根据足以証明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不正确的：这兩个命題，以及这兩个命題的結合，都是正确的。"(第四八頁)

在布哈林及其"集团"或"派别"的提綱第六条里面，也包含着相同的思想："……一方面，它們(职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們却是——并且越来越显得是——經济机关和一般国家权力机关的一个構成部分。……"(二月十六日"眞理报")

布哈林同志基本的理論上的錯誤恰恰就在这里：他用折衷主义(这在各种"时髦的"和反动的哲学体系作家当中是特别流行的)来暗中偷換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

布哈林同志說到"邏輯上的"根据。他的全部議論表明，他在这里——也許是不自覚地——所抱的观点是形式邏輯或煩瑣哲学邏輯的，而不是辯証邏輯或馬克思主义邏輯的。为着說明这一点，我先从一个最簡單的、布哈林同志自己所用的例子談起。在十二月三十日的討論会上，他曾說道：

"同志們，在这里所發生的爭論，大約要在你們很多人当中产生这样的印象：有兩个人跑来互相質問說，放在講台上的这个玻璃杯是什么东西。一位說：'这是一个玻璃圓筒，誰說不是这样，誰就要受詛咒。'第二个說：'玻璃杯是一个飲器，誰說不是，

誰就要受詛咒。'"(第四六頁)。

如讀者看到的，布哈林想用这个例子通俗地来对我說明片面性的害处。我怀着謝意接受这个說明，并且为着用事实来証明我的謝意起見，我以通俗地解釋折衷主义与辯証法不同的是什么来答复他。

無可爭辯的，玻璃杯是一个玻璃圓筒，也是一个飲器。可是，一个玻璃杯不仅具有这兩种屬性或素質或方面，而且具有無数的其他的屬性、素質、方面，与其余的整个世界的相互关系和"媒介"。玻璃杯是一个沉重的东西，它可以作为投擲的工具。玻璃杯也可以用来做压紙的东西，可以用来做裝被捉到的蝴蝶的器具，玻璃杯可以作为有艺术的雕刻和圖画的东西而有价值，这与杯子是否适宜于喝东西，是否由玻璃制成，它的形狀是圓筒、或者不完全是圓筒等等，都完全沒有关系。

其次，如果現在我需要把玻璃杯作为飲器使用，那末，知道它的形狀是否完全为圓筒，是否眞正由玻璃制成，对我是絕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底里沒有裂縫，在使用这玻璃杯时，不致損伤自己的嘴唇等等。如果我需要玻璃杯不是为着喝东西，而是为着任何玻璃圓筒都适宜的这种用途，那末，玻璃杯底里有裂縫，或甚至完全無底的等等，在我也是合适的。

局限于学校里的（并且应該局限于学校低年級的——加以修正过的）形式邏輯，以最普通的、眼睛最常見的东西为指导，采用形式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在这場合取出兩个或数个不同的定义，把它們完全偶然地联結起来（是玻璃圓筒，又是飲器），那末我們所得到的，就是一个折衷主义的定义，它指出对象的不同的方面，并只此而已。

辯証邏輯要求我們更进一步。要眞正地認識对象，必須把握和研究对象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們决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可是，全面性的要求，就可以預先使我們謹防錯誤，謹防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辯証邏輯要求在对象的發展上，在它的"自己运动"（如黑格尔有时所說的）上，在它的变化上去把握它。在一个玻璃杯

上，这不是一下子就明白的，可是，一个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和周圍世界的联系都在变化着。第三，必須把人的全部实踐包括到对象的完全的"定义"里面去，作为眞理的标准和作为对象与人所需要的东西联系的实际規定者。第四，辯証邏輯教导我們，"抽象的眞理是沒有的，眞理永远是具体的"——如已故的普列汉諾夫繼黑格尔之后所常常喜欢說的（我覺得在括弧里面，順便对年輕的党員指出这一点是适当的，就是：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諾夫所写的关于哲学的一切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覺悟的、眞正的共产党員，因为这乃是整个国际馬克思主义文献中最好的东西㊀）。

自然，我并沒有把辯証邏輯的概念全部說尽。然而，对目前的問題这一点也已經够了。現在可以从杯子轉到职工会和托洛茨基的政綱方面来了。

"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布哈林这样說，并在他的提綱上这样写着。托洛茨基的錯誤，就在于"他沒有充分地辯护学校的因素……"，而季諾維也夫的錯誤，則在于沒有充分估計到机关的"因素"。

为什么布哈林的这种議論是僵死的和空洞而無內容的折衷主义呢？因为布哈林絲毫沒有想独立地、从自己的观点出發，去分析这一爭論的全部历史（馬克思主义，就是說，辯証邏輯，無条件地要求着这一点），并去分析在一定的时間內，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之下，对于問題的整个处理，对于問題的整个提法——或者如果你願意，也可以說，問題提法的整个方向。布哈林絲毫沒有想这样做！他不經过絲毫具体的研究，而只是用于巴巴的抽象去处理問題，从季諾維也夫那里取

㊀ 附帶地說，不能不希望，第一，从現在已經出版的普列汉諾夫的文集中，將关于哲学的一切文章，另出專卷或几本專卷，并附以詳細的索引等等。因为这应当包括在共产主义必修教科書叢書之內。第二，我認为工人国家，应当向哲学教授要求，要他們知道普列汉諾夫对于馬克思主义哲学的闡釋，并善于將这一門知識傳授給学生們。然而所有这些，已經是从"宣傳"倒退到"行政管理"上去了。

一塊，从托洛茨基那里取一塊。这就是折衷主义。

为了更清楚地說明这一点，我举一个例子来說。对于中国南部的起义者和革命者，我是毫無所知的（除了我在許多年前所讀过的孙逸仙的兩三篇文章和几本書以及一些报章上的文章之外）。既然那里發生起义，那末在中国人之間也許也有爭論，某甲說起义是非常尖銳的、席卷全民族的阶級斗爭的产物，而某乙則說起义是一种艺术。用不着知道更多的东西，我就可以写出像布哈林的提綱那样的提綱来："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沒有充分估計到艺术的"因素"，另一个沒有充分估計到"尖銳化的因素"等等。这就是僵死的和空洞無內容的折衷主义，因为对于一定的爭論，一定的問題，一定的看問題的方法等等沒有具体的研究。

职工会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第三方面是劳动者的組織；第四方面是几乎只是产业工人的組織；第五方面是依生产部門㊀建立的組織等等，等等。布哈林絲毫沒有任何根据和任何独立的分析去証明为什么必須把握問題或对象的前兩个"方面"，而不把握第三、第四、第五等等方面。因此，布哈林集团的提綱，是徹头徹尾的折衷主义的空談。布哈林关于"学校"与"机关"相互关系的整个問題的提法，是根本錯誤的，是折衷主义的。

要正确地提出这个問題，就必須从空洞的抽象轉到具体的，即目前的爭論上来。关于这个爭論，無論拿哪种方式来說，拿全俄职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議上的爭論来講也好，拿托洛茨基本人在他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政綱小册子中所提出、所指出的爭論来講也好，你都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整个看法，他的整个方向，都是錯誤的。他不了解，即使在提出"苏維埃工联主义"这問題时也好，在講一般生产宣傳时也好，在如像托洛茨基那样提出"联合"問題即关于职工会参加管理生产問題时也好，都必須而且可以把职工会看做学校的。并且在最后的

㊀ 附帶地說，托洛茨基在这里也犯了錯誤。他以为生产工会，就是掌握生产的工会。这是不对的。生产工会乃是說按生产部門把工人組織起来的工会，这在一定的（在俄国和全世界上）技术和文化的水平下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問題上，如托洛茨基整个政綱小册子中所提出的那样，錯誤的地方是在于不懂得职工会是对生产进行行政和技术管理的学校。不是"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别的东西"，而是从各方面来看，在当前的爭論上，在当前托洛茨基对問題的提法上，职工会都是一个学校，是联合的学校，是团結的学校，是保护他們自身利益的学校，是管理經济的学校，是管理行政的学校。布哈林同志不去了解和改正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个根本的錯誤，却作了一个可笑的修正："一方面，另一方面"。

我們来更具体地研究問題吧。我們来看一看，作为管理生产"机关"的目前的职工会是什么东西。我們已經看到，根据不完全的統計，約有九百名工人、职工会的会員和代表在管理着生产。如果你高兴的話，那怕把这数目字增加到十倍，甚至于增加到一百倍，为了向你讓步，并为說明你的基本錯誤起見，我們甚至假定在最近的將来有这么难以置信的"前进"速度，——可是我們所得到的直接管理的人，与职工会会員总数六百万群众比較起来，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少数。由此可以更显明地看出，像托洛茨基所作的，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領导層"上，不顧百分之九八·五的会員（六、〇〇〇、〇〇〇減九〇、〇〇〇等于五、九一〇、〇〇〇等于总数百分之九八·五）在学习着，而且还应当長期地学习，而大談其职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和对于生产的管理，那就是說犯了根本的錯誤。不是学校和管理，而是管理的学校。

托洛茨基同志在十二月三十日駁斥季諾維也夫，并且毫無根据地和完全不正确地責备他否認"委任制度"，即否認中央实行委任的权利和义务时，曾經無意地說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对照。

他說："……季諾維也夫太过于从宣傳者的观点去处理每个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問題，而忘記在这里存在着的，不仅是鼓动的材料，而且是应当在行政上加以解决的問題。"（第二七頁）

現在我就来詳細地說明，怎样才能算对于該問題的行政上的处理。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底根本錯誤，恰恰在于，他是作为一个行政

人員，去处理（更正确些說，去參莽从事）他自己在政綱小册子中所提出的那些問題，而这些問題他本来可以而且应当只是以宣傳者的身分去处理的。

实际上，托洛茨基的好的东西是什么呢？不是在他的提綱中，而是在他的演講中——特别是在他忘記了他与职工会中的所謂"保守"派的失敗的論战时——生产宣傳無疑义地是好的，有益的。在职工委員会的实事求是的"經济"工作之下，在口头的与文字的言論中，托洛茨基同志作为全俄生产宣傳局的参加者和工作者，無疑义地他也許要做不少有益的事情（并且無疑义地正在做着不少有益的事情）。錯誤是在于"政綱式的提綱"。对于职工会組織里面的"危机"，对于职工会里面的兩种"傾向"，对于俄国共产党党綱的解釋，对于"苏維埃工联主义"，对于"生产教育"，对于"联合"等的行政人員的处理，像一根紅綫一样貫穿着这"政綱式的提綱"。我現在把托洛茨基"政綱"中所有主要的問題都列举出来了，在目前对于这些問題的正确处理，用托洛茨基現有的材料，只能是一个宣傳者的处理。

国家，这是强制的領域。拒絕强制，特别是在無产阶級專政时期，那是瘋狂。在这里"行政办法"和对事情行政的处理，是必須的。党是無产阶級的直接执政的先鋒队，是領导者。开除出党而不强制，这就是影响先鋒队的特殊手段，清洗与鍛煉先鋒队的手段。职工会是国家权力的后备軍，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管理經济的学校。在这一領域內，特殊的和主要的不是管理，而是"中央的"（自然也还有地方的）"国家行政管理、国民經济跟广大劳动群众之間"的"联系"（如我們党綱上关于职工会的經济部分第五节所說的）。

对这个問題整个提法的不正确，对于这种相互关系的不了解，恰如同一根紅綫似地貫穿着托洛茨基的整个政綱小册子。

試設想，假如托洛茨基是从另外一方面去处理整个問題，与他的政綱的其他問題相联系而拟就了这个有名的"联合"。試設想，假如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是完全論述这样的任务的：比如說，詳細地去考察九百件中九十件"联合"的事件，即同时兼任最高国民經济委員会中

管理工业的职务与职工会中的选举职务，同时兼任职工会会員与职工运动固定工作人員的事件。試設想，假如把这九十件事件，跟重点的統計調查材料，跟工农檢察院及相当的人民委員部的督察員和指导員的演說和报告一同加以分析，就是說，把它們根据行政机关的材料加以分析，从工作的总結、工作的結果、生产的成績等等观点加以分析。对于事情的这样的一种处理，才是一种正确的行政人員的处理，并且它才可以完全支持"整刷"的路綫，就是說，把注意力集中于应把誰撤职，应把誰調換，应任命誰，对于"領导層"現在应提出哪些要求。如果布哈林在他由运輸工会中央委員会出版的一月三日的彼得格勒演說中，曾經說：以前托洛茨基曾站在"整刷"的观点上，而現在則已經抛棄这种观点了，那末，在这里，布哈林也陷入一种实际上可笑的和理論上为馬克思主义者所絕对不容許的折衷主义里面去了。布哈林抽象地来看問題，而不会（或者是不願意）具体地来处理它。当我們，即党的中央和全党，要做行政工作，就是說，管理国家时，我們决不会拒絕，而且也决不能拒絕"整刷"，即拒絕撤职、調換、任命、免职等等办法的。然而在托洛茨基的政綱小册子中，却完全沒有使用那些材料，完全沒有提出"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問題"。季諾維也夫与托洛茨基所爭論过的，我們与布哈林所爭論着的，全党正在爭論的，不是关于"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問題"，而是关于"职工运动方面的傾向"的問題（托洛茨基提綱第四条末）。

这个問題就其实質来說，是一个政治問題。就事情——目前这一具体"事情"——的实質講，要像布哈林——他当然是充滿着最人道的感情和意圖的——所想的那样，用折衷主义的修改与补充去糾正托洛茨基的錯誤，那是不可能的。

这里，解决的方法可以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

正确地去解决关于"职工运动方面的傾向"，关于各阶級的相互关系，关于政治与經济的相互关系，关于国家、党、职工会——作为"学校"与作为机关——的特殊作用等政治問題。这是第一。

第二，根据正确的政治的解决，將来去进行——正确些說：現在

就进行——一种長期的、有系統的、坚决的、耐心的、多方面的、反复的生产宣傳，用国家机关的名义并在国家机关領导下，在全国范圍內来进行这种宣傳。

第三，不要把"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問題"，同关于傾向的那种構成"全党談話"和广泛討論的合法財产的爭論混为一談，而要实事求是地，在实际的委員会中，以証人的对質，对于演講、报告、統計的研究，来把它們提出，并且在根据这一切——只有根据这一切，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根据相当的苏維埃机关或党的机关的决定或兩种机关的决定去实行"整刷"。

而我們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里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混合物：处理問題上的政治錯誤，对中間傳送联系和輪帶的割裂，白費力气的冲击和攻击"行政办法"等。錯誤的"理論"根源——因为布哈林曾一度以他的"玻璃杯"提出了理論根源問題——是显然的。布哈林同志理論的——在这件事情上是認識論上的——錯誤，就在于以折衷主义暗中偷換辯証法。由于折衷主义地提問題，布哈林就完全迷了道路并陷入于工团主义的地步。托洛茨基的錯誤是：片面性、迷恋、夸大、执拗。托洛茨基的政綱是这样的，玻璃杯是一种飲器，但是該玻璃杯却是沒有底的。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摘自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三月單行本第五九至八五頁）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論反对詭辯論

这"在德国干着的"德意志的批評一直到它最近的努力上都不曾离棄过哲学之基地。其全部的問題，把一般哲学的諸前提之探討抛棄到天外，甚至竟植根在某种一定的哲学系統，即黑格尔系統，之基地。不仅在其答案中，"而且"就在其問題中已横陈着一个神秘化。正因为这样对黑格尔之服从，所以这些新的批評家們每人都在那样的主張着，要超过黑格尔，然而要对于黑格尔系統作一綜括的批判連略略尝試一下的人都沒有一个。他們对于黑格尔与同对于彼此的論辯是局限在这个情形上面，便是每人都各取得黑格尔系統之一方面，而以这一方面去攻击黑格尔系統之全部，去攻击他人所取的另一方面。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群益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第四五至四六頁

現在我給您举出一个表明蒲魯东先生玩弄辯証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狀态。我根本沒有什么必要談到自由的好处或坏处。至于奴隶制，那末关于它的坏处就不必去說了。唯一需要說明的，是奴隶制的好处。这里所指的，不是間接的奴隶制，不是無产者所受的奴役。这里所說的，是直接的奴隶制，即在苏利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对黑人的奴隶制。

直接的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貸等一样，是我們現代工业的基础。沒有奴隶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就沒有現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貿易，而世界貿易則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貿易尚未建立之前，殖民地給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沒有較为显著地改变过世界的面貌。可見，奴隶制是

个有很大意义的經济范疇。沒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国度——就会变成了宗法式的国度。只要从世界地圖上勾銷北美，結果就会看到紊乱狀态，就会看到貿易和現代文明的徹底衰落。但是，消灭奴隶制，那也就等于从世界地圖上把美洲抹去。这样，正由于奴隶制是經济范疇，所以奴隶制从創世时起就在各国人民中都可遇到。現代各民族善于只是在自己本国把奴隶制掩飾起来，而在新大陆中則公开地实行它。經过这一番关于奴隶制的思索之后，极慈善的蒲魯东先生又將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綜合，寻求眞正中庸妙法，即寻求奴隶制和自由間的均衡。

馬克思："致巴·瓦·安年科夫的信"(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中文版第四四八頁

蒲魯东按其本性是傾向于辯証法的。但是因为他从来也不理解眞正科学的辯証法，所以越不出詭辯主义的界限。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資产阶級观点有关的。小資产者也像历史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所構成。他在自己的經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也是如此，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他是个集中体現的矛盾。而既然他同时还像蒲魯东一样是个有机智的人，所以他就很快地习慣于玩弄自己本身的矛盾說法，根据情况把这种說法变成一些意外的、鮮艳夺目的、时而是出丑的、时而是輝煌的怪論。科学中的江湖騙术和政治上的随机应变是与这种观点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类人那里，只剩下有一个动机——他們的虛荣心，就像一切爱虛荣的人一样，他們关心的仅仅是获得短暫的成功，即聳人听聞。同时就不免要失掉簡單的道德品性，这种品性是一直防止例如盧梭对現存政权采取任何——那怕仅仅是表面上——妥协态度的。

馬克思："論蒲魯东(給施維澤尔的信)"(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四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三七三至三七四頁

«因为詭辯是依据未加批判和反复思考的毫無根据的假設而發的議論。而我們所說的辯証法是高級的理性运动，在这种运动中，那些看起来似乎是完全分开的[規定]通过它們本身，自己相互轉化，而假設則被揚棄。»[第一〇八頁]

列　宁："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一九一四年)，"哲学笔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八四頁

注意

在讀黑格尔的著作时，关于辯証法的思想

机智而且聪明！对于通常看起来似乎是僵死的概念，黑格尔加以分析并指出：它們之中有着运动。有限的？——就是說，向終极运动着的！某物？——就是說，不是他物。一般存在？——就是說，是这样的非規定性，以致存在＝非存在。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問題的实質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詭辯。灵活性，如果加以客观的应用，即反映物質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統一，就是辯証法，就是世界的永恒發展的正确反映。

列　宁："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一九一四年)，"哲学笔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八七頁

注意：主观主义(怀疑論和詭辯等等)和辯証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辯証法中，相对和絕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辯証法說来，相对之中有着絕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詭辯說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絕对的。

列　宁："談談辯証法問題"(一九一五年或一九一六年)，"哲学笔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三六二頁

这种議論的詭辯性就在于：他們耍了一个偷換的把戏，把从前的、早已过去的历史时代搬到現代来。考茨基所談的从前的战斗，有下面这些基本特点：(1)从前的战爭所解决的，是資产阶級民主改革和推翻專制制度或外族压迫的問題；(2)当时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沒有哪一个社会主义者能够在战前像斯圖加特决議(一九〇七年)和巴塞尔决議(一九一二年)那样，談到利用战爭“来加速資本主义毀灭”的問題；(3)当时在交战双方的国內，都沒有比較强大的、經过多次战斗考驗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

簡單地說来：在所有交战的国家里，都談不上無产阶級反政府反資产阶級的共同运动的时候，馬克思和馬克思主义者只以判断什么样的資产阶級的胜利对全世界的無产阶級更沒有害处（或者更有益处）为限，这是不是值得奇怪呢？

早在战爭很久以前，各交战国的社会主义者就在世界史上第一次地集合在一起，并且声言：我們要利用战爭“来加速資本主义的毀灭”(一九〇七年斯圖加特决議)。这就是說，他們認为这种“加速毀灭”的、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經成熟。这就是說他們用革命来威胁各国政府。巴塞尔宣言(一九一二年)还举出了巴黎公社和一九〇五年十至十二月，即国內战爭的例子，这一点就說得更加清楚了。

战爭爆發了，而过去用革命来威胁各国政府、号召無产阶級起来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却开始搬出半世紀以前的东西，替社会主义者支持政府和資产阶級的行为辯解！馬克思主义者果特在他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社会民主党”这本荷蘭文本的小册子里(第八四頁)，把考茨基式的“急进主义者”比做一八四八年的自由派：口头上是勇士，而实际上是叛徒。这眞是說得千眞万确啊！

在欧洲社会主义內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机会主义分子之間的矛盾發展了几十年。危机成熟了。战爭揭破了膿瘡。大多数的公認的政党都被实行民族自由工人政策的政客們打敗了，这些政客們保衛的是“本国的”，“祖国的”資产阶級的特权，是資产阶級占有殖

民地、鎮压弱小民族等等优惠的权利。考茨基和阿·波特列索夫不在無产阶級面前揭露民族自由工人政策，反而加以掩飾、保护和辯解。社会主义詭辯的实質就在这里。

列　宁："社会沙文主义的詭辯"(一九一五年五月一日發表)，"学习譯叢"一九五八年第六期第二至三頁

关于"禍首"的理論几乎笨拙到极点。人家侵犯了我們，我們就得起来保衛自己；無产阶級的利益要求反击欧洲和平的破坏者。这是各国政府的声明和全世界所有資产阶級刊物和黃色刊物的濫調的翻版。普列汉諾夫甚至連这个如此陈腐庸俗的見解也一定要用这位作家所习滑引用的"辯証法"来加以粉飾：即为了估計具体形势，据說首先需要找出禍首，予以惩罰；至于其他一切問題則留待另一种形势到来时再解决(見普列汉諾夫的小册子"論战爭"，一九一四年巴黎版；另見阿克雪里罗得在"呼声报"第八六号和八七号上对这种論調的重复)。在用詭辯主义偷換辯証法的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諾夫打破了紀录。詭辯家抓住"論据"之中之一个，但黑格尔已經很正确地說过，人們完全可以替宇宙万物找出"論据"。辯証法要求对某个社会現象在其發展中給以全面的研究，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結于根本的动力，即归結于生产力的發展和阶級斗爭。普列汉諾夫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上引用了一句話：德国人自己在战前就承認奧地利和德国是禍首，——这就够了。至于俄国社会主义者多次揭穿沙皇对加里西亞、阿尔明尼亞等地的侵略計划，普列汉諾夫却只字不提。哪怕是最近三十年来的經济史和外交史，他也一点不打算涉及，而这段历史确鑿地証明，侵占殖民地，掠夺别国的領土，排挤更順利的竞爭者并使其破产，正是目前交战列强集团双方政策的重要核心。

列　宁："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九一五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列宁反对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〇〇頁

有些資产阶級作家(考茨基現在也附和他們的意見，他完全背叛

了他所采取的，例如他在一九〇九年所采取的那种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認为：国际卡特尔是資本国际化的最明显的表現之一，給人們一种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間可能达到和平的希望。这种意見在理論上是絕頂荒謬的，而在实踐上是一种詭辯，是一种用欺騙的方法替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辯护的手段。国际卡特尔表明了現在資本家的壟断組織已經發展到怎样的程度，各个資本家同盟究竟为了什么而互相斗爭。后面这一点最重要，只有它才能向我們說明当前事件的历史經济意义，因为斗爭的形式可能变更，而且确实由于各种比較次要的和暫时的原因而經常变更，但是，斗爭的本質、斗爭的阶級內容在阶級存在的时候是始終不会改变的。例如德国資产阶級(考茨基在理論上已經轉到德国資产阶級那边去了……)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然要掩飾現代經济斗爭的內容(分割世界)，而强調这个斗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考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錯誤。这里所說的当然不是德国資产阶級，而是全世界的資产阶級。資本家分割世界，并不是因为他們的心腸特别毒辣，而是因为現在的集中已經發展到这种地步，使他們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利的道路；而且他們分割世界，是"按資本"、"按实力"来分割的，在商品生产和資本主义制度下也只有按这种标准来分割。实力是随經济政治的發展而变更的；要了解当前的事件，必須知道哪些問題的解决是取决于实力的变更，至于这些变更究竟是"純粹"經济上的变更，还是經济范圍以外的(例如軍事的)变更，却是次要的問題，絲毫也不能改变对于資本主义最新阶段的基本观点。拿資本家同盟互相斗爭与妥协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不和平的，后天又不是和平的)問題来偷換斗爭与妥协的內容問題，就等于墮落成詭辯家。

列寧："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九一六年一月至六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四五至二四六頁

即使在民主共和国里，国家也不过是一个阶級鎮压另一个阶級

的机器。考茨基知道、承認并贊成这个眞理——但是……但是他避开最根本的問題：当無产阶級爭取到無产阶級国家的时候，它究竟应当鎮压哪个阶級，为什么要鎮压这个阶級，采用什么手段去鎮压。

王德威尔得知道、承認、贊成并引証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但是……他根本不提鎮压剝削者的反抗这一"不愉快的"（对資本家先生們）問題！！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完全迴避了这个"不愉快的"問題。他們的叛徒立場也就在这里。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是用折衷主义代替辯証法的能手。一方面，不能不意識到，另一方面，应該承認。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民族的总和"（見李特列編的詞典——不待說是淵博的著作！——參看王德威尔得的書第八七頁），另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政府"（同上）。王德威尔得抄襲这个学者的庸俗論調，称贊这种論調，把这种論調和馬克思的言論列在一起。

王德威尔得說：馬克思主义对"国家"一詞的理解和通常的理解不同。因此可能产生"誤解"。"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国家，并不是广义的国家，不是作为管理机关、作为社会共同利益（intérêts généraux de la société）的代表的国家，而是国家政权，是权威机关，是一个阶級統治另一个阶級的工具。"……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到消灭国家时，指的只是后一种意义的国家……"过于絕对的論断，会冒不确切的危險。在以單独一个阶級的統治为基础的資产阶級国家和以消灭阶級为目的的無产阶級国家之間，有許多过渡阶段。"……

請看，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手法"，它同考茨基的手法有点不同，实質上則完全一样。辯証法否認絕对眞理，而闡明历史上对立物的更迭和危机的意义。折衷主义者不要"过于絕对的"論断，为的是暗中貫徹市儈庸人的希望：用"过渡阶段"代替革命。

作为資产阶級統治机关的国家和作为無产阶級統治机关的国家之間的过渡阶段，恰恰就是推翻資产阶級、打碎和摧毀資产阶級国

家机器的革命，对于这一点，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是默不作声的。

資产阶級專政应由一个阶級即無产阶級的專政来代替，革命的各个"过渡阶段"过去后，接着就是無产阶級国家逐漸消亡的各个"过渡阶段"，这一点，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已一笔勾銷了。

这也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叛徒立場。

这也就是在理論上哲学上用折衷主义和詭辯术代替辯証法。辯証法是具体的和革命的，它把从一个阶級專政向另一个阶級專政的"过渡"，与从無产阶級民主国家向無国家("国家的消亡")的"过渡"这兩者区分开来。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的折衷主义和詭辯术，为了迎合資产阶級，抹杀了阶級斗爭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提出"过渡"这个一般概念来掩盖(現在十分之九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掩盖)背棄革命的行为！

王德威尔得在运用折衷主义和詭辯术方面，要比考茨基巧妙些，精細些，因为用"从狹义国家向广义国家的过渡"一語，可以避开任何革命問題，可以避开革命和改良的一切区别，甚至可以避开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区别。試問，哪一个受过欧式教育的資产者竟想"一般"否認这种"一般"意义的"过渡阶段"呢？

列　宁："無产阶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十月至十一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〇三至三〇五頁

無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摘錄)

斯 大 林

一 辯証方法

世界上一切都在运动着…… 生活在变化着，
生产力在增長着，旧关系在破坏着。

——馬克思

馬克思主义不只是社会主义的理論，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个哲学体系，馬克思的無产阶級社会主义就是从这个哲学体系中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这个哲学体系叫做辯証唯物主义。

因此，闡明馬克思主义，也就是闡明辯証唯物主义。

为什么这个体系叫做辯証唯物主义呢？

因为它的方法是辯証的，而理論是唯物的。

什么是辯証方法呢？

有人說，社会生活处在不断运动和不断發展的狀态中。这是正确的：决不能認为生活是一种不变的和凝固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它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处在永恒的破坏和創造过程中。因此，生活中总是有新东西和旧东西，生長着的东西和死亡着的东西，革命的东西和反革命的东西。

辯証方法說：必須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我們看到生活处在不断的运动中，所以我們应当把生活当做动的东西来考察，并且要問：生活走向哪里去？我們看到生活是一幅不断破坏和創造的圖画，所以我們应当把生活当做既破坏又創造的过程来考察，并且要問：生活中破坏的是什么，創造的是什么？

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長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說，例如無产阶級，既然它作为一个阶級已在生活中产生并且一天天成長起来，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样弱，怎样小，归根到底是会胜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成長、壯大、前进。反之，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失敗的，哪怕它今天还显得是一个强壯的力量。这就是說，例如資产阶級，既然它在逐漸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末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敗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級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贅。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辯証原理：凡是眞正存在的东西，即日益成長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敗的。

举一个例子来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俄国革命知識分子中間發生了一場大爭論。当时民粹派硬說：能够担負起"解放俄国"这个任务的主要力量是乡村和城市的小資产阶級。馬克思主义者質問他們：为什么呢？民粹派說：因为乡村和城市的小資产阶級現在占大多数，而且他們的生活又穷又苦。

馬克思主义者回答說：是的，乡村和城市的小資产阶級目前确实占大多数，他們确实是穷，但問題难道在这里嗎？小資产阶級早已占大多数，但直到今天，他們在爭取"自由"的斗爭中，沒有無产阶級的帮助，就沒有表現过任何的主动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資产阶級作为一个阶級不是在成長壯大，相反地，是在日益解体和分化为資产者和無产者。另一方面，很明显，穷在这里并沒有什么决定意义："流浪汉"比小資产阶級更穷，然而誰也不会說他們能担負起"解放俄国"的責任。

由此可見，問題并不在于哪一个阶級今天占大多数，或者哪一个阶級穷些，而在于哪一个阶級在壯大，哪一个阶級在解体。

既然無产阶級是唯一的不断成長和不断壯大的阶級，是唯一的將社会生活向前推进、把一切革命分子聚集在自己周圍的阶級，那末

我們必須承認它是現时运动中的主力，应該加入它的行列，把它的先进的願望当做自己的願望。

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回答的。

显然，馬克思主义者是辯証地观察生活，而民粹派是形而上学地大發議論，把社会生活看成停滯不前的东西。

辯証方法就是这样观察生活發展的。

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在社会生活中有过"十二月事变期間"的运动，那时無产阶級挺起胸来，襲击軍械庫，进攻反动派。但是也必須把前几年的运动叫做社会运动，那时無产阶級在"和平"發展条件下只举行过零星的罢工，只建立过小型的工会。

显然，运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辯証方法說：运动有兩种形式，即进化的形式和革命的形式。

当进步分子自發地繼續进行自己的日常工作，使旧制度發生一些小的变化、量的变化的时候，运动就是进化的。

当这些进步分子联合起来，抱着一个共同思想向敌人的营壘冲去，以期根本消灭旧制度，使生活發生質的变化即建立新制度的时候，运动就是革命的。

进化为革命作准备，为革命打下基础，而革命則完成进化，促进进化的进一步發展。

自然界也有这样的过程。科学史表明，辯証方法是眞正科学的方法；从天文学直到社会学，到处都証实着这种思想：世界上沒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發展。因而对于自然界的一切都应該从运动和發展的观点去观察。而这就是說，辯証法的精神貫穿着全部現代科学。

至于运动的形式，至于依据辯証法所說的小的变化、量的变化归根到底要引起大的变化、質的变化，那末这个規律在自然發展史中也是同样有效的。門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系"清楚地表明，由量变而發生質变在自然發展史中有多么大的意义。在生物学上，繼新达尔文主义而起的新拉馬克主义理論，也証明了这一点。

至于其他已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十分詳尽地闡明了的各种事实，我們就不談了。

辯証方法的內容就是如此。

* * *

無政府主义者是怎样看辯証方法的呢？

大家知道，辯証方法的創始人是黑格尔。馬克思澄清了并改进了这个方法。当然，这种情况無政府主义者也是知道的。他們知道黑格尔是个保守主义者，于是一有机会就大罵黑格尔是"复辟主义"拥护者，他們拚命"証明""黑格尔是复辟主义的哲学家……他贊美專制的官僚立宪制度，他的历史哲学的总的思想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复辟时代的哲学派别的"，以及如此等等（見"号召报"㊀第六期車尔凱茲施維里的論文）。

有名的無政府主义者克魯泡特金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証明"这一点（見他用俄文發表的"科学和無政府主义"）。

我們的克魯泡特金派，从車尔凱茲施維里一直到沙·哥·都巽口同声地附和克魯泡特金（見"号召报"）。

其实，誰也不和他們爭論这一点，恰恰相反，每个人都同意黑格尔不是革命家。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比誰都早地在"批判的批判之批判"一書中証明过：黑格尔的历史观点是和人民專制根本矛盾的。虽然如此，但無政府主义者还是要"証明"并且認为必須每天"証明"黑格尔是"复辟主义"拥护者。他們为什么这样做呢？大概想用这一切来破坏黑格尔的威信，使讀者覺得"反动分子"黑格尔的方法也不能不是"令人厭惡的"和非科学的吧。

無政府主义者想用这种手段来駁倒辯証方法。

我們說，他們用这种手段除了証明自己愚昧無知而外，是什么也証明不了的。巴斯噶和萊布尼茨不是革命者，但他們所發現的数学方法現在被公認为科学方法了。迈尔和赫尔姆霍茨不是革命者，但

㊀ "号召报"是格魯吉亞無政府主义者的周刊，于一九〇六年用格魯吉亞文在梯弗里斯出版。

他們在物理学方面的發現成了科学的基础。拉馬克和达尔文也不是革命者，但他們的进化論方法使生物科学站住了脚……为什么不能承認黑格尔虽是保守主义者、但正是他黑格尔創造出了叫做辯証法的科学方法这一事实呢？

不。無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手段除了証明自己愚昧無知而外，是什么也証明不了的。

繼續講下去吧。在無政府主义者看来，"辯証法就是形而上学"，他們既然"想把科学从形而上学桎梏下解放出来，想把哲学从神学桎梏下解放出来"，所以他們就駁斥辯証方法了（見"号召报"第三期和第九期沙·哥·的論文。又見克魯泡特金"科学和無政府主义"）。

咳，这伙無政府主义者！眞是"嫁禍于人"。辯証法是在和形而上学的斗爭中成熟的，它在这个斗爭中博得了光荣，而無政府主义者認为辯証法就是形而上学！

辯証法說，世界上沒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世界上一切都是暫时的，变动的，自然界在变化，社会在变化，风俗习慣在改变，正义的概念在改变，眞理本身也在改变，——正因为如此，辯証法对一切都采取批判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它否認一成不变的眞理，因而也否認抽象的"一經發現后就只須熟讀死記的教条"（見恩格斯"費尔巴哈論"）㊀。

形而上学向我們說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套。在形而上学看来，世界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見恩格斯"反杜林論"），它是由某个人或某种东西永远确定了的，所以形而上学者一开口就是"永恒的正义"和"不变的眞理"。

無政府主义者的"始祖"蒲魯东說：世界上存在着一成不变的正义，这种正义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因此蒲魯东被称为形而上学者。馬克思借助辯証方法和蒲魯东作斗爭，并証明說：既然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那末"正义"也一定要变化，因而"不变的正义"只是一

㊀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中文版第三五九頁。——本書編者注

种形而上学的囈語(見馬克思"哲学的貧困")。形而上学者蒲魯东的格魯吉亞的門徒却一味向我們重复說:"馬克思的辯証法就是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承認各种含糊不清的教条,例如所謂"不可認識的东西"和"自在之物",归根到底也就变为毫無內容的神学。与蒲魯东和斯宾塞相反,恩格斯借助辯証方法来反对这些教条(見"費尔巴哈論")。而無政府主义者——蒲魯东和斯宾塞的門徒向我們說:蒲魯东和斯宾塞是科学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形而上学者!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無政府主义者自己騙自己,或者是他們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么。

但是有一点是毫無疑义的,那就是無政府主义者把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和他的辯証方法混为一談。

不用說,以永恒观念为依据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徹头徹尾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同样很明显,否定任何永恒观念的黑格尔辯証方法却徹头徹尾是科学的和革命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馬克思給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以致命的批判,同时又称贊黑格尔的辯証方法,認为他的辯証方法"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低头,在本質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見"資本論"第一卷的跋)。

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認为黑格尔的方法和黑格尔的体系有很大的区别。"特别重視黑格尔体系的人可能在这兩方面都很保守。而把辯証方法当做主要东西看待的人在政治方面和宗教方面都可能持最极端的反对立場。"(見"費尔巴哈論")

無政府主义者看不出这种区别,却一味輕率地重复說:"辯証法就是形而上学。"

我們再往下講吧。無政府主义者說:辯証方法是"詭計"、"詭辯方法"、"邏輯的翻筋斗"(見"号召报"第八期沙·哥·的論文),"利用这个方法可以同样容易地証明一个东西既是眞的又是假的"(見"号召报"第四期車尔凱茲施維里的論文)。

这样，在無政府主义者看来，辯証方法能同样証明一个东西既是眞的又是假的。

初看起来，也許覚得無政府主义者的責难不無根据。現在請听听恩格斯論到形而上学方法信奉者的时候所說的話吧：

"……他們的說法：'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都是鬼話。'在他們看来，一个事物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一个东西决不能同时既是它自身又是别的什么东西；肯定和否定是絕对互相排斥的……"（見"反杜林論"引言）

無政府主义者狂叫道：怎么能够这样呢！难道同一个东西能够同时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嗎？！这是"詭辯"呵，这是"玩弄字眼"呵，这就是說，"你們想同样容易地証明一个东西既是眞的又是假的"呵！……

然而，我們且思索一下問題的本質吧。

今天我們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我們能不能說民主共和国在各方面都好或是在各方面都坏呢？不，不能这样說！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共和国只有从一方面看，即当它破坏封建制度的时候，才是好的，而从另一方面看，即当它巩固資产阶級制度的时候，却是坏的。因此我們說：民主共和国既然破坏封建制度，所以它是好的，我們就要为它而奋斗；但是民主共和国既然巩固資产阶級制度，所以它是坏的，我們就要和它作斗爭。

由此可見，同一个民主共和国同时既"好"又"坏"，既"是"又"非"。

关于八小时工作制也可以这样說，它在同一时候既然加强無产阶級，所以是"好的"；既然巩固雇佣劳动制度，所以又是"坏的"。

恩格斯用上面引証的那段話来描述辯証方法特征的时候，正是指这样的事实。

無政府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們覚得这个十分清楚的思想是一种含糊不清的"詭辯"。

無政府主义者看見或看不見这些事实，当然可以随心所欲，他們甚至在沙岸上也看不見沙子，——这是他們的权利。但这和辯証方法

有什么关系呢，辯証方法和無政府主义相反，不是閉上眼睛看生活，而是感覚到生活的脉搏，并且直率地說：既然生活总在变化，总在运动，那末任何一种生活現象都有兩种趋势，即肯定的趋势和否定的趋势；我們应当維护前一种趋势，反对后一种趋势。

我們再往下說吧。在我們的那些無政府主义者看来，"辯証的發展是毀灭性的發展，由于这种發展，首先是过去的一切消灭干淨，然后是將来的一切另行确立起来…… 居維叶的激变是由一些不知道的原因引起的，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毀灭則是由辯証法产生的"（見"号召报"第八期沙·哥·的論文）。

同一个作者又在另一个地方写道："馬克思主义是依据达尔文主义，并对它采取不批判的态度。"（見"号召报"第六期）

請注意一下！

居維叶否認达尔文的进化，只承認激变，而激变是"由一些不知道的原因引起的"突然爆发。無政府主义者說：馬克思主义者附和居維叶，因而是排斥达尔文主义的。

达尔文否認居維叶的激变，承認逐漸的进化。于是那些無政府主义者又說，"馬克思主义是依据达尔文主义，并对它采取不批判的态度"，就是說，馬克思主义者否認居維叶的激变。

一句話，無政府主义者一面責备馬克思主义者附和居維叶，同时又指摘他們附和达尔文而不附和居維叶。

这才眞是無政府狀态！这眞是下士的老婆自己揍自己㊀！显然，"号召报"第八期上的沙·哥·忘記了第六期上的沙·哥·說的話。

究竟哪一期說得对：是第八期还是第六期呢？

讓我們看看事实吧。馬克思說：

"社会的物質生产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現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現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产关系發生矛盾…… 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但是，"不論哪种社会形态，当从它这里获

㊀ 引自果戈里的剧本"欽差大臣"中市長对赫列斯塔科夫說的話。——譯者注

得充分發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沒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見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㊀

如果把馬克思这个論点应用到現代社会生活中去，那就可以看出具有社会性的現代生产力和具有私人性的产品占有形式之間存在着根本的冲突，而这个冲突是一定要由社会主义革命来結束的(見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三編第二章)。

由此可見，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革命并不是由居維叶所說的“不知道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那些叫做“生产力的發展”的完全确定的和极端重大的社会原因产生的。

由此可見，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革命只有在生产力足够成熟的时候才会發生，而并不是像居維叶所想的那样突如其来的。

很明显，居維叶的激变和馬克思的辯証方法之間是沒有絲毫共同点的。

另一方面，达尔文主义不仅攆斥居維叶的激变，而且攆斥包括革命在內的、按辯証法来了解的發展，但从辯証方法观点看来，进化和革命、量变和質变乃是同一运动的兩个必要形式。

看来也决不能断言“馬克思主义……对达尔文主义采取不批判的态度”。

这样，“号召报”在前后兩种場合，即無論在第六期或第八期，都弄錯了。

最后，無政府主义者責备我們說，“辯証法……并不使人有可能翻来翻去、跳蹦自如”(見“号召报”第八期沙·哥·的論文)。

可敬的無政府主义者先生們，这完全是眞話，諸位在这里說得十分对，辯証方法确实不使人有这种可能。但是，为什么不使人有这种可能呢？因为“翻来翻去、跳蹦自如”是野羊的消遣，而辯証方法是供人使用的。

秘密就在这里！……

㊀ 見“馬克恩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中文版第三四一頁。——本書編者注

一般說来，無政府主义者对于辯証方法的看法就是如此。

很明显，無政府主义者沒有懂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証方法，他們虛構了自己的辯証法，并且正是这样無情地和自己的这套辯証法进行斗爭。

我們瞧見这种情景只能付之一笑，因为看到一个人和自己的幻想作斗爭，粉碎自己的虛構，同时却竭力要别人相信他在打击敌人，这是不能不令人發笑的。

（一九〇六年。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九月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七四至二八六頁）

反对伯恩斯坦的論文

Cant反对康德，或伯恩斯坦先生的精神遺囑(摘錄)

(埃·伯恩斯坦著："历史唯物主义"，譯者甘泽尔，第二版，聖彼得堡，一九〇一年)

普列漢諾夫

二

罗馬人說过，Habent Sua fata libelli (書籍有它自己的命运)。作家們也是有自己的命运的，而且这命运有时是異常奇怪的。就拿黑格尔来說。現在肯花力气研究他的哲学的人是多么少，而敢于对它品头論足的"批評家"又是多么多！正是这些輕率的人，当他看見有誰沒有讀过伯恩斯坦先生的書就来責难他的書的时候，就感覚到憤慨之极。为什么要有这兩种尺度呢？为什么对待偉大的黑格尔可以这样輕率而对待渺小的伯恩斯坦先生就不可以呢？That is the question(問題就在这里)。

如果伯恩斯坦先生对于他談得既幼稚而又笨拙的东西眞是知道的，那末，他自然会因自己对辯証法的責难而感到害羞。他以为辯証法的"是——否和否——是"会妨碍我們清醒地看待現实，会使我們受"概念的自我發展"的支配。但是只有伯恩斯坦先生用"是——是和否——否"这个公式所表明的形而上学的思維方法才有这样的毛病。

黑格尔說过："青年人总喜欢馳騖于抽象的概念之中，而有生活

閱历的人則避开抽象的'要就是这——要就是那'的公式，而把問題放在具体的基础之上。"㊀这一句簡單的話可以說很滿意地說明了辯証法和伯恩斯坦先生所喜愛的"是——是和否——否"这一公式的思維之間的差别。

后一公式正是黑格尔所說的为青年人所喜欢的"抽象的要就是这——要就是那"。而"抽象的要就是这——要就是那"長期地妨碍了社会生活中甚至自然科学中的問題的正确提出，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如在我們俄国，已故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就曾經很通俗、很清楚地闡明过辯証法看待所研究的事物的特点。从辯証法的观点看来，"人們只能就一定的事实下确定的判断，并須研究与該事实有关的一切情况……例如，下雨是好还是坏呢？这是一个抽象的問題，对它不能作确定的回答，因为有时下雨有好处，有时，虽說这样的时候很少，下雨又有害处。应当問得明确些：在麦子下种完了以后下一場連續五小时的大雨，这对麦子有沒有益处呢？只是在这里才可以作确定的回答：它是有益的。"黑格尔的辯証法哲学，对于社会現象也是从車尔尼雪夫斯基解釋得完全正确的这样一种观点来观察的。战爭是有害还是有益呢？"对于这一問題根本不能有确定的答案，因为应当首先知道說的是哪一个战爭。……馬拉松战役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最有价值的事件"。但是从这一观点来看現象，正是把对它們的研究放在具体的基础之上。所以，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話来說，辯証法哲学認为"从前那种不研究現象發生的原因就侈談其好坏的泛泛之論，那种一般的、抽象的詞句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抽象的眞理是沒有的，眞理总是具体的"。

初看起来，这似乎是自明之理；但是这只是对于那些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站在辯証法的观点上而不把"抽象的要就是这——要就是那"（或"是——是和否——否"的公式）当作最重要的思維方式的人才是明白的。如果問一問，例如，托尔斯泰伯爵，我們上面引的車尔尼雪

㊀ 黑格尔："小邏輯"，參閱三联書店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八七頁。

夫斯基关于战爭的議論是否正确，他將回答您說，它完全不正确，因为战爭就是惡，而惡是永远不能成为善的。托尔斯泰伯爵关于一切問題都是从"抽象的要就是这——要就是那"的观点来判断的，所以他的結論沒有什么严肃的意义。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辯証法是一竅不通的，这也是他本能地憎厭馬克思主义的原因之一。不幸的是，連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常常忘記，"眞理总是具体的"。他在自己的政治經济学中常常傾向于"抽象的要就是这——要就是那"。但是我們現在不来多談这一不可否認的事实。这里对于我們重要的是提醒讀者，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如何清楚地懂得和如何簡單而明了地解釋了辯証法的观点和抽象的議論之不能相容(在他的"果戈里时代的俄国文学概論"中)。

無政府主义者問社会民主党人：你們承認个人的自由嗎？馬克思主义者們回答說，我們承認，但是是有条件的承認，因为一个人的無条件的自由就意味着对他周圍的一切人的無条件的奴役，即是說把自由变成为自由本身的对立物。無政府主义者不喜欢这样的回答，他們大概确实認为馬克思主义者是自由的敌人，他們自己是主張个人之無限制的，亦即無条件的自由的。把自由变成为自由本身的对立物在他們看来簡直是詭辯，或者，他們中間現在如果有誰学会了伯恩斯坦先生的术語，就要說这是黑格尔辯証法的妙論之一。無政府主义关于自由的学說是浸透了"抽象的要就是这——要就是那"的精神的(要就是自由，要就是專制)。这个学說整个地建立在伯恩斯坦先生所喜欢的"是——是和否——否"的公式之上，而社会民主党人則从具体的观点来看自由的問題。他們記住了，抽象的眞理是沒有的，眞理总是具体的。在这一方面，他們是浸透了辯証法的精神的。

当然，伯恩斯坦先生自己很乐于斥責無政府主义关于自由的学說而同意抽象的眞理是不会有的。如果他这样主張，那他自己就过渡到了辯証法的观点。但是他是不自覺地这样做的，因此就擺脫不了支配着他的那种概念的混淆。莫里哀喜剧中的朱尔丹先生散文說得很不錯，但是他自己并沒有意識到有散文語言的存在。但是，当那

些只会不自覚地应用辯証方法的人談論辯証法的时候；他們除了胡說以外就談不出别的东西来。

寻求具体的眞理，是辯証法思維的特征。車尔尼雪夫斯基也表示过这样的意思。他說：从黑格尔以来，"解釋現实成为哲学思維的重大責任"；"由此，就对于从前所不加思考并且为了迎合自己的片面成見而肆意歪曲的現实，开始異常重視起来"。

假使眞地如此，——事实上也确是如此，——那末，不难理解辯証法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發展中的作用。

十八世紀的法国啓蒙学者是从善与惡、智与愚的抽象对立的观点来看社会生活的。他們經常"馳騖于抽象的概念之中"。我們只要提起他們对封建主义的态度也就够了：他們把封建主义看作是最大的愚蠢，怎样也不承認有过一个时候，封建主义曾是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制度。至于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們，他們有时对于十八世紀的抽象思維是十分不滿的。其中有几个人在关于历史的議論中，有时也抛棄"是——是和否——否"的抽象公式，而拥护辯証法的观点。但他們只是有时候是这样。他們的大多数，而且在絕大多数的場合下，在討論社会生活时都是滿足于"抽象的要就是这——要就是那"的。他們的整个体系都浸透着这一"要就是这——要就是那"的精神，而正是这一"要就是这——要就是那"的精神使他們的体系具有空想的性質。社会主义为了从空想变成科学，曾必須超越这种思維方法，而發展到辯証的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社会主义的这一必要的变革。但是他們之能完成它，只是因为他們在事先学过了黑格尔的哲学。他們自己也乐于承認，他們得辯証法的益处很大。但是伯恩斯坦先生希望最好不是这样。他向我們宣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是由于撇开了辯証法而不是得力于辯証法。語气当然是很坚决的，但是正和有一次吉荷米洛夫先生在他的一本"为什么我不再作革命家"的小册子中所發表的那个卓越的思想(俄国文学的發展是得力于專制制度而不是由于撇开了它)一样，是缺少証明的。

伯恩斯坦先生坚定地相信：黑格尔及其門徒是輕視有确定意义

的概念的，因为他們認为这是形而上学。讀者已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話知道了黑格尔的辯証法哲学如何要求人們重視現实。但是重視現实不能沒有意义确定的概念。所以必須假定，伯恩斯坦先生即在这里也表現出他沒有懂得这位偉大的思想家。实际上也正是如此。为了說明这点，只須讀一讀(当然也要懂得)黑格尔的大"百科全書"的第八十节。那一节是这样写的：

"思維，作为理智的活动，必須要有固定不移的、互相区别的定义。对思維說来这些有限的抽象性是牢固地存在的。"

对这一节的补充說明：

"我們首先必須賦予理智的思維以应有的地位，同样也必須承認它的功績。它的功績就在于，沒有理智的思維，無論在理論范圍內或在实踐中都不能达到什么牢固的和确定的东西。認識开始于把各种事物作一定的区别。例如，在研究自然界的时候就須区别各种質料、力量、类别等等，并把它們各自孤立地固定下来。科学的后来的进步就在于从理智的观点过渡到理性的观点。凡經理智固定为彼此間有深淵之隔的各現象，理性就研究其由一現象轉变为另一現象的过程，其發生及其消灭的过程。"㊀

凡是能在詞語后面看出与之相联系的概念，而不以現在看来是奇怪的黑格尔术語为怪的人，一定会同意黑格尔所指出的研究道路，正是我們今日的科学(例如，自然科学)所遵循并做出了自己的最光輝的理論發現的道路。

黑格尔不仅不忽視理智(包括有确定意义的概念)的权利，而且甚至在那些似乎离"理智"很远的領域，如哲学、宗教、艺术中也堅决主張理智的权利。他發表了一种精湛的意見，說每一个成功的戏剧作品必須以有几个精确刻画的人物为前提。至于說到哲学，那末它，用他的話来說，首先要求思想的精确(präzision)！㊁

但是伯恩斯坦先生管什么黑格尔哲学的眞实性質呢？他又管什

㊀ 黑格尔："小邏輯"，参閱三联書店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八三、一八四頁。

㊁ "黑格尔全集"，第四卷，第一五〇至一九一頁。

么"百科全書"和其中的这一节或那一节呢？他清楚地知道，他总找得到一些即使發現了他的錯誤也会对他鼓掌的讀者。他"批評"馬克思？他力求毀坏馬克思主义的"教条"。这就足够使他現在获得很大的荣誉。当然，沒有什么东西妨碍他研究一下自己所要批評的东西。但是不研究……也是过得去的。

伯恩斯坦先生信賴自己的常識，但是常識只是在不超出自己的專長的范圍的时候才是可靠的伴侶。不是在我們現在所批評的这本書中，而是在这本書出版后登在"新时代"的一篇論文中，伯恩斯坦所表露的如下的見解，說明他的話的眞意所在。

恩格斯在其論費尔巴哈的有名著作中說，在辯証法看来，世界是过程的总和，在这一总和中物及其在头腦中的反映，即概念，并不是靜止不动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在原則("prinzipiell")上伯恩斯坦先生"当然"認为这一原理是正确的。但是他不知道，在怎样的限度之內它能保持自己的正确性，并且应当怎样理解不断的变化这几个字。据他說，任何一个人的有机体所經历的变化总不能把他变成完全不同种的另一种生物。这样深刻的思想，連桑科·判扎都是要妒忌的。但是难道伯恩斯坦先生以为，黑格尔和黑格尔派会片刻忽視这一深刻的、老的和可敬的眞理嗎？黑格尔，好像預見到会有伯恩斯坦先生之流的"批評家"出現似的，曾經提醒自己的听者注意：任何一个現象的發展只能把本身所含的可能(an sich)变为現实。他举植物为例說，虽然植物也变化，但是只是依照着自己的胚胎的本性变化，而"不是毫無道理地胡乱变化"㊀。由此，你可以判断伯恩斯坦先生的深思熟慮的批判有沒有必要了！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三月出版的普列汉諾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第四二至四九頁）

㊀ "哲学史講演录"，第一卷，載"黑格尔全集"，第三卷，第三四至四五頁。

第二部分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

“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文摘录

馬克思

……“資本論”中所应用的方法被人們理解得很差，这点至少可从人們对它作出的各种极不一致的評价中看出。

例如，巴黎的“实証主义評論”責备我，一方面說我形而上学式地考察政治經济学，另一方面又說——你道怎样？——我只限于对現有事实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却沒有写出調味的方法（孔德主义的嗎？）供未来的厨房用。关于形而上学云云的責难，吉貝尔教授說：“至于說到理論本身，馬克思的方法乃是整个英吉利学派所用的演繹法，其缺点与优点都是一切最上乘的經济学理論家共同有的”㊀。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論家”一文（載于一八七二年七八兩月号的“經济学者杂志”）中，發現我的方法是分析法，并且說：“馬克思先生的这个著作証明他是最卓越的富于分析能力的头腦之一。”德国的書报評論家，自然是叫喊說什么黑格尔式的詭辯。彼得堡的“欧洲通聞”在一篇專論“資本論”方法的論文中（見一八七二年五月号，第四二七至四三六頁）㊁，說我的研究方法是极其現实性的，但叙述方法不幸是德意志式辯証性的。該文作者写道：“如果依照叙述方面的外

㊀ 吉貝尔著：“达·李嘉圖的关于价值和資本的理論”。一八七一年基也輔版，第一七〇頁。——編者注

㊁ 这里指的是彼得堡大学教授考甫曼斯著“卡·馬克思对于政治經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編者注

形来判断，仿佛馬克思是一个很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并且是"德意志式的"即很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然而，实际上，在經济学批判方面，他却比他的一切前輩人物都更加無可計量地是現实主义者。……無論如何不能称他为唯心主义者"。我最好是从这位作者本人的批評中摘录几段来答复他；而且这些摘录，会使我那些不能直接閱讀俄文原文的讀者感到兴趣。

这位作者，从我的"政治經济学批判"自序中（一八五九年柏林版，第Ⅳ至Ⅶ頁㊀）引用了我說明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的一段話之后，繼續写道：

"在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从事研究的諸現象的法則。并且在他看来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現象具有一定形态并处于当时現有相互关系中时支配着这些現象的法則。除此而外，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現象变化的法則，这些現象發展的法則，即由一个形态轉为另一个形态，由一种相互关系轉为另一种相互关系的法則。这个法則既已由他發現了，他就来更詳細研究这个法則表現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后果。……所以，馬克思只关心一件事：用严密的科学研究来証明一定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并尽可能确切地指明出那些成为他的出發点和根据点的各种事实。他認为完全足够的，就是他既已証明了現代秩序的必然性，从而又証明了这种秩序一定要推移到那里去的别一种秩序的必然性，不管人們是否想到这点，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这点。馬克思把社会的运动看作是一个自然性历史的过程，支配着这个过程的法則不仅不依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为轉移，而且本身就是决定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的。……既然意識要素在文化史上是起着这样从屬性的作用，那末不說自明，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决不能是以意識的任何一个形态或結果来做基础。这就是說，能作为这种批判的出發点的不是观念，而只是外部的現象。批判并不在于拿事实和观念来比較对照，而是拿一种事

㊀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三三九至三四三頁。——本書編者注

实和另一种事实来比較对照。对于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要兩种事实都受到尽量确切的研究和眞正是代表着不同的發展阶段，而且要这些發展阶段所由以表現出来的次序、連貫性和联系也受到同样确切的研究……

也許有些讀者在这里就会想到这样一个問題……經济生活的一般法則是同一的呵，無論它們应用于現代生活或应用于过去生活，豈不都是一样嗎？但这正是馬克思所不承認的。这样的一般法則在他看来是沒有的。……依照他的意見，恰恰相反，每一个大的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法則。……但是，当生活一旦經过了一定的發展时期，超出本阶段而进入了别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到别一些法則的支配。总之，經济生活在这种場合表現出来的現象，完全和我們在其他各种生物学現象方面所看到的相像。……对这种經济生活現象活动狀态的內部結構和特性的仔細分析，早从四十年代起就不只一次地使得許多研究家确信到，旧經济学者对經济法則实質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看法竟把經济法則跟物理法則和化学法則混同起来了。……对現象作更深刻的分析，就表明各种社会机体是和各种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有根本的不同。……所以，同一个現象，可能由于这些机体的構造不同，由于它們的器官不一样，由于各种器官所由以發生作用的条件不同等等，因而在不同的發展阶段上……受完全不同的法則所支配。例如，馬克思就不承認人口增加法則始終和到处都是一样，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都是一样。相反，他認定，每个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的人口繁殖法則。……經济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都取决于經济力量生产率的程度……由于生产率的不同，生产率的后果，从而支配这种后果的法則，也会是不同的。这样，馬克思抱定研究并且說明資本主义經济制度的这个目标，他不过是严密科学地确定了确切研究經济生活时可能有的目标。……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是在于它說明了那些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發生、存在、發展和死灭以及它由别一个即較高級社会机体更替过程的局部法則。馬克思这部書确实有这样的价值”。

这位作者既已如此确切地描出了他所称为我的实在研究方法的东西，并且如此好意地对待了我自己运用这个方法的手續，因而也就不外是描出了辯証法。

当然，說明方式是不能不在形式上不同于研究方式的。研究工作应該是詳細地掌握材料，分析这材料的各种發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發展形态的內部联系。

只有把这种工作完成后，才可适当地把現实的运动描述出来。当这層已經做到，而材料的生命已經获得观念的反映时，那末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驗式造成的結構了。

我的辯証法在根本上不仅是与黑格尔的辯証法不同，而且是与它絕对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維过程，即他所称为观念而甚至將其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維过程，是現实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实事物不过是思維过程的外部表現。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观念現象不过是被移置于人的头腦中并在人的头腦中改造过的物質現象而已。

在黑格尔辯証法仍甚流行时，即將近三十年前，我已批判过黑格尔辯証法的神秘的方面。但正是当我著"資本論"第一卷时，那些猖狂、自負、十分平庸而又在現代德国知識界中起倡导作用的不肖子孙們，却已像列辛时代大胆的門德尔桑鄔棄斯宾諾莎一样鄔棄黑格尔，即把他看作是一条"死狗"了。因此，我便公开宣称我是这位偉大思想家的門人，并且我在論价值学說的那一章內甚至往往用黑格尔特有的表达姿势来卖弄。辯証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是第一个把辯証法的一般运动形态作了一个全面的和自覺的叙述的人。在黑格尔手中，辯証法是倒立着的。必須把它順过来，以便在神秘的外壳下面揭示出合理的內核。

在其神秘化的形态上，辯証法成了德国的流行品，因为看来仿佛它是歌頌現存事物狀态的。在其合理的形态上，辯証法引起資产阶級及其空論主义思想家們的煩惱和恐怖，因为它在对于現存事物的肯定性的理解中，加进有对現存事物的否定性的理解，即关于現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于每一現存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洪流中，因

而也从其暫时經过的方面去理解；它对任何事物都不表示崇拜，而是本質上批判的和革命的学說。

資本主义社会充滿着矛盾的运动使实踐資产者能最切实地感触到，現代工业經历着循环周期中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頂点就是普遍危机。目前这危机又在逼近前来，虽則它还处于預备阶段中；这危机將由于它包括范圍的多面广闊和它作用程度的强烈深入，定会把辯証法甚至灌进新的神聖普魯士德意志帝国里那班暴發戶的腦袋中去。

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倫敦

（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排印）

关于正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摘錄)

毛 泽 东

一 兩类不同性質的矛盾

……

許多人对于敌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这兩类性質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該承認，这兩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們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經混淆过。在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錯誤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現在也还有。我們的錯誤沒有扩大化，是由于我們在政策中規定了必須分清敌我，錯了就要平反。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認为，对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这个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說来，对立的統一是有条件的、暫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爭則是絕对的。这个規律，列宁講得很清楚。这个規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漸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許多人說来，承認这个規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規律去观察問題和处理問題又是一回事。許多人不敢公开承認我国人民內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們的社会向前發展。許多人不承認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会矛盾面前縮手縮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將会使社会主义

社会內部的統一和团結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釋，引导人們認識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現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現为剧烈的阶級斗爭，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济基础之間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况罢了。我国現在的社会制度比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够容許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長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滿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下，生产力的發展一直是非常緩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間，全国除东北外，鋼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鋼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鋼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沒有机器制造业，更沒有汽車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現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資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許多人在这个問題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經回答了这个問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發展，这一点，甚至連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認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剛剛建立，还沒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資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剝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說，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質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質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問題上，还需要繼續解决。在各經济部門中的生产和交換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則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經济和集体所有制經济里面，在这兩种社会主义經济形式之間，积累和消費的分配問題是一个复杂的問題，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經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發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發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層建筑和經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識形态，这些上層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組織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資产阶級意識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構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相矛盾的。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体的情况，繼續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將会長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时常經过国家計划去調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經济計划，安排积累和消費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时的相对的統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說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爭所打破了，这种統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統一成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这就是我們計划經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發生

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断出現，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証規律。

現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級斗爭基本結束，但是阶級斗爭还沒有完全結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問題，应当繼續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說，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繼續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慣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經驗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們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兩类矛盾的界綫，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团結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場新的战爭——向自然界开战，發展我們的經济，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較順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

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認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發展經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进艺术發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針，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針。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們認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發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問題，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討論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踐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錯誤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时間。

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認，只能在斗爭中曲折地發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們一开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哥伯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說，达尔文的进化論，都曾經被看作是錯誤的东西，都曾經經历艰苦的斗爭。我国历史上也有許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長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見，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鑒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長。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愼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要輕率地作結論。我們認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較順利的發展。

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爭中發展起来的。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認为是毒草。現在它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还在繼續受打击，还被認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来，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級的残余还是存在，資产阶級还是存在，小資产阶級剛剛在改造。阶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的阶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阶級斗爭，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阶級斗爭，还是長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無产阶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資产阶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沒有眞正解决。無論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馬克思主义仍然必須在斗爭中發展。馬克思主义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現在是这样，將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錯誤的东西作斗爭的过程中發展起来的。眞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东西相比較而存

在，相斗爭而發展的。当着某一种錯誤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棄，某一种眞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眞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这种斗爭永远不会完結。这是眞理發展的規律，当然也是馬克思主义發展的規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誰胜誰負的斗爭，还需要一个相当長的时間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資产阶級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長期存在，作为阶級的意識形态，还要在我国長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会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思想斗爭同其他的斗爭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細致的講理的方法。現在社会主义在意識形态的斗爭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無产阶級領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們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錯誤，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們对人民是忠誠的，我們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設好，我們已經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將繼續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資产阶級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数都是愛国的，他們願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領导的劳动人民，他們就会無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們問：在我們国家里，馬克思主义已經被大多数人承認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評呢？当然可以批評。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眞理，它是不怕批評的。如果馬克思主义害怕批評，如果可以批評倒，那末馬克思主义就沒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評馬克思主义嗎？抱着資产阶級思想、小資产阶級思想而不願意改变的人們，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評馬克思主义嗎？馬克思主义者不应該害怕任何人批評。相反，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斗爭的风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陣地。同錯誤思想作斗爭，好比种牛痘，經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

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并不会削弱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領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該采取什么方針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剝夺他們的言論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內部的錯誤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許这些思想有任何發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对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讓發表錯誤意見，結果錯誤意見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見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沒有見过风雨，沒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錯誤意見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才能眞正發展正确的意見，克服錯誤的意見，才能眞正解决問題。

資产阶級、小資产阶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种办法頑强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讓他們表現，而应当讓他們表現，同时在他們表現的时候，和他們辯論，进行适当的批評。毫無疑問，我們应当批評各种各样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着錯誤思想到处泛濫，任憑它們去占領市場，当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爭。但是这种批評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辯証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說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評不能解决問題。我們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們必須謹慎地辨别什么是眞的毒草，什么是眞的香花。我們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謹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爭。

我們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須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傾机会主义，是一种資产阶級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义者，右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馬克思主义，他們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們所攻击的正是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們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証法，反对

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产党的領导，反对或者企圖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复資本主义制度，他們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級进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而在这个斗爭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这兩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沒有阶級性的，無产阶級可以利用它們，資产阶級也可以利用它們，其他的人們也可以利用它們。所謂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級、阶層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們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們的言論和行动的是非呢？我們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則，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張，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規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結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專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領导，而不是摆脫或者削弱这种領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結，而不是有損于这些团結。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領导兩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發展对于各种問題的自由討論，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討論。不贊成这些标准的人們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来辯論。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沿着正确的軌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鑒别人們的言論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鑒别科学論点的正确或者錯誤，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違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嗎？

以上所說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發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們并不認为，它們必須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六月單行本第九至一三、二五至三一頁）

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

（閱讀第一、二、三部分）

（見本書第一三九一至一四〇八頁）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
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
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宣言

（閱讀第二部分）

（見本書第六九至七一頁）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听取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和十六日至十九日举行的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的报告以后，一致同意这兩个会議所通过的宣言，对于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这兩个会議期間所进行的工作表示滿意。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議和所通过的兩个宣言，开辟了現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給了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一切和平民主进步的力量以极大的鼓舞。这兩个宣言得到了全世界共产主义政党的欢迎和拥护。美国共产党在清除了修正主义分子盖茨之后，也同意了宣言的观点。只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不但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的宣言公开地表示反对的态度，而且在它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徹头徹尾的修正主义的綱領，来同莫斯科会議的宣言相对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領导人鉄托等，为着替他們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徹头徹尾的修正主义綱領辯护，在他們的代表大会上，对于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陣营进行了一系列恶意的攻击，而对于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則表示了逢迎和感恩戴德。

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宣言中的观点，保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則，反对現代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任务。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的宣言，总結了一百年来特别是近四十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經驗，闡明了各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必須遵守的共同原則，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团結广大人民群众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根本方針，奠定了各国共产党团結的思想政治基础，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綱領性的文件。

宣言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指出了"世界的發展取决于兩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賽的进程和結果"；指出了"社会主义在向上發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指出了殖民主义体系正在瓦解；指出了"資本主义經济不能避免新的、深刻的震动和危机"。宣言指出了，是战爭还是和平共处已經成为世界政治的根本問題，而帝国主义的存在是侵略战爭的根源；指出了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已經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成为各国人民群众的最凶惡的敌人，"这些反人民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实行的政策使它們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同时，宣言又指出了，和平的力量已經大大成長，已經有实际的可能来防止战爭，而站在这个和平力量的最前列的，是不可摧毀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宣言指出了："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战爭的爆發。如果帝国主义的战爭狂人硬要不顧一切發动战爭，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灭亡，因为人民絕不会再繼續容忍那个給他們帶来如此慘重的痛苦和牺牲的制度。"

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所通过的"和平宣言"指出：对于和平事业的威胁，对于各国人民安全的威胁，是来自"在兩次世界大战中、在目前的軍备竞賽中大發横財的壟断資本集团"。宣言向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們呼吁：組織起来，爭取和平。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宣言对于国际形势的估

計的正确性，正被事实的發展所証明。半年以来，在社会主义陣营里，苏联、中国和其它許多兄弟国家的經济建設和文化建設都出現了蒸蒸日上的形势。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新的發展，而且在一些国家中，正在进行激烈的斗爭。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却进入新的严重的深刻的經济危机。这个經济危机是首先在資本主义最發达的美国發生的，美国的經济危机正在冲击着整个資本主义世界。在和平与战爭的問題上，苏联、波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馬尼亞和其他兄弟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的和平建議，苏联已經首先停止了核武器試驗，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我国政府共同决定从朝鮮撤出中国人民志願軍，这些事实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示了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为爭取和平願意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却至今不顧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願望，繼續拒絕停止核武器試驗，拒絕停止冷战，拒絕裁減軍备，拒絕从朝鮮撤兵，千方百計拖延最高級会議的召开。美帝国主义一直霸占着我国的台灣。美帝国主义者居然公开干涉印度尼西亞的內政，接济和援助印度尼西亞的叛乱集团，現在又要干涉黎巴嫩的內政。应該警惕，美帝国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还在积极进行战爭威胁，准备新的战爭，加紧对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国家进行政治、經济、文化的侵略，破坏这些国家內部的团結，以至直接用武力鎮压民族解放运动。我們的任务，是要团結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来維护和平，粉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战爭阴謀。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宣言指出，为了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設的具体实踐相結合的原則，必須注意克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宣言强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基础——辯証唯物論，反对形而上学和唯心論，認为"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辯証唯物論，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关于什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当前主要危險的問題，宣言明确地答复說："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險是修正主义，或者說右傾机会主义。它是資产阶級意識形态的表現，

它麻痺工人阶級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資本主义。”宣言指出：“資产阶級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則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宣言特别注意到現代修正主义的出現，指出：“現代修正主义企圖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偉大学說，說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發展已經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圖腐蝕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他們否認在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無产阶級革命和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領导作用，否認無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要求放棄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設的基本原則，首先是放棄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組織变成某种爭論不休的俱乐部。”

我們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高兴地看到，宣言發表以来，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兄弟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事业方面，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在团結合作方面，都有了新的成就。資本主义各国的兄弟党，在反对修正主义和右派叛徒的斗爭中，在巩固自己的队伍，保衛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統一，加强党的战斗力的工作中，在同工人和农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广大群众建立亲密联系的工作中，也有了新的进展。

显然，为着全世界無产阶級的共同事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爭，各国共产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結一致是特别重要的。各兄弟党应該加强相互間的联系。一切不利于团結的言論和行动都是有害的，都必須坚决反对。

宣言关于当前主要危險是修正主义即右傾机会主义的断定，也被事实所証明。最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在一系列的根本問題上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的宣言，并且違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所曾經签字的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的“和平宣言”。南共代表大会有权利通过自己的綱領，各国共产党同样有权利，也有責任，批判南共

这个修正主义的綱領，为保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潔性而斗爭。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这个綱領，一方面断言，“資本主义世界蓬勃發展的国家資本主义趋势极其明显地証明：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徑不可阻擋地深深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并且断言，資本主义世界的国家机構是“劳动关系和財产关系、社会权利和社会服务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調节者”，正在日益“限制私人資本作用”和“剝夺私人資本所有者在經济和社会中的某些独立职能”。另一方面，南共綱領又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說成是“国家資本主义”，他們認为在这种所謂“国家資本主义”的基础上直接产生“官僚主义和官僚国家主义偏向”。南共綱領就是这样，丑化社会主义而美化資本主义，丑化無产阶級專政而美化資产阶級專政。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認为“社会主义因素”正在資本主义国家內部形成起来，工人阶級只要对資产阶級国家机構“不断施加压力”，爭取在这种国家机構中“取得决定性的影响”，就能够“保証社会主义的發展”。南共綱領在这里散布不要無产阶級革命、不要打碎資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不要建立無产阶級專政的謬論，企圖腐蝕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級的革命意志。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領导集团标榜自己是超出于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之外，实际上并不是如此；他們攻击的矛头一直是对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而对于美帝国主义却絲毫不敢触动。他們把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这兩种根本不同性質的世界政治經济体系，說成是“世界分裂为兩个敌对的軍事政治集团”，并且尽量丑化社会主义陣营而美化帝国主义陣营。应当指出，有不少国家，虽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們采取反对战爭、擁护和平的中立政策，对于維持世界和平是有积极意义的，是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反对的，是得到各国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的。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領导集团的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团結的所謂超集团的立場，却是迎合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陣营的政策，因而得到了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喝采和奬金。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援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詞句，仅仅是为了披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便于欺騙别人。这个綱領在思想方法上是用顚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詭辯代替革命的唯物辯証法，在政治上是用反动的超阶級的国家論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論，用反动的資产阶級民族主义代替革命的無产阶級国际主义，在政治經济学上是为壟断資本辯护，混淆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無产阶級的阶級斗爭、無产阶級革命和無产阶級專政的理論，他們也就完全抛棄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無产阶級政党的学說。他們宣傳一套取消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的領导作用的謬論，攻击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并且誣蔑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本国不再是促进社会發展的革命性、創造性的推动因素"，其目的是妄圖破坏和瓦解各国共产党。

这个徹头徹尾的修正主义的綱領，是为了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提出来的，是恰恰在資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时候，在右翼社会党人的修正主义对工人阶級和劳动群众的麻痺作用日益減弱的时候提出来的，因而这个綱領对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效劳，等于"雪中送炭"。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認为，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狀况的决議"中，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背棄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而走上了資产阶級民族主义的錯誤道路所进行的批評，基本上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当时在处理这个問題的方法上有缺点和錯誤。我們党当时同意和支持了这次批評。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情报局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第二个决議則是錯誤的，参加情报局会議的各国共产党后来撤消了这个决議。一九五四年以来，以赫魯曉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創議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并且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苏联共产党的这个創議得到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贊同。我們也采取了同苏联一致的步驟，建立了中南兩国兩

党的关系。苏联共产党和一些有关的共产党从团結的願望出發，对过去在对待南斯拉夫关系問題上的缺点作了必要的自我批評。从那时以来，各国共产党为了改善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关系，作了仁至义尽的努力，耐心地等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領导人重新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上来。但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領导人完全無視各国共产党的善意的努力，始終沒有認識自己的錯誤，沒有作任何自我批評。不但如此，他們还不断地对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誣蔑，甚至不惜附和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他們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中，扮演了一个挑撥者和干涉者的很不光彩的角色，只是由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領导同志在鎮压叛乱中和平定叛乱后一貫地坚持了严正的正确的立場，才使他們的陰謀沒有得逞。而現在，在莫斯科会議增强了各国共产党团結之后，他們却在自己的綱領中表示了自己的頑强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并且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充满了敌意。毫無疑問，南斯拉夫領导人的这种立場和行为，表明他們自己自絕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这对于南斯拉夫眞誠的共产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人民是完全不利的。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完全同意党的中央委員会不派代表团而仅派观察員列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一致認为，必須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現的現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爭。同各国兄弟党一起，在政治上和理論上徹底粉碎現代修正主义，保衛馬克思列宁主义，保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統一，是我們党对国际工人阶級的神聖义务。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完全相信，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克服任何阻碍，在世界范圍內取得新的偉大的胜利。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五月單行本排印）

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批判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論

今天是科学共产主义創始人——馬克思誕辰的一百四十周年。从一八四四年以来，馬克思主义一直是在同資产阶級、小資产阶級各式各样的反动思潮作斗爭，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想作斗爭。馬克思主义在斗爭中不断地获得了胜利；因为革命的实踐証明了它的正确。在帝国主义和無产阶級革命时代，列宁就是在斗爭中發展了馬克思主义，把馬克思主义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現在国际工人运动又向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一个新的神聖任务，就是要同現代修正主义，或者說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进行毫不調和的斗爭。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兩条根本不同路綫的斗爭，这是关系国际工人阶級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成敗的一場大斗爭。

最近結束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这是一个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徹头徹尾的修正主义的綱領。概括地說来，这个綱領草案在思想方法上是用詭辯代替革命的唯物辯証法；在政治上是用反动的超阶級的国家論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論，用反动的資产阶級民族主义代替革命的無产阶級国际主义；在政治經济学上是为壟断資本辯护，混淆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兩种制度的根本区别。这个綱領草案公然背棄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則，与去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的宣言相对抗，同时也違反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自己所曾經表示同意的六十

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的"和平宣言"。这个綱領草案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奠定的、經过列宁和其他偉大的馬克思主义者加以發展的革命理論的基本原則，一概叫做"教条主义"，而南共領导人自称为"教条主义的不調和的敌人"。

南共領导人所要攻击的"教条主义"，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無产阶級革命和無产阶級專政。但是，大家知道，沒有無产阶級革命和無产阶級專政，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南共綱領草案集中地反对無产阶級革命，攻击無产阶級專政，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陣营加以丑化，对資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陣营則加以美化。这就不能不使人們对于南共領导人所說的"社会主义"發生了怀疑。

像各国反动派和中国資产阶級右派的口吻一样，南共領导集团惡毒地誣蔑無产阶級專政，說它"造成官僚主义、国家极权主义思想、政治領导力量脫离劳动群众、停滯、社会主义發展畸形化以及內部矛盾和对立的尖銳化"。他們惡毒地誣蔑社会主义陣营，說它也有所謂'从实力地位出發采取霸权斗爭的政策"。他們把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这兩种根本不同的世界政治經济体系，說成是"世界分裂为兩个敌对的軍事政治集团"。他們描写自己是置身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兩个集团"之外，即处于所謂超集团的地位；他們認为美国操縱的联合国可以"使世界日趋統一"；世界各国，即包括帝国主义在內的国际經济合作，是"走向世界經济發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組成部分"。他們認为，"資本主义世界蓬勃發展的国家資本主义趋势极其明显地証明：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徑不可阻擋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这些論点使人們不能不想起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右翼社会党徒，如伯恩斯坦、考茨基、希佛亭之流的所謂"进化的社会主义"、"超帝国主义"、"有組織的資本主义"、"資本主义和平長入社会主义"等等修正主义的說教。这种修正主义說教的目的，就是要引誘資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級放棄爭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爭，而維护資产阶級的統治。現在南共領导人的說教，对于各国工人阶級和其他劳动人民，也抱有一种狂妄的企圖，就是想引誘工人和其他劳

劲者走上向資本主义投降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領导人鉄托在普拉的演說中曾經說过："实际牽涉到的問題是：新的方針是否会在各国共产党內得胜——这种方針实际上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現在的問題是：是这条路綫(按：这就是所謂南斯拉夫路綫)得胜呢，还是斯大林路綫再度得胜。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它必須在各方面努力。"这些話充分暴露了他們的野心究竟是什么。

南共綱領草案出現在目前时期，决不是偶然的。从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經取得了一系列的偉大的历史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已經在九亿多人口中取得了胜利，資本主义总危机大大地扩大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在經历一个新的深刻的周期性經济危机。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加紧进行破坏。資产阶級历来破坏工人运动的手段不外兩种，一种是暴力鎮压的手段，一种是欺騙的手段。在目前国际新形势下面，在右翼社会党的修正主义在工人阶級和劳动群众中的麻痺作用日益減弱的时候，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提出的綱領，恰恰是符合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

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修正主义，或者右傾机会主义，是一种資产阶級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义者，右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馬克思主义，他們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們所攻击的正是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現在事实已經証明，毛澤东同志說的这一段話不但針对着我国的情况，并且也适合于国际的情况。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宣言写道："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險是修正主义，或者說右傾机会主义。它是資产阶級意識形态的表現，它麻痺工人阶級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資本主义。"宣言还特别着重地指出："現代修正主义企圖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偉大学說，說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發展已經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圖腐蝕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

人阶級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他們否認在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無产阶級革命和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領导作用，否認無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要求放棄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設的基本原則，首先是放棄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組織变成某种爭論不休的俱乐部。"宣言很清楚地描繪了現代修正主义者的嘴臉，南共綱領草案的內容正是表現了这样的一副嘴臉。

非常明显，对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所集中起来的一系列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徹头徹尾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必須进行公开的毫不調和的批判。如果說，上一世紀末期和本世紀初期馬克思主义者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展开理論批判是不可避免的話，那末，現在我們对于新伯恩斯坦主义的批判更加是必要的了。因为現代修正主义是由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党的領导集团，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統的綱領而提出的，因为現代修正主义的目的是在于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于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而且直接損害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們認为，一九四八年六月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狀况的决議"中，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脫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而陷入資产阶級民族主义的錯誤所进行的批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情报局对于这个問題的处理，在方法上是有缺点和錯誤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議則是錯誤的，参加情报局会議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后来已經撤消了这个决議。从一九五四年以来，苏联和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仁至义尽地采取各种措施，以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各国共产党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希望南共領导人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上来，以利于南斯拉夫人民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南共領导集团拒絕了苏共中央和各国共产党人的善意的努力。在匈牙利事变前后，他們曾經企圖用所謂"反斯大林主义"来分裂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团結，在匈牙利事变中，支持叛徒納吉集团，而在他們最近召开的

代表大会中，更提出了系统的完整的修正主义綱領。南共領导人应該冷靜地想一想，难道南共放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堅持修正主义的观点，能够保持同各国共产党的团結嗎？难道沒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观点，能够有团結的基础嗎？难道拒絕同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友好，拒絕同各国共产党友好，对南斯拉夫人民是有利的嗎？

我們認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分清大是大非，是完全必要的。正如列宁所說，“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目前世界是处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新的历史轉折点。馬克思主义路綫和修正主义路綫的斗爭，不是别的，而是反映了新兴的社会阶級力量同垂死的社会阶級力量的尖銳化的斗爭，反映了帝国主义世界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尖銳化的斗爭。每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想躲避这个斗爭是不可能的。历史的發展將会越来越清楚地証明，这个斗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論一元論历史观之發展(摘錄)

普列漢諾夫

第一章　十八世紀底法国唯物論

"假如你現在——米哈依洛夫斯基先生說——碰到一个年輕人……他甚至帶着多少过分的性急告訴你，他是'唯物論者'，那末，这不是說，他是一般＝哲学意味上的唯物論者，如我們旧时代的布赫納和摩莱蕭特的信徒那样。常常你的对談者对于唯物論的形而上的和科学的方面沒有絲毫兴趣，甚至关于这些他只有異常模糊的概念。他想說，他是經济唯物論底信徒，而且这亦是在特殊的有条件的意味上……"㊀

我們不知道，米哈依洛夫斯基先生碰到过那一类的年輕人。可是他的話能够使人設想，"經济唯物論底"代表們底学說和"一般＝哲学意味上的"唯物論沒有任何联系。这是否正确呢？在实际上，"經济唯物論"的內容是否如米哈依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这样狹隘和貧乏呢？

这个学說底历史底概述可以作为回答。

什么是"一般＝哲学意味上的唯物論"呢？

唯物論是唯心論底直接对立物。唯心論企圖以这种或那种精神底屬性来解釋自然底一切現象，物質底一切屬性。唯物論恰恰相反。它企圖以物質底这种或那种屬性，人体或者一般地动物肢体底这种或那种組織来解釋心理現象。所有那些在他們目光中物質是第一性的因素的哲学家屬于唯物論者的营壘；而所有那些認为第一性的因素是精神的——唯心論者。这就是关于一般的唯物論，关于"一般＝哲学意味上的唯物論"所能說的一切，因为时間在它的基本論点上安

㊀ "俄国之富"，一八九四年五月号，第二部九八頁。

置了最各色各样的上層建筑，它使一个时代底唯物論較之另一时代底唯物論帶上完全不同的面貌。

唯物論和唯心論說尽了哲学思想底最重要的方向。是的，在它們之旁差不多永远存在着二元論的体系，承認精神和物質为各别的、独立的本体。二元論永远不能滿意地答复下述这个必然的問題，即如何这兩个各别的、互相間沒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本体能够彼此影响。所以，最徹底的和最深刻的思想家永远是傾向于一元論，即借助于某一个基本原則去解釋現象(Monos按希腊文是統一的意思)。任何徹底的唯心論者，正如任何徹底的唯物論者一样是同等程度的一元論者。在这上面，例如在貝克萊和霍尔巴赫之間就沒有任何区别。一个是徹底的唯心論者，另一个是同样徹底的唯物論者；可是兩人都同等地是一元論者；兩人同等地很好地理解二元論的(至今几乎是最流行的)宇宙观底站不住。

在我們世紀底前半期在哲学上統治着唯心論的一元論；在它的后半期在科学上(这时候哲学已和它完全混合了)唯物論的一元論庆祝着胜利，不过，这种唯物論的一元論还远不是永远是徹底的和公开的。

我們在此地沒有必要叙述唯物論底全部历史。对于我們的目的，只要观察它从前世紀下半期起的發展就够了。而且就在这里，对于我們重要的是，主要地要注意其一个——是的，最重要的——流派，即霍尔巴赫、赫尔維齐及其同道者底唯物論。

这派唯物論者和当时的官式思想家进行了热烈的爭辯，这些官式思想家引用他們所沒有好好地理解的笛卡兒底話，断言：人有某种先天的(即不依賴于經驗而出現的)观念。法国唯物論者在辯駁这个观点时，实質上說来，只不过叙述了洛克底学說；洛克在十七世紀之末就証明了，先天的观念是不存在的(no innateprinciples)。可是在叙述他的学說时，法国唯物論者給了他以更徹底的面貌，在那洛克以良好教育的英国自由派資格所不願提及的一上加了一点。法国唯物論者是無畏的徹底到底的感覚論者，即他們把人底一切心理功能看做

是感覚底变形。在这里来考查在这处或那处他們的論据是否合于現代科学底观点是無益的事。不必說，法国唯物論者还不知道現在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許多东西：只要提起霍尔巴赫底化学的和物理学的观点就够了；然而他們是精通自己时代底自然科学的。可是法国唯物論者有那个不可爭辯和不可替代的功績：即他們从他們同时代的科学的观点上澈底地思想了的，而这是能够和应該要求于思想家的一切。我們时代底科学已經远远超过了法国唯物論者，这是不足为奇的；重要的是，这些哲学家底論敌对于当时的科学說来，亦已經是落后的人了。是的，哲学史家普通將法国唯物論者底观点和康德底观点对立起来，显然，要責备康德为知識不足是荒謬的。但是这种对立是完全沒有根据的；并且不难証明：康德和法国唯物論者本質上是站在同一的观点上㊀，不过不同地运用了它，因而按着他們在其影响下生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性質底不同而得出了不同的結論。我們知道，那些慣于相信哲学史家底話的人們將視这个意見为怪誕的意見。我們在这里沒有可能以詳尽的論据来証实它，可是如果我們的論敌們希望的时候，我們將不拒絕做这一点。

無論如何，大家都知道，法国唯物論者把人底全部心理活动看做是感覚底变形(sensations transformees)。从这个观点观察心理活动，就是說，認为人底一切表象，一切概念和感覚都是周圍环境对他作用的結果。法国唯物論者正是这样观察这个問題的。他們不倦地、很热烈地和十分确定地声言：人及其一切观点与感覚是由他的周圍环境造成的，即第一——自然，第二——社会。"L'homme est tout éducation"（人完全依賴于教育）——赫尔維齐曾經說过，并且把教育一字理解为社会影响底全部总和。这个把人看做是周圍环境底产物的观点乃是法国唯物論者許多革新要求底主要理論基础。实际上，如果人依賴于他的周圍环境，如果人的性格底全部屬性是为环境决定的；那

㊀ 普列汉諾夫指出，"康德和法国唯物論者本質上是站在同一的观点上"，这是錯誤的。与不可知論（康德底不徹底的主观唯心論）相反，十八世紀底法国唯物論者是站在外間世界可認識的观点上的。——編輯部注

末，人的缺点亦是为环境决定的，所以，如果你想和他的缺点斗爭，那末你就应該适当地改变他的周圍环境；而且正就是社会环境，因为自然既不使人为惡，亦不使人为善。將人們放在合理的社会关系中，即放在各人自保的本能不再推动他与别人作斗爭的条件下，协調个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底利益——而德行（Vertu）便会自行出現，正如失去支持的石塊会自行落地一样。德行不須說教而要以社会关系底合理制度来准备。經过前世紀保守派和反动派之手，法 国唯物論者底道德至今被視为是自私自利的道德。他們自己更正确地規定，道德在他們那里全部变为政治。

（一八九四年。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四月出版的博古譯本第一三至一九頁）

在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上的总結發言(摘錄)

(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

柯 慶 施

二 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領导和被領导的关系問題

……

既然民主和集中、領导和被領导之間的关系，从根本上来看是一致的，統一的，那么是不是相互之間一点矛盾也沒有了呢？不是的，我們說从根本上看沒有矛盾，并不是說完全沒有矛盾。在若干具体工作、具体問題上，或者在民主和集中、領导和被領导之間發生不协調的时候，往往存在着矛盾。但是，这种矛盾的性質是屬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可以通过批評和自我批評，通过教育、协商来加以解决的。譬如先进和落后之間，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長远利益之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間，这部分人利益和那部分人利益之間，就經常出現矛盾的狀况。譬如某一工厂的厂長，对問題的看法保守了一些，在这个厂里就会产生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經过群众的討論、批評，糾正了保守的观点，生产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变，生产力就会有很大的提高。

上列这类矛盾，只是暫时存在着的呢，还是長期存在着的呢？当然它是長期存在着的。因为产生这类矛盾的根源，既有社会的、历史的根源，还有人們認識的根源。特别是事物总是發展的，經驗不是固定的，新生事物、先进經驗是不断地生長着，所以在一項事物取得了

平衡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不平衡的局面。这类矛盾解决了一批，又会再出現一批，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現。世界上沒有这样的神技妙术，只要找出几个具体办法，就可以一下子把所有矛盾都解决完。如果有这种办法，那么人們都可以睡大覚了。例如上海的人口問題，去年有一个时期，疏散了一部分，那时只剩下二十万人沒有就业。当时，人們估計解决这二十万人就业問題是不很困难的。可是問題并不那么簡單，上海不是一个孤立的城市，周圍农村的情况就对上海有影响，上海附近各省的农村，一是地少人多，一是經常受到自然灾害的襲击。小灾小害比較容易克服，大灾大害困难就更大了。遇到这种情况，农村人口就往上海挤。例如，最近上海人口又增加了五十万人。过去認为上海人口能够不超过四百五十万就好了，但是不行；后来希望不超过五百万或五百五十万，使市民生活方面的許多問題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然而客观的事实并不依照我們主观的願望行事，現在全市人口又差不多到达七百万了。上海的人口問題哪一天才可以解决呢？从几年来的經驗看来，短期內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須經过長期的工作，創造各种条件，才能比較完善地解决这个矛盾。

既然矛盾是解决了一批又来一批，豈不麻煩？采取消极态度，兩耳不聞窗外事，行不行呢？不行。因为那是自欺欺人，天下并不因此而太平。**我們認为，对待矛盾的态度必須是积極的。这就是：不怕暴露矛盾，而是充分地、不断地揭露矛盾，加以研究分析，找出产生矛盾的原因和解决矛盾的办法。任何矛盾本身都包含着解决这个矛盾的因素，好的主意是应当从研究矛盾的过程中得出来的。**比如，去年学校不够，大家叫喊孩子上不了学，这就發生了矛盾，我們实行了二部制，把这个矛盾解决了。可是又有了新的矛盾：有些孩子有半天的时間無人管教。为了解决这个新的矛盾，这就需要采取新的办法，需把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配合起来，需要提高教学質量，需要今年少收一些学生。

人們走路，总是不能一直不停地走着的，如果一口气走上十天十夜，脚步不停一下，命也要走掉的。飞机飞得很快，但不能一直不停地

飞，中途必須停下来加油，才能繼續飞向前去。所以前进和停止是相反相成的，前进需要暫时的停止，暫时的停止是为了更好地繼續前进。这样才能不断地前进和提高。这是事物發展的客观規律，不按照这个規律办事，是要碰釘子的。

要揭露矛盾，研究矛盾，單靠少数領导者是不行的。一个人只有兩个眼睛，兩个耳朵，看問題找矛盾总是不周全的，所以要充分揭露事物的矛盾，就必須大家动腦筋找問題想办法，大家动手起来干。想迴避矛盾，躲开問題，是行不通的。我們要像三国演义上的赵子龙那样"一身都是胆"，有充分的勇气去面对矛盾，揭露矛盾。

矛盾揭露以后，就要解决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要实事求是，采取协商和批評自我批評的方法。根据什么原則来行事呢？那就要根据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設，有利于对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斗爭的胜利，使部分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精神办事。还应該从团結的願望出發，經过批評或者斗爭，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团結。特别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为着前进，还要善于作必要的妥协、等待。根据这些原則和精神，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是可以获得解决的。

如果离开这些原則和精神，什么事都以"我"为中心，不从全局出發，固执己見，坚持个人的"利益"，反对集体的利益，其后果，原来非对抗性的矛盾，也可能逐步轉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原来是人民內部的問題，矛盾的一方也可能逐步轉化到敌人的一方去。

对待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是辯証唯物主义的灵魂和核心。今天的天下已經不是帝国主义和反动統治者的天下了，已經是人民的天下了，事物变化了，人們的思想感情也必須随着变化。今天的民主已經不是資产阶級少数人的民主了，而是絕大多数人的民主了。人民的民主，不是为别的，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着社会主义的建設，为着在斗爭中能够更有力地战胜敌人。事物变化了，人們对待民主問題就必須用新的观点来观察它。今天的領导已經不是压迫和剝削的同义語了，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同义語了，領导与被領导的关系

問題，也就是团結一致，互相監督，共同努力的問題了。

有一个同志說：某局長过去沒有当局長的时候同我很好，現在当了局長有了架子了。換了一个局長，他还是这样說，似乎誰当了局長誰就有架子了。这种观点和感情自然还是旧的，不是新的，是把自己放在人民政权之外的，而不是把自己放在人民政权之內的观点和感情。如果确有那么一个局長喜欢擺架子，自然他的观点和感情也不是新的而是旧的。大家都有当主人的感覚，有了主人翁的感情，才能徹底抛棄旧的資产阶級的或小資产阶級的感情。我們写小說和演戏似乎也有这个毛病，写反面人物往往写得很生动，写正面人物就写得比較枯燥無味。写文章，写反面文章，往往講得头头是道，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宣傳好的风尚似乎就無精打采了。究其原因，一是新的情况不熟悉，一是新的感情、人民的感情不丰富。情况变了，如果人們的感情不变，思想方法不变，我們看問題做工作就不能避免偏差。

概括起来，解决矛盾的办法有三条：一是不怕矛盾，二是揭露矛盾，三是在全国人民和整个国家的集体利益基础上来解决矛盾。我們要在不断地解决矛盾的斗爭中前进。我們相信：既然我們能夠解决那些根本性質的、对抗性的矛盾，胜利地进行了偉大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我們就一定能夠胜利地解决那些非对抗性的、人民內部的矛盾，把我們的工作做得一天比一天好。

（摘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六号第一一至一二頁）

工业也要“今年看明年”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論

六日本报社論“今年看明年”中說：“上步看下步，今年看明年”的領导方法，“在工业和基本建設方面以及其他各項建設事业同样是可以应用的”。今天本报發表的江西省积极为明年地方工业的發展作准备的新聞，証明了工业部門“今年看明年”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工业部門“今年看明年”，一方面是要总結已經过去將近半年的躍进經驗，并据以制定明年的計划，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利用还剩下的半年的时間，为明年的生产和建設做好物質准备。

过去的几个月，工业战綫的躍进真个一日千里，指标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突破，行情日新月異。一个月以前，誰能够設想，今后一年內可以建成年产二千万吨鉄的上万座小高爐呢?! 从各部門已有的材料看，今年我国工业的發展速度，將不仅远远超过今年年初拟訂的百分之十四点六，而且肯定可以超过我国历史上發展最快的年份(一九五三年，这一年的增長率为百分之三十一点七)。現在的問題是明年怎样？是不是仍然可以高速度地躍进？根据过去几个月的經驗，發展工业的潜力仍然是很大的。除了現有厂矿企业的潜力外，还必須估計到明年地方工业的發展大大超过今年。因为各地今年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农业的躍进上，人力、財力、物力主要是集中在农业战綫上，大办地方工业还是最近兩三个月的事情，而且有不少地方还沒有来得及規划和动手。可以預料，明年地方工业將以更为巨大的規模和更高的速度飞躍。如果看不到这点，如果不未雨綢繆，將来就要被动，就难以保証明年地方工业發展的需要，因此，从現在起，就必須“今年看明

年”，及早准备。

工业的各个部門都是互相关連，互为前提的。要生产多少鋼，先看能生产多少鉄，要生产多少机器，先看能生产多少原材料。这种“一步連一步，一环扣一环”的特点，要求工业部門必須运用“上步看下步，今年看明年”的領导方法。只有“上步看下步，今年看明年”，才能适应“一步連一步，一环扣一环”的工业生产和建設的特点，及早准备，来組織各方面的协作，保証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經济的不断發展。如果不是运用“今年看明年”的方法，如果运用“走着瞧”的方法，过了今年再談明年的事，就难免甚至將来会弄得手足無措。这种沒有預見的領导方法，不能促进局部适应整体發展的要求，不能促进工业适应国民經济發展的要求，这种方法是我們必須坚决摒棄的。

我們共产党人是不断革命論者。我們認为，不論在自然現象中或者在社会現象中，对立統一的規律、量变質变的規律、肯定否定的規律都是永远普遍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矛盾着的对立面的統一和斗爭推动着一切事物的發展。革命者必須掌握这个規律，不断地提出新的任务，不断革命，才能实現共产主义的偉大理想。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闡述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后来在著名的“中央委員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書”中，更明确指出：工人阶級的战斗口号应該是不断革命。当时，德国共产党人正同民主主义的小資产阶級政党一起反对大資产阶級、封建主义和專制制度的統治。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民主主义的小資产者的革命，只是“想使社会制度發生一种能把現存社会弄成对他們尽可能惬意和舒服些的改变”，“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务，却是要革命成为不停頓的”，“对于我們，問題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廢除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級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級，不在于改良現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我們党和毛澤东同志就是运用不断革命的理論来領导中国革命的。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圍夺取了政权之后，就开始了全国范圍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經济战綫（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又进行了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現在經济战綫上、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經取得基本胜利，又提出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口号。这种不断的革命，使我們从一个目标前进到另一个目标，使我們永远不致于松懈，不致于自滿，使我們永远不断地前进。

在各种实际工作中，同样必須运用不断革命的思想，才能注意去發現新的問題，提出新的任务，使我們的工作永远不陷于停頓。“今年看明年”，就是使我們要有預見，要預見到明年可能出現的情况，要力爭上游，及早提出新的任务，使我們能够在一个胜利以后更有把握地朝新的胜利前进。

明年工业能不能高速度地發展？这是向工业部門提出的一个新的問題，也是一个考驗。我們永远是促进派，应該有这样的气魄：要使明年工业同样高速度地發展，这就需要“今年看明年”，早动手，早准备。

也許有人說：“那今年的工作不是更紧張了嗎？”說“更紧張”，意思当然是“本来就够紧張的了”。确实，今年已經够紧張的了，但看来“更紧張”一些也还是可以的。江西省“今年看明年”，根据初步确定的明年的計划，重新安排了今年的工作，新增加了兩百多个小型厂矿的建設項目，不是也安排下去了嗎？可見，潜力总是挖不完的，問題是你看見看不見。

这几天，各地都在大張旗鼓地宣傳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举国上下，人心振奋。有的地方已經在根据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精神檢查工作，一个更高的躍进浪头开始卷了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在工业战綫上的同志們，应該运用“今年看明年”的方法，組織广大群众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根据今年上半年的經驗，訂出明年的躍进計划，并充分利用今年下半年的时間，力爭超額完成今年的躍进計划，并为明年更大的躍进作更多的准备。

第三部分

关於矛盾的特殊性

自然辯証法(摘錄)

恩格斯

〔物質的運動形態。科學分類〕

* * *

Causa finalis〔究极的原因〕——物質及其固有的运动。这种物質并不是抽象。甚至在太阳当中，个别的物質是分解了并且在它們的作用上沒有差别。但是在星云的气团中，一切物質虽然各自分开地存在着，却都融为純粹的物質本身，即仅仅作为物質而不按照自己的特殊属性来起作用。

（此外，甚至在黑格尔那里也把 causa efficiens〔作用的原因〕和 causa finalis〔究极的原因〕間的对立揚棄在相互作用的范疇中了。）

* * *

原始物質。"把物質当作本来就存在着的并且它自身是沒有形式的这个观点，是在很古时候就有了的，并且在希腊人那里，首先在渾沌的神話样式中，我們就看到过了，因为渾沌是当作存在着的世界的沒有形式的基础。"（黑格尔，"百科全書"，第一卷，第二五八頁。）我們又在拉卜拉斯那里看到这种渾沌；和它近似的是星云，这种星云也仅仅只有形式的开端。此后分化便發生了。

* * *

普通都把重量看作物質性的最一般的規定，这就是說，吸引是物質的必然的性質，而排斥却不是物質的必然的性質。但是吸引和排斥像正和負一样是不可分离的，因此我們根据辯証法本身就可以預言說：眞正的物質理論应当給予排斥以和吸引同样重要的地位；只以吸引为基础的物質理論是錯誤的、不充分的、片面的。事实上已有足够的現象来預先指出这一点。仅仅由于光的緣故，以太就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了。以太是否是物質的呢？如果它是存在的，那末它就应当是物質的，就应当归于物質的概念之下。但它是根本沒有重量的。彗星尾被認为是物質的。它們显示着很强的斥力。热在气体中产生斥力等等。

* * *

引力和重力。全部重力論是奠基在这个說法上：引力是物質的本質。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是有引力的地方，它都由斥力来作为补充。所以黑格尔說得很对：物質的本質是吸引和排斥㈠。事实上我們愈来愈不得不承認：物質的分散有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吸引轉变成排斥；相反地，互相排斥的物質的凝縮也有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排斥轉变成吸引㈡。

* * *

由吸引到排斥和由排斥到吸引的轉变，在黑格尔那里是神秘的，但是事实上他在这里却預言了最近的自然科学上的發現。甚至在气体中也有分子的排斥，而在更稀薄的分散的物質中，例如在彗星尾中則更其如此，在那里排斥是以非常巨大的力作用着。甚至在这里黑格尔也显示出他的天才，他把吸引看成是从作为第一位的因素的排斥中引导出来的第二位的因素：太阳系不过是由于吸引漸漸超过原来占統治地位的排斥而形成的。——由热产生的膨脹＝排斥。气体

㈠ 見"黑格尔全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一六八至一六九頁："吸引和排斥一样地是物質的本質属性。"

㈡ 还可以参看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四二頁上的論"內聚力"那一个札記。——本書編者注

运动說。

* * *

物質的可分割性。这个問題对于科学实际上是無关紧要的。我們知道：在化学中，可分割性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超出了这个界限物体便不能再在化学上起作用了——原子；几个原子总是結合在一起——分子。同样，在物理学中，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有某种——对物理学的考察来說——最小的粒子；它們的排列制約着物体的形态和内聚力，它們的振动表現为热等等。但是物理学上的分子和化学上的分子究竟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我們直到現在还不知道。——黑格尔很容易地就把这个可分割性問題对付过去了，因为他說：物質既是可分割的又是連續的，同时又兩者都不是㊀；这决不是什么答案，但現在差不多已被証明了（見稿紙第五張，第三面：克劳西斯）㊁。

* * *

可分割性。哺乳动物是不可分割的，爬行动物还能再生出一只脚来。——以太波可以分割和量度到無限小。——实际上，在一定的范圍內，例如在化学中，每一个物体都是可分割的。

* * *

"它（运动）的本質是空間和时間的直接的統一……空間和时間都屬于运动；速度，运动的量，就是和某一特定的流过的时間成比例的空間"（〔黑格尔〕，"自然哲学"，第六五頁）。"空間和时間是为物質所充滿的……正如沒有無物質的运动一样，也沒有無运动的物質"（第六七頁）。

* * *

㊀ 恩格斯似乎是指黑格尔在"大邏輯"第一編中的議論（見"黑格尔全集"，俄文本，第五卷，第二〇四至二一八頁）。

㊁ 括弧中的話是恩格斯已經写完札記第五張稿紙以后补上去的（論物質的可分割性的札記在第四張稿紙上）。稿紙張数号碼后的数字3表示頁数（一張有四頁）。恩格斯所指的論克劳西斯的札記（和气体运动說及关于以太的假說有联系）在下面論物理学的札記中（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四二至二四三頁——本書編者注）。

运动不灭已經包括于笛卡兒的这个命題中：宇宙永远保存着同量的运动。自然科学家以所謂"力的不灭"很不完全地把这个思想表达出来。笛卡兒單單用量去表現也是同样不完滿的：那作为物質的本質的表現、作为物質的存在形式的运动本身，和物質自身一样，是不灭的，这个說法包含着量的方面。这就是說，在这里自然科学家也是在兩百年之后才証实了哲学家的理論。

* * *

运动不灭。格罗沃書中很好的一段，第二〇頁及以下各頁㊀。

* * *

运动和平衡。平衡是和运动分不开的㊁。在天体的运动中存在着平衡中的运动和运动中的平衡(相对的)。但是任何特殊相对的运动，在这里即指在任何运动着的天体上的个别物体的任何个别运动，都是为了产生相对的靜止即平衡的一种努力。物体相对靜止的可能性，暫时平衡狀态的可能性，是物質分化的主要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主要条件。在太阳上絕沒有个别物質的任何平衡，而只有整个質量的平衡，或者，如果在那里也有个别物質的某种平衡，那就只是极微不足道的、由密度的显著差别所决定的平衡；在表面上是永远的运动、波动、分解。在月球上似乎是絕对的平衡占了統治地位，任何相对的运动都沒有了——死亡(月球等于否定性)。在地球上运动分化为运动和平衡的交替：个别运动趋向于平衡，而整个运动又再破坏个别的平衡。岩石虽已經处于靜止的狀态，但是风化、海浪、河流、冰川的作用却不断地破坏这个平衡。蒸發和雨、风、热、电和磁的現象也起了同样的作用。最后，在活的有机体中我們看到一切最小的部分

㊀ 恩格斯所指的是格罗沃的名著"物理力之間的相互关系"("The Correlation of physical Forces")。該書第一版出于一八四六年(在倫敦)，以后又再版了許多次。根据恩格斯所指出的頁数和他所引証的話来判断，恩格斯所用的是这本書的第三版(一八五五年出版于倫敦)。在这一版的第二〇至二九頁上，格罗沃說到了在机械运动变成"电压狀态"和热的时候的"力的不灭"。

㊁ 在这一行上面，在稿紙頂端用鉛笔写着："平衡＝吸引胜过排斥"。——俄文本編者注

和較大的器官的繼續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正常的生活时期是以整个有机体的經常的平衡为其結果，然而又經常地处在运动之中；我們在这里看到运动和平衡的活的統一。

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暫时的。

* * *

(一)天体的运动。运动中的吸引和排斥間的近似的平衡。

(二)个别天体上的运动。質量。因为这种运动是由純粹机械的原因所引起，所以这里也存在着平衡。質量靜止在自己的基础上。在月球上这种靜止显然是完全的。机械的吸引克服了机械的排斥。从純粹力学的观点看来，我們不知道排斥是怎么一回事，而且純粹力学也說明不了例如那些使地球上的質量向反重力的方向运动的"力"究竟从何而来。它認为这是当然的事实。所以，这里是把具有排斥作用的机械运动簡單地由質量傳遞給質量，而吸引和排斥則彼此相等。

(三)但是地球上的一切运动大多数是运动的一个形态到另一个形态——由机械运动到热、电和化学运动——和每一个形态到任何其他形态的轉变；所以或者是㊀吸引之轉化为排斥——机械运动之轉化为热、电、化学分解(这种轉化是原来的上升的机械运动之轉变为热，而不是下降的运动之轉变为热，后者只是外表而已)(，——或者是排斥之轉化为吸引)。

(四) 現在在地球上起作用的全部能量都是从太阳热轉化来的㊁。

* * *

机械运动。在自然科学家那里，运动总是被当作和机械运动，和

㊀ 这个"或者是"("entweder") 在后面并沒有第二个 "或者是" ("oder") 和它互相呼应。不过我們可以推測：恩格斯在这句話末尾也想指出排斥之反过来轉化为吸引，可是却沒有实現这个意圖。推測出来的最后半句話是括在方括弧里面的。

㊁ 概略地写在这个札記中的思想，恩格斯在"运动的基本形态" 一章中已把它加以發揮（見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四六至六一頁——本書編者注)。

位置变动相同的东西，而且这还被認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从化学还沒有产生出来前的十八世紀傳留下来的，并且大大妨碍了对各种过程的清楚的理解。应用到物質上的运动，就是一般的变化。从同一个誤解出發，就产生了想把一切都归結为机械运动的狂热，——甚至格罗沃也“强烈地傾向于認为物質的其他各种狀态是运动的变形而最終会归結为这些变形”（第一六頁）㊀，这样就抹煞了其他运动形态的特殊性。这决不是說：每一个高級的运动形态不是經常必須和現实的机械的（外部的或分子的）运动相联系，正如高級的运动形态同时还产生其他的运动形态；化学作用沒有溫度变化和电的变化是不可能的，有机的生命沒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等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副次形态的存在并不能把所考察的每一个情况下的主要形态的本質包括無遺。終有一天我們一定可以用实驗的方法把思惟“归結”为腦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就把思惟的本質包括無遺了嗎？

---

* * *

自然科学的辯証法：它的对象是运动着的实物。实物本身的各种形态和种类又只有通过运动才能認識，物体的屬性只有在运动中才能显示出来；关于不运动的物体，是沒有什么可說的。因此，运动着的物体的性質是从运动的形态而来的。

（一）第一个最簡單的运动形态是机械的运动形态，是純粹的位置变动。

（甲）單个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只有在相对的意义下〔才可以談运动〕㊁——下落。

㊀ 恩格斯所引証的是一八四六年初版發行的格罗沃所著“物理力之間的相互关系”一書，他引証时所根据的版本極可能是第三版（一八五五年出版于倫敦）。格罗沃所謂的“物質的各种性質（affections）”是指“热、光、电、磁、化学亲和力和化学运动”（第一五頁），而“运动（motion）”則是指机械运动或位置变动。

㊁ 方括弧中的話是根据恩格斯于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日致馬克思的信补上的。

（乙）分离的諸物体的运动，弹道，天文学，——外表上的平衡，——最后总是接触。

（丙）互相接触的諸物体的相对运动——压力。静力学。流体静力学和气体。杠杆及本来意义下的力学的其他形态——这一切是在接触的最簡單的形态中从仅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摩擦和碰撞产生出来的。但是摩擦和碰撞，即实質上的接触，还具有从来未被自然科学家在这里指出过的其他結果：它們在一定的情况下产生声、热、光、电、磁。

（二）这些不同的力（除了声）——天体的物理学——

（甲）它們互相轉变和互相代替，以及

（乙）这些作用于諸物体（它們就化学上来說或者是化合物，或者是簡單的东西）而且就每一个物体說来都各不相同的每个力在量上增長到一定程度时，化学变化就發生出来，而我們就进入化学領域。天体的化学。化学的結晶学部分。

（三）物理学应該或者能够不考察有机的物体；而化学却只在研究有机化合物时才找到关于最重要物体的眞正性質的眞实說明，并且另一方面它把只在有机界中才出現的物体合成起来。在这里化学进入到有机生命的領域，并且它已經足够使我們确信：它單独就可以向我們說明那种到有机体的辯証的轉化。

（四）然而現实的轉变是在历史中——太阳系的历史，地球的历史，有机界的現实前提。

（五）有机界。

* * *

科学的分类。每一种科学都是分析單个的运动形态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轉变的运动形态的，同时科学的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态本身之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

在上世紀（十八世紀）末叶，在机械唯物論者占多数的法国唯物

論者之后，出現了要把旧的牛頓—林耐学派的整个自然科学作一个百科全書式的概述的要求，有兩个最偉大的天才負起了这个任务，这就是聖西門(未完成)和黑格尔。現在，当新的自然观在其基本特点上已經完成了的时候，同样的要求就發生了，并且也有一些人在这个方向上努力。但是，当現在自然界中普遍的發展联系已經弄清楚的时候，像那种仅仅把材料一件跟一件地加在一起的材料在外表上的聚集，正如黑格尔人为地完成的辯証的轉化一样，是不够了。轉化必須由自己来完成，必須是自然的轉化。正如一个运动形态是从另一个运动形态中發展出来一样，这些形态的反映，即各种不同的科学，必然一定是一个从另一个發展出来。

* * *

孔德从聖西門那里抄襲了自己的自然科学的百科全書式的整理方法，他并不是这个整理方法的創造者；这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个整理方法在他那里只是为了安排教材和为了教学，因而就形成了那一套愚蠢的 enseignement intégral〔全科教育〕，在那里不到每一門科学完全教完之后，不教别种科学，于是把一个基本上正确的观念数学地夸大成胡說八道。

* * *

黑格尔之划分(最初的划分)为机械論、化学論、有机論㊀，在当时是很完备的。机械論——質量运动；化学論——分子运动(因为这里也包括物理学，而且兩者——物理学和化学——都屬于同一系統)和原子运动；有机論——彼此不能分离的物体的运动。因为有机体当然是把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結合为一个整体的高度的統一，因而这种三位一体是不能再分割的。在有机体中，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可以直接引起机械运动，这和营养、呼吸、排泄等等有关，就像和純粹的肌肉运动有关一样。

㊀ 恩格斯所指的是于一八一六年初版印行的黑格尔所著"大邏輯"第三編。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以"力学"、"物理学"和"有机学"三个术語来表示自然科学的这三个主要部分。

每一組又可分为兩門。力学：(一)天体力学，(二)地球力学。

分子运动：(一)物理学，(二)化学。

有机体：(一)植物，(二)动物。

* * *

地文学㊀。在从化学到生命的轉化完成之后，首先应当考察生命賴以产生和存在的那些条件，因而首先是考察地質学、气象学等等。然后才是生命的各种形态本身，如果不这样，这些生命形态是不可理解的。

……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二月單行本第二〇三至二一〇頁。"附注"根据本書需要作了删节）

㊀ "physiographie"("地文学")这个詞的意思是"自然界的描述"。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
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眞理必須同
民族的、地方的特殊情况相結合

……各地的經驗証明，要使工人从这些旧政党的統治中解脫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各国建立無产阶級的政党，由它来执行显然同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的独立的政策，因为这个政党必須說明解放工人阶級的条件。这个政策的細节可以根据各国的特殊情况加以改变；但是既然劳資之間的基本关系各地都一样，有产阶級对被剝削阶級的政治統治这一事实各地也都存在，無产阶級政策的原則和目的在各地，至少在西方一切国家中也就都应該一样。……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的信"（一八七一年二月十三日），"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三七頁

在这里（指美国——編者），我們看到，即使你有这个民族自己的生活条件所产生的最好的理論，即使有比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好的教师，用学究式的和教条式的方法把某种东西塞給一个大民族，是不那么容易的。……

和其他人一样，他們应該从自己的切身經驗中以及自己的錯誤的后果中来学习。

恩格斯："致左尔格的信"（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七日），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俄文版第四一五頁

李卜克內西和我开了一个很不錯的玩笑。他从我給馬克思那几篇关于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的法蘭西的論文写的"引言"中，引証

了凡是能为他的無論如何是和平的而非暴力的策略辯护的东西。最近，他乐于宣傳这个策略，特别是現在，当柏林正在准备特别法的时候。但是我推荐这个策略仅仅是为了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很多附帶条件。至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根本不能奉行这个策略。就是对于德国，明天这个策略也可能成为不能接受的了。

恩格斯："致拉法格的信"(一八九五年四月三日)，"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版第二〇〇頁

……我們并不把馬克思底理論視为一成不变和神聖不可侵犯的东西；恰巧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为一个科学奠定了基础，而社会主义者若不願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我們認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特别必須独立闡發馬克思底理論，因为它仅仅提供出一般的指导的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局部說來，在英国是与法国不同，在法国是与德国不同，在德国是与俄国不同的。……

列　宁："我們的綱領"(一八九九年)，"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一〇五頁

……我国馬克思主义者忘記了西欧工人阶級是在已經清除干净的政治活动場所中活动的事实，因此也就过分藐視了其他一切非工人社会阶層所进行的急进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反政府的活动。只要有人稍微企圖注意自由主义政治性的社会表現，那末正統馬克思主义者就会表示反对，因为他們忘記了有許多历史条件使我們不能成为西欧式的馬克思主义者，而要求我們拿出另一种馬克思主义，即在俄国条件下适宜并且必要的馬克思主义。……

列　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底抗議書"(一八九九年八月至九月)，"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九六頁

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根本上就是国际的。这不仅是說我們应当反对本国沙文主义，而且是說在年輕国家内剛剛开始的运动，只有在

它运用别国經驗的条件下，才能順利發展。但是，为要眞正运用别国經驗，單單認識这种經驗或單單抄襲别国最近的决議，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須善于用批評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經驗，独立地檢查它。誰只要想一想現代工人运动已發展和散播到了如何广大的地步，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該要有多少丰富的理論力量和政治經驗（以及革命經驗）。

列　宁："做什么？"（一九〇一年秋至一九〇二年二月），"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一九七頁

俄国馬克思主义者既然沒有現成的經驗，既然認为不能去臆造資产阶級运动，自然也就不能在革命开始以前提出正确的土地綱領。可是他們却又犯过一种錯誤，就是他們在革命开始以后沒有把馬克思理論实际运用到俄国特殊条件上去（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条——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常教导我們說，——而是行动底指南），却毫無批評精神地背誦着人家把馬克思理論应用到别国条件，应用到另一时代所得出来的結論。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九〇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二五三頁

如果我們簡單地按照死板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法令，如果烏克蘭和頓河区的布尔什維克党員、苏維埃工作人員不加分析地籠統地把这些法令推行到其他地区去，那就錯了。我們一定会遇到不少的特殊情况，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束縛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能一成不变地認为我們的經驗，俄国中部的經驗，可以完全搬到一切边区。

列　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員会的总結报告"（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三三頁

你們(指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組織的代表——編者)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沒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須根据欧洲各国所沒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論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須看到农民是主要的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資本而是中世紀残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論和共产主义措施。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你們無論在哪一部共产主义書本里都找不到，但是在俄国所开始的共同斗爭中能够找到。你們应当提出这个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經驗来解决这个任务。

列　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組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三八至一三九頁

現在全部問題就是要使各国共产党人十分自覚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傾"教条主义进行斗爭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爭由于各国經济、政治、文化、民族成分(例如愛尔蘭等)、所屬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别种种特征而具有而且必然具有的一些具体特点。現在到处都可以感覚到，对于第二国际的不滿正在蔓延和滋長，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机会主义，一方面是由于它不会或者不能建立一个眞正集中的、眞正能起領导作用的中心，一个能在革命無产阶級为建立全世界苏維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爭中掌握無产阶級的国际策略的中心。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这样的中央領导机关無論如何都不能建立在使斗爭策略規律千篇一律、死板划定、彼此雷同的基础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間、各个国家之間的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在全世界無产阶級專政实現以后，也还要保留一个很長很長的时期)，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統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取消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則(苏維埃政权和無产阶級專政)运用到各民族、各民族国家的不同情况时，在細节上把这些原則正確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

应用于这种情况。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徑解决統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与左傾教条主义，推翻資产阶級，建立苏維埃共和国和無产阶級專政的时候，都必須考察、研究、探索、揣測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性，这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〇年四月至六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七三至七四頁

無論高加索各民族中工人与农民間的民族和平如何重要，但重要得更加無比的，是保持和發展这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苏維埃政权。任务虽很困难，却完全是能执行的。为要順利地解决这一任务，最重要的是要使南高加索的共产党員懂得他們的那种特殊情形，他們的共和国与苏俄共和国情形和条件有所不同的那种特殊情形；要懂得决不可机械地抄襲我們的策略，而要深思熟慮变更这一策略底形式，以求適合于特殊的具体条件。

列　宁："致阿捷尔拜疆、格魯吉亞、阿尔明尼亞、达格斯坦、哥里共和国共产党員同志們的信"（一九二一年四月），"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八四二頁

尽管我們党在思想上有了提高，可惜我們党內还存在着某种"領导者"，他們眞誠地相信：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公認的一般原理，不用顧到中国經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文化、中国习俗和傳統的民族特点，所謂用电报就能領导中国革命。实在說来，这些"領导者"不同于眞正領导者的地方，就在于他們衣袋里总藏着兩三个現成的、对一切国家都"适用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需的"公式。顧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和民族独有的东西的問題，对他們来說是不存在的。把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和每个国家革命运动的民族特点結合起来的問題，使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适应于各个国家的民族—国家的特点的問題，对他們来說是不存在的。

他們不懂得，現在，当各国共产党已經成長起来并成为群众性的政党的时候，領导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發現和掌握每个国家的运动的民族特点，并善于把这些特点和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結合起来，使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的易于实現并得以实現。

由此他們便企圖把对一切国家的領导千篇一律化。由此他們便企圖机械地搬用若干一般公式，而不顧到个别国家的运动的具体条件。由此便产生了公式和个别国家革命运动之間的永远的冲突，这种冲突是这些可憐的領导者領导的基本結果。

我們的反对派正是这类可憐的領导者。

斯大林："时事問題簡評"(一九二七年七月)，"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九至三〇〇頁

(参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七月出版的"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反对教条主义"第三四至三九頁)

論列宁主义基础(摘錄)

(在斯維尔德洛夫大学的講演)

斯 大 林

一 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即在資本主义的矛盾已經达到极点、無产阶級革命已經成为直接实踐的問題、准备工人阶級去进行革命的旧时期已經达到尽头而轉变为直接冲击資本主义的新时期的条件下成長和形成的。

列宁把帝国主义叫做"垂死的資本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使資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頂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在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三个。

第一个矛盾是劳动和資本之間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工业国里壟断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銀行和財政寡头拥有莫大的势力。和这种莫大的势力作斗爭，工人阶級通常采用的手段，如工会和合作社、議会政党和議会斗爭等等已經完全不够了。或者向資本屈服，依旧过着每况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拿起新的武器，——这就是帝国主义在千百万無产阶級群众面前提出的問題。帝国主义把工人阶級引向革命。

第二个矛盾是各財政集团之間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間为爭夺原料产地、爭夺别国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向原料产地輸出資本，就是为独占这些原料产地而进行瘋狂的斗爭，就是为重分已經被瓜分完的世界而进行斗爭，就是寻找"阳光下的地盤"的新起財

政集团和列强对死抓住既得贓物不放的老旧财政集团和列强进行特别猛烈的斗爭。各資本家集团之間的这种瘋狂斗爭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因素，即帝国主义战爭，为夺取别国領土而进行的战爭。而这个情况的特点又在于它使帝国主义者彼此削弱，使整个資本主义陣地削弱，使無产阶級革命的时机加速到来，使無产阶級革命必然实現。

第三个矛盾是为数极少的占統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屬国人民之間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国內十多亿居民施行最無耻的剝削和最殘忍的压迫。榨取超額利潤就是这种剝削和压迫的目的。可是，帝国主义在剝削这些国家时不得不在那里敷設鉄路，設立工厂，建立工商业中心。無产者阶級的出現，本地知識分子的产生，民族意識的覚醒，解放运动的加强，就是这个"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所有一切殖民地和附屬国內革命运动的加强都明显地証明了这一点。这个情况对于無产阶級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根本破坏資本主义的陣地，把殖民地和附屬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軍变为無产阶級革命的后备軍。

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使旧的"繁荣的"資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資本主义的那些矛盾，大体上就是这样。

十年前爆發的帝国主义战爭的意义，也就在于它把所有这些矛盾集合在一起投入天平盤里，因而加速和便利了無产阶級的革命战斗。

換句話說，帝国主义不仅使革命成了必不可免的实踐問題，而且造成了直接冲击資本主义堡壘的有利条件。

这就是产生列宁主义的国际环境。

有人会向我們說：这一切都不錯，但是这和当时并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俄国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和首先是在俄国而且为俄国工作的列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正好是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成了無产阶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的誕生地呢？

因为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合点。

因为俄国当时孕育着革命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所以只有俄国才能用革命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

首先，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現出来的各种压迫——資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軍事压迫的策源地。誰不知道，在俄国，資本的万能和沙皇制度的暴虐是融合起来了呢？誰不知道，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屠杀政策是融合起来了呢？誰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剝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領土的战爭是融合起来了呢？列宁說得对：沙皇制度是"軍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

其次，沙皇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最大的后备軍，这不仅是說它任憑外国資本自由进口活动，讓外国資本操縱俄国国民經济中像燃料和冶金业这样一些有决定意义的部門，而且是說它能拿出千百万士兵去供西方帝国主义者使用。請回想一下一千四百万俄国軍队为了保証英法資本家极高的利潤而在帝国主义战綫上流血牺牲的事实吧。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仅是帝国主义在东欧的看門狗，而且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它从巴黎和倫敦、柏林和布魯塞尔得到借款，而从人民身上榨取几亿盧布来繳付利息。

最后，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国主义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等等勾当中的最忠实的同盟者。誰不知道，帝国主义大战是沙皇政府和协約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进行的呢？誰不知道，俄国是这次战爭的重要角色呢？

正因为如此，沙皇制度的利益就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交織在一起，終于融合为統一的帝国主义的利益。

西方帝国主义会不会不竭尽全力拚命反对俄国革命以維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甘心丧失像旧时沙皇資产阶級俄国这样一个东方强大的支柱，这样一个富有人力物力的来源呢？当然不会！

由此应該得出結論：誰想打击沙皇制度，誰也就必然要动手打击帝国主义；誰起义反对沙皇制度，誰也就必須起义反对帝国主义。因为誰要是眞想不仅打破沙皇制度，而且徹底鏟除沙皇制度，那末他推翻沙皇制度也就必須推翻帝国主义。这样，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和無产阶級革命接近起来，并且一定要轉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轉变为無产阶級革命。

而且当时在俄国又掀起了最偉大的人民革命，領导这个革命的是世界上最革命的無产阶級，这个無产阶級又拥有俄国的革命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这样的革命决不会半途而廢，它一胜利就一定要举起反帝国主义的起义旗帜，繼續前进，这难道还要証明嗎？

正因为如此，俄国当时一定要成为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这不仅因为这些矛盾正是在俄国帶有特别丑惡和特别不堪的性質而最容易暴露出来，也不仅因为俄国当时是把西方財政資本和东方殖民地联結起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支柱，而且因为当时仅仅在俄国才有能够用革命方法来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現实力量。

由此应該得出結論：俄国革命不能不成为無产阶級革命，它不能不在一开始發展时就具有国际性質，因而也就不能不震撼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

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俄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狹隘民族范圍內呢？当然不能！恰恰相反，当时整个环境，無論是国內环境（深刻的革命危机）或国外环境（战爭），都推动他們把自己的工作超出这个范圍，把斗爭搬到国际舞台上去，割开帝国主义的膿瘡，証明資本主义必然破产，粉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并推翻本国資本主义，替無产阶級鍛煉出新的斗爭武器，即無产阶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以促进世界各国無产者推翻資本主义的事业。俄国共产党人不能不这样行动，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可以指望国际环境發生某种变化，使俄国能够避免資产阶級制度的复辟。

正因为如此，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俄国共产党人的領袖

列宁成了列宁主义的創造者。

俄国和列宁的"遭遇"差不多同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国和馬克思恩格斯的"遭遇"一样。德国当时孕育着資产阶級革命，正像俄国在二十世紀初期一样。当时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写道：

"共产党人現在的視綫主要是集注于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資产阶級革命的前夜，因为德国將在一般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十七世紀英国和十八世紀法国更發展得多的無产阶級去实現这个革命。因此，德国資产阶級革命一定要成为無产阶級革命的直接序幕。"㊀

換句話說，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移到德国了。

几乎用不着怀疑，馬克思在上述这段話中所指出的情况，大概正是德国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誕生地、德国無产阶級的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創造者的原因。

关于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国也必須这样說，而且更必須这样說。这个时期的俄国正处在資产阶級革命的前夜，它应当在欧洲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德国(英法更不用說)更發展的無产阶級去实現这个革命；并且一切事实都表明这个革命一定会成为無产阶級革命的酵母和序幕。

不能認为下面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就是早在一九〇二年，当俄国革命剛剛萌芽的时候，列宁就在他的"做什么？"一書中写了以下的預言：

"历史向我們(即俄国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注)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国無产阶級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

"实現这个任务，即摧毀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們現在可以說）亞洲的反动勢力的最强大的堡壘，就会使俄国無产阶級成为国际革命無产阶級的先鋒队。"（見"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四

㊀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四一頁。

五頁）

換句話說，革命运动的中心一定要移到俄国来。

大家知道，俄国革命的进程足以証实列宁的这个預言而綽綽有余。

既然如此，那末进行过这样的革命和具有这样的無产阶級的国家成了無产阶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的誕生地，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俄国無产阶級的領袖列宁同时也成了这个理論和策略的創造者以及国际無产阶級的領袖，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九二四年四月至五月發表。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六四至七〇頁）

答阿·霍洛波夫同志

斯 大 林

你的信收到了。

由于工作很忙，答复稍为迟了些。

你的信無形中是从兩个假定出發：第一个假定是認为可以脫离引文中所講到的历史时期而引証某一作者底著作，第二个假定是認为从研究一个历史發展时期而得出的某些馬克思主义結論和公式，对于一切历史發展时期都是正确的，因而应当是永远不变的。

应当說这兩个假定都是大錯特錯。

举几个例子来說。

(一)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壟断資本主义还不存在，資本主义沿着上升的路綫相当平稳地發展着，向还未被它占領的新的地域扩張，而資本主义發展不平衡的規律还不能充分有力地起作用，——那时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結論：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單独某一国家內胜利，它只有由于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实行了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这个結論后来便成了一切馬克思主义者底指导原理。

可是在二十世紀初，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誰都明白，壟断以前的資本主义显然已变为了壟断的資本主义，上升的資本主义已变成了垂死的資本主义，战爭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陣綫不可救藥的弱点，而資本主义發展不平衡的規律預先决定了各国無产阶級革命成熟时期的不同，——那时候列宁从馬克思主义理論出發，得出了結論：在新的發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單独一个国家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內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中革命底成熟是不平衡的；馬克思和恩格斯

底旧公式已經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

由此可見，关于社会主义胜利問題，我們在这里有着兩个不同的結論，它們不仅互相矛盾，而且还互相排斥。

某些書呆子和死啃書本的人不探究事情底本質，脫离历史条件而作表面上的引証，他們可以說：这些結論中有一个是絕对不正确的，应当加以抛棄，而另一个結論是絕对正确的，应当推广到一切發展时期。但是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書呆子和死啃書本的人是錯誤的，他們不能不知道这兩个結論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絕对地正确的，而是每一个結論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結論对于在壟断以前的資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而列宁底結論則对于壟断的資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

（二）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中說道：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家应当衰亡。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們党內的一些書呆子和死啃書本的人便根据这点开始要求党采取办法使我們的国家尽快地衰亡，把国家机关解散，把常备軍取消。

但是苏联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当代世界形势的研究，得出了結論：在資本主义包圍之下，社会主义革命底胜利只發生在一个国家內，而所有其他国家則为資本主义所統治，这时候革命胜利了的国家不应当削弱自己的国家、国家机关、偵察机关、軍队，而应当用一切办法加强它們，如果这个国家不願意被資本主义的包圍所击潰的話。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結論：恩格斯底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內获得了胜利而言，它对于下列場合却是不适用的，即社会主义在單独一个国家內胜利，而其他一切国家則为資本主义所統治。

由此可見，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問題，我們在这里有着兩个不同的公式，它們是互相排斥的。

書呆子和死啃書本的人可以說：这个情形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狀况，必須把公式中的一个看作絕对錯誤的而加以抛棄，把另外的一个看作絕对正确的而推广到社会主义国家發展底一切时期。但是馬克

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書呆子和死啃書本的人是錯誤的，因为这兩个公式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絕对地正确的，而是每一个公式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苏联馬克思主义者底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內胜利的时期是正确的，恩格斯底公式則对于下列的时期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內陆續的胜利引导到社会主义在大多数国家內的胜利，这样一来，实行恩格斯公式的必要条件才会造成。

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

对于霍洛波夫同志在其信中引証斯大林各种著作的关于語言問題的兩个不同的公式，也必須这样說。

霍洛波夫同志引証斯大林"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这一著作，其中作出了这个結論：比方說，由于兩种語言融合的結果，其中的一种語言通常成为胜利者，而另一种則陷于衰亡；可見兩种語言底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語言，而是其中的一种保存下来。其次，他又引証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另一个結論，这个結論說：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圍內胜利的时期，当社会主义巩固起来并实現于日常生活之中，各个民族語言就必不可免地会溶合为一个共同的語言，这个語言当然不会是大俄罗斯語言，也不会是德国語言，而是某种新的語言。霍洛波夫同志把这兩个公式对照了一下，發現它們不仅不互相一致，而且是互相排斥的，于是失望起来。"从你的文章里——他在信中写道，——我理解了語言底融合永远不会产生某种新的語言，可是在这篇文章發表以前，根据你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發言，我曾坚决地深信：在共产主义时期，各种語言会溶合为一个共同的語言。"

显而易見，霍洛波夫同志發現了这兩个公式之間的矛盾并且深信应当消灭矛盾，于是認为必須丢掉公式中的不正确的一个，而抓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都正确的另一个，但是必須抓住哪一个呢，——他就不知道了。眞好像是陷入了走头無路的狀态。霍洛波夫也沒有想到：兩个公式都可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書呆子和死啃書本的人常常就是这样，他們不探究事情底本質，

不管引文中所講到的历史条件而只作表面上的引証，結果必然陷入走头無路的狀态。

然而，如果分析一下問題底本質，就沒有任何根据感到走头無路了。問題是在于：斯大林底"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这一小册子和斯大林在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發言所指的是兩个完全不相同的时代，因此所得出的公式也不相同。

斯大林在其小册子中的論及語言融合問題的那个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圍內胜利以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剝削阶級是世界上統治的力量，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仍然很厉害，民族的孤立和互不信任被国家的区别所巩固着，民族底平等还不存在，語言底融合是在爭取一种語言底統治地位的斗爭中进行着；各个民族和各个語言底和平与友誼的合作条件还未具备，摆在日程上面的問題不是各种語言底合作和互相丰富，而是一些語言底被同化和另一些語言底胜利。不用說，在这样的条件下有的只能是战胜了的語言和被战胜了的語言。斯大林底公式所指的正是这些条件，因为这个公式講道：比方說，兩种語言底融合，結果不是新語言底形成，而是其中一种語言底胜利和另一种語言底失敗。

至于說到斯大林在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發言中論及各种語言溶合为一种共同語言时的另一个公式，那末这里所指的是另外的一个时代，即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圍內胜利以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世界帝国主义將不复存在，剝削阶級將被推翻，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將被消灭，民族的孤立和互不信任將被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权利底平等將被实現，压制和同化語言的政策將被取消，各民族間的合作將被建立，而各民族底語言將有在合作方式下互相丰富起来的可能。不用說，在这些条件下根本就談不到一些語言底被压制和失敗与另一些語言底胜利。在这里我們將遇到的不是兩种語言——其中一种遭受失敗而另一种成为斗爭中的胜利者，而是好几百种民族語言——这些語言由于各个民族在經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長期合作便首先分出最丰富的單一的区域性的語言，然后区域

性的語言才溶合为一个共同的国际語言，这种語言当然既不会是德語，也不会是俄語，更不会是英語，而是吸取了各民族語言和各区域語言底精华的新語言。

因此，兩个不同的公式适应于兩个不同的社会發展时代，而且正因为它們是与之适应的，所以这兩个公式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要求这兩个公式不互相矛盾，要求它們不互相排斥，——这是何等地荒唐，就像要求資本主义統治时代不与社会主义統治时代相矛盾，要求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不互相排斥一样。

書呆子和死啃書本的人把馬克思主义、馬克思主义个别結論和公式看作教条底彙集，而这些教条是"永远"不变的，虽然社会發展底条件已經改变了。他們認为：如果他們把这些結論和公式都背熟了，并把它們胡乱地引証一番，那末他們就能够解决任何問題，因为他們指望背熟了的結論和公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对于一切生活情形都是适用的。但是有这样想法的只能是那些看到馬克思主义底字母而不看到它的实質、背熟馬克思主义底結論和公式但不懂得它們的內容的人們。

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底發展規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剝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設的科学。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滯不前的，——它是在發展着和改进着。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發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經驗、新的知識而丰富起来，——因而它的个别公式和結論不能不随着时間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的公式和結論所代替。馬克思主义不承認絕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結論和公式。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底敌人。

約·斯大林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四七至五五頁）

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

(閱讀第一、二、三部分)

(見本書第一三九一至一四〇八頁)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宣言

（閱讀第四部分）

（見本書第七四至七七頁）

中国的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毛 泽 东

一 國內的政治狀況

現在国民党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級和乡村豪紳阶級的統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內以新軍閥代替旧軍閥，对工农阶級的經济的剝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發的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紳阶級篡夺了領导权，立即轉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資产阶級㈠，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济上的解放。

国民党新軍閥蔣桂馮閻四派㈡，在北京天津沒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張作霖㈢的臨时的团結。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結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內部激烈斗爭的局面，蔣桂兩派且在醞釀战爭中。中国

---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湘鄂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議的一部分，原題为“政治問題和边界党的任务”。

㈠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的是民族資产阶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的“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于买办大資产阶級与民族資产阶級的区别，曾作了詳細的說明。

㈡ 蔣派指蔣介石派。桂派指广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派。馮派指馮玉祥派。閻派指山西軍閥閻錫山派。他們曾联合对張作霖作战，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占領了北京和天津。

㈢ 張作霖是奉系軍閥首領。一九二四年吳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爭中被打敗后，張作霖成为北方最有勢力的一个軍閥。一九二六年他联合吳佩孚入据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从北京退回东北，在路上被向来利用他做工具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炸死。

内部各派軍閥的矛盾和斗爭，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爭。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狀况存在，各派軍閥就無論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暫时的。今天的暫时的妥协，即醞釀着明天的更大的战爭。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資产阶級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須由無产阶級領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發向長江發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無产阶級沒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領导权，被买办豪紳阶級夺取了領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暫时的失敗。中国無产阶級和农民在此次失敗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資产阶級（非买办豪紳阶級）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級在共产党領导之下的有組織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發展起来。軍閥軍队中的士兵因飢寒而醞釀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資产阶級在汪精衛、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發展着頗大的改良主义运动㊀。这种运动的發展是新的事实。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內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国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紳阶級对农民的封建的剝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㊁以后，是一天一天在發展的。

二　中國紅色政權㊂發生和存在的原因

一国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权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权的区域長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沒有的事。这种奇事的

㊀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寇占領济南及蔣介石公开無恥地对日妥协之后，曾經追隨过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变的民族資产阶級，有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蔣介石政权的在野反对派。当时汪精衛陈公博等这个投机的反革命政派，曾在这个运动中进行活动，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所謂"改組派"。

㊁ 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張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發展，出兵侵占山东省会济南，截断津浦鉄路。五月三日，日本侵略軍在济南屠杀很多的中国人。这个屠杀称为"济南惨案"。

發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統治的殖民地㊂，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間接統治的經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現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間的战爭。帝国主义和国內买办豪紳阶級支持着的各派新旧軍閥，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間进行着繼續不断的战爭，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沒有一国有这种現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也沒有一处有这种現象，仅仅

㊀ 中国紅色政权的組織形式近似于苏維埃政权。苏維埃即代表会議，为俄国工人阶級于一九〇五年革命时創造的一种政治制度。列宁斯大林从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出發而得出結論，認为苏維埃的共和国是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当的社会政治組織形式。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列宁斯大林的布尔塞維克党的領导之下，第一次在世界上实現了这种無产阶級專政的社会主义的苏維埃共和国。在中国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敗之后，中国共产党以毛澤东同志为首所領导的各地民众革命起义，即以代表会議为民众政权的形式。但在中国这个革命阶段，这种政权的性質，是無产阶級領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專政，这是和苏联的無产阶級專政的政权性質有区别的。

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原来屬于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統治下的东方許多殖民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占領，那里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資产阶級群众及民族資产阶級分子在共产党領导下，利用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組織了反法西斯侵略的广泛統一战綫，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爭，已开始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治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日本帝国主义被逐出，美、英、法、荷各帝国主义企圖繼續原来的殖民地統治，但各殖民地人民已在抗日战爭中鍛煉出了一种相当有力的武装力量，他們不願意照旧生活下去；而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除美国以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战爭中或被推翻或被削弱，更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陣綫在中国被突破，因而使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已在世界上發生很大的动摇。这样，就使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国差不多一样地有可能長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長期坚持由乡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战爭，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該殖民地全国范圍內的胜利。根据这种新的情况，毛澤东同志于一九二八年对于在帝国主义直接統治的殖民地条件下这一个問題上所作的观察，已有了改变。

帝国主义間接統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現象。这种現象产生的原因有兩种，即地方的农业經济(不是統一的資本主义經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战爭，便給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产党領导的紅色区域，能够在四圍白色政权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坚持下来。湘贛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許多小塊中間的一小塊。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紅色政权的存在，而發生悲观的情緒。这是沒有找出这种紅色政权所以發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釋的緣故。我們只須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爭是繼續不断的，則紅色政权的發生、存在并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第二，中国紅色政权首先發生和能够長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經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貴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兩年資产阶級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經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許多地方，曾經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組織，有过工农阶級对地主豪紳阶級和資产阶級的許多經济的政治的斗爭。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陸丰、湘东、湘南、湘贛边界、湖北的黃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㊀。至于此刻的紅軍，也是由經过民主的政治訓練和接

㊀ 这是指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变革命后，各地人民在共产党領导下最初爆發起来的对反革命势力的反击行动。在广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工人和革命士兵联合起义，建立了人民的政权，曾和那在帝国主义直接援助下的反革命軍队进行激烈的战斗，但因力量相差很大，这个人民的起义是失敗了。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海丰、陸丰等地的农民，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在共产党員彭湃同志的領导下，已經形成了强大的运动，对于广州国民革命軍兩次东征反革命滅陈炯明的胜利，給了很大的帮助。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反革命后，該地农民于四月、九月、十月，先后举行三次起义，在海丰、陸丰一帶建立过革命政权，一直坚持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在湖南省东部，一九二七年九月，起义的农民曾經占据过瀏阳、平江、醴陵、株州一帶。与此同时，在湖北省东北部的孝感、麻城、黃安等地，曾有数万农民的武装起义，占領黃安县城三十余日。在湖南南部，一九二八年一月，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資兴等县的起义农民，建立过革命政权达三月之久。

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軍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經过民主的政治訓練，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軍队，例如閻錫山、張作霖的軍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紅軍的成份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長期地存在，則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發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紅色区域的長期存在，不但沒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許多力量中間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繼續地向前發展，而有一个比較長期的停頓，則小塊紅色区域的長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現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紳阶級和国际資产阶級的繼續的分裂和战爭，而繼續地向前發展的。所以，不但小塊紅色区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义，而且这些紅色区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質的赤衛队㊀而沒有正式的紅軍，則只能对付挨戶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軍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沒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裝，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長期的和日益發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裝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須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紅色政权的長期的存在并且發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須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

三　湘贛邊界的割據和八月的失敗

軍閥間的分裂和战爭，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統治勢力。因此，小地方紅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軍閥之間的战爭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間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暫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統治阶級或几省的統治阶級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紅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紅色政权所必須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

㊀ 赤衛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裝組織，不脫离生产。

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險。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許多紅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贛边界、湘南、醴陵、黃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殘，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贛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統治势力暫时稳定的时候，湘贛兩省派来"进剿"的軍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們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爭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組織一天一天推广，紅軍和赤衛队一天一天壯大，原因就在于湘贛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軍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軍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爭，創造罗霄山脉㊀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軍队党帮助地方党的發展，正規軍队帮助地方武裝的發展；集中紅軍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爭，湘贛兩省进攻軍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贛兩省的影响則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敗，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統治阶級暫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統治阶級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敗。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顧特委、軍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議的决議，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团逃避斗爭欲回家乡的意見，其錯誤实在非常之大。这种失敗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軍委采取了糾正錯誤的步驟，而挽救过来了。

四　湘贛邊界的割據局面在湘鄂贛三省的地位

以宁岡为中心的湘贛边界工农武裝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

㊀ 罗霄山脉是江西湖南兩省边界的大山脉，井岡山居于罗霄山脉的中段。

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贛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贛兩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紅軍从斗爭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質量，能在將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裝即赤衛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質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戶团和小量軍队作战，將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漸減少依靠紅軍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給紅軍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贛三省暴动發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五 經濟問題

在白色勢力的四面包圍中，軍民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問題。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鎖，食鹽、布匹、藥材等日用必需品，無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貴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資产阶級㊀群众和紅軍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眞是到了极度。紅軍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餉。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錢伙食費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沒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較地好一点，特别是紅軍的給养使之比較地充足一点，則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經济問題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勢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較長的期間的条件下，割据將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經济問題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員注意。

㊀ 毛澤东同志这里所說的小資产阶級，是指农民以外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各种自由职业者和小資产阶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中国此等社会成份主要在城鎮，但在乡村中也占有相当数量。参看"中国社会各阶級的分析"一文。

六　軍事根據地問題

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㊀和九隴兩个軍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岡、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岡、茶陵、蓮花四县交界的九隴山区，这兩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險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軍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贛三省暴动發展的將来，亦將仍然是重要的軍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儲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設較好的紅軍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該努力的。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五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一卷排印）

㊀ 大小五井山区就是指界于江西西部的永新、宁岡、遂川和湖南东部的酃县四县之間的井岡山，因为在井岡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

“共产党人”發刊詞

（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毛 泽 东

中央很早就計划出版一个党內的刊物，現在算是实現了。为了建設一个全国范圍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維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在当前的时机中，这种必要性更加明显。当前时机中的特点，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中的投降危險、分裂危險和倒退危險日益發展着；又一方面，是我們党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而党的任务是动員群众克服投降危險、分裂危險和倒退危險，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損失。在这种时机，这样一个党內刊物的出版，实在是十分必要的了。

这个党內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它將写些什么东西呢？它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呢？

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設一个全国范圍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維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設这样一个党，建設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經大体具备，这件偉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帮助进行这件偉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須有專門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說来，我們的党已經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經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領导骨干說来，就其党員的某些成份說来，就其总路綫說来，就其革命工作說来，也已經是一个思想上、政治

上、組織上都巩固的和布尔塞維克化的党。

那末，現在提出新的任务的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們現在有大批的新党員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組織，这些新組織还不能說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塞維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員，也發生了提高水平的問題，对于老組織，也發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塞維克化的問題。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負的任务，現在和过去国內革命战爭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現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現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

現在是民族統一战綫的时期，我們同資产阶級建立了統一战綫；現在是抗日战爭的时期，我們党的武裝在前綫上配合友軍同敌人进行殘酷的战爭；現在是我們党發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經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們提出"建設一个全国范圍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維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

我們現在要建設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該怎样进行呢？解决这个問題，是同我們党的历史，是同我們党的十八年斗爭史，不能分离的。

我們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起，到現在，已經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党經历了許多偉大的斗爭。党員、党的干部、党的組織，在这些偉大斗爭中，鍛煉了自己。他們經历过偉大的革命胜利，也經历过严重的革命失敗。同資产阶級建立过民族統一战綫，又由于这种統一战綫的破裂，同大資产阶級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裝斗爭。最近三年，則又处于同資产阶級建立民族統一战綫的时期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發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資产阶級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資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沒有的。再則，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經济、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經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

国家，这就不但規定了中国現阶段革命的性質是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無产阶級、农民阶級和城市小資产阶級，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資产阶級的参加；并且規定了中国革命斗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斗爭。我們党的历史，可以說就是武裝斗爭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說过："在中国，是武裝的革命反对武裝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㊀ 这是說得非常之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領导的革命史中所沒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这样：(一)無产阶級同資产阶級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統一战綫，(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裝斗爭，——就成了中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过程中的兩个基本特点。这里，我們沒有把党同农民阶級和党同城市小資产阶級的关系作为基本特点，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关系，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原則上都是一样的；第二，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裝斗爭，实質上即是农民战爭，党同农民战爭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

由于这兩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們党的建設过程，我們党的布尔塞維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敗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縮小和扩大，党的發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資产阶級的关系和党同武裝斗爭的关系。当我們党的政治路綫是正确地处理同資产阶級建立統一战綫或被迫着分裂統一战綫的問題时，我們党的發展、巩固和布尔塞維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資产阶級的关系时，我們党的發展、巩固和布尔塞維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們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裝斗爭問題时，我們党的發展、巩固和布尔塞維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問題时，那末，我們党的發展、巩固和布尔塞維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設过程，党的布尔塞維

㊀ 引自斯大林"論中国革命的前途"。

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綫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統一战綫問題、武裝斗爭問題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論断，很明显地，已經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証明了。倒轉来說，党更加布尔塞維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綫，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統一战綫問題和武裝斗爭問題。这一論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証明了。

所以，統一战綫問題，武裝斗爭問題，党的建設問題，是我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問題。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問題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領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憑借我們丰富的經驗，失敗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縮小和發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經驗，我們已經能够对这三个問題做出正确的結論来了。就是說，我們已經能够正确地处理統一战綫問題，又正确地处理武裝斗爭問題，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設問題。也就是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战綫，武裝斗爭，党的建設，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国革命的偉大成績。

在这里，讓我們对于这三个法宝，三个問題，分别地大略地說一下吧。

十八年中，中国無产阶級同中国資产阶級和其他阶級的統一战綫，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間發展着的，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爭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爭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历史，証明了下列的規律：（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資产阶級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軍閥的斗爭的。因此，無产阶級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內，应該同民族資产阶級建立統一战綫，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在經济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統一战綫的內容不能始終一致，而是要發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資产阶級参加在內，而在另一时

期則民族資产阶級并不参加在內。(三)中国的帶买办性的大資产阶級，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們所豢养的阶級。因此，中国的帶买办性的大資产阶級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帶买办性的大資产阶級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間的矛盾尖銳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鋒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屬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統的大資产阶級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內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爭。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內，中国無产阶級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資产阶級集团建立可能的統一战綫，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四)在买办性的大資产阶級参加統一战綫并和無产阶級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爭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無产阶級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發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騙、誘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統一战綫的准备。(五)無产阶級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六) 城市小資产阶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这些規律的正确性，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証明了，而且在目前的抗日战爭中也在証明着。因此，無产阶級的政党在同資产阶級(尤其是大資产阶級)組織統一战綫的問題上，必須实行坚决的、严肃的兩条战綫斗爭。一方面，要反对忽視資产阶級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爭的可能性的錯誤。这种錯誤，把中国的資产阶級和資本主义国家的資产阶級看做一样，因而忽視同資产阶級建立統一战綫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統一战綫的政策，这就是"左"傾关門主义。另一方面，則要反对把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的綱領、政策、思想、实踐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視它們之間的原則差别的錯誤。这种錯誤，忽視資产阶級(尤其是大資产阶級) 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資产阶級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無产阶級和共产党，力求消灭無产阶級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独立性，力求把無产阶級和共产党变成資产阶級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資产阶級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視資产阶級(尤其是大

資产阶級)一到革命同他們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們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視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傾机会主义。过去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無产阶級适合資产阶級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主观原因。中国資产阶級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綫和党的建設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資产阶級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綫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資产阶級联合又同它斗爭的政治路綫。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設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資产阶級联合又同它斗爭的中間發展起来和鍛煉出来的。这里所謂联合,就是同資产阶級的統一战綫。所謂斗爭,在同資产阶級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爭;而在被迫着同資产阶級分裂时,就轉变为武裝斗爭。如果我們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資产阶級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發展;如果我們党不知道在联合資产阶級时又同資产阶級进行坚决的、严肅的"和平"斗爭,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敗;又如果我們党在被迫着同資产阶級分裂时不同資产阶級进行坚决的、严肅的武裝斗爭,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敗。所有这些,都是在过去十八年的历史中証明了的。

中国共产党的武裝斗爭,就是在無产阶級領导之下的农民战爭。它的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爭。这时,我們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裝斗爭的重要性,但还沒有徹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沒有了解武裝斗爭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爭。这时,我們党已經建立了独立的武裝队伍,已經学会了独立的战爭艺术,已經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我們党已經能够把武裝斗爭这个主要斗爭形式同其他許多的必要的斗爭形式直接或間接地配合起来,就是說,把武裝斗爭同工人的斗爭,同农民的斗爭(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爭,同政权的斗爭,同經济战綫上的斗爭,鋤奸战綫上的斗爭,思想战綫上的斗爭,等

等斗爭形式，在全国范圍內或者直接地或者間接地配合起来。而这种武裝斗爭，就是在無产阶級領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爭。第三个阶段，就是現在的抗日战爭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們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裝斗爭的經驗，能够运用武裝斗爭形式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爭形式互相配合的經驗。这种武裝斗爭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爭㊀。游击战爭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長时期內，人民武裝队伍为了战胜武裝的敌人、創造自己的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爭形式。到目前为止，我們党的政治路綫和党的建設，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斗爭形式的。离开了武裝斗爭，离开了游击战爭，就不能了解我們的政治路綫，也就不能了解我們的党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綫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裝斗爭。十八年来，我們党是逐步学会了并坚持了武裝斗爭。我們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产阶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們党的發展、巩固和布尔塞維克化，是在革命战爭中进行的，沒有武裝斗爭，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換来的經驗，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記。

㊀ 毛澤东同志在这里說中国革命的武裝斗爭的总概念，就是游击战爭，是总結了从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至抗日战爭初期的中国革命战爭的經驗。在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的長时間內，中国共产党所領导的武裝斗爭都是游击战爭。这个时期的后一阶段，随着紅軍力量的成長，游击战曾經轉变为帶游击性的运动战（这种运动战，按照毛澤东同志的規定，是提高了的游击战爭）。但在抗日战爭期間，根据敌情的变化，这种帶游击性的运动战又轉变为游击战爭。在抗日战爭的初期，党內犯右傾机会主义錯誤的同志輕視党所領导的游击战爭，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軍队的作战。毛澤东同志曾在"抗日游击战爭的战略問題"、"論持久战"和"战爭和战略問題"等著作中，駁斥了那种观点，并在本文中把長时期內中国革命的武裝斗爭采取游击战爭形式的經驗，作了理論上的总結。中国共产党所領导的武裝斗爭，到了抗日战爭的后期，特别是在第三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由于革命力量的新成長和敌情的新变化，战爭的主要形式就由游击战爭轉变为正規战爭；而在第三次国內革命战爭的后期，更發展为使用大量重武器并包括攻堅战的大兵团作战了。

党的建設的过程，党的發展、巩固和布尔塞維克化的过程，也同样是有三个阶段的特点的。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綫是正确的，党員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終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統一战綫、武裝斗爭和党的建設三个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狀况和社会狀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踐还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領导机关中占統治地位的成份，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沒有能够領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資产阶級的欺騙，而使革命遭到失敗。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組織是發展了，但是沒有巩固，沒有能够使党員、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員非常之多，但是沒有給予必要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經驗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結起来。党內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沒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謀詭計的包圍中，但是沒有警覚性。党內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沒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裝，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沒有經驗，缺乏深刻的革命認識，还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踐相結合。这就是党的建設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爭的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經驗，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狀况和社会狀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規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們的干部更多地領会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更多地学会了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踐相結合，我們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爭。資产阶級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組織不但重新發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們的党，但是党驅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內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創造了坚强的武裝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爭的艺术。所有

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偉大斗爭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們不去虛心領会过去的經驗，对于中国的历史狀况和社会狀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規律不了解，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踐沒有統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党的領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沒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綫和組織路綫。党和革命在一个时期遭受过李立三同志"左"傾机会主义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遭受过革命战爭中的"左"傾机会主义和白区工作中的"左"傾机会主义的危害。只在到了遵义会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議）以后，党才徹底地走上了布尔塞維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張国燾右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基础。这就是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經过去了三年，这三年的斗爭，是有非常偉大的意义的。党憑借着过去兩个革命阶段中的經驗，憑借着党的組織力量和武裝力量，憑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間的很高的政治信仰，憑借着党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踐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統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而且进行了偉大的抗日战爭。党的組織已經从狹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裝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爭中重新壯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偉大的成功。然而，大批的新党員还沒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組織还沒有巩固，他們同老党員和老組織之間，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批的新党員、新干部还沒有足够的革命經驗。他們对于中国的历史狀况和社会狀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規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們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踐之完全的統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在过去發展党的組織的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發展而又不讓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許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統一战綫虽然建立了并坚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資产阶

級特别是大資产阶級却时时刻刻在企圖破坏我們的党，大資产阶級投降派和頑固派所指揮的严重的磨擦斗爭在全国进行着，反共之声喧囂不已。大資产阶級投降派和頑固派，并想以此作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統一战綫和拉了中国向后倒退的准备。大資产阶級在思想上企圖"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組織上企圖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党的武裝力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們的任务，無疑是克服这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險，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統一战綫，保持国共合作，而爭取繼續抗日、繼續团結和繼續进步；同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損失。为达此目的，就要巩固党的組織，巩固党的武裝力量，并动員全国人民，进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坚决的斗爭。这种任务的完成，依靠全党的努力，依靠全体党員、党的干部、党的各地各級組織实行不屈不撓再接再厉的斗爭。我們相信，有了十八年經驗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有經驗的老党員、老干部和帶着新鮮血液富有朝气的新党員、新干部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經历过风浪的布尔塞維克化的中央和地方組織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坚强的武裝力量和进步的人民群众相互协力的情况下，是可能达到这些目的的。

这就是我們党在十八个年头中的主要的經历和主要的問題。

十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战綫和武裝斗爭，是战胜敌人的兩个基本武器。統一战綫，是实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战綫。而党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战綫和武裝斗爭这兩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鋒陷陣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我們今天要怎样建設我們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設一个"全国范圍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維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問題，考察一下我們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把党的建設問題同統一战綫問題、同武裝斗爭問題联系起来看一下，把党的建設問題同联合資产阶級又同它作斗爭的問題、同八路軍新四軍坚持抗日游击战爭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問題联系起来看一下，就会懂得。

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踐之統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經驗和当前的新鮮經驗傳达到全党，使党鉄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經犯过的錯誤——这就是我們的任务。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二卷排印）

学习和时局*（摘錄）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毛泽东

二

目前时局有兩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陣綫的增强和法西斯陣綫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陣綫內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前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容易被人們看見。希特勒不久就会被打敗，日寇也已处在衰敗过程中。后一个特点，比較地还不明显，还不容易被一般人看見，但是它已在欧洲、在英美、在中国一天一天显露

---

* 中国共产党中央領导机关和高級干部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間，对于党的历史特別是党在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时期的历史所进行的討論，大大地帮助了党內思想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礎上的統一。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貴州省遵义城所召集的扩大的政治局会議，实际糾正了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傾錯誤路綫，改变了党中央的領导机关的成份，确立了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領导，把党的路綫轉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軌道上，但是在党的很多干部中間，对于过去的錯誤路綫的性質却沒有作过徹底的清算。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党的干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党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这个时間內，曾經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討論；随后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这个时期內，領导全党高級干部进行同样的討論。这个討論为一九四五年召集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重要的准备，使那次大会达到了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学习和时局"就是毛澤东同志在延安高級干部会議上对于这个討論所作的講演。关于党中央对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傾机会主义路綫的錯誤所作的詳細結論，参看本篇附录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員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議"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决議"（見本書第四九三至五三〇頁——本書編者注）。

出来。

中国人民势力的增强，要以我党为中心来說明。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發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头兩年內，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軍閥重視国民党，輕視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綫进攻，对它采取以軍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誘降为輔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領导的抗日根据地則不重視，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但是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領武汉以后，他們即已开始改变这个政策，改为重視共产党，輕視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誘降为主、以軍事打击为輔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而逐漸轉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因为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感觉国民党已不可怕，共产党則是可怕的了。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內，抗战是比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許多限制，但也允許有較多的自由。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爭失敗和仇視共产党这种情緒的發展，国民党就逐漸反动，反共活动逐漸积极，对日抗战逐漸消极。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因为在內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結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組織的党員和三万多人的軍队，因此为日本軍閥所輕視。但到一九四〇年，党員已發展到八十万，軍队已發展到近五十万，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負担粮税和兩面負担粮税的㊀，約达一万万。几年內，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場，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場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將日軍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圍，挽救了国民党战場的危机，支持了長期的抗战。但在此阶段內，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錯誤，这种錯誤就是輕視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主張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輕視游击战爭），依賴国民党，缺乏清醒的头腦和

㊀ 这里所說的一面負担粮税的地区，是指根据地的比較巩固的地区，那里的人民只向抗日民主政府負担粮税；兩面負担粮税的地区，是指根据地的边緣地区和游击区，在那些地区因为敌人可以經常来騷扰，人民除向抗日民主政府負担粮税外，还經常被迫向敌伪政权繳納一些粮税。

缺乏独立的政策(因此产生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对于放手發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我党領导的軍队等項政策，發生了动摇)。同时，我党吸收了广大数目的新党員，他們还沒有經驗，一切敌后根据地也都是新創的，还沒有巩固起来。这一阶段內，由于时局开展和党与軍队的發展，党內又生長了一种驕气，許多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了。在这一阶段內，我們曾經克服了党內的右傾偏向，执行了独立政策，不但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創立了根据地，發展了八路軍新四軍，而且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爭，將他們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經改变了的方針，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針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針，更加强調起来，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領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圍，进行連續的"扫蕩"战爭，殘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兩年內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这一阶段內，我党根据地縮小了，人口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軍也縮小到三十多万，干部損失很多，財政經济极端困难。同时，国民党又認为他們已經閑出手来，千方百計地反对我党，發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本帝国主义配合着进攻我們。但是这种困难地位教育了共产党人，使我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們学会了如何反对敌人的"扫蕩"战爭、"蚕食"政策㊀、"治安强化"运动㊁、"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們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統一战綫政权的"三三制"政策、土地政策、整頓三风、精兵簡政、統一領导、拥政爱民、發展生产等項工作，克服了許多缺点，并且把第一阶段內許多人自以为了不得的那股驕气也克服下去了。这一阶段內，我們虽然受了很大的損失，但是我們站住脚了，一方面打退了日寇的

㊀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根据地大規模进攻失敗以后所实施的一种方法，即由迅速"鯨吞"的方法，改为長期的逐漸的"蚕食"方法。日本帝国主义企圖用稳扎稳打、逐步分割的步驟，縮小抗日根据地，扩大它的占領区。

㊁ 一九四一年三月間，华北的日寇和汉奸提出所謂"治安强化运动"的口号。所謂"治安强化"，就是实行搜查，举办保甲制度，調查戶口，組織伪軍，以鎮压抗日力量。

进攻，一方面又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国民党的反共和我們不得不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自衛斗爭的这些情况，党內又生長了一种过左的偏向，例如以为国共合作就要破裂，因而过分地打击地主，不注意团結党外人士等。但是这些过左偏向，也被我們克服过来了。我們指出了在反磨擦斗爭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則，指出了在統一战綫中又团結又斗爭和以斗爭求团結的必要，保持了国內和根据地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

一九四三年到現在为第三阶段。我們的各項政策更为見效，特別是整頓三风和發展生产这样兩項工作，發生了根本性質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質基础兩方面，立于不敗之地。此外，我們又在去年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审查干部和反对特务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我們根据地的面积又扩大了，根据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負担和兩面負担的，又已上升到八千余万，軍队又有了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二十七万，党員發展到了九十多万。

一九四三年，日本軍閥对中国的政策沒有什么变化，还是以打击共产党为主。从一九四一年至今这三年多以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华日軍是压在我党領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身上。三年多以来，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数十万軍队經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約有一半投降了敌人，約有一半被敌人消灭，殘存的和撤走的为数极少。这些投降敌人的国民党軍队反过来进攻我党，我党又要担負抗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軍。国民党只担負抗击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軍和不到百分之十的伪軍。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时間，日本軍閥沒有举行过对国民党战場的战略进攻，只有几次較大的战役行动（浙贛、長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归，而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我党領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国民党采取上山政策和观战政策，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退了袖手旁观。一九四三年国民党的国內政策更加反动，發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是又被我們打退了。

一九四三年，直至今年春季，日寇在太平洋战綫逐漸失利，美国

的反攻增强了，西方的希特勒在苏联紅軍严重打击之下有摇摇欲倒之势。为救死計，日本帝国主义想到要打通平汉、粤汉兩条鉄路；又以其对重庆国民党的誘降政策还沒有得到結果，有給它以再一次打击之必要，故有在今年大举进攻国民党战綫的計划。河南战役㊀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軍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軍还能打一下。湯恩伯部官脫离兵，軍脫离民，混乱不堪，損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几个师，也是一触即溃。这种情况，完全是几年来国民党厉行反动政策的結果。自武汉失守以来的五年半中，共产党領导的解放区战場担負了抗击日伪主力的重担，这在今后虽然可能發生某些变化，但这种变化也只能是暫时的，因为国民党在五年半以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所养成的极端腐化狀态，今后必將遭到严重的挫敗，到了那时，我党抗击敌伪的任务又將加重了。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結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結果。这一种情况，將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同志們可以看見，一九三七年七月起至現在止，这七年时間內，在我党領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經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种情况。我党抗击了日寇的殘酷进攻，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大大地發展了党和軍队，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党內發生的右的和"左"的錯誤思想，全党学得了許多可宝貴的經驗。这些就是我們七年工作的总結。

現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負比較过去更为重大的責任。我們要准备不論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負这种責任，就要使我党我軍和我們的根据地更加發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㊀ 一九四四年三月，日寇發动河南战役，使用兵力五、六万人。国民党軍將鼎文、湯恩伯、胡宗南部四十万人，在日寇面前望風崩溃，郑州、洛陽等三十八县相繼陷落，湯恩伯部損失兵員二十万人。

关于根据地工作，第一阶段內有大的發展，但是不巩固，因此在第二阶段內一受到敌人的严重打击，就縮小了。在第二阶段內，一切我党領导的抗日根据地都受到了严格的鍛煉，比起第一阶段来好得多了；干部和党員的思想和政策的水平，大进一步，沒有学会的东西，学会得更多了。但是思想的打通和政策的学习还需要时間，我們还有許多沒有学会的东西。我党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內还不够統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負比較目前更为巨大的責任。今后的問題就是在繼續抗战中使我党我軍和我們的根据地更加發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將来担負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質准备。沒有这种准备，我們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我們一向是做得很差的。如果現在我們还不爭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和市民群众圍繞在我党的周圍，并准备群众的武裝起义，我們的軍队和农村根据地就会得不到城市的配合而遇到种种困难。我們十多年来是处在农村中，提倡熟悉农村和建設农村根据地，这是必要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准备城市起义的任务，沒有也不可能在这十多年中間去实行。但是現在不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議要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实行了。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就可能开会，这次代表大会將要討論加强城市工作和爭取全国胜利的問題。

这几天陝甘宁边区召开工业会議，是有重大意义的。一九三七年边区还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七千人，現在有了一万二千人。切不可輕視这样的数目字。我們要在根据地內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則到了那时將無所措手足。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裝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这是第二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質准备。沒有这种准备，我們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五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九四五至九五〇頁）

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毛　泽　东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戰爭

第一节　战爭規律是发展的

……

第三节　战略問題是研究战爭全局的規律的东西

……

第三章　中国革命戰爭的特点

（見本書第一一二六至一一二九、一一三〇至一一三二、一一四〇至一一四五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摘錄)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刘 少 奇

一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

在十一年前,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向全党提出的任务,是"放手發动群众,壯大人民力量,团結全国一切可能团結的力量,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国"。这个任务,已經在一九四九年实現了。

反动派常常自己选擇走向灭亡的道路。我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針是要求国民党同全国民主力量成立联合政府。还在抗日战爭初期,我們党就曾經同国民党成立了联合抗日的协議。在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战爭結束以后,我們党又曾經多次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談判,以圖避免內战,并且試圖經过和平的道路实現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在一九四六年,我們和几个民主党派曾經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和平建国的协議。但是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發动了全国的大內战,企圖消灭代表中国人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切进步民主力量。他們想錯了。我們党在爭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沒有放棄警惕,沒有放棄人民的武裝。我們的政策是:如果国民党願意和平,并且願意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这是有利于人民的,是我們所力爭的。但是我們知道,和平的願望能否实現,却不取决于我們,而取决于当时的統治阶級。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把战爭强加在人民头上,那末,我們也作了充分的准备,能够动員人

民的力量击敗他們，使战爭的發动者自食其果。历史所作的結論正是这样。想要消灭人民力量的人們，自己被人民的力量消灭了。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即使在战爭期間，凡能和平解放的地方，例如北京、綏远、長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我們都做了爭取、接洽和談判的工作，实現了和平解放。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綫。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綫，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綫，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問題。我們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綫，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工人阶級在同几亿农民建立了坚固同盟的条件下取得了全国范圍的統治权力，工人阶級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領导全国政权的政党；人民民主專政实質上已經成为無产阶級專政的一种形式。这就使我国的資产阶級民主性質的革命有可能經过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轉变为無产阶級社会主义性質的革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結束和無产阶級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

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我們的国家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为了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必須發展社会主义的工业，首先是重工业，使我們的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而这是需要一个相当長的时間的。

第二，在我們的国家里，工人阶級的同盟者不但有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阶級，而且有民族資产阶級。因此，为了改造旧經济，不但对于农业和手工业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且对于資本主义工商业，也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这就需要逐步进行，需要时間。

党中央委員会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規定了我們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長的时間內，逐步实現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的这个总路綫是在一九五二年国民經济恢复阶段終結的时候提出的，在一九五四年已經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接受，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記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灯塔。各項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傾或者"左"傾的錯誤。在过去几年中，从右面离开党的总路綫的傾向，主要地是仅仅滿足于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既得成就，要求把革命停頓下来，不承認我們的革命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不願意对城市和农村的資本主义采取适当的限制政策，不相信党能够領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不相信党能够領导全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从"左"面离开党的总路綫的傾向，主要地是要求在"一个早上"就实現社会主义，要求在我国用沒收的方法消灭民族資产阶級，或者用排挤的方法使資本主义工商业破产，不承認过渡到社会主义应当采取逐步前进的步驟，不相信我們可以經过和平的道路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我們党坚决地拒絕和批判了这兩种錯誤的傾向。很明显，如果我們党接受这些意見的任何一种，我們就將不能建設社会主义，或者不能如同今天这样順利地建設社会主义。

按照过渡时期的总路綫，我国已經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执行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划。党中央委員会原来預計，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將需要大約三个五年計划的时間。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实踐証明，为了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三个五年計划的时間是必要的，或者还需要更多一点时間。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就已經基本上完成，而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除个别地区以外，就可以全部完成。

二　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現在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根据今年六月的統計，全国一亿二千万农戶中，加入农业生产合

作社的，已經有一亿一千万戶，占农戶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七。其中，有三千五百万戶加入了初級合作社；有七千五百万戶，即大多数，加入了高級合作社。畜牧业中的互助合作运动，也已經有了發展。

全国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合作組織。加入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組或者供銷生产合作社的，已經占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員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个体漁民、个体鹽民和运輸业中的个体劳动者，現在也基本上实現了合作化。

全国資本主义工商业已經基本上实現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个体小商业也已經基本上实現了合作化，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銷代購的业务。

这些成就，主要地是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高潮中达到的。

这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我国各种社会条件發展成熟的必然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沒收了控制国家經济命脉的全部官僚資本的企业，包括由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以后接收的日、德、意各国在中国的企业，把它們变为国营的社会主义企业，使国家掌握了最大的銀行，几乎全部的鉄路，絕大多数的鋼鉄工业，其他重工业的主要部分，以及輕工业的某些重要部分。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經济的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

人民政府接着用极大的努力發展了国营工业、国营运輸业和其他国营企业。国营工业产値在一九四九年还只占全部工业总产値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三，到一九五二年就已經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五，而到一九五五年，就已經占百分之五十一点三了。

人民政府把全部私营銀行和錢庄改造为在国家銀行領导下的統一的公私合营銀行，由国家集中經营銀行信貸、保險业务和黃金、白銀、外国貨幣的交易。人民政府建立了对外貿易的管制，实行了外汇的管理。人民政府又建立了全国統一的强大的国营商业和供銷合作社商业，掌握了主要的工业原料和主要的貨源，逐步地实現了批發商

业的国有化，巩固了社会主义商业在全国市場上的領导地位。

强大的社会主义經济的發展，建立了对于农业、手工业、資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質基础。但是为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还必須采取适合我国情况的政策和步驟，才能使我国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乐于参加集体經济，使我国的民族資产阶級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我們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步驟呢？現在，我們就农业、手工业、資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分别地作一些簡單的說明。

首先，我們要說明的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徹底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們党沒有采取單純依靠行政命令、"恩賜"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們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間，用徹底發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綫的方法，充分地啓發农民特别是貧农的阶級覚悟，經过农民自己的斗爭，完成了这一任务。我們花了这样多的时間是否需要呢？我們認为这是完全需要的。由于我們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組織起来，緊緊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裝。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經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級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而且在政治上徹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級和孤立了富农。广大的覚悟的农民認为，無論是地主或者富农的剝削行为都是可耻的。这就为后来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創造了有利的条件，大大地縮短了农业合作化所需要的时間。

在旧中国的农村人口中，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貧农和雇农群众。他們是农村中的半無产阶級和無产阶級，很容易接受工人阶級政党的領导。他們不只是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中有很大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有很大的积极性。在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群众的經济地位是改善了，很多貧农雇农上升为中农。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少人多，全国农民平均每人只有三亩耕地（約等于五分之一公頃），南方許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者只有几分田，所以在农村中

仍然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貧农和下中农。在繼續个体經营的条件下，他們要想过富裕的生活是毫無把握的。这就使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貧农和不富裕的农民积极地响应我們党的号召，願意走合作化的道路。

在土地改革以后，我們随即在农民中广泛地建立了帶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組織。这是农民的一种集体劳动組織。由于互助比"單干"优越，在一九五二年参加互助組織的农戶已經占全国农戶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在一九五四年又增加到將近百分之五十八。在互助組織的基础上，党中央在一九五二年开始有計划地發展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以土地入股、統一經营、但仍然保持土地和主要生产資料私有的一种初級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一九五一年底还只有三百多个；由于它又比互助組織优越得多，到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已經发展到六十七万个，参加的农戶約一千七百万戶。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后，像大家所知道的，由于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糾正了党內抑制农民的合作化积极性的右傾保守思想，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了特别迅速的發展。随后，初級合作社又开始大批地改組成能够更有效地組織生产的社会主义的高級合作社，在这种合作社里，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資料都由私有变成了集体所有。

事实証明，我們党采取这种逐步前进的办法是适当的。因为这使得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不断地得到好处，逐漸地习慣于集体生产的方式，可以比較自然地、比較順利地脫离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資料的私人所有制，接受集体所有制，从而避免了或者大大減少了由于突然变化而可能引起的种种損失。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的阶級政策是，树立貧农和土地改革以后由貧农上升的下中农在合作社內部的領导优势，同时巩固地联合中农。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农在农村中虽然居于少数，但是他們对于下中农以至貧农仍然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富裕中农一般地是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他們中間的許多人还是在土地改革中"翻身"的，但是他們对于走合作化的道路却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动摇。为了

巩固同中农的联合，这里的关键是必须在合作化运动中坚持自願和互利的政策。自願和互利的政策是适用于一切人的，对于中农更有重要的意义。党不但禁止勉强中农加入合作社，而且規定在合作化初發展的时候，首先吸收貧农和下中农入社，一般地不吸收比較富裕的中农入社。党又規定，在中农入社以前和以后，特别是在处理入社的生产資料的时候，都不允許損害他們的利益，占他們的便宜；当然也不讓中农損害貧农的利益，占貧农的便宜。国家在粮食問題上的正确政策，也对于中农發生了有益的影响。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国家对于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統購統銷，并且在統購統銷中規定了合理的价格，这就基本上消灭了市場上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資本主义投机活动。在一九五五年，国家又規定把購粮数量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上，改正了前一年不适当地多購七十亿斤粮食的錯誤，这就消除了农民担心政府收購过多的疑虑。由于党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联合中农的方針，由于中农看到了走資本主义道路的無望，看到了合作社生产的日益显著的优越性，广大的中农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終于停止了动摇，积极地要求入社了。

对于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党在过去几年中一貫地注意了領导农民防止和反对他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破坏活动，在合作化初期禁止他們加入合作社。只是在合作化运动取得胜利以后，党才决定分别地根据他們的具体情况，允許他們以不同的身份到合作社里进行同工同酬的劳动，以便把他們改造成为新人。

由于实行了以上的政策，我們就能在全国范圍的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不到四年的时間內，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全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戶組織成为一百万个左右大小不等的、高級的和初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其次，我們要說明的是手工业和其他个体經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广大的手工业个体劳动者除在极小范圍內能够自产自銷以外，都要依靠国营商业、供銷合作社和資本主义企业供給原料、推銷成品和借給資金。他們中間的多数人生活困难，疾病伤亡沒有保

險。他們的生产技术多数是落后的，有被現代机器生产淘汰的可能。因此，他們希望联合起来，在国营經济的領导下克服这些困难。从整个国民經济的利益来說，很多的手工业生产是必須繼續保存和發展的，这主要地是为了滿足国內市場的广大需要，部分地也是为了供应出口貿易的需要。中国的个体漁民、鹽民、小商小販和运輸业中的个体劳动者，也有很大的数量，他們的情况同手工业者大体相近。

对于手工业、漁业、鹽业和运輸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地是采取合作化的形式。这些方面的合作化运动，在过去几年內陆續有所發展。到一九五五年，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組織的人数占手工业从业人員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手工业和其他个体經济合作化的大發展，是在今年上半年。新成立的合作社，有些是經过生产小組的过渡形式發展起来的，大部分是在今年的合作化高潮中直接組織的。此外，有一小部分手工业和一小部分屬于資本主义經营方式的木帆船、獸力車，同資本主义工商业一起实行了公私合营。

小商小販是个体的商业劳动者。他們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除了一部分随着資本主义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外，一般地也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組成合作商店或者合作小組。小商小販所組織的合作小組，为国营商业和供銷合作社代銷代購，而照旧采取便利消費者的分散流动的經营方式，照旧保存它們原有的符合社会需要的經营特点。

最后，我們要說明的是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我国曾經占統治地位的大資产阶級主要是官僚买办資产阶級，这个阶級如前面所說，早已被革命消灭了。在旧中国，民族資产阶級是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資本有矛盾的。他們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中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他們在一定条件下願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統治的斗爭；另一方面，他們在斗爭中又常常表現有一种动摇性和妥协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們表示拥护人民民主專政，拥护共同綱領和宪法，表示願意繼續反对帝国主义，贊成土地改革；但是，他們又有發展資本主义的强烈願望。因此，我們对待民族資产阶級的政策，同过去一样，仍然是又团結、又斗爭、

以斗爭求团結的政策。这就是說，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工人阶級还保持着同民族資产阶級在政治上的联盟。在經济上，資本主义工商业具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具有有利于国計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具有不利于国計民生的作用。因此，国家对于資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按照这样的政策，工人阶級又同民族資产阶級建立了經济上的联盟，并且在这种联盟中实現了国营經济对于資本主义經济的領导，使資本主义私有制逐步地經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資本主义轉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国家对于資本主义工商业所以必須采取利用的政策，不仅是由于民族資产阶級有接受这个政策的可能性，而且还由于在过渡时期我們在經济上有利用資本主义工商业的必要性。全国解放初期，国民經济遭受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統治的严重破坏，我們面对着恢复国民經济的重大任务；同时又由于我国經济很落后，小生产占优势，我們有必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經济力量，以利于国民經济的恢复工作和建設工作。几年来，我們在优先發展国营經济的条件下，实行"公私兼顧、劳資兩利"的政策，在原料分配和其他一些問題上对于私营經济基本上給予"一視同仁"的待遇，这就使得私营工厂工人免于失业，同时也使得資本家有一定的利潤可得。由于这个政策，对于国計民生有利的資本主义工商业都能維持下来，并且有一些發展。事实証明，資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經济的恢复时期和建設时期，对于国营經济在許多方面都起了輔助的作用。对于資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政策，使国家能够取得更多的工业品去換取农民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使国家能够在市場上經常有相当充足的物資，有利于物价的稳定。当然，这种利用政策絕不是讓資本主义自由發展。对于資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利于国計民生的作用，国家必須实行限制的政策，这种限制政策是同利用政策分不开的。

国家对于資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是同資产阶級一个阶級的狹隘利益冲突的，因此資产阶級中总是有許多人表示反对，或者違反这种限制。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級斗爭的主要

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級矛盾——工人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的矛盾。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同資本主义的經济，在活动范圍方面，在税收方面，在市場价格和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的条件方面，在工人的劳动条件方面，經常地反复地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其中主要的是一九五〇年春天为了稳定物价而反对投机活动的斗爭，和一九五二年反对行賄、偷税漏税、盜窃国家資財、偷工减料、盜窃国家經济情报的"五反"斗爭。进行这些斗爭，是因为有許多資产阶級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計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在进行这些斗爭中，我們注意防止和糾正了对于資本主义經济的限制过多过死的錯誤。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針，是通过这些斗爭使那些坚持不法行为的少数資产阶級分子在人民群众中，同时也在資产阶級内部陷于完全的孤立，而把那些願意服从国家法令的大多数資产阶級分子团結起来。

国家实行利用政策和限制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对于資本主义工商业实現社会主义的改造。这种改造分为兩个步驟：第一步是把資本主义轉变为国家資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資本主义轉变为社会主义。在無产阶級执政的国家領导下的国家資本主义是什么呢？正如列宁所說的："这就是我們能够加以限制，我們能够規定它的界限的一种資本主义。"我們通过国家資本主义这种过渡形式，使民族資产阶級在国家和工人阶級的領导下，有一个必要的时間来逐步地接受改造。在工业方面，由于国家掌握了大部分工业原料，从一九五〇年开始对于私营工业采取了供給原料、加工訂貨和統購包銷的办法，从而初步地把私营工业納入国家資本主义的軌道。到了一九五四年，又进一步地有計划地用公私合营的方式来改造資本主义工业，使主要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多数轉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商业方面，由于国家經过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掌握了一切重要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貨源，就有可能按照国家規定的条件把貨品批發給私营商业，使私营商业执行經銷代銷的业务。在一九五四年，这种經銷代銷的初級形式的国家資本主义商业已經大量地發展起来。有了这

些准备以后，到一九五五年秋冬之間，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最后地断絕了資本主义在农村發展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內阶級力量的对比，資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条件就完全成熟了。这种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我国国家資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使資本主义所有制轉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驟。

为了通过国家資本主义这种和平过渡的办法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們对于資产阶級私有的生产資料的国有化，采取了逐步贖买的政策。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贖买的形式采取分配利潤的制度，即按企业盈余多少，分配一定利潤（例如四分之一）給資本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贖买的形式采取定息的制度，即在一定时期內，由国家經过專业公司支付資本家以一定的利息。此外，資方人員凡能工作的都由国家有关部門分配工作，不能工作的也酌量給以安置，或者予以救济，保障他們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必要的贖买的办法。馬克思和列宁都說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無产阶級对于資产阶級采取贖买政策是允許的，并且是有利的。这已經在我国的革命实踐中得到了証明。

我們在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实現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是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結合进行的。这就是在企业改造的同时，采取教育的方法，逐步地改造資本家，使他們由剝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們对于民族資产阶級采取又团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团結的政策，主要是教育他們。对于資本主义經济的限制和对于資产阶級的不法行为的斗爭是一种重要的实际的教育。几次調整，統筹兼顧，全面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这又是一种重要的实际的教育。他們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积极态度的，我們表示欢迎；采取怀疑态度的，我們进行教育并且表示等待；采取反抗态度的，我們进行必要的斗爭，而目的还是为了改造他們。这种分别对待的政策，也都是重要的实际的教育。此外，我們还采取了在資本家中举行講演会，座談会，开办学习班，組織資本家和他們的家屬进行学习，以及引导資本家內部进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等等方法，向他們进行教育，解决他們的

思想問題。我們这些教育的目的，是要提高他們中間原来的进步分子，即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使中間分子和落后分子逐步地改变态度向进步分子看齐，分化頑固分子。一句話，团結多数，削弱反抗，以利于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对于資本主义工商业所实行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及根据这个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驟，并不是憑主观願望任意决定的，而是研究了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条件，針对国計民生的迫切需要而确定的。这个政策和这些步驟，不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且資本家也找不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絕或者反对。現在已經可以断定，除开个别的頑固分子还想反抗以外，在經济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逐步轉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是絕大多数民族資产阶級分子能够作到的。

在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們的工作并不是沒有缺点和錯誤的，我們的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在政策的执行中也出現过局部的偏差。但是，改变生产資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現在在我国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誰战胜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决了。

这不是說，我們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任务已經全部完成。在我們的面前还摆着許多迫切的重大的問題。什么是我們今后的任务呢？

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我們需要繼續按照自願和互利的政策，爭取还沒有加入合作社的少数农戶入社，并且領导那些初級合作社轉为高級合作社。但是我們要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不允許有任何的强迫命令。目前最急需解决的問題是必須保証現有的一百万个左右合作社尽可能增加生产和增加社員收入。有一部分合作社的成立是比較急促的，还需要迅速处理許多遺留問題，或者还需要調整現有的組織形式。多数合作社还缺少領导几十戶、几百戶农民进行集体生产的經驗，党必須帮助合作社的干部尽可能迅速地取得这种經驗。許多合作社过分地强調集体利益和集体經营，錯誤地忽視了社員个人利益、

个人自由和家庭副业，这种錯誤必須迅速地糾正。为了有效地發揚社員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合作社的組織，必須坚持勤儉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針，并且不断地加强对社員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不久以前的个体农民，現在变成了合作社的社員，这是几亿农民生活史上的一个絕大的变化。合作社的干部必須充分認識这个变化，謹慎地担負起社員群众所委托給他們的重大領导职务，全心全意地为社員的利益服务。他們应当了解：只有使社員感覚到自己确实是合作社的主人翁，而且使社員的收入能够每年有所增加，这样的合作社才能够巩固。

在手工业和其他原来的个体經济的改造工作方面，必須根据各行各业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分别地解决各种合作組織在發展中的具体問題。在这里，不顧具体情况，采取千篇一律的形式，是錯誤的。一部分的合作組織在适当的条件下，將要發展成为国营企业或者并入国营企业；一部分的合作組織將在長时期內保持生产資料的集体所有制；而另一部分的合作組織，則將在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下保持各負盈亏的經营方式。各种合作組織都必須注意保持和發展原来的个体經济在生产上和經营上的优良傳統。合作化以后，手工业产品的質量必須不降低而要提高，品种必須不減少而要增多。

在資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方面，同样地应当按照各行各业的特点和社会經济的多方面的需要，分别地解决它們發展中的具体問題，而不要輕率地作千篇一律的处理，以免造成損失。对于企业中的职工，应当繼續进行有系統的教育工作和組織工作，使他們充分了解并执行自己在企业改造方面、生产方面和团結教育資方人員方面的任务，并且选拔职工中間的优秀分子参加企业的管理工作。对于資方人員，应当进行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安排，建立公私双方人員共同工作的良好关系，并且繼續加强对于他們的政治教育。資方人員很多是富有管理經驗和技术知識的，他們了解消費者的具体需要，熟悉市場情况，善于精打細算。因此，我們的工作人員除开向他們进行教育以外，还必須認眞地向他們学习，把他們的有益的經驗和知識当作

一份社会遺产繼承下来。資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目前还只达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我們必須准备在將来的适当时机，把这些企业变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

只有在完成以上所說的各方面的任务以后，我們才徹底地解决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問題。我們相信，我們党一定能够繼續同全国人民一起，在不長的时間內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得到最有利的發展条件。

……

四　国家的政治生活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权問題。我們为什么能够在仅仅七年的时間內根本改变我們祖国的面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方面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这难道不是因为我們領导工人阶級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了全国的政权的原故嗎？这难道不是因为我們的政权是一种完全新式的政权——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权的原故嗎？

为了大大地發展我国的已經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設，并且徹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們必須繼續加强人民民主專政，繼續改进国家工作。

我們所建立的国家，同一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有效率、最巩固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几亿被侮辱被損害的飢寒交迫的奴隶升到了主人翁的地位，使他們的生活和自由得到保障，使劳动得到光荣，使妇女得到平等的地位。大批优秀的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参加了国家管理工作，把我們的国家机关建設成为勤勉的、廉潔的、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我們的国家实現了空前未有的統一。由于民主改革的徹底完成和鎮压反革命的胜利，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發展，还由于人民政府的其他一系列的措施，在我們的社会上出現了空前未有的安定。

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实質都是阶級的專政，問題只是什么阶級对

什么阶級專政。一切地主阶級、資产阶級的国家都是少数人統治多数人、剝削者統治劳动人民的工具。俄国十月革命的偉大功績，就是它首先把这种情况顚倒过来，使国家成为多数人統治少数人、劳动人民統治剝削者的工具。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許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就是以工人阶級为首的人民大众对于反动阶級、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剝削者的專政。我們的民主不是屬于少数人的，而是屬于絕大多数人的，是屬于工人、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爱国的人民的。

我国的人民民主專政經历了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兩个时期。当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在革命根据地已經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这种專政是解决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任务的，因为它只是实行了对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改变民族資产阶級的生产資料所有制，也不改变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專政开始担負由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說，要把資产阶級和小生产者的生产資料的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徹底消灭人剝削人的制度。这样的政权实質上只能是無产阶級專政。只有無产阶級經过自己的先鋒队中国共产党，毫無阻碍地运用政权这个武器，把全体劳动人民和其他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力量紧密地团結在自己的周圍，共同执行無产阶級的政策路綫，一方面，組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經济文化生活，另一方面，鎮压反动阶級和反动派的反抗，防御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才能够实現这样严重复杂的任务。

事情很明显：如果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阶段，我国的农民和民族資产阶級离开了無产阶級的領导尚且不能够取得胜利，那末，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除开無产阶級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力量能够負起这种領导責任呢？要是沒有無产阶級的坚定的、有远見的和大公無私的領导，就是貧苦的农民也不可能走上眞正社会主义的道路，更不必說本性同社会主义完全相反的資产阶級了。我国資产阶級能够

鑼鼓喧天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奇迹正是說明了無产阶級的正确領导的偉大力量，正是說明了無产阶級專政的絕对必要。

人們会問：既然我国現阶段的人民民主專政实質上是無产阶級專政的一种形式，那末，为什么又有其他阶級、其他党派和無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权呢？我国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为什么还要繼續存在呢？

要知道：無产阶級專政不但需要無产阶級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領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無产阶級只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結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級的專政，才能实現社会主义，这难道不是異常清楚的道理嗎？列宁說："無产阶級專政，是無产阶級，即劳动者先鋒队与人数众多的非無产者劳动阶層（小資产阶級，小业主，农民，知識界等等），或与大多数劳动者建立的特式阶級联盟，……是为最終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列宁所說的阶級联盟的范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不一样的，但是，無产阶級專政总是一定形式的阶級联盟，这一点是無可怀疑的。

工农联盟是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基础。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离开了同农民的联盟就談不到实現社会主义。我們党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已經同农民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無論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經济文化事业的領导中，在税收政策、粮食政策、物价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我們都注意了繼續加强这种联系。农民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占着应有的重要地位。在全国广大农村的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几乎全部是农民。但是应当說，在我們的工作中，对于农民的具体利益重視不够的缺点还是不少的。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工农联盟进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但是在同时，由于許多党組織和国家机关过高地估計目前农业合作社的經济能力和濫用合作化所产生的"便利"，在农村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傾向又有了新的發展。为了繼續巩固工农联盟，我們必須坚决克服这些缺点。

对于农民的政策，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新近参加了各种合作組織的手工业者、小商小販和其他个体劳动者。他們在我国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層。由于他們的居住和經济活动都比較分散，我們过去在他們中間的工作比較薄弱。現在他們組織起来了，他們需要解决許多迫切的問題。我們必須采取有效的办法加强同他們的联系，使他們的經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得到应有的重視。

在我国的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民主統一战綫中，民族資产阶級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在抗日战爭期間，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已經吸收民族資产阶級的某些代表人物参加。但是那是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阶段，因而是比較容易了解的。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資产阶級和它的党派有更多的代表人物参加了我国的無产阶級專政性質的国家机关，并且同工人阶級和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繼續保持政治上的联盟。这是为什么呢？这种联盟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取得基本胜利的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难道不是一种負担嗎？

誠然，我国的民族資产阶級，包括大中小資本家和資产阶級的知識分子在內，是我国社会上除开官僚資产阶級以外人数最少的一个阶級，并且在政治上和經济上都有很大的軟弱性。但是不論在过去和現在，这个阶級在我国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在一方面，这是因为他們在历史上發展了近代工业，領导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具体条件下，采取了接受工人阶級和共产党領导的态度，接着又逐步地采取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在另一方面，这是因为他們比較早地掌握了現代的文化，并且掌握了一些現代企业的技术知識和管理知識；直到現在，他們仍然是我国具有比較丰富的現代文化知識、拥有比較多的知識分子和專家的一个阶級。在过去几年內，民族資产阶級参加了国民經济的恢复工作，还参加了或者支持了土地改革、鎮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的斗爭，从而使我們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并且增强了革命的力量。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人阶級同民族資产阶級的联盟，对于教育和改造資产阶級分子起了积极的

作用；在今后，我們还可以通过这种联盟对他們繼續进行团結、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使他們利用自己的知識来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由此可見，把这种联盟看作一种徒然的負担，是錯誤的。

民族資产阶級的大多数人，近年来正在經历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刻变化。我們的任务是要繼續和改进同他們的合作关系，使他們有充分的机会發揮能力和專長，并且进行进一步的自我改造。同过去一样，这种合作仍然是有团結又有斗爭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級斗爭仍然繼續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之間的斗爭，还会繼續一个很長的时間。我們进行这种斗爭的主要方法是說服教育的方法，只是对于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敌对态度并且違抗国家法律的个别的人，才必須分别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改造方法。

我国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爭时期形成的，并且同我們党早就發生了合作的关系。它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參加了人民政府，随后又逐步地支持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今后，我們認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資产阶級、上層小資产阶級和它們的知識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資产阶級和上層小資产阶級的成員將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將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由于在这部分劳动者中，資产阶級思想的殘余还会拖得很長，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很長的时間內繼續联系他們，代表他們，并且帮助他們改造。同时，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長期存在，在各党派之間也能够起互相監督的作用。我們的党是一个不为私利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是我們現在还有缺点，將来也一定还有缺点，并且不可能沒有錯誤。我們当然首先要加强党內的自我批評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監督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錯誤；同时，我們也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無党派民主人士的監督和批評中得到帮助。

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無党派民主人士在我們的許多国家机

关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在我們的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还有广大的党外工作人員。这就要求我們的党員必須同党外工作人員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这个問題之所以必須提出，是因为至今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員抱着一种"清一色"的观点，他們不願意党外人士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有事不同党外人士商量，不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这种观点是一种宗派主义观点。共产党員在任何时候在人民中都是少数，因此共产党員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同党外的人合作。党必須教育那些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合作的党員迅速地克服自己的缺点，这是目前巩固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重要任务之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發展，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范圍將愈来愈广泛。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層人士、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其他有各种社会影响的爱国人士，我們都应当繼續坚持同他們的团結。海外各地的爱国华侨也是統一战綫的組成部分，我們必須繼續团結他們。总之，我們的任务就是使一切积极因素都能够动員起来，使他們对于建設社会主义的事业都能貢献一份力量。

由此可見，最广泛的統一战綫和最广泛的爱国主义团結，不但沒有損害我們的無产阶級專政，而且有利于無产阶級專政的巩固和發展。

我們的国家制度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結合。这个制度已經在我国过去几年的历史中表現了它的优越性。这当然不是說，我們的国家工作就是完全健全的了。我們的許多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員在工作中常常脫离我們的国家制度的正确原則，不是發揮了而是妨碍了我們的国家制度的生动力量。当然也不是說，我們的国家制度已經一切都已完备了。它还需要相当的时間使自己逐步地成熟和完善起来。

什么是我們目前改进国家工作的主要任务呢？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新形势，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爭。

在我們的許多国家机关中，存在着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級和群众的意見、对于下級和群众的意見加以压制、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現象。这种脫离群众、脫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国家的民主生活的發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發揮，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我們必須認眞地、有系統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簡它們的組織机構，明确規定每个工作人員的責任，帮助他們改变那种只是忙于开会、签公文而不接近群众、不研究情况和政策的作风，定出中央一級和省、市一級的国家机关各部門負責人經常深入下層、了解下情、檢查工作、傾听意見的具体办法，督促他們严格地加以执行。

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長期的斗爭。但是，我們完全有信心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下逐步消除官僚主义的病害。因为我們的国家同那些少数人压迫絕大多数人的剝削阶級的国家相反，我們的制度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为了同官僚主义作有效的斗爭，我們必須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監督。第一，必須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領导和監督。除了党的各級委員会必須經常檢查各級政府中党組織的工作以外，党委的各个工作部門应当負責建立起对于有关的政府工作部門中党組織和党員的經常的監督。第二，必須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員会对中央一級政府机关的監督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級政府机关的監督。为了这个目的，应当加强人民代表的視察工作，以便广泛地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見，并且加强各級人民代表大会对于政府工作的檢查、批評和討論。第三，必須加强各級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監督和由下而上的監督。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爭中，国家的監察机关应当充分地發揮它的应有作用。第四，必須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級工作人員对于国家机关的監督。必須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評和揭露；凡是对批評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的人，必須受到应得的处分。

目前国家工作中另一个重要問題，是必須适当地調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也是符合于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的要求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实现和巩固国家的統一，我們反对了分散主义，把許多应当由中央管理的事务集中到中央手里，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近几年来中央有些部門把过多的事务抓到自己手里，对地方限制得过多过死，忽視地方的特殊情况和特殊条件，应当同地方商量的事也不同地方商量；有些部門还發出許多形式主义的公文和表格，給地方压力很大。这样，既不利于地方的工作，也分散了中央的精力，發展了官僚主义。不可能設想：在我們这样大的国家中，中央能够把国家的各种事务都包攬起来，而且样样办好。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給地方，是完全必要的。国家的很多工作，例如农业、小型和中型的工业、地方的运輸事业、地方的商业、中小学教育、地方的衛生事业和地方的財政等等，中央只应当提出一般的方針政策和大体的規划，具体工作应当交由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并且应当把中央机关的干部分一部分到地方去工作。省、市、县、乡都应当有一定范圍的行政管理职权。根据这样的方針，現在中央正在同地方共同研究和拟定具体方案，准备逐步地加以实行。这样，既能够發揮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揮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普遍高漲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确地处理少数民族問題，是我們的国家工作中一項重大的任务。我們必須用更大的努力来帮助各少数民族在經济和文化上的进步，使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充分地發揮积极作用。

少数民族的狀况在过去几年中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民族中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在大多数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国內三千五百多万少数民族人口中，已經有二千八百万人口的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另有二百二十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近二百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民主改革，只有三百多万人口的地区还沒有进行民主改革。今后，在尚待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我們仍然必須采取我們所一貫采取的愼重方針，这就是說，一切改革必須由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公众

領袖从容考虑，协商处理，按照各民族自己的意願办事。在改革中应当坚持和平的方式，而不要采取强力斗爭的方式。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層人士，在他們放棄对于劳动人民的剝削和压迫以后，国家要采取适当的办法，使他們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水平不致降低，并且說服人民群众同他們長期合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問題，我們必須長期坚持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决不可以在社会改革中加以干涉；对于宗教职业者的生活困难，应当帮助他們得到适当的解决。

各少数民族要發展成为現代民族，除进行社会改革以外，根本的关鍵是要在他們的地区發展現代工业。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已經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业基地，举办了一些大型的現代工业和运輸业，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还將繼續这样做。这是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都应当为完滿地实現国家的这个計划而共同奋斗。同时，为了滿足少数民族人民的特殊需要，中央各部門和各省、自治区政府，还应当根据客观上可能和經济上合理的原則，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地举办一些地方工业。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無論是中央国营工业或者是地方工业，都必須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形成自己的工人阶級，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干部和企业管理干部。只有这样，少数民族在各方面的发展才能比較快地达到現代的水平。

由于历史形成的現实条件，少数民族中的社会改革和經济文化建設，都需要汉族人民的大力援助。所以，繼續改进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間的关系，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目前，为了改进这种关系，主要的問題是要克服大汉族主义。

几年来，我們有很多的汉族干部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他們的大多数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完成了党給他們的任务，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欢迎。但是也有一部分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和意見，不积极地耐心地帮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而是由自己在那里包办代替。这些缺点和錯誤，同某些同志的思想中存在着輕

視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傾向是有关的。

中国各民族共同地創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今后各民族也一定要共同地建設我們偉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国內各少数民族的發展水平是不一样的，但是絕对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在所有的方面都落后。有一些民族的發展水平同汉族一样或者差不多，还有一些民族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比汉族高，值得汉族人民向他們学习。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長处。認为少数民族一無長处、样样不如汉族的观点，就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观点。

忽視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大汉族主义的一种表現。各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他們居住的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其中許多地方富有各种工业資源。如果認为不要少数民族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参加，單憑汉族人民的努力，就可以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显然是一种錯誤的想法。

所有上述大汉族主义的傾向和观点，都必須切实改正。只有坚决地克服了大汉族主义的任何一种細小的表現，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緒才能順利地克服，国內各兄弟民族才能在我們的人民民主的大家庭里面更加亲密地团結起来。

为了巩固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为了保衛社会主义建設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懲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我們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統地制定比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們国家的法制。

在革命战爭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为了肅清殘余的敌人，鎮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破坏反动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只能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規定一些临时的綱領性的法律。在这个时期，斗爭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統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縛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爭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因此，那些綱領性的法律是适合于当时的需要的。現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經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經建立起来，斗爭的任务已經变为保

护社会生产力的順利發展，因此，斗爭的方法也就必須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須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沒有違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們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須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們的公安机关、檢察机关和法院，必須貫徹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負責和互相制約的制度。

反革命分子是要破坏我們的国家、破坏我們的建設、危害人民的安全的，因此，我們的国家机关必須鎮压和肅清反革命分子。我們在一九五〇年領导了全国范圍的鎮压反革命的斗爭，給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以严重的打击。在一九五五年，我們又在社会上进行了鎮压反革命的斗爭，在全国的机关中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查。这些大規模的群众斗爭，大大地巩固了社会的秩序，加强了国家的安全。

我們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貫地实行徒办和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凡是坦白的、悔过的、立功的，一律給以寬大的处置。大家知道，这个政策已經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徒办和寬大相結合的政策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影响，由于人民群众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的提高，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愈来愈感到困难，因而在反革命分子中發生了激烈的分化，成批的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投案自首。这个事实說明，一方面，反革命分子确是存在着，認为可以放松警惕性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另一方面，只要我們的政策正确，反革命分子是可以肅清的，認为反革命活动会愈来愈严重的想法也是沒有根据的。

在今后，我們的公安机关、檢察机关和法院仍然必須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进行坚决的斗爭。但是如上所說，这一斗爭必須严格地遵守法制，并且应当根据目前的新情况，进一步实行寬大政策。党中央委員会認为，除极少数的罪犯由于罪大惡极，造成人民的公憤，不能不处死刑以外，对于其余一切罪犯都应当不处死刑，并且

应当在他們服徒刑的期間給以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凡屬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这样，我們就可以逐步地达到完全廢除死刑的目的，而这是有利于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的。

为了保衛我們的祖国，我們还必須繼續加强我們的国防，繼續加强我們的国防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軍。人民解放軍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战斗力，警惕地守衛我們的边境和海岸綫，保衛我国領土的完整。

我們祖国的領土台灣还被美帝国主义所霸占，这是对于我国安全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解放台灣的問題完全是我国的內政問題。我們願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台灣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解放台灣的正义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九月單行本第五至二一、四〇至五三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刘　少　奇

（閱讀第一部分）

（見本書第四四三至四五三頁）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摘錄)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上的报告)

刘 少 奇

二、关于宪法草案基本內容的若干說明

第二、关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步驟問題

宪法草案第四条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証逐步消灭剝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为了貫徹第四条規定的方針,宪法草案在总綱的其他一些条文中又作了許多規定。这些規定既表明了建設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总目标,也表明了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步驟。

我国在过渡时期还有多种經济成份。就目前来說,我国的生产資料所有制,主要的有: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資本家所有制。国家的任务是尽力巩固和發展前兩种所有制的經济成份,即社会主义的經济成份,并对后兩种所有制的經济成份,即非社会主义的經济成份,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以国家要"保証优先發展国营經济",特别要注意逐步建立社会主义主要經济基础的重工业,要"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經济的發展",要鼓励和指导資本主义工商业"轉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資本主义經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

宪法草案的这些規定，当然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經济关系的变化和广大群众的經驗为根据的，因此都是行得通的。关于这些規定，我想說一說以下几个問題。

首先，是关于过渡形式的問題。我們知道，实現对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种很艰巨的任务。我們决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这种改造。我們必須根据群众的經驗和覺悟程度，根据实际的可能性，逐步前进。我們的經驗已經証明，不論在农业、手工业或者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都可以有过渡的形式，而采用灵活的多样的过渡形式又是完全必要的。

在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主要的过渡形式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如像几年来我国农村中已經开始發展起来的，以土地入股和統一經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我們逐步地和广泛地运用这种半社会主义性質的合作經济的过渡形式，就可以引导广大的个体劳动者比較順利地走向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

在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过渡形式是国家資本主义。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我們可能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資本主义逐步实現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以工人阶級为領导的国家管理下的国家資本主义，同資产阶級統治下的国家資本主义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这就是列宁所說的"我們能够加以限制，我們能够規定它的界限的一种資本主义"。在国家資本主义經济中，一方面，資本家的所有制还沒有廢除，資本家还是有利可得，另一方面，資本家已經不能为所欲为地唯利是圖。經过国家資本主义这种过渡形式，就可以为將来用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造成有利的条件。

宪法草案把这些过渡形式明确地規定下来，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我要說一下通过和平道路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問題。在人民的討論中有不少的人問：为什么宪法草案序言中說我国的人

民民主制度能够保証我国通过和平的道路来消灭剝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呢？

在我国，封建主义的剝削制度，除少数地方外，已經在革命战爭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完全消灭了。为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还要消灭資本主义的剝削制度。这是进一步的社会变革。在資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級和其他劳动群众要实行这种社会变革，必須經过推翻資产阶級專政的国家制度的革命。但是，我国現在的政治經济狀况是同資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我国已經建立了工人阶級領导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我国已經有了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經济，这种国营經济已經成为整个国民經济的領导力量，而資本主义經济在我国已經不占統治地位。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同資本主义国家不相同。我們可以依靠現在这样的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来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如前面所說，在我們国家内，工人阶級同民族資产阶級存在着联盟的关系，因此，在我国消灭資本主义的剝削制度，也可以不采取像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实現土地改革那样的方式，即在一个短时間内發动一次广大的群众运动，一下子就把封建的土地制度消灭了。国家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將經过一个相当長的时間，并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資本主义来逐步实現。我們將讓資本家們有一个必要的时間在国家和工人阶級的領导下逐步接受改造。当然，斗爭是一定会有的，現在有，將来还会有。現在就有一部分資本家进行各种違法活动，有一些人并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抵抗态度。所以宪法草案規定："国家禁止資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經济秩序、破坏国家經济計划的一切非法行为。"那种認为我国已經沒有阶級斗爭了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对于那些違法和进行破坏活动的資本家，是应当加以处罰的。由限制資本主义剝削到消灭資本主义剝削，不可能設想沒有复杂的斗爭，但是可以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經济的領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用和平的斗爭方式来达到目的。資本家只要明白了大势所趋，願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違法，不破坏人民的財产，那末，他將得到国

家的照顧，將来的生活和工作將得到适当的安排，他的政治权利也不会被剝夺。这同我們对待封建地主阶級的政策是大有区别的。所有这些，即工人阶級的国家領导权和工农的巩固联盟，社会主义經济在国民經济中的領导地位，国内統一战綫的关系，并加上有利的国际条件，就是我国所以能够通过和平道路消灭剝削制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

至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更要充分注意各民族發展的特点。对于这个問題，我在以后还要說到。

其次，关于富农問題。在人民的討論中有不少的人問：宪法草案規定"国家对富农經济采取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应当怎样了解？

大家知道，富农經济是农村中的資本主义經济，富农是农村中最后的一个剝削阶級。在我国，富农經济原来就不發达。在土地改革中，富农出租的那一部分土地已被分配。在土地改革后，由于农村中生产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的發展，由于国家执行了对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統購統銷政策，富农經济已大大地受了限制。农村中虽然又产生了少数新富农，但是一般說来，富农經济不是上升，而是下降的。現在富农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比一般农民占有的土地只多一倍。过去的富农現在多已不雇工人或很少雇工人，放高利貸的减少了，經营商业的也受到了很大限制。所以，在我国，可以用合作化和限制富农經济發展的办法，逐步消灭农村中的資本主义。当然，斗爭是不可避免的，富农的破坏活动是不可忽視的。在許多地方都發現有富农抵抗統購統銷和破坏互助合作的事实。对于有破坏行为的富农分子，必須加以处罰。但是根据我国的整个政治經济情况来看，今后可以不需要發动一次像土地改革那样的特别的运动来消灭富农。將来对于那些已經放棄剝削行为的原来的富农，可以在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經巩固的前提下，根据一定的条件，并在取得农民的允許以后，讓他們分别参加合作社，繼續加以改造。

其次，在人民的討論中还有不少的人問：宪法草案一方面規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資本家生产資料所有权和其他資本所有权，另一

方面又規定，要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这豈不是互相矛盾么？

如果說这里有什么矛盾的話，那末，这正是反映着客观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在我国过渡时期，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資本主义，这兩种所有制的矛盾就是客观存在的矛盾。同时，資本主义工商业在現阶段一方面有它的有利于国計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它的不利于国計民生的作用，这又是資本主义工商业本身客观存在的矛盾。我們解决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的矛盾的政策，就是一方面允許資本家所有制存在，利用資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計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限制資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利于国計民生的作用，采用过渡办法，准备条件，以便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宪法草案所規定的关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具体步驟，就是为了要正确地解决这种矛盾。

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我們認为我們所采取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方針和方法是正确的。这个眞理，还可以从反面，就是从敌人的叫喊中和某些外国資产阶級报紙的評論中得到証实。

帝国主义者和台灣蔣介石卖国集团非常不喜欢我們建設社会主义，他們每天都在攻击我們。这有什么奇怪呢？原来我們是做对了。

有些外国資产阶級报紙失望地發現，在我們的宪法草案中宣布的我国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是的，我們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們是一点疑問也沒有的。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發展規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我們一向認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的眞理。

为了破坏我們的社会主义事业，狡猾的敌人还特别雇用了一些人，如像托洛茨基陈独秀分子，他們裝成“左”的面孔，攻击我們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具体步驟和具体措施。他們說，我們做得“太不徹底”，“太妥协”，“离开了馬克思主义”。他們想用这些胡說混淆人們的視听。他們要我們破裂同民族資产阶級的联盟，立即剝夺民族資产阶級。他們又嫌我們的农业政策“太慢了”，他們要我們破裂同农

民的联盟。这些难道不是完全的胡說嗎？我們如果照这样作，当然只有帝国主义和蔣介石卖国賊最为高兴。

我国人民既有建設社会主义的坚定目标，又有切实可行的具体步驟，这就不能不使我們的敌人大大地不高兴了。敌人最不高兴的事情，就是对我国人民最好的事情，这是用不着說的。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九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三至五八頁）

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決議

（閱讀第四部分）

（見本書第五〇八至五二四頁）

毛泽东論中国革命(摘錄)

(为紀念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而作)

陈 伯 达

二 近代中国是东方許多矛盾的焦点

近百年以来,特别是十九世紀末年以来,在东方,中国曾經是許多矛盾的焦点。

第一,中国曾經是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插手到中国来,并把它当成一塊最大的肥肉去爭夺。

一九一六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書指出:"在世界已分割完結的財政資本时代,爭夺这些半独立国的斗爭,当然是特别的緊張。""帝国主义之瓜分中国,还剛才开始。日美等国間为夺取中国的斗爭,日益緊張起来。"

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曾經指出:"中国是在民族方面稠密的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是全世界上极重要的出售商品和輸出資本的市場。……帝国主义就必須从民族的中国之活的身体上开刀,把它分割成碎片,夺取它整个省份,以保持它們的旧有陣地,或者最低限度維持这些陣地的一部分。……"㊀

由于各帝国主义都以中国为其宰割的对象,所以帝国主义曾經在許多場合形成过統一战綫,用以反对中国的革命(例如:一九〇〇年帝国主义八国联軍进攻北京,屠杀义和团的愛国群众;一九二七年

㊀ 斯大林:"与中国劳动大学学生的談話"。

各帝国主义联合反对中国大革命），或形成了共同宰割中国的局面。可是，又由于帝国主义間各有占取最大利益的壟断野心，所以就形成了它們彼此之間深刻的矛盾，形成了——如毛澤东同志所說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相互間的斗爭"。

这就是說，各帝国主义爭夺中国的矛盾，使它們在中国的陣綫时常是分裂的，而不是統一的。

第二，各帝国主义間的矛盾和斗爭，影响到中国旧統治阶級——封建买办阶級內部的矛盾及其斗爭的复杂化和激化，并演化为軍閥間的不断的战爭。

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二八年說："帝国主义和国內买办豪紳阶級支持着的各派新旧軍閥，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間进行着繼續不断的战爭，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現象产生的原因有兩种，即地方的农业經济（不是統一的資本主义經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㊀

这就是說，中国封建买办阶級分别替不同的帝国主义服务和代表不同的地方封建势力，使它們的統治营壘的內部是分裂的，而不是統一的。

第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深重的灾难。但是，从一八四〇年鴉片战爭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斗爭，总是前仆后繼，此伏彼起，沒有中断过。如說有什么中断的話，也只在一些很短的时間。又因为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在每次斗爭中所动員起来的人們，总是数量很巨大的。

中国人民和每一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都打过仗。中国人民从来沒有向任何反革命王朝屈服过。中国曾經是一个处在長期革命中的国家。

这就是說，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爭中逐步地形成了一

㊀ "中国的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夠存在？"

个极其强大的联合的力量。

由上述种种可知：近代中国表現出是东方矛盾的焦点，主要地說来，其一是各帝国主义相互間激烈爭夺的焦点，又其一是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斗爭的焦点。

显然，只有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才能够解决这些矛盾，而使帝国主义在东方的鎖煉首先在中国被突破。中国人民是有贏得这胜利的力量的。但是中国人民的力量，只有当其在無产阶級的領导之下，才能够組織成为眞正能够贏得胜利的力量。

中国工人阶級形成其特出的战斗性，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它身受几重殘酷的压迫，即外国的帝国主义、本国的封建主义和資本主义的压迫；第二，它是很集中的。中国工业虽然很薄弱，但却很集中，近代产业工人在有五百个工人以上的企业內做工的，占很大的数目；第三，中国近代产业工人虽然在全国人口中占少数，但全国各种的無产者和半無产者，却是一个极巨大的数目。連农村中的半無产者——貧农在內，那末，無产者和半無产者的人口就大大地超过全国人口的半数，他們所受的各种压迫都是极其悲慘的。这些原因，就使得处在革命中的中国工人阶級形成了很强大的战斗力，形成了自己坚强的政党——共产党，并成为中国各革命阶級的領袖。

在这样長期革命的大国中，有这样坚强的革命工人阶級成为极其广大而富有充分战斗性的农民的領袖，成为一切革命力量的領袖；而在国际范圍內，这是正处在無产阶級革命的时代，正处在社会主义已首先在俄国胜利的时代，中国革命有了很好的国际援助；这些就是說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买办阶級的胜利，乃是不可避免的。

一九二七年斯大林指出：

"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爭，一定要采取深刻地人民的和鮮明地民族的性質，一定要一步加深一步，一直到同帝国主义作拚命的决斗，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上的基础本身。"㊀

㊀ 斯大林："与中国劳动大学学生的談話"。

事情的經历就正是如此。

当然，不可能設想：革命在这个曾經成为各帝国主义爭夺焦点和在年代上有很長久的封建制度的大国，是能够輕易取得胜利的。不，这是不可能輕易取得胜利的。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間所写的一篇論文里曾經形容了这种取得胜利的过程："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积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积几百次大小斗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㊀这就是說：中国革命的进行是极其殘酷、复杂而曲折的。这样，就极大地鍛煉了中国工人阶級和中国人民，极大地鍛煉了中国工人阶級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而这种丰富的革命經驗，也就又变成了中国工人阶級和中国人民非常宝貴的財富；这种丰富的革命經驗，也就不可免地丰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

中国这种丰富的革命經驗，就是集中表現在毛澤东同志的著作上面，集中表現为毛澤东思想。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間曾經对东方共产主义者指出：

"在这里，在你們面前擺着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从前在全世界共产党員面前是沒有提出过的，这个任务就是：依靠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論与实踐，你們在应用于欧洲各国所沒有的独特条件时，須要善于把这个理論和实踐应用于这样的条件，即农民是主要群众，所要解决的斗爭任务不是反对資本，而是反对中世紀的殘余。"

"你們应当找出全世界先进無产者与往往生活在中世紀条件下的东方劳动的和被剝削的群众底这种联系之独特形式。"

列宁下面又繼續指出：

"任务就在于喚醒劳动群众求取独立和組織的革命积极性，不論他們是处在那种水平上，就在于把較为先进的国家底共产党員所享用的眞正共产主义学說譯成每种人民的語言，就在于实現那些应当立刻实現的实际任务、并且在总的斗爭中与其他各国無产者打成一

㊀ "丢掉幻想，准备斗爭"。

片。

这就是你們在任何一册共产主义書本中都找不到解决然而在俄国已經开始的总的斗爭中可以找到解决的一些任务。你們必須提出任务，并用独立的經驗加以解决。"㊀

大家知道：列宁和斯大林，在他們一系列的著作中，业已在基本原則上，解决了列宁在这里所提出的任务，而斯大林在中国問題上并作了特出的理論貢献。

中国共产党領袖毛澤东同志的任务是繼續列宁斯大林的工作，不断地考察中国的經驗，把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論和实踐跟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踐融会貫通起来，把先进国家的共产党員所用的眞正共产主义学說譯成中国人民的語言，根据中国的条件补充了它，轉化为中国革命的理論与实踐，激發起几万万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总斗爭汇合起来，和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各国的工人阶級及先进的人們，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結果就在中国偉大的土地上埋葬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統治。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二版單行本第四至九頁）

㊀ 列宁："在东方各民族共产主义組織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論一般和特殊

……一說到生产，总是指一定社会發展阶段上的生产，——指社会中的个人的生产。因而，看起来似乎是，只要一般說到生产，我們或者就要从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来观察历史發展过程，或者事先就要声明，我們指的是一个一定的历史时代，譬如，指的是現代的資本主义生产，这事实上是我們的本題。可是，生产的所有各时代共同地具有某些特征、某些共同的規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在它眞正把共同之点提出来、固定下来、因而省得我們重复的限度以內，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通过比較而区别出来的共同之点，本身是分为許多構成部分而以各种不同規定互相分别的东西。其中有的屬于一切时代　另外一些只屬于几个时代。〔某些〕規定是最近时代和最古时代所共同的。如果沒有它們，任何生产都無从設想。可是，虽然高度發达的語言也有一些法則与規定同于很不發达的語言　但構成語言的發展的，正是不同于这一般与共同之点的差别。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这里已經有了統一，而我們之所以要把对一般生产适用的种种規定区别开来，正是为了(damit㊀) 不致于因为統一而忘記了本質的差别。而忘記这种差别，正是——譬如說——想証明現存社会关系之永存与和諧的現代經济学家們的全部智慧所在。例如他們說，如果沒有一种生产工具，哪怕这种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如果沒有积累下来的过去的劳动，哪怕这

㊀ 手稿作 um.——德文本編者注

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与集中在野蛮人手中的熟練，任何生产也都不可能。資本，别的不說，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因此，資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就是說，如果我恰好抛开了使"生产工具"、"积累下来的劳动"成其为資本的那个特殊的話。……

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导言"（一八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政治經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四八至一四九頁

……政治經济学在本質上說来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資料是历史性的即經常变化的；它首先研究在生产和交換的發展上每一个别阶段的特殊規律，只在这样研究的結末，它才能确立极少的非常一般的、可以用于一般的生产和交換的那种規律，这上面不言而喻，对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換形式适用的規律，同样也适用于具有同样的生产方式和交換形式的所有历史时期，例如随着金屬貨幣的采用，一系列的規律發生了作用，这些規律对于所有采用金屬貨幣来进行交換的历史时期和国度都是适用的。

恩格斯："反杜林論"（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五〇至一五一頁

……事实上，一切眞实的、詳尽無遺的認識完全在于我們在思維中能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提高到特殊、然后再从特殊提高到一般；完全在于能从有限中找到無限，从暫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然而一般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無限的形式；它是把許許多多有限的东西綜合为無限的东西。我們知道：氯和氫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之下受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气体氯化氫；只要我們知道了这一点，我們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了上述的条件，随时随地都可以發生这件事情，至于是否只發生过一次或者重复了千百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發生过，这都是完全無关紧要的。……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九五頁

一般辯証法（因为資产阶級社会的辯証法在馬克思看来只是辯証法的局部情况）的闡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从最簡單的、最普通的、最常見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題开始，如树叶是綠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同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經有辯証法：个别就是一般（参看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施維格勒譯，第二卷第四〇頁，第三篇第四章第八至九节：《因为当然不能設想：在看得見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这就是說，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論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列入一般之中等等。任何个别經过千万次的轉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現象、过程）相联系。諸如此类等等。在这里已經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等的因素、萌芽、概念了。这里已經有偶然和必然、現象和本質，因为当我們說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我們就把許多特征作为偶然的东西抛掉，把本質和現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

列　宁：“談談辯証法問題”（一九一五年或一九一六年），“哲学笔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三六三頁

……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像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則应用到各阶級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發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們应該善于研究、探求和猜透这种特点。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〇年四月至六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七一頁

……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它的經济發展中，不仅服从自己特有的經济法則，而且还服从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經济法則，例如，在單一的社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統一的法則，在一切社会

形态發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間的关系法則。所以，各个社会形态不仅以自己特有的法則互相分开着，而且以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經济法則互相联系着。

斯大林："关于Л·Д·雅罗申柯同志的錯誤"(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六四頁

第四部分

关于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列宁、斯大林論抓住历史鏈条的中心环节

……全部政治生活都是由茫無終极的一串連环組成的一条茫無終极的鏈条。政治家底全部艺术也就在他能找到并紧紧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脫去，目前最关重要，且最能保障握住它的人去握住整个鏈条的那个环节。……

列　宁："做什么？"（一九〇二年），"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三二〇至三二一頁

仅仅一般地做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还是不够的。必須善于在每个时机里找出鏈条上的一个特别环节，这个环节是为了把握住整个鏈条并稳稳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所必須用全力抓住的；同时，在事变發展的历史鏈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們的形式，它們的关連，它們彼此間的区别，都不像鉄匠所制成的普通鏈条那样簡單，那样笨拙。

列　宁："苏維埃政权底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四〇三頁

我国革命充分完成了的只是資产阶級民主的工作。我們完全有权以此自豪。在我国革命中，無产阶級的或社会主义的工作，可以归納为三个主要方面：（1）用革命手段摆脫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揭露并

阻止資本主义强盜兩大世界集团的屠杀；在我們方面，这一点已經完全作到了；但是只有靠几个先进国家的革命才能在各方面都作到这一点。（2）建立苏維埃制度作为实現無产阶級專政的形式。世界的轉变已經完成。資产阶級民主的議会制度的时代已經終結。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即無产阶級專政的时代已經开始。不过还要由許多国家来改善和完成苏維埃制度和無产阶級專政的各种形式。在这方面，我們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沒有作。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是不可饒恕的。我們还要不止一次地把我們的工作作完，改作和从头作起。今后在發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們每前进和提高一步，都必定同时改善和改造我們的苏維埃制度；而我們在經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有待于改造的东西还很多，如果因此而"惶惑"起来，那就荒謬絕頂了（甚至比荒謬更坏）。（3）建設社会主义制度的經济基础。在这方面，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还沒有完成。而这是我們最确定不移的工作，無論从原則和实踐来看，或者从現在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国际方面来看，都是最确定不移的工作。

既然在自己的基础上还沒有完成最主要的工作，那就应該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这上面。这里的困难就在于过渡形式。

我在一九一八年四月"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仅仅一般地作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須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鏈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須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鏈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事变發展的历史鏈条里，各个环节的順序，它們的形式，它們的关联，它們彼此間的区别，都不像鉄匠所作的普通鏈条那样簡單，那样笨拙。"

在我們所談的当前工作中，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調节（指导）下活躍国內商业。在历史事件的鏈条中，即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們無产阶級国家政权、我們居于領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須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們現在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末不久的將来我們就一定能

够掌握整个鏈条。否則我們就抓不住整个鏈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經济关系的基础。

列　宁："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八八至九〇頁

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錯綜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鏈子。你要抓住整条鏈子，就必須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挑选那个你自己想抓的环节。一九一七年的关鍵是什么呢？是摆脫战爭，这是全体人民的要求，因而也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革命的俄国終于摆脫了战爭。虽然費了很大的力气，但是总算照顧了人民的基本要求，从而保証了我們多年的胜利。人民覚得，农民看見，从前綫回来的每个兵士都清楚地知道，苏維埃政权是他們所获得的比較民主、比較接近劳动群众的政权。尽管在其他方面我們作了多少愚蠢荒唐的事情，但是，我們照顧了这个主要的任务，这就是說，一切都是正确的。

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的关鍵是什么呢？是抗战。当时称霸全世界的协約国进攻我們，企圖扼杀我們；因此用不着进行宣傳，任何一个非党的农民都懂得發生了什么事情。地主要来了，共产党能同地主作斗爭。因此广大农民拥护共产党，因此我們获得了胜利。

一九二一年的关鍵是实行有秩序的退却。所以必須有十分严格的紀律。"工人反对派"說："你們低估了工人，工人应当發揮更大的主动性。"然而，主动性应当表現在有秩序地退却和严格地遵守紀律上面。只要有人稍微有点惊惶失措或破坏紀律，就会断送革命，因为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讓那些已經慣于进攻、浸透革命观点和理想、認为一切退却都是卑劣行为的人們实行退却。最大的危險就是破坏紀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維持秩序。

目前的关鍵是什么呢？目前的关鍵，也是我想把它作为这次报告的結論和总結的关鍵，并不在于政策方針的改变；新經济政策实行以后，人們关于这一点已經談得太多了。可是談的都是廢話，是

最有害的空談。新經济政策实行后，我們有人开始忙乱起来，改造旧机关，建立新机关，其实这是最有害的。我們得出結論，目前的关鍵在于人，在于挑选人材。一个慣于反对瑣碎事情、反对办事文明，慣于拿个人作用来代替改造机关的革命家，是难于領会这一点的。对于我們現在的情况，应当在政治上冷靜地估計一下，我們跑得太远，以致不能而且也不必保持全部陣地了。

列　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員会的政治报告”(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六七至二六八頁

……要在每个一定的时机找出事变过程鏈条上的特殊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就能掌握整个鏈条，为取得战略胜利准备条件。

問題是要从摆在党面前的許多任务中挑出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中心，实現这个任务就能保証順利地解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我們可以用兩个例子来說明这个原理的意义，一个例子可以引自很久以前的时期(党形成时期)，另一个例子可以引自我們最接近的目前时期(新經济政策时期)。

在党形成的时期，無数的小組和組織还沒有彼此联系起来，手工业方式和小組习气从上到下腐蝕着党，思想上的混乱是党內生活的特征，——在这个时期，整个煉条中的基本环节和摆在党面前的各項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創办全俄的秘密报紙（“火星报”）。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全俄的秘密报紙才能形成党內意見一致的核心，才能把無数的小組和組織联結成一个整体，准备思想統一和策略統一的条件，从而为眞正的党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由战爭过渡到經济建設的时期，工业遭到破坏的毒手而奄奄一息，农业苦于工业品的不足，国营工业和农民經济的結合已經成为順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条件，——在这个时期，事变过程鏈条中的基本环节，許多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發展商业。为什么呢？

因为在新經济政策的条件下，工业和农民經济只有通过商业才能結合；因为在新經济政策的条件下，有生产而沒有銷路就是致工业于死命；因为只有通过發展商业去扩大銷路，才能扩展工业；因为只有在商业方面巩固了，只有掌握了商业，只有掌握了这个环节，才能指望把工业和农民市場結合起来并順利地解决其他的当前任务，以便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創造条件。

斯大林："論列宁主义基础"（一九二四年四月至五月），"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四三至一四四頁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毛 泽 东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們的行动問題上，我們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認識。他們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們不贊成爭取江西的計划，而只贊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間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沒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紅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沒有用这种紅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們似乎認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爭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圍的大革命。他們这种全国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論，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們的这种理論的来源，主要是沒有把中国是一个許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爭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認清楚。如果認清了中国是一个許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爭夺的半殖民地，則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統治阶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一个統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問題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現在这样的全国規模的發

---

*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內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

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統治阶級內部長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击队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随着紅軍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長于四圍白色政权中的小塊紅色区域的存在和發展（中国以外無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紅軍、游击队和紅色区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無产阶級領导之下的农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單純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澤东式、方志敏㊀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划地建設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裝的路綫是經由乡赤衛队、区赤衛大队、县赤衛总队、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須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須这样，才能給反动統治阶級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这样，才能眞正地創造紅軍，成为將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須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們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㊁，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發。其結果，無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結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認識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現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經济組織之上的反动統治阶級的一切組織（政权、武裝、

㊀ 方志敏同志，江西弋阳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員会委員，是江西东北部紅色区域和紅軍第十軍的創造者。一九三四年他帶領紅軍抗日先遣队北上。一九三五年一月，在与国民党反革命軍队作战中被捕。同年七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㊁ 毛澤东同志这里所說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組織的革命力量。

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釋現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現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許要强些，但因为它們的反动統治阶級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統治阶級的力量更要强大許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發革命。現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現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这样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質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說，現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备了發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經得了充分的証明。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实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导，一进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实質，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現象，要去看它的实質。当湘贛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眞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級敌人看得一錢不值；到現在还傳为笑談的所謂"十分动摇"、"恐慌万狀"兩句話，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統治者魯滌平㊀的形容詞。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蔣桂战爭㊁尚未爆發之前）約四个月期間內，敌人的第三次"会剿"㊂臨到了井岡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爭已到十分

㊀ 魯滌平，国民党軍閥，一九二八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主席。

㊁ 蔣桂战爭，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間，国民党南京軍閥蔣介石和广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之間的战爭。

㊂ 指一九二八年末至一九二九年初湖南和江西的国民党軍閥对紅軍根据地井岡山的第三次进犯。

露骨的地步，蔣桂馮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質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紅軍和地方党內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發生了悲观的論調。中央二月来信㊀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內悲观分析的証据。

（四）現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給只观察当前表面現象不观察实質的同志們以迷惑。特别是我們在紅軍中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覚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屬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拋棄实質的观察，是因为他們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質并沒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問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眞正向前發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間、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間、帝国主义和它們本国的無产阶級之間的矛盾是發展了，帝国主义爭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爭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間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內發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統治者之間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就日益發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战而来的，是賦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負担賦税者和反动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讓步的事实，这就發展了中国資产阶級和中国工人阶級之間的矛盾，中国資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則給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税加重等項情况，

㊀ “中央二月来信”，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給前敌委員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前敌委員会給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該信的內容，主要地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計和紅軍的行动策略問題。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見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給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便使地主阶級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农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貨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購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税的加重，使得国貨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餉不足的条件之下無限制地增加軍队，并因此而使战爭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經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賦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禍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禍，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無錢开学，許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憂；因为生产落后，許多毕业学生無就业之望。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狀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滿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时局發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嘩变、学生罢課的發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無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話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給中央的信中，就已經有了。那封信上說：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九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岡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革命潮流逐漸升漲。党的战斗力組織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們的。屠杀主义㊀固然是为淵驅魚，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將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爭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㊁所指示的政治路綫和組織路綫是对

㊀ 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㊁ "党的六次大会"，即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指出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敗后，中国的革命性質仍旧是反帝反封建的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并指出新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来，所以当时的革命总路綫是爭取群众。六次大会清算了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

的：革命的現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爭取群众而不是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發展將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傳和准备应該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現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領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無产阶級領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鍵。党的無产阶級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創造，是目前党在組織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爭的發展，小区域紅色政权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爭、促进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条件。所以，拋棄城市斗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發展，以为將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員中有这种意見，我們以为也是錯誤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导而失敗，沒有农民斗爭的發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封信对紅軍的行动策略問題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們將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紅軍和發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連或营为單位，單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發动群众，避免目标，我們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計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敗了。因为：(一)主力紅軍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衛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則領导不健全，惡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敗。(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惡劣环境，队伍愈須集中，領导者愈須坚决奋斗，方能团結內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領导者也不如在惡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話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領城鎮。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領了城鎮，才能發动大范圍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塊的政权。这样才能聳动远近的視听(所

右的投降主义，也批判了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在一九二七年底一九二八年初在党內發生的"左"的盲动主义。参看"毛澤东选集"第三卷附录"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决議"第三部分（見本書第四九六至五〇七頁——本書編者注）。

謂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發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們前年干的湘贛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閩西政权㊀，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結果。这是一般的原則。至于說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沒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給中央的信上說了紅軍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們三年来从斗爭中所得的战术，眞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們的战术，群众斗爭的發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說来是：“分兵以發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駐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㊁，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間，很好的方法，發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網，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攏。打开以爭取群众，收攏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謂“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贛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內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三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蓮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贛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閩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則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較健全的領导机关兩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爭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紅軍和地方武裝。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敗，削弱了紅軍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贛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則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兩个条件，那就無疑地应該分兵，因为在这兩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給了四軍党內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謂蔣桂战爭不一定会爆發。

㊀ 一九二九年，紅軍自井岡山东征福建，开闢新的革命根据地，在福建西部的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政权。

㊁ “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紅軍建立比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說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發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紅軍的这一封信，虽然沒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沒有那些悲观的論調了，对于紅軍行动的主張也和我們的主張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給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覚得就在現时仍有对此問題加以解釋的必要。

关于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零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見之于給中央信上的，如下：

“蔣桂部队在九江一帶彼此逼近，大战爆發即在眼前。群众斗爭的恢复，加上反动統治內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們覚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兩省买办地主的軍力太大，湖南則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錯誤，党內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閩贛浙三省則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軍力最弱。浙江只有蔣伯誠㈠的少数省防軍。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㈡已被击破；陳盧㈢兩部均土匪軍，战斗力甚低；陆战队兩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張貞㈣比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張亦只有兩个团战力較强。且福建現在完全是混乱狀态，不統一。江西朱培德㈤、熊式輝㈥兩部共有十六团，比閩浙軍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錯誤比較少。除浙江情况我們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兩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論，贛北之德安、修水、銅鼓尚有相当基础；贛西宁岡、永新、蓮花、遂川，党和赤衛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贛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县的紅軍第二第四团有日益發展之势；方志敏的紅軍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圍的形势。我們建議中央，在国民党軍閥長期战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时

㈠ 蔣伯誠，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的保安司令。

㈡ “郭旅”指福建的国民党軍队郭凱鳴旅。

㈢ “陳盧”即福建的著匪陳国輝和盧兴邦，他們的部队被国民党收編。

㈣ 張貞，国民党軍队的一个师長。

㈤ 朱培德，国民党的軍閥，当时任江西省国民党省政府主席。

㈥ 熊式輝，当时是駐江西的国民党軍队的一个师長。

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計划。”

上面爭取江西的話，不对的是規定一年为期。至于爭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爭取江西的結論。那个建議的缺点就是不該規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謂“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給中央信上所說外，客观条件現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經济主要是封建的經济，商业資产阶級势力較小，而地主的武裝在南方各省中又比那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沒有本省的軍队，向来都是外省軍队来此駐防。外来軍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軍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們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釋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那一省都要普遍，紅軍游击队比那一省都要多了。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这点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發展和变化，只应該也只能說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該也不可能机械地規定时日。但我所說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沒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远看东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嬰兒。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七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一卷排印）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摘錄）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毛　澤　东

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

（一）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級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發展阶段。

（二）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兩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間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間的矛盾。一九三七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資产阶級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造成了工农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尖銳对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不由中国共产党單独負担的局面。

（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㊀以来

---

* 这是毛澤东同志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集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議上的报告。

㊀ “华北事变”，指一九三五年日寇侵略华北和以蔣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华北辱国丧权的一連串事件。是年五月，日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在华北的統治权，六月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欽与日寇华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訂协定，接受了这个要求，是即所謂“何梅协定”。按照这个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十月日寇又在河北省的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据县城。十一月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謂“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冀东汉奸“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員会”以适应日寇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的形势，使这些矛盾發生了如下的变化：

甲、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銳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間，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和世界的和平陣綫相結合的任务。这就是說，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終一貫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現时願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爭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們的統一战綫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乙、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內的阶級关系，使資产阶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党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任务。我們的統一战綫是包括資产阶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国的人們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須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丙、中日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無产阶級、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阶級）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人民更大規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爭。共产党發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裝人民)下和国民党中願意同我們合作抗日的部分訂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战綫的政策。这就是我党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㊀，十二月决議㊁，一九三六年五月

㊀ 这是指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發出的宣言。其要点如下："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禍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無論各党派間在过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队間过去和現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鬩于牆外御其侮'的眞誠覺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內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聖事业而奋斗。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軍队停止进攻紅軍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現在他

放棄"反蔣"口号㈡，八月致国民党書㈢，九月民主共和国决議㈣，十二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

們与紅軍之間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們与紅軍之間在对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願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共产党願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發起人，共产党願意立刻与中国一切願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聞記者联合会、教职員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衛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机关，进行談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問題。談判結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該作为救亡圖存的臨时領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設法召集眞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軍政商学各界，一切願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內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討論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問題。共产党絕对尽力贊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絕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議。""抗日联軍应由一切願意抗日的部队合組而成。在国防政府領导之下，組成統一的抗日联軍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軍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組成，或由其他形式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紅軍絕对首先加入联軍，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为了使国防政府眞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了使抗日联軍眞能担負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号召全体同胞：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貢献專門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員，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

㈡ 这是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会議所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議"。这个决議对于当时中国內外的形势、阶級間的变化和党的政策，作了完整的分析和决定。以下是这个决議的一部分："目前的形势告訴我們，日本帝国主义併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級、阶層、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們之間的相互关係。民族革命战綫与民族反革命战綫是在重新改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綫，是在于發动、团結与組織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賊头子蔣介石。不論什么人，什么派別，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級，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賊蔣介石的，都应該联合起来开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战爭，驅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統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徹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領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战綫（下層的与上層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蔣介石。当然，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級与阶層，不同的武装队伍，他們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們不同的

电㈢等等步驟之所由来。

丁、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圍政策和中国半殖民地經济狀况而来

动机与立場。有的是为了保持他們原有的地位，有的是为了要爭取运动的領导权使运动不至超出他們所容許的范圍之外，有的眞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徹底解放。正因为他們的动机与立場各有不同，有的在斗爭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的，有的会在中途消極或退出战綫的，有的願意奋斗到底的。但是，我們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綫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統一战綫策略的总路綫。只有按照这种路綫，我們才能动員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賊蔣介石。中国工人阶級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資产阶級群众，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資产阶級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賊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資产阶級与軍閥，不管他們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紅色政权，在他們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賊的斗爭获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綫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使他們离开了总的反革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該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爭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綫中来。不但如此，即在地主买办阶級营壘中間，也不是完全統一的，由于中国过去是許多帝国主义互相竞爭的結果，产生了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竞爭的卖国賊集团，他們中間的矛盾与衝突，党亦应使用許多的办法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暫时处于不积極的反对反日战綫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党在發动团結与組織全中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該坚决不动摇地同反日統一战綫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傾向做斗爭。一切破坏中国人民反日运动者，都是汉奸卖国賊，应該群起而攻之。共产党应該以自己徹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賊的言論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綫中的領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領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徹底的胜利。对反日战爭中的广大民众，应該滿足他們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貧民、知識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滿足了他們的要求，才能动員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徹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爭中的領导权。”請参看“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

㈢ 参考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紅軍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議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該电全文如下：“南京国民政府軍事委員会，全体海陆空軍，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

的中国軍閥割据和軍閥內战，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赞助这种割据和內战，以便利其独占中国。若干其他帝国主

报館，一切不願意当亡国奴的同胞們：自从中国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組織中国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鋒軍占領同浦鉄路，积極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蔣介石氏竟以十師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閻錫山氏阻攔紅軍抗日去路，并命令張学良楊虎城兩氏及陕北軍队向陕甘紅色区域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中国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蔣氏攔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一再考虑，認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論胜負屬誰，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損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蔣介石、閻錫山兩氏的部队中，不少願意停止內战、一致抗日的爱国軍人，目前接受兩氏的命令，攔阻紅軍抗日去路，实系違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爭，为了坚决履行我們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內战、一致抗日的主張，为了促进蔣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軍人們的最后覚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許多胜利，仍然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軍、全国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个月內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队伍，实行停战議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閱于牆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圍、首先在陕甘宁停止內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賊，則諸公的統治，必將最后瓦解，必將为全国人民所唾棄所傾复。語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諸公深思熟慮之。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会更号召全国凡屬不願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贊助我們停战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組織停止內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綫，督促并監視这一主張的完全实現。"

㊹ 見"关于蔣介石声明的声明"注七。

㊺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議所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議"和毛澤东同志的"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随后，根据情况的需要，党采取了迫蔣抗日的政策，估計人民共和国这个口号不会为蔣介石集团所接受，于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致国民党信中，改用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接着又在同年九月党中央所作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議"中，对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了具体的說明。兩个口号形式上虽有不同，实質上却是一致的。以下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党中央决議中关于民主共和国問題的兩节："中央認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

义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暫时地贊助中国的統一与和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則以极大的努力反对內战与分裂，爭取和平与統一。

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結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領土完整和預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禍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統一战綫的口号。民主共和国是較之一部分領土上的工农民主專政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專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爭的普遍發动与澈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夠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与組織力量，而且也給中国無产阶級及其首領共产党为着將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爭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極贊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紅色区域即將成为它的一个組成部分，紅色区域人民將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將在紅色区域內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繼續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統一战綫中的政治領导作用，極大地巩固紅色政权与紅軍，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統一战綫力量的言論行动进行坚决的斗爭，我們才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給民主共和国的实現准备前提。沒有艰苦的持久的斗爭，沒有全中国人民的發动与革命的高漲，民主共和国的实現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爭的过程中，应該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綱領开始，一直到中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徹底的完成。"

㈣ 此电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發出，原文如下："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諸先生鑒：西安問題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統一团結御侮之方針得以实現，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鈞一髮之际，本党深望貴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內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論、集会、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会議，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貴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則本党为着表示团結御侮之誠意，願給貴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証：（一）在全国范圍內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裝暴动方針；（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紅軍改名为国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軍事委員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內，实行普选的徹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之共同綱領。"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間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們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間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沒有減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适当地調整国内国际在現时可能和必須調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結抗日的总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統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談判种种方針之所由来。

（四）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时，告一段落。此阶段內的重大事变，是学生界、文化界、輿論界的救亡运动，紅軍的进入西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政策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上海和青島的反日罢工㊀，英国对日政策之趋向比較的强硬㊁，兩广事变㊂，綏远战爭和援綏运动㊃，南京在中日談判中的比較强硬的态度㊄，西安事变，最

㊀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上海的日本紗厂与中国紗厂共二十六厂，四万五千余工人，举行大罢工。十二月，青島各日本紗厂工人，为响应上海工人，也全体罢工。上海工人获得胜利，自十一月起增加工資百分之五，厂方無故不准开除工人，不得打駡工人。青島工人遭受了日本海軍陆战队的鎮压。

㊁ 自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占山海关进入华北以后，特别是自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以后，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华中的利益，直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因此英美就开始改变对于日本的态度，并給蔣介石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影响。当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的时候，英国曾經表示主張拒絕日本关于不利于它在华利益的要求，甚至表示只要蔣介石政府还能繼續統治中国人民，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以便打击日本的侵略政策。

㊂ 广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广东軍閥陈济棠等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間假借"抗日救国"的口号，联合反蔣。同年八月，这个事变被蔣介石用分化利誘等手段所瓦解。

㊃ 一九三六年八月，日伪軍开始侵犯綏远。十一月，駐綏的中国軍队进行抵抗，全国人民进行了援綏运动。

㊄ 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以后，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潮流的压力，和由于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政策比較强硬的影响，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采取了比較强硬的态度。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至十二月的談判中，国民党政府曾用拖延的办法，使談判未获結果而停頓。

后是南京国民党的三中全会㈥。这些事变，統統都是圍繞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圍繞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这个历史要求的。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爭取国內和平，停止国內的武裝冲突，以便团結一致，共同抗日。共产党在此阶段內提出了"停止內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这一号召是基本上实現了，这就構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实际組成上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五)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內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沒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徹底的轉变，沒有具体地解决問題。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內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轉变它过去十年的錯誤政策，这即是由內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轉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政策，这种初步轉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現出来了。今后的要求是国民党政策的徹底轉变。这就需要我們和全国人民更大地發展抗日和民主的运动，进一步地批評、推动和督促国民党，团結国民党內的主張和平、民主、抗日的分子，推动动摇犹豫分子，排除亲日分子，才能达到目的。

(六)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前一阶段和这一阶段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裝抗战的过渡阶段。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爭取和平，則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爭取民主。必須知道，为了建立眞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沒有国內和平固然不行，沒有国內民主也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达到眞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建立。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七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四三至二四七頁)

㈥ 指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所举行的一次会議。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摘錄)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毛 泽 东

第一章 中国社会

第二节 古代的封建社会

中国虽然是一个偉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傳統和优秀遺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从脫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經济、政治、文化的發展，就長期地陷在發展迟緩的狀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

中国封建时代的經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構成的：

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貴族对于从农民剝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換。那时虽有交換的發展，但是在整个經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統治阶級——地主、貴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則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沒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貴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將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給地主、貴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三、不但地主、貴族和皇室依靠剝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級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繳納貢税，并强迫农民从事無償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鎮压农民之用的軍队。

四、保护这种封建剝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級的封建国家。如果說，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統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專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狀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設官职以掌兵、刑、錢、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紳士作为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础。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經济剝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貧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縛于封建制度之下，沒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罵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沒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級这样殘酷的剝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經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級和地主阶級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創造財富和創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級。

地主阶級对于农民的殘酷的經济剝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級的統治。从秦朝的陈胜、吳广、項羽、刘邦㊀起，中經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銅馬㊁和黃巾㊂，隋朝的李

㊀ 这是中国第一次的农民大起义。公元前二〇九年，秦二世元年，陈胜、吳广在往戍地途中的蘄县（今安徽宿县）地方，举領同行戍卒九百人起义，反抗秦朝的暴政，得到了全国的响应。項羽和他的叔父項梁在吳（今江苏吳县）起兵；刘邦在沛（今山东沛县）起兵。項軍消灭了秦軍的主力，刘軍則先占領了关中和秦的首都。此后刘項兩方相爭，項羽敗死，刘邦遂代秦做了皇帝，为汉朝的創始人。

㊁ 西汉末年，到处發生农民騷动和零星的农民起义。公元八年，王莽代汉做皇帝，提出一些改革办法，曾企圖緩和农民的騷动。当时南方大飢，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人王匡、王鳳被飢民推为首領举行起义；后来这支农民軍打到南陽，号称"新市兵"。平林（今湖北隨县东北）人陈牧等千余人起义，号称"平林兵"。赤眉和銅馬也都是王莽时代的农民起义軍，銅馬起义的地点在河北的中部一帶，赤眉起义地点在山东的中部一帶。赤眉的領导人为樊崇，因为参加起义者都用紅色塗眉，所以号称"赤眉軍"，是当时最大的农民起义軍。

㊂ 公元一八四年，东汉灵帝时，張角領导农民起义，軍中都戴黃巾为标志。

密、竇建德㈠，唐朝的王仙芝、黃巢㈡，宋朝的宋江、方腊㈢，元朝的朱元璋㈣，明朝的李自成㈤，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㈥，总計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爭。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見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級斗爭、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爭，才是历史發展的眞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爭的結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沒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沒有新的阶級力量，沒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爭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产阶級和共产党的正确領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敗，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当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規模的农民革命斗爭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經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来。

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發生新的变化。

㈠ 公元七世紀初，即隋朝末年，农民紛紛起义，李密、竇建德都是当时起义的人物。李密在河南，竇建德在河北，他們所領导的起义軍，是当时声势很大的队伍。

㈡ 王仙芝于公元八七四年（唐僖宗年間）在山东地方起义，次年黃巢聚众响应。参看"毛澤东选集"第一卷"关于糾正党内的錯誤思想"注二（見本書第五四一至五四二頁注一——本書編者注）。

㈢ 宋江和方腊是公元十二世紀初宋徽宗宣和年間北方和南方兩个农民起义的有名首領。宋江在平原、山东、河北、河南、江苏接壤地帶，方腊在浙江、安徽一帶。

㈣ 公元一三五一年，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各地人民起义。安徽凤陽人朱元璋投入郭子兴的起义軍；郭死，朱即成为該軍的首領，終于推翻了蒙古皇朝的統治，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㈤ 参看"毛澤东选集"第一卷"关于糾正党内的錯誤思想"注三（見本書第五四二頁注二——本書編者注）。

㈥ 参看"毛澤东选集"第一卷"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三三（見本書第一〇五四頁注三——本書編者注）。

第三节　現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前面已經說明了。那末，中国現在的社会是否还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呢？不是，中国已經变化了。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战爭㊀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裝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現在我們就来說明这种变化的过程。

如第二节所述，中国的封建社会繼續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紀的中叶，由于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內部才發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內的商品經济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国資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义社会。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發展。外国資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經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济的基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則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經济的發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經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給中国資本主义生产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經济的破坏，給資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場，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給資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場。

事实上，由于外国資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經济結構的某些破坏，

㊀ 从十八世紀末期起的几十年中，英国向中国日益加多地輸入鴉片。鴉片的輸入，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民，并把中国的白銀大量地掠夺了去。鴉片貿易遭到中国的反对。一八四〇年英国政府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軍队在林則徐領导之下进行了抵抗的战爭。广州的人民曾自發地組織"平英团"，使英国侵略軍受到很大的打击。一八四二年腐朽的滿清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訂"南京条約"，除規定賠款及割讓香港外，并开放上海、福州、廈門、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輸入中国的英国貨物的稅率由中英双方共同議定。

还在十九世紀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紀末年和二十世紀初年，到了四十年前，中国民族資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發展。到了二十年前，即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爭，暫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紡織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發展。

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發生和發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資产阶級和無产阶級發生和發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資产阶級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無产阶級的前身了。中国的資产阶級和無产阶級，作为兩个特殊的社会阶級来看，它們是新产生的，它們是中国历史上沒有过的阶級。它們从封建社会脫胎而来，構成了新的社会阶級。它們是兩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級，它們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無产阶級的發生和發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發生和發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經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無产阶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国資产阶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可是，上面所述的这一資本主义的發生和發展的新变化，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發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結中国封建勢力压迫中国資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資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国变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这个目的，曾經对中国采用了并且还正在繼續地采用着如同下面所說的一切軍事的、政治的、經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一、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爭，例如一八四〇年的英国鴉片战爭，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軍战爭㊀，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爭㊁，一八

九四年的中日战爭，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軍战爭㈢。用战爭打敗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領了中国周圍的許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搶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領土。例如日本占領了台灣和澎湖列島，"租借"了旅順，英国占領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灣。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賠款。这样，就大大地打击了中国这个龐大的封建帝国。

二、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条約，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約，取得了在中国駐扎海軍和陆軍的权利，取得了領事裁判权㈣，并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圍㈤。

㈠ 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〇年，英法兩国联合对中国發动侵略战爭，美国和帝俄則从旁帮助他們。当时滿清政府正以全力鎮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消極抵抗的政策。英法联軍先后攻陷广州、天津、北京等重要都市，劫掠并焚毀北京圓明园，迫使滿清政府訂立了"天津条約"和"北京条約"。这些条約主要規定將天津、牛庄、登州、台灣、淡水、潮州、瓊州、南京、鎮江、九江、汉口等处开为商埠，外人有在中国内地游历及傳教的特权，有在中国内河航行的特权。外国侵略势力从此更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和深入了内地。

㈡ 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法国侵略者武裝进犯越南、广西、福建、台灣、浙江等地。中国軍队在馮子材、刘永福等率領下，奋起抵抗，并屢获胜利。但腐朽的滿清政府，在战爭胜利之后，反而签訂了屈辱的"天津条約"，承認法国占領越南，并允許其侵略势力伸入华南地区。

㈢ 一九〇〇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鎮压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义和团运动，联合出兵进攻中国，中国人民曾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八国联軍攻陷大沽，占領天津、北京。一九〇一年滿清政府和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訂了"辛丑条約"，主要規定中国賠偿各国軍費銀四亿五千万兩的巨款，各帝国主义有駐兵北京及由北京到天津、山海关一帶地区的非法特权。

㈣ 領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旧中国政府締結的不平等条約中所規定的特权之一，始于一八四三年的中英虎門条約和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約。这个特权，即是：凡在中国享有領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如成为民刑訴訟的被告时，中国法庭無权裁判，只能由各該国的領事裁判。

㈤ 从十九世紀末起，侵略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曾各按照其在中国的經济和軍事的势力而划定中国的某一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圍。例如，当时長江中下游省份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圍，云南兩广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圍，山东被划为德国的势力

三、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約，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許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們直接管理的租界㈥。它們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貿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內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們便能够大量地推銷它們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們的工业品的市場，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四、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經营了許多輕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經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發展。

五、帝国主义列强經过借款給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設銀行，壟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財政。因此，它們就不但在商品竞爭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資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財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六、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貸的剝削網，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級和商业高利貸阶級，以便利其剝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

七、于买办阶級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級变为它們統治中国的支柱。它們“首先和以前的社会制度的統治阶級——封建地主、商业和高利貸資产阶級联合起来，以反对占大多数的人民。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資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剝削形式（特别

范圍，福建被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圍；东三省（包括今辽东、辽西、吉林、黑龙江、松江五省）原划为帝俄的势力范圍，一九〇五年日俄战爭后东三省南部又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圍。

㈥ 帝国主义国家在强制滿清政府承認沿江沿海的某些地方为通商口岸后，并在他們所認为合宜的地方强占一定的地区做为他們的“租界”。在这种所謂“租界”內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統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帝国主义并通过这种“租界”而在政治上和經济上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中国的封建买办阶級的統治。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中，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进行了收回租界的运动，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間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但在蔣介石反革命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的租界又繼續被保留下来。

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則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㊀“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財政軍事的勢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殘余及其全部官僚軍閥上層建筑的力量。”㊁

八、为了造成中国軍閥混战和鎮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供給中国反动政府以大量的軍火和大批的軍事顧問。

九、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們的文化侵略政策。傳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紙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們的知識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十、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經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塊土地淪为日本的殖民地。

上述这些情形，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的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圖画。

由此可以明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發生了資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將这兩个方面的情形綜合起来說，我們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一、封建时代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級对农民的剝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經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二、民族資本主义有了某些發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

㊀ 引自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度革命运动的提綱”。

㊁ 引自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員会第八次全会上的演說“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

中起了頗大的作用；但是，它沒有成为中国社会經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軟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三、皇帝和貴族的專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級的軍閥官僚的統治，接着是地主阶級和大資产阶級联盟的專政。在淪陷区，則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統治。

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縱了中国的財政和經济的命脉，并且操縱了中国的政治和軍事的力量。在淪陷区，則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五、由于中国是在許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統治或半統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長期的不統一狀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經济、政治和文化的發展，表現出极端的不平衡。

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貧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們过着飢寒交迫的和毫無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見的。

这些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

决定这种情况的，主要地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結合的結果。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資产阶級和無产阶級的矛盾，反动統治阶級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爭及其尖鋭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發展的革命运动。偉大的近代和現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發生和發展起来的。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七至六二六頁）

論軍队生产自給，兼論整风和生产兩大运动的重要性*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毛　澤　东

我們的軍队在遭受极端物質困难的目前狀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狀况之下，切不可將一切物質供給責任都由上面領导机关負起来，这样既束縛了下面广大人員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滿足下面的要求。应該說：同志們，大家动手，克服困难吧。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讓下面自力更生，問題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如果上面不去这样作，而把一切事实上担負不起来的担子老是由自己担起来，不敢放手讓下面去做，不去發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虽然上面費尽了气力，結果將是上下交困，在目前条件下永远也不能解决問題。几年来的經驗，已經充分証明了这一点。"統一領导，分散經营"的原則，已被証明是我們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組織一切經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則。

解放区的軍队，已經达到了九十多万。为着打敗日本侵略者，还需要扩大軍队到几个九十万。但是我們还沒有外援。就是假定將来有了外援，生活資料也只能由我們自己来供給，这是一点主观主义也来不得的。在不久的將来，我們需要集中必要的兵团，离开現在分散作战的地区，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不但不能生产自給了，而且需要后方的大量的物質供給；只有被留下来

---

* 这是毛澤东同志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論。

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其数目將还是广大的),还能照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照此看来,我們全軍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訓練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給的任务,难道还有疑問嗎?

軍队的生产自給,在我們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質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形式上,我們違背了分工的原則。但是,在我們的条件下——国家貧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統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惡結果)以及分散的長期的人民游击战爭,我們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大家看,国民党的軍队面黃肌瘦,解放区的軍队身强力壯。大家看,我們自己,在沒有生产自給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經生产自給,何等舒服。現在,讓站在我們面前的兩个部队,例如說兩个連,去选擇兩种办法中的一种:或者由上面全部供給生活資料;或者不給它或少給它,讓它全部、大部、半部或小部地生产自給。那一种結果要好些?那一种它們願意接受些呢?在認眞地試行一年生产自給之后,一定会認为后一种办法結果要好些,願意接受它;一定会認为前一种办法結果要差些,不願意接受它。这是因为后者能使我們部队的一切成員改善生活;而前者,在目前的物質困难条件下,無論怎样由上面供給,也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至于因为我們采用了这种表面上"落后的"、"倒退的"办法,而使我們的軍队克服了生活資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壯,足以減輕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賦稅負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長期战爭,并足以扩大軍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縮小淪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这种历史意义,难道还不偉大嗎?

軍队生产自給,不但改善了生活,減輕了人民負担,并因而能够扩大軍队,而且立即帶来了許多副产物。这些副产物就是:(一)改善官兵关系。官兵一道生产劳动,亲如兄弟了。(二)增强劳动观念。我們現行的,既不是旧式的募兵制,也不是征兵制,而是第三种兵役制——动員制。它比募兵制要好些,它不会造成那样多的二流子;但比征兵制要差些。我們目前的条件,还只許可我們采取动員制,还不能

采取征兵制。动員来的兵要过長期的軍队生活，將減弱他們的劳动觀念，因而也会产生二流子和沾染軍閥軍队中的若干坏习气。生产自給以来，劳动观念加强了，二流子的习气被改造了。(三)增强紀律性。在生产中执行劳动紀律，不但不会減弱战斗紀律和軍人生活紀律，反而会增强它們。(四)改善軍民关系。部队有了家务，侵害老百姓財物的事就少了，或者完全沒有了。在生产中，軍民变工互助，更增强他們之間的友好关系。(五)軍队埋怨政府的事也会少了，軍政关系也好了。(六)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軍队生产了，机关生产更显得必要，更有勁了；全体人民的普遍增产运动，当然也更显得必要，更有勁了。

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兩年先后开始的帶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經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質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兩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們，我們就無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鏈条，而我們的斗爭也就不能繼續前进。

大家明白，我們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党的党員，剩下的不过數万人，而我們現在的党員是一百二十多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資产阶級出身的，他們有很可愛的革命积极性，并願接受馬克思主义的訓練；但是，他們是帶了他們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这种情形，就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党的党員中也是存在着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絕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們还能順利地前进嗎？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們在大量干部中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这个矛盾——党內無产阶級思想和非無产阶級思想（其中有小資产阶級、資产阶級甚至地主阶級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資产阶級的思想）之間的矛盾，即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馬克思主义思想之間的矛盾，我們的党就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空前統一地（不是完全統一地）大踏步地但又是穩步地前进了。在今后，我們党还会、也还应該有更大的發展，而我們是能够在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則下更好地掌握將来的發展了。

另一个环子是生产运动。抗战八年了，我們开头还有飯吃，有衣

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鹽不足，被服不足，經費不足。这是伴随着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敌人大举进攻和国民党政府發动三次大規模反人民斗爭（所謂"反共高潮"）而来的絕大的困难，絕大的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个困难，不解决这个矛盾，不抓住这个环节，我們的抗日斗爭还能前进嗎？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們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会着生产，这样一来，我們又活躍了，我們又生气勃勃了。再有几年，我們將不怕任何敌人，我們將要压倒一切敌人了。

这样看来，整风和生产兩大运动，具有何种历史重要性，是明白無疑的了。

讓我們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兩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項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徹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解放区的領导同志、工作人員、人民群众，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績。特别是那些还沒有学会生产的地区，今年应当更大地努一把力。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五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三卷排印）

在晉綏干部会議上的講話(摘錄)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毛 泽 东

五

全国形势，是同志們所关心的。自从去年党的全国土地会議决定采取新方針，展开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以后，差不多在一切解放区都召开了有关整党和土地改革的大的干部会議，批判了存在于党內的右傾思想，揭發了党內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份不純或者作风不純的严重現象。而在以后，在許多地区，又采取步驟，糾正了或者正在糾正着左的偏向。这样，就使我党在全国的工作，在新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之下，走上了健全發展的軌道。差不多一切人民解放軍，在最近几个月內，都利用了战爭的空隙，实行了大規模的整訓。这种整訓，是完全有領导地和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进行的。由此，激發了广大的指揮員和战斗員群众的革命热情，明确地認識了战爭目的，清除了存在于軍队中的若干不正确的思想上的傾向和不良現象，教育了干部和战士，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这种民主的群众性的新式的整軍运动，今后必須繼續进行。你們可以清楚地看見，我們所实行的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整党、整軍和土地改革工作，我們的敌人国民党是一样也不能实行的。在我們方面，是如此認眞地糾正自己的缺点，把我們的全党全軍团結得差不多像一个人一样，使全党全軍和人民群众密切地結合起来，有效地执行着我党中央所規定的一切政策和策略，胜利地进行着人民的革命战爭。在我們的敌人方面，則一切相反。他們是那样腐化，那样日益增多的無法解决的內部

爭吵，那样被人民唾棄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样多的敗仗，因此他們就是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兩党兩軍互相对比的全部形势。

在这种形势下面，全党同志必須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綫，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綫。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須是無产阶級領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說，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級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領导者，只能和必須由無产阶級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領导者。这就是說，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人們所組成的統一战綫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識分子、自由資产阶級以及从地主阶級分裂出来的开明紳士，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民大众。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及政府，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及代表各民主阶級联合專政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須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現，就是蔣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統治。

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統治的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內容。土地改革的总路綫，是依靠貧农，团結中农，有步驟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剝削制度，發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力量，只能和必須是貧农。这个貧农阶層，和雇农在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土地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滿足貧雇农群众的要求。土地改革必須团結中农，貧雇农必須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結成巩固的統一战綫。不这样做，貧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敗。土地改革的一个任务，是滿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必須容許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較一般貧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我們贊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發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級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絕对平均主义。誰要是提倡絕对平均主义，那就是錯誤的。現在农村中流行的

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質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們必須批判这种思想。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須是地主阶級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剝削制度，不能侵犯自由資产阶級，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經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沒有剝削或者只有輕微剝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剝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級，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須分給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財产，并使他們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經济生活的行列。除了可以和应当徵办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惡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惡霸分子以外，必須实行对一切人的寬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消灭封建剝削制度应当是有步驟的，即是說，有策略的。必須依据环境所許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决定發动斗爭的策略，不要企圖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剝削制度。土地改革的总的打击面，根据中国农村封建剝削制度的实际情况，一般地不能超过农村戶数百分之八左右，人数百分之十左右的数目。而在老的及半老的解放区內，此項数目还要减少。离开实际情况，錯誤地扩大打击面，是危險的。在新区，还必須分地区，分阶段。分地区，是說应当集中力量在那些可以巩固地占領的区域进行适当的合乎当地群众要求的土地改革工作；而在那些暫时尚难巩固地占領的区域，則不要忙于进行土地改革工作，而只做一些可以做的按照当前情况有利于群众的工作，以待情况之变化。分阶段，是說在人民解放軍剛才占領的区域，应当提出和实行中立富农和中小地主的策略，將打击面縮小到只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裝，打击豪紳惡霸分子，集中一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作为新区工作的第一个阶段。然后，依据群众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的被提高了的情况，逐步地發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的阶段。在新区，分浮財和分土地，均必須在环境比較安定和絕大多数群众充分發动之后，否則就是冒險的，靠不住的，有害無益的。在新区，必須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經驗。所謂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就是說必

須分別地主和富农，分別地主的大中小，分別地主富农中的惡霸分子和非惡霸分子，在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制度的大原則下面，不是一律地而是有所分別地决定和实行給予这些不同情况的人們以不同程度的待遇。在我們这样做了的时候，人們就会感覚，我們的工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發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發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在任何地区，一經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須立即提出恢复和發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將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轉移到恢复和發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組織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改良种子，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須放在恢复和發展农业生产及市鎮上的工业生产上面。为了迅速地恢复和發展农业生产及市鎮上的工业生产，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爭中，必須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破坏和浪費，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約。为了發展农业生产，必須劝告农民在自願原則下逐步地組織为現时經济条件所許可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生产的和消費的合作团体。消灭封建制度，發展农业生产，就給發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同志們知道，我党規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綫和总政策，又規定了各項具体的工作路綫和各項具体的政策。但是，許多同志往往記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別的工作路綫和政策，忘記了我党的总路綫和总政策。而如果眞正忘記了我党的总路綫和总政策，我們就將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們执行具体工作路綫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發生左右摇摆，就会遺誤我們的工作。

讓我再說一遍：

“無产阶級領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綫和总政策。

"依靠貧农，团結中农，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灭封建剝削制度，發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綫和总政策。

（摘自解放社一九四九年六月第五版标准本
"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第九〇至九五頁）

毛澤东同志論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

人民日报编輯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怎样認識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的問題，在中国，在世界范圍內，都还是一个大問題，有許多人总是不得解决。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有如夕阳西下，社会主义和为社会主义所支持的民族革命运动，却正如旭日东升。这是我們时代的特点。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他們已經快完蛋了。应当是反动派畏懼革命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畏懼反动派。現在有許多人还看不到这些，他們还有迷信，还有幻想，还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怀着敬畏的心理。他們在这个問題上还是被动的。一切先进的人們，一切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应当在他們中間进行說服工作，使广大人民具备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具备革命的远見性和坚定性，这是加速革命事業胜利發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精神条件。

毛澤东同志經常告訴我們，观察問題要抓住它的本質，不要为表面現象所迷惑。三十多年来，在我国国內阶級斗爭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毛澤东同志总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对于斗爭的形势作出深刻的判断，向人們指出一切反动派必將灭亡，革命事業必將胜利。他用"紙老虎"来說明貌似强大实际虚弱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他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句成語来說明革命事業中一天一天地成長着的新生力量，并且在这种估量之下来布置自己的战略計劃。毛澤东同志的关于革命力量不可战胜、暫时强大的反动力量

必定失敗的思想，武裝了中国共产党人，教育和鼓舞了中國人民，引导我們取得了偉大的胜利。“帝國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毛澤东同志的这个英明論断，早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所証明，它还要为中國和全世界革命事業的胜利發展繼續証明。

最近，“世界知識”杂志編輯部，把毛澤东同志历来關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的文章、講演和談話，輯录在一起發表。这是一件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对于人民反对帝國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斗爭，很有益处。現在，我們把他們輯录的文章，补充了一些有关的重要材料，并且在体例和段落上作了一些調整，發表于此。全篇文章仍然分做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代表腐朽势力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沒有前途，它們一时的猖獗，不过是表示垂死掙扎；第二部分論述帝國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外强中干，革命的人們有理由藐視它們，但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斗爭中間又要重視它們；第三部分論述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东风已經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力量已經超过帝國主义力量。这些文章、講演和談話，虽然多数是發表过的，沒有發表过的只占少数，时間前后相距二十年之久，又是采取集納的形式；但是看起来却使人感覺好像是一篇新的完整的政治論文。其原因是帝國主义及其走狗为一方，各國人民为另一方，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并沒有解决，美帝国主义又特别張牙舞爪，以原子战爭威胁世界和平，被压迫受威胁的人民的心思被这种緊張局势所吸引，迫切地要求解决这个矛盾，故尔使得讀者对毛澤东同志关于論述解决这个矛盾諸多問題中的一个首先和主要的問題，紙老虎还是并非紙老虎的問題，自然感覺兴趣。

一

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論”这部有历史意义的著作中，指出資本主义已經到了腐朽死亡的阶段，共产主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

“共产主义是無产阶級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

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館的东西了。資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館（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館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毛澤东同志又在“新民主主义論”里指出，一切代表腐朽力量的反动派的猖狂，都是表示它們的垂死掙扎：

“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們的最后掙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漸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毛澤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講話里指出，反动派越反动就越接近于灭亡：

“一切反动派的企圖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們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願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則。”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澤东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議上的講話中說：

“社会主义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規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圖阻止历史車輪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將必然取得胜利。‘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話。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們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結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蔣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偉大的俄国革命和偉大的中国

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嗎？”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毛澤东同志在延安宪政促进会发表的題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說中，揭穿了蔣介石的所謂实行宪政的欺騙宣傳，說明反动派所得的結果，“总是和他們的願望相反”：

“天下的頑固分子，他們虽然今天頑固，明天頑固，后天也頑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頑固下去，到了后来，他們就要变了。比方汪精衛，他頑固了許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盤上逞頑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張国焘，他也頑固了許多时候，我們就开了几次斗爭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頑固分子，实际上是頑而不固，頑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認錯了，就变好了。总之頑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頑固派，他們总有一套計划，其計划是如何損人利己以及如何装兩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頑固派，所得的結果，总是和他們的願望相反。他們总是以損人开始，以害己告終。我們曾說張伯倫‘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現在已經应驗了。張伯倫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爭爆发的一天起，張伯倫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張伯倫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現在，这块石头，还是繼續在打張伯倫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凱想打老百姓的脚，結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吳佩孚等等，他們都想鎮压人民，但是結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損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結果都不妙。”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澤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著名的政治报告“論联合政府”。在这个报告的“我們的具体綱領”部分，毛澤东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圖用召开“国民大会”来进行反人民的阴謀活动提出警告，預言实行这个反动方針是“他們准备把一条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是把自己推上絕路。毛澤东同志說：

“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根据这种分裂方針所准备采取的步驟，有把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去的危險。他們准备把一条繩索套在自己

的脖子上，并且讓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繩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們的原意是想把所謂‘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則抵制联合政府，二則維持独裁統治，三則准备內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邏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毛澤东同志在为新华社写的“評赫尔利政策的危險”的評論中，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了中国的內战危机，并且警告美国这种同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將給美国政府和人民帶来“無穷禍害”：

“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蔣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則变成了魔怪；并且他率直地宣称：美国只同蔣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当然这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見，而是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見，但这是錯誤的而且危險的意見。……假如赫尔利政策繼續下去，美国政府便將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糞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經覺醒和正在繼續覺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爭，在將来，妨碍世界和平。……可以确定地說的，就是贊助中国反人民势力和以如此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敌的这个赫尔利式的政策，如果繼續不变的話，那就將給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鈞重負和無穷禍害，这一点，必須使美国人民認識清楚。”

毛澤东同志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閉幕詞“愚公移山”中說：

“美国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說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圖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終究不会变为主流。”

反动派一定要倒台，革命一定要胜利。毛澤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閉幕詞里，号召人民要建立起革命必胜的信心。他引用“愚公移山”这个中国古代的寓言，說明只要革命的人們

有了信心，不畏惧反动派，有了决心，坚持奋斗到底，革命没有不胜利的。

“我們宣傳大会的路綫，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鋒队覚悟，下定决心，不怕犧牲，排除万难，去爭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須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覚悟，甘心情願和我們一起奋斗，去爭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头挖去这兩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說是你們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沒有穷尽的。这兩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兩个神仙下凡，把兩座山背走了。現在也有兩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們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們一道挖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毛澤东同志在为新华社写的“評白皮書”的評論中，非常精辟地論述了反动力量和人民力量极端不同的兩种发展邏輯；并且指出，先进的人們必須組織力量同反动派进行斗爭，必須教育、团結和爭取一切还在动搖犹豫着的人們，使反动派完全孤立：

“帝国主义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这样的不同。搗乱，失敗，再搗乱，再失敗，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邏輯，他們决不会違背这个邏輯的。这是一条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們說‘帝国主义是很凶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

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灭亡。

“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决不会違背这个邏輯的。这是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阶級斗爭，一些阶級胜利了，一些阶級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釋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自我批評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內部，希望劝說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斗爭，例如我們的人民解放战爭，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們，把他們打倒，制裁他們的犯法行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乱說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經繳械了的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級分子、官僚資产阶級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們給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們变成好人。中国的許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尔、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屬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問題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統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問題的緣故。

“先进的人們，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覚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去团結人民中国內部的中間阶層、中間派、各阶層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着的人們（这些人們还要長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們，批評他們的动摇性，教育他們，爭取他們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讓帝国主义把他們拉过去，叫他們丢掉幻想，准备斗爭。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

能眞正地爭取这些人。爭取了他們，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無所施其伎了。”

二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毛澤东同志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轉折点”里，分析了反动势力外强中干的实質，提醒革命的人們不要为表面的現象所迷惑。毛澤东同志写道：

“在人类历史上，凡屬將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掙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們也往往在一个期間內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現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質。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爭，正是这种最后掙扎的表現；而在战爭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現它自己的最后掙扎。在这个历史的轉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綫內的人們也有許多被法西斯的凶惡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質。”

反动派总是吹噓自己的貌似强大的武力。在人民中間，也有一部分人对于反动派的軍事力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畏惧心理。这是“唯武器論”的观点。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所写的著名論文“論持久战”里，对于这种观点作了深刻的批評：

“所謂‘唯武器論’，是战爭問題中的机械論，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問題的意見。我們的意見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軍力和經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澤东同志在延安接見美国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发表了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点。下面是这个談話的全文：

“斯問：你覺得中国的問題在不久的將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沒有？

“毛答：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蔣介

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話，和平是有希望的。

“問：如果美国除了它所已經給的以外不再帮助了，那末蔣介石还可以打多久？

“答：一年以上。

“問：蔣介石在經济上可能支持那样久嗎？

“答：可以的。

“問：如果美国說明此后不再給蔣介石以什么帮助了呢？

“答：在現时还沒有什么征象表示美国政府和蔣介石有任何在短时期內停止战爭的願望。

“問：共产党能支持多久？

“答：就我們自己的願望說，我們連一天也不願意打。但是如果形勢迫使我們不得不打的話，我們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問：如果美国人民問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該怎样回答呢？

“答：因为蔣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須自衛。这是美国人所能够理解的。

“問：你对于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爭如何看法？

“答：关于反苏战爭的宣傳，包括兩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爭的，目前的反苏战爭宣傳和其他的反苏宣傳就是对于反苏战爭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傳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許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間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間的矛盾。美国反苏战爭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資本主义世界扩張它的侵略势力。你知道，希特勒和他的伙伴日本軍閥在一个長时期中都曾經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辭，現在美国反动派的做法也正是这样。

“美国反动派要掀动战爭，首先必須进攻美国人民。他們已經在进攻美国人民了，他們从政治上、經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准备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美国人民应当起来抵抗美国反动

派的进攻，我相信他們是会这样做的。

“美国和苏联中間隔着极其辽闊的地帶，这里有欧、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沒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談不到进攻苏联的。現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圍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統治的中国、半个朝鮮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許多国家进行大規模的軍事布置，建立軍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說，他們在世界各地已經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海軍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錯，这些軍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現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軍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將会認識到眞正压迫它們的是誰，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終有一天將会发現他們自己是处在了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当然，我不是說，美国反动派不想进攻苏联。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衛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現；因此，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夢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調美苏战爭，鬧得烏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們的实际目的。原来他們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瘋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張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屬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結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爭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則是不能避免的。

“問：这是一个很好的說明。但是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彈呢？如果美国从冰島、冲繩島以及中国的基地轟炸苏联呢？

“答：原子彈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紙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彈是一种大規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爭胜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長远的观点看問題，眞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动派，而是屬于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內究竟那一方面拥有眞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陣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結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維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紙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經被人們看作很有力量的嗎？但是历史証明了他是一只紙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們所預料的强大得多。

"蔣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紙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們似乎覚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將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証明为并沒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眞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說，我們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槍，但是历史最后將証明，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許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时間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敗，我們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們代表进步。"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澤东同志在中共中央会議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毛澤东同志說：

"中国共产党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計了国际与国內的形势，知道一切內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須打敗的，而且是能够打敗的。当着天空中似乎是黑暗的时候，我們就指出：这不过是暫时的現象，暴风雨即將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当着一九四六年七月，蔣介石匪帮发动全国規模的反革命战爭的时候，蔣介石匪帮認

为，只須三个月至六个月，就可以打敗人民解放軍。他們認为他們有正規軍二百万，非正規軍一百余万，后方軍事机关及部队一百余万，共有軍事力量四百余万人；他們已經利用时間完成了进攻的准备；他們重新控制了大城市；他們拥有三万万以上的人口；他們接收了日本侵华軍队一百万人的全部裝备；他們取得了美国政府在軍事上与財政上的重大援助。他們又認为，中国人民解放軍在八年抗日战爭中已經打得很疲倦，而且在数量上与裝备上远不及国民党軍队；中国解放区还只有一万万多一点的人口（編者按：当时的人口調查不确实，一般認为全国只有四亿五千万人，解放以后經过确实調查，中国人口有六万万），其中大部分地区的反动封建势力还沒有被肅清，土地改革还不普遍与不徹底，人民解放軍的后方还不是巩固的。在这些基础上，蔣介石匪帮就不顧中国人民的和平願望，最后地撕毀在一九四六年一月間签訂的国共兩党的停战协定及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議的决議，发动了冒險的战爭。那时我們說，敌人軍事力量的优势，这只是暫时的現象，这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蔣介石战爭的反人民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軍則占着优势。人民解放軍的战爭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質，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蔣介石的政治基础。十八个月战爭的經驗，充分地証明了我們的論断。

……

“蔣介石反动集团在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規模的反人民的国內战爭的时候，他們之所以敢于冒險，不但依靠他們自己的优势的軍事力量，而且主要地依靠他們認为是異常强大的、举世無敌的、手里拿着原子彈的美国帝国主义，一方面，以为美国帝国主义能够像流水一样地供給他們以軍事上与財政上的需要；另一方面，狂妄地設想所謂‘美苏必战’，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这种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依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全世界各国反动势力的共同特点。这件事，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給予世界資本主义的打击

的严重性，反映了各国反动派力量的薄弱及其心理的恐慌与丧失信心，反映了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强大，使得各国反动派除了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感到毫無出路。但是，在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帝国主义，是否眞如蔣介石及各国反动派所設想的那么强大呢？是否眞能像流水一样的从美国接济蔣介石及各国反动派呢？并不如此。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所增强起来的經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縮小的国內市場与国际市場。这种市場的进一步縮小，就要引起經济危机的爆发。美国的战爭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現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与暫时的。危机就像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这种情况，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計划，像野獸一样，向欧、亞兩洲及其他地方乱竄，集合各国的反动势力，那些被人民唾棄的渣滓，組成帝国主义及反民主的陣营，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一切民主势力，准备战爭，企圖在將来，在遙远的时間內，有一天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打敗民主力量。这是一个狂妄的計划。全世界民主势力必須打敗这个計划，也完全能够打敗它。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陣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陣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們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毛澤东同志在給“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杂志所写的論文“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結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里指出，“对于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計和对于革命力量估計不足，將是一个极大的錯誤”：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而瘋狂地准备着新的世界战爭、威胁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們，反映了資本主义世界的极端腐敗及其濒于灭亡的恐怖情緒。这个敌人还是有力量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內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須团結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須团結起来，必須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則就不能胜利。这个敌人的基础是虛弱的，它的內部分崩离析，它脫离人民，它有無

法解脫的經济危机，因此，它是能够被战胜的。对于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計和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將是一个极大的錯誤。”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澤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內的指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問題”里告訴我們，在全体上，在战略上，要輕視敌人，同时又要講究斗爭艺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爭上，又要重視敌人：

“反对对敌人的力量估計过高。例如，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到国民党区域作战，惧怕消灭买办封建制度、分配地主土地和沒收官僚資本，惧怕長期战爭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全世界資本主义和中国蔣介石反动集团的統治，已經腐爛，沒有前途。我們有理由輕視它們。我們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內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爭上（不論是在軍事的、政治的、經济的、或思想的斗爭上），却又决不可輕視敌人，相反，应当重視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們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輕視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爭上，也輕視敌人。如果我們在全体上过高估計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們，不敢胜利，我們就要犯右傾机会主义錯誤。如果我們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爭上，不采取謹慎态度，不講究斗爭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爭取一切应当爭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級，学生、教員、教授和一般知識分子，一般公务人員，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紳士），我們就要犯‘左’傾机会主义錯誤。”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澤东同志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上的发言里說：

“一九四六年蔣介石开始向我們进攻的时候，我們許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憂虑：战爭是不是能够打贏？我本人也憂虑这件事。但是我們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記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她談話的时候談了許多問題，蔣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彈等等。我說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統統

不过是紙老虎。原因是他們脫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紙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嗎？我也談到沙皇是紙老虎，中国皇帝是紙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紙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沒有倒，还有原子彈，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紙老虎。蔣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規軍。那时我們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們有多少軍队呢？我們有几十万游击队，統統被蔣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們說，蔣介石不过是一个紙老虎，我們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爭，我們在一个長时間內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說，在战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敌人。也就是說在整体上我們一定要藐視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問題上我們一定要重視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視敌人，我們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錯誤。馬克思、恩格斯只有兩个人，那时他們就說全世界資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問題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問題上，如果我們不重視它，我們就要犯冒險主义的錯誤。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塊一塊地犁，就是吃飯也是如此。我們在战略上藐視吃飯，这頓飯我們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軍事書上叫做各个击破。”

三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澤东同志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上的发言里，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指出現在是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东风压倒了西风：

“我認为現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轉折点。世界上現在有兩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語：‘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認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說，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在这个发言的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七日，毛澤东同志在对我国留苏学生的講話中說：

“世界的风向变了。社会主义陣营和資本主义陣营之間的斗爭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現在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將近十亿，独立了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七亿多，正在爭取独立或者爭取完全独立以及帶有中立傾向的資本主义国家人口有六亿，帝国主义陣营的人口不过四亿左右，而且他們的內部是分裂的。那里会发生‘地震’。現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毛澤东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議上的講話中說：

“帝国主义除了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对国內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迫害以外，还指望着战爭。但是他們能够从战爭中指望什么呢？半个世紀以来，我們已經經历过兩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国出現了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欧和东方出現了更多的革命。如果帝国主义好汉們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們除了促使世界資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結果。”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議第十一次扩大会議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他在这篇講演的第十部分“坏事能否变成好事？”里說：

“現在世界各国的人們都在談論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問題，我們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們是坚持和平反对战爭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爭，我們也不要害怕。我們对待这个問題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兩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陣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轉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爭的結果，無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轉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条件，斗爭着的双方都不会轉化。世界上最願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無产阶級，其次是半無产阶級，因为一則全無所有，一則有也不多。現在美国操縱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暫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無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將变为富国，無权將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結一致的奋斗。"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当美国帝国主义公然发动侵略朝鮮的战爭和武装侵略我国領土台灣的时候，毛澤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会第八次会議上的講話里說：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亞洲的事务应由亞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亞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亞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魯門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說美国不干涉台灣，現在他自己証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毀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內政的一切国际协議。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亞洲人民很有利益。美国对朝鮮、菲律宾、越南等国內政的干涉，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將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們將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誘，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沒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結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敗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四日，毛澤东同志在苏联駐我国大使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签定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指出，

"在我們中苏兩个偉大的国家的合作之下，我相信，帝国主义的侵略計划是要被粉碎的。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們中苏兩国的偉大合作下，一切帝国

主义的侵略計划，沒有不能被粉碎的。它們一定要被徹底粉碎。只要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爭，我們和全世界人民就一定要將它們从地球上消灭干淨！”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澤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議上說：

“目前的形势对全世界爭取和平的人民有利。”

“总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

“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領土台灣，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裝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許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軍事基地。中国領土台灣、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軍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絞索的另一端交給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愛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絞索就將越紧。”

“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張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張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張局势走向了美国人願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員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

“美国壟断資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絞刑。其他美国帮凶也將是这样。”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澤东同志在巡視長江流域的几个省以后回到了北京。他在向新华社記者发表的談話里說：

“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長了，因为他們尽做坏事，專門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軍事基地，以原子战爭威胁和平。这样，他們就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將要对他們群起而攻之。但是帝国主义者目前还是在活着；他們依然在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横行霸道。他們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們本国的人民群众。这种局面必需改变。結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原載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新生力量一定战胜腐朽力量

于 兆 力

当前国际局势的發展，进一步証明了毛澤东同志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論断。現在非常明显，社会主义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已經占了压倒的优势。

帝国主义的統治已經临近死亡。第一次世界战爭的爆發，就是世界資本主义各种矛盾尖銳化的結果，它表明了資本主义已經从發生、發展而走向腐朽、灭亡。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人类由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四十年来，新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有了偉大的發展；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軍，反帝的民族革命力量也有了很大的發展。这兩支力量，結合起来对垂死的帝国主义力量，进行了反复的、激烈的斗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二十年間，帝国主义方面虽然在一段时間內暫时鎮压了一些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革命，取得了資本主义世界的暫时稳定；但是，他們沒有力量阻止苏联人民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成了社会主义，也沒有力量阻止世界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發展。帝国主义不能避免严重的經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帝国主义內部各种矛盾更加尖銳化的基础上，又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到今天的十三年間，帝国主义的处境更加困难了，它無时無刻不是处在风雨飄摇之中，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范圍內連綿不断，人民革命力量势如破竹，剧烈地震撼着帝国主义的最后統治。今天，同社会主义陣营十亿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有已經爭得了民族独立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七亿多人民，而

正在爭取独立或者爭取完全独立的国家，加上帶有中立傾向的資本主义国家，又有六亿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只有四亿人口，而他們的內部是四分五裂的，他們的脚下到处都是随时可以爆發的火山。

人类历史上，总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表面上弱小的但是正在生長中的力量战胜表面上强大的但是垂死的力量。新生的必然代替腐朽的，这是自然界發展的規律，也是社会發展的規律。华盛頓的弱小的民兵，終于战胜了全副武裝的英国殖民軍队。孙中山領导的弱小的革命力量，終于推翻了清朝皇帝的統治。人們知道，在伊拉克革命爆發的前夜，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費薩尔王朝也似乎是强大的，而人民革命的力量似乎是很小的。但是，只不过一夜之間，腐朽的力量就被新生的力量所战胜，伊拉克民族革命获得了偉大的成功。这又是新生力量必然战胜腐朽力量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証明。

正是因为这样，腐朽力量总是畏惧新生力量，而不是新生力量畏惧腐朽力量。共产主义者更是从来就不畏惧帝国主义者，相反的，帝国主义者从来就是畏惧共产主义的。在一百多年以前，整个的世界还在資本主义的統治之下，馬克思、恩格斯等少数赤手空拳的共产主义者，却敢于宣称："讓那些統治阶級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發抖吧。無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頸上的一条鎖鏈。他們所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当十月革命剛剛取得胜利，苏維埃国家只是一个处于資本主义世界包圍中的孤島的时候，列宁就指出："这些先进的、最文明的和'民主的'国家，拥有全副武裝，在軍事方面独霸全球，却像害怕烈火那样，害怕从一个受到严重破坏的、飢餓的、落后的、据他們說甚至是半野蛮的国家散播出来的思想傳染病！"列宁在"一定能够胜利"的口号下，組織了苏联人民的力量，战胜了世界上所謂头等强国的武裝干涉。在我們中国，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兩座大山压在人民头上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級的先进部队，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光輝的照耀下，在毛澤东同志的領导下，透徹地看到未来，深信人民的新生力量一定能够推翻压在他們头上的这兩座大山。中国共产党一开始成立，就勇敢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势力的口号。革命虽

然遭到过挫敗，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相信毛澤东同志所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眞理。在十二年前，当美国帝国主义联合蔣介石集团，用全副武裝的四百万正規軍，向只有一百多万裝备很差的解放軍，被分割成为几十个根据地的中国人民力量，發动瘋狂进攻的时候，毛澤东同志說，侵略者和独裁者是自掘坟墓，这只有造成中国革命早日胜利的結局。历史就是这样按照革命的辯証法前进的，新世界終究要代替旧世界。

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和美国記者斯特朗的談話中，曾經提出一个著名的論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他說："看起来，反动派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長远的观点上看問題，眞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动派，而是屬于人民。"他还說："美国的反动派也是紙老虎。……它也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將被証明并沒有什么力量。"十二年来，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革命战爭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民族独立斗爭的胜利，朝鮮抗美战爭的胜利，越南人民反对美法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爭的胜利，北非和西亞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埃及反抗英法侵夺苏伊士运河战爭的胜利，拉丁美洲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印度尼西亞維护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摧毀叛軍的胜利，叙利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爭的胜利，以及最近中近东各国人民反对美英帝国主义侵略、維护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爭的胜利，都有力地証明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确都是紙老虎。

今天，美国反动派这只紙老虎，虽然已經破綻百出，但是他們总还是裝腔作势，大吹大擂，以便掩盖自己的恐慌，吓唬一些意志不堅定的人們。美国反动派实行穷兵黷武的侵略政策。他們圍繞着社会主义国家，在广大的中間地帶，設立了二百五十多个軍事基地，拉攏了二十多个国家的反动派，拼湊軍事集团；并且，不断制造緊張局势，进行战爭宣傳。其实，这絲毫不足以說明他們的强大，而正好說明他們的虛弱。美国資产阶級虽然只有一百几十年的历史，但是他們早

已抛棄了华盛頓、杰弗逊和林肯的独立自由的旗帜，現在已經徹底腐化，病入膏肓。他們只能依靠麦卡錫主义和非美活动委員会来进行对国內人民的統治；而在国外政策方面，美国帝国主义把資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反动势力集結在自己的周圍，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到处与世界人民为敌，与世界和平为敌，与民族独立运动为敌。这样的結果只能使自己陷于极端的孤立。跟它站在一起的只有一小撮反动分子，全世界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在反对它。美帝国主义所执行的反动政策，造成了埋葬自己的掘墓人，促使自己灭亡。

希特勒和一切好战分子的命运，就是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前途。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命运还比不上希特勒。希特勒还曾經有过一段比較順利的發展侵略的时期，因为当时維护和平、反对侵略的力量还比較薄弱。現在美帝国主义想要那样地为所欲为，却是不可能了。美帝国主义，这次武裝侵略黎巴嫩，一登上貝魯特海灘，立即陷于极为狼狽的境地。帝国主义侵略者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譴責和反对；遭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和平力量支援下的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同盟集团，發生了严重的爭吵；美英兩国統治集团的內部，也發生了裂痕。美帝国主义現在是空前地孤立了。同时，面对着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和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各国人民，帝国主义的战綫太長，力量不足，弱点甚多。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曾經不断地大吵大叫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当他們揮动眞刀眞槍的时候，却不能不耽心自己的前途而双手發抖了。

美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的叫囂，实际上是侵略和奴役中間地帶国家的烟幕彈。美国同社会主义国家远隔重洋，当中横隔着几乎整个的資本主义世界。要發动反苏战爭，首先要压服这个資本主义世界。美帝国主义要在那一个国家設置軍事基地，首先就要侵略这一个国家。到处設置軍事基地，到处侵略别人，就必然到处陷入各国人民的包圍。大家知道，美帝国主义对待广大中間地帶国家是阴謀也干，阳謀也干；武戏也唱，"文戏"也唱。但是，在当代存在着强大的社会主

义陣营和世界和平力量的条件下，使得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爭政策，不能不遭到接二連三的失敗。無数事实都証明了：今天的强者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不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是眞正代表各国人民利益的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其他社会进步力量，不是違背人民意志的反动統治阶級；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而不是一小撮战爭販子。今天的强者是阿拉伯人民，不是美、英、法；是印度尼西亞，不是美国、荷蘭；是阿尔及利亞的民族解放运动力量，不是維持殖民統治的法国反动派；是伊拉克共和国，不是帝国主义侵略勢力。帝国主义有如夕阳西下，而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支援的民族解放运动，却正如旭日东升。帝国主义者不但难于顚复現在已經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而且也根本無法阻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繼續發展。

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总是拿战爭来吓唬世界人民。人民是不願意战爭的，是反对战爭的。而且，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团結起来，积极进行保衛和平的斗爭，战爭是可以制止的。但是，正如毛澤东和赫魯曉夫兩位同志的会談公报所指出："战爭能否避免，不能仅靠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願望和他們單方面的努力。西方大国的侵略集团至今拒絕对于維护和平采取任何認眞的步驟，反而肆無忌憚地加剧国际紧張局勢，使人类濒于战爭灾难的边緣。但是，他們应当知道，如果帝国主义战爭狂人竟敢把战爭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末，所有爱好和平和爱好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必將紧密地团結在一起，徹底地消灭帝国主义侵略者，奠定世界的永久和平。"这是对于目前世界局勢發展的英明的論断。中国有一句古話："夫兵，犹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列宁說过：沒有任何一种現象不能轉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帝国主义战爭会轉化成为革命的战爭。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战爭，人民一定会在这場被迫进行的战爭中进一步学习政治，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覚悟，人民决不会再繼續容忍那个給他們帶来如此慘重的痛苦和牺牲的制度，一定会憤怒地把帝国主义侵略集团送进坟墓。

美国反动派用以吓人的本錢是核武器。他們吹嘘氫彈、原子彈

如何可怕，到处招摇撞騙。但是，远在原子彈剛剛出現，而还被美国反动派壟断的时候，毛澤东同志就以"紙老虎"来嘲笑他們。毛澤东同志說："原子彈是一只紙老虎，看样子可怕，实在并不可怕。……原子彈的产生，就是美帝国主义灭亡的开始；因为它們依靠的只是炸彈，而結局將不是炸彈消灭人民，而是人民消灭炸彈。"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認为，最后决定战爭胜負的不是武器，而是掌握武器的人。古今中外被推翻的王朝，被打倒了的侵略者，都不是由于缺少当时最凶惡的杀人武器，恰恰相反，从單純武器的观点說来，优势常常是在他們方面的。对于历史上手無寸鉄的人民来說，刀矛弓箭等冷武器曾經就是古代的"原子彈"。对于过去革命根据地中只有小米加步槍的中国人民武裝力量来說，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們的全副武裝，也可算是当时的"原子彈"。虽然反动派能够屠杀成千、成万的中国人民，但是，这些紙老虎終于一个一个地在中国人民面前倒下去了。

美国的原子訛詐政策，在革命的人民面前，从来就沒有市場。况且美国壟断核武器的局面，早已改变了。在社会主义陣营里，苏联也早已掌握了核武器。而在某些最重要的軍事科学技术方面，例如在洲际导彈方面，美国已經大大地落后于苏联。这种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正是制止原子战爭爆發的基本条件。我們社会主义陣营是最爱好和平的，也坚定地相信世界上保衛和平的力量能够制止原子战爭的爆發。但是，必須警惕發动原子战爭的瘋子。对待瘋子，只有揭露，只有斗爭，只有引起大家的警戒，大家都包圍瘋子，才能在他要發瘋的时候，束縛住他的手脚。必須警告那些想發瘋的人們，他們一旦發动了原子战爭，將被炸毀的，只能是使人类陷于痛苦深淵的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不但炸不掉，而且一定会更快地在全世界实現。

美国反动派还自特他們年产一亿多吨鋼，在鋼产量和某些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暫时还居世界第一位，就到处張牙舞爪。其实，这也是吓不倒人的。鋼鉄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人。而且，就拿鋼来說吧，美国也并不居于絕对优势。美国是在独立之后，經过一百三、四十年，从南北战爭以后算起，也是經过四、五十年，到了

二十世紀初叶，才完成工业化，搞到年产二、三千万吨鋼。又經过四十年，主要是依靠兩次世界大战，才增加到年产一亿多吨鋼。美国鋼产量的增長，既然主要是依靠战爭，而不是依靠可靠的国內市場，因此它的基础是建立在沙灘上的。这一亿多吨鋼絲毫不能挽救美国腐朽的資本主义制度，更無法逃脫致命的經济危机。这一次美国的經济危机，就是从鋼鉄工业和同鋼鉄工业直接有关的工业部門开始的。今年第一季度比去年同一时期，美国鋼产量已經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人們对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美国經济危机記忆犹新，那时期，美国的鋼产量曾經从五千七百万吨，猛跌到一千三百九十万吨。对于美国壟断資本家来說，必然是爬得愈高，跌得愈重。人間沒有任何起死回生的仙丹，可以医治美国經济危机的絕症。

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总还是人，总还是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反法西斯战爭期間，苏联只年产一千八百万吨鋼，并且在战爭中还遭到严重破坏；当时美国和英国的鋼产量，加起来却有七千多万吨。但是，对反希特勒战爭胜利起决定作用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和英国。在代表世界科学尖端的人造衛星的竞賽中，絕对冠軍的获得者，不是年产一亿多吨鋼的美国，而是年产五千万吨鋼的苏联。从鋼产量發展的速度来看，社会主义的苏联更是美国所不能比拟的。战后十二年，苏联的鋼产量，从年产一千万吨左右猛增到五千多万吨，按照这种速度，很快就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何况，除了苏联以外，还有許多社会主义国家，鋼鉄和其他工农业生产都在飞速地增長中。社会主义世界生产的不断躍进，同美国为首的資本主义世界經济危机，恰恰成了鮮明的对照。大家知道，我国鋼鉄工业發展的速度，也必將超过人們的預料。在中国人民眼下，年产一亿多吨鋼的美国，也不过是曹操"煮酒論英雄"里所描画的袁术一类人物，虽然"兵粮足备"，但是已經半截下土，只配叫做"豪中枯骨"而已。

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总是要煽动反苏反共的风潮来鎮压本国的人民，鎮压本国的革命运动。但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制造的反苏反共的风浪，只能够吓倒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而革命的人

民，却会在暴风雨中鍛煉得更为坚强。任何革命力量的生長壯大，总是要靠兩方面来培养的。一方面靠革命的正面的教員，另一方面靠反革命的反面的教員。敌人越反动，就越能激發人民的革命性，敌人也就更加濒于死亡。坚强的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家，从来就是在风浪中生長起来的。从风浪中可以学会同反动派斗爭的規律。即使是由于缺乏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爭的經驗，有时候可能会吃一点亏，不过，吃了亏，就会增長知識。中国人說："吃一塹，長一智。"坏事会变成好事，就是这个道理。

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人民革命胜利的时候說过，帝国主义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这样不同。搗乱，失敗，再搗乱，再失敗，直到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邏輯，他們决不会違背这个邏輯的。这是一条馬克思主义的眞理。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决不会違背这个邏輯的。这是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眞理。俄国人民的革命說明了这条眞理，中国人民的革命也說明了这条眞理。在几十年前，俄国和中国，都只有几十个人的馬克思主义小組，經过前仆后繼地坚决斗爭，終于打倒了一切貌似强大的反动派，成为兩个大国的執政党。这就是革命的辯証法。今天的世界局势，正是"山雨欲来风滿楼"。一切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反动派，都無法逃避趋于灭亡的历史命运。这些国家中的似乎还很弱小的共产党，才是眞正强大的力量，他們終將在斗爭中成長和壯大起来，夺得最后胜利。

在十年前，毛澤东同志曾經指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意义估計不足，將是一个极大的錯誤。"他又說："对于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計和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將是一个极大的錯誤。"这个指示，同样适用于今天对待新的历史轉折点的估計。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已經为全世界人民斗爭的最后胜利开辟了道路。非常清楚，世界历史車輪的向前躍进是沒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的。新生力量一定战胜腐朽力量。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發展速度，必將超过人們的預計。

（原載"紅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六期）

为动員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爭(摘錄)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綫的学習和宣傳提綱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宣傳部制發，
經过中共中央批准)

第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

(五)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議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和总任务的主要內容已有規定。二中全会决議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發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轉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轉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全会决議指出："中国的現代性工业虽然还只占国民經济总生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量的和最主要的資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資产阶級的手里。沒收这些資本归無产阶級領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握有国家的經济命脉，成为整个国民經济的領导成分。这一部分經济，是社会主义性質的經济，不是資本主义性質的經济。""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長的时期內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資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經济的向前發展。……但是中国資本主义的存在及發展，自由竞爭和自由貿易的存在及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它將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占国民經济总量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經济和手工业經济，是可能和必須謹愼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們

向着現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錯誤的。必須組織中央、省、县、区、乡的生产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合作社的領导机关。……單有国营經济而沒有合作社經济，我們就不可能領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經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發展到將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無产阶級在国家政权中的領导权。”二中全会决議又指出：“对于私人資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产阶級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級斗爭的主要形式。”“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兩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無产阶級領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須强化。”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議的主要精神，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共同綱領关于經济政策的条文中也有相适应的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肅清国民党軍队殘余、統一全中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压反革命、恢复生产、增产节約、反对資产阶級进攻的“三反、五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以及其它各种民主改革运动等工作的巨大胜利，都是正确执行二中全会决議和共同綱領的結果。在过渡时期的头三年中，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权巩固了，社会主义經济在整个国民經济中的比重增長了，它的領导作用确立了而且加强了；經济恢复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已从經济恢复阶段进入有計划的經济建設和对非社会主义經济成分实行有系統的改造的阶段，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就有更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刘 少 奇

(閱讀第一部分)

(見本書第四四三至四五三頁)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一書編者按語一則

“誰說雞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語

这一篇很好，可以說服很多人。这个地方的党組織，在合作化的問題上，从来沒有动摇过。它坚决地支持貧苦农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賽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三年，实現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农說：“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沒有見过鷄毛能上天。”鷄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兩条道路的斗爭。在中国，富农經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們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無雇工，他們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們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兩条道路的斗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貧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賽表現出来的。在兩三年內，看誰增产：是單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貧农和下中农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貧农和下中农組成的合作社，同單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賽，大多数的貧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爭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們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們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持合作社。但是，可惜，并不是每一个乡村的党支部都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乱。首先是鷄毛能不能上天的輿論問題。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問題。几千年以来，誰人看見过鷄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眞理。如果党不給以批評，它就会使許多貧农和下中农

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質力量例如貸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合作社就会發生很大的困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傳鷄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眞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沒有增产，穷社还沒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沒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沒有在全国范圍內，大張旗鼓地宣傳合作化的好处。还沒有明确地指出"鷄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眞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經不是眞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鷄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經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們的許多地方党組織沒有能够給貧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們，上面还沒有給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沒有給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規划，并且在全国范圍內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領导。一九五五年，我們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調。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入社。最頑固的，也不敢議論鷄毛能不能上天的問題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沒有了。这同人民政府惩治了一批破坏治安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关系的。总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級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資本主义大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一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七七七至七七九頁）

坚持党的正確路綫，爭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戰綫上全胜（摘錄）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九日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員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員会第一書記　江　華

一、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

一九五七年全省形势發展的主要特点，就是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繼續进行了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踐証明：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济战綫上（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經过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爭，社会主义革命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一年来，运动發展的过程是这样的：从今年三月开始，我們組織全省党内外干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五月开始，在县市以上領导机关和民主党派、教育界、新聞界、文艺界、科技界、衛生界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爭；八月开始，又在农村、城市的基層組織中逐步开展了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全省的整风运动正在更广泛深入地展开。

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爭中，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覺悟大大提高了。在全省县、市以上領导机关中已經查出了一批右派分子。党内外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曾經在各个战綫上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領导。現在，他們的阴謀已經徹底破产，他們在群众中已經完全

确立了。

全民整风运动已經在全省开展，大部分县以上領导机关已經取得大鳴大放大辯論的初步經驗。在各項工作中，大鳴大放大辯論已經开始成为經常的工作方法。适应于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已經开始为干部所掌握。广大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正在轉变，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在农村，整风运动坚定了大多数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批判了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資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从而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陣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在工矿企业中，整风运动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政治覺悟，巩固了劳动紀律，提高了出勤率，密切了党群关系，初步形成了勤俭办企业的风气，推动了新的生产高潮的到来。

一年来的实踐証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抓住了整风，各項工作都获得显著的改进，出現了生动活潑的新气象。但是，应当指出：一年来我們对于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一个学习、实踐、积累經驗、逐步前进的过程。在这个大轉变的过程中，党內对一些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有分歧、有斗爭的。現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对这些問題作如下的說明：

一，对于一年来的形势、特别是对于今年上半年形势的看法，曾經發生过右的傾向和"左"的傾向。前一种傾向是看不到敌我矛盾仍然存在，后一种傾向則是夸大敌我矛盾，企圖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內部矛盾。

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級斗爭并沒有完全結束。資产阶級和無产阶級的斗爭，資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爭，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地不表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而表現在經济基础和上層建筑之間。

在反右派斗爭中，党內一些有右傾思想的人，看不到資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兩条道路的斗爭仍然是尖銳的、复杂的，看不到資产阶級右派和劳动人民之間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不了解反右派斗爭是一場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你死我活的大是大非斗爭，不坚决进行这个斗爭，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險，因而对于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表現了严重的政治动摇和温情主义。只有徹底批判他們的这种右傾思想，才能使运动深入展开。

党內还有一部分人，夸大了敌我矛盾，認为兩条道路的斗爭一概表現为敌我矛盾，并且認为省委上半年强調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右傾。这些同志的看法也是錯誤的。应当認識：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爭，既可以表現为敌我矛盾，也可以表現为人民內部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前一种情况是比較少数的，后一种情况却是大量的。从大鳴大放和鬧事中所暴露的問題来看，絕大部分都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其中一部分是由于資产阶級、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和富裕中农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摇和不滿，这些是反映了兩条道路的斗爭；一部分是由于各級領导上对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还缺乏經驗，在工作上和作风上还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錯誤，广大群众对于新的制度还感到不习慣和不适应，这些就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兩条道路的斗爭。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我們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时机，兴风作浪，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造成一陣混乱的局面。但是，物极必反，当他們的反动面貌充分暴露的时候，就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憤，一时被蒙蔽的部分群众，也清醒过来，这样就形成了群众性的反右派斗爭。斗爭的結果証明：大多数群众是可以信賴的，右派分子毕竟是极少数。因此，必須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忽視敌我矛盾是錯誤的，但是决不能夸大敌人的力量。不能把不屬于右派的一般資产阶級分子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滿看作敌我矛盾，也不能把富裕中农对于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滿看作敌我矛盾，錯誤地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

二，形势的發展，是时紧时松、曲折前进的，許多同志对于这一点缺乏完整的認識。在三大改造高潮前后，資产阶級分子敲鑼打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中富裕中农也鑒于大势所趋，加入了合作社。在那个时候，如果突出地强調阶級斗爭，就不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我們及时地强調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整风，是完全正确的。当右派分子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充分暴露了他們的反动面目的时候，我們提出反右派斗爭和徹底完成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使右派分子完全陷于孤立的地位。由此可見，阶級斗爭形势的發展是有起伏的。在这次斗爭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阶級敌人被迫退却，斗爭形势可能在一定时期緩和下来。但是，資产阶級右派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决不甘心死亡，在某种条件下，又会向社会主义發起新的进攻。这种斗爭的起伏形势，將在若干年內反复地發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發展，国內阶級斗爭，將通过这种起伏，逐步地减弱以至消灭。有些同志往往不看形势發展的这种規律，把反右派斗爭和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对立起来，这显然是錯誤的。

三，对于鬧事，有些同志只看到它是坏事的一面，而沒有看到，經过主观上的努力，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例如仙居县在今年上半年鬧事中有很多农业合作社垮台，这是坏事。但是，經过省委、地委派干部加强領导，总結經驗教訓，因而有效地糾正了干部的右傾思想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在农村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多貧农、下中农都亲身体会到合作社垮台給他們所造成的生产和生活上的很大困难，自动要求恢复合作社。目前入社农民已經达到农戶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各項工作都有了显著的改进。这就使坏事轉向反面，成为好事。因此，必須認識：鬧事固然会造成一些損失，但是，从鬧事中可以暴露我們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可以暴露敌人的破坏活动；可以鍛煉干部，教育群众；还可以促进領导上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只要善于从鬧事中吸取教訓，認

眞改进工作，就能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四，对于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和大字报这个群众路綫的新形式，許多同志还認識不足。有些人对鳴放和辯論表現得决心不大，信心不高，害怕出乱子，害怕辯不过人家，害怕"引火燒身"。这是一种不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的錯誤思想。我們不仅应当相信工农基本群众的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而且也应当相信在我国条件下，資产阶級分子、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和上層小資产阶級(在农村中是富裕中农)的大多数是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和群众一起进行整风。經驗証明，只有大鳴大放大爭大辯，才能徹底解决应該解决的問題。这个方法既可以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克服領导上的缺点和錯誤，克服群众的某些錯誤观点；又可以揭露敌人，动員和教育群众向敌人进行斗爭。

这里要着重地說一說关于說服和压服的問題。有些同志怀疑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他們不了解，用說服的方法，諸如扎根串連，打通思想、有事和群众商量、尊重大多数群众意見等，都是我們党的一貫的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在長期实踐中早已証明是有效的。在过去革命战爭时期，由于情况紧張，不可能从容地展开大辯論。在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时期，主要任务是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主要斗爭形式是急风暴雨的群众性的阶級斗爭，也不可能从容地展开大辯論。在目前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要解决的問題是改造人的思想和改进工作問題，而大鳴大放大爭大辯正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最好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我們党的群众路綫工作方法的新發展。我們必須自覺地在各項工作中学会运用这种形式，并且使之經常化，使之成为傳統。

对于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我們必須采取專政的方法，即压服的方法，严厉地給以打击。不这样办，就要犯右的錯誤。但是，在处理劳动人民和資产阶級右派之間的敌我矛盾的时候，一般地仍然应該采取大鳴大放、大辯論、摆事实、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因为这种敌我矛盾往往和人民內部矛盾混在一起，如果不采取这种方法，

就难以爭取中間群众，孤立右派。只有采取这种方法，才有利于提高中間群众的社会主义覚悟，划清大是大非界綫，徹底暴露、孤立和分化右派分子。同时，由于人民的力量强大，对于右派分子，也不需要采取极端的政策。

从上述問題看来，党內有不少同志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的学习还很不够，对于新形势、新任务、新方法的認識还有很多偏差。全省各級党組織必須領导广大党員認眞研究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决不能用老眼光来看新形势，用旧方法来解决新問題。

目前，我們的任务就是要爭取整风运动的全胜。在各个战綫上和各項工作上，都应当通过整风，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問題，解决各項工作的方針政策是否正确的問題，从而提高群众的思想水平，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团結广大群众，孤立、分化右派分子和一切反社会主义分子。因此，大辯論应当圍繞当前中心工作的各項重大問題广泛深入地展开，使辯論的結果，既能划清大是大非，教育和团結大多数群众，又能推动当前工作，掀起一个工农业生产和各項建設工作的高潮。

今冬明春在全省范圍內应当繼續深入展开全民整风运动。县以上領导机关的整风运动必須經过四个阶段：即大鳴大放阶段（結合整改），反击右派阶段（結合整改），着重整改阶段（繼續鳴放），以及每人学习文件、批評反省、提高自己阶段。凡是反右派斗爭已經取得胜利的單位，应当及时轉入以整改为主的第三阶段。在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販和艺人当中，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进行反右派斗爭；在大鳴大放以后，第二阶段一般都应当轉入以整改为主。如果有显著的錯誤言論，应当結合整改，展开辯論，划清是非界綫。

改进工作和反右派斗爭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目前改进工作只是开始，各級領导机关应当十分重視抓住这一环节，切实加强对改进工作的領导，爭取反右派斗爭的胜利，爭取改进工作的胜利，爭取改造思想的胜利。

（摘自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第五部分

关於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

談談辯証法問題

列　宁

（見本書第七一九至七二三頁）

神聖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摘錄）

駁布魯諾·鮑威尔及其伙伴

馬克思　　恩格斯

第四章　體現爲認識的寧靜的批判的批判或埃德加爾先生所體現的批判

(4)蒲魯东

批判性的評注2

……

無产阶級和富有是兩个对立面。它們本身構成一个統一的整体。它們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問題在于这兩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們是統一整体的兩个方面是不够的。

私有制，作为私有制来說，作为富有来說，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無产阶級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滿足的私有制。

相反地，無产阶級，作为無产阶級来說，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約着它而使它成为無产阶級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內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

有产阶級和無产阶級同是人的自我異化。但有产阶級在这种自

我異化中感到自己是滿足的和稳固的，它把这种異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証明，并在这种異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無产阶級在这种異化中則感到自己是被毀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無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現实。这个阶級，用黑格尔的話来說，就是在被唾棄的狀况下对这种狀况的**憤慨**，这个阶級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狀况相矛盾。

由此可見，在整个对立的范圍內，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無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則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經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轉移的、不自覚的、同它的意志相違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約的发展，只有通过無产阶級**作为**無产阶級——这种意識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貧困的貧困、这种意識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無产阶級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財富、替自己生产貧困而給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無产阶級而給自己做出的判决。無产阶級在获得胜利之后，無論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絕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無产阶級的胜利，無产阶級本身以及制約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

（一八四四年九月至十一月。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七月單行本第四三至四四頁）

自然辯証法(摘錄)

恩格斯

〔辯証法〕

〔(甲)辯證法的一般問題。辯證法的基本規律〕

.....

* * *

抽象的同一性（$a=a$，以及否定地，a 不能同时等于 a 又不等于 a)在有机自然界中同样是不能够应用的。植物、动物，每一个細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間，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这是由于吸取和排泄各种物質，由于呼吸，由于細胞的形成和死亡，由于循环过程的进行，一句話，由于不休止的分子变化的总和，这些分子变化形成生命，而其綜合的結果則一目了然地出現于各个生命阶段——胚胎生命，少年，性的成熟，繁殖过程，衰老，死亡。生理学愈向前發展，这种不断的、無限小的变化对于它就愈加重要，因而同一性內部的差别的考察也就愈加重要，而那旧的抽象的形式的同一性观点，即把有机体当作單只和它自己同一的东西，看作常住不变的东西的观点，便过时了㊀。然而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思惟方式及其諸范疇却还繼續存在。但是甚至在無机自然界中，同一性本身在現实中也是不存在的。每一物体不断地受到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这些作用經常在改变它，修改它的同一性。只是在数学中——即研究思想事物

㊀ 在恩格斯原稿上，这里有一个加了着重点的注："至于物种进化就更不用說了。"——俄文本編者注

（縱然它們是实在的反映）的一种抽象的科学中，——才有抽象的同一性及其与差别的对立，而且甚至在这里也漸次被抛棄着。黑格尔，"百科全書"，第一卷，第二三五頁。同一性在自身中包含着差别性，这一事实在每一命題中都表現出来，在这里述語是必須和主語不同的。蓮花是一种植物，玫瑰是紅的；这里不論是在主語或者在述語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述語或主語所包括不了的。黑格尔，第二三一頁㊀，与自身的同一首先必須有与一切别的东西的差别作为补充，这是不証自明的。

不断的变化，即抽象的和自身的同一性之抛棄，在所謂無机自然界中也是存在的。地質学就是这种不断变化的历史。在地面上是机械的变化（冲毀，严寒）、化学的变化（风化），在地球内部是机械的变化（压力）、热（火山的热）、化学的变化（水、酸、膠合物），以及大規模的变动，如地面大的凸起、地震等等。今天的板石根本不同于它所由構成的粘土，白垩土根本不同于構成它的松散微小的甲壳，石灰石尤其是根本不同于这些甲壳（根据某些学者的意見，石灰石完全起源于有机物），沙石根本不同于海沙，海沙是花崗石等等被风化而成，关于石炭更不必說了。

* * *

旧的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同一律是旧的世界观的基本原則，$a=a$。每一事物和它自己相同。一切都是永久不变的，太阳系、星体、有机体都是如此。这个定律被自然科学在每个場合下逐步地駁斥了，但是在理論中它还繼續存在着，而旧事物的拥护者还常常用它来抵抗新事物，他們說："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它自己又是别的。"但是最近自然科学很詳細地証明了（見上）：眞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别和变化。——抽象的同一性，像形而上学的一切范疇一样，只有对家事才

㊀ 在原稿中是："黑格尔，第Ⅰ卷，第二三一頁。"罗馬数字Ⅰ似乎是Ⅵ之誤（"黑格尔全集"德文本第六卷的内容是"小邏輯"）在"小邏輯"第二三一頁上曾說：命題或判断的形式本身已經指出了主語和述語之間的差别（見"黑格尔全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一九七頁）。

能应用，因为在这里所考察的只是很小的范圍或很短的时間；它所能适用的范圍差不多在每一个場合下都是各不相同的，并且是由对象的性質来决定的；在能采用橢圓为基本形态来作寻常天文学的計算而不至于造成显著錯誤的行星系統中，它的适用范圍就比我們观察几个星期內結束幼虫时期的昆虫时的范圍寬广得多。（还可以举其他的例子，如物种的变化就要以几千年为尺度来計算。）但是对于綜合的自然科学，即使在任何一个个别部門中，抽象的同一性便是根本不够的；虽然今天抽象的同一性整个說来在实踐中已經被排除了，但是在理論上它仍然統治着人們的头腦，而大多数的自然科学家还以为同一性和差别性是兩个不可調和的对立物，而不認为它們是同一个东西的兩极，这兩极之所以是眞实的只是由于它們的相互作用，由于差别性包含在同一性中。

* * *

.....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二月單行本第一七六至一七八頁。"附注"根据本書需要作了删节）

論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問題(摘錄)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思主义者
土地問題專家代表会議上的演說)

斯 大 林

一 "平衡"論

你們当然知道，在共产党員中間还流行着一种所謂我国国民經济各种成分"平衡"論。这种理論当然和馬克思主义毫無共同之处。但是右傾营壘中的許多人在鼓吹这种理論。

按照这种理論的說法，我們首先有社会主义成分，——这是一个箱子；此外，我們还有非社会主义成分，或者說資本主义成分，——这是另一个箱子。这兩个箱子沿着不同的軌道和平地向前移动，互不相撞。大家知道，按几何学說来，平行綫是不会相交的。可是，这个高明理論的編造者認为，这兩条平行綫总有一天会相交，而当它們相交的时候，我們就有了社会主义。这个理論沒有看到，在这兩个所謂"箱子"后面站着阶級，而这兩个"箱子"是在殘酷的阶級斗爭中，在生死存亡的斗爭中，在按照"誰战胜誰"的原則进行的斗爭中移动的。

不难了解，这种理論和列宁主义毫無共同之处。不难了解，从客观上說，这种理論的目的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經济的陣地，用"新的"理論武器把富农分子武裝起来反对集体农庄，破坏集体农庄的陣地。

可是，这种理論直到現在还在我們的报刊上流行着。而且不能說它已經受到我們理論家的严重反击，更不用說致命的反击下。發生这种荒誕的事情，不是由于我們的理論思想落后，又是由于什么呢？

其实，只要从馬克思主义宝庫中取出再生产理論来和各种成分平衡論相对立，就能把这后一个理論打得粉碎。的确，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論教导說，現代社会不逐年实行积累就不能發展，而沒有逐年扩大的再生产就不能实行积累。这是很明白的，可以理解的。我們的集中的社会主义大工业是按照馬克思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理論發展的，因为它的規模每年都在扩大，它有自己的积累，并一日千里地向前發展。

但是，我們的大工业并沒有包括整个国民經济。相反地，在我国国民經济中占优势的还是小农經济。能不能說我国小农經济是按照扩大再生产原則發展的呢？不，不能这样說。我国小农經济的大部分不仅不能实現逐年扩大的再生产，相反地，連簡單再生产也是很少有可能实現的。如果农业基础是这样一种既不能实現扩大再生产而又在我国国民經济中占优势的小农經济，那末能不能加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呢？不，不能。能不能在相当長的时期内把苏維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建立在兩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說，建立在最巨大最統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經济基础上呢？不，不能。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使整个国民經济全部崩潰。

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农业成为大农业，使农业能实行积累和实現扩大再生产，从而改造国民經济的农业基础。

但是怎样使农业成为大农业呢？

要做到这一点有兩条道路。一条是資本主义道路，就是用在农业中培植資本主义的方法使农业成为大农业，結果是使农民貧困，使資本主义企业在农业中發展起来。我們摈棄了这条道路，因为它是和苏維埃經济不相容的。

另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农业中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結果是使小农經济联合成为以技术和科学裝备起来的大規模集体經济，这种經济有可能向前發展，因为它能够实現扩大再生产。

因此，問題就是这样：或者走第一条道路，或者走第二条道路；

或者向資本主义后退，或者向社会主义前进。任何第三条道路都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平衡”論就是企圖指出第三条道路。正因为它指望着第三条（不存在的）道路，所以它是空想的，反馬克思主义的。

因此，只要拿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和各种成分“平衡”論相对立，就能把这后一个理論打得粉碎。

为什么我們的馬克思主义者土地問題專家不这样做呢？誰需要使这种可笑的“平衡”論在我們报刊上流行，而把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論束之高閣呢？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二八至一三〇頁）

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摘錄)

斯大林

第二个錯誤，是这些同志把資产阶級利益和無产阶級利益的对立、他們之間的殘酷的阶級斗爭，当成为社会的完全分裂，当成为兩个敌对阶級間斬断了一切联系。他們認为既然社会分裂了，再沒有統一的社会，有的只是阶級，那末就不需要有对整个社会的統一的語言，不需要民族的語言了。既然社会完全分裂了，并且沒有全民的民族語言，那末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只是阶級和"阶級語言"了。自然每个"阶級語言"都有自己的"阶級的"文法："無产阶級的"文法和"資产阶級的"文法。其实这样的文法在天地間是不存在的。可是这件事并沒有使这些同志覺得难为情，他們相信这样的文法一定会出現的。

有个时候在我国曾經有过"馬克思主义者"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鉄路是資产阶級的，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鉄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無产阶級的"鉄路。由此他們获得了一个外号叫做"穴居野人"。

显然这种对于社会、阶級、語言的粗陋的無政府主义观点，是与馬克思主义沒有任何相同之点的。但是这种观点的确在我們一些弄糊塗了的同志的腦筋中还繼續存在着。

認为在社会中有殘酷的阶級斗爭存在，好像一个社会便分裂成了相互之間毫無經济联系的各个阶級，当然是不正确的。相反地，只要資本主义存在一天，有产者和無产者相互之間便有千絲万縷的經济联系。他們是一个資本主义社会里的兩部分。有产者如果沒有受他支配的雇佣工人便不能生活和發財；無产者如果不出卖自己的劳

动力給資本家，也便無法繼續生存。斬断他們之間一切經济联系，便是停止一切生产，而停止一切生产便会使得社会灭亡，阶級本身灭亡。很显然的，沒有一个阶級願意自己灭亡的。因此，阶級斗爭不管怎样尖銳，是不会引起社会的分裂的。只有在馬克思主义理論上完全無知，只有絲毫不懂語言的本性，才会使我們某些同志說出什么社会分裂、"阶級的"語言、"阶級的"文法等这类荒唐話。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發表。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五月出版的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一五至一七頁）

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 泽 东

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

同志們！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們的党已經規定了自己的任务。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 这是毛澤东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議上所作的报告。毛澤东同志的这个报告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議之后作的。这一次政治局会議批評了党內那种認为中国民族資产阶級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錯誤观点，决定了建立民族統一战綫的策略，是一次極关重要的中央会議。毛澤东同志根据中央决議在这里充分地說明了和民族資产阶級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战綫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和紅軍在这个統一战綫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領导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長期性，批判了党內在过去長时期內存在着的狹隘的关門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紅軍在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同时，毛澤东同志唤起党內注意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敗的历史教訓，指出了蔣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这样就保証了后来我党在新环境中能夠具有清醒的头腦，在蔣介石的無穷欺騙和很多次的武裝襲击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損失。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貴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議，建立了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領导，改变了过去"左"傾机会主义的領导。但那次会議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夠对于当时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書記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会的組織問題做了决議。紅軍長征到达陕北之后，党中央才获得可能去有系統地說明政治策略上的諸問題。对于这类政治策略上的問題，毛澤东同志的这篇报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爭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間的斗爭，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經在一个时期內給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爭，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經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凱㊀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約二十一条㊁，不得不宣告無效。一九二二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頓九国会議签訂了一个公約㊂，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沒有很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㊃，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

㊀ 袁世凱为清朝末年北洋軍閥的头子。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推翻清朝以后，他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又利用当时領导革命的資产阶級的妥协性，篡夺了总統的职位，組織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級的第一个北洋軍閥政府。一九一五年他要做皇帝，因为想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就承認了日本的旨在独占全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同年十二月，在云南發生了反对袁世凱称帝的起义，随即在各地得到响应。袁世凱于一九一六年六月死于北京。

㊁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內答复。該要求全文共五号：前四号包括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利的移讓，并要求增加日本在山东的新权利，日本在南滿洲和东蒙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經营权，建筑鉄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沿海港灣島嶼概不讓于第三国等条款；第五号所列款項則要求攫取統治中国的政治、財政、警察、軍事的大权，并欲攫取湖北、江西和广东之間的重要鉄路建筑权。袁世凱除对第五号声明"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認。但因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的要求未能实行。

㊂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美国政府召集中、英、法、意、比、荷、葡、日八国代表，加上美国共九国，在华盛頓开会。这是一个美国与日本爭夺远东霸权的会議。次年二月六日，根据美国所謂"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門戶开放"的意見，締結了九国公約。九国公約的作用，是造成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控制中国、并在实际上为美帝国主义独占中国作准备的局面，来打消日本独占中国的計划。

的范圍暫时还限于东北四省㊂，就使人們覚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經显示他們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們要占領全中国。現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狀态。最近的冀东事变㊃和外交談判㊄，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給中国一切阶級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問題。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兩者之間呢？

現在，我們来看一看中国各个阶級怎样来回答这个問題。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証明中国工人阶級和农民阶級是中国革命的最堅决的力量。

中国的小資产阶級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資产阶級，現在不是已經發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㊅么？中国的这些小資

㊂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駐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謂"关东軍"襲取沈阳。这时中国駐沈阳及东北各地的軍队（东北軍）接受蔣介石的"絕对不抵抗"的命令，撤退至山海关以南，使日軍迅速地占領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中国人民习慣上称日寇这次侵略的行动为"九一八事变"。

㊃ 东北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相当于現在的东北大行政区所屬辽东、辽西、吉林、松江、黑龙江、热河六省和内蒙自治区大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軍先占領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占热河。

㊃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唆使国民党汉奸殷汝耕在河北省东部二十二个县成立傀儡政权，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为"冀东事变"。

㊄ 外交談判，指当时蔣介石政府与日本政府所进行的关于所謂"广田三原則"的談判。"广田三原則"是当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所謂"对华三原則"，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締一切排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滿"經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广田在日本議会演說称："中国政府业已承認帝国所提出之三原則。"

㊅ 在一九三五年，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开始新的高潮。北京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領

产阶級成份曾經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农民一样，他們有同帝国主义势不兩立的小生产的經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經給了他們以重大的損害，使他們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現在他們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沒有出路。

問題摆在民族資产阶級、买办阶級和地主阶級面前，摆在国民党面前，又是怎样的呢？

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买办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过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說：革命（不論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們組成了一个卖国賊营壘，在他們面前沒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綫，他們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們的总头子就是蔣介石㈨。这一卖国賊营壘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沒有这一群卖国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們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民族資产阶級是一个复杂的問題。这个阶級曾經参加过一九二

导下，首先在十二月九日举行爱国的示威，提出"停止內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这个运动衝破了国民党政府与日寇联盟的長期恐怖統治，很快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人們称为"一二九运动"。全国各阶級的关系由此很明显地表現出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成为一切爱国人們共同公开主張的国是。蔣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極大地被孤立了。

㈨ 毛澤东同志做这个报告的时候，蔣介石繼續其出卖东北的伎俩，正又在出卖华北，并繼續积極向紅軍作战。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須尽量揭穿蔣介石这个卖国賊的眞面目；也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这时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还沒有包括蔣介石在內。但是毛澤东同志在这个报告內，已經說到了各帝国主义間的矛盾可能引起中国地主买办阶級营壘中的分化。后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进攻，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發生了严重的衝突，中国共产党就認为和英美帝国主义利益密切联系的蔣介石集团可能在其主子的命令下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因而采取逼迫蔣介石轉向抗日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五月，紅軍由山西回师陝北，即直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內战一致抗日。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又致国民党中央一封信，要求組織兩党共同反日的統一战綫，并派遣代表进行談判。但蔣介石仍然拒絕共产党的主張。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蔣介石在西安被国民党內主張联共抗日的軍人所扣留的时候，他才被迫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內战准备抗日的要求。

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問題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資产阶級有沒有發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們認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資产阶級同地主阶級、买办阶級不是同一的东西，他們之間是有分别的。民族資产阶級沒有地主阶級那样多的封建性，沒有买办阶級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資产阶級內部有同外国資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資产阶級的右翼，我們暫且不去估計他們的变化的可能性。問題是在沒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較少的那些部分。我們認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資产阶級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發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們的动摇。他們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这二者之間动摇着。这就說明，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他們为什么參加了革命，及到这一时期之末，他們又为什么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現在的时期，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时期有什么分别呢？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現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来，他們抛棄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級，和地主买办阶級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沒有呢？沒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为这些情况，我們認为民族資产阶級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爭的某些阶段，他們中間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爭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則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蔡廷鍇等人領导的十九路軍㊀是代表什么阶級的利益呢？他們

㊀ 蔡廷鍇当时是国民党第十九路軍的一个軍長，兼該路軍的副总指揮，与陈銘樞蒋光鼐同为該路軍的負責人。十九路軍原来在江西与紅軍作战，九一八事变后調往上海。那时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的高潮，給了十九路軍以很大影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軍陆战队向上海攻击，十九路軍和上海人民在一起进行了抗战。但是这个战爭后来因为蒋介石和汪精衛的出賣而失敗。随后，十九路軍又被蒋介石調到福建去和紅軍作战。这时十九路軍的領导人物逐漸覺悟到和紅軍作战是沒有出路的行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軍將領联合国民

是代表着民族資产阶級、上層小資产阶級、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蔡廷鍇們不是同紅軍打过死仗的嗎？可是后来又同紅軍訂立了抗日反蔣同盟。他們在江西，向紅軍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紅軍成立了妥协，向蔣介石开起火来。無論蔡廷鍇們將来的事业是什么，無論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發动民众斗爭，但是他們把本来向着紅軍的火力掉轉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蔣介石，不能不說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壘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壘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我們党內持这样一种論点的人是不对的，他們說，整个地主資产阶級的营壘是統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他們不但不認識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連历史也忘記了。

讓我再講一点历史。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当着革命軍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發生了唐生智、馮玉祥㊁參加革命的事情。馮玉祥于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还曾經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軍。

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經和十九路軍一道进攻江西紅軍的第二十六路軍，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举行了宁都起义㊂；变成了

党內李济深等的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蔣介石破裂。他們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紅軍成立抗日反蔣的协定。十九路軍和福建人民政府在蔣介石的兵力压迫下失敗。此后蔡廷鍇等人逐步地轉入了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場。

㊁ 一九二六年九月，当北伐的革命軍攻抵武汉时，馮玉祥率領他的軍队在綏远省宣布脫离北洋軍閥的系統而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初，其部队由陕西出發，和北伐軍会同进攻河南省。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和汪精衛叛变后，馮玉祥亦参与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但和蔣介石集团間始終存在着利害衝突。九一八事变后，他贊成抗日，在一九三三年五月間，与共产党合作，在張家口組織民众抗日同盟軍，由于蔣介石势力和日本侵略軍的双重压迫，这次抗日起义于八月間失敗。馮玉祥在晚年繼續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場。

㊂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軍被蔣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紅軍。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該路軍一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領导下，响应中共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

紅軍嗎？宁都起义的領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㊃，也是統治者营壘中的一个分裂。

所有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彈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爭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洶涌的陣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壘是会發生破裂的。

同志們，現在讓我們把問題轉到另一点。

如果有人拿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在政治上經济上的軟弱性这一点来反对我們的論点，認为中国民族資产阶級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沒有改变态度的可能，这种說法对不对呢？我認为也是不对的。如果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民族資产阶級的軟弱性，那末，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为什么改变了他們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簡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資产阶級的軟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們从娘肚子里帶出来的老毛病嗎？难道今天軟弱，那时就不軟弱嗎？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資产阶級的軟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負他們，而这也就規定了他們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我們不但不否認，并且完全承認：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級容易拿某种臨时的賄賂为餌將他們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規定了他們对于革命的不徹底性。可是总不能說，在今天的情况下，他們同地主阶級和买办阶級沒有任何的分别。

所以我們着重地指出：国民党营壘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發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現于民族資产阶級的动搖，表現于馮玉祥、蔡廷鍇、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說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經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

加入紅軍。

㊃ 馬占山原为国民党东北軍的軍官，他的部队駐在黑龙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軍由辽宁向黑龙江推进时，該部曾进行抵抗。

能性。

同志們！这个問題的正面，已經說完了。讓我再来說一說它的反面，那就是民族資产阶級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騙民众的好手这样一个問題。为什么？因为他們中間除了那些眞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們而外，有許多人在一个时期內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現，所以他們同时就具备着欺騙民众的資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認識他們的不徹底性以及裝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評同盟者、揭破假革命、爭取領导权的責任。如果我們否認民族資产阶級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輕了我們党对于爭取領导权的任务。因为，如果民族資产阶級是同地主买办一模一样，以卖国賊的猙獰面孔出現，爭取領导权的任务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减輕了。

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資产阶級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該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級营壘中也不是完全統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許多帝国主义爭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爭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輕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爭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們不去說它。于今只說被蔣介石禁閉过的国民党政客胡汉民㊀；不久以前也签名于我們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綱領的文件㊁。胡汉民所依托的兩广

㊀ 胡汉民为国民党的著名政客，曾反对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策，是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發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謀者。后因与蔣爭夺权利，被蔣监禁。九一八事变后被釋放，由南京到广州，策动兩广派軍閥勢力与蔣介石南京政府形成長期对立的局面。

㊁ "抗日救国六大綱領"即"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綱領"，由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四年提出，經宋庆龄等签名公布。綱領包括下列各項条款：（一）全体海陆空軍总动員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員；（三）全体人民总武裝；（四）沒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財产及卖国賊財产以解决抗日战費；（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裝自衛委員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軍，与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誼关系。

派軍閥㈠，也在所謂"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㈡并重"（蔣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騙口号之下，同蔣介石对立。你們看，不是有点奇怪嗎？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一点特别有趣的爭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爭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們要把敌人营壘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把这个阶級关系問題总起来說，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級之間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壘的势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壘的势力。

現在我們来說中国民族革命营壘里的情形。

首先是紅軍的情形。同志們，你們看，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紅軍都在作陣地的大轉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同志㈢等率領第六軍团向賀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轉移㈣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們的轉移㈤。今年三月，川陝边区的紅軍也开始轉移㈥。这三

㈠ 兩广派軍閥指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

㈡ 蔣介石匪帮把革命人民叫做"匪"，把他們自己用軍队进攻和屠杀革命人民的行为叫做"剿匪"。

㈢ 任弼时同志，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員和組織家之一。自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党的历次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員，在一九三一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三三年，任湘鄂边区省委書記兼紅軍第六軍团政治委員。紅六軍团与紅二軍团会合后，任二、六兩軍团組成的第二方面軍的政治委員。抗日战爭初期任八路軍总政治部主任。一九四〇年参加中共中央書記处工作。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处書記。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逝世于北京。

㈣ 中国工农紅軍第六軍团原駐湘鄂边区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八月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开始突圍轉移。同年十月，在貴州东部与賀龙同志率領的紅軍第二軍团会合，組成紅軍第二方面軍，开闢湘鄂川黔的革命根据地。

㈤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紅軍第一、第三、第五軍团（即紅軍第一方面軍，亦称中央紅軍），从福建西部的長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等地出發，开始战略性的大轉移。紅軍經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貴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陝西等十一个省，走过終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草地，历尽艰

支紅軍，都放棄了原有陣地，轉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轉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轉移中，紅軍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們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暫时的部分的胜利，我們是遭遇了暫时的部分的失敗。这种說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說（例如張国燾㊆）：中央紅軍㊇失敗了。这話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馬克思主义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蝦蟆坐在井里說："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們說，紅軍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来是失敗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長征計划的方面）說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面）說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現"圍剿""追剿"計划的方面）說

苦，击溃敌人的多次圍追堵截，連續行軍兩万五千华里（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終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㊅ 川陕边区的紅軍，即中国工农紅軍第四方面軍。一九三五年三月，第四方面軍离开川陕边区根据地，向四川西康兩省的边境轉移。同年六月，在四川西部的懋功地方与紅軍第一方面軍会合，組織左右兩路軍北上。同年九月，到达松潘附近毛兒盖一帶地区后，在第四方面軍工作的張国燾違抗中共中央的命令，擅自率領左路軍南下，分裂紅軍。一九三六年六月，由湘鄂川黔边区突圍，經湖南、貴州、云南到达西康甘孜的紅軍第二方面軍，与第四方面軍会合。这时，第四方面軍的同志們違反了張国燾的意志，与第二方面軍一起作了北上的轉移。同年十月，第二方面軍全体和第四方面軍的一部分到达陕北，与紅軍第一方面軍胜利会师。

㊆ 張国燾，中国革命的叛徒。早年投机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在党内錯誤極多，造成了極大的罪惡。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反对紅軍北上，主張紅軍向四川西康間少数民族区域退却的失敗主义和取消主义，并且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的背叛活动，自立伪中央，破坏党和紅軍的統一，使紅軍第四方面軍蒙受了重大的損失。紅軍第四方面軍及其广大幹部由于毛澤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耐心教育，迅速地回到了党中央的正确領导之下，并在后来的斗爭中起了光荣的作用；但張国燾本人則終于不可救藥，于一九三八年春季，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并投入了国民党特务集团。

㊇ 中央紅軍，指原来在江西福建区域發展起来而由中共中央所直接領导的紅軍，即紅軍第一方面軍。

来是失败了。这样說才是恰当的，因为我們完成了長征。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义呢？我們說，長征是历史紀录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队，長征是播种机。自从盤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經有过我們这样的長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間，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偵察轟炸，地下几十万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說不尽的艰难險阻，我們却开动了每人的兩只脚，長驅二万余里，縱橫十一个省。請問历史上曾有过我們这样的長征么？沒有，从来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产。長征又是宣傳队。它向十一个省內大約兩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紅軍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許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內，發芽、長叶、开花、結果，將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胜利、敌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沒有共产党，这样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領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員，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誰怀疑我們領导革命战爭的能力，誰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团結，粉碎了卖国賊蔣介石向着陝甘边区的"圍剿"㊀，給党中央

㊀ 一九三五年七月，国民党軍开始对陝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圍剿"。陝北紅軍第二十六軍先在东綫击溃了敌人兩个旅，將該綫敌人赶到黃河东面。同年九月，原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紅軍第二十五軍，經陝南隴东到达陝北，与陝北紅軍会合，成立紅軍第十五軍团。紅十五軍团在甘泉劳山战役中消灭敌軍一一〇师大部，击毙其师长，不久又將敌軍一〇七师的四个营消灭于甘泉榆林桥。于是敌人重新組織进攻，以董英斌（东北軍的一个軍長）帶五个师分兩路进攻，东边一个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西边四个师由甘肅的庆阳、合水沿葫蘆河向陝北鄜县方面前进。同年十月，中央紅軍到达陝北。十一月，中央紅軍和紅十五軍团共同歼灭敌軍一〇九师于鄜县西南的直罗鎮，又于追击中歼灭敌軍一〇六师一个团于黑水寺。这样就徹底粉碎了敌人对陝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圍剿"。

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主力紅軍如此，南方各省的游击战爭怎么样呢？南方的游击战爭，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并沒有被消灭。許多部分，正在恢复、生長和發展㊀。

在国民党統治区，工人的斗爭正在从厂內向着厂外，从經济斗爭向着政治斗爭。工人阶級的反日反卖国賊的英勇斗爭，現在是在深刻地醞釀着，看样子离爆發的时候已不远了。

农民的斗爭沒有停止过。在外禍、內难、再加天灾的压迫之下，农民广泛地發动了游击战爭、民变、鬧荒等等形态的斗爭。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爭㊁，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發展，將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發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衝破卖国賊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爭配合起来，才有可能。

民族資产阶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們的动摇以至参加抗日斗爭的可能性，前面已經說过了。

少数民族，特别是內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爭。其前途，將和华北人民的斗爭和紅軍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陣势，是由局部性轉变到全国性，由不

㊀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間，中国南部紅軍的主力轉移时，曾經留下了一部分游击部队。这些游击部队，在八个省份內坚持了十四个地区的游击战爭。这些地区是：浙南地区，閩北地区，閩东地区，閩南地区，閩西地区，贛东北地区，閩贛边地区，粤贛边地区，湘南地区，湘贛边地区，湘鄂贛边地区，鄂豫皖边地区，豫南桐柏山区和广东省的琼崖地区。

㊁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裝反抗，組織了抗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軍，援助了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軍。一九三四年后，一切东北抗日的队伍，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組成为統一的东北抗日联軍，以著名的共产党員楊靖宇为总指揮，長期坚持了东北的抗日游击战爭。冀东的抗日游击战爭，系指一九三五年五月發生于河北省东部的一次农民抗日起义。

平衡狀态逐漸地轉变到某种平衡狀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紅軍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資产阶級、民族資产阶級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統一的民族革命战綫。

民族統一战綫

观察了反革命和革命兩方面的形势以后，我們就容易說明党的策略任务了。

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战綫。

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經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导方式，也必須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賊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們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国家。

实現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偉大的任务。这須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是下了凶横直进的决心的。国內豪紳买办阶級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兩天可以成功的，必須准备花費長久的时間；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須聚积雄厚的力量。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較过去更加衰弱了，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較过去更加增長了。这是正确的估計，这是一方面的估計。但是同时我們应当說，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暫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这也是正确的估計，这是又一方面的估計。由于中国政治經济發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發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沒有起来，或者發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長时期內已經遇到的情形。在將来，可以想到，在某些阶段里，革命的总的形势是更加發展了，但是不平衡狀态还会存在着。要把不平衡的狀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狀态，还要經过很長的时間，还要花費很大的气力，

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綫的正确。如果說，苏联共产党領导的革命战爭㊀是在三个年头里完結了的話，那末中国共产党領导的革命战爭，过去已經花去了很長的时間，而要最后地徹底地解决內外反革命勢力，我們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間，像过去那样地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还得提出一个很好的革命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狹小的圈子里打轉，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不是說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險不容許我們有一分鐘的懈怠。今后革命發展的速度，也一定比过去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临在战爭和革命的新时期了。虽然如此，中国革命战爭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規定了这个持久性。我們說，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現时革命形勢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現在我們又說，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狀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須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現时革命形勢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兩种特点，这兩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訓我們，要求我們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們調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抛棄关門主义，采取广泛的統一战綫，防止冒險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沒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这里不来說关門主义和冒險主义的关系，也不来說冒險主义在將来大的时局开展中可能發生的危險性，这点等到將来再說不迟。这里只說統一战綫的策略和关門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兩个不同的策略。

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馬，好把敌人包圍而消灭之。

一个則依靠單兵独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一个說，如果不足够地估計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

㊀ 苏联共产党領导的革命战爭，系指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苏联人民反对英美法日波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裝干涉和平定白党叛乱的战爭。

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綫，就不能足够地估計到組織广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战綫的可能性。如果不足够地估計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足够地估計到組織广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战綫的必要性；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門主义；就不会拿着統一战綫这个武器去組織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軍，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賊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沒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軍身上却吃了我們的子彈。这个叫做不会擇敌和浪費彈藥。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驅逐到狹小的孤立的陣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壘中被裹胁的人們，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軍的人們，都从敌人营壘中和敌人战綫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滯、孤立、縮小、降落，甚至走到失敗的道路上去。

一个則說，这些批評都是不对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聖經上載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資产阶級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讓不得。对于黃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鍇握手的話，那必須在握手的瞬間罵他一句反革命。那有猫兒不吃油，那有軍閥不是反革命？知識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們是危險的。因此，結論：关門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統一战綫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同志們，統一战綫的道理和关門主义的道理究竟那一个是对的呢？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贊成那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贊成統一战綫，反对关門主义。人中間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許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們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們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門主义策略的人們所主張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綫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

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現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兩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統一战綫的出發点。組織千千万万的民众，調动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賊打垮，这是有目共見的眞理。因此，只有統一战綫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門主义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門主义"为淵驅魚，为叢驅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蕩蕩"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門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賊的忠順的奴僕。关門主义的所謂"純粹"和"笔直"，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則向之嘉奬的东西。我們一定不要关門主义，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战綫。

人民共和國㊀

如果說，我們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阶級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現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阶級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級中願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在目前，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这个政府的成份將扩大到广泛的范圍，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沒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們，只要他們願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綱領，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則，据此以

㊀ 毛澤东同志在这里所提出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質及其各項政策，在抗日战爭期間，已經在共产党領导下的人民解放区完全实現了。因此，共产党能够在敌后战場領导人民对日寇进行胜利的战爭。在日本投降以后爆發的第三次国內革命战爭中，随着战爭的进展，人民解放区逐步扩張到了全中国，这样就出現了統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澤东同志关于人民共和国的理想，就在全国范圍內实現了

适当地修改我們过去的政策。

現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經过鍛煉的共产党，又有了經过鍛煉的紅軍。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現时还沒有經过鍛煉的共产党和紅軍，那就將發生极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汉奸卖国賊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們必然想出各种法子来破坏这个統一战綫，用他們威迫利誘、縱横捭闔的手段来挑撥离間，用兵力来强压，来各个击破那些比較他們小的、願意离开卖国賊而同我們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軍队中缺乏共产党和紅軍这个要素，这种情形是难于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內的机会主义路綫，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領导的軍队），而只依仗其暫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結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紳买办阶級，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蔣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衛拉去，使革命陷于失敗。那时的革命統一战綫沒有中心支柱，沒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軍作战，無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賀龙、叶挺一支軍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軍队，党又不善于領导它，終归失敗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紅軍都已經有了，而且有了紅軍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發起人，而且在將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蔣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沒有疑义，威迫利誘，縱横捭闔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蔣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們是要十分留神的。

当然，对于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广泛的队伍，我們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产党和紅軍一样程度的巩固。在他們的活动过程中，有些坏分子因为受了敌人的影响退出統一战綫的事情，是会發生的。但是我們不怕这些人退出去。一些坏人受敌人的影响退出去，一些好人却会受我們的影响加进来。只要共产党和紅軍本身是存在的，

發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必然也会是存在的，發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紅軍在民族統一战綫中的領导作用。共产党人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他們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蔣介石能够用縱横捭闔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縱横捭闔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們能够拉了我們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們当然也能够拉了他們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們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們能够从他們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們的队伍就扩大了。总之，現在是兩个基本势力相斗爭，一切中間势力，不附屬于那一方面，就附屬于这一方面，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蔣介石灭亡中国和出卖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驅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們方面来，或者徑直加入共产党和紅軍的队伍，或者同共产党和紅軍結成联合战綫。只要我們的策略不是关門主义，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

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規定的十大政綱㊀，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現在的情况，使得我們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級关系，不但小資产阶級，而且民族資产阶級，有了参加抗日斗爭的可能性。

那是沒有問題的，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級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紳买办阶級是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份放在所謂人民之列。这和蔣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政

㊀ 在一九二八年七月間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規定了下列的十大政綱：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統治；二、沒收外国資本的企业和銀行；三、統一中国，承認民族自决权；四、推翻軍閥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議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資、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險等；七、沒收一切地主阶級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給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稅，实行統一的累进稅；十、联合世界無产阶級和苏联。

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謂“国民”之列，是一样的。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構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級和地主阶級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們仅仅离开他們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們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們有权利称我們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

工人阶級的利益同民族資产阶級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要开展民族革命，对于民族革命的先鋒队不給以政治上、經济上的权利，不使工人阶級能够拿出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賊，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民族資产阶級如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那末，工人阶級和民族資产阶級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人民共和国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廢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沒收民族資产阶級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發展。任何民族資本家，只要他不贊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賊，我們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資間的斗爭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資本家發財，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發展，因为这种發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由此可知，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層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納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級。

讓这些人参加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不危險嗎？不危險的。工人农民是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群众。給城市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及其他拥护反帝反封建綱領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說話做事的权利，給他們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違背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我們綱領的重要部分应当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工农基本群众的

代表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領导和活动，都保証了他們进来不危險。中国革命的現时阶段依然是資产阶級民主主义性質的革命，不是無产阶級社会主义性質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㊀，才瞎說中国已經完成了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資产阶級民主主义性質的革命，这次革命沒有完成，而是失敗了。一九二七年至現在，我們領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資产阶級民主主义性質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資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長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

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阶級，現在則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資产阶級。

革命的轉变，那是將来的事。在將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轉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轉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轉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間会要相当地長。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經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轉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輕易談轉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間內去轉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謂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轉

㊀ 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說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級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誠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極端錯誤的政治派别，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現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級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偵探間諜、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偵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級死敌的匪帮。"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敗之后，中国也出現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結合，于一九二九年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小組織，散布国民党已經完成了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等类的反革命宣傳，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汚工具。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們接受托洛茨基匪賊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領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

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們看不見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經济情况的国家，他們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經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間和努力。

国际援助

最后，需要講一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們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說我們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現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爭都是必要的。古人說："春秋無义战。"㊀于今帝国主义則更加無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級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爭，都是义战。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义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是义战。中国的反鴉片战爭㊁，太平天国战爭㊂，义和团战爭㊃，辛亥革命战爭㊄，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爭，一九

㊀ "春秋無义战"，語見"孟子"。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年——前四八一年），中国許多封建諸侯相互不間断地进行爭权夺利的战爭，所以孟子有此說法。

㊁ 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因中国人反对鴉片貿易，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軍队在林則徐領导下曾經进行了抵抗的战爭。那时，广州人民自發地組織了"平英团"，也使英国侵略者受了很大的打击。

㊂ 太平天国战爭是發生于十九世紀中叶的反对滿清封建統治和民族压迫的农民革命战爭。一八五一年一月，这次革命的領导者洪秀全、楊秀清等，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宣布成立"太平天国"。一八五二年出广西，經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于一八五三年攻克南京。随后从南京分出一部兵力北上，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太平軍在它占領的地方都沒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領导集团又犯了許多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錯誤，因此不能抵抗清朝的反革命軍队和英美法侵略分子的联合进攻，而在一八六四年失敗。

㊃ 义和团战爭，是一九〇〇年中国北部农民和手工业者群众，采取神秘主义的秘密結社的形态、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广大的自發运动。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

二七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战爭，今天的抗日和討伐卖国賊的战爭，都是义战。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將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該使之轉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綫㊍。我們的抗日战爭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們也一定会援助我們，因为我們和他們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內，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蔣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說，我們是孤立的。現在这种形势已經改变了，变得对我們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繼續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們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爭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七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一卷排印）

武装力量占領北京天津，殘酷地鎮压了这个运动。

㊌ 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三。

㊍ 参看列宁"無产阶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一文，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要讀本"第六章第三节。

統一战綫中的独立自主問題*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毛 澤 东

幫助和讓步应該是積極的，不应該是消極的

为了長期合作，統一战綫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应該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我們必須巩固和扩大我党我軍，同时也应贊助友党友軍的巩固和扩大；人民要求政府滿足自己的政治經济要求，同时給政府以一切可能的利于抗日的援助；工人要求厂主改良待遇，同时积极作工以利抗日；地主应該减租减息，同时农民应該交租交息，团結对外。这些都是互助的原則和方針，是积极的方針，不

---

* 这是毛澤东同志在党的第六屆中央委員会第六次全体会議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統一战綫中的独立自主問題，是当时毛澤东同志与陳紹禹同志关于抗日統一战綫問題上意見分歧的突出問題之一。这在本質上就是統一战綫中無产阶級領导权的問題。关于这种意見分歧，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中曾作了以下簡單的总結："抗日战爭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按：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爭时期陳独秀的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讓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群众，不敢放手發动群众斗爭，不敢在日本占領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軍队，將抗日战爭的領导权送給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無能的腐朽的違背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爭，坚决地执行了'發展进步势力，爭取中間势力，孤立頑固势力'的政治路綫，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軍。这样，就不但保証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証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蔣介石举行反革命战爭时期，能够順利地不受損失地轉变到用人民革命战爭反对蔣介石反革命战爭的軌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偉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訓，全党同志都要牢記。"

是消极的片面的方針。互讓也是如此。彼此不挖牆脚，彼此不在对方党政軍內組織秘密支部；在我們方面，就是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軍队內組織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㊀，正是这种情形。沒有紅軍的改編，紅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現全国的抗日战爭。讓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驟达到了积极的目的。"为了更好的一躍而后退"㊁，正是列宁主义。把讓步看作純消极的东西，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所許可的。純消极的讓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資合作論㊂，把一个阶級一个革命都讓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張国燾，都是投降主义者；我們应該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們的讓步、退守、防御或停頓，不論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綫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綫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話，是积极的。

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一致性

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战爭，就是說使阶級斗爭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爭，这是統一战綫的根本原則。在此原則下，保存党派和阶級的独立性，保存統一战綫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統一而犧牲党派和阶級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級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战綫。在民族斗爭中，阶級斗爭是以民族斗爭的形式出現的，这种形式，表現了兩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級的政治經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內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級斗爭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爭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發点。这样便把

㊀ 語見"孟子"。原文为："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㊁ 引自列宁"哲学笔記"："黑格尔'哲学史講演录'一書摘要"。

㊂ "劳資合作論"，是第二国际在資本主义国家內，主張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合作，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資产阶級統治以建立無产阶級專政的反动理論。

統一战綫中的統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爭和阶級斗爭，一致起来了。

“一切經过統一战綫”是不对的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許有統一战綫的組織形式。刘少奇同志說的很对，如果所謂“一切經过”就是經过蔣介石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無所謂“經过統一战綫”。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經許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綱領”），独立自主地去做，無法“一切經过”。或者估計国民党可能許可的，先斬后奏。例如設置行政專員，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經过”則行不通。听說法国共产党曾經提出过这个口号，那大概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員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綱領，社会党方面不願照做，依然干他們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縛自己。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剝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圖指揮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們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經过”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縛起来，是完全不应該的。在現时，有些应該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將三个师的番号扩編为三个軍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斬。有些則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訴它，例如發展二十余万軍队，这叫做先斬后奏。有些則暫时斬而不奏，估計它現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議会之类。有些則暫时不斬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战綫，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經过統一战綫”的口号。“一切服从統一战綫”，如果解釋为“一切服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战綫中的独立自主，既統一，又独立。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二卷排印）

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时局好轉*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八日）

毛　泽　东

目前时局發展的情况，証明中央的历次估計是正确的。大地主大資产阶級的投降方向和無产阶級、农民、城市小資产阶級、中等資产阶級的抗战方向，是对立的，双方在斗爭中。目前是兩种方向同时存在，兩种前途都有可能。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認識的，就是不要把各地發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現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現象，应認識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現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沒有这种精神，如果沒有坚决反抗这些現象的正确方針，如果听任国民党頑固派的"軍事限共"和"政治限共"發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統一战綫一点設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險的，投降和反共就將全国化，統一战綫就有破裂的危險。必須認清目前国內国际尙存在着許多利于我們爭取繼續抗战、繼續团結和繼續进步的客观条件，例如，日本对华方針依然是非常强硬的；英美法和日本之間的矛盾虽已部分縮小，但并未眞正协調，而且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又被欧战削弱，因而所謂远东慕尼黑会議很难召集；苏联积极援助中国；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爭的国际条件。又如，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团結的方針；中間阶級也反对投降；国民党內部投降派和頑固派虽然握有权力，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

---

* 这是毛澤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內的一个指示。

行全国反共战爭的国內条件。在上述情况下，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頑固派的軍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發展全国党政軍民学各方面的統一战綫，力爭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爭中間阶層，力爭抗战軍队中的同情者，力爭民众运动的深入，力爭知識分子，力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裝、抗日政权的發展；力爭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資产阶級的投降危險并爭取时局的好轉前途。所以，为爭时局好轉，同时提起可能發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覚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針。

汪精衛公布卖国协定㊀和蔣介石發表告国人書之后，一方面，和平空气必受一个打击，抗战势力必有一个發展；又一方面，則"軍事限共"和"政治限共"还会繼續，地方事变还会發生，国民党有强調所謂"統一对外"以进攻我們之可能。这是因为在最近时期內，抗战和进步势力还不可能發展到足以全部压服投降和倒退势力的緣故。我們的方針，就在于在全国范圍內一切有共产党組織的地方，极力扩大反对汪精衛卖国协定的宣傳。蔣的宣言表示了他要繼續抗战，但是他沒有强調全国必須加强团結，沒有提到任何坚持抗战和进步的方針；而沒有这种方針，便無法坚持抗战。因此，我們应該在反汪运动中强調如下各項：（一）擁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衛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結起来，打倒汉奸汪精衛，打倒汪精衛的伪中央；（三）擁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衛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衛分裂抗日統一战綫的陰謀，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五）加緊全国团結，消灭內部磨擦；（六）革新內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七）开

㊀ 指一九三九年底汪精衛和日寇签訂的卖国密約"日支新关系調整綱要"。其主要內容如下：一、东北割讓給日本，將蒙疆（指当时的綏远、察哈尔兩省和山西北部）、华北、長江下游和华南島嶼，定为"日支强度結合地帶"，由日軍長期占領。二、伪政权自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都由日本顧問或职員监督。三、伪軍和伪警察，由日籍教官訓練，武器亦由日本供給。四、伪政府的財政經济政策、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資源，由日本任意开發。五、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放党禁，允許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八)保証人民有抗日反汉奸的言論集会自由权；(九)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汪派汉奸的阴謀破坏；(十)拥护抗日有功的軍队，充分接济前綫；(十一)發展抗战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締汉奸言論。以上这些口号，应公开發布之。各地应大量發表文章、宣言、傳單、演說和小册子，并增加适合地方情况的口号。

延安定二月一日召开反对汪精衛卖国协定的民众大会。各地应在二月上旬或中旬，联合各界和国民党抗日派，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二卷排印）

团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頑固派*

（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

毛 泽 东

我們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討卖国賊汪精衛，又是为了团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頑固派。

我們共产党人屢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灭华方針是坚决的。不管日本掉換什么內閣，它的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基本方針是不会变更的。中国亲日派大資产阶級的政治代表汪精衛，看了这种情形，吓得發瘋，跪倒在日本面前，訂立了日汪卖国条約，把中国出卖給日本帝国主义。他还要成立傀儡政府，和抗日政府相对立；还要成立傀儡軍队，和抗日軍队相对立。他对于反蔣近来不大提了，据說已經改为"联蔣"。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們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徹底，国共合作則力量更大，他們就用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使兩党各自孤立，最好是兩党打起来。这样，他們就利用国民党內部的頑固派，到处放火。在湖南就鬧平江慘案㊀，在河南就鬧确山慘案㊁，在山西就鬧旧軍打新軍㊂，在河北就鬧張蔭梧打八路軍㊃，在山东就鬧

---

* 这是毛澤东同志在延安民众討汪大会上所作的講演。

㊀ 見"必須制裁反动派"注一。

㊁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河南确山县国民党的特务和部队一千八百余人，圍攻确山县竹溝的新四軍留守处，慘杀因抗日受伤的新四軍幹部、战士和他們的家屬共二百余人。

㊂ 旧軍是指国民党山西軍閥閻錫山的軍队。新軍是指抗日战爭初期，在共产党領导和影响下新發展起来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裝，亦称抗日决死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蔣介石鬧錫山企圖消灭新軍，在山西西部集中六个軍的兵力向新軍进

秦啓荣打游击队㊃，在鄂东就閻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員㊄，在陕甘宁边区就閻内部的"点綫工作"㊅、外部的"封鎖工作"，并且还准备着軍事进攻㊆。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㊇；又雇請玄学鬼張君勱提出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軍新四軍的反动主張，雇請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做文章罵共产党。所有这些，無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㊈。

政，被新軍的反击所粉碎。同时，閻軍在山西的东南部摧残阳城晉城一帶的抗日民主县政府和人民团体，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員和进步分子。

㊂ 張蔭梧是国民党匪帮河北省保安司令，他从一九三九年以来，即在蔣介石的指令下，不断地进攻八路軍。是年六月，更率部襲击河北深县八路軍的后方机关，慘杀八路軍幹部和战士四百余人。

㊃ 一九三九年四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鴻烈指使秦啓荣匪部在博山襲击八路軍山东縱队第三游击支队，慘杀八路軍团級幹部以下四百余名。

㊄ 一九三九年九月，湖北东部国民党反动派程汝怀調集匪部，圍攻新四軍的后方机关，慘杀共产党員五六百人。

㊅ 国民党的特务間諜在陕甘宁边区的活动，以边区的城市为据点，并将这些据点联系起来成为几条綫，这样来布置他們的反革命工作。他們自称这种工作为"点綫工作"。

㊆ 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軍队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鎮原等五个县城。

㊇ 抗日战爭期間，国民党反动派模仿德意法西斯的办法，从中国西北的蘭州、西安至东南的贛州、上饒，設立很多集中营，逮捕大批共产党員、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囚禁其中。

㊈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逐漸积極。一九三九年二月，蔣介石秘密頒布了"共党問題处置办法"、"淪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在国民党統治区域和华中、华北各地，对于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軍事进攻日益加强。这种压迫和进攻，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达到了高潮，被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澤东同志在这里所举的国民党反动軍队在陕西、甘肅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在山西西部进攻共产党所領导的抗日决死队，就是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發动的兩次大的軍事进攻。在此以后，在一九四〇年的二三月間，蔣介石又指令国民党反动派朱怀冰刘合盧炳勛、張蔭梧、侯如墉等匪部，三路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軍。这次进攻被八路軍徹底击敗，国民党軍的三个师被消灭，而蔣介石所發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也就此被完全打退了。

这样，汪精衛派和国民党的反共頑固派兩家里应外合，把时局鬧得烏烟瘴气了。

許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非常气憤，就以为抗日沒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当反对。我們必須指出，气憤是完全正当的，那有看了这些严重情形而不气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向八路軍新四軍陣地后面打槍的人，对于那些敢于鬧平江慘案、确山慘案的人，对于那些敢于破坏边区的人，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軍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員的人，我們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讓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經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們还要鬧磨擦，鬧慘案，鬧分裂。不管他們心里怎样想，他們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衛，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罰，我們就是犯錯誤，就是縱容汉奸国賊，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实于祖国，就是縱容坏蛋来破裂統一战綫，就是違背了党的政策。但是这种給投降派和反共頑固派以打击的政策，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統一战綫。因此，我們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頑固派的人們，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員，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結他們的，是尊重他們的，是願意和他們長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誰如果不这样做，誰也就是違背了党的政策。

这就是我們党的兩条政策：一方面，团結一切进步势力，团結一切忠心抗日的人，这是一条政策；一方面，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頑固派，这是又一条政策。我們党的这些政策，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就是力爭时局好轉，战胜日本。我們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結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爭时局的好轉，挽救时局的逆轉。这就是我們的根本方針。我們决不悲观失望，我們是乐观的。我們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頑固派的进攻，我們一定要粉碎他們，我們也一定能够粉碎

他們。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国决不会亡国。中国的进步是一定的，倒退只是暫时的現象。

我們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結和进步是必要的。有些人單單强調了抗日，但不願意强調团結和进步，甚至完全不提团結和进步，这是不对的。沒有眞正的、堅强的团結，沒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堅持抗日？国民党的反共頑固派强調統一，但是他們的所謂"統一"，乃是假統一，不是眞統一；乃是不合理的統一，不是合理的統一；乃是形式主义的統一，不是实际的統一。他們高喚統一，却原来是要取消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和陕甘宁边区，說有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和边区存在，中国就不統一，他們要把全国一切都化为国民党；不但繼續他們的一党專政，而且还要扩大他們的一党專政。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統一呢？老实說，过去如果沒有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和陕甘宁边区眞心实意地出来主張停止內战一致抗日，那就無人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無人領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無从实行抗日。今天如果沒有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眞心实意地出来維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險傾向，那就会弄得一团糟。八路軍、新四軍几十万人擋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㊀，为什么要取消他們呢？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沒有貪官汚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党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沒有人吃磨擦飯㊁，十沒有人發国难財，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么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声呢？同志們，当然不能是这样的。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

㊀ 中国共产党領导的軍队所抗击的日寇軍队的数目，在后来有了变动。到一九四三年，八路軍和新四軍抗击了侵华日軍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和全部伪軍的百分之九十五。参看"毛澤东选集"第三卷"論联合政府"一文的"兩个战場"一节。

㊁ "吃磨擦飯"，即是說有些国民党人以反共为專門职业。

边区；不是取消八路軍、新四軍，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軍、新四軍；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們向落后的人們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們向进步的人們看齐。我們共产党是最主張統一的人，我們發起了統一战綫，我們坚持了統一战綫，我們提出了統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誰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誰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誰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塊錢薪水㊀呢？誰人能够創造这样的廉深政治呢？統一，統一，投降派有一套統一論，要我們統一于投降；反共頑固派有一套統一論，要我們統一于分裂，統一于倒退。我們能够信这些道理么？不以抗战、团結、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統一，算得眞統一么？算得合理的統一么？算得实际的統一么？眞是做夢！我們今天开大会，就是要提出我們的統一論。我們的統一論，就是全国人民的統一論，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統一論。这种統一論是以抗战、团結、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結，只有团結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結抗日才能統一。这就是我們的統一論，这就是眞統一論，这就是合理的統一論，这就是实际的統一論。那种假統一論，不合理的統一論；形式主义的統一論，乃是亡国的統一論，乃是丧尽天良的統一論。他們要把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統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謀，这是借統一之名，行專制之实，挂了統一这个羊头，卖他們的一党專制的狗肉，死皮賴臉，乱吹一頓，不識人間有羞耻事。我們今天开大会，就要戳破他們的紙老虎，我們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頑固派。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排印）

㊀ 当时共产党領导下的抗日軍队和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員，每人每月的伙食費和津貼費平均为銀幣五元。

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战綫*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但是还須我們繼續努力，才能最后地消灭它。我們的工作首先是战爭，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沒有文化的軍队是愚蠢的軍队，而愚蠢的軍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解放区的文化已經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遺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陝甘宁边区內，还有一百多万文盲，兩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腦子里的敌人。我們反对群众腦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們必須告訴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习慣作斗爭。为了进行这个斗爭，不能不有广泛的統一战綫。而在陝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爭期間，这种統一战綫就尤其要广泛。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規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規的村学、讀报組和識字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話剧，而且要有秦腔㊀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藥方面，更是如此。陝甘宁边区的

---

* 这是毛澤东同志在陝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議上所作的講演。

㊀ 秦腔，陝西省的一种旧式歌劇。因为陝西在古代是秦国的地方，故称秦腔。

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許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問題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訓練医生；不联合边区現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獸医，并帮助他們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統一战綫的原則有兩个：第一个是团結，第二个是批評、教育和改造。在統一战綫中，投降主义是錯誤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棄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識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們。为了改造，先要团結。只要我們做得恰当，他們是会欢迎我們的帮助的。

我們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須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須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願。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發，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願望出發。有許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观上还沒有这种覚悟，群众还沒有决心，还不願实行改革，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經过我們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覚悟，有了决心，自願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則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群众的自覚和自願，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敗。“欲速則不达”㊀，这不是說不要速，而是說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敗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兩条原則：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願，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們代替群众下决心。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五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三卷排印）

㊀ “欲速則不达”，孔子的話，見“論語”“子路”篇。

关于正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毛 泽 东

十　坏事能否變成好事？

（見本書第一二八七至一二八八頁）

毛澤东論中国革命(摘錄)

(为紀念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而作)

陳 伯 达

六 又聯合又鬥爭的广泛統一战綫

中国本来是一个农业国，近代曾經是处在各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极端动蕩的半殖民地，如前面所說，这是在东方成为許多矛盾焦点的国度。这样，就使得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可能充分利用各种矛盾，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各个击敗人民的敌人。

对于这个問題，在中国党的历史上發生过兩种錯誤的东西。一种是右傾机会主义：例如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主义，以及抗日战爭初期有的同志所犯的右傾錯誤，他們主張無原則的統一战綫，企圖使無产阶級变成資产阶級的尾巴。毛澤东同志把这种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叫做"一切联合，否認斗爭"。又一种是"左"傾机会主义：例如在十年內战时期中三次發生的，否認任何統一战綫，企圖使無产阶級和雇农貧农处于孤立的地位。毛澤东同志把这种"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叫做"一切斗爭，否認联合"。

显然，否認中国革命有广泛的統一战綫的可能性和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性，这乃是很錯誤的。一九二七年八月間，斯大林就中国問題駁斥托洛茨基派的时候，指出列宁主义在解决殖民地和附屬国革命問題时的基本出發点，就是必須严格区别帝国主义国家里的革命和受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的革命。在前一类国家里的資产阶

級和后一类国家里的民族資产阶級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是前一类的資产阶級是别国人民的压迫者，"在革命的一切阶段上都是反革命的"，而后一类的民族資产阶級則"在某一阶段上和某一时期內可以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㊀。

这也就是說：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無产阶級，在一定历史条件中，有和民族資产阶級建立革命統一战綫的可能性。

当然，在这种統一战綫中，必須不致模糊無产阶級自己的独立面目，必須絕对保持無产阶級运动的独立性。無产阶級必須在統一战綫中树立自己的領导地位。这种原則也是列宁斯大林所已規定了的。

毛澤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經驗，特别是根据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过統一战綫的經驗，發展了列宁斯大林这些观点，并形成了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統一战綫的完整的正确的政策。

毛澤东同志把中国共产党同資产阶級的統一战綫的政策，特别是如在抗日战爭时期中对于国民党大資产阶級的政策，叫做又联合又斗爭的政策。其所以需要又联合又斗爭，原因就是中国資产阶級的二重性。"左"傾关門主义看不見中国資产阶級的二重性，从而否認联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右傾机会主义也看不見中国資产阶級的二重性，从而否認斗爭的必要性。毛澤东同志的正确政策，就是对于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兩条战綫的斗爭。

这兩种机会主义在各个时候的危險性是不一样的。中国的革命史証明：当着对于資产阶級的統一战綫还沒有成为事实的时候，"左"傾关門主义乃是党的主要危險；但当着統一战綫变成事实的时候，右傾投降主义就时常成为党的主要危險了。例如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的时期，"左"傾机会主义甚至否認了和一般小資产阶級的統一战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把小資产阶級的一些小党派以及民族資产阶級的一些在野派都認为是革命最危險的敌人。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事变曾引起了中国內部

㊀ 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員会和中央监察委員会全体联席会議上的演說。

阶級間政治关系的新变化，但"左"傾机会主义者的看法依然沒有什么变化。这个"左"傾錯誤在这样的时候乃是主要的危險，因为它阻碍了党和广大人民間的联系，并阻碍了党充分利用各种矛盾以利于革命的可能性。可是，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成为事实之后，一些犯"左"傾錯誤的同志，以陈紹禹同志为代表，就轉而犯了右傾的錯誤。这个右傾錯誤在这样的时候乃是主要的危險，因为它阻碍了党和統一战綫中的反动力量及反动傾向的斗爭，有使無产阶級丧失独立的危險。

在抗日战爭期間，統一战綫甚至包括到以蔣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权派，他們是和共产党进行过十年殘酷战爭的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資产阶級。其所以有包括他們的必要，是因为他們当时拥有龐大的軍队，而美帝国主义則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爭夺远东霸权的矛盾。在形成这样广泛的抗日統一战綫之后，毛澤东同志根据阶級的分析，指出了这种統一战綫內部存在了左中右三个不同的集团，而提出了扩大与巩固左翼集团、爭取中間集团的进步与轉变、孤立右翼集团的政策，也即是"發展进步势力、爭取中間势力、孤立頑固势力"的政策。但犯右傾錯誤的同志却起来反对毛澤东同志的政策，抹杀了統一战綫中有阶級的区别，提出了"不分左中右"来和毛澤东同志的政策相对立，否認中国有法西斯的存在，甚至抹杀了国共兩党的阶級区别，而把国共兩党都認为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見陈紹禹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發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鍵"）。右傾的意見在实际上是保护了蔣介石国民党的頑固势力。

犯右傾錯誤的同志否認了毛澤东同志在抗日战爭期間所提出的"統一战綫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則，而在实际上主張一切經过蔣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犯右傾錯誤的同志并在軍事上主張"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作战計划，統一作战行动"。在实际上，这乃是要使共产党領导下的人民軍队合并于国民党軍队，任令蔣介石去并吞，完全适合于蔣介石后来所謂"軍令政令之統一"的反革命要求。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的，他們"……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

策讓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群众，不敢放手發动群众斗爭，不敢在日本占領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軍队，將抗日战爭的領导权送給国民党"㊀。

毛澤东同志在說明"統一战綫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則时，曾經指出："我們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經取得的陣地。这是我們的战略出發地，丧失了这个陣地就一切無从說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發展陣地，为了实现'动員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㊁毛澤东同志在政治上和战爭的战略問題上所提出的原則及由此所規定的一系列的政策，是为了引到一个总的大目标，即引到抗日战爭的結局成为人民胜利的結局。而这些原則和政策的問題对于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結局，則是帶决定性的問題。

但是，右傾的观点及其政策，首先就是放棄了自己已經取得的陣地，因此，發展陣地也無从說起了。因此，犯右傾錯誤的同志就不可免地引到一个完全和毛澤东同志相反的結論。例如，当时陈紹禹同志在"挽救时局的关鍵"的文章中曾經对于抗日的前途作过这样的估計："中国現在的实际情形是：如果国共兩党以合作的力量和方式达到驅逐日寇出境的胜利，那么，国民党在实际上証明其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国民党的領袖蔣先生及其他坚决領导抗战的人物，將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那时候，誰能違反中国人民的意志而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爭呢？""由此可見，听信'抗日胜利了是共产党苏維埃的天下'这种謠言的人，不但是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形太隔膜，而且是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战斗力量和光明前途無信心。这显然是非常有害的事情。"这种意見就是說，抗日胜利了之后依然只能是最反动的蔣介石国民党的天下，而不能够是共产党領导下的人民民主的天下。这种結論正是右傾分子当时一連串的右傾观点及其錯誤政策在邏輯上所不可避免地引出的結論。这种結論恰恰是对

㊀ "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

㊁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爭的形势和任务"。

于中国人民的战斗力量和光明前途的非常有害的和可耻的結論，而中国人民的战斗生活早已推翻了这种可耻的結論。恰恰和陈紹禹同志所作的估計相反：蔣介石只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賊，而永远照耀中国人民前进的眞正不朽的民族英雄，乃是無数可歌可泣的共产党員和人民的战士們。由此可見，对于中国实际情形太隔膜的，完全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形的，不是别人，正是右傾分子自己。

犯右傾錯誤的同志要以片面的消极的讓步去希望保持和蔣介石国民党的团結。然而这是完全錯誤的。毛澤东同志和右傾的同志相反，是以积极的斗爭的政策为达到团結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毛澤东同志說：

"在抗日統一战綫时期中，斗爭是团結的手段，团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团結則团結存，以退讓求团結則团結亡。"㊀

整个抗日战爭时期所發生的国內事变，完全証明了毛澤东同志所說的这个眞理。我們党按照毛澤东同志的政策，在統一战綫中堅决地以又联合又斗爭的革命兩面政策，去对付国民党大資产阶級的又抗日又准备投降、又联共又反共的兩面政策，結果就放手地發动了人民大众，团結了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稳定了动摇者，孤立了頑固派；打退了蔣介石的几次反共高潮，因此也就堅持了抗日战爭，維持了抗日的統一战綫，直至最后。

右傾分子完全不了解：我們在抗日时期中和蔣介石国民党的統一战綫，乃是建立在人民的武裝力量的基础之上。蔣介石是被迫来这样做的。如果沒有人民的武裝力量，蔣介石决不会和我們建立什么統一战綫。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右傾分子完全不了解：蔣介石国民党在被迫和我們建立統一战綫之后，依靠他的反革命武裝，随时随地都企圖利用一切方法和一切机会来进攻我們，随时随地都企圖消灭共产党和人民的武裝力量。因此，我們也就只得依靠人民的武裝力量，去和蔣介石国民党这种反革命的进攻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

㊀ "目前抗日統一战綫中的策略問題"。

爭。毛澤东同志批判了右傾分子在这兩个基本方面的錯誤，指出了这个抗日的联合，主要的是武裝力量的联合，但抗日統一战綫中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当蔣介石配合日本侵略者向人民的武裝力量和抗日根据地进行武裝进攻的时候，我們就不能任令蔣介石放肆下去，而必須进行正义的、必要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武裝自衛的斗爭，而在事实上，当蔣介石配合日本侵略者举行三次武裝进攻的反共高潮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沒有被这种反革命的进攻所屈服，而是相反，把它坚决地打退了，这就保衛了人民的武裝力量和抗日根据地，爭取了抗日战爭的胜利。

在抗日統一战綫中，关于和国民党頑固派斗爭問題，除了右傾的观点認为"斗爭会破裂統一战綫"以外，还有一种"左"傾的观点，認为斗爭可以無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間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毛澤东同志不但批評了右傾的观点，同时也批評了"左"傾的观点。正是因为要防备当时可能發生的过"左"的錯誤，毛澤东同志在和国民党頑固派的斗爭中提出了有名的三原則，即"有理"的条件，"有利"的条件，"有节"（斗爭适可而止）的条件。毛澤东同志指出："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爭，就能發展进步势力，爭取中間势力，孤立頑固派，并使頑固派尔后不敢輕易向我們进攻，不敢輕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輕易举行大內战。"㊀

这种在民族統一战綫中对資产阶級頑固派又联合又斗爭的政策，正是实現了毛澤东同志所曾經說明过的"民族斗爭和阶級斗爭的一致性"㊁。这是毛澤东同志运用得非常成功的革命艺术，也即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艺术。在抗日战爭当中，由于毛澤东同志这种又联合又斗爭的政策极大限度地孤立了頑固势力，爭取了中間势力，發展了进步势力，并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和軍事上使共产党和人民都有了充分的准备，因而在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能够領导人民稳步地、毫不慌乱地在兩三年的时間內，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

㊀ "目前抗日統一战綫中的策略問題"。

㊁ "統一战綫中的独立自主問題"。

狗蔣介石所發动的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战爭，推翻了中国这个以蔣介石为代表的最后的反革命王朝，成就了百年来中国人民所追求的胜利。

在抗日战爭期間，民族資产阶級，中产阶級，在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資产阶級和蔣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資产阶級之間，形成为中間勢力。中国共产党对于他們采取了爭取的政策。当时毛澤东同志說明了这样的情况：

“他們虽然同工人有阶級矛盾，不贊成工人阶級的独立性；但他們在淪陷区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民党統治下則受大地主大資产阶級的限制，因此他們还要抗日，并要爭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在抗日問題上，他們贊成团結抗战；在爭取政治权力問題上，他們贊成宪政运动，并企圖利用进步派和頑固派之間的矛盾以达其目的。这一阶層，我們是必須爭取的。”㊀

对于民族資产阶級的革命可能性，是联合的政策；对于它的动搖性和妥协性，是批評的政策，也即是另一种斗爭形式的批評政策。这是和对于国民党頑固派的斗爭形式有区别的批評的政策，因为民族資产阶級不是当权派。但这也是一种又联合又斗爭的政策。这个政策是要坚定民族資产阶級对于反帝国主义斗爭的态度。

在抗日战爭結束之后，民族資产阶級繼續受蔣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和官僚資产阶級(大資产阶級)的限制和压迫，同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被赶走之后又来了美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个美帝国主义的压迫也損害了民族資产阶級。这样，就存在了無产阶級和民族資产阶級繼續統一战綫的可能性。問題依然是：对于它的革命可能性；是联合的政策；对于它的动搖性和妥协性，是批評的和斗爭的政策。

由于中国經济的落后，毛澤东同志还指出了革命胜利后，在經济上和民族資产阶級进行統一战綫的必要性。

当然，如毛澤东同志所說明的：在經济上的統一战綫，也必須有

㊀ “目前抗日統一战綫中的策略問題”。

又联合又斗爭兩方面的政策。我們对于資产阶級的發展工业生产的积极性，是联合的政策；而对于資产阶級的投机操縱和破坏政府法令与經济計划的行为，則又是斗爭的政策。

几年来的事实，繼續証明了毛澤东同志关于"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經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須利用一切于国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資本主义因素，团結民族資产阶級，共同奋斗"的方針，是完全正确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財政經济上的种种事实，可以看出这种正确；而且从抗美援朝、鎮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这些規模宏大的人民运动，更可看出这种正确。

几年来的事实，繼續証明了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因为它企圖在統一战綫中牺牲無产阶級独立自主和領导的地位，因而不可免地要牺牲人民的胜利。同样地也繼續証明了"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因为它在必需和可能最大限度地孤立革命的敌人的时候，轉而企圖孤立自己，因而有利于敌人。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二版單行本第三〇至四〇頁）

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論

最近以来，报紙上陆續發表了許多振奋人心的消息：許多省份不是十年內完成全国农业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提出的任务，而是决心用五年、六年、七年的时間去完成；許多省市的地方工业，在今后五年內不是計划增長百分之几十，而是增長十多倍。比如甘肃省决定全民动手，自力更生，在五年內使地方工业总产值比現在的增長十六倍到十九倍，赶上或超过全省的农业总产值。这种种消息表明：这些地方和这些部門的領导人員，已經冲破了旧思想的束縛，敢于大胆地提出新任务，敢于放手發动群众，促进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躍进。他們的思想現在已經赶上前去，因此旗帜鮮明，干勁十足。这种情况，是符合于当前国內外有利的形势，也是符合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願望的。

但是，对于已經到来的工业农业大躍进的局面，对于許多省市和部門大胆提出的任务和指标，有些人却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惧。他們一方面感到高兴，但是另一方面又怀疑許多省市和部門能够达到自己提出的积极指标，并且担心由此而破坏国民經济的平衡，会出現許多不平衡，会弄得一团糟。在他們看来，从容不迫，平衡發展，才是正常的現象，而快步向前，有先有后，就是不正常，就是特殊。

是不是平衡就可喜，不平衡就可怕呢？事实并不是这样。列宁在"談談辯証法問題"中写道："对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暫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爭則是絕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絕对的一样。"这中間所說的"均势"就是平衡，它是相对的；而不平衡則是絕对的。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更明确

地指出："無論什么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暫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則是不平衡。"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这篇著名的講演中，毛主席又說："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时的相对的統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說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爭所打破了，这种統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統一成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这就是我們計划經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这就是說，任何事物，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对的，平衡則是暫时的相对的，而且只在一定条件下实現的。这也就是說，任何事物在發展中存在矛盾，出現不平衡，完全是正常的現象，而平衡，矛盾的統一，才是特殊的現象。有些人恰恰相反地理解这个問題，他們就不能不陷进形而上学的泥坑。

客观的無数事实却不断地向我們証明，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新生的力量，时时刻刻在向旧的事物冲击，向旧的定額、旧的指标、旧的規章制度挑战。这就是先进和落后的竞爭，新事物和旧事物的竞爭。在这个竞爭中，旧的平衡一定要被冲被，不平衡一定要出現；不平衡經过調节，然后再达到新的平衡，事物也就前进一步。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無論在工业和农业之間，在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間，或者在建設和生活之間，总的說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間，不断地出現过許多不平衡；但是，經过国家計划的适当調节，不平衡就达到了新的平衡，国民經济也就迅速地向前發展了。

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任何事物經过"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这种螺旋式的反复，也就不断地得到發展。客观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只能因势利导，無法任意改变。人們的思想如果違反了客观規律的要求，就一定不能把事情办好，只会把事情办坏。

在这方面我們有过許多經驗教訓。以一九五六年的例子来說，这一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在三大改造高潮的帶动下，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工业总产值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一，农业生产在受到严重

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然增長了百分之四点九，基本建設完成了五年計划工作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躍进。但是，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这种躍进所造成的国民經济迅速發展中的不平衡狀态惊呆了。他們只看到这种不平衡所引起的某些在进步中不可避免的暫时的困难，以为这也困难，那也困难，簡直惶恐得很。这就是因为他們对事物發展的客观規律缺乏正确的了解，对党和广大群众克服困难的力量缺乏足够的估計，因此就錯誤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給当时正在蓬勃發展的群众高潮潑了一瓢冷水。現在，社会主义建設的新高潮又已經来到，我們应当接受以往的經驗教訓，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

正如党中央几次指出过的，实現每一項任务，可以有兩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使事情作得快一些，好一些；另一种方法是使事情作得慢一些，差一些。人們对于平衡問題的兩种看法，兩种态度，也就往往产生兩种不同的工作方法。一种是积极的方法，就是竭力支持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促进新生事物的生長，讓落后事物赶上先进事物；另一种是消极的方法，不信任也不依靠群众的力量，不关心以至压制新生事物的生長，讓先进事物去迁就落后事物。很明显，前一种工作方法可以使我們的事业發展得快一些和好一些，后一种工作方法只能使我們的事业發展得慢一些和差一些。我們应当坚决采取前一种工作方法，完全抛棄后一种工作方法。

上面所說的兩种工作方法，表現在計划工作方面，就是兩种平衡的方法。一种方法，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額，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額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另一种方法，是采取消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总是企圖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額，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額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这是計划工作中兩种互相对立的方法，它是人們兩种互相对立的思想方法的表現。要做到积极平衡，就必須充滿热情，时时刻刻注意并且主动地去發現先进的和新生的事物，就必須走出办公室，到群众中去，信任和依靠群众的力量，

而不是只关起門来計算数字。

在国民經济的發展过程中，我們对于生产和需要之間，这一部門和另一部門之間，这一地方和另一地方之間，是需要組織平衡的。讓不平衡自流地發展，就可能使国民經济的某些部分發生彼此脫节的現象，这当然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也是不許可的。我們計划經济的优越性，正是表現在我們能够經常地对国民經济各部門的活动进行調节，完全避免像資本主义世界那样必然要發生的經济危机，并且加快国民經济的發展速度。我們承認事物在發展过程中出現不平衡現象是經常的絕对的，并不妨碍我們去組織新的平衡。相反，正是因为經常存在着不平衡，我們就必須时时刻刻做調整工作，組織平衡。这里，問題的中心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什么样的方法。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去組織平衡，我們就成为促进派；如果采取消极的态度和不正确的方法去組織平衡，就成为保守派，并且有成为促退派的危險。

在目前討論和制訂一九五八年計划的时候，我們特别要重視組織平衡的方法問題。重庆鋼鉄公司給我們提供了一个例子。这个公司原来的軋鋼能力大于煉鋼能力，煉鋼能力又大于煉鉄能力。在第一次制訂一九五八年生产計划的时候，他們根据落后环节組織平衡，結果总产値比去年只能增長百分之五弱，鋼产量只能增長百分之十弱，鋼材产量只能增長百分之五，成本只能降低百分之三点六。后来，他們發动职工討論，决心突破落后环节，根据先进环节組織平衡，結果总产値比去年增長百分之八点五。鋼产量增長百分之十七点八六，鋼材产量增長百分之十一点七一，成本降低百分之七点二。这就說明，用消极的态度和方法去組織平衡是錯誤的，只有用积极的态度和方法去組織平衡才是正确的。

有人認为，用积极的态度去組織平衡，会使得各方面都紧張起来。这誠然是必然要發生的事情。落后要赶上先进，先进要更加先进，当然会紧張起来。讓新生事物生長得快一些，讓旧有事物灭亡得快一些，当然要紧張起来。但是，难道我們能够安于我們国家在經济

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狀态而不迅速加以改变嗎？如果我們不安于落后狀态，就必須加紧努力，急起直追。我們必須时刻記住：从国外狀况来說，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它們是不甘心于失敗的，它們必然要作垂死的掙扎，我們必須鼓足革命干勁，同它們爭时間，比速度，在工业农业和其他方面赶过它們，充分保障我們国家的安全。从国内狀况来說，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还沒有全部完成，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还只能說剛才开始，只有再經过几十年时間的刻苦奋斗，当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充分地發展起来的时候，我們才能摆脫在經济文化方面的落后狀态。因此，我們必須紧張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現在多紧張一些，將来就可以少紧張一些；如果現在不紧張，將来就可能很紧張。

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胜利，我們必須反对庸俗的平衡論，或均衡論，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从庸俗的平衡論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来，我們也就敢于躍进了。

第六部分

关于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哲学的貧困(摘錄)

馬克思

第二章　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

第五节　罢工和工人同盟

……

我們应当把資产阶級的历史分为兩个阶段：第一是資产阶級在封建主义和君主專制的統治下形成为阶級；第二是形成阶級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旧社会改造成資产阶級社会。第一个阶段历时較長，花的力量也最多。資产阶級也是从組織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进行斗爭的。

对資产阶級所經历的各个历史阶段——从城市自治团体直到構成阶級，已有不少的探討。

但是，当問題涉及到对罢工、同盟以及無产者在我們眼前实現他們組成为阶級所采用的其他形式給以明确估价的时候，一些人就陷入眞正的惶恐，另一些人就显出先驗的蔑視。

被压迫阶級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級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級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級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須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現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繼續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級本身。革命因素之組成为阶級，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

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不是說，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現一个表現为新政权的新阶級的統治呢？不是。

工人阶級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級；正如同第三等級即資产阶級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級一样㊀。

工人阶級在发展进程中將創造一个消除阶級和阶級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資产阶級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資产阶級社会内部阶級对立的正式表現。

在这以前，資产阶級和無产阶級間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級反对另一个阶級的斗爭，这个斗爭一旦达到最紧張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見，建筑在阶級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終將成为最大的矛盾、將导致人們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嗎？

不能說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沒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沒有阶級和阶級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盤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結論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毀灭。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㊁

（一八四七年。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九六至一九八頁）

㊀ 这里所謂等級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級，这些等級有一定严格限定的特权。資产阶級革命消灭了等級及其特权。資产阶級社会只有階級，因此，誰把無产阶級称为“第四等級”，他就完全違背了历史。——弗·恩·（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㊁ 乔治·桑的历史小說“揚·瑞日卡”的序。

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經济"一書的評論(摘錄)

列　宁

〔布哈林原書的詞句〕

資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井制度。但是，把社会分裂为兩个基本阶級的阶級对抗，則到处都有它的表現。因而，資本主义結構是一元論的对抗或是对抗的一元論。

〔列宁的評語〕

井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

（一九二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参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八月單行本第一三頁）

关于正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毛 泽 东

一 兩类不同性質的矛盾

(見本書第一二六一至一二七〇頁)

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

（閱讀關于根本立場部分）

（見本書第一三八九至一三九一頁）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員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議的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員会，于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举行了第四次全体会議。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員三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員二十六人，正式中央委員和候补中央委員因病因事缺席九人。列席全会的有党、政、軍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負責同志共五十二人。毛澤东同志因在休假期間沒有出席全会。在全会上，中共中央書記处書記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澤东同志的委托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等四十四个同志作了重要的發言，經过詳細的討論，全会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澤东同志的建議而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結的决議"，并一致通过了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在一九五四年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議的决議。

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澤东同志的委托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和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結的决議"，其要点如下：

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議；三、为增强党的团結而斗爭。

刘少奇同志在講到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时指出：从一九五〇年六月党的三中全会到現在，已經过了三年半，在这个期間，党的中央政治局以毛澤东同志为首領导着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党在这时期的工作，基本上是以七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的决議为指針的。在这期間，党的中央領导着全党和全国人

民进行了抗美援朝运动、和平解放西藏、土地改革、鎮压反革命、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同时，在工厂和农村中进行了增产节約、劳动竞賽和爱国增产运动以及生产上的許多改革工作，大大地提高了工农业生产。主要工农业产品，在一九五二年均已超过或接近我国过去历史上的最高生产水平；交通运輸和商业均有相应的發展；国家财政的收支一直保持平衡；市場的物价一直保持稳定；人民的購买力已有提高，人民的生活已有改善。全党和全国人民很好地实現了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所指示的方針，爭取了国家财政經济狀况的基本好轉，使我国在一九五二年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經济的恢复工作。一九五二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为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百七十，其中現代工业产值則为二点六倍。現代工业的产值，在一九四九年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至一九五二年已增至百分之二十八左右。在进行經济恢复工作的同时，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質的經济获得了重要的增長。他繼續指出：一九五三年，我国已进入有計划的經济建設时期，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設計划。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澤东同志的提議，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是必要的和适时的。在这条总路綫提出以后的几个月中，党向全体党員干部和全国人民进行了規模巨大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綫的宣傳和教育工作，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获得了全国絕大多数人民的热誠拥护，使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国內树立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使資本主义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批判。在党的总路綫的鼓舞下，我們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設計划的第一年即一九五三年的任务，在工业方面，全国国营的、合作社經营的和公私合营的工业生产总值(私营工业在外)預計可完成年度計划的百分之一〇六，較一九五二年約增長百分之三十四；在基本建設方面，中央各工业部可完成百分之九十六点八；在农业方面，去年有些地方虽然發生了相当严重的灾害，但粮食的总产量仍略高于一九五二年的水平。一九五三年冬季，为了保証国家粮食的供应和市場物价的稳定，为了克服农民的資本主义自發势力，并与資产阶級的反限制

的活动进行斗爭，已开始由国家实行粮食的計划收購和計划供应的政策，并展开了巨大的工作。他又指出：我們在文化教育工作，民主的建政工作，外交和国际活动方面以及其他許多方面都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团結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統一战綫工作有了重要的进步。刘少奇同志在叙述三中全会以来，我們在抗美援朝斗爭、在經济战綫上以及其他各方面工作中的偉大胜利时，他着重指出这是与偉大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对我国的無私的援助以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对我国的深厚同情分不开的。接着他又說到：三中全会以来，党内教育，干部学习，整党建党工作也获得了不少成績。現有党員六百五十万人，党員成份已有改善，党員的覺悟程度和党的战斗力已有提高。在指出了三中全会以来党已获得上述巨大成就的同时，他又指出了党在各項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和錯誤，并認为：及时地發現和糾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乃是我們各項工作获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要求全党始終保持謙遜态度和批評与自我批評精神，为不断糾正和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而奋斗。

刘少奇同志在講到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議时指出：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設計划的胜利完成是实現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的一个决定性的关鍵；因此，中央政治局請求四中全会批准在一九五四年年內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議，以討論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設計划綱要及其他有关各項問題。

刘少奇同志在講到为增强党的团結而斗爭时說：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党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議上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結的建議。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毛澤东同志的建議，并根据他的建議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結的决議"草案，提交七屆四中全会討論。

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結的决議"內指出，党的团結，工人阶級的团結，劳动人民的团結，全国人民的团結，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証。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中国共产党依靠全党的团結，領导着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但是，现在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沒有最后完成，在国内人民的敌人还沒有完全消灭，在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包圍。现在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我們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极尖銳的斗爭。在这場斗爭中，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决不会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国内那些已經被打倒的阶級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將被消灭的阶級也决不会沒有反抗，他們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結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們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圖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敗，使反动統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們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們党的团結，并在我們党內寻找他們的代理人。我們党內产生过陈独秀、張国燾，苏联党內产生过貝利亞，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訓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們党內寻找他們的代理人，而且曾經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圖的分子作为他們的代理人。

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說：中央政治局認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險的，乃是敌人在我們党內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如果敌人眞能造成一种派别的話）作为他們的代理人的危險；因为敌人和我們同样明了这个眞理：堡壘是最容易从內部攻破的。所以全党千万不要以为力求卷土重来的帝国主义者和坚决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資产阶級分子要在我們党內制造分裂、寻找代理人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不是的，如果敌人不想分裂我們，不想利用我們队伍里面的分歧，不想利用我們队伍里面的不忠实、不稳定以至别有用心的分子作为代理人，那才是眞正奇怪的事。因此我們的任务决不是用万事大吉的精神来解除全党的警惕性，而应当是相反，应当用阶級斗爭的現实和历史的教訓来提高这种警惕性，使全党处于清醒狀态，并且用增强党的团結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謀。

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結的决議"对我們党的內部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决議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正确的政治路綫和正确的組織路綫的基础上，經过种种牺牲奋斗，形成了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統一領导和全党的团結一致，这个团結又由于及时地正确地克服了危害党的团結的敌对活动和錯誤傾向而日益巩固，終于使党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我們党現在还采取着和資产阶級联合的政策，小資产阶級还像汪洋大海似地包圍着我們，我們的党很大，党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还很不够，一部分干部中的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同时，我們党內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級干部对于党的团結的重要性还認識不足，对于集体領导的重要性还認識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認識不足；特别是由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內一部分干部滋長着一种极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績就冲昏了头腦，忘記了共产党員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态度和自我批評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調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贊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对批評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領导的地区和部門看作个人的資本和独立王国。所有这些情况都說明，当此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要历史关头，有极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强党的团結。党的团結是党的生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則，而破坏党的团結就是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則，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决議要求全党的同志都以高度的自覚来爱护党的团結，为增强党的团結而努力。特别是中央委員会和省(市)委員会以上的負責同志和武裝部队的高級負責同志，对于党的团結的必要和自身責任的重大都应有很高的自覚，并应在党內作很大的努力和必要的工作。

为此目的，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結的决議"中規定了各項增强党的团結的具体办法，同时又指出，党的团結必須是也只能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結，在正确的政治原則和正确的組織原則的基础上的团結。为了增强党的团結，不但不允許縮小党內民

主和党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必須保証充分發展党内民主，充分發展党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能避免的缺点和錯誤，使党的事业得到順利的进展。对于党員的缺点或錯誤进行批評，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針。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結，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錯誤，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須进行無情的斗爭，給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將他們驅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維护党的团結，才能維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但是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質上比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質上比較不重要的錯誤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較严重的錯誤，但在受到批評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願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針。对于他們的缺点或錯誤必須按照具体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評或必要的斗爭；但是这种批評或斗爭应当貫徹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指示："从团結出發，經过批評或斗爭达到团結的目的"，不应当不給他們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將他們的个别的、局部的、暫时的、比較不重要的缺点或錯誤夸大为系統的、严重的缺点或錯誤，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結出發，就不能达到团結的目的，就不利于党。

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結的决議"最后指出：党的中央委員会和省（市）委員会以上負責同志以及武裝部队的高級負責同志的团結，是全党团結的关鍵。在增强党的团結的事业上，这些負責同志担負着主要的責任。决議号召这些同志并經过这些同志教育全党干部以身作則，同心同德，"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結全党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塊坚固的鋼鉄一样"，以便团結整个工人阶級，团結全体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为战胜内外敌人的任何破坏阴謀，保証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偉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原載"新华月报"一九五四年第三号）

論党内斗爭(摘錄)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講)

刘 少 奇

三 机械过火的党內斗爭之表現

同志們！在上述三种党內斗爭的偏向中，第一种自由主义的偏向，我今天不准备来講。虽然我并不是認为目前党內自由主义的偏向不严重，目前反对自由主义不重要，我也还不能相信同志們对于自由主义这一种傾向及其在各种具体問題上的表現，是已經澈底弄清楚了的，我想許多同志是还沒有澈底弄清楚的。但我今天不准备講它，下次有机会时再講。我只提出党內自由主义傾向在最近是有些發展，在許多地方已經成为党內斗爭中一种主要的傾向，党內思想斗爭是开展得不够。因此，就使得党內許多錯誤的傾向，不良的現象，不能及时得到有力的糾正，党的紀律也逐漸的松懈起来，这是很不好的。这是由于最近有大批的知識分子及新党員加入到党內来，他們是帶有濃厚的資产阶級自由主义思想到党內来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还沒有受到無产阶級鉄的紀律的鍛煉；同时，过去犯过"左"傾錯誤及党內过火斗爭錯誤的許多同志，在今天他們又反轉过来犯右傾錯誤，犯自由主义錯誤。長期統一战綫的环境，資产阶級影响党內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暗藏在党內的反革命分子，則用一切方法發展与拥护党內的自由主义。因此，就使得党內自由主义的傾向發展起来。这是我們在加强党性鍛煉的斗爭中必須严格反对的一种傾向。比如有些同志看見别人犯錯誤不說，怕人报复；好朋友犯錯誤不說，相互隐瞞；当面不說，背后乱說；随便批評，發牢騷，小广播等……这

些現象，在党內是相当普遍存在的。还有特别严重的一种現象，最近也在党內产生，就是有一种人，生怕别人向党內上級报告他們的缺点与錯誤，怕人告狀。一方面，他們不能禁止自己不犯已經知道的錯誤，他們要明知故犯；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要禁止别的党員向党向上級报告及在会議上批評他們。他們做了一些錯誤的不正当的事情，犯了錯誤，但他們不肯將錯誤揭露，以便改正他們的錯誤及缺点。他們諱病忌医，他們不知道只有將錯誤揭露才能改正錯誤的眞理，他們要隐蔽錯誤，把錯誤当作比什么宝貝还要珍貴的隐藏起来，于是他們就不只是要想办法来禁止别人的眼睛不敢正視他們的錯誤，他們还要想办法来禁止别人的嘴巴不敢向党向上級报告他們的錯誤，取消别人以完全正当的組織方式在党內說話与批評的权利。他們恐吓其他的同志說："你敢于向上面报告，那我就会对你不起的！我要揍你的！揍你这个喜欢向上面拍馬屁溜勾子的东西！"痛恨那些向上面报告及講过他們錯誤的同志，而永記在心，并要想办法报复。这种現象是完全失了党員气味的恶劣表現。他們要隔离党的領导机关与党員群众的联系，以便他們能够在党內为非作恶。这种現象是应严格禁止的。

任何党員看見其他党員犯錯誤或其他一切不利于党的事情，必須向党向上級报告，不报告是不对的，报告是完全对的。禁止别人向党向上級报告自己的缺点錯誤，是完全非法的，党內是絕不能容許的。当然党的領导机关在得到这种报告后，应調查清楚事实，审愼处理；而不能單憑一面之辞，輕率的随便的处理。

目前党內的思想斗爭应該适当的开展，这是我們已經决定了的。因此，应該反对自由主义。在某些党的环节，犯自由主义錯誤特别严重的地方，应該根据事实，开展反对自由主义的具体斗爭，克服这种錯誤。毛澤东同志在几年前写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举出了党內十一种自由主义的現象，至今仍保持其效力，你們应細心研究，并遵从这个文章来糾正与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同时，在我們党的建設的課程上，也会要詳細講到自由主义的。所以我今天不来講它。我現在只来講第二第三种偏向；因为这兩种偏向是从来沒有人在党

內系統講过的。

党內机械的过火的斗爭，表現在一些什么地方呢？表現在以下的一些事实上：

第一，在地方党及部队党內，經常举行所謂“斗爭会”，甚至在政府机关及群众团体等非党組織中也經常举行这种“斗爭会”。这种“斗爭会”是預先布置好了的，主要的不是为了檢討工作，而是要打击某某人，不是首先“对事”而是首先“对人”斗爭，主要的不是向某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原則进行斗爭，而是向某人斗爭。所謂“斗爭張三或李四”，目的就是要打击某某犯了錯誤的同志。“斗爭会”的实質，是一种同志的审判会，主要的不是从思想上去解决什么問題，而是要从組織上去解决問題，去压服某些敢于坚持自己不同意見（这种意見不一定是眞正不对的）的同志，或調皮搗蛋的同志。而且在每一次“斗爭会”对被斗爭的人，大多数必有組織結論。很明白的，这种斗爭方式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首先，“斗爭会”这个名詞就不对，就不通。既有所謂“斗爭的会”，那末是不是还有所謂完全“無斗爭的会”呢？如果我們把某些“会”認为是專門进行斗爭的会，又把另一些“会”認为是完全不进行斗爭的会，那就是一种极大观念上的糊塗！在这里，証明許多同志是不懂得斗爭的絕对性及普遍性的。是把斗爭与教育机械的分开的。

党內斗爭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党与教育犯了錯誤的同志。所以党內斗爭本身就是一种党內不可缺少的教育；而党內的教育也是一种党內斗爭，一种比較温和的斗爭。因此教育与斗爭是不能分开看的，斗爭即是一种教育，教育即是一种斗爭，机械的分开是不对的。

其次，这种斗爭会，是党內宗派主义及对干部对同志实行錯誤的打击政策之一种具体表現形式。是为了要打击被斗爭的同志，而不是为了要帮助、教育或挽救犯錯誤的同志。主要的是对人斗爭，而思想上的分歧与对抗，反而被忽略了。因此这种“斗爭会”常常不能眞正加强党內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行动上的一致，反而常常加深党

內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行动上的分歧，加深党內不团結的現象、無原則的糾紛，及助長党內宗派主义的發展。

至于在非党的机关团体中举行这种"斗爭会"，那更是不对的。

第二，党內机械的过火的斗爭形式，还表現在：有些同志以为党內斗爭是斗爭得愈凶就愈好，問題提得愈严重愈好，搜集别人的錯誤愈多愈好，名詞用得愈多愈好，給别人戴的帽子愈大愈好，批評的語句愈尖刻愈好，批評与斗爭的方式和态度愈严峻愈粗暴就愈好——講話的声音愈大、面孔板得愈凶、牙齒露出来愈長……就以为是愈好，就以为是"最革命不过"的了。他們在党內斗爭与自我批評中不講求适当，不講求分寸，不講求适可而止，毫無限制的斗下去。很明白，这也是完全不对的！

第三，有些同志还不了解：党內斗爭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爭，是要在思想上求得一致才能保持与加强党內政治上、組織上、行动上的一致。是要从思想上、原則上去解决問題之后，才能在組織上、行动上解决問題。然而要在思想上、原則上求得一致与解决問題，要去克服别人不正确的原則，要去糾正别人不正确的原則，要去轉变别人的思想，要去糾正别人久已相信的原則、观点和成見，就不是那样容易的事，就不是采用那样簡單的办法，三言兩語，或一場斗爭会所能做到的，不是采用單純的压迫手段与强迫办法所能做到的。而是須要經过艰苦的說服教育工作与各种复杂的斗爭，經过相当長期的教育与斗爭及革命的实踐，才能够得到的。有些同志不是这样来認識党內斗爭的实質，而是把党內斗爭簡單化、机械化、庸俗化，認为党內斗爭只是一种組織上的形式上的对抗，只是一种簡單的打架或者罵人，只是一种吵嘴或者角力，而不是要从思想上、原則上去求得眞正的一致与解决問題。或者認为党內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是可以用这种簡單机械庸俗的办法来解决的。很明白，这是完全錯誤的！

由于这些同志不是要从思想上、原則上去克服党內的分歧，去糾正某些不正确的傾向与現象，来保持或达到党內的統一，而是企圖用一种簡單的組織上的办法，用一种对党員的压迫手段、打击政策与惩

办制度来达到或保持党内的統一，所以他們就产生各种錯誤的过火的党內斗爭方式，所以他們就不是細心的、周到的、从原則上、思想上去說服同志，而是采用一种單純的組織上的办法，敌对的方式，甚至行政上的办法去压服同志，吓住同志。他們隨便对同志作組織結論，在組織上去处罰同志，而且用資产阶級的平均的法律观点，慘痛的处罰党內的同志——即是不論何种党員犯了多大的錯誤，不管其承認及改正与否，按照党法均須給以多大的处罰。这就形成党內的惩办制度。他們常用开展斗爭的办法，去开展工作，推动工作；故意去寻找"斗爭对象"（党內的同志）作为机会主义的代表者来开展斗爭，牺牲与打击这一个或这几个同志，"杀鷄給狗看"，以推动其他的干部党員去努力工作，完成任务。他們故意搜集斗爭对象的缺点錯誤，形式的、片断的摘录他不大妥当的言論行动，把这些缺点錯誤和不大妥当的言論行动又孤立起来看，当作就是这个同志的全部。把这个同志个别的缺点錯誤夸大起来，替他構成为机会主义的系統，在党內同志中造成对这个同志极不好的印象，激动起党內一切仇恨机会主义的心理，向着这个同志来斗爭。于是"死老虎人人可打"，一些人的报复心理也發展起来，揭發他一切的錯誤缺点，任意提到原則的高度。甚至捏造一些事实，憑着主观的猜疑及完全不可靠的謠言，乱加这个同志以各种罪狀等等，結果是非把这个同志弄得昏头昏腦不可。这样做了之后，他們还不大允許这个被打击的同志起来做任何的辯护。如果他有辯护的話，那末又說他故意辯护錯誤，承認錯誤不澈底等等，再加以打击。不允許被打击的同志在服从組織的条件下，保留意見，不允許向上級控訴，一定要被打击的同志当时認錯。如果被打击的同志一切都承認了的話，那末思想上、原則上的問題，是否已經解决，又是不大注意的。所以在党內也發生过这种事实：即某些同志在斗爭中承認錯誤过多。为了免遭打击起見，不如一切都承認好些。錯誤虽承認了，实际上他自己也还是不懂得的。在这里也就証明这种斗爭方法不能培养共产党員坚持眞理的頑强性。

第四，是將党內斗爭方法与党外斗爭方法不加区别的混淆起来。

有些同志，將党內斗爭的方法机械的搬到党外的非党的群众团体及机关中去使用，用党內斗爭方法，去向非党干部和群众斗爭；另外有些同志，用党外斗爭方法，对敌人对異己分子斗爭的方法，来向党內的同志斗爭，用对付敌人与異己分子的办法，来对付党內的同志。一切挑撥离間、阴謀詭計都使用上来。行政上的办法——例如监視、逮捕、监禁、审判等也运用到党內斗爭中来。如有些同志在鋤奸工作中所犯的过"左"錯誤，大半就是沒有將党內斗爭与党外斗爭严格区别开来的結果，是把党內思想斗爭与鋤奸工作混淆起来的結果。党內也往往有敌人的奸細暗藏着，对于这种暗藏的敌人是必須根据事实进行斗爭，把他們揭露出来与驅逐出党的；但这与共产党員犯錯誤需要进行教育性的斗爭完全是兩件事，必須把二者区别清楚。党內斗爭与党外斗爭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斗爭的方法和斗爭的形式必須区别开来。

还有些同志(其实这已經不能称为同志)則公然依靠与假借党外的力量来进行党內斗爭，向党要挟和恐吓。如有些人，依仗他們一部分的工作成績，依仗他們的部队和槍杆子，依仗他們在群众中的信仰或某一部分的統一战綫关系等，而向党向上級机关进行斗爭，要挟上級机关及党接受他們的要求与意見，向党鬧独立性，向党宣告独立。或者利用党外的、甚至資产阶級的、敌人的报紙杂志及各种会議，来批評党，向党的上級机关，及向某些同志和干部进行斗爭。很明显的，这是与另外一些人依仗党的势力去强迫、命令、压迫党外的群众，去向党外人进行敲詐勒索，是一样严重的錯誤。这些人是站在党外来向党斗爭，因此他們虽尚挂着共产党員的名，却已經完全离开党的立場，成为党的敌对者。

第五，我們党內的許多問題都是在会議上解决，或經过会議解决，这是好的。但各个組織中，有許多会議是沒有經过准备与預先調查研究的工作的，常常在会議上發生許多不同的意見与爭論，而一切会議又必由最負責的参加者来做結論，一切会議的結論又等于决議，在这里也常發生許多毛病。我看見有些会議上的爭論，最后逼到指导

員或支部書記或其他負責同志来做結論。但这个負責同志自己是完全無把握的，問題是完全沒有弄清的，然而事情是逼来了，非做結論不可，否則不能做負責同志。这个負責同志只得来做結論，有的則表現非常狼狽与汗流浹背，粗率的把結論做下来，而这个結論也即等于決議，事情就照这个結論決定下来，这当然是要發生許多錯誤的。有些同志，当着他們对問題还沒有把握决定的时候，他們不肯說明自己还沒有把握，还要求一个考慮与研究的时間，或向上級請示的时期，而要顧全面子，保持地位，硬說自己是已有把握的，随便决定下来，結果常常不是正确的。这种情形，也应該糾正。

我們一切同志对一切的問題，应該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党內的問題，不是依靠蛮橫所能解决的。一切会議应該有結論，但不能决定的事情，或尚有疑問、尚未弄清的問題，就不应随便决定。决定的事情一定要是自己相信的，如果自己还無把握相信的事情，可以保留下来再加以研究或請示。会議的結論，不一定要参加会議最負責的同志来做，誰报告，在討論之后，即由誰做結論。但这个同志的結論不一定等于決議，会議的决定可以和这个同志的結論不一样。在苏联共产党內的作风也是如此的。

以上这些，就是机械的过火的党內斗爭一些重要的表現。

我在以上所說的，当然是一些最坏的典型，不能說我們过去的和現在的党內斗爭普遍都是如此的。但这种党內斗爭的方式确实是存在的，且曾經在一个时期是占着統治地位的，成为主要的党內斗爭方式。

在这种不正确不恰当的党內斗爭之下，曾經在党內造成了什么結果呢？是曾經在党內造成了以下一些惡果的：

第一，助長了党內的家長制。个别的領导者及領导机关，在这种党內斗爭方式之下，压迫着許多党員不敢說話，不敢批評，在党內形成个人或少数人的独断。

第二，另一方面，又助長了党內极端民主的傾向及自由主义的發展。許多党員平时不敢說話，不敢批評，表現党內一种形式上的和平

与統一。但是一到矛盾無法繼續隐蔽下去的时候，一到情况严重与錯誤暴露出来以后，即又乱批評乱斗爭一場，形成为党內的对抗与分裂及組織上的紛扰，很难收拾。这也就是党內家長制的反面表現。

第三，影响党內民主集中制的生活不能正确的建立，党內民主生活的不經常、不正規或极端的缺乏。

第四，阻止党員同志們积极性、自动性及創造性的發揚，削弱党員对党对工作的負責精神，影响同志們不敢积极負責，不敢放手工作，放手創造，不細心去考虑研究問題与情况，养成他們照办公事、人云亦云的作风。

第五，助長党內宗派主义的發展，無原則派别斗爭的發展，造成党內害怕批評与斗爭的心理，养成某些同志"独善其身"的保守心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第六，給托派奸細反革命分子以破坏党的更多机会，給反革命进攻我党以更多的口实。托派奸細分子特别利用党內的矛盾，不大正确的党內斗爭，来进行破坏党的活动，来爭取那些受打击的对党不滿的分子。而反革命則利用党內反机会主义的斗爭来进行宣傳煽动，影响党外的同情者及党內不稳定的成份来进行挑撥离間，破坏党內的团結与統一。

上述这些惡果，在党內是曾經造成过的，并且还有一部分遺留到現在尚未把它們消除。

这种机械的过火的党內斗爭方式，在相当長的一个时期內曾經造成党內生活不正常的現象，給党的損失很大。現在我党高級領导机关中，虽是已經糾正过来了，在全党現在也不是一种統治的斗爭方式，但在某些中下級組織中，在某些个别組織中，这种斗爭方式則至今还未完全糾正，还相当普遍的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繼續着。因此，这个組織中的生活仍然是不經常的。因此，我們必須严格指出这种偏向，以便在我們的組織中澈底肅清它。以便我們的同志不要重复这种錯誤，以便正确的切实的开展党內的思想斗爭，推动我們的党前进。

四　关于党內的無原則斗爭

同志們！我現在来講党內斗爭中另一种偏向——党內無原則的斗爭。这种現象在中国党內，是特别普遍与严重存在的。在外国党內虽然也有一种所謂"閑談运动"，但我想还沒有中国党內这样严重吧。所以我們对这种現象，必須使同志們認識清楚，并采取必要的办法来对付，否則对党內的团結和工作上的妨碍是太大了。

什么是党內的無原則糾紛与無原則斗爭呢？

我認为党內的以下几种糾紛和斗爭是屬于無原則的，即是离开我們党与無产阶級的革命的利益之共同立場和原則的。

第一，有些同志不是站在党的立場上、整个党的利益上来提出問題，来和其他同志进行斗爭，而是站在个人利益或派别利益的立場上来提出問題，来和党內其他同志进行斗爭。就是說，他們在进行党內斗爭中的立場是不正确的。因此他們对于問題的观点、处理方針和办法，也是不正确的。一切事情的处理，只要对他們个人或少数人有利，他們就贊成就主張，如果对他們个人或少数人不利，他們就反对，就不贊成。至于是否对党对革命有利？他們是不管的，或摆在次要的服从的地位。因此，这种人主張什么或反对什么，都是沒有原則的，离开党与革命的原則的。或者說：他們的原則不是党的原則与革命的原則，只是他們个人利益的原則。如果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个人利益为原則的話，那末，各个人的利益与原則必然矛盾，必然相互斗爭。

比如在你們中間就有人为了伕子的問題、馬匹的問題、吃飯穿衣及生病打針的問題、沒有提升自己职位的問題等，曾經發生一些爭論和斗爭，就是屬于这种个人的無原則的問題。同志們不是一般提出伕子、馬匹、吃飯、穿衣及打針应該怎样支配的原則才对党对大家有利，要党及学校采取；而是这样提出問題，为什么不給我伕子、馬匹？为什么不給我打針？为什么不提升我的职位？为什么不給我好的飯

吃？好的衣穿？一切以"我"个人为中心，从"我"个人的立場出發，在党內造成糾紛，进行斗爭。那末只要給他个人滿足了，即使支配的再不合理一点，他也可以不管的。这就是一种無原則的斗爭。

又比如同志們反对浪費吧！有些同志是站在党的利益与党的立場上来反对浪費的，因此他們提出各种違反节約原則的浪費現象来加以批評反对，并提出节約的意見要党采取。这是很对的。但另外有些同志就不是站在党的利益与站在党的立場上来反对浪費，因此他們就这样提出問題：某人浪費了多少，某人某人又吃了什么，穿了什么，用了什么……，为什么我就不能这样吃，这样穿，这样用呢？难道我的資格不老嗎？对党無功嗎？因此他在反对浪費的口号之下，起来斗爭了。原因就是别人浪費了，而他自己还沒有浪費到。这也是一种無原則的斗爭。

比如在皖东，曾經規定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員有少数的薪水，于是就有一些同志要求到政府机关去工作，目的就是想自己也要得到这一点薪水。不允許他們去的时候，他們就在反对政府机关人員有薪水的口号之下起来斗爭了。他們也并不是在原則上提出应如何来規定政府机关人員的生活，来加以商討。这也是一种無原則的斗爭。

第二，有些同志不是为了把党的事情弄好，甚至是为了把党的事情弄坏，或其他目的，来在党內起糾紛，进行斗爭。目的是不正确的。这也是一种無原則的斗爭。比如有些同志为了个人爱出风头，为了个人地位及个人面子，甚至为了报复别人以泄恨，在党內鬧糾紛，和其他同志斗爭，以搗乱其他同志的工作和計划，破坏党內的秩序与团結，而不顧及当时的情况与条件等，就是屬于这种無原則斗爭的。

第三，有些同志不是从原則上提出問題要党采納，或要党放棄，而只是憑自己的感情与喜怒来提出問題与进行斗爭，为了一时的痛快，为了發脾气舒感慨，而要罵人和气憤，这也是一种無原則斗爭。另外有些同志由于他們的經驗与理論水平低，不能从原則上提出問題来爭論，而只是在一些个别的零碎的純粹帶实际性質的問題上，不

涉及原則的日常政务問題上，来和其他的同志作絕不妥协的爭論，但并未涉及到一般的原則問題，因此这也是一种不应坚持的無原則斗爭。比如，有些同志对于某一次的战斗，某一次的行动，某一个斗爭形式，某一个組織方式等發生相互对立的意見，而不涉及到一般的战术原則与战略計划及一般的行动方針与一般的斗爭形式組織形式等，各持己見的不停止的爭論下去。他們的問題提得不正确，因此常不能有正确的結論，或是無論怎样都可以的，因此就常成为一种無結論的清談。

第四，是不擇手段，不依照正当的組織手續来进行党內斗爭。在党內無原則的拉攏或打击同志；在同志間进行挑撥离間、陰謀詭計及陷害同志等；或者当面不說，背后乱說，对党不負責任的乱批評、乱广播，及造謠、撒謊、誣蔑同志等。

以上这些，都是無原則斗爭。其次，还有一些同志，在原則斗爭中夾杂無原則斗爭的若干成份，或者在原則斗爭的大旗掩护下进行着無原則的斗爭。另有些同志特別着重的注意某人与某人爭吵，某人与某人的关系不正常等，而不注意他們爭論的实質。

党內这一切的無原則斗爭，都是不好的，对党有害無益的。

同志們又問什么是原則？什么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純粹帶实际性質的問題？什么是日常政务問題？以及为什么在这些問題上不应坚持己見，而应与党內抱有别种意見的人做一切妥协？

同志們！这些問題确是应該弄清楚的問題。

什么是原則呢？

如果純粹从理論上来講，所謂原則就是事物發展的一般法則。特殊的事物有特殊的發展法則。相同的事物有大体上相同的發展法則。我們所謂原則問題也就是按照事物的一般發展法則作为我們观察問題处理問題的方法問題。如果我們观察問題、处理問題的一般法則有錯，我們的立場，观点、方法有錯，那我們观察問題、处理問題就必然要發生錯誤。如果我們認識某一类問題的發展法則有錯，那末我們处理这一类問題的方法也必然要發生錯誤。所以我們对原則問

題是不能馬虎的。如果在原則上發生錯誤，那就不只是要發生个别的錯誤，而会發生系統的、一貫的、一系列实际問題上的錯誤。

什么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日常政务問題及純粹帶实际性質的問題呢？

这大半是一些个别的問題，是一些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的問題。比如我們說要發动与組織群众是一个原則問題，我們大家都同意，而發动与組織群众又須集中由群众团体来領导，部队也应該协助与参加群众工作，这些都是原則問題，我們大家都同意，即我們在原則上沒有不同的意見。但我們有的同志主張將部队的民运队及民运部暫时取消，將这些工作人員派到群众团体中去工作，另有同志則主張部队民运队，不应取消。有些同志主張群众团体应分为四部办事，另有同志主張分五部办事，这些就都是純粹帶实际性質的問題，都不是原則問題。

又比如，我們敌后抗战，今天的一般战术原則是分散的游击战爭。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点是完全沒有分歧的話，那末就是我們沒有战术原則問題上的分歧。但有一次由于各种情况的逼迫或者由于对他們特別有利的情况發生，我們某个指揮員打了一次胜利的或失敗的运动战，那末，这也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个别的实际問題。只要这个指揮員沒有在敌后打运动战的原則的观点，那末即使这一次二次战斗是錯誤的，也只是个别的錯誤，或者是由于特殊情况的發生，这个指揮員打得并不錯，所以我們就不要在这些个别的純粹实际的問題上来坚持己見，爭个不休。

又比如，在今天我軍裝备条件下，原則上是不应强攻敌人的坚固工事与中心城市的。如果对于这一个原則我們沒有分歧的話，那末某一个工事，某一个城市，因为有特殊的条件，或有特殊的必要，我們又去打下来了。这也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个别实际問題。但如果因为打下了这一个工事，这一个城市，就說一切敌人工事与敌占城市今天我們都可以去打，这就成为原則問題了。在內战时期，曾有同志主張打大城市，指揮紅軍向某些大城市进攻，这就是涉及原則問題的实

际問題。因为他們去打这些大城市是在原則上主張紅軍应該向大城市进攻。在这种涉及原則問題的实际問題上，我們即不应該在原則上妥协，而仍应在原則上主張不打大城市。

一切具体的实际的問題，常有几个解决的办法。由这里到那里，常有几条实际的可走的路。这些办法，这些道路，对我們当时情况又各有利弊，有的办法和道路对我們是最有利的，但包含有危險性，为了慎重起見，我們又不如采取次好的办法和道路。所以在这些具体的純粹帶实际性質的問題上，如果我們發生有不同的意見，只要不涉及到原則上成为問題，我們就要善于妥协，善于讓步，善于接受与同意别人的意見，"善与人同"，然后事情才能暢快的办理，問題才能爽快的决定；而不应总是堅持自己的意見，总是要别人放棄意見，总是要别人来將就自己，总是要别人照自己的意見办理，这样反而要拖延問題的解决，妨害工作的进行，增加党內糾紛与清談的傾向，妨害同志間的相互团結。这就是为什么在純粹帶实际性質的問題上，应与党內抱有别种意見的人做一切妥协的緣故。

由此可知，什么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日常政务問題、純粹帶实际性質的問題呢？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們的斗爭目标及达到此目标的斗爭方式的問題，就是那些不关涉到我們的战略及策略的問題，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們的一般立場与具体立場的問題，上面举过的各种例子，就都是这样的問題。

总之，我們处理一切問題的总原則，是党与無产阶級战斗的利益。一切要服从这个总原則。一切違反这个总原則的主張、意見和行动都是要反对的。各种原則之中，又有大原則与小原則之分，我們的規律，是部分服从整体，暫时服从長远，小原則服从大原則。在一切原則問題上的分歧是不能調和妥协的，必須澈底爭論清楚，求得一致。然而在一切不涉及原則的問題上，就不应死不妥协，就不应过分着重的斗爭与爭論，否則也要妨碍工作与妨害团結的。

我曾經听見一个同志說，在党內斗爭中只要我的政治主張是"对的"，在組織上即使錯誤一点是不要紧的，是次要問題，因此他認为在

党內斗爭中可以采取各种不合組織紀律的手段向反对者斗爭。这种說法，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他把正确的政治路綫与正确的組織路綫对抗起来看，他不知道搗乱党內的秩序与組織，就是犯了一个最严重的原則的錯誤；特别在今天妨害与破坏党內的团結和統一，就是最大的帮助了敌人，最大的妨害了党与無产阶級战斗的利益，就是犯了比其他原則錯誤更加严重的錯誤。在这里，在許多原則問題上，我們的同志都要善于比較、善于区别各种原則問題在当时对党的利害的輕重关系，根据小原則服从大原則、部分服从整体的法則，来决定在什么原則問題上应暫时讓步不坚持，在什么原則問題上則坚持不讓步。为了保持党內团結和統一，有时对于某些关系不大重要不大紧急的原則問題，我們也是应該和党內抱有别种意見的人暫时妥协的，暫时不提出这些問題，不在这些問題上坚持爭論，而着重在当时关系重大的紧急問題上。这当然不是原則上的調和与中間路綫，而是实际行动上的妥协及服从多数决定。

以上就是关于党內的無原則斗爭問題。

党內無原則斗爭以及机械的过火的党內斗爭，是从那里产生出来的呢？它們的根源是什么呢？这是由以下一些根源中产生出来的：

第一，是党內同志的理論水平一般还很低，許多方面的經驗还不够，全党的領袖与中心很久沒有实际的形成，党在各地方的領袖与中心則至今还很少实际的形成。

第二，党內小資产阶級成份多，小資产阶級的急性病、瘋狂性，农民小資产阶級的报复性，經常影响到党內斗爭。

第三，党內民主生活不正常，同志間客观的相互商討問題的作风未形成，粗糙的主观的判断与处理問題的作风仍然严重存在着。

第四，投机分子混入到党內来、以及某种投机心理在党內一部分同志中的存在。他們常常为了証明自己的"布尔什維克化"，而故意要"左"一些，以为"左"要比右好点，或者为了打击别人，以便抬高自己。

第五，托派奸細反革命分子混入到党內来，利用党內斗爭来破坏

党。内奸托派常常在党的旗帜掩盖之下故意打击某些同志，在打击之后，又要另一个内奸托派分子去吸收这些被打击的同志作内奸加入托派。

以上这些就是产生党内斗爭中上述各种偏向的根源。

我們的党从最初就有严格的自我批評与党内斗爭，这是完全必要的，很好的。在党内斗爭中有許多是做得对的，恰当的。因此我們的党在許多次的党内斗爭中都有成績，都使我們党的理論水平有些提高。不可否認的，这些批評与党内斗爭是推动我們党进步的原动力，如果沒有它，是不行的。然而我們同样的不可否認，在我們党長期的历史發展中，在过去的党内斗爭中，是存在着上述各种典型的偏向和錯誤，在党内斗爭中有許多是进行得不正确的。因此，就使我們在过去党内斗爭中費去了很大的代价。因此，我們在今天就应該如何的来惩前毖后，如何使过去所費去的很大的代价使它不是虛費的，如何从研究过去党内斗爭的历史教訓中来求得党的大的进步。

以更少的代价和痛苦換得党内斗爭更大的成績和党的更大的进步，这就是我們今天从研究中国党内斗爭的历史教訓中所应确定的今后党内斗爭的方針。但这就需要我們澈底糾正过去党内斗爭中各种偏向和錯誤，需要我們切实的适当的去进行党内斗爭。

五　怎樣進行黨內鬥爭

同志們！現在的問題已經很明显了，就是要怎样来正确的适当的进行党内斗爭呢？

关于这个問題，联共党及各国党均有很多經驗，中国党也有很多經驗。列宁、斯大林有很多指示，党的中央也有很多指示。关于这些，同志們应該去細心的研究，將来在党的建設上也要講的，所以我今天不来講那些。我只就中国党内斗爭的經驗提出以下一些意見来，作为同志們的参考。

第一，首先，同志們要了解：党内斗爭是一件最严重、最負責的

事。我們必須以最严肅最負責的态度来进行，而絕不可以草率从事的。必須自己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場上，完全是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及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錯誤与理解問題的大公無私的立場上来进行。必須自己首先把事情弄清楚，把問題弄清楚，实行系統的調查幷研究，同时还必須是有組織的、有領导的、有准备的去进行。

同志們应該知道：只有自己首先站在正确的立場上，才能糾正人家不正确的立場；只有自己是完全正派的，然后才能矯正别人的不正派。所謂"必先正己，然后才能正人"。

只有自己首先不动摇，然后才能帮助动摇的人，克服人家的动摇。

只有自己有正确的原則、正确的理論，然后才能克服人家不正确的原則与不正确的理論。

只有自己对于原則問題的明确性，才能改正人家的不明确。只有自己了解問題的实际材料更多，更有系統的研究了問題，然后才能給其他的同志幷給党以更多的帮助。

如果有同志不是这样，如果自己首先就不站在正确的立場上，沒有把握到正确的原則，沒有按照原則去观察客观情况与系統的研究問題，甚至只要有个别的缺点与在某些地方的不够明确，那在党內斗爭中都不能克服人家不正确的东西。如果还要魯莽的去斗爭，那就可能走到不正确的路上去。

只有客观的鉄的事实，只有在实踐中已証明了的經驗，只有眞理，能够战胜一切。

我們的自我批評与党內斗爭，不是为了要削弱党的組織与团結，削弱党的紀律与党的威信，妨害党的工作的进行；相反的，是为了加强党的組織与团結，提高党的紀律与威信，推动党的工作的进行；因此党內斗爭不能任其自流的發展，形成极端民主的現象。在党內既不能容許家長制的存在，也不能容許极端民主現象的产生。这是党內生活不經常的兩个极端的表現。

党内斗爭，是要用对党对革命最高的負責态度来进行的。

第二，同志們要了解党内斗爭基本上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原則的斗爭，不同思想不同原則上的对抗。思想原則上界限的明确划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組織上，在斗爭的方式上，在說話与批評的态度上，应該尽可能的不对抗，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討或爭論。尽可能不采取組織手段及做組織結論。尽可能完全采用誠恳、坦白、正面的教育的态度去进行，去求得思想上、原則上的一致。只有在必不得已的时候，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可以采取对抗的斗爭方式与組織手段。党的一切組織，在适当的限度內，都有完全的权力对任何堅持錯誤的党員做組織上的結論，党的紀律的执行与組織手段的采用，在一定的情况之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手段不可輕易采用，不可濫用。單是在組織上处罰同志多，并不能提高党的紀律。党的紀律，党的統一，主要的也不是靠处罰同志来維持（如果要这样才能維持，那就是党的一种危机了）。而主要的是依靠党在思想上、原則上的眞正一致，依靠大多数党員的自覚性来維持的。我們只要在思想上、原則上最后弄明白了，如有必要，組織結論是最容易做出来的。我們不要一分鐘可以决定开除某些同志的党籍，或宣布自己脫党。

同志中不同思想不同原則上的堅持、对抗与爭論，和同志們对于党的組織上的服从，对于多数与上級的服从，是不可分离的；否則就沒有党的統一与行动上的一致。同志們决不可以因为在原則上堅持己見，就在組織上与党对抗，就不服从多数与上級，就去自由行动。这是違反党的基本紀律的。

原則上、思想上的对抗，与組織上方式上尽可能的不对抗，是我們应該采取的党内斗爭的正确方法。許多同志的錯誤，就在于：一方面沒有思想上与原則上明确的对抗与分歧，但另一方面，在組織上及斗爭方式上又对抗得一塌糊塗，斗爭得一塌糊塗，爭得面紅耳赤，鬧得狗血淋头，斗得兩方面不見面，仇恨种下很深，然而在他們之間竟找不出原則上、思想上的明确分歧来。

第三，对党的組織、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評要适当，要有分寸。布

尔什維克的自我批評，就有布尔什維克的尺度。一切过分的批評，扩大人家的錯誤，濫給别人戴大帽子，都是不对的。党內斗爭不是斗得愈厉害愈好，而应有适当限度，应講求适当，"过"与"不及" 都是要不得的。

指出与批評别人的錯誤要抓住中心，要着重最重要的問題，給以系統的明确的解釋，才能解决問題。而不要枝枝节节的搜集人家許多錯誤的現象，及似是而非的事实，簡單給以暴露了事。这会使人感覚你故意找他的錯誤，攻击与打击他。

当你們估計或批評某个同志时，你們不应仅仅指出他的缺点錯誤当做他的全部，你們还应指出他的成績、功劳、長处及他正确的主張，即使他的主張只有一点或一部分是正确的，你們也必須替他指出，不可抹煞。这样才能給这个同志以全盤的估計与批評，才能帮助他进步，使他服气。

适当的批評，适当的态度和适当的方式，反对"过"与"不及"，这就是我們在党內斗爭中所应采取的方法。

第四，在党內外一般的停止斗爭会的举行。应从总結工作、檢查工作中来指出各种缺点錯誤。应該首先"对事"，然后"对人"。应該首先把事实弄清楚，把問題弄明白，把錯誤与缺点的性質、严重程度、产生的原因弄清楚，然后再指出对这些缺点錯誤的負責人，主要的、次要的由誰負責，而不要首先去追究錯誤的負責人。只要犯錯誤的同志不是有意的，并且眞正在了解錯誤，改正錯誤，那我們就应該欢迎，就不应再事斤斤計較。在党內斗爭中，对干部与同志的打击政策，攻击别人与打击别人的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这与剝削阶級对劳动者的鞭子政策、压迫政策，在本質上是同一的。我們的政策是同志間的互相帮助与互相檢討。

对于某些特别調皮搗蛋、經常違反决定、違反紀律、違反共产主义道德的同志，对于他們，原則問題还說不上、也說不通的时候，那末，个别的举行一些同志审判会，也并不是不可以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把它普遍化就是不对的。

第五，必須給被批評被处罰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訴的机会。在鑒定同志及对同志做組織結論的时候，通常均应通知本人，当面做結論。如果他不服，在經过辯論之后，应向上級申訴（一切在处罰后表示不服者，即使他本人不願上訴，党的組織亦应代他上訴）。任何党的組織，不能禁止任何同志在被处罰后向上級申訴。党員的上訴权不能剝夺。一切的上訴書，任何党的組織不能扣压，关于思想原則問題，党員并可越級直接向中央或高級党委上訴。不过上訴的同志应該在下面充分說明自己的主張和理由、分歧的意見何在？弄清楚之后，才去上訴，不能在下面不說，到上面又乱說，蒙混上級，企圖取巧，一切案件上訴之后，决定权即在上級，上級党委可取消、或減輕、或加重下級党委对同志的处罰。

在思想原則上，經过爭論之后，如果还未在党內最后的取得一致，是可以通过多数决定的。在多数决定之后，少数同志如果还有不同的意見，在組織上行动上絕对服从多数的条件之下，是有权利保留自己意見的。

一定数量的下級党委或同志要求上級党委及領导机关召集适当的会議檢查工作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上級党委应該召集会議来檢查。

第六，应使党內斗爭与党外斗爭有明确的界限，同时建立适当的联系。不要將党內斗爭的方式拿到党外去使用，也不要將党外斗爭的方式拿到党內来使用，更不要利用党外的力量和条件来向党进行斗爭与恐吓。一切党員要严重的注意和警惕，不要使暗藏的托派奸細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党內的矛盾和斗爭来进行破坏党的活动，一切党員在党內斗爭中，不要被这些分子所利用。这只有严格的遵守紀律及党內正确的进行党內斗爭，才能做到。

在党內，只能允許合法的斗爭，只能允許思想斗爭；一切違犯党章党紀的斗爭方式，都是不能允許的。

第七，禁止党內的無原則糾紛。这須規定以下的一些办法：

(一)一切党員对党的領导机关及各个党的組織，如有意見，只能

向相当的党的組織提出及批評，不允許在群众中乱說。

（二）一切党員对其他党員及党的負責人如有意見，只能当面批評，或在一定的組織中批評，不允許乱談。

（三）一切党員或下級党委对上級党委如有意見，只能向上級党委提出，或要求召集会議檢查，或向上級的党委控告，不允許乱說，或向下級傳达。

（四）一切党員如果發現其他党員有不正当的行为及危害党的利益的行为时，必須向相当的党的組織报告，不得隐瞞或互相包庇。

（五）一切党員应大家提倡正气，提倡正派，反对邪气，反对一切不正派的言論与行为，給那些喜說閑話、喜欢广播、喜打听人家的秘密、喜造謠言的党員以严重的斥責。党的領导机关应該随时通令，禁止党員相互談論某些一定的問題。

（六）各級領导机关应随时找那些喜欢說人閑話、喜鬧無原則糾紛的同志来談話，給以糾正及警告或其他处分。

（七）各級党委应尊重每个党員提出的意見，应經常召集会議，討論問題，檢討工作，給党員以充分發表意見的机会。

对于無原則糾紛，应該一般的禁止，不应去判断是非，因为是無原則糾紛，所以是無是非可以判断的。

当着我們去解决同志間無原則糾紛的时候，决不要單从糾紛的本身去解决，而应該去檢討与总結那里的工作，正面的原則的去提出那里今后的任务、工作方針、路綫和計划等。在这种总結、任务、方針、路綫和計划中，批評到某些同志不正确的意見，然后征求同志們的意見，是否还有不同的意見；如果同志們还有不同的意見，那就变为原則的爭論，把同志間的無原則爭論提到原則爭論的高度，如果同志們在原則上沒有不同的意見了，就要求同志們大家在这种总結任务和方針之下，团結起来，一致为完成这种任务与計划而斗爭。其他一切的無原則問題，要求同志們拋棄。应該从总結过去的工作、解决当前的任务、推动当前的工作中去解决無原則的糾紛，否則，無原則糾紛是不能得到解决的。我們决不要用审判官的态度去解决無原則的糾

紛，这是無法判断、無法解决的。如果你判断不当，双方都是会不滿意的，糾紛会繼續存在的。

至如某人对某人信任不够，某人对某人尚有若干怀疑等等，这些問題一般不应提出来討論，因为討論是無益的。要解决这些問題，也只有在工作中、斗爭中、实踐中，才能解决，才能証明某人是可信任的，某人是無可怀疑的。

如果有同志在原則斗爭中夾杂着若干無原則成份，那末我們只着重和他討論原則問題，無原則問題不应着重去討論，否則就会淹沒原則問題。

如果有同志在原則斗爭的掩盖之下去进行無原則斗爭，那我們一方面应指出他在原則上对的方面，不要"以人廢言"；同时也应适当的指出他的立場与手段的不正确，以免將原則斗爭引上無原則斗爭。

总而言之，党內斗爭基本上是一种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与斗爭。在党內一切要講道理，一切要講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講。否則不行。道理講清楚了，一切都好办，都容易办。我們要在党內养成講道理的作风。判别各种道理是否正确的尺度，是党与無产阶級战斗的利益，是部分利益服从整个利益，暫时利益服从長远利益。一切道理，一切主張，对于党与無产阶級的战斗有利的，对整个党与無产阶級的战斗長远有利益的，都是对的。不利的，都是不对的。無道理可講的斗爭，講不出道理的斗爭，就是無原則的斗爭。不講道理或講不清道理，都是不对的，都不能得到正确結論的，都不能澈底解决問題的。道理講清楚了，最后还不能得到一致的話，那末誰个是違犯党与無产阶級战斗的利益，也就清楚了，对于坚持錯誤的同志，采取組織結論就有必要了，問題就好解决了。为了要講清楚道理，要能講清楚道理，党內民主就是必要的，平心靜气互相商討的作风就是必要的。虛心学习，提高同志們的理論水准，弄清楚情况，調查清楚事实，細心研究問題等，更是必要的。粗心大意，主观主义，人云亦云，脫离实际，不查清楚事实……是絕不能講清楚道理的。既不講道理，或講

不清楚道理，結果就只有依靠蛮横，依靠手段，依靠組織上所賦予的权力，甚至依靠欺騙，来解决問題了。党內民主就更無必要了；因为党內民主，就是为了大家来把道理講清楚之后，以便一致行动的。

我在这里所謂之"道理"，当然不是那些空洞的似是而非的道理，而是那些实际事实与被实踐所証明了的眞正的道理。某些知識分子是好講空道理和歪道理的。他們不要事实也可以講一大篇，从地下可以講到天上，这是一种空談、党八股，对党对革命是只有害处毫無益处的。所以在提倡講道理的作风中，又必須反对空談与党八股，提倡那些从实际出發的又是为了实踐的客观的唯物的道理。就是說，"我們的理論是唯物的"。

一切要講道理！不講道理是不行的！道理講錯了也是不行的！空談更是不行的！这当然有些为难，但只有如此，才能够得上布尔什維克。

布尔什維克是講道理的，是眞理的支持者，是明白道理并且好好的和别人講道理的一种人，而不是蛮不講理的無理性的斗爭家。

同志們！这就是我所提出的怎样进行党內斗爭的一些方法。

我想我們同志应該依照这些方法去进行党內斗爭，去反对党內各种不正确的傾向，去檢查每一个党員特别是干部的党性。使我們的党在思想上、組織上更进一步的巩固起来，这就是我們的目的。

（附注）这篇文章因由电报發到延安，所以錯字很多，今特校正，并稍加修改付印，望讀者注意。

刘少奇 注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五日

（摘自解放社一九五〇年訂正再版"整風文献"第一七九至二〇九頁）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摘錄)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鄧 小 平

(四)

在党章草案的总綱中有一部分是說明党的团結和統一的。党的团結和統一是党的建設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正如党章草案的总綱所說:"党的团結和統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經常注意維护党的团結,巩固党的統一,是每一个党員的神聖职責。"

我們党所領导的人民革命为什么能够得到胜利呢?首先,当然由于我們党的主張是正确的,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但是,仅仅有正确的主張还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取得胜利。我們党同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团結了起来。但是,如果我們党自身不是团結的,我們怎样能去团結人民呢?

在我国的人民革命胜利以后,我們又依靠什么战胜巨大的困难和重重的障碍,迅速地实現了国家的統一,迅速地恢复了和发展了国民經济,迅速地进行了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經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呢?毫無疑問,如果我們党不是团結的,我們就决不可能領导人民在这样短的时間內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

我們党已經在国家工作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起着領导作用。很明显,我們党的狀况对于国家的生活,已經比以前任何时候具有更广泛更直接的影响。巩固我們党的团結,維护我們党的統一,这不但是我們党的利益,也是全国人民的利益。

党是阶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指出这一点,在今天党已經在国家工

作中居于領导地位的时候，特别重要。这当然不是說，党可以直接去指揮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是把各种純粹行政性質的問題提到党内来討論，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所应有的界限。这是說，第一，在国家机关工作中的党員，首先是由担任負責工作的党員所組成的党組，必須服从党的統一領导。第二，党必須經常討論和决定在国家工作中的各种方針政策問題和重要的組織問題，国家机关中的党組必須負責在同党外人士完滿合作的条件下，实現党所作出的这些决定。第三，党必須認眞地有系統地研究国家机关工作的情况和問題，以便对于国家工作提出正确的、切实的和具体的主張，或者根据实踐及时地修正自己的主張，并且对于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經常的監督。有某些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同志，借口自己工作的特殊性而不尊重党的領导，企圖把自己工作的部門造成一个独立国，这是必須克服的一种危險傾向。同时，也有些党的机关，对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作不正确的干涉，或者并不調查研究，滿足于籠統的一般化的領导或者臆想式的領导，这种傾向也必須加以糾正。

这里所說的党同国家机关工作的关系，一般地也适用于党同各种人民团体的关系。但是，人民团体内部的民主生活，要比国家机关广泛得多，党在領导人民团体内的党組的时候，必須注意到这种特点。

党为了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結和統一，为了正确地發揮自己的領导作用和核心作用，曾經同在这一問題上的各种錯誤的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爭。党曾經長期处在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封建阶級、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的思想作风，在社会上还保有强大的影响，阶級斗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时期中深刻化，这些情况，不会不在党的生活中有相当的反映。因此，党的团結和統一，也不能离开不同程度的党内斗爭。

像大家所知道的，在从第七次大会到第八次大会期間，最严重的党内斗爭就是反对高崗、饒漱石反党联盟的斗爭。关于这一斗爭，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集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議上，曾經作过詳細的报告

和討論。

高崗、饒漱石反党联盟的基本特点，就在于进行毫無原則的广泛的陰謀活动，企圖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一联盟企圖把持某些地区和某些工作部門，作为反对中央和进行篡夺活动的"資本"，并且为着同一目的，在各个地区中和人民解放軍中，进行反对中央的煽动。他們的陰謀活动，完全違反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敌人。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五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議对于一九五四年二月七屆四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以后所采取的有关措施，表示了完全一致的同意。

在党的七屆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議以后，党的团結和統一，是大大地加强了，全党同志的覺悟和党的組織的战斗力，是大大地提高了。党的和人民的敌人，在这一斗爭中什么也沒有得着。

党中央决定开除高崗和饒漱石的党籍，因为他們的行为，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有极端严重的危害，并且他們在党的七屆四中全会前后的長时期中，在党再三向他們敲了警鐘以后，他們仍然沒有悔改的表示。党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召集的全国財經工作会議，和同年九十月間召集的全国組織工作会議上，都着重地要求全党加强团結，反对破坏团結的行为，但是，这些醉心于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陰謀家完全置若罔聞。

七屆四中全会的决議指出："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錯誤，甚至在党內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必須进行無情的斗爭，給予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將他們驅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維护党的团結，才能維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但是，这只是党对于犯錯誤的党員的方針的一个方面。七屆四中全会决議指出："每个同志都可能有缺点或錯誤，每个同志都需要别人帮助，而党的团結正是为了發展这种同志式的互相帮助。对于党員的缺点或錯誤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針。"接着，这一决議說："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質上比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質

上比較不重要的錯誤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較严重的錯誤，但在受到批評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願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針。对于他們的缺点或錯誤必須按照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評或必要的斗爭；但是这种批評或斗爭应当从团結出發，經过批評或斗爭达到团結的目的，不应当不給他們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將他們的个别的、局部的、暫时的、比較不重要的缺点或錯誤夸大为系統的、严重的缺点或錯誤，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結出發，就不能达到团結的目的，就不利于党。”

七届四中全会决議在对待党內錯誤問題上的上述方針，已經写到党章草案的总綱里了。

大家知道，党中央从一九三五年以来，对于党內犯錯誤的党員，就一直采取着这种分别对待的方針，而实踐証明，采取这种方針是正确的，有利于党的团結和党的事业的蓬勃發展的。党中央認为，在一般的情况下，糾正同志的錯誤是为了取得教訓，改进工作，教育同志，也就是說，“懲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了把犯錯誤的同志“整死”，整得他实际上不能在党內繼續工作。因此，对待这些同志，应該着重实事求是地分析錯誤的实質和根源，应該着重使这些同志提高思想上的覺悟，并且也使其他同志以至全党都得到必要的教訓，而不应該着重組織上的处分，不应該依靠簡單地“扣帽子”和簡單地实行懲办的方法去解决問題，尤其不应該加重懲办的程度，扩大懲办的范圍，造成党內的緊張狀态和恐惧情緒，使党的力量受到損失。在“左”傾机会主义分子統治党的时期，就曾經犯过这种把党內斗爭絕对化的錯誤。他們在党內实行过火斗爭和懲办主义（所謂“殘酷斗爭”和“無情打击”），結果是严重地損害了党的团結、党的民主和广大党員的积极性，严重地妨碍了党的事业的發展。現在，这种錯誤地对待同志的缺点和錯誤的情况，虽然在党的生活中已經不占統治地位，但是在一部分組織中还是存在的，还必須注意加以糾正。

在另一方面，目前党內也有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对于犯

錯誤的同志，采取包庇姑息态度，不給以应有的处分，而且也不进行思想斗爭。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傾向，这也是必須坚决反对的。

为了保持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結和統一，为了及时地帮助同志克服缺点，糾正錯誤，必須大大發展党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評，禁止压制批評的行为，对于發展批評有决定的意义。在过去几年中，党中央曾經多次組織全党范圍的"整风"形式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中央領导同志在召集下級同志开会或者同他們談話的时候，主动地要求他們对于中央的工作提出批評，耐心地听取他們的批評，并且对于批評中所指出的缺点和錯誤，迅速采取必要的实际措施，使党內的由下而上的批評，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对于压制批評的現象，党中央也进行了尖銳的斗爭，处分了一些專横地压制下級批評的領导人員。但是，必須承認，至今还是有不少党組織的負責人，不少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党員負責人，并沒有采取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評的态度，有一部分人甚至对于批評者采取可耻的打击报复的办法。这个事实，也是官僚主义病菌正在侵襲我們党的严重信号之一。每一个忠誠的共产主义者，必須为消灭这种恶劣的現象而斗爭。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九月單行本第五三至五八頁）

最后，我們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兩条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愼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發了闌尾炎，医生把闌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錯誤的人，只要他不諱疾忌医，不固执錯誤，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眞正願意医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頓，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魯莽的态度，必須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毛澤东："整頓党的作風"（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二版第八二九至八三〇頁

……我們不应該自滿，我們还要繼續作自我批評，还要繼續求进步。我們的生产也要繼續求进步。我們臉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洗臉，地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們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傾向，在軍队工作中的軍閥主义傾向，已經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傾向又可以生長起来的。我們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層層包圍之中，我們是处在散漫的小資产阶級的包圍之中，极端惡濁的官僚主义灰塵和軍閥主义灰塵天天都向我們的臉上大批地撲来。因此，我們决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自足起来。我們应該抑制自滿，时时批評自己的缺点，好像我們为了清潔，为了去掉灰塵，天天要

洗臉，天天要扫地一样。

毛澤东："組織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二版第九三八頁

我們工作作风中的一項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員习慣于独断專行，而不善于啓發人們的批評討論，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当然，这是拿我們解放区的这种作风与那种作风作比較，而不是拿我們解放区与国民党区域作比較。我們解放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里是封建的地方，这兩个地方是原則上区别的。但是，我們队伍中确有許多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傳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見，提了就不高兴。只愛听恭維話，不愛听批評話。为怕碰釘子，受打击，遭报复，人們不敢大胆提意見。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們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員的进步。我提議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內，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論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惡意攻击，允許大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要紧。各級領导人員，有責任听别人的話。实行兩条原則：（1）知無不言，言無不尽；（2）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如果沒有"言者無罪"一条，并且是眞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無不言，言無不尽"的效果。自从整风以来，我們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称贊的，这是很光荣的。但是我們仍有严重缺点，我們許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們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們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們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們就能团結更广大的人民，我們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發展。

毛澤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陝甘宁边区参議会上的演說）

有無認眞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們曾經說过，房子是应該經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滿了灰塵；臉是应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

想，我們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塵的，也应該打扫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对于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实行“知無不言，言無不尽”，“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們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眞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發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犧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隨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見、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嗎？难道我們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体嗎？無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难过，难道我們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犧牲，还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

毛澤东：“論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二版第一〇九七至一〇九八頁

……人民民主專政有兩个方法。对敌人說来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时期內，不讓他們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們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們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們成为新人。对人民說来則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們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进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

毛澤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一届全国委員会第二次会議閉幕詞”（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在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把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結——批評——团結”。講詳細一点，

就是从团結的願望出發，經过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按照我們的經驗，这是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們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內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員群众之間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馬克思主义思想之間的矛盾。"左"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內斗爭方法叫做"殘酷斗爭，無情打击"。这是一个錯誤的方法。我們在批評"左"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沒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結的願望出發，經过批評或者斗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經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結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偉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結的願望出發。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沒有团結的願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殘酷斗爭，無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結？从这个經驗里，我們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結——批評——团結。或者說，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我們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們处理領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軍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軍队之間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間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偉大的成功。这个問題，在我們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們在南方建立革命軍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軍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內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們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覺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們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結——批評——团結"这个方法。我們現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內部繼續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們內部的矛盾。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六月單行本第六至八頁

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国共产党
第八届中央委員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議上)

鄧 小 平

(一) 运动的一般情况

……

(二) 关于資产阶級和知識分子

(見本書第六三五至六四四頁)

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毛 澤 东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戰爭

第一节 战爭規律是發展的

战爭的規律——这是任何指导战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問題。

革命战爭的規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問題。

中国革命战爭的規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从事战爭，我們的战爭是革命战爭，我們的革命战爭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

---

* 毛澤东同志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結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的經驗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紅軍大学作过講演。据著者說，本書只完成五章，尙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問題，因为西安事变發生，沒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这是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党內在軍事問題上的一場大爭論的結果，是表示一个路綫反对另一个路綫的意見。对于这个路綫上的爭論，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的遵义会議作出了結論，肯定了毛澤东同志的意見，而否定了錯誤路綫的意見。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移到陕北以后，毛澤东同志隨即在十二月作了"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講演，系統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党的政治路綫上的問題。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毛澤东同志又写了本書，系統地說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爭战略方面的諸問題。

研究一般战爭的規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爭的規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爭的規律。

大家明白，不論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爭——从有私有財产和有阶級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級和阶級、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間、在一定發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爭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爭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爭，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爭——革命的阶級战爭和革命的民族战爭，在一般战爭的情形和性質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質。因此，在一般的战爭規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質，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規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爭，就不能在革命战爭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爭——不論是国內战爭或民族战爭，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內进行的，比較一般的战爭，一般的革命战爭，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質。因此，在一般战爭和一般革命战爭的規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爭中打胜仗。

所以，我們应該研究一般战爭的規律；也应該研究革命战爭的規律；最后，我們还应該研究中国革命战爭的規律。

有一种人的意見是不对的，我們早已批駁了这种意見了；他們說：只要研究一般战爭的規律就得了，具体地說，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軍事学校出版的那些軍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爭的規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們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絲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內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敗仗。他們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們不知道：我們固然应該尊重过去流血的經驗，但是

还应該尊重自己流血的經驗。

又有一种人的意見也是不对的，我們也早已批駁了这种意見了；他們說：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爭的經驗就得了，具体地說，只要照着苏联內战的指导規律和苏联軍事机关頒布的軍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苏联的規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內战和苏联紅軍的特殊性，如果我們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許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敗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爭是革命的战爭，我們的战爭也是革命的战爭，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們不知道：我們固然应該特别尊重苏联的战爭經驗，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爭的經驗，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們还应該尊重中国革命战爭的經驗，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紅軍又有許多特殊的情况。

再有一种人的意見也是不对的，我們也早就批駁了这种意見了；他們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爭的經驗是最好的，我們应該学习它，具体地說，学北伐战爭的長驅直进和夺取大城市。他們不知道：北伐战爭的經驗是应該学习的，但是不应該刻板地抄用，因为我們現时战爭的情况已經变化了。我們只应該采用北伐战爭中那些在現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們应該按照現时情况規定我們自己的东西。

由此看来，战爭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爭指导規律，有时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别。从时間的条件說，战爭和战爭指导規律都是發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爭規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爭的性質看，革命战爭和反革命战爭，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爭規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爭規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們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爭的指导規律，应該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發展，反对战爭問題上的机械論。

还不止此。对于一个指揮員来說，起初会指揮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揮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發展了。一个地方和許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許多地方也会作战，这对于一个指揮員又是进步了，發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發展，一个战爭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級阶段会指揮的，到了高級阶段也会指揮，这对于一个指揮員更是进步和發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爭發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沒有进步和沒有發展。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長和一孔之見，再也沒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則在一地一时有些作用，但是沒有大的作用。我們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爭指导者。一切战爭指导規律，依照历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战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沒有的。

第二节　战爭的目的在于消灭战爭

战爭——这个人类互相殘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發展終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將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爭反对战爭，用革命战爭反对反革命战爭，用民族革命战爭反对民族反革命战爭，用阶級革命战爭反对阶級反革命战爭。历史上的战爭，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兩类。我們是拥护正义战爭反对非正义战爭的。一切反革命战爭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爭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爭生活时代將要由我們之手而結束，我們所进行的战爭，毫無疑义地是屬于最后战爭的一部分。但是我們所面临的战爭，毫無疑义又是最大的和最殘酷的战爭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殘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爭，迫临在我們的头上，我們如果不打起正义战爭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殘。人类正义战爭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爭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爭，毫無疑义地是正义的战爭，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無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轉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級，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爭也沒有了，反革命战爭沒有了，革命战爭也沒有了，非正义

战爭沒有了，正义战爭也沒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們研究革命战爭的規律，出發于我們要求消灭一切战爭的志願，这是区别我們共产党人和一切剝削阶級的界綫。

第三节　战略問題是研究战爭全局的規律的东西

只要有战爭，就有战爭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爭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爭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爭的一全局。凡屬帶有要照顧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質的，都是战爭的全局。

研究帶全局性的战爭指导規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帶局部性的战爭指导規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要求战役指揮員和战术指揮員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規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屬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說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見是錯誤的，因为这种意見沒有看見战爭的胜敗的主要和首先的問題，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錯誤，那个战爭是一定要失敗的。說"一着不愼，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帶局部性的即对全局無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爭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脫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敗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爭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敗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爭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敗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組成战爭全局的多数战役失敗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敗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說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爭历史中有在連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敗仗以至全功尽棄的，有在吃了許多敗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說的

"連战皆捷"和"許多敗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說的"一个敗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說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顧战爭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顧部队和兵团的組成問題，照顧兩个战役之間的关系問題，照顧各个作战阶段之間的关系問題，照顧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間的关系問題，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問題，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說到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但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是如此，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和团营动作的关系，連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就是实例。任何一級的首長，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揮的全局說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問題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問題或动作上。

說重要，說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規定，必須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規定。作战时选擇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規定。在給养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战士吃得太飽，在給养不足的地方却要注意不使战士餓肚。在白色区域，可以因为仅仅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尔后的战斗失敗；在紅色区域，則走漏消息的問題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战役，高級指揮員有亲自参加之必要，其他則無此必要。一个軍事学校，最重要的問題，是选擇校長教員和規定教育方針。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員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如此等等。总之，一个原則，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学习战爭全局的指导規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見，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構成的，有局部經驗的人，有战役战术經驗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級的东西。战略問題，如所謂照顧敌我之間的关系，照顧各个战役之間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間的关系，照顧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

照顧全盤情况中的特点，照顧前后方之間的关系，照顧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蔭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箝制方面，集中指揮和分散指揮，持久战和速决战，陣地战和运动战，本軍和友軍，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級和下級，干部和兵員，老兵和新兵，高級干部和下級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紅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緣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敗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規軍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爭取群众，扩大紅軍和巩固紅軍，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現在的任务，現在的任务和將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綫和非固定战綫，国內战爭和民族战爭，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問題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見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說，能够把战爭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問題，都提到較高的原則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問題的任务。

第四节　重要的問題在善于学習

为什么要組織紅軍？因为要使用它去战胜敌人。为什么要学习战爭規律？因为要使用这些規律于战爭。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爭的学問拿在講堂上，或在書本中，很多人尽管講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負之分。战爭史和我們自己的战爭生活，都証明了这一点。

那末，关鍵在那里呢？

我們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將軍，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們要求在战爭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將軍——智勇双全的將軍。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識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規律，并且应用这些規律于自己的行动。

許多国家頒布的軍事条令書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則”

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敗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揮員因死用原則而主观地犯錯誤；后者是当着指揮員主观地犯了錯誤，或客观情况起了非所預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訴指揮員怎样去处置。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錯誤呢？就是因为战爭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揮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沒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間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較地会办和比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較地会办，軍事上就要求比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說，要求比較地少打敗仗。这里的关鍵，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間好好地符合起来。

举战术的例子来說。攻击点选在敌人陣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揮員的偵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結果正碰在敌人的釘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預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揮和客观情况統統相符合。統統相符合的事，在战爭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爭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裝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緣故，这和处置靜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揮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指揮員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对于各种偵察材料的联貫起来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將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構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計划，——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計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認識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軍事家，不去这样做，把軍事計划建立在一相情願的基础之上，这种計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魯莽的事

憑热情的軍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騙，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誘，受自己部下不負責任的無眞知灼見的建議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任何軍事計划，是应該建立于必要的偵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緣故。

認識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軍事計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軍事計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計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終結止，这是又一个認識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檢查。如果計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計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变，或不願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結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說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經驗多的軍人，假使他是虛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揮員、战斗員、武器、給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揮員、战斗員、武器、給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爭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經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軍人指导战爭或作战，就比較地有把握，比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長时間內認識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規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結果。这一認識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沒有这一种長时間的經驗，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爭的規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眞正能干的高級指揮員，不是初出茅廬或仅仅善于在紙上談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須在战爭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一切帶原則性的軍事規律，或軍事理論，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爭經驗的总結。这些过去的战爭所留給我們的血的教訓，应該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經驗中考証这些結論，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絕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

做，我們就不能指导战爭

讀書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爭学习战爭——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爭，就是从战爭中学习。革命战爭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軍人之間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長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爭，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說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說学得徹底，用得純熟不容易。說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軍人，是說此門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話："世上無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門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軍事的規律，和其他事物的規律一样，是客观实际㊀对于我們头腦的反映，除了我們的头腦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認識的对象，包括敌我兩方面，这兩方面都应該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們的头腦（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們都是不能解决战爭規律的学习和使用的問題的。中国古代大軍事学家孙武子㊁書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話，是包括学习和使用兩个阶段而說的，包括从認識客观实际中的發展規律，并按照这些規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这句話。

战爭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級和阶級、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間互相斗爭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爭的規律，都是进行战爭的民族、国家、阶級、政治集团为了爭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爭的胜負，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軍事、政治、經济、自然諸条件，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

㊀ "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兩种含义：一种是指眞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們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說的实踐）。毛澤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

㊁ 孙武子即孙武，公元前五世紀时的中国著名軍事学家，著"孙子"十三篇。本文引語見"孙子"卷三"謀攻"篇。

能力。軍事家不能超过物質条件許可的范圍外企圖战爭的胜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条件許可的范圍內爭取战爭的胜利。軍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質条件的上面，然而軍事家憑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許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剧来。因此，我們紅軍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質基础即軍事、政治、經济、自然諸条件之上，就必須發揮我們的威力，提挈全軍，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級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須用我們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們不許可任何一个紅軍指揮員变为乱撞乱碰的魯莽家；我們必須提倡每个紅軍指揮員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駕馭整个战爭变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战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驟地达到彼岸。指导战爭的規律，就是战爭的游泳术。

以上是我們的方法。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戰爭

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爭，已經过去了兩个阶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今后則是抗日民族革命战爭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爭，都是中国無产阶級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領导的。中国革命战爭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資产阶級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爭，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經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願意也不能領导中国革命战爭走上徹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資产阶級群众，是願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爭，并願意使战爭得到徹底胜利的。他們是革命战爭的主力軍；然而他們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則具有無政府思想），所以他們不能成为战爭的正确的領导者。因此，在無产阶級已經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爭的領导責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爭如果

沒有或違背無产阶級和共产党的領导，那个战爭是一定要失敗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層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無产阶級和共产党，才最沒有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組織性，而且也最能虛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無产阶級及其政党的經驗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無产阶級和共产党能够領导农民、城市小資产阶級和資产阶級，克服农民和小資产阶級的狹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資产阶級的动摇和不徹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和战爭走上胜利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爭，基本地說，是在国际無产阶級和中国無产阶級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爭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資产阶級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棄革命領导权，这次革命战爭就失敗了。

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战爭，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爭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資产阶級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資产阶級則做了大資产阶級的尾巴。領导这个革命战爭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經形成了对于革命战爭的絕对的領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絕对的領导权，是使革命战爭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沒有共产党的这种絕对的領导，是不能設想革命战爭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領导了中国的革命战爭，在十五年的長岁月中㊀，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爭的最前綫。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經驗，以几十万英勇党員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間起了偉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爭中的偉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圖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

㊀ 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六年毛澤东同志著此文时，正是十五周年。

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長时間內考驗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領导者。現在共产党說的話，比其他任何政党說的話，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沒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間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險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爭中，除了犯过陈独秀㊀右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傾机会主义㊁兩个錯誤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兩个錯誤：

㊀ 陈独秀原为北京大学教授，因編輯"新青年"杂志出名。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創建人之一，由于他在五四运动时代的声名以及党在初創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書記。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党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傾思想，形成了投降主义的路綫。当时的"投降主义分子，自願放棄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資产阶級和中等資产阶級的領导权，尤其是放棄对于武裝力量的領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敗"（毛澤东："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陈独秀及其他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变成了取消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場，并和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組織，因而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驅逐出党。陈独秀死于一九四二年。关于陈独秀的右傾机会主义，請参看"中国社会各阶級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兩文題解，和"毛澤东选集"第二卷"'共产党人'發刊詞"一文（見本書第八八六至八九六頁——本書編者注）。

㊁ 李立三"左"傾机会主义，是指一九三〇年六月以后約四个月时間內以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主要領导者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左"傾机会主义路綫，通称为"立三路綫"。立三路綫的特点，就是違反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針，不認革命需要准备群众的力量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認为毛澤东同志在長时期中用主要注意力創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圍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謂"極端錯誤的""农民意識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主張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馬上起义。李立三同志在这种錯誤路綫下定出了立即組織全国各中心城市武裝起义的冒險計划。立三路綫同时不承認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認为中国革命的总爆發必將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發，而中国革命又必須在世界革命的总爆發中才能成功；也不承認中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实行社会主义轉变的开始，并因此規定了若干不适合时宜的"左"傾冒險政策。毛澤东同志反对这一个錯誤的路綫，全党广大的幹部和党員也要求糾正这一个路綫。李立三同志本人，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承認了当时被指出的錯誤，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領导地位。因为立三同志在長时期中改正了自己的錯誤观点，所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他做中央委員。

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机会主义㊀，这个錯誤使得土地革命战爭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損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紅軍的結果。这个錯誤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議时糾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張国燾右傾机会主义㊁，这个錯誤發展到破坏了党和紅軍的紀律，使一部分紅軍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損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領导，紅軍中党員和指揮員战斗員的覚悟，終于也把这个錯誤糾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錯誤，对于我們的党，我們的革命和战爭，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終于被我們克服，我們的党和我們的紅軍是从这些錯誤的克服中鍛煉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共产党領导了、而且繼續領导着轟轟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

㊀ 一九三〇年九月举行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及其后一时期的党中央，对于停止立三路綫作了許多有积极作用的措施。但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一部分沒有实际革命斗爭經驗的同志，以陈紹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二同志为首，却起来反抗中央的措施。他們在当时發表的名为"兩条路綫"又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册子中，特别强調地宣称当时党内主要的危險不是"左"傾机会主义，而是所謂"右傾机会主义"，把"批評"立三路綫的"右"当作其活动的資本。他們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繼續，恢复或發展立三路綫及其他"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領导，而与毛澤东同志的正确路綫相对立。毛澤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一書，主要地是为批判这个新的"左"傾机会主义路綫在軍事方面所犯錯誤而作的。这个新的"左"傾錯誤路綫在党内的統治，是从一九三一年一月間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貴州遵义召集的政治局会議結束这一錯誤路綫的領导而开始了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領导时为止。这次"左"傾錯誤路綫在党内統治的时間特别長久（四年），給予党和革命的損失特别重大，其惡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紅軍和紅軍的根据地都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使数千万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受了国民党的摧殘，推迟了中国革命的进展。犯过这个"左"傾路綫錯誤的同志，在長期体驗中，絕大多数都已經認識了和改正了自己的錯誤，并且做了許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認識的基础上，在毛澤东同志的領导下，互相团結起来了。一九四五年四月間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决議"，对于这个錯誤路綫的各方面，作了詳細的总結。

㊁ 参看"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二一和注二二（見本書第一〇四三頁注六和注七——本書編者注）。

革命战爭。这个战爭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們。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爭的阶段上，我們將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將給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爭証明，我們不但需要一个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綫，而且需要一个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軍事路綫。十五年的革命和战爭，已經鍛煉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綫了。今后战爭的新阶段，我們相信，將使这样的路綫，根据新的环境，更加發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訴我們，正确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綫，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發展起来的，而是从斗爭中产生和發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傾机会主义作斗爭，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傾机会主义作斗爭。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爭的有害的傾向作斗爭，并且徹底地克服它們，正确路綫的建設和革命战爭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时常提到錯誤方面的意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第三章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

第一节　这个問題的重要性

不承認、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中国革命战爭有其特点的人，把紅軍对国民党軍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爭相同，或和苏联內战相同。列宁斯大林領导的苏联內战的經驗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經驗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經驗的理論綜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說，我們应該在我們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經驗。中国革命战爭的許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內战的特点。不估計到这种特点，或否認这种特点，当然是錯誤的。这点在我們的十年战爭中已經完全証明了。

我們的敌人也曾犯过类似的錯誤。他們不承認和紅軍作战需要有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他們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輕視我們，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这是一九三三年敌人的第四次"圍剿"

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結果就是招致了他們的历次的失敗。首先在国民党軍队中提出在这个問題上的新意見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將軍柳維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們的意見被蔣介石采納了。这就是蔣介石廬山軍官訓練团㊀及其在第五次"圍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軍事原則㊁产生的过程。

然而当着敌人改变其軍事原則使之适合于同紅軍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們队伍中却出現了回到"老套"的人們。他們主張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絕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絕紅軍血战史的經驗，輕視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輕視国民党軍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則視若無睹。結果，是丧失了除了陝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紅軍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員降到了几万党員，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組織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罰。他們自称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馬克思列宁主义也沒有学到。列宁說：馬克思主义的最本質的东西，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㊂。我們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記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爭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爭，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爭走上胜利的途徑。

第二节　中国革命战爭的特点是什么

那末，中国革命战爭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㊀ 廬山軍官訓練团是蔣介石訓練反共軍事幹部的組織，創办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地址在江西省九江县的廬山。該团輪流調集蔣軍軍官，由德国、意国和美国的軍事教官施以法西斯主义的軍事的和政治的訓練。

㊁ 这里所說的第五次"圍剿"的新軍事原則，主要地是指蔣介石匪帮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壘政策"。

㊂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共产主义"一文。在該文中列宁批評匈牙利共产党員貝拉·貢說："他抛开了馬克思主义的最本質的东西、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經济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經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爭有發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爭發生不久，湖南江西兩省边界区域——井岡山的同志們中有些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問的时候，我們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贛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㊀）。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問題，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問題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論基础。

現在把这个問題分开来看一看：

中国政治經济發展不平衡——微弱的資本主义經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經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滯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統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軍閥和管理各省的小軍閥同时存在，反动軍队中有隶屬蔣介石的所謂中央軍和隶屬各省軍閥的所謂杂牌軍这样兩部分軍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鉄路航路汽車路和普遍的独輪車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統一，影响到中国統治集团間的不統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迴旋的余地。

中国是經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紅軍的种子，准备好了紅軍的領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所以我們說，中国是一个經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經济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爭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

㊀ 湘贛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湘贛边区共产党在宁岡县茅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不但基本地規定了我們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規定了我們軍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

紅軍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軍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軍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現代国家的軍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軍事物資的供給比起紅軍来雄厚得多，而且其軍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軍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軍。它的軍队和紅軍比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經济、交通、文化的樞紐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中国紅軍是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的面前。这是中国革命战爭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使紅軍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爭以及苏联內战、北伐战爭都有許多的不同。

第三个特点是紅軍的弱小。

中国紅軍是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資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經济上比較稳定的时期。

我們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沒有任何的外間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經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紅軍沒有眞正巩固的根据地。

紅軍的数量是少的，紅軍的武器是差的，紅軍的粮食被服等物質供給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銳的对比。紅軍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銳的对比上發生的。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領导和土地革命。

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結果。这个特点产生了兩方面的

情形。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爭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資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領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龐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軍事上給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們有农民的援助。紅軍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領导下的紅軍人員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揮員和战斗員之間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則和国民党成了尖銳的对比。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沒有农民的援助。其軍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許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級干部自覚地为国民党拚命。官兵之間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

第三节　由此产生我們的战略战术

經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經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紅軍，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爭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規定了中国革命战爭的指导路綫及其許多战略战术的原則。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規定了中国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規定了中国紅軍的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規定了战爭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还可能失敗。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爭的兩方面。这兩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說，既有順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爭的根本規律，許多規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規律發生出来的。我們的十年战爭史証明了这个規律的正确性。誰要是睜眼看不見这些根本性質的規律，誰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爭，誰就不能使紅軍打胜仗。

很明显的，正确地規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險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轉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紅軍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認紅軍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認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綫和陣地战，承認非固定的作战

綫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認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兩个拳头主义，承認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認小后方制度；反对絕对的集中指揮，承認相对的集中指揮；反对單純軍事观点和流寇主义㊀，承認紅軍是中国革命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反对土匪主义㊁，承認严肅的政治紀律；反对軍閥主义，承認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軍事紀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認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認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紅軍停頓于旧阶段，爭取紅軍發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則問題，都要求正确的解决。我們現在要講的战略問題，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爭的十年血战史的經驗，好好地說明这些問題。

第四章　"圍剿"和反"圍剿"——中国内戰的主要形式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爭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紅色游击队或紅軍的周圍，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圍，經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圍剿"。敌人把紅軍看作異物，一出現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紅軍，而且总是把它圍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沒有变化的，如果沒有民族战爭代替国內战爭，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紅軍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紅軍的活动，采取了反"圍剿"的形式。所謂胜利，主要地是說反"圍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圍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組織而成。在一次"圍剿"沒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許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說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經胜利了。十年的紅軍战爭史，就是一部反"圍剿"史。

敌人的"圍剿"和紅軍的反"圍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兩种

㊀ 見"关于糾正党內的錯誤思想"注二和注三（見本書第五四一至五四二頁注一和注二——本書編者注）。

㊁ "土匪主义"，指無紀律、無組織、無明确的政治目标的搶掠行为。

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爭沒有兩样的。然而中国內战的特点，則在二者的長期的反复。在一次"圍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紅軍的防御，紅軍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圍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紅軍的进攻，紅軍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圍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圍剿"，都是包括这兩个阶段的，而且是長期地反复的。

說長期反复，是說战爭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圍剿"和反"圍剿"，是战爭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圍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至于战爭和战斗的內容，則不是簡單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規律，是"圍剿"和反"圍剿"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然而不是沒有起落的。第五次"圍剿"之后，因为紅軍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紅軍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內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圍剿"的規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較小些，簡單些，緩和些了。

紅軍的失敗是什么呢？在战略上說，只有反"圍剿"根本沒有成功，才叫做失敗，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暫时的失敗。因为国內战爭的根本的失敗，就是整个紅軍的复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沒有的。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紅軍的轉移，这是暫时的和局部的失敗，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敗，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軍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事实，我們把它叫做防御的繼續，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繼續。这就是說，在"圍剿"和反"圍剿"的斗爭中，我們沒有由防御轉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們的防御，我們的防御就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然而等到紅軍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例如我們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陝西，"圍剿"的反复又出現了。所以我們說，紅軍的战略退却(長征)是紅軍的战略防御的繼續，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繼續。

中国国内战爭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爭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兩种。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圍剿"和反"圍剿"的長期地反复和攻防兩种战斗形式的長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偉大的战略轉移(長征)㊀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

所謂敌人的失敗，也是如此。他們的战略失敗，就是他們的"圍剿"被我們打破，我們的防御变成了进攻，敌人轉到防御地位，必須重新組織才有再一次的"圍剿"。敌人沒有如同我們所謂一万多公里的战略轉移的那种情形，这是因为他們是全国性的統治者，他們比我們强大得多的緣故。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过的。若干根据地中被紅軍圍攻的白色据点內的敌人突圍而出，退却到白区里去重新組織进攻，这样的事是發生过的。如果內战延長，紅軍胜利的范圍更广大时，这种事情会多起来。但是他們的結果不能和紅軍相比；因为他們沒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間又不一致。他們如果也学紅軍的長途轉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在一九三〇年的立三路綫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內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內战發展中"圍剿"又"圍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長期反复的規律(那时已有湘贛边区的三次"圍剿"，福建的兩次"圍剿"等)，因此在紅軍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紅軍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裝起义，企圖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圍剿"反复这一規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則有所謂"偏师"㊁說，那里的一些領导同志認为第三次"圍剿"失敗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紅軍，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馬担当主力軍。在这个估計之下的战略方針，就是紅軍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紅軍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誘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

㊀ 指紅軍由江西到陕北的二万五千华里的長征。見"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二〇(見本書第一〇四二至一〇四三頁注五——本書編者注)。

㊁ "偏师"，即不是主力軍，而只是軍队的担任側翼的一部分。

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認为"反对五次'圍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則上一致的。这个"左"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圍剿"、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圍剿"斗爭中的錯誤路綫的根苗，使紅軍在敌人的严重的"圍剿"面前不得不处于無能的地位，給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損失。

跟否認"圍剿"反复的"左"傾机会主义直接联系，而說紅軍根本不应該采取防御手段的一种意見，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革命和革命战爭是进攻的——这种說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爭从發生到發展，从小到大，从沒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沒有紅軍到創造紅軍，从沒有革命根据地到創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傾向是应該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爭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說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側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許多事物在發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現象，何况軍事运动。

上述兩个論断中的前一論断，在政治上說来可以是对的，移到軍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說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〇六年㊀、中国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一八年的布列斯特条約㊁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論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眞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

㊀ 指俄国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起义失敗后，革命由高漲时期轉入逐漸退落的时期。参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要讀本"第三章第五、第六兩节。

㊁ 布列斯特条約是苏俄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和德国訂立的和約。这是在当时敌人的力量显然超过革命力量的情况下，为了使剛才成立而还沒有自己軍队的苏維埃共和国不受德帝国主义的打击，而采取的暫时退却。这个和約的签訂，使苏維埃共和国獲得了时間去巩固無产阶級的政权，調整經济，建立紅軍；使無产阶級保持了对农民的領导，集聚了力量，得以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击溃白軍和英美法日波各国武裝干涉者。

用軍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

"圍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結束？据我看来，如果內战延長的話，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紅軍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結束了。那时是我們圍剿敌人，敌人則企圖反圍剿，但是政治和軍事的条件將不允許敌人获得如同紅軍一样的反"圍剿"的地位。那时，"圍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說完全結束，但是一般的結束是可以断言的。

第五章　战略防御

这个題目中，我想說明下列各問題：（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圍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問題；（六）集中兵力問題；（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第一节　积極防御和消極防御

为什么从防御說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統一战綫失敗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殘酷的阶級战爭。敌人是全国的統治者，我們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們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圍剿"奋斗。我們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圍剿"的，我們發展的命运全看我們能不能打破"圍剿"。打破"圍剿"的过程往往是迂迴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問題，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問題成为紅軍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問題。

在我們的十年战爭中，对于战略防御問題，常常發生兩种偏向，一种是輕視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輕視敌人，許多游击队失敗了，紅軍对若干次敌人的"圍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領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們看見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裝起义胜利了，或从白軍中嘩变

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順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輕視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沒有經驗，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現象，可是人們不願意想一想，一味只講进攻，不講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裝，因而把行动引到錯誤的方向。許多游击队因此失敗了。

紅軍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圍剿"的例子，則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紅軍的失敗㊀，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紅軍，在所謂国民党偏师說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圍剿"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輕敌者相反，人們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輕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針，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裝。其結果或者是游击队失敗，或者是紅軍的某些战役失敗，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圍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錯誤是从右傾的观点产生的。領导者們畏敌如虎，处处設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誘敌深入，聚而歼之，結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紅軍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長征。然而这种錯誤，往往有一种"左"傾輕敌的錯誤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軍事冒險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圍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綫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張国燾路綫"。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黄河以西的失敗㊁，是这个路綫的最后的破产。

㊀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广东海陆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之下举行第三次起义，占領海丰陆丰及附近地区，組織紅軍，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后因犯輕敌的錯誤而失敗。

㊁ 一九三六年秋季，紅四方面軍与紅二方面軍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国燾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貫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达甘肃后，張国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队二万余人，組織西路軍，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爭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專守防御，又叫單純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眞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軍事書，任何一个比較聪明的軍事家，而且無論古今中外，無論战略战术，沒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爭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軍事上的表現，我們应該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發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兩国的軍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爭的。德日帝国主义的軍事家們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說的阶級矛盾剧烈，而战爭的利益仅仅屬于反动的統治阶層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們的情况不同。在保衛革命根据地和保衛中国的口号下，我們能够团結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們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苏联內战时期的紅軍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战胜敌人的。他們的战爭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組織白党进攻时，是在保衛苏維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也是在保衛首都的口号下进行軍事动員的。一切正义战爭的防御战，不但有廣濶政治上異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員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爭中来。

馬克思說的武裝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該停止进攻㊀，这是說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該不讓反动的統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間把国內反动的統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滿足于已得的胜利，輕視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縮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敗。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說，敌我双方已在軍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該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㊀ 見馬克思致顧格曼論巴黎公社的信。

我們过去的战爭，整个地說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軍事上采取了打破"圍剿"的形式。

在軍事上說来，我們的战爭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們，說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說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鍵在于打破"圍剿"。"圍剿"沒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圍剿"一經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兩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圍剿"和它的又一次"圍剿"是衔接着的。这兩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圍剿"的許多問題。基本的原則是承認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从国內战爭說，假如紅軍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針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第二节　反"圍剿"的准备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計划的"圍剿"，如果我們沒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倉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沒有的。因此，在和敌人准备"圍剿"同时，进行我們的反"圍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們队伍中曾經發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見是幼稚可笑的。

这里有一个困难問題，容易發生爭論。就是，何时結束自己的进攻，轉入反"圍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圍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們难于知道他們將在何时开始进攻。我們准备反"圍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減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給予紅軍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驟，就是軍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員。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發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們的重新进攻剛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

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問題。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間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軍事、財政和社会輿論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計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敗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計到敌人內部的矛盾，財政的困难，过去失敗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計到过去胜利的影响。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問題，一般地說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損失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則是有备無患，根本上立于不敗之地。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問題，是紅軍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員，征集新兵，財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異己分子的处置等。

所謂紅軍的准备退却，就是說不要使紅軍向着不利于退却的方向，不要进攻得太远了，不要使紅軍过于疲劳。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夜主力紅軍的必要的处置。这时紅軍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創造战場，征集資材，扩大自己和訓練自己的計划上。

政治动員是反"圍剿"斗爭中第一个重要問題。这即是說，明确、堅决而充分地告訴紅軍人員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紅軍的优良条件，我們一定要胜利的志願，我們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紅軍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圍剿"、保衛根据地而斗爭。除开軍事秘密外，政治动員是必須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員。重要的关节是說服干部。

征集新兵須从兩方面出發：一方面顧到人民的政治覺悟程度和人口情况；又一方面顧到当时紅軍的情况和整个反"圍剿"战役中紅軍消耗的可能限度。

財政和粮食問題，不待說对于反对"圍剿"是有重大意义的。要顧及"圍剿"时間的可能延長。应当計算，主要的是紅軍，再則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整个反"圍剿"斗爭中物資需要的最低限度。

对待政治異己分子，不可对他們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們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間是应該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們說明，爭取他們中立，并且組織民众监視他們。只有对极少数最帶危險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圍剿"斗爭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輕敌而發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發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該坚决反对的不良傾向。我們需要的是热烈而鎮定的情緒，紧張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三节　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是劣势軍队处在优势軍队进攻面前，因为顧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軍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計划的战略步驟。可是，軍事冒險主义者則坚决反对此种步驟，他們的主張是所謂"御敌于国門之外"。

誰人不知，兩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却往往被退讓者打倒。

"水滸傳"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連喚几个"来""来""来"，結果是退讓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綻，一脚踢翻了洪教头㊀。

春秋时候，魯与齐㊁战，魯庄公起初不待齐軍疲憊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劌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針，打胜了齐軍，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軍战胜强軍的有名的战例。請看历史家左丘明㊂的叙述：

㊀ "水滸傳"是中国描写农民战爭的著名小說，相傳为公元十四世紀元末明初时人施耐庵所作。林冲、柴进都是書中的英雄人物。洪教头是柴进家里的一个武术教师。

㊁ 魯国和齐国是中国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年——前四八一年）的兩个封建国家。齐是大国，在今山东省的中部；魯国較小，在今山东省的南部。魯庄公，公元前六九三年至前六六二年魯国的国君。

㊂ 左丘明，中国周朝著名編年史"左傳"的作者。本文中引的一段文章見"左傳"庄公十年。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劌請見。其乡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謀。乃入見。問：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偏，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战。战則請从。公与之乘。战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齐人三鼓。劌曰：可矣。齐师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問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測也，惧有伏焉。吾視其轍乱，望其旗靡，故逐之。"㊀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轉入反攻的陣地——長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轍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說的战略防御的原則。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則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皐之战㊁、新汉昆阳之战㊂、袁曹官渡之战㊃、吳魏赤壁之战㊄、吳蜀彝陵之

㊀ "肉食者"指做官的。"又何間焉"，是"何必厠身其間"的意思。"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中，牺牲玉帛是祀神的礼物，加是虚报的意思。曹庄公說他据实报告祭品，表示他对神守信用。"忠之屬也。可以一战"，忠是尽力做好本分的事。曹劌的意思是說：一个国君对臣民处置得合乎情理，便会得到人民拥护，所以可以作战。"公將鼓之"和"齐人三鼓"的"鼓"，都是說鳴鼓指揮士兵衝鋒。"登軾而望之"的"軾"是車前供給乘者扶手的横木，因为在車上位置最高，所以登軾遠远。

㊁ 成皐故城在今河南省成皐县西北境，为古代軍事重地。公元前二〇三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連攻下滎阳、成皐，刘邦几乎溃不成軍。但后来刘邦終于等待到楚軍在汜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軍，复取成皐。

㊂ 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二三年，刘秀（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的軍队。这次战爭双方軍力强弱悬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余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將軍王寻、王邑輕敌懈怠，用精兵三千突破王莽軍队的中坚，乘銳进击，大破敌軍。

㊃ 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二〇〇年，曹操軍队和袁紹軍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紹拥軍十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軍的輕敌無备，实行輕兵偷襲，燒了袁軍的輜重。袁軍慌乱，曹軍出击，歼灭了袁軍主力。

战㈤、秦晋淝水之战㈥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后發制人，因而战胜的。

我們的战爭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沒有經驗。南昌起义㈧、广州起义㈨是失敗了，秋收起义㈩在湘鄂贛边界地区的紅軍，也打了几个敗仗，轉移到湘贛边界的井岡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敗后保存的部队，經过湘南也轉到了井岡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帶着朴素性質的游击战爭基本原則，已經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謂"敌进我退，敌駐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訣。这个十六字訣的軍事原則，立三路綫以前的中央是承認了的。后来我們的作战原則有了进一步的發展。到了江西

㈤ 吳指孙权方面而言，魏指曹操方面而言。赤壁在湖北省嘉魚县东北的長江南岸。公元二〇八年，曹操率兵五十余万，号称八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和曹操的敌人刘备联合，出兵三万，利用曹軍有疫疾，又不习水战，用火攻燒曹軍船只，大破曹軍。

㈥ 彝陵在今湖北宜昌县东。公元二二二年，吳將陆遜在这里大敗蜀汉的刘备。这次战爭开始，刘备軍連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吳境五六百里。陆遜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計不复生"，利用順風放火，大破蜀軍。

㈦ 公元三八三年，东晉將軍謝玄大敗秦主苻堅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堅有步兵六十余万、騎兵二十七万、衛队三万余騎，东晉只有水陆軍八万。在兩軍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晉軍將領利用了敌軍的驕傲自恃，要求淝水以北的秦軍讓出一片战場来，以便晉軍渡水决战。秦軍果然应允，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晉軍乘机渡水攻击，大敗秦軍。

㈧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蔣介石汪精衛的反革命，繼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业，在江西省城南昌領导了有名的起义。参加这个起义的有三万多人的武装部队，領导人有周恩来、朱德、賀龙、叶挺等同志。起义軍于八月五日按原来計划退出南昌，進至广东潮州、汕头时，遭受挫敗。起义軍的一部分后来由朱德、陈毅、林彪等同志率領轉战到井岡山，和毛澤东同志領导的工农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师会合。

㈨ 見"中国的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夠存在？"注八（見本書第八八一頁注一——本書編者注）。

㈩ 一九二七年九月，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修水、萍乡、平江、瀏阳等县的人民武装在毛澤东同志領导下，举行著名的秋收起义，成立工农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师。毛澤东同志率領这支軍队到井岡山，在那里建立了湘贛边区革命根据地。

根据地第一次反"圍剿"时，"誘敌深入"的方針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圍剿"，于是全部紅軍作战的原則就形成了。这时是軍事原則的新發展阶段，內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許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則，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訣。十六字訣包举了反"圍剿"的基本原則，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兩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兩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發展罢了。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圍剿'被粉碎后爭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則錯誤的决議發布之后，"左"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則作斗爭，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則，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謂"新原則"，或"正規原則"。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規的了，那是应該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統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軍事冒險主义，第二阶段轉到軍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議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錯誤路綫的破产，重新承認过去路綫的正确性。这是費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

起勁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們說：誘敌深入是不对的，放棄了許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現在不是已經和过去不同了嗎？并且不放棄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嗎？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嗎？过去的东西沒有任何的正規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現在我們的国家已成立了，我們的紅軍已正規化了。我們和蔣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軍和大軍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該全部抛棄的了。新的原則是"完全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沒有馬克思主义的。新原則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綫出击"，"夺取中心城市"，"兩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門之外"，"先發制人"，"不打爛罐罐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

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壘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絕对的集中指揮；最后，則是大規模搬家。并且誰不承認这些，就給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銜，如此等等。

無疑地，这全部的理論和实际都是錯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順利时小資产阶級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現；环境困难时，則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魯莽家和門外汉的理論和实际，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單說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誘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陣地”。从前的軍事理論家和实际家也無不承認这是弱軍对强軍作战时在战爭开始阶段必須采取的方針。外国的軍事家就曾这样說：“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們对此也沒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軍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讓一步，則必危及軍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許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認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單純防御路綫”。我們的历史已經証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錯誤的了。

准备反攻，須选擇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發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們的过去情形說来，大概須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轉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积极援助紅軍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陣地；

（三）紅軍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發現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發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紅軍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

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發現。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紅軍时，紅軍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紅軍反对白軍的。根据地的边緣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鎖消息、偵察、运輸、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較边緣区为好。所以"退却終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圍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紅軍的作战比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壘主义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軍队能够选擇自己所欲的有利陣地，使进攻的軍队不得不就我范圍，这是內綫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軍要战胜强軍，是不能不講求陣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單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則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發生了过失，或者該路前进的敌人比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陣地，也只得置之不顧，繼續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無优良的陣地，但無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發現时，紅軍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緣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箝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則。当着我們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紅軍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紅軍就实行所謂"求心退却"。退却的終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則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紅軍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軍对于强軍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揀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們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軍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偵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許多时間，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軍甚远，我們要求强弱的对比發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圍剿"时蔣介石某旅参謀長所說的"肥的拖瘦，瘦的拖

死”，又如“圍剿”軍西路总司令陈銘樞所說的“国軍处处黑暗，紅軍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軍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許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紅軍虽弱，却养精蓄銳，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軍的絕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軍的絕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軍劣于我軍，而我軍反优于敌軍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圍剿”时，紅軍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紅軍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圍剿”軍超过紅軍十倍以上。孙子說的“避其銳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發現敌人的过失。須知任何高明的敌軍指揮員，在相当長时間中，要不發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錯誤，正如我們自己有时也弄錯，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們可以人工地造成敌軍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謂“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謂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終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該地区还無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發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說，須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爭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內綫作战軍队所应該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見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終点究在何处，須以整个形势作出發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轉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則据此决定退却終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須計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們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終点应該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圍剿”，陝甘第三次反“圍剿”时。有时須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时。有时則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时。这些都是將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圍剿”，我

軍全然不講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見于局部的和見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退却終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絕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們拒絕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軍大規模"圍剿"。敌我强弱悬殊，我們在保存軍力待机破敌的原則下，才主張向根据地退却，主張誘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發現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随直使紅軍連在根据地也無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終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該承認的，至少在理論上是应該承認的，虽然我們过去很少这种經驗。

白区退却終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側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第一种終点，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时，如果紅軍沒有內部不統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綫和AB团㊀兩个困难問題存在，是可以設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間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因为当时从贛撫兩河間㊁前进的敌人軍力，比起紅軍来优势并不很大（十万对四万）。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但陣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第二种終点，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規模沒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閩贛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們的攻击时，也可以設想紅軍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繞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第三种終点，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时，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們也許被迫着退到会昌、寻鄔、安远地区（那里是白色区域），引敌更向南进，然后紅軍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內部打去，这时北面

㊀ 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潛伏在紅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組織。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塞維克）的簡写。

㊁ 指江西省的中部贛江和东部撫水的中間地区。

根据地内部的敌軍当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这些說明都是假定，沒有經驗，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則看待。对于我們，当敌举行大規模"圍剿"时，一般的原則是誘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們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主張"御敌于国門之外"的人們，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謂"打爛罐罐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則謂我退一步，敌之堡壘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無法恢复。如果說誘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壘主义的第五次"圍剿"是無用的。对付第五次"圍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見是容易的，我們的历史已經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問題，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將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則。如果我們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賺錢生意。市場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錢，就不能取得貨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貨物，也不能取得金錢。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設。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間，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覚，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这是蝕本生意。我們在敌人第五次"圍剿"时期的蝕本正因为这一点。不願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結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亞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結果，虽然阿国失敗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問題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爛些罐罐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長期地打爛罐罐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長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塞維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見拒絕对德和約时，新生的苏維埃就有夭折的危險㊀。

㊀ 参看列宁"关于立刻單独媾和并签訂割地和約問題的提綱"、"奇談与怪論"、"严重的教訓与严重的責任"、"关于战爭与和平問題的报告"等著作，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要讀本"第七章第七节。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傾意見，来源于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們看問題仅从一局部出發，沒有能力通观全局，不願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結，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結，捉住一局部一时間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間，是应該捉住不放的，不然我們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終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絕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視。我們应該学习的是布尔塞維克的聪明。我們的眼力不够，应該借助于望远鏡和显微鏡。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远鏡和显微鏡。

当然，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擇，退却終点的选擇，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說服，都是困难問題，都必須給予解决。

退却开始时机的問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們在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說如果再迟，那至少我們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損失。但是一般地說来，过迟的損失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終点以后，整頓队势，以逸待劳地轉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圍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經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慘敗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們結束第二次反"圍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蔣介石就开始了他們的第三次"圍剿")，紅軍倉卒地繞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擇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說过的选擇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沒有經驗时，在軍事領导的权威还沒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說服干部和人民的問題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問題。由于干部沒有經驗，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

"圍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圍剿"的整期，在这个問題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圍剿"时，由于立三路綫的影响，干部的意見，在沒有被說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圍剿"时，由于軍事冒險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見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圍剿"时，干部的意見开头是繼續軍事冒險主义反对誘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軍事保守主义。張国燾路綫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㊀地区不能建立我們的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經驗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敗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虛心接受别人的經驗也屬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經驗，否則固执己見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狹隘經驗論"。我們的战爭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沒有經驗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圍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組織和人民群众無不反对紅軍的退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經驗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圍剿"时，就完全沒有这个問題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損失，人民的吃苦，是暫时的，大家都有了紅軍能够打破"圍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說服干部。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轉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鍵，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第四节　战略反攻

战胜絕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經說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沒有使敌人失敗。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敗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敗的現

㊀ 这里所說的藏人、回人，是指西康一帶的藏族和甘肅青海新疆等省的回族。

实性，还沒有实現兩軍的胜負。实現这个胜負，依靠兩軍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兩軍之間誰胜誰敗的問題。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長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躍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謂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帶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繼續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屬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質。

可以是屬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質的，例如，此时敌軍的更加疲劳和减員，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員的繼續。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現。例如，敌軍打了一个或几个敗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軍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軍打敗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化。敌軍調动忙乱，举措失当，兩軍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敗仗不是屬于敌軍，而是屬于我軍，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說，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發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無論何方失敗，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敗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圖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脫出这种新出現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創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圖發展自己的胜利，給敌人更大的損害，务求增加或發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讓对方完成其脫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圖。

所以，不論在何方說来，决战阶段的斗爭，是全战爭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揮上說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問題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問題、集中兵力問題、运动战問題、速决战問題、歼灭战問題等。

这些問題的原則，不論对于反攻說来，或对于进攻說来，在其基本性質上，是沒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說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則，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則，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許多問題統統說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門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門中只說些另外的問題，以避重复，但我們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異点。

第五节　反攻开始問題

反攻开始問題，即所謂"初战"或"序战"問題。

許多資产阶級軍事家都主張愼重初战，不論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們过去，也曾經严重地提出了这个問題。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圍剿"的作战給了我們以丰富的經驗，研究一下这些經驗不是沒有益处的。

第一次"圍剿"时，敌人以約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綫，分八个縱队向紅軍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紅軍約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軍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蔣之嫡系，总的形勢不十分严重。(二)敌軍罗霖师防衛吉安，隔在贛江之西。(三)敌軍公秉藩、張輝瓚、譚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岡、源头一帶。張师主力在龙岡，譚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兩地因人民受 AB 团欺騙一时不信任紅軍，并和紅軍对立，不宜选作战場。(四)敌軍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軍毛炳文、許克祥兩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間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帶。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許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張輝瓚、譚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問題。(六)張、譚兩师是"圍剿"主力軍，"圍剿"軍总司令江西主席魯滌平的嫡系部队，張又是前綫总指揮。消灭

此兩师，"圍剿"就基本上打破了。兩师各約一万四千人，張师又分置兩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絕对优势。(七)張、譚兩师主力所在的龙岡、源头一帶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蔭蔽接近。(八)龙岡有优良陣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則陣地亦好。(九)我在龙岡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岡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迴于敌后。(一〇)我軍实行中間突破，將敌人的陣綫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諸縱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兩群。基于以上理由，我們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張輝瓚的主力兩个旅和一个师部，連师長在內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馬。一战胜利，吓得譚师向东韶跑，許师向头陂跑。我軍又追击譚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內打兩仗（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諸敌畏打紛紛撤退，第一次"圍剿"就結束了。

第二次"圍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軍二十万人，何应欽为总司令，駐南昌。(二)和第一次"圍剿"时一样，全部是蔣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孙連仲的第二十六路軍、朱紹良的第八路軍为最强或較强，其余均較弱。(三) AB团 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紅軍。(四)王金鈺的第五路軍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夢齡兩师，大体相同。(五)我軍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閩贛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資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圍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則限于贛江，战局結束后無發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轉，又劳师費时。(六)我軍人数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鋭。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鈺、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繳槍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圍剿"。当打王金鈺时，处于蔡廷鍇、郭华宗兩敌之間，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謂我們"鑽牛角"，但終究鑽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軍各部之不統一。郭师敗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圍剿"时的情况是：(一)蔣介石亲身出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欽，与蔣同駐南昌；右路陈銘樞，駐吉安；左路朱紹良，駐南丰。(二)"进剿"軍三十万人。主力軍是蔣嫡系之陈誠、罗卓英、赵观濤、衛立煌、蔣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約十万人。次是蔣光鼐、蔡廷鍇、韓德勤三师，四万人。次是孙連仲軍，二万人。余均非蔣嫡系，較弱。(三)"进剿"战略是"長驅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圍剿"之"步步为营"，企圖压迫紅軍于贛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圍剿"結束至第三次"圍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紅軍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繞道千里回到贛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們决定的第一个方針，是由兴国經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絡綫上横扫过去，讓敌主力深入贛南根据地置于無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針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虛弱。但我軍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發覚，陈誠、罗卓英兩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計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場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許我軍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計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蓮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蔣鼎文师和蔣、蔡、韓軍間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帶，轉到蓮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軍(上官指揮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夢齡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夢齡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繳槍逾万。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軍主力，皆轉旗向东，集中視綫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圍姿势接近了我軍。我軍乃于蔣、蔡、韓軍和陈、罗軍之間一个二十华里間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內集中。及至敌發覚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月个，敌則飢疲沮丧，無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蔣光鼐、蔡廷鍇、蔣鼎文、韓德勤，消灭蔣鼎文一个旅、韓德勤一个师。对蔣光鼐、蔡廷鍇兩师，則打成对峙，讓其逃去了。

第四次"圍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兩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驥兩个师。敌从左路分出兩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兩役繳槍万余，这个"圍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圍剿"，敌以堡壘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領了黎川。我却企圖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陣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資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陣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輾轉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壘之間，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終第五次反"圍剿"战爭一年之久，絕無自主活躍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圍剿"时期我軍作战的經驗，証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紅軍，欲打破强大的"进剿"軍，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敗給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結論：

第一，必須打胜。必須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則宁可退讓，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一次反"圍剿"时先想打譚道源，仅因敌不脫离源头那个居高臨下的陣地，我軍兩度开进，却兩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張輝瓚。第二次反"圍剿"时，我軍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鈺脫离其富田巩固陣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險，拒絕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議，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終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圍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發覚了我們迂迴其側后的計划，但我們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間突破，終于在蓮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圍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驟，終于轉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圍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圖出發，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預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

起的变化，而貿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眞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計划必須是全战役計划的有机的序幕。沒有好的全战役計划，絕不能有眞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說，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則这个仗虽胜也只算敗了（例如第五次"圍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須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軍全局將起如何变化，假若敗了，又將起如何变化。虽結果不見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須依据双方全局，仔細地切实地想明白。沒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眞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顧反攻，不顧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敗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責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該計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計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測，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計算是可能的，估計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爭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該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發展自己战略战役計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險直冲的錯誤。然而貫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長时期的方針，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錯誤，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須知敌人的統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們只有使自己操練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圍剿"时期"左"傾机会主义路綫和張国燾路綫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錯誤，主要地就在于沒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須計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須計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須計算到退却阶段。沒有这种計算，束縛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敗之道。

必須打胜；必須照顧全战役計划；必須照顧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記的三个原則。

第六节　集中兵力問題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頗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無論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慘苦的环境，軍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組織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敗。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質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軍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發揮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轉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計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軍力，待机破敌，是誘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倉卒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爭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則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棄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軍說来，反攻是我軍强迫它放棄主动权，同时即給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現在是企圖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給予影响于全战役。

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終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則属于积极阶段，即"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沒有脫离防御性質，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

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間的过渡的东西，帶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質，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內外綫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內綫作战的軍队，特别是处于被"圍剿"环境的紅軍，蒙受着許多的不利。但我們可以而且完全应該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將敌軍对我軍的一个大"圍剿"，改为我軍对敌軍的許多各别的小圍剿。將敌軍对我軍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軍对敌軍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將敌軍对我軍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軍对敌軍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將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軍，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將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謂內綫作战中的外綫作战，"圍剿"中的圍剿，封鎖中的封鎖，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爭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中国紅軍的战史中，这个問題常常成为重要的爭論問題。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們的攻击本身并沒有奏效。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謂"全綫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沒有根本改变的时候；無論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箝制和突击的兩方面，事实上絕少所謂"全綫出击"。全綫出击的口号，是伴随軍事冒險主义而来的軍事平均主义。

軍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謂"兩个拳头打人"的說法，把紅軍主力分割为二，企圖在兩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結果是一个拳头置于無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沒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見，在有强大敌軍存在的条件下，無論自己有多少軍队，在一个时間內，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兩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兩个或兩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間

內，只应有一个。中国紅軍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現于內战的战場，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績，依賴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無論那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証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說法，是对整个战爭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們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們决不应如此。無論在反攻或进攻，我們总是集結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譚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八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軍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四年三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誠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誠十二个团），然而我們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簡直还可以說它是敗仗。因为沒有繳获或繳获不超过消耗，在我們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們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們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們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則之一。

軍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圍剿”时，發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綫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結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箝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損失。然而这是暫时的局部的損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箝制方向的損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都使我們遭受了土地的損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圍剿”时江西紅軍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結果我們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由于看不見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發生惧怕紅軍远离根据地的錯誤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紅軍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圍剿”战役胜利后紅軍轉向福建进攻时，都曾發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張分兵把守，結果都証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根据地使他們艰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紅軍是他們的主要的

危險物。敌軍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紅軍所在地，拋开主力紅軍不顧而專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紅軍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紅軍。縮小根据地的計划是敌人整个計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紅軍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軍統帅部就不得不把他們的注意力和他們的軍力更大地向着紅軍。所以，敌人縮小根据地的計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堡壘主义的五次‘圍剿’时期我們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說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壘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紅軍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軍在內綫放棄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轉向敌人的內綫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則，正是战胜堡壘主义的工具。

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棄人民的游击战爭在內。立三路綫主張廢棄小的游击战爭，“一枝槍也集中到紅軍中去”，早已証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爭，从整个革命战爭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紅軍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紅軍而無人民的游击战爭，就像一个独臂將軍。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說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說来，就是有武裝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視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置紅軍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証对于战場作战的絕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則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場作战，应以絕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圍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張輝瓚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場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二次反“圍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紅軍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說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絕对劣势兵力出現于战場。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紅軍(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

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給我們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箝制其正面及一翼，紅軍集中全力突然襲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襲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則。絕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襲击白軍大队伍，仅仅是襲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則。

集中大軍于一个战場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給养、駐处等的說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紅軍和白軍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紅軍較之白軍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我們是以少胜多的——我們向整个中国統治者这样說。我們又是以多胜少的——我們向战場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說。这件事情已經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們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們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們的損失，因为何时何地我們这样做，他們不曉得。这一点我們是保守秘密的。紅軍的作战一般是奇襲。

第七节　运动战

运动战，还是陣地战？我們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沒有广大兵力，沒有彈藥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紅軍的条件下，陣地战对于我們是基本上無用的。陣地战，对于我們，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由于敌人强大和紅軍技术貧弱所發生的紅軍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沒有固定的作战綫。

紅軍的作战綫，服从于紅軍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綫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內的小方向則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轉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連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革命的內战时期，作战綫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軍队和我們的軍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們

之甚。一切战爭也不能有絕对固定的作战綫，胜負进退的变化不許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綫往往見之于一般的战爭。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紅軍这样的軍队，則是例外。

作战綫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領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縮时伸是經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發生。这种領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爭的流动性。

战爭和領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設工作也發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設計划是不能設想的。計划改变的頻繁，是我們家常便飯的事情。

承認这种特点，对于我們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發，規定我們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無退的战爭，不要震惊于領土和軍事后方的暫时的流动，不要企圖建立長时期的具体計划。把我們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現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爭取將来的比較地不流动，才能爭取最后的稳定。

統治着第五次反"圍剿"时期的所謂"正規战爭"的战略方針，否認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謂"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們要裝作一个大国家的統治者来办事，結果是得到了一个異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長征。

我們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們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們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們軍队的数量和技术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們的領土还很小，我們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們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規定我們的方針，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認紅軍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沒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們的特点，正是我們的長处，正是我們战胜敌人的工具。我們应該准备抛棄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棄。游击性在將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須抛棄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貴的和必須坚持的东西。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这就是今天我們的运动战的通俗的

解釋。天下也沒有只承認打不承認走的軍事家，不过不如我們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們，走路的时間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間，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們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針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們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鄰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說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陣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繼續打。以上这些时候，我們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許可的，是必須的。因为我們承認必須的走，是在首先承認必須的打的条件之下。紅軍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絕必要的和可能的陣地战。战略防御时，我們箝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無援之敌，都是应該承認用陣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陣地战制胜敌人的經驗，我們过去已經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壘、寨子，被我們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陣地被我們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們这一方面的弱点。我們完全应該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許可下的陣地攻击和陣地防御。我們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陣地战，或者把陣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許可的。

紅軍的游击性，沒有固定作战綫，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設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爭中一点也沒有变化嗎？有变化的。从井岡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圍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紅軍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圍剿"到第三次反"圍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縮小了許多，方面軍已經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經存在。从第三次反"圍剿"后至第五次反"圍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縮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軍事委員会已經建立。長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錯誤地否認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沒有战胜第五次"圍剿"和大流动，紅軍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縮小了，但又已經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

固了并發展了陝甘宁边区根据地。紅軍主力三个方面軍已經統一指揮，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依战略的性質說，也可以說井岡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圍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圍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長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圍剿"时人們錯誤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針，我們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圍剿"时人們的錯誤方針，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針。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圍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圍剿"时的錯誤的东西。

游击主义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規性，就是不集中、不統一、紀律不严、工作方法簡單化等。这些东西是紅軍幼年时代本身帶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紅軍的高級阶段，必須逐漸地自覚地去掉它們，使紅軍更集中些，更統一些，更有紀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說使之更帶正規性。在作战指揮上，他应逐漸地自覚地減少那些在高級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絕前进，固执地停頓于旧阶段，是不許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規模作战的。

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針，是現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無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設計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紅軍建設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規化。在这一方面拒絕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貿然地脫离現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沒有現实意义的所謂"新阶段"，同样是不許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我們現在是处在紅軍技术和組織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們应該准备轉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將来的战爭的。在將来，紅軍的技术和組織条件改变了，紅軍建設进到了新阶段，紅軍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綫的比較固定就出現了；陣地战增加了；战爭的流动性、領土和建設的流动性，大大減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現在限制着我們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陣地，就不能限制我們了。

我們現在一方面反对"左"傾机会主义統治时期的錯誤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紅軍幼年时代的許多在現时不需要的非正規性。但是我們要坚决地恢复紅軍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許多可宝貴的建軍原則和战略战术原則。我們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結起来，成为有系統的更發展的更丰富的軍事路綫，以便爭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將来轉变到新阶段去。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問題是很多的，例如偵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揮、蔭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襲击、陣地攻击、陣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圍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間、超越敌人作战、連續作战、無后方作战、养精蓄銳之必要等等。这些問題在紅軍战史中都表現了許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給以总結，我在这里就不說了。

第八节　速决战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兩方面，这是国內战爭的兩个同时并重的原則，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爭。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勢力是逐漸地生長的，这就規定了战爭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爭，对于别的国家也許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們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題、承題和起講㊀，許多热鬧文章

㊀ 八股文是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中国封建皇朝考試制度所規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組成。"破題"共二句，說破題目的要义。"承題"用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題的意义而說明之。"起講"概說全体，为議論的开始。"入手"为起講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議論，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兩股兩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亦称为八比。毛澤东同志这里是說写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开过程，用以比喻革命發展的各种阶段。但在通常的場合，毛澤东同志則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和諷刺教条主义。

都还在后面。往后的發展，在一切內外条件的影响下，無疑地將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內的环境已經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說我們已經脫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發展的孤軍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該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計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勢力，是許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內革命勢力沒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內外敌人的主要陣地以前，国际革命勢力沒有打破和箝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勢力以前，我們的革命战爭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發，規定我們長期作战的战略方針，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針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則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爭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爭問題上，古今中外也都無不要求速决，曠日持久总是認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爭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綫时期譏笑我們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說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譏笑我們要待头髮白了才能看見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現急性病的情緒，早已証明是不对了。但是他們的批評意見如果不是放在战略問題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問題上，則是非常之对的。原因在于：第一，紅軍的武器尤其是彈藥沒有来源；第二，白軍有很多支部队，紅軍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圍剿"要准备迅速的連續的作战；第三，白軍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較地密集，打它們中間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們，几小时，一天或兩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經常的。只有在"圍城打援"的方針下，目的不在打圍敌，而在打援敌，对圍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箝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無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給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針。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紅軍的速决战。

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須加上許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圍迂

遇战术，良好陣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駐止而陣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圍剿"屬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則，而不是持久原則。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財力、軍力等項条件都不許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則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軍事政治領导机关，估計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計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給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圍剿"，从初战到結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圍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圍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沒有打破"圍剿"而被迫突圍时，还表現了不应有的倉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兩三个月，用以休整軍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圍后的領导稍为聰明一点，情况便將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們所說的力爭縮短全战役时間的原則。除了战役战斗計划力爭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內綫（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圍剿"以外，当"圍剿"已經証明無法在內綫解决时，应該使用紅軍主力突破敌之圍攻綫，轉入我之外綫即敌之內綫去解决这个問題。堡壘主义發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將要成为經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圍剿"进行兩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現之时，紅軍主力無疑地应該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贛地区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苏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战略防御轉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無堡壘地帶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調动江西敌人至湖

南而消灭之。此計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絕，剩下長征一条路了。

第九节　歼灭战

"拚消耗"的主張，对于中国紅軍来說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給于敌方的紅軍，基本的方針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圍剿"和發展革命根据地。給敌以杀伤，是作为給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則便沒有意义。因給敌以杀伤而給我以消耗，又因給敌以歼灭而給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軍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軍的力量。击潰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負的东西。歼灭战，則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潰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圍剿"，我們的方針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圍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圍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針，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們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圍迂迴战术，同一意义。沒有后者，就沒有前者。人民贊助、良好陣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潰有意义，乃至讓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軍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說的，否則便沒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場合。

我們建立軍事工业，須使之不助長依賴性。我們的基本方針是依賴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軍事工业。倫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們是有权利的，并且經过敌人的运輸队送来。这是眞理，并不是笑話。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五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一卷排印）

論持久战*

（一九三八年五月）

毛泽东

問題的提起

（一）偉大抗日战爭的一周年紀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結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統一战綫，同敌人作英勇的战爭，快一年了。这个战爭，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將是偉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爭。身受战爭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無日不在渴望战爭的胜利。然而战爭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說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說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爭取最后胜利？这些問題，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沒有解决的。于是失敗主义的亡国論者跑出来向人們說：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們也跑出来向人們說：中国很快就能战胜，無需乎費大气力。这些議論究竟对不对呢？我們一向都說：这些議論是不对的。可是我們說的，还沒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們的宣傳解釋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發展还沒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質，还沒有將其面貌鮮明地摆在人們之前，使人們無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無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針和做法。現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經驗，尽够击破毫無根据的亡国

---

* 这是毛澤东同志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爭研究会上的講演。

論，也尽够說服急性朋友們的速胜論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結性的解釋。尤其是对持久战，有亡国論和速胜論的反对意見，也有空洞無物的了解。“蘆溝桥事变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們中流行着。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抗日战爭和統一战綫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許多的因素：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資产阶級；全国軍队，从主力軍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愛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內反战的人民到前綫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們的抗战中都尽了他們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們表示敬意。我們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結一切力量，战胜万惡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員在抗日战爭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因此，我的講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題目有关的問題，我都准备說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說到，因为一切的东西，不是在一个講演中完全說得了的。

（二）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經驗都証明下述兩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論，一种是中国速胜論。前者产生妥协傾向，后者产生輕敌傾向。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話，非科学的。

（三）抗战以前，存在着許多亡国論的議論。例如說：“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敗。”“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亞。”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論沒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协的空气时起时伏，主張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㊀。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

㊀ 这种亡国論是国民党的意見。他們是不願意抗日的，后来抗日是被迫的。蘆溝桥事变以后，蔣介石一派勉强地参加抗日了，汪精衛一派就代表了亡国論，并准备投降日本，后来果然投降了。但是亡国論思想不但是在国民党內存在着，在某些中層社会中甚至在一部分落后的劳动人民中也曾經發生影响。这是因为国民党

說："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單独一个人作宣傳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談話。对象都不是無知無識的愚民，他們多少也懂得一点，他們对我的談話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們总說：'中国打不胜，会亡。'討厭极了。好在他們还不去宣傳，不然眞糟。农民对他們的信仰当然要大些啊！"这类中国必亡論者，是妥协傾向的社会基础。这类人中国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陣綫中随时可能發生的妥协問題，恐怕終战爭之局也不会消灭的。当此徐州失守武汉紧張的时候，給这种亡国論痛駁一駁，我想不是無益的。

（四）抗战十个月以来，各种表現急性病的意見也發生了。例如在抗战初起时，許多人有一种毫無根据的乐观傾向，他們把日本估計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輕視抗日战爭中游击战爭的战略地位，他們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輔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輔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們不贊成八路軍这样的战略方針："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認为这是"机械的"观点㈡。上海战爭时，有些人說："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爭就可解决。"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㈢。台兒庄胜利㈣之后，有些人主張徐州战役应是"准决战"，說过去的持久战方針

政府腐敗無能，在抗日战爭中节节失敗，而日軍則長驅直进，在第一年中就打到武汉附近，因而在一部分落后的人民中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緒。

㈡ 以上这些意見，都是共产党內的。在抗日战爭的头半年內，党內存在着一种輕敌的傾向，認为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据并不是因为他們感覺自己的力量很大，他們知道共产党領导的軍队和民众的有組織的力量在当时还是很小的；而是因为国民党抗日了，他們感覺国民党有很大的力量，可以配合共产党有效地打击日本。他們只看見国民党暫时抗日的一面，忘記了国民党反动和腐敗的一面，因而造成了錯誤的估計。

㈢ 这是蔣介石等人的意見。蔣介石国民党既已被迫抗战，他們就一心希望外国的迅速援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㈣ 台兒庄是山东省南部的一个市鎮。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国軍队和日本侵略軍在台兒庄一帶进行过一次会战。中国軍队以四十万人对日軍七八万人，因而得到了胜利。

应該改变。說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掙扎"，"我們胜了，日閥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場，只有靜候末日审判"㊀。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腦；台兒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腦。于是敌人是否进攻武汉，成为疑問了。許多人以为："不一定"；許多人以为："断不会"。这样的疑問可以牽涉到一切重大的問題。例如說：抗日力量是否够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現在的力量已使敌人不能再进攻，还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說：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为統一战綫的現时狀态已够打退敌人，还要什么巩固和扩大呢？例如說：国际外交和国际宣傳工作是否还应該加緊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說：改革軍队制度，改革政治制度，發展民众运动，厉行国防教育，鎮压汉奸托派，發展軍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是否应該認眞去做呢？例如說：保衛武汉、保衛广州、保衛西北和猛烈發展敌后游击战爭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战爭形势稍为好轉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兩党之間加緊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轉到对內。这种情况，差不多每一个較大的胜仗之后，或敌人进攻暫时停頓之时，都要發生。所有上述一切，我們叫它做政治上軍事上的近視眼。这些話，講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毫無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談。扫除这些空談，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爭，应該是有好处的。

（五）于是問題是：中国会亡嗎？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嗎？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爭是持久战。

（六）这些問題的主要論点，还在兩年之前我們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蘆溝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記者斯諾先生的談話中，就已經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战爭的形势，并提出了爭取胜利的各种方針。为备忘計，不妨抄录

㊀ 这是当时国民党政学系报紙"大公报"在一篇社論中提出的意見。他們从一种僥倖心理出發，希望用几个台兒庄一类的胜仗就能擋住日本，免得在持久战中动員人民力量，危及自己阶級的安全。整个国民党当时都有这种僥倖心理。

几段如下：

問：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統一战綫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統一战綫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場来說，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問：你想，这个战爭要延長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統一战綫的实力和中日兩国其他許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說，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間所給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內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統一战綫有力地發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縱的方面都有效地組織起来，如果認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們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給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則这次战爭將迅速結束，中国將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現，战爭就要延長。但結果还是一样，日本必敗，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經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問：从政治上和軍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爭的前途会要如何發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經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領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們确切地知道，就是揚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經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內。并且日本还想占領菲律宾、暹罗、越南、馬来半島和荷屬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無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敗論者，因为他們害怕損失財产。有許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鎖，中国就不能繼續作战。这是廢話。为反駁他們，我們不妨举出紅軍的战爭史。在抗日战爭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內战时紅軍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龐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領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們离战敗还很远呢。我們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爭中須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經济的不統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

爭反为有利。例如將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損害，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損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鎖，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無法封鎖的。所以問題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結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陣綫。这是我們早就提出了的。

問：假如战爭拖得很長，日本沒有完全战敗，共产党能否同意講和，并承認日本統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問：照你的意見，这次解放战爭，主要的战略方針是什么？

答：我們的战略方針，应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变动不定的战綫上作战。中国軍队要胜利，必須在广闊的战場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規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御工事的陣地战。这并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陣地战。但是轉換全局的战略方針，必然要是运动战。陣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屬于輔助性質的第二种的方針。在地理上，战場这样广大，我們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軍遇到我軍的猛烈活动，必得謹愼。他們的战爭机構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們集中兵力在一个狹小的陣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將使我軍失掉地理上和經济組織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亞的錯誤。战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漸地破坏敌人軍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調动有訓練的軍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組織很多的游击队。須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軍，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員抗战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当，能使日本軍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須記住这个战爭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說，日軍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圍；日軍要被迫运来他們所需的軍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們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綫，时时謹防襲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駐扎滿洲和日本內地。

在战爭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虜許多的日本兵，夺取許多的武器

彈藥来武装自己；同时，爭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軍队的裝备逐漸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爭的后期从事陣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領地进行陣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济行將崩溃；在無数战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將頹靡。中国方面，則抗战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傾注到前綫去，为自由而战爭。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們能够对日本占領地的堡壘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国。（斯諾："西北印象記"）

抗战十个月的經驗，証明上述論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將繼續証明它。

（七）还在蘆溝桥事变發生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在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清楚地指出：

蘆溝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領，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經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員。他們的所謂"不求扩大"的宣傳，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彈。

七月七日蘆溝桥的抗战，已經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經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战的胜利。

爭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鍵，在使已經發动的抗战發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却，內部的分化、叛变，暫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該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动的抗战，必將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繼續地前进和發展。

抗战十个月的經驗，同样証明了上述論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將繼續証明它。

（八）战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机械論的傾向，是一切錯誤观点的認識論上的根源。他們看問題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無根据地純主观地說一頓；或者是只根据問題的一側面、一时候的表現，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們的錯誤观点可分为兩类：一类是根本的錯誤，帶一貫性，这是难于糾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錯誤，帶暫时性，这是易于糾正的。但既同为錯誤，就都有糾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机械論的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爭；才能使战爭問題得出正确的結論。

問題的根據

（九）抗日战爭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中日战爭不是任何别的战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爭。全部問題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說来，战爭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許多特点。

（一〇）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軍力、經济力和政治組織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爭的基本条件，战爭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軍力、經济力和政治組織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經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爭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爭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內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規模的冒險战爭，而且使得它臨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說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爭不能达到日本統治阶級所期求的兴旺，而將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謂日本战爭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

了它的战爭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內的阶級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爭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爭必然失敗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爭虽是在其强的軍力、經济力和政治組織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軍力、經济力和政治組織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战爭。日本統治者想从战爭中解决这个困难問題，但同样，將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說，它为解决这个困难問題而發动战爭，結果將因战爭而增加困难，战爭將連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將逐漸地增長，終究不但將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將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規律，是从日本战爭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說，日本的長处是其战爭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則在其战爭本質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一一）中国方面：第一，我們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鴉片战爭，太平天国，戊戌維新㊀，辛亥革命，直至北伐战爭，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們依然是一个弱国，我們在軍力、經济力和政治組織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爭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經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內外反对力量虽給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鍛煉了

㊀ 指發生于戊戌年（一八九八年）的改良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代表一部分自由資产阶級和开明地主的利益，以康有为、梁啓超、譚嗣同等人为首，得到了光緒皇帝的贊助，但缺乏群众的基础。当时拥有武力的袁世凱向頑固派的首領慈禧太后出卖了維新派的机密，于是慈禧太后重新攫取政权，禁閉光緒皇帝，并杀了譚嗣同等六人。这个运动就这样悲慘地失敗了。

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軍事、經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領导下的軍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爭，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沒落狀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爭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爭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爭是正义的，就能喚起全国的团結，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爭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長期的战爭，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爭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說，中国的短处是战爭力量之弱，而其長处則在其战爭本質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一二)这样看来，日本的軍力、經济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强的，但其战爭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軍力、經济力和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爭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爭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規定了和規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战略战术，規定了和規定着战爭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屬于中国而不屬于日本。战爭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賽。这些特点在战爭过程中將各依其本性發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發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虛造騙人的；是战爭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殘缺不全的片段；是貫徹于双方一切大小問題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無的。观察中日战爭如果忘記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錯；即使某些意見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錯，但战爭的經过必將証明它們是錯的。我們現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說明我們所要說的一切問題。

(一三)亡国論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說"抗战必亡"，現在又說"再战必亡"。如果我們仅仅說，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們的。他們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証据，証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們說，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們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証明小而强的資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須提出其他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論者的口封住，使他們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傳工作的人們得到充足的論据去說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們，巩固其抗战的信心。

(一四)这应該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一五)我們的战爭不是任何别的战爭，乃是中日兩国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进行的战爭。在我們的敌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資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战爭發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帶最后掙扎性的冒險战爭。所以，战爭的結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統治集团，这是無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則，当日本举行战爭的时候，正是世界各国或者已經遭遇战爭或者快要遭遇战爭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經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一六)中国方面呢？它已經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是在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所

謂抗日战爭是进步的，不是說普通一般的进步，不是說阿比西尼亞抗意战爭的那种进步，也不是說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的那种进步，而是說今天中国的进步。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經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經有了資本主义，有了資产阶級和無产阶級，有了已經覺悟或正在覺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軍队即共产党領导的中国紅軍，有了数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經驗。这些經驗，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結抗日的基础。如果說，在俄国，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經驗就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那末，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沒有十七年以来的經驗，也將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內的条件。

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爭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論中国的战爭也罢，印度的战爭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因此胜利了，但那个援助的規模还沒有今天广大，性質也沒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規模和空前的深刻性發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現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沒有的。所有这些，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沒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長战爭的时間，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規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橫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爭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規定了日

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敗，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八）阿比西尼亞为什么灭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国，而且是小国。第二，它不如中国进步，它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沒有資本主义，沒有資产阶級政党，更沒有共产党，沒有中国这样的軍队，更沒有如同八路軍这样的軍队。第三，它不能等候国际的援助，它的战爭是孤立的。第四，这是主要的，抗意战爭領导方面有錯誤。阿比西尼亞因此灭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亞还有相当广大的游击战爭存在，如能坚持下去，是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据以恢复其祖国的。

（一九）如果亡国論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敗史来証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話，那我們的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一句話。中国本身、日本內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日本比过去更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变，力量依然頗弱，这一点是严重的情形。日本暫时还能控制其国內的人民，也还能利用国际間的矛盾作为其侵华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在長期的战爭过程中，必然要發生相反的变化。这一点現在还不是事实，但是將来必然要成为事实的。这一点，亡国論者就拋棄不顧了。中国呢？不但現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軍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都必然会向前發展。虽然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屢次遭受挫折，使中国不能积蓄更大的力量用于今日的抗日战爭，——这是非常可痛惜的历史的教訓，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自己摧殘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础上，加上广大的努力，必能逐漸前进，加强抗战的力量。偉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就是这种努力的总方向。国际援助一方面，眼前虽然还看不見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国际局面根本已和过去兩样，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醞釀中。中国近代無数解放运动的失敗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在今天，虽然存在着許多困难条件，規定了抗日战爭是艰难的战爭，例如敌人之强，我們之弱，敌人的困难还剛在开

始，我們的进步还很不够，如此等等，然而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只須加上主观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难而爭取胜利。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沒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爭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敗的理由。

妥协还是抗战？腐敗还是進步？

（二〇）亡国論之沒有根据，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許多人，并非亡国論者，他們是爱国志士，却对时局怀抱甚深的憂虑。他們的問題有兩个：一是惧怕对日妥协，一是怀疑政治不能进步。这兩个可憂虑的問題在广大的人們中間議論着，找不到解决的基点。我們現在就来研究这兩个問題。

（二一）前头說过，妥协的問題是有其社会根源的，这个社会根源存在，妥协問題就不会不發生。但妥协是不会成功的。要証明这一点，仍不外向日本、中国、国际三方面找根据。第一是日本方面。还在抗战初起时，我們就估計有一种醞釀妥协空气的时机会要到来，那就是在敌人占領华北和江浙之后，可能出以劝降手段。后来果然来了这一手；但是危机随即过去，原因之一是敌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蛮政策，实行公开的掠夺。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質的和精神的兩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層民众，而且是对上層成份，——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無原則之分。大体上，敌人是將东三省的老办法移植于內地。在物質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飢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毀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殘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識。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順民，做牛馬，不許有一絲一毫的中国气。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內地。他的胃口很旺，不願停止战爭。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內閣宣言的方針㊀，至今坚决执行，也不能不执行，这就激怒了一切阶層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爭的退

步性野蛮性而来的，“在劫难逃”，于是形成了絕对的敌对。估計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將出現，某些亡国論者又將蠕蠕而动，而且难免勾結某些国际成份（英、美、法内部都有这种人，特别是英国的上層分子），狼狽为奸。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爭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規定了这个問題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国方面。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共产党，这是領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又其一，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这三者互相团結，誰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奸方面，人人得而誅之。一切不願当汉奸的人，就不能不团結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妥协就实际上难于成功。

（二三）第三是国际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資本主义国家的上層分子中的某些成份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国妥协而利于中国抗战。这一因素影响到中国的希望。今天全国人民有一种希望，認为国际力量必將逐漸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和中国是历来休戚相关的。苏联和一切資本主义国家的上層成份之唯利是圖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战爭为其职志的。中国战爭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兩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兩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二四）由此可作結論：妥协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能够克服。因为敌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其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有妥协的社会根源，但是反对妥协的占大多数。国际力量也有一部分贊助妥协，但是主要的力量贊助抗战。这三种因素結合

㊀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閣發表声明，宣布以武力灭亡中国的方針；同时，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威逼和誘降，宣称国民党政府如果“依然策动抗战”，則日本政府將在中国扶植新的傀儡政权，不再以它为談判“对手”。

起来，就能克服妥协危机，坚持抗战到底。

（二五）現在来答复第二个問題：国內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賴于坚持抗战。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現象是严重地存在着，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历史积累，使得广大爱国志士發生很大的憂虑和煩悶。但是抗战的經驗已經証明，十个月的中国人民的进步抵得上过去多少年的进步，并無使人悲观的根据。历史积累下来的腐敗現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長的速度，減少了战爭的胜利，招致了战爭的損失，但是中国、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許中国人民不进步。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敗現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緩慢的。进步和进步的緩慢是目前时局的兩个特点，后一个特点和战爭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称，这就是使得爱国志士們大为發愁的地方。然而我們是在革命战爭中，革命战爭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凡屬正义的革命的战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爭將改造中日兩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統一战綫，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兩国的人和物都將在这次战爭中和战爭后获得改造。我們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說日本也能获得改造，是說日本統治者的侵略战爭將走到失敗，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时。这和中国的抗战密切地联系着，这一个前途是应該看到的。

亡國論是不对的，速勝論也是不对的

（二六）我們已把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几个敌我之間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作了比較研究，批駁了亡国論，答复了为什么不易妥协和为什么政治可能进步的問題。亡国論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問題的論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們

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們的片面性；他們將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們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說来，他們是沒有根据的，是錯誤的。那些并非亡国論者，也不是一貫的悲观主义者，仅为一时候和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內腐敗現象所迷惑，而一时地發生悲观心理的人們，我們也得向他們指出，他們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傾向。但是他們的改正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們是爱国志士，他們的錯誤是一时的。

（二七）然而速胜論者也是不对的。他們或則根本忘記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單單記起了其他矛盾；或則对于中国的長处，夸大得离开了眞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則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現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現象，一叶障目，不見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們沒有勇气承認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們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眞理的一方面。他們又沒有勇气承認自己長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眞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錯誤来，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們的心是好的，他們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的看法則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为估計不符合眞相，行动就無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敗軍亡国，結果和失敗主义者沒有兩样。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們是否否認亡国危險呢？不否認的。我們承認在中国面前擺着解放和亡国兩个可能的前途，兩者在猛烈地斗爭中。我們的任务在于实現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現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們和亡国論者不同，我們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認亡国和解放兩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爭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論者則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認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認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爭取这些条件而努力。我們对于妥协傾向和腐敗現象也是承認的，但是我們还看到其他傾向和其他現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对于前者將逐步地占优势，二者在猛烈地斗爭着；并指出后者实現的条件，为克服妥协傾向和轉变腐敗現

象而努力。因此，我們并不悲观，而悲观的人們則与此相反。

（二九）我們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誰也贊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們指出，沒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腦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們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計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爭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徑，而排斥毫無根据的速胜論。我們主張为着爭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間就早一日。我們認为只有这样才能縮短战爭的过程，而排斥貪便宜尙空談的速胜論。

为什麼是持久戰？

（三〇）現在我們来把持久战問題研究一下。"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一个問題，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單說敌人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有陷入亡国論的危險。因为單純地以弱敌强，無論在理論上，在实际上，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結果。單是大小或單是进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样。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們說抗日战爭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結論。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險。但敌尙有其他缺点，我尙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則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則將最后失敗，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

（三一）既然敌之优点只有一个，余皆缺点，我之缺点只有一个，余皆优点，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結果，反而造成了現时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呢？很明显的，不能这样形式地看問題。事情是現时敌我强弱

的程度愚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沒有也不能發展到足以減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沒有且不能發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現，而出現的是不平衡。

（三二）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劣势，这种情况，虽因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統一战綫的努力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沒有产生基本的变化。所以，在战爭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則將遭到一定程度的失敗。然而敌我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內一定程度上的胜或敗，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敗，这是什么緣故呢？因为一則敌强我弱之原来狀况就是相对的，不是絕对的；二則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統一战綫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拿原来狀况来說，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減杀，不过此时还沒有減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沒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双方的强弱优劣原来都不是絕对的；加以战爭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統一战綫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內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敗，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况是繼續变化的。战爭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軍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則的錯誤，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將随战爭之延長而發展，必能繼續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繼續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將發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敗我胜的結果。

（三四）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給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进攻，反之，尚足以維持其进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剧本国阶級对立和中国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战爭之退步性和野蛮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碍其进攻的情况。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發展之

中，还沒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許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軍火資本家和战爭原料資本家，尚在唯利是圖地供給日本以大量的战爭物資㊀，他們的政府㊁亦尚不願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这一切，規定了我之抗战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現在軍事、經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減弱。其各种有利因素，虽然都在起积极作用，但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則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国內，克服腐敗現象，增加进步速度；在国外，克服助日势力，增加反日势力，尚非目前的現实。这一切，又規定了战爭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

持久戰的三个階段

（三五）中日战爭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將是屬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設想，这种持久战，將具体地表現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預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爭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現实的行程將是異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誰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爭的"流年"来；然而給战爭趋势描画一个輪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將来的事实，而將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堅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見，描画輪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阶段，現在还未完結。敌之企圖是攻占广州、武汉、蘭州三点，幷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約

㊀ 这里主要的是指美国。

㊁ 指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

一百五十万兵員，时間一年半至兩年，用費將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將不堪設想。至欲完全占領粤汉鉄路和西蘭公路，將經历非常危險的战爭，未必尽能达其企圖。但是我們的作战計划，应把敌人可能占領三点甚至三点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幷可能互相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即令敌如此做，我也有应付之方。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爭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陣地战輔助之。陣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軍事当局的主观錯誤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輔助的。此阶段中，中国已經結成了广大的統一战綫，实現了空前的团結。敌虽已經采用过幷且还將采用卑鄙無耻的劝降手段，企圖不費大力实現其速决計划，整个地征服中国，但是过去的已經失敗，今后的也难成功。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頗大的損失，但是同时却有頗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繼續抗战的主要基础。此阶段中，苏联对于我国已經有了大量的援助。敌人方面，士气已开始表現頽靡，敌人陆軍进攻的鋭气，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將更不如初期。敌之財政和經济已开始表現其竭蹶狀态，人民和士兵的厭战情緒已开始發生，战爭指导集团的內部已开始表現其"战爭的煩悶"，生長着对于战爭前途的悲观。

（三七）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將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終点，到达此終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轉入保守占領地的阶段。此阶段內，敌之企圖是保守占領地，以組織伪政府的欺騙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頑强的游击战爭。游击战爭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虛將有一个普遍的發展，建立許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領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將有广大的战爭。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輔助之。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規軍，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領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一方面因中国技术条件一时未能完备，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除正面

防御部队外，我軍將大量地轉入敌后，比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裝，向敌人占領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爭，并尽可能地調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現在山西的榜样。此阶段的战爭是殘酷的，地方將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爭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領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們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敗，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領地將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爭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爭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間的長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們要准备付給較長的时間，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將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經济困难和汉奸搗乱將是兩个很大的問題。敌人將大肆其破坏中国統一战綫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領地的汉奸組織將合流組成所謂"統一政府"。我們內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爭的困难，动搖分子將大倡其妥协論，悲观情緒將严重地增長。此时我們的任务，在于动員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絕不动搖地坚持战爭，把統一战綫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論，提倡艰苦斗爭，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此阶段內，必須号召全国坚决地維持一个統一政府，反对分裂，有計划地增强作战技术，改造軍队，动員全民，准备反攻。此阶段中，国际形势將变到更于日本不利，虽可能有張伯倫一类的迁就所謂"既成事实"的"現实主义"的調头出現，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將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亞，將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發新的战爭。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爭和人民抗日运动將疲憊这一大批日本軍，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長其思乡厭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軍队。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虽然不能說它絕对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資本缺乏，又困于游击战爭，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爭的过渡阶段，也將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轉变的樞紐。中国將变为独立国，还是淪为殖民地，不决定于

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統一战綫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將在此阶段中获得轉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員的努力，最精彩的結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三八）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繼續地生長着的力量。然而單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須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則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傳和外交工作的任务。这个阶段，战爭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將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現象上，并將表現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內綫，而將逐漸地变为战略外綫。直至打到鴨綠江边，才算結束了这个战爭。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謂坚持战爭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爭形式仍將是运动战，但是陣地战將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說，第一阶段的陣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阶段的陣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將变成頗为重要的。此阶段內的游击战，仍將輔助运动战和陣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阶段之变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这样看来，战爭的長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殘酷性，是明显的。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長期地占領中国的許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驅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將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敗我胜，但是必須經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四〇）中国人民在这样長期和殘酷的战爭中間，將受到很好的鍛煉。参加战爭的各政党也將受到鍛煉和考驗。統一战綫必須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統一战綫，才能坚持战爭；只有坚持統一战綫和坚持战爭，才能有最后胜利。果然是这样，一切困难就能够克服。跨过战爭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是战爭的自然邏輯。

（四一）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变化將循着下述的道路前进。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須估計抗战以前到这

一阶段末尾，有兩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經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將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經济力量、軍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減縮。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許要減縮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經济方面。这一点，將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論和妥协論的根据。然而必須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爭中的經驗，軍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員，文化的新方向的發展，游击战爭的出現，国际援助的增長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質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給了我們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四二）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也有兩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現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彈藥的消耗，士气的頹靡，国内人心的不滿，貿易的縮減，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輿論的責备等等方面。这个方面，又給予我們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計到敌人的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領土、人口和資源。在这点上面，又产生我們的抗战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的根据，同时也將被一些人利用作为亡国論和妥协論的根据。但是我們必須估計敌人这种向上变化的暫时性和局部性。敌人是行將崩溃的帝国主义者，他占領中国的土地是暫时的。中国游击战爭的猛烈發展，將使他的占領区实际上限制在狹小的地帶。而且，敌人对中国土地的占領又产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国的矛盾。再則，根据东三省的經驗，日本在相当長的时間內，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資本时期，不能是收获时期。所有这些，又是我們击破亡国論和妥协論而建立持久論和最后胜利論的根据。

（四三）第二阶段，上述双方的变化將繼續發展，具体的情形不能預断，但是大体上將是日本繼續向下，中国繼續向上㊀。例如日本的

㊀ 毛澤东同志在这里所預言的抗日战爭相持阶段中中国方面可能的向上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的解放区是完全实現了。在国民党統治区，以蔣介石为首的統治集团則因其消極抗日，积極反共反人民，不但沒有向上，而且向下了。但因为

軍力、財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爭，国內人心更加不滿，士气更加頹靡，国际更感孤立。中国則政治、軍事、文化和人民动員將更加进步，游击战爭更加發展，經濟方面也將依憑內地的小工业和广大的农业而有某种程度的新發展，国际援助將逐漸地增进，將比現在的情况大为改观。这个第二阶段，也許將經过相当長的时間。在这个时間內，敌我力量对比將發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將逐漸上升，日本則逐漸下降。那时中国將脫出劣势，日本則脫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將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应該重复地指出：所謂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長、日本困难的增長和国际援助的增長在內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

（四四）根据中国政治和經济不平衡的狀态，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將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帶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敌人采用各种分化手段破裂中国統一战綫的企圖，此阶段中并不会減弱，因此，中国內部团結的任务更加重要，务不令內部不調致战略反攻半途而廢。此时期中，国际形势將变到大有利于中国。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徹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四五）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爭的过程，中日战爭的必然趋势。

（四六）于是問題和結論是：中国会亡嗎？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嗎？答复：不能速胜，必須是持久战。这个結論是正确的嗎？我以为是正确的。

（四七）講到这里，亡国論和妥协論者又將跑出来說：中国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軍力和經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

这样，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和覺悟。請参看毛澤东同志在"論联合政府"著作中关于这一切事实的分析。

有超过日本的軍力和經济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結論是不正确的。

（四八）这就是所謂"唯武器論"㊀，是战爭問題中的机械論，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問題的意見。我們的意見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軍力和經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爭方面的話，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軍力和經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嗎？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較劣势的軍力和經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嗎？沒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統一战綫，其軍力和經济力是能够逐漸地加强的。而我們的敌人，經过長期战爭和內外矛盾的削弱，其軍力和經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嗎？还不止此，目前我們不能把别国的軍力和經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將来也不能嗎？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將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軍力和經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們，那末，优势不更在我們一方面嗎？日本是小国，其战爭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將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爭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將益处于多助。所有这些，經过長期發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發生变化嗎？

（四九）速胜論者則不知道战爭是力量的竞賽，在战爭双方的力量对比沒有起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就想提前到达解放之路，也是沒有根据的。其意見实行起来，一定不免于碰壁。或者只是空談快意，并不准备眞正去做。最后則是事实先生跑將出来，給这些空談家一瓢冷水，証明他們不过是一些貪便宜、想少費气力多得收成的空談主义者。这种空談主义过去和現在已經存在，但是还

㊀ "唯武器論"是認为中国武器不如日本，所以在战爭中中国一定失敗的論調。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們（包括蔣介石在內）都有这样的看法。

不算很多，战爭發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时，空談主义可能多起来。但是在同时，如果第一阶段中国損失較大，第二阶段时間拖得很長，亡国論和妥协論更將大大地流行。所以我們的火力，应該主要地向着亡国論和妥协論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对空談主义的速胜論。

（五〇）战爭的長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爭究將經过多少年月則誰也不能預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縮短战爭时間的人們，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減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說，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軍队，努力于發展游击战爭，使敌之占領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圍，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統一战綫，团結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設新軍和發展新的軍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經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員，努力于瓦解敌軍和爭取敌軍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傳爭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爭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縮短战爭的时間，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圖便的法門。

犬牙交錯的戰爭

（五一）我們可以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爭，將在人类战爭史中表現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頁。犬牙交錯的战爭形态，就是顯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犬牙交錯的战爭，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內战，就有过这种情形。但其在中国的特点，是其特殊的長期性和广大性，这將是突破历史紀录的东西。这种犬牙交錯的形态，表現在下述的几种情况上。

（五二）內綫和外綫——抗日战爭是整个处于內綫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軍和游击队的关系，則是主力軍在內綫，游击队在外綫，形成夾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內綫，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綫，又形成了很多夾攻敌人的火綫。在战

爭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綫作战的正規軍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綫作战的游击队則將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將更加猛烈地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異形态。

（五三）有后方和無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綫伸至敌人占領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軍。脫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綫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規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綫。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該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們不但沒有后方，也沒有作战綫。"無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領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軍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爭的特点，沒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

（五四）包圍和反包圍——从整个战爭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綫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內綫作战地位，無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圍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圍。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綫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綫作战方針，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圍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圍。再从敌后游击战爭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圍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后者例如晋西北。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圍。但若將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將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規軍的陣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許多敌人都包圍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圍了同蒲路（路之东西兩側及南端），四面包圍了太原城；河北、山东等省也有許多这样的包圍。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圍。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兩种包圍，大体上好似下圍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圍棋也算在內，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圍，这就是侵略陣綫与和平陣綫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圍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圍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圍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將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

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㊀。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綫，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單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單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單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無处逃跑的天罗地網，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網大体布成之时。这絲毫也不是笑話，而是战爭的必然的趋势。

（五五）大块和小块——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將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領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說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說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發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圍，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进来，则在面积上中国未失地区仍然是大半，而敌占地区包括东三省在內，也只是小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完整区域当然是重要的，应集大力去經营，不但政治、軍事、經济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紧。敌人已將我們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們則要將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同时，敌后广大游击区的經营也是非常之要緊的，也应把它們的各方面發展起来，也应發展其文化工作。总起来看，中国將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將暫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

（五六）这样看来，長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爭，是軍事、政治、經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錯的战爭，这是战爭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壯举，惊天动地的偉业。这个战爭，不但將影响到中日兩国，大大推动兩国的进步，而且將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

㊀ 如来佛指佛教的开創者釋迦牟尼。孙悟空是十六世紀中国的一部神話小說“西遊記”中的英雄。这部神話說，孙悟空本是个猴子，他能筋一觔斗翻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上尽力翻觔斗，总是翻不出去，反而被如来佛手掌一扑，將五个手指化作五座联山的五行山，把他压住。

族的进步。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錯的战爭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爭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爭的特殊的形态。

为永久和平而战

（五七）中国抗日战爭的持久性同爭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沒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爭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由于阶級的出現，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滿了战爭，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內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間打。打到資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殘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絕后的战爭。只有目前开始了的战爭，接近于最后战爭，就是說，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战爭，你們看，一个意大利，又一个日本，一个阿比西尼亞，又一个西班牙，再一个中国。参加战爭的这些国家共有差不多六万万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的战爭的特点是無間断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質。为什么無間断？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亞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国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还要接着誰呢？無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法西斯主义就是战爭"㊀，一点也不錯。目前的战爭發展到世界大战之間，是不会間断的，人类的战爭灾难不可避免。为什么又說这次战爭接近于永久和平？这次战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資本主义总危机發展的基础上發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資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爭，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爭的冒險。我

㊀ 一九三五年八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反战反法西斯斗爭的当前問題"的报告中說："法西斯主义——就是橫行無忌的民族侵略主义和强盜的战爭。"一九三七年七月，季米特洛夫同志又發表了題为"法西斯主义——这就是战爭"的論文。

們可以預見这次战爭的結果，將不是資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潰。这次战爭，將比二十年前的战爭更大，更殘酷，一切民族將無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爭时間將拖得很長，人类將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覚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爭中無疑將出現偉大的革命战爭，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爭，而使这次战爭帶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質。即使尔后尚有一个战爭时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远了。人类一經消灭了資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爭了。那时將不要軍队，也不要兵船，不要軍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將亿万斯年看不見战爭。已經开始了的革命的战爭，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爭的一部分。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兩国之間的战爭，在这个战爭中將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將从这个战爭中得来。將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將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們的抗日战爭包含着为爭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質。

（五八）历史上的战爭分为兩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爭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爭都是非正义的。我們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爭，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爭。对于后一类战爭，我們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爭，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爭。反对的方法，在战爭未爆發前，极力阻止其爆發；既爆發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爭反对战爭，用正义战爭反对非正义战爭。日本的战爭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爭，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內，都应該反对，也正在反对。我們中国，則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爭。我們的战爭是神聖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須决一死战，便須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間虽長，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經鮮明地擺

在我們的前面。我們从事战爭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爭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爭延長到無尽期，我們則要把战爭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將来給以結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該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創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爭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貢献，無疑地是非常偉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經济的行程已經接近了这一点，只須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能動性在戰爭中

（五九）以上說的，都是說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說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將轉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問題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爭取最后胜利？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問題。为了这个，我們將依次說明下列的問題：能动性在战爭中，战爭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員，战爭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內綫中的外綫，主动性，灵活性，計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陣地战，歼灭战，消耗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爭的决战問題，兵民是胜利之本。我們現在就从能动性問題說起吧。

（六〇）我們反对主观地看問題，說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敗，故須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沒有人做就不会出現。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划、方針、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見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們名之曰"自覚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們必須發揚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須

發揚这种自覚的能动性。抗日战爭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須动員全中国人民，統統發揚其抗日的自覚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沒有持久战，也沒有最后胜利。

（六一）自覚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爭中强烈地表現出这样的特点。战爭的胜負，固然决定于双方軍事、政治、經济、地理、战爭性質、国际援助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胜負。要分胜負，还須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爭和实行战爭，这就是战爭中的自覚的能动性。

（六二）指导战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战爭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內，能动地爭取战爭的胜利。战爭指揮員活动的舞台，必須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壯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質的基础之上，抗日战爭的指揮員就要發揮他們的威力，提挈全軍，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們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狀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須用我們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們不贊成任何一个抗日战爭的指揮員，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魯莽家，但是我們必須提倡每个抗日战爭的指揮員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將軍。他們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駕馭整个战爭变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战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要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驟地到达彼岸。作为战爭指导規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爭大海中的游泳术。

戰爭和政治

（六三）“战爭是政治的繼續”，在这点上說，战爭就是政治，战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动，从古以来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战爭。抗日战爭是全民族的革命战爭，它的胜利，离不开战爭的政治目的——驅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統一

战綫的总方針，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員，离不开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敌軍等項政治原則，离不开統一战綫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員，离不开爭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話，战爭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軍人中，如有輕視政治的傾向，把战爭孤立起来，变为战爭絕对主义者，那是錯誤的，应加糾正。

（六四）但是战爭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說，战爭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㊀。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發了战爭，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發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發动了侵略战爭。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爭，企圖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現在用战爭来压迫，要完全断絕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爭，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爭結束。障碍沒有扫除得干凈，战爭仍須繼續进行，以求貫徹。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緣故妥协了，但是战爭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繼續战爭，貫徹战爭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战爭，战爭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基于战爭的特殊性，就有战爭的一套特殊組織，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組織，就是軍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爭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軍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因此，战爭的經驗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爭的人們，必須脫出寻常习慣，而习慣于战爭，方能爭取战爭的胜利。

抗日的政治動員

（六六）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战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員，

㊀ 参看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爭"第一章和列宁的"第二国际的破产"第三节。

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动員，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經輸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員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說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彈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員，但这是敌人替我們做的，不是我們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們，至今还是靜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須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爭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輸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發揮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絕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尙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員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頂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爭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堅持抗战，堅持統一战綫，堅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員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視政治动員，叫做"南其轅而北其轍"，結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六七)什么是政治动員呢？首先是把战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队和人民。必須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么关系。抗日战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須把这个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貢献一切給战爭。其次，單單說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說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就是說，要有一个政治綱領。現在已經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綱領"，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綱領"，应把它們普及于軍队和人民，并动員所有的軍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沒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綱領，是不能动員全軍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报紙書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員。現在国民党統治地区有的一些，滄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須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員就够了，抗日战爭的政治动員是經常的。不是將政治綱領背誦給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誦是沒有人听的；要联系战爭發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爭的政治动員，变成經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絕大的事，战爭首先要靠它取得

胜利。

戰 爭 的 目 的

(六八)这里不是說战爭的政治目的，抗日战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前面已經說过了。这里說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謂战爭，兩軍相杀的战爭，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战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裝，也就是所謂"剝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爭，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繼續。轟炸机、机关槍、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發展；防空掩蔽部、鋼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發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結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廢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則自己將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輔助进攻或准备轉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屬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繼續；而追击，則是进攻的繼續。应該指出：战爭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輔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爭实际中，虽有許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爭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样解釋战爭中提倡勇敢牺牲呢？豈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爭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暫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們說，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这里。防御必須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單純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七〇）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爭的目的，就是战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战爭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貫徹这个本質的。战爭目的，是战爭的基本原則，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則，一点也离不开它。射击原則的"蔭蔽身体，發揚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因为前者，于是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躍进运动，疏开队形，种种方法都發生了。因为后者，于是扫清射界，組織火網，种种方法也發生了。战术上的突击队、箝制队、預备队，第一种为了消灭敌人，第二种为了保存自己，第三种准备依情况使用于兩个目的——或者增援突击队，或者作为追击队；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增援箝制队，或者作为掩护队，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照这样，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則，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爭的目的，它普及于战爭的全体，貫徹于战爭的始終。

（七一）抗日战爭的各級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兩国之間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爭，也不能离开这个战爭目的去指导战爭。兩国之間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爭的行动中，就变成互相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爭。我們的战爭，在于力求每战爭取不論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裝，損伤敌人一部分人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績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驅敌出国，保衛祖国，建設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决，內綫中的外綫

（七二）現在来研究抗日战爭中的具体的战略方針。我們已說过了，抗日的战略方針是持久战，是的，这是完全对的。但这是一般的方針，还不是具体的方針。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呢？这就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我們的答复是：在第一和第三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該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內綫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綫作战。

在第三阶段中，应該是战略的反攻战。

（七三）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針的，我們則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圖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們应自覚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日本用其战斗力頗强的几十个师团的陆軍（目前已到了三十个师团）和一部分海軍，从陆海兩面包圍和封鎖中国，又用空軍轟炸中国。目前日本的陆軍已占領从包头到杭州的長陣綫，海軍則到了福建广东，形成了大范圍的外綫作战。我們則处于內綫作战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敵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則适得其反。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里就产生了兩个重要的結果。第一，敵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領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領区域，則空出了广大地面無法占領，这就給了中国游击战爭以广大活动的地盤。在全国，即使敵能占領广州、武汉、鄭州之綫及其附近的地区，但以外的地区是难于占領的，这就給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爭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樞根据地。第二，敵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圍中。敵分路向我进攻，敵处战略外綫，我处战略內綫，敵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兩个長处，不作死守的陣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場的外綫，突然包圍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敵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綫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內綫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內綫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綫和进攻。对其一路如此，对其他路也是如此。以上兩点，都是从敵小我大这一特点發生的。又由于敵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員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員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綫打內綫，还須采取速决战的方針。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駐止中之敵，而打运动中之敵。我預將大兵蔭蔽集結于敵必經通路之側，

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圍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灭他；打不好，也給他一个大的杀伤。一战如此，他战皆然。不說多了，每个月打得一个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兒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軍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場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經过許多战役和战斗的敗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七五）上述这样的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針，一句話說完，就是："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針"內綫的持久的防御战"說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現这样的战略方針之必要的方針。如果战役和战斗方針也同样是"內綫的持久的防御战"，例如抗战初起时期之所为，那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这兩种情况，那就决然达不到战略目的，达不到总的持久战，而將为敌人所击敗。所以，我們历来主張全国組成若干个大的野战兵团，其兵力針对着敌人每个野战兵团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針，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場之上。这种方針，不但是正規战爭用得着，游击战爭也用得着，而且必須要用它。不但适用于战爭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战爭的全过程。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以弱敌强这种情况即使完全沒有了，我仍用多兵从外綫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例如我用兩个或三个或四个机械化的师对敌一个机械化的师，更能确定地消灭这个师。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識中包含的眞理。

（七六）如果我們坚决地采取了战場作战的"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場上改变着敌我之間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將逐漸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場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綫，敌是少兵处內綫；我是速决，敌虽企圖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軍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許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將引起变化。这就是說，集合了許多战場作战

的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發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們自己的其他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們实行反攻驅敌出国的时机了。

（七七）战爭是力量的竞賽，但力量在战爭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錯誤，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現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針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主动性，靈活性，計劃性

（七八）上面說过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中心点在于一个进攻；外綫是說的进攻的范圍，速决是說的进攻的时間，所以叫它做“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針，也即是所謂运动战的方針。但是这个方針实行起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計划性。我們現在就来研究这三个問題。

（七九）前面已說过了自覺的能动性，为什么又說主动性呢？自覺的能动性，說的是自覺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現于战爭中，这些是前面說过了的。这里說的主动性，說的是軍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狀态的。行动自由是軍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軍队就接近于被打敗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繳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結果。一个軍队的战敗，也是一样。为此緣故，战爭的双方，都力爭主动，力避被动。我們提出的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現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計划性，可以說都是为了爭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爭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錯誤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錯覺和不意来爭

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下面就来分析这几点。

(八〇)主动是和战爭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則和战爭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爭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較能掌握和發揮，然而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絕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絕对优势对絕对劣势才有可能。一个身体壯健者和一个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絕对的主动权。如果日本沒有許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几百万至一千万大兵，財源比現在多过几倍，又沒有民众和外国的敌对，又不实行野蛮政策招致中国人民拚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种絕对的优势，它便有一种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絕对的主动权。但在历史上，这类絕对优势的事情，在战爭和战役的結局是存在的，战爭和战役的开头則少見。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屈服的前夜，这时协約国变成了絕对优势，德国則变成了絕对劣势，結果德国失敗，协約国获胜，这是战爭結局存在着絕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又如台兒庄胜利的前夜，这时当地孤立的日軍經过苦战之后，已处于絕对的劣势，我軍則造成了絕对的优势，結果敌敗我胜，这是战役結局存在着絕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战爭或战役也有以相对的优劣或平衡狀态而結局的，那时，在战爭則出現妥协，在战役則出現对峙。但一般是以絕对的优劣而分胜負居多数。所有这些，都是战爭或战役的結局，而非战爭或战役的开头。中日战爭的最后結局，可以預断，日本將以絕对劣势而失敗，中国將以絕对优势而获胜；但是在目前，則双方的优劣都不是絕对的而是相对的。日本因其具有强的軍力、經济力和政治組織力这个有利因素，对于我們弱的軍力、經济力和政治組織力，占了优势，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动权的基础。但是因为它的軍力等等数量不多，又有其他許多不利因素，它的优势便为它自己的矛盾所減杀。及到中国，又碰到了中国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堅强的民族抗战，它的优势再为之減杀。于是在总的方面，它的地位就变成一种相对的优势，因而其主动权的發揮和維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对的东西。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

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員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軍队的敌愾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軍力、經济力等的劣势的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的劣势。因而也减少了被动的程度，仅处于战略上的相对的被动地位。然而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須力求脫离它。軍事上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和發动敌后的游击战爭，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許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許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漸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脫出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間、优势和劣势之間的相互关系。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間的关系。如上所述，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脫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們許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剝夺敌人的許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們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轉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为什么呢？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础作地盤，互爭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賽。竞賽結果，有胜有敗，除了客观物質条件的比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揮的正确，敗者必由于主观指揮的錯誤。我們承認战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别的社会現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帶所謂"盖然性"。但战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㊀，仍是科学的眞理。錯誤由于对彼己的無知，战爭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無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爭情况和战爭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样的战爭情况和战爭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

㊀ 見"孙子"卷三"謀攻"篇。

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繼之以指揮員的聰明的推論和判断，減少錯誤，实現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們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間的关系。

（八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軍打敗仗、弱小之軍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㊀，楚汉成皐之战，韓信破赵之战㊁，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吳魏赤壁之战，吳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崙的多数战役㊂，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內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轉成了优势，轉成了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則反是；由于其主观錯誤和內部矛盾，可以將其很好的或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敗軍之將，亡国之君。由此可知，战爭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現实事物，必待經过斗爭，經过主观能力的竞賽，方才出現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爭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錯誤，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統治王朝打不贏革命軍，可見單是某种优势还沒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沒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眞实的情况，經过主观能力的活躍，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㊀ 城濮在今平原省濮县境內。公元前六三二年，晉楚兩国大战于此。战爭的开始，楚軍占优势。晉軍退却九十里，选擇了楚軍力量薄弱的左右兩翼，予以严重的打击，楚軍大敗。

㊁ 公元前二〇四年，汉將韓信率部与赵敬大战于井陘。赵軍号称二十万，数倍于汉軍。韓信背水为陣，率軍奋战；同时，遣兵襲占赵軍防御薄弱的后方，使其腹背受敌，遂大破赵軍。

㊂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法国的拿破崙曾与英、普、奥、俄以及欧洲其他很多国家作战，在多次战爭中，拿破崙的部队在数量上都不如他的敌人，但都得到了胜利。

（八三）錯覚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計划地造成敌人的錯覚，給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錯覚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㊀，是錯覚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錯覚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鎖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騙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錯誤和行动錯誤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厭詐”，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無准备。优势而無准备，不是眞正的优势，也沒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軍，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敗。我們說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無准备中。这兩件事——造成敌人的錯覚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爭的不确实性給予敌人，而給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爭取我之优势和主动，爭取我之胜利。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組織。因此，發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裝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襲击，同时即用以封鎖消息，掩护我軍，使敌無从知道我軍將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錯覚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过去土地革命战爭时代的中国紅軍，以弱小的軍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組織起来和武裝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爭照規矩应比土地革命战爭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錯誤㊁，民众是散的，不但倉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發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爭的一切需要上給以無穷無尽的供給。在这个給敌以錯覚和給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爭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們

㊀ 公元三八三年，秦主苻坚原来輕視晉軍，出兵攻晉，晉軍在安徽寿阳洛澗的地方打敗秦軍的前鋒，于是水陆攝进。苻坚登寿阳城望之，看見晉兵布陣严整，又望見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皆是晉兵，覚得是遇到勁敌，而有懼色。参看“毛澤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注三〇（見本書第一一五六頁注七——本書編者注）。

㊁ 指蔣介石汪精衛等在一九二七年背叛第一次国共的民族民主統一战線，举行十年的反人民战爭，使得中国人民沒有能夠广大地組織起来的事实。这个历史錯誤是应該由蔣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負責的。

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㊀。我們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們变成瞎子和聾子，要把他們的指揮員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們变成瘋子，用以爭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間的相互关系。战胜日本是少不了这种主观指导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进攻阶段中，因其軍力之强和利用我之主观上的历史錯誤和現时錯誤，它是一般地处于主动地位的。但是这种主动，已随其本身帶着許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战爭中也犯了些主观錯誤（詳論見后），与乎我方具备着許多有利因素，而开始了部分的減弱。敌之在台兒庄失敗和山西困处，就是显証。我在敌后游击战爭的广大發展，則使其占領地的守軍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虽則敌人此时还在其主动的战略进攻中，但他的主动將随其战略进攻的停止而結束。敌之兵力不足，沒有可能作無限制的进攻，这是他不能繼續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一个根源。我之战役的进攻战，在敌后的游击战爭及其他条件，这是他不能不停止进攻于一定限度和不能繼續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二个根源。苏联的存在及其他国际变化，是第三个根源。由此可見，敌人的主动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够破坏的。中国如能在作战方法上坚持主力軍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猛烈地發展敌后的游击战爭，并从政治上大大地發动民众，我之战略主动地位便能逐漸树立起来。

（八五）現在来說灵活性。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現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爭指揮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爭的事业，除了組織和教育軍队，組織和教育人民等項之外，就是使用軍队于战

㊀ 宋襄公是公元前七世紀春秋时代宋国的国君。公元前六三八年宋国与强大的楚国作战，宋兵已經排列成陣，楚兵正在渡河。宋国有一个官員認为楚兵多宋兵少，主張利用楚兵渡河未畢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說："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未排列成陣，宋国官員又請求出击，宋襄公又說："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陣势的队伍。"一直等到楚兵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結果宋国大敗，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故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組織軍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軍队則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爭特性中的紛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現指揮上的灵活性。

（八六）抗日战爭战場作战的基本方針，是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針，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箝制、包圍和迂迴、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換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將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給了敌人以預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駐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問題。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釘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問題。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問題。不但使用战术，还須变換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箝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箝制队，以及包圍迂迴等等之互相变換，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給以变換，是灵活性的指揮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揮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揮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謂"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們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揮員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該拒絕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揮員，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項）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謂"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轉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現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屬于我們了。

（八八）現在来說計划性。由于战爭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現計划性于战爭，較之实現計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事先的計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爭

的胜利。战爭沒有絕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沒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尋，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現象可供思索。这就構成了所謂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爭的計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近代技术（有綫电、無綫电、飞机、汽車、鉄道、輪船等）的發达，又使战爭的計划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战爭只有程度頗低和时間頗暫的确实性，战爭的計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爭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爭范圍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計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計划，常須一日数变。战役計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計划，大体能終战役之局，但在該战役內，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間或有之。战略計划，是基于战爭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內适用，战爭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計划便須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計划之各依其范圍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爭指揮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爭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抗日战爭的各級指揮員，对此应当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于战爭的流动性，就从根本上否認战爭計划或战爭方針之相对的固定性，說这样的計划或方針是"机械的"东西。这种意見是錯誤的。如上条所述，我們完全承認：由于战爭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爭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爭的計划或方針，也只应給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須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爭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換或修改，不这样做，我們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認一定时間內的相对地固定的战爭計划或方針；否認了这点，就否認了一切，連战爭本身，連說話的人，都否認了。由于战爭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爭計划或方針，也就必須拿相对的固定性賦予它。例如，由于华北战爭的情况和八路軍分散作战的行动有其在一定阶段內的固定性，因而在这一定阶段內賦予相对的固定性于八路軍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战略的作战方針，是完全必要的。战役方針，較之上述战略方針适用的时間要短促些，战术方針更加短

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时間的固定性。否認了这点，战爭就無从着手，成为毫無定見，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爭相对主义了。沒有人否認，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間內适用的方針，它也是在流动的，沒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針的廢止和另一方針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針的各种不同的战爭行动的范圍中，而不是这一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流动，即是說，是数的流动，不是質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質，在一定时間內是决不流动的，我們所謂一定时間內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絕对流动的整个战爭長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們对于战爭計划或战爭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意見。

（九〇）在說过了战略上的內綫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又說过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計划性之后，我們可以总起来說几句。抗日战爭应該是有計划的。战爭計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帶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爭的情况。要处处照顧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間的形势。而一切这些，都表現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現于战略上的內綫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

（九一）作为战爭內容的战略內綫、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爭形式上就表現为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正規兵团在長的战綫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謂“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內，并且也把起輔助作用的陣地攻击和陣地防御包括在內。它的特点是：正規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九二）中国版圖广大，兵員众多，但軍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則兵力不足，但技术和教养比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無疑地应以

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輔助之，組成整个的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謂"有退無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謂"有进無退"的拚命主义。

（九三）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战軍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然而，这和韓复榘式的逃跑主义㊀是沒有相同之点的。战爭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运动战决不能被韓复榘一类人所借口，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沒有向前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实行的結果，中国虽大，也是要被"运动"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种思想也是不对的，即所謂有进無退的拚命主义。我們主張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內容的运动战，其中包括了輔助作用的陣地战，又包括了"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沒有这些，运动战便不能充分地执行。拚命主义是軍事上的近視眼，其根源常是惧怕丧失土地。拚命主义者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战軍的大踏步的进退。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許多条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鎖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暫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为暫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消极方面，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軍力的保存时，应該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軍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拚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爭一城一地的得失，結果不但城和地俱失，軍力也不能保存。我們历来主張"誘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軍对强軍作战的最有效的軍事政策。

（九五）抗日战爭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

㊀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軍占領北平天津后，沿津浦鉄路南下，进攻山东省，多年統治山东的国民党軍閥韓复榘不战而逃，从山东一直逃到河南。

游击战了。我們說，整个战爭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輔助的，說的是解决战爭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規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負这种解决战爭命运的主要的責任。但这不是說：游击战在抗日战爭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爭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沒有游击战的輔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这样說，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發展这一个战略任务在內的。長期的殘酷的战爭中間，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將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兩方面：一是輔助正規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規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爭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說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輕視的了。因此，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問題，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問題。这个問題，我在"抗日游击战爭的战略問題"一文里面已經說到了。前面說过，抗日战爭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陣地战是輔助的。第二阶段，則游击战將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陣地战輔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輔之以陣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規軍負担，而將由原来的游击軍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負其一部分，也許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爭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將在人类战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为此緣故，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規軍中間，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發动和配合民众武裝，从事游击战爭，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軍队，要自覚地負担这种神聖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資格，这种想法是錯誤的。游击战爭沒有正規战爭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在長期和殘酷的战爭中，游击战爭將表現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并且正規軍分散作游击战，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八路軍就是这样做的。八路軍的方針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針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針的人們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九六）防御的和攻击的陣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們表現弱的地方。再則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迴避我們的陣地設施。因此陣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說用为主要手段。然而在战爭的第一第二兩阶段中，穿插于运动战范圍，而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輔助作用的局部的陣地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爭取余裕时間之目的，而采取半陣地性的所謂"运动性的防御"，更是屬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中国須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陣地攻击的任务。战略反攻阶段，無疑地將提高陣地战的地位，因为那时敌人將坚守陣地，沒有我之有力的陣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將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虽然如此，第三阶段中，我們仍須力爭以运动战为战爭的主要形式。因为战爭的領导艺术和人的活躍性，臨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以后西欧地区那样的陣地战，饒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广大版圖的中国境內作战，在相当長的时間內中国方面又还保存着技术貧弱这种情况，"把战爭从壕溝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現。就在第三阶段，中国技术条件虽已增进，但仍不見得能够超过敌人，这样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講求高度的运动战，不能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这样，整个抗日战爭中，中国將不会以陣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爭形式中，战爭的領导艺术和人的活躍性能够得到充分地發揮的机会，这又是我們不幸中的幸事呵！

消耗戰，殲滅戰

（九七）前头說过，战爭本質即战爭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此目的的战爭形式，有运动战、陣地战、游击战三种，实現时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謂消耗战和歼灭战之别。

（九八）我們首先可以說，抗日战爭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为什么？敌之强的因素尚在發揮，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依然存在，沒有

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減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脫离，为了爭取时間，加强国內国际条件，改变自己的不利狀态，沒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也不能成功。因此，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在这点上說，歼灭战就是消耗战。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九九）但达到战略消耗目的的，还有战役的消耗战。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陣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在这点上說，歼灭战不同于消耗战。战役的消耗战，是輔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

（一〇〇）从理論上和需要上說来，中国在防御阶段中，应該利用运动战之主要的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上輔助性質的陣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相持阶段中，繼續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漸地轉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时，繼續用歼灭达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驅逐敌人。

（一〇一）但是在事实上，十个月的經驗是，許多甚至多数的运动战战役，打成了消耗战；游击战之应有的歼灭作用，在某些地区，也还未提到应有的程度。这种情况的好处是，無論如何我們总算消耗了敌了，对于持久作战和最后胜利有其意义，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点是：一則消耗敌人的不足；二則我們自己不免消耗的較多，繳获的較少。虽然应該承認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即敌我技术和兵員教养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論上和实际上，無論如何也应該提倡主力軍在一切有利場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游击队虽然为了执行許多具体任务，例如破坏和扰乱等，不能不进行單純的消耗战，然而仍須提倡并努力实行在战役和战斗之一切有利場合的歼灭性的作战，以达既能大量消耗敌人又能大量补充自己之目的。

（一〇二）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之所謂外綫，所謂速决，所謂进

攻，与乎运动战之所謂运动，在战斗形式上，主要地就是采用包圍和迂迴战术，因而便須集中优势兵力。所以，集中兵力，采用包圍迂迴战术，是实施运动战即外綫的速决的进攻战之必要条件。然而一切这些，都是为着歼灭敌人之目的。

（一〇三）日本軍队的長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組織性，其因过去沒有打过敗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驕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輕視等等特点；这是日本軍閥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慣造成的。我軍对之杀伤甚多、俘虜甚少的現象，主要原因在此。这一点，过去許多人是估計不足的。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長的过程。首先需要我們重視这一特点，然后耐心地有計划地从政治上、国际宣傳上、日本人民运动上多方面地向着这一点进行工作；而軍事上的歼灭战，也是方法之一。在这里，悲观主义者可以据之引向亡国論，消极的軍事家又可以据之反对歼灭战。我們則相反，我們認为日本軍队的这种長处是可以破坏的，并且已在开始破坏中。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爭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順导他們的这种自尊心，从寬待俘虜的方法，引导他們了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則是在他們面前表示中国軍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頑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給以歼灭战的打击。在作战上講，十个月的經驗証明歼灭是可能的，平型关、台兒庄等战役就是明証。日本軍心已在开始动摇，士兵不了解战爭目的，陷于中国軍队和中国人民的包圍中，冲鋒的勇气远弱于中国兵等等，都是有利于我之进行歼灭战的客观的条件，这些条件并將随着战爭之持久而日益發展起来。在以歼灭战破坏敌軍的气焰这一点上講，歼灭又是縮短战爭过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条件之一。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沒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〇四）另一方面，应該承認在技术和兵員教养的程度上，現时我們不及敌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歼灭，例如全部或大部俘获的事，在許多場合特别是在平原地帶的战斗中，是困难的。速胜論者在这点

上面的过分要求，也属不对。抗日战爭的正确要求应該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場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圍迂迴战术——不能包圍其全部也包圍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圍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圍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圍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圍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場合，則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則；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則。在战役的指揮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揮的原則；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揮的原則。这些，就是抗日战爭战場作战的基本方針。

乘敵之隙的可能性

（一〇五）关于敌之可胜，就是在敌人的指揮方面也有其基础。自古無不犯錯誤的將軍，敌人之有岔子可寻，正如我們自己也难免出岔子，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战略和战役上說来，敌人在十个月侵略战爭中，已經犯了許多錯誤。計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漸增加兵力。这是由于敌人对中国估計不足而来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敌人一向看不起我們，东四省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东、察北的占領，这些都算作敌人的战略偵察。他們得来的結論是：一盤散沙。据此以为中国不値一打，而定出所謂"速决"的計划，少少出点兵力，企圖吓溃我們。十个月来，中国这样大的团結和这样大的抵抗力，他們是沒有料到的，他們把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已存在着先进的党派、先进的軍队和先进的人民这一点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漸增兵，由十几个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个。再要前进，非再增不可。但由于同苏联对立，又由于人財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数和最后的进攻点都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沒有主攻方向。台兒庄战役以前，敌在华中、华北大体上是平分兵力的，兩方內部又各自平分。例如华北，在津浦、平汉、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伤亡了一些，占領地駐守了一些，再前进就沒有兵了。台兒庄敗仗后，总結了教訓，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这个錯誤算是暫时地改了一下。

三是沒有战略协同。敌之华中、华北兩集团中，每一集团內部是大体协同的，但兩集团間則很不协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兒庄时，南段不动。兩处都触了霉头之后，于是陆軍大臣来巡視了，参謀总長来指揮了，算是暫时地协調了一下。日本地主資产阶級和軍閥內部存在着頗为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在向前發展着，战爭的不协同是其具体表現之一。四是失去战略时机。这点显著地表現在南京、太原兩地占領后的停頓，主要的是因为兵力不足，沒有战略追击队。五是包圍多歼灭少。台兒庄战役以前，上海、南京、滄州、保定、南口、忻口、临汾諸役，击破者多，俘获者少，表現其指揮的笨拙。这五个——逐漸增加兵力，沒有主攻方向，沒有战略协同，失去时机，包圍多歼灭少，是台兒庄战役以前日本指揮的不行之点。台兒庄战役以后，虽已改了一些，然根据其兵力不足和內部矛盾諸因素，求不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且得之于此者，又失之于彼。例如，將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領地就出了大空隙，給予游击战爭以放手發展的机会。以上是敌人自己弄錯，不是我們使之錯的。我們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錯誤，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組織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錯覺，調动敌人就我范圍，例如声东击西之类，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經說过了。所有这些，都說明：我之战爭胜利又可在敌之指揮上面找到某种根源。虽然我們不应把这点作为我之战略計划的重要基础，相反，我之計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錯誤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敌隙，敌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又是我們指揮方面的任务。然而敌之指揮錯誤，是事实上已經存在过，并且还要發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来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將軍們应該极力地捉住它。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揮許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揮，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頗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們应該向他学习。

(一〇六)抗日战爭中的决战問題应分为三类：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無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賭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抗日战爭不同于其他許多战爭的特点，又表現在这个决战問題上。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則相反，在选擇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兒庄以及許多的其他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無把握的决战，例如彰德等地战役所采的方針。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則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計划，不得不跟了我們干持久战。这种方針，在領土狹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們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迴旋余地，可以促进幷等候国內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內溃，这是抗日战爭的上策。急性病的速胜論者熬不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企圖速胜，一到形势稍为好轉，就吹起了战略决战的声浪，如果照了干去，整个的抗战要吃大亏，持久战为之葬送，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計，实在是下策。不决战就須放棄土地，这是沒有疑問的，在無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棄。情况到了这种时候，絲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換时間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侖㊀。中国現在也应这样干。

(一〇七)不怕人家罵"不抵抗"嗎？不怕的。根本不战，与敌妥协，这是不抵抗主义，不但应該罵，而且完全不許可的。坚决抗战，但

㊀ 一八一二年，拿破崙以五十万大軍进攻俄国。俄軍放棄幷焚毀莫斯科，陷拿破崙軍于飢寒困苦、后路被扰乱、軍队被包圍的絕境，使其不得不引軍后退。俄軍乘机反攻，拿破崙軍仅剩二万余人逃去。

为避开敌人毒計，不使我軍主力丧于敌人一击之下，影响到抗战的繼續，一句話，避免亡国，是完全必需的。在这上面發生怀疑，是战爭問題上的近視眼，結果一定和亡国論者走到一伙去。我們曾經批評了所謂"有进無退"的拚命主义，就是因为这种拚命主义如果成为一般的风气，其結果就有使抗战不能繼續，最后引向亡国的危險。

（一〇八）我們主張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論是战斗的和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許任何的消极。給敌以歼灭和給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每个抗日軍人均須坚决地去做。为此目的，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須給以坚决的反对。李服膺、韓复榘等逃跑主义者的被杀，是杀得对的。在战爭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計划下絕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我們曾經严厉地指斥了所謂"有退無进"的逃跑主义，拥护严格紀律的执行，就是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計划下的英勇决战，才能战胜强敌；而逃跑主义，則是亡国論的直接支持者。

（一〇九）英勇战斗于前，又放棄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嗎？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嗎？这是非常不妥当的發問。吃飯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嗎？睡覚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嗎？可不可以这样提出問題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飯就一直吃下去，睡覚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鴨綠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誰人不知，为爭取时間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棄，时間却爭取了，給敌以歼灭和給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經驗却取得了，沒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長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嗎？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棄土地是为了保存軍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棄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絕無把握的决战，結果丧失軍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說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資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錢，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資本家。賭汉也要賭本，孤注一擲，不幸不中，就無从再賭。事物

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战爭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

（一一〇）我想，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那时虽然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然而仍适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則，直至打到鴨綠江边，都是如此。这样，我可始終立于主动，一切敌人的"挑战書"，旁人的"激將法"，都应束之高閣，置之不理，絲毫也不为其所动。抗日將軍們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將軍。那些"一触即跳"的人們，是不足以語此的。第一阶段我处于某种程度的战略被动，然在一切战役上也应是主动的，尔后任何阶段都应是主动。我們是持久論和最后胜利論者，不是賭汉們那样的孤注一擲論者。

二

兵民是勝利之本

（一一一）日本帝国主义处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是决不放松其进攻和鎮压的，它的帝国主义本質規定了这一点。中国不抵抗，日本就不費一彈安然占領中国，东四省的丧失，就是前例。中国若抵抗，日本就向着这种抵抗力压迫，直至它的压力無法超过中国的抵抗力才停止，这是必然的規律。日本地主資产阶級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島，北攻西伯利亞起見，采取中間突破的方針，先打中国。那些認为日本將在占領华北、江浙一帶以后适可而止的人，完全沒有看到發展到了新阶段迫近了死亡界綫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經和历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們說，日本的出兵数和进攻点有一定的限制，是說：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础上，为了还要举行别方面的进攻并防御另一方面的敌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国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为止；在中国一方面，又表現了自己的进步和頑强的抵抗力，不能設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国沒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占領全中国，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区，它將不遺余力地鎮压中国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內外条件使日本帝国主义發生了进入墳墓的直接危机之前，它是不会停止这种鎮压的。日本国內的政治只有兩个出

路；或者整个当权阶級迅速崩潰，政权交給人民，战爭因而結束，但暫时無此可能；或者地主資产阶級日益法西斯化，把战爭支持到自己崩潰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这条路。除此沒有第三条路。那些希望日本資产阶級中和派出来停止战爭的，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日本的資产阶級中和派，已經作了地主和金融寡头的俘虜，这是多年来日本政治的实际。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沒有給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話，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亞，甚或兩处都打。欧洲战爭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日本統治者的如意算盤是打得非常之大的。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爭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亞的原来計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然而在出現了这种情形之时，不是日本进攻中国的放松，反而是它进攻中国的加紧，因为那时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剝的一条路。那时中国的坚持抗战；坚持統一战綫和坚持持久战的任务，就更加显得严重，更加不能絲毫懈气。

（一一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結和各方面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中国已处于进步的时代，并已有了偉大的团結，但是目前的程度还非常之不够。日本占地如此之广，一方面由于日本之强，一方面則由于中国之弱；而这种弱，完全是百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各种历史錯誤积累下来的結果，使得中国的进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狀态。現在要战胜这样一个强敌，非有長期的广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应該努力的事情很多，我这里只說最根本的兩方面：軍队和人民的进步。

（一一三）革新軍制离不了現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沒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鴨綠江的。軍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沒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軍队的基础在士兵，沒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貫注于軍队之中，沒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貫注，就不能达到眞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發揮它們应有的效力。我們說日本技术条件虽优，但它終必失敗，除了我

們給以歼灭和消耗的打击外，就是它的軍心終必随着我們的打击而动摇，武器和兵員結合不稳。我們相反，抗日战爭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軍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軍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廢除封建主义的打罵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軍队就增加了絕大的战斗力，長期的殘酷的战爭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战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無組織狀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陣，我們一声喚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我們方面，軍队須有源源不絕的补充，現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㊀，亟須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員，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財源十分困难，动員了民众，則財政也不成問題，豈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財穷之理？軍队須和民众打成一片，使軍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队，这个軍队便無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一一五）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軍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訴他們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問題，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發，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錯的，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軍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軍。这些原則要实行有效，都須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敌軍俘虜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發。那些認为不是根本态度問題而是技术問題的人，实在是想錯了，应該加以改正才对。

（一一六）当此保衛武汉等地成为紧急任务之时，發动全軍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爭，是十分严重的任务。保衛武汉等地的任

㊀ 国民党扩軍的办法，是派軍警四处捉拿人民去当兵，捉来的兵用繩捆索綁，形同囚犯。略为有錢的人，就向国民党的官吏行賄，出錢买人代替。

务，毫無疑义必須認眞地提出和执行。然而究竟能否确定地保衛不失，不决定于主观的願望，而决定于具体的条件。政治上动員全軍全民起来奋斗，是最重要的具体的条件之一。不努力于爭取一切必要的条件，甚至必要条件有一不备，势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复轍。中国的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馬德里的条件。过去是沒有过一个馬德里的，今后应該爭取几个，然而全看条件如何。条件中的最基本条件，是全軍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員。

（一一七）在一切工作中，应該坚持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总方針。因为只有这种方針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軍民关系，才能發动全軍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衛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爭取最后胜利。

（一一八）这个政治上动員軍民的問題，实在太重要了。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說到这一点，实在是沒有这一点就沒有胜利。沒有許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沒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是全軍全民的統一战綫，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員們的統一战綫；动員全軍全民参加統一战綫，才是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根本目的。

結　論

（一一九）結論是什么呢？結論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統一战綫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統一战綫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場来說，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爭要延長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統一战綫的实力和中日兩国其他許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現，战爭就要延長。但結果还是一样，日本必敗，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經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我們的战略方針，应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变动不定的战綫上

作战。中国軍队要胜利，必須在广闊的战場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除了調动有訓練的軍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組織很多的游击队。”“在战爭的过程中……使中国軍队的裝备逐漸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爭的后期从事陣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領地进行陣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济行將崩潰；在無数战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將頹靡。中国方面，則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傾注到前綫去，为自由而战爭。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們能够对日本占領地的堡壘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国。”（一九三六年七月与斯諾談話）“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战的胜利。”“爭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鍵，在使已經發动的抗战發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却，內部的分化、叛变，暫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該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动的抗战，必將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繼續地前进和發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些就是結論。亡国論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論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的意見相反：抗日战爭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們的結論。

（一二〇）我的講演至此为止。偉大的抗日战爭正在开展，很多人希望总結經驗，以便爭取全部的胜利。我所說的，只是十个月經驗中的一般的东西，也算一个总結吧。这个問題值得引起广大的注意和討論，我所說的只是一个概論，希望諸位研究討論，給以指正和补充。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二卷排印）

毛澤东同志論革命的辯証法

陈 伯 达

一

毛澤东同志的著作"矛盾論"闡發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唯物辯証法观点，特别是对于列宁"关于辯証法問題"这一著作的主要观点，作了极其杰出的分析的工作，从而展开了关于唯物辯証法的本質的問題的各个方面。閱讀"矛盾論"，使得我們能够更加懂得毛澤东同志在从事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复杂問題的时候，是如何深刻地和如何生动地运用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因而也就使得我們能够更加懂得为什么毛澤东同志历来在我們党內关于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的斗爭中，总是比别人站得更高与看得更远更深，为什么毛澤东同志在任何时机总是能够保持自己高度的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而結果总是战敗了論敌。

中国是一个处在長期革命中的大国。特别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人民在工人阶級領导下所进行的革命运动，它的規模的壯闊，革命与国內外反革命的生死斗爭的残酷，革命統一战綫內部的又联合又斗爭，革命敌友的变化与重新組合，革命發展过程中的胜利和挫折，进攻和退却，各地革命运动的极端不平衡；革命斗爭形式的多种多样，作为中国革命斗爭主要形式的武裝斗爭在广闊地面上所使用的战略战术的多端随机应变，所有这些，都特别表現出激烈的矛盾，激烈的变化，也即是說，特别表現出历史事变的辯証法运动。很明显，中国共产党人必須善于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的指导的原理，去掌握这样生气勃勃的革命的辯証法运动，不断地把这种客观

事物的辯証法运动所提供的新东西用以丰富我們思想上的辯証法，用以丰富我們党領导中国革命的理論、方針、政策和策略，否則，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澤东同志所以成为中国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最杰出的代表和領袖，就是因为他执行了这样一个偉大的任务。在一定的意义上說来，他的"矛盾論"，就是中国革命所表現出的复杂而曲折的矛盾运动的产物，并且是和中国革命的一个极端复杂和极端曲折的历史时期——即抗日战爭时期相联系的。在这一个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級矛盾形成了奇特的交錯。兩类矛盾的斗爭之間的差别及其互相联結，对立的同一性；民族統一战綫內部各阶級之間的各种不同性質的矛盾和各种不同性質的斗爭，对立的同一性；根据不同的条件，民族斗爭本身有它的多面性，阶級斗爭本身又有它的多面性；各种不同的斗爭狀态的互相推移；局部斗爭和全局斗爭的互相联結；如此等等的矛盾糾纏在一起，差不多把中国革命長期中所表現出的复杂而曲折的矛盾运动都集中起来，因而也就把辯証法問題最突出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毛澤东同志临在这样一个时期，特别用力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証法，研究矛盾运动的諸問題，并把这种研究和中国革命运动的經驗結合起来，这就对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踐，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事情正是由于毛澤东同志灵活地运用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証法，使得我們同志們处在这样极端复杂的矛盾交錯的时期，能够不致迷失方向，既避免陷入"左"傾的錯誤，又避免陷入右傾的錯誤；使得我們終于摆脫了国內外敌人所放置的暗礁，把革命大踏步地推向前进，而国內外的敌人結果只好一个又一个地倒在历史的道路上。

二

列宁說，辯証法乃是"最完整深刻而沒有片面性弊病的發展学說"("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組成部分")。列宁又說："辯証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帶着对現实的任何

观察与接近之無数側面的(具有从各个側面發展成为整体的哲学体系的)認識……"("关于辯証法問題")辯証法是和片面性完全不能够相容的。

正如毛澤东同志在許多著作中所指出的：过去我們有些同志之所以犯右傾机会主义或"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就都是因为他們在思想上陷入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而片面性正是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的特点。他們沒有看到革命生活的全貌，所以他們就沒有唯物論，也沒有辯証法。

毛澤东同志在"矛盾論"中写道：

"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的同志們所以犯錯誤，就是因为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內部規律的，人們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們，不認識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認識事物的內部規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事实正是如此。

主观主义者对于事物的看法，只是固定化在他們自己設想的一些僵死的公式里面。他們特别沉溺在以下的这兩种公式：第一种公式：如果說那里有統一的东西，便也就沒有矛盾的东西。第二种公式：如果說那里有矛盾的东西，便也就沒有統一的东西。就是說，他們或者只是單独地突出一个統一的片面，或者只是單独地突出一个矛盾的片面。他們不会在統一中把握其矛盾，又不会在矛盾中把握其統一。

主观主义者把他們这些僵死的公式用在政治問題上，便完全陷于极端的荒謬，而致害于革命。例如：当一九二四——二七年間，我們党和国民党成立統一战綫的时候，右傾机会主义的思想公式，便是屬于第一种，因而在政策上形成了"一切联合，否認斗爭"的一套。又例如，当十年內战时期，"左"傾机会主义的思想公式，便是屬于第二种，因而在政策上又形成了"一切斗爭，否認联合"的另一套。

主观主义者既然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只会死板地絕对化某一个突出的片面，而在其他的历史条件下又只会死板地絕对化另一个突出的片面，因此，他們就可以时而犯右傾錯誤，又时而犯"左"傾錯誤。

毛澤东同志的"矛盾論"，在闡發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等这一系列的問題的时候，都是在警告思想的片面对于革命所必然引起的危險性。毛澤东同志着重地批判了教条主义，这就是因为我們教条主义者的片面性的狂妄無知，曾經很重大地危害过革命的緣故。

毛澤东同志用了較多的篇幅，卓絕地論述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这就是因为我們教条主义者的片面性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不懂得把握矛盾的特殊性。毛澤东同志說："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則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別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們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們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們指导革命实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教条主义者既然不懂得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从而也就剝夺了矛盾的普遍性的眞实血肉，把一般眞理"变成为人們所不能够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实际上也即是不懂得什么是事物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說明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面的錯誤，毛澤东同志特別咀嚼了列宁所指出的关于馬克思主义的主要点：即馬克思主义的最本質的东西，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什么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就是具体地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这就是如毛澤东同志所說的："不但事物發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結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們必須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發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須注意。"这又就是如毛澤东同志所說的："研究事物發展过程中的各个發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須在其联結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須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很明白，我們的教条主义者之所以不幸，就是因为他們腦子里面

失掉了这样的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們离开这一切具体的分析，因而对于革命的运动，对于一切事物，就都只能类似"盲人騎瞎馬，夜半临深池"，那是沒有不失敗的。

由各个方面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达到捉住事物發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如毛澤东同志所指出：必須捉住主要的矛盾，从而找出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又从而为繼續解决其他的矛盾开辟道路。毛澤东同志說："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兩个以上矛盾的复杂的过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但我們的教条主义者既然不去分析矛盾的特殊性，那末，对于捉住主要的矛盾这一件事，也就只好像在海底撈針一样，是永远撈不着的。例如：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經打到我国里面的时候，他們就还沒有看到所發生的矛盾的新变化。因此，他們也就不懂得去捉住这个新的突出的主要矛盾，并从而变化自己的政策。

毛澤东同志指出：要找出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就必須分别該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他說："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兩种情形，也就是說不研究这兩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將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

但我們的教条主义者既然不能够分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那末，也就不可能成功地解决任何的問題。例如：在抗日战爭时期，他們对于統一战綫的主要力量和非主要力量，就有了完全顛倒的看法，把国民党的反动力量看成抗日的主要力量，而把工人和农民的力量看成抗日的非主要力量。因此，他們也就不可能找出解决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人民这兩方面矛盾的正确的方法，同样也不可能找出解决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內部矛盾的正确的方法。

教条主义的失敗，恰恰說明了矛盾的特殊性在辯証法运动中的重要的地位，而誰如果再不去注意到这个問題，誰就还是只好等着失

敗。"我們必須以教条主义者的失敗为鑒戒。"这就是毛澤东同志在这个問題上的結論。

三

毛澤东同志不断地在世界革命的总运动中找寻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他在每一个时期內，总是联系着世界普遍性的矛盾，着重地研究与解决中国革命在發展中所遇到的种种特殊性的矛盾的問題。他善于針对着中国的政治的和經济的具体特点，灵活地运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所發現的普遍眞理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問題的学說，从而掌握中国革命的發展在其某一定时期的具体过程的特点，并且在各个时期一步一步深入地暴露中国各个方面的矛盾，使得人們在紛乱的摸索中，得到思想的光輝。

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中，中国無产阶級和民族資产阶級以国民党的各阶級革命联盟为組織形式，形成了第一次的民族統一战綫。資产阶級的人們之所以和共产党联合，是因为他們那时有和国外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軍閥的矛盾；但又因为他們有和国內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以又和共产党进行領导权的斗爭。共产党进行这个联合是正确的，必要的。在这个联合还沒有形成的时候，曾經有以張国燾为代表的从"左"方面来的片面性，其特点是不承認对立方面的統一的可能性，即不承認联合。但在这个联合业已形成之后，便特别突出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从右方面来的片面性，其特点是不承認統一中的对立，即不承認統一战綫內部的矛盾的斗爭。毛澤东同志从事关于革命敌友的矛盾的分析，关于民族統一战綫內部阶級之間的矛盾的分析，关于資产阶級內部各部分之間的矛盾的分析，便一方面反对了前一类的片面性，而另一方面又特别用大力反对了后一类的片面性，因为革命規模的發展——特别是农民革命的發展，右傾的片面性已成为党內主要的危險。

当以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国民党集团为代表的資产阶級相繼叛变了革命之后，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双方的力量之間形成了新的分化，

新的結合。我們党在毛澤东同志的領导下，不顧蔣汪国民党的叛变，独立地开辟了广闊的土地革命的道路。革命是更加深入了，但是由于蔣汪国民党的叛变，革命却遇到了新的困难。陈独秀的右傾机会主义者在这时候由原来否認統一战綫內部的矛盾而走到否認革命与反革命之間的矛盾，变成了取消主义者，随又与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合伙，因而被逐出党外。但另方面，在党內則重新出現了一些从"左"方面来的片面性。这些犯"左"傾錯誤的同志，看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銳的矛盾，但是他們否認革命的曲折性和長期性，以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間的矛盾，可以很快地在一个偶然的早上，便在全国規模上得到解决。他們看不見国民党反革命統治內部的矛盾，也看不見大地主大資产阶級在朝派与中产阶級在野派的差别和矛盾，因此他們主張的政策是"一切打倒"，以为在任何条件下都沒有什么灵活的余地，甚至以为对小資产阶級的政策都不会有什么統一战綫的可能性。他們把中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的一切政派都看成是和蔣介石一样的反革命，甚至以为它們还是比蔣介石更危險的革命敌人。在这样一个时候，毛澤东同志进一步地分析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間的矛盾的問題，这对于推动革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进，具有决定的意义。他分析了半殖民地中国長期存在的一种突出的矛盾：即一方面是在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之下的反革命統治阶級內部矛盾所形成的繼續不断的战爭，另一方面便是紅色政权能够利用統治阶級內部的矛盾并依靠自己正确的机变的政策，而在四周圍白色政权的包圍中間發生和坚持下来。他分析了这个突出的矛盾，便得出了中国革命能够而且必須經过乡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結論，預見了乡村革命根据地和一些小塊的紅色政权在長时期的斗爭中將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預見了它們將成为新的大革命和中国人民在無产阶級領导下夺取全国政权的出發点。

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者开始侵占中国大片的領土，使民族矛盾和国內矛盾又开始發生了新的变化，而当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向华北侵入的时候，就更加突出了这种变化。但我們党內原来一些

犯"左"傾錯誤的同志曾經在很長时間內看不到这种变化，随后承認了这种变化，却又由"左"的方面的片面性轉到右的方面的片面性。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爭爆發之后，他們只承認了日本侵略者和中国民族的矛盾，而完全抹煞其他的矛盾，抹煞了中国民族內部的阶級矛盾，抹煞了美英帝国主义除了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之外还有和中国民族的矛盾，因而否認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內部有左、中、右三种不同方面力量的差别，否認了在那作为美英帝国主义工具的蔣介石国民党与我們党之間对于抗日問題有反人民的路綫和人民的路綫的差别。毛澤东同志批判了这些同志忽"左"忽右的片面性的錯誤。他指出："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內阶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間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們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內阶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間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沒有減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亦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就是說，因为有民族矛盾与国內矛盾的地位的变化，所以我們党便能够重新提出并从事建立包括資产阶級在內的統一战綫；那些反对統一战綫的，正是犯了片面性的錯誤。但同时又因为抗日統一战綫內部的阶級矛盾依然存在，以及蔣介石的被迫參加抗日这一件事在实际上是反映了美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爭霸的矛盾，所以無产阶級就必須鑒戒一九三七年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轍，而在統一战綫中坚定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原則和坚定地采取又团結又斗爭的政策，力求推动矛盾的發展有利于人民，使抗日战爭胜利的結局發展为人民胜利的結局；那些認为在統一战綫中，"不分左中右"而放棄斗爭的，也正是犯了极其严重的片面性的錯誤。

在日本投降以后，毛澤东同志重新分析了世界和中国所發生的新的变化的矛盾。他指出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代替德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地位，中国人民原来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已变为中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从这个具体矛盾的分析中，毛澤东同志預見了全国人民除了繼續斗爭再無出路，

人民解放軍將由防御轉到进攻以取得完全的胜利，而蔣介石則已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他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軍复灭。

在这个时候，毛澤东同志同样地批判了从右方面来的和从"左"方面来的兩种片面性。从右方面来的片面性，乃是过高地估計敌人的力量和过低地估計人民的力量，毛澤东同志把这些叫做"軟弱無能的思想"。从"左"方面来的片面性，乃是在乡村中損害中农和破坏工商业。毛澤东同志揭露了資产阶級中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政治傾向，但同时指出了："政治上的打击与經济上的消灭是兩件事；如果混同这兩件事，我們就要犯錯誤。"因此，就使得一些同志糾正了"左"的片面性的錯誤。

当一九四九年春間，蔣介石匪軍的主力已被消灭、全国正接近完全解放的时候，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已發生了根本的变化。毛澤东同志根据这个矛盾根本变化的新形势，即指出了二十几年来中国革命以乡村为重心然后取得城市的时期已經完結，代之而起的，乃是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領导乡村的时期。毛澤东同志分析了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的所將存在的矛盾，其基本的矛盾，一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一种是国內的，即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他由这些矛盾的分析，指出了必須强化工人阶級領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同时指出了在工人阶級領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繼續巩固和發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規定了关于这些方面的种种政策。

在政治的政策上，毛澤东同志認为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我党和党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党思想和工作上确定下来"，而所要反对的片面性，一方面是右的迁就主义，另方面就是"左"的关門主义或敷衍主义。在經济的政策上，毛澤东同志認为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也必須反对右的和"左"的兩种片面性。他这样指出："如果認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义，認为可以拋棄'节制資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錯誤的，这就是右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認为应当对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为簡直可以很快

地消灭私人資本，很快地进入無产阶級專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完全錯誤的。这就是'左'傾机会主义或冒險主义的观点。"毛澤东同志反对各种片面性而規定这一切正确的政策，同时便已警告了我們党的同志对于資产阶級的"糖衣炮彈"的攻击，必須随时保持充分的警惕。

我們党所經过的历史正是这样地說明的：毛澤东同志根据时局的發展，随时捕捉当前特殊的主要的矛盾以及主要的矛盾方面，而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的指导的原理，一个一个地在理論上和政策上解决了它，由此引导我們偉大的人民不断地克服無数的困难和阻碍，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准备着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們党所經过的历史也正是这样地說明的：毛澤东同志在反对右傾与"左"傾机会主义的兩条战綫的斗爭中，总是駁斥那些或者只看到統一而沒有看到矛盾、或者只看到矛盾而沒有看到統一的片面的簡單化的錯誤，而随时根据革命生活的發展，从統一中看出矛盾，又从矛盾中看出統一，因此就正确地保証了党的政策的极大机动性。

历史同样又是这样地說明的：毛澤东同志从来不把矛盾的特殊性当作孤立的东西。他在任何研究工作中，都充分地注意到事物發展过程之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互相联結。他不論在分析任何一个具体的矛盾或解决任何一个具体的問題的时候，都不曾忽視矛盾的普遍性，而总是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这些偉大的导师的学說，从矛盾的普遍性中看出矛盾的特殊性，又从矛盾的特殊性中看出矛盾的普遍性。

毛澤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級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論"以及其他許多著作，都是从列宁和斯大林所分析的帝国主义（即垂死的資本主义）和無产阶級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这个世界主要的矛盾来研究中国革命問題的。他从世界矛盾的全局来观察中国的矛盾，同时他又从分析中国的矛盾而看出中国革命这一偉大力量所包含的世界意义，認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新民主主

义論"这个著作正是在分析問題的方法上模范地处理了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的关系，并由此在中国革命問題上發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問題是一般無产阶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一个理論。

然而不只是像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这样的大問題才有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的問題。在毛澤东同志看来，任何事物在其一定的范圍中都会有其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的問題。例如，毛澤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中曾經就战爭这一个問題說道："只要有战爭，就有战爭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爭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爭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爭的一全局。凡屬帶有要照顧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質的，都是战爭的全局。"接着他就詳細地說明了全局性和局部性的互相关系，一方面指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屬于全局性的东西的。"另方面又指出："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脫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毛澤东同志这里所說的全局性和局部性的关系，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战爭的情况是这样，其他的情况也沒有不是这样的。

很明白，如果只是限于籠統地看看矛盾的普遍性，而沒有具体地揭露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說，如果只是籠統地看看全局的东西，而沒有具体地揭露局部的东西——特别是揭露那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的东西，那末，便会犯片面性的錯誤。为什么？因为"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反之，如果只限于表面地看到矛盾的特殊性，而沒有密切地联系矛盾的普遍性，就是說，如果只是限于看到局部的东西，而沒有密切地联系全局的东西，那末，便也会犯片面性的錯誤。为什么？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屬于全局性的东西的"。

在"矛盾論"中，毛澤东同志关于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的問題，扼要地叙述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分析方法，随后即作了以下的概括：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貫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終，……所以它是共性，是絕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無个性即無共性。……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暫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絕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証法。"

深刻地說明了和發展了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辯証法的精髓，乃是毛澤东同志的貢献。

四

按照列宁的說法，革命的辯証法是"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列宁譏笑第二國际英雄們的万分迂腐，因为他們对于革命的辯証法是一竅不通的，他們完全不了解馬克思所說的在革命时期必須有极大的机变性（見列宁："論我国革命"）。

列宁在他的"論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論文中写道："如果我們想用一个字来断定全部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發表所討論的一切思想集結的中心点，那末这个字就是辯証法。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他們对之有最重要最新穎的貢献，因而在革命思想史上造成了天才进步的地方，就是运用唯物辯証法来根本改造全部政治經济学，把唯物辯証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級的政策和策略方面。"

斯大林在"無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写道："科学底历史表明着：辯証方法是眞正科学的方法……辯証法的精神貫通全部現代科学。"

由此可見，不懂得唯物辯証法，就不可能懂得馬克思主义。必須用唯物辯証法的观点来学习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因为有一个东西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全部著作的思想貫串起来的，这就是唯物辯証法。

同样地，如果沒有唯物辯証法的观点，要懂得毛澤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問題的一切著作，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毛澤东同志一切著作的思想中，有一个东西貫串起来的，这也就是唯物辯証法。

毛澤东同志不但一切著作都是借助于唯物辯証法，不但写了"矛盾論"这个專門的辯証法著作，而且还在他关于各种問題的許多著作中，对于唯物辯証法的一些重要問題，时常給我們作直接的啓示。例如：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作里面，他直接提出了关于現象和实質的辯証法問題。他說："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实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导，一进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实質，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著作里面，他直接提出了关于任务和工作方法的辯証法問題。他說："我們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沒有桥或沒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問題，过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决方法問題，任务也只是瞎說一頓。"在"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的著作里面，他直接提出了关于战爭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的辯証法問題，又如前面本文所引述的关于全局性和局部性的辯証法問題。在"論持久战"的著作里，他直接地提出了关于唯物的全面的認識論一系列的辯証法問題，而批判了主觀的和片面的認識論。在党的六屆六中全会論"学习"的著作里面，他写道："运动在發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層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时刻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絕对于这些作認眞的过細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毛澤东同志在这里也正是直接地提出了辯証法的問題。如此等等。

毛澤东同志平日不論在任何場合，总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証法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而在自己的一切工作中完全忠实于革命的辯証法。

列宁在"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写道："現实性諸要素之全部总和底展开（注意）等于辯証法的認識之本質。"毛澤东同志許多著作，例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

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爭的形势和任务”，“抗日游击战爭的战略問題”，“論持久战”，“統一战綫中的独立自主問題”，“战爭和战略問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論”，“目前抗日統一战綫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結”，“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論联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这些等等著名的論著，其特点也正在善于展开現实性諸要素之全部总和。他先分析事物矛盾發展的最初狀态，随而一步又一步地，一層又一層地深入暴露現实的一切方面、各个方面的互相交錯和互相推移，而达到关于解决矛盾的結論。

毛澤东同志在抗日战爭初期的“論持久战”和抗日战爭中期的“新民主主义論”的所以能够吸引中国的人心，使無数的中国人在困难与迷途中看到自己的光明，就是因为这些著作展开了現实性諸要素之全部总和。他对于当时具体的矛盾运动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种关系，給予了天才的分析与綜合，从头至尾地交織着革命的生活的辯証法，因而使得人們認为他的思想是不可抵抗的。

在整个抗日时期中，毛澤东同志关于政策問題的那些論著，縱横屈伸地分析各种矛盾，并根据对方的各种矛盾的方面而提出各种差别的对策，完全显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証法的非常出色的活潑潑的力量。

毛澤东同志之所以能够那样出色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証法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問題，很明显地，那是因为他是在战斗中过生活，他为人民的斗爭而研究辯証法，并用辯証法去和各种論敌作堅定的斗爭。

斯大林在“論列宁主义基础”一書上曾提到馬克思自己所說的：辯証方法“在实質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学說”。同时指出：“列宁的方法就是徹头徹尾都为这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所貫注的。”斯大林在“論辯証唯物論和历史唯物論”一書上說到辯証法这一个字的原来含义就是进行論战。他指出：“古代人所謂辯証法，就是借助于揭露对方議

論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术。”整个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所貫串的辯証法精神就是斗爭的精神。沒有斗爭就沒有辯証法。因此，任何学究决不可能懂得唯物辯証法。

毛澤东同志著作的經历，就是他应用唯物辯証法去和人民的敌人作斗爭以及和党內各种錯誤思想作斗爭的經历，而他在斗爭中又随时吸引人民斗爭的力量以增强唯物辯証法的思想。毛澤东同志在“論持久战”里面說到“自覚的能动性”。毫無疑問：凡是在革命中能够高度地發揮自覚的能动性的，便是他能够和当前具体的斗爭結合起来而高度地运用唯物辯証法。

毛澤东同志的著作“矛盾論”本身就是一个偉大的战斗的著作，它的發表，对于我們有偉大的新的意义。它將使得我們更加懂得必須如何去学习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更加懂得必須如何去学习毛澤东同志的著作。它給我們以工作的尖銳的武器，將使得我們在各个工作崗位上，更加懂得必須如何去分析具体的問題和解决具体的問題，而促进我們偉大的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經济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的新胜利。

“矛盾論”的發表，实际上也是对于我們現在所表現的力量不足和生气不足的学术界，給予了一个当头的批判。我認为我国的广大革命干部和知識分子必須熟讀毛澤东同志这个著作，从那里得到啓發。如果他們中还有如像教条主义者“从来不用腦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的作风，那就应当抛棄这种作风，而根据毛澤东同志的指示，开动自己的腦筋，在思想战綫上和学术上認眞地有所作为，以符合我們党和我們人民的希望。

（原載“新华月报”一九五二年五月号）

关於正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这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議第十一次擴大会議上的一篇講演。現在經本人根据当时記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补充。）

毛 澤 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这是一个总題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題目。在这里，也要說到敌我矛盾的問題，但是重点是討論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

一 兩类不同性質的矛盾

我們的国家現在是空前統一的。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將来，正擺在我們的面前。人民所厭惡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級和共产党的領导下，团結一致地进行着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国家的統一，人民的团結，国內各民族的团結，这是我們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証。但是，这并不是說在我們的社会里已經沒有任何的矛盾了。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眞的想法。在我們的面前有兩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

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認識敌我之間和人民內部这兩类不同的矛盾，应該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內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說，在抗日战爭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級、阶層和社会集团都屬于人民的范圍，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爭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产阶級、地主阶級以及代表这些阶級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級、阶層和社会集团，都屬于人民的范圍。在現阶段，在建設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贊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阶級、阶層和社会集团，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設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間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間說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剝削阶級和剝削阶級之間說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現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有着不同的內容。在我国現在的条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級內部的矛盾，农民阶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农兩个阶級之間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阶級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資产阶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产阶級內部的矛盾，等等。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眞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导同被領导之間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間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說来，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們国家里，工人阶級同民族資产阶級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阶級和民族資产阶級的阶級斗爭一般地屬于人民內部的阶級斗爭，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資产阶級有兩面性。在資产阶級民

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剝削工人阶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願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資产阶級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級、官僚資产阶級不同。工人阶級和民族資产阶級之間存在着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兩个阶級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轉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們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資产阶級采取团結、批評、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資产阶級不接受我們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級同民族資产阶級之間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間的矛盾。

敌我之間和人民內部这兩类矛盾的性質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簡單地說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問題，后者是分清是非的問題。当然，敌我問題也是一种是非問題。比如我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这些內外反动派，究竟誰是誰非，也是是非問題，但是这是和人民內部問題性質不同的另一类是非問題。

我們的国家是工人阶級領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这个專政是干什么的呢？專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內部的反动阶級、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剝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設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內敌我之間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將他們判罪，在一个时期內不給地主阶級分子和官僚資产阶級分子以选举权，不給他們發表言論的自由权利，都是屬于專政的范圍。为了維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盜窃犯、詐騙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須实行專政。專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顛复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現的时候，專政就担負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間的矛盾的任务。專政的目的是为了保衛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將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誰来行使專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級和在它領导下的人民。專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內部。人民自己不

能向自己專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間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專政是有原則区别的。在人民內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們的宪法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論、出版、集会、結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們的宪法又規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須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員必須为人民服务。我們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資产阶級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們的專政，叫做工人阶級領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內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級团結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級、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分子实行專政。所謂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領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态。無政府狀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

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們希望在中国也出現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們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違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內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騙，錯誤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結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騷乱，給予經济方面的損失，需要長时間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問題上表現动摇，是因为他們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們以为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議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們要求实行西方的兩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謂兩党制不过是維护資产阶級專政的一种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級斗爭的社会里，有了剝削阶級剝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劳动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产阶級的民主，就沒有無产阶級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資本主义国家也容許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产阶級

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許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馬克思主义告訴我們，民主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这个范疇。这就是說，归根結底，它是为經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絕对的，都是在历史上發生和發展的。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紀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統一体的兩个矛盾着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应当片面地强調某一个側面而否定另一个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須用社会主义的紀律約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們主張有領导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說，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是非的辨别問題，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們不信教。不能强制人們放棄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們相信馬克思主义。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領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領导者發布各种适当的帶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無法維持，这是人們的常識所了解的。这同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內部的矛盾，是相輔相成的兩个方面。为着維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發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單靠行政命令，在許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把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結——批評——团結"。講詳細一点，

就是从团結的願望出發，經过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按照我們的經驗，这是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們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內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員群众之間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馬克思主义思想之間的矛盾。"左"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內斗爭方法叫做"殘酷斗爭，無情打击"。这是一个錯誤的方法。我們在批評"左"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沒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結的願望出發，經过批評或者斗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經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結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偉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結的願望出發。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沒有团結的願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殘酷斗爭，無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結？从这个經驗里，我們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結——批評——团結。或者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們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們处理領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軍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軍队之間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間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偉大的成功。这个問題，在我們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們在南方建立革命軍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軍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內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們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覺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們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結——批評——团結"这个方法。我們現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內部繼續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們內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覺，麻痺大意，也可能發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暫时的現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

灭了人剝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現的那种范圍相当寬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內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原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暫时的現象。社会主义国家內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結，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挑撥离間，兴风作浪，企圖实現他們的陰謀。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訓，值得大家注意。

許多人覚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一个新的問題。事实并不是这样。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認为無产阶級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間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須采取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許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則。我們历来就主張，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这兩类不同性質的矛盾，采用專政和民主这样兩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們党的过去的許多文件里和党的許多負責人的言論里，曾經說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里曾經說过：

"对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解决人民內部的問題，"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議上的講話里，又說过："人民民主專政有兩个方法。对敌人說来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时期內，不讓他們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們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們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們成为新人。对人民說来則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們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进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們已經多次講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內部矛盾这个問題，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問題。为什么現在又有人覚得这是一个新問題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內外的敌我斗爭很尖銳，人民內部矛盾还不

像現在这样被人們注意的原故。

許多人对于敌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这兩类性質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該承認，这兩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們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經混淆过。在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錯誤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現在也还有。我們的錯誤沒有扩大化，是由于我們在政策中規定了必須分清敌我，錯了就要平反。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認为，对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这个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說来，对立的統一是有条件的、暫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爭則是絕对的。这个規律，列宁講得很清楚。这个規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漸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許多人說来，承認这个規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規律去观察問題和处理問題又是一回事。許多人不敢公开承認我国人民內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們的社会向前發展。許多人不承認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会矛盾面前縮手縮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將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內部的統一和团結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釋，引导人們認識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現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現为剧烈的阶級斗爭，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济基础之間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

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况罢了。我国現在的社会制度比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够容許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長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滿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下，生产力的發展一直是非常緩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間，全国除东北外，鋼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鋼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鋼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沒有机器制造业，更沒有汽車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現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資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許多人在这个問題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經回答了这个問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發展，这一点，甚至連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認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剛剛建立，还沒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資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剝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說，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質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質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問題上，还需要繼續解决。在各經济部門中的生产和交換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則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經济和集体所有制經济里面，在这兩种社会主义經济形式之間，积累和消費的分配問題是一个复杂的問題，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經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發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發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

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層建筑和經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識形态，这些上層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組織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資产阶級意識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構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相矛盾的。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体的情况，繼續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將会長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时常經过国家計划去調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經济計划，安排积累和消費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时的相对的統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說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爭所打破了，这种統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統一成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这就是我們計划經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發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断出現，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証規律。

現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級斗爭基本結束，但是阶級斗爭还沒有完全結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問題，应当繼續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說，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繼續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慣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經驗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們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內部兩类矛盾的界綫，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团結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場新的战爭——向自然界开战，發展我們的經济，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較順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　肃反問題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問題是敌我矛盾的斗爭問題。在人民內部，有些人对于肃反問題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兩种人的意見，和我們的意見不相同。有右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認敌为我。广大群众認为是敌人的人，他們却認为是朋友。有"左"傾思想的人則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內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兩种看法都是錯誤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問題，也不能正确地估計我們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計我国的肃反工作，我們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于我們国家的影响。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有些动蕩，但是沒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該說，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相当徹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們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們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們有經过几十年革命斗爭鍛煉的共产党和解放軍，有經过几十年革命斗爭鍛煉的劳动人民。我們的党和軍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長期革命火焰中鍛煉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們的人民共和国是經过革命根据地逐步發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鍛煉，同我們共过患难。有些知識分子經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爭的鍛煉，許多人經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們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們的經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們对于民族資产阶級和其他阶級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們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無疑是我們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們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許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愛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們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沒有發生波动。民族資产阶級也是这样。更不要說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們肅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長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惡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們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說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經肅清。我們的根本任务已經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發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們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肅反工作的巨大成績，这是完全錯誤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許的。

我們的肅反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錯誤。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們的方針是："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我們在肅反工作中的路綫是群众肅反的路綫。采取了群众路綫，工作中当然也会發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較少一些，錯誤会比較容易糾正些。群众在斗爭中得到了經驗。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經驗。犯了錯誤，也得了犯錯誤的經驗。

在肅反工作中，凡是已經發現了的錯誤，我們都已經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糾正的步驟。沒有發現的，一經發現，我們就准备糾正。原来在什么范圍內弄錯的，也应該在什么范圍內宣布平反。我提議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总結經驗，發揚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員会和政协委員会主持。在檢查工作的时候，我們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潑冷水，而要帮助他們。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潑冷水是不对的。但是發現了錯誤，一定要改正。無論公安部門、檢察部門、司法部門、监獄、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該采取这个态度。我們希望人大常务委員、政协委員、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檢查。这对于健全我們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兩句話来說明：还有反

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說，已經沒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覚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說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單位都有），还必須繼續和他們作斗爭。必須懂得，沒有肅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們必定要乘机搗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蔣介石集团經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們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肅清了，还可能出現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們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說，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說現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見也是錯誤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計，結果也会搞乱。

三　農業合作化問題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經济的發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認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經济之間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耽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勁，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那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現在有一些人却在說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沒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沒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場上發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們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經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絕大多数的社員成了余粮戶。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該能做到，或者时間長一点也应該能做到。由此可見，那些說合作化不好了的議論是沒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長都是要經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經

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順，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絕大多数貧农和下中农，他們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眞正不滿意的只占极少数。許多人沒有分析这种情况，沒有对合作社的成績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間刮起了一陣所謂合作社沒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間合作社才能巩固，認为合作社沒有优越性的議論才会收場呢？根据許多合作社發展的經驗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間。現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們就要求它們那么好，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計划期內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計划期內合作社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經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間，在合作社內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間，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我們必須經常注意从生产問題和分配問題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問題上，一方面，合作社經济要服从国家統一經济計划的領导，同时在不違背国家的統一計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經营的經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計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計划。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須处理适当，經常注意調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們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許多人說农民苦，这种意見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說来是对的。这就是說，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們的代理人压迫剝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識分子、

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間，經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將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說"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說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說，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沒有改善，單單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經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剝削，生产逐年發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將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購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兩項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銷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鎮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說农民生活沒有改善。我們准备在几年內，把征粮和購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發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現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戶不再缺粮，除了專門經营經济作物的某些农戶以外，通通变为余粮戶或者自給戶，使农村中沒有了貧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簡單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較，說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費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說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資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員的工資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滿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調整，是必要的。

四　工商业者問題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順利，是跟我們把工人阶級同民族資产阶級之間的矛盾当做人民內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級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沒有。还要經过相当的时間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現在

有些人說，資本家已經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說，資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說，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級不改造？这些議論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誰說工人阶級不要改造？当然，剝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兩种不同性質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談。工人阶級要在阶級斗爭中和向自然界的斗爭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級必須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們这些人来說，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說，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馬克思主义的思想，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書本上学了一点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長期阶級斗爭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繼續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則就要落后了。难道資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嗎？

有人說，中国資产阶級現在已經沒有兩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資产阶級分子已經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員，正处在由剝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轉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們現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說，他們的剝削根子还沒有脫离。他們同工人阶級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慣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說已經沒有了兩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資产阶級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間繼續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認为資产阶級已經沒有了兩面性，那末資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沒有了。

应該說，这种意見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願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願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徹底改造必須是在工作中間，他們应当在企业內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經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願为基础。許多工商业者在講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

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語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們从亲身的經驗懂得，繼續学习，繼續改造自己，对于他們是有益的。剛才所說的那种認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見，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見，只是少数人的意見。

五　知識分子問題

我国人民內部的矛盾，在知識分子中間也表現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識分子，現在轉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們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們如何帮助他們适应新社会需要的問題。这也是人民內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識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經有了显著的进步。他們表示贊成社会主义制度。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經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漸增多。当然，知識分子中間有一些人現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識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眞正願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識分子，我們都应当給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关系，帮助他們解决各种必須解决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积极地發揮他們的才能。我們有許多同志不善于团結知識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預那些不应当干預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須加以克服。

广大的知識分子虽然已經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滿。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抛棄資产阶級的世界观而树立無产阶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轉变是一个根本的轉变，現在多数知識分子还不能說已經完成了这个轉变。我們希望我国的知識分子繼續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

地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經起了变化，資产阶級思想的經济基础已經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識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徹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長的时間，我們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終不願意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不願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們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們就应当給他們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間，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減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沒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陣，現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針对着这种情况，現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論是知識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該努力学习。除了学习專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沒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沒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須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門都要負責任。共产党应該管，青年团应該管，政府主管部門应該管，学校的校長教师更应該管。我們的教育方針，应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發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覚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們懂得，我們的国家現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間內根本改变这种狀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間內，团結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創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給我們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現还要靠我們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費气力享受現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六　少数民族問題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約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問題的关鍵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間，則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無論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結，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內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問題。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須給以足够的注意。經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絕大部分都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沒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議，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須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領袖人物認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現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計划期內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七　統筹兼顧、適当安排

这里所說的統筹兼顧，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划、办事、想問題，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發，千万不要忘記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問題；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縮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們，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結一切可能团結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將消极因素轉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設社会主义社会这个

偉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眞正承認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認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們的本錢。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們各方面的建設事业都在蓬勃地發展着，成績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問題还是很多的。又發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适当安排。無論粮食問題，灾荒問題，就业問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种爱国力量的統一战綫問題，少数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統籌兼顧这个观点出發，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煩难办，推出門外了事。我这样說，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們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統籌兼顧、适当安排的方針之內，我們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認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發展經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进艺术發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針，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針。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們認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發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問題，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討論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踐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錯誤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时間。历史上

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認，只能在斗爭中曲折地發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們一开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哥倫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說，达尔文的进化論，都曾經被看作是錯誤的东西，都曾經經历艰苦的斗爭。我国历史上也有許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長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見，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鑒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長。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愼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要輕率地作結論。我們認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較順利的發展。

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爭中發展起来的。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認为是毒草。現在它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还在繼續受打击，还被認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来，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級的残余还是存在，資产阶級还是存在，小資产阶級剛剛在改造。阶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的阶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阶級斗爭，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阶級斗爭，还是長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無产阶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資产阶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沒有眞正解决。無論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馬克思主义仍然必須在斗爭中發展。馬克思主义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現在是这样，將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錯誤的东西作斗爭的过程中發展起来的。眞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东西相比

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当着某一种錯誤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棄，某一种眞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眞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这种斗爭永远不会完結。这是眞理發展的規律，当然也是馬克思主义發展的規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誰胜誰負的斗爭，还需要一个相当長的时間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資产阶級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長期存在，作为阶級的意識形态，还要在我国長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会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思想斗爭同其他的斗爭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細致的講理的方法。現在社会主义在意識形态的斗爭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無产阶級領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們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錯誤，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們对人民是忠誠的，我們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設好，我們已經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將繼續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資产阶級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們願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領导的劳动人民，他們就会無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們問：在我們国家里，馬克思主义已經被大多数人承認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評呢？当然可以批評。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眞理，它是不怕批評的。如果馬克思主义害怕批評，如果可以批評倒，那末馬克思主义就沒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評馬克思主义嗎？抱着資产阶級思想、小資产阶級思想而不願意改变的人們，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評馬克思主义嗎？馬克思主义者不应該害怕任何人批評。相反，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斗爭的风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陣地。同錯誤思想作斗爭，好比种牛痘，經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

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并不会削弱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領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該采取什么方針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剝夺他們的言論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內部的錯誤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許这些思想有任何發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对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讓發表錯誤意見，結果錯誤意見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見如果是在溫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沒有見过风雨，沒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錯誤意見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才能眞正發展正确的意見，克服錯誤的意見，才能眞正解决問題。

資产阶級、小資产阶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种办法頑强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讓他們表現，而应当讓他們表現，同时在他們表現的时候，和他們辯論，进行适当的批評。毫無疑問，我們应当批評各种各样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着錯誤思想到处泛濫，任憑它們去占領市場，当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爭。但是这种批評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辯証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說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評不能解决問題。我們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們必須謹愼地辨别什么是眞的毒草，什么是眞的香花。我們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謹愼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爭。

我們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須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傾机会主义，是一种資产阶級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义者，右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馬克思主义，他們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們所攻击的正是馬

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們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証法，反对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产党的領导，反对或者企圖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复資本主义制度，他們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級进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而在这个斗爭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这兩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沒有阶級性的，無产阶級可以利用它們，資产阶級也可以利用它們，其他的人們也可以利用它們。所謂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級、阶層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們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們的言論和行动的是非呢？我們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則，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張，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規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結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專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領导，而不是摆脫或者削弱这种領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結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結，而不是有損于这些团結。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領导兩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發展对于各种問題的自由討論，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討論。不贊成这些标准的人們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来辯論。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沿着正确的軌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鑒别人們的言論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鑒别科学論点的正确或者錯誤，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違反这几条政

治标准的嗎？

以上所說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發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們并不認为，它們必須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長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經經过了好几年的醞釀。長期共存的思想已經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讓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級政党長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屬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結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們沒有理由不对它們采取長期共存的方針。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議上，就已經这样說过：“只要誰肯眞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內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貫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廢，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說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長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長期共存，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我們的方針。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長期存在下去，不是單由共产党一方面的願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現，要看它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見，作批評。所謂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單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讓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員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們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間所提的意見，所作的批評，也只有在合乎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發揮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們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爭取和共产党一道長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九　关于少数人鬧事問題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發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課的事件。这些人鬧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領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錯誤，有一些是要由上級机关負責，不能全怪下面。鬧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員鬧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領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該承認：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長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經驗和社会生活經驗，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經怎样經历千辛万苦的斗爭才摆脫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經过怎样的長时間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間經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經常把發生的困难向他們作眞实的說明，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們是不贊成鬧事的，因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結——批評——团結"的方法去解决，而鬧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發展。我們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决不無故鬧事。但是这并不是說，在我国已經沒有了發生群众鬧事的可能性。在这个問題上，我們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發生鬧事的問題。(二) 如果由于我們的工作作得不好，鬧了事，那就应当把鬧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鬧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

沒有解决的問題。应当在处理鬧事的过程中，进行細致的工作，不要用簡單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鬧事的帶头人物，除了那些違犯刑法的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輕易开除。在我們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鬧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們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們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顧公共利益、蛮不講理、行凶犯法的人。他們可能利用和歪曲我們的方針，故意提出無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謠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們并不贊成放縱他們。相反，必須給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則是違反群众意願的。

十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講过的，在我們的社会中，群众鬧事是坏事，是我們所不贊成的。但是这种事件發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說来，坏事也可以轉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們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們在事件的發展过程中間处理得正确，結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轉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現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訓。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發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鍛煉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級，这就变成好事。在許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員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願意繼續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員更好团結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們必須学会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

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結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說过:"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敗。但是在中国的失敗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敗。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証明了嗎?

現在世界各国的人們都在談論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問題,我們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們是坚持和平反对战爭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發动战爭,我們也不要害怕。我們对待这个問題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兩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陣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發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轉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潰。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爭的結果,無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轉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条件,斗爭着的双方都不会轉化。世界上最願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無产阶級,其次是半無产阶級,因为一則全無所有,一則有也不多。現在美国操縱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暫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無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將变为富国,無权將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結一致的奋斗。

十一　关于節約

我想在这里談一下节約的問題。我們要进行大規模的建設,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約,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們反对过貪汚、浪費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貪汚。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約,重点是在非生产性

的基本建設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約原料，成績很大。那时，节約的方針还沒有在国民經济各部門中認眞地推行，也沒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認眞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約，反对浪費。我們对建設工作还缺乏經驗。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績，同时也有浪費。我們必須逐步地建設一批規模大的現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沒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內变为現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遺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較少的錢办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約反对浪費的方針以后，几个月来已經开始發生效果。这一次节約运动必須徹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費，同批判其他缺点錯誤一样，好比洗臉。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臉嗎？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無党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們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約，反对鋪張浪費。这不但在經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中間，現在滋長着一种不願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計較个人名利的危險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們在增产节約运动中要求精簡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險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經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經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間，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約、反对浪費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針。

十二　中国工業化的道路

这里所講的工业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业、輕工业和农业的發展关系問題。我国的經济建設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須肯定。但是同时必須充分注意發展农业和輕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發展工业必須和發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沒有农业，就沒有輕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場这一点，目前还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發展，农业的日益現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設、电力建設、运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場的情况，將会易于为人們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計划和第三个五年計划期間，如果我們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發展，使輕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發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經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輕工业發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会更快地發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經过三个五年計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間，我国的鋼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發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經济問題今天不准备多講。經济建設我們还缺乏經驗，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經驗。对于革命我們开始也沒有經驗，翻过觔斗，取得了經驗，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們要求在取得經济建設方面的經驗，比較取得革命經驗的时間要縮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費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須懂得，在这个問題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經济發展的客观規律和我們主观認識之間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踐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將表現为人同人之間的矛盾，即比較正确地反映客观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們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們必須認眞学习苏联的先进經驗。苏联建設社会主义已經有四十年了，它的經驗对于我們是十分宝貴的。大家看吧，誰給我們設計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給我們沒有？英国給我們沒有？他們都不給。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

会主义国家，是我們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給了我們一些帮助。完全不錯，一切国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資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兩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腦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們有益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結，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这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亞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們应当巩固和發展同它們的团結。有了这兩种力量的团結，我們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們也要团結那里的人民，并且爭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發生的战爭，但是决不可以对他們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六月單行本排印）

学习文件

第一部分

关于阶級斗爭，民主和專政

共产党宣言(摘錄)

馬克思　　恩格斯

(一) 資产者与無产者㊀

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㊁都是阶級斗爭的历史。

自由民与奴隶，貴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东㊂与帮工，簡言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終是处于互相对抗的地位，进行着不断的，有时是隐藏，有时是公开的斗爭，每次結局若不是全部社会結構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斗爭阶級同归于尽。

在先前各个历史时代，我們差不多到处都可以看見社会完全分成为各个不同的等級，——可以看見各种不同的社会地位構成头整整一串阶梯。在古代罗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和奴隶；在中世紀有封建領主、陪臣、行东、帮工和农奴，并且几乎其中每个阶級里面又有一些特别的等第。

㊀ 資产阶級是指的現代資本家阶級，即由占有社会生产資料而使用雇佣劳动者組成的阶級。無产阶級是指的現代雇佣工人阶級，即由沒有自己的生产資料而不得不靠出卖自己劳动力来維持生活者組成的阶級。（这是恩格斯为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加的附注。）

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現代資产阶級社会，并沒有消灭掉阶級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級，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爭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

但現今这个时代，即資产阶級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級矛盾簡單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兩大敌对的陣营，兩大互相对抗的阶級，即資产阶級与無产阶級。

从中世紀的农奴中間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級中間發育了最初的資产阶級分子。

美洲以及环繞非洲航路的發現，給兴起着的資产阶級开辟了新的活动場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貿易，交換工具以及一般商品的增加，給予了商业、航海事业和工业一种空前未有的刺激，因而也就使崩毀着的封建社会里所产生的革命顧素迅速地發展起来。

先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組織已不能滿足随着新市場的增大而增大起来的需求了。于是便有手工工場起而代之。行东被工业的中層等級挤倒了；各个行业組合間的分工也就从此消灭而由單个作坊內部的分工所代替了。

但市場总是在扩大着，需求总是在增加着。工場手工业也不能滿足这种需求了。于是蒸汽和机器便在工业中实現了一个革命。現

㊀ 即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在一八四七年間，关于社会史前狀态，即关于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組織，几乎还完全無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生發現了俄国村社公共土地占有制，羅列尔訊明这种占有制是一切日耳曼部落历史發展所由肇源的社会基础，从而逐漸查明土地公有的农村公社乃是或曾經是从印度起到愛尔蘭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又因發現出氏族的眞实本質及其在部落中的地位而集了此事的大成，于是便把这个原始共产社会的标本內部結構闡明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就开始分成了特别的，終究彼此对抗的阶級。这一解体过程，我曾在一八八六年斯圖加特再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書中企圖加以考察。（这是恩格斯为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加的附注。）

㊁ 所謂行东就是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員，他是行会內部的工匠，而不是行会的首長。（这是恩格斯为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加的附注。）

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場手工业；工业的富豪，整批产业軍的統領，即現代的資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層等級。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准备好了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引起了商业、航海事业和陆路交通工具极大規模的發展。这种發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范圍的扩大，并且按照工业、商业、航海事业和鉄路交通發展的程度，資产阶級也在同样的程度內發展了起来，逐漸增加着自己的資本，將中世紀遺留下来的一切阶級都排挤到后面去了。

由此可見，現代資产阶級本身原是一个長期發展过程的产物，原是生产和交換方式多次变革的产物。

資产阶級这样發展一步，政治势力也增进一步㊀。它在封建主統治时期是个被压迫的等級，在公社㊁里面是个武裝和自治的团体，在这些地方組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别一些地方又組成为君主国中納稅的第三等級㊂；后来，在工場手工业时期，它在等級制的君主国里或在專制的君主国里成为对抗貴族的势力和一般巨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自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場确立时起，資产阶級又在現代的代議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統治权。現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資产者阶級共同事务的委員会罢了。

資产阶級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資产阶級在凡是它已达到統治的地方，就都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醇朴的关系一一破坏。它無情地斬断了那些把人們系縛于其

㊀ 在恩格斯校訂的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上，“政治势力”几字以前加有“这个阶級的”几字。——編者注

㊁ 法国新兴城市甚至在其尚未从封建領主那里爭得地方自治权和“第三等級”政治权利以前已称为“公社”。一般說来，此地是將英国当作資产阶級經济發展的典型国度看待，而將法国当作資产阶級政治發展的典型国度看待的。（这是恩格斯为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加的附注。）

意法兩国市民从他們的封建領主那里买得或爭得了最初的自治权以后，便把自己的城市团体称为公社。（这是恩格斯为一八九〇年德文版加的附注。）

㊂ 在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上，“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几字后面加有“（如在意德兩国）”几字，“君主国中納稅的第三等級”几字后面加有“（如在法国）”几字。——編者注

"天然尊長"的复杂封建羈絆，它使人与人之間除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之外，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發的宗教虔誠，义俠血性和俗人温情一概淹沒在利己主义計較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身价变成了交換价值，它把無数特許和几經掙得的自由都用一个沒心肝的貿易自由来代替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無耻直截殘酷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剝削。

資产阶級抹去了所有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上面的神聖光彩。它把医生、律师、牧师、詩人和学者变成了它拿錢雇佣的僕役。

資产阶級撕破了家庭关系上面所籠罩着的温情脉脉的紗幕，并把这种关系化成了單純金錢的关系。

資产阶級揭示出，中世紀时代那种深受反动势力贊賞的蛮勇举动，原是以懶惰逸乐习气为其自然补充的。它第一次表明了人类的活动能够达到怎样的成就。它創造了根本与埃及金字塔、罗馬水道以及哥特式教堂不同的艺术奇蹟；它举行了完全与民族大迁移以及十字軍东征異趣的远征。

資产阶級除非使生产工具經常發生变革，因而除非使生产关系，亦即除非使全部社会关系革命化，便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先前所有一切工业阶級賴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要始終不变地保全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經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接連不断的震蕩，恆久的不安定与变动，——这便是資产阶級时代与先前所有一切时代不同的特征。一切陈旧凝固的关系，都連同那些与其相当的历来被尊崇的見解与观点破坏下去；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是等不到凝結就成为陈旧的了。一切等級制的和凝固的东西尽行消散，一切神聖的东西概被褻瀆，于是人們到底也就只好用冷靜的眼光来看待他們自己的生活境遇和他們彼此間的相互关系了。

資产阶級由于需要有不断增加的产品銷路，乃不得不奔走于全球各地。它不能不到处鑽营，到处棲止，到处建立联系。

資产阶級既已掊取着世界市場，于是就使所有一切国度的生产

和消費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抽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有的各个民族工业部門都被消灭，并且每天还在繼續被消灭下去。它們被新的工业部門挤倒下去，采用这种新的工业部門已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問題，这种部門加工制造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最遙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并且它們所出产的制造品已經不只是供本国內部消費而且是供世界各处消費。旧时的需要是用国貨就能滿足的，而新有的需要却一定要仰給于距离极远国度和气候悬殊地帶所出产的貨物来滿足了。先前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閉塞狀态以及單靠本地出产品来維持生存的狀况已經消逝，現时各个民族都已經是在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在各方面互相依賴了。物質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成果已成为共同的享受物。民族的片面性和偏狹性日益失去立足的地位，于是从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中便形成出一个全世界的文学。

資产阶級既將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使交通工具极臻便利，于是就把所有一切以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进文明的漩渦了。它那种商品的低廉价格，便是它用以摧毀一切万里長城，征服野蛮人最頑强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資产阶級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自己那里施行所謂文明制度，即变为資产者。簡言之，它按照自己的形像来为自己創造出一个世界。

資产阶級已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它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因而使頗大一部分居民脫离了愚昧的乡村生活。正好像它使乡村屈服于城市一样，它同样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度屈服于文明的国度，使农民的民族屈服于資产阶級的民族，使东方屈服于西方。

資产阶級日甚一日地把生产資料、財产以及人口的分散狀态消灭下去。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資料集中起来，使財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由此必然發生的結果便是政治的集中。原先各自独立的，差不多只是由联盟关系結合起来的，各有其單独利益、單独法律、

單独政府和單独税則的各个地区，此时已經团結成为一个具有統一政府、統一法制、統一民族阶級利益以及統一税关的民族了。

資产阶級占得阶級統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而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先前一切世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宏偉众多。自然力的被征服，机器的采用，工农业上化学的应用，輪船的行駛，鉄路的交通，电报的傳达，一洲一洲大陆的墾殖，河川的通航，好似从地底下呼喚出来的大量人口，——試問从前哪一个世紀能料想到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沉眠在社会劳动里面呢！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資产阶級所靠着形成起来的生产和交換工具，是在封建社会里面造成的。当这种生产和交換工具發展到一定程度时，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換在其中进行的那种关系，封建制的农业和工业組織，一句話，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复适合于业已發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不是促进生产而是阻碍着生产。它們已变成了束縛生产的桎梏。它們不免要被打破，而它們果然被打破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爭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即資产阶級在經济上政治上的統治。

現时在我們眼前又發生着类似的运动。現代的資产阶級社会連同其資产阶級的生产和交換关系，連同資产阶級的所有制关系，曾經像用魔术一样造成了非常龐大的生产和交換工具，現在它却已經好像一个术士那样不能再把它用符咒呼喚出来的魔鬼鎮伏下去了。所以，数十年以来的工商业史不过是現代生产力反叛現代生产关系，即反叛作为資产阶級及其統治地位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为了証明这点，只要指出周期重复發生而愈益凶猛地危及全部資产阶級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每当商业危机的时候，不仅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毀灭下去，并且很大一部分业已造成的生产力也被毀灭下去。在危机期間爆發出一种在先前一切时代看来不免覺得是种荒唐現象的社会瘟疫，即爆發出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轉瞬間回复到突然到来的野蛮狀态，仿佛是飢荒或普遍毀灭的战爭把社会所有一切生活資料都尽行吞噬了，仿佛是工商业尽被消灭了，——試

問这是什么緣故呢？就是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資料数量太多，工商业規模太大。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不复促进資产阶級文明和㊀資产阶級所有制关系的發展；恰恰相反，生产力已經增長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納的地步，資产阶級的关系已在阻碍着生产力的發展；而当生产力一开始实行打破这种障碍时，就使得全部資产阶級社会陷于混乱，就使得資产阶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資产阶級的关系已是过于狹隘，再容納不了它們所造成的財富了。——試問資产阶級是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的呢？一方面是不得不毀灭大批生产力，另一方面則是夺取新市場和加紧搾取旧市場。究竟是用怎样一种办法呢？原来就是用准备着更普遍更厉害的危机并减少着防止危机的办法。

先前資产阶級用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那种武器，現在却对准着資产阶級自身了。

然而資产阶級不仅煉好了致自身于死命的武器；它同时还产生了將运用这一武器来反对它自身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产者。

資产阶級即資本愈發展，無产阶級即現代工人阶級也愈益發展起来；現代的工人只有当他們能找到工作时才能够生存，但他們又只有当他們的劳动还能增殖資本时才能够找到工作。这些不能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也如其他一切貨物一样是一种商品，所以他們也是不免要受到竞爭方面一切偶然現象的影响，不免要受到市場方面一切漲落情况的影响。

由于机器采用范圍和分工程度的增加，無产者的劳动已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質，因而也就失去了任何引起工人兴趣的作用。工人已变成为不过是机器的附屬品，他所必須担任的已只是些最簡易、最單調、极容易学会的动作。因此，用在工人身上的耗費，也就差不多只限于为維持工人生命和延續工人后代所必需的一份生活資料。但一切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㊁的价格，都是与其生产費用相等的。因

㊀ 在从一八七二年德文版起以后各次版本中，"資产阶級文明和"几字从略。——編者注

此 劳动的趣味愈是减低，工資也就愈益减少。况且，机器采用愈广，劳动分工愈細，劳动数量㊂也就愈益增加，这或是由于工作时間的延長，或是由于在一定时間内需要的劳动数量的增加，由于机器动作的加速等等。

現代工业已將宗法行东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資本家的大工厂。拥挤在工厂里面的工人群众就像兵士一般被編制起来。他們是工业軍的普通兵卒，受着整批軍士和軍官的層層监視。他們不單是資产者阶級的奴隶，不單是資产阶級国家的奴隶，——他們每日每时都被机器，被监工，首先是被各該工厂主資产者本人奴役着。这种專横制度越是公开宣布它的目的只在于發財，那它也就显得越發刻薄，越發可憎，越發令人痛恨。

手工劳动所需要的技巧和气力愈少，換句話說，現代的工业愈發达，則男工劳动也就愈益受到女工和童工劳动的排挤。对于工人阶級說来，性别与年齡上的差别已沒有任何社会的意义了。他們都是些劳动器具，不过因其性别和年齡上不同而需要有多寡不一的耗費罢了。

当工厂主对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而工人終究領到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时候，馬上就有資产阶級中的另一部分人，即房东、店主和高利貸者等等，跑来向工人进攻。

中等等級的下層，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分子、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級都降落到無产阶級队伍中来，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們的小資本不够来經营大工业企业，經不住同大資本家进行的竞爭；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們的專門技艺已被新生产方法弄得一錢不值了。無产阶級的队伍就是这样由民間各个阶級中的分子

㊂ 后来馬克思指明出，工人所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关于这点，可参看本卷第四七至五五頁所載恩格斯为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一書作的导言。——編者注

㊃ 在一八八八年的英文版上，"劳动数量"字样已改为"劳动緊重程度"。——編者注

充实起来的。

無产阶級經历了各种發展阶段。它反对資产阶級的斗爭，是从它本身开始存在的那天开始的。

起初是个别的工人，尔后是某一工厂中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某一劳动部門中的工人，向着那直接剝削他們的單个資产者作斗爭。他們施行的打击不仅是反对資产阶級生产关系，并且是反对生产工具本身；他們破坏那些竞爭的舶来品，搗毀机器，放火焚燒工厂；他們企圖用强力来恢复那已經失去了的中世紀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們还是分散于全国各处而为互相竞爭所分裂的人群。此时工人群众的团結还不是他們本身联合的結果，而不过是資产阶級联合的結果，当时資产阶級为了达到它自己的政治目的，曾不免要發动并且暫时还能够發动整个無产阶級。所以，在这个阶段上，無产阶級还不是和自己的那些敌人作战，而是和自己的那些敌人的敌人們，即和君主專制的余孽、地主、非工业資产者以及小資产者們作战。因此，当时全部历史运动是操縱在資产阶級手中；在这种条件下所爭得的每次胜利都是資产阶級的胜利。

然而随着工业的發展，無产阶級不仅在数量上增加起来；它集合成为广大的群众，它的力量日益增加，而它也就越發覚察到自己这种力量。机器使各种劳动間的差别愈益消失，使工資差不多到处都降到同样低微的水平，因此無产阶級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就愈益趋于一致了。由于資产者中間日益加厉的竞爭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危机，遂使工人的工資越發动摇不定；由于机器愈益迅速發展和繼續不断改良，遂使無产者的生活狀况越發沒有保障；个别工人与个别資产者間的冲突愈益成为兩个阶級間的冲突。工人們开始是成立反对資产者的同盟㊀；他們共同發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工資。他們甚至建立起經常的团体，以便一旦發生冲突时使自己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爭往往轉变成为公开的起义。

㊀ 在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上，"同盟"一語后加有"(职工会)"字样。——編者注

工人們有时也获得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暫时的。他們斗爭的眞实成果并不是直接的成功，而是工人們愈加扩大的团結。促进这种团結的是由大工业所造成的愈益發达的交通工具，因为这种交通工具使各地工人彼此發生联系。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許多地方范圍內發生而到处性質相同的斗爭集中成为一个全国范圍的阶級对阶級的斗爭了。而一切阶級斗爭都是政治的斗爭。中世紀的市民因交通梗阻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团結，現代的無产者因有鉄路交通便利只消几年就可达到了。

無产者这样組織成为阶級，因而組織成为政党一事，时时刻刻因工人們自相竞爭而受到破坏。但这种組織总是繼續不断地重新發生，并且每次都来得更为有力，更为坚固，更为强大。它乘資产阶級各个阶層互相爭执机会要挟用立法手續承認工人們的某些利益。例如在英国頒布过十小时工作制的法律。

一般說来，旧社会內部的冲突在許多方面都促进着無产阶級的發展。資产阶級进行着不断的斗爭：起初是反对貴族，后来又反对資产阶級中那些利益与工业进步相抵触的部分，并且还經常反对一切外国資产阶級。它在所有这一切战斗中都不免要向無产阶級呼吁，不免要向無产阶級求援，因而也就不免要把無产阶級卷入到政治运动中来。所以，資产阶級自己將自己的知識原素㊀授給無产阶級，即將反对資产阶級自身的武器授給無产阶級。

其次，我們已經看見，工业的进步將統治阶級中整个个的阶層抛到無产阶級队伍里去，或至少也使他們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們也給無产阶級帶来大量的知識原素㊁。

最后，在阶級斗爭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統治阶級內部，整个旧社会內部瓦解的过程便来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銳，致使統治阶級中有

㊀ 在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上，"自己的知識原素"字样改为"自己的政治知識和普通知識原素"。——編者注

㊁ 在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上，"知識原素"字样改为"啓导原素和进步原素"。——編者注

一小部分人脫离出去而归附于革命阶級，即归附于未来主人翁的阶級。所以，正如先前有一部分貴族分子曾轉到資产阶級方面一样，現在也有一部分資产阶級分子轉到無产阶級方面来，而这便是已經进步到在理論上認識全部历史运动进程的那一部分資产者思想家。

在現时与資产阶級对立的一切阶級中，只有無产阶級才是眞正革命的阶級。其余一切阶級都随着大工业的發展而趋于衰落和灭亡，無产阶級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等等級，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都是專为挽救他們这种中等等級生存地位于灭亡而与資产阶級作斗爭的。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們并且是反动的，因为他們企圖使历史車輪倒退。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就是因为他們行將落入無产阶級的队伍，因为他們不是捍衛着他們現时的利益而是捍衛着他們將来的利益，因为他們抛棄他們固有的观点而接受無产阶級的观点。

流氓無产阶級乃是旧社会最下阶層腐化过程的消极产物，它虽間或被無产阶級革命卷入到运动中来，但它的全部生活狀况都更使它甘願受人收买去干反动勾当。

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無产阶級的生活条件中間已經消灭了。無产者是沒有私产的；他对妻子兒女的关系是与資产阶級的家庭关系全然不同了；現代的工业劳动，以及無論在英国或法国、無論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現代的資本压迫，已使無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了。法律，道德，宗教，——所有这些在他看来尽是掩盖資产阶級利益的資产阶級偏見。

先前所有一切阶級夺得統治权之后，总是力求把已經获得的生活地位巩固起来，使全社会都服从于保証它們那种占有方式的条件。無产者却只有消灭自己現时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迄今存在的全部占有方式，才能夺得社会生产力。無产者自己沒有什么必須保护的东西，他們必須打破迄今所有一切保护和保障过私有財产权的东西。

迄今所發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为少数人謀利益的运动。無产阶級的运动是絕大多数人为絕大多数人謀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無产阶級是現代社会中最下層的阶級，它若不把压在它头上而由組成正式社会的那些阶層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物抛出九霄云外，便不能伸腰，便不能抬头。

如果不是就內容而是就形式来說，那末無产阶級反对資产阶級的斗爭起初总是民族的斗爭。每一个国度中的無产阶級当然首先应該消灭本国資产阶級。

当我們叙述無产阶級發展中那些最一般的阶段时，我們也就循序考察了現存社会里多少是隐蔽着的国內战爭，一直到这个战爭轉变为公开的革命，那时無产阶級就用强力推翻資产阶級而建立起自己的統治。

我們已經看見，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級与被压迫阶級对抗上面的。但是，为要有可能压迫某一个阶級，就必須保証这个阶級至少有能維持其奴隶生存地位的条件。农奴制度下的农奴曾能掙扎到公社社員的地位，也如封建專制制度鉄蹄下的小資产者曾能掙扎到資产者的地位一样。反之，現代的工人并不是随着工业进步向上升进，而是愈益降到本阶級生存条件水平以下。工人变成为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更快。由此就能很明显地看出，資产阶級已不能繼續做社会上的統治阶級和强制全社会把資产阶級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的法則了。資产阶級不能統治下去，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証它的奴隶以奴隶生活的水平，因为它竟只得讓它的奴隶沉淪到不仅不能供养它自己，反而要由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的权力下面生活下去，就是說，它的生活已經是与社会不能相容了。

資产者阶級生存和統治的基本条件是財富积累在私人手中，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雇佣劳动制是全靠工人們自相竞爭来支持的。但資产阶級不由地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业进步，却使工人們經过互相联合达到的革命团結代替了他

們因互相竞爭引起的分散狀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發展，資产阶級所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脚底下抽去了。它所生产的首先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产阶級的灭亡和無产阶級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至一八四八年一月。摘自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第八至二一頁）

卡尔·馬克思(摘錄)

列　宁

階　級　鬥　爭

一个社会中某一部分人底趋向与另一部分人底趋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滿着各种矛盾；历史上各个民族彼此之間，各个社会彼此之間，以及各族人民与各个社会內部，常有斗爭發生，除此而外，还有革命时期与反动时期，和平时期与战爭时期，停滯时期与迅速进步时期或衰落时期互相更替，—— 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馬克思主义給我們指出了一条基本綫索，使我們能在这种仿佛迷乱混沌的狀态中找出一种規律性。这条綫索就是阶級斗爭論。只有把某一社会或几个社会內全体組成員趋向底总和拿来研究，才能对这些趋向底結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趋向，是因为每一社会所分成的各个阶級底生活狀况和条件，都是各不相同的。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說道："迄今所有一切社会底历史（原始公社底历史除外，——恩格斯补充說），都是阶級斗爭底历史。自由民与奴隶，貴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东与帮工，簡言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終是处于互相对抗的地位，进行着不断的，有时是隐藏，有时是公开的斗爭，每次結局不是全部社会結構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斗爭阶級同归于尽……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中間产生出来的現代資产阶級社会，并沒有消灭掉阶級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級，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爭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但現今这个时代，即資产阶級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級矛盾單純化了：社会愈益分裂成为兩大敌对的陣营，兩大对抗的阶級，即資产阶級与無产阶級"。从法国大革命时

起，欧洲好几个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了事变底这种眞实内幕，即阶級斗爭。法国复辟时代的一批历史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归納了当时的事变，不能不承認阶級斗爭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关鍵。最近时代，即資产阶級获得完全胜利，創立代議机关，施行广泛（如果不是普遍）选举制，創办深入群众的廉价日报等等的时代，工人联合会和企业家联合会等等势力强大和范圍日广的时代，更加显然証明（虽然有时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宪政的"形式証明）阶級斗爭是事变底發动机。馬克思所著"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話表明，馬克思严格要求社会科学用客观态度分析現代社会中每一阶級底地位，以及每一阶級發展底条件。这段話就是："在現时与資产阶級对立的一切阶級中，只有無产阶級才是眞正革命的阶級。其余一切阶級都随着大工业的發展而趋于衰落和灭亡，而無产阶級却是大工业本身底产物。中間等級，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都是爲救他們这种中間等級生存地位于灭亡而与資产阶級作斗爭的。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保守的力量。不仅如此，他們并且是反动的力量，因为他們企圖使历史車輪倒退。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力量，那就只是因为他們感到自己势必落入無产阶級的队伍，因而他們不是捍衛着他們現时的利益而是捍衛着他們將来的利益，因而他們拋棄他們固有的观点而接受無产阶級底观点"。在許多历史著作中……，馬克思作出了用唯物主义态度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級以至每个阶級內部各种集团或阶層所处地位的燦爛深刻的模范，透徹地指明为什么和怎样"一切阶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从我們所摘引过的那一段話中，就可知道馬克思为估計历史發展底全部合成力而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从一阶級进到另一阶級，从过去进到將来的許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

馬克思底經济学說，就是馬克思理論最深刻，最周到和最詳細的証实与运用。

……

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策略

馬克思在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时期就已揭示了旧唯物主义底一个基本缺点，認为这个缺点就是不了解革命实踐底条件和意义，而馬克思本人一生除了理論工作之外，对無产阶級阶級斗爭底策略問題，始終都予以莫大的注意。馬克思所有一切著作，特别是一九一三年出版的四卷"馬恩通信集"，都有証明这点的极丰富的材料。这种材料还远未完全收集起来，还沒有总括起来，沒有加以研究和整理。因此，我們現在只能作一个最普泛最簡短的說明，同时要着重指出，馬克思因旧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而認定它是一种不徹底的，片面性的，死板的唯物主义这一估計，是完全公正的。馬克思决定無产阶級策略底基本任务时，始終是严格依据他的辯証唯物主义世界观底一切前提出發的。只有用客观态度把某社会所有一切阶級底全部相互关系作个綜合的观察，亦即把这个社会發展底客观阶段，以及这个社会和其他社会間的相互关系都加以观察估量，才能定出先进阶級底正确策略。同时，观察各个阶級和各个国家时又不应將其看作处于靜态而应將其看作处于动态的現象，換句話說，不应將其看作不动而应將其看作运动的現象（这个运动規律是从每一阶級底經济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同时，观察运动时又不要單只从过去的方面出發而是还要从將来的方面出發，并且不是按只知道緩慢变化的"进化論者"底庸俗見解而是按照辯証法态度来观察，即正如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上所写的那样："二十年等于偉大历史發展时期的一天，虽然后来也許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通信集"，第三卷，第一二七頁）。在每个發展阶段上，在每个时机內，無产阶級底策略应估計到人类历史这个客观必然的辯証律，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所謂"和平的"迟緩發展时代来發展先进阶級底意識、力量和战斗能力，另一方面在进行这种利用工作时完全要以达到这个阶級运动底"終极目的"，并在这个阶級中养成能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偉大时

期实际解决偉大任务的本事为主旨。关于这个問題，特别必須指出馬克思所提出的兩个原理：一个是在"哲学底貧困"中論及無产阶級底經济斗爭和經济組織时提出，另一个是在"共产党宣言"上論及無产阶級底政治任务时提出。前一原理是說："大工业把大批各不相謀的人集合于一处。竞爭使他們的利益彼此分裂。可是，保护工資，一致对付雇主的这种共同利益，却把他們用必須实行反抗和一致联合的共同思想統一起来……这种联合起初是孤單的，后来形成为許多团体，于是工人为反对經常联合的資本而保护自己的联合，便比保护工資更加必要了……在这个眞正是国内战爭的斗爭中聚集幷發展着进行將来决战的一切要素。联合一达到这个程度，就成为政治性質的联合了"。这就是經济斗爭与职工运动在数十年內，在准备無产阶級力量去作"將来战斗"的整个長久时期內所必需实行的策略和綱領。这里我們还要引証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英国工人运动实例所作出的許多論断：工业的"繁荣"引起了一种"收买工人"（見"馬恩通信集"，第一卷，第一三六頁），使工人放棄斗爭的企圖；这种繁荣又一般地"敗坏工人意識"（第二卷，第二一八頁），英国無产阶級日益"資产阶級化"，"最帶資产阶級性的这个民族"（英国民族）"大概是想要終究造成一个資产阶級式的貴族和資产阶級式的無产阶級来与資产阶級幷列"（第二卷，第二九〇頁）；英国無产阶級日益丧失其"革命毅力"（第三卷，第一二四頁）；必須在一个較为長久的时期內等候"英国工人解脫他們仿佛已陷于資产阶級腐化墮落的情形"（第三卷，第一二七頁）；英国工人运动缺乏"宪章派底热情"（一八六六年；第三卷，第三〇五頁）；英国工人領袖是掮介居于"急进資产者与工人"中間的样式造成的（論高利鄂克，第四卷，第二〇九頁）；因为英国占有壟断地位，所以当这种壟断地位尚未破坏时，"对不列顛工人是毫無办法的"（第四卷，第四三三頁）。經济斗爭底策略，在这里是用非常广泛的，完滿周到的，辯証法的，眞正革命的观点把它和工人运动底全部进程（和結局）联系起来观察的。

"共产党宣言"論到政治斗爭策略問題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馬克

思主义原理："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級底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他們在現今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底将来"。因此，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援助了波蘭"土地革命"党，即"那个引起了一八四六年克科拉夫起义的党"。馬克思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間援助了德国极端革命民主派，并且后来也从沒有收回过他当时关于策略問題所說的話。馬克思認为德国資产阶級是"自始就蓄意叛变民众"(資产阶級当时只有与农民实行联合，才能完全实現自己的任务)，"同旧社会底王公貴族实行妥协"的成份。以下就是馬克思对于德国資产阶級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时代的阶級狀况所作的一个总結的分析（这一分析同时又是用唯物主义观察社会，即是从运动中間，并且不是只从运动底已往方面观察社会的榜样)："……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層面前咕噜，在下層面前战慄；……被世界的大风暴吓得胆战心惊；始終显得沒有毅力，到处实行剽窃；……沒有主动性；……令人痛恨的老头子却要为自己晚年的利益着想而領导年少力壯的民众底初次的青年發动……"(載于一八四八年的"新萊茵报"，見"遺著"，第三卷，第二一二頁)。約过二十年后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第三卷，第二二四頁)，說一八四八年革命底失敗是因为資产阶級一覚察到將有爭取自由的斗爭發生就宁願去同奴隶制度媾和。当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时代已經完結时，馬克思便坚决反对任何玩弄革命的兒戏(反对沙培尔和維利赫一流人)，要大家善于在似乎是"和平地"准备着新革命的那个新阶段中好好进行工作。馬克思当时究竟怎样要求进行这种工作，这可从他对德国一八五六年最厉害反动时期的情形所作的如下估計中看出："德国全部事情，都將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农民战爭来协助無产阶級革命为轉移"("馬恩通信集"，第二卷，第一〇八頁)。在德国民主革命(資产阶級革命)尚未完成时，馬克思認为社会主义無产阶級底策略应以發展农民底民主毅力为主要目标。馬克思当时認为拉薩尔"客观上是为普魯士底利益而叛变了工人运动"(第三卷，第二一〇頁)，也就是因为拉薩尔容忍了地主和普魯士民族主义。一八六五年，恩格斯写信同馬克思商量他們將要在刊物上共同

發表意見的問題时說道："在一个农业国内代表产业工人說話时只攻击資产者而竟忘掉了封建貴族对农村工人施行的宗法式的'鞭笞式的剝削'，眞是可耻已极"（第三卷，第二一七頁）。一八六四至一八七〇年間，当完成德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时代，即普奧兩邦剝削阶級为了究竟要用何种方法来从上面完成这个革命的問題而互相斗爭着的时代快告終結时，馬克思不仅責备过实行和俾斯麦勾通的拉薩尔，并且糾正过陷于"亲奧主义"思想和拥护分立主义观点的李卜克內西，馬克思当时要求采取革命策略，無論对俾斯麦或亲奧派都要进行無情斗爭，不要迁就"获得胜利"的普魯士地主，而要在普魯士軍事胜利所造成的基地上也立刻恢复反对他們的革命斗爭（"馬恩通信集"，第三卷，第一三四，一三六，一四七，一七九，二〇四，二一〇，二一五，四一八，四三七，四四〇至四四一等頁）。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發表的那个著名的国际通告中，馬克思警告法国無产阶級不要举行不合时机的起义；但当起义終于發生时（一八七一年），馬克思却又十分喜悅地欢迎了群众实行"冲天"的革命首創精神（馬克思致庫格曼的信）。从馬克思底辯証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当时的情形下，也如在其他許多形势下一样，革命發动底失敗，对于無产阶級斗爭底整个进程和結局的害处，要比放棄陣地，不战而退的少些：因为不战而退就能使無产阶級精神頹唐，能削弱無产阶級底斗爭能力。馬克思十分注重在政治消沉和資产阶級合法制流行时代利用合法斗爭手段，所以他在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間，即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令頒布以后，严厉地責备了莫斯特底"革命空談"，但他又同样严厉，甚至更加严厉地攻击了当时在正式社会民主党中占得暫时統治的机会主义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使党沒有立刻表現过坚定性，坚决性和革命性，沒有立刻表現过用不合法斗爭手段对付非常法令的决心（"馬克思致恩格斯書信集"，第四卷，第三九七，四〇四，四一八，四二二，四二四等頁，并参看致左尔格的信）。

（一九一四年七月至十一月間。摘自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第二六至二七、四一至四五頁）

国家与革命(摘錄)

列　宁

第一章　階級社會和國家

1.国家是阶級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

馬克思的学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級解放斗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学說的遭遇一样。当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級总是不断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敌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誹謗对待他們的学說。在他們逝世以后，便企圖把他們变为無害的神像，即所謂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級，同时却閹割革命学說的內容，磨灭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产阶級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对馬克思主义作的这种"修改"是一致的。他們遺忘、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說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把資产阶級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頌揚。現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馬克思主义者"(請不要笑！)。那些德国的資产阶級学者，昨天还是摧殘馬克思主义的專家，現在却愈来愈頻繁地談論起"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来了，仿佛馬克思培育极有組織的工人协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爭！

在这种情况下，在歪曲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們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馬克思关于国家的眞正学說。为此，必須引証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許多話。当然，很多的引証会使文章冗長，不通俗，但是沒有这样的引証是絕对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

作中所有論到国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我們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証，一方面使讀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創始人的整个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發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鑿地証实并指明現在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們現在先从傳播最广的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書講起，这本書于一八九四年在斯圖加特印行了第六版。我們必須根据德文原著譯出一段引文，該書俄文譯本虽然很多，但多半譯得不完全，或者譯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結他所做的历史分析时說："国家决不是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現实'或'理性的形象和現实'。国家是社会發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的表現，是社会分裂为不可調和的对立面而又無力摆脫这种对立狀况的表現。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經济利益彼此冲突的阶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互相消灭，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駕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緩和冲突、使它不致破坏'秩序'的力量，就成为必要了。这个从社会中产生、駕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脫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六版第一七七至一七八頁）㊀

这一段話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級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和表現。在阶級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調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說，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級矛盾的不可調和。

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根本問題上，人們从兩个主要方面来歪曲馬克思主义。

一方面，資产阶級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資产阶級的思想家，迫于無可辯駁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認，只有在有阶級矛盾和阶級斗爭

㊀ 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三一六頁）。

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們又来"改正"馬克思，說国家是阶級 調和 的机关。在馬克思看来，如果阶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儈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論家們（他們往往善意地引用馬克思的言論！）看来，国家正是用来調和阶級的。在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級 統治 的机关，是一个阶級 压迫 另一个阶級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級冲突得到緩和。在小資产阶級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級調和，而不是一个阶級压迫另一个阶級；緩和冲突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夺被压迫阶級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爭工具和手段。

例如，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时候，对国家的意义和作用的看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問題，是需要在实踐中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規模行动的問題，全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在这个問題上一下子就完全滾到"国家""調和"阶級的小資产阶級理論方面去了。这兩个政党的無数决議和他們的政治家的許多論文，都浸透了这种市儈的庸俗的"調和"論。国家是一定阶級的統治机关，这个阶級 决不能 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級）調和，这一点是小資产阶級民主派始終不能了解的。在对待国家的态度問題上，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們布尔什維克向来就这样說），而是唱社会主义高調的小資产阶級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歪曲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巧妙得多了。"在理論上"，它不否認国家是阶級統治的机关，也不否認阶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是，它忽視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級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既然它是駕于社会 之上 并"日益 同社会 脫离"的力量，那末很明显，被压迫阶級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 統治阶級建立的、体現这种"脫离"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可。这个結論在理論上是不言而喻的，下面我們会看到，这是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做了具体的历史分析后得出的 絕对肯定的結論。正是这个結論（我們在下面还要詳細說明）竟被考茨基……"遺忘"和歪曲了。

……

第二章　國家与革命　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1.革命的前夜

成熟的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哲学的貧困”和“共产党宣言”，恰巧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夜写成的。由于这种情况，这兩本書除了叙述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具体的革命形势。因此，我們来研究这兩部著作的作者在做出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經驗的总結以前关于国家問題的言論，也許更为恰当。

馬克思在“哲学的貧困”中写道，……“工人阶級在發展进程中將創造一个沒有阶級和阶級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資产阶級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資产阶級社会內阶級对抗的正式表現。”（一八八五年德文版第一八二頁）㊀

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月以后（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論述来同这一段关于国家会随着阶級消灭而消逝的思想的論述比較一下，是頗有教益的。

……“当我們叙述無产阶級發展中最一般的阶段时，我們探討了現存社会里多少帶有隐蔽性的国內战爭，一直到这个国內战爭变成公开的革命，那时無产阶級就用暴力推翻資产阶級而建立起自己的統治”……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見，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無产阶級变为（直譯是提升为）統治阶級，爭得民主。”

“無产阶級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步地夺取資产阶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即組織成为統治阶級的無产阶級手中，并尽量迅速地增殖生产力总量。”（一九〇六年德

㊀ 見馬克思的“哲学的貧困”一九四一年俄文版第一四八至一四九頁。

文第七版第三一頁和三七頁)㊀

在这里我們看到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問題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無产阶級專政"(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所說的那样)的思想,其次我們还看到給国家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屬于馬克思主义中"被人遺忘的言論":"国家即組織成为統治阶級的無产阶級"。

国家的这个定义,在各正式社会民主党最流行的宣傳鼓动書刊中从来沒有解釋过。它恰巧被遺忘了;因为它同改良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击了"民主制和平發展"的一般机会主义偏見和市儈幻想。

無产阶級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說馬克思的学說就是如此,但是"忘了"补充:馬克思認为,第一、無产阶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国家,即需要建立一个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就是"組織成为統治阶級的無产阶級"。

国家是特殊的权力組織,是用来鎮压某一个阶級的强力組織。無产阶級要鎮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級呢?当然只是剝削阶級,即資产阶級。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鎮压剝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領导和实行这种鎮压的只有無产阶級,因为無产阶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阶級,是唯一能够团結一切被剝削劳动群众去反对資产阶級并把它完全鏟除的阶級。

剝削阶級需要政治統治是为了維持剝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絕大多数人民。被剝削阶級需要政治統治,是为了徹底消灭一切剝削,也就是为了絕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現代奴隶主——地主和資本家。

小資产阶級民主派,这些以幻想阶級妥协来代替阶級斗爭的假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也抱着幻想,他們不是把改造設想为

㊀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第六三、七八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二〇、二八頁)。

推翻剝削阶級的統治，而是設想为少数馴順地服从那意識到了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資产阶級空想同認为国家是超阶級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这种空想在实际上必然导致出卖劳动阶級的利益，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一八七一年革命的历史已經表明了这一点，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英、法、意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資产阶級內閣的經驗也表明了这一点。

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資产阶級社会主义，即目前在俄国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复活起来的这种小資产阶級社会主义。馬克思一貫坚持阶級斗爭的理論，并把它貫徹到政权学說、国家学說之中。

只有無产阶級这一特殊阶級才能推翻資产阶級的統治，因为無产阶級生存的經济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資产阶級統治的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資产阶級一方面分离和拆散农民及一切小資产者阶層，另一方面也使無产阶級联合、团結和組織起来。只有無产阶級，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經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剝削劳动群众的領袖，这些被剝削劳动群众受資产阶級的剝削、压迫和蹂躪往往比無产阶級更厉害，可是他們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的斗爭。

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問題上运用的阶級斗爭学說，必然会承認無产阶級的政治統治，承認無产阶級專政，即承認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裝力量的政权。只有使無产阶級变为統治阶級，变为能够鎮压資产阶級必然要进行的拚命反抗、能够組織一切被剝削劳动群众来建立新的經济制度的統治阶級，才能推翻資产阶級。

無产阶級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权力組織，强力組織，为的是鎮压剝削者的反抗和領導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資产阶級和半無产阶級来"組織"社会主义經济。

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教育無产阶級的先鋒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導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領导建立新制度，成为所有

被剝削劳动者在沒有資产阶級参加并反对資产阶級而建設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領导者和領袖。反之，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脫离群众而代表工資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圖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稀飯而出卖長子的权利，即放棄权利不当領导人民反对資产阶級的革命領袖。

"国家即組織成为統治阶級的無产阶級"，——馬克思的这个理論同他关于無产阶級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說，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現是無产阶級專政，無产阶級的政治統治。

既然無产阶級需要国家这样一个 反对 資产阶級的 特殊 强力組織，那末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結論：不預先消灭和破坏資产阶級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組織。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結論，馬克思在总結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的經驗时也就談到了这个結論。

2.革命的总結

关于这个使我們感到兴趣的国家問題，馬克思在"拿破侖第三政变記"中总結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革命时写道：

…… "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还在前进中不断鍛煉自己。它在有条不紊地执行自己的任务。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侖第三政变的日子)"以前，它完成了准备工作的前一半，現在正在完成后一半。它首先使議会权力臻于完备，以便有可能推翻这个权力。現在，它已經做到了这一点，它就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行政权力达到最純粹的表現形式，孤立起来，成为自己面前唯一的靶子，以便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行政权力"(着重号是我們加的)。"当革命完成后一半准备工作时，欧洲就会跳起来欢呼說：老田鼠挖得好呀！

这个行政权力拥有龐大的官僚組織和軍事組織，拥有极复杂的人为的国家机器，拥有五十万官吏队伍和五十万軍队——这个像密网一样纏住法国社会的軀体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

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專制时代即封建制度崩潰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第一次法国革命發展了集中制，“但同时又扩大了政府的职权范圍，增加了行政人員。拿破侖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統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实行更大的分工以外，沒有增加任何新东西”……

……“最后，議会制共和国在其反对革命的斗爭中，除采用高压手段以外，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不得不使国家权力更加集中。迄今一切政变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毀”（着重号是我們加的），“那些爭夺統治权的相互更替的政党，把夺取这个龐大的国家建筑看成是自己胜利时的主要战利品。”（“拿破侖第三政变記”一九〇七年汉堡德文第四版第九八至九九頁）㊀

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出色的論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該書中，国家問題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在这里，問題已經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結論：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

这个結論是馬克思主义国家学說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仅被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遺忘，并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論家考茨基公然歪曲了（这点我們在下面还要講到）。

在“共产党宣言”中做了一般的历史总結，使人們認識到国家是阶級統治的机关，还使人們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結論：無产阶級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統治，不把国家变为“組織成为統治阶級的無产阶級”，就不能推翻資产阶級；这个無产阶級国家在取得胜利

㊀ 見馬克思的“拿破侖第三政变記”（“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三〇八至三〇九頁）。
在本書第一三二一頁上，列宁引用了恩格斯为該書第三版写的序言（同上第二二一至二二二頁）。——本書編者注

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沒有阶級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沒有提出究竟应当（从历史發展的观点来看）怎样以無产阶級国家来代替資产阶級国家的問題。

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提出来加以解决的正是这个問題。馬克思是忠于自己的辯証唯物主义哲学的，他拿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偉大年代的历史經驗作为基础。馬克思的学說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識闡明的經驗总結。

国家問題現在提得很具体：資产阶級的国家，資产阶級統治所需要的国家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資产阶級革命进程中，面临着各被压迫阶級独立行动的时候，国家机关如何改变，如何演进？無产阶級对这个国家机器的任务怎样？

資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集中的国家政权，产生于專制制度崩潰的时代。最能表現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兩种机关，即官吏和常备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屢次談到的这兩个机器，恰巧同資产阶級有千絲万縷的联系。每个工人的經驗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說明了这种联系。工人阶級由于亲身的体驗，現在已經領会到这种联系意味着什么，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級很容易懂得、很深刻地領会到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小資产阶級民主派則不是愚蠢地、輕率地否認这一点，便是更輕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認，但是忘了做出相应的实际結論。

官吏和常备軍是資产阶級社会軀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蝕着这个社会的內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目前在正式社会民主党內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認为把国家看作一种 寄生机体 的观点是無政府主义独具的特性。这样来歪曲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空前地玷污社会主义、把"保衛祖国"的概念应用于帝国主义战爭来替这个战爭辯护粉飾的市儈，当然是有很大好处的，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絕对的歪曲。

經过从封建制度崩潰以来欧洲所發生的多次資产阶級革命，这

个官吏机关和軍事机关就逐漸發展、完备和巩固起来。必須指出，小資产阶級被吸引到大資产阶級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多半是通过这个机关的，因为这个机关給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層分子以比較舒适、安靜和显要的职位，使他們駕于人民之上。我們看一看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以后这半年中發生的一些事情吧：以前黑帮分子把持的官吏位置，現在成为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贓物了。实际上他們不想进行任何認眞的改革，力圖把这些改革拖延到"立宪会議召开的时候"，而召开立宪会議的日期，他們又慢吞吞地想拖延到战爭結束以后！至于瓜分贓物，攫取部長、次長、总督等肥缺，却沒有延期，沒有等待任何立宪会議！分配政府要职的把戏，其实不过是全国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中瓜分和重分"贓物"的一种表現。現在各种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职位已經分配完了，分配方面的"錯誤"也由几次重新分配糾正了，——这無疑是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八月二十七日这半年的总結，客观的总結。

但是在各資产阶級政党和小資产阶級政党之間（拿俄国来講，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之間）"重分"官吏机关的事实愈多，各被压迫阶級，首先是領导它們的無产阶級，就会愈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同整个資产阶級社会不可調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資产阶級政党，甚至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也必須加强高压手段来反对革命的無产阶級，巩固高压机关，也就是巩固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破坏和消滅国家机器的任务，而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

这个任务的提出，不是由于邏輯的推論，而是由于实际的事变發展，由于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生动經驗。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还沒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这个必須消灭的国家机器的問題，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是怎样严格地依据实际的历史經驗的。那时在这个問題上，經驗还沒有提供材料，后来在一八七一年，历史才把这个問題提到日程上来。一八五二年，根据对自然历史过

程的精确的观察，只能断定無产阶級革命已接近于提出“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毀”国家机器的任务。

这里可能会發生这样的問題：把馬克思的經驗、观察和結論加以推广，用到比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这三年法国历史更为广泛的范圍上去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这个問題，我們先回忆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話，然后再来研究实际材料。

恩格斯在“拿破侖第三政变記”第三版序言里写道：……“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历史上每一次阶級斗爭的結局，都比其他各国更加徹底。它的經常更換的政治形式最鮮明地表現出阶級斗爭的进展及其結果。法国在中世紀时代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在文艺复兴以后是一个純粹等級制的典型帝国，它在大革命时代摧毀了封建制度而建立了純粹的資产阶級統治，它所具有的这种典型的鮮明性，是欧洲其他国家所沒有的。抬起头来的無产阶級反对統治的資产阶級的斗爭在这里所表現的尖銳形式，也是其他各国从来沒有的。”（一九〇七年版第四頁）

最后一句話已經过时了，从一八七一年起，法国無产阶級的革命斗爭就停頓了，可是無論停頓多久，法国也还有可能在即將到来的無产阶級革命中成为坚决把阶級斗爭进行到底的典型国家。

現在我們来概括地看一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我們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在更加广闊的場所更緩慢更多样地进行着：一方面，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和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及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各国）里正在形成“議会权力”，另一方面，瓜分和重分官吏职位“贓物”的各資产阶級政党和小資产阶級政党，在不改变資产阶級制度的基础上为爭夺政权进行着斗爭，最后，“行政权力”及其官吏机关和軍事机关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無疑問，这是現代資本主义国家整个进化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这三年內，法国迅速地、尖銳地、集中地表明了整个資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那种發展过程。

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銀行資本时代，大資本主义壟断时代，壟断資本主义轉变为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时代表明，無論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無产阶級加强鎮压，“国家机器”就大大加强起来，它的官吏机关和軍事机关也就空前地扩大了。

現在，整个世界历史無疑將在比一八五二年更加广泛的范圍內把無产阶級革命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去“摧毀”国家机器。

至于無产阶級將用什么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巴黎公社对这一点提供了极有用的材料。

3.一八五二年馬克思对問題的提法㊀

一九〇七年梅林把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摘要登載在“新时代”杂志㊁（第二十五卷第二期第一六四頁）上。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出色的論述：

“至于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会中有阶級存在或發現各阶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資产阶級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級斗爭的历史發展，資产阶級的經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級做过經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献就是証明了下列几点：(1)阶級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發展的一定历史阶段（historische Entwicklungsphasen der Produktion）相联系；(2)阶級斗爭必然要导致無产阶級專政；(3)这个專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級和进入無阶級社会的过渡”……㊂

在这一段話里，馬克思非常清楚地指出了兩点。第一、他的学

㊀ 第二版增加的一节。

㊁ “新時代”(«Die Neue Zeit»)杂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一八八三年至一九二三年在斯圖加特出版。一八八五至一八九五年“新时代”杂志曾發表过恩格斯的几篇文章。恩格斯經常向該杂志編輯部提出意見，并因它背棄馬克思主义而給予尖銳的批評。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以后，該杂志系統地刊載了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間（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該杂志采取了考茨基中派立場，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㊂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一九五三年俄文版第六三頁。

說同資产阶級最淵博的先进思想家的学說之間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說的实質。

馬克思学說中的主要內容是阶級斗爭。人們时常这样說，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往往会对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資产阶級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級斗爭学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产阶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而且一般說来，是資产阶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仅仅承認阶級斗爭，那他还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沒有走出資产阶級思想和資产阶級政策的圈子。用阶級斗爭学說来限制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义，把馬克思主义变为資产阶級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認阶級斗爭、同时也承認無产阶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資产者（以及大資产者）之間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須用这塊試金石来測驗是否眞正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义。無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际上向工人阶級提出这个問題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間的人），都成了否認無产阶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产阶級民主派。考茨基写的"無产阶級專政"一書，是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即在本書第一版刊行以后很久才出版的，这本書是用市儈的观点歪曲馬克思主义、口头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卑鄙地背叛馬克思主义的典型（見我的"無产阶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

以过去的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現代机会主义，完全陷入了馬克思所詬述的資产阶級立場，因为这个机会主义把承認阶級斗爭的范圍局限于資产阶級关系的領域以內。（在这个領域、这个范圍內，任何一个有知識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絕在"原則上"承認阶級斗爭！）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的問題上不承認有阶級斗爭，即不承認在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資产阶級并徹底消滅資产阶級的时期有阶級斗爭。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級斗爭空前殘酷、阶級斗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

国家就必須是新型的民主国家（对無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的專政国家（对資产阶級是專政的）。

其次，一个阶級專政，不仅一般阶級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資产阶級的無产阶級需要，而且，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無阶級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領会了馬克思国家学說的实質。資产阶級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質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总是資产阶級專政。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个，就是無产阶級專政。

……

第五章　國家消亡的經济基础

2.从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馬克思繼續写道，……"在資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無产阶級的革命專政"……

这就是馬克思根据他对無产阶級在現代資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这个社会的發展情况以及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利益对立并且不可調和的实际材料所得出的結論。

从前，問題的提法是这样的：無产阶級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資产阶級，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專政。

現在，問題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發展的資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經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無产阶級的革命專政。

这个專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們知道，"共产党宣言"就是把"無产阶級变为統治阶級"和"爭得民主"这兩个概念放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

定，民主制在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怎样变更的。

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順利的發展条件下，比較完备的民主制就是民主共和国。但是这种民主制始終只限于資本主义剝削的狹小范圍，因此它实質上始終只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阶級、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資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終与古希腊共和国只供奴隶主享受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資本主义剝削的条件，現代的雇佣奴隶被貧困压得"無暇过問民主"，"無暇过問政治"，以致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說是証实这一論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有一段很長的时間，几乎有半世紀之久（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宪法一直承認結社是合法的，在这个时期內，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利用合法机会"方面做的工作要比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多得多，特别是使工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了举世未有的高度。

那末这种有政治覚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在資本主义社会里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一千五百万雇佣工人中只有一百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員！一千五百万雇佣工人中只有三百万是工会会員！

供极少数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这就是資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如果仔細地考察一下資本主义民主制的結構，那末無論在选举法的"細微的"（似乎是細微的）条文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議机关的办事手續上，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的集会場所不准"穷人"使用！），在純粹按資本主义原則办报等等事实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民主制的重重限制。对穷人的这种种限制、禁止、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細微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沒有亲身体驗过貧穷困苦、从来沒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級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資产阶級的政論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来是很細微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却把穷人推出和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使他們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馬克思出色地暴露了資本主义民主制的这一实質，他在分析公社的經驗时說：这就是容許被压迫者数年一次来决定压迫阶級中什

么人应当在議会里代表和压迫他們!

但是这种必然是狹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完全虛伪和騙人的資本主义民主制，决不像一般自由主义的教授和小資产阶級的机会主义者所想像的那样是簡單地、直接地、平稳地朝着“日益徹底的民主制”發展的。不是的。向前發展，即向共产主义發展，必須經过無产阶級專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剝削者資本家的反抗。

而無产阶級專政，即被压迫者先鋒队組織成为統治阶級来鎮压压迫者，不能仅仅限于扩大民主制。除了大規模地扩大这种第一次供貧民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之外，無产阶級專政还要对压迫者、剝削者、資本家采取一系列剝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們必須鎮压这些人，必須用强力粉碎他們的反抗，——顯然，凡是实行鎮压和使用强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讀者总还記得，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信中已經很好地闡明了这一点，他說：“無产阶級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鎮压自己的敌人，到了有可能来談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存在了。”

絕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剝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鎮压，即不允許他們参加民主生活，——这就是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民主制。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只有当資本家的反抗已經徹底粉碎，資本家已經消灭，阶級已經不存在的时候，即社会各个成員在对社会生产資料的关系上已經沒有什么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談得上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眞正完备的、眞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制才有可能实現。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制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簡單，因为人們既然摆脫了資本主义奴役制，摆脫了資本主义剝削制所造成的無数殘暴、野蛮、荒謬和卑鄙的現象，也就会逐漸習慣于遵守数百年来人們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自动地遵守这些規則，

而不需要强力，不需要强制和服从，不需要 所謂国家的这种 特别的强制 机关。

"国家 消亡"这句話說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漸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發性。只有习慣才能够而且一定会發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們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如果沒有剝削，如果沒有某种会引起抗議、起义并使 鎮压成为必要的令人气憤的現象，那末人們是多么容易习慣于遵守他們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規則。

总之，資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制是一种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伪的民主制，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制。無产阶級專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第一次提供了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同时对少数人即剝削者实行必要的鎮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眞正完备的民主制，而民主制愈完备，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換句話說，在資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級鎮压另一个阶級、少数人鎮压多数人的特别机器。很明显，为了达到剝削者少数始終压迫被剝削者多数的目的，就必然要采取极凶惡极殘酷的鎮压手段，就必然会造成無数流血慘案，而这样的流血事件是人类在奴隸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都經历过的。

其次，在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 过渡 的时候鎮压 还是 必要的，但这已經是被剝削者多数对剝削者少数的鎮压。特别的鎮压机关，特别的鎮压机器即"国家"，还是 必要的，但是已經是过渡性質的国家，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 昨天 还是雇佣奴隸的多数人去鎮压剝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較容易、比較簡單和比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也会比从前在鎮压奴隸、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时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也要小得多。而且这种鎮压同絕大多数居民的广泛的民主是不違背的，因而对特 别的 鎮压 机器 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如果沒有极复杂的鎮压机器，剝削者就不能鎮压人民，但是 人民 鎮压剝削者，却只要有很簡單的"机器"，甚至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别的机关，而只要有 武裝羣众的組織（如工兵代表苏維

埃，——我們先在这里提一下）。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为完全不需要国家創造条件，因为那时已經沒有人須要加以鎮压，——这里所謂"沒有人"是指阶級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統的斗爭而言。我們不是空想主义者，我們絲毫也不否認个别人搗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認有鎮压这种搗乱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特别的鎮压机器，特别的鎮压机关，武裝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項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簡單容易，正像現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都很容易去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們知道，产生違反公共生活規則的搗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剝削和群众貧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搗乱行为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們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进度怎样，但是，我們知道这种行为一定会消亡。国家也会随着这种行为的消亡而消亡。

馬克思并沒有憑空幻想这个未来的远景，他只是更詳細地确定現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級阶段和高級阶段之間的差别。

（一九一七年八月至九月。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五月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七三至三七六、三八八至四〇〇、四四六至四五一頁）

無产阶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摘錄)

列　宁

資产阶級民主和無产阶級民主

被考茨基弄得一塌糊塗的問題实际上就是这样。

若不嘲弄常識和历史，問題就很明显：只要各种阶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阶級的民主(附帶說一下，"純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級斗爭也不了解国家实質的蠢話，而且是十足的空談，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將变成习慣，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純粹的"民主)。

"純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謊話。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資产阶級民主，有代替資产阶級民主的無产阶級民主。

考茨基几乎用了几十頁的篇幅来"証明"資产阶級民主比中世紀制度进步，無产阶級在反对資产阶級的斗爭中必須利用資产阶級民主。这些話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义空談。不仅在文明的德国，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国，这也是人人知道的眞理。考茨基一本正經地談論魏特林，談論巴拉圭的耶穌教徒，談論許許多多别的东西，这不过是用那套"学者"的謊話来蒙哄工人，以便迴避現代民主即資本主义民主的資产阶級实質。

考茨基把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和資产阶級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紀制度的批評，資本主义和資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資产阶級接受的东西(無产阶級用革命暴力来消灭資产阶級)抛棄、抹杀和隐瞞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資产阶級

的奴才。

資产阶級民主同中世紀制度比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伪的、騙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剝削者是陷阱和騙局。正是这个眞理，这个馬克思主义学說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問題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資产阶級民主变为富人的民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一味去博取資产阶級的"欢心"。

我們首先要向博学的考茨基先生提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被我們的書呆子可耻地"忘記了的"(为了迎合資产阶級)理論，然后再来作一个最通俗的說明。

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而且"現代的代議制的国家也是資本剝削雇佣劳动的工具"(見恩格斯論国家的著作)㊀。"既然国家只是一种在斗爭中、在革命中用来鎮压敌人的暫时的机关，那末，談論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因为当無产阶級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鎮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恩格斯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給倍倍尔的信)"国家無非是一个阶級鎮压另一个阶級的机器，即使在民主共和国里也同在君主国里一样，不差分毫。"(見恩格斯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战"一書所写的序言)㊁普选制是"工人阶級成熟的指标。在現代国家中，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恩格斯論国家的著作㊂。考茨基先生令人厭煩地反复咀嚼这个論点当中能为資产阶級接受的前一部分，而对我們特别重視的和不能为資产阶級接受的后一部分，叛徒考茨基却閉口不談了!)。

㊀ 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三一八頁)。

㊁ 見馬克思"法蘭西內战"("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四六三至四六四頁)。

㊂ 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三二〇頁)。

"公社不应当是議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阶級中的什么人在議会里代表和压迫（verund zertreten）人民，普选制应当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們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計，正好似个人选举权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馬克思論述巴黎公社的"法蘭西內战"）㊀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是很熟悉这些原理的，但是其中每一个原理都在打他的嘴巴，揭發他的整个叛徒立場。在考茨基的整本小册子中，連了解这些眞理的影子都沒有。他的小册子的全部內容都是对馬克思主义的嘲笑！

看看現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以及"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处处可以看見每个誠实的覚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資产阶級民主的虛伪性。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有許多漏洞或限制，以保証資产阶級"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压迫阶級"破坏"自己的奴隶狀态和試圖不像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調軍队来鎮压工人，实行軍事戒严等等。考茨基無耻地粉飾資产阶級民主，閉口不談美国或瑞士最民主的、最帶共和色彩的資产者对付罢工工人的种种行为。

呵，聪明博学的考茨基对于这一点是閉口不談的！他，这位博學的政治家不知道，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就是無耻。他宁願向工人講一些民主就是"保护少数"之类的童話。这很难令人相信，但这是事实！在公元一九一八年夏天，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第五年，在各"民主国"的国际主义（即不像列諾得尔和龙格之流，不像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不像韓德遜和韋伯之流那样無耻背叛社会主义的人們）少数遭受迫害的第五年，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很甜的嗓子頌揚起"保护少数"来了。誰想知道这一点，可以去看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第一五

㊀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四九八、五〇〇頁。

頁。而在第一六頁上；这位博学的……人物甚至把十八世紀英国〔輝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講給你听呢！

多么淵博呵！向資产阶級献媚是多么無微不至呵！呵，在資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舐他們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質彬彬呵！假如我是克虜伯或謝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諾得尔，我一定会用万兩黃金酬謝考茨基，用犹大的接吻獎賞他，在工人面前称贊他，劝他們同考茨基这样"可敬的"人物保持"社会主义的統一"。著書反对無产阶級專政，講十八世紀英国的輝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硬說民主就是"保护少数"，絕口不談"民主"共和的美国 摧殘 国际主义者的事实，难道这不是奴顏婢膝地为資产阶級效劳嗎？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記了"（大概是偶然忘記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資产阶級民主制的統治党仅仅对其他 資产阶級 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無产阶級，則在一切 重大、深刻 和 根本的 問題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軍事戒严或摧殘蹂躪。民主愈發达，在發生危及資产阶級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摧殘或内战也就愈容易發生。資产阶級民主制的这个"規律"，原是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中，在民主共和制美国对黑人和国际主义者的私刑中，在民主制英国的爱尔蘭和烏尔斯脫事件㊀中，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民主共和制俄国对布尔什維克的压迫与摧殘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仅举出战时的例子，而且举出战前和平时期的例子。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宁願閉眼不看二十世紀的这些事实，而向工人講述十八世紀英国輝格党和托利党的十分新鮮、极其有趣、太有教益、非常重要的故事。

就拿資产阶級議会来說吧。能不能說博学的考茨基从来沒有听說民主愈發达，交易所和銀行家就愈能操縱資产阶級議会呢？当

㊀ 指英国資产阶級以血腥手段迫害一九一六年爱尔蘭反对英国奴役的起义的参加者的事件。列宁在一九一六年写道："在欧洲……爱尔蘭举行了起义，而'爱好自由的'英国人用死刑鎮压了爱尔蘭。"
烏爾斯脫是爱尔蘭的东北部分，居民以英吉利人为主；烏尔斯脫的軍队曾和英国軍队一起鎮压爱尔蘭人民的起义。

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不应該利用資产阶級議会(布尔什維克利用議会，可說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更有成效，因为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我們把第四屆杜馬的整个工人选民团都爭取过来了)。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結論說，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像考茨基那样忘記資产阶級議会制的历史局限性和条件性。在最民主的資产阶級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資本家"民主制度"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無产者成为僱傭奴隸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詭計。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認清了資本主义的腐敗和虛伪。为了准备群众进行革命，社会主义的宣傳家和鼓动家要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然而当革命的新紀元已經开始的时候，考茨基却轉过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贊美垂死的資产阶級民主制的妙处。

無产阶級的民主制(苏維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正是为了絕大多数的人，即为了被剝削的劳动群众而把民主發展和扩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像考茨基那样写出一整本論民主的書，用兩頁談專政，用几十頁談"純粹民主"，而竟沒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用自由主义态度来完全歪曲事实。

拿对外政策来說。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資产阶級国家中，对外政策都是不公开的。到处都是欺騙群众，而在民主制的法国、瑞士、美国和英国，这种欺騙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百倍，巧妙百倍。苏維埃政权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对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沒有注意到这一点，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虽然在进行侵略战爭和签訂"分割勢力范圍"(即資本家强盜瓜分世界)的秘密条約时代，这一点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和平問題和千百万人的生死問題都是以此为轉移的。

拿国家的結構来說。考茨基极力抓住一些"小事情"，連选举是"間接的"(在苏維埃宪法中)也提到了，但問題的本質，他却沒有看到。国家机关、国家机器的阶級实質，他却沒有注意到。在資产阶級的民主制度下，資本家千方百計("純粹的"民主愈發达，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地排斥群众，使他們不能参政，不能享受集会、出版等等

自由。苏維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严格說来是第二个，因为巴黎公社已經开了端）吸引群众即被剝削群众参政的政权。劳动群众参加資产阶級議会（在資产阶級的民主制度下，議会从来沒有解决过重大的問題；解决这些問題的是交易所和銀行）的門徑被千百道牆垣阻隔着，所以工人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覚到，看到和体会到：資产阶級的議会是别人的机关，是資产阶級压迫無产阶級的工具，是敌对阶級即少数剝削者的机关。

苏維埃是被剝削的劳动群众自己的組織，它尽量使他們自己建立国家，并用一切办法管理国家。这里，恰恰是劳动者与被剝削者的先鋒队——城市無产阶級享有一种优势，就是各大企业把他們极好地联合起来了；他們最容易进行选举和监督选举。苏維埃組織自然而然使一切劳动者和被剝削者易于团結在他們的先鋒队即無产阶級的周圍。旧的資产阶級机关，官僚制度，財富特权，資产阶級教育和交情等等特权（資产阶級民主愈發达，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所有这些，在苏維埃制度下都消失了。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紙張都从資产阶級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宮殿、公館、地主邸宅等等也是如此。苏維埃政权把千万座好房子一下子从剝削者手里夺过来后，群众的集会权利就更加"民主"百万倍，因为沒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騙局。在生活紧張而又要求很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的时期，非地方苏維埃的間接选举制使苏維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構开支小些，灵活些，更加接近工农。

無产阶級民主比任何資产阶級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維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資产阶級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只有自覚的資产阶級奴僕，或是政治上麻木不仁、被資产阶級書籍蒙蔽而看不見实际生活、腦子里充滿資产阶級民主偏見、因而在客观上变成資产阶級走狗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只有不能站在被压迫阶級的立場上提問題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資产阶級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中等普通工人，中等普通僱农，或一般的农村半無产者（即占人口絕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能够多少像在苏維埃俄国一样，享有在最好的大厦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紙庫来發表自己的意見、保护自己的利益的自由，享有选拔本阶級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設"国家的自由呢？

在任何一个国家內，考茨基先生要想从一千个略知时务的工人和雇农中間，哪怕找到一个在回答这問題时表示怀疑的人，都是絕对不可能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資产阶級报紙上看到一鱗半爪的眞实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維埃共和国，因为他們看到它是無产阶級的民主，是窮人的民主，而不是富人的民主；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資产阶級民主，实际上都是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們（和"建設"我們国家）的是資产阶級的官吏，資产阶級的議員，資产阶級的法官。这是所有資产阶級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資产阶級国家在內）被压迫阶級中的千百万人从自己的生活經驗中知道、每天感覚到和体会到的淺显明白的眞理。

而在俄国，則完全摧毀了官僚机关，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資产阶級議会，建立了工农容易參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維埃代替了官吏，由工农苏維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維埃选举法官。單是这件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級承認苏維埃政权这一無产阶級專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資产阶級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考茨基不了解这一每个工人都了解的明显眞理，因为他"忘記了"或"已經不会"提出这个問題：究竟是哪一个阶級的民主？他从"純粹的"（即非阶級的？或超阶級的？）民主的观点去推論。他的論据正像夏洛克㊀的論据一样：只要"一磅肉"，別的什么都不要。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沒有民主。

我們要向博学的考茨基，向"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考茨基提一个問題：

㊀ 夏洛克是莎士比亞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角色。

被剝削者能同剝削者平等嗎?

在討論第二国际思想領袖的著作时竟要提出这样的問題，眞是古怪得很，眞是不可思議。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談起了考茨基，也就必須向这位博学的人說明，为什么剝削者不能同被剝削者平等。

被剝削者能同剝削者平等嗎?

考茨基說：

(1)"剝削者总是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考茨基的小册子第一四頁)

这是無可爭辯的眞理。从这一眞理出發，究竟应該怎样推論呢?可以按馬克思主义观点，即按社会主义观点来推論，那就应該以被剝削者和剝削者的关系为基础。也可以按自由主义，即按資产阶級民主主义观点来推論，那就应該以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关系为基础。

若按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推論，就应該說：剝削者必然要把国家(这里說的是民主制，即說的是国家形式之一)变成剝削阶級統治被剝削阶級的工具。因此，只要統治着大多数被剝削者的剝削者还存在，民主国家就必然实行剝削者的民主。被剝削者的国家同这种国家根本不同，它应該对被剝削者实行民主，对剝削者实行鎭压，所謂鎭压一个阶級，就是使这个阶級沒有平等权利，不能享受"民主"。

若按自由主义的观点来推論，就应該說：多数决定，少数服从。不服从者受处罰。再沒有别的了。無論国家的阶級性或"純粹民主"的阶級性，都用不着講了；这同問題沒有关系，因为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再沒有别的了。

考茨基正是这样推論的：

(2)"为什么無产阶級的統治要采取而且必須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第二一頁)接着他极詳細极嚕嗦地說明無产阶級拥有多数，并且引用馬克思的話和巴黎公社的选举票数来証明。結論是："在群众中这样根深蒂固的制度，沒有絲毫理由去損害民主。

有人用暴力来消灭民主的时候，这个制度就非使用暴力不可。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但是这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拥护的制度使用暴力，不是为的消滅民主，而是为的保护民主。如果它要消灭自己的最可靠的基础，要消灭偉大道德权威的深刻泉源——普选制，它就簡直是自杀了。”（第二二頁）

你們看，在考茨基的論据中被剝削者和剝削者的关系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一般多数，一般少数，一般民主和我們所熟悉的“純粹民主”。

請注意，这些話是談到巴黎公社时說的！为了明显起見，我們看看馬克思和恩格斯談到巴黎公社时关于專政是怎样講的：

馬克思說：……“如果工人……为要打破資产阶級的反抗，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專政来代替資产阶級專政……那他們就是賦予国家以革命的暫时的形式”……㊀

恩格斯說：……“获得胜利的”（在革命中）“政党往往迫不得已要用自己的武器使反动派感到畏惧，来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沒有憑借武裝人民的权威来反对資产阶級，它能支持一天以上么？反过来說，难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备公社，說它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嗎？”……㊁

恩格斯又說：“既然国家只是一种在斗爭中、在革命中用来鎮压敌人的暫时的机关，那末，談論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因为当無产阶級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鎮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㊂

考茨基和馬克思、恩格斯之間，即自由主义者和無产阶級革命者之間，实有天淵之别。考茨基所說的純粹民主和一般“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人民国家”的另一說法，亦即純粹無稽之談。考茨基抱着飽

㊀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十五卷第八八至九一頁。

㊁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六一四頁。

㊂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四〇頁。

有学識的書呆子态度或十岁女孩的天眞态度問道：既然拥有大多数，还要專政干什么呢？馬克思和恩格斯解釋說：

——为了打破資产阶級的反抗。

——为了使反动派畏惧。

——为了維持武裝人民的权威来反对資产阶級。

——为了使無产阶級能够用暴力鎮压自己的敌人。

这些解釋考茨基是不了解的。他迷恋于民主的"純粹性"，看不見它的資产阶級性，"一貫"主張多数既然是多数，就用不着"打破"少数的"反抗"，用不着"用暴力鎮压"少数，只要鎮压違反民主的行为就够了。考茨基迷恋于民主的"純粹性"，無意中犯了一切資产阶級民主派常犯的小錯誤：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完全是騙人的假平等）当做事实上的平等！这是小事情呵！

剝削者不能同被剝削者平等。

这个眞理考茨基很不喜欢，但它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內容。

另一个眞理是：在一个阶級剝削另一个阶級的可能性沒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眞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在首都举行的起义或軍队暴动一成功，可以一下子打倒剝削者。然而除了极稀少极特殊的場合，剝削者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在一个稍为大些的国家中，决不能一下子剝夺所有的地主和資本家。其次，只有法律上或政治上的剝夺，远不能解决問題，因为需要的是在事实上鏟除地主和資本家，在事实上用工人管理工厂和田庄的办法来代替地主和資本家。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不能平等，因为剝削者世世代代享受教育特权，过着富裕生活，具有各种本領，而被剝削者大多数甚至在最先进最民主的資产阶級共和国里也是受压迫、受恐吓、愚昧無知和分散的。在革命以后的長时期內，剝削者必然在事实上保有很大的优势：他們还有貨幣（貨幣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联系，有組織和管理的技能，有熟悉一切管理"秘訣"（习慣、方法、手段和机会）的知識，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等技术人員（过資产阶級生活、有資产阶級思想的人員）有密切关系，有大

得不可計量的軍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剝削者只在一国內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現象,因为几国同时發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們就依然比被剝削者強大,因为剝削者的国际联系是非常广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剝削者,一部分最不开展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等等,是会跟着剝削者走的,这已为过去的一切革命所証明,巴黎公社也不例外(因为凡尔賽軍队中也有無产者,这是飽学的考茨基"忘記了"的)。

在这种情况下,若以为在比較深刻的、严重的革命中,可以簡單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問題,那就是愚蠢到了极点,就是固守庸俗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見,就是欺騙羣众,隐瞞明显的历史眞理。这个历史眞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剝削者照例要进行長期的、頑強的、拚命的反抗,多年內在事实上对被剝削者保有巨大的优势。剝削者在沒有利用自己的优势作一次或多次最后的、拚命的战斗以前,决不会像甜蜜蜜的傻子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剝削者多数的决議。

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剝削者不會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們不相信这一点,不願想到这一点,所以他們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敗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热情、百倍增長的仇恨来拚命斗爭,想恢复他們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們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現在却被"平凡的賤民"弄得貧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而跟着剝削者資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資产阶級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經驗証明,小資产阶級总是犹豫动摇,今天跟着無产阶級走,明天又因革命遭遇困难而張皇失措,因工人遭受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乱,焦躁不安,东奔西跑,痛哭流涕,从这个营壘跑进那个营壘……如像我国的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在进行拚命的激烈战爭时代,当历史已提出了千百年特权的存亡問題的时候,竟說什么多数和少数,什么純粹的民

主，什么專政沒有必要，什么剝削者同被剝削者平等！多么愚蠢、多么庸俗的人才会說出这种話来呵！

但是資本主义比較"和平"發展的几十年（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已使极力迁就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党变成了堆滿庸俗見解、狹隘观点和叛变思想的馬厩……

* * *

讀者大概已經注意到，考茨基在我們上面引来的一段話內，說到什么侵害普选制（这里我們要附帶說說：考茨基把普选制称为偉大道德权威的深刻泉源，而恩格斯在也是論述巴黎公社和也是論述專政問題的时候，却說的是憑借武裝人民的权威反对資产阶級；把庸人和革命家对"权威"的看法比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

必須指出，剝夺剝削者的选举权問題，是純粹俄国的問題，而不是一般無产阶級專政的問題。如果考茨基不作假，把他的小册子叫做"反对布尔什維克"，那末，小册子的名称就符合于它的內容了，考茨基也就有权直接談論选举权了。但是，考茨基首先想以"理論家"的姿态出現。他把自己的小册子称做一般論"無产阶級專政"。他只是在小册子的后半部，从第六节起，才專門談到苏維埃和俄罗斯。前半部（我引証的話就是这一部分的）談的是一般民主和一般專政。考茨基一談到选举权，便显了原形，証明他是一个反对布尔什維克的論战家，絲毫也沒有提出什么理論。因为要闡述理論，要說明民主和專政的一般的（而不是民族特殊的）阶級基础，就不应該談选举权这样的專門問題，而应該談一般問題：在推翻剝削者、用被剝削者的国家代替剝削者的国家的历史时期，能不能保留富人的民主、剝削者的民主呢？

理論家就是这样提問題，而且只能这样提問題。

我們知道巴黎公社的例子，我們知道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关于巴黎公社以及論到巴黎公社时的一切議論。我根据这种材料，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国家和革命"那本小册子中，就分析了民主和專政的問題。我一句話也沒有提到限制选举权的問題。現在应該說，限制

选举权的問題是某一国家中实行專政的特殊問題，而不是專政的一般問題。談到限制选举权的問題，应該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及其發展的特殊道路。这一点我在以后說明。預先就担保說，將来欧洲的無产阶級革命全都一定会或大部分一定会限制資产阶級的选举权，那是錯誤的。这种限制也許是可能的。在大战之后，在有了俄国革命經驗之后，这种限制是会有的，但这不是实現專政所必需的，不是專政这一邏輯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專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級概念的必备条件。

專政的必要标志和必备条件，就是用暴力鎮压剝削阶級，因而也就是破坏"純粹民主"，即破坏这个阶級的平等和自由。

理論上应該这样而且只能这样提問題。考茨基沒有这样提問題，也就証明他不是以理論家的姿态而是作为向机会主义者和資产阶級献媚的奴才来反对布尔什維克。

究竟在哪些国家里，由于某种資本主义的哪些民族特点，对剝削者的民主要实行某种限制和破坏（全部或大部），这是牽涉到某种資本主义和某种革命的民族特点問題。这不是理論問題，理論問題在于：不破坏剝削阶級的民主，無产阶級專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正是避而不談这个在理論上唯一重要的本質問題。考茨基引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各样的話，就是沒有引用我在上面引过的同这个問題有关的話。

考茨基講了很多，講了能为自由派和資产阶級民主派接受的、不超出他們的思想范圍的一切，而恰恰沒有講主要的东西，沒有講到：無产阶級不打破資产阶級的反抗，不用暴力鎮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凡是实行"暴力鎮压"的地方，沒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沒有民主。

这是考茨基不了解的。

（一九一八年十月至十一月。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二四至二三八頁）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騙人民(摘錄)

列　宁

三

我現在来談下一个問題。这就是一般对待民主的态度問題。

我已經指出，那些反对我們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常常用民主来替他們所持的政治立場辯解，这是一种最为流行的辯护方式。你們当然都知道，第二国际的思想領袖和至今还是伯尔尼国际的一員的考茨基就是欧洲著作界中代表这种观点的最坚决的人物。他說："布尔什維克选擇了一种違反民主的方法，布尔什維克选擇了專政的方法，因此他們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对的。"这种論調在所有的出版物和我提到的那兩家报紙上經常地千万次地出現过。整个知識界也經常重复这种論調，有时庸人們也在自己的議論中半自覚地重复这种論調。"民主，这是自由，这是平等，这是多数人的决定；什么能高于自由、高于平等、高于多数人的决定呢！既然你們布尔什維克違背了这一点，甚至还無耻地公开說，你們既高于自由平等，又高于多数人的决定，那就請你們不要惊訝也不要埋怨我們把你們叫做篡夺者和暴徒吧！"

我們对此絲毫也不感到惊訝，因为我們最希望弄清眞相，我們只指望劳动者的先进部分眞正認清他們的地位。是的，我們在自己的党的綱領中，过去和現在都一直講，我們决不拿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意志这类漂亮的口号来欺騙自己，我們要像对待高尔察克的帮凶那样，对待那些把自己称为民主主义者、純粹民主和徹底民主的拥护者而又直接或間接地把民主和無产阶級專政对立起来的人。

請分析分析看，分析一下是必要的。那些眞正純粹的民主主义者的罪过是在于他們宣傳純粹民主、維护純粹民主而反对篡夺者呢，还是在于他們站在有产阶級那边，站在高尔察克那边？

我們先来分析自由。不用說，对于任何革命，無論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可是我們的綱領声明：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脫資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騙人的东西。我想，你們任何一个讀过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只要讀过一本叙述馬克思学說的通俗讀物的人都会知道：馬克思恰恰是把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間、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描繪得淋离尽致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証明这些詞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資本的自由。

我們对任何人都說，在事情已經發展到推翻全世界或者一个国家的資本权力的时候，在被压迫的劳动阶級徹底打倒資本、徹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爭已提到首位的历史关头，誰要是大談一般"自由"，誰要是为了这种自由而反对無产阶級專政，誰就是帮助剝削者，誰就是拥护剝削者，因为正像我們在自己的党綱中所直接声明的那样，自由如果不服从于劳动摆脫資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騙人的东西。从綱領的外部結構来看，这也許是多余的，但是从我們的全部宣傳和鼓动来看，从無产阶級斗爭和無产阶級政权的基本原則来看，这却是最根本的东西。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必須同全世界的資本作斗爭，我們清楚地知道，全世界的資本担負过創造自由的任务，它推翻了封建的奴役制，創造了資产阶級的自由，我們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我們声明，我們根本反对資本主义，既反对共和制資本主义，反对民主制資本主义，也反对自由資本主义；当然，我們知道，它一定会打着自由的旗帜来反对我們。所以我們回答了它。我們認为必須在自己的綱領中給予回答：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脫資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騙人的东西。

也許不可能是这样的吧？也許自由同劳动摆脫資本压迫不相抵

触吧？請你們看看你們到过的、至少从書本上知道过的那些西欧国家吧。每一本書都說它們的制度是最自由的制度，現在法、英、美等西欧文明国家都打着这面旗帜，“为了自由”而反对布尔什維克。近几天，我們很少得到法国报紙，因为我們被团团圍住了，但是可以从無綫电中收到消息，天空毕竟是霸占不了的，我們可以截获外国广播。近几天，我有机会收听到法国强盜政府的广播：法国反对布尔什維克，支持他們的敌人，照旧信奉它所固有的“崇高的自由理想”。这是我們随时随地都遇到的，这是他們在論战中反对我們的基本論調。

他們把什么叫做自由呢？这些文明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竟把集会自由叫做自由。他們的宪法总是写着：“全体公民有集会自由。”他們說：“你們看，这就是自由的內容，这就是自由的基本表現。而你們布尔什維克呢，你們却破坏了集会自由。”

我們回答說：是的，英国、法国、美国的先生們，你們的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脫資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騙人的东西。文明的先生們，你們忘記了一件小事情，忘記了你們的自由是写在把私有制法定下來的宪法上的。問題的实質就在这里。

与自由并列的是财产，在你們的宪法中正是这样写着的。至于你們承認集会自由，这比起封建制度、中世紀制度、农奴制来，当然是一个大进步。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承認的，他們正是利用这种資产阶級社会的自由来教育無产阶級怎样打倒資本主义的压迫的。

但是，你們的自由只是紙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这就是說，如果在大城市中有像这样的大厅，那是屬于資本家和地主的，例如叫做“貴族会議”厅。俄罗斯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們，你們可以自由集会，但这是私有財产，对不起，請你們要尊重私有財产，否則你們就是布尔什維克、罪犯、强盜、掠夺者、搗乱分子。而我們則說：“我們要把这翻过来。我們先要把这座建筑物从‘貴族会議’大厦变成工人組織的大厦，然后再談集会自由。”你們責备我們破坏自由。而我們認为，任何自由，如果它不服从于劳动摆脫資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騙人的东西。在一切資产阶級共和国的宪法中所載的集会自由都是

騙人的东西，因为在毕竟沒有把冬季消灭、沒有把天气改造过来的文明国家里，举行集会是需要集会場所的，而高楼大厦却是私有财产。所以我們先要沒收高楼大厦，然后再談自由。

我們說，讓資本家有集会自由，那是对劳动者的极大犯罪行为，那是讓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們对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先生們和拥护民主的先生們說：你們責备我們破坏自由，这是胡說！当你們的偉大的資产阶級革命家一六四九年在英国、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在法国举行革命时，他們并沒有讓君主派有集会自由。法国革命所以叫做大革命，是因为它不像一八四八年的很多革命那样优柔寡断、半途而廢、流于空談，因为它是一个推翻和徹底鎮压了君主派的实实在在的革命。我們現在也会同样地对待資本家先生們，因为我們知道，要使劳动者从資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必須剝夺資本家的集会自由，就必須取消或削減他們的"自由"。这有利于劳动摆脫資本压迫，这有利于眞正自由，这会使建筑物再不屬于个别家庭，再不屬于某个地主、資本家或某个股份公司。到了当人們都忘記公共建筑物可能是誰的財产的时候，我們才会主張完全"自由"。当世界上只有工作者的时候，当人們不再去想做一个社会成員而不做一个工作者（这还不会很快实現，資产者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这班先生們的罪过就在于延緩它的到来）的时候，我們才主張人人有集会自由，而現在实行集会自由，就是讓資本家和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們正在同他們作斗爭，我們正在給他們以反击，所以我們声明，我們要剝夺这种自由。

我們在进行战斗——这就是無产阶級專政的內容。以为只要說服大多数人，只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美丽远景描繪出来，大多数人就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种天眞的、空想的、虛構的、机械的和書生气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經过去了。用这些童話来自慰慰人的那种时代已經过去了。承認阶級斗爭的必要性的馬克思主义說：人类只有經过無产阶級專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專政，这是一个殘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講的。社会主义者提

出了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們知道，除非进行殊死的無情的斗爭，剝削阶級是不会投降的，它將用各种好听的字眼来掩盖自己的統治。

集会自由，——什么能高于这个字眼好于这个字眼呢！沒有集会自由，劳动人民的發展及其覚悟的提高能以想像嗎？沒有集会自由，人道的基础能以想像嗎？我們說，英国和北美合众国宪法上的集会自由是騙人的东西，因为它束縛着劳动群众，使他們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因为我們清楚地知道，資产阶級將用一切办法来推翻这个很不寻常很"怪誕的"政权。在那些考慮过阶級斗爭和稍微具体而明确地想到起义工人对資产阶級的态度的人看来，只能是这样。資产阶級已在一个国家內被推翻，但还沒有在一切国家內被推翻，正因为它还沒有完全被推翻，它現在才以更为狂怒的姿态投入战斗。

正是在資产阶級被推翻以后，阶級斗爭才具有最尖銳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資产阶級既被推翻事情就告終結的說法来自欺欺人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毫無用处的。事情只是开始，而不是完結。因为資产阶級直到今天还不相信它已被推翻，而且在十月革命前夜，它和藹可亲地嘲笑过我們；米留可夫嘲笑过，切尔諾夫嘲笑过，新生活派也嘲笑过。他們嘲笑說："好吧，布尔什維克先生們，請你們組閣吧，你們亲自掌握一兩个星期政权看看，——你們会帮我們一个大忙的！"要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諾夫这样写过，米留可夫在"言論报"上这样写过，牛孟什維克的"新生活报"也这样写过。他們所以嘲笑，是因为他們認为事情并不严重。現在他們看到事情严重了，認为"民主共和国"是自己的护身甲的英、法、瑞士的資产者先生們現在也看到并意識到事情严重了，所以他們大家都在武裝起来。假使你們能够看一看自由瑞士的情形，那就可以看出，那里的每个資产者都在武裝起来，建立白衛軍，因为他們知道，問題已經發展到他們能不能保持特权来使千百万人处于雇佣奴隶的地位了。現在斗爭具有世界規模了，因此任何一个用"民主""自由"的字眼来反对我們的人，都是站在有产阶級一边，欺騙人民，因为他不懂得，自由和民主直到現在都是有产者的自由和民主，对無产者来說不过是殘羹剩飯。

当劳动者受資本奴役、为資本做工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集会自由是什么呢？这是騙人的东西。要使劳动者获得自由，首先必須战胜剝削者的反抗；既然我遭到整个阶級的反抗，那很清楚，我不能把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决定給予这个阶級。

四

談了自由以后，現在我来談平等。在这里，問題还更深奥。在这里，我們要涉及一个引起很大分歧的、更严重的、更迫切的問題。

革命在自己的进程中把剝削阶級一个一个地打倒下去。它首先打倒了君主制，把平等仅仅理解为要有选举出来的政权，要有共和国。革命向前發展，打倒了地主，你們知道，当时反对中世紀制度、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爭，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不分等級，一律平等，百万富翁和穷光蛋，一律平等——載入史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偉大的革命家都是这样講，这样想，这样眞心認为的。反对地主的革命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那时人們把百万富翁和工人应有同样的权利叫做平等。革命又向前發展了，它說，"平等"（我們在自己的綱領中沒有特别談到它，而且不能永無止境地重复它，这一点就同我們談到自由时所說的一样清楚）如果同劳动摆脫資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騙人的东西。这是我們說的，而且这是千眞万确的眞理。我們說，民主共和国和現代的平等是謊言，是欺騙，因为在那里沒有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生产資料、貨幣和資本的所有制妨碍着人們享受这种平等。可以立刻廢除富人的房屋所有制，可以比較快地剝夺資本和生产工具，但是貨幣所有制却要保留下来。

要知道，貨幣是社会財富的結晶，是社会劳动的結晶，貨幣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貢物的憑据，貨幣是昨天的剝削制的殘余。这就是所謂貨幣。能不能一下子把貨幣消灭呢？不能。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社会主义者就說过，貨幣是不能一下子就廢除的，而我們根据切身的經驗也可以証实这一点。在貨幣消灭之前，平等始終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同时每个有貨幣的人都有实际的剝削权利，但是要

消灭貨幣，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而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組織上的成就。所以我們不能一下子廢除貨幣。我們說，貨幣暫时还要保留下来，而且在从資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長的时間。平等如果同劳动擺脫資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騙人的东西。

恩格斯說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級無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謬的偏見㊀。資产阶級的教授們企圖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証明我們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們企圖用他們揑造的这种無稽之談来責备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們由于自己無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現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說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級，平等就是一句空話。我們要消灭阶級，从这方面說，我們是主張平等的。但是硬說我們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無謂的空談和知識分子的愚蠢的揑造，这些知識分子有时裝腔作势，玩弄字眼，然而毫無內容，尽管他們把自己称为作家，有时称为学者，或者称为别的什么人。

所以我們說：我們要爭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級。因而也要消灭工农之間的阶級差别。这正是我們的目的。工农之間还有阶級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釋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做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詭辯，是字眼上的爭論。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爭論字眼是沒有必要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間的阶級差别还存在，我們就談不上平等，就不能不加以防备，以免帮助了資产阶級。农民是父权制时代的阶級，是由几十年几百年的奴隶制培植起来的阶級；农民在这整个期間一直是小業主，起初从屬于其他阶級，后来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农民是食品的私有者和占有者。

現在我們要談的这个問題，在我們的敌人中間引起了最多的責

㊀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一九五三年俄文版第一〇〇至一〇一頁

难，在沒有經驗和缺乏思考的人們中間造成了最多的怀疑，同时也最容易把我們同那些想以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分开，他們埋怨我們，說我們不把他們看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把他們叫做資本家的拥护者。也許由于愚昧無知，但他們确实是資本家的拥护者。

就农民的生活习慣、生产条件、生活条件、經济条件来看，农民的地位是这样的：他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

这是事实。当貨幣、交換还沒有消灭的时候，你們就跳不出这个事实。要消灭貨幣和交換，就需要無产阶級多年的稳固統治，因为只有無产阶級才能战胜資产阶級。有人对我們說："你們是平等的破坏者，你們不仅破坏了同剝削者的平等，——这一点我是要同意的，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孟什維克說这种話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說的是什么——而且破坏了工农之間的平等，破坏了'劳动民主'的平等，你們是罪犯！"我們回答說："是的，我們破坏了工农之間的平等，并且肯定地說，你們主張这种平等，你們就是高尔察克的拥护者。"不久以前我在"眞理报"上看到格尔曼諾夫同志写的一篇漂亮的文章，其中引証了最"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派孟什維克之一舍尔先生的提綱。这个提綱是在我們的一个合作社机关中提出的。这样的提綱眞可以刻在木牌上，挂在每一个乡执行委員会里，并在末尾署上："此即高尔察克分子。"

我清楚地知道，这位舍尔先生及其同伙会因此把我叫做誹謗者，或者說得更坏些。可是，我要請那些学过政治經济学入門和政治常識的人仔細地分析一下誰是誰非。舍尔先生說：苏維埃政权的粮食政策和一般經济政策根本行不通，先要逐漸地然后广泛地实行粮食自由貿易，保証私有財产。

我認为，这就是高尔察克的經济綱領和經济原則。我肯定地說，凡是讀过馬克思著作的人，特别是讀过"資本論"第一章的人，或者只是讀过考茨基叙述馬克思学說的通俗讀物"卡尔·馬克思的經济学說"的人，都一定会認为：当無产阶級反对資产阶級的革命正在进行

的时候，当地主和資本家所有制正在被推翻的时候，当被四年帝国主义战爭弄得滿目瘡痍的国家正在闹飢荒的时候，粮食貿易自由就是資本家的自由，就是恢复資本权力的自由。这是高尔察克的經济綱領，因为高尔察克不是悬在空中的。

只是譴責高尔察克迫害工人、甚至拷打那些同情布尔什維克的女教师，那是十分愚蠢的。这是庸俗地維护民主，这是蠢笨地責备高尔察克。高尔察克現在正用一切方法进行活动。但是，他在經济上靠什么来支持呢？他靠貿易自由来支持，他为貿易自由而斗爭，因此所有的資本家都拥护他。你們說："我已經离开了高尔察克，我不是高尔察克分子。"这当然使你很光彩，但这并不能証明你有一个能够判断事物的头腦。我們这样回答这些人，絲毫也沒有伤害那些認清高尔察克是一个暴徒而离开了他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面子。但是，这样的人，如果在一个同高尔察克进行殊死决斗的国家里，繼續为"劳动民主的平等"而斗爭，为粮食貿易自由而斗爭，那也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过他不懂道理，不能自圓其說。

高尔察克（無論他叫高尔察克或邓尼金都一样，服裝不同，实質則一）是靠占領一个盛产粮食的地区之后，在那里准許粮食貿易自由和恢复資本主义的自由来維持的。在过去的一切革命中都有过这样的情形，如果我們放棄無产阶級專政，实行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左派孟什維克、直到無政府主义者（名称多得很）这班先生們的这种"自由"和"平等"，那末，在我們这里也会有这样的情形。目前在烏克蘭每一个县里都有一个匪帮，每个匪帮都有一个称号，一个比一个自由，一个比一个民主。

把工农平等奉献給我們的是"劳动农民利益的維护者"，他們大半是社会革命党人。另外的人，像舍尔先生那样，虽然学过馬克思主义，但是毕竟不懂得，在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工农平等是不可能的；应該認为，許以这种平等的人就是在發展高尔察克綱領，虽然他們并沒有了解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說，任何一个人，只要稍微考虑一下这个遭到特别厉害的破坏的国家的具体条件，就

会明白这个道理。

那些硬說我国現在处于資产阶級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者"經常責备我們，說我們的共产主义是消費的共产主义。有些人补充說，这是士兵的共产主义。他們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高过这种"下賤"形式的共产主义。这純粹是一些玩弄字眼的人。他們看書，讀書，反复背誦，但是一点也不懂得書中的意思。这样的学者是有的，他們甚至是极有学問的人。他們在書中看到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發展。考茨基甚至現在还一直在重复这一点。我前兩天看了一份我們偶尔得到的德国报紙，上面談到了德国最近一次的苏維埃代表大会。考茨基在大会上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調指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太太，因为他病了，他的太太替他宣讀报告) 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發展，是生产，無論資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能維持下去，可是德国工人不懂得这一点。

可憐的德国工人！他們正在同謝德曼和諾斯克作斗爭，同劊子手作斗爭，竭力推翻仍以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居的劊子手謝德曼和諾斯克的政权，他們認为正在进行內战。李卜克內西被杀害了，盧森堡被杀害了。俄国的一切資产者說（这曾登載在叶加特林諾达尔报紙上)："就应該这样对付我国的布尔什維克！"报紙上就是这样登的。懂事的人清楚地知道，整个国际資产阶級都主張这样做。应当进行自衛。謝德曼和諾斯克在进行反对無产阶級的內战。战爭毕竟是战爭。德国工人認为，現在正处于內战时期，其余一切問題都是次要的。首先应該使工人有飯吃。考茨基却認为这是士兵的或消費的共产主义。应該發展生产！……

哦，聪明絕頂的先生們！但是在一个为帝国主义者所掠夺所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沒有煤、沒有原料、沒有工具的国家里，你們怎么能發展生产呢？"發展生产"！我們人民委員会或国防委員会每次开会都在分配殘存的几百万普特的煤或石油，我們很苦惱，每个委員只拿到殘存的一点物資，感到不够，不得不决定关閉某些工厂，不得不使某些工人失业，——这是一个令人苦惱的問題，但是只有这样做，因

为沒有煤。煤在頓巴斯，由于德寇的侵犯，煤被毀掉了。請你們看看比利时和波蘭，这是个典型現象，到处都呈現出帝国主义战爭的后果。这就是說，失业和飢餓現象还要存在很多年，因为有些被淹的矿井过許多年也是恢复不起来的。可是有人对我們說："社会主义就是提高生产率。"可爱的先生們，你們讀書，写書，但是絲毫不懂得書中的內容。(鼓掌)

从資本主义社会在和平时期会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我們除了提高生产率而外，当然沒有其他更迫切的任务。不过应当加上"假使"二字。假使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产生，資本家先生們也是不願意讓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說还有点不够。假使連战爭也沒有，所有的資本家先生也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發展。偉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資产阶級所發动的瘋狂战爭而告終。如果从阶級斗爭的观点来看这个問題，而不是从孟什維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整个"民主派"用以款待我們的关于自由、平等、劳动民主和多数人的意志的市儈的愚蠢的空談来看，也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以和平方式發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在目前这个时期，在帝国主义战爭剛剛結束之后，就来談什么和平發展，是很可笑的，特别是在一个經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拿法国来說。法国是个战胜国，然而粮食生产也縮減了一半。在英国，我从英国的資产阶級报紙上看到，人們都說："我們現在是乞丐了。"而在一个經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竟責备共产党人使生产陷于停頓！說这种話的人，尽管再三自称是伯尔尼国际的領袖，他不是十足的白痴，就是工人的叛徒。

在一个經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們能活下去，我們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

我們还要忍受許多年的貧困，許多年的倒退，向野蛮方面的倒退。帝国主义战爭使我們倒退，使我們向野蛮方面倒退。如果我們能够拯救劳动者，拯救人类的主要生产力——工人，我們就能挽救一

切，如果我們不能拯救工人，我們就会灭亡；因此，再說一遍，誰在这个时候大喊消費的和士兵的共产主义，鄙視别人，自以为高过这些布尔什維克党員，他就一点也不懂得政治經济学，只是抓住引文，像一个腦袋里裝着引文卡片的学者一样，一旦遇到書中沒有談到的新問題，就束手無策，拿出恰恰不該拿出的引文来。

在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我們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維持工人的生活，拯救工人，而工人会死亡，是因为工厂停工，工厂停工是因为沒有燃料，是因为我們的生产不合理，工业同原料产地隔絕。全世界都是如此。俄国棉紡織厂需要的原料，要从埃及和美国运来，再近也要从土尔克斯坦运来，当反革命匪帮和英国軍队占領了阿什哈巴德和克拉斯諾沃茨克的时候，請你們把棉花从土尔克斯坦运来吧，当鉄路無法运輸，遭到破坏，陷于停頓而又沒有煤的时候，請你們把棉花从埃及从美国运来吧。

必須拯救工人，虽然他們無法工作。如果我們能拯救工人，熬过这几年，我們就能拯救国家、社会和社会主义。如果我們不能拯救，我們就会滾回去，滾回雇佣奴隶制去。关于社会主义的問題就是这样摆着的，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从那些迷恋于和平方式的、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傻瓜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現实中，从激烈的极端殘酷的阶級斗爭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事实。为了拯救工人，应当不惜牺牲一切。我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發的。有人走来对我們說："我們主張劳动民主的平等，而你們共产党人甚至不讓工人和农民平等"；那我們回答說：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飽腹的粮食投机者和挨餓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如此，我們的宪法才說工人和农民是不平等的。

你們說，他們应該是平等的吧？那讓我們来衡量一下，計算一下。拿六十个农民和十个工人来說。六十个农民有余粮。他們衣服襤褸，但是他們有粮食。而十个工人呢，在帝国主义战爭結束之后，他們衣服襤褸，受尽折磨，沒有粮食、燃料和原料。工厂停工。怎么样，你們認为他們是平等的嗎？六十个农民有决定的权利而十个工人应

当服从嗎？这眞是平等、劳动民主的統一和多数人的决定的偉大原則！

他們就是这样对我們說的。我們回答說："你們是一些小丑，因为你們用一些动听的話来迴避和掩盖飢餓的問題。"

請問你們：在一个經济遭到破坏、工厂停工的国家里，如果农民不把余粮拿出来，挨餓的工人是不是有服从多数农民的决定的权利呢？如果用其他方法不行，他們有沒有甚至用暴力取得这些余粮的权利呢？請直截了当地回答吧！可是一拿出問題的实質，他們就轉弯抹角和支吾搪塞了。

各国的工业都遭到破坏，而且这种狀况將繼續好几年，因为燒掉工厂或淹沒矿井是輕而易举的事情，炸毀車廂、搗毀机車也是輕而易举的事情，任何一个傻瓜，不管他是德国軍官或法国軍官，做这种事都是很能干的，特别是他有了进行爆炸、射击等等的优良裝备的时候；然而恢复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它需要好多年的时間。

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級：他們是劳动者，是資本主义剝削的敌人，但同时又是私有者。农民几百年来一直認为，粮食是他的，他可以随便出卖。他們認为，这是我的权利，因为这是我的劳动，我的血汗。要很快改变他們的心理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長期艰巨的斗爭过程。誰以为用一个說服一个的办法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至少是三岁小孩子，要不然就是政治騙子，而大多数在政治講台上講演的人，当然是屬于后一类的。

問題是这样摆着的：农民习慣于自由买卖粮食。我們摧毀了資本主义机关，但是还存在着一种支持資本主义的力量，这就是习慣的力量。我們愈坚决地摧毀支持資本主义的机关，而另一种支持資本主义的力量即习慣的力量就表現得愈明显。干得好，机关是能一下子打碎的，但是不管干得怎样好，习慣是永远不能一下子打破的。我們把全部土地交給了农民，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下解放了出来，摧毀了束縛他們的一切，但是，他們仍然認为自由出卖粮食是"自由"，必須按照固定价格出卖余粮是不自由。农民憤慨地說，这是怎么一

回事，这算什么"給土地"；特别是在我們的机構很糟的时候，他們更是这样說，而机構很糟，是因为整个資产阶級知識界都站在苏哈列夫卡㊀那边。显然，这种机構应該依靠那些正在学习、即使是忠誠老实也至少要学几年才学得会的人，只要他們沒有学会，我們的机構还是糟的，有时甚至会有各种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騙子混进来。这种危險威胁着任何一个执政的党，威胁着任何一个胜利了的無产阶級，因为既不能一下子摧毀資产阶級的反抗，也不能一下子建立起完善的机構。我們清楚地知道，粮食人民委員部的机構还更糟。不久以前，对非农业省份的工人的粮食供应情况做了科学的統計調查。原来他們的一半粮食是从粮食人民委員部那里得到的，另一半是从投机者那里得到的，前一半占他們全部購粮支出的十分之一，后一半占十分之九。

一半粮食是由粮食人民委員部收集和供給的，当然有些缺点，但它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而不是按照資本主义方式收集的。收集这一半粮食是靠战胜了投机者，而不是靠同投机者勾搭，是有利于挨餓的工人，而損害了社会上的其他一切利益，其中包括孟什維克、社会革命党人之流的先生們所夸耀的那种形式上"平等"的利益。諸位先生們，你們死守着你們的"平等"吧，而我們則要跟挨餓的工人在一起，把他們从飢餓中拯救出来。不管 孟什 維克 怎样責 备我們破坏 "平等"，事实却是这样的：我們在空前未有的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解决了粮食任务的一半。所以我們說，如果六十个农民有余粮，而十个工人在挨餓，那应該談的就不是一般"平等"、"劳动者的平等"，而是六十个农民無条件地必須服从十个工人的决定，把余粮交給他們，即使貸給他們也好。

全部政治經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的話）、全部革命史、全部十九世紀政治發展史都告訴我們，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資产者走。他不能走别的道路。当然，这种說法在某些民主主义者听来

㊀ 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市場，国内战爭时期，投机商和粮販曾在此进行黑市交易。——譯者注

也許是不堪入耳，因为他們認为我是在用馬克思主义的惡毒詞句誣蔑农民。农民占多数，他們是劳动者，竟不能走自己的道路！为什么呢？

要是你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奉劝这样的先生們去讀一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济学入門，讀一讀考茨基对馬克思学說的叙述，去想一想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任何一次大革命的發展和十九世紀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吧。它会告訴你們为什么。資本主义社会的經济是这样的：能够成为統治力量的只有資本或打倒資本的無产阶級。

在这个社会的經济中，其他的力量是沒有的。

农民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农民是劳动者，因为他用血汗掙来粮食，他受地主、資本家和商人剝削。农民是投机者，因为他出卖粮食，出卖必需品，誰要沒有这种必需品，甚至要拿出全部財产去換它的。飢餓是無情的，为了买到粮食，花一千盧布也可以，花多少也可以，甚至付出全部的財产。

这不是农民的罪过，因为他的經济条件是这样的：他生活在商品經济中，生活了几十年几百年，习慣于用自己的粮食換貨幣。习慣不是一下子改得了的，貨幣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要消灭貨幣，必須建立亿万人的产品分配組織，——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所以只要商品經济存在，只要挨餓的工人和隐藏余粮的飽腹的农民同时存在，工农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就会存在，誰用“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的空談来迴避这个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对立，他至少是一个空談家，要不然就是一个拥护資本主义的伪君子。如果資本主义战胜了革命，那是它利用农民的愚昧無知，收买他們，用恢复自由貿易引誘他們的結果。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事实上是站在資本主义方面来反对社会主义的。

高尔察克、邓尼金和所有俄国白衛分子的經济綱領就是自由貿易。他們是懂得这一点的，舍尔先生不懂得这一点，这并不是他們的过錯。生活中的經济事实并不因某个政党不懂得它們就会改变。資产阶級的口号就是自由貿易。有人竭力欺騙农民說：“照旧生活下去

不更好嗎？靠自由出卖农业劳动来生活不更好嗎？什么比这更公平呢？”自覚的高尔察克分子是这样說的，而且从資本的利益来看，他們是对的。为了恢复俄国資本权力，需要依靠傳統，依靠农民的偏見，依靠自由貿易的旧习慣，需要用暴力鎮压工人的反抗。别的出路是沒有的。从資本的观点来看，高尔察克分子是对的，他們在自己的經济和政治綱領中說得头头是道，懂得从何开头从何結尾，懂得农民的自由貿易和对工人的殘杀之間的联系。联系是有的，虽然舍尔先生不了解这种联系。粮食貿易自由是高尔察克分子的經济綱領，槍杀成千上万的工人（如在芬蘭）是实現这个綱領的必要手段，因为工人不会白白放棄他們的果实。联系是密切的，而那些一点不懂經济科学和政治的人，那些由于自己市儈的懦怯心理而忘記了社会主义原理的人，即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企圖用“平等”、“自由”的空談使我們忘記这种联系，他們大喊大叫，說我們破坏“劳动民主”內部的平等原則，說我們的宪法是“不公平的”。

几个农民的票等于一个工人的票，这是不公平嗎？

不，这在必須打倒資本的时代是公平的。我知道你們的公平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你們的这些概念是从昨天的資本主义时代来的。商品所有者、他的平等、他的自由，——这就是你們的公平概念。这是小資产阶級偏見的殘余，这就是你們所謂的公平、平等和劳动民主。在我們看来，公平应該服从于打倒資本的利益。除了無产阶級团結一致、共同努力而外，用其他办法是不能打倒資本的。

能不能使千百万农民一下子就巩固地联合起来去反对資本、反对自由貿易呢？由于經济条件的限制，你們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农民十分自由并有高得多的文化，这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这需要其他的經济条件，需要多年的准备。那末，誰来进行这种准备呢？不是無产阶級，就是資产阶級。

农民由于自己在資产阶級社会中所处的經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資产阶級走。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他們可能动摇不定，糊里糊塗，耽于幻想，他們也可能發牢騷，講怪話，咒罵無产阶

級的"狹隘的"代表和資产阶級的"狹隘的"代表，說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都是少数。可以咒罵他們，可以高談多数，高談你們劳动民主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高談純粹民主。要講什么都可以。但这些說法只是掩盖一个事实：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資产阶級走。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而在工人挨餓、工业停頓这样极端困难的历史轉变时期，那些不是按照較公平的价格而是按照"自由的"价格，按照資本主义的和生意人的价格把粮食拿来帮助工人的人，不管他們本人怎样竭力否認，不管他們怎样眞心地相信他們是在誠心誠意地实行自己的綱領，他們都是在实行高尔察克分子的綱領。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七月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一四至三三三頁）

中国社会各阶級的分析*

（一九二六年三月）

毛 泽 东

誰是我們的敌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这个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結眞正的朋友，以攻击眞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結我們的眞正的朋友，以攻击我們的眞正的敌人。我們要分辨眞正的敌友，不可不將中国社会各阶級的經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級和买办阶級。在經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級和买办阶級完全是国际資产阶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級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發展。他們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

---

* 毛澤东同志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內存在着的兩种傾向而写的。当时党內的第一种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記了农民，这是右傾机会主义。第二种傾向，以張国燾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記了农民，这是"左"傾机会主义。这兩种机会主义都感覚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軍。毛澤东同志指出中国無产阶級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軍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軍問題。毛澤东同志并且預見到当时的民族資产阶級是一个动摇的阶級，他們在革命高漲时將要分化，其右翼將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發生的事变，証明了这一点。

大地主阶級和大买办阶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㊀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級。这个阶級代表中国城乡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級主要是指民族資产阶級，他們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們在受外資打击、軍閥压迫感覚痛苦时，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国主义反軍閥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內有本国無产阶級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無产阶級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資产阶級地位的阶級的發展感覚到威胁时，他們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張为实現民族資产阶級一阶級統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㊁"眞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㊂上發表議論說："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兩句話，画出了这个阶級的矛盾惶遽狀态。他們反对以阶級斗爭学說解釋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們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納共产党㊃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級的企圖——实現民族資产阶級統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現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作最后斗爭的局面。这兩大勢力竪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級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

㊀ 国家主义派，指当时組織"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来又改名"中国青年党"的一小撮法西斯主义的無耻政客。他們以反对共产党和反对苏联、而向各种当权的反动派及帝国主义領取津貼为其反革命的职业。

㊁ 戴季陶，早年参加国民党，曾經和蔣介石共同經营交易所的投机事业。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之后，他即从事于反共的煽惑工作，为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举行反革命政变作了精神上的准备。在長期中，他都是蔣介石反革命的忠实走狗。一九四九年二月，他看到蔣介石的統治即將崩溃，前途已經絕望，因而自杀。

㊂ 北京"晨报"为当时在政治上拥护北洋軍閥統治的政团之一——研究系的机关报。

㊃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改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容納共产党人参加該党，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当时毛澤东同志和李大釗、林伯渠、瞿秋白等同志都参加了这个大会，对于帮助国民党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們并被选为当时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員或候补执行委員。

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間阶級，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級，以其本阶級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小資产阶級。如自耕农㊀，手工业主，小知識阶層——学生界、中小学教員、小員司、小事务員、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屬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級，在人数上，在阶級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經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經济。这个小資产阶級內的各阶層虽然同处在小資产阶級經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錢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腦力劳动所得，除自給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發財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㊁礼拜最勤，虽不妄想發大財，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級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东，往往垂着一尺長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們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們的經济地位和中产阶級頗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級的宣傳頗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資产阶級中占少数，是小資产阶級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經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給的。这一部分人比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們也想發財，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讓他們發財，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軍閥、封建地主、买办大資产阶級的压迫和剝削，他們感覚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从前的世界。他們覚得現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維持生活。必須增加劳动时間，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維持生活。他們有点罵人了，罵洋人叫"洋鬼子"；罵軍閥叫"搶錢司令"，罵土豪劣紳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軍閥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軍閥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貿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絕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資产阶級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謂殷实人家，漸漸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漸漸变得生活下降了。他們每逢年

㊀ 毛澤东同志在这里是指中农。

㊁ 赵公元帅是中国民間傳說的財神，叫赵公明。

終結賬一次，就吃惊一次，說："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們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負債漸多，漸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慄"。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覚的痛苦很大，因为他們有一个从前和現在相反的比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頗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資产阶級的左翼。以上所說小資产阶級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漲、可以看得見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資产阶級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無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們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㊀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經驗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錯的。

半無产阶級。此处所謂半無产阶級，包含：(一)絕大部分半自耕农㊁，(二)貧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員㊂，(五)小販等五种。絕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貧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謂农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半自耕农、貧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經营的，都是更細小的小生产的經济。絕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貧农虽同屬半無产阶級，但其經济狀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細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約有一半不够，須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經营小商，以資弥补。春夏之間，青黃不接，高利向

㊀ 指一九二五年全国人民抗議五月三十日上海英国巡捕屠杀中国人民事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間，青島上海各地日本紗厂先后發生工人罢工的斗爭，規模很大，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軍閥的鎮压。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紗厂資本家槍杀工人顧正紅，伤工人十余人。二十八日青島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三十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内宣傳声援工人，号召收回租界，随后集合群众万余人，在英租界捕房門首，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全中国人民团結起来"等口号。英帝国主义巡捕旋即开槍屠杀，死伤許多学生，是为著名的"五卅惨案"。这个大屠杀事件發生后，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憤，到处發生游行示威、罢工、罢課和罢市，形成極大規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㊁ 毛澤东同志在这里是指半自耕半租佃的貧苦农民。

㊂ 中国店員有不同的阶層。毛澤东同志这里所指的是在店員中比較占多数的人；还有一部分下層店員則是过着無产阶級的生活。

別人借債，重价向別人糴粮，較之自耕农的無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貧农。因为貧农無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則租于別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貧农。貧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剝削。其經济地位又分兩部分。一部分貧农有比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資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結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撈魚蝦、飼鷄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維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較另一部分貧农为优。其革命性，則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貧农。所謂另一部分貧农，則既無充足的农具，又無資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無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憐，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債务叢集，如牛負重。他們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傳。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無产阶級，是因为他們虽然自有簡單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們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經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貧农相当。因其家庭負担之重，工資和生活費用之不相称，时有貧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貧农亦大致相同。店員是商店的雇員，以微薄的薪資，供家庭的費用，物价年年增長，薪給往往須数年一增，偶与此輩傾談，便見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貧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傳极易接受。小販不論肩挑叫卖，或街畔攤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貧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現狀的革命，也和貧农相同。

無产阶級。現代工业無产阶級約二百万人。中国因經济落后，故現代工业無产阶級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鉄路、矿山、海运、紡織、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資产业的奴役下。工业無产阶級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級，做了革命运动的領导力量。我們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員罢工㈠、鉄路罢工㈡、开灤和焦作煤矿罢工㈢、沙面罢工㈣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兩处的大

罢工㈠所表現的力量，就可知工业無产阶級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們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無論那种人都不如他們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經济地位低下。他們失了生产手段，剩下兩手，絕了發財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軍閥、資产阶級的极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碼头搬运夫和人力車夫占多数，糞夫清道夫等亦屬于这一类。他們除双手外，别無長物，其經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的資本主义的农业。所謂农

㈠ 指一九二二年初的香港海員罢工和長江船員的罢工。香港海員罢工坚持了八个星期，經过激烈的流血的斗爭，最后香港英帝国主义当局被迫承認增加工資，恢复原工会，釋放被捕工人，撫邮死难工人。長江船員工人繼起發动罢工，坚持兩星期，也得到胜利。

㈡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建立后，就在鉄路工人中进行組織工作，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各个主要鉄路綫上，都在共产党領导下有过罢工斗爭。最有名的一次，是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京汉鉄路（即北京到汉口的鉄路）工人們为爭取組織总工会的自由而举行的总罢工。为英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北洋軍閥吳佩孚、蕭耀南，在二月七日对罢工工人实行了殘酷的屠杀，是为历史上有名的"二七慘案"。

㈢ 开滦煤矿，是开平滦州兩个煤矿区的总称，在中国的河北省，是互相联系的大煤矿区，矿工五万余人。英帝国主义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时候掠夺了开平煤矿，中国人乃另組滦州煤矿公司，后来又并入开滦矿务总局，兩矿遂都为英帝国主义所独占。开滦罢工，是指一九二二年十月間的罢工。焦作煤矿原屬河南省，在現在平原省的西部，是中国著名的煤矿区。焦作罢工，是指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至八月九日的罢工。

㈣ 沙面当时是英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借地。一九二四年七月，統治沙面的英帝国主义者，頒布一新警律，規定沙面中国人出入租界，必須携帶貼有本人像片的执照，但外国人却可自由出入。沙面工人于七月十五日宣布罢工，抗議这个無理措施。結果英帝国主义者被迫取消了新警律。

㈤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上海事件后，六月一日开始上海总罢工，六月十九日开始香港总罢工。前者参加罢工的人数为二十余万，后者为二十五万。香港大罢工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中时間最長的一次罢工。

村無产阶級，是指長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無土地，無农具，又無絲毫資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間之長，工資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貧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無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們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魯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㊀，都曾經是他們的政治和經济斗爭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問題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綜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結帝国主义的軍閥、官僚、买办阶級、大地主阶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动知識界，是我們的敌人。工业無产阶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导力量。一切半無产阶級、小資产阶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时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扰乱了我們的陣綫。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七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一卷排印）

㊀ 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青帮，是一些原始形式的民間秘密团体，这些組織的組成分子主要的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浪無产者等。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类成份常常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紐帶，而在家長制的組織形式下，形成种种名目不同的組織，有的还拥有武装。他們曾經用这种組織去求在社会生活中的互相援助，并在一定时期中曾經用以發动斗爭，去反抗压迫他們的官僚和地主。但很显然，农民和手工业者是不可能从这种落后性的組織中得到出路的。这种落后性的組織又往往容易被地主豪强势力所操縱和利用，加上他們帶有盲目的破坏性，因此有的就变成了反动的力量。一九二七年蔣介石举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曾經利用过这种落后的組織作为破坏劳动人民团結和破坏革命的工具。当近代工业無产阶級的力量盛大兴起以后，农民在工人阶級領导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組織，这类原始的落后的組織就失掉了它們的存在价值。

論人民民主專政

——紀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

毛　澤　东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經走过了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壯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級消灭了，作为阶級斗爭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將因其丧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类社会。我們和資产阶級政党相反。他們怕說阶級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們則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創設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和人民專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認这一条眞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沒有讀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剛才进党的青年同志們，也許还不懂得这一条眞理。他們必須懂得这一条眞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們必須懂得，消灭阶級，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問題只是时間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資产阶級高明，他們懂得事物的生存和發展的規律，他們懂得辯証法，他們看得远些。資产阶級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眞理，是因为他們不願意被人們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們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們及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說，这是痛苦的，不堪設想的。工人阶級，劳动人民和共产党人，則不是什么被推翻的問題，而是努力工作，創設条件，使阶級、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为着

說清我們在下面所要說的問題，在这里順便提一下这个人类进步的远景的問題。

我們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們要和国內外党內外的敌人作战。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們給了我們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槍，而是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在"'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論的經过。俄国人曾經在几十个年头內，經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馬克思主义。中国有許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經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兩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則更落后。先进的人們，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眞理，这是相同的。

自从一八四〇年鴉片战爭失敗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經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眞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眞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內廢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資产阶級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謂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說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謂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們，在很長的时期內产生了一种信心，認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資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們成功地建設了資产阶級的現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夢。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

总是不能实現。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規模的运动，都失敗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蘊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国無产阶級及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領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發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个嶄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眞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馬克思主义，是經过俄国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給我們送来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無产阶級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問題。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結論。一九一九年，中国發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絕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蔣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長时間中，蔣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絕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軍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削弱了兩个帝国主义大国，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沒有損失。而美国的国內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蔣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之下，在驅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爭，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就是这样，西方資产阶級的文明，資产阶級的民主主义，資产阶級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資产阶級的民主主义讓位給工人阶級領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資产阶級共和国讓位給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經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級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

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資产阶級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經过工人阶級領导的人民共和国。

一切别的东西都試过了，都失敗了。曾經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們，有些倒下去了，有些覚悟过来了，有些正在換腦筋。事变是發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們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中国無产阶級的先鋒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爭，經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經驗，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終遺囑里所說“积四十年之經驗”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結論，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須喚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們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級立場出發去观察和处理問題，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爭的問題上，却和我們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結論。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論和实踐，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發展了，根本上变換了中国的面目。到現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这兩件事：(一)在国內，喚起民众。这就是团結工人阶級、农民阶級、小資产阶級和民族資产阶級，在工人阶級領导之下，結成国內的統一战綫，并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阶級領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新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無产阶級及广大人民，結成国际的統一战綫。

“你們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須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条道

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蔣介石反动派，我們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不但中国，全世界也一样，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絕無例外。中立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是沒有的。

“你們太刺激了”。我們講的是对付国內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們，不是講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發生刺激与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們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覚和注意，長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学景阳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們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們只反对妨碍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須知，妨碍我們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們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动派。团結国內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內外反动派，我們就有生意可做了，我們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錯誤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眞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偉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斯大林早已告訴我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并建立各新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人民中国的現在和將来，也是这样。請大家想一想，假如沒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沒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沒有各新民主国家的出現，假如沒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爭，假如沒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資本主义国家內部的人民大众和統

治他們的反动派之間的斗爭，假如沒有这一切的綜合，那么，堆在我們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們能够胜利么？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經驗是太多了。孙中山临終时講的那句必須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話，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經驗。

"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現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現时英美的統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們会給人民国家以援助嗎？我們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設这些国家在將来願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錢給我們，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資本家要賺錢，銀行家要賺利息，借以解救他們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成和我們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資产阶級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論。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經無数次地向資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請讀者們看一看孙先生的遺囑罢，他在那里諄諄囑咐人們的，不是叫人們把眼光向着期待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們"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經驗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們要記得他的話，不要再上当。我們在国际上是屬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綫一方面的，眞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綫一方面去找。

"你們独裁"。可爱的先生們，你們講对了，我們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实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剝夺反动派的發言权，只讓人民有發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現阶段，是工人阶級，农民阶級，小資产阶級和民族資产阶級，这些阶級在工人阶級及共产党的領导之下，团結起来，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級和官僚資产阶級以及代表这些阶級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

凶們实行專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乱說乱动。如要乱說乱动，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內部，則实行民主制度，給予言論集会結社等項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給人民，不給反动派。这兩方面，对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你們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嗎"？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还不要，我們現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內反动派还存在，国內阶級还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保护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級及共产党的領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級和实現大同。軍队、警察、法庭等項国家机器，是阶級压迫阶級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級，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們不仁"。正是这样。我們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級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們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內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級的反动行为。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圍內和全体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离內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現在还是很大的，并將在長时期內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慣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并繼續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發展。

我們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处罰，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級当作一个阶級的專政来說，有原則的区别。

对于反动阶級和反动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坏，不搗乱，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們如果不願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們劳动。也对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对俘虜軍官們已經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說是“施仁政”罢，但这是我們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級的人們所强迫施行的，和我們对于革命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論。

这种对于反动阶級的改造工作，只有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剝削阶級——地主阶級和官僚資产阶級即壟断資产阶級，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資产阶級，在現阶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們进行許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將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們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資产阶級造反。

严重的問題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經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时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沒有农业社会化，就沒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須發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必須有步驟地解决这个国家工业化的問題。本文不打算多談經济問題，这里不来詳說。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領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說：“近世各国所謂民权制度，往往为資产阶級所專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蓋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則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誰領导誰这一个問題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綱領来說，这里所說的民权主义，是和我們所說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許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許为資产阶級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級的領导，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制度了。

蔣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資产阶級和地主阶級的專政作为

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專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現在才为我們領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

罵我們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們。他們实行了資产阶級对無产阶級及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級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級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說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資产阶級，正是指的这些人。蔣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許多書，說了許多話，大家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还沒有忘記："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們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項对待反革命阶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权，他們的政权就会被內外反动派所推翻，內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級、农民阶級和城市小資产阶級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兩个阶級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兩个阶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兩个阶級的联盟。

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阶級的領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級最有远見，大公無私，最富于革命的徹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証明，沒有工人阶級的領导，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阶級的領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級，都不能領导任何眞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資产阶級和民族資产阶級曾經多次領导过革命，都失敗了，就是明証。

民族資产阶級在現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們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惡的。中国要实現經济上的眞正的独立，还需要經过很長的时間。只有中国的工业發展了，中国在經济

上不倚賴外国了，才有全部的眞正的独立。中国的現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經济上的比重是很小的。現在还沒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計，現代工业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經济总生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經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須利用一切于国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資本主义因素，团結民族資产阶級，共同奋斗。我們現在的方針是节制資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資本主义。但是民族資产阶級不能充当革命的領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資产阶級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領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資产阶級的社会經济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远見，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孙中山主張"喚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誰去"喚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說小資产阶級和民族資产阶級。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敗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資产阶級和民族資产阶級不可能領导任何眞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我們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們有許多宝貴的經驗。一个有紀律的有馬、恩、列、斯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領导的軍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領导的各革命阶層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战綫。这三件是主要的經驗。这些都是我們区別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們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們曾和党內的机会主义傾向作斗爭，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錯誤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来了，我們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錯誤总是难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越迅速，越徹底，越好。

总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級（經过共产党）領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这个專政必須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結一致。这就是我們的公式，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这就是我

們的主要綱領。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長时期，我們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爭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們的事情还很多，譬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余的敌人尚待我們扫灭。严重的經济建設任务摆在我們面前。我們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閑起来了，我們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們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們办不好經济。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

我們必須克服困难，我們必須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学經济工作。拜他們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鑽进去，几个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会办經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們的失敗。但是联共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領导之下，他們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来了一个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联共学习。国际和国內的形势都对我們有利，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这个武器，团結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單行本排印)

关于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議的討論，由人民日报編輯部写成的）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总結了国际关系和国内建設的新經驗，作出了关于坚定地执行列宁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可以和平共处的政策、發展苏維埃的民主制度、貫徹遵守党的集体領导的原則、批判党內的缺点、規定發展国民經济的第六个五年計划等等一系列的重大决定。

反对个人崇拜的問題，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銳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現象曾經在一个長时間內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許多工作上的錯誤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錯誤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評，表現了党內生活的高度原則性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偉大生命力。

在过去历史上，在現在一切的資本主义国家中，沒有任何一个为剝削阶級服务的当权政党或者政治集团敢于在自己的党員群众面前，在人民群众面前，認眞地揭露自己的严重錯誤。工人阶級的政党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工人阶級的政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党，对于它們說来，实行自我批評，除了失掉錯誤以外，什么都不会失掉，而所得到的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兴高采烈地談論苏联共产党关于个人崇拜的自我批評。他們說：好！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共产党居然犯了严重的錯誤，而且还是一个有很大声名和荣誉的領导人物斯大林犯了这样的錯誤。反动派以为，

他們現在是抓住了一个能够用来中伤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把柄了。可是，反动派毕竟是"心劳日拙"的。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什么著作中曾經說过我們是永远不会犯錯誤的，或者曾經說过某一个共产党人是絕对不会犯錯誤的呢？我們共产党人的党內生活所以有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制度，难道不是因为我們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否認有什么不会犯或大或小的錯誤的"神人"嗎？何况一个在世界上史無前例的首先实行無产阶級專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設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錯誤呢？

一九二一年十月間，列宁說过：

"讓垂死的資产阶級和依附着它的小資产阶級民主制度的走狗和瘟猪們，用層出不穷的詛咒、謾罵、嘲笑来攻击我們，責难我們所建設的我国苏維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錯誤吧。我們一分鐘也沒有忘記，我們工作中的失利和錯誤，無論过去或現在，确实是很多的。在这样的全世界历史上的新奇事业，即創立空前未見的新式国家制度中，难道能够沒有失利和錯誤嗎！我們將百折不回地来为糾正我們的失利和錯誤而奋斗，力求改善我們实际运用苏維埃原則这方面还远未完善的方法。"

也不可能設想：初期有过某些錯誤，就將命定地永远不会再犯某些其他的錯誤，而且命定地不会或多或少地再犯原来有过的錯誤。自从人类社会分裂为几个利害不同的阶級以来，經历过奴隶主的專政，封建主的專政，資产阶級的專政，这些專政繼續了几千年；而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人类才开始經历無产阶級的專政。前三个專政都是剝削阶級的專政，但是封建主的專政比奴隶主的專政要进步些，資产阶級的專政又比封建主的專政要进步些。这些在社会發展史上曾經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剝削阶級，总是在很長的时期中犯过無数历史性的錯誤，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才能积累他們的統治經驗。但是随着他們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間的矛盾的尖銳化，他們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錯誤，激起被压迫阶級的大規模反抗和他們自己內部的分崩离析，以至促进了自己的灭亡。無产阶級

的專政和以前任何剝削阶級的專政，在性質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剝削阶級的專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專政，是为着創造沒有剝削、沒有貧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專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專政。这样的專政，担負着历史上最偉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爭，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說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錯誤。如果有些共产党人發生驕傲自滿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們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錯誤。这一点，我們共产党人是必須充分地估計到的。为着战胜强大的敌人，無产阶級專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須和高度的民主相結合的。当着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調了的时候，就会出現許多錯誤。这一点，也是人們所完全能够理解的。可是，無論有怎样的錯誤，对于人民群众說来，無产阶級專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剝削阶級專政的制度，比起資产阶級專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列宁說得很对："如果我們的敌人責难我們說：看，列宁自己也承認，布尔什維克做了大量的蠢事；那我就想这样来回答他們：对的，但是你們是否知道，我們的蠢处較之你們說来，終究完全是另一种性質的。"剝削阶級为了掠夺的目的，总是希望使他們的專政能够永远保持下去，由一世傳到万世，因而用尽千方百計来折磨人民，他們的錯誤是無法克服的。但是無产阶級为了在物質上和精神上解放人民的目的，却是要利用自己的專政条件，实現共产主义，实現人类大同，讓自己的專政逐步地消逝下去，因而就要尽量地發揮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而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在無产阶級專政之下的無限發揮的可能性，也就包含着克服無产阶級專政时代所犯各种錯誤的可能性。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領导人物的責任是要尽量減少錯誤，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錯誤，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暫时的錯誤中取得教訓，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暫时的錯誤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長时期的錯誤。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領导者都十分謹慎和謙遜，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調查研究实

际的情况，經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領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錯誤，就是因为他沒有这样做。他驕傲了，不謹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問題做出了錯誤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由于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列宁的領导之下，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迅速地实現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現了农业的集体化，發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在苏維埃联盟的形式下形成了国內多民族的巩固的联盟，苏联国內原来落后的民族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敗法西斯的主力，挽救了欧洲的文明，并且帮助东方人民打敗了日本軍国主义。这一切燦爛的成就，給全人类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大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統治，使苏联在全世界爭取持久和平的斗爭中成为第一个坚强的堡壘。苏联鼓舞和支持了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設，鼓舞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和一切爭取人类进步的运动。这些都是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人类历史上所創造的偉大业績。給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指出創造这种偉大业績的道路的，是列宁。在为实現列宁的方針而进行的斗爭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强有力的領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領导人物的斯大林，創造性地运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衛列宁主义遺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其他資产阶級代理人的斗爭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願，不愧为杰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贏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領导人在一起維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維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綫。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綫，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

希特勒的战爭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級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但是，当着斯大林正确地运用列宁主义的路綫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的荣誉的时候，他却錯誤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領导相对立的地位，結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傳的某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承認党必須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須發展党內民主，發展自我批評和自下而上的批評，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專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問題上陷于理論和实踐相脫节的矛盾。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認为領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爭的前列，而領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認个人的作用，否認先进人物和領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領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脫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錯誤的决定。斯大林在某些問題上沒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暫时的錯誤中引出教訓，而使这些錯誤不致变为全国范圍的和長时期的严重錯誤。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賞个人崇拜，違反党的民主集中制，違反集体領导和个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因而發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錯誤：在肃反問題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爭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發展和农民的物質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作了錯誤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問題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脫离了客观实际狀况，脫离了群众。

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長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遺产。个

人崇拜不只在剝削阶級中間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間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長制就是小生产經济的产物。在無产阶級專政建立之后，即使剝削阶級消灭了，小生产經济已經由集体經济所代替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但是旧社会的腐朽的、帶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残余，还会在人們的头腦中，在一个很長的时期內保存下来。“千百万人的习慣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慣势力。这种习慣势力既然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也就有可能給予許多国家工作人員以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領导人物也受了这种影响。个人崇拜是社会現象在人們头腦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領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轉过来再影响給社会，造成事业的損失，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創造性。

發展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經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党的生活，日益和个人崇拜这类精神狀态互相矛盾着，互相冲突着。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爭，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阻碍物的一个偉大的、勇敢的斗爭。

有一些天眞爛漫的想法，仿佛認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認矛盾存在，就是否認辯証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質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發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發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的現象，都將是必然要繼續發生的，否則，社会的發展就將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現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將来要走的路，將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長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將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現。一切都还將是这样：一个矛盾將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認为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

除掉，这个意見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論和唯心論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將存在，还將經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現出来。人們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滿無缺的。那个时候，人們本身也还將有自己的矛盾，还將有好人和坏人，还將有思想比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們之間也还將有斗爭，不过斗爭的性質和形式不同于阶級社会罢了。

这样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个人和集体的矛盾現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而任何党和国家的領导人物如果脫离集体領导，脫离人民群众，脫离实际生活，他們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思想硬化起来，以致做出严重的錯誤。对于我們必須警惕的，就是：有些人当他們因为党和国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績，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的时候，便有可能利用这种群众的信任去濫用权威，做出一些錯事来。

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爭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中国革命的經驗同样証明：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領导和个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才使我們党不論在革命时期或者在国家建設时期都能够取得偉大的胜利和成就。中国共产党过去在革命队伍中曾經不断地反对脫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毫無疑义，脫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現象还是会長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現。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現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現出来。人們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見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錯誤。因此，反对脫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該經常加以注意的問題。

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領导方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間，曾經作出了一个关于領导方法的决定。在現在說到

有关党的集体領导問題的时候，提一下这个决定，对于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員和它的一切領导人員說来，將仍然是有好处的。这个决定写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屬正确的領导，必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說，將群众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来（經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众中去作宣傳解釋，化为群众的意見，使群众坚持下去，見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驗这些意見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長时期以来，在我們党內，对于这样的領导方法，曾經給它起了一个通俗的名称，叫做"群众路綫"。我們工作的全部历史告訴我們：凡是遵守这条路綫的，工作总是好的或者較好的，即使犯了錯誤，也易于改正；凡是違背这条路綫的，工作总是遇到挫折。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領导方法，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路綫。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級和共产党已經成为領导全国政权的阶級和政党的时候，我們党和国家的領导工作人員，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襲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脫离群众、脫离集体領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險性。因此，我們要是不願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話，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綫的領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証群众路綫和集体領导的貫徹实施，而避免脫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我們也还必須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爭中吸取教訓，繼續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爭。

工人阶級和其他人民群众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贏得革命，贏得国家政权，而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又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發展开拓無限广闊的道路。但是，因为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認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們有不少宣傳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

輸給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語言，很有說服力地去說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統一。若干年来，我們在哲学、經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評的研究領域中有了一些成績，但是一般說来，还有許多不健康的狀态存在着。我們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条繩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这里必須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必須認眞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特别是他关于保衛列宁主义和正确地总結苏联建設經驗的許多著作，我們都需要当做一項重要的历史遺产接受过来。不这样做，就是錯誤的。但是，可以有兩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有些人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看待斯大林的著作，結果是不能分析其中的正确方面和不正确方面，就是对于其中的正确內容，也是当作万应灵藥，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錯誤。例如斯大林曾經有过这样的公式：在各种不同的革命时期，基本的打击方向是使那个时候的中間的社会政治力量陷于孤立。对于斯大林这个公式，就应該用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点有分别地看待它。在某种条件下，孤立中間势力可以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孤立中間势力都是正确的。按照我們的經驗，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应該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对于中間势力，則应該采用又联合又斗爭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并且应該力求在可能的条件下，爭取它从中立的地位轉变过来，使它和我們成立联盟，以便有利于革命的發展。可是，曾經有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十年內战时期），我們的一些同志簡單地搬用斯大林的这个公式到中国革命中来，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中間势力，把它說成是最危險的敌人，結果沒有孤立眞正的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使自己吃了亏，而有利于眞正的敌人。鑒于这种教条主义的錯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在抗日战爭时期，为了打敗日本侵略者，提出了"發展进步势力、爭取中間势

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这里所指的进步勢力，就是共产党所領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間勢力，就是民族資产阶級、各民主党派和無党派的民主人士。这里所指的頑固勢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蔣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勢力。实踐的經驗証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方針是适合于中国革命的情况的，是正确的。

事实总是这样：教条主义只是思想懶汉才会加以欣賞的东西，它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覚、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創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論工作的迅速發展等等方面說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現在仍然是必要的。

無产阶級專政（在中国是工人阶級領导的人民民主專政）現在已經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圍內取得了偉大的胜利。無論在苏联，在中国，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成功的經驗和錯誤的經驗。我們应該繼續地总結这些經驗。必須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們还是可能犯錯誤的。重要的教訓，就是我們党的領导机关应該使錯誤限制在个別的、局部的、暫时的范圍內，而不应該讓个別的、局部的和初步出現的錯誤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長时期的錯誤。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犯严重錯誤的經驗。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我們党內出現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們党內出現了三次"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其中特別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綫和王明路綫，前者是在一九三〇年發生的，后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發生的，而以王明路綫对于革命的損害最为严重。在这个时期內，在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里还發生了同党的中央相对抗的反党的張国焘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这条錯誤路綫严重地損害了一部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上述兩个时期內所犯的錯誤，除了張国焘路綫是屬于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的錯誤以外，都是全国性的錯誤。在抗日战爭时期，我們党內又出現了以王明同志为

代表的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但是由于我們党吸取了以前兩个革命时期的教訓，沒有讓这条錯誤路綫發展下去，这条錯誤路綫在較短的时間內就被我們党的中央所糾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們党內又出現了高崗、饒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內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發覚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話，党和革命事业的損失將会是不堪設想的。

由此可見，我們党的历史經驗，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錯誤路綫作斗爭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鍛煉，因此取得了偉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設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別的錯誤，則在工作中时常發生，仅仅是依賴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們不能获得發展的机会，沒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長期性的錯誤，沒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錯誤。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發生的錯誤，必須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認为斯大林完全錯了，这是严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个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錯誤而不自覚其为錯誤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訓。不論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現象，帶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說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間，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間，許多革命工作的經驗还是不足的。我們有偉大的成績，但是还有缺点和錯誤。如同一个成績出現了接着又創造新的成績一样，一个缺点或錯誤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錯誤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們去克服。而成績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錯誤的地方，缺点和錯誤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領导者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認眞地对待錯誤。完全不犯錯誤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沒有的。列宁說："公开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产生錯誤的环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

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訓練阶級，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遺教，現在正在認眞地对待斯大林在領导社会主义建設中所犯的某些性質严重的錯誤及其所遺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偉大功績的同时，又尖銳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錯誤的实質，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錯誤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們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經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銳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錯誤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將普遍地活躍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將比較过去更好地团結一致，为了建設一个人类从来沒有看見过的偉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爭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譏笑这件事，他們在譏笑我們陣营中克服自己的錯誤。这种譏笑会有什么結果呢？毫無疑义，結果將是在他們面前站着一个比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偉大陣营，而譏笑者們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四月單行本排印）

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議的討論，由人民日报編輯部写成的）

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間，我們曾經就斯大林問題討論过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从那个时候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繼續發生了一系列引起我国人民关切的事件。鉄托同志在十一月十一日的演說和各国共产党对于这篇演說的評論，在我国报紙發表以后，再一次使人們提出了許多需要加以答复的問題。我們現在这篇文章將着重地討論以下一些問題，就是：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設的基本道路的估計；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計；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第四，关于各国無产阶級的国际团結。

在观察現代国际問題的时候，我們必須首先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出發，就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全世界人民力量之間的对立。飽受帝国主义侵略痛苦的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記：帝国主义从来就反对各国人民的解放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从来就把最坚决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眼中釘。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世以来，帝国主义就用尽一切手段来危害苏联。在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后，帝国主义陣营同社会主义陣营的对立，它对于社会主义陣营所进行的明目張胆的破坏活动，更成为世界政治中異常显著的現象。帝国主义陣营的首腦美国，在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內政方面，作得特别凶惡無耻。它多年来阻撓着我国解放自己的領土台灣，多年来公开地把顚复东欧各国作为政府的政策。

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爭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陣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

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員会会議的决議所說，匈牙利事件是由內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釋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謀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縱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內政的决議，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瘋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美帝国主义尽管利用英法侵埃战爭的失敗，竭力企圖夺取英法在中东北非的利益，但是还是声明保証同英法消除"誤会"，取得"更密切、更亲密的諒解"，以便重整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亞非人民和反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統一战綫。为了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該团結起来——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会会議上所說的"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必須有一套生活和行动的哲学"的主要含义。杜勒斯多少帶着醉意地断言："苏联共产党結構正处于惡化狀态(？)，而統治者的权力正在崩潰(？)……面对着这种形势，自由国家必須保持道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破坏苏联—中国共产主义体系，有助于保持軍事实力和决心。"他号召北大西洋公約国家"搞垮以軍国主义(？)和無神論观念为基础的苏联强有力的專制政治(？)"，并且認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質，在現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我們从来認为敌人是我們最好的教师。現在杜勒斯又在給我們上課了。他尽可以污蔑我們一千次，詛咒我們一万次，这毫無什么新奇之处。但是他从"哲学"上要求帝国主义世界把对于共产主义的矛盾放在其他一切矛盾之上，一切都为了"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質"，"破坏"和"搞垮"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这对于他們虽然肯定是徒劳的，对于我們却給了十分有益的教訓。尽管我們一貫主張而且繼續主張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应該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賽，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們。因此，我們無論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記敌人同我們之間的严重斗爭，这就是世界范圍內的阶級斗爭。

在我們面前有兩种性質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間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陣营同社会主义陣营之間，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間，帝国主义国家的資产阶級同無产阶級之間，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級之間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間，共产党內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間，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間，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間，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間，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發生不是由于阶級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見和錯誤意見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質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須服从于对敌斗爭的总的利益。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該从团結的願望出發，經过批評或者斗爭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結。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級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內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質，不再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現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經出現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决不应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間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認阶級斗爭、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开始談到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之前，我們認为必須首先解决这个根本立場問題。否則，我們就必然会迷失方向，就不可能对于国际現象作出正确的解釋。

一

帝国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攻击，長期以来，主要地集中于苏联。而最近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爭論，也大都同对于苏联的認識有关。因此，正确地估計苏联的革命和建設的基本道路，

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必須回答的重要問題之一。

馬克思主义关于無产阶級革命和無产阶級專政的学說，是工人运动經驗的科学总結。但是，除了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亲自看到过他們所毕生努力爭取的無产阶級革命和無产阶級專政的实現。俄国無产阶級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領导之下，在一九一七年胜利地实現了無产阶級革命和無产阶級專政，接着又胜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从此由理論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現实。这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但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苏联在革命以后的三十九年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剝削制度的消灭，苏联消灭了經济生活中的無政府狀态、危机和失业。苏联的經济和文化，以資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發展着。它的工业总产量，在一九五六年已經达到革命以前最高年份一九一三年的三十倍。革命以前工业落后、文盲众多的国家，現在已經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拥有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和高度發展的社会主义文化。苏联劳动人民由革命前的被压迫者变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他們在革命斗爭和建設劳动中發揮了巨大的积极性和創造性，他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狀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本来是国內各民族的牢獄，而在十月革命以后，这些民族却得到了平等的地位，迅速地發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民族。

苏联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风順的。苏联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零年，受到了十四个資本主义国家的进攻。早期的苏联，經历过內战、飢荒、經济困难、党內宗派分裂活动的严重的折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的时間內，在西方国家开辟第二战場以前，苏联曾經独力承受了并且击敗了希特勒和他的伙伴們的几百万軍队的进攻。这些严酷的考驗沒有压倒苏联，沒有阻止它的前进。

苏联的存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統治，而給予一切革命

的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以無限的希望、信心和勇气。各国劳动人民援助了苏联，苏联也援助了各国劳动人民。苏联执行了維护世界和平、承認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外交政策。苏联是在世界范圍內战胜法西斯侵略的主力。英勇的苏联軍队同有关各国的人民力量合作，解放了东欧各国和中欧的一部、中国的东北部和朝鮮的北部。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援助了这些国家的經济建設，并且同它們在一起組成了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壘——社会主义陣营。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爭取独立的运动，对于世界人民爭取和平的运动，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亞非地区的許多和平国家，苏联也給予了重大的支持。

以上所說的这一切都是不可爭辯的事实，而且是人們早已知道了的。为什么現在还要再一次提起这些事情呢？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敌人固然一貫地抹煞这一切，而現在有些共产主义者在探討苏联經驗的时候，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事情的次要方面，而忽視了事情的主要方面。

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就它們的国际意义說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經驗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質，在人类历史的現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經驗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錯誤的、失敗的經驗。錯誤和失敗，尽管在表現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苏联由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它的一些錯誤和失敗更加难于避免。这些錯誤和失敗，对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是极其有益的教訓。因此，苏联的全部經驗，包括某些錯誤和失敗的經驗在內，都值得我們認眞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經驗尤其重要。苏联發展的事实証明，苏联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是一个偉大的成功，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曲响徹云霄的凱歌。

什么是苏联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呢？据我們看来，至少以下这一些經驗具有基本的性質：

(1)無产阶級的先进分子組織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員和人民群众。

(2)無产阶級在共产党領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經过革命斗爭从資产阶級手里取得政权。

(3)在革命胜利以后，無产阶級在共产党領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無产阶級对于地主、資产阶級的專政，鎮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現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現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剝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資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級。

(4)無产阶級和共产党領导的国家，領导人民群众有計划地發展社会主义經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5)無产阶級和共产党領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認各民族平等，維护世界和平，坚持無产阶級国际主义的原則，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我們平常所說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現的具体形式来說，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

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設的过程，除了有共同的方面，还有不同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說，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發展道路：关于这个問題，我們將在后面去討論。但是从基本原理上說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發展長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內关于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这不但是苏联無产阶級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無产阶級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須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正是因为这个緣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說："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許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

保衛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質”，他們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見，所傳播的右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無产阶級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团結無产阶級，团結人民群众，坚决地击退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世界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二

人們問道：既然苏联革命和建設的基本道路是正确的，为什么又發生斯大林的錯誤呢？

关于这个問題，我們在四月間的文章中已經討論过了。但是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他有关情况的發展，正确地認識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錯誤的問題，已經成为影响許多国家共产党的內部發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結的重大問題，已經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爭的重大問題。因此，需要把我們对于这个問題的观点作一些进一步的申述。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發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發展是有偉大功績的。我們在“关于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一文中說过：“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領导人物的斯大林，創造性地运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衛列宁主义遺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其他資产阶級代理人的斗爭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願，不愧为杰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贏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領导人在一起維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維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綫。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綫，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爭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級

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的內外政策方面都犯了一些严重的錯誤。斯大林的个人專断的工作方法，曾經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則，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許多工作中严重地脫离群众，个人專断地决定許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錯誤。这种錯誤，特别明显地表現在肅清反革命的問題上和对某些外国的关系問題上。斯大林在肅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懲办了很多必須懲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綫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許多忠誠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損失。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方面，总的来說，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場上，援助了各国人民的斗爭和社会主义陣营的發展的。但是，在处理某些具体問題的时候，他却表現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談不到教育广大干部采取謙虛的态度；有时他甚至錯誤地干涉某些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內部事务，因而引起了許多严重的后果。

对于斯大林的这些严重的錯誤应該怎样解釋呢？这些錯誤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証法科学告訴我們，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層建筑，都有它的發生、發展和灭亡的过程。生产力發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經济基础發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層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質的变革。誰要抵抗这种变革，誰就会被历史所抛棄。这一規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这就是說，也适用于現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將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斯大林的錯誤，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經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經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發展的需要了呢？当然不是如此。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年輕的，它所走过的时間还不

到四十年。苏联經济迅速發展的事实証明，苏联的經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的發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經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錯誤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糾正这些錯誤，当然不需要去"糾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資产阶級想用斯大林的錯誤来証明社会主义制度的"錯誤"，这是完全沒有根据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經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釋斯大林的錯誤，認为政府管理了經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發展的"官僚主义机構"，这也無法令人信服。誰也不能否認，苏联經济的巨大高漲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計划地管理經济事业的結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錯誤，却很少同管理經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

但是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在上層建筑和經济基础之間，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現成为經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質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調整。

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調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質的矛盾（按照辯証法，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証不發生錯誤了呢？問題沒有这样簡單。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無論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証工作中不会發生严重的錯誤。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問題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沒有这些，人們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錯誤，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为了解决以上所說的这些問題，必須依靠經驗的积累和实踐的考驗，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旧的問題解决了，新的問題又产生了，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也是不会有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就是在已經建立了巩固的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層建筑的某些环节也还有缺陷，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还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并沒有什么奇怪的

地方。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調整經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發現和糾正工作中的錯誤。当然，党和国家的領导人員的主观認識，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观实际。因此，在他們的工作中，个别的、局部的、暫时的錯誤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严格遵守并且努力發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証唯物主义的科学，只要徹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認眞地依靠群众，全国性的、長时期的、严重的錯誤，却是可以避免的。

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錯誤之所以發展成为全国性的、長期性的、严重的錯誤，而不能得到及时的糾正，正是因为他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脫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会受到某种破坏，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的条件。这就是：党在領导国家方面还缺乏經驗；新的制度还沒有巩固到足以抵抗一切旧时代影响的侵襲（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都不是直綫的，它們的某种波浪式的起伏現象，在历史的轉变时期是屢見不鮮的）；国內外的紧張斗爭对于某些民主發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但是仅仅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錯誤的可能性变为現实。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却沒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錯誤。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們的思想狀况。斯大林后期被一連串的胜利和歌頌冲昏了头腦，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辯証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慧和权威，不肯認眞地調查和研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認眞地傾听同志們的意見和群众的呼声，以致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違反客观实际情况。而且，他往往在一个長时間內固执地要推行这些錯誤的东西，而不能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錯誤。

为了糾正斯大林的錯誤，消除这些錯誤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已經采取了步驟，并且已經开始取得了成就。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

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錯誤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錯誤的后果方面，表現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們，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糾正錯誤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滿的成功。很明显，由于斯大林的錯誤不是一个短时間的錯誤，这个錯誤的糾正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得到完全胜利。它需要一个相当長的时間的努力，需要細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我們相信，曾經克服过無数困难的偉大的苏联共产党，必將克服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目的。

苏联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糾正錯誤的斗爭，当然不会从西方資产阶級和右翼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支持。他們为了乘机抹煞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抹煞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陣营在过去时期的巨大成就，为了乘机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硬把对于斯大林錯誤的糾正叫作所謂反对"斯大林主义"，叫作所謂"反斯大林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的斗爭。他們的惡意本来是显而易見的。不幸，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間，也在那里傳播着类似的說法。我們以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說法是极端有害的。

大家知道，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錯誤，他的一生乃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在青年时代为反对沙皇制度和傳布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爭，在参加了党中央的領导机关以后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而斗爭，在十月革命以后为保衛十月革命的成果而斗爭，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为建成社会主义、保衛社会主义祖国、發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斗爭。从整个說来，斯大林始終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爭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調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錯誤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衛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無論如何，斯大林的錯誤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損失，但是在斯大林領导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大大地向前發展了。这个不可否認的事实，不但說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而且也說明了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們在总結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須

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績和錯誤。只要我們是全面地观察問題，那么，如果一定要說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話，就只能說，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錯誤。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糾正这些錯誤而对这些錯誤加以强調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們發生誤解起見，將这些錯誤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們認为，斯大林的錯誤同他的成績比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我們才能够正确地对待斯大林以及一切在他的影响下犯了类似錯誤的同志，才能够正确地对待他們的錯誤。他們的錯誤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錯誤，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內部的是非問題，而不是阶級斗爭中的敌我問題。我們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該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們，就需要在批評他們的錯誤方面的同时，保护他們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該否定他們的一切。他們的錯誤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認識的根源。这种錯誤既可以在他們身上發生，也可以在某些别的同志身上發生。因此，在認識和糾正了他們的錯誤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錯誤看作严重的教訓，看作一項可以利用的財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覚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錯誤，并且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發展。否則，如果对于这些犯錯誤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們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視和敌視，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訓，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兩类性質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陣地。

鉄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其他領导同志在最近的言論中，对于斯大林的錯誤和其他有关問題所采取的态度，据我們看来，不能够認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南斯拉夫的同志們对于斯大林的錯誤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过去时期內，南斯拉夫的同志們在困难条件下，作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可貴的努力。他們在企业

和其他社会組織中实行民主管理的試驗，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中国人民欢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南斯拉夫取得和解，欢迎中南兩国建立和發展友好关系，并且同南斯拉夫人民一样希望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日益繁荣和强盛。我們也同意鉄托同志这次演說中的一些論点，例如对于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譴責，对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支持，对于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的譴責，对于法国社会党采取侵略政策的譴責。但是使我們惊異的是，他在演說中对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許多共产党都进行了攻击。鉄托同志断定，"頑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各国党內設法繼續保持他們的职位，他們再一次希望巩固他們的統治，把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傾向强加在他們的人民的头上，甚至别国人民的头上"。因此，他宣称："我們必須同波蘭同志們一起来反对其他国家的——無論东方国家的或西方国家的——党內出現的那种傾向。"我們沒有看到过波蘭党的領导同志認为必須对于兄弟党采取这种敌对态度的言論。对于鉄托同志的这些意見，我們覚得必須說，他把所謂"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等等作为攻击的对象，并且認为現在的問題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路綫和所謂"斯大林主义路綫"哪一个得胜的問題，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这只能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

鉄托同志正确地指出："从將来是社会主义还是反革命这样的角度来看匈牙利目前的發展，我們必須保衛卡达尔的現政府，我們必須帮助它。"但是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員会副主席卡德尔同志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議会上关于匈牙利問題的長篇演說，却很难說是对于匈牙利政府的保衛和帮助。他的演說不但对于匈牙利事件作了一种完全不分敌我的解釋，而且要求匈牙利的同志們"必須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要求他們把全部政权交給布达佩斯的和其他区域性的工人委員会，"不管工人委員会成了什么样子"；要求他們"不必在恢复共产党方面枉費心机"，"因为对群众来說，这样的党是官僚專制的化身"。这就是卡德尔同志給兄弟国家所設計的"非斯大林主义路綫"的一个标本。匈牙利的同志們拒絕了卡德尔同志的这个建議。他們

解散了被反革命分子所操縱的布达佩斯和其他区域性的工人委員会，坚持地發展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我們認为，匈牙利的同志們是作得完全正确的，否則匈牙利的將来就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反革命。

南斯拉夫的同志們显然是作得太过分了。即令他們对于兄弟党的批評有某些合理的部分，但是他們所采取的基本立場和方法都違背了同志式的討論的原則。我們不願意干預南斯拉夫的內部事务，但是这里所說的并不是內部事务。为了巩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結，为了不給敌人在我們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的条件，我們不能不向南斯拉夫的同志們提出兄弟般的劝告。

三

斯大林的錯誤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發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判斯大林的錯誤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爭。这个斗爭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錯誤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發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無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我們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須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馬克思列宁主义認为：在人类社会的發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規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間，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經历着阶級斗爭，并且最后都將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各国無产阶級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而且只要他們这样做，他們就会創造出自己的新的經驗，从而給别的民族和整个馬克思列宁主义宝庫作出一定的貢献。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現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現出来和發生作用。他們不肯認眞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

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因此，他們也就不可能指导無产阶級的事业达到胜利。

馬克思列宁主义既然是各国工人运动經驗的科学总結，当然不能不重視运用先进国家經驗的問題。列宁在"做什么?"一書中說过："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根本上就是国际的。这不仅是說我們应当反对本国沙文主义，而且是說在年輕国家內剛剛开始的运动，只有在它运用别国經驗的条件下，才能順利發展。"列宁在这里是說俄国剛剛开始的工人运动必須运用西欧工人运动的經驗。在年輕的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苏联經驗的問題上，他的这个观点也是适用的。

但是学习必須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經驗，包括基本的經驗，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結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該原样照抄的。如前所說，苏联的經驗中还有錯誤的、失敗的部分。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敗的經驗，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無价之宝。因为它們都可以帮助我們少走弯路，少受損失。反之，如果不加分析地原样照抄，那么，在苏联成功了的經驗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造成失敗，更不要說失敗的經驗了。列宁在我們上文所引用的話下面紧接着說："但是，要眞能运用别国經驗，單單認識这种經驗或單單抄襲别国最近的决議，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須善于用批評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經驗，独立地檢查它。誰只要想一想現代工人运动已發展和散播到了如何广大的地步，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該要有多少丰富的理論力量和政治經驗(以及革命經驗)。"显然，在無产阶級已經取得政权的国家，問題比列宁在这里所說的更要复杂許多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間，教条主义者否認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經驗，曾經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敗。这个失敗深刻地教訓了我們的党。我們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議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間，曾經徹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綫，团結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錯誤的同志在內，發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們克服了教条

主义路綫，我們的党現在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經驗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較地少犯一些錯誤。也由于这样，我們能够充分了解目前波蘭和匈牙利的同志們糾正过去时期教条主义錯誤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教条主义的錯誤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須糾正的。我們將繼續努力糾正和防止在我們工作中的这类錯誤。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毫無共同之点。馬克思列宁主义承認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有它的民族特点，但是这决不是說，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沒有基本的共同点，可以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間，在我們国內和国外，都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經驗，而否認苏联的基本經驗的国际意义，借口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的意义。

由于斯大林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时期的領导者犯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錯誤，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借口發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圖削弱或者否定無产阶級專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領导作用。

無产阶級專政必須把对于反革命力量的專政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亦即社会主义民主，紧密地結合在一起，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無产阶級專政之所以强有力，所以能够战胜国內外的强大敌人而負起实現社会主义的偉大历史任务，正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对剝削者的專政、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專政，正因为它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現了任何資产阶級民主所不能实現的民主。离开了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离开了他們的积极支持，就不可能有什么無产阶級專政，至少不可能有巩固的無产阶級專政。阶級斗爭愈是紧張，無产阶級愈是需要采取最坚决最徹底的态度，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員他們的革命积极性来战胜反革命力量。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和紧接着的国內战爭时期"热火朝天"的群众斗爭的經驗，充分地証明了这个眞理。我們党所常說的"群众路綫"，也就是从苏联当时的經驗学来的。苏联当时的紧張斗爭，基本上依靠着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当然不可能

具备完善的民主程序。到了剝削阶級已經消灭、反革命力量已經基本上肅清以后，無产阶級專政虽然对于国內的反革命残余（这种残余在帝国主义存在期間不可能完全肅清）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它的主要鋒芒就应該轉向防御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勢力。在这种条件下，当然应該在国內政治生活中逐步地發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發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撤除損害这种联系的障碍，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的傾向，而不应該像斯大林那样，在阶級消灭以后仍然强調阶級斗爭的尖銳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發展。苏联共产党坚决地糾正了斯大林在这个問題上的錯誤，这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許同無产阶級專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許同資产阶級民主混淆起来。無論在政治方面、經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民主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無产阶級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發展他們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發展他們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勢力作斗爭的积极性。因此，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謂"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有些人并不是这样認識問題的。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反应，最显著地暴露了这一点。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而反革命分子却沒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間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滿情緒，組織武裝叛乱。这就說明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沒有認眞地建立起無产阶級專政。但是，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和平和战爭的緊急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識分子是怎样提出問題的呢？他們不但沒有提出实行無产阶級專政的問題，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給予

反革命分子以"民主"1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报紙，至今还在放肆地詆毀在艰苦条件下英勇奋斗的匈牙利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革命措施，但是对于全世界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却几乎默不作声。这个奇異的事实說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說明，那些离开無产阶級專政而高談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資产阶級方面而反对無产阶級，实际上是要求資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虽然他們中間許多人或者并沒有自覚到这一点。列宁曾經再三指出，無产阶級專政的学說是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之点；是否承認無产阶級專政，乃是"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小資产者(以及大資产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区别"。对于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無产阶級政权，列宁曾經要求他們"采取严酷無情和迅速坚决的强力手段"来鎮压反革命分子，并且說："誰不了解这一点，誰就不是革命者，誰就沒有資格当無产阶級的領袖或顧問。"由此可見，人們如果因为看到了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錯誤，看到了过去时期匈牙利領导者所犯的錯誤，就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無产阶級專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会走上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無产阶級革命事业的道路。

否認無产阶級專政的人們也否認社会主义民主需要集中，否認無产阶級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領导作用。这些議論，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說来，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恩格斯在同無政府主义者斗爭的时候早已指出，在任何社会組織中，只要有联合活动存在，就必須有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权威和自治之間的关系是相对的，它們的应用范圍是因社会發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恩格斯說："把权威原則描写成絕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則描写成絕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謬的"。他并且說，誰要是坚持这种荒謬观念，誰就是在实际上"为反动派效劳"。列宁在反对孟什維克派的斗爭中，透徹地指出了党的有組織的領导对于無产阶級事业的决定意义。在一九二零年批評德国共产主义"左派"的时候，列宁着重地指出：否認党的領导作用，否認領导者的作用，否認紀律，"这就等于完全解除無产阶

級的武裝以帮助資产阶級。这也就恰恰是小資产阶級的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結、不能整齐动作等等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如果任其横行，必使任何無产阶級的革命运动都会一敗塗地。”这些原理是否过时了呢？是否不适用于某些国家的特殊情况呢？运用了这些原理，是否就会产生斯大林的錯誤呢？事实显然不是如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原理，經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發展的历史考驗，到現在还沒有遇到过一种可以称为例外的情况。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由于实行了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了党的領导，恰恰是由于他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破坏了党的領导。正确地貫徹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地加强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領导，乃是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团結人民、战胜敌人、克服困难而获得强大發展的基本保証。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要打击我們的事业，总是向我們要求“自由化”，总是集中力量来破坏我們事业中的領导机構，来破坏無产阶級的核心共产党。他們对于目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党和国家机关的紀律受到損害而产生的“不稳定狀态”，表示了极大的滿意，并且正在利用这种狀况来加紧他們的破坏活动。这个事实說明，維护民主集中制的权威，維护党的領导的作用，对于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具有多么严重的意义。毫無疑問，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必須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領导必須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領导。在这些方面如果發生了缺点，就必須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領导，而絕对不能是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無产阶級队伍的渙散和混乱。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們中間，有些人索性否認無产阶級專政和資产阶級專政之間的界限，否認社会主义制度和資本主义制度之間的界限，否認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之間的界限。在他們看来，用不着經过無产阶級政党領导的無产阶級革命，用不着建立無产阶級政党領导的国家，某些資产阶級国

家就可以建設社会主义，它們的国家資本主义就已經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經在"長入"社会主义了。但是，正在他們进行这种宣傳的时候，帝国主义对于已經建立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正在动員一切可以动員的軍事、經济、外交、特务和"道义"的力量，积极准备把它們"破坏"和"搞垮"。这些国家的潜伏的和逃亡到外国的資产阶級反革命分子，也还在力求复辟。修正主义的思潮虽然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但是帝国主义者的行动，却并不有利于修正主义，而是証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四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各国無产阶級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加强無产阶級的国际团結。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为了达到他們的毀灭共产主义事业的目的，正在利用各国人民中狹隘的民族感情和某些民族隔閡，来千方百計地破坏無产阶級的国际团結。坚定的無产阶級的革命派坚决地維护这个团結，把这个团結看成各国無产阶級的共同利益。动搖分子在这个問題上动搖不定，沒有明确的立場。

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因为只有各国無产阶級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各国資产阶級的共同压迫，而实現自己的共同利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国际团結，大大地帮助了各国無产阶級革命事业的發展。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給了国际無产阶級革命运动的新發展以巨大的推动力量。在十月革命以来的三十九年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經得到了极其偉大的成就，在世界范圍內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全世界無产阶級和一切渴望解放的人們，都把关于人类的光明前途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运动的胜利上面。

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苏联由于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陣营出現以后，又是这一陣营中最强大和經驗最丰富的国家，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資本主义世界的各国人民能够給

予最重大的援助，所以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这种情况不是任何人人为地决定的，而是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为了各国無产阶級共同事业的利益，为了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为了爭取社会主义各国經济文化的共同高漲，我們必須繼續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無产阶級的团結。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之間的国际团結，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完全新式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發展过程当然不会沒有困难。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必須联合，同时必須保持各自的独立。历史的經驗証明，如果不把这兩个方面正确地統一起来，而忽視任何一个方面，就不能不犯錯誤。当各国共产党相互間保持平等的关系，經过眞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協商而达到意見和行动的一致，它們的团結就会增进。反之，如果在相互关系中把自己的意見强加于别人，或者用互相干涉內部事务的办法代替同志式的建議和批評，它們的团結就会受到損害。在社会主义各国中，由于共产党已經对于国家生活担負領导責任，由于党同党之間的关系往往直接涉及国家間的关系和民族間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正确处理就成为一个更加需要愼重对待的問題了。

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坚持無产阶級的国际主义同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相結合。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必須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党員和人民，因为各国人民的眞正的民族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另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又必須成为本国人民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代表者。共产党人从来是眞誠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他們了解，只有在正确地代表了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时候，他們才能受到本国广大人民眞正的信任和爱戴，才能有效地在人民群众中間进行国际主义的教育，有效地協調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主义团結，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必須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在較大国家的党对待較小国家的党的关系中，这一点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不致引起較小国家方面的反感，較大国家的党需要經常注意采取平等的态度。列宁說得对："各国有覚悟的共产主义無产阶級，对于遭受压

迫极久的国家和民族內的民族心理残余，要特别慎重，特别注意。”

如前所說，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中，曾經表現过某些大国主义的傾向。这种傾向的实質，就是忽視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地位。这种傾向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旧时代大国对待小国的积习固然还会留下某些影响，而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在革命事业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难免不使人們产生一种优越感。

正是因为这样，为了克服大国主义的傾向，需要作有系統的努力。大国主义并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現象。乙国比甲国小和落后，但是比丙国大和先进，这样，乙国尽管埋怨甲国的大国主义，却往往同时对于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我們中国人特别需要記住的是：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也是大帝国。虽然我国从十九世紀中叶以后的百年間成了被侵略的半殖民地，虽然我国現在还是一个經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是在条件变化以后，大国主义傾向如果不竭力防止，就一定会成为严重的危險。而且应該指出，目前这种危險在我們的一些工作人員中已經开始露出了苗头。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國代表大会的决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十一月一日的声明，都向自己的工作人員提出了反对大国主义傾向的任务。

但是妨碍無产阶級国际团結的，不仅有大国主义。大国在历史上不尊重甚至压迫小国，小国在历史上不信任甚至仇視大国。这兩种傾向在各国人民中以至各国無产阶級队伍中都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此，为了巩固無产阶級的国际团結，除了首先要在較大国家中克服大国主义的傾向以外，还必須在較小国家中克服民族主义的傾向。無論是在大国或是小国，共产党人如果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無产阶級运动的总利益对立起来，借口前者而反对后者，在实际行动中不認眞維护無产阶級的国际团結，反而損害这种团結，这就是一种違反国际主义、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重錯誤。

斯大林的錯誤曾經引起了某些东欧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滿。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某些人对于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資产阶級民

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抹煞苏联的貢献。他們企圖使人們不想到这一点：如果沒有苏联存在，帝国主义將怎样对待这些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我們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地看到，波蘭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党現在已經在認眞地制止那些制造反苏謠言、在各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中煽动民族对立的坏分子的活动，并且着手破除在一部分群众中以至一部分党員中的民族主义偏見。这显然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迫切需要的措施之一。

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苏联过去时期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符合于国际無产阶級利益、符合于被压迫民族利益、符合于世界人民利益的。苏联人民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在援助各国人民的事业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和英勇的牺牲。斯大林所犯的一些錯誤，决不能使偉大的苏联人民的这种历史功績減色。

苏联政府在改善苏南关系方面所作的努力，苏联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的宣言，以及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間同波蘭的会談，表示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徹底消除过去对外关系中的錯誤的决心。苏联所采取的这些步驟，对于加强国际無产阶級的团結，是一个重大的貢献。

很明显，当帝国主义者向各国共产主义队伍进行瘋狂进攻的今天，各国無产阶級需要努力加强相互間的团結。大敌当前，那些妨害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团結的言論和行动，無論用了什么名义，都难于指望获得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同情。

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無产阶級的国际团結，不但符合于各国無产阶級的利益，也符合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和全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人民，从切身的經驗出發，很容易了解誰是他們的敌人，誰是他們的朋友。因此，帝国主义所煽动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在这些洲的十几亿人口中只能找到极少数人的冷落的响应。事实証明，苏联、中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無产阶級，是埃及反侵略斗爭的忠实支持者，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独立事业的忠实支持者。在反对帝

国主义的斗爭中，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無产阶級和爭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三种力量，具有共同的利害，它們的相互支援对于人类前途和世界和平具有最偉大的意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最近时期重新造成了国际形势的一定程度的紧張。但是依靠上述三种力量的联合斗爭，加上全世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共同努力，这种紧張狀况是可以重新轉向和緩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沒有从对埃及的侵略中得到什么东西，反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由于苏联軍队对于匈牙利人民的援助，帝国主义在东欧制造战爭前哨陣地和破裂社会主义陣营团結的計划，也已經归于失敗。社会主义各国坚持同資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坚持發展相互間的外交关系和經济文化关系，坚持以和平談判解决国际爭端，坚持反对准备新的世界战爭，坚持在全世界扩大和平地区、扩大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应用范圍。所有这些努力，必將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同情。国际無产阶級团結的加强，更將使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敢輕于冒险。因此，尽管帝国主义还在抵抗这些努力，但是和平的力量終將战胜战爭的力量。

* *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如果从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算起，到現在还只有九十二年。在这九十二年中，虽然有許多迂迴曲折，但是整个运动的进展是十分迅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出現了占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苏联；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出現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陣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犯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錯誤，敌人就高兴起来了，有些同志和朋友就难过起来了，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發生了动搖。但是無論敌人的高兴、同志和朋友的难过或者动搖，都是沒有充足理由的。無产阶級初次担負国家的管理，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們不遭到任何失敗是不可能的。短时間的、局部范圍的失敗，不但过去有，現在有，將来也还会有。但是任何有远見的人决不会为此而感覺失望和悲观。失敗是成功之母。目前的短时間的局

部性的失敗，正是增加了国际無产阶級的政治經驗，从而为無限的將来岁月的偉大成功准备条件。如果拿英国資产阶級革命和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历史来比較，我們事业中的这些失敗就簡直算不得什么。英国的資产阶級革命，开始于一六四零年。但是在战胜了国王以后，接着就出現了克倫威尔的独裁統治。接着又出現了一六六零年的旧王朝的复辟。直到一六八八年，資产阶級政党以政变的方式从荷蘭迎来了一个帶着荷蘭海陆軍进入英国的国王，这才使英国的資产阶級專政稳定下来。法国資产阶級革命从一七八九年爆發到一八七五年第三次共和国成立，經过了八十六年，中間交織着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內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尤其动蕩不宁。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受着全世界反动派的联合压迫，它的整个道路却順利和稳定得多。这正是說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空前强大的生命力。在最近一段时間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我們却从此得到了許多有益的教訓。我們糾正了或者正在糾正我們队伍中必須糾正的一些錯誤。在錯誤糾正以后，我們就会更加强大起来，就会团結得更好。同敌人的預料相反，無产阶級的事业將更好地前进而不是后退。

但是帝国主义的命运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那里，帝国主义跟被压迫的民族之間，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間，帝国主义政府跟人民之間，存在着根本利害的冲突，这种冲突愈来愈尖銳，沒有一个医生能够找出医治的藥方。

当然，新生的無产阶級專政的体系，目前在許多方面还有許多困难，还有許多弱点。但是比之以前苏联孤軍奋斗的情况，我們現在是好得多了。而且，哪有一种新生的事物沒有困难和弱点呢？問題是在于未来。我們前面的道路無論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的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四月單行本排印）

論权威

恩格斯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系統性的十字軍征討，来反对他們所称为权威原則的东西。只要他們声明說某种行为是有权威的，就足以把它定罪了。这个簡化的方法竟被濫用到这种地步，以致必須要較詳細地来闡明問題。这里所談的权威，是說别人的意志强迫我們接受；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兩个用語都不好听，而它們所表現的关系又是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的，那末試問：是否可以不要这种关系，我們是否能够——在現代社会中現有的条件下——創出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無謂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們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現代資产阶級社会基础的那些經济关系、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看到，它們具有使各个分散行动愈益为人們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起而代替各个分散生产者小作坊的，出現了拥有龐大工厂的現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縱着蒸汽發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乘客馬車和載重馬車已被鉄路上的火車代替，而小型帆舟和內海帆船已被輪船代替了。甚至在农业中，也是愈益由机器和蒸汽占統治地位，虽然緩慢地但却一貫地使小自耕农被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資本家所代替。这样，联合的活动，互相依賴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各个人的独立活动而代之。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組織起来，而組織起来是否可能不要权威呢？

假定說，社会革命已把目前財富的生产和流通受其权威支配的資本家們推翻了。假定完全站在反权威主义者的立場上来說，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們的工人的集体財产了。那末，权威

是否就会消灭下去，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态呢？我們来考察一下。

拿一个棉紗厂来作例。棉花至少要經过六道連續加工手續后才会成为綫，并且这些加工手續大部分是在不同場所內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轉动而需要有照管蒸汽机的工程师，需要有进行日常檢修的技师以及許多把生产品由一个場所运到别一个場所的工人等等。所有这些工人——男人、女人和兒童——都被迫依照那不管什么个人自治权的蒸汽权威所决定的时間来开始和停止工作。这样，工人們首先必須商定劳动时間；而劳动时間一經确定，大家就要毫無例外地一律遵行。其次，在每个厂房里，时刻都会發生关于生产方法、材料分配等局部問題，它們要求馬上解决，免使全部生产工作立刻停頓下来。不論怎样解决这些問題，即無論是由选出来領导各該劳动部門的人去决定，或是在可能情况下由多数表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而这也就是說，問題是由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自动的机器，比利用工人作工的小資本家要專制得多。至少是关于劳动时間，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門上写出如下字样：«Lasciate ogni autonomia voi che entrate㊀。如果說人靠科学和創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就对他施行报复，在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內使他服从一种眞正的專制，而不管社会組織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紡紗机而恢复手紡車。

再拿鉄路来作例。这里，無数人的合作也是絕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須依照准确規定的时間来实行。这里工作上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支配的意志来解决所屬一切問題，——不管这个意志是由一个选出的人来代表，还是由一个負責执行大多数有关人們的决議的委員会来代表，都是一样。無論在前一場合或后一場合，都存在一个表显得很鮮明的权威。况且，假如鉄路服务人員在乘客先生們的心目中的权威被消灭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車就会弄成什么样子呢？

㊀ 意即"进門者得放棄任何自治权"。——編者注

但是，最显然說明需要有权威，并且是需要有最專断权威的場合，要算是在航行于汪洋大海的船上了。那里，在遇到危險的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就得全体立即絕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提出这种論据来反对那些最頑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們就只能給我如下的回答："是呵！这是对的，但这里所說的并不是我們賦予我們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哩"。这些人以为只須改变某一事务的名称，就可改变这一事物本身哩。这些深奥的思想家們，簡直是开我們的玩笑。

这样，我們看到，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方面要有一定的服从——無論在什么样的社会組織下，都是如此，——由于賴以进行产品生产和流通的物質条件，这兩者都是我們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已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質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發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圍。所以，把权威原則描写成絕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則描写成絕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們的应用范圍是因社会發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如果自治派仅仅是想說將来的社会組織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权威存在，那也許还可以和他們說通。但他們对于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都閉眼不看，却一味拚命反对名詞。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以叫喊反对政治权威，叫喊反对国家为限呢？所有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認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將由于未来社会革命的結果而消逝，这就是說，社会职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变为关注社会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一举而把政治国家廢除，即要求在那些产生出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尚未廢除以前就把它廢除。他們要求社会革命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廢除权威。

这些先生曾經見过一次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槍大炮，即用非常有权威的手段强迫

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而获得胜利的政党往往迫于必要，不得不借自己武器所給予反动派的威吓，来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曾憑借武裝人民的权威来反对資产阶級，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么？反过来說，我們不是有理由因为公社把这个权威运用得太少而加以責备么？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些什么，那末他們就仅仅是散布糊塗观念；或者是他們知道这一点，那末他們就是背叛無产阶級的事业。在前后兩种場合，他們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弗·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十月写成。載于一八七四年"共和党人論叢"文集。按文集上所載本文刊印。原本系意大利文。

（按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排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刘　少　奇

四　国家的政治生活

（見本書第九一七至九二八頁）

文匯报的資产阶級方向应当批判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論

自本报編輯部六月十四日發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間內的資产阶級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問題均有所檢討。

光明日报工作人員开了几次会議，严肃地批判了社長章伯鈞、总編輯儲安平的方向錯誤，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場根本轉过来了，由章伯鈞、儲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資产阶級路綫轉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綫。由此恢复了讀者的信任，像一張社会主义的报紙了。略嫌不足的是編排技巧方面。編排的技巧性和編排的政治性是兩回事，就光明日报說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問題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編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讀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檢討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許多反映正面路綫的新聞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覚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員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綫問題上沒有調和的余地。編輯和記者中有許多人原在旧軌道上生活慣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說是輕松愉快，这句話具有人們常有的礼貌性質。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諒。

严重的是文汇报編輯部，这个編輯部是該报鬧資产阶級方向期間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脫。帅上有帅，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并且指名道姓，說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兩帅之間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駐京办事处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將。人們說：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編輯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統。

民盟在百家爭鳴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組織、有計划、有綱領、有路綫，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兩个党在这次惊濤駭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較少，系統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員說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濤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終成大业为时局估計和最終目的者，到底只有較少人数，就是所謂資产阶級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們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聞記者协会开了兩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間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資产阶級新聞路綫。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頑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犯了一些錯誤。作自我批評是好的，我們表示欢迎。但是我們認为文汇报的批評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帶着根本性質。就是說文汇报根本上沒有作自我批評。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論中替自己的錯誤作了辯护。“我們片面地錯誤地理解了党的鳴放政策，以为只要無条件地鼓励鳴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見或者对錯誤的意見进行反批評，就会影响鳴放”。是这样的嗎？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針，向無产阶級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針背道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眞是“帮助整风”嗎？假的，眞正是一場欺騙。在一个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对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間，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

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說，共产党看出了資产阶級与無产阶級这一場阶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产阶級及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發动这一場战爭，报紙在一个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对資产阶級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組織，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內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說，这是阴謀。我們說，这是阳謀。因为事先告訴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歼灭它們，毒草只有讓他們出土，才便于鋤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鋤几次草嗎？草鋤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級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現他們自己的。他們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針公开告訴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級斗爭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轉移的。就是說，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級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網呢？他們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無产阶級的絕对优势，看成了絕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鳴大放，一触即發，天下頃刻大乱，共产党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計。这不是利令智昏嗎？"利"者，夺取权利也。他們的报紙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針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騙，好像它是从善意出發的。文汇报說："而所以發生这些錯誤認識，是因为我們头腦中还殘存着的資产阶級办报思想"。錯了，应改为"充滿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無产阶級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紙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資产阶級的方向，殘存着一点資产阶級思想，够用嗎？这里是一种什么邏輯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結論，这就是文汇报的邏輯。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导过的違反事实的反动新聞，大量刊發的反动言論，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無产阶級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編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經作了許多比較認眞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錯誤比

文汇报小，它一發現自己犯了錯誤，就認眞更正，表示了这張报紙的負責人和記者們对于人民事业的責任心，这个报紙在讀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責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們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債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債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給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題，讀者要問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現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沒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轉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認眞地照它那样办。

現在又回到"資产阶級右派"这个名称。資产阶級右派就是前面說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資产阶級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說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現出来了。他們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輕視。这种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动，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对他們不适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現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們中許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寬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繼續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則，对他們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論，無行动。言論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無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寬大些了。錯誤的言論一定要批判干淨，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許有言論自由。一个偉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們的錯誤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們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們有毒；并且散發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繼續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順利进行了。

这是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論

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的斗爭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徹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沒有完成的。許多人还不認識这一点。右派分子則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發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一九五六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繼續。我們現在所說的社会主义革命，許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經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沒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則沒有完成。而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則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經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無法說服反动的資产阶級右派。

一九五六年的我国生产資料所有制的大变革并沒有遇到严重的抵抗。这是因为，在我国农村中，占人口大多数的貧农和下中农迫切要求合作化，富裕中农在这种形势下不能不追随潮流，同时他們中間有很多人也确实認識了合作化的利益。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促进了城市的社会主义高潮，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手工业也合作化了。由于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社的迅速發展，資产阶級工商业者在一九五六年除了接受社会主义以外，已經沒有别的出路。同时，資产阶級工商业者經过了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的严重斗爭，多数人也大大减少了反对劳动人民的勇气。

至于原来的地主阶級、官僚資产阶級，原来的国民党軍政人員，他們早已名誉扫地，更加沒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資本了。

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資本的社会力量，主要的是資产阶級的党派和資产阶級的知識分子。資产阶級党派是在我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过程中發展起来的，它們曾經在不同程度上参加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爭，所以是民主党派。由于这种情况，解放以后，各民主党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各級政治协商机構和县市以上的各級人民政府中都被給予相当的地位。它們在共产党的領导下，或多或少地参加了一些革命的群众运动，并且曾經多次宣布它們拥护社会主义，接受共产党的領导。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情况大体上也类似民主党派。实际上，多数民主党派是以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为基础的，它們的傾向一般也代表着許多無党派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比起資产阶級政治活动家还多一种資本：他們的大部分直接参加着社会主义建設，無产阶級在經济文化的种种部門需要着他們。

在各民主党派和資产阶級知識界中，都有一部分右派，他們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們并非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今天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唯一出路，并非不知道社会主义在过去几年中已經为中国造成了一日千里的进步，沒有社会主义，这种进步是不可能的。但是問題是社会主义要求整个国民經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有計划的發展，要求資产阶級分子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把个人的利益和意志服从于广大人民的統一的利益和意志。这是他們所認为不能忍受的。因此他們决心要同無产阶級較量一下。

但是資产阶級右派的政治活动家和知識分子，虽然确是痛恨社会主义，并且自信还有号召的能力，也并沒有在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竪起反社会主义的旗帜。首先，如上面所說，他們在全国人民中間是孤立的。他們不但不能动摇工人阶級和貧苦农民的联盟，也得不到工商业者和富裕中农的多数的支持。其次，就在各民主党派中和資产阶級知識界中，他們也处于少数的地位。在各民主党

派中，在資产阶級知識界中，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共产党对他們所采取的团結教育改造的政策，已經形成了一个轉入無产阶級立場的左派，但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間还不長，他們也还是一个比較的少数。各民主党派和資产阶級知識界的多数，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还在动摇观望于左右兩翼之間。他們还沒有放棄对于資本主义的依恋，但是他們也并不敌視社会主义。鑒于这种情况，資产阶級右派在一九五六年决定按兵不动，等待时机。

按照右派分子的观点，对他們"有利"的时机总是会来的。匈牙利事件是他們的时机。毛主席报告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又是他們的时机。一九五七年五月，共产党决定整风，这对于右派分子当然更是好时机。于是他們向無产阶級、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向無产阶級的政党共产党，發起了大举进攻。他們攻击社会主义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特别是攻击無产阶級專政和共产党的領导。他們公开地反对共产党的領导地位，并且要求共产党下台。

資产阶級右派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假面具撕破了，反对劳动人民的凶恶面目露出来了。他們用自己的行动証明：他們同劳动人民的矛盾不再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而是敌我之間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曾經趋于緩和的阶級斗爭，由于右派的猖狂进攻，再一次尖銳化起来了。人民群众不能不坚决地徹底地粉碎資产阶級右派的进攻。人民群众認識了，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随之以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是对敌視社会主义的資产阶級右派进行坚决的徹底的政治斗爭，直至他們投降为止。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沒有希望的。

所謂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說取得政权。在我国，政权問題在一九四九年已經基本上解决了。無产阶級已經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的命脉，因此才有可能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的方法进行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右派分子的进攻証明，無产阶級对于国家政权的領导，就某些方面說来，还不是巩固的。無产阶級对于某些国家机关和某些文教組織还沒有眞正建立起

自己的領导。对于右派分子，無产阶級当然不可能实現領导，因为他們是無产阶級的敌人。对于中間分子，特别是受右派影响較深的那些中間分子，無产阶級也只有一种不甚巩固的領导。反右派斗爭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在我們国家的一切方面把無产阶級的領导巩固地树立起来。

所謂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說要把右派分子（除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逮捕起来，或者加以肉体上的消灭。反对右派分子的方法，仍然是群众性的辯論，仍然是摆事实、說道理、把右派分子一一地駁倒。我們国家的情况不需要对右派采取极端的政策。我們要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我們也要使一切願意眞誠悔改的右派分子得到改造的机会，尤其是要使广大群众在反右派斗爭中得到教育。

使广大群众在反右派斗爭中得到教育，这里包括左派和中間派。对于左派，是要使他們在斗爭中提高覚悟和受到鍛煉。对于中間派，是要使他們在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自己在資本主义立場和社会主义立場中間动摇不定的兩面性，是要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改造，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有一部分从中間派归入左派，扩大左派的队伍。所謂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地就是对中間派說的。

中間派是可以同無产阶級合作的，也是無产阶級所必須爭取的，但是他們同無产阶級之間有矛盾。这种矛盾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应当按照"团結——批評——团結"的公式去解决。

所謂中間派，就是动摇于左派和右派之間、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革命和反动之間的人們。左派和右派都是坚决的，而中間派是不坚决的。就全国人民来說，左派是絕大多数，中間派是少数，右派更是极少数。但是就目前的知識界的情况說来，如前面所說，左派暫时也还是比較的少数，多数还是中間派。中間派可以跟着右派走，也可以跟着左派走。右派之所以敢于进攻，就是由于中間派的存在，就是由于右派还有可能同左派爭夺中間派。因此，不解决这一部分人的政治立場問題，反右派斗爭就不能获得徹底的胜利。

知識分子是为一定的經济基础服务的，他們同經济基础的关系，好比毛同皮的关系。现在，旧的資本主义的經济基础已經灭亡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新的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上开始新生活，就是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全心全意地为偉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否則，知識分子就会成为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目前的中間派的知識分子，如果不向左轉，不向劳动人民靠攏，就多少类似这种"梁上君子"。这是过渡时期的不可避免的現象，因为他們虽然并不坚决拥护資本主义，但是毕竟还沒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他們对旧世界还有留恋，对新社会还有些生疏，常有"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之感。当然，这种現象是不会持久的。他們或者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数，經过一段时間，終將站到無产阶級和劳动人民方面来。同样，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多数在目前也在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兩条道路之間。無产阶級、广大的劳动人民和革命的知識分子的任务，就是要团結一切还处于中間狀态的人們，帮助他們尽量縮短动摇的时間。为了团結中間派，就要坚决反对右派，并且批評中間派的动摇性。思想革命就是要革掉他們的动摇性，使他們变成眞正的社会主义的知識分子、社会主义的工商业工作者和社会主义的农民。

目前的反右派斗爭已經發展成为全民性的斗爭。这一場斗爭对于粉碎右派，教育中間派和社会上的一切人，都具有偉大的决定的意义。当然，一次斗爭不能解决一切問題。为了完全解决問題，还需要一个相当長的时間。

在經济战綫上，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們有更好的条件来进行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將反过来促进和加强經济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加速現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現代化的农业基础的建立。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質基础还很不充分，这是右派还敢于进攻和中間派还在动摇的一个客观原因。只有建立了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础，我們的国家，我們的社会主义經济制度和

政治制度，才算充分巩固。爭取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我国人民在整个过渡时期的偉大历史任务，它將还需要經过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全国的無产阶級、劳动人民、革命知識分子和全体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人民应当团結一致，加紧努力，改进工作，为尽快地和尽可能完滿地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建成完全巩固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摘錄)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周 恩 来

一 關於社會主義革命

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亿二千万农戶和五百多万个手工业者的个体經济已經变为集体經济。七万戶的私营工业企业已經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將近二百万戶的私营大中小商店,已經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組或者直接变为国营商店。这是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資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領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过程里,社会財产沒有遭到損坏,社会秩序沒有發生混乱,社会生产沒有下降。恰恰相反,我們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一九五六年的自然灾荒,不仅是我国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灾荒,也是几十年以来我国最大的一次灾荒,被灾田地約二亿三千万亩,受灾人口約七千万人。在全国实行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我国农业就經历了这样严重灾情的考驗。在党和政府的积极領导和支持下,全国农民發揮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实現了增产的要求。一九五六年,全国农业总产値約为五百八十三亿元,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接近了第一个五年計划最后一年的指标;粮食(不

包括大豆)的产量为三千六百五十亿斤，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亿斤，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計划最后一年的指标。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由于大家忙于組織合作社和积肥造肥以及兴修水利等基本建設，并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增产粮食方面，因而使某些地方一部分农村副业的發展一度受到影响。一九五六年，棉花和油菜子受灾最重，产量比一九五五年减少了。但是，在实現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国除了灾情严重的地区以外，就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农戶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减少收入的农戶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对于灾区，政府去年用于防汛、搶險、堵口、复堤、救济等項的支出和發放生产救灾貸款的款項共达八亿六千万元，从去年七月到現在，向灾区調运的粮食，增加了七十亿斤，而农业合作社的集体救灾和生产互助，更起了大的作用。

一九五六年，由于城市和乡村的基本建設和生产同时增長，生产資料的需要驟然增大，因而使各种器材，特别是建筑材料和五金材料的供应出現了紧張情况。可是，尽管如此，一九五六年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和营业，也都得到了發展。这一年，手工业总产值达到一百一十七亿元，較一九五五年增長了百分之十六；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一百九十一亿元，較一九五五年这些企业的总产值增加了約百分之三十二。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組的零售总額达一百一十亿元，較一九五五年这些企业的零售总額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在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还不到一年的时間里，政府已經完成了給私方定股定息的工作，对私方人員也作了大体安排。

人們知道，当小生产一旦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經济以后，資本主义就失去了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础。可以这样設想，在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在社会主义經济的大發展中，如果政府对私营工商业不采取一視同仁、合理安排和进行改造的方針，或者私营工商业者不参加公私合营而拒絕改造的話，那么，二百多万戶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营业不仅不能得到發展，并且必然会处于被削弱以至

被淘汰的地位，而私营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从业人員就会遇到失业和轉业的困难。这不仅对国家和人民不利，对工商业者更加不利。党和政府从开国以来，就把私营工商业放在国家的統筹安排之內，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私营工商业者就在一九五六年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接受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从而使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能够同时基本上完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的历史發展所准备好了的。一九四九年，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圍內取得胜利后，我国革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接着，我們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运动。土地改革徹底摧毀了封建基础。抗美援朝击退了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挑战，破除了我国一部分人的特别是許多知識分子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肅清反革命运动相当徹底地打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專政。三反五反，击退了資产阶級的猖狂进攻，創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許多反动思想，初步解决了大多数知識分子为誰服务的問題。显而易見，如果沒有这些运动的胜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短短时間內，就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这些运动都是在党的領导下以群众性的斗爭形式进行的，因为不采取这种形式，便不可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員起来取得运动的胜利，同时也不能使群众在运动中得到鍛煉，提高覚悟，为三大改造鋪平道路。由此可知，对于五大运动無論就其成績来說，也無論就其进行的形式来說，都是不应該怀疑的。五大运动的胜利保証了三大改造能够順利地进行。三大改造本身也是有准备有步驟地进行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經过了从互助組到低級合作社再到高級合作社的發展过程。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經过了从供銷小組、分散生产联合經营等低級形式到手工业合作社的高級形式、从小規模的手工业合作社到規模較大的手工业合作社的發展过程。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是經过了从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到部分的公私合营再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發展过程。同时，三大改造又是相互联系配合起来进行的。了解了上述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历史發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就可以了解在涉及六万万人民生活的历史大变革后的第一年，工农业生产不仅能够正常进行而且能够获得很大發展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巨大的群众性运动中，在具体工作上是發生过一些偏差和錯誤的。政府对于这些偏差和錯誤，有的已經作了檢查和处理，有的正在檢查。我們欢迎全国人民繼續提出批評和建議。当然，我們在檢查偏差和錯誤的时候，要分析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要分析在当时那些偏差和錯誤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是不能完全避免甚至是無法避免的。这样，我們才能判明这些偏差和錯誤的性質、程度和范圍。对于那些在当时条件下确实可以避免的偏差和錯誤，我們必須引以为戒，坚决糾正；对于在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損害的人，我們应該公开向他們道歉；在运动中沒有处理完毕的問題，現在应該由有关机关迅速予以处理。

但是，历次运动中發生的偏差和錯誤，是掩盖不了当时产生这些运动的客观需要和历次运动的基本成績的。以思想改造运动来說，由于这个运动也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某些問題的处理是比較粗糙的，因而損伤了一些从旧社会来的、資产阶級的知識分子的自尊心。但是，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确实帮助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数基本上渡过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数都表示贊成社会主义，就是証明。再以肅清反革命运动来說，在政府历年来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中，計有以下四类：(一)因积恶累累民憤极大而判处死刑的占百分之十六点八，其中絕大多数是从解放后到一九五二年判处的，这在当时是絕对必要的；(二)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三，其中已經刑滿釋放或者安置生产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現在在押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十六点七；(三)实行管制的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已經解除了管制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九，現在仍管制的占百分之九点一；(四)逮捕后寬大处理、教育釋放

的占百分之八点九。由此可知，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七点四是經过劳动改造或者寬大处理而得到釋放和撤消了管制的，他們已經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其余仍在劳动改造或者管制中的，只要他們認罪守法，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也將会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根据政府的初步檢查，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有偏差的是极少数，而絕大多数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認为肃反的偏差竟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是完全沒有根据的。毛澤东主席已經提出还要对这一运动进行一次檢查，我們相信，檢查的結果会繼續証明这一点。

过去进行的五大运动，或者是民主革命的徹底完成，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組成部分。因此，决不能拿革命运动中个别的乃至部分的錯誤来动搖革命运动的成果。即使在个别單位甚至个别地区發生的錯誤比較严重，也依然不能否定这些运动的成果。党和政府每当提倡一种运动的时候，都是根据客观的迫切需要，經过愼重研究和典型試驗才提出的，而每次运动又动員了广大群众参加并且得到他們的拥护。这样就保証了运动的成績是基本的，偏差和錯誤是个别的。有人認为，如果我們說这些运动的成績是基本的，偏差和錯誤是个别的，这就是"教条主义"，这就是"公式"和"新八股"。实际上，这些人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公式"和"新八股"等等口号，就是为了夸大錯誤、抹煞成績，引导一些立場不稳或者不明是非的人把这些个别性質或者部分性質的偏差和錯誤，看成是这些运动的根本性質或者全面性質的錯誤，以达到他們动搖革命运动成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我們說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胜利了，大規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級斗爭基本上結束了，但是这并不是說，阶級斗爭已經結束了。我們現在着重地提出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并不是說，現在就沒有敌我矛盾了。应該指出，目前在国内还有阶級存在，地主阶級、官僚資产阶級虽然已經早被消灭，但是这些阶級的分子，还正在劳动中、生活中改造着，而他們固有的阶級思想和阶級感情，还不可能完全改变。私营工商业者的絕大部分虽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是由于他們还拿定息，对工人阶級还有剝削关系，因而資产阶級的兩

面性依然存在。例如，有人主張或者贊成把股息延長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一次付清，有人說股息不是剝削，仅仅是"不劳而获"，說資产阶級分子和工人阶級分子已經沒有本質的差别，甚至說"官僚主义是比資本主义更加危險的敌人"。这些謬論都是由于資产阶級的唯利是圖、貪得無饜的剝削思想的一面在作祟，都是为資本主义复辟的企圖打掩护。有少数資本家主張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更是拒絕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露骨的表現。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表明資产阶級还存在着兩面性嗎？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說明資产阶級分子还有繼續改造的必要嗎？对資产阶級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他們进行自我批判，逐步改变資产阶級的立場和思想感情，也就是要他們得到"脫胎換骨"的本質改造。要作到这一点，又非經長期的改造功夫不可。这对絕大多数願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业者来說，又有什么不好呢？現在不是已經有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認識到了这一点嗎？由上述情形看来，在人民內部矛盾中，目前还存在着資产阶級同工人阶級对抗的一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級斗爭，更不必說在人民內部之外，还存在着我們同国內的反革命分子和国外的帝国主义的敌我矛盾了。正如大家已經明白看到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有思想斗爭，也有政治斗爭。因此，当我們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时候，絕不能無視还有阶級斗爭的存在，也不能無視还有敌我矛盾的存在。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繼續进行和徹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我們今后的一項重要任务。

……

四　關於國家基本制度

我們的国家是工人阶級領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在我們的国家里，一切权力屬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在这些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里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些就是宪法規定的我們国家的

基本制度。我們的国家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經济关系的上層建筑。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国家制度，才保証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胜利，今后还必須依靠这种国家制度，才能保証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对我們国家基本制度的任何动摇都是不能容許的。

当然，这并不是說，我們国家制度的一切方面都已經是尽善尽美，而不需要任何改进和發展了。恰恰相反，这种改进和發展是經常需要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还只是初步建立起来，各种旧的生产关系的殘余不能不在我們国家的某些制度中有所反映。毫無疑問，这些旧生产关系的殘余是一定要一天天消亡下去，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定要一天天更加巩固、更加發展起来。因此，我們国家基本制度的某些組織形式和运用方法，必須随着經济的發展和政治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同时，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的时間还很短，我們的經驗还很不够，只有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实踐中，逐步积累經驗，才能使我們国家基本制度本身更加健全和完善起来。

至于根据我們国家的基本制度所制定的有关政治、經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各种制度和組織形式，更是必須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进的。例如，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解放初期为了工作的便利，建立了大区軍政委員会或者行政委員会。到了一九五四年，为了适应在計划經济下加强統一管理的需要，我們撤銷了大区軍政委員会。近兩年来，为了糾正中央在某些方面集中过多、統得过严的缺点，我們又研究了体制問題，現在政府正准备适当地扩大地方权力，以便在中央的集中領导下，充分發揮地方的积极性創造性，推进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所有这些改变，显然是必需的，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說明我們各方面的制度和組織形式必須随着客观情况而不断改进，否則，就不能同經济基础相适应，不能为經济基础服务，甚至起阻碍經济發展的作用。

就目前而言，我們各方面的制度的确有許多还是不够完备的，有缺点的。造成这种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有些制度在制訂的当

時是合理的，正确的，但是，当情况發生变化之后沒有及时地加以改变；另一方面是由于有些制度在制訂的时候，就缺乏深入的調查研究，因而不完全符合于客观情况，甚至是錯誤的。还有一些制度上的缺点，是由于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經驗的时候，沒有很好地結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所造成的。在現行的各种制度中，凡是有缺点和錯誤的，国务院有关部門都应該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有益的意見，分别加以修正、补充或者廢除。

我在这里要說一說許多人表示关心的法制問題。我国今天的法制，的确还沒有完备，但是也并不像有些人所說的"完全無法可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們在頒布宪法前后，已經制訂了許多重要的法律，如工会法、劳动保險条例、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綱要、选举法、婚姻法、兵役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貪污条例、逮捕拘留条例等等。同时政府根据工作需要，还制訂了許多單行条例和規章，發布了許多决定和指示，这些在实际上都起了法律的作用。在国家建立之初，特别是在过渡时期，政治經济情况变动很快，在各方面都制訂帶有根本性的、長期适用的法律是有困难的。例如民法、刑法，在生产資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沒有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沒有完全确立以前，是难以制訂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頒布暫行条例、决定、指示等等来作为共同遵守的工作規范，是必要的，适当的。只有在这些条例、决定、指示行之有效的基础上，才可以总結經驗，制訂長期适用的法律。就是資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在初期也是不完备的，也是經过很長时期才逐漸制訂出来的。現在生产資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經确立，国家在各方面工作的实踐中也取得了一定經驗，这就使我們有可能在总結过去經驗的基础上，在整理过去已有法規的同时，制訂社会主义的各种法律，例如刑法已經有了初步草案，民法和治安管理处罰条例也在由有关方面草拟中。

現在有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發出了許多破坏性的言論，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們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他們从資

产阶級民主的观点出發来攻击我們的国家制度；他們誣蔑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是一切錯誤和缺点的根源；他們企圖用否定成績、夸大缺点的办法来詆毀我們的国家制度。他們企圖在我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外成立某种国家权力机关，例如所謂"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会"之类，他們的目的不外是想使我們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級和它的先鋒队——共产党的領导。他們把这些破坏性的言論加上各种伪裝，企圖迷惑那些还看不清楚他們面目的人。这种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論当然不能同善意的批評相提并論。批評缺点和錯誤是为了健全和發展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們所欢迎的。而右派分子实質上是要把我們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資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是广大人民所决不容許的。

我們的国家有民主和專政兩方面的职能。有人認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專政这方面的任务就已經沒有了。这种看法是錯誤的。这是因为在我們国內还有一些殘余的反革命分子，他們仍然在伺机而动。在原来的剝削阶級分子中，也还有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設活动的人。此外，在社会上还有一些盜窃犯、詐騙犯、杀人犯、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尤其不要忘記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集团还經常对我們进行武裝挑衅，并且不断派遣特务、間諜来进行破坏活动和顛复活动。因此，我們决不能削弱我們国家的專政的职能，我們必須改进專政机構的工作，繼續巩固国防，保衛我們的祖国，保衛我們的社会主义事业。

根据我国的宪法，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發展，这种权利日益扩大并且日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只有少数剝削阶級分子才能享受自由，而广大劳动人民，是沒有眞正的自由可言的。与此相反，我們社会主义国家保証了广大人民行使宪法上所給予的自由权利，而对于那些少数反革命分子，必須剝夺他們的自由权利。右派分子說，在我們的国家里，自由权利太少了，好像是对于反对宪法中所規定的国家基本制度、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言論和行动，国家都要給予便利和保証，才

叫做有了自由。显然，人民是不会同意給予这种自由的。

右派分子还攻击我們的选举制度。他們認为，只有像資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才是最民主的。其实，有些資本主义国家虽然实行了所謂普遍、直接的选举，但是資产阶級統治者总是用各种方法特别是金錢和行政手段控制选举，来保障他們的統治地位。在我們这里，恰恰相反，选举制度首先是要保障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又照顧在全国人口中占极少数的資产阶級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使他們在国家权力机关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代表。目前我国在基層实行直接选举，在县以上实行間接选举。这种选举制度是适合于我国当前情况的較好的民主形式。但是，这并不排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地在县以上的各級也实行直接选举。在进行选举的时候，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协商提出联合的候选人名單，事实証明这是适当的。至于候选人的名額問題，过去在联合提出的候选人名單中，候选人数和当选名額相等，这是各方面协商的結果。今后在这个問題上的具体作法，也仍然要經由各方面协商决定。总之，我們国家的选举制度是为了眞正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且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团結起来，而不是用虛伪的形式欺騙人民，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选举是人民享有民主权利的一个方面，我們国家的民主生活还有更丰富內容。宪法中規定："一切国家机关必須依靠人民群众，經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傾听群众的意見，接受群众的監督。"我們国家机关就是根据这种群众路綫的方法来进行工作的。許多重要的法律，在制訂过程中，都經过群众的充分醞釀和討論；国家的經济計划，也由国家有关部門提出控制指标或者草案交給基層生产單位的广大群众討論，然后加以确定；为了發动广大职工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和对企业行政領导工作进行監督，我們在企业中正在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也根据民主办社的原則，建立了社員代表大会和社务委員会。我国公民，經常通过人民代表、监察机关、人民团体、报紙刊物对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也常

常直接用来信来訪的形式向各級領导机关申述意見。我們的国家机关，正是通过这些办法，經常听取群众的意見来改进自己的工作。政府領导机关对待人民批評、建議、来訪和来信的工作还做得不很好，我們应該迅速加以糾正，并且要求各級政府机关十分重視这种工作。正在进行着的整风运动，也是我国民主生活的一个显著的表現。發动群众来公开揭發和批評我們的国家机关和工作干部的缺点和錯誤以便加以克服，这是任何号称自由民主的資本主义国家所不会做，而且也不敢做的事情。

但是应該指出，在我們国家各級行政管理机关中还存在着，甚至是严重地存在着官僚主义的习气。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还只是初步建立起来，旧社会的影响，特别是資产阶級的思想，还經常在侵蝕我們国家机关的工作干部；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他們行使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的权利，还不免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在我們的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就有可能滋長起来。同时，我們国家的管理制度上的某些缺点，例如机構龐大，層次过多，有些事权过于集中等等，也助長了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习气的存在，妨碍着我們的国家机关同人民的联系，給工作帶来了很大損失。我們必須繼續扩大民主，依靠群众的监督，不断地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爭。

我們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把广泛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互相結合起来。我們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我們之所以要有广泛的民主，是为了团結一切力量来共同建設社会主义，發展社会生产力。如果只有民主，沒有集中，就不可能使全国人民在一个共同的方向、統一的計划下进行有組織的共同斗爭，也就不可能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偉大目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运用，是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动而有所不同的。大家知道，过去在进行革命战爭的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我們对于民主和集中这兩方面比較着重于集中，但是，即使在战爭和革命的时期，集中仍然是建立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适应战爭的需要，不能保証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我們就有可

能进一步扩大民主。近兩年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經济管理工作上，民主的扩大都是很明显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因为民主的扩大而根本否定集中的領导。小資产阶級从他們自發的無政府主义傾向出發，常常向往于所謂"絕对民主"，也就是不要集中領导的民主。这种"絕对民主"只能使人民陷入散漫的、無組織的狀况中，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特别喜欢这种"絕对民主"的观念，企圖利用这种观念来涣散劳动人民的意志，瓦解劳动人民的組織性和战斗性。为了击敗右派分子的陰謀，我們必須坚决地保衛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度，不讓那些所謂"絕对民主"的观念来侵蝕我們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导地位是宪法明文肯定了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級的先鋒队，共产党的領导，就是体現工人阶級的領导。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領导下，已經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兩次偉大胜利。在建設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同样必須有共产党的領导，因为建設社会主义，就是要用工人阶級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方針就是要領导全中国人民建成沒有剝削、沒有阶級的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中国人民历来所憧憬的大同世界。难道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别的党派能够領导中国人民实現这样偉大的理想嗎？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导地位說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惡意的誹謗。事实上，正是在共产党領导下，中国广大人民才眞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够充分發揮自己的力量来建設新的生活。北京工人說"共产党領导的中国就是工人阶級的天下，就是人民的天下"。这是对于这种"党天下"的叫囂的最好的回答。所謂"党天下"的說法，也就是把共产党当成一个脫离群众与群众对立的宗派，所以有些右派分子又說，共产党就是宗派主义的根子，这是完全違反事实的謊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反对宗派主义的，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共产党都坚持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因而才形成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結。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又主动

地提出了願意同各民主党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而它的最終目的又是要实現消灭一切阶級、从而使一切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內，都趋于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党同宗派主义是絕不相容的。共产党总是教育党員要时时刻刻注意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絕不容許党員用宗派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党外人士。中国人民大众之所以信任共产党的領导，也就是因为他們根据事实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眞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級政党。

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工农联盟是基本力量，但是同时必須团結其他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願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級、阶層。共产党領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就是全国人民革命大团結的具体表現。有了这样的統一战綫，就能够更好地联系和团結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各方面人民群众的意見和要求，使国家能够及时地采取适当措施来調节他們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时，通过团結在这样的統一战綫之內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就能够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推进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發展。共产党提出的同各民主党派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的作用和目的就在这里。广大人民所希望于各民主党派的就是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場上，注意进行思想改造，以充分發揮他們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設的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战綫必然还要进一步地巩固和發展。任何怀疑統一战綫政策的意义，低估統一战綫的作用，輕視統一战綫工作的思想都是錯誤的。

但是，必須肯定，共产党是統一战綫的領导力量和核心力量，社会主义是統一战綫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全国人民团結奋斗的共同目标。这些不可动摇的原則，是参加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各民主党派所必須遵循的軌道，离开这个軌道，就是自外于統一战綫。

我們国家的权力机关，是在共产党領导下由各民族、各阶級、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組成的。国家的大政方針都是由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事先协商然后提交有关国家机关討論和制定的，而

在执行这些方針的机关中，又有各民主党派和無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加。这种在共产党領导下各民主党派和無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参与国家管理工作的办法，能够更好地团結全国人民，調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設社会主义。这正是表現了我国国家制度的优越性。資本主义国家所标榜的兩党或者多党輪流执政的办法，只是資产阶級各派集团欺騙劳动人民的虛假民主罢了。現在有些右派分子所夢想的，就是要把这种資产阶級的多党政治和"各党派輪流执政"的办法，搬到中国来代替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

一九五四年我受第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組織政府的时候，就是根据宪法規定的以共产党为領导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原則提出国务院組成人員名單的，当时共产党以外的各民主党派和無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的成員約占四分之一以上，后来增加政府成員的时候，大致也是根据了这个比例。这种安排是根据当时情况确定的，現在看来也是适当的。

要保証政府各方面政策的正确执行，就必須在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中都有共产党的坚强的核心領导。共产党必須領导一切的原則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說的，并不等于一切具体工作都要由共产党直接管理；相反的，許多專門业务工作应該由專家負責。这里所說的專家，自然也包括共产党員專家在內。至于体現共产党領导的具体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可以而且应該因时因事有所不同，以求更好地發揮党的領导作用，使領导和被領导、共产党員和非共产党人士都能够充分發揮积极性，更好地合作共事。許多人在这方面提出的善意的批評和建議是应該仔細研究的。但是，右派分子提出的"中共組織退出机关、学校"、"共产党不在知識分子中發展組織"、"党不要在政权之外再搞一套党的系統"、"請共产党下台"等等狂妄要求，却与前面說过的"官僚主义是比資本主义更加危險的敌人"、"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会"、"党天下"、"各党派輪流执政"等等謬論同出一轍，互相呼应，目的都是要使人民政权脫离工人阶級政党的領导，以便按照他們的資产阶級面貌来改变我們国家的性質。

有些人批評現在有党政不分的現象。对这个問題要加以分析。党对于人民群众直接發出政治上的号召和政策性的决定，对于政府工作不但沒有妨碍，而且有很大的帮助。有些帶有政治号召和政策指示性質的决定或者帶有群众运动性質、需要党政一齐动手的工作指示，由同級党政机关联合發布；有些工作的檢查，由相应的党政机关联合进行；有些政府机关的会議邀請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有关負責人参加；事实証明，这些办法对于推进工作是有好处的，今后还应該繼續采用。但是，在某些机关中，共产党的組織包办代替行政工作，或者对于某些具体业务不通过行政而直接干預，这些現象对于政府工作和对于党的工作都是不适当的，应該加以糾正。

有人提出在国家机关、学校、企业中非共产党員的負責人有职無权的問題，这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但是，如果对这个問題加以具体分析，便可以看出存在有各种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共产党員和非共产党人士合作得很好，彼此之間無牆無溝；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共产党的組織和党員干部对非共产党人士的职权不够尊重，甚至对他們采取歧視、排斥的态度，这是严重的宗派主义性質的錯誤；第三种情况，是有些非共产党人士，对自己的职务尽責不够，并且对共产党的組織和党員采取疏远和猜疑的态度，而有关的共产党的組織和共产党的負責干部对他們的接近和帮助也往往不够。后兩种情况应該引起我們严重注意，积极加以克服。解决这个問題的关鍵，首先在于共产党的組織要教育自己的党員，切实执行党的統一战綫政策，克服宗派主义思想，善于在工作中尊重、团結和帮助党外人士，虛心傾听他們的意見和批評，学习他們的專長和經驗，不断地提高自己，改进工作。对于某些影响团結、增加隔閡的工作制度，应該加以改变。同时，非共产党人士也应該勇于尽职尽責，消除对于工农干部的抵触情緒，消除对于共产党員的猜疑隔閡，开誠相見，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随时提出批評和建議，并且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認識，以期达到双方亲密合作、和衷共济的目的。在非共产党人士中有一些人对于社会主义还抱着对立的情緒，他們尤其需要努力改造自己，清除这

种对立情緒。

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着的整风运动，同时也就是在我們的国家机关中的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对于这些錯誤的思想和作风的任何积极的批評，那怕态度有些偏激，內容不够全面，所根据的个别事实还有出入，我們都应該抱着欢迎的态度加以考虑，采納其中有益的意見，来改进我們的工作。有些右派分子硬說，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就是無产阶級專政，或者在指責我們的国家机关中的毛病和缺点的时候，把我們的国家机关和剝削阶級的国家机关相提并論，这些謬論必須加以駁斥。在資产阶級專政的国家里，国家机关是資产阶級压迫和剝削广大人民的工具。这种国家机关是同广大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在这种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仅是不可避免，而且是不可克服的。我們的国家机关完全是另一回事。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級为領导的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社会主义国家必須而且能够吸引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說来，是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相容的。我們一定要、也一定能够战胜这一切病菌，我們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就是我們能够战胜这一切病菌的保証。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十月單行本第一至八、三七至四九頁）

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国共产党
第八届中央委員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議上）

鄧 小 平

（見本書第六三五至六六三頁）

关于所謂"輿論一律"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書中"人民日报"的編者按語)

胡风所謂"輿論一律",是指不許反革命分子發表反革命意見。这是确实的,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这种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种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一个社会,無論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兩种人們、兩种意見矛盾地存在着和斗爭着,总是先进的意見克服落后的意見,要想使"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該的。只有充分地發揚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內尚有阶級和阶級斗爭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級和人民大众,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阶級、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达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輿論一律"对于他們的不方便。他們感到不方便,正是我們的目的,正是我們的方便。我們的輿論,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內部,允許先进的人們和落后的人們自由利用我們的报紙、刊物、講壇等等去竞賽,以期由先进的人們以民主和說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們,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賽。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暫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須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間的矛盾,則是人民在工人阶級和共产党領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專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專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乱說乱动。这里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

律也一律。在这个問題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詞；有些糊塗的人們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論調之后，也好像覚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輿論一律"，或者說，"沒有輿論"，或者說，"压制自由"，豈不是很难听的么？他們分不清楚人民的內部和外部兩个不同的范疇。在內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錯誤缺点的批評，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們的制度。而这些，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則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縱反革命乱說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專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們的制度。資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資产阶級專政，不許革命人民乱說乱动，只叫他們規規矩矩。剝削者和反革命者無論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剝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專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則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說："絕大多数讀者都在某种組織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們在人民內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說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錯誤的。"絕大多数讀者都在某种組織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沒有过，仅在共产党領导人民做了長期的艰苦的斗爭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將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剝削压迫的散沙狀态改变为团結狀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內实現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結。胡风所說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們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經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們認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沒有过，仅在共产党領导人民作了長期艰苦斗爭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覚这么难受。一句話，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們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說："文艺問題也实在以机械論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論"是辯証唯物論的反話，"最省力"是他的瞎說。世界上只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們瞎說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檢查的。唯物論和辯証法則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檢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論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則性的問題，我們認

为有加以詳細駁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說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緒，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〇年說的。那时，在大陆上剛剛消灭了蔣介石的主要軍事力量，还有許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裝正待肅清，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和鎮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沒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沒有进行整頓工作，胡风的話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沒有說完全。說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緒，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搗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六月出版的"关于胡風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第六八至七〇頁）

在肃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論

現在我們都公認毛主席这样的論断是正确的：在我們国家里，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反革命分子不多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它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表明，我們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經基本上解决了摧毀反革命势力的历史任务，走上了巩固發展的阶段。

反革命分子之所以不多了，首要的原因正是过去几年来的鎮反运动和肃反运动。这本来是很容易了解的事。然而，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特别是那些企圖用庇护反革命分子和成立所謂平反委員会来取得政治資本的英雄們，却竭力散布种种謬論，特别攻击一九五五年开始的在机关学校进行的肃反运动，說它"糟糕透頂"，根本沒有成績可言。另外一些人，或者由于在肃反运动中被斗爭过，或者由于把暫时的局部的現象当作全体，也随声加以附和。为了澄清这些錯誤意見，对于肃反运动（主要是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究竟有無成績，成績大小，必須根据事实，加以实事求是的討論。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爭是一場艰苦的、复杂的斗爭。在这个斗爭中，敌人是隐蔽的。正因为这样，我国人民在肃反斗爭中，不但依靠專門的国家机关——公安部門——的工作，而且首先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我們認为，只有广大群众积极投入这个斗爭，才能比較容易發現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才能比較少犯錯誤。要錯誤少就得經驗多，而經驗是需要积累的。从这个观点出發，才能正确地估計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的成績和錯誤。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的成績，有以下四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現在已經定案的来說，有八万一千多名（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由于国家采取了更加寬大处理的政策，不以反革命分子論处，沒有計算在內）。在这些反革命分子里面，有美蔣特务机关派遣进来的特务間諜，有老早就潜伏下来的特务間諜，有重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各种各样的反革命集团。把他們清查出来，对于我国的国防和建設的安全，無疑有极大的意义。

第二，由于肅反运动，反革命分子內部日益趋向于分化和瓦解。一年多来，全国有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其中包括不少長期潜伏的和美蔣派来的特务間諜分子。一九五六年全国的反革命案件，比一九五五年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他刑事案件也减少很多。对于反革命活动的打击，帮助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帮助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順利进展。

第三，在肅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問題，例如隐瞞参加反动組織、隐瞞反动身份、隐瞞历史上的惡迹等等的問題。不弄清楚这些問題，就很难划清敌我界限，而他們自己也將背着沉重的包袱。現在，对他們弄清了疑点，做出了結論，使他們去掉了精神負担，便于积极工作。这無論对于人民事业或者对于他們本人，都是有利的。

第四，經过肅反运动，群众比較懂得了怎样去識别隐蔽的敌人。使广大群众具有对隐蔽的敌人的警惕性，具有識别暗藏反革命的能力，不仅过去和現在需要，將来也仍然需要，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蔣介石集团和殘余的反革命分子还存在。大家都看到六月九日报紙上的一条消息：六月七日晚上，一个特务分子在广州文化公园扔了定时炸彈。如果不是被兩位青年学徒發覚，就不知道会有多少游客死在特务手里。很明显，群众的这种革命警惕性，經过肅反运动是更加提高了。

以上所說的肅反运动的巨大成績，都是不容抹煞的。

否認肅反运动有成績的有几种人。一种人同人民站在相反的立場上，从根本上否定肅反运动。人民認为肅反很必要，他們却認为肅

反本身就是錯誤。人民因为肃反的結果得到了安定的社会秩序而感謝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們則因为自己的阶級本能，在思想感情上总覚得把反革命分子搞得太狠了，而对于肃反运动和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对于領导肃反运动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心怀怨恨。这种人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人，例如黃紹竑，在解放以前本来是杀人不眨眼的反革命劊子手。这样的人，对于肃反运动怎么会不竭力反对和加以污蔑呢？

另一种人承認肃反运动有成績，却認为成績太小了。他們說，"搞来搞去沒有搞出多少反革命分子"。在他們看来，八万人的数目是太小了，值不得"小題大作"。

这种意見是錯誤的。首先，就是不說肃反运动給予整个反革命活动的沉重打击，也不說由于肃反运动才投案自首的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單是八万个反革命分子也决不是什么小事。难道一定要八十万个，八百万个，才值得我們兴师动众去肃清么？

其次，应該指出，在这八万多反革命分子中間，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重要部門的重要职位。例如曾經是內务部戶政司司長的周維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長而且負有血債的反革命分子。又如山西师范学院教授、民主同盟成員潘恩溥，是一个叛徒和中統特务分子。他曾經破坏內蒙古东胜旗革命运动，出卖党的負責人，致王若飞同志被捕；田得秀同志被害。又如吉林省委宣傳部理論教育处处長于民一，原来是一九三八年混入革命队伍的中統特务。又如，公安部十局副处長張荣桂，竟是一个混入共产党十八年的特务，早在一九三五年他就参加了国民党反革命組織C.C.。

讓反革命分子掌握了重要职务，窃据了要害部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敌人在我們的革命堡壘里面，埋下了按照敌人意志活动的"定时炸彈"。这些炸彈一旦爆炸，就可能給我們的国家和人民事业造成难以逆料的損失。

还应該指出：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現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而且这里面还有相当数目的重

要的特务間諜。

广州市第十五中学教員黃然，一九五五年三月經澳門的特务分子張維安、張維柱介紹，参加了蔣帮特务組織，被委任为"广州工作組組長"。他曾八次用密写、暗語等方法同特务組織联系和寄送情报。武汉市劳动局調配处会計王鵬，是蔣帮保密局的上尉通訊員，解放前干过逮捕进步学生、监視中共代表团等罪惡勾当。一九四九年，他在日本的"中美联合工作总部万能情报員訓練班"受訓，一九五〇年就潜回大陆进行特务活动，向敌人送过密写情报多次，并阴謀架設电台。山西太原机車車輛修理厂四級工程师王孚中，騙取了先进工作者称号，审查結果竟是奉保密局太原站長田畯之命，携帶电台一部，潜伏下来进行特务活动的軍統特务。

有人說，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間，大部分并非身居要职，也不是現行犯。但是第一，对于重要的和現行的反革命分子的危害性，不能簡單地拿数字去判断；第二，沒有身居要职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对于人民的危害性也决不允許忽視。

許多人都知道抗日战爭时期發生的河北灤县"千人坑"大慘案，有一千二百八十名爱国同胞在这个慘案中遭到活埋。当时河北灤县日伪警察所警务股書記張占鰲，就是这次慘案的凶手。在埋人坑前面，曾經有一位妇女攙着一个小孩，跪在他的面前求饒。毫無人性的張占鰲竟一木棒把这位妇女打到坑里，然后提起孩子的兩只小腿扔了下去。解放以后，他改名換姓，混进了黑龙江省龙江县的教育界，当了小学教員。

一九四七年蔣軍侵入山东省昌邑县的时候，該县角蘭乡自衛团長毕音祥，同一帮匪徒活埋和慘杀了本乡的十五名革命干部，积极分子和他們的家屬，其中五个人是毕音祥直接动手杀害的。这个劊子手还慘杀了土改积极分子李永胜的全家，包括一个三岁的孩子。直到这次肅反运动，才把他从第一汽車制造厂的杂工中清查出来。

像这样万惡的凶犯，能够听任他們逍遙法外嗎？

这样的劊子手，隐瞞了自己的血腥的历史，甚至改了名，換了姓，

混在人民内部，虽然暫时同反革命組織中断了联系，暫时隐蔽不动，但是有什么根据相信他們已經痛改前非，眞正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呢？一旦他們認为时机到来，他們就会重新擦亮屠刀来对付人民。六月二十五日报載，山东館陶县浮渡乡乡長申林台全家九人，有七人慘遭反革命分子杀害。行凶的主犯申孟春在敌伪时期当过伪軍班長，对革命群众有过血債。这一次他只是怀疑申林台知道他的底細，就对申林台全家下了毒手。对于这样的豺狼，难道不应該在他們还沒有来得及重新动手以前，就把他們清查出来么？

徹底肅清反革命，这是我們国家的長治久安之計。正因为这次肅反运动在历次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又得到了新的巨大的胜利，清除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弄清楚了許多人的政治問題，我們的革命队伍更加純潔了，所以党和人民政府才有把握作出这样的論断：反革命还有，但已經不多了。

再还有一种人說，肅反成績的确很大，但是錯誤缺点更大，因而得不償失。这种說法对不对呢？

当然，我們說肅反运动有巨大的成績，并不是說在肅反运动中沒有錯誤，沒有偏差。肅反运动确实有錯誤，在极少数單位，錯誤还很严重。無論錯誤大小，有了錯誤就必須糾正，不能含糊。但是这些錯誤同上述的肅反运动的重大成績比較起来，只能說是次要的。

肅反运动中究竟有哪些錯誤呢？

錯誤的性質有兩类。一类是有些單位在肅反运动中漏掉了一些本来可以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另一类是不少單位錯斗了一些好人。这些單位曾經根据一些不确实的材料，沒有經过認眞的調查和仔細的分析，把本来沒有政治問題的好人錯認为坏人。还有一些人平日工作上出过容易引起怀疑的差錯，肅反运动一来，这些單位的領导方面沒有冷靜地加以分析，混淆了工作上的差錯和反革命破坏，以致把这些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斗爭了。

究竟为什么一些共产党員会犯这种現在看起来是不应該發生的錯誤呢？这是因为，反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爭，本来是一件难

事。加以許多單位沒有用最严肅的态度进行周密的調查研究，因而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或者把坏人当作了好人，或者把好人当作了坏人。漏掉了的反革命分子，必須繼續清查，不能因为肅反有了成績而懈怠疏忽。錯斗了一些好人，伤了他們的感情，損害了他們的名誉，使其中一些人暫时地同党和政府疏远了，使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某些环节暫时地受到了一定的損失，对于这种錯誤必須坦白承認，并且徹底糾正。

有一些沒有反革命活动、但是隐瞞了政治問題的人，在肅反运动中也曾被斗爭过。因为隐瞞政治問題而引起怀疑，隐瞞者本人不能說沒有責任。經过清查，現在才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他們并不是反革命分子。如前所說，弄清了他們的政治問題是好事，但是把其中有些人当作反革命分子，却是錯了。

此外，在一个短的时間內，有些地方，在斗爭方式上犯了錯誤，例如打人罵人等等。这些錯誤仅仅是發生在一九五五年肅反运动初期小組斗爭的高潮当中，时間很短，一經發現，就采取了糾正的措施。

有些人不大喜欢"难免"論。当然，如果可以避免的錯誤而沒有避免，那是不能用"难免"論来推卸責任的。但是像肅反这样的斗爭，你或者根本不进行，那只能把反革命分子保留下来；或者認眞地进行，那就确有一部分錯誤是难以避免的。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尽可能地防止錯誤的發生和扩大，尽可能地避免不能补救的錯誤。这些措施确实避免了許多錯誤，但是仍然沒有避免了也不可能避免所有的錯誤。

就錯斗了好人的問題說，無論是直接被錯斗的人，或者是同他們亲近的人，或者是自己参加了錯誤的斗爭、感覚抱歉的人，或者是完全旁观、代打不平的人，对于这样的錯誤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公平的認識。錯誤都是不对的，不好的，不应該掩护和粉飾的；身受錯誤損害的人，尤其不免有种种痛苦。这是事情的一面。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这种錯誤是为什么發生的呢？是为了保存反动势力？是为了私人的恩怨利害？是明知其为錯誤而故意犯錯誤？不是的。犯錯誤

的人(除了极个别的假公济私、明知故犯、因而必須惩处的例外)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他們当时并不知道而且很难知道自己是犯了錯誤。在最英明的統帅所指揮的完全正义的战爭中,也無法保証被炮火攻击的都是該受攻击的。不但普通居民,有时甚至自己方面的战士,也会受到誤伤。但是我們能不能根据这些無心的过失,去否定一場革命战爭或者衛国战爭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呢?我們能不能因此而把犯了这些过失的將士看作冤仇呢?同样,每一个能够客观地权衡利弊得失、分清大是非和小是非的人,对于肃反斗爭中的錯誤,以及其他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的錯誤,也不难作出正确的而不是片面的、感情用事的判断。

毫無疑問,在斗爭中,同一些人伤了感情,發生了一些副作用(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甚至是难于弥补的副作用),对于这一点应該有足够的估計。我們認为,在一方面,暫时受伤害的人应該看到事情的本質和整体,不要怨恨不已,必报复而后甘心;在另一方面,在斗爭中誤伤了好人的人,特别是各單位肃反斗爭的領导人,必須向一切受了伤害的好人公开承認錯誤,进行賠礼道歉。当着原来参加斗爭的群众恢复他們的名誉。这个工作許多地方已經进行过,已經取得了許多被錯斗的人的諒解。有些地方善后工作做得不好,应該立即毫不躊躇地認眞补課。即令有些人暫时还不諒解,我們相信,当他們徹底了解了肃反斗爭的意义,看到了肃反斗爭的某些錯誤确是难以完全避免,那些犯錯誤的人对他們确是毫無私怨,而且在認識了錯誤以后坚决糾正錯誤,向他們誠恳地賠礼道歉,当众恢复他們的名誉之后,他們終有一天是会完全諒解的。

說肃反的成績是主要的,是指就全国、全省、全市、全区来說的。至于某些單位,錯斗了一些人,而并沒有搞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或者根本那里就沒有反革命分子,当然应当进行具体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結論。即使在这样的單位,也不能抹煞肃反的成績。把一个單位的全体人員的政治面目弄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不是成績呢?至于用这样的局部的情况去判断全体,那自然更不正确了。

無論如何，凡是站在革命的人民的立場上的人，凡是坚决主張肅清反革命的人，决不能給肃反运动潑冷水，决不能給参加肃反运动的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潑冷水。人民事业的进步；人民民主專政的巩固，依靠而且只能依靠革命的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的任劳任怨、百折不撓的奋斗，依靠而且只能依靠他們在奋斗的过程中不断地增加經驗，提高覚悟。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的革命积极性，这是一切財富中最宝貴的財富。对他們潑冷水，实际上也就是对革命潑冷水，对社会主义潑冷水。

反革命分子虽然不多了，但是还有，因此还需要繼續警惕，繼續識别，繼續清除。"有反必肅，有錯必糾"，这就是革命的人民的方針。为了貫徹执行这个方針，对于过去的肅反运动的成績和錯誤，作出透徹的分析和恰当的估計，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用事实来駁倒那些根本反对肃反运动的右派分子，才能够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肅反运动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才有利于認眞糾正工作中的左的和右的錯誤，也才有利于保护人民群众同反革命分子斗爭的积极性。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届
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刘 少 奇

(見本書第四四三至四七三頁)

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摘錄）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上的报告）

柯慶施

一

关于国內外的形势，党中央經常給我們作出全面的分析。在这次会議上，周恩来同志作了“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政治报告，使我們对形势、对全局有了进一步的認識。我們做各种工作都要看一看全局。全国有全国的全局，全市有全市的全局，一个部門、一个單位也都有各自的全局。懂得了全局，才能心中有数，不致迷失方向。我們有些同志往往不經常注意形势，不注意全局，不注意对事物进行全面的分析。有时看到成績，看不到缺点；有时看到缺点，又看不到成績；对成績和缺点，有时又分不清主次。为了使整改进行得好，也需要先看看全局。因此，我們有必要先来談談形势，特别是过去一个时期發生过爭論的一些問題。

首先，我們談談国內的主要矛盾問題。

这个問題，中央已經作过明确指示。但是，过去一个时期，我們一部分同志被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刮起来的一陣妖风吹昏了头腦，对于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發生了怀疑，好像党的某些基本政策是右了。这一股风虽然不很大，但很值得注意。

大家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三大敌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我国的过渡时期，上面說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国內基本上解决了。資产阶級同無产阶級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爭，成了国內的主要矛盾。一九五六年初达到高潮的資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三大改造运动，标志着我国經济战綫上（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無产阶級同資产阶級在这方面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經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徹底、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所有制的基本改变，不但还沒有完全解决經济战綫上的問題（所有制还沒有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質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現代工业和現代农业的發展还很不充分），尤其还沒有完全解决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問題。在我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的总綱里，就着重地指出：党仍然面对着“徹底消灭剝削制度，并且杜絕产生剝削制度的根源”的严重任务，仍然面对着“繼續注意从經济方面、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克服資本主义的因素和影响”的严重任务。因此，阶級斗爭还沒有結束，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誰战胜誰的問題还沒有完全解决，斗爭还是長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無产阶級同資产阶級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爭，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內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現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間，即生产資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着社会生产力的發展；而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后，兩个阶級、兩条道路之間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現在上層建筑同經济基础之間，即資产阶級的政治活动和資产阶級的意識形态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一部分資产阶級分子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还不承認無产阶級的領导权，甚至还企圖夺取这种領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兩个阶級、兩条道路之間的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圍內表現为敌我矛盾，在其他范圍內則表現为人民內部的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現为人民內部的矛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表

現为敌我矛盾。旧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們同人民的矛盾当然是敌我矛盾，但是他們在人民群众中已經徹底孤立了。还有一些政治資本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是資产阶級的一部分，即尚未被揭發出来的資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里头的右派分子。他們同無产阶級的矛盾也是敌我矛盾。但是不論是在全国人民中，或是在資产阶級中，他們也只占极少数。当他們一旦暴露出自己的反社会主义面貌，他們很快就陷于广大人民的包圍之中。至于資产阶級分子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多数(中間派)，对于所有制的改变和無产阶級的領导虽然也不完全心服，但是一般說来，他們还是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無产阶級領导的，他們同無产阶級的矛盾一般地表現为人民內部的矛盾。不論就全国来看，或是就上海这个資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地方来看，情况都是这样。

我們可以举出兩个摆在眼前的現实例子，証明党中央对基本形势所作的分析的正确。一个例子是：这次党所領导的上海工商界的反右派斗爭，主要是由工商界自己进行的。第一批六千人，經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提高了認識，学会了大鳴大放、摆事实、講道理的方法，在进入反右派斗爭阶段以后，揭露出右派分子二百四十八人，整个工作做得很不坏。目前运动正逐步推广到整个工商界去。另一个例子是：复旦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剝削阶級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六十，上層小資产阶級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五，工农家庭出身的只有百分之四点五，但是，在政治上，左派加中左分子却占百分之四十四(这个比例在全市是比較高的，一般大学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右派只占百分之八点五。这兩个例子难道还不能說明，就以商学兩界而論，近几年来，特别是近兩年来，他們的改造工作做得还不坏，他們自我改造的成績是显著的嗎？这难道还不能說明情况已經發生了有利于無产阶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嗎？难道还不能說明他們的大多数經过教育是可以进步的，認为他們同劳动人民之間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是完全正确的嗎？

我們有些同志不去認眞研究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教导，即是

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我們处理得当，如果資产阶級接受無产阶級的政策，無产阶級同資产阶級的对抗性矛盾可以轉变为非对抗性矛盾。他們看不見国内阶級关系的巨大变化，不認眞研究周圍事物的新發展，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化了。他們錯誤地把我国無产阶級同資产阶級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爭一概看作敌我矛盾，把不屬于右派的資产阶級分子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中間派对社会主义的动搖和不滿也看作敌我矛盾，企圖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而不懂得必須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性質的矛盾，必須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新的形式来处理阶級斗爭的必要。

当然，看不到敌我矛盾是完全錯誤和非常危險的。既然敌我矛盾还存在，否認或者忽視敌我斗爭，把兩个阶級、兩条道路的斗爭中所包含的一部分敌我矛盾，即我們和右派之間的斗爭，也看作人民內部的矛盾，就要犯右傾錯誤。由于阶級关系时而尖銳（例如当資产阶級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时而緩和（例如当反右派斗爭取得胜利，阶級敌人被迫退却的时候），我們必須繼續保持警惕，注視这方面的發展变化。当阶級关系尖銳化起来的时候，我們必須强調这方面的斗爭，并且坚决粉碎一切反社会主义、反劳动人民的分子的进攻，如同这次反右派斗爭所做的那样。但是，鑒于資产阶級分子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大多数（中間派）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無产阶級領导的，我們仍然应該信任他們中間的多数，帮助他們进行徹底的改造，使他們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在資本主义立場和社会主义立場中間动搖不定的兩面性，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爭取他們中的許多人逐步从中間派轉入左派，扩大左派的队伍。当然，这是一个長时期的反复的过程，中間还会起变化。他們中間的大多数会逐漸进步，逐步改造好，也会有一部分改造不好，但是数量不会很多。

我們說兩个阶級、兩条道路之間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类，这并不是說，目前我国人民內部的矛盾都屬于兩个阶級、兩条道路之間的矛盾，而劳动人民內部就沒有矛盾了。党中央和毛

澤东同志指示我們：人民內部的矛盾除了存在于一般的資产阶級分子同劳动人民之間的以外，还更广泛地存在于劳动人民內部和工人阶級內部。毛澤东同志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及人民日报編輯部的文章“关于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和“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对于这个問題都曾有全面的深刻的分析。毛澤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济基础之間的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剛剛建立，还沒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資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剝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說，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質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質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問題上，还需要繼續解决。在各經济部門中的生产和交換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則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經济和集体所有制經济里面，在这兩种社会主义經济形式之間，积累和消費的分配問題是一个复杂的問題，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經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發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發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層建筑和經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識形态，这些上層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組織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資产阶級意識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構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相矛盾的。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体的情况，繼續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毛澤东同志在这里所指出的种种矛盾，一部分屬于資产阶級同無产阶級的矛盾，一部分屬于小資产阶級同無产阶級的矛盾，一部分是由于資产阶級、小資产阶級的思

想作风傳染到無产阶級中的許多人，因而在無产阶級內部产生的矛盾，但是还有許多矛盾却不是由于阶級的存在或者阶級影响的存在，而是由于人們的主观認識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人們的領导工作落后于群众需要。这是一种主观同客观、先进同落后的矛盾，这类矛盾就是在阶級和阶級影响完全消灭以后也仍然会繼續产生。在同过渡时期比較起来称得起完全巩固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以及在往后亿万斯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發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發展，上層建筑的發展到了一定时期也仍然会落后于經济基础的發展。因此，仍然需要及时地發現經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日常性質和特殊性質的矛盾，及时地加以調整。有了正确的制度，还需要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所有这些方面，領导工作情况怎样，是好还是坏，是采取辯証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还是采取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是走在客观实际和群众覺悟的前面还是落在后面，具有很大的作用。总之，在阶級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錯誤、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將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現。而人类社会也就將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由此可見，人民內部的矛盾需要加以分析。以我們党的整风为例。我們在整风中要着重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要着重批判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無政府主义、絕对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这些是資产阶級、小資产阶級思想影响的反映。但是我們要反对的主观主义作风，却是認識上的問題。我們要解决許多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例如对于工业發展速度和农业發展速度的某些爭論，对于形势發展快慢的不同估計的某些爭論。这种爭論將来永远也是会有的。对于这种矛盾，就不能看作阶級矛盾的反映，更不必說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

我們有些同志过去一个时期怀疑党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怀疑党的若干基本政策的正确性，主要地就是由于沒有

具体地分析国内的阶級关系和主要矛盾，对不同性質的矛盾又缺乏具体分析。

我們有一些同志喜欢用压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总覚得說服的方法收效慢，或者收效小。这是沒有根据的。看来他們好像很"左"，其实，恰巧說明了他們很右。事实証明，对人民采取說服的方法，是馬克思主义的最积极、最有效的方法。我們同志們相信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难道不是被說服的結果而是被压服的結果嗎？为什么我們可以被先进的同志們說服了，而我們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說服别人呢？对人民采取压服的方法，这不是别的，正是历史上一切剝削阶級对待被剝削阶級的方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方法。国民党蔣介石是最会向帝国主义屈服、向人民施"威风"的。我們必須反掉这种国民党作风的影响，不許向人民施"威风"。我們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定要相信党能够說服大多数，团結一切可能团結的人，改造旧社会，創造新社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把旧社会的人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在剝削制度下，旧社会把人訓練成自私自利，而在新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斗爭的逐步深入，随着社会主义經济基础的日益强大和巩固，就有可能最后肅清資产阶級思想的影响，使旧社会来的人改造成为具有無产阶級大公無私的思想的人。这当然是一个長期的过程。但是，我国的社会运动和社会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局势是有利于我們这样做的。

整风运动的經驗，最有力地說明对人民采取說服方法的偉大效力。經过今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爭，我們很多同志学会了用大鳴大放、大爭大辯、貼大字报、开辯論会等等一套方法，正确地处理了我們工人阶級内部、劳动人民内部的大批問題，以及同資产阶級的阶級矛盾中的大批問題，取得很宝貴的經驗。同时，我們还取得了用大鳴大放、大爭大辯、擺事实、講道理的一套方法，就是說，也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 理我們同資产阶級右派这一种敌我矛盾的經驗。这是极为重要的收获。但是，我們还有不少同志沒有学会或者沒有完全学会这套办法，不少同志对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

还有抵触。因此，我們各級党組織和各級領导同志要下定决心，不但自己要对当前的阶級关系和国內的主要矛盾和大量存在的矛盾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还要帮助各級党組織直到基層党組織、基層干部都能認清形势，分别各类矛盾，并且能够正确地加以处理。只要我們大家有了經驗，并且把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报、座談会、辯論会、擺事实、講道理、边整边改等等这一套办法完全学会，并且把它变成經常的制度，經常的方法，今后許多事情就好办了。無論是革命問題或者建設問題，無論是大是大非或者是小是小非問題，都可以运用这一套办法迅速地加以解决。

其次，需要估計一下我們工作的成就。

尽管資产阶級右派說我們这也搞糟了，那也搞糟了，但是，經过反右派斗爭和全民大辯論，人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我們的党領导全国人民实現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結，进行了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展开了突飞猛进的大建設，这是連社会主义的敌人也無法否認的，因为这是鉄一般的事实。經过一九五六年达到高潮的三大改造运动，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經济战綫上(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是用和平的方法实現的，在經济上和社会秩序上沒有發生波动和破坏，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今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爭，又取得了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巨大胜利，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成功。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計划已經完成和超額完成。事实上，其中一些重要任务和重要指标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經完成和超額完成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經奠定。我国的农业在合作化以后的新条件下正在向前躍进。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日益繁荣。我国的面貌已經根本改变，我国的国际地位已經空前提高。由于党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等等一系列政策的貫徹执行，全国一切可以調动的力量，正在調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国人民的团結，在党的領导下日益加强和巩固。我国人民正以愚公移山、精衛填海的精神，改造旧社会，建設新中国，这都是任何人也否認不了的事实。

就我們上海各个战綫上的工作来說，也是一样。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們已經把占全国比重很大的上海資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經济，同时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改变了上海的政治和經济面貌，为上海的建設开辟了广闊的道路。国家第一个五年計划所規定的上海經济和文化建設的各項指标也已經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預計是一百二十八亿元，其中除去手工业产值三亿元外，工业产值是一百二十五亿元，占全国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超过第一个五年計划指标的百分之十六点三，比解放初期的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二百九十七点五一，比第一个五年計划开始前的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九十六，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十四点五。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一般輕工业和紡織工业的比重，也分别从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十六点七、百分之二十二点六、百分之六十，变为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二、百分之二十六点二、百分之三十二点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随着全国經济建設的發展，随着上海經济的改造，上海工业制造了大批的新产品，机器制造工业也从过去只能进行裝配变为可以独立制造，許多产品的質量达到了国际水平，这就使上海这个工业基地能够供应全国人民更多的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能够为發展国內外貿易供应更多的物資，能够为国家积累更多的建設資金。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郊区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加上上海的有利条件，为爭取郊区提前实現"全国农业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所規定的任务准备了条件。文化教育战綫和其他各个战綫也有了很大的成績。劳动就业逐步扩大的結果，已經基本上消除了历史上遺留下来的失业現象。更重要的是人的变化。几年来的各項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不但鍛煉了上海工人阶級，使上海工人的政治覚悟、組織程度和技术水平都有了提高，能够担負起領导阶級的重任，而且也推动了各界人民的政治思想改造。今年的反右派斗爭，証明了光荣的上海工人，首先是老工人，是維护社会主义的最坚决的力量；証明了其他各界人民几年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們中間已經形成了一个有力量的左派；中間分

子也有程度不同的进步；右派只占极少数。沒有广大人民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在短短的时間內，使得右派分子遭到孤立和分化，遭到严重的失敗，是不可能的。全民整风运动虽然还沒有結束，但是它已經給我們帶来了無可比拟的力量，促使上海各个战綫上的工作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誰也可以看到今天的上海，已經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上海了。冒險家乐园的旧上海已經随着黑暗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新的人民的上海已經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暴风雨中成長起来。明天的上海，將是我們祖国社会主义經济和文化建設的更加强大的基地，屹立在东海岸国防前綫的更加强大的堡壘。

我們上海的工作所以取得这些成績，是上海百万工人英勇斗爭和忘我劳动的結果，是上海七百万人民团結一致共同奋斗的結果，是全国人民全力支援的結果，是中央和毛澤东同志英明領导的結果，也是上海各級党組織和广大干部努力地、积极地貫徹执行党中央各項正确政策的結果。在回顧我們取得的这些偉大成就的时候，我們向全市的工人同志和各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賀，向全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感謝。同时，我們上海的工人阶級和上海人民同全国的工人阶級和全国人民一样，大家都以有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英明領导而自豪。

在这里，我們还要答复一个問題：上海各方面工作發展得这样快，是不是"冒进"了？

有一部分同志曾經認为我們上海的各項工作都"冒进"了。在对上海工业方針的爭論中，就突出地表現了这一点。大家記得，一九五六年，市的党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曾經确定了"充分利用、合理發展"上海工业的方針。这个方針，一方面反对了忽視上海这个工业基地的作用，不注意利用这个基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反对了不顧全国的統筹安排和当地的具体条件，盲目大發展的思想。事实証明：这个方針，給上海的工作帶来了朝气，推动了各个方面的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有的同志說，由于有了这个方針，上海各方面的工作"冒进"了。这种意見，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全局来說，倒是因为有了这个方針，才調动了各种积极因素，又限制

了各方面的盲目發展。一年来上海工作的發展是正常的。問題是对于什么叫正常、什么叫冒进，有完全不同的了解。

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書写的序言中，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形势曾經作过这样的分析：“現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問題，这个問題已經解决了。也不是在資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問題，这个問題也已經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問題，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談一談，这个問題也会容易解决的。現在的問題，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輸业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經济部門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种經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計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發展。人們的思想必須适应已經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無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許可的条件去計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現在的問題，还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經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認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澤东同志这段話，值得我們反复地閱讀和思索。“現在的問題是經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認为做不到”，我們有些同志的思想难道不是这样的嗎？

我們認为，既然是干社会主义革命、干社会主义建設，干这种前無古人的事业，干这种同帝国主义爭时間、比速度的事业，那就必須有一股革命的干勁。那就必須对上海的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因素采取积极的态度，并且爭取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根据国家的統筹安排，千方百計地出主意、想办法，充分地利用上海基地为社会主

义服务。因此，在我們看来，凡是經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努力做到，这才是正常現象；不去努力做到，这才是不正常現象。否則，就談不到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就談不到尽可能快地把我国建設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因此，我們应該坚决貫徹执行多、快、好、省的勤俭建国方針。这是一个統一的不可分的方針。为了多、快、好，就需要勤，就需要努力，就需要認眞；为了省，就需要俭，也需要努力，需要認眞。这个方針，是既反对了右傾保守，又反对了急躁冒进。这是一个促进的而不是"促退"的方針，是在現在的国际环境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所应該采取的唯一正确方針，而且是一个已經在实踐中証明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針。在执行这个方針的过程中，也可能發生个别缺点和錯誤，但是决不能因此对整个方針發生动摇。曾經有些人同党的看法相反，他們把这种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看作是冒进，看作是"好大喜功"。他們总是說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們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資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資本主义多了、快了；到底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还是相反。試問，經过一番努力能够使社会主义前进得快一些、多一些，这难道是錯誤嗎？难道我們能够說，經过一番努力就能够做到的也不去做，以便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得慢一些、少一些，才是正确的、才是正常的嗎？难道我們坚决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針，就叫做"好大喜功"，就要受到責备，而执行相反的方針才应当受到贊揚嗎？当然，贊揚的人是有的，但决不会来自渴望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广大人民。因此，我們必須批判这种实际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这种思想已經給我們造成了一些損失。去年下半年以后，多、快、好、省的方針不大提了，貫徹"全国农业發展綱要"的規划也执行得不帶勁了，不少人的革命干勁低落了。这才叫作不正常現象。在整风运动中，必須批判这种右傾保守观点，改正各种不正常現象，以便迎接新的建設高潮，促进建設事业的新高潮。

（原載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从团結的願望出發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論

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中，我們党提出了"团結——批評——团結"这一进行党內斗爭的公式，这就是說，为了解决同志間的意見分歧，应該从团結的願望出發，經过批評或斗爭，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經过整风运动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实踐証明，这一公式不但可以用于党內，而且可以用于党外，成为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方法。

人民內部矛盾是是非問題，解决人民內部矛盾是为了明辨是非，增强团結，而不是像进行敌我之間的斗爭那样，要消灭或打倒矛盾的一方。因此，在人民內部，例如在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間、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人民群众之間、党和国家机关中的上下級之間、个人和集体之間、党和非党之間，都可以用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办法，来解决各种不同意見的分歧和不同利益的冲突，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

要使批評成为习慣。在党的生活中，在各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議上，在国家机关內部，在各級党和国家工作人員和人民群众的日常接触中以及人民群众之間，批評和自我批評都应該更加活躍起来。在人民內部，任何人都可以批評别人，任何人任何机关团体也都要接受正确的批評。我們的任何党組織和国家机关，我們的任何工作人員，不論他們的职位高低、年龄老少、功劳大小、資历深淺、工作成績好坏，誰都沒有任何特权任何理由可以抗拒批評。应該采取各种措施扩大民主生活，使人人都有机会对自己不滿意的事情提出批評。在我們的社会上、国家机关以至党組織中，都需要形成这样一种风气：

把批評和自我批評看成像每天洗臉每天打扫衛生一样，是日常生活中不能一日或缺的事情。不要認为只有各方面都很不好的人，或者是坏人坏事才应当受批評，不要一遇到批評特别是公开的批評就过分紧張起来，大家对被批評者側目而視，被批評者更覚得長期抬不起头見不得人。这种风气不利于开展批評。

批評是否有利于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有些同志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害怕批評会使內部矛盾尖銳起来复杂起来，会使党和政府或領导方面处于被动地位。事实是不是眞的如此？以如何对待官僚主义作风为例。官僚主义常常是形成內部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既有官僚主义，必然会引起群众不滿。領导机关如果發揚民主，支持群众对官僚主义的批評，在一定的时間內看起来，的确矛盾是紧張尖銳起来了。群众对有官僚主义作风的人非常憤慨，提出了大堆意見，很多很多問題一下摆到領导者的面前，領导工作一时也不免感到一些困难和被动。实际上，矛盾并沒有更加尖銳，不过是表面化了。矛盾表面化了，問題都摆出来了，你就非去解决不可，这正是解决問題的必要条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領导者在被动之后就会取得更大的主动。当然，对严重的缺点和錯誤进行批評的时候，某些党組織和国家机关的威信是可能受到影响的，但是这也沒有什么可怕。只要党組織和国家机关接受正确的批評，認眞改正缺点和錯誤，群众就会从这里看到党和政府对人民事业的高度的严肃負責态度，这时候党和政府的威信就不是降低而是更加提高和巩固了。相反地，如果不支持群众对官僚主义傾向进行批評，在一定的时間內，問題沒有揭开来，大家在表面上似乎可以相安無事。可是，群众長期受到压制不能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見和合理要求，一旦到了不能容忍的时候，他們就会用不冷靜的过火的行为去反对官僚主义，甚至要求解决某些一时不能解决的問題。这时候，矛盾眞正尖銳化复杂化了，領导者也必然处于更被动更困难的境地。应該看到，矛盾和分歧既然在客观上存在，就誰也抹煞和掩盖不了。不正視它們，硬要掩飾它們，其結果必然是矛盾和分歧越来越加深越来越尖銳。在我們的实际生活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教訓。

并不是任何一种批評都有利于处理人民內部矛盾。从团結的願望出發的同志式的实事求是的批評，才眞正有助于分清是非，增强团結，才眞正能够成为我們事业前进的推动力量。

开展批評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是非、团結同志，而不是为了整那一个人。因此，無論誰在批評别人的时候，都应該滿怀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精神。在我們党內，提倡用正确的态度对待犯錯誤的同志，提倡向摔了跤的同志伸出手来，不但从旁等待他改正錯誤，而且要积极地和耐心地帮助他改正錯誤，欢迎和鼓励他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在人民內部同样应当本着这种精神开展批評。在批評别人的时候，要考虑到怎样为被批評者改正錯誤准备条件，而不要有意地整得别人下不得台，更不允許用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去批評人民內部的錯誤，对待人民內部的矛盾。有些同志有时候忽略了这个問題，特别是当他們認为被批評者的缺点和錯誤比較严重的时候，他們就要給犯錯誤者以"殘酷斗爭，無情打击"；甚至当犯錯誤的同志表示了悔改的願望，希望得到帮助和支持的时候，他們也仍然不用同志式的态度去帮助这些同志，以致使这些同志失掉改正錯誤的信心和勇气。这对于人民的事业是很不利的。

要特别注意防止批評这一武器被宗派主义者利用。批評本来应当是从团結的願望出發，达到团結的目的。有些宗派主义者却利用批評去打击排斥跟自己持不同見解或者有个人嫌隙的同志。有些人甚至把批評用做个人之間鬧無原則糾紛的工具。这些人在批評别人的时候，当然談不到团結的願望和同志式的态度，而是唯恐整不倒人，唯恐对方能够很好地改正錯誤。这样的批評不仅不会弄清是非，增强团結，还要混淆是非，破坏团結。在我們党的历史上，曾經有过不少这样的教訓。而"团結——批評——团結"的公式，也正是党內的馬克思主义者在同某些宗派主义者进行斗爭的过程中發展起来，成为反对宗派主义者利用批評破坏团結的有力武器的。这个經驗，值得全国人民記取。

党組織、国家机关和企业的領导者，今天首先需要鼓励和帮助群

众充分地使用批評武器。我們提倡批評从团結的願望出發，是为了正确地發展批評，是为了达到更好的团結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用来作限制批評的擋箭牌。由于种种原因，批評意見中总不免有一些偏激过火的部分，批評者有时也会态度粗暴，方式不好，看起来似乎不合乎从团結出發的标准。但是，只要不是宗派主义者或别有用心的坏分子利用批評进行挑撥和污蔑，領导者对批評者就应該明确地采取保护态度。首先要保护他們提意見的积极性，接受意見中的正确部分。即使有少数偏激过火的意見，也不要馬上暴跳如雷。我們应該引导批評向正确的方面發展，教育群众逐漸認識片面性的錯誤，但是对于那些片面性意見中的合理的成分和积极的作用，也不要一笔抹煞。这就是說，要用全面性去对待片面性，而不要用片面性去对待片面性。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应該是我們的座右銘。領导者愈是采取保护群众积极性的态度，他們就愈能够引导群众走上正确的道路，而領导者和群众也就愈能够巩固地团結一致。

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發展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論

近半年来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爭，是我国过渡时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是一个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这个运动从政治界、文化科学界的工作人員和知識分子中开始，逐步扩大到工人、农民、工商业者、中小学教职員和軍队中間，已經具有全民的性質和全民的規模了。这个运动所要解决的問題是我国过渡时期的兩种不同性質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所采取的方式，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出大字报、开座談会、开辯論会和在几乎一切报紙刊物上作报道、写文章等目前已經普及的方式。这是适合于目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內容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实行大鳴大放大爭，擺事实，講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談会和辯論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資产阶級民主所不能夢想的。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也是教育和团結群众对敌人进行斗爭的方法。"

社会主义的民主同資产阶級的民主根本对立。我們反对資产阶級民主，因为它是极少数剝削者对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实行压迫和欺騙的手段，是为資本主义私有制度的經济基础服务的。我們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为了保障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并且保障他們能用自己的力量来建設新生活，是为了消灭剝削，消灭生产資料的私有制，而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的經济基础服务的。正因为我們的社

会主义民主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民主，这就决定了我們的民主內容和它的形式要广泛地适应于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而不断地充实起来和發展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在各个国家、各个时期、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形式会是多种多样的。現在我国人民在全民整风运动中，創造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出大字报等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这是我們党所必須充分重視和充分运用的。

我們采用这种形式进行党的、国家机关的和全民的整风运动，是我們党的民主工作方法的一个重大的新發展。一九四二年，我們党进行了在我們党的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整风运动，这是全体党員在党的統一領导下，發揚民主，进行系統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来达到糾正錯誤和提高思想水平的目的的运动。在这一次整风运动期間，大字报、座談会等方式已經出現。后来，在全国解放以前和以后，又曾三次进行过这样的整风和整党运动。在三反五反期間，适应当时的需要，又有說理斗爭的各种方式出現。我們在工厂、农村、学校、軍队中都曾普遍采取各种群众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这些民主傳統經过最近这个时期的發展，就成为現在的大鳴大放大爭等相当完整的新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了。我們找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这种形式，今后許多事情就好办了。無論革命問題或者建設問題，無論大是大非或者小是小非，都可以經过大鳴大放大辯論，而迅速地得到解决。各机关、各学校、各企业的大字报，都可以逐步地变为进行这种鳴放和爭辯的一种經常性的武器。

人們应該看到，往往有許多問題在不鳴不放不爭的情况下，几乎老是得不到解决；在小鳴小放小爭的情况下，很慢地得到了某些不徹底的解决；而在大鳴大放大爭的情况下，就会很快地得到全面的徹底的解决。由此可見，大鳴大放大爭的方法，应該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方法。虽然在大鳴大放大爭的时候，有些問題不一定都能够进行非常詳尽的研究，但是这些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补足，而大鳴大放大爭的优点，却不能用其他方法来代替。因为它是群众性的行动，揭露問題比較徹底，批評比較深刻，教育作用比較大，解决問題的办法由于

多数人的集思广益也比較妥善而迅速。

有些人害怕大鳴大放大辯論，害怕大字报。怕什么呢？一怕"乱"，二怕"下不了台"。他們的这种害怕，表示了他們不敢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这是采用全民整风的方法、采用大鳴大放大辯論的方法的根本出發点，这也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出發点。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認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人民群众必須、也只能、也一定能自己救自己。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所作的"人民委員会的工作报告"中說："苏維埃政权的胜利之所以取得，是因为苏維埃政权从最初起就实行社会主义的历来的訓条，它徹底地坚决地依靠着群众，它認为它的任务，是在喚起社会上最受压迫的最受摧殘的阶層起来参加活潑的生活，是提携他們起来参加社会主义的創造。"我們在反右派斗爭和整风运动中所作的，就正是这样。我們所依靠的，主要的就是在旧社会最受压迫最受摧殘的阶層，就是工人、貧农和下中农。他們是革命的主力，他們加上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在一起，就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其余約百分之十的人，也并不都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那样的人不过百分之一、二，而他們是孤立地分散在群众的包圍之中的。我們的事业既然有群众的絕大多数的支持，只要我們依靠群众，革命的天下就不会乱，我們就沒有怕乱的理由。一切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报，归根結底，只能有利于無产阶級和人民群众，而不会有利于無产阶級和人民群众的敌人。右派害怕群众、不信任群众是有理由的，左派害怕群众、不信任群众是沒有理由的。眞正的左派必然坚定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否則他就不是眞正的左派。右派說共产党不行，說社会主义不行。我們說，好吧，讓群众听一听他們的吧，然后群众就会作出正确的判决。如果不讓右派大鳴大放，徹底地暴露他們自己，群众怎么会認清那些敌人，怎么会起来同那些敌人作坚决無情的斗爭呢？当右派大鳴大放的时候，革命的天下似乎有一些乱，但是群众一旦認清了这些敌人并且向他們进攻，革命的天下就不但不乱，而且比以前巩固了一百倍。相反，如果右派分子不暴露，有話都藏在心里，群众不了解他

們，不知道要同他們斗爭，更不知道要怎样同他們斗爭，那么，他們就有可能迷惑群众，他們就有可能利用某种时机起来搗乱。对于右派是如此，对于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和缺点也是如此。坚决地放，大胆地放，徹底地放，随之而坚决地改，大胆地改，徹底地改，其結果天下必不乱。坚决地不許放，坚决地不肯改，其結果天下即令不大乱，也不能免于小乱。这个眞理，在我們的实踐中已經充分証明了。群众是講道理的，是能够分清是非的。天下既然不会大乱，当然也就沒有什么"下不了台"的問題。事实上，眞正下不了台的人，就是那些希望共产党下不了台的右派分子自己，如果他們不肯低头認罪，从新作人的話。只要是好人，虽然犯了錯誤但是願意改正，那么，群众是願意与人为善的。

还有一些人認为，大鳴大放大爭的方法，不符合和风細雨的整风精神。但是，人們都知道，我們是主張和风細雨的，而整风运动一开始，右派分子却以狂风暴雨之势向我們进攻，接着群众起来了，向右派举行了反击，这当然不能不也是一場大风大雨。不过，这个运动終究还是要轉为和风細雨的。在对待人民內部矛盾的时候，一定要用和风細雨，这样才能十分細致而正确地研究和处理各种問題。应該指出的是，这种研究和处理，仍然离不开群众路綫，就是說，仍然是要通过群众的大鳴大放大爭的过程。

目前全国人民正在就兩条道路的問題，就是說，究竟应該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应該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問題，展开大鳴大放大爭，这是完全必要的。应該进一步对这个問題展开热烈的大辯論，使人人都徹底地弄清楚这兩条道路的好坏和是非。对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問題，也应該發动群众，大鳴大放，貼大字报，开座談会，弄清是非，找出原因和糾正的办法，并且监督这些办法的实行。各級党組織、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学校、企业和部队所規定的某些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有許多不够合理的地方，在目前着重进行整改的时候，尤其应該經过大鳴大放大爭，对这些問題加以整理和解决。对于群众的工資福利和收入分配如何合理調整的問題，对于群众思想意識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絕对平均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等等

向如何克服的問題，同样也应該經过大鳴大放大爭，逐步求得解决。总之，只要坚决地信任群众，把同群众有密切关系的重大問題有領导地交給群众去討論和辯論，那么，当前的全民整风运动就一定能够得到极为丰富的收获。

第二部分

关于社会發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層建築的矛盾

“政治經济学批判”一書序言

馬克思

我考察資产阶級經济学体系是按照以下的序列：資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产阶級社会所分裂成的三大阶級的經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項間的相互关系是很明显的。說明資本的第一本書的第一篇分为以下几章：(一)商品，(二)貨幣或簡單流通，(三)資本一般。头兩章構成了本書的內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都是些專題論文，它們是在間隔很久的不同时期內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自己弄清問題；至于这些專題論文能否按上述計划有系統地整理出来，就要看外部环境如何而定了。

原已草就的一篇总的緒論，現在我把它刪去，因为經过更周密的思索之后，我認为所有預先講出尚待証明的結論的做法都是可能有妨害的；凡是一般願意跟随我研究問題的讀者，都应当下决心从局部升到一般。不过，关于我自己从事研究政治經济学的經过，还不妨在此略加叙述一下。

我的專业本来是研究法学，但我只是把它作为一門附屬科目拿来与哲学和历史一同进行研究的。在一八四二至一八四三年間，我作为“萊茵报”㊀的編輯，不得不就所謂物質利益問題初次發表意見，而这曾使我陷入困难的境地。萊茵省議会关于盜伐林木和細分地产問

題的討論，当时的莱茵省省長夏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狀况問題对"莱茵报"进行的官方論战，最后，关于自由貿易和保护关稅的辯論，給了我研究經济問題以最初的刺激。另一方面，在这时，即当想要"向前进"的善良願望大大超过对于問題的实际知識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出現了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帶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反响。我表示反对这种淺薄草率的态度，但同时在与奥格斯堡"普通日报"进行的論战㊁中坦白承認，我当时的知識不容許我对于各个法国流派的內容本身敢加任何判断。于是我就更加乐意地利用了"莱茵报"領导人幻想以采取較溫和办报方針免除对它所作死刑宣判的机会，从社会舞台退到書齋中去。

为解决使我激动不安的疑难而着手进行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对于黑格尔法权哲学的批判审查；这一著作的緒論曾于一八四四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書"㊂上發表。我这番研究工作使我得出結論如下：法权关系，也如国家形式一样，不可能从它們本身中得到理解，也不可能从所謂人的精神一般發展过程中得到理解；恰恰相反，它們是根源于物質生活关系，黑格尔曾按照十八世紀英法兩国作家先例把这些关系的总和称为"公民社会"，而对于公民社会的解剖則应当在政治經济学中去寻求。我研究政治經济学的工作是在巴黎开始的，后来我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移居布魯塞尔时，就在那里繼續进行研究。我所得出并且后来成为我以后一切工作的南針的总結果，可以簡單扼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为轉移的关系，即与他們当时物質生产力的一定發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組成为

㊀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 是一八四二至一八四三年在科倫出版的急进派日报；馬克思从一八四二年十月十五日到一八四三年三月十八日任該报編輯。——編者注

㊁ 馬克思这里所指的是他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普通日报'"一文。——編者注

㊂ "德法年書(«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馬克思于一八四四年在巴黎出版的宣傳革命共产主义的机关刊物。——編者注

社会的經济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所賴以树立起来而有一定的社会意識形态与其相适应的現实基础。物質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人們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識。社会的物質生产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它們向来在其中發展的那些現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現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产关系發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發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縛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經济基础的变更，在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發生变革。在考察这种变革时，必須时刻把經济生产条件方面所發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学精确眼光指明出来的物質变革，去与人們所借以意識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形式，——簡言之，思想形式，——分别清楚。正如我們評判一个人时不能以他对于自己的揣度为根据一样，我們評判这样一个变革时代时也不能以它的意識为根据。恰恰相反，这种意識正須从物質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間現存的冲突中求得解釋。無論哪一个社会形态，当它所給以充分發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沒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們所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質条件还沒有在旧社会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現的。所以人类始終只会提出自己所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我們仔細去看时总可看出，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質条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發生的。大体說来，亞洲生产方式、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以及現代資产阶級生产方式，可以看成为社会經济形态發展中的几个演进时代。資产阶級的生产关系乃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所謂对抗，并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生活的社会条件中生長起来的对抗；但是，在資产阶級社会内部發展着的生产力，同时又創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質条件。所以人类社会的前期历史也就以这个社会形态告終。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从他那篇关于經济学范疇批判的天才論文發表(在"德法年書"上)以来，我即与他經常通信交換意見，他經由别的路徑达到了和我所达到的同样的結果(請参看他著的"英国工人阶級的狀况")；当他在一八四五年春天也移居到布魯塞尔时，我們便决定共同来研討我們与德国哲学思想观点相对立的观点，实質上也就是来清算我們过去的哲学信仰。这一願望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实現了。用八开紙訂成兩厚册的稿子送到了威斯特發里亞那里的出版地方，过了好久我們才得知由于情势改变而不可能付印㊀。既然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已經达到了，我們也就更加乐意地把那稿子交給了耗子去批判。在当时我們向公众發表的从这一或那一方面闡述我們观点的各篇著作中，我只想举出恩格斯和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与我自己發表的一篇"关于自由貿易"的言論。我們見解中决定性的論点，在我一八四七年为反对蒲魯东而發表的著作"哲学的貧困"中，第一次科学地——虽然只是以論辯的形式——叙述了出来。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的著作，本来是我在布魯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关于这个題目所作的講演集，由于二月革命發生和我因此被强力逐出比利时国境而沒有能够印成。

一八四八年与一八四九年"新萊茵报"的出版和接着發生的一些事件，中断了我对經济学的研究，直到一八五〇年在倫敦我才又重新把这一工作恢复了起来。由于大英博物館里收集有关于政治經济学历史方面的巨量資料，由于倫敦是便于研究資产阶級社会的良好观察所，以及由于資产阶級社会仿佛已随着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矿的發現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發展阶段，——由于有这一切，就使我决心要重新从头开始，并以批判的态度来整理新的材料。这种研究工作，一部分自然而然地引导到一些似乎全然無关的科目上去，并且我对这些科目不得不花費了頗为長久的时間。然而使我自由支配的时間特别縮短了的原因，乃是謀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英美第

㊀ 这里所講的是"德国思想体系"。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編者注

一流报紙"紐約每日論壇"㊀撰稿（我專門为报紙写通訊只是例外的情形），使我必須異常分散我的科学研究工作。可是，因为論述英国与欧洲大陆方面突出經济事件的文章在我为报紙所写稿件中占极大部分，所以我就不得不更仔細了解那些超出本来意义的政治經济学科学范圍以外的实际細节。

我現在把我研究政治經济学的經过情形簡單叙述出来，只是要表明，我的观点——不管别人怎样評判这些观点，也不管这些观点怎样不合于統治阶級自私自利的偏見——乃是虛心和多年努力研究所得的結果。而在科学的門口，正像在地獄的門口一样，必須提出如下一个要求：

Qui si convien lasciare ogni sospetto;
Ogni viltà convien che qui sia morta㊁.

一八五九年一月，倫敦

刊載于一八五九年在柏林出版的卡·馬克思所著"政治經济学批判"一書內按書上所載本文刊印。原本系德文

（按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排印）

㊀ "紐約每日論壇"（«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八四一年至一九二四年在紐約出版的民主派日报；馬克思从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二年間經常为該报撰稿。——編者注

㊁ "在这里一切的疑懼都須拋棄，
一切怯懦的念头在这里都須化除。"
（引自但丁作的"神曲"）。——編者注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發展(摘錄)

恩 格 斯

三

唯物的历史观，从下述的原則出发，即：生产和生产之后的生产品的交換，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出現于历史上的社会中，生产品的分配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阶級或等級的划分，是由这个社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換生产品来决定的。因之，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終极原因，不应該求之于人們的头腦之中，也不应該求之于人們对于永恒眞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長的理解之中，而应該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換方式的变更之中；这些原因，不应求之于哲学，而应求之于各該时代的經济。对于現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与不公平、和对于"理性变成荒唐，幸福变成苦痛"㊀的日益覚醒的認識，不过是一种标志，指示着在生产方法和交換形式之中，已經不知不覚地发生了这样的变更，使得从旧的經济条件产生出来的社会制度，已經不能和这些变更相适应了。这上面也指出：消灭这些已經发覚了的禍害的手段，也应当以或多或少的发展的形式，具备于变化了的生产关系本身之中。可是这些手段，不能从头腦中被发明出来，而应該借头腦之助，从当前的生产的物質事实中发現出来。

那么，这样看来，近代社会主义的情形怎样呢？

現在，大家都承認，現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現在的統治阶級——資产阶級——創立的。資产阶級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馬克思以

㊀ 哥德"浮士德"中麦非斯多費尔的話。——編者

来称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級特权以及人身隶屬关系不能并容的；資产阶級破坏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資产阶級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爭、迁徙自由、商品所有者的平权的王国，一句話，建立了拥有一切資产阶級妙事的王国。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現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机器生产把旧的手工工場变成大工业之后，在資产阶級支配之下所造成的生产力，以向所未聞的速度与向所未有的規模，往前发展着。正如手工工場和在其影响之下改进了的手工业在当时与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在其更高发展的阶段上，也就不得不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局限着它的狹隘的范圍发生冲突。新的生产力，已經大大地超越了資产阶級的使用生产力的方式。这种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間的冲突，絕不是仅仅在人們头腦中产生的冲突，——像人的原始罪惡与神的正义之間的冲突那样，——而是存在于現实中，客观地在我們之外存在着，甚至不依賴于創造它的那些人們的意志和行动。現代社会主义，正就是这个事实上的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在头腦中的——首先是在直接吃它的苦头的那个阶級（工人阶級）头腦中的——观念的反映。

这种冲突，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在資本主义生产未出現之前，即在中世紀，到处存在以生产者的生产資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在农村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小农——自由的农民或受农奴制束縛的农民——所經营的农业，在城市中占支配地位的是手工业。劳动資料——土地、农具、作坊和手工工具——曾是个人的劳动資料，只备个人应用，所以不得不是碎小的、粗陋的、狹隘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它們通常是为生产者自身所有、的。把这些分散的碎小的生产資料集中起来，加大起来，使之轉化为近代生产的强有力的杠杆——这正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代表者（資产阶級）的历史作用。資产阶級在历史上，自十五世紀起怎样經过生产的三个不同的阶段（簡單协作、手工工場及大工业）来完成这个作用，——这些，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篇中已經作了詳尽的叙

述。像馬克思在那里所証明的一样，資产阶級如要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資料轉为强大的生产力，那么他們就不得不把它們从个人使用的生产資料，变成只有很多人共同一起才能使用的社会的生产資料。紡紗机、織布机、蒸汽錘代替了手紡車、手織机和手用錘；需要数百数千工人共同劳动的工厂，代替了小的作坊。和生产資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分散的行动变成一系列的社会的行动，而生产品也从个人的生产品变为社会的生产品。現在工厂所出产的紗、布、金屬品，都是許多工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这些产品在完成之前，先要按一定的順序經过他們許多人的手。沒有一个人單独地能够說："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生产品。"

在以自发的沒有任何計划的、逐漸产生的社会分工作为基本生产形式的社会內，这种分工必然地使生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換、买卖使个别的生产者有可能滿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在中世紀，情形就是如此。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給手工业者，而从他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一种个别生产者、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萌发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在支配于全社会中的自发的沒有計划的分工当中，树立了在个别工厂中按計划組織起来的分工；在个别的小生产者的生产之旁，出現了社会的生产。兩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場上发售，因之，价格至少要大約相等。但是，有計划的組織，較之自发的分工，当然要强得多，采用社会劳动的工厂的产品，較之散漫的小生产者的产品，当然要便宜些。个别生产者的生产，在一个又一个部門中遭受了打击，社会的生产，終于把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但是社会化的生产的革命性質，很少为人所認識，相反，人們之所以采用它，乃是为了推进和刺激商品生产。这种社会化生产的产生是和一定的、先它而存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的杠杆直接联系着的，即和商业資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因为它是以商品生产的一种新的形式出現的，所以商品生产所固有的占有形式，对于它也保持着全部的效力。

在中世紀所发展着的商品生产形式之下，劳动的生产品应該屬

于誰这一問題，甚至不能发生。个别的生产者，通常用自己的原料——往往是自己所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工具，用自己或自己家庭的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生产者用不着自己去占有自己的生产品，因为这些产品理所当然地是屬于他的。因之，生产品的所有权，是建筑在自己的劳动之上的。即使在用得到别人协助的地方，这种帮助照例只不过是起着次要的作用，并且除工資以外，还获得别种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不仅是为着工資和伙食去劳动，他們更多的是为着学习手艺，为着获得独立师傅的名义去劳动。可是往后，生产資料开始集中于大的作坊及手工工場了，它們实質上开始变为社会的生产資料了。但这些社会的生产資料和产品，还是繼續和以前一样，被人当作好像是个人的生产資料和劳动产品来对待。如果在这以前，劳动工具的所有者之占有生产品，是因这些生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劳动的生产品，别人的輔助劳动，只是一种例外，那么現在劳动資料的所有者，还是繼續占有生产品，可是这些生产品已經不是他自己的劳动所生产的了，而完全是他人的劳动所生产的。这样，社会劳动的生产品，不是为那些眞正运用生产資料的和眞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們所占有，而是为資本家所占有。生产資料和生产，在其实質上，已經变为社会的了。但是它們所服从的占有形式，却还是以个别生产者的私有生产为前提的那种占有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生产品的主人并把它們在市場上出卖。新的生产方式，虽然毀坏了这种占有形式的前提，可是它还是服从着这种占有形式㊀。在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帶上資本主义性質的矛盾中，已經包含着一

㊀ 在这里無需解释的是：虽然占有的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質，由于上述的过程，其所經历的革命，也不較生产本身的性質为小。我占有自己劳动的产品，抑是占有别人劳动的产品——这自然是兩种不同的占有形式。此地可以附帶說及的就是，包含着全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于其中的雇佣劳动，是从古代就存在的。在偶發的分散的形式之下，雇佣劳动曾經在好几个世紀內，与奴隶制度相并存，但是只在它所必需的历史条件已經成熟之时，这一隱藏着的萌芽，方能發展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注

切現代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的統治，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門中和在一切在經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国度內，变得愈加完全，因之，也就愈加把个人生产变成仅仅是很小的殘余，社会生产与資本主义占有之不可并存性，也就愈加尖銳地表露出来了。

像上面所說的，最初的資本家所遇見的是現成的雇佣劳动的形式。可是那时已存在了的雇佣劳动还仅仅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輔助，一种过渡狀态。不时出去作短工的农人，自己有着小塊土地，这土地能够維持他的貧困的生活。行会的条規，关心着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可是当生产資料变为社会的生产資料并集中于資本家手中的时候，一切都变化了。个人小生产者的生产資料和生产品，日益丧失了价值，小生产者除了就雇于資本家外，别無出路，以前曾是例外和副业的雇佣劳动，現在变成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了；它往昔是种副业，現在已經变成工人的唯一职业了。临时的雇工，变成終身的佣工了。此外，由于同时发生的封建制度的崩溃，封建主的衛队的解散，农民之从自己的园地上被驅逐出来等等，終身佣工的数量，非常大地增加起来了。一方面生产資料集中于資本家的手中，另一方面生产者則除了劳动力以外一無所有，生产資料和生产者这兩方面之間，发生了完全的分裂。社会的生产与資本主义的占有之間的矛盾，明白表現为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的对抗。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萌发于个别商品生产者所組成的社会內，这些生产者的社会联系，是通过他們的生产品的交換来实現的。但是每个建筑在商品生产之上的社会的特点是：在这个社会內，生产者丧失了控制自己本身的社会关系的权力。每个人用其偶然所有的生产資料，并为着滿足自己特殊的交換需要，为自己而生产。誰也不知道他所生产的那种产品会有多少出現于市場上，不知道它能够找到多少数量的消費者；誰也不知道他的个人劳动的产品究竟是否为人們所需要，不知道究竟能否抵償它的成本，而且不知道一般地是否卖得出去。在社会化的生产中，統治着無政府狀态。可是商品生产，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它自己特殊的、它所固有

的不能与它分离的規律，这些規律，不管無政府狀态如何，还是在無政府狀态之中并通过無政府狀态来显示自己的作用。这些規律表現于社会联系的唯一保留下来的形式之中（即交換之中），并且作为竞爭的强制規律，对个别的生产者发生作用。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这些生产者自己甚至并不知道这些規律，只有經过長期的經驗，才逐漸地发現它們；因之，这些規律是越过生产者并且違反生产者的意志而确立的，成为他們生产形式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規律。生产品統治着生产者。

在中世紀的社会內，特别是在最初的几个世紀中，生产主要是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它主要只是滿足了生产者自己及其家屬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隶屬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同时还滿足封建主的需要。因之，在这里，沒有交換，生产品也还沒有帶着商品的性質。农民的家庭，差不多生产了全部他們所需用的物品：工具、衣服以及生活資料。只有在他自己的需要以及必須繳納于封建主的貢賦以外还有剩余时，他才开始为售卖而生产，这种进入于社会交換中的預定出卖的剩余生产品，就成了商品。城市的手工业者，自然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換而生产。可是就是他們，也独立地生产大部分他們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們有菜园和小塊土地，他們在公共的林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从这森林中，他們获得建筑材料和燃料，妇女紡織麻和羊毛等等。以交換为目的的生产，商品生产，还只在产生中。因此，交換有限，市場有限，生产方式是稳定的，本地对于外方是隔离的，在地方范圍內是統一的；在乡村中有馬尔克，在城市中有行会。

由于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由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現，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的規律，就更公开地、有力地发生作用了。以前的联系被动搖了，以前的障碍被打破了，生产者日益变为分散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無政府狀态明白地表現出来，并具有日益尖銳的性質。可是資本主义在社会生产中用来加重这种無政府狀态的最主要的工具，却是無政府狀态的直接的对立物，这就是在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作为社会的生产，其組織日益加强。因这一杠杆

之助，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結束了旧时的和平的稳定性。这一生产方式，当其侵入产业的任何一个部門时，就从那里驅逐了旧的生产方法。它掌握了手工业后，就消灭了旧时的手工业。劳动場地变成了战場。偉大的地理发現㊀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建立，好几倍地扩大了商品的銷售，促使手工业变为手工工場。斗爭已經不仅发生于个别的地方的生产者之間；地方的斗爭本身也发展到了民族斗爭的規模，发展成为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的商业战爭㊁。最后，大工业以及世界市場的产生，使斗爭普遍化，同时使它具有空前未有的剧烈性。在个别資本家之間，在各个生产部門之間，在各个国家之間，存亡的問題，都由他們是否拥有自然的或人工造成的生产的有利条件来决定。失敗者被無情地排除。这正是从自然界移于社会，而且变得远更剧烈的达尔文式的爭取生存的竞爭。动物的自然狀态竟作为人类发展的頂点而出現了。社会的生产与資本主义的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組織性与全社会中生产的無政府狀态之間的对立。

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沒有出路地运行于其所固有的（由于其起源如此）矛盾的兩种表現形式之中，它給出了一种"罪惡的循环"，这是傅立叶所早已发現了的。当然，在傅立叶时代还不能看到，这个循环是逐漸地縮小着，而且生产的运动还是按螺旋形前进着，并且和天体的运行一样，結果不得不与它的中心点发生冲突。社会生产的無政府狀态的推动力，經常地使人类的日益增加的大多数变成無产者，而反过来，無产阶級群众則最后將結束这种生产的無政府狀态。同样地，社会生产的無政府狀态的推动力，把大工业所使用的机器的無止境地改善的可能性，变成为每一个工业資本家的必須遵守的規律，这

㊀ 这些偉大的地理發現中，最重要的是一四九二年哥倫布之發現美洲与一四九八年葡萄牙人瓦斯哥·达·伽馬之發現通印度的航路。——譯者

㊁ 十七至十八世紀的商业战爭，發生于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国与英国之間，它們爭夺对于印度与美洲的貿易的控制权以及把这些地方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在这些战爭中，胜利者是英国，英国到十八世紀末，支配了全世界的貿易。——譯者

个規律，使他在遭受毀灭的威胁之下，被迫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机器。可是机器的改进，使得一定数量的人的劳动成为多余了。如果机器的采用和推广意味着数百万手工工人被少数使用机器的工人所驅逐，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把使用机器的工人本身更厉害地驅逐出来，而归根到底，便形成了超出資本家对于劳动力的平均需要之上的劳动力的过分的供給。这些無工可做的工人群众，組成了眞正的产业后备軍，——像我在一八四五年所称呼它的㊀，——这种后备軍，在产业旺盛的时候能够投入生产，可是在每次經济活躍之后不可免地随着而来的危机之时，他們又被擲到街头；这种后备軍，在工人阶級为生存而和資本进行斗爭之时，总是挂在工人阶級脚上的重負，成为工資的調节器，使工資处于极低的合于資本要求的水平上。这样，結果是：机器——用馬克思的話来說——变成了資本手中反对工人阶級的最有力的武器，劳动工具經常地从劳动者的手中剝夺其生活資料，而工人們自身的产品，却反成了奴役他們自己的工具。于是劳动資料上的节約，同时一开始就是劳动力的最厉害的浪費和对于正常劳动条件的掠夺；机器这个节省劳动时間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和其家屬的一生受資本家支配，为增殖其資本价值而服务的一种最可靠的手段。正由于如此，所以工人阶級的一部分人的过度的劳动，造成了别部分人的完全失业；而在全世界上追寻消費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內把工人群众的消費限制到飢餓的最低的水平，因之，便破坏了自己的国內市場。“使相对的人口过剩或产业后备軍同資本积累的規模和能力保持平衡的那种規律，把工人紧紧地束縛于資本之下，而且束縛得比較火神黑发斯达把盜火者普罗米修士釘于岩石上㊁还要紧一些。这一規律，形成了和資本积累相适应的貧困的积累。因之，在一个极端上是財富的积累，同时在相反的极端上——即

㊀ 参看“英国工人阶級狀况”，第一〇九頁。——恩格斯注

㊁ 普罗米修士是古希臘傳說中的英雄，他从天上盜火种給人。据神話說，他因此激怒了天神。在天神的命令之下，火神黑發斯达就把普罗米修士釘于岩石上。——譯者

在那个把自己的生产品作为資本来生产的阶級方面——是貧困、劳动的折磨、奴役、無知、粗野、道德墮落的积累。”(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六七一頁)㊀。如果想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上期待另一种的生产品的分配，那么这就等于期待着当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之时，不使水分解，和不使阳极放出氧，阴极放出氫一样。

我們已經看到，近代机器趋于完善的能力——这已經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如何由于社会生产的無政府狀态，而变成了迫使个别工业資本家不得不改善自己的机器，不得不經常提高生产力的强制的規律。扩展自己生产規模的簡單的事实上的可能性，对于資本家說也变成为同样的强制的規律。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展能力——气体的膨脹力与之相較，簡直是兒戏——現在表現为在質量上和数量上扩展这种工业的需要，这个需要絲毫也不顧虑任何的障碍。这就是大工业产品的消費、銷路、市場所形成的障碍。市場之向更广更深方面扩展的能力，是被完全不同的、其作用的力量弱得多的那种規律所决定的。市場的扩展赶不上生产的扩展。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并且由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一日不被炸毀，这种冲突就一日不能得到解决，所以它(冲突。——譯者)就帶有周期的性質。資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罪惡的循环”。

眞的，自一八二五年发生了第一次普遍危机以后，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人民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屬国的人民的生产与交換，差不多每十年总要出軌一次。商业停頓了，市場挤滿了大批找不到銷路的貨物，現金遁迹，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因为生产了太多的生活資料，反而丧失了任何生活資料，破产和拍卖紛紛不絕。停滯狀态繼續了好几年，大批生产力和生产品被浪費和破坏，直至最后，堆积如山的貨物以或多或少的低价卖了出去；生产和交換的运动逐漸恢复起来。这个运动，逐漸加速，慢步轉成快步，这工业的快步轉成跑步，这跑步又讓位于瘋狂的奔馳，包括工业、商业、信用、投机

㊀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参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八一三頁。——譯者

在一起的跳欄賽跑，直至在几次拚命的跳躍之后，重新陷入危机的泥坑之中。如此不断反复。从一八二五年以来，我們已經經过了五次循环，現在(一八七七年)正在經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質是如此清楚的表現出来，使傅立叶把所有这些危机一下子就說中肯了，他把最初一次危机就称为"多血症的危机"，即由过剩而起的危机。

在这危机中，社会的生产与資本主义的占有之間的矛盾，进到剧烈爆炸的地步。商品的流通暫时停頓了；流通工具——貨幣——变成了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規律，都顛倒起来了。經济的冲突，达到了自己的頂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換方式。

工厂內的生产的社会組織达到这样的发展程度，使它已不能与那种存在于它之旁、凌駕于它之上的社会內的生产的無政府狀态相容，这一事实，由于許多大資本家和更多的小資本家在危机的时候流于破产，并且强制地把資本集中起来，这样，就是資本家自己也感覚到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構，在它自己所造成的生产力的重压之下瘫痪起来了，它已經不能把所有的生产資料都变成資本；許多生产資料閑着沒有应用，因之，产业后备軍也被迫閑着無事。生产資料，生活資料，資本支配下的工人——所有这些生产的和一般財富的因素，都有多余的。可是正如傅立叶所說，"过剩变成了貧穷与困苦的来源"，因为正是它阻碍着生产資料与生活資料轉化为資本。因为在資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資料如果不变为資本，即变为剝削人类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起作用。这些生产資料与生活資料变为資本的必要性，好像怪物一样，矗立于工人和这些資料之間；这种必要性妨碍着物的生产杠杆与人的生产杠杆的結合；它妨碍生产資料发揮作用，妨碍工人劳动和生活。这样，一方面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沒有能力来繼續管理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强大的威势，力圖結束这个矛盾和摆脫它們自身作为資本所固有的那种性質，并且要求在事实上承認它們的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質。

强大地增長起来的生产力对于它們的資本主义性質的这个抵抗，要求承認它們的社会本性的日益增長的必要性，迫使資本家阶級

本身也不得不就資本主义关系的一般的可能范圍之內，更頻繁地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無論是产业兴旺和信用無限膨脹的时期，或是使資本主义大企业陷于崩潰的危机时期，都使得大量的生产資料走向像我們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到的那种社会化的形式。在这些生产資料和交通工具中，有些例如鉄路，就其本性而言已具备这样巨大的規模，使它除了这种形式外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資本主义經营的形式了。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連这个形式（股份公司的形式。——譯者）也变成不够了；某一国度的同一产业部門的一切大的生产者，結合为一个"托拉斯"，一个以調节生产为目的的联合。它們决定应該生产的总数，將这总数分配于自己之間，并且規定好往后的出卖价格。可是因为这些托拉斯在营业一有不佳时便大部分趋于瓦解，因此它們就引起更集中的社会化：整个产业部門变为一个龐大的股份公司，某一国度內的竞爭讓位于这一公司的国內壟断了。在一八九〇年，英国碱的生产就发生了这种情形，这一制造业合并整个四十八个大工厂，而成为單一的由一个中心領导的公司，資本有一亿二千万馬克。在托拉斯中，自由竞爭轉化为壟断㊀，而資本主义社会的無計划

㊀ 壟断是資本主义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最基本的特点；列宁对于这点这样写道："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資本主义基本特性的發展和直接繼續而成長起来的。但是，資本主义只有發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才变成了資本帝国主义，这时候，資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已經变成了与自己相反的东西，而且由資本主义进入更高級的社会經济形态的那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已經在各个方面形成和暴露出来了。在这一过程中，經济方面的基本現象就是資本主义的自由竞爭为資本主义的壟断所代替。自由竞爭是資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壟断是同自由竞爭正相反的东西，但是自由竞爭分明已經变成壟断，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又用最大的生产来代替大生产，使生产和資本集中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以至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辛迪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等壟断組織，以及同这些壟断組織溶合起来的十来个支配着亿万資金的銀行的銀行資本。同时，从自由竞爭中生長起来的壟断并不消灭竞爭，而是駕凌于竞爭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剧烈的矛盾、磨擦与冲突。"（見"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譯者（引文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五七至二五八頁作了改动——本書編者注）

的生产，向着行將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有計划的生产投降。固然，起初这只是有利于資本家。但是，在这种形式之下，剝削已变成如此明显，使得它不得不崩溃。沒有一国人民，願意長久忍受由托拉斯来領导生产，致使一小伙專靠剪息票为生的强盜来对全社会进行公开的剝削。

無論如何，不管有托拉斯或沒有托拉斯，在最后，国家，作为資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不得不㊀把生产的領导抓在自己的手里。这种轉化为国有財产的必要，首先出現在大規模的交通工具上：邮政、电报及鉄路上。

如果危机表示出資产阶級沒有能力繼續管理現代的生产力，那么，大規模生产企业及交通工具之轉入股份公司和托拉斯手中、之轉为国家財产，显示出就这一目的而言，資产阶級完全是多余的了。資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現在已經由雇用的职員来执行了。資本家除了收款項，剪息票，在各个資本家相互夺取資本的交易所中賭博以外，再沒有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起初是驅逐工人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現在驅逐資本家了，是的，暫时还沒有把他們驅进产业后备軍，而仅

㊀ 我說"不得不"，这是因为只有在生产資料及交通工具眞正發展到不适于股份公司的管理，而国有在經济上成为不可免的場合上，国有——甚至現在的国家所完成的国有，才是經济上的进步，才是社会本身在掌握一切生产力的道路上前进的新的一步。可是，最近，自俾斯麦力倡"国营"以来，出現了特种的伪社会主义，在有些地方，甚至墮落为某种自願的阿諛逢迎，它毫不迟疑地把生产資料的任何一种国有，甚至俾斯麦式的国有，都宣布为社会主义的。显然的，如果国家的烟草專卖，也算是社会主义的話，那么拿破侖和梅特涅（奥国首相，欧洲反动的神聖同盟的主腦。——譯者）無疑地也可算做社会主义的創始者了。如果比利时政府，因最平常的政治的和財政的理由，自己去建造主要的鉄路，如果俾斯麦沒有任何經济上的必要，把普魯士的主要鉄路收归国营，其唯一目的，是为着使鉄路更适于战时的应用，是为着驯服鉄路人員，使他們順从地投票拥护政府，而且主要的，是为着不求助于議会即能有新的收入的来源——所有这些，直接地、間接地、自覚地、不自覚地都絲毫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驟。不然，便应該承認皇室海上貿易公司，皇室制磁厂，甚至陆軍制衣队，甚至腓德列·威廉第三时代某一聰明人所認眞提議的妓院国有，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設施了。——恩格斯注

仅归入过剩的人口中。

但是無論轉入股份公司和托拉斯手中，無論变为国有财产，都沒有消灭生产力的資本主义性質。关于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这是十分显明的。至于現代国家，那么它只是資产阶級社会为自己建立的組織，用来保护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其不受工人及个别資本家的侵害。現代国家，無論其形式如何，在实質上总是資本家的机器，資本家的国家，理想的集体的資本家。它愈是把生产力更多地掌握于自己手中，它就愈益完全地轉成为集体的資本家，愈益剝削更多的国民。工人还是雇佣工人，無产者。資本主义关系沒有被消灭，反而达到了极点，达到了頂点。可是在頂点上，就会发生变革。生产力的国有沒有解决冲突，可是它却包含着解决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的可能性。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認現代生产力的社会性，因之，也就使生产的、占有的和交換的方式，和生产資料的社会性相适合。而这点只有經过这种方法才能达到，即社会公开地不轉弯抹角地占有生产力——这些生产力，已經发展到除了社会的管理方式之外再不适合于任何其他管理方式的地步了。这么一来，生产資料和生产品的社会性——現在它是反对生产者自己的，并且周期地震撼生产和交換的方式的，它作为一种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規律，暴烈地和帶破坏性地显示出自己的作用——这种社会性那时就將为生产者所完全自覚地运用，并且从混乱和周期危机的原因轉化为生产本身的强有力的杠杆。

社会的力量，正如自然的力量一样，在未被我們認識到和算計到以前，发生着盲目的、强制的、破坏的作用。可是一經我們認識了它們，研究了它們的作用、方向及影响，那时就完全听憑我們来使它們愈益更多地服从于我們的意志，并且利用它們来达到我們的目的。这点特别适用于現代的强大的生产力。当我們执拗地拒絕理解它的本性与特質之时，——而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拥护者，是拒絕这种理解的，——生产力总是像我們在上面所詳細指明了的，違背我

們，反对我們而行动，把我們置于它的統治之下。可是，一旦理解了它的本性，它就可能在集体生产者的手中，从惡魔似的統治者，变成順从的奴僕。这上面的区别，正如打雷时閃电的破坏力与电报机上和弧光灯上的馴服的电流之間的区别，也正如火灾时的火与供人应用的火之間的区别。当我們开始按照最后已被認識的近代生产力的本性去处置它的时候，生产的社会的無政府狀态，就要为生产的社会的有計划的調节所代替，这种生产，是以滿足全社会以及社会每一成員的需要为目的的。那时資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在这方式中，生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以后又奴役占有者——也將被以現代生产資料的本身性質为根据的新的占有形式所代替，一方面，是生产品的社会的直接的占有，用以作为維持生产及扩大生产的資料，另一方面，是直接的个人的占有，用来作为生活及享乐的資料。

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的居民变成为無产者，因而，就造成了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起来完成这个革命的力量。資本主义迫使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資料日益轉变为国有財产，因此它自己指出了完成这一革命的道路。無产阶級將夺取政权，而把生产資料首先变为国家的財产。可是因此，它也就消灭了自己作为無产阶級的那种性質，这样也就消灭了所有的阶級区别和阶級对立，跟着这些也就消灭了作为国家的那种国家。直到現在所存在过的和存在着的、运动于阶級对立之中的那种社会，需要有国家，即剝削阶級用以維持它的生产的外部条件的那种組織，也就是用来把被剝削阶級强制地束縛于那种为一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被压迫狀态（奴隶制、农奴制、封建隶屬制、雇佣劳动制）之下的組織。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的代表，是社会聚結为一个有形的集合体；但是国家之能成为这样的代表，仅仅因为它是当代唯一代表了全社会的那一阶級的国家：在古代，它是奴隶主—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国家，在我們这个时代是資产阶級的国家。等到最后，国家眞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的时候，它本身便成为多余的了。当社会上沒有必須被压迫的阶級的时候，当从現代的生产無政府狀态中产生的、一个阶級对另一

个阶級的統治和生存斗爭不再存在的时候，以及当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暴力行为都一起消灭了的时候——那时候，便無需乎压迫什么人和束縛什么人了，那时候，現在执行这个职能的国家政权也就失去其必要性了。国家以全社会的眞正代表的資格所作的第一次行动——將生产資料变为社会所有，——同时也將是国家之所以为国家的最后一次独立行动。国家政权对于社会关系的干涉，將逐漸成为多余的而自行停止下来。对人的管理將被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指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廢除"（abgeschaft）的而是自行萎亡(abst-erbt)的。应該根据这点去估价"自由的人民的国家"这一詞句，它在鼓动中有暫时存在的理由，可是它从科学意义上講来，毕竟是沒有根据的；同样应該根据这点去估价所謂無政府主义者的要求㊀，即在一个晚上廢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資本主义生产出現于历史舞台以来，把全部生产資料作为社会所有这一点，常常是作为單独的个人或整个的宗派对于未来的多少是模糊的理想而被提了出来。可是，这一点只有在实現它的物質条件已經存在的时候，才成为可能，才成为历史的必然。正同任何其他的社会进步一样，这一点之所以能被实現并不是由于意識到了阶級的存在是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并非由于廢除阶級的簡單的願望，而是由于一定的新的經济条件。社会之划分为阶級——剝削阶級与被剝削阶級，統治阶級与被統治阶級——是以前生产发展不大的必然結果。当社会劳动的生产总量用来供应社会全体所最必需的生活資料以外难得有所剩余的时候，当劳动差不多占据着社会极大多数人的全部或差不多全部时間的时候，这时候，这个社会必然分成各个阶級。在这个完全从事于强制劳动的极大多数人之旁，形成着一个脫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級，它从事于社会的这样一些共同事务：劳动的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之，作为阶級划分的基础的是分工的規律。可是，这并不是說，在阶級的形成中，沒

㊀ 無政府主义者（蒲魯东、巴枯宁等）否認一切国家，他們是無产阶級專政的敌人。他們的立即消灭国家的要求，实际上是用来反对無产阶級的国家的。——譯者

有采用过暴力和掠夺、狡詐和欺騙；也并不妨碍掌握政权的統治阶級牺牲劳动阶級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把对于社会的領导变为对于群众的加紧的剝削。

因此，即使阶級的划分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也只是对于一定时代和一定社会条件而言。它以生产不足为根据，它將为現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实际上，社会阶級的消灭，要以达到这样的历史发展的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不仅这个或那个一定的統治阶級的存在，而且一般地任何統治阶級的存在，因之，也就是阶級划分本身，都將成为时代的錯誤，成为过时的东西。所以，阶級的消灭是以生产的这样的高度发展的水平为前提的，在这阶段上，特殊社会阶級对于生产資料和生产品的占有——而与之一起的还有对于政治統治权，对于教育和精神指导的壟断权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經济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发展的障碍了。这个阶段，現在已經达到了。資产阶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于它自己，也几乎不是秘密了；而它的經济破产，則十年一次有規律地反复着。在每次危机中，社会窒息于它自己所不能利用的生产力和生产品的重压之下，面对着荒謬的矛盾而束手無策，这个矛盾就是：生产者之所以不能获得消費品，是因为生产品找不到消費者。生产資料扩展的力量毀裂着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上的桎梏。使生产資料脫出这种桎梏，乃是生产力不断的日益加速的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之也就是生产本身在实际上無限增長的唯一先决条件。可是不仅如此，生产資料归于社会所有，不但要消除生产的現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要消除生产力和生产品的直接浪費和破坏，这种浪費和破坏，在現在正是生产的不可避免的伴侶，而且在危机中更达到了它的最大的規模。此外，生产資料归于社会所有，还由于消灭了現在統治阶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耗費，因而为社会节約出大量的生产資料和生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証社会一切成員的十分丰足的并且日益改善的物質生活条件，而且还可能保証他們体力和智力的完全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样的可能性，現在第一次达到了，而且現在确实是

达到了㊀。

一旦社会拥有了生产資料，那么商品生产以及与之一起的生产品对于生产者的統治就將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無政府狀态，就將为有計划的自覚的組織所代替了。个人的生存斗爭停止了。这时候，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后地——才脱离了动物界并且从畜牲似的生存条件轉到眞正的人的生存条件。一切环繞着人們并且直到現在支配了人們的生活条件，現在受到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了。人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眞正的和自覚的主人翁，因为他們成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人翁。人們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規律——它直到現在还作为異己的、支配着人們的自然規律而与人們相对立——將被人們十分內行地运用了，因之也將服从于人們的支配了。人們的社会生存，直到現在，作为自然界和历史所强加于他們的，而和他們相对立的現象，現在变成了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动。直到現在統治于历史之上的客观的異己的力量，現在才受到人們自己的控制。只有从这时起，人們才开始充分自覚地自己創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这时候，他們所推动着的那些社会原因，才將以极大的和日益增加的程度，給予他們以其所希望的結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的王国进于自由的王国的飞躍。

在总結时，我們把上面所叙述的发展过程概括如下：

(一)中世紀社会：細小的个人生产。生产資料預定为个人使用，因此簡陋、細小、效能有限。生产是为供給生产者自己或其封建領主的直接消費而进行的。只有在生产超过直接消費有剩余时，这个剩

㊀ 少数的几个数字，尽可給予这样一种近似的观念，就是：即使在資本主义的压制之下，現代生产資料也具有何等巨大的扩張的能力，根据吉芬氏的最新統計，不列顛和爱尔蘭的国富总額約計如下：

一八一四年　二十二亿金鎊　等于　四百四十亿馬克

一八六五年　六十一亿金鎊　等于一千二百二十亿馬克

一八七五年　八十五亿金鎊　等于　一千七百亿馬克

至于危机时候生产資料和生产品的破坏，那么在德国工业家第二次大会上（一八七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柏林）計算出，在最近一次危机中，單就德国鉄工业一項說，損失已达四亿五千五百万馬克。——恩格斯注

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換；所以，商品生产尚处在产生的过程中；但它在这时候已經包含着社会生产的無政府狀态的萌芽。

（二）資本主义革命：工业中的变革起初是通过簡單协作和手工工場来实現的。以前的零散的生产資料集中到大作坊中来了，这样就把它們从个人的生产資料轉变为社会的生产資料——这种轉变一般地和整个地說并未牽动交換的形式。旧的占有形式还保持着作用。出現了資本家：他們作为生产資料的所有者，占有生产品，并把它們变为商品。生产成了社会的行为，而交換以及生产品的占有，仍旧是个人的行为，各别的私人的行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品被个别資本家所占有。这就是根本的矛盾。从这里产生了近代社会所运动于其中的一切矛盾，这些矛盾特别明显地暴露于大工业中：

（甲）生产者同生产資料分离。工人被判定作終身的雇佣劳动。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的对立。

（乙）支配商品生产的那些規律的日益增長的意义和日益加强的作用。猛烈的竞爭。个别工厂中的社会組織和整个生产的社会無政府狀态之間的矛盾。

（丙）一方面，机器的改进，因竞爭之故，成为每一个厂主所必須遵守的規律，这同时就意味着日益厉害地把工人从工厂中驅逐出来：产业后备軍的产生。另一方面，生产的無限制的扩展也成为每一厂主所必須遵守的竞爭的規律。从这兩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場拥塞，十年一次的危机，罪惡的循环：这里——生产資料和生产品过剩，那里——沒有工作沒有生活資料的工人过剩。可是生产和社会幸福这兩种杠杆，不能联結起来，因为資本主义的生产形式，除非把生产力和生产品首先轉变为資本，它是不許生产力发生作用的，不許生产品流通的，可是这种轉变，正为它們的过剩所阻碍。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換形式。这样資产阶級被証明它不能繼續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了。

（丁）部分地承認生产力的社会性——資本家自己也被迫作出这种承認；巨大的生产的和交通的机構，起先变为股份公司所有，后来

又轉为托拉斯所有，更后又归国家所有。資产阶級成为多余的阶級，它的一切社会职能，現在都为雇用的职員所执行了。

（三）無产阶級革命，矛盾的解决：無产阶級夺取社会权力，并用这个权力把从資产阶級手里取来的社会生产資料变为整个社会的財产。这么一来，無产阶級就使生产資料解脫了直到現在它所固有的作为資本的那种性質，而使它們的社会性能有完全的发展自由。从此，按照預定計划来进行的社会生产，成为可能了。生产的发展使各个社会阶級的繼續存在，成为时代的錯誤。随着社会生产的無政府狀态的消逝，国家的政治威权也相应地趋于衰亡，人类終于成为自己的社会存在的主人翁，因之，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翁，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翁——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乃是現代無产阶級的历史使命。研究这一变革的历史条件并且同时研究这一变革本身的性質，因而也就是向負有完成这一事业的使命的現在的被压迫阶級闡明他們自身事业的条件和性質——这就是作为無产阶級运动的理論表現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一八七七年。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出版的吳黎平譯本第六〇至八二頁）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諾夫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社会——不管其形态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作用的产物。人們是否可以自由选擇某一社会形态呢？决不可以。有一定的人們生产力發展阶段，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費形式。有一定的生产、交換和消費發展阶段，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阶級組織，一句話說就是有一定的公民社会。有一定的公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公民社会正式表現的一定政治制度。这就是蒲魯东先生永远不能理解的东西，因为他竟以为他从国家訴諸公民社会，即从社会的正式表現訴諸正式社会，就是在完成着一种偉績哩。

这里不必再补充說，人們不能自由选擇構成其全部历史基础的自己的生产力，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既得的力量，即以往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們实踐能力的結果，但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們所处的条件，取决于先前已經获得的生产力，取决于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的社会形态，取决于不是由这些人創立，而是由先前各代人們創造出来的社会形态。單是由于有这样一件事实，即每一后代的人們所找到的都是先前各代人們已經取得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則供他們作为原料繼續进行生产的，由于有这一件事实，便形成人类历史的联系，便形成人类的历史，随着人們的生产力，从而人們的社会关系愈益發展，这个历史也就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便必然得出一个結論：人們的社会历史，始終只不过是他們个体發展的历史，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这点。他們的物質关系乃是他們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質关系不过是他們的物質的和个体的活动所由以实現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魯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們始終不抛棄他們既經获得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說，他們不会抛棄他們所由以获得了一定生产力的那个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經达到的成就，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們在其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一切承受下来的社会形式。——这里我使用"commerce"一詞是指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也如在德文上使用"Verkehr"一詞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体制，全部中世紀規則，曾是唯一适合于既得生产力，并且适合于这些制度所由以产生的早先社会狀况的社会关系。在公会制度及其規則保护下逐漸积累了資本，發展了航海貿易，建立了殖民地，但是如果人們想把这些果实所由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們就要丧失这一切果实了。所以便爆發了兩次霹靂式的震动，即一六四〇年和一六八八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經济形式，一切跟它們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全部曾是旧公民社会正式表現的政治制度，——所有这一切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見，人們借以进行生产、消費和交換的經济形式，乃是暫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們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們便改变所有不过是当时一定生产方式必然关系的經济关系。

馬克思："致巴·瓦·安年科夫的信"（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中文版第四四二至四四三頁

……只要一方面分配关系，从而，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和对立，取得了广度和深度，这样一个危机的时間已經到来的事实，就表示出来了。这时候，生产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会形态之間的冲突就發生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一八九四年出版），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一五八頁

……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無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異性和承續性，同样，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長官的意志（或者說按社会意志和政府的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結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社会經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确定了这种形态的發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一八九四年春夏），"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二二頁

……人們和自然界斗爭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質資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絕，各人單独进行，而是以团体为單位，以社会为單位来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們在实現物質資料生产时，也就建立彼此間在生产內部的某种相互关系，即某种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是不受剝削的人們彼此間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可能是統治和服从的关系，最后，也可能是由一个生产关系形式过渡到另一个生产关系形式的过渡关系。……

斯大林："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九三八年九月），"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〇八頁

……生产底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長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終处在变更和發展狀态中，同时生产方式中的变更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底变更，即引起全部社会的和政治的結構底改造。人們在各个不同的發展阶段上有着各个不同的生产方式，或者粗淺一点說，过着各种不同样式的生活。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一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下有另一种生产方式，在封建制度下有第三种生产方式，余此类推。同时，人們底社会制度，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的观点，他們的政治制度，也与此适应而各不相同。

社会底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在基本上也就会怎样，社会底思想和理論、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也就会怎样。

或者粗淺一点說：人們底生活样式怎样，人們底思想样式也就会怎样。

这就是說，社会發展史首先便是生产發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謝的生产方式發展史，生产力和人們生产关系發展史。

由此可見，社会發展史同时也就是物質資料生产者本身底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并实現着社会生存所必需物質資料生产的那些劳动群众底历史。

由此可見，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眞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發展史归結为帝王將相底行动，归結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質資料生产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底历史。

由此可見，研究社会历史規律的关鍵，并不是要到人們底头脑中，到社会底观点和思想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会在每个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要到社会底經济中去探求。

由此可見，历史科学底首要任务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底規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發展底規律，社会經济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無产阶級党要想成为眞正的党，首先就应精通生产發展底規律，社会經济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無产阶級党在制定自己的党綱以及进行实际活动时，首先应以生产發展底規律，应以社会經济發展底規律为出發点。

……生产底第二个特点就在生产底变更和發展始終是从生产力底变更和發展上，首先是从生产工具底变更和發展上开始。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起初是社会底生产力發生变更和發展起来，然后，人們底生产关系；人們底經济关系也依賴于这些变更并与这些变更相适应而發生变更。但这并不是說，生产关系不影响到生产力底發展，生产力不依賴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虽然是依

賴于生产力底發展而發展，但同时它們又反轉来影响到生产力，加速或延緩其發展。而且必須指出：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長久落后于生产力底增長并和这一增長相矛盾，因为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底性質及狀况，并使生产力有發展余地时，生产力才能尽量發展起来。因此，無論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底發展，但它們迟早总应而且一定会去适合于生产力底發展水准，适合于生产力底性質。不然，便会有生产体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統一底根本破坏，全部生产破裂，生产危机以及生产力破坏的情形。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質不适合的实例，它們兩者間冲突的实例，便是資本主义国家中所發生的經济危机，那里的生产資料的資本主义私有制是和生产过程底公共性質，是和生产力底性質极不适合的。这种不适合的結果，便是使生产力陷于破坏的經济危机，而这种不适合的情况就是那負有使命破坏現存生产关系，并建立起适合于生产力性質的新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底經济基础。

反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質完全适合的实例，便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經济，这里的生产資料的公有制和生产过程底公共性質是完全适合的，因此在苏联便沒有經济危机，也沒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

所以，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而且是生产發展过程中决定的要素。

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也就应怎样。

……

……生产底第三个特点就在新的生产力以及与其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产生的过程，并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單独發生，不是在旧制度消灭以后發生，而是在旧制度內部發生；不是由于人們有意自覺活动底結果，而是自發地，不自覚的，不依人們意志为轉移地發生的。其所以是自發地和不依人們意志为轉移地發生，是由于以下兩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們不能自由选定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因为每一新輩人开始生活时，他們已遇到現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前輩人所工作的結果，因此这新輩人在最初一个时候，应当接受他們在

生产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現成东西，应当去适应这些东西，以便有可能生产物質資料。

第二个原因，就是人們在改善这种或那种生产工具，这种或那种生产力要素时，不会覚悟到，不会了解到，也不会想到这些改善将会引起怎样一种社会結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減輕自己的劳动，謀得某种直接的，可以感触到的益处。

……

但这并不是說，生产关系底变更以及由旧生产关系进到新生产关系的过渡是一帆风順地进行，而不經过什么冲突，不經过什么震动。恰巧相反，这样的过渡通常是表現于用革命手段来推翻旧生产关系而奠定新生产关系。到一定时期为止，生产力的發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更，是不依人們意志为轉移而自發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經产生和正在發展的生产力还沒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当新生产力已經成熟时，現存的生产关系及其体現者的統治阶級就变成了"不可克服的"，只有經过新阶級自覚活动，只有經过新阶級强力行动，只有經过革命才可扫除的障碍。这里特别明显地表現出应該用强力把旧生产关系消灭掉的那些新社会思想，新政治制度和新政权底偉大作用。在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互相冲突的基础上，在社会底新經济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社会思想；新的思想組織和动員群众；群众团結成为新的政治軍队，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并运用这个政权去用强力消灭生产关系方面的旧秩序而奠定新秩序。于是，自發的發展过程就讓位于人們自覚的活动，和平的發展就讓位于强力的变革，进化就讓位于革命。

斯大林："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九三八年九月），"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〇八至七一九頁

第一，說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只限于是束縛生产力發展的阻碍作用，这是不对的。当馬克思主义者講到生产关系的阻碍作用时，他們所指的并不是任何生产关系，而只是已經不能适合生产

力發展、因而阻碍生产力發展的旧生产关系。但是，大家知道，除了旧生产关系以外，还有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关系。可不可以說，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归結为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它真正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發展，沒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靡下去，如像現在資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形一样。

……

当然，新的生产关系不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与生产力的进一步發展發生矛盾，而开始失去其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并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那时候，就出現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經变旧了的生产关系，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就是充当生产力进一步發展的主要推进者。

生产关系从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發展到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以及从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發展到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这样一种發展的特性，是馬克思主义唯物辯証法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說生产关系即經济关系的独立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在消失，說生产关系是在被生产力吞沒着，說社会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归結为生产力的組織，这是不对的。馬克思主义是把社会生产看作一个整体，它具有兩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社会生产力（社会对自然力的关系，社会在与自然力作斗爭中来取得必要的物質資料）和生产关系（人們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是社会生产的兩个不同的方面，虽然它們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的。正因为它們是社会生产的兩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它們能够互相影响。硬說这兩个方面中有一个可以被另一个吞沒而变成它的組成部分，就是极严重地違反馬克思主义。

斯大林：“关于 Л·Д·雅罗申柯同志的錯誤”（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五至五七頁

……人們的生产关系，即經济关系。这里包括：(甲)生产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們的相互关系，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自己的活动"；(丙)完全以甲乙二項为轉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構成政治經济学的对象。

这个定义中缺少恩格斯定义內的"交換"这个术語。其所以缺少，是因为"交換"通常被許多人了解为不是一切社会形态而只是某些社会形态所特有的商品交換，这有时候就会引起誤会，虽然恩格斯所說的"交換"这个术語不仅是指商品交換。但是，恩格斯用"交換"这个术語所指的东西，显然已包含在上述定义中，作为其組成部分。因而，就其內容講来，政治經济学对象的这个定义是与恩格斯的定义完全相符合的。

斯大林："关于 Л·А·雅罗申柯同志的錯誤"(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六五至六六頁

……什么是經济呢？这是組成特定社会的人們在其生产过程中的实在关系底总和。这些关系不是不动的形而上学的存在物。它在生产力發展的影响下，同样亦在包圍特定社会的历史环境底影响下永久地变化着。……

普列汉諾夫："論一元論历史观之發展"(一八九四年)，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三八三頁

任何一个社会的組織，都为它的生产力狀况所决定。当这种狀况有所改变时，社会組織迟早也一定要發生变化。因此，在社会生产力正在發展着的地方，社会組織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平衡狀态之中的。

普列汉諾夫："論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八九七年)，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二一頁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諾夫論基础和上層建築

人們的观念、观点、概念，簡短些說，人們的意識，是随着人們的生活条件、人們的社会关系和人們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七年十二月至一八四八年一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八八頁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聳立有由各种不同感情、幻想、思想和世界观構成的整个上層建筑。由整个阶級在其物質条件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来創造和确定着这一切。……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八五一年十二月至一八五二年三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二四九頁

……在社会进一步發展的进程中，法律便發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愈复杂，則它的表現方式就愈益不同于社会通常經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現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因素，好像是一个并非从經济关系中，而是从自己的內在基础中，譬如說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存在理由和繼續發展根据的因素。人們往往忘記他們的法权起源于他們的經济生活条件，正如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一八七二年六月至一八七三年二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六〇〇頁

正如达尔文發現生物界的發展規律一样，馬克思發現了人类历史的發展規律，即發現了直到最近还被思想体系的积淀所遮盖的一个簡單的事实：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而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物質生活資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所达到的經济發展的一定程度，形成一个基础，人們的国家組織、法律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便是从这个基础上發展起来，因此也就必須由这一基础来加以說明，而不是象先前那样作得相反。

恩格斯："馬克思墓前演說"（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七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中文版第一六六頁

……正是馬克思最先發現了偉大的历史进展法則，按照这个法則，一切历史上發生的斗爭（不論它是在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領域中發生的，或是在任何其他意識形态領域中發生的），实际上只是各个社会阶級彼此斗爭的多少明显的表現，而这些阶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冲突，則是由它們經济狀况的發展程度、生产的性質和方式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来制約的。……

恩格斯为"路易·波拿巴政变記"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一八八五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二二二頁

……当一种历史現象一旦为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經济的原因所造成的时候，它也就影响周圍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諸原因發生反作用。……

恩格斯："致弗·海林格的信"（一八九三年七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中文版第四九九頁

……馬克思……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領域中划分出經济領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一八九四年春夏），

"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
版第一一八頁

……他們㊀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㊁中就已表达得十分明确的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質关系和思想关系㊂。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們的意志和意識为轉移而形成的物質关系的上層建筑，是人們維持生存的活动的形式(結果)。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說，对政治法律形式的說明要在"物質生活关系中"去寻找。……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一八九四年春夏），
“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
版第一三一頁

革命从馬克思主义观点方面来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意思就是用强力来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層建筑物，即打破那因与新的生产关系發生矛盾而在一定时机遭到了破产的上層建筑物。現在，專制制度已因它与資本主义俄国全部机構相矛盾，即与这資本主义俄国需要按資产阶級民主方面發展的全部趋势相矛盾的这种情形曾被勉强阻延得特别長久而遭到特别厉害的破产了。上層建筑物已是破綻百出，經不住攻击，日益削弱下去了。人民只好由自己，即經过各种阶級和各种集团底代表人物来为自己建造起一个新的上層建筑物。在一定的發展阶段上，旧的上層建筑物底腐敗無用已成了尽人皆知的事实。革命已是大家都承認的了。目前任务是要确定清楚，究竟哪些阶級，以及究竟应該怎样来建造新的上層建筑物。若不把这点确定清楚，那末革命这一口号在目前阶段上就是个空泛而毫無意思的口号，因为專制制度力量虛弱的事实已使那些亲王們和莫斯科

㊀ 指馬克思和恩格斯。——本書編者注

㊁ 这里指的是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一書序言”中的一段引文，見“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一八至一一九頁(参看本書第一四八〇至一四八一頁)。——本書編者注

㊂ 在本文的另一个地方，列宁在“思想关系”一詞后面用括弧注“例如法律关系或宗教关系”，見“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三〇頁。——本書編者注

新聞报館中人也都变成为"革命者"了！若不把这点确定清楚，那就根本談不到先进阶級底先进民主任务。而这样的确定也就是工农民主專政口号。这个口号既能确定出新上層建筑物底新"建筑人"可能而且应該倚据的那些阶級，又能确定出这一上層建筑物底性質（即"民主"專政而不是社会主义專政）和建筑方式（实行專政，即用强力鎮压强力抵抗，把民間各个革命阶級武裝起来）。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兩个策略"（一九〇五年六、七月間），"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六六八至六六九頁

人底意識反映着不依賴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發展着的物質；同样，人底社会意識（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各种观点与学說），也是反映着社会經济制度。政治制度是經济制度的上層建筑物。……

……

馬克思既認为經济制度是政治上層建筑物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于是他就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經济制度。……

列　宁："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組成部分"（一九一三年發表），"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中文版第七一頁

……任何民主，就像一般的任何政治的上層建筑一样（这种上層建筑在阶級消灭之前，在無阶級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要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該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

列　宁："再論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六九頁

……同时生产方式中的变更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

想、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底变更，即引起全部社会的和政治的結構底改造。……

社会底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在基本上也就会怎样，社会底思想和理論、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也就会怎样。

斯大林："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九三八年九月），"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〇八至七〇九頁

基础是社会發展在每一阶段上的社会經济制度。上層建筑是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

每一个基础都有适合于它的上層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制度；資本主义的基础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筑；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筑。当基础發生变化和被消灭时，那末它的上層建筑也就会随着变化，随着被消灭。当产生新的基础时，那末也就会随着产生适合于新基础的新的上層建筑。

斯大林："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發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至二頁

……上層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說上層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只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級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質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層建筑一出現后，就要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摧毀和消灭旧基础与旧阶級。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基础之所以創立上層建筑，也就是为了要使上層建筑替它服务，要使上層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起来和巩固起来，要使上層建筑积极为消灭已經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層建筑而斗爭。只要上層建筑拒絕履行它替基础服务的作用，只要上層建筑从积极保衛自己基础的立場走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場，走

到对各个阶級同等看待的立場，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質，并終止其为上層建筑。

斯大林："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發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頁

……上層建筑是同一經济基础存在着和活动着的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層建筑的生命是不長久的，它要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

斯大林："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發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頁

……上層建筑与生产及人的生产行为沒有直接联系。上層建筑只是經过經济的中介、基础的中介与生产發生間接的联系，因此上層建筑反映生产力發展水平的改变不是直接發生，不是立刻發生的，而是在基础改变以后，通过生产改变在基础的各种改变上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說，上層建筑活动的范圍是狹窄的和有限的。

斯大林："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發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七頁

政治制度影响于經济生活。它們或者促进这个生活底發展，或者阻碍它。前一种情形从馬克思底观点上看来絲毫也不足为奇的，因为特定的政治体系之被創造起来就是为着促进生产力底往前發展（至于是自覚地或不自覚地被創造出来——在这里对于我們是完全一样的）。后一种情形絲毫也不与这个观点矛盾，因为历史的經驗証明，既然特定的政治体系不再适合于生产力底狀态，既然它变成了生产力往前發展的障碍，那末它便开始走向沒落，最后，被排除掉。不仅是这个情形不与馬克思底学說矛盾，而且它最好地証实了馬克思底学說，因为正是它指明：在什么意义上經济統治着政治，生产力底發展怎样先于人民底政治發展：

普列汉諾夫："論一元論历史观之發展"（一八九四年），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二五七頁

……生产力底發展把人們置于这样一种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下，某些对象底个人的占有对于生产过程成了更加便利的。适合于这种情况，原始人底法权概念变化了。社会底心理适应于它的經济。在特定的經济基础上命定地建筑着适合于它的意識形态的上層建筑。可是，另一方面，在生产力發展上的每一个新步驟把人們在其日常生活底实踐中置于新的互相关系中，这个新的关系是和旧的过时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合的。这个新的从未有过的情况反映于人們底心理上，有力地变化着它。向哪一个方向呢？社会底一些成員坚持旧制度，这是停滯底人們。另一些人——旧制度对他們不利的人們，贊成前进的运动；他們的心理变向那随着时間底到来將会代替旧的、过时的經济关系的生产关系底方面去了。可以看到，心理对于經济底适应繼續着，可是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經济革命。

当这个革命完成之后，就建立了社会心理与經济之間的完全的适合。这时候在新的經济基础上，新的心理怒放起来。在某一时期中这种适合是不可破坏的；它甚至日益巩固起来。可是慢慢地新的不和之芽又出現了：先进阶級底心理，依着上面指述的原因，又駕凌于旧的生产关系之上：一分鐘也不停止它的适应于經济，它又去适应那組成將来的經济的萌芽的新的生产关系。这难道不是同一过程底兩个方面么？

普列汉諾夫："論一元論历史观之發展"（一八九四年），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二六六至二六七頁

……这里我們需要注意的主要的东西，就是馬克思的下面一个指示：財产关系在生产力發展到一定的阶段上形成以后，在相当时期內是帮助这种生产力进一步發展的，但是后来它又开始阻碍生产力的發展了。这就告訴我們，虽然生产力的某种狀态是引起某种生产关系，特别是財产关系的原因，可是这种生产关系一旦作为上述原因的結果而發生以后，它又从自己方面开始影响这种原因了。这样便發生了生产力和社会經济間的相互影响。在經济的基础上面既然是

成了社会关系、感情和概念的整个上層建筑，而且这个上層建筑起初也是帮助經济的發展，后来又是阻碍經济的發展的，那么，上層建筑和基础之間也就發生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可以拿来解釋一切驟然看来似乎是跟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相矛盾的現象。

"批評"馬克思的人們直到現在所說的一切，什么馬克思主义片面呀，什么除了經济因素以外，他忽視社会發展的其他一切"因素"呀，这只是証明他們簡直不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加于"基础"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相互影响的作用。要使大家相信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注意政治因素的意义，只要讀一下"共产党宣言"中講到資产阶級解放运动的几頁就够了。这里写道：

"資产阶級在封建主統治时期是个被压迫的等級，在公社里面是个武裝和自治的团体，在这些地方組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别一些地方又組成为君主国中納稅的第三等級；后来，在工場手工业时期，它在等級制的君主国里或在專制的君主国成为对抗貴族的势力和一般巨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自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場确立时起，資产阶級又在現代的代議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統治权。現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資产阶級共同事务的委員会吧了。"

政治"因素"的意义在这里暴露得十分明显，有些"批評者"自己甚至覺得过于夸大。但是这个"因素"的起源和力量，以及它在資产阶級發展的每一时期的作用方式，本身在"共产党宣言"里面用經济發展的行程来說明了，因为这个緣故，所以"因素"的多样性絲毫沒有破坏根本原因的統一性。

無疑的，政治关系可以影响經济运动；同样，毫無疑問，政治关系在影响經济运动以前，是由經济运动創造出来的。

关于社会人类的心理，以及关于史丹姆勒稍微片面地叫做社会概念的东西，也是如此。"共产党宣言"提供了确鑿的証据，証明它的兩位作者是非常了解思想"因素"的意义的。但在同一个"宣言"中我們可以看到，要是思想"因素"在社会發展上起了重大的作用，那么它本身是事先由这种發展所造成的。

"当古代世界衰落的时候，古代宗教也为基督教所征服了。当基督的思想讓位給十八世紀的啓蒙思想时，封建社会就同那时革命的資产阶級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爭。"在这方面，"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章說得更加确切。兩位作者在那里說，他們的同道者竭力想在工人的头腦中造成一种資产阶級和無产阶級的利益根本对立的最明确的意識。大家都明白，凡是不重視思想"因素"的人，他就沒有在任何社会集团的头腦中制造任何意識的邏輯理由。

普列汉諾夫："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一九〇八年發表)，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四一至四三頁

历史的过程由唯物論来解釋，要比較由唯心論解釋好的多。更准确的說：只有当学者自覺或不知覺的站在唯物論的基础上时，才能对于历史过程作科学的解釋。但是历史唯物論者的眼界，应不仅限于經济一面。历史唯物論的眼界不但注意，而且应該注意整个在經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層建筑"，这整个上層建筑經常对于經济基础有反影响的，假如唯物論者不願注意这一反影响，他便是自己違背了自己的办法：从自己的眼界中取消"上層建筑"，便不能用經济基础解釋"上層建筑"的来源与"上層建筑"对于經济基础的反影响。

普列汉諾夫："俄国社会思想史"上册(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七年)，商务印書館一九三七年版第二四五至二四六頁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

馬克思、恩格斯論社会主义社会中残存的不平等現象

……这里平等的权利在原則上仍然是資产阶級式的法权，虽然原則和实踐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但在商品交換中，等价物的交換則只是平均地存在着，而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場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有一方面还仍然受資产阶級范圍的限制。生产者們的权利是与他們供給的劳动成正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平等的尺度——劳动——来計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間內貢献的劳动量較多，或者能够工作的时間較長；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应当按照时間長度和劳动强度来确定，不然劳动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个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是个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認任何的阶級差别，因为每个人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都只不过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認不同等的个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种天然特权。所以根据其內容来講，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根据它的性質来講，只有在使用平等的尺度时才能存在；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只有在下述場合才能用同一的尺度去計量，即以同一的观点来看待他們，从一个确定的方面去对待他們，譬如就像在上述場合一样，把他們只当做工人看，而他們身上再也看不出别的什么，撇开其他一切东西不說。其次，一个工人已經結

婚了，另外一个則沒有；一个工人的兒女較多，另一个工人的兒女較少等等。在同等的劳动下，亦即在同等享受社会消費品存額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在实际上所領得的比另一个人多些，某一个人就会比另一个人富些等等。为要避免这一切，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在它經过長久的产育苦痛以后剛剛从資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經济制度以及由此經济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發展程度。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一八七五年五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中文版第二二頁

“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句用以代替“消灭一切阶級差别”的話，也是很成問題的。在各个国家、省份甚至各个地方之間，在生活条件方面总是要存在某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將来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居民与平原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有所不同。把社会主义社会当作平等乐园的观点是个与“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有联系的片面的法国观点，——这个观点作为一定的發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是正当的，但是現在这个观念則象以前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应当克服下去，因为它只能引起混乱，并且因为現在已經有了闡述这个問題的更精确的方法。

恩格斯，“致奧·倍倍尔的信”（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至二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中文版第四〇至四一頁

恩格斯論体力劳動和腦力劳動矛盾的解决

……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經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

新發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將創造出这种新人来。……教育可使年輕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統，它可使他們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們自己的爱好，輪流从一个生产部門轉到另一个生产部門。因此，教育就会使他們摆脫現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則組織起来的社会，將使自己的成員能够全面地發揮他們各方面的才能……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一八四七年），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五至一六頁

当社会掌握全部生产資料，使之可以根据社会的計划来运用它們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直到現在居支配地位的、生产資料对于人的奴役。自然，社会如不把每个人解放，它自己也是不能得到解放的。所以旧的生产方式，应該徹底地被改变，特别是旧的分工应該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該是这样的生产組織，它使得一方面誰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供給每人以全面發展并运用自己一切体力智力的可能，它（生产劳动——譯者）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从一种重負，变成为一种快乐。

恩格斯："反杜林論"（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三一〇頁

列寧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矛盾的看法

〔布哈林原著的詞句〕

資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但是，把社会分裂为兩个基本阶級的阶級对抗，則到处都有它的表現。因而，資本主义結構是一元論的对抗或是对抗的一元論。

〔列宁的評語〕

※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

列　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經济'一書的評論"（一九二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參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三頁

列寧論社會主義制度下新舊事物的矛盾

……我們不是空想主义者，我們知道資产阶級"論据"的眞实价值，也知道旧东西的残余在革命后的一定时期内还必然胜过新的幼芽。当新事物剛剛誕生时，旧事物在相当时期内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見的現象。譏笑新的幼芽軟弱，抱着輕浮的知識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資产阶級反对無产阶級的阶級斗爭手段，是保护資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們应当縝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細地对待它們，尽力帮助它們成長，并"照护"这些柔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是不免会死亡的。不能担保說，"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問題不在这里。問題在于支持各种各样新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們战胜梅毒，耐心地試驗了六〇五种藥品，直到制出滿足一定要求的第六〇六种藥品为止，可見要想解决战胜資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們，也应該具有坚靱不拔的精神来試驗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爭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得出最适当的办法为止。

列　宁："偉大的創举"（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七頁

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下工人內部的矛盾

（一）关于工人中保存着的資本主义社会的傳統心理

工人和旧社会之間从来沒有一道万里長城。工人还保存着許多資本主义社会的傳統心理。工人在建設新社会，但他还沒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馬上办到，那就是愚蠢透頂的

空想，就是在实踐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我們不是这样建設社会主义的。我們是站在資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設的，我們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經常拖無产阶級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爭。在这个斗爭中，常常碰到許多分散主义的小私有者的旧习慣、旧习气，还会听到"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旧口号。这种情形在每个工会、每个工厂里真是太多了；工厂往往只顧自己，至于别人，那就讓上帝和首長去照顧吧。这一点我們看出了，亲身体驗到了，这是我們用無数錯誤、無数严重的錯誤換来的。因此我們現在估計到了这个經驗，并对同志們說：我們提醒你們，必須坚决防止这方面的一切自作主張的行为。而且我們說：这样做將不是建設社会主义，而是我們大家向資本主义的弱点讓步。

列　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日），"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〇三頁

（二）关于無产阶級專政下工会内部情况的矛盾

……一方面，工会的主要工作方法是說服教育；另一方面，工会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就不能拒絕采取强制手段。一方面，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維护劳动群众最直接最切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和整个国民經济的建設者，就不能拒絕采取强迫方法。一方面，工会应当按照战时方式来工作，因为無产阶級專政是一場最殘酷、最頑强、最激烈的阶級斗爭；另一方面，正是工会应該最少采用战时的特殊工作方法。一方面，工会要善于适应群众，适应群众当时的水平；另一方面，它們又决不应当姑息群众的偏見和落后，而要不断地把他們提到愈来愈高的水平上，如此等等。这些矛盾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是在今后几十年内所能克服的。因为，只要資本主义和小生产的殘余还存在，在整个社会制度中这些殘余和社会主义萌芽之間的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以得出兩个实际結論：第一、工会要有效地进行工作，仅

仅正确地了解工会的任务、仅仅有正确的工会机構是不够的，还必須有特别的机智，善于在各种具体場合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近群众，尽量減少摩擦，在文化、經济和政治方面把群众更提高一步。

第二个結論：上述矛盾必然会引起糾紛、不协調和摩擦等現象。因此必須有一个最高的权威机关及时地解决这些糾紛。……

列　宁："工会在新經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六三頁

（三）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罢工問題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罢工斗爭的最終目的显然是摧毁国家机关，推翻当时的阶級政权。而在我們这种过渡形式的無产阶級国家中，工人阶級的任何發动，比如，同这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偏向，同它的錯誤和缺点，同資本家力圖逃避国家监督的阶級野心作斗爭等等，其最終目的只能是巩固無产阶級国家和無产阶級的国家政权。因此，無論共产党、苏維埃政权或工会决不能忘記，而且也不应当向工人和劳动群众隐瞞这一点：在無产阶級执政的国家里采取罢工斗爭，只能一方面是由于無产阶級国家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偏向，它的机关中还存在着各种資本主义旧殘余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群众在政治上不开展和文化落后造成的。

所以当工人阶級的个别部分同工人国家的个别机关發生糾紛和冲突时，工会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地圓滿地解决冲突，使工会所代表的工人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但要無損于其他部分和無害于工人国家及其整个經济發展，因为只有这种發展，才能为工人阶級的物質福利和精神福利打下基础。解决工人阶級个别部分同工人国家个别机关之間的糾紛和冲突，其唯一正确、合理和适当的方法，就是工会通过它的相应机关参加仲裁，或者根据双方明确提出的要求和建議，同有关經济机关进行談判，或者向高一級的国家机关上訴。

如果經济机关的錯誤作法、某些工人的落后、反革命分子的从中

挑撥以及工会組織本身的缺乏預見，在国营企业中造成了罢工等公开的冲突，工会的任务就是采取工会工作性質所規定的措施，尽快地促成冲突的解决，例如設法消除确实不妥当的作法和混乱現象，滿足群众合理的可以办到的要求，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等等。

工会能在何种程度上采取富有远見的政策，眞正从各方面保障工人群众的利益，及时消除可能造成冲突的因素，以有效地防止国营企业发生群众性的冲突，这是衡量工会工作是否正确有效的一种最重要最精确的尺度。

列　宁：“工会在新經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五七至一五八頁

列宁論社会主义經济制度和小資产階級自發势力的矛盾

千百年来，国家都是压迫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机关，它給我們的遺产，是群众对一切国家事务的极端仇視和不信任的心理。克服这种心理，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一任务只有苏維埃政权才能胜任，然而就是苏維埃政权也須要經过長时間的和坚忍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遺产”的影响，在建立統計和监督的問題上，即在推翻資产阶級以后的第二天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問題的这方面，表現得特别厉害。那些在推翻地主和資产阶級之后第一次覺得自己得到了自由的群众，必然要經过相当的时間，不是根据書本，而是根据亲身經历的苏維埃的經驗，才能認識并且感受到：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与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統計和监督，那末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維持下去，資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

資产阶級尤其是小資产阶級的一切习慣与傳統，是反对国家监督的，要求“神聖私有財产制”和“神聖”私有企业的不可侵犯。馬克

思主义說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是資产阶級的思潮，說它們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級專政和共产主义的矛盾是如何不可調和，現在我們看得特别明显，这是多么正确。力求把苏維埃的，即由国家实行統計和监督的思想灌輸到群众的意識中去，力求实現这种思想，力求打破把获得衣食看作"私人"事情，把买卖看作"只是与我有关"的这种旧时惡习，——这是一个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偉大斗爭，这是一个社会主义自覚性反对資本主义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的斗爭。

列　宁："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月至四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三一至二三二頁

列宁論过渡时期的工農矛盾

（一）关于过渡时期工农之間在經济上政治上的不平等

……組織无产阶級比組織农民快得多，这就使工人成了革命的支柱，使工人实际上获得了优越地位。往后的任务就是从这种优越地位逐漸过渡到工农平等。……

……我們的宪法，正如我們所指出的，曾不得不把这种不平等放进去，这是因为文化水平低，因为我們的組織弱。但是我們不把这点变成理想，恰恰相反，按照党綱，我們党一定要进行有系統的工作来消灭較有組織的无产阶級和农民之間的不平等。一旦我們提高了文化水平，我們就要取消这种不平等。那时我們就不需要这种限制了。在革命胜利后过了十七个月的現在，这种限制的意义实际上已經很小了。

列　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綱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五八頁

尽管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切尔諾夫、馬尔托夫、考茨基、龙格、麦克唐納之流）的小資产阶級民主派，在“平等”、“普选”、“民主”、“純粹民主”或“徹底民主”这些女神面前磕破了头，但是城市和农村在經济上政治上不平等的事实并未因此而消失。

这是一般在資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从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不可避免的事实。

城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领导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問題仅仅在于，“城市”阶級中的哪个阶級能够領导农村，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以及这种城市的領导采取什么形式。

列　宁：“立宪会議选举和無产阶級專政”（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二五頁

（二）建立無产阶級專政下工农之間的正确关系

……毫無疑問，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絕大多数的国家里，实現社会主义革命必須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业和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占絕大多数的資本主义發达的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的。在資本主义發达的国家里，有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級。只有这样的阶級，才能够在社会上、經济上以及政治上成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只有在这个阶級相当發展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資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需要全国性的特殊的过渡办法。我們在許許多多的著作中，在我們所有的演講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都强調說，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則占絕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兩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徹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你們知道，为了爭取这个条件，我們比以往多做了很多工作，然而，要使它成为現实，我們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另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实現自己的專政或者說掌握国家政权的無产阶級和大多数农民之間互相协議。协議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它包含着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这里必須指出，我們应当在我們的全部宣傳和鼓动工作中开誠布公地提出問題。有些人把政治理解为耍手腕，有时几乎归結为欺騙，这种人在我們当中应当受到最坚决的斥責。他們的錯誤必須加以糾正。……

……

我們应当努力滿足农民的要求，因为他們感到不滿足，不滿意，而这种不滿意是合理的，他們是不可能滿意的。我們应当对他們說，"是的，这种情况是不能繼續下去了。"怎样去滿足农民呢？滿足农民是什么意思呢？我們从哪里能够找到对怎样滿足农民这个問題的答案呢？自然，这要从农民的要求本身中去寻找。这些要求我們是知道的。但是我們必須对这些要求加以审查，必須从經济学的观点对我們关于农民的經济要求所知道的一切加以考查。只要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个問題，我們就会立刻对自己說：实質上可以用兩个东西来滿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周轉自由，需要給小私有主一定的經营自由。第二，需要供应商品和产品。如果沒有什么可以周轉，那还算什么周轉自由；如果沒有什么可以交易，那还算什么貿易自由！那就会成为空头支票；而阶級是不能从空头支票得到滿足的，只有用物質的东西才能滿足它的要求。……

列　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五日），"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〇三至二〇六頁

在农民人口占絕对优势的条件下，我們的总的政策，我們的經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工人阶級和农民之間建立一定的关系，这是很自然的。在現代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这样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下，剝削阶級已經被消灭，但是还存在着兩个不同的阶級——工人阶級和农民。在农民占絕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优势不能不影

响到經济政策和总的政策。对于我們，主要的問題目前是而且今后若干年內一定仍然是在这兩个阶級之間建立正确的关系 —— 从消灭阶級的观点来說是正确的关系。苏維埃政权的敌人常常談起工人阶級和农民的协議这个公式，并且常常利用它来反对我們，因为这个公式本身是很不明确的。对于工人阶級和农民之間的协議，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从工人阶級的观点看来，只有当这种协議支持工人阶級專政并且成为一种消灭阶級的手段时，它才是可以容許的、正确的和原則上可能的，如果忘掉这一点，那末工人阶級和农民成立协議的公式自然就会成为苏維埃政权的一切敌人和專政的一切敌人所主張的公式。……

列　宁："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議上关于粮食税的报告"（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九五至三九六頁

当然，在我們苏維埃共和国內，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兩个阶級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現在也容許"耐普曼"即資产阶級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如果在这兩个阶級之間發生严重的阶級分歧，那末分裂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国社会制度內并不存在必然發生这种分裂的基础，所以我們中央委員会和中央監察委員会以及我們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視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預防这种情况，因为我們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將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級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級的联盟呢，还是讓"耐普曼"即新資产阶級把他們和工人拆开，使他們和工人分裂。对这兩种結局，我們看得愈清楚，我国全体工人和农民了解得愈清楚，我們避免那种足以使苏維埃共和国复灭的分裂的可能就愈大。

列　宁："怎样改組工农檢查院"（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四〇頁

列宁論在利用資产阶級專家建設社会主义中所發生的矛盾

……我們有一些同志，看到領导紅軍的有沙皇的奴僕和旧軍官，就非常憤慨。当然，在建立紅軍时，这一个問題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个問題提得正确与否决定着建軍的成敗。專家問題应当提得更广泛些。我們应該在一切建設領域內，自然是在我們沒有旧資产阶級專家的經驗和科学素养、用自己的力量不能完成任务的那些建設領域內，利用他們。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認为社会主义俄国的建設事业可以由什么新人物来完成，我們要利用旧的資本主义世界給我們遺留下来的材料。我們把旧人員放到新的环境中，使他們受到适当的监督，受到無产阶級严密的监視，使他們完成我們所需要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建設。如果你們不能利用資产阶級世界遺留給我們的材料来建設大厦，你們就根本建不成它，你們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談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必須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資本主义俄国給我們遺留下来的一切东西。当然，在这条路上我們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到处都有投敌分子和存心不良的怠工分子。在这里首先必須使用暴力。但除此以外我們还应当利用無产阶級的道德影响、强大的組織和紀律。拋棄对我們有用的專家是根本沒有道理的。但是应該把他們放在一定的范圍內，使無产阶級能够监督他們。应該給予工作，但要警覚地监視他們，設政治委員管他們，防止他們的反革命陰謀。同时必須向他們学习。一方面，在政治上决不向这些先生們作絲毫讓步，另一方面，在任何地方，只要可能，就要利用他們的劳动。在这方面我們已經做到了一部分。我們已經从鎮压資本家进而利用他們，这也許是一年来我們在国內建設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列　宁：“在彼得格勒苏維埃会議上关于人民委員会对外对內政策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二日)，“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五至六頁

……發展生产力的这一任务要求迅速地、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資本主义遺留給我們的科学技术專家，尽管他們多半不可避免地浸透着資产阶級的世界观和习慣。党应当与工会組織紧密結合，执行自己原有的路綫：一方面，对这个資产阶級阶層不作絲毫的政治讓步，無情地鎮压他們的各种反革命陰謀；另一方面，也要無情地反对貌似激进实則是不学無术的自負，以为劳动者不向資产阶級專家学习，不利用他們，不經过同他們多年共事的鍛煉，就能消灭資本主义和資产阶級制度。

苏維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現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开始从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不能給自己提出立刻实現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間內仍要給專家們較高的报酬，使他們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績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組織工作的奬金制度。

同样地必須使資产阶級專家同覺悟的共产党員所領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从而促使被資本主义分开的体力劳动者和腦力劳动者互相了解和接近。

列　宁：“俄共(布)党綱草案”(一九一九年)，“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一〇至一一一頁

在我們面前摆着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根据一年的經驗概括出来的。当我們在我党革命綱領中写到專家問題时，我們总結了我党在一个最大的問題上的实际經驗。我記得，以往的社会主义导师，对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預見得很多、策划得很多，但从来沒有对这个問題發表过什么意見。問題对他們来說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在我們着手建設紅軍时才产生的。这就是說：用过去充当走卒的被压迫阶級来建立一支滿腔热忱的軍队，并使这支軍队去利用資本主义遺留給我們的那些最殘暴最可憎的东西。

我們在紅軍問題上遇到的这个矛盾也存在于我們的一切建設部

門中。……

列　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員会的总結报告"（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二九頁

列宁論社会主义制度和官僚主义的矛盾

必須努力不懈地发展各地的苏維埃組織和苏維埃政权組織。現在有一种使苏維埃代表变为"議会議員"，或变为官僚的小資产阶級趋势。必須吸引全体苏維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許多地方，苏維埃的各部逐漸与各人民委員部合并成了一个机关。我們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貧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現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驟，——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該詳細地記載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統化，用更多的經驗来檢查它，并且定为法規。我們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除做八小时"份內的"生产工作外，还要無报酬地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过渡到这个制度，是特别困难的，可是只有实現这种过渡才能保証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

……

苏維埃与"人民"，即与被剝削劳动者保持着稳固的联系，保持着灵活的和能伸縮的联系，就可以防止苏維埃組織受官僚主义的毒害。……

正是苏維埃与劳动"人民"接近，才造成一种特别式的罢免制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現在应該极力发展这些形式。例如，国民教育委員会就是苏維埃选民及其代表为討論和监督苏維埃政权在这方面的工作而举行的定期代表会議，这种委員会是值得完全贊同和拥护的。如果把苏維埃变成一种停滯不前的和自滿自足的东西，那就是再愚蠢不过的了。現在，我們愈坚决主張有极为强硬的政权，愈坚决主張在某种工作过程中，在某种純粹执行职能方面实行个人独裁制，

我們就应該有更多种多样的和自下而上的監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絕毒害苏維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剷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列　宁："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月至四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五一至二五三頁

……我們一切經济机关的全部工作的最大的禍害是官僚主义。許多共产党員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說有什么东西能够使我們灭亡的話，那就是官僚主义。而对于国家銀行最危險的莫过于变成官僚主义的机構。我們还在考慮各項指令、各种机关。錯誤就在这里。現在一切問題的关鍵在于实际工作者，在于实际工作。寻找精明強幹的人材（一百人中找到一个，一千个共产党員中找到一个，也要謝天謝地）；把我們的指令由令人討厭的公文（好指令坏指令都一样）变成生动的实际工作，——关鍵就在这里。

列　宁："給財政人民委員部的信"（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列宁論苏維埃国家机关工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二一七頁

列宁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

我在民族問題的著作中已經指出：抽象地一般地提出民族主义問題是极不恰当的。必須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对于第二种民族主义，我們大民族的人，几乎在整个历史上施加了无数暴力，甚至不知不覚地施加了无数的暴力和侮辱——只要回想一下我的伏尔加回忆录，就可以知道：我們有人蔑視異族人，把波蘭人称为"波蘭棒子"，嘲笑韃靼人为"惡魔"，烏克蘭人为"哈霍尔"，格魯吉亞人和其他高加索人为"蛮子"。

因此，压迫民族即所謂"大"民族(这种民族不过是因为实行暴力才偉大，不过象杰尔治摩尔达那样偉大)的国际主义，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消除在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誰不懂得这一点，誰就不懂得对于民族問題的眞正無产阶級态度，誰就在实际上持有小資产阶級观点，因而也就不能不滾到資产阶級泥坑去。

对于無产阶級来說，什么是重要的呢？对于無产阶級来說，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証在無产阶級的阶級斗爭中取得異族人最大的信任。那末需要什么呢？不仅需要形式的平等，而且需要用自己对異族人的态度或讓步来消除"大国"民族的政府在过去历史上对他們的不信任、猜疑和侮辱。

我想，对布尔什維克和共产党員来說，这是用不着詳細解釋的。我想，这方面，在对格魯吉亞民族的态度上，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說明，我們要以眞正無产阶級的态度处理問題，就必須非常謹愼，采取关心和讓步的态度。一位格魯吉亞人由于蔑視事情的这一方面，結果被人輕蔑地罵为"社会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他自己不仅是眞正的"社会民族主义者"，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治摩尔达)，这位格魯吉亞人实际上破坏無产阶級的阶級团結的利益，因为沒有什么比对待民族不公平更能阻撓無产阶級阶級团結的發展和巩固了，因为"受侮辱"的民族的人对平等感、对自己的無产阶級同志破坏这一平等(那怕是出于無心或由于开玩笑)是最敏感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少数民族多讓步一些，多和緩一些，比讓步不够、和緩不够要好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無产阶級的根本利益，無产阶級阶級斗爭的根本利益，要求我們始終不要形式地对待民族問題，而要估計到被压迫民族(或小民族)对待压迫民族(或大民族)的态度的必然有的差别。

列　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問題(續)"(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批判斯大林問題文集"第二輯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三四三至三四四頁

斯大林論工人階級和农民羣众間的矛盾是"結合內部的矛盾"

"我国有兩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內部的矛盾，即無产阶級和农民之間的矛盾（这里是指在一个国家內建成社会主义而言。——斯大林注）。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們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这里是指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言。——斯大林注）"……"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無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誰把这兩种矛盾混为一談，誰就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宁主义的錯誤，誰就是糊塗虫，或者是不可救藥的机会主义者。"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議的工作总結"（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斯大林在"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一九二六年）中自己摘引了这段話并加注，"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六二至六三頁

……如果指的是农村中一般的阶級斗爭，那末無产阶級所进行的阶級斗爭不仅仅是反对富农的。而無产阶級和全体农民之間的矛盾，——这难道不是阶級斗爭（虽然这种阶級斗爭具有很特殊的形式）嗎？無产阶級和农民現在是我們社会中的兩个基本阶級，在这兩个阶級之間存在着矛盾，固然，这种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并且終究是可以克服的，但这毕竟是引起这兩个阶級之間斗爭的矛盾，这难道不是事实嗎？

我認为，如果是城乡之間，無产阶級和农民之間的关系，則我国的阶級斗爭有三条主要的战綫：

（甲）整个無产阶級（以国家为代表）同农民之間在規定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最高价格，在使税收工作正常化等等方面的斗爭战綫；

（乙）整个無产阶級（以国家为代表）同富农之間在消灭农产品的

投机价格，在把税收负担的主要重心轉到富农身上等等方面的斗爭战綫；

（丙）貧农，首先是雇农同富农之間的斗爭战綫。

你們可以看出，这几条战綫無論在它們的比重上，或者在它們那里所發生的斗爭的性質上，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因此，我們对待这几条战綫上的几种阶級斗爭的态度，也应当是有区别的、不一样的。

……

……第一、在根本問題上，無产阶級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都願意国民經济的社会主义發展道路获得胜利。由此就产生了工人阶級和农民的联盟。第二、在当前問題上，工人阶級同农民的利益是有矛盾的。由此就产生了这个联盟內部的斗爭，这个斗爭，按其比重来說，是被利益的一致性掩蓋着的，这种斗爭在將来工人和农民不再是阶級的时候，即当他們都变成沒有阶級的社会的劳动者的时候，是必然会消失的。第三、我們拥有解决工人阶級同农民之間的矛盾的手段和方法，我們是在維护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范圍內根据兩个同盟者的利益来解决这些矛盾的。我們不仅拥有这些方法和手段，而且我們在新經济政策和資本主义暫时稳定的复杂情况下，已經卓有成效地使用了这些方法和手段。

由此能不能得出結論說，我們应当在这条战綫（編者按：指上述三条战綫中的第一条）上挑起阶級斗爭呢？不，不能。恰恰相反！由此只能得出結論說，我們应当竭力設法減弱这条战綫上的斗爭，用协商和互相讓步的方法来調节这一斗爭，并且無論如何不要把它导向尖銳化的形式，导向冲突。我們現在正这样做。因为我們有这样做的一切可能性。因为在这里利益的一致性比利益的矛盾更有力和更深刻。

可見，挑起阶級斗爭的口号，是完全不适合这条战綫上的斗爭情况的。

斯大林：“問題和答复”（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四四至一四五，一四七至一四八頁

……右傾机会主义者断定說，在我国制度內不存在工人阶級和农民之間发生分裂的基础，因此可以不必为制定对待农村各社会集团的正确政策操心，反正富农会長入社会主义，而工农联盟会所謂自流地得到保証。这种說法同样是不对的，愚蠢的。只有那些不了解党的政策（而且还是执政党的政策）是决定工农联盟命运的基本因素的人，才会这样說。列宁决沒有認为工人阶級和农民之間沒有分裂的危險。列宁說过，“在我国社会制度內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但是，“如果在这兩个阶級之間发生严重的阶級分歧，那末分裂將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列宁認为：

“我們中央委員会和中央监察委員会以及我們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留心注視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預防这种情况，因为我們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將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級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級的联盟呢，还是讓‘耐普曼’即新資产阶級把他們和工人拆开，使他們和工人分裂。”

可見工人阶級和农民之間的分裂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也决不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在我国制度內存在着防止这种分裂和巩固工人阶級和农民联盟的可能性。为了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現实，需要做些什么呢？为了把防止分裂的可能性变成現实，首先必須埋葬机会主义的自流論，必須挖掉資本主义的根，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并由限制富农剝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級的政策。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員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五至二九六頁

你的来信充滿了誤解。我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議上的报告中說的是“工业化的利益（即無产阶級的利益）和居民中劳动阶層的基本群众的利益趋于一致”。报告中說，我們的工业化方法，即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方法“不是使千百万群众貧穷化，而是改善他們的物質生

活狀況，不是使內部矛盾尖銳化，而是緩和并解决这些矛盾”。可見这里說的是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基本群众首先是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結合。可見这里說的是結合內部的矛盾。随着工业化的增長，即随着無产阶級在国內的力量和影响的增長，这种矛盾將日益緩和并順利解决。

这就是我在报告中所談到的。

可是你忘記了这一切，而談論無产阶級和富农之間的矛盾，即結合范圍以外的矛盾。在我們还沒有消灭富农阶級以前，这种矛盾是会日益增長并尖銳化的。

可見你把兩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了。你把無产阶級和劳动人民基本群众之間的矛盾同無产阶級和富农之間的矛盾混淆起来了。

斯大林：“給契·同志的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〇頁

斯大林論集体农莊內的矛盾

……空談阶級斗爭，叫嚷集体农庄內的阶級斗爭，是目前我們的一切“左的”空喊家的特征。在这种叫嚷中最可笑的是这些叫嚷者在沒有或几乎沒有阶級斗爭的地方“看見了”阶級斗爭，而在有阶級斗爭并且阶級斗爭很尖銳的地方却看不見阶級斗爭。

集体农庄內是否有阶級斗爭的因素呢？是的，是有的。既然集体农庄內还保存着个人主义心理甚至富农心理的殘余，既然集体农庄內还存在着物質生活狀況方面的某些不平等現象，那末集体农庄內就不能沒有阶級斗爭的因素。能不能說集体农庄內的阶級斗爭和集体农庄外的阶級斗爭是相同的呢？不，不能。我們的“左的”清談家的錯誤就在于他們看不見这个差别。

集体农庄外的，集体农庄成立以前的阶級斗爭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同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資料并用这些生产工具和生产資料盤剝貧农的富农进行斗爭。这个斗爭是生死存亡的斗爭。

而集体农庄基础上的阶級斗爭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就是說，富农已經被击溃并被剝夺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資料。其次，这就是說，貧农和中农已經在基本生产工具和生产資料公有化的基础上联合为集体农庄。最后，这就是說，这是集体农庄庄員之間的斗爭，他們中間一部分人还沒有摆脫个人主义殘余和富农思想殘余，企圖利用集体农庄內的某些不平等現象圖利营私，而另一部分人想把这些殘余和这些不平等現象从集体农庄中剷除掉。只有瞎子才看不見集体农庄基础上的阶級斗爭和集体农庄外的阶級斗爭之間的差别，这不是很明显嗎？

如果以为有了集体农庄，就有了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那就錯了。如果以为集体农庄庄員已經变成社会主义者，那就更錯了。不是的，要改造集体农民，克服他們的个人主义心理，使他們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还必須做很多工作。集体农庄机械化实現得愈快，集体农庄拖拉机化实現得愈快，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愈快。但是这絲毫沒有减弱集体农庄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杠杆的极大的意义。集体农庄的偉大意义，正在于它是农业中采用机器和拖拉机的主要基地，是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改造农民、改造农民心理的主要基地。列宁說得对：

“改造小农，改造他們的整个心理和习慣，是需要經过几代的事情。只有物質基础，只有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規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規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和小农有关的問題，才能使他們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四頁）

集体农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經济形式，只有通过它，千百万个体小农才能参加拥有机器和拖拉机的大經济，而机器和拖拉机是經济繁荣的杠杆，是农业按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杠杆，誰能否認这一点呢？

斯大林：“論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問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四四至一四六頁

斯大林論工人、农民、知識分子之間的差别和一致

目前苏联的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中間有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呢？無疑是有的。要千百万工人、农民在一切实际問題上和各种細节上的想法都一致是不可能的。在实际生活中沒有这样的事情。第一、工人和农民之間，無論按他們的經济地位或按他們对各种問題的看法来說，都有很大的差别。第二、就是工人阶級本身，在看法上也有某些差别，在教育、年龄、性格上也都有差别，血統工人和农村来的工人之間也有差别，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会在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中間引起不同意見的爭論，这种爭論会在会議上、工会中、合作社中、苏維埃选举时以及其他場合得到合法的表現。

但是，現在，在無产阶級專政条件下的不同意見的爭論和过去十月革命以前的不同意見的爭論是有根本差别的。在过去，工人和劳动农民中間的不同意見的爭論主要集中在推翻地主、沙皇制度、資产阶級的問題上，集中在摧毀資产阶級制度的問題上。現在，在無产阶級專政条件下，不同意見的爭論却不是圍繞着推翻苏維埃政权的問題，不是圍繞着摧毀苏維埃制度的問題，而是圍繞着改进苏維埃政权机关的問題，改进它們的工作的問題。这里是有根本差别的。

过去，圍繞着以革命手段摧毀現存制度問題的不同意見的爭論成了工人阶級和劳动农民群众內部出現几个互相竞爭的政党的根据，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些政党就是布尔什維克党、孟什維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另一方面，現在，在無产阶級專政时期，不同意見的爭論的目的已經不在于摧毀現存的苏維埃制度，而在于改进和巩固这种制度，所以这种爭論不会在工人和农村劳动群众中間造成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这也是很容易了解的。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談話"（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〇一至一〇二頁

斯大林論消滅城市和乡村間、腦力勞动和体力劳动間的差别問題

無疑的，在我国，随着資本主义和剝削制度的消灭，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而城市和乡村利益的对立、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事情也正是这样发生了的。……

……

……显然，随着資本主义和剝削制度的消灭，体力劳动和腦力劳动間利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它在我国現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也消失了。……

至于消灭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間、体力劳动和腦力劳动間的差别的問題，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質的問題。这个問題沒有被馬克思主义的經典著作家們提出来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踐所提出的新問題。

这个問題是不是臆造出来的呢？它对于我們有沒有什么实踐的或理論的意义呢？决不能把这个問題看作是臆造出来的。恰恰相反，它对于我們是极其重要的問題。

例如，如果拿农业和工业的差别来說，那末在我国，这种差别不仅归結为农业的劳动条件与工业的劳动条件不同，而首先和主要是归結为在工业中我們有生产資料和产品的全民所有制，而在农业中我們却有着不是全民的，而是集团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前面已經說过，这种情况引导到商品流通的保存，只有工业和农业間的这个差别消失时，商品生产及其一切后果才会随之消灭。因而，不能否認，农业和工业間的这个本質差别的消失，对于我們应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关于消灭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間本質差别的問題，也必須这样說。这个問題对于我們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开始展开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賽以前，我国工业的發展是进行得并不順当的，有許多同

志甚至提出了要降低工业發展速度的問題。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太低，远远落后于技术人員的水平。然而当社会主义竞賽在我国已具有群众性的时候，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正是在这以后，工业就以加快的速度向前迈进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竞賽具有了群众性呢？因为在工人中間有了整批整批的同志，他們不仅掌握了基本的技术知識，而且更前进了，与技术人員站在同一水平上，开始糾正技师和工程师的缺点，打破已經陈旧的現行定額，采用新的更加現代化的定額等等。假如不是少数工人，而是大多数工人都把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了工程技术人員的水平，結果会怎么样呢？那我国的工业就会提高到其他各国工业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因而，不能否認，用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到技术人員水平的办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腦力劳动間的本質差别，对于我們是不能不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二二至二五頁

斯大林論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个人和集体之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間是沒有而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調和的对立的。不应当有这种对立，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認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結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給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滿足。此外，社会主义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唯一牢固的保証。在这个意义下"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間是沒有不可調和的对立的。……

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談話"（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六頁

斯大林論領导和群众間的矛盾以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爭

最后談談第三种危險。

这种危險的特点是：不相信党的內部力量；不相信党的領导；国家机关力圖削弱党的領导，摆脫党的領导；不了解沒有党的領导就不可能有無产阶級專政。

这种危險是从三方面来的。

第一、需要領导的各个阶級已經發生变化。現在的工人和农民已經不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工人和农民。在以前，工人阶級是丧失阶級性的，是散漫的，而农民則是充滿恐惧的，他們唯恐国內战爭一旦失敗，地主又要回来，而且党在这个时期是按照軍事方式进行領导的唯一集中的力量。現在我們这里是另一种情况。战爭已經沒有了，因而使劳动群众集合在党的周圍的軍事危險也沒有了。無产阶級無論在文化方面或者在物質方面都已經复原并且提高了。农民也同样地提高和發展了。这兩个阶級的政治积极性正在增長并且会繼續增長。現在按照軍事方式进行領导已經不行了。第一、在領导中必須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第二、对工人和农民的要求和需要必須有特殊的敏感。第三、必須善于把由于工人和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增長而涌現出来的这兩个阶級当中的优秀人物吸收到党內来。但是大家知道，这些条件和品質不是立刻就能得到的。因此在向党提出的要求和目前党所具备的可能性之間产生了不相适应的情况。因此也就产生了削弱党的領导的危險和失去党的領导的危險。

第二、在最近时期，在經济發展时期，国家組織和社会团体的各个机关已經大大發展和巩固了。托拉斯、新迪加、貿易机关、信貸机关、行政政治机关、文化教育机关以及各种合作社等，都吸收了几十万新的人員，主要是非党人員，因而大大發展和扩大了。这些机关不仅自己的成員增多了，而且它們的力量和比重也增大了。而它們的

作用愈增大，它們对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們就愈頑强地力圖削弱党的領导，他們对党的反抗就愈猛烈。因此，在这些机关内部必須根据能够保証党在新环境中的領导这一点重新配置力量和配备領导人員。但是大家知道，要一下子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因此就产生了国家机关脫离党的危險。

第三、工作本身复杂化和多样化了。我指的是現在的建設工作。無論是农村的或是城市的許多工作部門和分部門都复杂化和發展了。因此，領导就更为具体了。从前通常都講"一般的"領导。現在"一般的"領导就是句空話，因为这句空話里并不包含什么領导內容。現在需要的是具体的和实际的領导。过去一个时期培养了一种自以为知識广博、准备解答一切理論問題和实踐問題的工作人員。現在这种旧型的自以为知識广博的工作人員，应当讓位給竭力要成为某一工作部門行家的新型工作人員了。要眞正地实行領导，就应当懂得业务，就应当認眞地、耐心地和頑强地鑽研业务。不懂得农业，不懂得合作社，不熟悉价格政策，不研究同农村有直接关系的法律，就不能在农村中进行領导。不懂得工业，不研究工人的生活，不傾听工人的要求和需要，不懂得合作社、工会和俱乐部工作，就不能在城市中进行領导。但是能不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切呢？很遺憾，不能。要把党的領导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首先需要提高党的工作人員的水平。現在应当把工作人員的質量放在第一位。但是要一下子提高党的工作人員的質量，并不那么容易。遺憾的是，那种不去熟悉业务而急于求成发号施令的旧习慣，依然存在于党的組織中。正因为如此，所謂党的領导有时就退化成一堆可笑的誰也不需要的命令，退化成不触及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空洞的和口头上的"領导"。这就是削弱和降低党的領导的最严重危險之一。

斯大林："問題和答复"（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四一至一四三頁

……如果先鋒队和本阶級間正确的相互关系被破坏了，如果党和本阶級間"相互信任"的关系被破坏了，那又怎么办呢？

如果党这样或那样使自己和本阶級对立起来，破坏了自己和本阶級間正确的相互关系的基础，破坏了"相互信任"的基础，那又怎么办呢？

这种情形一般說来是否可能呢？

是的，是可能的。

这种情形在以下的場合是可能的：

（一）如果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是建筑在它的工作和群众的信任上，而是建筑在它的"無限"权力上；

（二）如果党的政策显然不正确，而党又不願意重新审查并糾正自己的錯誤；

（三）如果党的政策一般是正确的，但群众还領会不了它的政策，而党又不願意或不善于等待一下，讓群众有机会根据本身經驗来确信党的政策的正确，却企圖强迫群众接受它的政策。

在我們党的历史上有过許多次这样的情形。我們党內各种集团和派别所以土崩瓦解和烟消云散，就在于它們犯了这三条中的一条，有时甚至这三条全犯了。

由此应該得出結論，只要在以下的場合，把無产阶級專政和党"專政"（領导）对立起来看，就不能認为是正确的：

（一）如果不把党对工人阶級的專政了解为这个名詞的本义的專政（"憑借暴力的政权"），而了解为党的領导，正如列宁所了解的那样，了解为决不容許对整个工人阶級、对工人阶級大多数使用暴力的那种領导；

（二）如果党有根据做本阶級的眞正領导者，就是說，如果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这个政策是符合本阶級利益的；

（三）如果本阶級，如果本阶級的多数都接受这种政策，領会这种政策，并由于党的工作而确信这种政策的正确，信任党和拥护党。

違背这三条就一定会引起党和本阶級的冲突，引起它們之間的

分裂，引起它們彼此間的对立。

斯大林："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七至四八頁

……还有一种情况推动我們去进行自我批評。我指的是群众和領袖的問題。最近我們这里領袖和群众之間开始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一方面，我們这里出現了、从历史上形成了一批威信越来越高的領导者，他們几乎成了群众所無法接近的人物。另一方面，一般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級群众，却上升得非常慢，他們开始瞇着眼睛从下面向上望領袖，并且往往怕批評自己的領袖。

当然，我們这里形成了一批上升得非常高并且有很高的威信的領导者，这个事实本身是我們党的巨大的成就。显然，沒有这样一批有威信的領导者，要領导一个大国是不可設想的。但是，領袖上升的时候逐漸离开群众，而群众开始从下面向上望他們，不敢批評他們，这个事实就不会不产生領袖脫离群众、群众离开領袖的某种危險。

这种危險会使領袖驕傲自大，認为自己十全十美。而領导上層驕傲自大，开始从上面向下看群众，这会有什么結果呢？显然，除了党遭到毀灭以外，什么結果也不会有。可是，我們要的是向前迈进，改进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毀灭党。正是为了前进并改善群众和領袖之間的关系，就应当时时刻刻敞开自我批評的大門，应当使苏維埃人有可能"責罵"自己的領袖，批評他們的錯誤，使領袖不会驕傲自大，而群众也不会离开領袖。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員会和中央监察委員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八至二九頁

……無論在我們的国家机关、合作社机关还是党的机关里都有官僚主义分子，这是沒有疑問的。必須和官僚主义分子作斗爭，只要我們这里还有国家政权存在，还有国家存在，这个任务就会始終摆在我們面前，这也是事实。

但是总要有个分寸。如果把反对我們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斗爭弄到毀灭国家机关的地步，弄到使国家机关威信扫地的地步，弄到企圖把它搞垮的地步，那就是違背列宁主义，那就是忘記我們的机关是苏維埃机关，是世界上现有一切国家机关中最高类型的国家机关。

我們国家机关的力量在哪里呢？就在于它通过苏維埃把政权和千百万工农群众联系起来。就在于苏維埃是供数十万工人和农民学习管理的学校。就在于国家机关不是和千百万人民群众隔絕，而是通过許許多多环繞着苏維埃并因而支持着政权机关的群众組織、各种委員会、各种团体、各种会議和代表大会等等来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我們国家机关的弱点在哪里呢？就在于它里面有破坏和歪曲国家机关工作的官僚主义分子。为了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在一兩年內是清除不了的——就必須有系統地改善国家机关，使它和群众接近，依靠新的忠于工人阶級事业的人材来革新它，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改造它，而不是把它搞垮；不是使它威信扫地。列宁說得非常对，他說："如果沒有'国家机关'，那我們早就灭亡了。如果不进行有系統的和頑强的斗爭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們就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沒有建成以前灭亡。"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員会的政治报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七三至二七四頁

……我們机关里的官僚主义是最大的障碍之一，甚至是最大的障碍。这里指的是我們党組織、国家組織、工会組織、合作社組織以及其他各种組織里有官僚主义分子。这里指的是靠我們的弱点和錯誤过日子的官僚主义分子，他們害怕群众的批評和群众的监督象害怕火一样，他們妨碍我們开展自我批評，妨碍我們克服我們的弱点和錯誤。决不能把我們組織里的官僚主义看做仅仅是拖拉作风和文牘

主义。官僚主义是資产阶級对我們組織的影响的表現。列宁說得对：

"……我們必須懂得同官僚主义作斗爭是絕对必要的，这种斗爭也象同小資产阶級自發势力作斗爭的任务一样复杂。官僚主义在我們国家机構中已經成为这样一种膿瘡，以致我們的党綱也提到它了，这是因为它和这种小資产阶級自發势力及其散漫性是有联系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六七頁)

如果我們眞正想开展自我批評并治愈我們建設事业中的膿瘡，那就应当更坚决地进行反对我們組織里的官僚主义的斗爭。

我們应当更坚决地發动千百万工农群众进行自下而上的批評，进行自下而上的監督，作为消除官僚主义的主要藥剂。

列宁說得对：

"如果我們要同官僚主义作斗爭，那我們就应当吸收下層群众来参加"……因为"除了吸收工人和农民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呢？"("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九八頁)

但是，为了"吸收"千百万群众，就必須在工人阶級的一切群众性組織里，首先在党內發揚無产阶級的民主。缺少这个条件，自我批評就等于零，就等于空談，就等于廢話。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評口号庸俗化"(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談表)，"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一五至一一六頁

哥达綱領批判(摘錄)

馬 克 思

对于德国工人党綱領的几点意見

(一)

1.“劳动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但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屬于社会一切成員。”

本条第一部分：“劳动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劳动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 自然界也如劳动一样是使用价值（而物質財富正是由各种使用价值所構成！）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現，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現。上面引用的那句話在一切兒童識字課本里都可碰到，但它只是由于它本身不言而喻地意味着劳动在具备有相当对象和工具的条件下进行，才是正确的。然而，这类資产阶級的說法，这类竟把唯一使其具有意义的那些条件隐默不提的說法，是社会主义的綱領所不应有的。既然一个人在事先就对一切劳动資料和劳动对象本源的自然界处于所有者地位，就把自然界当作隶屬于他的东西来处置，那末他的劳动就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就成为財富的源泉。資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說劳动具有超自然的創造力量，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約性中才产生出如下一种情况，即一个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沒有任何其他財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狀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物質条件的他人作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允許才能工作，也就是說，只有得

到他人允許才能生活。

但是不管这句話缺点如何，我們且把它放在一旁，不去管它。那末結論应是怎样呢？結論显然是应如下述：

“既然劳动是一切財富的源泉，所以社会中任何一个成員除非是占取劳动产物便不能占取財富。如果他自己不工作，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来生活，并且他自己的文化也是依靠别人的劳动来获得的。”

事实上却沒有这样說，而竟借助“但因为”几字在第一句后面添上第二句，以便从这第二句中，而不是从第一句中作出結論来。

本条第二部分：“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

据第一个原理所說，劳动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从而任何一个社会都非有劳动不可。而我們現在却看到，相反，任何一种“有益的”劳动都非有社会不可。

那末同样也可以說，只有在社会里，無益的或者甚至对社会有害的劳动才能成为一个工业部門，只有在社会里才可以过游閑生活等等，——簡言之，就是把全部盧梭著作抄写一遍。

然而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这只不过是能达到預期效果的劳动罢了。一个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复是猿类时就是蒙昧人）用石头击斃野獸，采集果实等等，就是进行“有益的”劳动。

第三。結論：“但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屬于社会一切成員。”

好一个結論！既然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就应屬于社会，而單个工人从这种所得中所获得的仅仅是不必用来維持劳动“条件”即社会的那一部分。

眞的，在一切时代中，每个現存社会制度的拥护者都曾提出过这个原理。首先是政府以及紧紧依附于它的一切方面的要求，——因为据說政府是維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哩；其次是各种私有財产方面的要求，因为据說各种私有財产是社会的基石等等哩。你們看，这

空洞辞句是可以随便东掉西换的。

本条第一和第二兩部分只有改成下述說法才能有些合乎情理的联系：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是說“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財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原理無疑是正确的，因为孤独的劳动（假定它所由以进行的那些物質条件是具备的）虽能創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創造財富，也不能創造文化。

但是另一原理也同样是無可爭辯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發展过程的發生，由于劳动日益成为財富和文化的源泉，因而劳动者方面的貧穷和困乏，不劳动者方面的財富和文化，也跟着發展起来”。

这是到現时为止的全部历史的法則。因此不应該講一些关于“劳动”或“社会”的普泛詞句，而应該清楚說明，怎样在現代資本主义社会中最終創造了物質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得工人能够剷除这个社会禍害，并迫使他們这样作。

实則这整个形式不妥和內容錯誤的条文夾杂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要把拉薩尔关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式作为第一个口号写在党的旗帜上。以后我还要回头談到“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等，因为同样的說法在下面又以稍有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現。

2.“在現代社会中，劳动資料为資本家阶級所壟断。由此所造成的工人阶級的从屬性是一切形式的貧困和奴役的原因。”

这个从第一国际規章中借用来的原理，經过这种“修改”后就变成很荒謬的了。

在現代社会中，劳动資料为土地所有者所壟断（地产的壟断甚至是資本壟断的基础）和資本家所壟断。無論是前一或后一壟断者阶級，第一国际規章在有关条文中都沒有提到。它談到的是“劳动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断”。“生活源泉”这一补充語充分表明，劳动資料也

包括土地。

其所以作了这种修改，是因为拉薩尔由于現在大家都已知道的理由仅仅攻击了資本家阶級，但却沒有攻击土地所有者。在英国，資本家大部分甚至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

3."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資料提高为整个社会的財产，并要求在公平分配劳动所得下集体調节全部劳动。"

"把劳动資料提高为整个社会的財产"，显然是說把它們"变为整个社会的財产"。但这不过是順便說一句而已。

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产品还是产品价值呢？而在后一場合，是产品的总价值抑或只是劳动加在消費掉的生产資料的价值上去的那部分价值呢？

"劳动所得"是拉薩尔为代替明确的經济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資产者不是断定說，現代的分配是"公平的"嗎？并且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現代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难道經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調节，而不是相反，不是由經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嗎？并且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不是抱有关于"公平的"分配的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嗎？

为了要知道"公平的分配"一語在这种場合是指什么东西，我們必須把第一条和本条对照一下。后者假定一个社会，里面"劳动資料是社会的財产并且全部劳动是由集体調节着"，而在第一条里我們則看到，"劳动所得应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屬于社会一切成員"。

"屬于社会一切成員"？甚至也屬于不劳动者嗎？那末"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何在呢？只是屬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員嗎？那末社会一切成員的"平等的权利"又何在呢？

但是"社会一切成員"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話。問題的实質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拉薩尔式

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們把"劳动所得"这个說法首先当作劳动产品的意思来看，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全部社会产品。

現在从它里面应該扣去：

第一，补偿消費掉的生产資料所需要的費用。

第二，用以扩大生产的附加部分。

第三，为預防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而用来保險的后备基金或保險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作出这些扣除乃是一种經济上的必要，而扣除多少，应当按照現有的資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按照或然論来确定，但無論如何不能根据公平原則来扣除。

剩下的是全部产品中的其他一部分，即作为消費品用的那一部分。

在把这个剩下的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从里面又得扣除：

第一，一般的不屬于生产的管理費用。

这一部分和它在現代社会中所占的数額比較起来，將会立即大大縮減，并將随着新社会的發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作为共同滿足需要的費用，如学校、保健机关等費用。

这一部分和它在現代社会中所占的数額比較起来，將会立即大大增加，并將随着新社会的發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为丧失劳动力者設立的基金等，簡言之，就是現在屬于所謂官方济貧的費用。

只有現在我們才談得上綱領中說到的——在拉薩尔的影响下仅仅如此偏狹地說到的——那种"分配"，就是說，才談得上在集体的个别生产者中間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費品。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經不知不覚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生产者私人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間接地用来为他这个社会成員謀福利。

也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語已經消失了那样，一般"劳动所

得”一語現在也在消失下去。

在一个根据集体主义原則組織起来而以共同占有生产資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換自己的产品；消費在产品生产上面的劳动，在这里也同样很少表現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即很少表現为它們所具有的某种物質特性，因为这时和資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劳动已不經迂迴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全部劳动的構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一由于意义含糊就是現在也不能接受的說法，便丧失了任何意义。

我們这里所說的不是已經在自身基础上發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剛剛从資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經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由脫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每一个别的生产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后，从社会中正好領回他所給与社会的一切。他所給与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股份。例如，社会的工作日就是一些个人工作小时的总和；每一个别生产者个人的工作时間就是社会的工作日里由他所供給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的工作日里占有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領得一張收据，証明他供給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憑这張收据又从社会儲备中領得与其劳动量相等的那么多的消費品。他以一种形态給与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态全部取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那个調节商品交換的原則，因为商品交換是同等价值的交換。內容和形式在这里都改变了，因为在变更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誰都沒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供給，另一方面，也因为除了个人的消費品之外，再沒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財产。但是，說到消費品在各个生产者中間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着在商品等价物的交換里也通行的那个原則，即一种形态的一定数量的劳动可以与另一种形态的同量劳动交換。

所以，这里平等的权利在原則上仍然是資产阶級式的法权，虽然原則和实踐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但在商品交換中，等价物的交換則只是平均地存在着，而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場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有一方面还仍然受資产阶級范圍的限制。生产者們的权利是与他們供給的劳动成正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平等的尺度——劳动——来計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間內貢献的劳动量較多，或者能够工作的时間較長；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应当按照时間長度和劳动强度来确定，不然劳动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个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是个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認任何的阶級差别，因为每个人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都只不过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認不同等的个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种天然特权。所以根据其內容来講，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根据它的性質来講，只有在使用平等的尺度时才能存在；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只有在下述場合才能用同一的尺度去計量，即以同一的观点来看待他們，从一个确定的方面去对待他們，譬如就像在上述場合一样，把他們只当做工人看，在他們身上再也看不出别的什么，撇开其他一切东西不說。其次，一个工人已經結婚了，另外一个則沒有；一个工人的兒女較多，另一个工人的兒女較少等等。在同等的劳动下，亦即在同等享受社会消費品存額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在实际上所領得的比另一个人多些，某一个人就会比另一个人富些等等。为要避免这一切，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在它經过長久的产育苦痛以后剛剛从資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經济制度以及由此經济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發展程度。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級阶段上，当那奴役人們、迫使其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后；当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已随之消失后；当劳动已經不單單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为乐生的第一要素时；当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在各方面的發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財富泉

源都尽量涌现出来时，——只有那时，才可把資产阶級式的法权的狹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会就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較为詳細地一方面談到了"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談到了"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是为了要指出：人們一方面企圖重新强迫我們党接受那在过去曾有一些意思，但現在已变成陈詞濫調的見解作为教条，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慣用的思想上的、法学上的以及其他的謊言，来歪曲那曾化費很大力量才灌輸給党，但現在已在党內札了根的現实主义观点，——人們这样做是犯了多么大的罪惡呵。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謂分配看作是事物的本質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

消費品的任何一种分配，始終只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后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則表現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以資本私有制和土地私有制为其形式的物質的生产条件，掌握在不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則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也就要自然而然产生出現代的消費品分配。如果物質的生产条件將是工人自己的集体財产，那么結果也就要产生出跟現代不同的消費品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而由于它，某部分民主主义亦然）从資产阶級經济学家們那兒学了一套手法，即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种不依賴生产方式的东西，而由此把問題描述成这样：仿佛社会主义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打圈子。但是眞正的关系既然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車呢？

4."劳动的解放应該是工人阶級的事情，对于工人阶級，一切其他阶級只組成为反动的一帮"。

前半句是从国际規章导言中摘取来的，但是加过"修改"了。那里写道："工人阶級的解放应該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里却反而說

"工人阶級"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誰能了解,就讓他去了解吧。

但是,仿佛是作为一种补償,接着就来了一个轉句,即十足的拉薩尔原句:"对于工人阶級,一切其他阶級只組成为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現时与資产阶級对立的一切阶級中,只有無产阶級才是眞正革命的阶級。其余一切阶級都随着大工业的發展而趋于衰落和灭亡,無产阶級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㊀

这里,資产阶級作为大工业的体現者,对于力求保持陈旧生产方式所創造的一切社会陣地的那些封建主和中等等級說来,是被当作革命阶級看待的。所以他們并不是和資产阶級一起只組成为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無产阶級对于資产阶級是革命的,因为它本身既已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長起来,就力求使生产摆脫資产阶級想要永远保存的資本主义性質。但是,"宣言"同时补充說,"中等等級"是"因为他們行將落入無产阶級的队伍"而变成革命阶級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說什么对于工人阶級說来,中等等級和資产阶級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組成为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謬的。

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中有人曾向手工业者、小工业主等等以及农民們宣布說:"对于我們說来,你們和資产者以及封建主一起只組成为反动的一帮"嗎?

拉薩尔熟知"共产党宣言",犹如他的虔誠信徒熟知他編写的聖經一样。而他这样粗魯地歪曲"宣言",不过是要为他跟那些專制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敌人們建立的反資产阶級联盟作辯护罢了。

此外,絕頂聰明的拉薩尔格言完全是被勉强加到上述条文中去,而与这一句从国际規章中摘来加以荒謬"修正了的"引語毫不相干的。这純粹是一种無耻的狂妄做法,这种做法当然絕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是柏林的馬拉㊁所專門从事的廉价的無耻行徑

㊀ 見本書第一三〇二頁。——本書編者注

之一种。

5."工人阶級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現代民族国家的范圍內进行活动，同时意識到，各民族的国际友誼团結，將是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度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意向的必然結果。"

跟"共产党宣言"以及所有先前社会主义相反，拉薩尔以最狹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有人在这方面还仿效他，而这是在国际的活动之后哩！

当然，工人阶級为了一般能够斗爭起見，必須在自己国度內組成为一个阶級，而它直接的斗爭舞台就是它自己的国度。所以，它的阶級斗爭不是在內容上，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說"在形式上"是民族的。但是，"現代民族国家的范圍"——以德意志帝国为例——本身在經济上是处在世界市場"范圍內"，而在政治上是处在国家体系"范圍內"。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貿易同时就是对外貿易，而俾斯麦先生的偉大恰好就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結于什么呢？归結于意識到"各民族的国际友誼团結"將是它的意向的結果。从資产阶級的和平自由同盟㊁那里借用来的这句話，应該充当一个等价物，以替代各国工人阶級在它們反对各国統治阶級及其政府的共同斗爭中的国际友誼团結。于是，关于德国工人阶級的国际任务就只字不提！这就是建議工人阶級用来跟本国資产阶級（它早已和其他一切国家的資产阶級亲密团結起来反对工人阶級了）和俾斯麦先生国际阴謀政策相对立的一切！

其实，这个綱領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貿易党的国际主义还要遜色得难以估量。自由貿易党也主張說，"各民族的国际友誼团結"

㊁ 馬克思在这里大概是把拉薩尔派中央机关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krat»）总編輯哈塞尔曼譏諷地称作柏林的馬拉。——編者注

㊂ 国际和平自由同盟是一八六七年在日內瓦成立的資产阶級民主派及和平主义者的組織。第一国际在馬克思的坚持和領导下进行了坚决的斗爭，来反对該同盟提出的使無产阶級离开阶級斗爭的蠱惑口号。——編者注

將是它的意向的結果。但是它还做一些事使貿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滿足于一切民族都在自己国家內从事貿易的意識。

各国工人阶級的国际活动絕对不依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要为这种活动創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試，这种尝試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已留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成績，但在巴黎公社失敗之后，已不能在其第一个历史形态上繼續实行了。

俾斯麦的"北德意志报"，为了取悅于自己的主人，有充分权利宣揚說，德国工人党在它新的綱領內已放棄了国际主义㊀。

(二)

"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則出發，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爭取自由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廢除工資制度連同其鉄的法則和任何形态的剝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关于"自由的"国家，我后面再講。

这样一来，德国工人党今后就应当相信拉薩尔的"鉄的法則"了！为了不至于把它失掉，竟胡言乱語，而說什么"廢除工資制度（应当說：雇佣劳动制度）連同其鉄的法則"。如果我廢除雇佣劳动，那末自然，我也廢除它的法則，不管这些法則是"鉄的"或者像海綿一样是軟的。但拉薩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爭，却几乎完全是繞着这个所謂法則打圈子。所以，为要証明拉薩尔派已获得胜利，"工資制度"应当"連同其鉄的法則"一并被消灭掉，而不是不連后者。

大家知道，在"工資的鉄的法則"里面，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鉄的，偉大的法則"中借用来的"鉄的"这个詞以外，任何东西都不屬于

㊀ 馬克思指的是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日第六十七期"北德意志普通日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上登載的社論。該文在談到社会民主党綱領第五条时指出，"社会民主的鼓动在許多方面更加謹慎起来"，并且它在"拋棄国际"。——編者注

拉薩尔。"鉄的"这个詞是虔誠的信徒們借以相互認識的一个标記。但是如果我接受那帶有拉薩尔戳記因而是拉薩尔意义的法則，那末我也不得不接受該法則的拉薩尔論据。这个論据是什么呢？正如關格在拉薩尔死后不久就已証明的那样，这就是(關格亲自宣傳的)馬尔薩斯的人口論。但是，倘若这个理論是正确的，那末，我甚至一百次廢除雇佣劳动，也無論如何不能廢除"鉄的法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法則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經济学家們恰好是依据这个理論，五十多年来一直証明說，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貧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平均分布于整个社会面上！

然而，这一切还不是最主要的。且完全不說拉薩尔对这个法則的錯誤了解，而下述情况总是一种眞正可惡的退步。

自从拉薩尔死后，在我們党內，如下一种科学見解已給自己开辟了道路，即認为工資不是它表面上呈現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劳动的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力的价格——的掩蔽形态。这样一下子就把对于工資的資产阶級見解以及先前用以反对这种見解的全部批評都徹底推翻，并且明白确定出：雇佣工人只是由于替資本家們(因而也替他們那些剩余价值的分享者們)白白地工作一定时間，人家才允許他为維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換言之，才允許他生活；整个資本主义生产体系繞着环轉的軸心，就是用延長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从而用使劳动力更加紧張的办法等，力求增加这个無償劳动；因此，不論工人劳动的报酬是較好或是較坏，雇佣劳动制度都是个奴隶制度，而且是个社会劳动生产力越發展就越加殘酷的奴隶制度。而現在，当这个見解已在我們党內日益給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却竟有人倒退到拉薩尔的教条那里去，虽則現在人們已該知道，拉薩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資，而是追随着資产阶級經济学者把外表当作事物本質哩。

这正好像是当奴隶們最終發現了自己处于奴隶地位的秘密而举行了起义时，其中有一个还完全受陈旧观点束縛的奴隶竟要在起义

的綱領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須廢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給养不能提高得超过一定的、非常低的最大限度！

我們党的代表們对那广布在党員群众中的見解竟能进行这样惊人的侵犯，單只这一事实不是就証明他們在着手草拟妥协綱領时犯了多么輕率的罪过，多么不顧廉耻嗎！

本条末尾所謂"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語句，应該改成：随着阶級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会自行消失。

（三）

"为了开辟解决社会問題的途徑，德国工人党要求設立依靠国家帮助并受劳动人民民主监督的生产协作社。無論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协作社都必須大規模地成立起来，以便能从这中間产生出全部劳动的社会主义組織。"

繼拉薩尔的"工資的鉄的法則"之后，接着还有这同一个預言者开的万灵藥方。这里"途徑开辟"得确实不錯。代替現有的阶級斗爭，換上了拙劣报刊作家关于"开辟途徑"来"解决"的"社会問題"的空話。"全部劳动的社会主义組織"不是从社会的革命改造的过程中，却是从給生产协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而这些生产协作社又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成立起来"的。仿佛靠国家补助金就能像建設一条新鉄路那样容易建設一个新社会，这眞不愧为拉薩尔的幻想。

由于还有点羞耻，于是就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

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由农民而不是由無产者組成的。

第二，"民主的"这个字眼在德文里意思是"人民有权的"（«volksherrschaftlich»）。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有权的监督呢"？何况所

說的劳动人民又是些向国家提出这类要求，因而完全承認他們既沒有掌握政权，也沒有成熟到能掌握政权的劳动人民！

在这里詳細批評毕舍在路易—菲力普执政时为了与法国社会主义者相对立而开的藥方，由"作坊"㊀方面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藥方，那是多余的。主要的不幸并不在于把这个特殊的万灵藥方写入了綱領，而是在于根本从阶級运动的观点退向宗派运动的观点。

如果工人們力求在整个社会的范圍中，首先是在自己民族的范圍中建立集体生产的条件，这也只是表明，他們在为爭取現在的生产条件的变革而斗爭，而这与設立靠国家帮助的合作社一举，毫無相同之处。至于現存的合作社，那末它們之所以可貴，仅仅是因为它們是工人自己独立創設的，既不受政府的保护，也不受資产阶級的保护。

（四）

現在我們来談民主的一节。

（甲）"国家的自由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說法，德国工人党得爭取"自由的国家"。

自由的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經摆脫狹隘忠順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里，"国家"差不多是和俄国一样"自由的"。自由就是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并且在目前，各种国家形式的較为自由或較为不自由，是要看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而定。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如果它接受这个綱領的話——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領会得多么膚淺；它不把現有的社会（对于任何未来的社会亦然）当作是現有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作是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看作是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以及自

㊀ "作坊"（«Atelier»）是工人的月刊，于一八四〇至一八五〇年在巴黎出版，受畢舍的天主教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編者注

由的基础"的一种独立本質。

而且在綱領中还粗笨地濫用了"現代的国家"和"現代的社会"等字眼，甚至更粗笨地誤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現代的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資本主义社会，它是多少免除了中世紀杂質，依每一國度历史發展的特点而形态多少有所不同，多少發展了的。反之，"現代的国家"却是依每一国度的情况而变更的。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国与在瑞士完全不同；它在英国与在美国也完全不一样。所以，"現代的国家"乃是一种虛構。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里各个不同的国家尽管其形式如何紛繁复杂，但有一个彼此共同之点：它們都是建筑在資本主义多少已經發展了的現代資产阶級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們具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說到"現代的国家制度"，以与其現在的根基即資产阶級社会死亡时的那个未来相对立。

其次还有这样一个問題：国家制度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將遭到怎样的变化？換句話說：那时，还有哪些与現代国家职能类似的社会职能仍然会保存？这个問題只能用科学方法来答复；不然，無論你千百次地把"人民"与"国家"这兩个名詞联接起来，也是絲毫不会对这个問題的解决有所帮助的。

在資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則只能是無产阶級的革命專政。

但是，这个綱領既沒論到这个無产阶級的革命專政，也沒論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綱領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廢話：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軍等等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內容。这純粹是資产阶級的人民党及和平自由同盟的反响。所有这一切要求凡不屬于空想的，都已經实現了。不过实現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內，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的国家"就是現代的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圍"以外。

但是他們却忘記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現代的民族国家的"范圍內，就是說在自己国家即普魯士—德意志帝国的范圍內进行活动，——否則，它的許多要求也就大部分無意义了，因为人們所要求的仅是所沒有的东西——那末，它就不应該忘記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說这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認所謂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們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內才是适宜的。

既然人們已經沒有勇气要求民主共和国，如像法国工人綱領在路易—菲力普和路易—拿破崙执政时作过的那样——而这是合理的，因为情势要求謹慎小心，——那末就不当該采用这个既不"誠实的"㊀也不相称的遁辭：居然向一个仅仅是蒙着国会外衣，与封建附屬物混在一起，已經受到資产阶級影响，按官僚方式組成，以警察来保衛的軍事專制的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面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庄严地向这个国家保証，說是想要用"合法的手段"爭得这类东西！

甚至那庸俗的民主派——他們是把民主共和国看作世上天堂，并且完全沒有想到正是在資产阶級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面，阶級斗爭要徹底以武力解决的——甚至那庸俗的民主派也都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許可而为邏輯所不容許的范圍內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哩。

至于，"国家"在事实上是被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是被了解为由于分工关系具有其离社会分立的独特机構的国家，那是可由下面的話来充分証明的："德国工人党要求以統一累进所得税"等等"作为国家的經济基础"。賦税是政府机器的經济基础，而不是什么其他东西的經济基础。在瑞士現存的"未来的国家"里，这种要求已經差不多实現了。所得税是以有各个不同社会阶級的各种收入来源为前提，亦即以資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拥护財政改革的人們——以格拉斯頓的兄弟为首的資产者們——也在提出我們所考查的这个綱領

㊀ 愛森納赫派被称作"誠实的"人。这里馬克思是在使用双关語。——編者注

所提出的那些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

（乙）“德国工人党要求下列各项作为国家精神和道德的基础：

1.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人人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义务就学。实施免費教育。”

对人人都平等的国民教育嗎？究竟是怎样理解这句話的呢？是不是設想在現代的社会里（而所談到的只是現代的社会），教育对于一切阶級都可能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上等阶級也被强迫降到低微的教育水平——国民小学——即降到唯一不仅相当于雇佣工人經济地位，而且相当于农民經济地位的教育水平呢？

“实施义务就学。实施免費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在国民小学方面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說在北美几个州里，高等学校的教育也是“免費的”，那末事实上这不过是上層阶級从总税收中支付了他們的教育經費而已。我們順便指出，（甲）項第五条所要求的“免費訴訟”也是如此。刑事訴訟到处都是免費的；而民事訴訟几乎單只审理財产糾紛案件，因而几乎單只涉及有产阶級的。那末，难道要建議它們用人民的金錢来打官司嗎？

关于学校的那一条，至少应該要求与国民小学一起还有技术專科学校（理論的和实习的）。

“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經費、教育人員的資格、学习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家监察員来监督这些法律規定的实施，这完全不同于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相反，应該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对于学校不起任何影响。相反，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国內（那个談到“未来的国家”的空洞遁辞在这里也無济于事，——我們已經看到在这方面是怎样一回事了），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

然而整个綱領，尽管滿是民主的喧囂，却全部浸透了拉薩尔派的对于国家的忠順信仰，或者說全部浸透了一点也不比前者好的对于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更正确点說，它是这兩种同样与社会主义背离的对于奇迹的信仰的一个妥协。

"科学自由"——普魯士宪法中有一条这样写道。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为文化而斗爭"㊀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回想起他們的旧口号，那末只有以下述形式才能作到这点："每一个人都应該有可能实現自己的信教需要，也像他实現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要警察来干涉"。但是工人党本应該乘此机会說出自己的主張，即資产阶級的"信仰自由"不外是对所有各种宗教信仰自由表示容忍，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麻醉中解放出来。然而我們这里一般人却竟不願越过"資产阶級的"水平。

現在我就要結束了，因为綱領里面的下述补充不是它主要的部分。所以我在这里只限于作些簡短的批評意見。

2."正常工作日。"

無論在其他哪一个国家，工人党都沒有局限于这种模糊要求，而总是要确切指出，它在当前条件下把多么長的工作日認作是正常的。

3."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童工。"

規定工作日的标准本来应該包括限制妇女劳动，因为它涉及工作日的多長和休息多久等問題；此外，它只能意味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妇女有伤风化的生产部門中禁止妇女劳动而已。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末也就应該这样說。

"禁止童工"。此地絕对必須指明年龄限度。

完全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誠願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是可能的話——就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調节工作时間的条件下，在其他保护兒童的預防措施之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㊀ "为文化而斗爭"（«Kulturkampf»）是俾斯麦于一八七〇年代通过用警察迫害天主教的方法所进行的反对德国天主教党即"中央"党的斗爭。——編者注

4."对工厂工业、手工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在指的是普鲁士—德意志国家时，应該明确地要求，工厂监察員必須經过法庭审判来撤职；每个工人都能够向法庭告發监察員違犯职守的行为；监察員的职务必須只由受过医学教育的人来担任。

5."調整监獄劳动。"

在一个一般的工人綱領里面，这是一种細节性的要求。無論如何应該明白說出，工人們完全不願意因自己害怕竞爭而使国家对待刑事犯人像对待牲畜一样，特别是不願意使他們失掉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这是可以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

6."有效的責任法。"

应該說明，"有效的"責任法是指什么东西。

我順便指出，在关于正常工作日的一条中，忘却了工厂立法中关于衛生設施和預防不幸事故措施等等那一部分。責任法只有当这些規定遭到破坏时，才会發生效力。

总之，这点补充也是写得同样草率的。

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㊀。

由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五月初写就。

初次由恩格斯刊載（有刪节）在一八九一年"新时代"杂志上。

按手稿刊印。原本系德文。

（摘自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第一六至三五頁）

㊀ 意即"我講了，我就拯救了我的灵魂"。——編者注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的信

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倫敦。

……根据唯物史观，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現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無論我或馬克思从来都不过是如此断定而已。倘若有人把这个原理加以歪曲，說仿佛經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断語变成毫無意思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济狀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爭进程發生影响，并且在許多場合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爭形式的，也还有上層建筑的各种因素，如阶級斗爭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爭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級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至所有这一切实际战斗在参加者头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論，宗教的观点以及它們进一步發展为教义体系。这里表現出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經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透过無穷無尽的偶然情况向前进展（这些偶然情况就是指的这样一些事物，它們的內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判别，以致我們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認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的）。否則把理論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演算一个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为容易了。

我們自己創造着我們的历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創造这个历史的。在这些前提和条件中，經济的归根到底是有决定作用的。但是政治条件等等，甚至那些存在于人們头腦中的傳統，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的作用。普魯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和归根到底是經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發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迂儒才会断言說，在北德意志的許多小国中，正是勃蘭登堡被注定成为一个体現了北部和南部彼此間的經济差異、語言

差異，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現了宗教差異的强国，并且这恰好只是由經济的必然性所注定的，而其他的因素并沒有同时發生影响（在这里首先起过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即勃蘭登堡由于握有普魯士而不得不卷入波蘭事件，并因此而卷入国际政治关系，后者在形成奥地利王室威力时也曾起过决定的作用）。恐怕只有鬧笑話的人，才能从經济上說明每个小德意志国家过去和現在的存在，或者从經济上說明那种把从苏台至薩烏努斯間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貫穿全德意志的眞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口音的起源吧。

第二，历史是这样創造的，即最后的結果始終是由許多个别意志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的形成，又是由于有許多特殊生活条件的結果。这样，就有着無数的錯綜交叉力量，有着無限止的一讒力量的平行四边形，并由这一錯綜交叉情况中产生出一个总的結果，即历史事变。这个历史結果又可以看做是由一个力量作为整体不自覚和無意中發生作用的产物。要知道，一个人所願望的事物是要遭到任何一个人阻碍的，而最后結果就会出現誰都沒有希望过的事物。这样，历史，像它过去經过的那样，总是犹如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样进行的，并且实質上是服从于同样的运动規律的。但是，根据下面这一件事实，即虽然各个人的意志都希望有由他們的体質以及外部的、終归是經济的情况（或是各人自己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情况）引誘他們向往的东西，但这些意志却不能达到它們所希望的东西，而是融合为一种中間的东西，融合为一个总的合成力，——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結論說这些意志是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是参加于合成力的，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成力里面的。

其次，我請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論，而不要隔一道手，——这实在要容易得多呵。馬克思所写的文章，沒有一篇里面不是由这个理論起了作用的。尤以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書是运用这个理論的光輝范例，資本論中同样也有許多指示也是如此。其次，我当然可以指出拙著“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举行的变革”和“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我在这兩部書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

知是目前最为詳尽的闡述。

青年們有时过份看重經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自己应負其咎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調那些受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并且不是始終都能有充分时間、地点和机会来把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因素也加以应有的重視。但是，只要問題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則情况就有改变了，这里就不容有任何錯誤了。可惜人們往往以为，只要基本原理已被領会，并且还不一定領会得正确，就算已經充分理解了新理論并且已能够把它加以运用了。在这方面，我可以責备許多最新的"馬克思主义者"；須知，由于这点也曾产生出惊人的混乱……

（按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排印）

恩格斯致亨·施塔尔肯堡的信

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倫敦。

施塔尔肯堡先生：

現在我回答您的問題。

(一)我們所視为是社会历史决定性基础的經济关系，就是指一定社会中的人們用以生产生活資料和彼此交換产品（就存在有分工而言)的方式說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有生产和运輸的全部技术裝备。这种技术裝备，照我們的观点看来，同时也决定着交換以及产品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級的划分，从而决定着統治和从屬的关系，从而决定着国家、政治、法权等等。在經济关系概念里，其次包括有这些关系所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础，并且有事实上由各先前經济發展阶段遺傳下来的殘余（这些殘余往往只是由于傳統和惰力才繼續保存下来)，以及当然还有圍繞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如果說，像您所断言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科学狀况，那末科学狀况却就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依賴于技术的狀况和需要了。社会方面一旦發生了技术上的需要，則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数个大学更加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液体力学(如托里采利等)是由于十六和十七世紀調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所引起的。关于电气，只有从电气在技术上可用的性能已被發現时起，我們才知道一些合理的东西。在德国方面，可惜人們写科学史时已慣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了。

(二)我們認为，經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約着历史的發展。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經济因素。不过这里不应忘記兩点：

(甲)政治、法权、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發展是以經济發展

为基础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經济基础。实际上并不是只有經济狀况才是积极的原因，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結果。不，这里始終是由在經济必然性基础上發生的交互作用归根到底为自己开拓道路。例如，国家就是借助于保护关税、自由貿易、好的或者坏的財政制度發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市儈們那种致命的疲惫性和軟弱性——导源于一六四八至一八三〇年时期德国經济可憐狀况，最初表現于神秘虔信情緒，尔后表現于多情善感和对諸侯貴族表示奴顏婢膝的根性——也不是沒有对經济起过作用的。这对于重新振兴曾是一大障碍，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有革命战爭和拿破侖战爭使得慢性穷困尖銳化才被克服的。所以，并沒有什么經济狀况自动發生的作用，像某些人为着簡便起見而設想的那样，而是人們自己創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們是在他們受其制約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現实关系基础上創造着的，在这些現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經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而經济条件归根到底終究是有决定意义的，是構成为一个鮮明綫索以貫串于全部發展进程并唯一令人能理解到这个發展进程的。

（乙）人們自己創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他們至今創造这个历史，甚至在某个一定有限社会范圍內，也沒有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意志，沒有按照一个共同的計划来动作过。他們的意向是錯綜交叉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占着統治地位。这里透过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經济的必然性。这里我們就要談到所謂偉大人物問題。恰巧某个偉大人物在一定时間出現于某一国家，这一情况完全是种偶然性。但是，如果我們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替代他，并且这个替代者是会出現的，——也許是較好些或較差些，但經过一些时間总是会出現的。恰巧拿破侖这个科西嘉島人做了那被战爭弄得疲竭的法蘭西共和国所需要的軍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性。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侖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充当的。这点可由如下一点来証明，即每当需要有这

样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出現这样一个人：愷撒、奧古斯特、克倫威尔等等就是如此。如果說唯物史观是由馬克思把它發現了，那末梯也里、民耶、基佐以及一八五〇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等，便是証明有許多人都已在力求达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發現就是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經成熟了，而这一發現是必定要被作出来的了。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貌似的偶然性，都是如此。我們所研究的部門离开經济部門越远，它越是接近于純粹抽象思想部門，我們在它的發展进程中就看到越多的偶然性，它的曲綫就越加是曲折的。如果您画出曲綫的中軸綫，您就会發覚到，研究的时期越長，研究的范圍越广，它的軸綫就越接近經济發展的軸綫，它就越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在德国方面，对于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出版物中对于經济史的不可原諒的忽視。不仅很难于抛掉那种在学校里已被灌輸的关于历史發展的观念，而且更难于搜集为此所必要的材料。例如，居里赫㊀老先生那部枯燥材料彙集中所刊載的許多对于說明問題很有价值的政治事实材料，是否有人閱覽过呢？

一般說来，我認为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書中所作出的光輝范例，定能对您所提各問題給予您一个頗为完整的回答，因为那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大多数問題，我以为在"反杜林論"一書第一編第九至第十一章、第二編第二至第四章以及第三編第一章或导言里，此外在"費尔巴哈"一書最后一章里，都已談到过了。

請您不要吹毛求疵地对待上面这篇文字中的每一字句，而要始終注意到总的联系；可惜我沒有时間能像給报刊写文章那样很清晰而明确地給您把这一切說明出来……

（按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排印）

㊀ 恩格斯指的是居里赫著的数卷作品"現代各主要商业国的貿易、工业和农业的历史描繪"，一八三〇至一八四五年在耶拿出版。——編者注

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

(閱讀第二部分)

(見本書第一三九五至一四〇二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刘　少　奇

二　社会主义改造

（見本書第九〇六至九一七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
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刘　少　奇

（閱讀第二部分）

（見本書第四五四至四六五頁）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書
編者按語一則

“發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的按語

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問題。在合作化以后，許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發动过去不参加田間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綫上去。这是出于許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們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剩。原来已經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許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踐，打破了人們的这种顧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沒有扩大生产規模，还沒有进行多种經营，耕作也还沒有精致化的緣故。对于很多地方說来，生产的規模大了，經营的部門多了，劳动的范圍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張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現在还只是在开始，將来会一年一年地發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將是这样。將来会出現从来沒有被人們設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現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換事业的發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設想的。科学、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业也是如此。中国的妇女是一种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发掘这种資源，为了建設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發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須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則。浙江建德县的經驗，一切合作社都可以采用。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一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六七四至六七五頁）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人民公社是形势發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綜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經出現，而且已經在若干地方普遍發展起来，有的地方發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圍內出現一个發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擋之势。人民公社發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躍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覚悟。在經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上战胜了資本主义道路之后，發展了空前規模的农田基本建設，創造了可以基本上免除水旱灾害、使农业生产比較稳定發展的新的基础；在克服右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規之后，出現了农业生产飞躍發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長，更加促进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大規模的农田基本建設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綫上轉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現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在农田基本建設和爭取丰收的斗爭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組織軍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覚悟；公共食堂、幼兒园、托兒所、縫衣組、理髮室、公共浴堂、幸福院、农业中学、紅專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鍛煉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都說明几十戶、几百戶的單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

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設，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須采取的基本方針。

二、社的組織規模，就目前說，一般以一乡一社、兩千戶左右較为合适。某些乡界辽闊、人烟稀少的地方，可以少于兩千戶，一乡数社。有的地方根据自然地形条件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也可以由数乡并为一乡，組成一社，六、七千戶左右。至于达到万戶或兩万戶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但在目前也不要主动提倡。

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單位組成联社。現在就应該对人民公社的分布，以县为單位进行規划，作合理的布局。

社的規模扩大以后，由于农林牧副漁、工农商学兵綜合性的发展，社的管理机構也必須有适当的分工，要在組織精干和干部不脫离生产的原則下，建立若干分工負責的部門。并且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員会就是社务委員会。

三、小社并大、轉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驟。小社并大，轉为人民公社，是当前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貧农、下中农是坚决拥护的，大部分上中农也是贊成的；我們要依靠貧农、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鳴放辯論，团結大部分贊成并大社、轉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搖，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謠破坏，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覚自願的基础上并大社、轉公社，防止强迫命令。在步驟上，并大社，轉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兩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試点，然后逐步推广。

并大社，轉公社必須与当前生产密切結合，不仅不能影响当前的生产，而且要使这个运动成为推动生产更大躍进的一个巨大力量。为此，在并社初期可以采取"上动下不动"的方法，首先由原来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員会，搭起架子，統一規划部署工作，把原来的各小社改为耕作区或者生产队，原来的一套生产組織和管理制度暫时不变，照常經营，一切应該合并調整的东西和合并中应該解决的具体問題，以后再逐步合并、逐步清理、逐步解决，以保証生产不受影响。

社規模的大小，并大社，轉公社进度的快慢，以及做法和步驟，都

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轄市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决定。但是，無論在秋前秋后或者今冬明春合并，都应該从現在起，就把准备合并的一些小社串連起来，共同商量，統一規划秋后的农田基本建設，統一安排为爭取明年更大丰收的各項准备工作。

四、并社中的若干經济政策問題。在并社过程中，应該加强教育，防止少数社发展本位主义，在合并前不留或少留公共积累，分多分空。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須了解，由于各个农业社的基础不同，若干社合并成一个大社，他們的公共財产，社內和社外的債务等等，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在并社过程中，应該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認这种差别，不要采取算細賬、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計較小事。

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問題，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規定。一般說，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經营，零星果树暫时仍归私有，过些时候再处理，股份基金等可以再拖一、二年，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人們覚悟的提高，自然地变为公有。

五、关于社的名称、所有制和分配制的問題：

大社統一定名为人民公社，不必搞成国营农場，农場就不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煩。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經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將在不断发展中繼續增長，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时間。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質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經过多少年，社会产品积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覚悟和道德品質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

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遺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資产阶級法权的殘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將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要从具体条件出发，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資制；在条件还不成熟的地方，也可以暫时仍然采用原有的三包一奖或者以产定工制等等按劳动日計酬的制度，条件成熟以后再加以改变。

人民公社虽然所有制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分配制度無論工資制或者按劳动日計酬，也还都是"按劳取酬"，并不是"各取所需"，但是人民公社將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它將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層單位。

六、現階段我們的任务是建設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而建設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現，已經不是什么遙远將来的事情了，我們应該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徑。

（原載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

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紅旗"雜志一九五八年第七期社論

随着今年夏季和秋季农业生产的偉大胜利，广大地区的农民正在进一步組織起来：把小社合并为大社，把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变为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人民公社正在全国范圍內形成为一个新的不可阻擋的群众运动的潮流。不少地方的农民在很短的时間內就实現了全县的人民公社化。还沒有实現公社化的地方，广大的农民积极分子也正在作各种准备，爭取在秋收前后通过群众的鳴放辯論，建立公社。已經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在发揮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力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性的基本建設、加速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发展公共福利事业等等方面，表現了比农业合作社更偉大的优越性。

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建立人民公社，說明这是目前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全面的不断的躍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覚悟。我国农民在經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战胜了資本主义，克服了农业生产中的右傾保守思想以后，发展了空前規模的农田基本建設，实行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使农产品产量一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長。同时，为了进一步地发展农业生产，为了在农村中广泛地发展工业，促进工业和农业的結合，提高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农村（包括县城、市鎮）的小型以至中型的工业企业正在迅速地发展起来。农村中的这些变化使农民認識到，原有的、規模比較狹小的、經营項目比較單純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組織形式，已經不能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事实上，許多地方的农民在着手大規模地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植树造林、同自然灾害作斗

爭、举办农业机械化事业和水力发电事业、改善农村的交通条件和居住条件的时候，已經不能不打破小社、小乡的界限，有时甚至县界也不能不打破了。不但如此，原有的农业社只管农业的局面也显得完全落后了。农业社不但必須成为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漁业的綜合經营單位，而且必須成为工农商学兵的統一組織單位。这样，实現乡人民委員会和农业社的合一，就有利于集中統一的領导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而乡社分开就完全沒有必要了。为了充分利用劳动力，讓妇女充分参加田間生产，讓男女劳动力不浪費自己的劳动时間，农业社必須不但是生产的組織者，而且是生活的組織者，不但要使劳动进一步地集体化，而且要使生活集体化。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园、縫衣組等等，在这种迫切需要下面，象雨后春笋一般地发展起来了。所有这些情况，都要求从原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前进一步——改变成为人民公社。

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轉变成为人民公社，不但是組織規模和經营范圍的扩大，而且包含着生产关系的重要改变。許多地方的人民公社——例如本刊本期所介紹的河南遂平县衛星公社——已經消除了生产資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后的残余（由于集体劳动的需要日益增長，由于公共食堂普及到全体社員，社員自己經营自留地和养猪已經成为不可能和不必要了），而且在若干方面突破了集体所有制的框子。此外，在实行社內的粮食供給制这类的发展中，人們还不难看出共产主义的萌芽的生長。

当然，在建立人民公社的时候，并不必須立即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更不应該勉强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初級阶段进到共产主义高級阶段。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比較快，有些地方可能比較慢。在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再經过一段时間，社会生产力更大地发展了，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覚悟和道德品質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了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遺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

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資产阶級法权的殘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的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將由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时代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目前的人民公社为我国提供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設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良好的組織形式。它不但在現阶段將成为我国社会的基層單位，并且將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層單位。

广大的劳动人民毫不躊躇地接受人民公社这种組織形式，并且毫不躊躇地改变若干过时了的生产关系，这不但是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飞躍发展，而且由于我国人民掌握了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关于不断革命的指导思想。劳动人民不願意在革命发展中停頓下来，他們看到，革命愈是迅速地向前发展，他們得到的利益愈多。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前进中提出了这样的充滿革命精神的口号：組織軍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所謂組織軍事化，当然不是說他們眞的組織成了兵营，更不是說他們要給自己安上將校尉的头衔。只是农业的急速发展要求他們大大加强自己的組織性，要求他們在劳动中行动得更迅速，更有紀律和效率，更便于在广大范圍內自由調动，如同工厂的工人一样，如同部队的战士一样。这样，他們就認定，他們的組織需要軍事化。提出这样的口号的农民領导者，很可能并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成立产业軍，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綱領，但是他們和广大的农民群众在長期的人民革命的武裝斗爭中，完全知道軍事化絲毫沒有什么可怕。相反，为了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而实行全民皆兵，对于他們是十分自然的。現在的在农业劳动中的組織軍事化，虽然并不是为了对人間的敌人，而是为了对自然界进行斗爭，但是在这兩种不同的斗爭中，互相轉变并不是一件难事。

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人民公社，在沒有外来的敌人襲击的时候，是向自然界进軍，是为了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村共产主义化的幸福的未来而进軍；如果外来的敌人敢于向我們襲击的时候，就会动

員全民的武裝，为坚决、徹底、干淨、全部地歼灭这些敌人而进軍。

这不会产生命令主义么？我們認为，人民公社的組織軍事化、全民武裝和命令主义是互相区别的兩件事。沒有人民公社，沒有組織軍事化，沒有全民武裝，也可以产生命令主义；相反，有了人民公社，有了組織軍事化，有了全民武裝，可以不发生命令主义，可以实現最大限度的民主。事实上，由于劳动生产率愈来愈高，由于农业劳动中的机械化电力化愈来愈发展，由于社会产品愈来愈丰富，由于人民的文化程度愈来愈高，劳动时間將逐漸縮短，劳动强度也將逐漸減輕，克服命令主义的可能性也就会愈来愈大。

組織軍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决不是意味着劳动强度的無限紧張。如党中央所指出，我們的劳动应該是有节奏的，应該是苦战和必要的休整相結合，而劳动中的紀律性和集中性，必須建立在群众自覚的民主的基础之上。

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发展本身就必須經过群众充分的思想醞釀的过程。只有通过充分的鳴放辯論，在当地人民群众充分的自覚自願的条件下，才可以把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变为人民公社。我們相信，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如此高漲，我国农民的革命覚悟如此成熟，我們党的广大干部在領导整风和生产的过程中同群众建立了如此亲密的联系，在这样的形势下，人民公社一定会由于它自身的优越性而迅速地在全国发展起来。

高举人民公社的紅旗前进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社論

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主义运动新阶段的人民公社，目前正在許多地方迅速地建立和發展起来。这个运动的开始，是出于农民群众在高度的社会主义覚悟的基础上的自动創造。在少数最早的公社获得成功以后，許多农业合作社就学习它們的榜样，使这个运动逐步地得到發展。現在，經过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倡导，人民公社的运动發展得更加迅速了。不少地方的农民群众写了大批的大字报、申請書和决心書，要求建立人民公社。河南和辽宁已經基本上实現了全省公社化，河北、黑龙江、安徽等省的人民公社运动也正在高潮中。西北各省、长江流域和長江以南各省，正在准备在秋收以后分期分批地建立公社。在已經建立人民公社的地方，农民群众敲鑼打鼓，欢天喜地，生产积极性比前一个阶段更为高漲。貧农和下中农更是兴高采烈，認为"多年的盼望今天实現了"。

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一是大，二是公，所以人民公社也可以說是一种大公社。所謂大，就是公社的規模大，人多地多，便于进行大規模的綜合性的生产建設。不仅农、林、牧、副、漁全面發展，而且工、农、商、学、兵互相結合。目前已經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一般說是万人社以至万戶社，一个社的范圍等于一个乡（如果原有的乡太小还可以扩大合并）。人多力量大，过去小社办不到或者不容易办好的許多事情，例如中型水利工程、較复杂的工矿建設、較大規模的道路和住宅建設、中等和中等以上学校的兴办等，現在大公社都可以大办特办了；劳动力不足的問題也比較容易解决了。所謂公，就是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主义化，更加集体化。由于公社的生产規模

大，要求劳动組織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便于自由調动，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因而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級組一类組織日見普及，这样，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資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殘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的成片果树、一部分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等，許多地方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已轉为社有。有少数公社在群众自覚自願的基础上，开始实行生产資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試行工資制或供給制。这种試驗是有益的，因为它指出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發展的前途。同时，由于人民公社实現了工农商学兵的結合，超出了單一的經济組織的范疇，而成为經济、文化、政治、軍事的統一体，乡一級的政权当然就沒有單独存在的必要，必須同公社合而为一。公社的社务委員会，就是乡人民委員会。再进一步，人民公社的县联社也將有同县人民委員会合而为一的趋势。这样既便于集中統一的領导，又使得农业社的集体經济和乡級县級的国有經济得到了密切的結合，便利了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因此，人民公社是我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設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适当的組織形式，它將像从前許多卓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直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多次預料过的一样，發展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層單位。

从农业生产合作社轉变为人民公社，是我国历史發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目前有七十万个左右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大多数是在一九五五年社会主义高潮中建立起来，并在以后逐步轉为高級社的。这些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毫無疑問比單干戶、互助組以至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都优越得多，对于几年来我国农业生产的逐年上升起了偉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發展，特别是去冬以来农业的大躍进，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經逐漸显得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發展的需要了。一方面，这些农业社的規模比較狹小，全国平均每社只有一百多戶，劳力少，公共积累数量少而且速度也慢，發展多种經营也因人少地小力量小而受到种种限制。許多事实証明，为了高速度發展农业，为了迅速改变农村面貌，为了尽快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必須进行大規模的根本改变自然面貌的农田基本建設，必須采取

新的农业技术措施，必須在發展农业的同时發展林业、畜牧业、漁业和副业，必須兴办为农业服务、为农村生活服务以及为大工业服务的工业，必須逐步实現机械化和电气化，必須改进农村的交通运輸和居住条件，必須兴办各种教育、衛生、文化事业。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只有几十戶、几百戶的农业社力所能及的。河南商城县超英公社在公社成立之前，虽然資源条件很好，但各个小社办工业并不多。在并社、轉公社以后，十天内就抽出了干部二千五百人和社員一万七千五百人，办起了鋼鉄、机械、化肥、水泥等工厂四千五百三十个，其中投入生产的三千二百五十个。办大公社的优越性，在这里就明显地表現出来了。事实上，在去冬以来的水利、造林、抗旱、防洪等一系列斗爭中，許多地方的农业社已經尖銳地感到小社不如大社，感到原有的劳动組織不便于进一步挖掘劳动潜力，提高劳动效率，因而有許多小社已經联合起来，或者打破社界、乡界，以至县界、省界，进行社会主义大协作，并且实行了"組織軍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情况說明，原有的組織規模比較狹小、經营項目比較單純、集体程度比較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經开始成为生产力进一步發展的障碍了。

必須指出，人民公社在农民群众中这样迅速地發展，决不仅仅是由于經济的原因。农民群众对于人民公社所表現的热情，首先說明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覚悟和共产主义覚悟有了极大的提高。一九五七年，党在农村中通过兩条道路的大辯論，粉碎了資产阶級右派以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进攻，战胜了富裕中农的資本主义傾向，随后又通过整风运动，根本改变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克服了在农业生产中的右傾保守观点。在今年的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工作的大躍进的过程中，广大农民不但看到了农业生产成倍地增長，而且看到了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幸福前途。所有这一切，使党在农民中的威信空前巩固，使农民空前坚决地要求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并且为將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农民群众在努力追求生产建設和文化教育的最新最高的發展同时，也努力追求最适合于生产力發展需

要的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組織形式。沒有这个政治覚悟作基础，人民公社运动的發展就是不可能的和不可理解的。

人民公社的建立，对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向前發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公社規模的扩大和乡社合一，既然便于农村中的工矿交通事业和文教事业迅速發展，这就使打破农村和城市的界限、农民和工人的界限、农民和知識分子的界限以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逐步成为可能。但是，無論如何，目前的人民公社运动并不要求一律立即把集体所有制轉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表示它已經由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初級阶段轉变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主义高級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某些个别的人民公社可能走得比較远些，但是一般說来，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轉到全民所有制將是經过三四年以至五六年才会完成的过程。然后再經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覚悟和道德品質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遺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資产阶級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才会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目前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正在發展成为一个比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运动更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各地党委必須根据当地工作的具体情况，对这个运动的發展作出正确的規划，进行积极的領导。人民公社运动的發展在各个地方必然有先有后，在規模、步驟和作法上也会各有特点，不应强求一律。人民公社的建立必須是在当地群众通过鳴放辯論、眞正自覚自願的基础上。至于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任何改变，尤其不允許采取任何急躁、輕率、命令主义的态度。鑒于目前許多地方秋田管理工作特别紧張，今冬明春的生产准备工作又需要及早安排，因此，不論已經开始或尚未开始建立人民公社的地方，都必須抓紧当前的生产工作。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中央委員会第六次全体会議通过，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

一

一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組織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闊的地平綫上出現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規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結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現，就以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們广泛的注意。

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很快。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只經过了几个月时間，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經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組成了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有一亿二千多万戶，已經占全国各民族农戶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这个情况表明：人民公社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經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設大躍进的产物。

农村人民公社成立的时間虽然不久，但是广大农民已經看到了它所帶来的显著利益：劳动力和生产資料可以在更大的范圍內作統一的安排和調度，比以前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使用，因而更便于发展生产；工农商学兵各項事业（其中的农又包括农林牧副漁五业），在公社的統一領导下，得到了密切的結合和迅速的发展，特别是成千成万的小工厂在农村中雨后春笋般地兴建了起来；公社适应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創办了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园、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这就特别使得几千年来屈伏在鍋灶旁边的妇女得到了徹

底的解放而笑逐顏开；很多公社在农业巨大丰产的基础上，实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广大的男女农民开始領得自己的工資，而过去經常愁吃愁喝、愁柴米油鹽醬醋菜的家庭，从此可以"吃飯不要錢"，也就是說，得到了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所有这些，对于农民都是开天辟地的新聞。农民的生活已經得到了改善，而且根据实际的經驗和公社发展的远景，他們知道，他們的生活在今后还將大大改善。

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发展，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这就是：它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內职能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

这一切都証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議上根据群众的創造所作的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議，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人民公社現在在各民族农村中（除西藏和某些个别地区以外）已經普遍地建立起来了，在城市中也在开始进行一些試驗。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將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設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換、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統一組織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結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組織。但是城市和农村有所不同。一則城市的情况比农村复杂。再則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城市中已經是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了，工人阶級領导的工厂、机关、学校（除一部分职工家屬以外）已經按照社会主义原則高度組織化了，因而城市的公社化不能不提出一些同农村不同的要求。三則目前城市中的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中許多人的資产阶級思想还相当濃厚，他們对于成立公社还有顧虑，对于这一部分人，我們也应当有所等待。因此，在城市中应当繼續試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緩，只作醞釀工作。要等到經驗多了，原来思想不通的

人也通了，再大量兴办起来。

已經建立起来的农村人民公社，由于成立的时間还很短，絕大多数的公社剛一建立，就忙于秋收、秋耕、秋种和全民煉鋼鉄的紧張工作，还沒有来得及巩固組織，健全制度，系統地解决由于成立公社而发生的关于生产、分配、生活福利、經营管理等方面的新問題。对于如何办好和发展人民公社，大家的經驗还不足，对于某些問題的認識也难免有一些参差不齐。目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迅速統一全党全民对于公社的認識，加强对于公社的領导，整頓和巩固公社的組織，确定和健全公社的制度，更好地組織公社的生产和生活。要把已經搭起架子的公社切实充实起来，以便使它們能够日益完滿地担負起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向前发展的偉大使命。

二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結構的工农商学兵相結合的基層單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組織的基層單位。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我国人民公社的初步經驗，現在可以預料：人民公社將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并且將成为我国实現下述兩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即第一，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第二，成为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現在也可以預料，在將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將仍然是社会結構的基層單位。

从現在开始，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經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組織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經济全面地实現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共产主义的因素必將逐步增長，这就將在物質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

基础。

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复杂的任务。从現有的經驗看来，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全面地实現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时間可能早一些，但是也不会很早。广泛地实現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建成具有高度发展的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們前进的速度較快，需要的时間还將很長；全部完成这个过程，从現在起，將需要經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間。

帝国主义者和他們的应声虫將說，我們想有高度发展的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这个时間是太短了，我們將不能达到目的。这种調子我們早已听慣了，可以不去管它；因为他們总是要不断地在事实面前認輸的。但是还会有另外一些人說：这个时間太長了。这是我們自己队伍中的好心人，只是太性急了，他們把高度发展的現代工业等等看得非常容易，把全面地实現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至实現共产主义看得非常容易。他們認为，农村人民公社現在就已經屬于全民所有制性質了，很快就可以甚至現在就可以放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則，采取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則了。因此，他們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还要繼續一个很長的时間，覚得不能理解。这当然是一种誤解，这种誤解必須消除。

必須指出：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轉变，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些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

首先，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帶上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但是这并不等于已經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現在全国农村已經公社化了，但是要在全国农村实現全民所有制，还需要經过一段相当的时間。

不錯，人民公社的建立，使集体所有制的經济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这是由于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基層政权合而为一；由于

农村中原有的全民所有制的銀行、商店和某些其他企业下放到公社管理；由于公社参加兴办某些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工业和其他建設事业；由于許多县成立了統一領导全县公社的县联社，县联社有权調度各公社的适当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去进行全县性的或者超过县的范圍的建設事业，并且許多地方已經在着手进行这些事业；等等。但是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資料和产品，現在基本上仍然屬于公社集体所有，同国营企业的生产資料和产品屬于全民所有不同。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但是全民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更进步，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資料和产品，可以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經济的需要作統一的合理的分配，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包括目前的农村人民公社，却不能作到这一点。認为目前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已經是全民所有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为了逐步促进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各县应当普遍地成立县联社。县联社应当在今后若干年內，在大力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覚悟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步驟，逐步增加公社生产資料的全民性部分，逐步增加公社产品由国家統一分配的部分，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把集体所有制轉为全民所有制。如果不及时地发展和完成这种轉变，老是維持集体所有制的現狀，讓公社社員的眼光只是局限在較小范圍的集体利益的圈子里，那就將妨碍社会生产力的繼續发展和人民覚悟的繼續提高，因而是不适当的。但是必須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的积极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覚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們的主观願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經过一个相当長的时間，才能在全国范圍內分期分批地实現。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現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談，过于性急，企圖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匆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其次，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比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需要經过更長得多的时間。

不錯，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給制，开始带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則的萌芽；人民公社实行的工农业同时并举和互相結合的方針，为縮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开辟了道路；农村人民公社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它的共产主义因素將有新的增長；这些都是应当承認的。而且，随着社会产品由于全国工农业日益高涨，逐步由不丰富到丰富，公社分配制度中的供給部分逐步由少到多、供給标准逐步由低到高，以及人民共产主义覚悟日益提高，全民教育日益发展，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逐步縮小，国家政权对內作用逐步縮小，等等，随着这一切，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將逐步成熟起来。忽視甚至阻碍这个发展过程，把共产主义推向遙远的將来，自然是不适当的。

但是每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長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質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經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兩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則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則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現。沒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則，就会妨害人們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現。因此，在人民公社的社員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資部分，在長时期內，必須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間內并將占有主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員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員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較容易滿足，公社必須努力使社員所得的工資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內必須比供給部分增加得更快。即使已經由集体所有制过

渡到了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沒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將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圖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則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則，也就是說，企圖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無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無論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質，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狀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同志們要記着，我国現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經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將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至于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强度大大减輕、劳动时間大大縮短这些目标，就还有一段更長的距离。而沒有这些，当然就談不到进入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們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須首先热心于发展我們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現我們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計划，而不应当無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作，不仅是一种輕率的表現，而且將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小資产阶級的平均主义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設的发展。

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問題上，我們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者，我們認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沒有隔着也不允許隔着万里長城；我們又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論者，我們認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質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質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农村建立人

民公社問題的八月决議中曾經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时間。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質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然后再經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覚悟和道德品質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遺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資产阶級法权的殘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經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將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为了澄清目前有关人民公社問題的一些誤解，保証人民公社运动的健康发展，必須認眞地用这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間，进行广泛的反复的宣傳教育工作。

二

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換、消費和积累，都必須有計划。人民公社的計划应当納入国家的計划，服从国家的管理。同时，它在制定計划的时候，应当充分发揮自己的特点和主动精神。

发展生产是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的中心环节。人民公社发展生产的正确方針应当是：根据国家統一計划和因地制宜的原則，根据勤俭办社的原則，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自給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無論在那一方面的生产中和基本建設中，都必須厉行节約，精打細算，尽可能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財力，降低成本，节减开支，增加收入，防止和反对有些公社工作人員因为丰收而发生鋪張浪費的現象。

在农业生产方面，应当逐步改变淺耕粗作、广种薄收为深耕細作、少种多收，实現耕作园田化和生产过程机械化、电气化，大大提高單位面积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縮减耕地面积和在农业方面所

使用的劳动力。应当争取在一个較短的时期內，做到每年全国产粮平均每口人能有兩千斤至三千斤，即一吨至一吨半。随着粮食問題的解决，应当逐步提高棉、麻、蚕絲、大豆、油料、糖料、茶叶、烟叶、藥材等工业原料作物在全部农业生产当中所占的比重，并且极大地注意加速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漁业的发展。总之，如像在工业战綫一样，一定要在农林牧副漁五业中来一个全綫大革命，徹底改变整个农业战綫的面貌。

过去人們經常憂愁我們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論断推翻了。只要認眞推广深耕細作、分層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額丰产的經驗，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將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內，根据地方条件，把現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縮減到例如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土地实行輪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紅的观賞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这样做，一可在农田上大大省水，省肥，省人力，而且將大大增加土壤的肥力；二可大兴山水草木之利，大大发展农林牧副漁的綜合經营；三可改造自然环境，美化全中国。这是一个可以实現的偉大理想，全国农村中的人民公社都应当为此而努力。

人民公社必須大办工业。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將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將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現，縮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应当根据各个人民公社的不同条件，逐步把一个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轉移到工业方面，有計划地发展肥料、农藥、农具和农业机械、建筑材料、农产品加工和綜合利用、制糖、紡織、造紙以及采矿、冶金、电力等輕重工业生产。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必須同农业生产密切結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現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滿足社員日常生活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場服务。必須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則，不要办那些本地沒有原材料、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取原材料的工业，以免

增加成本，浪費劳动力。在生产技术方面，应当实行手工业和机器工业相結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相結合的原則。凡是原来有基础而又有发展前途的手工业，一定要繼續发展，并且逐步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革。机器工业也必須充分利用土鋼鉄、土机床和其他各种土原料、土設备、土办法，逐步由土到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

人民公社無論在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既要发展直接滿足本社需要的自給性生产，又必須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性生产。各个公社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在国家領导下，同别的公社和国营企业实行必要的生产分工和商品交換。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經济才能够以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各个公社也才能够換回必要的机器和設备，实現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也才能够換回所需要的消費物資和現金，以便供应社員和发放工資，并使工資逐步增長。为了保証交換計划的实現，要在国家和公社之間、公社和公社之間，广泛地实行合同制度。

应当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內，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間的商品交換，必須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不同于資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因为它們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計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資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無政府狀态地进行的。繼續发展商品生产和繼續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則，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經济是兩个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党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圖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貨幣、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四

农村的人民公社应当在勤儉办社的原則下，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收入。为了迅速地发展生产，在从总收入扣除生产費用、管理費用和繳納税款以后，应当适当地提高积累的比例。但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同时应当使收入中用于社員个人消費和集体消費的部分（包括用

于公共福利、文化教育等事业的部分)逐年有所增加，使人民的生活逐年有所改善。

在分配給社員个人消費的部分，实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这是我国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創举，是目前广大社員群众的迫切要求。如前面所說，这种分配制度，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但是它的基本性質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在分配給社員的总額当中，工資部分和供給部分各占多少，要看各个公社生产发展的不同情况来决定。目前在确定工資和供給的比例的时候，要注意尽量不使劳力强而人口少的戶减少收入；一般地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員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余社員的收入比上年也不致减少。

供給范圍目前不宜过寬。实行供給制并不是使人們的生活清一色。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人們的需要总是大体相同而又各有不同的。因此，無論在目前和將来，在供給的范圍內，必須注意尽可能使社員有适当选擇的自由。

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資必須逐步增長。除供給部分外，目前农村中的工資等級一般可以分为六級至八級。最高工資可以等于最低工資的四倍，或者倍数更多一点，但是不要过于悬殊，因为那样就不符合于目前农村劳动熟練程度高低差别的实际情况。各个地区的工資水平也允許有相当的差别。目前城市中工資的差額要比农村大一些，这是必要的。到了將来，由于生产有了极大的高漲，所有一切人都富裕起来，無論在城市或者农村，这种工資等級的差别就会显得沒有必要，而逐步趋于消失，那就是接近共产主义的时代了。

城市的工資水平一般比农村为高，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城市中的生活費用較高这样一个原因)，而且也是一种暫时現象，应当向农民講清楚。农村中有些社員除自己劳动外，家中还有外出人員(例如某些工人、軍人、干部、华侨等)由城市或其他地方寄錢回来，对于这种情形，应当教育其他社員不必斤斤計較。公社在分配的时候，無

論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对于这样的社員都应当一視同仁，也不要勉强他們向公社投資，或者捐献。如果他們依靠外出人員維持全部生活，公社也不应当加以干涉，但是可以不另行供給。对于外出上学的学生，除由国家供給或者自己可以供給者外，他們的需要应当由县联社按照学校規定的費用标准，統一負責解决。

社会主义事业愈是向前发展，社会产品愈是丰富，分配給个人所有的生活資料也必然愈是丰富。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現有的消費財产拿来重分，这是一种誤解。应当向群众宣布：社員个人所有的生活資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銀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員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員所有。社員多余的房屋，公社在必要时可以征得社員同意借用，但是所有权仍归原主。社員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繼續經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人民公社成立以前遺留下来的債务，不論是个人相互間的債务，公社和社員相互間的債务，或者社員欠銀行、信用社的貸款，一律不要宣布廢除。对于这些債务，凡有条件偿还的应当照旧偿还，沒有条件偿还的暫时保留。

五

人民公社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組織者，而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全体社会成員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党在領导公社工作的时候，必須注意全面地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必須关心人，糾正那种見物不見人的傾向。群众的干勁越大，党越要关心群众生活。党越是关心群众生活，群众的干勁也会越大。把生产和生活对立起来，認为重視群众生活就会妨害生产的观点，是錯誤的。当然，离开提高覚悟和发展生产，片面地或者过分地强調改善生活，而不提倡为長远利益而艰苦奋斗，也是錯誤的。

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認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將"从沉重的負担变成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將来每天劳动的时間無疑

將大大縮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們必須爭取在今后若干年內开始实現每天劳动六小时的制度。我們目前的紧張劳动，也正是为將来的每天六小时劳动以至更短时間的劳动創造条件。在目前时期，不但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应当实行平时实际工作八小时、学习二小时的制度。农忙或者农村其他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工作时間可以适当延長一些。但是無論如何，必須保証每天睡眠八小时，吃飯、休息四小时，共十二小时，这个时間一定不可少。目前劳动力紧張，这是事实，但是要着重在搞好工具改革方面和改善劳动組織方面找出路，而不要指望在延長劳动时間方面找出路。必須着重注意安全生产，尽可能改善劳动条件，力求减少和避免工伤事故。一定要保証妇女在产前产后的充分的休息，在月經期內也一定要讓妇女得到必要的休息；不做重活、不下冷水、不熬夜。

要办好公共食堂。要保証所有的社員吃得飽、吃得好、吃得干淨衛生，并且适合民族习慣和地方习慣。公共食堂要有飯厅，要經营好菜园、豆腐坊、粉坊、醬园，要养猪羊、养鷄鴨、养魚等。飯菜要多样化，要有味道。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使食品当中包含有生理上必需的含热量和营养分。对老人、小孩、病人、孕产妇和哺乳的母亲，在伙食上要給以必要和可能的照顧，并且可以允許某些社員在家做飯吃。公共食堂要实行管理民主化。食堂的管理人員和炊事員要选擇政治上可靠的人員担任，最好經过民主选举。

要办好托兒所和幼兒园，使每一个孩子比在家里生活得好、教育得好，使孩子們願意留在那里，父母也願意把孩子放在那里。父母可以决定孩子是否需要寄宿，并且可以随时把孩子領回。为了办好托兒所和幼兒园，公社必須大量培养托兒所和幼兒园的合格的保育員和教师。

要办好敬老院，为那些無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戶”）提供一个較好的生活場所。

公社还必須負責办好小学、中学和成人教育。要在全国农村中普及小学教育，办好全日制的中学和半日制的农业中学，或者其他中

等职业学校，逐步做到普及中等教育。在成人中要認眞地扫除文盲，組織各种业余学校，进行政治、文化和技术教育。在劳动人民中間实行普及教育，并且逐步提高教育水平，这是縮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一个重大步驟，必須認眞进行。此外，各公社还必須选送一部分青年去投考城市中的高級中学、中等專业学校和高等学校，以便为国家和公社培养有較高文化水平的工作人員。無論那一种学校，都必須貫徹执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結合的原則。九岁以上的兒童可以适当地参加一些劳动，以便自幼养成劳动习慣，促进身心发育；但是必須充分照顧到兒童的健康，分配以适合兒童体力和兴趣的輕微的、短时間的劳动。

要加强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园、敬老院、小学校、衛生院、俱乐部、商店等方面工作人員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且积极指导社会輿論，使整个社会和整个公社把办好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园和其他集体生活福利事业，作好服务性工作，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要批判和糾正那种輕視群众生活福利工作、輕視服务性劳动的剝削阶級观点。

要逐步改造現有的旧式房屋，分期分批地建設新型的园林化的乡鎮和村的居民点，包括住宅、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园、敬老院、工厂、禾場、畜舍、商店、邮电所、倉庫、学校、医院、俱乐部、电影院、体育場、浴室、厕所等。乡鎮和村居民点住宅的建設規划，要經过群众的充分討論。我們主張廢除历史上遺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長制，发展民主团結的家庭生活。这种主張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因此，在住宅建筑方面，必須注意使房屋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現在世界上有一大堆蠢人，下死勁攻击我們的人民公社，其中就有美国的杜勒斯先生。这个杜勒斯，对于我国的事情，啥也不懂，却要裝作一个中国通，瘋狂地反对人民公社。特别使他伤心的是，据說，我們破坏了几千年傳下来的好得不得了的家庭制度。不錯，中国人民破坏了一个封建的家長制。須知这种家長制在資本主义社会中一

般早已沒有了，这是資本主义的一个进步。我們却更进一步，建立了民主团結的家庭，这在資本主义社会一般也是少有的。只有在將来，在那里实現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人剝削人的資本主义制度以后，这样的家庭才有可能普遍出現。至于托兒所，幼兒园，工厂里的工人食堂，也是資本主义社会先有。不过，在那里，凡是由資产阶級举办的这类事业，都是資本主义性質的，目的在于便利資本家剝削男女劳动者。而我們所举办的这类事业，則是社会主义性質的，便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便利于人类个性的解放，眞正徹底地解放了妇女群众，并使兒童教养得更好些，因而得到全体劳动人民，首先是妇女群众的热烈欢迎。

六

人民公社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無論在生产管理方面，在收入分配方面，在社員生活福利工作方面，以及一切其他工作方面，都必須貫徹执行这个原則。

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統一領导、分級管理的制度。公社的管理机構，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員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进行經济核算的單位，盈亏由公社統一負責。生产队是組織劳动的基本單位。在公社管理委員会的統一領导下，应当使管理区（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組織生产和基本建設、管理財务、管理生活福利事业等方面，有必要的权力，以利于发揮他們的积极性。

县联社和人民公社的各級組織，都必須学会在生产各部門（农业部門、工业部門、运輸部門）之間，在經常性生产任务、突击性生产任务、服务性任务之間，合理地分配和調度劳动力，避免这里有事無人做、那里有人無事做的現象。必須不断地改进劳动組織工作，在生产任务和其他任务中繼續执行和巩固分層包干的責任制，健全劳动檢查和評奬的制度，切实保証提高劳动效率和工作質量。

人民公社的劳动組織中必須既有紀律，又有民主。所謂組織軍

事化，也就是組織工厂化，就是說公社的劳动組織应当像工厂、像軍队那样地有組織有紀律，这是大規模的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大規模的农业生产队伍同大規模的工业生产队伍一样，是一支产业軍。近代的产业軍，是資产阶級組織的，一个工厂就等于一个軍营。工人站在机器面前，其紀律之严，不下于軍队。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产业軍，是工人阶級一个阶級的产业軍，去掉了剝削剩余价值的資本家，在工人阶級內部实行了生动活潑的自覚自願的民主集中制。我們現在把这个制度应用于农村，这样就建立了沒有地主富农剝削、也脫离了小生产狀态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农业产业軍。

在人民公社的各級生产組織中，应当相应地建立民兵組織。民兵組織和生产組織的領导机構应当是兩套，各級民兵組織的指揮員，即团長、营長、連長等，原則上不由公社的主任、管理区主任(大队長)、队長等兼任。这些指揮員应当参加公社的同級管理机構作为成員之一，受同級管理机構和上級民兵指揮机关的双重領导。民兵組織应当根据需要配备武器，武器由地方自办兵工厂生产。基干民兵要按照規定的时間进行軍事訓練，普通民兵也要在劳动間隙进行适当的訓練，以便为实行全民皆兵准备条件。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是喜聞乐見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他們在長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爭中，認識到只有把自己武裝起来，才能战胜武裝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塊天地的主人；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們又看到，国外还有天天声言要灭掉这个人民国家的帝国主义强盜們存在；因此，全体人民决心繼續把自己武裝起来，并且声言：一心想要搶劫我們的强盜們，你們小心一点兒吧，不要妄想来碰我們这些从事和平劳动的人們，我們是准备好了的。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爭，那时我們就將实現全民皆兵，民兵就將配合人民解放軍，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軍，徹底打敗侵略者。

人民公社的一切組織，包括民兵的組織在內，都应当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公社不但要組織人民的生产，而且要組織人民的生活，为了

把工作作好，一定要实行高度的民主，一定要有事同群众商量，忠实地代表群众的利益，反映群众的意志。因此，公社必須在实行“組織軍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同时，充分地实行管理民主化。决不允許借口組織軍事化，或者利用对付敌人的民兵制度，而使公社和民兵組織的民主生活受到絲毫的削弱。公社是我国基層政权的組織，只有充分保証公社的民主化，才能在全国范圍內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生动活潑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七

办好人民公社的根本問題是加强党的領导。只有加强党的領导，才能实行政治挂帅，才能在干部和社員中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和反对各种錯誤傾向的斗爭，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綫和政策。某些人認为有了公社就可以不要党，就可以实行所謂“党社合一”，这种想法是錯誤的。

党在人民公社的工作中，除了必須保証执行正确的路綫和政策以外，还必須注意教育公社的工作人員发揚优良的作风，首先是群众路綫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經过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整风运动，党的群众路綫已經获得了新的偉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設的大躍进和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就是这一胜利的兩个标志。党的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是人民公社的生命；沒有群众路綫，沒有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沒有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高漲，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巩固是不可能的。因此，公社的各級領导工作人員，在任何工作中，都必須徹底执行群众路綫。必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对于社員群众采取同志式的态度。严格禁止用那种压服群众的国民党作风、資产阶級作风来对待群众。由于生产的大躍进，由于公社化的胜利，某些干部开始冲昏头腦，对人民群众不願意耐心地进行說服教育工作，而表現某种粗暴态度。这种現象虽然只是个别的，但是必須引起严重

的警惕。

党在任何工作中必須坚持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結合的原則。一九五八年的大躍进創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空前胜利，現在甚至我們的敌人也無法否認这个胜利的意义了。但是我們决不能因为有了大的成績就忽視小的缺点。相反，成績愈大，我們愈需要提醒干部保持冷靜的头腦，不要在一片胜利声中变得飄飄然起来，以至看不到，甚至不願意看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目前社会主义建設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們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們的經济工作必須愈作愈細致，我們的各級領导工作人員必須善于区别事物的眞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沒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須力求接近客观实际。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制定和实現我們的計划。

八

为了促进人民公社的巩固，为了保証一九五九年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更大躍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根据本决議所提出的各項要求，抓紧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五个月时間，紧密結合冬季和春季的生产任务，对本地区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教育、整頓和巩固的工作，即整社的工作。

在进行整社的时候，首先要求領导干部認眞地进行自我批評，虛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見，在这个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大鳴大放大辯論，貼大字报，表揚好人好事，批判坏思想坏作风，总結經驗，明确方向，开展一个深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在进行整社的时候，要对公社的生产規划、分配狀况、生活福利、經营管理、財务工作、組織領导，做一次全面的深入的檢查。同时，要切实整頓党的組織和公社的組織，保証党和公社的各級領导成員必須是忠实于人民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积极分子，并且吸收在大躍进运动和公社化运动中受过考驗、合乎党員标准的优秀分子入党。

对于党員、干部作风中的問題，要經过党的教育和群众鳴放加以处理。在处理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要根据"团結——批評——团結"的原則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对于犯了錯誤而又願意改正錯誤的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寬。对于混入公社領导机構的阶級異己分子，和极少数作风惡劣、屢教不改的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把他們从領导机構里清除出去。

复杂的阶級斗爭，不但在国外，在資本主义世界，严重地存在着；就是在国內，也还是存在着。要教育群众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敌人的破坏活动。公社中过去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被剝夺了政治权利的人，是否可以作社員，或者作非正式社員，或者仍然由公社监督劳动，都应当在整社的过程中，由群众根据他們的表現，分别地加以討論和做出决定。

整社工作，在每个县的范圍內，要首先做好一个或者兩个試点，即在一个或者兩个人民公社內，帮助那里的同志們，在一个較短的时間內，做好那里的工作，取得經驗，作为榜样，然后全面推广。各省、市、自治区，都要組織千人、几千人或者万人左右的檢查团，由省、地、县三級党委的第一書記挂帅，領导整社工作。檢查团要在專区和專区之間、县和县之間、公社和公社之間，开展参观評比，召集現場会議，发揚成績，克服缺点，鼓干勁，想办法，具体地解决当前的問題，及时地推广成功的經驗。总之，必須通过这一次整頓，使全国的人民公社的工作普遍地提高一步。

（原載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有历史意义的綱領性文件

——“紅旗”一九五九年第一期社論

中国共产党八屆六中全会根据毛澤东同志的建議所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这个决議系統地总結了人民公社发展的經驗，从理論上和政策上对于人民公社发展中的各个基本問題，作了詳細的規定和深刻的說明。現在我們的任务是，按照这个决議，在全党全民中进行广泛的宣傳教育，加强对于公社的領导，健全公社的制度，促进公社的巩固，把人民公社的工作大大地提高一步。

人民公社——这种大規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結合的、政权組織和經济組織合一的組織形式，是我国人民群众在党的領导下的偉大創造。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大躍进，首先是农业生产的大躍进，使农民群众深深感到，原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組織已經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它在規模上、活动范圍上和集体化程度上，都显現出同生产力的飞躍式的发展不相适应。人們要求从原有的农业合作社前进一步。还在人民公社出現以前，各地群众已經对于农业合作社的組織和制度作过多方面的改进的尝試。許多农业社合并成为大社，并且扩大了經营的范圍，开始发展自己的工业，不少地方还实行了农业社、手工业社、供銷社、信用社的合一。許多农业社改进了劳动組織，加强了相互間的协作，这种协作有时不但超出了乡界，而且超出了县界。适应农业生产大躍进的需要，很多农业社都办了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园，取消了自留地。在分配制度方面，也有一些农业社改变了原有的按劳动日計酬的办法。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产生了現在形式

和現在名称的人民公社。少数公社取得成功以后，許多农业合作社把它們作为榜样，建立人民公社就逐漸地形成为群众运动。毛澤东同志对于人民群众的这种創举，給予了热烈的支持，并且及时地指出，我們的方向是逐步地有秩序地組成工农商学兵相結合的公社，从而構成为我国社会的基層單位。一九五八年八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議，根据毛澤东同志的建議，作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决議"。这个决議把人民公社引上迅速发展的軌道。到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开幕的前夜，我国农村中已經有了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組織，加入公社的农戶，达到了一亿二千多万戶，占全国农戶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从一九五八年夏季算起，我国的人民公社运动还只有半年左右的历史。在这个不長的时間內，人民公社已經在发展生产、組織分配、統一安排生活等等方面，表現出了它的显著的优越性。从农业合作社轉变成为人民公社，組織規模和經营范圍都扩大了，生产方面和社員生活方面的集体化程度都提高了；劳动力和生产資料比以前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使用，便于在更大的范圍內調度；工农商学兵互相結合，統一領导，使全国农村中实現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得到可靠的保証，农村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农业合作社轉变成为人民公社，不仅实現了生产力方面的革新，而且包含了生产关系方面的重要变革。首先，生产資料私有制的残余（自留地等）消失了，集体所有制由于公社的巨大規模，大大扩大和提高了。其次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出現了。公社和乡政权的合一，在县范圍內的成立联社，国家的基層財貿机構和其他企业下放給公社和县联社管理，县联社有权統一調剂全县公社的积累，調度公社适当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这些都是人民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的成分。最后，許多人民公社在农业生产飞躍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其中的供給制部分开始帶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則的萌芽。所有这些都表明，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有長远发展的前途。正如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議所指出的，人民公社

这种崭新的制度，“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

全会决議所指出的这些发展方向，对于我們共产主义者說来，当然是早已确定了的；但是究竟采取什么具体的形式来实現这些发展，却还是一个重大的問題。大家知道，在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互助組、常年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这些形式，以及在我国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些形式，都曾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的发現，比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各种形式当然具有远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在我国的条件下，人民公社不但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設的最好形式（这已經首先在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在全国开始普遍地实現工农业同时并举方面得到了証明），而且是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又是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人民公社現在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結構和政权組織的基層單位；而且如中央的决議所說，在我国將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仍將是社会結構的基層單位，这也是符合于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創始人所提出的理想的。因此，人民公社的发展，不但在目前具有偉大的意义，而且随着历史的前进，它还將愈来愈显出它的偉大的意义。

对于我国的大躍进和公社运动的偉大胜利，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感到惊慌，因此拚命加以攻击和污蔑。他們竭力把我国的公社描写成为凶惡可怕的怪物，把公社的胜利說成是强迫的結果。他們完全無法解釋，为什么我国的五亿多农民对于公社的成立和发展如此欢欣鼓舞，为什么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工业在公社的領导下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是各国資产阶級在对劳动人民采用了一切强迫手段之后所無法达到的。他們也知道，他們不可能破坏我国的

公社运动，于是他們只好不断地預告着公社的失敗，好象他們如果不能由此多少获得一些安慰的話，他們就連呼吸都要发生困难似的。

同反动派的这种白痴式的幻想相反，我們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一致通过的决議中，肯定了公社运动的偉大胜利和偉大前途，并且为它今后的发展和巩固規定了明确的方針。

为了使得全国的人民公社迅速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澤东同志的建議，在关于人民公社問題的决議中，詳細地討論了公社目前所面对着的最重要的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并且澄清了在公社运动中出現的一些誤解。决議着重指出：农村的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經济組織，它們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將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間；至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那就需要經过一段更長的时間。

人民公社运动是我国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一次偉大变革。这个变革是在客观条件成熟和广大农民群众自覚自願的基础上进行的。实际生活已經証明，这个得到群众热烈支持的变革，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設的迅速发展和群众覚悟的繼續提高。这个事实告訴我們，为了巩固已有的胜利，并且通过人民公社的巩固，繼續促进社会主义建設的发展和群众覚悟的提高，就必須在工作中永远坚持群众路綫，永远重視群众的自覚自願。群众的覚悟首先产生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因此，关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度、分配制度、生产經营、生活福利等等問題的处理，都必須采取科学的态度，从群众的自覚自願出发，从生产发展的需要出发。在这些方面，决不允許过于性急，把將来的理想当做当前的任务，勉强做条件还不具备的事情，因为那样就將不利于公社的巩固，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議指出，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者，又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論者。革命的各个阶段是互相联系的，我們不能使革命停頓下来，而应当領导它不断前进，要善于在革命发展的每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革命的各个阶段又是互相区别的，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質和任

务，我們必須把每一阶段的基本性質弄清楚，据以制定符合实际需要的方針和政策。把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統一起来，这就是八屆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問題的基本出发点。

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的統一，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毛澤东同志在領导我国人民革命的事业中，一貫地坚持了这个原理。为了認清这个原理，回顧一下我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前，我們党內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的爭論是有益的。在过去的不同时期內，一切右傾的錯誤观点（陈独秀的观点，抗日战爭时期的新陈独秀主义者的观点），都是不承認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的衔接，否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的原理，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他們的投降主义的綱領和政策；而一切"左"傾的錯誤观点（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的三次"左"傾路綫的代表者的观点），都是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的界綫，否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論的原理，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他們的冒險主义的綱領和政策。毛澤东同志既反对把革命停頓在民主革命阶段，也反对急于跳过民主革命阶段。他一方面坚持在民主革命过程中間必須发展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要是無产阶級的領导权），以便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实現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另一方面又坚持不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混淆起来，坚持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間不采取超出民主革命范圍的政策。大家知道，我国的革命正是按照毛澤东同志的路綫取得胜利的。

毛澤东同志曾經把革命的前后阶段比喻为互相关联的兩篇文章。他說："兩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領导民主革命，是爭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毛澤东同志在抗日战爭时期，在批評一种"左"傾空談主义的时候，曾經这样来說明革命的前后阶段不能混淆：

"还有另外一些人，他們似乎并無惡意，也迷惑于所謂'一次革命論'，迷惑于所謂'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純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

个革命，無所謂‘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驟，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說，兩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兩个阶段必須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資产阶級專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論。如果說，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沒有自己的一定时間，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間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眞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毛澤东同志的这些話，虽然是二十年前講的，所說的問題，虽然和我們当前遇到的問題在性質上和內容上都不相同，但是对于我国当前的革命事业的繼續发展，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毛澤东同志的領导下，从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相統一的观点出发，党的八屆六中全会在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問題上，既肯定目前公社已經有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并且指出，必須采取适当步驟，促进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同时又肯定，目前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必須根据生产发展的水平和群众覚悟的水平，不可过于性急。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問題上，全会既肯定在公社的分配制度中已經有了共产主义的萌芽，并且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建設的发展和人民公社的发展，共产主义的因素將逐漸增加，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將逐步成熟；同时又肯定，在相当長的时間內，我国人民的任务仍然是建設社会主义，只有在現代工业、現代农业、現代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我国才能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全会的决議明确地划清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的界限，又指出了它們之間的內在联系，并且根据这些，制定了有关人民公社的各种方針和政策。决議指出，無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不仅是一种輕率的表現，而且將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小資产阶級的

平均主义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設的发展。”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議的公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因为这是全国公社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向前迈进的指路明灯。这个决議不但适应于目前，而且适应于今后一个相当長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指导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向前发展的綱領性的文件。决議給全国人民和全国公社指出了無限偉大的远景：通过国家的工业化和公社的工业化，通过农业战綫上实現深耕細作、少种多收的大革命，通过全国文化教育事业和公社文化教育事业的高漲，我国將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間內建設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現代工业、現代农业、現代科学文化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同时，將在物質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决議对于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劳动、学习、休息的安排，妇女、兒童、老年的照顧，人民的飲食、居住和家庭生活，乡村、市鎮以至整个大地的园林化，都表現了密切的关怀。决議特别强調了在公社中貫徹执行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实行管理民主化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使人民群众得到了巨大的鼓舞。

讓帝国主义分子对我們党的决議叫嚷什么“退却”之类的夢話吧！我們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全会决議中获得了极大的力量和信心，并將紧密团結在党中央和我們偉大的領袖毛澤东同志的領导下，一致努力，为执行这个决議而坚决奋斗。毫無疑問，我們的人民公社的事业將在全会决議所确立的基础上蒸蒸日上，我們的公社將迅速获得巩固，我們的工农业將在一九五九年繼續躍进，我們在一九五九年的新胜利將繼續使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发抖！

發动群众打破陈規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論

本报今天發表的北京鉄路管理局改革三項不合理的制度的新聞，說明了兩个問題：一是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需要积极改革；一是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的好办法，就是放手發动群众，一切經过試驗。

适时的、合理的規章制度，可以使群众的革命覚悟和創造精神得到鼓励，便利和促进生产的發展。过时的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却会阻碍群众覚悟的提高和生产的發展。八年来，政府各部門和各地方制定和实施的規章制度，大部分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起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原来是正确的，但在情况發生变化、特别是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和生产發展以后，已經不适用了；也有一部分或者是旧社会遺留下来还沒有加以改訂的，或者是在各个部門各个單位在沒有經过群众討論和試行而且同有关部門單位互不联系的情况下制定的，因而本来就不够合理。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指出的："許多規章制度不合理，不切实际，相互矛盾。这影响到上下級之間、同級之間、这一部門和那一部門之間、这部分群众和那部分群众之間的关系，影响到生产的发展。"北京鉄路管理局原来实行的机車大、中修規則，被群众批評为"强迫患小病的人住院开刀"。他們原来实行的車輛檢修規定、房屋維修規定，使許多完好的車輛、房屋要"依法"进行"年修"。这都限制了交通运輸事业的发展，浪費了国家大量資財。本报一月三十一日报道的戚墅堰发电厂降低过高的奬金率的新聞，也是一个例子。他們原来的奬励制度既月月浪費着国家宝貴的資金，又人为地制造着这部分职工同那

部分职工之间的矛盾，甚至还[illegible]了职工的經济主义的思想，削弱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妨碍了生产[illegible]上的改进。显然，这类規章制度，已是非改革不可了。

規章制度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上層建筑必須适合經济基础的需要。但是，事物永远是在矛盾中發展的，社会主义的上層建筑和經济基础之間也仍然不可避免地發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因此，我們必須十分注意及时地調整上層建筑各个环节同經济基础的某些矛盾，使上層建筑有效地为經济基础服务。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这一講演中教导我們："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識形态，这些上層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組織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資产阶級意識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構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相矛盾的。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体的情况，繼續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目前，在全国范圍內出現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設高潮的新形势。为社会主义革命所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和为整风运动所激發的群众的生产热情，正以千軍万馬之势，勇猛前进。許多工作都打破了旧日的"常規"，它們的發展由漸进变为躍进。这就更加迫切要求及时改革那些同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不相适应、限制生产力發展、束縛群众积极性的規章制度。

一切願意促进生产力發展而不願使自己落在新形势后面的領导人，都应該明确地認識这个問題的重要意义。他們的責任不但是准許群众打破陈規，而且是發动群众、鼓励群众、同群众在一起来打破陈規。但是，目前也还有这样的領导人員，他們虽不否認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应該改革，但是行动起来前怕龙后怕虎，既怕某些落后群众不滿意，又怕"影响其他單位"、"打乱工作步驟"。甚至群众起来已經打破陈規了，有些人还認为应該"慢慢来，等將来研究好了一塊改"，"能不改的就先别改"。对于这些人来說，大的改革固然是从未想过，就是許

多摆在眼前的問題，在本部門本單位必須解决也可以解决的問題，也不願立即加以解决。这种态度显然是錯誤的。

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所需要遵循的原則，是有利于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設和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北京鉄路管理局、成璧堰发电厂以及积极改革住房制度的湘江机器厂、降低过高的福利待遇的石景山发电厂，都是不顧原有規章制度的限制，經过放手发动群众，打破了不合理的陈規。这样作并沒有把事情弄坏，只是把事情办得更好了。上級領导机关也不能"按部就班"，照老規矩办事，而是应該在有利于多快好省地發展社会主义事业和提高群众覚悟的前提下，对部分單位打破不合理規章制度的創举，加以批准，并且認眞地到群众中間去总結他們的經驗，以便在更多的單位中試驗推行。不仅如此，中央各部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該派負責同志到地方和基層單位去主动地檢查現行的規章制度，組織群众鳴放和辯論，保存它們中間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廢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拟定一些新的規章制度的初步草案来在若干單位試行，等待取得成熟的經驗以后，再分别不同情况，按照一定的程序，对这些新的規章制度加以法律上的确定。这才是积极适应当前新形势的正确态度。

"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經过試驗"，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規章制度所应当采取的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

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的管理体制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十四日批准了国务院通过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財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規定。这三个規定的总的精神，是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財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給地方行政机关和厂矿企业單位，以便进一步發揮地方的、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完成国家的統一計划。这一套做法必將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产生积极的良好的影响。我們党的、政府的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必須估計到这种影响，采取相应的改进步驟，以适应蓬勃發展的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

集权和分权的問題，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曾有过爭論。有的强調中央集权，有的强調地方分权；封建社会爭論过这个問題，資本主义社会也爭論过这个問題。但是在阶級社会里，不管是中央集权也好，是地方分权也好，都是少数統治阶級掌权，大多数劳动人民無权。阶級社会里集权和分权的爭論，实际上是反映了各个統治集团之間的利害冲突和互相傾軋，是为了巩固少数統治阶級对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統治。社会主义国家也有集权和分权的問題，但是这就根本不同于阶級社会里的集权和分权的問題。社会主义国家的集权和分权的問題，实际上就是民主和集中的問題，是怎样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問題。只强調集中，不强調民主，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造成官僚主义；只强調民主，不强調集中，就会帶来极端民主化，容易發展本位主义，片面性，造成自由散漫、無紀律、無秩序的現象。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解决集权和分权的問

題，也就是更好地貫徹民主集中制，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發揚民主的問題。

八年来，我們的国家正是遵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来解决集权和分权的問題的。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建国之初的共同綱領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都有明文規定。应該說，这个制度是被中央和地方普遍遵守了的。許多重要的法令，事先更曾經过各級政府組織，甚至全国人民广泛討論。宪法的制定是一个例子。全国人民討論了宪法草案，提出了十多万条意見，才訂出了一个比較完善的宪法。农业合作化的政策也是一个例子。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是先發下去討論，然后又收回来討論才公布的。同时，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时候，中央总是强調各地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总是坚决反对不研究具体情况，生搬硬套的主观主义的。地方在結合当地具体情况执行中央的政策方針上，也是坚决的、有創造性的。中央的許多指示，都是以各地創造的經驗为根据的。例如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对資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地方上根据中央的政策創造的經驗，然后再在全国推行的。八年来由于民主集中制的貫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正常的、健康的。

但是，也应該承認，过去几年在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財政管理上，比較起来，集中是比較多的。这种比較多的集中，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同当时的社会情况和工作任务相适应的。例如在解放初期，我們接收了旧社会留下的爛攤子，財政金融混乱，物价上漲；要統一財政、稳定物价，显然不是地方各行其是所能解决的，这就需要比較多的集中。編制第一个五年計划，开始有計划的經济建設，需要集中使用有限的財力、物力、人力，需要从全国范圍的平衡来考虑国民經济各个部門的發展，这显然也是需要比較多的集中的。由此可見，过去几年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財政管理上集中比較多些，是必要的，从現在看来也是正确的；只是其中有一部分，現在看来是不必要的，或者是有缺点的。例如商业方面許多專业公

司，曾經不根据各地业务量大小的不同，普遍布点，“一杆子撑到底”，显然是不必要的。企业方面曾經規定，厂矿單位在固定資产購置方面用款超过二百元以上的，都要按照基本建設投資程序，呈請主管部門批准，也是有缺点的。因为控制企业的开支虽然必要，但企业有大小不同。对小企业說来，二百元很能解决問題，几乎沒有什么約束；对大企业說来，二百元就不能解决什么問題，几乎寸步难行。这些不免会限制地方的和企业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設。

我們国家是一个大国，各地的自然情况不同，經济基础也不同，許多事情是很难强求一致的；即便是一些被公認为最需要集中的事情，也需要因地制宜、需要給地方一定的机动权力。例如国家的經济計划，这是最需要集中的。五年計划、年度計划都需要由中央来确定。但中央在确定五年計划和年度計划的时候，也只能先由上而下地頒發控制数字，然后由下而上地編制計划草案，經过反复修訂，才能最后确定下来。而且計划也不能訂死了，如果都訂死了，那就很难切合实际，也很难办事。因此，就是最需要集中的計划，也只能搞出个大輪廓、大項目；而細小的部分只能讓地方因地制宜地去确定。計划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可見，事不分大小都由中央来管是不行的。这样的“集中”，看来是集中了，实际上是不利于集中的。为了有效地集中，必須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給地方；这种权力下放，表面看来是削弱了集中，实际上恰恰是加强了集中。

还必須指出的是，經过八年来的努力，我国的經济情况已經有了若干变化，这种变化也要求适当地下放权力。例如大批新企业投入生产，旧企业扩建改建完成，中央各个工业部所轄企业的数目大大增加，繼續沿用旧的組織管理的形式，实际上已經很难对每个企业实現具体領导。又例如由于各地經济的發展，特别是由于一些新工业区的出現，地方上也需要有比較多的权力来安排本地区的經济生活，調节中央各部所屬企业在本地区的相互关系，繼續沿用旧的組織管理形式，也很难适应經济工作的新的形势。因而近兩年来，

如何适当地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給地方行政机关，已成为大家都感到需要解决的問題。国务院曾經陆續有过一些規定，給地方增加了一些机动权力；但是由于这是很大的、牽涉很广的問題，短时間內还沒有可能从体制上作系統的考虑。現在經过較長时間愼重的研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批准了国务院通过的改进管理体制的三个規定，从体制上对中央和地方在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財政管理上的权力作了适当的調整，是完全必要的。

权力下放，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說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責任下放。权力和責任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財政管理的体制改进后，地方行政机关的权力扩大了，厂矿企业主管人員的权力也扩大了，但同时应当看到，地方行政机关和厂矿企业主管人員由于管理体制的改进，所負的責任也加重了。在他們来說，过去一些可以由上級决定的事，現在要由自己来决定了。必須兢兢业业，認眞学习，胜任愉快地把責任担当起来，把工作进行得比过去更好。同时，还应当看到，在职权下放的同时，必須更加加强綜合平衡的工作。有关的綜合部門、計划部門和中央各业务主管部門必須适应管理体制的改变，改进自己的領导方法和业务重点，着重綜合平衡工作和有关方針政策的指导，使地方能够在一定的范圍內，因地制宜决定問題，而又不至影响整体和全面的平衡。不要以为权力下放了，中央有关的主管部門就可以完全撒手不管了。另方面，地方負責同志和企业主管人員也应当更多地注意处处从整体出發，照顧全局，注意克服可能出現的本位主义情緒和局部观点，以免削弱社会主义計划經济。我們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們的建設是有計划的建設，我們的計划是建立在綜合平衡的基础上的；沒有全局的、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計划的經济，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費。例如权力下放之后，各地在經济上必然有所發展，必然会兴办一些工业，这时候就需要考虑不使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已有的生产設备閑置起来。只顧沿海城市，不

顧內地，以致热水瓶等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也要集中在沿海生产，远程运到內地，是不对的；但內地样样都要求自給自足，排斥外来的产品，必然造成已有設备的浪費，也是不对的。

国务院通过的工业、商业和財政三个改进管理体制的規定，是不是十分完善，將来不需要再作改进了呢？不是的。比如改进財政管理体制的規定中就說到，由于剛开始实行，各方面都無經驗，准备在实行一年以后，必要的时候再作局部調整。我們說，国务院制定这三个改进管理体制的規定，是十分愼重的。自从毛主席去年在关于“調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报告中提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个問題后，曾經开过一系列的会議，組織各地进行过多次討論，不久前党的三中全会也專門作了研究，前后費时一年多，才定下来。因此，这个改进，从現在看来是完全正确的。

全民整风开展以来，許多同志已經在实际工作中感覚到一个新的生产高潮正以千軍万馬之势奔向前来。农村里，展开着兩条道路的大辯論，更坚定了广大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中共中央發表的全国农业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又鼓舞起广大农民更大的生产热情。厂矿企业里，鳴放的高潮和整改的高潮已經出現，千万条意見提上来，許許多多的工作已有改进，生产面貌煥然一新。在全国范圍內，到农村去、到劳动中去、到基層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已成为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数以百万計的干部已經輕裝下放，或者正整裝待發。一个社会主义生产的新的高潮，确实在日益形成中。在这种情况下，改进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財政管理的体制，無疑給了地方迎接生产高潮、組織生产高潮以很大的助力。地方的党組織和政府組織，有的是有这方面的經驗的，有的还缺乏这方面的經驗，这就需要立即行动起来，認眞研究本地区的經济情况，正确地运用下放的权利，以便組織广大群众因地制宜地、更好地完成国家統一的社会主义建設計划。

發展生产力的重大措施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論

把大部分原来由中央各部門管理的企业、事业單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給省、市、自治区管理，这是我国經济管理体制的一大改革，也是貫徹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發展生产力的一个重大措施。

企业、事业單位和技术力量的管理权下放，是根据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結合的原則确定的。我們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們国家里，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結合，就是貫徹民主集中制，就是在中央的統一領导下，發揚地方和人民的积极性，更快更好地發展社会生产力。过去几年在工业和財經的管理体制方面，集中得多一些，差不多全国所有的大型、中型企业、事业單位和主要的技术力量，都由中央各部門直接管理。这也是当时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因为在三年的恢复时期，整个国民經济还沒有走上正軌，百廢待举，沒有比較多的集中就不能迅速恢复国民經济；在进入第一个五年計划建設的时候，我們也还缺少經驗，沒有比較多的集中，也就不能保証建設事业的順利进行。現在来看，过去的集中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也有一些缺点。这就是中央各部門对企业、事业單位的一些具体工作有的管得多了一些，發揚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我国是一个大国，一个省的面积比欧洲的某些国家还大，人口比某些国家的还多。各省、市、自治区的經济發展也很不平衡，有的工业比較發达，有的則比較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企圖用一个格式把全国企业管理起来，是很难管得好的。特别是九年来我們国家的經济情况已經起了很大的变化。新建的厂矿越来越多，旧的工业基地在不断扩大，新的工

业基地在不断出現。这些厂矿都由中央各部門直接管理，事实上是有困难的，即使勉强管起来，也很难对每一个企业进行具体的領导。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工业管理体制就必須有适当的改变，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發展。

早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东同志在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必須正确解决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結合的問題，指出要讓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使全国各方面的建設工作能够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也使中央各部門能够集中力量去办那些应当由自己負責办好的事情。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国务院根据毛澤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公布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規定，今年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共同作出了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項决定，就是把国营企业的管理权，除少数特殊的和試驗性的單位以外，都逐步下放給省、市和自治区。企业管理权的下放，將更有利于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相結合和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方針的貫徹，更有利于把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和自治区，一百八十多个專区和自治州，二千多个县和自治县，八万多个乡和鎮，十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和七十多万个农业合作社办工业的积极性充分發揮起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

企业管理权下放以后，企业的生产潜力就有可能充分挖掘出来。因为管理权下放以后，地方跟企业的关系就由間接的变为直接的了，企业的盈亏直接影响着地方財政的收入，直接影响着地方經济和文化事业的發展。这就使地方更加关心企业的生产和建設，更加积极地千方百計地發展企业的生产力。湖北省明山水庫的建設，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个水庫工程的規模比官厅水庫稍小一点。去年中央水利电力部批准这項工程的时候，投資一千八百一十六万元还怕不够，但是，去年冬天，水庫建設的管理权下放給湖北省以后，投資只要九百三十多万元就够了。一个明山水庫变成了兩个水庫。这是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地方党委比中央各部門更能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發动群众，依靠群众，勤俭办企业。例如湖北省水利厅考虑到民工修

水利的积极性，將灌溉支渠的土石方工程改由群众自办，节省了投資，用以兴修其他水利工程，农民都很滿意。同时，这个水庫的移民工作由麻城县包干以后，麻城县就發动受益区群众为迁移戶搬家盖房，帮助迁移戶安家，經济实用，效果更好。至于这个水庫在修建对外公路和非生产性建筑方面，也都因为充分利用了当地群众的积极性和其他有利条件，投資也大大減少。这些都是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难于做到的。

刘少奇同志在向"八大"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中指出："随着管理体制的改进，随着生产建設事业的躍进和群众覚悟的提高，必須認眞地、有系統地改进現行的关于經济工作以及其他工作的各种規章制度。"經济工作的規章制度是反映經济基础并为經济基础服务的上層建筑，它必須适应生产力發展的需要。我国現行的經济工作的各种規章制度，不少是根据以前的管理体制制訂的。現在根据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結合的原則，根据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方針，依靠群众，全面审查一次現行的規章制度，十分必要。对其中合理的能够促进生产的部分，应当保存；对不合理的不利于發展生产的部分，应当进行修改或取消，制訂适合于新情况和需要的規章制度。这样，我們才能使上層建筑进一步适应于經济基础，适应生产力發展的需要，更加推动生产建設的高潮。

我国現有的企业和事业單位的分布很不均衡，原来工业很發达的省、市接管的單位和技术力量要多一些，原来工业很不發达的省、自治区接管的單位和技术力量則少一些。因此，在企业、事业單位和技术力量下放以后，企业、事业單位和地方党委、人民委員会，除了保証完成中央規定的計划任务以外，还应該本着老厂支援新厂、工业基础强的地区支援工业基础弱的地区、技术力量强的單位支援技术力量弱的單位的原則，繼續發揚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积极完成原来的协作任务，接受新的协作任务，帮助那些工业不發达的省、市、自治区和地方，迅速地把地方工业建設起来。在这一方面，辽宁省工业厅提出的"宁願自己少拿些設备，也要帮助别的省市快点發展工业"的口

号是值得推广的。根据这个口号，他們今年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地方工业生产的机械設备供給别的省市。这种互助协作的精神，应当大大發揚。

企业管理权下放以后，是不是中央各部門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責任就減輕了呢？从对企业的管理事务来說，是減輕了，但是，从在社会主义建設中所負担的任务来說，不是減輕了，而是加重了。中央各部門除了管理好少数特殊的和試驗性的企业、事业單位以外，还要集中力量做好全面規划，組織全国大协作、大平衡的工作。中央各部門还要通过搞試驗田的办法，抓几个重点企业，总結和推广各地的先进經驗；要組織对新技术的研究和采用，做好技术指导和提高的工作。这些工作比起具体管理企业的工作来要复杂得多和繁重得多。中央各部門必須在整风的基础上繼續改进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深入基層，跟地方密切联系，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企业和事业的管理权下放，仅仅是为生产力的發展創造了条件。再好的条件，也必須經过人們的利用才能生出实际的效果来。現在，各地方都积累了很多的領导和管理企业的經驗，职工群众的干勁十足，只要認眞依靠群众，我們相信，管理体制的这一重大改进一定能大大地促进生产力的發展，大大地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

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創举

一九五八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論

四月二十五日本报發表的黑龙江省庆华工具厂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由职工群众創造出来的大胆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經驗，是一項具有重大意义的創举。这些經驗，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科室、車間管理干部每天参加半日劳动，厂級主要領导干部每周参加一天劳动；二是工人在車間行政的領导下，直接参加生产小組的一部分日常管理工作；三是坚决改进企业管理业务，即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这三个方面的工作互相結合，互相推动，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善領导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关系，进一步提高广大职工主人翁的責任感和积极性，从而推动了生产的大躍进。

干部参加半日劳动和工人直接参加小組日常管理工作以后，首先在管理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关系上，發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在我們社会主义企业中，生产資料归全体人民所有，企业管理人員和工人都是为建設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偉大的共同目标而奋斗。他們相互之間，在政治上是完全平等的，在工作中是同志式的关系。这与旧社会中企业管理人員对工人的剝削压迫关系根本不同。但是，这并不是說完全沒有問題了，在他們中間还經常存在着某些旧的生产关系的殘余，例如有这样一些管理人員，他們不是以平等姿态对待工人，而自認为是高人一等的、專門指揮和管理别人的人；他們只是高高在上發号施令，既少深入生产現場，又不参加体力劳动；他們認为，只要建立一套龐大的机構，繁瑣的規章制度，采用單純行政命令的办法，就可以把企业管好。因此，他們忽視工人群众在企业中主人翁的

地位和作用，不依靠群众的創造性和自覚性来办好企业，忽視了我們党的群众路綫的优良傳統，因而造成了严重的脫离群众、脫离实际的傾向。这就是我們所說的官气。工人們对于这种現象是不滿意的，某些工人甚至因此产生一种錯覚，也認为“管理只是干部的事，工人只管干活”。这就表現了在企业中还存在有一些旧的生产关系的殘余，它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工人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的發揚，不利于生产力的迅速發展。党中央指示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在企业中开展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徹底改变干部的思想作风，提高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覚悟，以便有效地克服这种旧的生产关系的殘余，使領导和被領导之間的关系眞正成为社会主义的平等、互助、合作的相互关系，以推动生产力进一步的大發展。

庆华工具厂的領导干部和全体职工同志在这一方面表現了革命的創造精神。这个厂不仅領导干部每周参加一天至一天半体力劳动，而且实行了科室、車間管理干部每天参加半日劳动的制度；与此同时，这个厂的工人在車間行政的領导下，分工直接参加生产小組的一部分日常管理工作。干部参加劳动特别是工人直接参加生产小組日常管理工作的实际行动，有力地証明了，在社会主义企业中，領导和被領导、管理人員和工人，只是工作中应有的分工和职責任务的不同，而沒有什么高低、貴賤的差别。因此，管理干部不仅应当从事管理工作，而且应当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工人不仅从事生产，而且应当参加一定的管理工作。这就使人們在思想上产生了新的变化，大大地提高了工人主人翁的責任感，使爱厂如家、爱护国家財产成为风气，使相互之間批評和自我批評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發展，使集体主义的思想大大發揮起来。庆华工具厂的工人，对干部参加劳动前后的变化，作了这样对比的描写：“过去本本拿在手，看見困难扭头走，生产任务急如火，他們稳坐办公楼；如今干部向下走，我們一起来动手，理論实际一結合，一切問題不發愁。”現在，在这个厂子里，工人对和他們一起劳动的干部，也像工人之間那样亲切地称呼“張师傅”、“李师傅”了。这就使干部和工人能够互相帮助，互相諒解，分工合作，相处無

間。这种新的相互关系，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大躍进。在庆华工具厂之前实行工人参加生产小組日常管理工作的黑龙江省建华机械厂，"躍进計划天天被打破，时时要修改"；工人們普遍更加关怀企业，关怀产品，关心集体，主动协作，对于自己分管的业务，克尽己責，井井有条。他們提出了"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干"；"生产好、管理好、文武双全"的口号。他們的生产、工作和学习的热情都空前高漲起来了。对于管理干部来說，他們的工作更加主动，有可能从事务堆中解放出来，集中力量解决企业中的重大問題，更好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为又紅又專創造了有利的条件。

庆华工具厂和建华机械厂工人在車間行政的領导下，直接参加小組一部分日常管理工作的措施，进一步丰富了我們管理企业工作的經驗，使我們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可以更加完备起来。民主集中制是我們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根本原則。企业領导者在国家工业管理机关的領导下对企业进行統一集中的管理，是社会主义的計划經济和現代化生产特点所决定的。但是，正如党中央所一再指示的，高度的集中必須建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在企业管理工作中，在加强集中領导的同时，必須不断扩大企业的民主生活，坚决貫徹执行党的群众路綫。为了实現党中央所指示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級办好企业的方針，几年来我們曾經采取了許多有效的措施，特别是实行了党委領导下的厂長負責制和党委領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这兩个基本制度，企业內部的关系和各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变，管理工作显著提高。但是，怎样使广大工人群众都有可能直接参加工段和小組的日常管理工作，以便使民主集中制这个根本制度在企业管理上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却仍然是一个沒有得到妥善解决的問題。庆华、建华兩个厂的創造，使我們在这方面找到了新的途徑。把工人直接参加小組日常管理的办法，同党委集体領导下的厂長負責制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結合起来加以运用，并且在运用中不断充实和創造新的經驗，就可以逐漸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能够貫徹执行群众路綫的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

庆华和建华兩个厂，在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同时，还进行了以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为主要內容的业务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这兩个厂子里，也和其他的單位一样，存在着一些束縛群众积极性的陈規陋章和繁瑣的制度手續，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發展和管理工作的提高。在干部参加劳动和工人参加管理以后，这些陈規旧章对生产的障碍作用就暴露得更加明显和突出。有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如果不馬上加以改变，就無法推行上述这兩項措施。这兩个厂的同志們采取了正确的依靠群众、領导和群众相結合的办法，大胆地突破了許多陈規陋章，建立了一些新的合理的制度，既有利于生产，又便于群众参加管理。庆华工具厂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創造性，几天之內就廢除和簡化了二百六十三种表报，修改了一百五十八种制度，并且建立了由有关职能科室把材料、医藥和錢款送到生产現場的所謂"三送上門"等制度，服务生产，便利群众，受到了广大工人的欢迎。事实証明，要管理好現代化的企业，沒有一套科学的規章制度是不行的，几年来有关管理机关和企业所制訂的各种規章制度，許多还是适用的，但是，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已經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發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須加以修改或廢除。社会主义企业的規章制度，必須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原則，必須要能促进生产力的發展，便利工人进行生产活动和参加生产管理。因此，在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事业的路綫下，在經过整风运动群众覚悟提高的基础上，采取群众路綫的办法，改革規章制度，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庆华工具厂和建华机械厂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創举，是在党的領导下，在整风运动中，在干部和工人群众共产主义精神大大高漲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成果。这就再一次表明了，党的領导，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济工作的保証。思想和政治是統帅，是灵魂。事实很明显，沒有整风运动这一場偉大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沒有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思想上的大解放，就不可能出現这种在高度主人翁思想覚悟基础上所产生的創造性的行动。加强党的領导，加强

政治思想工作是改革企业管理的重要保証，不仅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如此，在改革之后进一步貫徹各項新的措施和新的制度的时候更是如此。

庆华、建华兩个厂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經驗，是我們企业管理經驗的新的發展，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原則的。这些經驗已經在黑龙江省各工业企业中普遍推广，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各地都应当研究这种經驗，并且选擇一批条件較好的企业加以試驗，取得成熟的經驗后逐步加以推广。在試驗和推广过程中，要加强領导，及时發現和解决問題，注意总結新的經驗，以便使之更加充实和完备起来。

〔附〕

关于干部参加生產、工人参加管理和業務改革經驗的初步总結

中共黑龍江省国营慶華工具厂委員会

自从党中央發布了关于各級領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以后，特别是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和中央轉發了湖北省紅安县干部种試驗田的經驗，对干部的教育极大，在干部思想作风上、工作方法上，發生了一系列的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就是車間和厂級职能干部，每天参加半日劳动，半日工作，建立了干部跟班劳动和工作的制度，厂級主要領导干部（包括科長、主要技术人員和党委部長以上干部），每周参加一天劳动，其中以半天集中起来参加組織的“三条龙”的劳动（选擇兩个先进一个薄弱車間，組成了“三条龙”），另以半天分散参加其他車間的劳动。这样使点与面、抓先进与落后結合起来了。干部参加了劳动，不仅鼓起了生产干勁，而且激發了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空前未有的积极性。工人按生产的联系和需要，組成了生产管理小組（十人左右），在上級領导下，实行工人对小組生产、技术、經济全面的直接管理。由于干部参加了劳动，工人参加了管理，就促使职能管理干部，对原来管理上一套繁瑣的业务規章制度，不得不进行“革命”性的改革。在广大技职人員的努力下，几天内共砍掉和簡化了表报二百六十三种，占原有数百分之五十以上，仅就經营和材料兩科，减少表格所少盖的印章，全年有一百九十五万二千八百个次，如以兩秒鐘盖一个章計算，一个人在每天八小时内連續不停的盖章，也得盖一百三十多天。修改了不合理的工作制度一百五十八种。如过去車間安裝一盞电灯，从申請到安裝經过往返十五道手續，現改为由車間保养

員直接安裝即可。通过这次改革，重要的是开始解决了职能管理部門脫离实际脫离群众的思想作风，克服了互相扯皮、踢皮球，所謂互相制約、以及不深入生产面向生产等長期存在的严重缺点。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和管理业务改革三个方面的問題，是企业里帶有根本性的問題。而三者又是相輔相成、互相有机联系着的。这次所以能够順利解决，是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結果。在整风运动中，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的政治思想覚悟普遍地显著地提高了，革命干勁空前高漲。实际証明，政治是統帅，是获得上述根本轉变的基础。干部参加劳动，不仅克服了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密切联系了群众，及时發現与解决了問題；有力地推动了生产，而且鍛煉了干部，使干部学习与掌握了生产技术知識，把紅与專、政治与技术統一起来了。依靠發动工人参加生产管理，是办好企业的基础。我們厂过去也老是喊要依靠工人阶級，但是長期碰来碰去，沒有摸到一个門路，通过整风运动，現在我們初步摸到了門路，解决了过去在生产中从未解决的重大問題。工人参加管理，大大提高了思想覚悟，加强了工人主人翁思想，具体体現了工人阶級当家作主；增强了工人阶級团結和互助，發揮了集体主义思想；給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后备干部。在干部参加生产和工人参加管理以后，已經形成了人人既是管理者，又是生产者，使人們在思想領域里發生了根本变化。使生产与管理、領导与群众紧密結合起来了。上述三个方面，使我們找到了依靠工人阶級办好企业，貫徹执行党的群众路綫，找到了一个具体的正确的途徑；調整了領导与被領导的矛盾，正确地解决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調整了企业的生产关系，使企业上層建筑适应了生产力的發展。因此，这些工作的推行，給企业生产力的飞躍發展，开辟了广闊的前景。今年第一季度計划已提前超額完成，現在初步制訂的全厂躍进計划，总产値已比去年实际完成躍进了一翻以上，主要产品的可比成本比去年降低百分之五十，全厂技职管理干部由占百分之二十三降为百分之七点五，而且还每天参加半日劳动。由于实行了工人参加管理，工段長和記录員普遍取消，減少了一級層次。

（一）关于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从一九五七年五月，为貫徹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我厂各級干部开始每周参加了半天劳动，由打扫环境衛生、修路等簡易劳动，逐步参加到生产中的运料、推鉄屑等輔助劳动。这样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对干部参加生产是为了領导好生产的目的認識不明确，加之方法不对头，地点沒有固定，結果解决不了生产中的根本問題，因此多数干部泄了勁。以后当工作一忙时，在絕大多数單位中就逐漸把已經建立起来的这一制度取消了，又回老路上去了。

但是，一車間（鍛工）領导干部却沒有这样，不但沒有“回老路”，而且还逐步發展了。他們早就体会到干部参加劳动好处很多。在一九五七年春节前后，車間領导干部，曾兩次利用假日帮助工人把兩台錘修理好了。上班后，有些工人告訴坏了錘的工人說：“你們的錘由干部們給修理好了”，而他們还不相信。后来一試果然修好了，工人們对干部的看法开始轉变了。

中央發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后，一車間干部感到中央指示太正确了，便正式規定由車間主要干部到所有干部，由参加輔助零星劳动，轉到直接参加主要生产劳动，由每周半天到一天，最后發展到每个干部每日半天参加生产、半天工作，实現了边生产、边領导。在任务紧急时，甚至曾經連續整天参加生产。

一車間在实行干部半日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許多干部在車間支部規定了每个干部每天参加半日生产、半天工作的制度后，思想顧虑就發生了。

当时的思想顧虑主要是三怕：一怕把管理、业务搞乱了。有的說：“干部成天管还管不好呢，参加半天劳动，管理工作不就更乱套了嗎？”二怕干不好丢人。有的講：“要在生产中出了廢品，出了事故，达不到定額，工人还不把咱們大牙笑話掉！那今后还怎么教育工人？”特别是老工人出身的干部，認为自己过去技术等級高，現在参加生产还得向青年工人学习，这多丢人。三怕干活不頂用。一些小知識分子出

身的技职干部，想参加生产鍛煉，学点生产技术，但怕参加劳动不頂用，又怕把自己的业务耽誤了。还有极个别的干部怕累、怕髒，根本不願意参加劳动。

事实証明，只要主要領导干部有坚强的决心和信心，用模范的实际行动来帶动全体干部，这些思想都是可以解决的。如一車間支書、主任等領导干部，始終帶头参加生产，并且注意領导生产、發現問題、解决問題，并以如何密切联系工人、教育工人的經驗来教育干部。通过实踐証明，干部参加半日劳动不但工作沒有"乱"，反而更加好了，不但工人沒有"笑話"干部，反而和干部亲热起来了。这样把一些干部的思想顧虑逐漸消除了，許多干部認識到只有参加了生产，才能領导好生产。

一車間的經驗，我們开始是認識不足的，但由于以后省委一再督促，特别是学习了中央关于"試驗田"的指示，使我們逐漸地重視了。于是党委在今年三月二日組織了全厂干部，学习了一車間的經驗。在沒有介紹一車間經驗以前，曾有一部分干部說："一車間小，又是鍛工，比較簡單，在大車間，机械加工車間，未必行得通。"但介紹以后，广大干部被一車間許多生动事例教育了，都一致口服心服，再沒有人說"干部参加生产不行"，"机械加工車間行不通"。因此，不仅車間都普遍行动起来了，而且还推动了一部分科室干部也每天参加了半日生产，和厂級主要領导干部每周参加了一天生产。現在干部参加生产，領导生产，在全厂已經形成了自覚的行动。

干部参加生产的形式：

由于干部的具体条件不同，因而参加生产的形式也应該有所区别。1、我厂車間干部参加生产的形式有四种：一是老工人出身的干部，一般是針对生产需要和部門工作需要，可以固定生产崗位，掌握一道生产工序，也可以"堵缺"（如工人缺勤，生产出了問題）。但固定崗位时間不宜过長，一般以一个月左右为宜，再長了不便于了解車間全面情况，短了不易达到定額。二是知識分子出身不懂操作技术的干部，主要是固定崗位，拜师学艺，帮助老师傅作輔助工作，边学边作，逐步鑽研一門技术。三是技术干部，主要是針对生产技术关鍵，参加

生产，一般不宜固定崗位，便于解决技术关鍵問題。四是特殊工艺（如淬火、鑄、鍛等）單位，因多是爐組作业，可以組織干部爐組进行單独作业，也可以分散和工人参加一起劳动。但証明后者較好，便于干部和群众結合。2、科室职能干部，参加每日半日劳动形式与要求，原則上与車間干部相同。但科室不是直接領导生产單位，因此，干部下去要和車間取得紧密联系，一般的应固定在一个車間內。3、厂級主要領导干部（包括科長、主要技术人員和党委部長以上干部），組織了"三条龙"，选擇了兩个先进車間和一个薄弱車間，把主要干部集中起来，每周以半天参加"三条龙"的生产，半天分头帮助車間研究与改进工作。另外，厂級主要領导还各分了一个車間，也在每周参加半天生产，并把"龙"的經驗与問題，結合車間的情况进行重点帮助。

但是所有参加生产的干部，都必須把参加生产和領导生产、参加生产和部門工作紧密結合起来，并帮助工人把区域小組的工作加强起来。

干部参加生产必須注意，1、各單位的領导干部，在参加劳动的时間上要交錯开，一般是党、团支書和工会主席，行政正职和副职以及技职干部之間，要上下午分开（我們对全厂作了統一規定，如支書、正主任都在每天上午干活，其他都是下午，或与此相反），并且要采取业务串連，互相协作的方法，以便既保証干部半日劳动，又保証車間正常管理业务的进行。厂的領导部門要尽量減少会議；2、干部下去要模范地遵守各項制度，特别是生产安全和工艺紀律；3、要放下架子，服从分配，虛心向工人学习，做到既是工人、又是領导，既要参加生产、又要領导生产。

干部参加生产取得的主要效果是：

1、克服了領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及时發現与解决了生产上的問題，以推动生产的發展。过去管理生产的狀况是：干部坐在办公室里看表报、盖圖章、憑开調度会、靠干部彙报来掌握情况，依靠会議解决問題。生产上發生了关鍵問題，就从工人到車間主任層層向上彙报，車間主任就一次、再次召集开会，最后結論还是責成某某工

長、技师去和厂部某科室研究解决。干部参加生产后，情况就变了。如二車間主任，头一天到一台压刀机上干活，發現床头一个螺絲松了，主任想找扳子也沒有，耽誤了老半天，問工人你們过去怎么办的？工人說："这个問題向領导不知反映了多少次，領导不当回事，沒有办法我們只得用手撐，再不，就用'榔头'敲敲。"主任干完活就告訴車間修理班，馬上檢查將沒有扳子的机床各配了一套，全車間的这个問題就解决了。由于干部参加生产及时解决問題，大大地推动了生产。以一車間为例，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以来，月月都超額完成任务。特别是在今年二月份，不仅工作日少，而且任务比1月份多百分之二十（等于去年十二月份实际完成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但仍然提前一天半完成了任务。

2、进一步密切了領导与群众的关系，解决了領导与被領导之間的矛盾。过去一些工人說干部是"蹓蹓躂躂，走馬观花，解决問題，光用嘴拱"。"挟本子的太多了，晃晃蕩蕩不像話"。工人把干部諷刺为"官"，对干部不說心里話，但是干部参加生产后，工人对干部的看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干部参加劳动，对工人影响极好，加上干部参加劳动后，对工人生产、生活、思想情况了解具体，解决及时，工人更加滿意了。干部和工人經常在一起干活，不分彼此，工人有什么心里話都向干部講，也願意听干部的話了，現在工人对干部是一呼百应。工人說："我們和干部的区别只差四个点了。"（意思是只差四个小时）。

3、由于干部参加了生产，进一步發揮了各种組織的作用。过去干部多，又不参加生产，所有工作都由干部包下来，所以各种組織作用和群众作用不能充分發揮。干部参加半天生产后，工人变了，什么事工人都自己主动找着干。車間工会工作，过去就是主席一人干，現在各种委員会都負起了自己的責任，比脫产主席办得更漂亮。党的支部委員和小組、党員，現在很多具体工作不用支部布置，就自己主动召集宣傳員会、小組会，进行研究，及时布置党員联系群众，保証完成任务。許多行政專业干部，通过劳动結合自己业务，也都發揮了积极性和主动性，克服了工作上的推脫依賴現象。一車間工具員曲功超过去工人找他要鉗子、鈎子时，他說："模型供应上就行，别的我不管，你們

自己解决去。”但他参加劳动后，亲身体驗到缺少工具的难处，于是主动征求工人意見，統計缺什么工具。工人提出了三十八条意見，兩天的工夫基本解决，群众反映很好。

4、由于干部参加了生产，既鍛煉改造提高了干部的思想，又使干部学习与掌握了一門專业生产技术，因而使紅与專、政治与技术統一起来了。对于工人出身的干部，虽然他們过去掌握了一定技术，但是随着生产新技术的不断出現，他們已經跟不上發展了。同时由于当了干部脫离了生产，不仅脫离了群众，产生了官僚主义，而且对許多生产技术現在已經生疏了，不如青年工人掌握得熟練。因此，干部必須在通过参加生产中密切联系群众和逐步掌握提高新的生产技术以适应生产發展的需要，从而領导好生产。如工具科党支書于东城（老工人出身）在参加生产中积极会同技术員和工人先后进行了十二項技术改进，其中改进旧車床半自动化就提高效率四倍。这样就使政治和技术統一了，并且干部脫离群众的現象也逐漸消除了。如工具科副科長吳克謙，过去不經常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并且工作方法生硬，但参加劳动以后，群众对他的看法改变了。对于一些新旧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来說，参加生产鍛煉当然更是需要。但因目前工作情况，这些人又不能一下子全部当工人去鍛煉，因此通过边工作、边劳动的半脫产鍛煉，这是一种最切实最有效的方法。而这些干部也有这样要求。机动科助理工程师朱璧街（大学生）参加板金組劳动后，他說：“我經过亲身体驗，工人用手操縱卷筒机太累了，卷八公厘鋼板得六个人干，續料的、打錘的都滿头大汗，过去我認为这活有手就能干，現在才認識到不是那么簡單的，我准备馬上改进一个半自动化工具，解除工人笨重劳动。”通过干部半脫产劳动的实踐証明，所有干部，無論从思想上、技术上、业务上都有了很大提高，体現了党中央关于干部参加劳动指示的重要作用。

（二）关于發动工人参加管理

由于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职工的思想覚悟和主人翁責任感大

大提高，特别是反浪費反保守运动中，广大职工深入揭發了企业管理中存在的严重問題，这些問題不仅造成了国家大量的損失浪費，而且工人个人利益也受到了一定損失。工人群众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設速度，爭取实現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偉大号召，迫切要求全面改进企业工作，特别是企业管理工作。所有这些，都說明了广大工人群众对企业管理改革，参加企业管理工作，是有强烈的內在要求的。

今年三月二日，由于推行了一車間干部参加生产的經驗，全厂干部認眞貫徹执行了干部参加半天生产、半天工作的制度后，对广大工人群众影响极大，轉变了对干部的看法，直接激發了工人参加管理工作的积极性。虽然干部参加了半天生产，及时發現与解决了生产中的問題，提高了管理工作，但因缺乏广大群众的基础，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混乱現象。因此，摆在面前的任务，必須依靠群众，吸收与組織群众积极参加管理工作。今年二月末，党委書記在省委参加市地县委書記会議时，听省委說某厂有实行工人参加管理的經驗（但具体情况不知道），三月初为了吸取經驗，組織了工作組，在六車間选擇了一个章士良小組（六个人），进行了工人参加管理的試点，經过一个星期的时間，实际效果很好。根据这些情况，在三月十日把章士良小組的經驗，开始在一、六車間全面推行，其它車間在少数小組試点。但經过三、四天的时間，广大工人劲头极大，發展极为迅速，仅在很短时間內，就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效果与經济效果。到三月十五日全厂普遍推行起来了。目前工人参加管理工作，正在蓬勃地深入开展。

工人参加管理的形式、內容和方法：

我們認为搞好企业管理工作，不仅仅是要加强厂級和車間的領导，更主要的是要依靠群众，發动与組織群众参加管理。我們的作法：在工段范圍內，按生产特点，划分若干生产小組，在目前开始推行和工人业务不熟的情况下，人数不宜太多，一般十人左右为宜，便于小組的管理，在經过一个时期，工人的覚悟与业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后，可适当扩大一些，但也不应过大（二十人左右）。小組屬工長直接領

导。在生产小組內，实行工人分工負責，把小組的生产、技术、經济等工作全面地管理起来。小組內每个人的分工是根据每个工人的特長和具体条件，將管理工作如考勤、記录、計划、工具、保护用具、質量、設备等，分給每个工人一件具体管理工作任务（目前小組人数少的是分担兩件工作），小組內最好一人至少分管一件，不要有空白，否則对沒有分管着任务的工人会有刺激。如人数較多的大組可兩人分管一件任务，但要确定一人負主要責任。在小組分工时，必須由工人自己討論，民主分工，不要由領导指定。

必須認眞愼重选擇組長。組長的好坏对小組影响很大。但因开始試行沒有經驗，現在我們采取了行政任命和民主选举后由行政任命兩种作法。我們認为后者較好。但無論采取那种方法，都必須貫徹群众路綫。在选擇組長时，我們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和群众有联系幷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二是能大胆負責，对事业忠心耿耿的；三是有一定技术水平，一般能熟悉、掌握、指导本組生产技术的。

領导必須坚决相信群众，大胆放手讓群众管理。因此，車間、工段应該將一定的职权下放給生产小組。放那些权呢？根据初步試行不成熟的經驗：（1）根据生产情况的需要，小組有权指导与調配本組人員的工作，以便及时調度解决生产中出現的問題；（2）小組有权考核本組人員的工作成績，作为評比优胜的条件和評奬；（3）小組有权提出对經常严重損坏工具、出現廢品的人員的处理意見；（4）小組長有权批准本組工人不超过四小时請假，免得事事找干部，还可以及时处理問題，但应及时向上彙报；（5）小組在年、季計划和定額限度內，有权提出物料需用計划（根据情况可按定額一次發給小組一月或半月的）；（6）小組工人应服从小組長的領导。

工人参加管理的方法：

为了充分發揮工人参加管理的积极性，除人人分管一件事以外，还必須注意解决小組的活动时間，以保証小組开展各項工作。我們厂是这样的：早晨上班前十五分鐘，小組安排本日工作，晚上下班后十五分鐘檢查当日生产情况和进行每个工人分管的业务工作。每周

規定一天时間(一个小时)作为小組全面檢查一周来的工作（具体日期由車間根据生产情况临时确定）。生产过程中的活动时間是根据生产关鍵在空隙时間来进行，原則上不能影响自己生产。每个工人所分管的业务工作进行的具体方法，主要是充分运用小組会議和提高小組会的質量来开展各項工作。但必須要結合小組內的当前生产关鍵，有重点地抓住一、兩个問題，發动大家集中分析研究，找出原因与改进意見。对于思想覚悟不高而造成錯誤的，应开展互相批評，加强团結。

經过鳴、放、辯，提高了思想：

我們認为要切实开展好群众性的管理工作，并把它持久、巩固地發展起来，必須首先建立在群众高度思想覚悟的基础上，克服各种不正确的認識。沒有这一条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在开始时一面在車間以上的主要領导干部中，要求坚决依靠群众，树立坚强信心，全党动手，發动群众搞好管理；一面在群众中开展大鳴、大放、大辯論，澄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認識。作法上是采取了边放、边辯、边試、边推的方法。

开始时，有些干部对加强管理工作的意义，是認識不足的。把管理工作簡單地理解为，就是讓工人把各項原始記录工作統計上报車間就可以了，然后，由厂部彙总报部局和作为安排計划的根据。工人对这样作，認为沒有什么大的困难。以后我們逐步明确了，認为管理工作，不仅仅是限于統計、記录，更重要的是群众通过各項統計記录，及时由小組的工人群众进行分析，發現与解决生产上的各种問題。比如工人考勤員要分析本組今天某某人为什么沒有出勤，找出原因来，并及时針对情况进行工作，想尽各种办法，使本組人員达到更高的出勤率。工人工具員不仅要保管好工具，还要紧紧掌握本組工具的消耗定額，并对損坏工具的現象及时找出原因，研究解决办法，达到工具的最大节約。又如工人計划員，要通过本組統計，分析研究每人今天达到定額与达不到定額的情况，对好的要組織学习他們的經驗。其它各分工的"員"也都应該把自己担負的一項管理工作任务，切实

担当起来。我們認为这样作，才算是工人眞正地搞好了管理，当家作主，办好企业的样子。当領导把这样的要求和工人講了以后，絕大部分工人說能办得到，但还有一小部分工人产生了思想問題：第一、有人嫌麻煩，嫌費事，怕管不好。說："干部参加了生产，管理工作交給我們工人了，要这样，还是叫干部不参加半天生产，他們專門搞管理，我們管干活。"第二、是怕得罪人，顧虑自己要把責任負起来了，怕别人不听自己的話，說："这玩艺够嗆，管工具掌握太严了，群众有意見，都給新的不够用，給旧的不同意，不好办"，"一人管一件事，將来互相报复怎么办？"第三、是怕影响自己生产。說："这么多工作都叫咱們干，什么时間干呢？工作时間干影响生产。"

在干部中（主要是車間干部和工長）的思想顧虑主要是不相信群众，怕搞乱了。有的干部說："干部專門管还沒搞好，要是交給工人管，还不給你整乱七八糟的！""工人管，小倉庫得更多了，尽使新不使旧的了。"其次是顧虑工人管理起来了，怕减少車間的干部，怕下放。

为了开展群众性的辯論，进行群众性的自我教育，把放出的这些問題，归納起来出了几个題目。如："光靠專职干部管理好，还是由工人也参加管理好？""工人自己管会不会管乱了？""工人管理有啥困难，能不能行通？"工人在辯論中揭發了管理中存在的漏洞，講了很多很深的道理。如有的工人說："过去工長記賬，是看活記工时，活多点大，活少点小，反正不讓工人賠錢，工長为的是好領导，这是叫国家吃亏。要是我們記賬，就得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多記，多記了那还像当家的。""过去記录員下来記賬，我們說多少是多少，他根本不查，那怎么能准呢？我們記比他准。"有的說："干部参加劳动，是鍛煉又紅又專，这是毛主席号召，干部应該参加劳动。"又說："过去記录員記賬，有时把張三的活記在李四的賬上，我們記就不能那样。"通过群众性的辯論，是教育群众最好的方法，把那些說工人管理不行的人，教育过来了。同时在边試边辯中，把那些搞得好的典型小組和典型人物的事迹，及时进行了傳播，更有力地教育了群众，教育了干部。

思想弄通了，問題得到了順利的解决。

这一工作虽然开展时間不長，但取得了显著效果。

1、实行工人参加管理，是搞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作的基础。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人，每个人都是企业的主人，人人有权力和有責任参加企业管理工作。从过去总的情况来講，是依靠了工人阶級，因而，企业有了很大發展。但是在具体工作上，我們还是低估了工人的政治覚悟与管理才能，总不大相信工人。我們过去强調加强企业管理时，主要是片面地依靠增加职能人員，充实职能机構，制訂各种制度規章（当然有些是必需的），但是忽視了基础，忽視了發动工人参加管理。結果管理机構臃腫，手續繁多，管理工作沒有迅速提高，仍然落后于生产發展的需要。現在，由于工人参加了企业的基層管理，使企业管理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面貌，完全出現了一片新的气象，工人責任心普遍加强了，及时解决生产中出現的問題。如一車間刘福小組，每天生产計划是五百二十五个活，兩个月来每天只干三百三十个左右，过去工段記录員記完就走，工人也沒当回事。实行工人管理后的第二天，小組的工人記录員到下班后統計，看只完成了三百三十个，要求組長当即召开了小組会，进行了研究，找出的原因是生产准备工作不好，浪費了生产时間。討論中各自提出：燒火的上班提前二十分鐘点好爐子，开錘的帮助燒火添煤，幷事先檢查好錘，掌鉗的在上班前作好一切工具准备，一到上班时間就开始工作，結果由三百三十个增加到五百六十八个活。六車間工人廖成緒在一天夜班干活时，提前回家兩小时，假記工时，虛报产量，次日被小組計划員發現了，对廖进行了批評教育，幷把虛报記录改过来了。像这些事过去工人从来不过問，而工長又根本顧不到，管不了，漏洞百出。

2、实行工人参加管理，改变了管理形式，使管理工作形成一个群众性的管理網，保証了生产与管理的統一，使职工既是生产者，又是管理者，从而調整了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解决了領导与群众之間的矛盾，調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奠定了管理工作的基础。仅从三个主要車間工人参加管理后，就創造了四十一个新的管理方法，改革了九項

管理制度。如工具車間姜庆林小組工人們創造了"串联生产"的管理方法，減少了換卡具时間，提高工作效率百分之八十；一、六車間的小組創造了"生产調度及时制"，一周內中断工时就降低百分之四十三点六，不少小組消灭了間断工时；二車間二工段薛蘭庭、張春海兩小組創造了"上下道生产协作"的方法，提高生产效率百分之三十。出現了一种人人关心管理，搞好管理的局面。鍛工車間工人把管理工作編成順口溜："鍛工車間响叮咚，工人管理喜洋洋，你考勤，我記录，料具管理帶維护，建設社会主义牢記住。"絕大多数工人在管理工作上都能尽职尽責，这样就把管理工作建立在巩固的群众基础之上了。由于管理方法的改革，促使生产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躍进，职工普遍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工具車間提出"用兩年完成五年計划"，全車間五十四个生产小組其中有五十个小組要躍进一至八倍，如赵魁生小組改进技术十三項，提出"用六个月完成五年計划"。全厂工人参加管理后，一周的时間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十二点五，突破定額，比前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全厂中断工时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二，到处都呈現生产新气象。工人們表示："有决心把企业管理得更先进。"这些事实有力地教育了干部依靠群众。

3、工人参加管理使工人阶級提高了思想覚悟，加强了工人阶級的团結，爱厂如家的新气象普遍形成。广大工人进一步加强了集体观念，生产上的互相协作得到了發展，由过去保証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变为保証完成全小組的生产任务。从实行工人参加管理后，小組生产任务都能按时完成，生产出了問題大家研究，及时解决。如工具車間，磨工小組十四个人过去有半数人不能达到定額，工人参加管理后，十四个工人集体負責，上下道互相帮助，全員达到定額，一周內提高生产效率百分之八十。六車間工人参加管理后仅十天，共解决了十个問題。如一車間燜火爐少，燜火組的工人就研究了增大加爐熔量，提高生产效率一倍半，解决了爐的不足問題。工人們主动負責的精神加强了，不仅出色地完成生产任务，更注意經济效果，如工具車間工人用廢料头制造了八百把刀具。一車間过去每人每月四副手套

不够用，現在每人能节約一、二副。工人們奔向先进已成为一种气氛，落后面大大縮小了，全厂迟到、早退、違犯劳动紀律現象几乎沒有了，工人們的組織性、紀律性加强了，工人之間比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結了。工人參加管理后，在原来精簡的基础上，厂級又进行了精簡，車間管理人員減少了一半，工段長和記录員普遍取消。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生产上的大躍进。

（三）关于改革管理業务

改革管理业务是在干部參加生产和工人參加管理的基础上發展起来的。党委提出全厂干部要抽出一半的时間參加生产的要求之后，在科室干部思想上引起了一个新的矛盾。他們虽然認識到干部參加生产、領导生产的道路是正确的，非走不可，但又覚得困难很多，怕行不通。我們分析，出現这种矛盾是合乎發展規律的。因为管理工作落后是个老問題了，虽然随着精簡机構解决了一些問題，但遺留的問題仍然很多，这次要求科室干部每周抽出三个半天參加生产，三个半天深入車間指导业务工作，是在老問題上增加了新的压力，同时工人參加管理又迫切要求簡化管理手續，这已是造成了"逼上梁山"之势，必須引导广大干部迅速地解决这个矛盾。事实上在这种新形势下，广大干部早已在千方百計地寻找出路，經营管理科副科長呂剛同志就是个突出的典型。他在党委召开的动員会后就找科內的同志研究解决問題的出路，第二天就向党委提出业务改革的决心書。經过党委研究，認为經营管理科是全厂經营管理的中心（是由計划科、財务科和会計科合并組成的），它的工作伸展到全厂的各个方面，如果先打开这一关，就会給全厂的业务改革創造有利的条件，从而推动全厂业务改革工作的迅速开展。于是我們决定順势利导，通过支持經营管理科改革业务的决心書，在全厂燃起管理工作大改革的烽火。

业务改革的主要內容：

业务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什么？这是首先遇到的一个問題。党委支持經营管理科改革业务的决心和号召全厂进行业务改革的行动，

对管理干部的鼓舞很大，紛紛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但問題的关鍵在那里？并不是很明确的。經过發动群众总結經驗、挖根源，摆出的事实很多，但綜合起来看主要有四方面的問題：(1)权力过多地集中在厂一級，很多生产上的問題車間無权处理，因而增多了办事的層次，拖長了解决問題的时間，結果是包的多，办不好；(2)过分强調互相制約，在一个互相联系的生产企业里，出現了許多人为的"矛盾"，造成了关系紧張，互不信任；(3)管理工作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不依靠群众的主动性和自覺性，缺乏群众基础；(4)工作追求形式，單純靠数字办事，使管理工作脫离生产、脫离实际。

进行业务改革的主要方法：

业务改革是牵动着企业上下左右和每个职工的工作問題，虽然明确了方向，但思想上仍有不少顧虑。他們一怕打破常規把工作的秩序搞乱。有的同志認为現行的工作制度是多年积累起来的，执行中还常出差錯，現在改得这么急，若是改乱了可沒法收拾。二怕違反上級規定的制度。如有的講：这些表格都是北京統一印来的，我們改了能行嗎？三怕提出的問題沒有根据，得不到領导与有关部門的支持，行不通。四怕簡化了工作程序用人少了，現有人員要削减，自己的工作不好安排等等。我們分析产生这些思想顧虑的原因：除了因为它牵連到干部的切身問題，还有些个人打算外，主要是思想仍受陈規束縛，还沒有打破陈規的决心。这种反映使我們开始認識到，改革管理业务，不只是要减少一些表格、修改一些制度，最根本的是要解决思想問題，思想束縛不解放，业务改革就不能徹底。因此我們提出业务改革要"大刀闊斧"地干，不要受清規戒律束縛，只要解决的問題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群众，就可以大胆地改。要放手發动群众，一切經过試驗，通过試驗解决問題，在实踐中进一步教育和提高干部。在这方面經营管理科的經驗比較突出，他們是由解决思想問題开始，通过揭露的具体事例，批判了不相信群众、不从便利生产出發的思想，对干部教育很大，表示决心解决这些問題。但是提高了思想并不等于改革了管理业务，因而在进入解决具体問題的时候，

又感到业务工作繁多，無从着手。后經群众研究認为，改革經营管理科的业务工作必須把"成本計算时間过長"的关鍵"炸开花"。因为成本計算不仅工作量最大，牽涉全科以至全厂的各个科室和車間，而且直接关系到全厂經济管理工作。这个問題不解决，經营管理科的工作就"翻不了身"。那么怎样才能"炸"开呢？他們找出解决这个問題有兩个难关，群众称之为"碉堡"：一是材料、工具核算問題。由于过去材料、工具核算花費的力量很大，拖的时間很長，不能及时供給成本計算的資料。經过一步一步地深追原因，認为工具、材料核算量大是因为領料票据太多，每日达二千三百張。票据多是因为現用現領，一料一票。这样有沒有好处呢？对大型材料和儲备不足的材料这样作是有必要的，但对一般材料这样作就沒有什么好处，而且会給生产帶来些麻煩，因为領材料的手續很复杂，有时找不到人还会耽悞生产。同时車間也有材料庫，一般材料也可以保存。怎样办呢？經过大家研究認为如果能很好地發揮車間材料庫的作用，适当地增加每次領料的数量，減少領料的次数，或將某些小型材料改为月初一次領料，即可減少核算量，又便利生产。另一方面改变过去票据来了"裝口袋"，月末一起統計的方法，代之以随来随算和深入庫房計价的方法，基本可以达到工作量平衡。这样就能保証在次月一日較过去提前兩天把有关資料供应成本計算出来。

第一問題解决了，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爭意志，接着向影响成本計算的第二个"碉堡"——工資計算迟緩的問題进攻。經过群众研究，發現工資計算迟緩主要是工作安排得不合理。业务改革以前，計件工資計算需要等到下月一日才开始，这样把上月的工資計算工作都推到下月初去作，工作量很大，不仅造成了月初紧張，也直接影响了成本計算工作。这回改为在月末的一天即开始計算，除去当天以外的全部工資，当月就完成了絕大部分工作量，到下月一日把上月最后一天的工資往上一加，就把月份工資全部計算出来。再加上簡化了工資金种統計法，提高效率七倍。这样第二个难关也打破了。兩个"碉堡"被攻下，不仅坚定了群众的信心，也訓練了群众解决問題的能力。

接着就提出全面"圍剿"、乘胜追击，进一步研究修改制度和权力下放等問題。方法是：每个人把自己的工作全面摆开，逐項研究，然后把改革措施和效果記在"記工卡"上。为了使提出的意見准确可行，对于那些牽动面較大的工作，則采取"一人提出，大家研究，实际表演，現場观摩"的方法，效果又快又好。他們經过一周的奋战，改变了过去的忙乱現象，使經营管理科的工作面貌煥然一新。在我們介紹了經营管理科的作法以后，全厂普遍学习了这种作法，在一个多星期里，就由改革业务工作發展到定机構，定人員，收到的效果很大。这些收获不仅是减少了一些表格，簡化了办事的手續，其更重要的收获是：第一、树立了經营管理工作为生产服务的思想和創造了一些便利于生产、便利于工作、便利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方法。过去材料科發料先由材料員作計划，車間主任签字，然后送材料科材料組审查，科長批准，最后到材料科領料，往复經过五道手續。現在改为送料制，由車間提出月計划，材料科統一送料。經营管理科会計人員也改变了蹲"衙門"的作风，实行"送款上門，就地报銷"的办法。衛生科也实行了医生車間負責制，节省工人挂号和候診时間。工人对"三送到門"非常滿意。第二、找到了工业企业管理工作上如何貫徹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發揮了技职人員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責任心。减少了扯皮的現象，加强了技术管理工作。如技术科过去一百二十多个人多是忙于修改圖紙、下达通知單等工作，很少有專人研究技术問題。业务改革以后，把一些一般的技术工作，交給車間技术員去作了，因而就能集中力量研究技术上的主要問題。他們現在只有三十个人，全年訂了六十三个研究題目，現在已經实現了十二个。第三、調整了不合理的职責范圍，下放了一部分权力，加强了基層，减少了办事層次，工作效率大为提高。以前合理化建議的处理非常迟緩，积压很多，业务改革以后消灭了积压現象，处理过程由八天减少为三至五天。第四，业务改革从管理制度上給克服"三风"、"五气"創造了良好的基础，为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創造了有利条件。

业务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几个問題：

(一)管理机構的設置要从实际需要出發，不要追求整齐划一，上下对口。业务改革中对机構設置問題，有人主張科下設組，有人主張不設組，党委綜合了双方意見的合理部分，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在已定的組織机構基本不变的基础上，根据各車間所担負的任务和規模，确定分为三种类型：(1)机械加工車間設三个組：經营管理組、生产准备組、技术組；(2)輔助部門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工具科設四个組，动力科設三个組；(3)特殊工艺部門，因为人少工作單一則不設职能組。

(二)要教育干部認識，簡化手續不是削弱管理工作而是为了加强管理工作，下放权力更不是放棄領导，放任自流，而是要在主要問題上加强指导和监督。在业务改革中曾經在一少部分人中出現过取消一切放棄領导的思想反映，这是非常有害的，需要加以糾正。

(三)业务改革工作方面要全面規划，加强領导，注意解决上下左右平衡的問題。由于业务改革中提出的問題很多，而且牽扯到各个方面，在解决这些問題时也曾出現过不协調的現象，因此需要統筹安排，全面照顧，免得顧此失彼，互不衔接。我們已經开了几次条条会議(解决上下之間的問題)，和塊塊会議(解决横的联系問題)，目前正在进行业务建設，把各方面工作的改革情况彙总起来，作一次全面审查和平衡，以便在那些旧制度打乱之后，立即建立新的制度，以适应生产大躍进的需要。

我們在上級党的領导和广大职工的努力下，虽然获得了一些初步成績，但是由于推行时間短，加上我們水平不高，因此，在工作上还存在不少問題。如干部参加生产如何进一步發揮全面作用問題，如何使干部有計划地迅速学习掌握生产技术問題；科室职能干部和党群部門干部，如何在参加生产中和部門业务工作更紧密結合的問題；工人参加管理后，厂級車間如何进行領导，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晝夜班生产小組如何进行分工搞好管理；业务改革后如何进行全面安排，和上下左右配合协作等問題，都亟需进一步研究解决。

(原載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現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論

鉄道部工务局自整风运动以来，曾經出現許多批評局長領导作風的大字报，其中最突出的是批評局長对待下級工作人員的态度不好。这是值得注意的相当普遍的問題。

在我們的社会里，領导者和被領导者同是革命工作人員，同是普通的劳动者，在这一点上大家沒有任何不同。他們的关系也就是这一个普通劳动者和那一个普通劳动者之間的平等的同志关系。当然，領导者和被領导者职位不同，但是，这只是革命工作中必要的分工。这种分工使他們之間有着上下級的关系。这种上下級关系和他們的平等的同志关系并不矛盾。因为，我們的上下級关系和旧社会的上下級关系根本不同，在我們的上下級之間沒有任何尊卑貴賤的不平等关系。可惜，旧社会遺留下来的上下級之間的不平等关系，在某些單位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在这次打倒官气的整风运动中，对这种殘留下来的不平等現象，正在进行着一次大扫除。

鉄道部工务局工作人員的大字报中批評局長态度比較生硬，不耐心听取下級干部意見，和下級干部接触較少。批評者希望局長对下級态度要和气些，还要常到各科走走，找大家談談。大字报还批評局長听彙报常常不听完就發表自己的意見，批評者要求局長"冷靜地多听彙报人的意見和發言，晚点發表自己的意見。"人們也許会說，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我們要問：破坏我們上下級之間应有的平等的同志式关系的是什么东西呢？难道不正是这种討厭的官气嗎？能說这是不值得注意的小事嗎？

領导者，本来也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可是，因为他担任着領导职务，这种領导者的身份就常常掩盖了他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使他們在群众中显得特殊起来。担任領导工作的同志不妨考虑一下，当你和下級干部接触的时候，是不是注意到不要使自己領导者的身份掩盖了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是不是有意識地感到你和他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

像工务局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很个别的。某些脱离群众的領导者，在下級面前面孔冷冷的，难見一絲笑容；除了开会、布置任务，很少和下級見面；彼此之間很疏远，誰也不大了解誰，誰也摸不着誰的心。特别使下級不滿意的是他們不耐心听取下級干部的意見：話說得囉嚕一点了，就不耐煩，甚至制止别人發言；下級的意見和領导者不一致，立即就会被頂回去，甚至还会因此受到批評。这种情况，对下級干部的积极性和創造性是一种束縛。有些人因此在上級面前不敢暢所欲言，甚至"話到口边留半句"。領导者也因此变得耳目蔽塞，容易發生主观片面性的錯誤。这种現象同我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生产关系的性質是不相符合的，它是我們的各項事业發展的障碍。在整风运动中，这种現象不能不受到群众的严厉批評。特别是当工农业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事业全面大躍进的新形势出現以后，这种現象就更为人們所不能容忍。

整风运动以来，特别是反浪費反保守的高潮出現以后，官气已被打掉不少。許多沾染上官气的同志正在努力从自己身上扫除灰塵。鉄道部工务局那位受到批評的局長現在已經有了显著的改进，对下級的态度不那么生硬了，开始耐心地听取同志們的意見了，同时也尽可能多找机会和同志們接触。可是，就一般情况看，这种改进毕竟还是不很巩固的，而且，有的改得好些，有的改得差些，有些領导同志虽然也在力求改进，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却还缺少深刻的認識。因此，从扫除官气的斗爭中吸取經驗教訓，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在我們的領导同志中，沾染了国民党作风，有意識地摆官架子以

勢压人的，当然极少。多数脱离群众的領导者虽有官气，可并不是有意要摆官架子，甚至，在下級沒有对他們的官气提出批評的时候，他們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有那么大的官气。那么，这种官气究竟从何而来呢？

有些領导者虽然并不覚得自己比下級干部特殊或者尊貴，可是总以为自己比下級高明、正确。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对于下級的意見那么不感兴趣，甚至連下級彙报情况都不願耐心听完？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那么不喜欢听不同的意見？不能否認，領导干部的水平要比下級干部高。可是，仅仅憑这一点，远不能做好領导工作。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說："我們党的領袖毛澤东同志所以在我們的革命事业中起了偉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踐結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綫，坚持党的民主原則和集体領导原則。"可見，是不是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正是一个領导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那些自以为总比别人高明的領导者恰恰忽略了这一点，脫离了党的群众路綫，陷于主观武断的泥坑中去了。

不同的意見，經过爭辯求得解决，是最好的領导方法。一个成熟的領导者，决不害怕討論問題时有不同意見，害怕的是树立不起对立面，讓事物的矛盾被隐蔽起来。掩盖矛盾，害怕爭論的是不懂辯証法的主观主义的領导者。正确的东西决不害怕同不正确的东西进行斗爭，經过斗爭，正确的才能变得更充实更完整。而且，領导者的意見也并不永远都是正确的，尤其不会都是十分全面十分完整的。不听不同的意見，就有犯錯誤的危險。

有些領导者喜欢用下命令和發指示这种簡便的办法去对待下級，就是征求意見，也常常只是簡單的問一声，使人不便多談。命令和指示是少不了的。但是，一般說，那应該是組織的集体的决定。領导者个人和下級干部談工作，应該尽量避免指示和命令的口气，否則，对方就会感到你是上級他是下級，談話就容易受到束

縛。最好是像同級的同志在一起一样，毫無拘束地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你把你的看法告訴他，他把他的意見告訴你，互相补充、互相辯駁，使大家的看法漸漸接近。这样，下級干部就会感到这是同志間的研究問題，就不会覺得双方之間有什么不平等和界限。可是，为什么有些領导者只习慣于在同級干部中这样自由地商討問題，而不习慣同下級干部一起商討呢？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还应該說一說对下級的态度粗暴以至随便發脾气的問題。說这是官气，这是用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下級干部，有些同志是不同意的，他們总說是因为脾气不好。这說法是很难站得住的。习慣对下級發脾气的同志，有多少也用同样粗暴的态度对待他的上級呢？恐怕不多吧。实际上不管自覚不自覚，这些同志总是以为我是你的上級，你是被我領导的，我对你發發脾气沒有什么关系。这能够說是平等的态度嗎？上級对下級应該有严格的要求，应該及时地批評他們的缺点和錯誤。但是，这和發脾气是兩回事。严肅的批評可以使人头腦清醒提高認識；發脾气却只能使人感到难堪和不平等。

增加上下級之間的接触，对于增加了解消除隔閡很有好处。領导工作的某些特殊情况，使上下級之間的接触不可能和同級干部之間完全一样。下級干部应該体諒到这一点，不要要求大家絕对一样；領导者却决不要因此就覺得自己可以特殊。事在人为，只要眞正感到有必要，就可以想出很多办法。整风运动以来，这方面的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进。比如，領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大家一起除四害大扫除，在大鳴大放中和大家一塊写大字报……，有些同志在这方面已經下了很大的决心，阜新煤矿平安矿的領导干部，最近都搬到工人宿舍去住，就是很值得提倡的好办法。增加接触、增进上下級之間友誼关系的办法很多，关鍵还在于領导干部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眞正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現，是和大家推心置腹地商量問題。只有这样，下級干部才会把心交給你，把你当成亲密而又值得尊敬和信任的朋友，在别人面前不願講的話却願意向你傾吐。否則，一切好办法都会流于形式主义，即使經常接触也是貌合神离。

第三部分

关於人民羣众的作用，羣众路綫

列宁論人民群众

……决定論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謂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話，但絲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評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論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評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絲毫不損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無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構成的。在評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發生的眞正問題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証这种活动得到成功呢？有什么东西能担保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沒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呢？这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其他社会主义者解决得各不相同的另一个問題：以实現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活动应如何吸引群众参加才可产生重大的成果呢？显然，这个問題的解决直接取决于对俄国社会力量的結合的看法，对俄国現实由以構成的阶級斗爭的看法……大家知道，社会民主主义者解答这个問題时所持的观点是：代表俄国經济制度的是資产阶級社会，要摆脫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出路，这条出路是从資产阶級制度的实質中必然产生出来的，这条出路就是無产阶級反对資产阶級的阶級斗爭。……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一八九四年春夏)，“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三九至一四〇頁

……我們党所有一切組織和团体每天經常进行的全部日常工作，即宣傳鼓动以及組織方面的工作，都是以巩固扩大我們与群众間

的联系为目标。……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兩个策略”（一九〇五年六、七月間），“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五七〇頁

革命是历史底火車头；——馬克思这样說过。革命是被压迫者与被剝削者底盛大节日。民众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不如革命时期这样能表現为新社会制度底积极創造者。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儈漸进主义狹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議的奇迹。但在这样的时候，必須使革命党底領导者也更广闊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任务，必須使他們的口号始終能發揚群众底革命自动性，成为他們的灯塔，表現出我們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底全部偉大与全部光彩，指明出达到絕对完全徹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兩个策略”（一九〇五年六、七月間），“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六五四頁

……馬克思向来都是無情反对那些認为“人民”一致，認为在人民內部缺乏阶級斗爭的小資产阶級幻想的。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詞时，并沒有用它来抹煞各阶級間的区别，而是將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成分統一起来。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兩个策略”（一九〇五年六、七月間），参閱“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六七三頁

……每个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爭方式問題，应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馬克思主义与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它决不用某一种斗爭方式来局限运动。它承認各种各样的斗爭方式，并且不是“憑空想出”这些方式，而不过是把革命阶級在运动进程中自然發生的各种斗爭方式綜合起来，組織起来，使其帶有自覚性。馬克思主

义根本反对一切抽象公式，一切理想藥方，而要求細心看待目前發生的羣众斗爭，因为这个斗爭随着运动的發展，随着群众覚悟程度的增長，随着經济政治危机的加剧，就会产生出日新月異的攻守方式。所以馬克思主义对于任何一种斗爭方式都絕对不預先表示拒絕。馬克思主义决不局限于只是在一定时期可能和現实的斗爭方式，而是認为随着一定社会局面的变迁就必然会有該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新的斗爭方式出現。在这方面，馬克思主义可說是向群众的实踐学習，决不企求用研究室內的"公式專家"所臆想出来的斗爭方式教导群众。……

第二，馬克思主义絕对要求用历史眼光来考察斗爭方式問題。不管历史具体环境如何而提出这个問題，就等于不懂得辯証唯物主义的起碼要求。在經济演进各个不同的阶段上，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慣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爭方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爭方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帶的斗爭方式，也随之發生变更。不詳細考察某个运动在其某个發展阶段上所处的具体环境，而企圖对于一定的斗爭手段問題作个是或否的回答，就等于完全离开馬克思主义立場。

这就是我們所应遵守的兩个基本理論原則。西欧馬克思主义底历史，給我們提供出証实上述原理的無数例証。……

列　宁："游击战爭"（一九〇六年九月三十日發表），"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一五五至一五六頁

由于革命的發展，由于革命任务的增長，能够参加爭取实現这些任务的斗爭的阶級成分和人民成分也随着發生变化。誰要是忘記这一点，誰就会大錯特錯。

列　宁："革命环境中的庸俗气味"（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發表），"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一卷第二二六頁

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論不同，它精妙地結合着兩种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靜态度来分析客观情势与客观进化

行程，另方面是极坚决地承認群众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底意义，同时当然也承認那些善于探索并实現其与某些阶級联系的个别人物、集团、組織和政党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的意义。……

列　宁："反对抵制"（一九〇七年七月），"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一九九頁

为要服务群众并代表他們正确覚悟到的利益起見，先进部队即組織，必須在群众中进行其整个活动，从他們中間毫無例外地吸收一切最优秀的人才，在每一步驟上細心地客观地檢查是否和群众保持着联系、檢查和群众联系是否眞实可靠。先进部队要这样并且只有这样来培养和教育群众，代表他們的利益，教导他們組織起来，指导群众的整个活动沿着阶級覚悟政策的道路前进。

列　宁："查苏利奇怎样打倒取消主义"（一九一三年九月），"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九卷第三六八頁

發現唯物史观，或更正确点說，徹底發揮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現象上去，就消灭了先前一切历史理論底兩个主要缺点。第一，先前一切历史理論，至多不过考察了人們历史活动底思想动机，却沒有考究这些动机究竟是由什么所引起，沒有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發展中的客观規律性，沒有認定物質生产發展程度是这种关系底根源；第二，先前的理論恰巧沒有包括到人民群众底行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們能用自然历史精确眼光考察群众生活底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底变更。……

列　宁："卡尔·馬克思"（一九一四年七月至十一月），"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二五頁

我們并不苛求馬克思或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形。这是痴想。我們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們只知道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有哪些阶級的力量；至于具体情况，实际情

况，那只有千百万人的实踐經驗才能表明。

列　宁："政論家札記"（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二日發表），"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七三頁

……資产阶級总是非常虛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現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眞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眞正群众性的运动。

列　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月至九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五八至四五九頁

群众的生动創造力量，——这是新輿論的基本要素…… 社会主义不能根据上面的指示建設起来。它的精神与官僚主义的自發运动格格不入；社会主义生气蓬勃，富于創造性，它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創作。

列　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員会会議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詢問"（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二五四至二五五頁

"他們"㊀以为"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貧苦农民，决办不好社会主义革命所加到劳动群众肩上的那种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眞正英勇偉大的組織任务。'沒有我們是不行的"——那些慣于替資本家和資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識分子这样安慰自己說。他們这种厚顏無耻的打算决不会实現：富有学識的人現在就已分化出来，轉到人民方面，轉到劳动群众方面，帮助民众来打破資本仆役們底反抗。而具有組織才能的人物在农民和工人阶級中是很多的，这些人材現在剛剛才自覚有力，醒悟起来，趋向于生动的、創造性的偉大工作，独立从事于社会主义社会底建設事业。

現在最主要任务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最主要任务的話，——

㊀ 指資产者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本書編者注

就是要尽量广闊地發展工人以及所有一切被剝削劳动群众在創造性的組織工作中所表現的这种自动倡首精神。無論如何都要打破那种荒謬、粗野、卑鄙齷齪的旧成見，似乎管理国家，管轄社会主义社会底組織建設工作，只有所謂"上等阶級"，只有富人或受过富有阶級教育的人，才能胜任。

这是成見。支持这种成見的，則是那些腐敗慣例，頑固守旧，奴才习气，尤其是資本家齷齪的私利观念，这些人正是乐于借管理来搶劫，为搶劫而管理。这样不行。工人們一分鐘也不会忘記自己需要有知識力量。工人們在求知方面表現得非常热心，又恰恰是在現时，这就証明無产阶級对于这一点沒有什么迷誤，也决不会有迷誤的。可是組織家的工作是凡能識字，善于知人，有实踐經驗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可以胜任的。这样的才干，在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所貌視所鄙称的"老百姓"中，是多得很的。这样的才干，在工人阶級和农民中，乃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并且是一个最丰富的泉源。

列　宁："怎样組織比賽？"（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七日發表），"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二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三〇七至三〇八頁

千百万創造者的智慧所創造的东西，比一个最偉大的天才的預見要高超得無比。

列　宁："第三屆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維埃代表大会关于人民委員会的报告的結束語"（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四三一頁

我們所知道的一切……生产資料私有制，已由历史判决死刑；它必將崩裂；剝削者不可免地要被剝夺。这是以科学性的精确性确定了的道理……。在我們夺取了政权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我們已知道这層道理，可是，改造的形式和具体改造事业的發展速度，我們当时却不能知道。只有集体的經驗，只有千百万群众的經驗，才能在

这方面給我們以左右一切的指示……我們依靠集体的經驗，依靠广大劳动群众的經驗。

列　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綱和改換党的名称的报告"(一九一八年三月八日)，"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一〇四至一〇五頁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們于1917年10月25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級和它所領导的貧苦农民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积极的工作或建設的工作，就是要把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組織系統建立起来，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計划的生产和分配。这种革命，只有在人民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大多数表現出有历史意义的独立創造精神之下，才能順利实現。只有在无产阶級和貧苦农民能够表現充分的自覚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

列　宁："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月至四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二〇頁

……"老百姓"中，即工人和不剝削别人劳动的农民群众中，有极多的天才組織家；資本家把这样的天才組織家成千地摧殘、毀灭和拋棄，而我們呢，也还不善于去发現他們，鼓舞他們，扶持他們，提拔他們。可是，如果我們能以全部的革命热忱——沒有这种革命热忱，便不会有胜利的革命——学习这种工作，那我們就一定能学会这种工作。

列　宁："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月至四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四〇頁

主張共产党人不参加反动工会的荒謬"理論"最清楚不过地說明"左派"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問題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輕

浮，說明他們在高喊"群众"时是在如何濫用这个字眼。要想能够帮助"群众"，博得"群众"的同情、愛戴和支持，就必須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領袖"对我們进行挑剔、搗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間接地同資产阶級和警察勾結），哪里有羣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正是要在有無产阶級群众和半無产阶級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里进行宣傳和鼓动工作，哪怕那些机構是最反动的，也要不顧一切牺牲，克服重大障碍以便系統地、不屈不撓地、坚韧不拔地、耐心地在那里进行工作。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組織。……

……

……因为共产党員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 說服 落后分子，善于在他們中間进行工作，而不是臆造一些幼稚可笑的"左的"口号同他們隔离开来。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〇年四月至五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四至三六頁

……一切眞正革命的标志，就是从那些到現在还非常消沉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很短时間內就可以产生出十倍的甚至百倍的能够进行政治斗爭的代表人物来……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〇年四月至五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六六頁

…… 一切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須竭力实現"更深入群众"和"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的口号，这里講的群众，就是指受資本剝削的全体劳动群众，特别是那些最無組織、最不开通、最受压迫、最难組織的劳动群众。

列　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綱"（一九二〇年七月四日），"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七〇頁

关于領导方法的若干問題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毛　澤　东

(見本書第二七一至二七五頁)

1664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毛 泽 东

有兩个問題，同志們在討論中沒有着重注意，我覚得应該提出来說一說。

第一个問題是关于群众生活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員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爭，以革命战爭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發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誰要是看輕了这个中心任务，誰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員。我們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眞正看清楚了，懂得無論如何要把革命發展到全国去，那末，我們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問題，群众的生活問題，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輕。因为革命战爭是群众的战爭，只有动員群众才能进行战爭，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爭。

如果我們單單动員人民进行战爭，一点別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們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領导农民的土地斗爭，分土地給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对外貿易；解决群众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問題，都是我們应当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对这些問題注意了，解决了，滿足了群众的需要，我們就眞

---

* 这是毛澤东同志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

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組織者，群众就会眞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热烈地拥护我們。同志們，那时候，我們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爭，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在我們的工作人員中，曾經看見这样的情形。他們只講扩大紅軍，扩充运輸队，收土地稅，推銷公債，其他事情呢，不講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紅軍和动員运輸队，对于群众生活問題一点不理。汀州市群众的問題是沒有柴燒，資本家把鹽藏起来沒有鹽买，有些群众沒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貴。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問題，十分盼望我們帮助他們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討論。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議改选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討論扩大紅軍和动員运輸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議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紅軍、动員运輸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績。这是一种情形。

同志們，送給你們的兩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你們大概看到了吧。那里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長岡乡㊀，福建的才溪乡㊁，扩大紅軍多得很呀！長岡乡青年壯年男女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紅軍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紅軍去了。公債也銷得很多，長岡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銷了四千五百塊錢公債。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績。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長岡乡有一个貧苦农民被火燒掉了一間半房子，乡政府就發动群众捐錢帮助他。有三个人沒有飯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馬上捐米救济他們。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㊂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眞正模范的乡政府。他們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領导方法，是絕对的不相同。我們要学习長岡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領导者！

㊀ 長岡乡是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乡。

㊁ 才溪乡是福建省上杭县的一个乡。

㊂ 公略县是当时江西紅色区域的一个县，以吉安县东南的东固鎮为中心。紅軍第三軍軍長黃公略同志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在此牺牲，因設此县以紀念他。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們应該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問題，从土地、劳动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学办起了沒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問題，都应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应該討論，应該决定，应該实行，应該檢查。要使广大群众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要使他們从这些事情出發，了解我們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爭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們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爭到底。長岡乡的群众說："共产党眞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模范的長岡乡工作人員，可尊敬的長岡乡工作人員！他們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眞心实意的爱戴，他們的战爭动員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战綫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發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眞心实意地为群众謀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决群众的一切問題。我們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們，把革命当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們無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紅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無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們粉碎了么？

国民党現在实行他們的堡壘政策㊀，大筑其烏龟壳，以为这是他們的銅牆鉄壁。同志們，这果然是銅牆鉄壁么？一点也不是！你們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宮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惡的一个統治者；当無产阶級和农

㊀ 一九三三年七月蔣介石在江西廬山軍事会議上决定在紅色区域周圍建筑碉堡，作为第五次"圍剿"中的新的軍事策略。据統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底，江西共筑碉堡二千九百座。后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和八路軍新四軍作战，亦采用蔣介石这种堡壘政策。根据毛澤东同志关于人民战爭的战略，这种反革命的堡壘政策是完全可以打破和战胜的，这已为历史的事实所充分証明。

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沒有呢？沒有了。銅牆鉄壁呢？倒掉了。同志們，眞正的銅牆鉄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眞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眞正的銅牆鉄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团結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們的革命战爭，我們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夺取全中国。

第二个問題是关于工作方法的問題。

我們是革命战爭的領导者、組織者，我們又是群众生活的領导者、組織者。組織革命战爭，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們的兩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問題，就严重地摆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沒有桥或沒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問題，过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决方法問題，任务也只是瞎說一頓。不注意扩大紅軍的領导，不講究扩大紅軍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紅軍念一千遍，結果还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作、經济建設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区边区的工作，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棄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說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現的。

兴国的同志們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們称贊他們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贛东北的同志們也有很好的創造，他們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贛东北的同志們，他們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爭联系起来了，他們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問題和革命的工作任务問題同时解决了。他們是認眞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們是仔細地在那里解决問題，他們在革命面前是眞正負起了責任，他們是革命战爭的良好的組織者和領导者，他們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組織者和領导者。其他，如福建的上杭、長汀、永定等县的一些地方，贛南的西江等处地方，湘贛边区的茶陵、永新、吉安等县的一些地方，湘鄂贛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許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屬县，那里的同志

們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們大家称贊。

一切我們領导的地方，無疑有不少的积极干部，群众中涌現出来的很好的工作同志。这些同志負担着一种責任，就是应該帮助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帮助那些还不善于工作的同志們作好工作。我們是在偉大的革命的战爭面前，我們要冲破敌人的大規模的"圍剿"，我們要把革命推广到全国去。全体革命工作人員負担着絕大的責任。大会以后，我們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們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該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該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几千个長岡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們的巩固的陣地。我們占据了这些陣地，我們就能从这些陣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圍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統治。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七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一卷排印）

論联合政府*(摘錄)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毛 泽 东

五 全黨團結起來，爲實現黨的任務而鬥爭

同志們，我們已經了解了我們的任务和我們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們应該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这些政策和完成这些任务呢？

目前国际国內的形势，在我們和中国人民面前显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是显然的，毫無疑义的。但是同时，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条件。誰要是只看見光明一面，不看見困难一面，誰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現党的任务而斗爭。

我們的党和中国人民一道，不論在整个党的二十四年历史中，在八年抗日战爭中，为中国人民創造了巨大的力量，我們的工作成績是很显然的，毫無疑义的。但是同时，我們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缺点。誰要是只看見成績一面，不看見缺点一面，誰也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現党的任务而斗爭。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誕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的历史中，經历了三次的偉大斗爭，这就是北伐战爭、土地革命战爭和現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爭。我們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無产阶級的最正

---

* 这是毛澤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結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一經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踐相結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思想武裝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实踐相結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风。

反映了全世界無产阶級实踐斗爭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在它同中国無产阶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爭的具体实踐相結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們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違反这个眞理的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作坚决斗爭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脫离具体的实踐，經驗主义把局部經驗誤認为普遍眞理，这兩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違背馬克思主义的。我們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錯誤思想，使得我們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我們党現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員。其中絕大多数是在抗日时期入党的，在他們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純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員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純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糾正。今后应当繼續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須使各級党的領导骨干都懂得，理論和实踐这样密切地相結合，是我們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結全党进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們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脫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負責和向党的領导机关負責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們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須随时准备坚持眞理，因为任何眞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須随时准备修正錯誤，因为任何錯誤都

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屬錯誤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脫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經驗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驕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項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們脫离群众。我們的代表大会应該号召全党提起警覚，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讓他脫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細心地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覚悟程度，去啓发和提高群众的覚悟，在群众出于內心自願的原則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組織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內外环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斗爭。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錯誤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覚悟程度，違反了群众的自願原則，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經了解并且是否願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們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錯誤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覚悟程度，違反了領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許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們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們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領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見，并且將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見誤認为广大群众的意見，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該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論行动，必須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該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創造力是無穷無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們，而只会被我們所压倒。

有無認眞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

标志之一。我們曾經說过，房子是应該經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滿了灰塵；臉是应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塵的，也应該打扫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对于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实行“知無不言，言無不尽”，“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們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眞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見、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嗎？难道我們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体嗎？無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难过，难道我們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錯誤不能抛棄嗎？

同志們，我們的大会閉幕之后，我們就要上战場去，根据大会的决議，为着最后地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国而奋斗。为达此目的，我們要和全国人民团結起来。我重說一遍，不管什么阶級，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贊成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国的，我們就要加以联合。为达此目的，我們要把我們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和紀律的原則之下，坚强地团結起来。不論什么同志，只要他是願意服从党綱、党章和党的决議的，我們就要和他团結。我們的党，在北伐战爭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員，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爭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員，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現在我們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員，这一回無論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們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經驗，采取謙虛态

度，防止驕傲态度，在党內，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結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結起来，就可以保証，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徹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們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設起来。

三次革命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战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沒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沒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同志們，有了三次革命經驗的中国共产党，我坚决相信，我們是能够完成我們的偉大政治任务的。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讓我們高举起他們的旗帜，踏着他們的血迹前进吧！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誕生了，讓我們迎接这个偉大的日子吧！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五月第三版"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一〇九四至一〇九九頁）

介紹一个合作社

毛 泽 东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讀。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發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覚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層奋發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層，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經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資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長的时間了。除了党的領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热气高，干勁大。从来也沒有看見人民群众象現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揚，意气风發。过去的剝削阶級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們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願意帶着花岡岩头腦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無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識形态和上層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徹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間；这些东西崩潰之势已成，則是确定無疑的了。除了別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則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圖。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来了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龔自珍詩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馬齐瘖”的沉悶空气冲破了。我現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們，以

及城市里的同志們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發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付奴隶相么？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現在眞正开始統治这塊地方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于广州

（原載"紅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一書編者按語兩則

“所謂落后乡村並非一切都落后”一文的按語

在中国，对于許多人来說，一九五五年，可以說是破除迷信的一年。一九五五年的上半年，許多人对于一些事还是那么样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到下半年，他們就坚持不下去了，只好相信新事物。例如：他們認为群众中提出的“三年合作化”不过是幻想；合作化北方可以快一些，南方無法快；落后乡不能办合作社；山区不能办合作社；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不能办合作社；灾区不能办合作社；建社容易巩固难；农民太穷，資金無法筹集；农民沒有文化，找不到会計；合作社办得越多，出乱子就会越多；合作社發展的速度，超过了群众的覚悟水平和干部的經驗水平；因为党的粮食統購統銷政策和合作化政策，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在合作化問題上，共产党如果不赶快下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險；合作化將出現大批的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許多。总之都是迷信。这些迷信，經过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屆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議（扩大）的批判以后，統統都打破了。現在全国农村中已經出現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这件事給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訓：群众中蘊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許多領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沒有感覚到，或者感覚的那样少呢？領导者們所想的同广大群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致呢？以此为教訓，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問題，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話，就是不要脫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質上

發現群众的积极性。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一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五六至五七頁）

"書記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語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作为本書的第一篇向讀者們推荐。如像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写的，自己不懂，怕人問，就"繞开社走"的人，現在各地还是不少的。所謂"坚决收縮"，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繞开社走"的一种表現。不过他們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們的話）多少个合作社，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他們手里拿着刀，一砍，他們就繞开麻煩問題了。他們說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据說簡直困难到了不堪設想的地步。全国有不可胜数的事例駁倒了这一种說法。河北省遵化县的經驗，不过是这些事例的一个。在一九五二年，这里的人都不懂得怎样办合作社。他們的办法就是学习。他們的口号是"書記动手，全党办社"。其結果就是"从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河北省遵化县的第十区，十一个乡，四千三百四十三戶，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共計三年时間內，已經在半社会主义性質的阶段內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入社农戶占全区农戶的百分之八十五。这个区的农林牧等項生产的产量，一九五四年同一九五二年比較，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

我們現在有理由向人們提出这样一个問題：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說不可以，你們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我看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煩，或者爽直一点，叫做右傾机会主义。因此就是"繞开社走"，就是書記不动手，全党不办社，就是从不懂到不懂，从少数人到少数人，从区干部到区干部。要不然，就是手里拿着刀，見了找麻煩的合作社就給它一砍。只要有了

这样一条理由，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我們提出了“积极領导，稳步前进”，“全面規划，加强領导”这样一些口号，并且贊成遵化县同志們所提出来的“書記动手，全党办社”这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在遵化县，难道不是“积极領导，稳步前进”的嗎？难道不是“全面規划，加强領导”的嗎？当然是的。这是不是有危險呢？是不是“冒进”了呢？危險在于“繞开社走”，这一点遵化县的同志們已經克服了。危險还在于借口“冒进”，大批地“砍掉”合作社，这一点遵化县那里并沒有。所謂“合作社發展速度超过了群众覚悟的水平和干部領导能力的水平”，这对于遵化县的情况怎样解釋呢？那里的群众就是要求合作化，那里的干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誰能在遵化县那里看得出什么危險来呢？难道在三年內，由于一步一步地实現了合作化，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这就算是一种危險嗎？这就算是“冒进”嗎？这就算是“超过了群众覚悟的水平和干部領导能力的水平”嗎？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戶貧农只有三条駑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間內，“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資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淚。我看这就是我們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內，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嗎？社会的財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不是迴避問題，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我們要感謝这篇文章的那位沒有署名的作者。他用滿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調，詳尽地叙述了一个区的合作化过程，这对于全国的合作化事业会有不小的貢献。我們希望每个省、每个專区、每个县都有一篇到几篇这样的文章。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一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三至五頁）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議上的祝詞

（一九五六年四月三十日）

同志們！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議，向出席和沒有出席这次会議的全国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賀！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在我国的农村中兴起了巨大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接着全国資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入了高潮，这就是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着的极为广闊极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現在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整个国民經济和文化事业的高漲。大家知道，全国的农民在农业生产战綫上正在进行着空前未有的努力，为逐步地实現一九五六——一九六七的十二年农业發展的偉大計划而奋斗。在他們中間，出現了大批的农业劳动模范，他們团結着广大的农民群众，成为农业战綫上的中坚。同样，在工人阶級中間，在工业战綫以及其他經济战綫和文化战綫上，在各个工作部門的工作崗位上，也出現了空前規模的社会主义建設的热潮，出現了大批的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他們發起了先进生产者运动，領导着广大的工人群众和知識分子群众，为又多又好又快又省地实現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計划而斗爭。你們就是工人阶級中間这些优秀分子的代表。

我国人民的共同目的是要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偉大的、有强大

的工业和农业和有高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目前的經济水平和科学、文化、技术水平还是很落后的。因此，我們必须动員各方面一切可能动員的积极因素，进行長期的艰苦的斗爭，才能逐步地改变我們的落后狀况，实現我們的偉大的历史任务。目前我国各个生产战綫上的先进生产者，各个工作部門中的先进工作者，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的一种最积极的因素。这种因素应当受到我們最大的重視。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結底，是生产的历史，是生产者的历史。生产是永远处在發展变动的狀态中的，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代替着旧的生产技术。因此，在任何时代，在任何生产部門中，总是有少数比較先进的生产者，他們采用着比較先进的生产技术，創造着比較先进的生产定額。随后，就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者学会了他們的技术，达到了他們的定額，直至最后，原来是少数先进分子的生产水平就成为全社会的生产水平，社会生产就提高了。如果有重大的生产技术的發明，就要引起生产技术的重大改革，創造生产的巨大高漲。因此，先进生产者是人类經济生活向前發展的先驅，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向前發展的先驅。

但是先进生产者在旧的时代并不是經常受到社会重視的。恰恰相反，剝削阶級一般地是賤視生产者的。当先进生产者的創造有利于剝削者的时候，剝削者才利用这种創造，但是仍然常常为着"專利"而限制别人学习和利用这种創造。而当先进生产者的創造不利于剝削者，或者剝削者由于愚昧而不能了解这种創造的价值的时候，这种創造和創造者就常常受到打击，受到压制。因此，在旧社会中，先进生产者的先进經驗和各种發明創造的利用和發展，总是受到各种限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跟过去的旧社会相反，它的主人不是剝削者，而是生产的劳动者自己。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沒有人禁止学习和利用先进生产者的先进經驗；相反，它要求先进生产者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要求其他的生产者認眞地学习和利用他們的先进經驗，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是同先进生产者的利益一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

里，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劳动群众的自觉的努力，通过教育和批評的方式，不断地把落后提高到先进的水平。千百万劳动者在先进生产者率領下为消除落后而斗爭，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一种动力。正因为这样，先进生产者在我們的时代里才能發展成为如此强大的群众性的运动，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居于如此光荣的地位。大家知道，毛澤东同志曾經說过，劳动模范有三种作用：即帶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这就是說，在人民民主制度的条件下，先进生产者不但是人民群众的先驅，而且成了人民群众的核心，成了国家和人民群众之間的重要紐帶。先进生产者是社会和国家的領导力量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沒有先进生产者，也就不可能有完全正确的領导。

同志們！你們聚会在这里举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議，你們的会議受到党和政府的极大的重視，这个事实就是表示我們坚决支持你們在各个生产战綫上的創造，支持全国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就是表示我們坚决同你們站在一起，要求全体工人阶級像你們一样地劳动；就是表示我們决心克服一切障碍，为把你們所已經达到的先进的生产水平迅速地变为全社会的生产水平，并且为繼續前进到更新的生产水平而斗爭。

为了發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为了使先进生产者运动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先进生产者、普通生产者和生产的領导者三方面的共同努力。

每一个先进生产者应当坚持自己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定額，应当为普及自己的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定額而斗爭。先进生产者不只是要保持自己的先进，而且要努力促进别人由落后达到先进。因此，先进生产者必須用一切方法帮助和教会别人，并且不断地爭取更加先进。仅仅依靠一时的先进不能保持永远的光荣，而驕傲自滿只能促成自己的退步。唯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努力，才有可能不断地前进。

1682

每一个普通生产者应当向先进生产者学习，向先进生产者看齐，迅速地把一般的生产水平提高到先进分子的水平。这是完全可以做到而且是必须做到的。試問，既然是先进生产者已經做到的事，具有同样条件的别的生产者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既然是先进的單位已經做到的事，具有同样条件的别的單位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很明显，拒絕向先进生产者看齐的人們沒有什么理由可講，有的只是一种得过且过的惰性，这种惰性的实質不是别的，就是要保持生产的落后狀态，保持我們国家的落后狀态。因此，我們必須批評那种不积极赶上先进者、用种种借口替自己的落后辯护的人們，我們必須要求他們切实地改变这种态度。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尽快地把先进生产者的水平变为全社会的一般水平，从而尽快地把全社会的生产推向前进。

每一个生产的領导者应当坚决地支持先进生产者的运动，支持每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先进經驗和創造。这就是說，第一，他必須詳細地鑒定、研究和总結先进生产者的先进經驗，以便确定它是可以推广和应当推广的，并且找出推广的有效的方法。第二，他必須采取一切必要的技术措施和組織措施，例如組織先进操作的表演、傳授和訓練，改进原有的設备、劳动組織和操作規程，研究人們不願意学习先行經驗的經济上、技术上和思想上的原因，并且加以消除，等等，以便实际地而不是空談地推广这种先进生产者的經驗。誰做的这些实际工作愈多、愈好，他在推广先进生产者运动方面所得的成績也就愈大。誠然，这是一个艰苦的、細致的工作，但是一个害怕做艰苦細致工作的人，是不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領导者的。

可惜在我們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这样的一种領导者还是有的，这些人具有我們所說的官僚主义的傾向。为了发展先进生产者运动，必須跟这种官僚主义傾向作斗爭。

妨碍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官僚主义傾向有几种形式。有一种人是实际上不滿意或者反对先进生产者运动的。他們安于落后，把落后的技术和落后的定額当作先进的东西，或者是当作不能更改、至少是目前不能更改的东西。我們的不少的先进生产者已經跟这种人进行

了斗爭，用事实批判了他們的錯誤的观点，使他們受到了教育。我們今后还需要繼續反对这种傾向。但是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官僚主义傾向。有这种傾向的人，口头上甚至主观上不但不反对先进生产者运动，而且是热烈支持的，但是他們滿足于空喊，滿足于一般号召，滿足于給先进生产者发奖旗，写訪問記，滿足于讓先进生产者当这种或者那种代表，但是他們很少認眞地为先进生产者創造条件，使之不断前进，很少認眞地研究先进生产者的經驗，認眞地推广这些經驗。他們不努力由个别的先进生产者前进到整个的先进的車間，由个别的先进的車間前进到整个的先进的工厂，由个别的先进的工厂前进到整个的先进的行业，反而使先进生产者有忙于应酬、脫离群众、不能繼續提高、漸漸变为落后生产者的危險。我們必須糾正这种官僚主义的領导方法。

官僚主义傾向还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表現，就是不关心职工群众的切身生活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应当是一致的，其中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的工人，国家机关中和文化、教育、衛生事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員，合作社的农民，他們的劳动是为着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同时是直接为着他們个人的利益。而国家的利益則是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每个劳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当然，把个人的利益跟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对立起来，离开生产的发展而追求生活的改善，这种意見是不正确的。但是只注意增加生产，增加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不注意增加劳动者个人的利益，也是不正确的。要求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个人的收入，改善个人的生活，这是完全正当的和必要的。只有这样，劳动者的积极性才会不断提高，先进生产者运动才能获得巩固的基础。但是現在有些企业和机关的領导者只是片面地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生产，却不注意按照可能和必要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改善劳动者个人的生活，对于在生产上、工作上有卓越成就的人們，也不注意給予充分的奖励。这种傾向，無疑是必須坚决糾正的。

只有坚决依靠先进生产者、普通生产者和生产领导者的共同努力，只有坚决克服領导工作中的各种官僚主义傾向，并且正确地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把它們紧密地結合起来，我們才能使先进生产者运动得到普遍的持久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的生产水平和科学、文化、技术水平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地提高。

同志們！我們的国家是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在我們的国家里，一切工作都必須貫徹执行依靠群众的路綫，都必須依靠由上而下的方法和由下而上的方法相結合。离开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离开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任何少数人的領导都不会是正确的、有效的和巩固的。反过来說，只要我們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中密切地依靠群众，我們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在我們的前面摆着一个最困难的任务，这就是要把一个在經济上和文化上都很落后的六亿人口的大国建設成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完成这个任务，就会使整个社会主义陣营极大地加强起来，就会使世界和平极大地巩固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們全体先进生产者代表和我們同样担负着巨大的、光荣的責任。我們希望你們每一位代表，你們所代表的每一位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以及农民、手工业者、人民解放軍的指战員和其他爱国人民中的每一位先进分子，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領导下，都能够密切地联系群众，帶領群众不断地向先进的水平看齐，不断地前进再前进，那末，我們大家就一定能够完成我們共同的历史任务。

我們祖国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計划胜利万岁！

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中国工人阶級万岁！

偉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按工人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六月出版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議主要文件”排印）

論　党(摘錄)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一月經作者校閱)

刘　少　奇

第四，是關于黨的群众路綫問題。

在党章的总綱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調了党的群众路綫。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因为党的群众路綫，是我們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綫，也是我們党的根本的組織路綫。这就是說，我們党的一切組織与一切工作必須密切地与群众相結合。

毛澤东同志屢次指示我們：在一切工作中要采取群众路綫。他在向这次大会的报告中，又以极恳切的詞句指示我們：要根据群众路綫去进行工作。他說：我們共产党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們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帜。他要我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脫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發。"他要我們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論行动，必須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要我們同志明了："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創造力是無穷無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我們就是不可战胜的。他說："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錯誤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众的自願原則，害了急性病。"又說："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錯誤的，因为

它落后于群众的覚悟程度，違反了領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所有毛澤东同志的这些指示，都是极端重要的，每个同志都必須細心領会和切实执行。

我們的这种群众路綫，是只有無产阶級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們的群众路綫，也就是阶級路綫，就是無产阶級的群众路綫。我們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我們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剝削阶級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

我們完全懂得：人民群众的先鋒队在人民群众解放斗爭的全部过程中所起的决定的作用。人民群众必須有自己的先鋒队，而且必須有如我們党这种性質的先鋒队，人民群众的徹底解放，才是可能的。人民群众如果沒有自己的这种性質的先鋒队，就將使人民群众沒有革命的領导，而如果沒有这种領导，就將使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遭受失敗。中国人民只有在我們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領导之下，只有依照我們党所指出的政治方向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徹底解放。

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先鋒队必須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它必須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須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必須用正确的方法去領导人民群众，然后先鋒队才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否則，先鋒队是完全可能脫离人民群众的。而先鋒队如果脫离人民群众，就不能成其为人民的先鋒队，就不独不能实現它解放人民群众的任务，而且有直接被敌人消灭的危險。这就是說，人民群众的先鋒队在一切工作中必須有徹底的明确的联系群众的路綫。

在一些什么重要情形下，先鋒队就要脫离人民群众呢？

首先，就是先鋒队如果不能履行自己当作人民先鋒队的应有职責，不能在一切时期和一切情况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不能及时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不能坚持眞理，不能在有錯誤时及时修正錯誤，那就要脫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說，尾巴主义、自流主义，是要脫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們党內，公开的自發論，公开主張追随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主义"理論"，公开主張不要無产阶級政党領导的"理論"，是还沒有的。但是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和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就是一种尾巴主义，它們远远落在当时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后面，不能提出代表人民群众并鼓励人民群众前进的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因而脫离人民群众，使革命受到損失或失敗。此外，还有些同志在各种工作中有尾巴主义这类性質的錯誤。比如，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不把党看作是阶級組織的最高形式，而把党看作是軍队的、政府党团的或职工会的附屬品。另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疲蹋，老一套，安于現狀，任其自流，丧失上进之心，而不根据当时当地群众的情况，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率領群众力求前进，違反領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則，迁就群众中落后的意見，把自己降到普通工人、农民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失去先鋒队的作用。有时又迁就群众中錯誤的意見，而跟随在群众自發运动的尾巴后面跑，不能对群众实行正确的有远見的領导。这种傾向，是要使我們脫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因为人民群众并不需要这样的人来領导自己。

其次，就是先鋒队如果不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領导人民群众，不設法使群众在自己的亲身經驗中来体会党的口号的正确，因而在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或者提出了过高的口号、过左的政策，或者提出了当时情况所不能允許的与群众所不能接受的过高的斗爭形式、組織形式，那就要脫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說，命令主义、冒險主义与关門主义，是要脫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們党內，有些同志是犯过命令主义、冒險主义与关門主义的錯誤的。比如，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对人民群众負責，不相信群众是自己解放自己，而站在人民群众之上，去代替群众斗爭，恩賜群众解放，命令群众行动。他們犯了急性病，表面上积极，然而他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怎样才能把党所提出的任务变为群众自己的任务。他們不知道如何才能去啓發群众的覚悟并适当地等候群众的覚悟，不知道采取許多步驟去使群众自然

而然的革命化，而企圖用簡單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接受党的口号和任务，并强制群众起来行动。他們違反了群众的自願原則。特别在提出了过高的口号与过左的政策，引起群众的怀疑与不滿之时，他們更用强迫命令甚至惩办主义的办法，去推动其工作。其中最惡劣的作法，就是他們每到一地，就去找那里的錯誤、缺点和坏典型，加以批評、斗爭和处罰，以此去吓唬人民和干部，去推进工作；而不去找那里的优点和好典型，加以研究、补充和系統化，獎励那里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傳布好的經驗，以鼓励党員和人民前进，同时即可以克服那里的錯誤、缺点。他們到处打击人，簡單地用命令解决一切，不向人民群众学习，不吸收群众中的新發明与新創造，而强迫别人依照他們的办法行动。这种傾向，是要严重地脫离人民群众的，并要引起群众对于他們、以至对于党發生怨恨。

除开上述兩种傾向外，官僚主义与軍閥主义的傾向也在我們党內有些同志中發生了。这也是严重脫离人民群众的傾向。

官僚主义的傾向，表現在有些同志沒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以及对党对人民不負責任的观点。其典型的表現就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只知發号施令，而自己則既不調查，又不研究，也不向群众学习，拒絕群众的批評，抹煞人民的权利，甚至要求人民为他們服务，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惜犧牲群众的利益，劳民伤財，貪污腐化，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等。

軍閥主义的傾向，表現在有些同志不了解：我們的軍队，乃是人民的軍队、人民的武力，乃是人民用以战胜敌人解放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而把軍队看成是超出人民之外，或是站在人民之上的一种特殊势力，甚至把軍队看成是可以造成少数个人势力、个人地位的工具，因而他們就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使用在人民的軍队工作中。其特点，首先表現在官兵关系、上下級关系上，用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办法来統率自己的士兵与部下，而不依靠士兵与部下的自覺与自动。其次，表現在軍民关系上，不注意严整部屬的群众紀律，不热爱人民，而强迫、打罵人民群众，使軍队脫离人民群众。再其次，

表現为單純軍事观点，表現在革命軍队与革命政府的关系上，企圖照軍閥那样把軍队摆在政府之上，企圖以軍治政。很明白，这种傾向，与人民軍队是根本不相容的。

上述这些脫离群众的錯誤傾向之所以在我們党內产生，是由于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不够和旧社会剝削阶級的影响，我們党內的小資产阶級成份以及脫离社会生产甚久的成份，常常容易接受这种影响而形成各种脫离群众的傾向。这些傾向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以至在我們党章的总綱上也提到了它們。將来革命愈扩展，工作愈繁重，我們內部的这些傾向也愈有可能生長。因此，我們应經常和这些傾向作斗爭，才能經常保持和巩固我們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应該經常扫地和洗臉，以免这些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来蒙蔽与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党的肌体。

人民群众必須有自己的坚强的先鋒队，人民的先鋒队必須密切联系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这样，人民群众的解放，才是可能的。因此，我們党——中国人民的先鋒队，必須經常清除上述各种脫离人民群众的傾向，而实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綫。所謂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綫，就是党的群众路綫，毛澤东同志的群众路綫，就是要使我們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綫，就是要使我們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領导人民群众的路綫，就是要使我們党的領导机关和領导人与被領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綫。

毛澤东同志說：我們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应該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說，不但我們党的政治路綫，而且我們党的組織路綫，都应該是正确地从群众中来的路綫，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綫。我們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綫，是与正确的組織路綫分不开的。虽然政治路綫与組織路綫之間，可能發生某些部分的暫时的不調和現象，但不能設想，政治路綫是正确的，組織路綫却是不正确；反之，組織路綫正确了，政治路綫却是不正确；要把二者互相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謂正确的組織路綫，就是党的群众路綫，就是我們党的領导骨干和党內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結合的路綫，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

中去的路綫，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結合的路綫。

为了貫徹我們党和毛澤东同志的群众路綫，在党章的总綱上和条文上都强調地指出了以下几个群众观点，这几个观点，必須在每一个党員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設起来。

第一，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我們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們一切党員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爭，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們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驕傲的地方。因此，凡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而損害人民利益的观点，都是錯誤的。我們的一切党員，以及参加我們队伍中的一切人員，只要是忠于职务并多少著有成績的，也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員，不管他們意識到了这一点与否，也不管他們担負的是重要的領导职务，或是普通的战斗員和炊事員、飼养員等职务，他們都是在不同的崗位上，直接或間接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他們都是平等的、光荣的。我們要在一切党員和一切人員中，提高自覚性，使我們一切党員和一切人員都在高度自覚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負責。

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負責的观点。我們为人民服务，就要对人民負責，就要在客观上使人民因为我們的服务而获得益处，获得解放；就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錯誤，免得害了人民，引起人民的損失。凡屬是我們提出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都应該是正确的，这样才于人民有利；如不正确，即要損害人民的利益，那就要誠恳地进行自我批評，迅速求得改正。就是說，我們要善于为人民服务，要服务得很好，而不要服务得很坏。因此，我們在人民面前，一切都不应采取輕率态度，而应采取严肃的負責的态度。

还必須了解：向人民負責与向自己領导机关負責的一致性。即是說，我們党員受了党的領导机关与領导人的命令去进行工作，他們在工作中是要对党的領导机关与領导人負責的；但如果把这种对領导机关負責与对人民負責分开来看，那是錯誤的。必須对人民群众負責，才算是尽了最后与最大的責任。要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

益的一致性，凡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即是对党有利的事业，每个党員都必須尽力去作。凡对人民不利的事业，即是对党不利的事业，每个党員都必須反对，必須避免。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無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即是眞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們党員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每个党員对人民負責，即是对党負責，对人民不負責，即是对党不負責。要理解对党負責与对人民負責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統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發現自己領导机关与領导人所指示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有缺点、錯誤时，即应以对人民負責的精神，向領导机关与領导人建議改正，要弄清是非，不应馬虎敷衍。否則，就是对人民沒有負起責任，也就是对党沒有負起責任。党的紀律是必須遵守的，党的統一是必須保持的，因为保持我們党的統一与紀律，即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借口对人民負責而破坏党的紀律与統一；但領导机关与領导人的任何缺点、錯誤，都必須糾正，每一个党員都有責任，也有权利，去帮助領导机关与領导人糾正任何缺点与錯誤。因为任何缺点与錯誤，都是对人民不利的，因此也就对党不利。我們党員忠誠的自我批評精神，对自己及对領导机关的錯誤所采取的批評与自我批評的态度，以及遵守党的紀律的精神，都是对人民負責的精神。

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毛澤东同志經常說：人民群众是眞正偉大的，群众的創造力，是無穷無尽的，我們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眞正創造者，眞正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馬克思早就說过：劳动者是自己解放自己。国际歌上說：不是皇帝，不是神仙，也不是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这就是說，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爭，自己起来爭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賜、所能給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爭取的。所以恩賜的观点，代替群众斗爭的观点，是錯誤的。

人民群众自己創造自己的历史，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須由群众的自覚与自願，并且举出自己的先鋒队，在先鋒队的指导下，自己組織起

来，自己去斗爭，自己去爭取，然后群众才能自覺地去获得斗爭的果实，并保持与巩固这种果实。人民群众的敌人，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才能打倒，否則，人民的敌人是不能被打倒的。沒有人民群众的眞正自覺与眞正发动，仅有先鋒队的奋斗，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不会前进的，任何事业都是不能成功的。甚至就是如减租减息、变工队、合作社这样有关人民直接利益的事，沒有群众的自覺与自动，即使有什么人"恩賜"了减租减息，代替群众把变工队、合作社組織起来，群众还是"明减暗不减"，变工队、合作社也只能是形式的空洞的东西。

我們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們的一切綱領与政策，不論是怎样正确，如果沒有广大群众的直接的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爭，都是無法实現的，所以我們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覺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覺与自动，我們將一事無成，費力不討好。但只要我們依靠于群众的自覺与自动，只要群众有了眞正的自覺与眞正的发动，又有我們党的正确領导，我們党的一切偉大事业，都一定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与成功。因此我們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鋒队，不論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沒有自覺时，我們的責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啓发群众的自覺，不論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長久的时間，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須作好的；因为只有作好了这第一步，才能进入第二步，即是当着群众已經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覺以后，我們的責任，就是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組織起来，斗爭起来；在群众組織起来，斗爭起来以后，我們再从群众的行动中去啓发群众的再自覺。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党提出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口号而斗爭。我們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任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偉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群众事业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这些。除开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点。如果有人企圖在这里再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錯誤都可能由此产生。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賜观点等，都可能产生。

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該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

群众的引导者和嚮导，而不应該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人民群众在革命斗爭中迫切需要有远見的坚强的引导者与向导，因为这样的引导者和向导，是人民群众爭取胜利的必要条件；但是人民群众并不需要代替他們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因为这种脱离群众的"英雄好汉"不能完成任何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

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我們要很好地为群众服务，要去啓发群众的自覚，要去指导群众的行动，那我們共产党人必須首先具备一定的条件，必須有預見，对于各种問題必須有預先的計算。就是說，必須是先覚者。只有先覚者，才能覚后覚。我們同志除开完全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具有充分的热情和牺牲精神之外，还必須有足够的知識，还必須是十分有經驗和十分机警，才能很好地去啓发群众自覚和指导群众行动，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了要使我們有知識、有經驗和有預見，我們就必須学习。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学习历史，学习外国人民斗爭的經驗，可以增加我們的知識。向敌人学习，也可以增加知識。而最重要的，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因为群众的知識，群众的經驗，是最丰富最实际的，群众的創造能力，是最偉大的，所以毛澤东同志常常教导我們：必須首先向群众学习，然后教育群众。只有我們同志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識和經驗集中起来，化为系統的更高的知識，才能够具体地去啓发群众的自覚，指导群众的行动。如果不向群众学习，而自作聪明地从腦子中想出一套东西，或生硬地从历史經驗与外国經驗中搬运一套东西，来啓发群众与指导群众，那是一定無用的。为了能够不断地向群众学习，所以我們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如果我們从群众中孤立起来，那我們的知識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們們就决不能是聪明的，决不能是有知識有本事的，我們就决不能領导群众。

"……平常的人有时候竟比某些高級机关更接近于眞理得多。"

"……要領导我們的事业，只靠我們的經驗、領导者底經驗，是远不够的、要正确地領导，就必須以党員群众底經驗、工人阶級底經驗、劳动群众底經驗、所謂'小人物'底經驗来补充領导者底經驗。"

为要做到这一步，只有在"領导者与群众有极密切的联系，領导者与党的群众、与工人阶級、与农民、与劳动知識分子有极密切的联系时才有可能。"

"与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决心傾听群众底意見，——这就是布尔什維克領导力量之所在及其不可战胜的原因。"（斯大林："論党工作底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兩面分子及其他兩面分子的办法"）

这是斯大林告誡苏联共产党人的話。这是一条普遍眞理。

領导者与領导机关的职責，就是要实行正确的領导，就是要正确地了解情况，正确地抓住中心，提出任务，决定問題，正确地动員与組織群众来实行自己的决定，正确地組織群众来审查自己决定之实行的情形。而为要使这些事情都做得好，就必須向群众学习，必須实行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綫。否則，任何一件領导工作都是做不好的。

这就是向群众学习的观点。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負責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們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們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綫，才能实行正确的領导。

有些同志只把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的工作，看成是群众工作，但不把其他工作也看成是群众工作，这是錯誤的。我們党的及我們党所領导的各种工作、各种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都是（無一項不是）經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都应該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綫去进行。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綫，都要有群众观点。

我們党內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綫；因为党的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党又只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我們在軍队中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綫；因为軍队本身，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軍队又只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自然，各种工作，各有其特殊的工作方式，不可混同，如工会、农

会的工作方式，和党的、軍队的工作方式，应該有所区别。但各种工作，都是群众工作。

自然，人民群众不是划一的，各种工作是复杂的。我們同志应从各种工作的崗位上，直接地去为部分的、具体的人民服务（如为一个工厂的工人、一个农村的农民、一个机关的职員、一个部队的士兵服务，以至只为几个人服务等），而汇合于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个共同目标上。因此，我們同志必須正确理解部分与全体的关系，直接进行部分工作与为部分人民服务，間接推进与加强整个革命工作与为全体人民服务。我們同志必須同时具有部分观点与全局观点，只照顧部分不照顧全体，是不对的，只照顧全体不照顧部分，也是不对的。应使部分与全体統一起来。在人民群众部分的暫时的利益与全体的長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使部分的暫时的利益服从全体的長远的利益。这就是說，小道理应該服从大道理，小原則应該服从大原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問題，然而，只有当我們同志善于思想，善于在一切具体情况下，正确地区别与配合人民群众的部分利益与根本利益时，才能有徹底的群众路綫；否則，就可能自覚与不自覚地只站在部分人民的暫时的利益上，反对多数人民的長远的利益，而从多数人民的長远的利益上脫离人民群众。

在一切群众中，通常总有比較积极的部分及中間狀态与落后狀态的部分，在最初时期，积极分子总是比較占少数，中間与落后狀态的人总是組成为广大的群众。按照群众路綫，必須照顧多数，即是必須照顧中間狀态与落后狀态的群众，否則先进部分就会孤立起来，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我們在群众中提出的行动口号以及斗爭形式、組織形式等，都必須是中間狀态与落后狀态的群众能够接受的，所謂啓发群众的自覚与自动，主要地就是要去注意啓发那些中間与落后狀态的群众的自覚与自动。只有中間狀态与落后狀态的群众有了覚悟，有了热情，起来行动的时候，才能有群众运动。我們必須特别注意教育、团結与組織积极分子，使积极分子成为群众中的領导核心。但是我們絕对不是为了組織积极分子而去組織积极分子的，絕对不能使积

极分子从中間与落后狀态的群众中孤立起来，而是为了要經过积极分子去吸引与推动中間狀态与落后狀态的群众、即是为了最广大的群众而去組織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如果中間与落后狀态的群众还未自覚，我們就要善于去啓发他們，并要善于等待他們；如果我們不願意等待，而冒冒失失地率領少数积极分子前进，我們就会脫离群众，我們就要失敗。

中国的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就全国范圍来說，所謂照顧人民群众的多数，主要地就是照顧农民。我們的群众观点与农村观点，是密切联系着的。中国的工人阶級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看不見中国的农民，如果不着眼于中国农村的解放，是一定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中国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很低，其他群众的文化水平（除知識分子外）也很低，因此，在我們的工作中采取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結合的方法，采取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方法，就更有必要。指导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仅用一般号召，是决定地不能成功的。因为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总是从亲自看到的、亲自体驗到的事情上去理解問題，而不是从我們一般的宣傳和口号上去理解問題的。我們必須在工作中突破一点，做出模范，讓群众亲自看到、体驗到，給群众以典型示范，才能鼓励群众特别是給中間狀态与落后狀态的群众以理解問題的可能与方便，給他們以信心和勇气在我們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成为群众的热潮。近来各地部队工作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之所以发生很大的作用，成为群众中最好的宣傳者与組織者，就是因为他們是以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人物、范例和經驗，使群众理解了問題，提高了群众的自覚与自信。中国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建設事业对于全国人民的教育啓发作用，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的自覚与自信，也是这样。至于領导方面在突破一点的过程中取得具体經驗，以加强自己的一般号召，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对于群众，如果沒有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經驗来做一般号召的內容，群众是很难理解的。

我們要照顧全体，照顧多数，不要关門主义与宗派主义。我們要密切联系群众，不要官僚主义与軍閥主义。

我們要領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們要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我們要从群众原来的水准出发，去提高群众的覚悟，率領群众前进。我們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則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这就是我們的群众路綫。这当然是不容易作到的，但只有如此，才够得上一个好的馬克思主义者，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員。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三月第十四版單行本第三七至五七頁）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摘錄)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鄧 小 平

(二)

党章草案的总綱,同原有的总綱比較起来,有了很大的修改,特别是在政治方面。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党章的总綱,是我們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和組織綱領。我国的政治情况既然發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們在目前时期的政治綱領,当然也要有根本的改变。关于总綱的政治部分,在大家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以后,我以为可以不再作什么說明了。对于党章草案的总綱,需要首先着重說明的,是其中說到的我們党的群众路綫問題。

群众路綫在我們党的工作中,并不是新的問題。在第七次大会通过的党章,特别是党章的总綱中,就是貫串着群众路綫的精神的。毛澤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关于党的作风的部分,刘少奇同志在第七次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关于党章的总綱部分,对于群众路綫問題都作了精辟的解釋。現在所以仍然需要加以着重說明,是因为:第一,群众路綫是我們党的組織工作中的根本問題,是党章中的根本問題,是需要在党內反复进行教育的。虽然第七次大会已經对于这个問題作了說明,但是,現在党內絕大多数同志是在第七次大会以后入党的,而且实踐証明,有許多同志并沒有貫徹执行这一路綫,这說明党內对于这一問題的教育,还决不能認为是充分的。第二,从第七次大会到現在的十一年間,党的实际斗爭的經驗,給了这一路綫以更深刻更丰富的內容,因而在党章草案中,这一路綫也

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映。党章草案的总綱，着重地指出了党必須不断地發揚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綫的傳統，并且指出了这个任务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綫呢？簡單地說来，它包含兩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認为人民群众必須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領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給人民群众指出斗爭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爭取和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須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脫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員必須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負責、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認为党的領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澤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領导方法的决定"的話来說，就是"將群众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来(經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众中去作宣傳解釋，化为群众的意見，使群众坚持下去，見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驗这些意見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綫，具有极深刻的理論意义和实际意义。馬克思主义向来認为，归根結底地說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創造的。工人阶級必須依靠本阶級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現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人民群众的覺悟性、积极性、創造性愈是發展，工人阶級的事业就愈是發展。因此，同資产阶級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級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覚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偉大的領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領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

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組織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爭。确認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認党沒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認党沒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賜、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認党沒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

如果不从認識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張必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問題，那末，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問題仍然不能眞正地解决。实踐証明，許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沒有为人民服务的願望，但是他們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損失。这是因为他們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領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們出的主意，經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他們又不从錯誤和失敗中取得教訓，以为錯誤和失敗，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濫用党的威信，繼續一意孤行，这就使他們的錯誤和失敗愈来愈严重。在我們党的历史上，这种主观主义者給我們党的損失，給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損失，是不可胜数的。主观主义者不懂得，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繼續做学生，才能繼續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員，只有認眞地总結群众的經驗，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領导群众前进。我們不是尾巴主义者，当然懂得，群众的意見一定不会都是正确的和成熟的。我們所謂总結和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見的簡單堆积，这里必須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但是，离开群众經驗和群众意見的調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領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領导。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也是会犯錯誤的，但是不断地同群众商量，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踐，这就使党有可能少犯錯誤，并且及时地發現和糾正錯誤，而不致使得錯誤發展到严重的地步。

因此，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綫，本身就要求党的領导保持謙虛和謹慎的态度。驕傲，專横，魯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見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錯誤，是同党的群众路綫根本不相容的。

回顧一下我們党从第七次大会以来所走的道路吧：我們党在解放战爭中，在土地改革和肃清反革命的斗爭中，在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斗爭中，在發展工业、农业和其他經济文化建設事业的斗爭中，我們党所得到的巨大胜利，哪一項不是执行群众路綫的結果？例如說，为什么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和战斗員能够战胜在数量上和裝备上都占优势的国民党軍呢？难道主要地不是由于他們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場，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树立了模范的軍民关系，在部队內部建立了能够充分發揚下級官兵积极性的同志式的关系，并且依靠群众，总結每次战爭的經驗，从战术到战略都不断地得到进步的原故嗎？战士替居民挑水，官長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綫上开"諸葛亮会"，保护俘虜的健康和自尊心，不搜俘虜的腰包，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一系列的偉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例如說，几千年受地主阶級压迫的几万万农民，为什么能够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样坚决地建設自己的新生活呢？难道不是由于我們党在土地改革期間所派的工作团，眞正深入到了貧苦农民中間，找出他們的积极分子，喚起他們的覚悟，动員农民自己起来，推翻地主的統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們眞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領导核心，而不是簡單地由政府下命令把地主的土地轉移給他們的結果嗎？他們这样迅速地和自願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难道不是我們党从群众本身的經驗出發，大量地帮助农民从組織季节性的互助組起，进而組織常年互助組，进而組織初級合作社，又进而組織高級合作社，使农民从实踐中确信了合作化的优越性的結果嗎？例如說，我們国家的肃反运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績，而又能够少犯錯誤，难道不是我們采取了專門机关和發动群众相結合的正确方針的結果嗎？难道不是因为我們充分地發动了群众，在几万万只眼睛的透視之下，才使得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沒有藏身之所，而不得不低头認罪、接受改造和重新做人嗎？例如說，在全国解放以后，不到兩三年的时間，我們就改变了旧社会那种极端腐敗的社会风气，树立了具有优良道德品質的新的社会风气，难道沒有广大人民群众自

覺自願的行动和群众之間的相互教育、相互劝导和相互帮助，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嗎？試問，我們在大規模的消灭鴉片烟毒的运动中的胜利，在大規模的爱国衛生运动中的胜利，以及在生产建設和其他各种工作中的胜利，哪一件不是因为这个运动或者这件工作的本身，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且变成了广大群众自覺自願的行动的結果呢？

在說到我們党由于实行群众路綫而得到巨大的胜利的时候，我們的意思决不是認为我們的工作在这一方面都是光明的。恰恰相反，我們的目的是要讓全党記住：如果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綫，使我們得到成功，那末，違背群众路綫，就一定要使我們的工作遭受損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損失。如同前面已經說过的，由于我們党現在已經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脫离群众的危險，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脫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認眞地宣傳和貫徹执行群众路綫，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党的組織和国家机关的許多工作人員中，正在滋長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傾向。不少領导机关和領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視調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眞实情况。他們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踐出发，来考虑和决定他們的工作，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像和願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們的工作。因此，他們作出的决議、指示虽然很多，但有的不完全正确，有的甚至完全錯誤。他們在执行中央和上級的指示的时候，往往不采取同下級同志和群众商量的办法，不結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只是机械地盲目地搬运。他們往往滿足于表面上的成績，而不注意工作的实际效果，或者只看到工作中好的方面，看不到工作中坏的方面，或者只追求数量，不講究質量。他們对自己的工作心中無数，常常左右摇摆，有时表現为右傾保守，思想落后于实际，有时又表現为急躁冒进，貪多求快，超过实际的可能。

不少机关的負責同志，把自己的絕大部分时間，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層，深入群众，了解他們的要

求和研究他們的經驗，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牘主义的泥坑。不少領导同志，喜欢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建立龐大的机关，由于机構臃腫，層次重叠，不能使群众的意見和要求正确地及时地反映上来，也不能把自己的决議和指示正确地迅速地貫徹下去，在自己和群众之間，設置了許多人为的障碍。不少負責同志，对于工作中需要立即解决的問題，不是亲自动手来处理，而是層層下放，然后又層層上报，結果不是处理有錯誤，就是处理不及时，使工作受到許多損失。更严重的是有些領导同志，不願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問題，不是积极地去解决，而是抱着一种無动于中的冷淡态度。

官僚主义也表現在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驕傲自滿情緒。他們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調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贊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甚至有些品質惡劣的人，还对批評者实行压制和报复。我們党內还有一种人，他們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顚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間濫用权力，做种种違法乱紀的坏事。这是一种很惡劣的反人民的作风，这是旧时代統治阶級作风在我們队伍中的反映。誠然，这样的干部为数很少，但是，他們的危害却很大。

官僚主义傾向还有一种比較大量的表現，就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組織和干部，在作出决議、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議、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圖一切依靠命令行事。犯这种錯誤的同志，他們在主观願望上也許是想把工作做好，但是，在实际上却是把工作做得很坏。这种命令主义的錯誤，在党的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中表現得較为突出，但是，下面的命令主义錯誤，往往是同上級領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領导分不开的。

上述这些現象的存在，說明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綫，还远沒有在我們党內得到完全貫徹地执行。我們必須向这些脫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現象进行經常的斗爭。而且我們必須看到，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長时期剝削阶級統治的遺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

远的影响。因此，貫徹群众路綫，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須是一个長时期的斗爭。

党章草案在总綱部分和有关的条文中，都提出了这个任务。当然，仅仅依靠这些規定，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問題。我們还必須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我們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呢？

第一，必須在党的教育系統中，在党員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綫的教育。

第二，必須有系統地改善各級領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領导工作人員有足够的时間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調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經驗和意見，而不是像現在这样，把絕大部分时間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領导机关內部开会上面。应該縮小領导机关，减少領导机关的層次，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員騰出来派到下層去，使留在領导机关的工作人員必須亲自处理实际工作，防止領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險。

第三，必須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和政府的下級組織，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証，可以及时地無所顧忌地批評上級机关工作中的錯誤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議，特别是各級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見、开展批評和爭論的講壇。

第四，必須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現和糾正各种官僚主义現象，对于違法乱紀和其他严重地損害群众利益的分子，及时地給以应得的处分。

第五，各地区各部門党的組織，必須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經驗，采取群众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員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頓，特别着重檢查群众路綫的执行情况。

在貫徹执行群众路綫、反对官僚主义的斗爭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爭，具有重大的意义。現在我們党內还有不少的同志，甚至还有一些負相当領导責任的同志，仍然犯着不願意或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毛病。这实質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派主义傾向，必須克服这种傾向，才能使党的統一战綫

政策得到貫徹地实行。必須使这些同志了解，我們党同民主党派和無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長期的，这一个方針是早已确定了的。从抗日战爭时期开始，我們党就实行了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們同各个民主党派和無党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多年的經驗証明，这种合作对于我們党的事业，是有益而無害的。同我們合作的民主人士中，有許多人最初在政治上是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的代表，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他們的立場，逐漸在不同程度上向社会主义方面变化了，并且將繼續向这个方面变化。当然，这种合作中間是有斗爭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問題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們党提供一种單靠党員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現我們工作中的一些我們所沒有发現的錯誤和缺点，能够对于我們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在他們的立場和我們的立場比以前更加接近以后，他們可以給我們的帮助只有越来越多。因此，我們的任务就是繼續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使他們在我們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爭中，和在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

关于我們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綫的意义，关于我們党在工作中繼續貫徹群众路綫方面的任务，我所要說的就是这一些。

（三）

民主集中制是我們党的列宁主义的組織原則，是党的根本的組織原則，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綫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在党章草案的总綱和第二章中，对于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較充分的規定。这些規定，是我們党組織生活的多年来經驗积累的結果。

党是依靠全体党員和全党的各个組織，来联系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为了从人民群众中收集他們的意見和經驗，为了向人民群众宣傳党的主張，把它变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主張，并且組織人民群众加以执行，一般地都必須經过党員的努力，經过党的下級組織的努力。因

此，正确地解决党的組織和党員的关系，党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的关系，党的中央組織和地方組織的关系，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問題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我們党的历史上，关于上下級关系問題，是曾經出現过偏向的。"左"傾机会主义在党內居于統治地位的时候，上下級关系中的偏向是过度集中。在那个时期，下級組織对于上級領导机关实际上几乎沒有发言权。当时的上級領导者不但沒有兴趣听取下級的情况和意見，而且要給那些根据实际情况向他們提出合理的不同意見的人們以种种打击。这种錯誤，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結束了"左"傾机会主义的統治以后，也就在基本上被克服了。

从一九三五年以来，我們党的上下級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中央在处理全国性的重要問題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征詢和听取各地方和各部門的同志們的意見，对于不同的意見，一般也可以进行自由的反复的討論。大家知道，中央有許多重要的指示，是先用草案的形式发給地方，要求各地在討論和試行中加以修正，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多以后，才根据各地的意見修正发布的。对于中央已經发布的指示，如果地方組織由于具体情况确实不能照样执行，中央也同意地方組織按照实际情况加以变通。不但在抗日战爭期間和解放战爭期間，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中央都給予地方独立处理問題的广泛权力，而事实証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在各地方和各部門，上下級关系一般也是执行了同样的原則。地方和下級对于中央和上級的領导，一般是尊重的，因此，党的政策基本上在全党能够得到貫徹地实行。

但是，在这个时期，党內也曾經存在过另一种偏向，就是分散主义的偏向。我們党內时常出現这样一种干部，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爱好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領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級的决定，甚至在他們处理一些应当由中央統一决定的重要問題的时候，也事前既不向中央和上級机关請示，事后又不向中央和上級机关报告，違背党的政策和紀律，危害

党的統一。党中央对于这种偏向，进行了不断的坚决的斗爭。一九四一年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領导一元化的决定，一九四八年中央关于建立請示报告制度、加强組織性和紀律性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都主要是針对着克服这种分散主义傾向而发出的。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更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徹底地摧毀了这种分散主义的錯誤。从那时以来，分散主义的偏向，就只在个别的范圍內还有它的殘余了。

在目前，党的上下級关系中的缺点，从总的方面說来，主要地还是对于发揚下級組織的积极性創造性注意不足。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不但表現在經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国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現在党的工作中。上級机关所作的硬性的規定太多，而不少的規定，并不是对于下級組織的情况和經驗作了充分研究的結果，以至往往使下級組織在执行的时候发生困难。許多上級組織还不善于深入下層，傾听下級組織和群众的意見，同下級組織經过互相商量去解决工作中的問題，还习慣于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或者到下面去包办代替。此外，有些上級的領导人員还喜欢摆架子，耍威风，只是教訓人，批評人，而不能向下級請教，不能听下級的批評，不能对下級作自我批評。这种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也不是个别的。如果不注意并且改变这种情况，那末，在这些地方也就不会有眞正的民主集中制。

根据以上所說的多方面經驗，党章草案关于民主集中制中的上下級关系問題，增加了下列的規定：

第一，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增加了下列的規定："党的各級領导机关必須經常听取下級組織和党員群众的意見，研究他們的經驗，及时地解决他們的問題。""党的下級組織必須定期向上級組織报告工作。下級組織的工作中应当由上級組織决定的問題，必須及时向上級請求指示。"

第二，关于中央和地方、上級和下級的职权范圍問題，增加了这样的条文："党的中央組織和地方組織的职权应当有适当的划分。凡

屬全国性質的問題和需要在全国范圍內作統一决定的問題，应当由中央組織处理，以利于党的集中統一；凡屬地方性質的問題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問題，应当由地方組織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上級地方組織和下級地方組織的职权，也应当根据同一原則作适当的划分。”

第三，关于政策問題的討論和决議的执行，增加了这样的条文：“关于党的政策問題，在党的領导机关沒有作出决議以前，党的下級組織和党的委員会的成員，都可以在党的組織內和党的会議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討論，并且向党的領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議。但是党的領导机关一經作出决議，他們就必須服从。下級組織如果認为上級組織的决議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門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級組織請求改变这个决議；但是如果上級組織認为仍然应当执行原来的决議，下級組織就必須無条件地加以执行。”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問題，是各級党組織中的集体領导問題。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問題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領导原則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闡明，这些闡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問題，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領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錯誤的机会。

在我們党內，从長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問題，已經形成一个傳統。違背集体領导原則的現象虽然在党內經常发生，但是这种現象一經发現，就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糾正。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領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我認为，把这个决定在这里重新介紹一下，对于全党仍然是有意义的。这个决定写道：

“党委制是保証集体領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領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問題的習气甚为濃厚，重要問題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議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

決定，党委委員等于虛設，委員間意見分歧之事亦無法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長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員間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質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須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軍区（軍分会或領导小組）、政府党組、民众团体党組、通訊社和报社党組，均必須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議制度，一切重要問題（当然不是無关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会議討論只待执行的問題）均須交委員会討論，由到会委員充分发表意見，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之党委亦应如此。高級領导机关之部（例如宣傳部、組織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領导分子的集体会議。当然必須注意每次会議时間不可太長，会議次数不可太頻繁，不可沉溺于細小問題的討論，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議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見的重要問題，又須有个人商談，使委員們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議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委員会又必須分划为常委会和全体会兩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必須注意，集体領导和个人負責，二者不可偏廢。軍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長有临机处置之权。”

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現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

当然，集体領导的制度在这个决定之前早就存在了。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結了党内認眞实行集体領导的成功的經驗，促使那些把集体領导变为有名無实的組織糾正自己的錯誤，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領导的范圍。

像这个决定所說的，在中国人民解放軍里面，長期以来就实行着党委的集体領导制，或者說得完全些，党委集体領导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中国人民解放軍長期战爭的經驗，証明这个制度对于部队工作是有利的，它并沒有妨碍部队的軍事指揮。根据最近几年的經驗，中央已經决定在一切企业中同样实行党委集体領导的制度，也就是党委集体領导下的厂長負責制或經理負責制等等。

但是，党的集体領导的制度，在实踐中还是有許多缺点。有少数党組織的負責人，仍然有个人包办的行为。这些負責人，或者很少召

集必要的正式的会議，或者往往也召集党組織的会議，但是，这些会議只是形式主义的。他們既沒有使会議的參加者对于所要决定的問題，在会議以前具有思想上的准备，在会議上，又沒有造成便于展开討論的气氛，实际上形成强迫通过。这种以集体領导的外表掩盖个人專断的实質的办法，必須坚决加以反对。一切提到会議上的問題，都必須經过討論，允許提出異議。如果在討論中发現重大的意見分歧，而这种分歧并不屬于需要立即解决的紧急問題，就应該适当地延長討論，并且进行个人商談，以便求得大多数的眞正同意，而不应該倉促地进行表决，或者生硬地作出結論。同样，在党組織进行选举的时候，候选人的名單也应該在选举人中間进行必要的醞釀和討論。只有这样，党內的民主生活才能获得眞实的保証。

中央一九四八年九月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另一方面的缺点，現在在許多組織中也还存在，这就是会議次数过多、时間过長。过多过長的会議，不但使党的專职工作人員缺少深入群众和进行具体領导的时間，助長官僚主义和文牘主义，而且妨碍許多党員和群众的劳动和休息。这种缺点的产生，是由于缺乏对会議的規划、准备和領导，同时也由于濫用会議的方式，把許多不需要提到会議上討論的問題提到会議上来了。这种缺点也必須坚决地克服。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党的各級代表大会的定期召集和充分发揮作用。党的第八次大会同第七次大会隔了十一年多，当然是迟了。地方各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議，除了一部分單位已經严格执行了党章的規定以外，多数的單位还是比党章規定的开得少。这是我們党的民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缺点。

党內民主沒有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議开得不經常而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从第七次大会以来的这些年份里，無論党的中央組織和地方組織，都召集了大量的干部会議，这些会議按照充分民主的精神，討論了党的政策和工作中的各种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起了党的代表会議以至代表大会的作用。例如，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就召集过多次全国范圍的会議，这就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圣十三日的扩大的七届二中全会；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至九日的扩大的七届三中全会；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一日的全国财政經济工作会議；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至十二日的全国粮食統購統銷会議；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的扩大的七届四中全会；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的全国代表会議；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一日的省市委書記会議；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的关于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問題会議；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的关于知識分子問題会議；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的省市委書記会議。出席这些会議的，一般都有百多人、几百人到一千多人。这些会議，实际上都起了全国代表会議的作用，都在自由的、切实的討論的基础上，解决了党的政策和工作中的重要問題。当然，無論如何，召集这些会議在法律上究竟不能代替召集代表大会，不能弥补不經常召集代表大会的缺憾。

为了徹底克服这个缺点，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員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項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級的和县一級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級人民代表大会那样。党章草案規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一級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一級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这三級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因此，原有的党的各級代表会議制度就不需要了。党的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大大减少了代表选举工作的負担，代表大会在任期届滿以前，可以随时召集。由于每年开会，代表大会的会議也就可以开得簡便一些。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从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按照新的制度，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經过代表大会討論。党的中央、省、县委員会每年必須向它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評，答复它的詢問。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們的选举單位負責，就便于經常地集中下級組織的、党員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見

和經驗，他們在代表大会会議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閉会期間，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們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內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

必須着重地指出，党是一个战斗的組織，沒有集中統一的指揮，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胜利的，一切发展党內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給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这是我們大家都充分明了的。我們主張改进各級代表大会的制度，是为了使各級党的委員会更便于集中广大群众的意見，工作作得更正确有效。我們主張改进中央和地方、上級和下級之間的工作关系，是为了使中央和上級的領导更符合于实际，把注意力更集中于必須集中的工作，对于地方和下級更可以加强檢查和指导。我們主張巩固集体領导，这并不是为了降低个人的作用，相反，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揮，而集体領导，也必須同个人負責相結合。沒有个人分工負責，我們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复杂的工作，就將陷入無人負責的灾难中。在任何一个組織中，不仅需要分工負責，而且需要有人負总責。沒有小組長，一个小組也不能行动，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常識嗎？

在这里，我想談一下領袖对于党的作用。馬克思主义在承認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創造的时候，从来沒有否認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結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轉移的。同样，馬克思主义也从来沒有否認領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著名的說法，領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經驗"的人們，毫無疑問，他們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經驗乃是党、阶級和人民的宝貴的財富。对于这一点，我們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切身經驗中，是感到特别亲切的。当然这种領袖是在群众斗爭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同过去剝削阶級的領袖相反，工人阶級政党的領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級政党的領袖，必須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須是服从党的組織、遵守党的紀律的模范。对于

領袖的爱护——本質上是表現对于党的利益、阶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們党从来認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沒有缺点和錯誤，这一点，現在已經写在我們的党章草案的总綱里去了。因为这样，我們党也厭棄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澤东同志的提議，决定禁止給党的領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領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頌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領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領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長远历史的社会現象，这种現象，也不会不在我們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务是，繼續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眞正巩固領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則和群众路綫，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地执行。

（摘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九月單行本第三四至五三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刘 少 奇

（閱讀第二、三部分）

（見本書第四五四至四七三頁）

把总路綫的紅旗插遍全国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論

我們党的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已經胜利結束了。这次大会是整风的大会，是大躍进的大会，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我国人民在我們党的領导下，已經取得了經济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正在进入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新时期。

这次大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确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大会号召全党同志同心同德，团結全国人民，在繼續完成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貫徹执行这条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这次大会的另一个內容是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議的决議。决議完全支持莫斯科宣言；并且指出："同各国兄弟党一起，在政治上和理論上徹底粉碎現代修正主义，保衛馬克思列宁主义，保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統一，是我們党对国际工人阶級的神聖义务。"大会还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委托中央委員会根据今年的实行情况再作必要的修改，提交第二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布。大会号召全党同志同五亿农民一起，和全国人民一起，为提前实現这个綱要而努力。

党的八屆二次大会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是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总結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的結果。如果說，党的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主要是总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經驗，那末，第二次会議主要是总結了整风运动和社

会主义建設的經驗。这次会議能够总結社会主义建設經驗，并且提出和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是由于經济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基本上完成，党已經有可能把主要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設方面来，而我国的建設工作也已經有了八年的历史，特别是在最近三年中取得了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这样一个馬鞍形發展的教訓。經过这次大会，党和人民获得了統一思想、統一步調的銳利武器，这对于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迅速發展，無疑將产生偉大的作用。

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正确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迫切要求，也体現了我們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概和对于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在我們的国家里，要不要建設社会主义的問題已經解决了。摆在面前的問題是采取怎样的方針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究竟要不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呢？要不要、能不能把事情办得快些好些呢？在有些人看来，我国建設只能慢些、差些，不能快些、好些。他們有种种理由：什么人口太多啦，經济文化太落后啦，农业長不上来啦，資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啦，外国的速度也只有那样高啦，如此等等。这些人跟資产阶級右派不同，他們是要建設社会主义的，只是他們的精神不够振作，反映了由于我們民族長期被压迫而遺留下来的自卑心理。他們只覺得自己矮得很，别人才是丈二金剛。他們不知道，解放了的、覚悟了的、团結起来和組織起来的六亿多人口，这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創造力量，有了这个力量，就能够有最多的資金和最大的技术力量，就能够有工业和农业的高速度發展，就能够做到人类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在偉大的中国和以偉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面前，什么美国英国，什么帝国主义陣营，真正不过是一些侏儒罢了。我国的經济文化还很落后，但是正因为这样，我国人民对于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积极性特别巨大。党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正是集中体現了我国人民对于尽早擺脫經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迫切要求，表現了我国人民的大無畏精神和勢如破竹的气概。我們党深

信，只要鼓足六亿多人民的干勁，动員六亿多人民力爭上游，我們就一定能够高速度地进行建設，一定能够在一个比較短的时間內赶上一切資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一。人們看到，正是在經济落后文化落后的中国，人民革命的發展速度和規模远远超过了欧美所有經济發达、文化發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我国在建設的速度和規模方面不能同样远远地超过它們呢？我們在任何时候都反对驕傲自大，但是自卑和自大同样是我們所必須抛棄的低級趣味。目前我国广大群众在全民整风和建設高潮中，已經表現出一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作敢为的高尚风格。我們应該發揚这种共产主义的风格，使之成为全党的风格，全民族的风格。这是实現总路綫的关鍵。

党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的基本出發点既然是相信群众的力量和反映群众的意志，那末，实現这条总路綫的基本方法，也必然是群众路綫的方法。我們的国家是又穷又白，我們的建設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群众。总路綫規定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就是为了發揮五亿农民的积极性，为工业提供最大的市場、更多的資金和更多的原料。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就是为了使全国二十几个省、直轄市和自治区，一百八十多个專区、二千多个县、八万多个乡、十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和七十多万个农业合作社，都能够充分發揮發展工业的积极性，使企业更加接近群众，更加便于充分地發掘群众的潜力。党所号召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同經济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都必須是群众性的运动。而整风运动的深入，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报的方法的普及，官气、暮气、闊气、驕气、嬌气的克服，在領导工作中种試驗田、跟班劳动、参观評比、抓兩头帶中間等項方法的推广，这些都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为了充分地發揮群众的积极性。目前全国各地工农业生产躍进，地方工业遍地开花，农具改良运动和技术革新运动蓬勃發展，扫盲运动、民办中小

学、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衛生运动成效显著，都有力地証明了：由于貫徹执行群众路綫，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已經产生了無穷無尽的偉大力量。毛澤东同志曾經一再教导我們，群众路綫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綫。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正如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所說，是群众路綫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的应用和發展。在一切工作中运用这个路綫，一定能够保証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在党的路綫已經确定以后，全党的任务，全国人民中一切积极分子的任务，就是貫徹执行这条路綫，把总路綫的紅旗插遍全国，使总路綫的灯塔照耀全国人民的一切工作。目前，全民整风运动已經取得了偉大的胜利，党內的团結和全民团結已經大大增强，各項建設事业都处在躍进的高潮中。这一切都是使人高兴的。但是这决不是說，在我們的工作中已經沒有缺点、沒有困难了，总路綫的实現已經不会再有曲折，不再需要艰苦的奋斗了。我們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同时又是革命的現实主义者。我們必須在工作順利的情况下看到我們工作中存在的各种缺点和困难，还要預計到一切可能發生的困难，預計到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总路綫要求我国尽快地建成为一个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現代科学文化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把这个偉大的理想变为現实，还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付出严重的努力。全党干部必須沿着又紅又專的道路頑强地学习；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我們必須学会把辯証唯物主义运用到一切实际工作中去，学会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踐相結合，把严肅的原則精神同生动活潑的創造精神相結合。我們全党同志应当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学习毛澤东同志的著作，大大提高我們党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理論水平，以便胜利地实現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論

党的整风运动和人民群众反对資产阶級右派的斗爭，經过几个月以来的發展，目前正在扩大成为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除了民主党派、国家机关、教育界、新聞界、科技界、文艺界、衛生界的反右派斗爭已經陆續展开以外，全国的工商业者，全国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城乡劳动者，也都正在或者將要分期分批地用擺事实和講道理的方法，就許多有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根本問題，展开群众性的大辯論。

这次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对于資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的知識分子，是使他們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問題；对于小資产阶級（原来的个体农民和其他的城乡小生产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們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問題。对于工人阶級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則是整頓作风，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問題。这本来是屬于性質不同的兩个社会范疇。但是，由于都采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擺事实和講道理的大辯論的方法，因而都叫作整风。

党的这个方針已經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大家現在都看到，如果不采取这种整风的方法，不采取这种群众性的大辯論的方法，就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間內使这样多的人大大提高政治覚悟，并且使形形色色的錯誤的和反动的意見受到揭露和批判。但是直到現在，也还有不少同志对于在工厂农村展开群众性的大辯論抱着怀疑的态度，不敢發动群众起来大鳴大放大爭。他們多少还有些害怕群众的批評

揭露，害怕群众中的落后分子和混在群众中的右派分子的煽动，害怕大字报、座談会、辯論会的斗爭形式。他們想：这种办法，在高等学校和国家机关中間或者是有效的，但是为什么要把它推广到全体工人、农民中間去呢？这不会搞得"天下大乱"嗎？

其实，就在高等学校和国家机关中間，在大鳴大放的初期，許多同志又何尝沒有这样憂虑过呢？但是事实証明，人民的"天"非但沒有坍下来，相反地，由于广大群众在辯論中認清了是非，提高了革命积极性，人民的天下是更巩固了。倒是那些得意忘形的右派分子，很快就被群众包圍起来，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圍攻。工商界和知識界的許多中間分子，由于他們的立場还沒有根本的轉变，虽曾受过右派言論不同程度的蠱惑和煽动，但这也只是暫时的現象。在反击右派的斗爭中，他們也逐步地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站到人民群众方面来了。

事情的这种偉大轉变說明了什么呢？它說明了：第一，我們的事业的正义性是不容怀疑的。广大人民已經坚定地接受了共产党的領导，选擇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任何人要想反抗广大人民的这种意志，都只能遭到可耻的失敗。第二，任何重大的問題，首先是涉及我国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只要我們坚定地依靠群众的多数，相信群众的革命性和覚悟性，有領导地在群众中展开討論和辯論，群众就一定能够分清是非，辨明善恶，决不会被錯誤的和反动的言行所蒙蔽。第三，只有在革命斗爭的风暴中間，只有在同錯誤的和反动的言行作斗爭中間，才能給予干部和群众最好的教育和鍛煉，使他們增長見識、經驗和才干。那种不經风雨的、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鮮花，是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这次反击右派分子的全民性的大辯論，是一場尖銳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凡是参加到这个斗爭中来的人，都已經感覚到受了极其宝貴的教育，他們的头腦豁然开朗了，他們的思想覚悟和認識水平大大地提高了。

我們共产党人在进行任何工作和解决任何問題的时候，都必須坚定地依靠和相信群众的多数。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最高

国务会議扩大会議的演講中指示我們："凡屬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里所說的民主的方法、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群众路綫的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間，我們的党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党与群众之間，領导与被領导之間，以及这部分群众和那部分群众之間的矛盾的，并且已經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經驗。我們必須在今后坚持这种方法，才有可能在我們的国家里造成这样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的生动活潑的政治局面。有了这种生动活潑的政治局面，我們的党和国家就会更加巩固，我們的党和政府就会較易于克服困难，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就会更加充分地發揮出来，从而更快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

如前所說，反击右派分子的斗爭和人民內部的整风，是性質不同的兩个社会范疇的問題。但是都采用了群众性的大辯論的方法。这是因为，在揭露和批判右派的問題上，也必須依靠群众，也必須走群众路綫。

为什么有一些同志到現在还害怕用群众性的大辯論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来开展反右派的斗爭的問題呢？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同志还沒有深刻理解党的群众路綫的重要性，还沒有养成坚决依靠群众和有事同群众商量的习慣。

有一些同志不希望群众在大鳴大放的过程中公开批評他們的缺点和錯誤。他們听不得群众的批評，一听就沉不住气，就覺得丢了面子。这种想法当然是非常有害的。一个人的缺点和錯誤是客观的存在，既不会因为受了群众的批評而無中生有，由小变大，也不会因为躲过了群众的批評而由大变小，由小变了。群众如实地公开地批評了，这就給缺点的克服和錯誤的糾正造成了有利的客观形势，这就有力地推动了而且保証了工作的改进。犯錯誤的人在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面檢討了而且糾正了自己的錯誤，这有什么不好呢？群众看見你

認識和改正了錯誤，仍然会繼續信任你。相反，把自己的錯誤隐瞞起来，使自己的思想繼續受毒害，使党的工作繼續受損失，这又有什么利益呢？事实上，錯誤是隐瞞不了的，愈隐瞞只有使錯誤愈發展。别的不說，誰要是違反党关于依靠群众来整頓作风的指示，誰就首先犯了一个無法隐瞞的严重錯誤。

另外一部分同志害怕群众性的大辯論，是因为他們不相信群众能够通过辯論分清是非，他們害怕某些不正确的意見会在群众中乘机抬头，这就会使他們过去的政治教育"前功尽棄"，这就会給他們今后的工作造成很大的"麻煩"。这种想法也是完全錯誤的。群众中間如果有些人有不正确的意見，是根本不讓他們發表，因而得不到对症下藥的教育好呢，还是讓他們發表出来，讓他們通过辯論改正自己的認識好呢？毫無疑問，通过辯論以后，群众的絕大多数必然会站在眞理的一边，这比人云亦云地甚至言不由衷地附和正确意見要可靠得多，比在普通課堂上的学习要生动得多。这样的政治教育，才能眞正解决群众思想上的問題，才能眞正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只有通过这种政治教育，群众才能得到認眞的訓練，不但对于落后分子和中間分子是如此，而且对于先进分子，对于教育人的人，也是如此。

总之，对于一个共产党員来說，害怕群众性的大辯論是沒有絲毫理由的。我們共产党人是人民利益的坚决捍衛者。我們的目标是要消灭剝削阶級和剝削制度，在我国建立起人人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偉大的目标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了达到这个偉大的目标，我們同人民群众一起，向国内外的敌人进行了坚决頑强的斗爭，不惜忍受任何艰难困苦，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既然革命和建設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在推进这个事业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和矛盾，不依靠群众的集体力量、集体經驗和集体智慧来克服，还依靠誰呢？正由于我們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人民群众是我們的唯一依靠，我們才能够放手地發揚民主。甚至在手执武器的人民軍队中，党也在一定的范圍內和集中的指导下实行了軍事的、政治的和經济的民主，因而密切了官兵关系和軍民关系，因而使

軍队的士气高漲，战無不胜。在軍队里尚且能够采用的方法，为什么在工厂、农村中反而不能采用呢？共产党人連帝国主义反动派都不怕，难道反而怕自己的亲人——老百姓么？

依靠群众的力量和通过群众的辯論解决問題，这当然不是說可以放棄領导，可以放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放棄劳动紀律和行政紀律。相反，辯論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領导，加强应有的集中和紀律，而不是为了削弱它們。就是在辯論的过程中間，也必須遵守一定的集中和紀律，不允許妨碍生产和造成無政府狀态，而且必須有領导有步驟有計划地展开討論和辯論。群众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自發地了解一切事实的眞相，因此他們当然也会發表錯誤的意見，或者暫时受錯誤的意見所迷惑。但是只要我們加强領导而不是放棄領导，不但善于用群众自身的經驗来教育群众，并且积极帮助群众掌握全面的眞实的情况，那么經过討論和辯論，群众的絕大多数就一定能够站在正确的方面。

通过群众路綫处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改进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通过群众路綫开展反右派的斗爭，开展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当前的全民整风的內容。这对于中央和省市的許多領导干部，已經逐漸熟悉起来了；对于專区、县、区、乡和厂矿企业的許多干部，还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为了熟悉，就需要大談特談。要在正确地解决了一批这样的問題以后，就認眞地总結經驗，广泛地傳播教訓。这样久而久之，人們也就会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而作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大企业必须大搞群众运动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論

我国鋼鉄工业展翅高飞，有兩个翅膀：一个是"大(大型、中型企业)、洋(現代化生产方法)、群(群众路綫)"；一个是"小(小型企业)、土(土办法)、群(群众路綫)"；这也就是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土""洋"結合的方針在鋼鉄工业上的具体体現。在"小、土、群"方面，广大群众已經发动起来了。他們打破了办鋼鉄工业的神秘观点，大搞土法煉鉄、煉鋼，已經創造出种种奇迹，出現了衛星竞发、百花齐放的局面。他們对完成今年的鋼鉄生产計划信心百倍。但是，在"大、洋、群"方面，主要是全国十八个重点鋼鉄企业，其中有好些企业还沒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这些企业中还有一部分干部(甚至包括少数企业領导干部在內)不願去发动职工群众，那里沒有轟轟烈烈的群众运动，而是冷冷清清的局面，抱住"規章""制度"不放。甚至当工人群众已經冲破了生产常規創造出新的成就的时候，他們还在那里摇头議論，指点挑剔。这些同志在大型企业里占相当一部分人，他們的影响不可忽視。

毛主席在巡視大江南北回京后，对新华社記者发表的重要談話中指出："在鋼鉄战綫上，广大群众已經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說，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沒有做好，沒有开群众大会，沒有將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講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辯論。到現在，我們还有一些同志不願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規模的群众运动，他們把在工业战綫上搞群众运动，說成是'不正規'，貶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毛主席的指

示，对于那些不願意大搞群众运动的重点鋼鉄企业来說，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重点鋼鉄企业，对于完成今年鋼鉄生产任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今年計划产量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鋼和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鉄，依靠这些企业完成。如果不駁倒存在于某些重点企业領导人員中的錯誤思想，那里的群众运动就会遇到絆脚石，今年的鋼鉄生产就要受到損失。

这一部分同志的第一个錯誤是迷信設备，迷信"物"，而不重視"人"的"唯条件論"。他們說：要增产鋼鉄么？請拿吊車、馬达来！誠然，增添新設备是需要的，是完成鋼鉄生产任务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是誰也沒有否認过的。但是，这絕不是唯一的条件，而且問題还在于怎样去創造这些条件：是靠少数領导人向上級伸手呢，还是发动广大群众去創造？是消极等待呢，还是积极地爭取？

我們反对"唯条件論"，并不意味着根本否定条件的作用。恰恰相反，我們認为，条件是重要的，但条件要依靠人去創造；而如何发揮已有的条件的作用，又依靠人去运用。"物"是靜止的东西，而人的力量才是無穷的。"物"的作用的发揮，取决于人对"物"的認識程度和掌握程度。只有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同心协力地創造設备条件，設备条件才能更快更好地創造出来。例如，有一个煉鋼厂产量提高后，几座平爐同时出鋼，吊車不够用了。这时有人主張少裝料、慢出鋼，或是增加吊車，来解决这个矛盾；而职工群众和这相反，他們主張快煉鋼快出鋼，一个煉鋼爐快了，别的爐子使用吊車就松和了，他們同时把鋼水包放在架子上，推着走，也解决了吊車不够的困难。按照前一种主張，消极等待，不敢打破旧的平衡，結果只有使鋼产量退步走，这是"怕尿床就不敢睡覚"的人提出来的、向后看的、促退的办法；而后一种主張，寻找积极的因素，抓住它，冲破困难，創造新的平衡，这是具有革命气概的人提出来的、向前看的、促进的办法，是共产党人应有的风格。

是不是"物"的条件好才能創造奇迹，"物"的条件差就不能呢？未必。决定的关鍵在于人的能动性发揮的程度如何，在于人对"物"的条件掌握的程度如何。何以見得？有例为証。上海鋼鉄公司三厂

的平爐，論設备、論生产条件，比鞍鋼的平爐差远矣，但是全国平爐利用系数的紅旗插在上鋼三厂，而不在鞍鋼。九月份，上鋼三厂的利用系数是十四，而鞍鋼各煉鋼厂，最好的只有九点九八。再如本溪鋼鉄公司，第一煉鉄厂的設备和生产条件都比第二煉鉄厂差，但是全国高爐的紅旗插在一厂而不在二厂。九月份一厂的高爐利用系数为二点零七七，二厂是一点九八二。

这些同志的第二个錯誤是迷信技术規程，迷信前人，迷信老經驗。他們的思想被陈套、常規拴得死死的，不敢也不曾想去打破常規、創造奇迹。据說有一个煉鋼厂，夜班工人要求提前上班，作生产准备工作，好爭取多煉些鋼，但是看管更衣室的人摇摇头說，按时上下班是制度，改动不得。那些教条主义者和經驗主义者，就像这位摇头的更衣室看管人一样，把技术指标、操作規程，当作神聖不可侵犯的东西，絲毫变动不得。因此，他們对于广大群众新的創造发明，不是去热情地加以鼓励、支持和推广，而是以"不合規程"、"从古未有"为理由頂回去。鞍鋼八号高爐的职工采取多上料的积极措施，曾使生鉄日产量提高到二千吨，于是，有人出来說話了："出二千吨鉄是僥幸！""那是冒險作业！"等等。第二煉鋼厂的十六号平爐、十一号平爐的工人們，接連創造出快速煉鋼的新紀录时，也有人說这不过是偶然的現象。这些同志有个通病，就是他們不懂得，任何技术指标、操作規程、先进經驗，都是人民群众从生产实踐中創造出来的，它們并不是絕对不可变更的。今天的規程、經驗，是打破了昨天的成規后創造出来的，是否定了昨天的結論之后創造出来的；而一旦明天創造了新的規程、經驗，又会把今天的取而代之。生产实踐是永恒地向前发展着的，新的規程、新的經驗也就会不断地創造出来。对于我們工人阶級和共产党人来說，沒有什么奇迹是我們創造不出来的。那种認为前人的东西高不可攀、改动不得的思想，就是"賈桂思想"，这是和敢想、敢說、敢作的共产主义风格不相容的。

由于迷信"物"，迷信成規，迷信前人，迷信老經驗，他們只会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进行工作，不会用群众路綫的办法，即把企业的生产

任务、完成任务的重大意义以及采取什么措施和方法去完成任务等等，向职工群众清清楚楚地交底，发动群众大鳴大放，献策献計，大闊技术革命。事实証明，今年八月以来，全国鋼鉄战綫上出現的空前未有的大躍进局面，其实就是在党的領导下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哪里只要发动了群众，哪里生产上就一定能气象一新，困难为之一扫。上鋼三厂創造全国平爐利用系数最高紀录，大連鋼厂創造全国电爐利用系数最高紀录，本溪鋼鉄公司第一煉鉄厂創造全国高爐利用系数最高紀录，重庆鋼鉄公司耐火材料車間創造全国耐火材料燒成时間的最高紀录，九月二十九日全国鋼鉄高产紀录……，無一不是在党的領导下充分发动群众所取得的胜利。

放手发动群众，徹底走群众路綫，这是我們从事一切工作所必須遵循的領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做任何一件工作，假如只有少数領导人的积极性，而沒有发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結果只能是少数人的空忙。現在离年底只剩下七十天了。摆在十八个重点企业面前的任务还是很繁重的。完成和超額完成这个繁重的任务，最根本的保証就是要在党的統一領导下，立即大搞群众运动。

对于重点企业来說，大搞群众运动，首先要在干部和技术人員中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他們对"物"，对技术成規，对前人的迷信，使他們从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的束縛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必須徹底地走群众路綫，把生产任务交給数十万鋼鉄工人，更深、更透、更广泛地发动他們为完成今年的計划，群策群力，大闊技术革命；使每一个工厂、爐子、班組都有自己的計划，都有自己的躍进目标。还要在重点企业里認眞推行兩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規章制度）、三結合（在党的領导下，行政人員、技术人員和工人群众密切結合）的經驗。我們相信，十八个重点鋼鉄企业数十万鋼鉄工人的潜力是無穷無尽的，他們一定能在党的領导下，团結一致，創造出偉大的奇迹；今年的鋼鉄生产任务一定能够完成和超額完成。

駁工业战綫上群众路綫的怀疑派

"紅旗"雜志評論員

党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議以后兩个多月时間內，在我們的国家里发生了三个大規模的群众运动，即：在农业大躍进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大办鋼鉄为中心的全民工业化运动，以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結合为特征的文化革命运动。

全民大办鋼鉄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是工业化方法的革命运动，它能够把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提到从来沒有过的高度，已經是众所公認的事实。但是它的意义决不止此。我們还应当看到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深远影响。

几千万人办鋼鉄，更多的人办工业，发揚了人們敢想敢說敢干和要干就大干的作风，徹底破除了工业神秘化的迷信。許多从来沒有見过鋼鉄厂的人，現在自己动手建設高爐和轉爐；許多从来不知道矿物是什么的人，現在自己动手开采鉄矿和有色金屬矿。許多現代化企业中的职工群众，同样打破了陈旧的規章制度，在生产上技术上創造出千千万万的奇迹，过去認为無法做到或者要許多年才能做到的事情，現在苦战几晝夜就做到了。这种风格，是共产主义风格。有了这种风格的人民群众，使工业群众运动大放光彩；而大規模的群众运动，又使共产主义风格更加发揚光大。

全民办鋼鉄办工业的运动把我国五亿多农村人口进一步动員起来了。广大农民象在历次革命斗爭中一样，坚决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工业化运动中貢献了偉大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我們在农村中就建立了亦工亦农的基础。这就是在实际上为开始共产主义所要求

的消灭城乡之間的差别和工农之間的差别的工作准备条件。

全民办鋼鉄办工业的运动又把所有的学校、机关、团体、商店的人員以及城市街道居民都动員了起来。这些人中間的大多数是腦力劳动者，現在大量地經常地参加体力劳动，就使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結合，开始为消灭这兩种劳动形态之間的差别創造了条件。

工业战綫上大搞群众运动的必要性，已經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被人們理解了，但是也还有人怀疑，有人非議。究竟是党的方針正确还是他們的意見正确，这是每个人都必須弄清楚的問題。

一、"天下大亂"还是天下大治

正象历次革命运动中必然会发生的那样，对于全民办鋼鉄办工业的运动，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說好得很，有些人說糟得很。說糟得很的，又有各种各样的人。帝国主义分子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他們說糟得很，毫不足怪。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們革命队伍中，也有很少数人說糟得很。他們不甘于"观潮"，而站出来"擋潮"。这种人为数虽少，但是障碍却不小，因而值得注意。

"擋潮派"对于全民工业化运动的看法：一曰"搞乱了生产秩序"，二曰"破坏了比例和平衡"，三曰"造成紧張"，四曰"得不償失"。总而言之，他們認为全民工业化运动造成了"天下大乱"，不是了不得而是不得了。

一点也不錯，現在确实是象他們所說的"天下大乱"了。無論在城市和农村，也無論在机关和学校，到处是煉鉄煉鋼的熊熊烈火；在荒山和曠野，到处是开矿和运輸的人群；工厂和公社里到处有学生和干部，而教室里到处有工人和农民。农民們在一亩土地上收几万斤粮食，工人們一天几次打破定額，用小机器制造大机器，許多粗具文化的人創造出科学家难以創造的新技术，青年学生們自己編写教科書，党委書記和工人們一起睡在高爐旁边，几百万工人和农民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以及吃飯不要錢等等，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古今

中外所沒有看見过的。但是，难道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天下大乱"，我們的国家才更加兴旺，我們的人民才更加奋发，我們的事业才发展得更加快嗎？这种"天下大乱"，实則是天下大治。有了"乱"才有治。这种"乱"，是革命的人民万分欢迎的。只有那些对革命厭倦的人，才对"乱"害怕和不滿。

要不要維护生产秩序？当然要，而且我們正在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設而努力建立新的生产秩序。在党的八屆二次大会上，党根据毛澤东同志历来的主張，确定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針；以后，又确定了"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同时并举和互相結合的方針。在不久以前，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又重新强調地指出，办工业必須大搞群众运动，"土"法生产的小型企业要大搞群众运动，現代化大企业也要大搞群众运动，同时指出了工业化运动的中心必須是鋼鉄和机械。这样一系列的方針，就是我国实現工业化的基本路綫。我們必須按照这条路綫，建立新的生产秩序。这样，就决然要搞乱所謂"正規化"的旧的生产秩序，即那种冷冷清清少数人办工业的生产秩序，那种自上而下用行政命令办工业的生产秩序，那种只强調技术不注意政治、只强調物的作用不注意人的因素的生产秩序，那种只顧大"洋"不管小"土"、只顧中央不管地方、只顧工业不管农业的生产秩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秩序不破坏，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秩序就不能建立，这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嗎？

社会主义經济的发展必須有計划，必須按比例和組織平衡，問題在于怎么样按比例，怎么样組織平衡。在有些人看来，比例是固定不变的，平衡是絕对的，神聖不可侵犯，一时一刻也不能被"破坏"，否則就要发生脫节現象，造成天下大乱。他們按比例和組織平衡的方法，就是指标乘定額（即外国的或者本国过去的生产結果），算出一个数字，用同样的方法又算出第二个第三个……許許多多的数字，最后又归結到第一个数字，就此得出結論說，这些多了，那些少了，这样平衡了，那样不平衡。对于这样的观点和方法，毛澤东同志曾經不止一次

地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世界上沒有絕对平衡发展的东西"，"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規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級。"这不是很清楚嗎？国民經济在发展中并沒有什么絕对的經常的平衡狀态，也并沒有什么絕对的固定不变的比例。万万千千的事实証明了毛澤东同志的論断完全正确。人民群众就是按照毛澤东同志所指示的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原理，来突破計划、超过指标、打破比例、打破平衡的。对于这样的革命行动，我們为什么要表示惊慌而不表示欢迎呢？

我們社会主义建設最重要的問題是速度問題。比例和平衡的安排，应当是积极的，不应当是消极的；应当服从于提高速度的要求，而不应当妨碍这个要求。但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認識，他們主張，为了按比例和达到平衡，应当限制速度。这明显地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主張，是为比例而比例、为平衡而平衡的主張。按照这种主張去办事，只能促退而不能促进經济的发展。我国人民群众有魄力以世界上最高的速度发展生产，当生产的某些环节出現薄弱狀态的时候，也有力量去消除这些薄弱环节。在不久以前，当鋼鉄的"小土群"运动猛烈地发展起来以后，不是一度感到煤炭不足嗎？就在这个时候，許多地方就放出了煤炭的高产"衛星"，使煤炭的生产大体上适应于鋼鉄生产的需要。这个例子只是許多例子中間的一个，但是它已經可以完全駁倒上述某些人的錯誤观点。

在按比例和組織平衡問題上，还有一些人担心鋼鉄这个重点太突出了，要挤掉一些东西，或者别的方面跟不上，就会破坏国民經济各部門的比例，造成不平衡。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以鋼鉄为中心安排整个工业建設，这是一种以重点帶动一般的方法。在今年，我們把一千零七十万吨鋼作为工业生产的中心，固然挤掉了一些东西，但主要是帶动了各个方面；挤掉的只是次要的方面，帶动的却是主要的方面；而且某些东西被挤掉是暫时的，不用多久又会被帶动起来。应当看到，在次要的方面有所不为或少有所为，才能在主要的方面大有

所为。今年为了保証鋼产量翻一番，我們的机械制造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和交通运輸业都有了很大的躍进，許多产品的产量將增長一倍或者几倍；我們的化学工业、石油工业、有色金屬工业、水泥工业、木材工业也被帶动起来，有了很大的躍进；我們的輕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大大超过往年。如果沒有一千零七十万吨鋼的"压力"，上述許多部門是决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躍进的。

突出重点，当然就要有全面安排。重点突出和全面安排也是对立的統一。我們抓紧了鋼鉄和机械两个主要环节，当然不是說可以不管其他。在重工业各个部門之間，在重工业和輕工业之間，工业和农业之間，生产和流轉之間，都应当有全面的安排。即使鋼鉄生产本身，也存在着全面安排的問題。例如煉鉄煉鋼能力有很大躍进以后，必須使軋鋼和采矿很快跟上去。这里所說的全面安排，主要的一是劳动力，二是生产資料。

"一馬当先，万馬奔騰"，这是我們需要的形势。在今年，我們的經济战綫上已經出現了这种形势，我們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也已經出現了这种形势。

大規模的工业群众运动，鋼鉄帶头一馬当先，必然会使各个方面都紧張起来。所謂紧張，無非是說，形势逼使各个方面的工作尽快地赶上去，促使所有的人尽快地进步，因此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紧張使人們的精神狀态更加奋发，去想更多更好的办法。千方百計，都是逼出来的；不逼，一方一計也难有。紧張正是革命的常規。不甘于落后，要革命，就得紧張起来。我們对于这种使社会主义事业高速度发展的紧張，应当举起双手迎接它。

有些人看到土爐子小爐子煉鉄煉鋼多用了一些煤炭，多花了一些劳动力，就認为是"得不償失"。他們引用許多資料，算了很多次賬，来証明群众办工业浪費很大。他們就是不算大賬，因此看不見我們得到了什么。他們也不去想一想，一千零七十万吨鋼有什么意义，几千万人煉鉄煉鋼又有什么意义。只看局部，不見整体，看問題缺乏政治观念，难道不就是这些人的致命所在？在全民办鋼鉄运动中，有些地

方多用了一些煤炭，多花了一些劳动力，使那里的鋼鉄成本比較高，这是事实。目前有一部分"土"法生产的鋼鉄質量不好，也是事实。这些問題都需要解决，不努力去解决是不对的。但是从整个工业化运动說来，这些缺点是极次要的方面，是細小的支流，而且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毛澤东同志告訴我們，看問題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那些只算小賬不算大賬的人，恰恰又一次忘記了毛澤东同志的教导。

二、普及和提高

工业战綫上群众运动的发展，在我們面前出現了普及和提高的問題，以及怎样普及和怎样提高的問題。对于这样的問題，人們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有些同志認为，工业群众运动現在已經到了必須全力提高的阶段。

讓我們首先察看一下工业群众运动的狀况。目前，鋼鉄的"小土群"运动已經普遍发展起来，煤炭的"小土群"运动也已經比較普遍发展起来，其他工业的"小土群"运动或者剛才开始，或者还只限于局部的范圍。在現代化企业中，群众运动已經开始发动，但是开展得很不够，一般地說，中小企业开展得比較好，大企业开展得比較差；設备差的企业开展得比較好，設备好的企业反而开展得比較差。至于地区上的不平衡，不仅在現代化企业的群众运动中存在，在"小土群"运动中也存在。从这些情况看来，当前工业群众运动有普及問題，也有提高問題，但主要是普及問題。

任何一个群众运动，当它确实已經普及而需要提高的时候，如果不去提高，不去解决发生的問題，运动就不能繼續发展，这是我們应当努力避免的。但是，当运动还沒有很好地开展，或者只是在局部范圍內开展起来的时候，就强調提高，势必要使运动中断。因此，那种强調工业群众运动現在就要全力提高的主張，是錯誤的。有些同志所以强調提高，正是因为他們看不起普及的东西，也不願意去普及，

或者是不想在現代化企业中搞群众运动。甚至有少数人，他們怀疑工业战綫上大搞群众运动的正确性，企圖采取"收縮"工业群众运动的方針，来反对党的繼續大規模地发展工业群众运动的方針。这些人的錯誤，就更加明顯了。

目前工业战綫上的群众运动应当怎样普及和提高呢？

現代化大企业是我們工业化的骨干，而且有很大的潜在力量，目前又是工业群众运动中的薄弱方面。因此，应当首先抓紧这类企业，同时抓紧在生产上有重要作用的中小型現代化企业，把群众运动开展起来。有一些企业的領导干部，还沒有完全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陈旧的規章制度和定額标准的束縛中解放出来，对于外国的一套生产方法和技术規程还有迷信，还不敢革命。有些同志感覚到形势逼人，但是又滿足于已有的成績，只从常規去衡量自己的工作。可見，开展这类企业中的群众运动，还必須从解放領导干部的思想着手。

"小土群"运动，目前应当向各个方面普及。机械、石油、化学、水泥、木材、紡織和輕工业等各个工业部門，無一不可以发展"小土群"运动，也無一不应当发展"小土群"运动。有些人認为"小土群"只是在鋼鉄方面的临时措施，是毫無根据的；"收攤子"的想法，更是錯誤的。要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工业，必須把"小土群"推广到各个方面，作为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長远的方針。"土"法生产經过提高未必落后，"洋"法生产不經过改造未必先进，这一点現在已經看得比較清楚。"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相結合，这是我国技术革命的一个方向。經过这种結合，我們有可能創造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正如中医西医合作可以把我国的医学科学推进到世界最高峰一样。

鋼鉄工业的"小土群"运动需要提高，是毫無疑問的。現在就应当着手来提高技术水平，改善劳动組織，改进产品質量，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应当根据資源、运輸、劳动力等条件，調整現有的生产点，建立"土""洋"結合的，包括煉焦、采矿、煉鉄、煉鋼、軋鋼、生产耐火材料在內的小型鋼鉄基地。

普及中有提高，提高中又有普及，不断普及，不断提高，我們的工业群众运动也就越来越向更高級的阶段发展，我們的工业发展速度也就必然会越来越快。

整个工业群众运动存在着一个提高的問題，就是提高人民群众共产主义思想的問題。全民的工业化运动必須同全民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結合起来，做到既有生产的躍进，又有思想的躍进；既改变物質面貌，又改变精神面貌。在生产建設中，人人都应当做思想政治工作，事事都应当有思想政治工作，讓共产主义思想挂帅，繼續发揚敢想敢說敢干的高尚风格，打倒賈桂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这样，我們的工业化运动就有了灵魂，有了統帅，也就能够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三、兩种思想方法，兩条工作路綫

要不要大搞群众运动，是工业战綫上兩种方法的斗爭，实行所謂"正規化"，依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办工业，这是一种方法；开展大規模群众运动，依靠全党全民轟轟烈烈地办工业，这是另一种方法。采取前一种方法，結果必然是少慢差費，采取后一种方法，結果必然是多快好省。可見，兩种思想方法的斗爭，也就是兩条工作路綫的斗爭。

是否相信人民群众的創造力，是否敢于发动人民群众去破坏旧世界和建設新世界，历来就是馬克思主义和非馬克思主义、無产阶級思想和資产阶級思想的一条重要的分界綫。所以，上述兩种思想方法和兩条工作路綫的斗爭，不能不是馬克思主义和非馬克思主义、無产阶級思想和資产阶級思想的斗爭。

我們党的历史，就是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勁、創造精神相結合的历史。在三十多年的革命斗爭中；广大干部学会了群众路綫的方法，同群众有緊密的联系。在全国解放以后，我們在工业企业中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开展了多次的政治运动、增产节約运动和技术改

革运动，因而在生产建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进行大規模工业建設的过程中，由于我們缺乏經驗，有些同志对党的群众路綫发生了动摇，而对于另外一套做法产生了迷信。他們除了醉心于大型企业和"洋"办法以外，在工业管理方面，还片面地强調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实行一長制，只依靠少数技术專家办事，建立整套的規章制度，用物質利益刺激职工的积极性，并且把这些誉之为"正規化"，而把自下而上发动群众，依靠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广泛地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党委集中領导下的分工負責制，領导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等等，貶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有些同志甚至創造了一套"工业特殊論"，說什么群众运动只适用于政治革命，不适用于經济建設；只适用于农村工作，不适用于企业工作；或者只适用于小企业，不适用于大企业。他們認为，在工业中搞群众运动，就会"打乱計划"，"影响生产均衡发展"，"妨碍統一集中領导"，"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在这些同志看来，現代化大工业是神秘的高不可攀的东西，人民群众是無能为力的，無法插手的；在工业化时期，大搞群众运动已經过时。这种做法和这种論調，曾經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批判，并且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抵制，但是，在今年以前，还有一部分干部却不願意改变自己的錯誤观点和錯誤作法。其結果，就是在經济建設中削弱了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了党的一元化領导，限制了工业战綫上群众运动的大規模展开，妨碍了工业建設的迅速发展。現在，徹底丢掉一切錯誤的东西，已經是时候了。我們应当相信，有了一条正确的工业化路綫，又有充滿着共产主义活力的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在工业上攀登世界高峰，决不需要很長的时間。

（原載"紅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十二期）

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摘錄)

(一九四四年春天,在延安参加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时的习作)

陈 伯 达

一 兩种方法論

当群众的学生,集中群众斗爭的經驗及其意見,反轉过来,又当群众的先生——这是毛澤东同志从来所应用的革命方法論。这篇文章是毛澤东同志应用这个革命方法論的最出色的典型之一。应用这种革命方法論的前提,乃是把群众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把群众的欢喜当成自己的欢喜,充分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正确,信任群众的將来。掌握这种革命方法論的人,对于群众自我的革命發动和革命創造,决不惊慌失措,也不是"站在他們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評他們",而是拿出充分的勇敢和毅力去迎接他們,学习他們,幷"站在他們的前头領导他們",使他們获得結果,获得胜利。这就是布尔塞維克的革命方法論。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方法論。大家回忆一下一八七一年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态度吧!又回忆一下一九〇五年列宁对于俄国武裝的工人阶級的态度吧!这些無产阶級的革命大匠对于群众的"冲天"行动,不是責备他們"幼稚",不是責备他們"过分",而是給以滿腔热情的欢呼;不是隔岸观火,不是自吹博学,而是和斗爭中的群众在一起,分析和总結他們斗爭的經驗,作为他們繼續斗爭的胜利指南針。毛澤东同志的态度,和这些無产阶級的革命大匠的态度,完全一致。請看毛澤东同志对于当时湖南农民革命的歌頌。

"……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阶級企圖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該跟着瞎說。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覚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無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們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

"……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为惡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个劣，誰个不劣，誰个最甚，誰个稍次，誰个惩办要严，誰个处罰从輕，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計算，罰不当罪的极少。……"

毛澤东同志完全为群众方面辯护。但这决不是盲目地辯护。这种辯护完全合乎历史發展的实际，完全合乎历史發展的眞理。这种辯护是为打倒各种形式的反革命議論所絕对必要的。要革命，就必要長群众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沒有群众的狂风驟雨，决不能有大革命，也决不能完成革命。毛澤东同志就是挺身起来，歌唱群众的大风雨，并且是对于群众进行了呼风喚雨的工作的無产阶級革命家。你說群众的狂风驟雨太粗暴了嗎？对不起！你要懂得革命嗎？这就是眞正的革命！我們就是歌唱这样的革命！毛澤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对于革命，給了一个絕妙的科学界說：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画綉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讓。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級推翻一个阶級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級推翻封建地主阶級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須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你說群众会"过分"嗎，群众会"矯枉过正"嗎？不錯，毛澤东同志

回答說："……那些所謂'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質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須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决不能鎮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紳权。"毛澤东同志說："矯枉必須过正，不过正不能矯枉。"这是毛澤东同志在中国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中根据群众斗爭的經驗所指出的一个重要的客观革命規律。这是群众革命斗爭的客观辯証法。革命不是修正旧制度，而是要依靠群众的大力量，从事破坏旧制度，而一旦群众起来，就会向他們的累代世襲的压迫者發泄其郁积的怨憤，就是說，就会"冲决一切束縛他們的罗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改良派說，这是"矯枉过正"。但是革命群众所越过的"正"，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改良派所划定的界綫，这个界綫就是改良派保留旧制度的界綫。

当然，不是說，群众在斗爭中不会有任何的錯誤。但是，革命者不能因为群众在战斗时有时可能有些錯誤而就事先去束縛群众的手足，去阻止群众冲破改良派企圖保留旧制度的界綫，相反，必須讓群众去冲破这样的界綫。应該了解：群众也可能有些錯誤，但应該讓群众在斗爭中学习自己的本領，并学习糾正自己可能犯的錯誤。

在物理活动的現象中，我們碰到这样的規律，即事物的某些运动（这里是說运动的一种形式，不是說运动的一切形式），在达到它的目的或定下它的重心之前，时常要或多或少越过它的目的或它的重心。在群众革命活动的現象中，也有这样的規律。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說到普列汉諾夫替法国大革命辯护这件事。普列汉諾夫是这样写的："比法国大革命底恐怖更加厉害的恐怖，在历史上是沒有的，法国大革命底恐怖把眞正的金剛力士抬出历史舞台，它好像'天上的雷雨暴风一样'光临法国，它無情地破坏了'旧制度'底一切残余。……它的力量乃是人民革命运动的力量，主張恐怖的人們策略上的主要特点，就是無論如何总要設法維持和加强群众的革命自动精神。这种恐怖，并不是由于对群众运动底力量發生'失望心理'所引起的，

而是相反的，是絲毫不动摇的，相信这种力量的信念所引起的。"当普列汉諾夫还是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时候，他是这么写的。毛澤东同志，作为無产阶級的偉大革命家，非常特色地鼓励和信任群众的旋轉乾坤的創造力，而認为：無产阶級的革命政党依靠这种群众的創造力，集中革命群众的經驗，是能够指导群众在合乎历史規律的軌道上前进的。

在一九二四——二七年革命时代，和毛澤东同志所代表的这种布尔塞維克的革命方法論相反，还有一种方法論，这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孟塞維克的方法論。这类人也就是毛澤东同志时常所称为"本本主义"的人。他們口头也时常談过"革命"的詞句，特别当群众还沒有大發动的时候，他們甚至可以把自己描写成为了不起的"革命好汉"或"革命英雄"，但他們是在書房中制造"革命"的計划，繪画"革命"的圖案，而叱咤群众要去按照他們的計划或圖式走路。如果群众斗爭有点走样，即走出了他們的計划和圖案的时候，特别是当群众大發动，而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冲决一切束縛他們的罗网"的时候，那些"本本主义"的人就会始而惊呼："吓！吓！你們果真干起来嗎？慢点慢点！我还有錦囊妙計呢！讓我先和敌人談判談判！你們且息一息吧！"繼而生气："呸！你們胡鬧！你們完全沒有知識，为什么不听我的命令呢？"終而摇头嘆气和咒詛："世事大变了，真是無法無天，眼看要出乱子了，沒有办法！沒有办法！讓你們去得禍吧！"如果群众果真失敗了，那末，他們的理由就更多了，神气就更十足了："活該！我老早就算到了，不听我的話，活該有这样的結果！"

毛澤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上說："革命战爭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当然，不但革命战爭是这样，各种群众的革命活动也都时常是这样。但这种眞理对于"本本主义"的人，是格格不相入的；他們說："世界上那里会有这等事呢！世界上是書本出革命，那里会是革命出書本呢！"这类人一方面害怕反革命的恐怖，另方面害怕革命的恐怖，而且，害怕革命的恐怖，比起害怕反革命的恐怖，是要更厉害得多，所

以，他們不会贊助群众自我的革命行动，也决不肯向革命的群众学习，最后，也就要从革命的队伍中滾出去。

当农民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陈独秀所写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員会議决案(一九二六年九月)就要給农民运动划定界限。他在那里写道："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往往敌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已受很大的損失。"群众剛在起来，連陈独秀自己也承認，那时还未打倒了敌人，但是陈独秀却已不耐煩了，大喊"过左"了。群众运动剛在活躍的有利时机，反革命則在設法抵抗，但是陈独秀却倒轉說是"自己已受很大的損失"以作为限制农民运动的借口了。陈独秀又在那里写道："当地主与貧农有冲突时，应設法使旧农会(革命以前土豪劣紳所操縱的合法机关)居調停地位。"陈独秀对于农村問題的解决，不是要取决于农民群众的斗爭，而是要取决于旧"农会"的調停。調停——这是陈独秀的根本观念。他这个根本观念就是漠視群众、限制群众和否認群众的观念，就是孟塞維克的方法論。当一种革命的新事物从群众那里发現出来的时候，陈独秀不是給以正視，衷心地去欢迎它，而是不敢正視，对它表示煩躁。請把陈独秀这种态度和毛澤东同志的态度比一比吧！孟塞維主义与布尔塞維主义的分别，眞是太显然了。

群众的革命規模前进一步，孟塞維克就要后退一步。兩者背道而馳——这是一种規律。偉大的中国工人阶級在一九二四——二五年的革命中先后进行了世界上可歌可泣的斗爭；在英勇的共产党員領导下，武汉工人阶級的收回英租界，上海工人阶級的流血起义——这兩件繼广东工人阶級省港罢工之后而为革命重要組成部分的群众英雄事业，不是給陈独秀这类孟塞維克們欢喜，而是給他們煩惱；偉大的湖南农民革命，又是給他們煩惱再加上一个煩惱。馬日(五月二十一日)反革命事变之后，湖南农民在英勇的共产党員領导下向長沙进軍，这是一个偉大的进軍，根据当时力量的对比，这个进軍本来是可以获得胜利的，但是机会主义者却向胜利的进軍作了失敗的退軍的决定，打击了群众的英雄主义，瓦解了群众的革命队伍，扩大了反

革命的毒焰，助長了反革命的野心。这是对于革命的极可耻的沒有气节的决定。这是武汉政府时代一个重大的历史关节，也是当时革命失敗一个重大的历史关节。接着各种可耻的遏止农民群众革命发动的通告就出来了(参考"八七会議告全党党員書")，自动地解散汉口工人糾察队了，解散劳动童子团了。这一切都是和毛澤东同志所代表的当时全党許許多多的布尔塞維克精神相反。这一切都是陈独秀孟塞維克們畏惧群众革命发动的不可避免的可耻的結果。

布尔塞維主义积极拥护群众的自我革命发动和群众的革命創造。但布尔塞維主义和盲动主义有天淵之别。盲动主义的特点是脫离群众；脫离群众的孤立胡干(像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后期那些"左"傾机会主义者所干的)，不能帮助群众发揚革命英雄主义，而且适足損伤群众的革命銳气(因为必然失敗)。布尔塞維主义的特点則是联系(結合)群众，是和群众一起来干，在其决定行动之前，首先就要充分估計到群众的情緒、組織和力量的配备，估計到群众四周圍的各种条件，不落在群众的斗爭之后，而又一步一步地根据实际的斗爭提高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引导群众到胜利的道路。

布尔塞維主义又和尾巴主义完全相反。尾巴主义的特点就是盲目地附和于群众之后，或者从右方面去附和，或者从"左"方面去附和，不能根据群众斗爭的經驗加以概括，去帮助群众获得自己明确的方向，反而使得群众可能迷失方向，陷于失敗。这也是脫离群众的一种形式。布尔塞維主义則完全是另一样。布尔塞維主义之所以成为無产阶級和一切革命人民先鋒队的思想，就是因为它是生动地概括群众斗爭的經驗，集中群众的意見，不但吸取群众斗爭中一切优良的先进的东西，而且舍棄群众中那一切由于阶級压迫和迷信因襲而产生的某种不好的落后的东西，向他們提出明确的方向，考虑斗爭中进攻与防守的各种場合，規定随机应变的具体战略和策略，糾正他們可能犯的錯誤，这一切也就是毛澤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的所謂"站在他們的前头領导他們"。換句話說：布尔塞維克之所以为布尔塞維克，还不但是因为和群众在一起，而且更因为是群众的領导者。我們党

有許多这样的布尔塞維克，所以就能創造出轟轟烈烈的中国大革命。

盲动主义和尾巴主义在实际上都是孟塞維主义的种类。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布尔塞維主义，就是在和中国的孟塞維克及其一切变种的斗爭中逐步成長起来，成为不可战胜的旗帜。

（选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單行本第二至一一頁）

馬克思、恩格斯对馬尔薩斯人口論的批判

資本主义下的相對过剩人口

……劳动人口造成資本的积累时，就以不絕增大的范圍，造出各种手段来使自己变为相对多余的。这就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法則。事实上，每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它的特殊的历史上适用的人口法則。抽象的人口法則，只存在于历史上不曾受人类干涉的动植物界。

但是，一个剩余的劳动人口，固然是資本主义基础上的积累或財富發展的必然产物，这种人口过剩也会反过来，变为資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变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条件之一。过剩的人口，形成一个可以处分的产业后备軍(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它像是由資本出錢养成的一样，絕对隶屬于資本。不管人口的現实增加有何等限制，它总归可以为資本价值增殖上的变动需要，創造出随时可以剝削的人身物質(Menschenmaterial)。資本的突然伸展力，会随积累，随那种和它陪伴在一起的劳动生产力的發展而增大起来，不仅因为机能中的資本的伸縮性加大了，不仅因为資本仅在其中形成一个可伸縮部分的絕对財富增大了，也不仅因为信用每次受到特殊刺激，就馬上会把那种財富的異常大的部分，当作追加資本，交給生产去支配。生产过程自身的技术条件，机器，运輸手段等等，还允許把剩余生产物极迅速地轉化为追加的生产資料。随积累进步而充溢起来，得轉化为追加資本的大量社会財富，瘋狂地流进那些突然把市場扩大了的旧生产部門，或流进鉄道(其需要，是由旧市場的發展而产生)一类新形成的生产部門。在所有这些場合，都必須突然有巨数的人，

在不損害其他生产部門的規模的限度內，在决定点上供給出来。这是由过剩人口供給的。近代产业的特征的生活过程，相当活躍，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滯的十年循环（其間有各种小的变动把它中断）形态，就是以产业后备軍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多少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一种現象作为基础。但产业循环的各种轉变，也生出新的过剩人口，并成为它的最有力的再生产因素。

近代产业这种特殊的生活过程，在人类任何以前的时期，都是我們看不見的。就在近代資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期，也还是不可能的。那时，資本構成只极其緩慢地变化，所以，大体說来，劳动需要的增大，是与資本的积累相符合。与近代相比較，那时資本积累的进步是迟緩的。它碰着了可以剝削的劳动人口的自然限制。这种限制，只是憑借于我們后面將要述及的强力手段，才被排除掉。生产規模之突然的突击性的展开，是它的突然收縮的前提；后者又喚起前者，但前者沒有可供利用的人身物質，沒有与人口絕对增加相独立的劳动者数的增加，是决無可能的。这种增加，是由劳动者一部分不絕被"游离"出来的簡單过程造成的，是由那些使被雇劳动者数比于增大的生产而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近代产业的全部运动形态，是由一部分劳动人口不断轉化为失业者或半就业者这件事生出来。信用的伸縮，不过是产业循环周期变化的征候。政治經济学会把它看为是它的原因，那就显示了它是如何淺薄。像天体一經投入一定运动中，会不断反复同一的运动一样，社会的生产一經投入那种交替着伸展和收縮的运动，就也是这样。結果会反过来变为原因。会不断把它自身的条件再生产出来的这全部过程的轉变，是采取周期性的形态。这件事一旦固定下来，政治經济学把就相对过剩的即超过資本平均价值增殖需要的人口的生产，当作近代产业的生存条件来理解了。

先任牛津大学經济学教授，后充英国殖民部官吏的亨利·麦利維尔(H. Merivale)說："假設在一个危机当中，国家掙扎着要把几十万过剩軍队移往国外，那將会引起怎样的結果呢？結果就是，劳动需要第一次恢复时，劳动就將感到不足。人类的繁殖無論怎样迅速，要把

成年劳动者补充起来，也非有一代的期間不可。我們制造业者的利潤，大体依賴这样一种力量，那就是利用暢銷时期来补償停滯时期的損失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由对于机器与筋肉劳动的支配权来保証。他必須在手边准备好可以利用的劳动者；他必須能够依照市况，在必要时，伸張或收縮他的营业活动。不然的話，要想在竞爭哄逐中，維持那种当作我国财富基础的优胜地位，就会是不可能的。"連馬尔薩斯（他依照他的可鄙的看法，把它理解作劳动者人口的絕对过剩，不是把它理解作劳动者人口的相对过剩）也認人口过剩，是近代产业的一个必然。他說："結婚的愼重习慣，如果在一个主要依賴于工商业的国家相当通行于劳动者阶級間，那將于国家有害。……从人口的性質說，要在有特殊需要时，对市場供給追加的劳动者，勢非經过十六年乃至十八年不行。但由节約，以所得化为資本的过程，可以进行得远較为速。劳动基金比人口增加得更速，是一个国家經常有得發生的事情。"政治經济学在这样把相对过剩劳动人口的不断生产，宣布为資本主义积累的一个必然以后，又合乎其分地，以老处女的姿态，擺出資本家的臭架子，把以下的字眼，放在口里，告訴那些只因为自己創造了追加資本方才致于被驅逐的"过剩者"（Ueberzählligen）說："我等制造业者，为諸君曲尽所能，来增大諸君必須靠来生活的資本；其余的事情就要由諸君自己去做，因为諸君必須使諸君的人数，适合于生活資料。"

資本主义的生产，决不滿足于人口自然增殖所供給的可以利用的劳动力之量。它为了要有它的自由活动，需要一个和这种自然限制相独立的产业后备軍。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一八六七年出版），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七九五至七九九頁

人口過剩的神話

資本同資本、劳动同劳动、土地同土地之間的斗爭，使生产陷于热病狀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顚倒过来。要是資本不拚命

展开自己的活动，它就抵擋不住其他資本的竞爭。要是土地的生产率不經常提高，耕种土地就会無利可获。要是工人不竭力工作，他就对付不了自己的竞爭者。总之，卷入竞爭斗爭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棄一切眞正人的目的，就經不住这种斗爭。一方面这样过度紧張，結果他方面必然会削弱。在竞爭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給、消費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發展过程中就必然会出現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生产力大大过剩，結果，广大人民群众反而無以为生，人們恰恰因过剩而餓死。長时期来英国就处于这种瘋狂的狀态中，处于这种荒謬絕倫的情况下。如果生产搖摆得更加厉害(这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結果)，那末就会出現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滯的反复交替。經济学家从来就不能够理解这种怪誕現象；他为了解釋这种現象，就編造了一套人口論，这种理論和貧富并存的矛盾同样荒謬，甚至比它更荒謬。經济学家不敢正視眞理，不敢承認这种矛盾是竞爭的自然結果，因为不这样他的学說就会全部垮台。

在我們看来，这个問題很容易闡明。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無穷無尽的。应用資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無限地提高。按照最稳健的經济学家和統計学家的計算(参看艾利生"人口原理"第一卷第一、二章)，"人口过剩"的大不列顛在十年內，就能够使粮食生产达到足以供应六倍于目前人口所需的程度。資本在日益增加，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長而增長，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無穷無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覚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負的劳动就会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要是讓竞爭自由發展下去，生产能力虽然也会起同样的作用，然而是在对立的情况下起作用。一部分土地在实行精耕細作，而另一部分——大不列顛和愛尔蘭的三千万英亩好地——却荒蕪着。一部分資本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周轉，而另一部分却死死地躺在箱子里。一部分工人每天得工作十四小时至十六小时，而另一部分却無事可干，無工可做，活活餓死。这种对立情况也可能不同时出現：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到处是一片忙碌景象，資本以惊人的速度周轉着，农业欣欣向荣，工人干得

筋疲力尽；而明天停滯到来了，农业得不偿失，大片土地荒蕪了，資本在运动得最紧張的时候突然停頓下来，工人無事可做，整个国家都因財富过多、人口过剩而备嘗痛苦。

經济学家不能承認情况这样發展是合理的，否則他就得像上面所說的那样放棄自己的全部竞爭学說，就得承認自己把生产和消費对立起来、把人口过剩和財富过剩对立起来是完全荒謬的。但是事实本身是無法否認的，所以为了使这种事实符合理論起見，就发明了人口論。

这种学說的創始人馬尔薩斯断言，人口总是威胁着生活資料，随着生产的增加，人口也同样地增加，人口生来就有一种超过它所支配的生活資料的傾向，这种傾向就是一切貧穷和罪惡的原因。因此在人太多的地方，就应当用某种方法把他們消灭掉；或者用暴力將他們杀死，或者讓他們餓死。这样做了以后，就会出現一个空隙；这个空隙等余下的人口一增長馬上又会被塡滿，于是以前的貧穷狀况又重新到来。据說在任何条件下——不仅在文明的狀态下，而且在自然的狀态下——都是如此；新荷蘭（澳大利亞的旧称——編者注）平均每平方英里只有一个野蛮人，但是那里也和英国一样，深感人口过剩的痛苦。簡言之，要是我們願意徹底一些，那我們就得承認：**当地球上还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經人口过剩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結論：正因为穷人过多，所以，除了尽量減輕他們在餓死过程中的痛苦并使他們相信这里的一切都是無法改变的，他們整个阶級的唯一出路就是尽量減少生育，此外就不应該为他們做任何事情；要是这样做沒有什么結果，那末至少应当像"馬尔庫斯"所建議的那样（按照他的建議，每一个工人家庭只能有兩个半小孩，超过这个限額的孩子就应当用無痛苦的办法杀死）建立一个国家机关，以便用無痛苦的办法把穷人的孩子杀死。賑济穷人被認为是罪过，因为这样会加强过剩人口的增長；但是，把貧穷宣布为犯罪，把济貧所变为惩治所（如英国"自由派的"新济貧法所做的那样）却算是极其有益的事情。的确，这种理論很不符合聖經上关于上帝及其創造完美無缺的教义，但是"把聖經

拿来和事实相对抗的反駁，那才是最拙劣的反駁！”

我是否还需要更詳尽地闡述这种卑鄙下流的学說，这种对自然和人类的惡毒的誣蔑，并追究其进一步的結論呢？在这里我們終于看到了，經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經登峰造极。一切战爭和壟断制度所造成的灾难，同这种理論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要知道，正是这种理論構成了自由派的貿易自由学說的柱石，这个柱石一倒，整个大厦就会垮台，因为竞爭在这里既然已經証明是貧困、穷苦、罪惡的原因，那末誰还胆敢为竞爭辯护呢？

艾利生在上述著作中动搖了馬尔薩斯的理論，因为他訴諸土地的生产力，并用以下的事实来反对馬尔薩斯的原理：每一个成年人能够生产出比他本人消費所需的更多的产品。如果不存在这一事实，人类就不可能繁殖，甚至不可能生存；否則成長中的一代依靠什么来生活呢？可是艾利生沒有深入事物的本質，因而他最后也得出了同馬尔薩斯一样的結論。固然他証明了馬尔薩斯的原理是不正确的，但是他未能駁倒馬尔薩斯据以得出他的原理的事实。

要是馬尔薩斯不这样片面地看問題，他就会看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終同財富过剩、資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从馬尔薩斯开始写人口論时起，一切人口过剩的国家的情况，尤其是英国的情况，都极其明显地証实了这一点。事实就是如此，馬尔薩斯正应当把这些事实，全部加以研究，而研究这些事实就能得出正确的結論；但是他沒有这样做，他只抓住了一个事实，而不理睬其他事实，因而他得出了荒謬的結論。他犯的第二个錯誤是把生活資料和就业手段混为一談：人口总是威胁着就业手段，有多少人能够就业，就有多少人生出来，簡言之，劳动力的产生迄今仍然由竞爭的規律来調节，因而也同样要受周期性的危机和波动的影响，这是事实，确定这一事实是馬尔薩斯的功績。然而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資料。就业手段的扩大仅仅是机器力量增加和資本扩大的最終結果；而生活資料却只要生产力稍許提高，就会立刻增加。这里又暴露出政治經济学的一个矛盾。經济学家所理解的需

求不是眞正的需求，他所理解的消費只是人为的消費。在經济学家看来，只有能够为自己取得的东西提供等价物的人，才是眞正的需求者，眞正的消費者。但是，如果事实是每一个成年人生产出来的东西比他自己所能消費的要多，事实是小孩像树木一样能够綽綽有余地偿还花在他身上的費用(难道这不是事实？)，那就应該承認，每一个工人必然能够生产出远比他自己的需要还要多的东西，因此，社会一定会乐意供給他所必需的一切；同时也应該承認，大家庭应当是极受社会欢迎的礼物。但是由于經济学家粗魯地看問題，所以除了用可以捉摸的現金来支付的东西以外，他就不知道还有任何别的等价物。他已深深地陷入对立之中，連最触目的事实也像最科学的原理一样不能使他有所感触。

我們只是在用取消矛盾的方法来消灭矛盾。只要目前处于对立狀态的各方面的利益能够融合起来，人口过剩和財富过剩的对立就会消失，一国人民正是由于富裕和过剩而餓死的这种不可思議的事实，这种比宗教中的一切奇迹的总和更不可思議的事实就不会存在，那种認为土地不能养活人們的荒謬見解也就会不攻自破。这种見解是基督教政治經济学的英明卓絕的表現，而我們的政治經济学本質上是基督教政治經济学这一看法，我可以在每一个原理和每一个范疇中加以証明，这个工作到时候我会做的；馬尔薩斯的理論只不过是認为精神和自然之間存在着矛盾并因此使二者墮落的宗教教条在經济学上的表現而已。我想，这个早在宗教領域內同宗教一起被揭露了的矛盾之毫無根据，我也在經济領域中指出了；同时，除非馬尔薩斯理論的辯护士用这种理論的原則向我闡明，人民怎么能够恰恰因过剩而餓死，除非經济学家使这种解釋符合理性与事实，那我就不会認为这种辯护士是够格的。

可是，馬尔薩斯的理論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們前进的、絕对必要的轉折点。由于他的理論，总的說来是由于政治經济学，我們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只要我們战胜了这种絕望的經济制度，我們就能保証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我們从馬尔薩斯

的理論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經济論据，因为即使馬尔薩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須立刻进行这种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馬尔薩斯本人也認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由于这个理論，我們才开始明白人类极度墮落的情况，才了解这种墮落是和竞爭的各种条件相关联的；这种理論向我們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終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取决于需求；它指出竞爭制度因此屠杀了，并且每日屠杀着千百万人；这一切我們都看到了，这一切都促使我們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爭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結束这种人类墮落的現象。

为了証明对人口过剩的普遍存在的恐惧是毫無根据的，讓我們再回到生产力和人口的关系这个問題上来。馬尔薩斯的整个学說是建筑在下面这种計算上的：人口是按几何級数1＋2＋4＋8＋16＋32……增加，而土地的生产力則是按算术級数1＋2＋3＋4＋5＋6增加。差額是触目惊心的，但是这是否对呢？在什么地方証明了土地的生产能力是按算术級数增加的呢？我們可以假定耕地面积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个面积上使用的劳动力却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即使假定收获量并不是永远和花費的劳动量同比例增加；但是我們还有第三个要素，一个对經济学家来說当然是毫無意义的要素——科学，它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長一样，是永無止境的，至少也是和人口的增長一样快。仅仅一門化学，甚至仅仅亨弗利·戴維爵士和尤斯圖斯　李比希二人，就使本世紀的农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就？但是，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和人口增長的速度一样的；人口的增長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則同前一代人遺留下的知識量成比例，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級数发展的。而对科学来說，又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当"密士失必河流域尚有足够的荒地可供欧洲的全部人口移居"的时候，当地球上的土地才耕种了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采用現在已經是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产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时候，談論什么人口

过剩，这豈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恩格斯："政治經济學批判大綱"（一八四三年底至一八四四年一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六一五至六二二頁

人口對就业手段的壓力

正当我不得已耽擱了給你复信的时候，我有机会收到你关于劳动問題的書；我以很大兴趣把它讀过了。当我第一次讀到达尔文的著作的时候，对于他有关植物和动物生活的說明与馬尔薩斯的理論之間的明显的类似，我同样感到惊奇。不过，我得出的結論和你的不同：这就是，对于現代資产阶級的发展来說，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这一事实，它还沒有越过动物世界的經济形态。在我們看来，所謂"經济規律"并不是自然界的永恒規律，而是产生着和消失着的历史規律；現代政治經济学的規則，就它为經济学家用客观正确性編制出来来說，在我們看来不过是現代資产阶級社会唯一能依以存在的諸規律与諸条件的总結——总之是現代資产阶級社会生产与交換諸条件的抽象和概括的表現。所以，在我們看来，在所有这些規律中，就表現純粹資产阶級的諸条件来說，沒有一个規律是比現代資产阶級社会更为古老的；至于那些在全部历史过程中至今多少发生过效力的規律，只不过是以阶級統治和阶級剝削为基礎的一切社会所共通的那些关系的表現。里嘉圖的所謂規律屬于前者，它在封建农奴制或古代奴隶制下都不起作用，所謂馬尔薩斯的理論中可以拥护的东西，則屬于后者。

像他其他所有的思想一样，牧师馬尔薩斯直接从他的前驅者剽窃了这个理論；唯一屬于他的是那兩个級数的純屬武断的运用。在英国，經济学家們早就把这个理論本身导入合理的范圍；人口压力不是加在生活資料上、而是加在就业手段上；人类是能够比現代資产阶級社会所能办到的增加得更快的。在我們看来，这是宣称这个資产阶級社会是发展的必須去掉的阻碍的又一个理由。

你自問，人口增加如何与生活資料的增加达到和諧；可是除了在

序言中的一句話以外，我发現你并沒有解决这个問題的打算。我們所由出发的前提是：創造了現代資产阶級社会——蒸汽机、現代机械、大規模殖民、鉄路、汽船、世界貿易——以及現在由于永久的貿易危机已經使它走向崩潰和最后毀灭的同样力量，这些同样的生产与交換的手段，也能在短期內把关系倒轉过来，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生产出足够供給兩个、三个、四个、五个或六个人消費之用的程度。于是今天的城市工业就能够节省出足够的人員，提供給农业与到現在为止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終于也將大規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徹底地应用于农业；而东南欧和西部美洲的天然肥沃的、用之不竭的地区，就將以空前的規模进行开垦。如果所有这些地区都已垦殖，在此以后发生匱乏，那时候才算是响起了警鐘(caveant consules)。

生产得太少，这就是全部事情的原因所在。但是，为什么生产得太少呢？并不是因为生产的极限——即使就今天的意思而言——已經登峰造极了。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决定生产极限的不是飢餓的肚皮的数目，而是能够購买和支付的錢袋的数目。資产阶級社会不希望，也不能希望去生产得更多。沒有錢的肚皮，是不能为利潤而使用的，因此是不能購买的劳动，便被听任死亡。假定有一个如經常出現的突然的工业繁荣，使这个劳动能帶来利潤而被雇佣，那末他就有錢来花，而生活資料就不再缺乏了。这就是整个經济制度所陷入的無法自解的循环。人們預先假定資产阶級关系是一个整体，然后証明，它的个别部分都是它的必要部分，因此是一个"永恒的規律"。

恩格斯："致朗格的信"(一八六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人口和共产主义

即使講壇社会主义者們坚持要求我們無产阶級社会主义者，应該替他們解决如何避免过剩人口的可能发生，以及人口过剩將帶来的新社会秩序崩潰的危險等問題，这远远不能成为我应該滿足他們要求的充分理由。我認为，替这些人物清除所有由于他們自己混乱地自作聪明而引起的顧虑和怀疑，或者，比方說，去反駁賽弗萊(Schä-

ffle)--个人在他的許多大卷著作中拼凑起来的一切可怕的廢物，那將是白白浪費时間。仅仅为了校正这些紳士們在引号中所作的对"資本論"的錯誤引証，就得写成一大本書。在他們要求答复他們的問題以前，首先讓他們学会讀書和抄录吧。

再者，在这个时候，当只在目前才成为現实的美国的大量生产和眞正的大規模农业，其所生产的生活資料的份量正确实威胁着要压得我們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当处在一个必定在其他許多結果中，具有这样的結果，即地球將必住滿人——你在第一六九至一七〇頁所談的很膚淺地接触到这点，——以及欧洲也必定需要人口的大量增加这个結果的革命的前夜，我并不認为这是十分火急的問題。哀勒(Euler, L.)的計算，实际上是和关于一个克萊澤尔(Kreutzer)在公元第一年，按每十三年增殖一倍的复利借出，因此到現在已相当于$\frac{1\times 2^{144}}{60}$盾(gulden)，即比地球还大的銀堆的数額这种說法，难分高下的。当你在第一六九頁上說到美洲和欧洲的社会条件之間并沒有很大差别的时候，的确，它只是在关于大的沿海城市、或者隐蔽这些条件的表面的立法形式方面是正确的。美洲的大量人口一定生活在非常有利于人口增加的条件之下。这是由移民的流入得到証实的。然而，要使人口增加一倍，还是需要三十多年的时間。那是不足惊異的！

当然，人口將极为众多，因此將有限制他們增加的极限，这种抽象的可能性是有的。可是，如果在某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发現它本身有义务去調节人的生产，正像它已經調节物的生产那样，那一定是这个社会，而且唯有这个社会才能够毫無困难地进行这項工作。我并不認为，这样一个社会有計划地获得那已在法国和下奧地利(Lower Austria)自发地、無計划地产生的結果，終將会有困难。無論如何，这个工作是否应該做，什么时候做，怎样做，以及他們为了这目的而想采用的什么办法，这些事情都要由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民自己来决定。关于这一点，我并不覚得要向他們提出建議和給予忠告。無論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的見識定不会比我們少的。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的信"(一八八一年二月一日)

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普列漢諾夫

(一)

已故的卡布里茨㊀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写了“理性与情感是进步的因素”一文。在該文中，作者援引斯宾塞底言論，認为在人类前进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情感，而理性只起着次要的并且完全是附屬的作用。有位“可敬的社会学家”㊁反駁卡布里茨时，对这种輕視理性的理論表示含有譏嘲意味的惊異。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为理性作辯护，当然是作得正确的。但他如果不涉及卡布里茨所提出的那个問題底实質，而單只指明根本不可以和不容許这样提出問題，那他就会作得更为正确了。須知，“因素”論本来就是沒有根据的，因为它竟把社会生活中某几方面随便提了出来，將其看作独立的实体，將其看作是从各个不同方面和具着程度不同的功效引导社会人类走向进步的力量。尤其因为卡布里茨把它叙述成这样，以至不是把社会人类活动底某些部分，而是把个人意識底某些部分說成为社会学上的特别主体，于是这个理論就显得更加荒謬了。这眞是絕頂的抽象；無法再往前进一步，因为再进一步，就会走进显然妄誕無理，滑稽可笑的境

---

* 普列汉諾夫所著“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書，是于一八九八年初次用俄文刊印。本版系按苏联国立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四年版本譯出。——出版局底声明

㊀ 卡布里茨（一八四八至一八九三），系俄国民粹派作家。

㊁ 所謂“可敬的社会学家”，是指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尼·米海洛夫斯基而言。米海洛夫斯基讀到卡布里茨那篇文章后，馬上就在自己的“一八七八年文艺隨笔”中对它作过評判。

界。这才是"可敬的社会学家"应該叫卡布里茨及其讀者們注意的地方。"可敬的社会学家"看出卡布里茨因极力探寻历史上"統治"因素"而走进了怎样一种抽象的迷宮时，也許会对因素論本身偶然作出一点批評的。这样来作，当时对于我們大家都会是很有益处的。但他却沒有胜任。原来他自己也是站在这一理論底观点上，其与卡布里茨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具有折衷主义的傾向，所以他竟覺得一切"因素"都是同样重要的。后来，在他攻击辯証唯物主义的言論中，他那副头腦底折衷主义本性更是表現得特别明显。竟以为辯証唯物主义是为了經济"因素"而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并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化为烏有的一种学說。"可敬的社会学家"連想都沒有想到辯証唯物主义絕对排斥"因素"說，所以只有完全不能按邏輯思維的人才会認为辯証唯物主义是替所謂無为主义作辯护的学說。不过，应該指出，"可敬的社会学家"所犯的这个錯誤絲毫也不新奇：过去有，現在有，并且大概將来很久一个时期也还会有許多人犯这种錯誤……

当唯物主义者还沒有拟定出辯証法的自然和历史观的时候，早已就有人責备他們傾向于"無为主义"了。我們且不去追溯"往古"，只要指出英国一位著名学者普里斯特萊同普萊斯进行的爭論。普萊斯批判普里斯特萊学說时，硬說唯物主义与自由观念不能相容，硬說唯物主义根本否認个人底积极作用。当时普列斯特萊曾援引日常經驗来反駁过他。"我不来講我自己，虽然誰也不能說我是个最不活动的动物(am not the most torpid and lifeless of all animals)；但我要問問你：究竟还有什么人比必然論者更富于努力追求最主要目标的思考力，积极性，力量和坚忍不拔精神呢"？普里斯特萊說这話时，是指宗教民主派，即指当时所謂 christian necessarians㊀ 而言。我們不知道这个教派是否眞像該派份子普里斯特萊所想像的那样积极。但这点并不重要。毫無疑义，唯物主义的人类意志观是完全能与最坚

㊀ 十八世紀的法国人看見唯物主义与宗教信条这样配合起来，一定会深为惊訝。但在英国却沒有一个人覺得这种現象奇怪。普里斯特萊本人就是一个非常信奉宗教的人。眞是各地有各地的風俗。

教积极的实际行为相容的。郎松㊀說道，"所有一切向人类意志提出最大要求的学說，都在原則上認定意志沒有力量，都否認自由而硬要世界服从宿命論"㊁。郎松以为凡屬否認所謂意志自由的观点都会走到宿命論，他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然而他終究指出了一件极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其实历史告訴我們，甚至宿命論也不仅不总是妨碍坚毅实际行动，而且相反，在某些时代，宿命論还是这种行动底心理上的一种必要基础。例如在十七世紀的英国，清教徒比其他一切党派都表現过更大的毅力，又如謨罕默德信徒在很短一个时期內就征服了从印度起至西班牙止的广大地域。誰若認为我們只要一确信某些事变必然到来，則我們在心理上就不复能促进或阻撓这些事变的到来，那他就未免想錯了㊂。

这里一切都要依我自己的活动是否为必然事变鎖鏈中必要的一环为轉移。如果"是"的話，那我的犹豫就会更少，我的动作也就会更加坚决。这是毫不足怪的：当我們說某人認为自己的活动是必然事变鎖鏈中必要的一环的时候，那就是說，缺乏意志自由在他看来是等于完全不能無所动作，这种缺乏意志自由在他的意識中所引起的反映是認为不能不如他所作的那样去作。这便是可以用路德底名言"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 ㊃来表示的一种心理，人們

㊀ 郎松（一八五七至一九三四），系法国文学研究家兼文艺史学家。

㊁ 参看"法国文学史"俄譯本，第一卷，第五一一頁。

㊂ 大家知道，依据加尔文学說，人底一切行为都是由上帝預定了的。Praedestinationem vocamus aeternum Dei decretum, quo apud se constitutum habuit, quod de uno quoque homine fieri valet.（"我們所謂預定，是指上帝底意旨而言，上帝憑其意旨所規定的一切都是必然要对各个人發生效力的"。——譯者）。(Institutio, lib. III, cap 5).)。同时，依据这个学說，上帝从他的信众中挑选出几个人去解救那些受無理压迫的人民。救出犹太人的那个莫依斯就是这样的人物。克倫威尔大概也自認为是上帝底这种工具；他始終，并且想必是很誠摯地称自己的行动为上帝意旨底产物。他自己認为所有这一切行动都是預先决定了的必然的結果。但这不仅沒有妨碍他趋向于一胜再胜，并且还使他这种趋向具有了不可遏止的力量。

㊃ "我既站在这个地位上，也就不免要这样作"。——譯者

具有这种心理，就会表現出簡直不可遏止的毅力，作出絕頂惊人的功业。哈姆列特根本沒有这种心理，所以他始終只能呻吟叫苦，只能反省直覚。因此，哈姆列特也就始終忍耐不了那認为自由是已被意識到了的必然性的哲学。費希特說得对："有怎样一个人，也就会有怎样一种哲学"。

（二）

我国有些人听信了史达木萊尔㊀底意見，以为西欧有一种社会政治学說似乎含有不可解决的矛盾。我們所指的就是关于月蝕的那个有名的例子。其实这个例子是再無聊沒有了。在月蝕所必需的种种条件中，人底活动無論如何也不包括在內，并且也不能包括在內。單就这点来看，已可知道只有在瘋人院里才能产生出一个促成月蝕的政党。退一步說，就假定人类的活动能包括在上述条件中去，但凡屬很想看見月蝕而又确信这种現象不用他們帮助也必然会发生的人終究是不会加入月蝕党的。在这种場合，他們的"無为主义"就会只是拒絕去作無謂的事情，即是拒絕去干無益的动作，而与眞正的無为主义毫不相干。为了使这个月蝕例子不是一种毫無意思的事情，那末月蝕党就得把这个例子完全改变过来。那时就要設想月亮是个有意識的东西，認为月亮覚得它受蝕时在天空中所占的位置是其意志自决的結果，这个位置不仅使它感到极大的快乐，并且是为使它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所絕对必需的，因此它总是力求站在这个位置上㊁。这样設想以后，就会要自問一下：当月亮終究发覚原来并不是它的意

㊀ 史达木萊尔（一八五六年生），系德国新康德派哲学家，否認历史規律性。

㊁ «C'est comme si l'aiguille aimantée prenait plaisir de se tourner vers le nord car elle croirait tourner indépendamment de quelque autre cause, ne s'apercevant pas des mouvements insensibles de la matière magnétique», Leibniz, Théodicée, Lausanne, MDCCLX, p. 598. ("这恰好似磁針沒有發覚磁性底作用，以为它是自行轉动，根本不受任何原因所决定，因以其向北方轉动而感到快乐一样"。見萊布尼茨所著"辯神論"一書。——譯者）。

志，也不是它的"理想"决定它在天空中的运动，反而是它的运动决定它的意志及其"理想"的时候，那它又会作何感想呢。照史达木莱尔底意見說来，当月亮一发覚这点时，那它除非用某种邏輯上的矛盾想法来解脫这种窘境，就会不能运动了。但这种假定是毫無根据的。这样一种发覚，也許会成为使月亮心情懊丧，使其精神失調，使其"理想"与机械現实发生矛盾的一种正式根据。但我們既已假定"月亮底精神狀态"归根到底完全是由它的运动来决定，于是我們也就要在它的运动中去探求那些使它精神失調的原因。如果我們留心来观察事情，那我們也許能看出，当月亮处在远点时，它是以其意志不自由为憾的，而当它处在近点时，它却又会覚得这是使它精神爽健的新的正式根据了。也許結果恰巧相反：也許它不是在近点，而是在远点能找到使自由与必然互相融洽的机会。但是無論如何，这样互相融洽总是完全可能的；必然的認識是完全能同最坚毅的实际行动相融洽的。至少迄今历史上的情形常是如此。否認意志自由的人，往往要比其一切同代人都有更坚强的意志，并且对于自己意志的要求也最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例子是人所共知的。只有故意不願意看見眞正历史現实的人，才会如史达木莱尔那样忘記这种例子。例如，我国主观主义者和德国某些庸人就是极不願意看見眞正历史現实的。但庸人和主观主义者并不是人，而是如别林斯基㊀所說一样不过是些幻影罢了。

現在我們来仔細看看一个人覚得自己的——过去的，現时的或將来的——动作完全是必然性結果的那种場合吧。我們已經說过，在这种場合，一个人既如拿破侖那样自認是替天行道的使者，或如謨罕默德那样自認是不可逃避的天运所选定的人物，或如十九世紀的某些社会活动家那样自認是代表着不可遏止的历史运动力量的人物，那他就会表現出几乎是自发式的强大意志力量，把大大小小的哈姆列特所筑成的那些当前障碍尽行扫除㊁，好像疾风扫敗叶一般。但是，

㊀ 别林斯基（一八一一至一八四八），系俄国傑出的批評家政論家。

我們感覺兴趣的是这种情形底另一方面，即是如下这一方面。当我認为我的意志不自由只是表明我主观上和客观上完全不能不如我作的那样去作时，当我了解我的这种动作也就是各种可能动作中最合我的心願的动作时，那我就会認为必然性是与自由同一，自由是与必然性同一的，于是我不自由的地方就会只在我不能違反自由与必然性的同一，只在我不能使二者彼此对立，不能覚到我自己受必然性所拘束。然而这样缺乏自由，也正是表明有极完备的自由。

琴梅尔㊁說过，自由始終是意味着不受某种拘束，自由若不了解成为与拘束相反，那自由就沒有什么意思了。这話当然說得不錯。但是，决不能根据这种細微粗淺的眞理来推翻哲学思想所作出的一种最英明的发現，即認为自由是已被意識到了的必然性这一原理。琴梅尔所下的定义太狹了：这一定义只能是指不受外部拘束的那种自由而言。当我們还只講到这样的拘束时，若把自由与必然性看作同一个东西，那就可笑已极了：一个想从你的衣袋中偷去新手帕的小偷遇到你的抵抗而又还沒有用某种办法打破你这种抵抗的时候，当然是不能自由偷去你这个手帕的。但是除了这种粗淺的自由观之外，还有一种比这深刻得無比的自由观。沒有哲学思想的人是根本不知道有这种自由观的，而且具有哲学思想的人，也只有已經摆脫二元論并了解主体与客体間根本沒有二元論者所設想的那种不可逾越的界限时，才能領会到这种自由观。

㊀ 讓我們再举一个例子来具体証明这种人底情感何等强烈。菲拉尔公主萊奈（法王路易十二底女兒）在她致教师加尔文的信中写道："我当然沒有忘記你所写給我的那些話：达維得对上帝底敌人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自己也始終不会持另一种态度：要是我知道皇帝，即我的父亲，皇后，即我的母亲，以及我已故的丈夫（feu monsieur mon mari）和我亲生的兒女是为上帝所摒棄了的話，那我就会对他們怀不共戴天的仇恨，惟願他們落入地獄"等等。怀有这种情感的人，該能表現出何等巨大而坚强的毅力啊！而这些人都是否認意志自由的哩。

㊁ 琴梅尔（一八五八至一九一八），系德国唯心派的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崇尚康德思想。

俄国主观主义者㈠用其烏托邦理想来同我国資本主义的現实相对立，并且不能超过这种对立一步。主观主义者陷进了二元論的泥潭。那些所謂俄国"門徒"㈡底理想，其近似資本主义現实的程度是比主观主义者底理想少得不可計量的。虽然如此，但这些"門徒"毕竟找到了把理想与現实連接起来的桥梁。"門徒"底見解提升到一元論了。他們認为資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是走向于本身的否定，因而使他們——俄国"門徒"，并且不只是俄国"門徒"——所提出的理想見諸实現。这是历史的必然性。"門徒"就是充当着实現这种必然性的一种工具，并且他們由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因这种地位所造成的理智和道义性格，也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这也是必然性的方面。既然他們的社会地位使他們具有这种性格而不是具有别种性格，于是他們也就不仅充当实現必然性的工具，不仅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而且很願意，并且不能不願意充当这种工具。这就是自由的方面，并且这种自由是从必然性中生長起来的，更正确点說，是与必然性同一的自由，是变成了自由的必然性㈢。这样的自由也是免除某种拘束的自由；它也是与某种約束对立的：深刻的定义并不推翻粗淺的定义，它补充着粗淺的定义而將其包括进去。既然如此，那末究竟还可談到什么拘束，什么約束呢？显然，这里只可談到尚未摆脫二元論的那些人底毅力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拘束；只能談到不知应怎样把理想与現实連接起来的那些人所受到的約束。当一个人还沒有用哲学思想上的英勇努力爭得这种自由时，他当然还不能完全自作主張，不能不因遇見那种与他对立的外部必然性而在精神上感到可耻的苦痛。

㈠ 俄国主观主义者是指拉薩洛夫，米海洛夫斯基，卡列夫等人而言。

㈡ 俄国"門徒"系当时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即社会民主党人在合法刊物上为迷惑書报檢查局耳目而自称的符号。

㈢ "Die Notwendigkeit wird nicht dadurch zur Freiheit, dass sie verschwindet, sondern dass nur ihre noch innere Identität manifestiert wird"（"必然性之所以变成为自由，并不是因为必然性已归于消失，而只是因为它的那种暫时还是內在的同一性表現出来了……"——譯者）。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Nürnberg, 1816, Zweites Buch, S. 281.

可是当他一旦摆脱这种苦惱和可耻的拘束重压，而他的自由活动已成为必然性底自覚和自由表現时，那他就会获得他从来所不知道的一种嶄新的完滿的生命了㊀。那时，他就会成为偉大的社会力量，世上沒有什么东西能阻碍他，而且沒有什么东西会阻住他如

天雷神电

轟击妖邪……

（三）

再重复說一遍：对于某种現象絕对必然性的認識，只能加强每一同情此种現象并認为自己是引起此种現象的一种力量的个人底激力。如果这样一个人認識了該現象底必然性以后却竟袖手旁观，那就只是表明他不懂得算术而已。例如，我們假定說某种条件总和 S 具备时，現象A 就会必然要发生。你已經給我証明，这个总和中的一部分已經具备，另一部分到T 时就会具备的。于是同情于A 現象的我一知道了这点，便贊嘆道："妙极了！"，說罢便酣睡起来，一直睡到你所預測的那个事变到来的那个吉日良辰为止。結果会怎样呢？結果就会是如下述。在你的計算中，在現象A 发生所必需的条件总和S中，本来是把我的动作也包括在內的，——假定我的动作是等于a。但因为我酣睡去了，于是在T 时所有促进这一現象发生的条件总和就不会是S，而是 S—a，結果当然会使情形有所改变的。也許那时忽然有另一个人来替代我，此人本来也是近于無所作为，不过幸亏他因看見我消极冷淡得太豈有此理而有所感慨。于是，力量 a 就会由力量 b 所替代，而如果 a 等于 b(a=b)，那末促进現象A 发生的条件总和就会仍然是等于 S，而現象A 也就会終究是在T 时发生。

但是假如不能認为我的力量是等于零，假如我是个灵巧能干的工作者，假如沒有什么人来替代我，那就不会有完整的总和 S，而現

㊀ 这位老黑格尔在另一个地方又卓絕地說过："Die Freiheit ist dies, Nichts zu wollen als sich"（"自由不过是个人本身的确立而已"——譯者） Werke, B. 12, S. 98.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象A 也就会发生得比我們所預料的迟些，或是不会发生得如像我們所期待的那样完滿，或是甚至完全不会发生。这是个非常明显的道理，如果我不明白这个道理，却竟以为在我叛变以后，S 仍然是 S，那就只是因为我不会計算而已。然而是否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計算呢？你曾預告过我說在T 时一定会有总和 S，而你却沒有料想到我同你談話后就立刻跑去睡覚了；你竟确認我始終是个很好的工作者；你竟把不很可靠的力量看成了很可靠的力量。可見，你也計算錯了。但是，我們就假定你絲毫也沒有弄錯，而是把一切都考虑到了吧。那末你的計算就会是如下述：你本来是說在 T时总和 S 就会具备的。这个条件总和中包括有一个負数，即我的叛变；同时这中間还包括有一个正数，即意志坚强的人因确信其意向和理想是客观必然性底主观表現而发生的那种努力工作精神。在这种場合，总和 S 就会眞正在你所預料的那个时刻具备，而現象 A 也就会眞正按时发生。这大概是很明白的了。既然这很明白，那末究竟为什么我竟会因想念到現象A 必不可免而感覚慌張呢？为什么我会覚得这种必然性注定要我無所作为呢？为什么我談論这种必然性时，竟会把最簡單的算术法則忘記了呢？大概是因为我所受的那种特殊教育养成了我这种极想無所作为的癖性，而我同你进行的談話又使我这种劣根性一触即发。不过如此而已。对于必然性的認識在这里不过是成了我这种頹唐卑劣习性借以暴露出来的緣由。要把它当作造成我这种頹唐习性的原因是絕对不可能的：原因并不是对于必然性的認識，而是我受到的那种特殊教育。由此可見……由此可見，算术原来是一門非常可敬和十分有益的科学，它的法則甚至是哲学家先生，甚至特别是哲学家先生不应忘記的哩。

若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对某种現象的发生不表同情，并設法加以阻撓，那末他对这种現象必然性的認識，又会怎样影响到他的行为呢？这里的情形就有点不同了。这种認識也許会使他的反抗力量减弱下去。但是反对某种現象的人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信服这种現象的必然性呢？只有当促成这种現象的条件已經很多而且很强大的时候。

反对这种現象的人們对于这一現象到来的必然性的認識，以及他們反抗力量的衰落，这都不过是表現出促使該現象发生的种种条件强大有力罢了。这种表現，也要算是促使該現象发生的一种条件。

然而，并不是所有反对該現象的人都会減弱其进行反抗的努力。其中有些人恰好会因認識到此一現象的必然性而加紧进行反抗，以至于拚命掙扎。在一般历史上，尤其是在俄国历史上有过不少表明这种拚命掙扎而值得玩味的例子。这种例子想必讀者自己也能够記忆起来，無須我們来妄費唇舌吧。

說到这里，卡列夫先生就来打断我們的話，他虽則当然不贊成我們对于自由与必然性的观点，并且不贊同我們偏袒意志坚强分子"极端主張"的态度，但他終究以在我們杂志上讀到我們認为个人能成为偉大社会力量的这种意見而感到滿意。这位可敬的教授先生高兴地喟然感嘆道："我向来都是这样說的呀！"。这話倒也正确。卡列夫以及所有的主观主义者，确实是向来都認为个人在历史上有极大的作用。曾經有过一个时期，他們是因这样主張而博得过一班先进青年方面很大的同情的，这班青年极力想从事裨益于社会的高尚劳作，所以自然极为重視个人倡导精神底作用。但是老实說来，主观主义者不仅始終沒能解决，甚至沒能正确提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他們把"有批評头腦的个人底动作"与社会历史运动規律底影响对立了起来，因而創造出了一种似乎新穎的因素論：有批評头腦的个人是社会历史运动底一种因素，这个运动本身的規律則是它的另一种因素。由此就得出了一种极不合理的观念，这种观念只有当那些积极的"个人"还專心致志于实际迫切問題，因而無暇研究哲学問題的时候，才勉强可以使人認为滿意。而当八十年代到来的沉寂时期已使那些有思想头腦的人获得一种出乎心願之外的閑暇功夫来从事哲学思考的时候，于是主观主义者底学說便显得破綻百出，甚至好像阿卡吉·阿卡吉也維奇㊀那件鼎鼎大名的外套一样根本破襤了。無論怎样

㊀ 阿卡吉·阿卡吉也維奇果戈里所著中篇小說"外套"中的主人公，象征着典型的小官僚。

修补也补不成功了，于是有思想头腦的人就相繼棄絕了主观主义这个分明全無根据的学說。但是，正如一般在此种場合所常見的情形那样，这一学說所引起的反感竟使某些反对这一学說的人走到了另一极端。如果說某些主观主义者因力求拚命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認人类历史运动是規律性的过程，那末現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却就因力求拚命强調这种运动底規律性而显然决意要把历史是由人所創造，因此个人底活动在历史上不能不发生作用这一原理置之腦后了。他們把个人看成是 quantité négligeable㊀。这种理論上的极端性是与极热烈的主观主义者所犯的那种极端性同样不容寬恕的。为了反題而忘掉正題，也如为了正題而忘掉反題一样，同样是沒有根据的。我們只有把正題与反題中間所包括的眞理成分統一成为一个合題的时候，才能得出正确的观点来㊁。

（四）

这个任务早已就使我們感到兴趣，因此我們早已就想請讀者来同我們一塊解决这个任务。但我們因有一些顧慮而沒敢这样作：我們总以为也許我們的讀者自己已經解决了这个任务，因而我們的提議未免太迟了。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这种顧慮了。德国史学家已經替我們打消了这种顧慮。这是眞情实話。原来最近一个时期在德国史学家中間发生了关于偉人在历史上作用問題的激烈爭論。有的認为偉人底政治活动是历史发展中主要和几乎是唯一的原动力，有的却又認为这是种片面观点，說历史科学不仅应当注意到偉人底活动与政治历史，并且要注意到全部历史生活(das Ganze des geschichtlichen Lebens)。蘭普勒赫特㊂就是后一学派中的一分子，他著有"德國民族史"一書，此書已由尼古拉也夫先生譯成了俄文。反对蘭普勒赫

㊀ "值不得注意的东西"。——譯者

㊁ 在追求合題方面，卡列夫也搶过了我們。只是可惜他沒有超出人是灵魂和肉体所構成的这个眞理范圍一步。

㊂ 蘭普勒赫特（一八五六至一九一五），系德国資产阶級史学家，著有德意志史多卷。

特的人責备他是个"集产主义者"，是个唯物主义者，甚至把他——horribile dictu!㊀——同"社会民主主义的無神論者"混为一談，如他自己在爭論結語中所說过的那样。我們認識了他的观点以后，才知道人們加予这位可憐学者的种种罪名，都是毫無根据的。同时我們又知道了現代德国史学家沒有能力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于是我們就認为我們有权来設想，这个問題对于某些俄国讀者也是至今尚未解决，因此現在关于这个問題也还可以說一点并非全無理論和实踐价值的話。

蘭普勒赫特搜集了一大批(eine artige Sammlung，据他自己說)国家英俊人物自己对于自己活动与其所处历史环境間的关系的見解；但他在爭論中，暫时还只援引过俾斯麦所发表的某些演說和意見。他引証了鉄血宰相于一八六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北德議会中所說的如下一段話："諸位，我們既不能忽視已往，也不能創造未来。有人常將自己的表針移前一些，以为这样就能把时間加快，但这实在是一种錯誤，我希望諸位加以避免。一般人通常过分估計了我对于我所依靠的那些事变的影响，可是始終沒有一个人想到要我来創造历史。这种任务是我同諸位联合起来行动也办不到的，虽說我們联合起来便能与全世界相抗。然而我們毕竟不能創造历史；我們应等候历史去自行造成。我們用火来温暖果树，决不能加速果子成熟的过程；我們把尚未成熟的果子摘下来，是只会妨碍果子成長而使其腐坏的"。然后，蘭普勒赫特又根据紹里所作記述引录了俾斯麦在普法战爭时期說过多次的意見。这种意見大体上也还是說："我們不能創造偉大的历史事变，而应当适应自然进程，只能設法享受已經成熟的果实"。蘭普勒赫特認为这是个深刻而周备的眞理。在他看来，現代的史学家若不局限于很短一段时間而去探察事变远因，便不会有另外一种想法。俾斯麦能不能把德国拉回到自然經济时代去呢？这是他在他威势最高的时候也做不到的。一般的历史条件，要比任何意志

㊀ "眞是言之可怕！"——譯者

坚强的个人更为强大。偉大人物所处时代底一般性質对于偉大人物是种"实在的必然性"。

蘭普勒赫特底意見就是如此，他把自己的观点称为万有史观。这个"万有"史观底弱点，是不难发现的。他所援引的俾斯麦意見是很有趣味的一种心理証据。对于前德国宰相底活动尽可不表同情，可是决不能說他这种活动渺不足道，决不能說俾斯麦是个帶有"無为主义"色彩的人。拉薩尔論到俾斯麦的时候說过："反动势力底僕役并不長于談吐，但我們很希望进步势力能多有这样的僕役"。这样一个往往表現过眞正鋼鉄般意志的人竟也自認为完全無力違反客观自然进程，因为他大概認为自己不过是历史发展底一种工具哩；这件事实又告訴我們，一个根据必然观来看待現象的人，同时又可能是个意志很坚强的活动家哩。但也只有在这一点上，俾斯麦底意見才值得注意，若要用他这种意見来回答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却就絕对不行了。据俾斯麦所說，事变是自行造成的，我們只能設法享受事变所預备好了的东西。但是，每次"設法享受"的举动也是一种历史事变；这种事变与那些自行造成的事变究竟有何区别呢？其实，几乎每一次历史事变一方面既是某人"設法享受"先前发展过程中已經成熟的果实，同时又是預备未来果实的那些事变鎖煉中的一环。試問怎样可以把"設法享受"的举动与自然的进程对立起来呢？俾斯麦底意思大概是要想說，在历史上活动的个人或集团从来不是，而且將来也永远不会是万能的。这点当然絲毫也不容疑义。但我們毕竟想要知道：他們的力量——固然是远非万能的力量——究竟要依什么为轉移；这种力量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增長起来，在什么情况下又会減少下去呢。对于这些問題，無論俾斯麦自己，亦無論那位援引俾斯麦言論的博学的"万有"史观者，都是沒有給予一个回答的。

誠然，我們在蘭普勒赫特那里也可讀到一些較为值得玩味的引証㊀。例如，他从法国現代史学界最大权威之一的莫諾作品中引証过如下一段話："史学家太习慣于專門注意那些燦爛响亮曇花一現的人类活动表現，注意偉大的事变和偉大的人物，却不願說明經济条件

和社会制度偉大而緩慢的运动，这种經济条件和社会制度正是人类发展中眞正重要而非暫时性質的部分，——这一部分在某种程度內是可以归結为一种法則，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还可拿来确切分析的。須知，偉大事变和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正是因为兩者是这个发展中各种情况底符号和象征。至于大多数所謂历史事变，則它們对于眞正历史，也好像海面的波浪对于来潮和退潮底深邃經常运动一样，是根本不关重要的：波浪发生，一时光彩燦爛夺目，随后一触着沙岸，就会被击破，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蘭普勒赫特声明，說他对于莫諾这段話中每一句話都极表贊同。大家知道，德国学者是不愛贊同法国学者，而法国学者也是不愛贊同德国学者的。因此，比国史学家皮萊恩就在 «Revue historiquc» 上兴高采烈地强調了莫諾底历史观点与蘭普勒赫特底历史观点这样吻合的事实。他說：“这样一种吻合极为重要，因为它証明新的历史观点显然有远大的前途”。

（五）

我們可不能对皮萊恩所持这种惬意願望表示贊同。模糊暧昧的观点决不会有什么远大的前途，而莫諾，尤其是蘭普勒赫特底观点，却正是这样的观点。把研究社会制度和經济条件当作历史科学主要任务的学派，当然应該受到欢迎。当这个学派在历史科学中最終巩固时，历史科学就会获得長足的进步。但是，第一，皮萊恩把这个学派当作新学派看待，是未免錯誤了的。历史科学中这一学派早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就已經产生了：基佐，米涅，梯叶里㊁，以及后来的多克維尔等人，便是这个学派中卓越一貫的代表人物。莫諾与蘭普勒赫特底观点，不过是从一个老旧而頗为光輝的藍本上模印下来的一

㊀ 我們在此地且不說及蘭普勒赫特的其他哲学历史論文，而始終只是講到他的論文 “Der Ausgang des Geschichtswissenschaftlichen Kampfes”, “Die Zukunft”, 1897, No 44。

㊁ 基佐，米涅和梯叶里，系法国复辟时代（一八一四至一八三〇年）資产阶級史学家。

种模糊的抄本罢了。第二，基佐，米涅及其他法国史学家底观点在当时虽然可算深刻，但它中間总还有許多东西沒弄清楚。其中对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沒有給予一个确切圓滿的回答。然而历史学家如果眞要摆脫其对于本門科学的片面观点，那末历史科学确实是应該解决这个問題的。只有对这个問題也能給予一个最好答案的学派，才是具有远大前途的学派。

基佐，米涅以及該派其他史学家底观点是十八世紀的历史观点所引起的一种反应，是十八世紀的历史观点底反題。十八世紀研究历史哲学的人把一切都归因于个人底自覚活动。誠然，当时也有过一些越出一般規例的例外：例如，維科，孟德斯鳩或赫得尔㊀底哲学历史眼界，就要广大得多。但我們現在所講的并不是这种例外；至于十八世紀的絕大多数思想家，却是正如我們所說过的那样去观察历史的。就这一点来說，現在把例如馬布里㊁这样一位史学家底作品閱覽一下，是很有趣味的。据馬布里所說，克里特島人底社会政治生活和风俗是由迈諾斯一手造成，李庫尔对于斯巴尔特的貢献也是如此。斯巴尔特人之"鄙薄"过物質財富，完全应归功于李庫尔，因为他"深深鑽进到同胞們底心坎里去压倒了貪財心理之芽" Oeuvres complètes de l'abbé de Mably, Londres 1789, tome quatrième, p. 3, 14—22, 34 et 192 ㊂。而斯巴尔特人后来离开英明李庫尔指点給他們的这条道路，却应归罪于来山特，因为来山特居然叫他們相信

㊀ 維科是十八世紀前半期意大利哲学家兼史学家；孟德斯鳩是同时期法国社会学家；赫得尔是十八世紀后半期德国哲学家兼史学家。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曾企圖确定出历史过程底規律性，認为历史事变进程并不依帝王將相底意旨为轉移。据維科底意見，这种規律性就在于历代国家兴亡交替都是循着上帝所决定的永恒輪迴次序發生的。孟德斯鳩和赫得尔企圖把历史規律性归因于自然条件，主要是归因于气候和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

㊁ 馬布里僧正（一七〇九至一七八五），是法国的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認为帝王賽傑底活动是历史变迁底基本原因。

㊂ 参看 (descendit pour ainsi dire jusque dans le fond du coeur des citoyens etc.)。

"新时代和新环境要求他們采取新規則和新政策"㊀。用这种观点所写成的作品，实在与科学作品很少相干，不过是專为引伸出一些所謂道德"教訓"而写述的一种教义罢了。复辟时代法国史学家毅然反对的正是这种观点。有了十八世紀末叶惊天动地的事变以后，已經絕对不能設想历史是某些較为杰出人物或較为高尚开明的人物所一手作成的事情，以为他們能够随心所欲，用某种情感和观念去訓示那些沒有知識而又唯命是听的民众了。况且，这种历史哲学又还激怒了資产阶級理論家底平民自尊心理。这里可以看出早在十八世紀資产阶級戏剧发生时期就已經表露出来的那种情感。梯叶里在反对旧的历史观点时，又还运用过波馬什等人所提出来反对旧时审美观的那些論据㊁。末了，法国不久前所經历过的风暴时期，又很明显地証明了历史事变进程决非只是由人們自覚的行为所决定；單是这一情况已不免要叫人想到，此种事变是在一种隐藏的，如同自然界中自发势力那样盲目而又依照某些不可变移規律动作着的必然原因影响下发生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实，——虽然我們知道，这件事实在先前誰也沒有指出过，——是把历史看作一个規律性过程的这种新观点已由复辟时代的法国史学家在論述法国革命的著作中最为徹底地发揮过了。例如，米涅和梯也尔㊂兩人底著作就是明証。莎托布里翁把新的历史学派称为宿命論派。他論述这个学派所提出的研究任务时說道："这种学說要求史学家論述最殘忍的暴行时不表憤慨，說到最高尚的德行时不表爱感，要用冰冷的眼光观察社会生活，認为社会生活不过是不可抵抗的規律底表現，这种規律使一切現象都正如它們所必然要发生的那样发生㊃。这种說法当然是不正确的。新学派并沒有要求历史家持冷眼观察态度。梯叶里甚至坦白地說过，

㊀ 参看同書，第一〇九頁。

㊁ 請参閱"法国历史"的第一封信与波馬什所著 Oeuvres complètes 第一卷中的 «Essai sur le genre dramàtique sérieux» "对照"。

㊂ 梯也尔（一七九七至一八七七），系法国反动政治家，政論家兼史学家。殘酷鎮压巴黎公社的事件就是由他組織的。

政治热情磨研着研究者底头脑，能成为发現眞理的强有力手段㊃。所以只要稍微看看基佐，梯叶里或米涅底历史作品，就可知道他們热烈贊助过資产阶級反对俗家与宗教貴族的斗爭，以及資产阶級打破新兴無产阶級要求的企圖。然而有一件事实是不容爭辯的，这就是新的历史学派是发生于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当时貴族虽然还企圖恢复某些旧有特权，但它已被資产阶級打敗了。在新学派史学家們所有一切議論中都反映出他們的阶級以获胜自豪的意識。既然資产阶級从来未曾有过騎士气概，所以从它那些有学問的代表人物底議論中往往可以窺見殘忍对待被战胜者的态度。基佐在他的一本辯論的小册子中說过，«Le plus fort absorbe le plus faible, cela est de droit»（弱肉强食，理所固然）。它对工人阶級也持着同样殘忍的态度。这种殘忍态度有时竟表現成为冷酷眼色，因而就使莎托布里翁走入迷途。此外，当时还不完全明白究竟应該怎样来了解历史运动規律性。末了，新学派之所以竟能使人覚得它是个宿命論派，乃是因为它力求坚决主張規律观，而很少注意到偉大历史人物㊄。受过十八世紀历史

㊃ Oeuvres complètes de Chateaubriand, Paris 1860, t. VII, p. 58. 此外还請讀者注意下面一頁；这一頁簡直令人覚得是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执笔写成的。

㊄ 参看 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附录于 «Récits des temps Mérovingiens», Paris 1940, p. 72.

㊅ 聖畢夫*在其評論米涅所著"法国革命史"第三版的一文中，把这位史学家对人物的态度評述如下：«A la vue des vastes et profondes émotions populaires qu'il avait à décrire, au spectacle de l'impuissance et du néant où tombent les plus sublimes génies, les vertus les plus saintes, alors que les masses se soulèvent, il s'est pris de pitié pour les individus, n'a vu en eux pris isolément que faiblesse et ne leur a reconnu d'action efficace, que dans leur union avec la multitude». "当他看見他所必須記述的那些广大深入的民变时，他眼看那些最高尚的聖哲 和最純潔的善人在民众起义的場合显得毫無办法和毫無力量，便不禁为之伤感，認为人物孤独来說总是軟弱無力，認为他們不同群众結合便不能有何实际作为"——譯者）。

* 聖畢夫（一八〇四至一八六九），系法国詩人兼文艺批評家。他認为个人底活动与社会条件無关。

思想熏陶的人，当然很难容忍这种观点。所以，新史学家也就受到各方面紛至沓来的反駁，因而发生了我們已經說过的至今尚未結束的那种爭論。

一八二六年一月，聖毕夫在 «Globe» 上論及当时出版的梯叶里所著"法国革命史"第五第六兩卷时写道："一个人物随时都能依其意志底突然决定，对事变行程添加一种意外而可能变化的力量，这种力量能使事变行程变更方向，但这种力量本身却是不可測量的，因为它是可能变化的"。

决不要以为聖毕夫曾認定人类意志底"突然决定"是种毫無原因的現象。这样設想是未免太幼稚了的。他只認定人們在社会生活中发生較为重大作用的那些智慧上道义上的特性，即材能，知識，坚决或犹豫，勇敢或胆怯等等，不能不对事变进程和結局发生显著的影响，这些特性又不單只是取决于国民发展底一般規律，而永远幷且大半是在可以叫作私人生活偶然現象的影响下形成。我們且举几个例子来把这个显然無須說明的思想說明一下。

在奧皇繼嗣战爭时期，法国軍队获得过几次輝煌的胜利，所以法国当时显然能从奧国方面索得現今比国境內很大一部分領土的讓步；但路易十五却幷沒有索取过这种讓步，因为他——据他自己說——幷非以一个商人資格，而是以一个国王資格进行战爭的，所以亞琛和約也就使法国一無所得；但假如路易十五具有另外一种性格，那末法国領土也許会扩大起来，而它的經济和政治发展进程也就会稍有不同了。

大家知道，七年战爭，法国却已是同奧国結成联盟来进行的了。据說，在締結这次联盟的事情上，保拜都尔夫人㊀出力甚大，这是因为她深以驕傲的馬利亞在写給她的那封信里称她做表妹或亲爱的女友(bien bonne amie) 为幸。因此我們可以說，若是路易十五底性情严峻一点，或是說，如果他沒有那样厉害地屈服于他那些寵妃底影

㊀ 保拜都尔（一七二一至一七六四），是法王路易十五底寵妃，在当时法国对內对外政策上起过頗大的作用。

响，那末保拜都尔夫人也就会不能对事变进程起这样重大的作用，而事变底局势也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其次，七年战爭結果是于法国不利的：法軍將領遭到过几次可耻已极的失敗。而且他們的举动根本就是奇怪已极：黎塞留專干擄掠勾当，苏俾茲和布洛利兩人始終是互相掣肘。例如，当布洛利在費里高尊一帶对敌人实行攻击时，苏俾茲虽听見了炮声，但他却沒有依照預先約定并且显然是他所应該作的那样去援助这位同袍，結果竟使布洛利不得不实行退却㊀。而当时和护极庸碌將官苏俾茲的仍是那位保拜都尔夫人。所以我們又可以說：假如路易十五不是如此好色成性，或是說，假如他这位寵妃沒有干預政事，那末事变結果也許不会这样不利于法国的。

据法国史学家說，当时法国根本不应該在欧洲大陆作战，而是应該集中全力到海上去反对英国侵略法国殖民地領土的行动。法国之所以沒有这样去作，又是由于保拜都尔夫人底过失，因为她始終都想在她那位"亲愛的女友"馬利亞面前討好。由于七年战爭的結果，法国丧失了最好的殖民地領土，結果無疑是对法国經济关系发展进程有过重大的影响。在这里，女人的虛荣心理竟成了影响經济发展的一个强大"因素"。

还要举出其他什么例子来說明一下么？那末就讓我們再举出一个也許是最鮮明不过的例子来說說吧。同是在这个七年战爭时期，一七六一年八月間，奧軍在西里細亞同俄軍汇合之后，已把当时駐扎在施特里高一帶的腓特烈軍队包圍起来了。腓特烈处境危急万分，但联軍却一再迁延攻击，而俄將布圖林㊁在敌軍面前停駐二十日之后，甚至完全退出了西里細亞，只留下一部分軍队去支援奧將牢敦。

㊀ 有些人却說当时錯的不是苏俾茲而是布洛利，因为布洛利不願同苏俾茲分沾功名，所以沒有等候他来援助。但这对于本題并沒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不能把情形改变絲毫。

㊁ 布圖林伯爵(一六九四至一七六七)，是俄国大元帅，在七年战爭中(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担任过俄軍总指揮。

牟敎占領了距腓特烈軍队据守地点很近的什維尼茨城，但这次胜利并沒有什么重大的意义。若是布圖林为人坚决一点，那結果又会怎样呢？若是联軍向腓特烈举行了攻击，使其無法筑壘固守，那結果又会怎样呢？也許联軍会把腓特烈完全击破，使其不得不接受胜利者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哩。可是經过几月后又发生了一次偶然事件，即俄女皇依利薩伯病歿，結果竟使局势一下子就变得大大有利于腓特烈了。試問：假如布圖林为人較为坚决一点，或者說，假如当时担任指揮职务的不是他而是如苏濕洛夫㊀那样的一个人，那結果又会怎样呢？

聖毕夫批判"宿命派"史学家底观点时，又还說出过我們所应注意的另一种意見。他在我們已經摘引过的那篇論米涅"法国革命史"的文章中，認为决定了法国革命底进程和結局的不仅有这次革命所由以发生的一般原因，也不仅有这次革命反过来所激起的种种情欲，并且还有常被一般研究家忽略过去，甚至完全不能眞正叫作社会現象的許多細小現象。他写道："当这些(一般)原因和(由它們所引起的)种种情欲发生作用的时候，自然界的物理和生理因素也不是無所作为的：石头仍然受着地心吸引力的支配；血脉也沒有停止循环。假若米拉波未因偶患寒热病症死去，假若罗伯斯比尔忽被偶然墜落下来的一塊磚瓦击死或因患腦冲血病死了；假若拿破侖中彈殞命了，那末事变进程难道不会有所变更么，难道你們敢于断定說事变結局也会是那样么？当我所假定的那种偶然事件充分具备时，事变进程就会与你們所認为不可避免的那种进程完全相反。而我这样假定是有理由的，因为革命底一般原因及其所引起的那种情欲并不能排斥这种偶然現象"。接着，他又援引人所共知的意見，說要是克列奧帕特尔皇后底鼻梁生得矮一点，历史进程也許会成为完全另一种样子；最后，他認为虽然可以說出許多理由来辯护米涅底观点，但他又指出了米涅錯誤的地方。他說：米涅把一切結果都归因于一般原因的作用，殊不知这些結果同时也是由其他許多細小曖昧而不可捉摸的原

㊀ 苏濕洛夫（一七三〇至一八〇〇），系俄国傑出的統帥。

因促成的；米涅底严格头脑，好像根本不願承認他所認为沒含有一定次序和規律的那些現象存在。

（六）

聖毕夫提出这种異議，是不是有什么理由呢？看起来仿佛是有某些理由。究竟有多少理由呢？为了确定这一部分理由，我們首先就要把認为人能"用自己意志底突然决定"来給事变进程添进一种新力量而使其大大改变的这种意見考察一下。我們已經举出了我們認为极能說明这种意見的一些例子。現在我們就要把这些例子仔細思索一下。

大家知道，当路易十五在位时代，法国軍事力量愈益衰落下去。据馬尔騰所說，在七年战爭时期，法国軍队始終都有許多妓女、商人和僕役跟着，軍中輜重馬匹要比騎行馬匹多兩三倍，所以这个軍队与其說是秋連和古斯达福·奧多尔夫那样的軍队，不如說是达里和薛西斯那样的匪群㊀。阿恒合尔茨在記載这次战爭經过的著作中指出說，当时法軍中被指定放哨的官長，往往随便离开哨所跑到鄰近地方去跳舞，只有他們認为必要和方便的时候，才肯执行上司命令。法国軍中情形这样惡劣，是由于貴族阶層衰敗，——但当时这个阶層仍然把持着軍中一切高級职位，——以及当时全部"旧秩序"因普遍解体而迅速陷于破坏的緣故。單只这些一般原因，已經完全足够使法国在七年战爭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了。但是，苏俾茲一类將領庸碌無能的事实显然又使法軍由一般原因决定的那种失利危險加增起来。既然苏俾茲底地位是全靠保拜都尔夫人来支持，于是我們就必須承認，这位貪求虛荣的夫人乃是在七年战爭时期大大加深了一般原因对法国不利影响的一个"因素"。

保拜都尔夫人之所以强而有力，并非由于她自己有什么力量，而是因为大权在握的国王听从她的意旨。能不能說路易十五底性格按

㊀ «Histoire de France», 4me édition, t. XV, p. 520—521.

照法国当时社会关系发展进程定应如此呢？决不能这样說。在当时那样的发展进程中，也可能有一个用别种态度对待女人的国王出現。聖毕夫也許会說，这里只要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曖昧生理原因底作用就行了。如果他眞这样說，那他就会說得正确。但由此就应得出結論：这种曖昧的生理原因既影响到七年战爭底进程和結局，也就影响到了法国后来的发展情形，因为法国如果在七年战爭中沒有失去一大部分殖民地領土，它的发展情形也許会是另一种样子哩。試問这个結論是否与社会发展規律性的概念相抵触呢？

不，絲毫也不相抵触。个人的特性在上述場合发生过作用是沒有疑問的；但这种作用只有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才能发生，也同样是沒有疑問的。自法軍在罗斯巴哈遭到失敗以后，法国人民对于庇护苏俾茲的这位女人极表憤慨。她每天都收到許多充滿威胁詈罵的匿名書信。因此保拜都尔夫人深为焦虑，寢不安席㊀。虽然如此，但她还是极力袒护苏俾茲。一七六二年，她在致苏俾茲的信中一面責备他有負厚望，接着便补充說："但你不必畏惧，我会設法来保护你，消除国王对你的誤会"㊁。可見，她并沒有对法国社会輿論讓步。为什么她沒有讓步呢？大概是因为当时法国社会沒有可能强迫她去讓步。为什么当时法国社会不能做到这点呢？原来是因为当时法国社会本身結構惡劣，而这种惡劣的社会結構又是由当时法国社会力量对比关系决定的。由此可見，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也就是路易十五底性格及其寵妃底癖性竟能对法国命运发生出这样一种悲慘影响的根本原因。如果具有这种寵爱女癖性的不是国王本人，而是王室中某一个厨司或馬夫，那这种癖性就不会发生什么历史作用。可見，問題并不在于这种癖性，而是在于具有这种癖性的人所占的社会地位。讀者当然懂得，这种論断对于上述其他一切例子也都是适用的。只是要在运用这种論断的时候把应当改換的对象改換一下就行了，例如把法国換成俄国，把苏俾茲換作布圖林等等。因此，我們也就不去

㊀ 参看 «Mémoires de madame du Hausset». Paris 1824, p. 181.

㊁ «Lettres de la marquise de Pompadour», Londres 1772, t I.

重复这些論断。

由此可見，个人因其性格帶有某种特点而能影响到社会底命运。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但这种影响表現的可能及其范圍，却要依当时的社会結構，以及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个人底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許的那个时候、地方和程度內，才能成为社会发展底"因素"。

也許有人会說，个人影响底范圍是与个人材能也有关系的。是的，我們同意这种意見。但个人只有在社会上占有相当的地位时，才能表現出自己的材能。为什么法国命运竟能操在一个既沒有什么能力，也沒有什么热心去替社会服务的人物手中呢？这是因为法国当时的社会結構曾是如此。正是这种社会結構，才使某些賢明人物或庸碌分子在某某时候能表現一定的作用，因而也就能表現出一定的社会影响。

个人底作用既然是由社会底結構来决定，那末試問他由这种作用所制約的社会影响，又怎么会与社会发展的規律性概念相抵触呢？个人底社会影响不仅不与这种概念相抵触，并且是对于这种概念的一种最鮮明的証实。

不过这里必須說明一点。既然个人有可能表現出受社会結構制約的社会影响，于是那些所謂偶然現象就能影响各国人民底历史命运。路易十五好色成性，原是他那种体質底必然結果。但这种体質对于法国一般发展进程却是一种偶然的現象。但我們已經說过，这种体質对于法国后来的命运不是沒有发生影响，而是成了决定这个命运的一种原因。米拉波之死，当然是由于完全合乎規律的那些病理作用的結果。但这种病理作用的必然性，并非由法国一般发展进程所引起，而是由这位著名演說家个人体質上某些特点以及他染受疫症时所处的那些物理条件所致然。这些特点和这些物理条件，对法国一般发展进程来說是种偶然的現象。可是米拉波之死却影响到了法国革命后来发展的进程，成了决定这个进程的諸原因中的一种原因。

1778

在上述那个說明腓特烈第二只是因为布圖林优柔寡断才得逃出窘境的例証中，偶然原因底作用表現得更为明显。布圖林被任为俄軍总司令一事，甚至对于俄国一般发展进程也可說是我們所認定的那种偶然性的現象，而对于普魯士一般发展进程說来，当然更是毫不相干的。但实际上我們却很可断言，只是由于布圖林优柔寡断，才使腓特烈逃出了絕望的境地。如果当时被任为俄軍总司令的不是布圖林而是苏渥洛夫，那末普魯士底历史进程，也許会成为另外一种样子的。可見，国家底命运有时候还会由一些可說是次等偶然現象的偶然現象来决定哩。黑格尔嘗說："In allem Endlichen ist ein Element des Zufälligen"(一切終結現象都包含有偶然性的成分)。我們在科学中所考察的只是"終結現象"；因此可以說科学所研究的一切过程都包含有偶然性的成分。这是否会使对于各种現象的科学認識成为不可能呢？絕对不会。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它只会是在諸必然过程交叉点上出現。欧洲人在美洲出現，对于墨西哥和秘魯土人說来是种偶然的現象，因为这种現象并不是从这几个美洲国家底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結果。但西欧人在中世紀末期傾心于航海事业却不是偶然的；欧洲人底力量很快就打破了土人反抗，也不是偶然的。同样，欧洲人征服墨西哥和秘魯而引起的影响，也不是偶然的；这种影响归根到底是由兩种势力底合成力所决定：一种势力是各被征服国家底經济狀况；另一种势力便是各征服国家底經济狀况。这兩种势力及其合成力，是完全可以用严格科学眼光来考察的。

七年战爭中的偶然現象，对于普魯士后来的发展史有重大的影响。可是，如果当时普魯士处于另一种发展阶段，那末这些現象所发生的影响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偶然現象底影响在这里也是由兩种势力底合成力所决定：一方面是当时普魯士底社会政治狀况，另一方面是当时影响了普魯士的那些欧洲国家底社会政治狀况。可見，这里的偶然性也絲毫不能妨碍对于各个現象的科学研究哩。

由此可知，个人往往能对社会命运发生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由該社会底内部結構及其对于其他諸社会的关系所决定的。但

这还不能概括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我們还应从另一方面来考察一下。

聖毕夫以为他所指的那种細小曖昧的原因完全具备时，法国革命就会有与我們所知道的結局相反的結局了。这是个严重的錯誤。不管心理上生理上的細小原因錯綜結合得怎样奇巧，但它們絕对不能消除法国革命所由引起的种种巨大社会需要；当这些需要尚未得到滿足时，法国的革命运动是不会停止的。为了使法国革命运动能有一种与当时实在結局相反的結局，就必須用相反的需要来代替这种需要；但这当然是任何一种細小原因的湊合也办不到的。

法国革命底原因是在于当时那种社会关系底特性，聖毕夫所假定的那些細小原因却只能根源于單个人物底个人特点。社会关系底根本原因是在于生产力底狀况。生产力底狀况所取决于單个人物个人特点的地方，至多也不过是这种人物对于从事技术改良、技术发現和发明的能力的大小。聖毕夫所指的并不是这种特点。可是其他一切特点都不会使單个人物能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狀况，因而也就不能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狀况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即經济关系。当經济关系适合于当时生产力狀况的时候，那末一个人物無論有怎样的特点，也不能把这种經济关系消除的。但是一个人物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从事于滿足当时經济关系所引起的社会需要或阻碍这种滿足，却要由这个人物底个人特点来决定。十八世紀末期法国最迫切的社会需要，是要推翻陈腐政治制度，而代之以适合于法国新經济制度的另一种政治制度。当时最有名望和最有益处的社会活动家，正是那些最能帮助滿足这种最迫切需要的人物。我們假定說米拉波，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侖就是这样的人物。如果米拉波未因早死退出政治舞台，那末情形又当怎样呢？那末，君主立宪党就会把自己所有的巨大政治力量保持得較为長久，于是它对于共和派的抵抗也就会更为坚强。但也不过如此而已。無論怎样一个米拉波，都不能防止当时共和派底胜利。米拉波底力量全靠民众底同情和信任来支持，而民众是趋向于共和制度的，因为当时朝廷那种頑强保护旧制度的政策激

怒了民众。所以民众一知道米拉波不同情于他們的共和趋向时，就会不复对他表示同情，于是这位大演說家底影响就会丧失殆尽，結果他就会由他自己徒然力圖阻止的那个运动所推翻。罗伯斯比尔底情形大致也是如此。我們假定說他在他的党內是个完全無可替代的大人物。但他毕竟不是这个党內唯一的大人物。假如他在一七九三年一月間㊀偶然被墜落下来的一塊磚瓦打死了，那末当时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物来替代他，这个人物也許在各方面都比不上他，但事变进程毕竟还是会按其在罗伯斯比尔在世时所走的那种方向发展下去的。譬如說，基郎特党人在这种場合也会不免要遭受失敗；不过，罗伯斯比尔党丧失政权也許来得更早一些，因而我們現在就会不是說热月的反动㊁，而是說花月，草月或穑月的反动㊂。也許有人会說，罗伯斯比尔所采取的殘忍恐怖手段，只是加速而不是延緩了他那个党复亡的时日。我們且不去考察这种假設，而把它当作一个完全有根据的假設吧。这样一来，就会必須假定罗伯斯比尔党底复亡不是发生于热月，而是发生于果月，葡月或霧月。总而言之，这个事件也許发生得早一点，或是发生得迟一点，但它終究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这个党所憑借的那个人民阶層沒有实行長久統治的能力。然而，無論如何也不会有与罗伯斯比尔所努力促成了的那种結果"相反的"結果发生。

我們就假定拿破侖在阿尔科会战时中彈殞命了，但也不会有这种"相反的"結果发生的。拿破侖在意大利及其他地方的征伐中所作出的事情，是会由其他的將領作出的。这些將領也許沒有拿破侖那样的材能，也許不能获得那样輝煌的胜利。但法蘭西共和国毕竟还

㊀ 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是法蘭西国王路易十六被斬之日。

㊁ 热月的反动是在法国热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反革命政变后造成的政治社会反动局面。热月九日的政变推翻了小資产阶級專政，并把小資产阶級專政底領袖罗伯斯比尔推到断头台上斬决了。

㊂ 热月，花月，草月，穑月，霧月等，是法国康文梯（国民公会）于一七九三年秋頒行的革命年历月名。其所以如此称呼，是要强調出革命势力毅然决然与反革命天主教会破裂的事实。

是会在当时各次战爭中获得胜利的，因为法国兵士比当时欧洲其他各国兵士都要优良得不可比拟。至于霧月十八月政变㊀及其对于法国內部情形的影响，那末事变底进程和結局实际上也想必会与由拿破侖当权时的情形相同。因热月九日反动政变而受到致命重伤的共和制度，已經是奄奄待斃了。督政部根本不能恢复当时摆脫了上層等級統治的資产阶級所渴望的秩序。当时为要恢复秩序，就需要有如西依史所說的那样一枝“宝劍”。起初大家以为这种宝劍使命可以由朱伯尔將軍来执行，但当他在納威会战时陣亡以后，大家便提到莫洛，麦唐納和被納多特等人了㊁。拿破侖这个名字，还是后来才被提起的。如果他也如朱伯尔那样陣亡了，那末大家就根本不会談到他，而会提出另一枝“宝劍”来。自然，一个被事变抬上了独裁者地位的人物，应該自强不息地鑽营政柄，坚毅果决地把一切阻碍他前进的人推开并予以無情打击。拿破侖具有鉄一般的毅力，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沒有留过什么情面的。但当时除他而外，也还有过不少坚强能干，貪圖功名利祿的人物。他所掙得了的那个位置大概是不会空閑起来的。假定另一位將軍爭得这个位置后，举动比較拿破侖温和一点，不会激起全欧洲的反抗，結果这位將軍就会是死在推勒里宮中㊂，而不是死在聖叶倫島上。那末，布尔奔皇族就会根本無法回到法国来；这样的結果，对于他們說来，当然是与实际上所发生的那种結果“相反”，但对于法国整个內部生活說来，却是与实际的結果很少区别的。当这枝“宝劍”恢复了秩序，保証了資产阶級获得統治以后，資产阶級很快就会厭惡这枝“宝劍”所表現的那种軍营习慣和專擅行为。于是就会有在复辟时代发生过的那种自由主义运动发生起来，斗爭就会漸漸燄烈起来。既然那些“宝劍”不很愛作讓步，那末仁慈

㊀ 共和国八年霧月十八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是拿破崙（巴納帕特）举行政变之日。这次政变結果推翻了督政部，成立了执政府，隨后又成立了帝国。

㊁ 参看 La vie en France sous le premier Empire par le vicomte de Broc, Paris 1895, pp. 35-36 及往下各頁。

㊂ 推勒里系巴黎城中法王故宮，后为拿破崙第一宮室所在地。

的路易腓力普代替他所憧憬爱慕的同宗来登王位也許不是在一八三〇年，而是在一八二〇年或一八二五年。事变进程中的这一切变化，也許能局部影响到欧洲后来的政治生活，并經过这政治生活而影响到欧洲經济生活。但革命运动底最后結局終究是不会与实在的結局"相反"的。大人物憑靠他們那种头腦和性格上的特点，虽然也能使各个事变底單个外貌以及各个事变底某些局部后果改变一个样子，但这些特点終究不能改变事变底一般方向，因为这种方向是由别种因素决定的。

（七）

除此而外，还要注意到如下一点。一般人講到偉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差不多总是发生一种錯誤观念。向讀者指出这种錯誤观念，大概是不会沒有益处的吧。

拿破侖既担起了挽回社会秩序的"宝劍"使命，于是就排除了其余一切將官担負这种使命的机会，虽然这些將官中間也許有些人是能像他那样或差不多像他那样执行这种使命的。当社会要有一个坚毅軍事統治者的这种需要已获得滿足时，社会的結構就堵截了其余一切能干軍人成为軍事統治者的途徑。于是这种結構底力量就成了障碍其他能干軍人表現其材能的力量。由此就有我們現在所說的那种錯誤观念发生。因此一般人就未免极端夸大了拿破侖个人的力量，因为他們竟把提出和支持了这种力量的全部社会力量通統归到他一人份下去了。由是大家就覚得拿破侖个人的力量是个唯一無二的力量，因为所有其余与他相同的一切力量都沒有由可能变成为現实。当人們听說假如沒有拿破侖，那末情形就会不知怎样的时候，于是人們的想像就混乱起来，竟以为如果沒有拿破侖，就根本不会发生拿破侖个人力量和影响所憑借的那种社会运动。

在人类智慧发展史中，因某一个人物获得成功而使另一个人物不能获得成功的情形，是要稀少得無比。但是人們在这方面也不能完全避免上述那种錯誤观念。当一定的社会局势在其精神代表人物面

前提出相当任务的时候，那末这些任务在英俊人物尚未把它們解决以前是始終引起英俊人物注意的。而当他們已能解决这种任务时，他們的視綫就会轉注到另一种对象上去。当一个英俊人物A已把任务X解决时，于是英俊人物B就会离开这个已經解决的任务而去注意另一个任务，即注意任务 y。当你問到如果 A 还沒把任务 X 完成而就不幸死去，那末結果又会怎样的时候，人們就会发生一种錯覚，以为社会智慧发展的綫索將因此中断。殊不知 A 死去之后，这个任务是会由B或 C 与 D 去担任解决的，所以虽然 A 不幸早死了，但社会智慧发展的綫索依然是会完整無缺的。

为了使一个拥有某种材能的人能运用他的这种材能来对事变进程发生重大影响，就需要有兩个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材能应比别人所具备的材能更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如果拿破侖所具备的不是他那种軍事材能，而是彼多芬那样的音乐材能，那他当然就会做不到皇帝。第二，当时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备有恰合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如果法国旧制度再延續过七十五年之久，拿破侖也許終身也不过是个不大著名的包納泊特將軍或上校㊀。在一七八九年間，达武，达扎，馬尔蒙和麦唐納还不过是少尉；伯納多特还只是个上士；何西，馬索，勒非甫耳，皮士格律，內依，馬森，繆拉，苏尔特还是些軍曹；欧什洛还是个劍术教师；蘭恩还是个染匠；孙錫尔还是个戏子；茹尔丹还是个小販，别西尔还是个剃头匠；布隆还是个排字匠；朱伯尔和朱諾还是法科学生，克雷貝尔还是个建筑家；摩尔退直到革命发生时还沒在軍中服务㊁。

若是旧制度至今仍然存在，那末現在誰也不会想到前世紀末期法国曾有过一些戏子，排字匠，剃头匠，染匠，律师，小販和劍术教师，

㊀ 那时，拿破崙也許会像他在法国革命几年以前所打算的那样到俄国軍队中去服务。如果他果真去了，他或許能在俄軍反对土耳其軍队的战斗或反对高加索山民的战斗中显一显身手，但是沒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个地位微賤而頗有材能的軍官，在情况順利的时候能夠成为世界霸主的。

㊁ 見 Histoire de France, par V. Duruy, Paris 1893, t. II, pp. 524-525,

原来是些处于可能狀态的軍事干材哩㈠。

斯騰达尔說，一个与梯齐阿諾同年，即一四七七年誕生的人，可以与拉斐尔（死于一五二〇年）以及达芬奇（死于一五一九年）同时度四十年的生活，他可以与一五三四年逝世的科列志以及一五六三年死去的米开蘭基罗同时生活很長一个时期，他当佐佐湟去世时还不过三十四岁，他能亲眼看見廷托勒特，巴撒諾，味洛里則，罗曼諾和薩托等人；一句話說，他能做一切偉大画家底同代人，不过看不見一百年后才出現的波倫亞学派中的人物㈡。同样也可以說，一个与莫味曼同年誕生的人几乎能亲身同荷蘭所有一切偉大画家相識㈢，而莎士比亞底同庚則可以和整整一群卓絕戏剧作家同时生長㈣。

早已就有人說过，凡是有便于英俊人物发揮其材能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和地方，总会有英俊人物出現的。这就是說，每一个眞正显出了本領的英俊人物，即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英俊人物，都是社会关系底产物。但由此就可看出，英俊人物，正如我們所說过的，只能改变当时事变底个别外貌，却不能改变当时事变底一般趋势；他們自己是完全順应着这种趋势出現的；沒有这种趋势，他們是永远也跨不过

㈠ 当路易十五在位时代，第三等級中只有塞維尔一人才升擢到了中將衔。当路易十六在位时代，第三等級中人在軍中升进的途徑更感困难了。見 Rambeaud,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caise, sixiéme édition, t. II, p. 226.

㈡ 見 Histoire de la Peinture en Italie, Paris 1892, pp. 24-25.

㈢ 一六〇八年間誕生的有特尔保，布牢厄，林布蘭；一六一〇年間誕生的有凡奧斯特，波特，波尔；一六一三年間誕生的有凡得赫尔斯特，施拉尔滋；一六二〇年間誕生的有莫味曼；一六二一年間誕生的有維尼克斯，厄味定根和弄納克尔；一六二四年間誕生的有伯尔格姆；一六二五年間誕生的有坡特尔；一六二六年間誕生的有楊斯騰；約于一六三〇年間誕生的有麦楚；一六三〇年間誕生的有留斯达尔；一六三七年間誕生的有凡得亥登；一六三八年間誕生的有和柏馬；一六三九年間誕生的有凡得維尔（見本頁注二）。

㈣ “同时出現或相繼出現的莎士比亞，彼蒙得，弗列特契尔，約翰孙，韋伯斯特，馬辛澤，蘭耳德，弥得尔敦和黑武德等人便是一羣新起的人物，他們憑藉他們所处的那种方便的境遇而在前一羣人物所已預备好的土壤上繁盛滋長了起来”（見太納所著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Paris 1863, t. I, p. 468）。

由可能进到现实的門阶的。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英俊人物。太納說得对："当文明发展进程中新的进步产生出一种新的艺术时，总会有几十个以一兩个天才人物为中心的英俊人物应运而生，几十个英俊人物只能把社会思想表現出一半，而一兩个中心天才人物却能把这种思想完全表現出来"㊀。若是拉斐尔，米开蘭基罗和达芬奇在童年时期就被一些与意大利社会政治和精神发展进程沒有关系的机械原因或生理原因击死了，意大利的艺术也許不会发展得那样完备，但它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的一般趋势終究会同是那样的。拉斐尔，米开蘭基罗和达芬奇并沒有創造出这种趋势，他們自己不过是这种趋势底优秀代表人物。固然，在一个聖才人物周圍通常有整个学派出現，并且他那些門徒总是努力把他的一切方法，甚至极細微的方法也都拿来运用，因此，拉斐尔，米开蘭基罗和达芬奇如果不幸早年去世，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由此所遭到的損失便会对其后来发展史中許多次要特点发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只要当时意大利精神文明发展的一般进程中沒有某种一般原因引起某种大变更，那末这种艺术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不会有什么变更的。

不过，大家知道，数的区别归根到底是会轉变为質的区别的。既然到处都是如此，历史上的情形当然也不能成为例外。某一艺术潮流中如果有好几个能够成为它的代表者的英俊人物都因时运不齐而相繼夭亡了，那末这一潮流也許始終不会有什么出色的地方。但这种人物底夭亡是只有在此潮流不很深刻，以致不能提出一些新的英俊人物的場合，才会使其不能有相当的表現。可是，文艺中任何一个潮流底深度都要依它对于自身所代表其趣味的那个社会阶級或阶層底意义，以及这个阶級或阶層底社会作用如何来决定，所以这里的情形归根到底也是要依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力量对比关系为轉移的。

㊀ 見太納所著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Paris 1863, t. II, p. 5.

（八）

总之，領导人物底个人特点能决定各个历史事变底局部外貌，所以我們所說的那种偶然成分在这种事变进程中始終表現着相当的作用，但这种进程底趋势归根到底要由所謂普遍原因来决定，即实际上是由生产力底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轉移的社会經济生产过程中的人們相互关系来决定。偶然現象以及著名人物个人的特点，其表現要比深藏的一般原因显著得無比。十八世紀的人們很少想到这些一般原因，却把历史归因于历史人物底自覚举动和情欲。当时哲学家認为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因受某些极細微原因影响而完全变更其方向，譬如說，由于某个統治人物腦子里有某个"原子"作怪（这是"自然体系"一書里屢次表示过的一种意見）㊀。

历史学中新思潮的拥护者認为無論有怎样的"原子"，历史始終是只会循着它实际經过的那条路綫进展的。他們因极求强調一般原因底意义，竟把历史人物个人特点底意义完全忽略过去了。照他們那样說来，历史事变仿佛絲毫也不会因能力大小不一人物的交替而有所变更㊁。我們既認为可以这样假定，于是也就不免認定个人成分在历史上根本沒有什么作用，历史上所有一切都归因于一般原因底作用，都归因于历史发展一般規律底作用。这是走极端，是根本排斥相反观点中所包含的那一部分眞理。唯其如此，所以相反的观点也就仍然保留有某种存在的根据。这兩种观点間的冲突，表現成为兩个相反命題互相对立的局面：一个命題是一般規律，另一命題是个人底活动。从后一命題方面来看，历史不过是种种偶然現象底湊合；从前一命題方面来看，却会覚得甚至各个历史事变底局部特点都是

㊀ "自然体系"是法国傑出唯物哲学家霍尔巴赫（一七二三至一七八九）底主要著作。

㊁ 即是說，像他們那样推論历史事变規律性，就会要得出这样一种結論来。而他們中間有些人在簡單記述这种現象的时候，却甚至往往过分估計了个性底作用。但我們現在感覚兴趣的不是他們所作的記述，而是他們所作的推論。

由一般法則底作用来决定。如果你認为各个事变底局部特点都是由一般法則底作用所制約而与历史人物底个别特性無关，那你就不免要得出結論，說这种特点是由一般原因来决定，并且絲毫不会因历史人物改变而有所改变。于是这个理論就变成为宿命論。

反对这个理論的人們当然沒有放过它的这种弱点。聖毕夫把米涅底历史观点比作波綏㊀底历史观点。波綏認为决定历史事变的力量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历史事变是專供上帝表現其意旨的东西。米涅認为这种力量就是人类的情欲，这种情欲在历史事变中間是像自然界的力量那样不可遏止一往直前地表現出来的。但他們双方都把历史看作是一些絕对必然如此发生的現象所構成的一串連环；他們兩人都是宿命論者；在这一点上，哲学家实在是与牧师相近(le philosophe se rapproche du prêtre)。

当社会現象規律性的学說还根本否認历史上杰出人物底个别特点能对事变发生什么影响时，这种責难本来是有相当理由的。而且这种責难本来应当引起很大的印象，因为新的历史学派中的那些人也如十八世紀的史学家和哲学家一样，認为人类天性是最高的主体，所有历史运动底一般原因都从这个主体中間发生，并且是服从于这个主体的。既然法国革命已經表明历史事变不只是由人底自覚行为来决定，于是米涅，基佐以及屬于該派的其他学者就把往往不受意識所支配的情欲冲动提到了首位。既然說情欲是历史事变底最后最一般的原因，那末聖毕夫为什么又不能認定，說如果当时有一种人物能在法国人民中間激起一种与法国人民当时的情欲相反的情欲，則法国革命就会有其与实在結局相反的結局呢？米涅也許会要說：因为由于人类天性的关系，当时沒有其他情欲能激动法国人民。这种說法含有一部分眞理。但这一部分眞理帶有很鮮明的宿命論色彩，因为它無異是說人类历史所有一切詳情細节都是由人类天性底一般屬性預决的。在此場合，宿命論就会是專門注重一般而抹煞个体的

㊀ 波綏主教（一六二七至一七〇四），系法国哲学家兼著作家。

結果，并且始終都是这样抹煞的結果。有人說道："既然一切社会現象都是必然的，那末人們底活动都根本不能有什么作用了"。这是对于正确意思的一种不正确的表述。本来应該說：如果說一切都是一般原因所造成的結果，那末个别的成分——包括我的努力在內——就根本沒有什么作用。这样的結論本来正确，只是一班人把它运用得不正确罢了。用这种結論来評判現代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极不合理的，因为这个历史观对于个体作用也是予以承認的。但用这种結論去評判复辟时代法国史学家底观点却是有根据的。

現在已經不能把人类天性当作历史运动底終极的和最一般的原因看待了：如果說人类天性恒久不变，那它就不能解釋变化無穷的历史进程；如果說它常有变化，那它的这种变化本身又是由历史运动来决定的。現在应該把生产力发展情形看作人类历史运动底終极和最一般的原因，人类社会关系方面的历次变迁是由这种生产力决定的。除这种一般原因外，发生作用的还有一些特殊原因，即某个民族生产力发展进程所处的历史环境，但这种历史环境本身归根到底又是由其他民族共同的生产力发展狀况，即是由一般原因造成的。

末了，除特殊原因底影响而外，还有个别原因底作用，即社会活动家个人特点及其他"偶然性"底作用，因为有这些个别原因底作用，于是事变就具有其个别的外貌。个别的原因不能根本改变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底作用，而且个别原因影响底范圍和方向是由这种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所制約的。虽然如此，但如果影响了历史的那些个别原因已被别种个别原因所替代，那末这个历史無疑是会具有别一种外貌的。

莫諾和蘭普勒赫特兩人至今还是以人类天性为立脚点。蘭普勒赫特硬說，并且再三再四声言，說他認为社会心理是历史現象底根本原因。这是个严重的錯誤，正因为有这样一个錯誤，所以力求概括"全部社会生活总合"的那种本来值得嘉奬的志願，也就只能得出一种外表虽然美观，但內容却完全空虛的折衷主义結論，或是得出——在那些推論得最徹底的人們那里——像卡布里茨那样一种妄談理性

和感覚孰重孰輕的議論。

但我們还是言归正傳吧。一个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并不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各个偉大历史事变具有其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自己所具备的特性使他自己最能致力于当时在一般和特殊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偉大社会需要。卡尔来㊀在其論英雄人物的名著中，把偉人称呼为发起人（Beginners）。这个名称用得极其中肯。偉人确实是发起人，因为他的見識要比别人的远些，他的願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他把先前的社会理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紧急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所引起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担負起滿足这种需要的发起責任。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个英雄，并不是說他能阻止或改变客观自然事变进程，而是說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不自覚进程底自覚自由的表現。他的作用全在于此，他的力量全在于此。但这是种莫大的作用，是种极大的力量。

俾斯麦嘗說，吾人不能創造历史，而应該等候它自行造成。但历史究竟是由誰造成的呢？它是由社会人造成的，社会人是历史底唯一"因素"。社会人自己造成自己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但他在某一时期造成某种关系而不是造成别种关系，这当然不是沒有原因，而是由生产力发展狀况所制約的。沒有一个偉大人物能够强迫社会去接受已經不适合于这种生产力狀况的关系，或是接受还不适合于这种狀况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說，他确实不能創造历史，所以他在这种場合移动他的表針当然是徒劳無益的，因为他既不能把时間加速，也不能使时間倒退。蘭普勒赫特說得完全正确：俾斯麦在他威势最高的时候也是不能把德国推轉到自然經济时代去的。

社会关系有它自己的邏輯：当人們还处于某种相互关系时，他們的感覚、思維和行为也就一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一个社会活动家要想反对这种邏輯，也会是徒劳無益的，因为自然的客观事变行程（即这种社会关系邏輯）定会把他的一切努力化为烏有的。然而我

㊀ 卡尔来（一七九五至一八八一），系英国资产阶級著作家兼史学家。

如果知道社会关系因社会經济生产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化而朝着什么方向变更，我也就会知道社会心理將朝着什么方向变更，因此我就有可能影响这个心理了。影响社会心理，也就是影响历史事变。可見，在相当意义上說，我毕竟能够創造历史，因此我也就不必等候历史去"自行造成"。

据莫諾底意見，历史上眞正重大事变和人物之所以重大，只在于他們是社会机構和經济条件发展底符号和象征。这一意見頗为公允，不过表述得很不确切；但正因为这种意見公允，所以决不可把偉大人物底活动同这种条件和机構底"緩慢变动"对立起来。"經济条件"較为緩慢的变更过程，到一定的时候就会使社会必然要較为迅速地改造自己的机構。这种改造从来不是"自行"发生，而是始終需要由人們来干預的，因此人們担負有偉大的社会任务。所謂偉大人物，也就是最能帮助解决这种任务的人物。解决任务，当然不能只算是任务解决的"象征"和"符号"。

我們覺得，莫諾之所以竟把兩者对立起来，主要是因为他为"緩慢"这一惯意的字眼迷住了。这个字眼是很多現代进化論者所愛用的字眼。这种偏頗态度在心理上很容易解釋：它是必然要在那些崇尚溫和客气的体面人們中間产生的。但它在邏輯上根本不值一駁，黑格尔早已就指出这点了。

并且不仅那些"发起人"，不仅那些"偉大"人物拥有大显身手的广大活动場所。凡是願用眼睛来看，願用耳朵来听，願拿一顆誠摯的心来爱护亲近人的人，都拥有这种場所。"偉大"一語是个相对的概念。在道义方面說，每一个如聖經上所說願意"舍己救人"的人都是偉大的。

（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單行本排印）

第四部分

关於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青年运动的方向*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毛　泽　东

今天是五四运动的二十周年紀念日，我們延安的全体青年在这里开这个紀念大会，我就来講一講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几个問題。

第一，現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㊀。“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說，它表示我們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轉变点了。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敗了，这种情形，現在要来一个轉变，不是再来一次失敗，而是要轉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現在中国的革命正在前进着，正在向着

---

* 这是毛澤东同志在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紀念会上的講演。毛澤东同志在这个講演中發展了关于中国革命問題的思想。

㊀ 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原是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組織所規定的。那时国民党在广大的青年群众的爱国高潮的压迫下，也同意了这个規定。后来国民党畏懼青年的革命化，覺得这个規定很危險，又改定以三月二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广州黃花岡革命烈士紀念日）为青年的节日。但在共产党領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則繼續以五月四日为青年的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胜利前进。历史上多次失敗的情形，不能再繼續了，也决不能讓它再繼續了，而要使它轉变为胜利。那末，現在已經轉变了沒有呢？沒有。这一个轉变，現在还沒有到来，現在我們还沒有胜利。但是胜利是可以爭取到来的。抗日战爭就要努力达到这个由失敗到胜利的轉变点。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結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話，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錯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該打倒。你們看，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滿清政府，并且推翻了滿清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結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該这样去認識五四运动。現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鑒于过去革命失敗的經驗，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敗，并且不容許再有卖国賊，不容許革命再失敗。全国的青年除了一部分人之外，大家都覚悟起来，都具备这种必胜的决心，規定"五四"为青年节就表示了这一点。我們正向胜利的路上前进，只要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中国革命一定要在抗日过程中得到胜利。

第二，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現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倒汉奸。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無产阶級，有农民阶級，还有其他阶級中一切願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們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許多人中間，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中国革命的性質是什么？我們現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們現在干的是資产阶級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們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范圍。現在还不应該破坏一般資产阶級的私有財产制，要破坏的是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資产阶級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資产阶級已經無力完成，必須靠無产阶級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現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將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資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許資本家存在。中国是否永远要資本家呢？不是的，將来一定不要。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將来都統統不要資本家，中国也不能例外。苏联是建設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將来全世界統統要跟它走，那是沒有疑义的。中国將来一定要發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誰都不能推翻。但是我們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現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全国青年应当为此而努力。

第三，过去中国革命的經驗教訓怎么样呢？这也是青年要懂得的一个重要問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資产阶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經五十多年了；至于資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則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爭，从鴉片战爭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爭，有甲午战爭，有戊戌維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爭，有紅軍战爭，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現狀的。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較明确的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趕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沒有完成。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敗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

义的統治之下。北伐战爭的革命也是一样，它胜利了，但又失敗了。国民党反共㊀以来，中国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天下。于是不得不有十年的紅軍战爭。但是这十年的奋斗，也只完成了局部的革命任务，还沒有完成全国的革命任务。如果我們把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做一个总結，那便是只得到了暫时的部分的胜利，沒有永久的全国的胜利。正如孙中山先生說过的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現在要問：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兩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沒有胜利。所謂敌人的力量太强，是說帝国主义（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所謂自己的力量太弱，有軍事、政治、經济、文化各方面表現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沒有动員起来，所以表現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結，那就是全国人民沒有充分地动員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殘这种动員。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員起来，組織起来，才有可能。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里說："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連同他說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經驗教訓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喚起民众"这一条道理。你們应該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国青年都应該好生研究。青年們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員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現在我們要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員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

第四，我再講到青年运动。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們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發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們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鋒

㊀ 指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南京和汪精衛在武汉所發动的反革命政变。

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頑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認的。什么叫做先鋒队的作用？就是帶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識青年們和学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队。这支軍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軍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軍，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軍。但是光靠这个方面軍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軍。主力軍是誰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識青年們和学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員起来，組織起来。沒有工农这个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軍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識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結合在一塊，和他們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軍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軍队呵！有了这支大軍，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陣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壘。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就应該指出一种錯誤的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們不願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他們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們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們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說，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的青年运动，是沒有好結果的。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㊀，我在那里說过这样一句話："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結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認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結合在一塊。願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

㊀ 指"五四运动"一文。

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講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們看，希特勒不是也講“信仰社会主义”嗎？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們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馬克思主义嗎？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張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馬克思主义嗎？他現在到那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們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們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結帝国主义；他們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們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們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眞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眞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沒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記不要墮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認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軍。

第五，現在的抗日战爭，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偉大、最活躍、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青年們在这个阶段里，是負担了重大的責任的。我們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經过了許多的奋斗阶段，但是沒有一次像現在的抗日战爭这样广大的。我們認为現在的中国革命有和过去不同的特点，它將从失敗轉变到胜利，就是指的中国的广大的人民进步了，青年的进步就是明証。因此，这次抗日战爭是一定要胜利的，非胜利不可。大家知道，抗日战爭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現在中国青年运动的不統一，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你們应該繼續要求統一，因为統一才有力量。你們要使全国青年知道現在的形势，实行团結，抗日到底。

最后，第六，我要說到延安的青年运动。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

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你們看，在統一方面，延安的青年們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們是团結的，是統一的。延安的知識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結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間，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論姓張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的模范嗎？延安的青年們不但本身团結，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結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們干了些什么呢？他們在学习革命的理論，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們在实行生产运动，开發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連孔夫子也沒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賢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謂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請教如何耕田，他就說："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問如何种菜，他又說："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聖人那里讀書的青年們，不但沒有学过革命的理論，而且不实行劳动。現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論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講。只有我們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們根本不同，他們眞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們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說，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今天的大会很有意思。我要講的都講过了。希望大家把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經驗研究一下，把好的地方發揮起来，把錯誤去掉，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結合起来，使革命由失敗轉变到胜利。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發动起来、組織起来、团結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負这个責任。每个青年現在必須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結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組織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們的。

（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二卷排印）

大量吸收知識分子*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毛　泽　东

一、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战爭中，在建立新中国的偉大斗爭中，共产党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战力量，組織千百万农民群众，發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战綫。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二、三年以来，我党我軍在吸收知識分子方面，已經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参加党，参加軍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發展了統一战綫，这是一个大的成績。但許多軍队中的干部，还沒有注意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許多我們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許多地方党部，还不願意吸收知識分子入党。这种現象的發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識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識分子和資本主义国家的知識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資产阶級服务的知識分子和为工农阶級服务的知識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資产阶級政党正在拚命地同我們爭夺知識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識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們的党和軍队已經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識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三、因此，今后应該注意：（1）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軍队，应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队，加入我們的学校，加入政府工

* 这是毛澤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的一个决定。

作。只要是願意抗日的比較忠实的比較能吃苦耐劳的知識分子，都应該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們在战爭中在工作中去磨練，使他們为軍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將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願入党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也应該同他們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帶領他們一道工作。(2)在这种大量吸收政策之下，毫無疑义应該充分注意拒絕敌人和資产阶級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絕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絕，应取严肃的态度。这类分子已經混进我們的党、我們的軍队和政府者，則应依靠眞憑实据，坚决地有分别地洗刷出去。但不要因此而怀疑那些比較忠实的知識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3) 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較忠实的知識分子，应該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該好好地教育他們，帶領他們，在長期斗爭中逐漸克服他們的弱点，使他們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們同老党員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們同工农党員融洽起来。(4) 对于一部分反对知識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則应該切实地說服他們，使他們懂得吸收知識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同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識分子化和知識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現起来。(5)在国民党統治区和日寇占領区，基本上适用上述原則，但吸收知識分子入党时，应更多注意其忠实的程度，以保証党的組織更加严密。对于广大的同情我們的党外知識分子，則应該同他們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們組織到抗日和民主的偉大斗爭中去，組織到文化运动中去，組織到統一战綫的工作中去。

四、全党同志必須認識，对于知識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們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許多地方許多軍队对于知識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無产阶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識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級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問題。

（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二版“毛澤东选集”第二卷排印）

丢掉幻想，准备斗爭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新華社社論

美国的白皮書在現在这个时候發表，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敗。它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內部的矛盾重重，無法克服，使他們自己陷入了极大的苦悶中。

帝国主义給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內的人民大众，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驅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偉大斗爭的历史时代。

帝国主义替这些人民大众准备了物質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工厂，鉄道，槍炮等等，这些是物質条件。中国人民解放軍的强大的物質裝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从日本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自从一八四〇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接着就是法国进攻中国的战爭，英法联軍进攻中国的战爭，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軍进攻中国的战爭，日本进攻中国的战爭，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領土內进行的战爭，一九三一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中国东四省的战爭，一九三七年开始繼續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爭，最后是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蔣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的战爭。这最后一次战爭，美国政府的白皮書上說，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質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金錢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在軍事方面，供給了国民党政府的“軍需品的大部分”，这就是美国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

战爭。所有这一切侵略战爭，加上政治上，經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精神發揚起来，从斗爭中团結起来，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积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积几百次大小斗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沒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給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資本，并因而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經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資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資产阶級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無产阶級。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換的方法剝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給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計的貧农大群众，貧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給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錢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員、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員，都造反了，或者不願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無孔不入地宣傳为杀人放火，奸淫搶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長，不講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惡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奇怪的，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們的拥护。

有一部分知識分子还要看一看。他們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說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們对美国存着幻想。他們不願意將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們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

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語所欺騙，似乎不經过严重的長期的斗爭，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講平等，講互利。他們的头腦中尚殘留着許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們是除了国民党反动派以外的人民中国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逊白皮書中所說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們的欺騙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層薄薄的社会基础。

艾奇逊的白皮書表示，美国帝国主义者們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無办法了。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無論帮它多少总是命定地完蛋了，他們不能控制了，他們無可奈何了。艾奇逊說："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內战的不幸結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它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內所曾經做过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变这个結果。美国所未做的，对于这个結果也沒有影响。这是中国內部勢力的产物。这些勢力，美国亦曾試圖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

按照邏輯，艾奇逊的結論应該照着中国某些思想糊塗的人們的想法或說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盜收心做好人"，給人民的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搗乱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逊說，还是要搗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搗乱。效果呢？据說是会有的。依靠什么一批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說："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終將再度胜利，中国終將推翻外来制度。我認为我們应当在中国鼓励現在或將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

帝国主义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这样的不同。搗乱，失敗，再搗乱，再失敗，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邏輯，他們决不会違背这个邏輯的。这是一条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們說"帝国主义是很凶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灭亡。

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决不会違背这个邏輯的。这是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

是依照这条定律。

阶級斗爭，一些阶級胜利了，一些阶級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釋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自我批評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內部，希望劝說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斗爭，例如我們的人民解放战爭，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們，把他們打倒，制裁他們的犯法行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乱說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經繳械了的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級分子、官僚資产阶級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們給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們变成好人。中国的許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尔、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屬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問題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統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問題的緣故。

先进的人們，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覚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去团結人民中国內部的中間阶層、中間派、各阶層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着的人們（这些人們还要長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們，批評他們的动摇性，教育他們，爭取他們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讓帝国主义把他們拉过去，叫他們丢掉幻想，准备斗爭。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眞正地爭取这些人。爭取了他們，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遜的一套就無所施其伎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就可以巩固了，国家建設的工作就可以順利地进行了，封鎖、水灾、失业、通貨膨脹、物价上漲等等困难就易于克服了。

1804

"准备斗爭"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問題上，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問題上尚存有某些幻想的人們說的，他們在这个問題上还是被动的，还沒有下决心，还沒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長期斗爭的决心，因为他們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問題上他們和我們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書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給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滿，或有某些不滿，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丢了他們的臉，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

艾奇遜公开說，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再度获胜，推翻所謂"外来制度"。这就是說要推翻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領导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因为据說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来"的，在中国沒有根的，是德国的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把他們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級斗爭，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須推翻。这种"推翻"的工作，經杜魯門总統，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遜国务卿(即經手发布白皮書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滾蛋大使們一"鼓励"，經过"民主个人主义"之手，据說"終將再度胜利"。艾奇遜們認为这是在做"鼓励"工作，但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們認为是一瓢冷水，使他們感覚丢臉：不和中国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帳工作，而且公开写在白皮書上，丢臉，丢臉！对于有爱国心的人們說来，艾奇遜的話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騰騰，有良好条件去爭取和团結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無深仇大恨，但有錯誤思想的人們。先进的人們就应利用白皮書，向一切这样的人們进行說服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

（一）經济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了基本胜利，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設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已經出現了大躍进的形势。为了徹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为了实現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必須“在繼續进行經济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中国共产党第八屆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决議）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躍进，文化革命已經开始进入高潮，这主要表現在全国扫盲运动、教育事业和各种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正确地領导教育工作，坚持党的教育工作的方針，反对右傾思想和教条主义，調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計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阶級知識分子的队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任务之一。

（二）全国解放九年以来，我国教育工作在党的領导之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这些成績是：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了教育主权；妥善地接收了全国的学校；取消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学校的法西斯管理制度和对学生的法西斯教育和特务統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基本上肅清了隐藏在教育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学校中开設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課程；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了思想改造；进行了院系調整和教学改革；进行了反对資产阶級右派的斗爭；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都增加几倍；扫盲运动和业余的文化技术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学校中开始普遍地实行了勤工俭学；在教育工作者的队伍中建立了党的組織；为社会主义

建設培养了大量的干部。在教育工作崗位上，絕大多数的同志是努力执行了党的指示的。成績是主要的，但是，教育工作在一定的时期内曾經犯过教育脫离生产劳动、脫离实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忽視政治、忽視党的領导的錯誤。九年的工作，使我們得到了經驗，并且使我們有可能更加明确地和系統地提出党和国家的教育工作方針，以便团結全党和一切可能团結的教育工作者，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右傾思想和教条主义思想，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而奋斗。

（三）党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为無产阶級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結合；为了实現这个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党来領导。沒有党的領导，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不能設想的。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設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教育工作必須在党的領导之下，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服务，为消灭一切剝削阶級和一切剝削制度的残余服务，为建設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消灭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服务。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就是既有政治覚悟又有文化的、既能从事腦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不是旧社会的只專不紅，脫离生产劳动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党所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覚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口号，正确地解釋了“全面发展”的涵意。必須在党的領导之下，团結全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和广大的知識分子，同“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和“教育只能由專家領导”的資产阶級思想进行坚决的斗爭。党的教育工作方針同資产阶級教育工作方針之間的斗爭，按其性質来說，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資本主义道路兩条道路之間的斗爭。

在一切学校中，必須进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級的阶級观点（同資产阶級进行斗爭），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同个人主义观点进行斗爭），劳动观点即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結合的观点（同輕視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主張劳心劳力分离的观点进行斗爭），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进行斗爭）。必須改变政治教育中脫离我国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实际、脫离具体教育对象的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評判学生学习成績的时候，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覚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覚悟的程度。輕視政治思想工作，和拒絕在学校中設政治課，不論用什么借口，都是錯誤的。

在一切学校中，必須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課程。每个学生必須依照規定参加一定时間的劳动。現在勤工儉学的运动已經普遍开展起来了，事实証明，只要領导得好，参加生产劳动对学生来說，不論在德育、智育或体育方面都有好处，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的一条正确道路。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場，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和农場，可以自己办，也可以协助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生可以在学校自办的工厂和农場中劳动，也可以到校外的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去参加劳动。学校办工厂和农場，要尽可能注意同教学結合。学校也要协助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开办学校。地方党委和政府，应当把学校所办的工厂和农場，納入地方的生产計划和商业銷售計划，对它們供給原料和推銷它們的产品，派技术工人去傳授生产技术，并注意指导和組織他們的生产。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可以訓練工厂和农业合作社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也应該为其他工业部門或农业部門訓練人才；应該注意办技术学校，也应該注意办普通学校来提高所有人員的文化水平，因为这是实現文化革命所必需的，是实現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所必需的。这种学校也应該納入地方的教育計划，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注意領导这种学校，帮助他們逐步解决师資方面的困难，特别是解决基础課程的师資的困难。在缺乏劳动的学校里强調劳动，在缺乏基础課程的学校里强調基础課程，使兩种学校都向自己所缺乏的方面发展，逐步向理論与实际的更完善的結合前进。为了訓練大量称职的师資，县以上的各級党委和人民委員会都必須发展师范教育。

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該受党委的領导；党委应該注意在学校师生中发展党和青年团的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所屬

的学校，在政治上应該受当地党委的領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領导下的校务委員会負責制；一長制容易脫离党委領导，所以是不妥当的。学校党委，应当配备党員去領导級和班的工作、配备党員去做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行政工作和生产管理工作，党委書記和委員力求担任政治課的教学、研究工作。学校党委应当在教师中經常注意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在提拔师資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政治思想条件、学識水平和解决实际問題的能力，資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鑒定学生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政治覚悟的程度，解决实际問題的能力，同时也注意課內学习的成績。一切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也应該放在党委的領导之下。为了加强党在教育事业中的領导，各級党委要輸送一批干部到教育机关和学校中去。

（四）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必須动員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有中央的积极性，又要有地方的积极性和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为此必須采取統一性与多样性相結合，普及与提高相結合，全面規划与地方分权相結合的原則：

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覚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全国統一的，違反这个統一性，就破坏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則。但是，在这个統一的目标下，办学的形式应該是多样性的，即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兒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讀、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免費的教育与不免費的教育并举。这就是說，全国將有三类主要的学校：第一类是全日制的学校，第二类是半工半讀的学校，第三类是各种形式的业余学习的学校。

乙、三类学校中，有一部分要担負提高的任务。这部分学校必須有完备的課程，注意提高自己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質量，提高各門学科的水平。这些学校应該在不損害原有水平的情况下，努力帮助建設新校的工作，但降低这些学校的水平，对整个教育事业来說是不利的。为了很快地普及教育，应当大量发展业余的文化技

术学校和半工半讀的学校，因为这种学校可以全部或者大部解决自己的經費，很少需要或者不需要政府的帮助，因为这种学校可以按照"能者为师"的原則就地找到师資。現在用大量发展业余的文化技术学校和半工半讀的学校的形式来普及教育，对于提高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提高广大人民的政治覚悟和文化水平，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学校將要逐漸成为在課程、設备、师資等方面日益完备的学校。业余学校在將来有远大的前途，随着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劳动时間將会縮短，这时候，业余学校和半工半讀的学校就沒有区别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公共积累的增多，收費的学校也將变为免費的学校。我們的原則，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是"兩条腿走路"，不是"一条腿走路"。

丙、为了在教育工作中既能发揮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的积极性，又能发揮地方的积极性，全部的小学中学和大部分的高等学校、中等專业学校、技工学校，已經下放給省、市、自治区管理；仍屬中央各部的中等專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也应当由各部下放給各部所直接領导的厂矿、企业、农場管理。

各大协作区应該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該逐漸建立起这种比較完整的教育体系。然后，每个專区、每个县也应該这样做。各省、市、自治区有責任滿足中央各部所屬学校的招生任务，教育事业发达的地区有帮助教育事业落后的地区的責任，教育事业落后的地区要尽力在三年至五年內做到不向别的省、市、自治区招生。中央教育部負責全国教育事业的綜合規划和平衡。

現行的学制是需要积极地和妥当地加以改革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政府有权对新的学制积极进行典型試驗，并报告中央教育部。經过典型試驗取得充分的經驗之后，应当規定全国通行的新学制。

高等学校的教材，应該在党委領导下采取党委、教师、学生"三結合"的方法，經过大鳴大放大爭大辯，認眞予以修訂。中小学教科書，

由各省、市、自治区組織力量編写，編写时应当結合当地具体情况。中央教育部应召开各种教材的專門会議，交流經驗，推荐較好的教材，确定全国应該通用的那一部分教材，确定各类学校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的科目。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的日期，是七月下半月和八月上半月。在这个統一規定下，各省、市、自治区有权依照当地的情况規定本地区的学历，报告中央教育部。廢除全国統一的学历。

地方党委应当組織学校同工业、农业、商业、文化事业、科学研究事业等各方面的协作。

关于职权下放后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协作問題，依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問題的規定”办理。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中的特殊問題，由省、市、自治区作出决定，报告中央教育部。

(五)教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而需要教育事业的。办教育需要依靠專門的队伍，沒有强大的專門队伍是不行的。但是，教育工作的專門的队伍必須与群众結合，办教育更必須依靠群众。把教育工作神秘化，以为只有專家才能办教育，“外行不能領导內行”，“党委不懂教育”，“群众不懂教育”，“学生不能批評先生”，那就是錯誤的。这种迷信，只能妨碍教育成为人民群众的事业，妨碍教育工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因而也妨碍教育工作的发展和进步。办教育应当在党委領导之下，把專业的教育工作者同群众結合起来，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綫的方法，貫徹全党全民办学。

在学校內部，在政治工作、管理工作、教学工作、研究工作等方面，也应該貫徹党委領导下的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

1、大鳴大放，大字报，应当成为一切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提高师生政治覺悟、改进教学方法和教育管理工作、提高教学質量，加强师生团結的普遍和經常采用的方法。

2、制定学校教育計划，制定教学大綱的时候，应当采取党委領导之下教师与学生結合的方法。

3、对学生进行鑒定、評定学生助学金等的时候，也应当采取在党委領导下，师生結合的方法。

4、教授課程必須貫徹执行理論与实际联系的原則，应当在党委領导之下，尽可能采取聘請有实际經驗的人（干部、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土）專家）同專业教师共同授課的方法。

5、学校領导人員要尽可能在生活和劳动中同学生打成一片。党和团的工作者、政治課教师，应当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学校的財政、建設計划等，应該向全体师生員工公开，使师生員工能参加管理工作。

6、应当在教师与学生之間建立民主的平等的关系。教师应該接近学生，經常了解学生的情况，針对实际情况施行教育，要把“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結合起来。

科学研究，应当实行“百家爭鳴”的方針。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各系的高年級中，应当設立一些介紹或批判資产阶級学說的課程，树立对立面。

必須坚持勤俭办学的原則。把学校的經費用于教学，用于生产，尽量減少用于对改善教学工作和增加与生产無关的項目的經費。

（六）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間內，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兒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兒所和幼兒园的任务。应当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爭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間內，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願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我們將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間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間来从事提高的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和全体教育工作者，为完成这个文化革命的光荣任务而努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員会，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規划。

（原載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紅旗”杂志發刊詞

在無产阶級領导下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兩次偉大胜利，使中国从長期沉眠不醒的狀态中翻过身来。正如毛澤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所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現在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發展处在空前的大躍进的时代。革命正在繼續为社会生产力的發展扫清道路。在具有冲天气概的中国人民面前，高山低头，河水讓路。凡是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發展的老制度和陈腐观念，都要死亡；凡是适合社会生产力發展的新制度和新思想，都在發出自己的生命的威力。

“紅旗”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它在中国的这个新形势下創刊，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無产阶級在思想界的革命紅旗。毫無疑問，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資产阶級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無产阶級的旗帜。

中国無产阶級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就已經在中国思想界举起了自己的紅旗。中国人民在这个旗帜的引导下胜利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內主要的斗爭是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的斗爭，社会主义道路和資本主义道路的斗爭。無产阶級要在这个斗爭中取得徹底的胜利，就必須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展开思想战綫的斗爭，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破除迷信，厚今薄古，打破旧傳統，粉碎資产阶級的伪科学，从而把中国人民从資产阶級思想的束縛下面完全解放出来。

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个别人在書齋中的空想的产物，而是人民群众的斗爭經驗的总結。它是理論和实踐的統一，是高度科学性和

高度革命性的統一。它本身集中了劳动人民和整个人类所积累的知識，反映着無产阶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偉大創造性和偉大革命毅力。因此，它反过来成为人民群众斗爭的指南。中国共产党的領袖毛澤东同志經常教育全党，要象列宁那样，善于密切地联系群众，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把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眞理和具体实踐結合起来，尊重新鮮的事物，敢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問題，解决問題，坚持眞理，坚决地同修正主义和一切脫离馬克思主义軌道的思潮决裂。“紅旗”杂志在自己的工作中，將遵循着毛澤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

我們相信，在党的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所制定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照耀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的領导下，在全党同志和党外的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下，“紅旗”杂志將一定能够努力完成它所应当担負的任务。

1814

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召开的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会議上）

周　恩　来

（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二月單行本）

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国共产党
第八届中央委員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議上）

鄧　小　平

（二）关于資产階級和知識分子

……

（三）关于農村

……

（四）关于工人階級

……

（見本書第六三八至六五三頁）

教育者必須受教育

——談知識分子的改造

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社論

馬克思在"費尔巴哈論綱"中說，"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必須受教育。"我們正在进行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在这偉大的事业中，知識分子將日益發揮重要的作用。为了使知識分子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須加强对知識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馬克思的話給了我們以深刻的啓示。

我們的党和政府向来是重視知識分子的。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圍內对于知識分子实行了团結、教育、改造的政策，充分注意使用知識分子，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在团結、教育、改造旧的知識分子的同时，党用了很大力量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識分子，其中已有相当数量从劳动阶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目前，我国知識界的面貌已經發生了根本的变化。

但是，知識分子的思想狀况，同他們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应的。在我国几百万知識分子中，还只有少数人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比較熟悉；多数人願意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学得还很少。这些人都是爱国主义者。还有少数人也爱国，也願意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不願意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除此以外，当然也还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不很欢迎，甚至保持敌对的情緒。

一部分知識分子还沒有接受或者还不贊成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狀况在很長的时間內都会存在。如果不承認这种狀况，我們就会

要求过高，要求得不合理，而且就会把自己的任务降低甚至取消。如果所有的人都是馬克思主义者了，还有什么宣傳馬克思主义的任务呢？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有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的，是認为知識分子应当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知識分子的学习只能通过自願。在人民內部的問題上，在思想性質的問題上，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

知識分子是人民的先生。但是，教育人民的人先要受教育，不受教育就無法去教育广大群众。时代变了，并且在迅速地前进着。知識分子如果不丢掉过时的旧东西，不研究新問題，不接受新事物，他就会脫离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找不到共同語言，他就会一事無成，根本談不到去作人民的什么先生。事实上，知識分子本身，就大多数来說，現在对于这一点也已經有深切的感受了。認为知識分子不需要受教育、不需要改造的人，不但是极少数，而且也难于得到多数人的共鳴。

知識分子要学些什么呢？要学的东西自然很多；但是我們認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是不可缺少的。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論。只有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观察事物，处理問題，才能不犯錯誤，才能扫除思想上資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应当包括党內和党外的知識分子。我們知道，共产党員中能够眞正懂得并且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也还很少，甚至还有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比如犯教条主义毛病的人就是。而且，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断發展的。我們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另一方面，非党的知識分子，也完全可能成为眞正的馬克思主义者。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魯迅，就是一个非党的馬克思主义者。因此，知識分子不但应当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可以学得很好。而且，由于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們的社会生活中的灵魂，是我們国家生活中的指导思想，知識分子作为国家公民来說，無論自覚不自覚，無論願意不願意，每天都

在受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每天在我們的生活中都在得到証实。因此，即使有的知識分子現在还不贊成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只要他願意忠于客观眞理，我們相信，他也一定会逐步接近和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

自然，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知識分子在自願基础上的自我教育。所謂知識分子的改造，乃是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我們党的責任，是要在人們願意的条件下，进行好心的和切实有效的帮助，帮助他們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而不是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强加于人。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断發展的，因此学习应当結合实际，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习，实踐；再实踐，再学习；边做学生，边做先生；逐步学会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全面地分析問題。在学习过程中，要提倡思想見面，展开批評和自我批評，这样才能清除旧思想，树立新思想。

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也是树立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且，一般地說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直接和广泛。对于非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識分子来說，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树立往往是不容易的。知識分子要走下心灵深处的"小資产阶級王国"的宝座，到工厂、农村中去，去感受劳动人民的呼吸，观察社会生活的脉搏的跳动。这样，就有可能从書本上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变成眞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果大家都学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便有了共同的語言，对于教育人民，順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將会起极大的作用。我們已經看到，許多高級知識分子走到工厂和农村去了以后，改变了他們原来片面的看問題的观点，端正了思想認識。有一位知識分子說得好，"交尽天下良友，讀尽人間奇書。今天的奇書，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辯証法。今天的良友，就是工农群众和劳动的知識分子。"

为了便利知識分子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各地党的組織应当积极准备条件。目前，各地中共党委按照自願和联系业务的原则，規定

一些必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課程，采取自学、上夜大学、函授学校、政治学校、科学討論会、报告会、学习組等方法，来帮助知識分子学习理論。民主党派对于所联系的群众——知識分子，也已經注意运用各种方法，帮助大家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协全国委員会已經創办了社会主义学院，負有教育、改造、团結知識分子任务的各人民团体和政协地方委員会，都要把組織知識分子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社会生活实踐作为自己經常的工作。各地应当繼續組織这些学习。学习的指导人应当具有一定的水平，学习的計划和方法要适合各类知識分子的需要。只要我們采取积极的、热誠的和謹慎的态度，我們就一定可以帮助全国几百万知識分子在当前的偉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实現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光荣使命。

投入体力劳动——共产主义的大熔爐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論

整风运动最偉大的成果之一，就是通过干部普遍参加体力劳动，扫除了我們許多干部身上存在的最危险的脫离群众的作风，使得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空前改善，大为密切了。

参加体力劳动，本来是我們革命队伍的光荣傳統。不論是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抗日战爭时期，还是第三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革命干部从来都用一部分时間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帮助群众生产，或者自己組織生产。这种生产活动不仅增加了財富，克服了困难，更重要的是大大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全国解放以后，我們所处的环境有了根本的变化，于是，就漸漸地出現了一股歪风，发出了一种怪論，說革命队伍有个严重的缺点，就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于是就提倡所謂"正規化"。結果革命队伍中的有些傳統，比如参加体力劳动的傳統，被反掉了。实际上所謂"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主要就是指的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这种光荣傳統，而所謂正規化，主要就是"官僚化"。这样，干部同群众的联系減少了，干部的官气增加了。

干部和群众，由于所处領导和被領导的地位不同，又由于分工不同，因而他們之間会有距离，会产生隔閡。而这种分工，又为社会发展所需要，革命事业所需要。問題是我們如何对待这种情况，是努力消除这种隔閡呢？还是保持这种隔閡？是恢复我們的光荣傳統呢？还是放棄这种光荣傳統？我們党坚决采取了前一种办法。我們的党中央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后，又在

五月十日发出了关于各級領导人員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要各級領导人員把参加体力劳动作为改进領导工作，加强同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方法。这一指示，很快得到全体干部的响应。于是农业中的种試驗田的方法普遍推广了，工业中的"兩参一改"也逐步推广了；全国一百多万干部下放劳动鍛煉了。这就把干部和群众之間的距离大大縮短了，隔閡根本打破了。于是在全国范圍內就形成了干部和群众眞正打成一片的新气象。

毛澤东同志在"論联合政府"中指出：只要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們，而只会被我們所压倒。"無数历史事实，特别是全国大躍进以来的事实，最好地証明了毛澤东同志的正确論断。不管是阶級敌人或是自然界敌人，都抵擋不了我們的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偉大力量。因此，应該肯定，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在新的形势下，我們党改造干部思想作风的极大胜利，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极大成功。根据这个成功的經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作了决定，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进一步制度化，这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措施。

劳动人民不但同那些沾染上官气的干部之間存在着矛盾，特别同那些沒有無产阶級化的知識分子干部之間存在着矛盾。而这种沒有無产阶級化的知識分子干部，在我們革命队伍中比重很大，据中央国家机关及其所屬企业事业單位的統計和北京市級机关及其所屬企业事业單位的統計，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之后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識分子，占全体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这批干部由于沒有經过革命战爭和严重的革命斗爭的鍛煉，也沒有經过生产劳动的鍛煉，很多人并沒有無产阶級化，在他們的思想意識、习慣的深处，还保存着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的坏影响。他們虽然是革命干部，也具有革命性，但是这种革命性同無产阶級革命性却不相同。正如中共六屆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决議中所指出的："任何沒有無产阶級化的小資产阶級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質上和無产阶級革命性不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狀态。"輕視体力劳动，輕視体力劳动

者，便是这些知識分子共同的特点。而这些知識分子思想上作风上的很多缺点是和这个特点分不开的。因此，讓这些知識分子干部到体力劳动中去，到体力劳动者中間去，是改造他們的思想，促使他們更快地無产阶級化的根本方法，也是消除知識分子干部同劳动人民之間的矛盾，并使他們打成一片的根本方法。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还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就是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創造条件。体力劳动，从来就是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根本条件。試想，我們哪一項物質文明能够离开体力劳动？哪一种精神享受可以离开体力劳动？可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阶級社会中，体力劳动一直被鄙視。那时候，不但脑力劳动者鄙視体力劳动，甚至体力劳动者也鄙視体力劳动。于是，鄙視体力劳动便成为一种可怕的习慣势力。这种习慣势力，一直到人們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今天，还是那样根深蒂固地盤踞在許多人的思想意識中。我們要建設共产主义社会，就得从根本上冲破这种习慣势力。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要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如何消灭呢？过去在这个問題上还存在着一个糊塗观念，仿佛要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只是体力劳动者單方面的問題，只是把体力劳动者提高到工程师、技师水平的問題；而脑力劳动者是不是需要学习体力劳动的技能，是不是需要养成体力劳动的习慣？这却沒有人注意。显然，这种观点是錯誤的，它仍然反映了对体力劳动的不够重視。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必須兩方面共同努力，既要求体力劳动者进行脑力劳动，也要求脑力劳动者进行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不进行脑力劳动，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同样，脑力劳动者不进行体力劳动，也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因此，在体力劳动者开始进行脑力劳动的同时，作为脑力劳动者一部分的干部，也应該經常进行体力劳动。

將来随着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随着阶級的消灭和阶級斗爭的消灭，党和国家一定要消亡下去。那么像現在这样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員，一定也要成为社会上的普通公民。到共产主义社会，虽然

也还会有管理公共事务和管理經济事务的工作人員，但这种人員的数量較之国家存在时的工作人員的数量一定会大大减少。而且，由于广大群众共产主义覚悟的大大提高，文化知識和生产技术的全面发展，正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書中指出的，輪流担任社会公职的情况一定会出現。像現在这样，工作人員成为一部分人的終身职业的情况就一定会改变。現在，当我們国家还远沒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在企业中已經大量地出現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現象，甚至像山西阳泉市中陶瓷厂已經創造了"人人是劳动者，人人是管理者"的無脫产干部管理企业的經驗。这就是將来共产主义社会中輪流担任公职，甚至有些地方完全取消公职制度的萌芽。可以断定，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全民皆兵"，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說是"全民皆官"。到那时候，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就將最后地完全地溶合起来。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結合在我国已經有十分巨大的进展。工厂和人民公社正在兴起一个办学校的高潮，各种学校也在兴起一个办工厂和办农場的高潮。而且在国家机关大大减少脫产干部的同时，几百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和工厂，所有干部参加一定时期的体力劳动，以及机关团体大办工厂和农場，这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密切結合的新气象，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間的差别在逐漸消失的新趋势。

早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前，法国的社会主义先驅者傅立叶就曾指出：爱好劳动本来就是每一个人的天性，并且証明劳动和享受具有同一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肯定了这种論断，并且預言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將从"沉重的負担变成愉快"，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类的这种崇高的理想，不仅要在我們这一代人的手里开始，而且要在我們这一代人的手里完成。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員，不仅要从現实的需要来理解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偉大意义，还要从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需要来理解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偉大意义。

体力劳动，这对脑力劳动者来說，是一座共产主义的大熔爐。在

这里不仅可以紅，也可以專，不仅可以改造領导作风和思想意識，还可以学得实踐經驗和生产技术。共产主义不需要的东西，將在鍛煉中消灭，共产主义需要的东西，將在鍛煉中成長。所有国家工作人員，都应該自覚的投入这个熔爐中去。

搞臭資产阶級的个人主义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社論

双反运动在知識界已經形成爭取紅透專深的运动了，这是必需的。如果知識分子不紅透專深，我国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就不能实現。但是，要做到紅透專深，必須破除思想障碍。而最大的思想障碍就是資产阶級的个人主义。因为在我国所有制改变还不久，資产阶級的个人主义思想影响还很严重，即使在共产党員之中，也存在着这种思想。这个运动对于共产党員或者非共产党員都是一样的，这不是誰来教育誰的問題，而是每一个人都应当进行自我教育，并且教育别人。

目前，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还严重地束縛着許多知識分子。那些騙人的"为科学而科学"啦，"为艺术而艺术"啦，"个人自由"啦，"清高"啦，"力爭成为世界聞名的科学家"啦，"一本書"啦，各种口号不一而足。这些口号帶着很濃烈的麻醉作用。在这种种口号之下，知識分子自我陶醉了，它麻醉了自己，又麻醉了青年一代。党和政府的号召，历次的政治运动，对这些麻醉了的人們来說，曾清醒一下，有一部分人确实清醒了过来。但是大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还在陶醉着。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在許多地方，还有唱有和，还有一些市場。双反运动以来，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受到了大字报烈火的燃燒。这是給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来了一頓"杀威棒"，把威风打了下来，这是必要的。但是要比較徹底地解决思想問題，还有待于深入細致的座談、交心、辯論。因为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是長年累月集成的，它根深蒂固，有系統，有体系，頑固

地占領着許多人的头腦。它使許多知識分子，从待人接物直到学术思想，完全貫串着个人名利观念。沒有細致的摆事实、講道理、反复分析的批判态度，就不能把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徹底搞臭。

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确实是极臭的。有的教师，为了个人多拿几百元的稿費，出点小名气，把主要精力放在写稿譯稿上，对国家交給他的教学任务却敷衍了事，讓成百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浪費掉大好时光，在学校里得不到眞才实学。有些人为了多拿到几个錢，他們所譯所写的稿子往往粗制濫造，文理不通，并且把許多有毒的思想通过自己的写稿譯稿，流傳到广大讀者中去。还有更严重的，他們自己学識淺薄，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却自己裝作学者專家，背地里东拼西凑，干些个偷窃勾当！这就是知識分子在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干出来的事。干这种事的，目前还不在少数。

有的知識分子，已經有了一定的名，国家給他的工資已經很不低。他們却繼續追求更高的名，更多的利。他对国家交給他的生产上立待解决的重要問題，棄之不顧。即使应承了一些，也是三心二意，敷衍塞責。他对自己所領导的一部分青年人，也看作是自己前进道路上的贅瘤，不認眞指导，随青年們去摸索。甚至把知識据为己有，把資料藏起来，把理論書籍霸占着，却指揮青年人为他的个人研究去找材料，搞数据。

知識分子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表現是形形色色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根本問題是从个人名利出發，而不顧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們只想以最少的劳动，取得最大的个人利益。这种思想發展到严重的时候，投机取巧什么都干得出来。

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正严重地障碍着我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前进。对这些人，正确的学术思想是談不进去的。你說联系实际，他却認为解决一个实际問題比他那种所謂論文要費勁得多，他当然不干。你說培养青年，他却覺得"后生可畏"，不把眞本事教給青年。你說厚今薄古，他却为了談古显得自己淵博，还可以

东抄西凑，談今却要有眞本事，还容易碰釘子，他根本不敢干。你說集体协作，他却想独占名利，对这种要求他当然接受不了。你說服从国家需要，他心目中只有个人的小名小利，沒有国家的大名大利，他怎么会服从国家的需要呢？

在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思想支配下，学术研究是按照个人的小打算零敲碎打，無計划無重点的。它好像一个沒有脊椎骨的人，也許有一个手指头生得还很好，但就整个的人来說是站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依靠这样的人来發展經济和文化事业。

問題很清楚，是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严重的丑惡的思想在妨碍着許多知識分子的进步。它妨碍着学术的發展，它妨碍着国家建設的前进。要徹底地把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丑惡面貌揭露出来，要把形形色色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表現完完全全地揭开，把它徹底搞臭，徹底燒透。必須把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又髒又臭的本質擺到光天化日之下，讓这种濃烈的臭气使任何人都掩鼻而去，这样才会使那些受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麻醉的人們清醒过来。

在这一場双反的烈火中，我們要树起思想領域的紅旗。我們的科学家，人人要講眞心話，不管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不管是不滿或者牢騷，有什么說什么。只有当大家都敢于把什么思想都挖出来的时候，人們互相之間才可能有比較深刻的了解，才能进行比較深刻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从而把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燒透，把人們的思想問題解决，使大家輕松愉快地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徹底搞臭，并不是把所有有这种思想的人搞臭或者一棍子打死，而是以治病救人的态度使他們清醒过来。这样做不是乱戴一些帽子，而是要細致地擺事实，講道理，开展严肃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使人們認識到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思想对祖国建設事业的危害性，从而使更多的人們受到眞正有益的教育。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怀仁堂的講話）

陸 定 一

中国科学院院長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先生，要我来講講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張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張百家爭鳴，这已經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議上宣布过了。执行这个政策，我們已經有了部分的經驗，但是我們的經驗还是很少的。我今天所要講的，是个人对这个政策的認識。今天到会的都是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共产党員，也有各民主党派的和無党無派的朋友。你們当然能够了解：这个政策对于我国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的發展，对于你們所从事的工作；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我的了解如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不吝指正，使我們的共同事业能够順利發展。

一、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政策？为什么現在才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

我国要富强，除了必須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須發展經济，發展教育事业，加强国防以外，还必須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

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須采取“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無論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拿眼前的例子来說，就是戏剧。几年以前，还

有人反对京戏。那时，党决定在戏剧方面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現在大家都看到，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收到了巨大的效果。由于有了各剧种之間的自由竞賽和相互观摩，戏剧的进步就很快。在科学工作方面，我国也有历史經驗。我国在兩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方面曾經出現过"百家爭鳴"的局面，这成了我国过去历史上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国的历史証明，如果沒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沒有自由討論，那末，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滯。反过来說，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討論，学术就能迅速发展。春秋战国时代同現在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当时，社会是动乱的，学术方面的"百家爭鳴"是自发的而沒有有意識的統一領导的。現在，却是人民自己打出了自由的天地，人民民主專政已經建立起来而且巩固起来了，人民要求科学工作的迅速发展，因而自覚地对科学工作进行全盤的規划，并采取"百家爭鳴"的政策来促进学术工作的发展。

我們又要看到，在阶級社会里，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毕竟要成为阶級斗爭的武器。

这个問題，在文学艺术的領域里，是比較明显的。文学艺术中有一些显然有害的东西。胡风就是一个例子。誨盜誨淫的黄色小說又是一个例子。"打打麻將，国事管他娘"、"美国月亮比中国的圓"这些所謂文学作品又是一些例子。把这样的有毒的文艺，同蒼蠅、蚊子、老鼠、麻雀一例看待，加以消灭，是完全应該的。这对文艺只有好处，沒有坏处。所以，我們說，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有为帝国主义 地主、資产阶級服务的文艺。我們所需要的，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領域里，阶級斗爭也是比較明显的。胡适的哲学观点，历史学观点，教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大家都批判过了。批判胡适，这是阶級斗爭在社会科学領域里的反映。这个批判，以及对梁漱溟先生的批判，是完全应該做的。对其他資产阶級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和資产阶級社会学的批判，也是应該做的。

在自然科学領域里，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沒有阶級性，但自然科学

工作者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的。从前，在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中間，有过盲目崇拜美国的思想。在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中也有所謂"非政治化"的傾向。批判这些坏东西也是完全应該的。这种批判，也就是阶級斗爭的反映。

我們还必須看到，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虽然同阶級斗爭密切有关，可是它和政治終究不是完全相同的。政治斗爭，是阶級斗爭的直接的表現形式，文艺和社会科学，可以直接地表現阶級斗爭，也可以比較曲折地表現阶級斗爭。以为文艺和科学同政治無关，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这是一种右的片面性的看法，是錯誤的。反之，把文艺和科学同政治完全等同起来，就会发生另一种片面性的看法，就会犯"左"的簡單化的錯誤。

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見、坚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㊀。

㊀ 几位科学家来信，認为应該防止对百家爭鳴的政策在認識上發生偏向。現在把科学出版社楊肇燫先生的来信摘要發表在这里。

楊先生的信說：

"百家爭鳴的方針毫無疑問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实际上对这一方針的認識似乎要防止很可能有的某些不正确的偏向。

"顧名思义，爭鳴的应当是多少可以称为'家'的。可是有一些人往往安于淺嘗，偶有一'得'，便沾沾自喜，不肯深入鑽研，不肯脚踏实地去做学术工夫，以致陷入泥坑而不知返，反而坚持錯誤，在眞理面前还不肯低头。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經常有不少的人不肯相信（其实是不肯艰苦学习）已經公認为証明了的为什么用圓規和直尺三等分角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永动机是不可能的，而偏偏要白費时間和脑力去發現奇跡。这种把精神智慧消耗于毫無意义的、明明注定要失敗的企圖上的人，为数恐不在少。其中有些人恐不免是由于要想陌夜成'家'，一'鳴'惊人，不願去走崎嶇的学习途徑。如果向他們建議去下工夫进行学习已有的結論，根据經驗，很可能他的答复会輕松地說，那是資产阶級学者的理論，是'唯心'的！

"与上面所說的情形相仿，經驗告訴我們，有些人，尤其是工程师和技术工作

我們所主張的自由，是同資产阶級民主主义所主張的自由不同的。資产阶級所主張的自由，只是少数人的自由，劳动人民是沒有份或者很少有份的。資产阶級对劳动人民是实行專政的。現在美国的好战分子标榜什么"自由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好战分子反动派有一切自由，而盧森堡夫妇却被处以死刑，因为他們主張和平。我們是主張不許反革命分子有自由的，我們主張对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实行專政。但是在人民內部，我們主張一定要有民主自由。这是一条政治界綫：政治上必須分清敌我。

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是人民內部的自由。我們主張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而扩大这种自由。

人民內部是一致的又是不一致的。我国已經有了宪法，遵守宪法是人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內部的一致性。这就是說，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都应該一致的。但是，人民內部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在思想上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别，这种分别，在阶級还存在的时候会有，在阶級消灭以后还会有，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在阶級还存在的时候，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的矛盾表現为阶級的矛盾；在阶級消灭以后，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者，由于业务上的客观情况，不大有机会去接触相关的文献，因此就不努力去查文献或向人請教，而徑自苦心孤詣地去研究一个問題，并且得出了正确的結果，可是很不幸，他还不知道早已有人甚至在几十年前就已經作好了。

"要眞正成'家'，要嘹嘹善'鳴'，是需要經过一段長时期艰苦鑽研和实踐的历程的。这一点对百家爭鳴起碼应該具备的正确知識，似乎有必要着重予以指出。否則，今后各研究單位、各高等学校將会收到很多'家'各'鳴'其'鳴'的發現或發明，还得花費不少宝貴时間予以审閱，还得小心翼翼地耐煩地說明其不可能，或指出其已有前人作过。这样，作者的精力固然白費了，审查人的精力也是白費的。但如果对百家爭鳴具有正确的認識，至少可以減少精力的浪費，进一步还可化無用为有用。"

楊先生和好几位别的科学家关于防止对"百家爭鳴"發生誤解的意見，是經驗之談，是有道理的。这种誤解，这种偏向，是应該防止的。——作者

那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还將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是有斗爭的，而且这种斗爭將是長期的。共产党人是辯証唯物主义者，当然主張宣傳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这是不可动搖的。但是，正因为是辯証唯物主义者，正因为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規律，所以共产党人主張必須把人民內部的思想斗爭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斗爭严格地区别开来。在人民內部，不但有宣傳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傳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傳唯物主义或者是宣傳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兩者之間的辯論，也是自由的㊀。这是人民內部的思想斗爭，同对反革命分子所进行的斗爭是不同的。对反革命，应該鎮压，应該打倒。对人民內部的唯心主义的落后思想，应該进行斗爭，这个斗爭也是尖銳的，但这个斗爭是从团結出发的，是为了克服落后，加强团結。对于思想問題，想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是不会有效的。只有經过公开辯論，唯物主义的思想才能一步步克服唯心主义的思想。

在艺术性質的問題上，在学术性質的問題上，在技术性質的問題上，也会有意見的不同。这种意見上的不同，是完全容許的。在这类性質的問題上，发表不同的意見，进行辯論，进行批評和反批評，当然是自由的。

总而言之，我們主張政治上必須分清敌我，我們又主張人民內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是人民內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領域中的表現。

我們現在已經完全有条件来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了。

㊀ 有人以为，在我国不应該有宣傳唯心主义的自由。也有人以为，既然有宣傳唯心主义的自由，那末唯心主义者就应該有無限的宣傳自由。这些看法都是出于誤解。以宗教为例来說，在我国，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教堂、寺庙、刊物、出版机关，还有訓練傳教干部的学校，这些都是自由的而且受到国家的保护的。但是，为了有利于無神論者和有神論者之間的团結，避免發生冲突起見，無神論者不到教堂、寺庙里去做反宗教宣傳，有神論者不在教堂、寺庙以外的公共場所进行宗教宣傳，这里，無神論者和有神論者双方在宣傳上的自由又是有限度的。——作者

我們現在的情形是怎样呢？

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剝削制度將在今后几年内在这些地区被消灭。一切原有的剝削者將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即將成为沒有剝削阶級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知識界的政治思想狀况已經有了根本的变化，并且正在发生更进一步的根本变化。这在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报告中已經說得很詳細。在这里，讓我略为回顧一下最近的一次斗爭。

最近的一次斗爭，是反对資产阶級唯心主义思想的斗爭。在这次斗爭中，广大的知識分子表現得很好，进步很大。

在这个斗爭中，我們学术界的主要鋒芒，集中在胡适和胡风这兩个反革命分子身上，他們不仅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而且政治上是反革命分子。此外，还对梁漱溟先生的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对文艺界中的个人主义的資产阶級思想等等进行了批判。現在大家都可以看得見，这种斗爭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是必要的，因而这个斗爭是正确的。

在这个斗爭中，中共中央曾經指示，必須坚决反对阻碍开展学术批評和討論的思想，这些思想表現为：对資产阶級"名人"的偶像崇拜，認为他們是"权威"，不能批評；对青年的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采取資产阶級貴族老爷的态度，对他們实行压制；某些党員以"权威"自居，不許别人批評自己，不进行自我批評；某些党員因为"怕破坏統一战綫""怕影响团結"不敢批評别人；某些党員因为私人友情或情面的关系，对别人的錯誤不去批評，甚至加以掩护。中共中央指出，必須坚持这样的原則：在学术批評和討論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評，或者对資产阶級錯誤思想熟視無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同时，中共中央又指示，学术批評和討論，应当是說理的，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說，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銳的学术論爭。批評和討論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簡單、粗暴的态度。应当采取自由討論的方法，

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許被批評者进行反批評，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評。应当容許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見，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对于在学术問題上犯了錯誤的人，經过批評和討論后，如果不願意发表文章檢討自己的錯誤，不一定要他写檢討的文章。在学术界，对于某一学术問題已經做了結論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的意見，仍然容許討論。中共中央又指示：在进行对資产阶級錯誤思想的批判和学术問題的批評和討論时，应当坚持党的統一战綫政策和团結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应当把在思想上坚持資产阶級錯誤观点的人，和虽有这种錯誤观点但是傾向于唯物主义的人区别开来，分别对待。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錯誤的人。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資产阶級錯誤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分子，都应当保障他們获得适合于他們的工作崗位，保障他們有可能繼續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揮他們对社会有用的專長，并將这种專長傳授給青年，同时鼓励他們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評和討論，实行自我改造。

这些指示，保証了我們在反对資产阶級唯心主义思想和开展学术批評的工作中不犯重大錯誤。現在檢查起来，这个斗爭基本上是做得对的，在分寸的掌握上也大体是对的。但錯誤和缺点还是有的。例如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但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錯誤。对他在学术思想上的錯誤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只是有一些文章則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說服力量，語調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說他把古籍壟断起来，則是并無根据的說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釋清楚。

我們回顧一下，再看現在。那末，現在的情形已經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了，如果在一兩年前，資产阶級唯心主义还有很大的市場，胡风之流还在思想战綫上猖狂进攻，很多知識分子不能辨别什么是唯物主义思想、什么是唯心主义思想，不知道資产阶級唯心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事业有什么危害，那末，今天我們思想界已經大有进步。

現在，有些部門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工作的原定計划

还沒有做完，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也沒有做完。凡是沒有做完的，应該貫徹进行到底，不可以半途而廢。因为只有把这些工作做好了，才能为今后的很多工作創造出有利的条件。在这个斗爭中还必須再三强調团結占全体人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好人，包括落后的分子在內，共同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斗爭。

第三，我們还有敌人，国內也还有阶級斗爭，但是敌人特别是国內的敌人已經大大削弱了。

敌人是誰呢？在国外，有以美国好战分子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国內，有盤据台灣的蔣介石集团，还有其他殘余的反革命分子。这些就是我們的敌人。对这些敌人，仍然必須繼續坚决斗爭，不能松懈。

第四，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而且还在繼續增强之中。

正是估計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現在着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就是要我們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調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

現在，我們許多自然科学工作者正在政府領导之下草拟关于自然科学發展的十二年的規划，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十二年發展規划也正在拟定的过程中。制定和实現这些規划，是我們科学界的光荣任务。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完成这个任务的一个重要保証。

二、加强团結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既是为了动員一切积极因素，所以又是一个加强团結的政策。在什么基础上的团結？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团結起来干什么？建設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并且同內外敌人作斗爭。

有兩种不同的团結。一种是机械服从的团結，一种是自覺自願

的团結。我們所要的，是自覚自願的团結。

我們的文艺界科学界是不是团結的呢？是团結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建立的时候比較起来，文艺界和科学界在团結方面是大有进步了。社会改革的工作和思想改造的工作，是我們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坚固团結的原因，否認或忽視这一点是不对的。但这决不是說，我們的团結已經十全十美了。团結方面还有缺点。

缺点在那里？首先在于有些共产党員忘記了毛澤东同志的指示，忘記了宗派主义的害处。工作中的成績，往往会使一些人冲昏头腦，居功自傲的情緒就会發展起来，宗派主义的情緒就会發展起来。

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在"整頓党的作风"一文中說：

"我們的許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員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視人家，而不願尊重人家，不願了解人家的長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傾向。这些同志，讀了几本馬克思主义的書籍之后，不是更謙虛，而是更驕傲了，总是說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我們的同志必須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員和党外人員相比較，無論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員，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員。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員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員。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員合作呢？对于一切願意同我們合作以及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同他們合作的义务，絕無排斥他們的权利。一部分党員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願意同我們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們。这是沒有任何根据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給了我們这样的根据么？沒有。相反地，他們总是諄諄告誡我們，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脫离群众。中国共产党中央給了我們这个根据么？沒有。中央的一切决議案中，沒有一个决議說是我們可以脫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相反地，中央总是叫我們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脫离群众。所以，一切脫离群众的行为，并沒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們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綫的实行，所以我們要針对这个

問題在党內进行广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們的干部眞正懂得这个問題的严重性，使他們懂得共产党員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員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二七至八二八頁）

大家都知道，几年以来，我們在文艺界科学界中，曾在党內进行了几次反宗派主义的斗爭。这种斗爭，在衛生工作部門中，在自然科学研究部門中，在文学艺术工作部門中，在社会科学工作部門中，都曾經进行过。我們还要繼續进行这种斗爭，并且号召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工作的党員，都起来注意克服宗派主义。

在斗爭过程中，我們摸索出了几条經驗，現在要来說一說。

（一）大家都知道，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內是沒有阶級性的。它們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它們同社会制度的关系，仅仅在于：在不好的社会制度之下，这些科学要發展得慢些，在較好的社会制度下就能發展得快些。这些本来是在理論上早已解决了的問題。因此，在某一种医学学說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說上，貼上什么“封建”“資本主义”“社会主义”“無产阶級”“資产阶級”之类的阶級标签，例如說什么“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資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說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說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莫尔根的遺傳学是資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錯誤的。我們切勿相信。犯这种錯誤的人，有的是因为宗派主义的思想，有的却因为要强調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而强調得不恰当，不自覚地犯这种錯誤的。对于这种种不同的情况，都要分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論。

在指出上述錯誤的同时，我們也要指出另一种錯誤。这种錯誤就是否認巴甫洛夫学說和米丘林学說是重要的学說。犯这种錯誤的人，又有不同的出發点。有的是因为政治上有反苏情緒，因而連苏联的科学成就也要加以否認。有的是因为学派不同，不能心服。前者是政治观点問題，后者是学术思想問題，也要不同对待，不能一概而論。

（二）对于文学艺术工作，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今天来說，也就是为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

社会主义現实主义，我們認为是最好的創作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創作方法；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任何作家可以用任何自己認为最好的方法来創作，互相竞賽。題材問題，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許写工农兵題材，只許写新社会，只許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文艺既然要为工农兵服务，当然要歌頌新社会和正面人物，同时也要批評旧社会和反面人物，要歌頌进步，同时要批評落后，所以，文艺題材应該非常寬广。在文艺作品里出現的，不但可以有世界上存在着的和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也可以有天上的仙人、会說話的禽獸等等世界上所沒有的东西。文艺作品可以写正面人物和新社会，也可以写反面人物和旧社会，而且，沒有旧社会就难以襯托出新社会，沒有反面人物也难以襯托出正面人物。因此，关于題材問題的清規戒律，只会把文艺工作窒息，使公式主义和低級趣味發展起来，是有害無益的。至于艺术特征問題，典型創造問題等，应該由文艺工作者自由討論，可以容許各种不同的見解，并在自由討論中逐漸达到一致。

文艺界已經有了戏剧方面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經驗。这是很宝貴的經驗。現在的問題是把"百花齐放"的政策推行到一切文学艺术部門去。

（三）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領域中，工作成績是大的。但正因为如此，宗派主义的危險也就大了。如果不及时注意，可能發生思想僵化的严重后果。建国以来，在广大知識分子中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进行反对資产阶級唯心主义的斗爭和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等工作，都是对的，必要的，而且有成績的。但是，还应該看到阴暗面。有一些党員，产生了把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壟断起来的思想，自以为是，看不見甚至忘記了别人的長处，看不見别人的进步，听不得批評的意見，自己永远以先生自居，把别人看做是永远只配当自己的学生，看做永远只能是个唯心主义者或資产阶級学者。这就非常危險了。这样下去，个人就有墮落的危險，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事业就会死气沉沉，停滯不前。这些同志应該赶快停止陶醉，放謙虛些，多听些别人的批評，多做些学問，多向党外人士請教，

同他們好好合作，以免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事业受到損失。

鑒于建国以来已經將要七年，虽然还有一些人坚持唯心主义的思想，坚持資产阶級的思想，但是，很多人已經有了很大进步。应該考虑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中，依照情况，逐步改組力量，改变有些原来是錯誤的和原来并不錯誤但現在已經过了时的制度和办法，以便动員一切积极因素，發展我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事业。哲学和社会科学是极重要的科学部門，所以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这里要附帶談談近代史問題。近代史是社会科学中极其重要的部門，但是近年来成績不多。据說，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編出一本党史教科書来，然后根据党史教科書来写各种近代史。現在請你們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編党史教科書，只准备陆續出版党的大事記和文件彙編。我們的近代史学工作者，应当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問題。在近代史的研究中，也应該采取百家爭鳴的政策，不应該采取别的政策。

去掉宗派主义，团結一切願意合作或可能合作的人；去掉壟断想法，去掉过多的清規戒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不要專为自己为本部門本單位的利益打算，多多帮助别人，帮助别部門别單位；去掉驕傲自大，自以为是，实行謙虛謹愼，尊重别人。这样，就可以去掉我們过去团結中的缺点，大大地加强团結。

我們希望党外的文艺家和科学家也来注意加强团結的問題。周恩来同志在"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报告"中有一段話，我要在这里复述一遍。

"在一部分知識分子同我們党之間，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我們必須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但是这种隔膜常常是从兩方面来的：一方面是由于我們的同志沒有去接近他們，了解他們；而另一方面，却是由于一部分知識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采取了保留态度、甚至反对态度。在我們的企业、学校、机关里，在社会上，都还有这样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間、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間不分敌

我；他們不滿意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資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他們反对苏联，不願意学习苏联；他們拒絕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詆毀馬克思列宁主义；他們輕視劳动，輕視劳动人民，輕視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不願意同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接近；他們不願意看見新生力量的生長，認为进步分子是投机；他們不但常常在知識分子和党之間制造糾紛和对立，而且也在知識分子中間制造糾紛和对立；他們妄自尊大，自以为天下第一，不能够接受任何人的領导和任何人的批評；他們否認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看一切問題都从个人的利益出發，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贊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当然，所有这些錯誤一应俱全的人，在現在的知識分子中是很少数；但是有上述一种或者几种錯誤的人，就不是很少数。不但落后分子，就是一部分中間分子，也常有以上所說的某一些錯誤观点。胸怀狹窄、高傲自大、看問題从个人的利益出發的毛病，在进步分子中也还不少。这样的知識分子如果不改变立場，即使我們努力同他們接近，他們同我們之間也还是会有隔膜的。”

这就是說，为了加强团結，要求共产党員的努力，也要求非共产党員的努力。

个人主义，門戶之見，在文艺界科学界中也是存在的。新老科学工作者之間的隔膜，也是存在的。这些不好的东西都应該去掉。我們相信一定能够去掉的。只要共产党員做出榜样来，同非党員一起努力，問題的解决是会順利的。

三、批評問題和學習問題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对批評工作来說，就是批評的自由和反批評的自由。

現在的批評，有的令人害怕。如果不令人害怕，就又往往淡而無味。这个問題該怎样解决呢？

批評有兩种。一种是对敌人的批評，所謂“一棍子打死”的批評，

或打击式的批評。另外一种是对好人的批評，这是善意的同志式的批評，是由团結出發，經过斗爭，来达到团結的目的的。这种批評，必需顧全大局，采取多說道理，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不能用阿Q正傳中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的态度。

不論前一种批評或后一种批評，都要依靠研究。不是看到一点就写，而是看了很多想了很多才写。

有一种想法是錯誤的，就是認为批評一定是打击的。在延安时期有个反革命分子叫王实味，后来又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叫胡风，他們是用"杂文"和别的形式来攻击党和人民政权的。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报之以打击，当然是应該的。但如果在人民內部也用这种打击的办法，就是錯誤的了。

对好人的批評，我想介紹四篇文章：1.毛澤东：改造我們的学习；2.毛澤东：整頓党的作风；3.毛澤东：反对党八股；4.人民日报：关于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前三篇，是对王明，博古兩同志的批評，这兩人在当时是犯了重大錯誤的同志；后一篇是对斯大林同志的批評，斯大林是既有大功劳，又有大錯誤，而功劳多于錯誤的同志。看了这些批評，就会知道，可以有这样的批評，既不是过火的打击，也不是不痛不痒，而能使很多人得益的批評。可以看的出，写这样的批評，是經过了怎样的刻苦研究工作。这种批評，正是我們所应該提倡的。

攀登科学和艺术的高峰是很困难的工作。所以困难，因为这里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有一点調皮。我們应該給科学家和艺术家以充分的支持。凡是老老实实做工作的科学家和文艺家，在我們这个社会制度之下，是只应受到支持，不应受到打击的。独立思考，进行复杂的創造性的劳动，完全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第一，單是知識不足，有时就会使人作出錯誤的判断。第二，把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夸張了，看得太絕对了，也会犯錯誤。列宁說过："只要向前再多走一小步，——看来仿佛依然是向同一方向前进的一小步，——眞理便会变成錯誤"。("左"派幼稚病第十章)有一些人，对进步的事物很拥护，只是太性急了一些。因而犯了錯誤，常常是屬于这种性質。第三，有些

人犯的是唯心主义的錯誤，但是犯唯心主义的錯誤也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因为"人的認識并不是直綫(也不是循着直綫进行的)，而是那無限地近似于螺旋形的曲綫。这曲綫的任何一个断片、截片、小片，都可以轉化(片面地轉化)为独立的、完整的直綫，而这一直綫(如果只看見树木而不看見森林)就会导引到泥坑，导引到僧侶主义(在那里統治阶級的阶級利益把它巩固起来)"。(列宁："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第二一九頁)在認識發展的过程中，思想的僵化，孤立地看問題(所謂"鑽牛角尖")和片面地看問題，都会引导到唯心主义的錯誤。

好人犯錯誤的事是常有的。完全不犯錯誤的人在世界上是沒有的。应該把这种錯誤同反革命的言論严格区别开来。对这种錯誤的批評只应該是与人为善的，只应該是平心靜气来說道理的，只应該是顧全大局，从团結出發达到团結的目的的。对于犯了錯誤的人，应該积极帮助他改正錯誤。受到批評的人也根本不用害怕。

錯誤是容易犯的，但是錯誤必須要改正得愈快愈好，堅持錯誤就会造成很大的損失。对被批評的人来說，眞理是应該堅持的，别人批評得不对，可以表示不同的意見；但錯誤是应該改正的，别人批評得对，应該虛心接受。公开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产生錯誤的环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这对于一个政党来說，是郑重的党的标志，对于个人来說，也是实事求是的标志。犯了錯誤，接受批評，就是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帮助，这对于自己，对于我国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的發展是只会有好处，不会有什么坏处。

学习方面，要繼續在自願的基础之上組織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同时，要广泛地学习知識，对古今中外，对朋友，对敌人，都要批判地学习。

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在广大的知識分子中已經成为热潮，这是一种好現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論，是人类的最高智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眞理。从前有人以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适用于中国的，这种說法已經完全破产了。沒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

論作为指导，我国的革命胜利是不能設想的，我国的各种建設，包括科学和文化的建設在內，要取得巨大的成就和迅速的發展，也是不可設想的。

但是，在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工作中，也有許多缺点和錯誤，主要的是教条主义的傾向。

十五年前，即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澤东同志写了"改造我們的学习"，后来，一九四二年二月，又写了"整頓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这三篇文章，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文件。延安整风运动，是反对主观主义，主要地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思想运动。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我国一次最偉大的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教条主义，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几乎断送了我国的革命，它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敌。这个痛苦的經驗我們要牢牢記住。我們还必須深深警惕：如果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研究学問，如果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領导文艺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那是一定要失敗的，因为这种态度是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

我願意趁这个机会，向我們的文艺家、科学家，郑重介紹毛澤东同志的"改造我們的学习"、"整頓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和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决議"。我希望每个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都把这几篇文件精讀几遍，以便了解教条主义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别何在，为什么教条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敌，为什么必須坚决地同教条主义进行斗爭。

我們要广泛地学习知識。

我国有很多的医学、农学、哲学、历史学、文学、戏剧、繪画、音乐等等的遺产，应該認眞学习，批判地加以接受。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不够認眞，輕視民族遺产的思想还存在，在有些部門还是很严重。

接受些什么遺产和怎样接受遺产呢？

如果要从現在的观点看来十全十美的东西，才作为遺产来接受，那末，就沒有什么东西可以接受的了。相反，如果無批判地接受文化

遺产，这便成了"国粹主义"了。

对我国的文化遺产，我們提議采取这样的方針：要細心地选擇、保护和發展它的一切有益成分，同时要老老实实地批判它的錯誤和缺点。現在，我們的工作在兩个方面都有缺点。对我国文化遺产中的有益成分，有粗心大意一笔抹煞的傾向。这是当前主要的傾向。昆剧"十五貫"的演出，告訴了我們，那种認为昆剧里沒有有益成分的說法是錯誤的。戏剧如此，其他文艺部門和科学研究部門是否也有类似的現象呢？应該說是有的。这种現象是应該改正的。同时，我們也發現了对文化遺产的缺点錯誤不加批判，或者加以粉飾的現象；这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所以也是应該改正的。

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要向人民去学习。人民的智慧是無穷無尽的，人民中間有很多宝藏还沒有被發現，或者發現了还沒有好好利用。举医学为例来說，从前，針灸、气功疗法等都是被看不起的，現在才被看得起了。可是，像正骨、推拿、草藥等民間的医疗方法，現在还沒有引起足够的重視和注意。再举音乐和繪画为例来說，这兩个部門对民族遺产是不够重視的。凡是有这种情况的，都应該改正过来。从民間来的东西，常常是不系統化的，沒有从理論上加以說明的朴素的东西，有的还帶着所謂"江湖气"，帶着迷信的色彩等等。这是不足为奇的。科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不是去鄙視这些东西，而是要去学习，細心选擇、保护和發展它們的有益成分，使之成为科学的东西。

我們要有民族自尊心，我們决不能做民族虛無主义者。我們反对所謂"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但这决不是說我們应該自大，拒絕学习外国的好东西。我国还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我們要花很大的努力向外国学习許多东西，我們的国家才能富强。民族自大，無論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不对的。

我們应該向苏联学习，向人民民主国家学习，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

向苏联学习，这是正确的口号。我們已經学了一些，今后还有許

多应当学习。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和平民主陣营的領袖，它的工业發展速度最快，对社会主义建設有丰富的經驗，在科学方面也已經有不少重要部門赶上和超过了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民，当然值得我們好好学习。不向苏联学习，是根本錯誤的。

但是，在学习苏联的时候，我們的学习方法必須不是教条主义的机械搬运，而是要結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一点必須引起注意。否則，也会使我們的工作受到損失。

除了向苏联学习以外，还要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長处，許多国家在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比我国进步；也有些国家在其他方面比我国进步，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自高自大是不应該的。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以外的世界各国的人民，他們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之下。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会有变化，但人民却会永远生存和發展下去。他們所以能够生存和發展，都不是沒有原因的。凡是他們的長处，不論屬于文艺科学的，屬于风俗习慣的，或者屬于其他种类的，我們都应該批判地加以学习。这里也不应該自高自大。

除了朋友之外，我們也要向敌人学习，不是学习他們的反动的制度，而是学习他們的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中的有价值的东西。这种学习，目的是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的發展，以便更有力量来防止侵略和保衛世界和亞洲的和平。

还要說一說党員应該向非党員学习知識的問題。我們不少党員是在知識上有缺陷的。非党員缺少馬列主义的基本知識，但对于許多热心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非党員的朋友来說，那是过去的事或者將要过去的事了。他們之中很多的人已經把这个缺陷补足了，或者將要补足了。这个問題已經提出了，也已經在解决之中了。現在要提出的問題，是党員应該注意补足自己的缺陷了。办法只有老老实实向懂得的人去請教，去学习。非党員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学习

得很努力。共产党員向他們学习各种知識的时候，不应落后。这也是学习問題里的重要的一条。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这个政策提出来之后，有許多問題会逐步跟着提出来，要求解决。希望大家考虑这方面的問題。今天只講些原則問題，請大家加以指正。

一九五六年六月六日修正

附記：講話之后，收到了郭沫若先生等七十二封来信，有的是个人写的，有的是集体写的，有的对講稿提出了意見，有的發表了自己的感想。这些宝貴的来信，給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在这里敬致謝意。

作　者

（原載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陈伯达談"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是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方法之一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陈伯达今日应国务院科学規划委員会副主任郭沫若的邀請，在国务院科学規划委員会第五次会議上作了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講話。他談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躍进的問題。

陈伯达首先对解放后八年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作了估价。他說，解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虽然还落后于革命的实际，但成績还是主要的，一批新生力量已經成長；發表了不少好的、批判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的文章；經过思想改造、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爭以后，有相当一批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已經解决或部分解决了自己的人生观宇宙观問題，轉向或靠近工人阶級。接着他指出，現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缺点是"言必称三代"（指夏、商、周）、脫离革命实踐的煩瑣主义；有一批資产阶級知識分子逃避社会主义的現实政治生活，企圖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欢討論几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他認为考古是可以的，但不能用学术界的主要力量去考古。主要力量应該用于研究当代的現实。而且考古的目的，也应該是为了"溫故而知新"。他在这里引用了馬克思的話："任何眞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他說，但是，我們現在有些哲学家的哲学文章并沒有表現这一点。陈伯达又引用了馬克思說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鑰匙"、"資本主义經济为古代經济等等提供了鑰匙"的理論，来說明我們研究問題的方法，主要的应該从現代开始到古代，应該克服目前那种偏重研究古代的傾向。

在談到边干边学的时候，陈伯达批判了那些自高自大，翹起尾

巴、瞧不起工人阶級，瞧不起劳动人民、瞧不起老干部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他說，渺視劳动人民的人，劳动人民就有权利渺視他。

陈伯达說，学校教育当然能够培养出很多人才，我們必須注意学校教育，但是过去进过大学、出过洋、得过博士学位的人并不一定都是眞正有学問的，相反的，有些有大学問的人却并沒有进过大学、出过洋、得过博士学位。現在在各种崗位上已經出現了一批由劳动者出身、原来沒有受过正規教育、但在工作中經过努力学习已經能够开始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老干部；还有些單位存在一些科学技术問題，是科学技术人員多时沒有解决的，但一經群众討論，就很快地得到了解决。这些新气象說明了劳动人民和老干部边干边学的新躍进。

陈伯达最后說，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躍进，应該躍进，而躍进的方法之一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所謂厚今薄古，就是說，不要薄今厚古；所謂边干边学，就是說，不一定要学好了才干。这正是毛主席說的"讀書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干就是学习"。

（原載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范　文　瀾

面临着工农业生产大躍进的形势，科学工作也必須大躍进，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历史科学工作者誰都想躍进，誰都想大大的躍进，干勁是足够的，問題在于如何躍进。陈伯达同志給我們講話，要我們"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如何躍进的問題解决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和如何实行这个指示。当然，对伯达同志的講話有不同意見的，还可以提出来討論，这里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講历史，厚今薄古，本来是很自然的道理。現代近代的事情，最容易理解，也最有現实意义。可是，現在史学界的情况恰恰是薄今厚古，越是今的越不講，越是古的越講，这实在是一种反常的現象，是一种衰暮的現象。伯达同志給我們着重指出来，要我們赶快糾正，是完全必要的。

持厚古薄今論的人也有他們的想法，以为学术是独立的东西，牽涉到政治就失去独立性，就不成其为学术。講古，不牽涉政治，所以是学术。講今，总要牽涉到政治，所以不是学术。这种想法有道理么？我想举出极簡單的事例和厚古薄今論者商量商量。

厚今薄古是中國史學的傳統

因为你們厚古，我不免从古說起：

我国封建时代有三部最大的历史著作：第一，春秋。是孔子的政治学，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基本政治学。孔子作春秋，从魯隐公元年写

到哀公十四年。隔了一年，哀公十六年，孔子就死了。春秋記載二百四十年的事情，按照公羊家的說法，春秋分三世：所見世相当于孔子和他父亲的年代，可以說是当时的現代史。所聞世相当于孔子祖父的年代，所傳聞世相当于孔子曾祖高祖父的年代，可以說是当时的近代史。再往上就不写了。孔子是好古主义者，但在写春秋这一点上，倒像是个"厚今薄古"的史学家。春秋是脫离政治專談学术的么？为什么"乱臣賊子惧"，还不是怕它在政治上的誅伐？第二，史記。司馬迁作史記，从五帝一直写到汉武帝，能說他薄今么？史記的今上本紀固然早已失傳，但在平准書、封禪書中对汉武帝提出批評，这是不是談政治呢？第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这部書虽然比春秋、史記差一点，沒有写宋朝的历史，但也写到五代。看書名就知道他写書的目的是为朝廷講封建政治学，書中的"臣光曰"，那一条不是談政治的？这三部最著名的史書以外，不論正史或野史，总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正史叙述一个朝代或若干朝代的政治活动，在叙述中就含有写作者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說，贊、評、論、史臣曰等等的專为褒貶而作。野史的写成，多在兩朝交替特别是在外族侵入統治中国的时候，当然有强烈的政治性。清朝因禁止野史，大兴文字獄。如果历史著作与政治無关，清朝統治者何苦杀許多人呢。由于文字獄十分殘酷，清朝学者才被迫放棄写历史，把精力轉到脫离政治的經学——考据学上去，这完全是在野蛮压力下發生的变态病态，与顧亭林倡导学以致用的經学——考据学不是一回事了。到了清季中国产生資产阶級，它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学术和政治又結合起来。举例来看，康有为作新学伪經考、孔子改制考，以变法維新为宗旨。这些講經学、史学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資产阶級改良派的政治著作。江浙学人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創办的国粹学报，以排滿复汉为宗旨。在学报里，講史学主要是宣傳排滿，講經学主要是提倡复汉，这些談經学史学的学术刊物，同时也是資产阶級革命派的政治刊物。由此可見，中国資产阶級的早期代表人物并無学术应該和政治脫离的說法。

史書有多种体裁，自然有各种不同的写法。有些表現出明显的

政治性，有些表現得不那么明显或完全与政治無关，不論表現的形式如何，归根都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一种反映。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終究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以至国粹学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書，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

厚古薄今是資產階級的學風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学获得了馬克思主义的指导，开始表現划时代的大發展，成为服务于人民革命的一个力量。反动統治阶級的学者們，为了对抗革命，提倡学术与政治脫离，企圖使学术脫离革命的政治，变成沒有灵魂的死东西。事实上，他們自己也是想把反动的政治和学术結合起来的。蔣廷黻等人曾写中国近代史，把政治与学术結合了，可是对他們說来，結果坏得很，美国賊的口供，不打自招了。記得有一个人在他的一本書里替秦檜說好話，鬧得报紙上"輿論嘩然"，这不是想替蔣介石辯护反而明明白白告訴人們說蔣介石就是秦檜么？在这一点上，胡适比那些笨伯們狡猾得太多。他是反动政客兼反动学者，学术和政治在他身上紧紧結合在一起，但在表現形式上却一般是采取政治和学术分开的手法，写出許多瑣瑣碎碎一字一句所謂点滴功夫的考据文。其中考一些無关紧要的人和事的考据文，就当作研究历史，認为考据等于历史，他們既然把历史說成"垃圾堆"，那末，撿些片言只字考一考，也就可以自称为做史学工作了。胡适这样做，教他的追随者也这样做。这样做的好处何在呢？掉进煩瑣主义泥坑里的人，(一)不关心革命的政治，因而可能傾向于反动的政治；(二)不关心反动的政治，因而有利于蔣介石的橫行無阻。無論是(一)或(二)都对蔣介石有好处，所以，脫离政治的学术正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政治性学术，多么巧妙呵！

胡适，經过我們近几年来大規模的批判，一般地說，我們史学界已經看清楚了。但还有兩种人：一种是自覚的胡适門徒，直到今天还

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絕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絕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絕学习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須对他开战。还有一种人是不自覚的受影响者。他們在蔣介石統治时期，不了解馬克思主义，也不滿意蔣介石的反动政治，覚得胡适那套說法可以安身立命，因此，学习做一些瑣瑣碎碎点点滴滴的考据文章。挑选題目，总要离开現实愈远愈好，寂寞的三代于是变成了热鬧的市場。因为厚古薄今的习慣已經养成，要改到厚今薄古的方面来，不免感到困难。但是，他們是願意学习馬克思主义的，而且已經取得或多或少的成績。这种人为数較多，經过自我改造的努力，把旧影响抛掉，是我們史学界的重要力量。

自覚的胡适門徒和不自覚的受影响者兩种人情况不同，但他們厚古薄今，逃避現实、脫离政治的学风是一样的。这确实是"資产阶級遺留下来的风气，不是無产阶級的风气，不是馬克思主义的风气"。陈伯达同志对这种"言必称三代的煩瑣主义的学风"，予以严正的指責，我們应該深刻反省，从"象牙之塔"跳出来。

上面所說的話，总起来就是說，在社会主义大建設的今天，还保持学术脫离政治的想法是錯誤的。学术一定要为政治服务。不扫清从这个錯誤想法产生出来的厚古薄今的学风，历史学根本談不到有什么躍进的可能。

下面，我談談对伯达同志講話的一些体会。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兩條路綫的鬥爭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存在着兩条路綫的表現，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無灭資和兴資灭無兩条路綫的斗爭。不是無灭資，就是資灭無，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我們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必須認清这一点，担当起兴無灭資的責任。不管我們学到的馬克思主义有多少，現在少不要紧，只要学就会多起来，史学工作者在

思想上明确地站在馬克思主义陣綫这一边，确定自己是馬克思主义者，只要这样，气势自壯，力量也就来了。那些自称为有学术的資产阶級学者，如果敢于在人民面前翹尾巴，拒絕改造，我們应該毫不留情的藐視他們，要知道，凡是裝腔作势的人，一定是庸妄淺薄的人，他所自恃的一点所謂学术，既然裝在小器里，其不多不大，可以想見。我們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較短的期間內，消除資产阶級学术在史学上的影响，是完全有把握的。

厚今薄古第一必須扩大和加强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無产阶級領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資产阶級領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認眞地下功夫，用成績来証明厚今的意义远胜于厚古。第二必須确实用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史研究上取得眞正的成績。否則，資产阶級的所謂学术也会竄进今史里面来，例如考証洪秀全有沒有鬍子，这就是煩瑣主义竄进今史的表現。更危險的而且已經发生一些影响的是用馬克思主义的詞句，用資产阶級研究学术所常用的詭辯方法，来歪曲今史，牽涉的問題相当大，危害馬克思主义学术也相当严重，及早予以防阻是必要的。充实今史研究的力量，并且保持今史研究的健全发展，厚今薄古的学风自然会在坚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因为今厚了，古也就相对地变薄了。

厚今薄古，在扩大和加强今史的研究以外，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还必須分出一部分力量去占領古史的陣地。古史是資产阶級学者进行頑抗的据点，他們在古史上占了些点或片段，就在这些小角落里称王称霸，目空一切。其实，他們所占据的地盤，不过是若干个夜郎国而已。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該写出几部質量比較好的通史来，从現代开始通到古代，从經济基础通到全部上層建筑，这样整个历史陣地，基本上都占領下来了。同时逐个占領夜郎国，使那些国王們失去依据，不得不接受改造。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陣地占領过来，不然的話，資产阶級搞这一部分的学者，不知道要表現多大的驕气。这个經驗是值得学习的。我們只要花点功夫，任何一个学术部門都可以压倒他們。我們在大力提倡厚今薄古的同时，

也应該注意到这一点，免得資产阶級学者拿厚古薄今来和我們对立。

開展百家爭鳴，史學界領導干部要種試驗田

厚今薄古、兴無灭資是思想战綫、学术战綫上的問題，这里絲毫不能用其他办法，唯一可用的办法是思想斗爭，学术爭論。馬克思主义者为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必須全力开辟百家爭鳴的园地。在这个园地里广泛展开批評和自我批評，依靠边干边学的方法，我們的馬克思主义水平逐步可以得到提高，所討論的学术問題也逐步可以得到深入。第二，我們担負領导工作的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必須种"試驗田"，在业务上做出些成績来。种"試驗田"的好处很多：(一)資产阶級学者狂妄自大的借口之一，是說你們只会說不会做。如果我們做出些自己本行的业务来，他們还能拿这个做借口么？是不是可以說，我領导工作太忙，沒有功夫作业务，这当然也是一个理由。但是，我們科学院任何一个工作者，能够說比郭老还忙么？郭老有十足的理由免种"試驗田"，可是他种的是阡陌相連的大田，出产品特别丰收。我們种"試驗田"来个歉收，一亩收五升一斗可不可以呢？如果我們顆粒無收，怎么不讓他們有所借口呢！(二)种"試驗田"就会知道种田的甘苦所在，这样，就可以同一般工作者同甘共苦，对領导工作的改进有很大的好处。(三)可能有些学术工作者懶惰不想躍进，或者想躍进不得其法，領导者起示范作用，可以使懶者变勤，不得法者得法。(四)上級領导者种"試驗田"，对下級領导者的錯誤可以糾正得更准确些，更具体些，更有說服力些。还有一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經过全民整风运动，六万万人都躍进了。农民向四、五、八躍进；工人更是了不起，十五年在鋼鉄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要超过和赶上英国，每天看报，使人每天兴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部門有不躍进的人甚至有些还是領导工作者，那就很不好了。

我对陈伯达同志的講話体会得很不够，錯誤也很难免，在这里提出来，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指教。

（原載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破除迷信

毛澤东同志告訴我們：一定要破除迷信。

現在，我們国家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工作部門，都在大躍进。破除迷信对于躍进有很大的作用。

凡是信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或者对于某种东西的信仰并不符合它的实际情况，都是迷信。当人們着了迷的时候，把这种东西看作神聖尊严不可侵犯的权威，但西洋景一經戳穿，权威便成为笑柄。举个例来看，古人說："麟凤龟龙，謂之四灵"。麟凤龙誰也沒有見过，且不去說。龟是常見的。商代、周代的人硬說龟是能先知的神物，有大事疑事，总得虔誠地請它作决定。后来，社会發展了，人对自然界的認識提高了，知道龟是个蠢物，予以极大的藐視。迷信可以使蠢物变成"神物"，知識使这种"神物"还原为蠢物。可以断言，許多迷信的对象，在科学面前，都將成为与龟同样可笑的东西。

人类的知識，基本上不外乎生产斗爭知識和阶級斗爭知識。通过劳动群众在生产斗爭和阶級斗爭中的实踐，通过对于这些实踐的概括，人类逐漸累积了关于自然界規律和社会生活規律的知識。随着近代工业生产的發展，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科学）有了巨大的發展。但是在資本主义时代，資产阶級学者对于阶級斗爭的科学知識却不敢正視，并且竭力加以抹煞。偉大的無产阶級革命家馬克思和恩格斯总結了当时人类所获得的全部知識，建立起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从而建立起眞正的社会科学。無产阶級掌握了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社会發展規律，自覺地进行斗

爭，这就大大促进了無产阶級的革命事业的發展，帮助無产阶級取得了偉大的胜利，并將进而取得全世界范圍的胜利。

中国無产阶級由于获得了馬克思主义的武裝，就戳穿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些曾經是不可向邇的"神物"的西洋景，把它們投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在無产阶級的队伍中，也还有人对于資产阶級的知識分子抱着迷信态度。必須破除这种迷信，中国的無产阶級才能获得精神上的完全解放。

这里，讓我們簡單地观察一下中国的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在思想文化战綫上的形势。無产阶級的先鋒队有战無不胜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資产阶級企圖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以及一些破破爛爛的社会学說来对抗。事实早已証明，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虽然無产阶級还面临着許多复杂的任务，但是絕对优势是在無产阶級这边，这却是無可怀疑的了。說到自然科学，情况就有些不同。这是因为無产阶級首先是要集中力量去进行推翻剝削阶級的革命斗爭，来不及充分掌握在近代迅速發展了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識。許多資产阶級出身的或者站在資产阶級立場上的知識分子，在这个方面掌握了較多的知識。但是他們往往脫离生产的实踐，他們或者按照資产阶級的利益去利用自然科学，或者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形而上学的方法歪曲自然科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的应有的發展。取得政权的、建設着社会主义的無产阶級，現在必須急起直追，充分掌握和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全部知識，扫除籠罩在自然科学上面的資产阶級唯心主义观点，使自然科学在無产阶級和人民的手中获得最順利的發展。

無产阶級的許多革命干部，因为長时期进行极其殘酷的阶級斗爭，書本知識不多，本来是不足为奇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有学习的时間和条件，取得了一些書本知識，也是不足为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开始进行了极其偉大的建設事业。革命干部在新的工作崗位上，担負繁重的任务，很自然地感到自己的知識不足以应付客观的需要，感到需要学习。但是，有些同志却对自己估計过低，發生自卑感。他們往往对那些讀書多年的教授学者們望而生畏，發生迷信，而

不知道我們对一切都应該采取分析的态度，对教授学者也应該如此。确有眞才实学的知識分子和只有虛名的知識分子应該加以区别。同时，对于前者也应該恰如其分地加以估計，并且应該帮助他們进步。

以学者、教授、工程师为代表的中国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处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大部分是爱国的。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發展和胜利，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在政治思想方面經过自我改造，逐漸轉向社会主义，逐漸同無产阶級和劳动群众相結合，有些已經成为馬克思主义者。他們能够用他們自己的知識和能力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偉大的經济建設和文化建設，他們是有貢献的，而且今后还会作出更多的貢献。他們拥护無产阶級的領导，努力向群众学习，而無产阶級也重視他們的知識和劳动。还有許多人仍在徬徨，但是大势所趋，其中的多数迟早是要跟着無产阶級和劳动群众前进的。此外，有一小部分人是頑固分子。装腔作势、儼然充当迷信的对象，而自鳴得意的，往往就是这些頑固分子。

有些頑固的教授学者，总是坚执理論脫离实际的謬說来反对馬克思主义。他們自詡为"理論家"，拒絕联系实际，似乎一联系实际便損害"理論"的尊严。战国时候有个赵括，講起軍事理論来，比他的父亲名將赵奢还高明，赵王着了迷，讓赵括帶兵打仗，結果六十万赵兵全軍复沒。不能打仗的軍事理論有什么資格叫做理論？不能联系实际的科学理論还不是一样！不联系算是保持尊严，一联系就难免当場出丑。反对联系实际就是不敢正視当前革命的現实，企圖負所謂理論之隅来对抗現实。厚古薄今是一个隅，現在厚今薄古的巨浪已經冲毀了这个隅。崇拜西方資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崇拜美国，是另一个隅。显然，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下，这个隅也必然要被冲毀。

某些本来沒有多大本事的知識分子，自称才大用小，不能尽其所長，因此不願拿出所長来。其实，这是市儈本色，不可輕信。这些市儈形式上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囤积居奇的。这种人有某些專長，但是自以为奇貨可居，求名求利，無有止境，售价已經远远超过实价，但还想得到更高的售价。其特征叫做貪。又一种是卖狗皮膏的。这种人有

些貨物，不过是江湖术士的狗皮膏，却不但沒有自知之明，看了别的貨物不合狗皮膏的标准，就要指手画脚不已。其特征叫做妄。第三种是买空卖空的。这种人双手空空，一無所有，專憑裝模作样，故弄玄虛，自称是什么家，实际只是空头家。其特征叫做騙。“外行不能領导內行”，多半是这三种人叫喊出来的。我們不禁要問：卖狗皮膏是什么內行？买空卖空是什么內行？囤积居奇的，可能懂得些專业，不妨称为这些專业的內行，但是，这只是小內行、局部的內行。無产阶級的党和人民政府領导国家全面建設，規模如此宏偉，成就如此突出，这才是大內行、全面的內行。兩种內行相比，正如一粟之比滄海。各个部門的領导，只要善于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善于总結人民群众的知識經驗，善于学习业务，并且使业务和政治相結合，也就是內行的領导。照那三种人的說法，等于要乐队指揮者收起指揮棒，去拉小提琴，吹大喇叭；要將帅放棄司令部，去开机关槍，駕坦克車。多么荒謬的要求！所謂“外行不能領导內行”，本質就是資产阶級頑固分子反对無产阶級的領导。正因为我們各級領导在政治上是內行的領导，貪夫不得起哄抬价，妄人不得謬种流傳，南郭先生不得濫竽充数，这才急得他們乱叫起来，希望得点什么意外的好处。我們对貪、妄、騙的把戏，有个簡易办法，就是嗤之以鼻，予以极大的藐視。只有这样，迷信才能破除，而对于旧知識分子的团結、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也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破除迷信的另一个方面，是要打破科学难学的錯誤看法。我們既要学习社会科学，也要学习自然科学。劳动者由于有实踐的經驗，無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可以学好的。現在学习自然科学，更是具备着許多优越的条件。学习苏联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使我們少走一些弯路。党和政府大力提倡自然科学，設立各級專业学校，出版大量科学書籍和刊物，为学习自然科学創造了良好条件。科学界已經开始形成相当大的队伍，其中有数量愈来愈大的青年科学工作者，有由革命干部轉业，在实踐中掌握了业务知識的科学工作者，有从旧社会来的、經过自我改造、自願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工作者，有爱好

科学、业余进行研究的科学工作者。这个队伍虽然还有待扩展，但人多力大的表現已很明显。只要肯学，到处有良师。在資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往往被少数人壟断，好似术士煉丹，难以捉摸；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为广大群众所共有，好似家常煮飯，誰都可以学会。

破除迷信的又一个方面，是要打破对書本和大师的錯誤看法。实踐是一切科学知識的根源，实踐中不断地出現新原理、新标准和新傳統；書本上記載的旧原理、旧标准和旧傳統，就得不断地讓位給新的創造，所以書本上最新的知識不久也会变成落后的知識。归根說来，向書本学习是必要的，但不可执着，一有执着，書本便变成迷信对象，障碍事业的前进。我們应当向眞有学問而值得尊敬的科学大师学习，同时，我們还必須向群众学习。在中国古代，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等偉大發明都出于不知名的群众之手。在今天，解放了的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設，更有难以数計的新創造。如果科学家能够总結群众創造的經驗，繼續加工提高，一定可以得到許多重大的成就。反之，如果略得門徑，一知半解，便以讀过某些書本、出于某师門下妄自驕矜，甘居下游，不求上进，那末，書本和大师成了迷信的对象，就只能束縛人們的思想的發展。

崇信伪科学家，把科学神秘化，把書本和大师絕对化，都是錯誤的。無产阶級和劳动群众应当努力破除这些迷信，不但勇敢地掌握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而且勇敢地掌握自然科学。我們要掌握全人类历史上积累起来的一切有用的知識，使全部科学得到全面的發展，使一切阻碍發展的迷信观点，都在科学的照耀和群众运动的冲击下，归于消灭。

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領导下海嘯般發动起来了。六亿人民正在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大躍进。有些人过去对迷信的危害性認識不足，經过毛澤东同志的反复指点，警惕性也提高了。农民由于历史傳統的关系，迷信本来是較多的，自从轉化为集体农民以来，思想就根本改变。周揚同志在"紅旗"第一期上發表的文章，引用了陝西安康县农民的一首詩："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

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嶺开道，我来了。”在迷信时代，对玉皇大帝、海龙王那样的大权威，誰敢說个不字。现在呢，大权威連影子也不見了。詩里所說的“我”，自然是集体农民的总称，也是广大群众的总称。人民一旦成了社会的主人，气魄多么雄健，风格多么崇高啊！我們要創造新生活，建立新世界，就应当有这样的气魄，这样的风格。

（原載“紅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二期）

文艺战綫上的一場大辯論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組扩大会議上的講話整理、补充并和文艺界的一些同志交換了意見之后写成）

周　揚

在全国反击資产阶級右派的斗爭中，文艺界揭露和批判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及其他右派分子，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文艺战綫上的一場大是大非之爭，社会主义文艺路綫和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綫之爭。这場斗爭，是当前我国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社会主义道路和資本主义道路的斗爭在文艺領域內的反映。

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每当阶級斗爭形势發生急剧的变化，就可以在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它的征兆。

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的斗爭是長期的，时起时伏的。每經一次紧張的斗爭，工人阶級就受到一次严重的鍛煉和考驗。不管道路多么曲折艰难，斗爭的最后結局，总是革命战胜反革命，新事物、新思想战胜旧事物、旧思想。整个社会的發展如此，文艺的發展也不例外。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反动派注定了失敗的命运。社会主义的事业，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必將压倒一切反动势力的阻撓而取得胜利。

一　大風浪中的考驗

最近一兩年来国际国內經历了一系列重大的不平常的事件。我国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我国

有史以来的大变化。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得到解放；广大工农群众欢欣鼓舞。資产阶級由于他們的阶級本性却不喜欢这种变化。他們当中識时务的人們努力使自己适应于这种形势；他們看到了只有改造自己，他們在新社会中才有光明的前途。但是資产阶級右派及其在知識界的代表是不甘心这么作的，他們不肯放棄剝削制度和剝削思想，厭惡社会主义新制度而迷恋資本主义旧制度，妄想資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一切贏得人民欢呼的新事物，他們一件也看不順眼。他們覚得一切都"今不如昔"，就像九斤老太一样，总覚得如今的世道是"一代不如一代"。他們所一向依附的旧經济基础正在被消灭，而他們又不願意依附到新的經济基础上来，他們看不起工农群众，但又不能不感到工农群众的力量。这就是一部分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思想苦悶，精神动蕩的根本原因，也是他們一遇到风吹草动就乘机向人民进攻的原因。因此，为了巩固和發展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的上層建筑能和基础相适应，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一場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国內外的反动派总是要寻找一切机会向社会主义發动进攻。每当共产党內糾正錯誤、整頓作风、进行公开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时候，反动派便以为他們进攻的时机到来了。帝国主义者利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逆流。这个反动浪潮的高峰，就是匈牙利事件。如何对待匈牙利事件，成了測量一个人是否眞正的共产主义者、眞正的革命家的重要标准。全世界絕大多数的共产主义者，在这个严重关头表現了他們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忠誠和坚定，他們是經得起风險的。但是也有不少的人經不起考驗。他們在思想上發生了混乱，政治上动摇了，其中少数的人公开叛变。这种現象在西方进步知識界的一部分人中表現得很突出。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就是一个可耻的叛徒。他在叛党声明中訴說"我毕生建立起来的信仰完全粉碎了"。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叛徒的懺悔口吻。显然，他粉碎了的只是披在他身上的一層薄薄的馬克思主义的外衣，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眞正

信仰；他的灵魂深处浸透了資产阶級自由主义的腐朽思想。这样的人退出了工人阶級的队伍，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我党中央連續發表了《关于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和《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兩文，分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發生的新問題，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兩种性質不同的矛盾，从而澄清了党內外的某些思想上的混乱。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和接着發布的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指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發展起了無可估量的作用。

但是，我国知識界的那些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却从国际反共浪潮得到了鼓舞。从一九五六年春季以后，特别是从匈牙利事件以后，他們的心就痒得熬不住了。他們按照自己的主观願望把"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正确政策加以曲解。本来，我們提倡学术上不同意見的自由爭論和艺术上不同风格的自由竞賽，是为了發展社会主义文化。我們將長期地坚定不移地实行这个方針。我們認为，壟断、独占，沒有竞賽，沒有比較，就不可能引导科学艺术走向繁荣，而只会使它們走向衰退。我們相信工人阶級有力量能够通过自由竞賽、自由辯論的方式在文化艺术上战胜資产阶級。資产阶級右派却把"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解釋成对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否定；他們十分討厭思想改造运动。他們說"严冬"就要"解冻"，"春天"即將来临。他們的目的并不在开展甚么学术辯論和艺术竞賽，而只是企圖利用这个口号来卷起一場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浪潮。因此，当我党开始进入整风并广泛發动群众提意見的时候，他們就認为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共产党的时机来到了。他們的矛头首先指向思想文化領域。他們急于要夺取思想陣地。他們認为这道防綫是比較薄弱，容易突破的。接着，他們就向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展开了全面的攻击。这在某种意义上說，对于我們也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右派暴露了自己的眞面目，并从反面教育了人民。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資本主义道路？作革命派，还是作反

动派？这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要求抉擇的迫切問題。在民主革命阶段，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誰就是革命派。現在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作革命派，就必須反对資本主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你要走資本主义道路，就是反动派。兩者之中，必擇其一。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对我国知識分子来說，是比过民主革命这一关更为严重得多的考驗。

果然在知識界、文艺界，出了不少的右派，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員，他們扮演了和党外右派里应外合向党进攻的活躍的角色。鍾惦棐的«电影的鑼鼓»(載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文艺报»)是敲得較早的，可以看作右派进攻的一个信号。这篇文章把解放以来的电影事业的成就一笔抹杀，肆意攻击党对文艺工作的領导，企圖把电影事业拉回到資本主义的老路。

在这个期間，修正主义思想开始在文艺界抬起头来。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反对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綫。他們說«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已經"过时"了。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創作原則应当修改或者放棄。他們在所謂"写眞实"、"干預生活"等等的口号下，提倡"揭露生活的阴暗面"，認为只有这样才是"現实主义的新路"。一时間，眞是"山雨欲来风滿楼"。文艺界的风正在向右刮。看到这种現象，一些"左"的教条主义者着慌了，想用簡單粗暴的压服方法鎮压这股歪风。当然教条主义和压服方法是克服不了修正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害怕鳴放，是由于他們不相信工人阶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相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所以他們表面上的"左"正是反映了他們骨子里的"右"。党坚决地采取了放手讓他們鳴放的方針，因为他們力爭鳴放，發了狂了，恨不得一口气吃掉共产党。他們完全不講道理了。他們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宪法，背叛了自己的諾言。党早就公开說明，我們不怕毒草，要把毒草鋤翻，变成肥料；我們不怕牛鬼蛇神，要請牛鬼蛇神做人民的反面教师。我們看到毒草已經長出来了，那么，就讓它長罢。因为毒

草是一种客观存在，毒草盛長，就标志着工人阶級鋤草队伍要出动了。想把客观存在的毒草泥封土掩，不許露头，或者一露头就用簡單办法一下子压死，是一种不懂阶級斗爭策略的蠢笨作法，而且一定会留下后禍，將来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把它鋤掉。党相信群众有識别毒草，克服毒草的力量。党是懂得如何对付阶級敌人的。就是这样，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同社会各界的右派分子一样，就原形毕露，張牙舞爪地乘机活动起来，形成了兩軍对壘。兩方面都高兴。右派即反动派高兴的是共产党眼看垮台，資本主义可以复辟了。革命派高兴的是牛鬼蛇神大队出籠，有机会灭掉它們了。

右派分子妄想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正如匈牙利的反动派濫用了柯苏特、裴多菲的招牌作为他們进行反革命的武器一样，中国的右派分子在一九五七年也利用党的整风运动煽动一次反对社会主义的所謂“新的五四运动”。这时，正像李又然形容的，丁玲的眼睛都因为高兴而發亮了。馮雪峰的情緒也从来沒有这样兴奋，他說“洪水冲到了大門口”。他鼓动一切对党、对人民政权心怀不滿的分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用“狂风暴雨”式的“大民主”来反对党和国家的領导。連一向不大过問世事的陈涌也說：“大变动的前夜到来了。”鍾惦棐在他后来的檢討中說：“在我的腦子里經历了一場匈牙利事件。”这是眞实的自白。所以党內右派和党外右派里应外合是很自然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文汇报》的右派密通声息，想借《文汇报》来为他們公开声援，以便达到他們分裂文艺界和推翻党的領导的目的。艾青在这一活动中起了穿針引綫的作用。馮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右派的靠山。江丰反党集团在中央美术学院和民盟中的右派亲密合作到了“盟党合流”的程度。这些号称共产党員的人，在工人阶級的事业遭到敌人攻击的时候，不挺身起来保衛工人阶級的利益，却反而里应外合向党进攻，这不是叛变是什么呢？

丁玲、陈企霞、馮雪峰等人的反党活动，并不是現在才开始的。十五年前，正当革命处在极艰苦的年月，全世界面临法西斯的奴役，希特勒的軍队侵占了苏联大塊国土，延安被国民党反动派重重

封鎖，敌后根据地的人民和軍队正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最残酷的斗爭，正是在这个时候，丁玲、陈企霞等人在延安和王实味、蕭軍等坏分子串通一气，在他們主編的报刊上連續發表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一系列反党文章，从背后向革命射击。他們的这些文章很快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喝采。与这同时，馮雪峰在国民党統治区支持胡风集团，同样向人民放出了反党、反馬克思主义的毒素。他們在不同地区，却挑选了同一时机，互相呼应，向党进攻，这事正說明了一条历史的規律：当阶級斗爭到了尖銳化的阶段，革命到了轉折的关头，总有一批混在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和不坚定的分子在大风浪中經不住考驗，暴露出他們的原形来。

十五年前是历史的一个轉折点。斯大林格勒一战扭轉了世界的局面。我党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奠定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十五年后的今天，又是历史的一个轉折点。以匈牙利事件而达到頂点的反苏反共逆流被击退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表現了空前的团結和强大。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走到了世界的最前面。我党又發动了第二次整风运动，而且胜利地击溃了右派的进攻，使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兩次的历史轉折关头，在我党的兩次整风运动中，丁玲等人兩次扮演了反党的角色，这决不是偶然的。

这次右派分子在文艺界放火，比十五年前的火头来势更猛，但是今天的革命力量也远非十五年前可比了。縱火者結果燒着了自己。丁玲等人的反党面貌被最后地徹底地揭露出来。

經过反右派的大辯論，我們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受到了极深刻的教育。絕大多数的作家、艺术家更坚定地站到了社会主义方面。社会主义热情在文艺界高漲起来。右派分子只有徹底悔改，重新作人，才有出路；别的出路是沒有的。党和人民願意帮助他們改造，但主要要靠他們自己的努力。

二　兩种不可調和的世界观

人們也許要問：丁玲、馮雪峰都是老党員，老左翼作家，他們怎么蛻落成为右派分子的呢？从他們的事件中，我們可以吸取一些甚么教訓呢？

回顧一下我們这些人走过来的道路。我們中間的許多人出身于沒落的封建地主或其他剝削阶級的家庭，就教养和世界观来說，基本上都是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五四"新文化运动給我們帶来了科学和民主，也帶来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潮。那时我們急迫地吸取一切从外国来的新知識，一时分不清無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綫。尼采、克魯泡特金和馬克思在当时几乎是同样吸引我們的。到后来我們才認識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人类的唯一眞理和武器。我們投身于工人阶級的解放事业，但存在于我們腦子里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思想、情緒和习慣却沒有根本改变。我們有了一个抽象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但支配我們行动的却仍然常常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冲动。我們和工人农民沒有結合，甚至很少接近。民主革命是我們切身的要求，而社会主义革命还只是一个理想。那个时候，我們許多人与其說是無产阶級革命派，不如說是小資产阶級革命民主派。个人主义的影响在我們身上長期不能摆脫。回想当年，个人主义曾經和"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等等的概念相联系，在我們反对封建压迫、爭取自由的斗爭中給予过我們鼓舞的力量。十九世紀欧洲文学的許多杰出作品經常描写个人和社会的冲突，憤世嫉俗，孤軍奋斗和無政府式的反抗，这在我們的头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曾經热烈地欢迎易卜生，欣賞他那句"世上最孤立的人就是最有力量的"的名言。我們中間許多人就是經过个人奋斗走上革命道路，背着个人主义的包袱参加革命的。

資产阶級的个人主义和無产阶級的集体主义是無法調和的。我們不只要进行資产阶級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在我国也是只能由無产

阶級領导的），而且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們身上存在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就成了我們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在对待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問題上，兩种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一种人在長期的革命过程中，經过党的教育，实际斗爭的鍛煉和自我改造，逐漸成为集体主义的战士。他們决心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改造自己的思想，决心服从無产阶級集体事业的利益。他們的思想感情經历了从一个阶級到另一个阶級的革命轉化。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并不那么容易。他們常常是在碰了壁，摔了跤之后，才慢慢丢掉的。丢掉了包袱，人就輕松愉快了。他們就能够和集体打成一片，同党一条心了。他們在集体身上找到無穷的力量。这样，把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的利益，他們才覚得不是勉强的，而是自然的，应該如此的。从此，他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对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另一种人却不是这样。他們始終丢不掉个人主义的包袱，糾纏于个人得失，个人恩怨；即使碰了壁，摔了跤，包袱也还是不肯丢，反而越背越重。他們不肯按照集体主义的精神改造自己，却总想按照个人主义的面貌改造党，改造我們的革命事业。他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和集体格格不入，同党不是一条心。他們稍有成就，就居功自滿；而当他們犯了錯誤，受到了批評的时候，就怨气冲天。他們經不起任何严重的考驗。到了重要关头，他們不惜背叛工人阶級。

在我們党內，第一类人以及願意努力去作第一类人的占大多数。但第二类人也不少。丁玲、馮雪峰就屬于第二类人。在一九五五年作家协会党組扩大会上，我曾經說，一个共产党員最重要的是对党忠誠。丁玲对这句話頗有反感；她在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期間气势汹汹地質問我为什么要提"忠誠"这些話。丁玲自己心里当然明白。原来作賊心虛，她怕听"忠誠"二字。丁玲正是一个徹头徹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一貫对党不忠的人。

許多同志提到了《莎菲女士的日記》。要了解丁玲的性格和思想，讀一讀她三十年前的这篇成名之作，倒是很有帮助的。書中的主

人公是一个可怕的虛無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她說謊，欺騙，玩弄男性，以别人的痛苦为快乐，以自己的生命当玩具。这个人物虽然以旧礼教的叛逆者的姿态出現，实际上只是一个沒落阶級的頹廢傾向的化身。当然，作家可以描繪各种的社会典型；問題在于作者对于自己所描写的人物采取甚么态度。显然，丁玲是帶着极大的同情描写了这个应当否定的形象的。如果說这篇小說表現的是她早年的思想，那么她入党很久以后，特别是在革命根据地生活了几年以后，却写了像《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这样的作品，就說明她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后来不但沒有改好，反而發展到和工人阶級，和劳动群众尖銳对立的地步。《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說，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搶去作随营娼妓的女子，当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值得注意的是，馮雪峰在《丁玲文集后記》中，却說作者所描写的这个"灵魂"，是如何如何的"丰富和有光芒的偉大"。这就看出，他們的口味是如何相投了。丁玲在一九四一年写的《在医院中》，更是集中地表現了她对工人阶級，对劳动人民的敌視。这篇小說是丁玲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动世界观的縮影。小說把一个有着严重的反党情緒的年輕的女共产党員陆萍描写为一个新社会的英雄人物，仅仅是因为組織上分配工作的时候沒有滿足她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作者就忍不住替她的主人公抱不平，把党和革命的需要咒罵为套在脖子上的"鉄箍"。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發生抵触的情况下，陆萍对延安的一切投以仇視的眼光，并且在医院中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小說把革命根据地的劳动群众写成愚蠢的、麻木的人，把延安写成一个殘酷無情、阴森可怕的地方，延安的革命干部从上到下都是沒有希望的。因此，作者支持她的女主人公"同所有的人"作斗爭。丁玲写道："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縫隙来进攻，她指摘着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眞理是在自己这一边的。"丁玲这篇小說，正是宣傳了她反党、反人民的"眞理"，狂热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眞理"。从莎菲开始，在丁玲所描写的不少女主人公的經历和性格上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她十分欣賞莎菲

式的女性。她对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林希翎的贊賞决不是偶然的。她把这种类型的女性当作最可爱的坚强性格加以頌揚。可以說，多少年来，莎菲女士的灵魂始終附在丁玲的身上，只是后来她穿上了共产主义者的衣裳，因而她的面貌就不那么容易为人們所識别，而她作起坏事来危害也就更大了。

頑强的个人主义者，在革命斗爭中，一遇到严重的考驗，就变成极脆弱的人了。丁玲早在一九三三年在南京向国民党自首，从特务机关的阶下囚一变而为他們的座上客，背叛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級，就是这种脆弱性的表現。后来丁玲到了延安，隐瞞了这段历史，騙取了党的信任。一九四二年，她發表《三八节有感》一类的文章，和王实味、蕭軍等人共同反党，表現得十分頑强，这可以說是她叛党行为的繼續和發展。党对她进行了坚决的斗爭。但是当她表示願意改正錯誤的时候，党仍然努力挽救她，鼓励她到群众中去改造自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在党的这种帮助之下写出来的。

全国解放和一本《桑干河上》給丁玲帶来了名誉和地位。她在解放后一兩年內多少作了一些工作。但她的个人主义也随着更加發展了。她忘記了党对她的批評和教育，变得驕横不可一世。她利用党和人民所交托的崗位，极力培植自己的小圈子，企圖实現她的称霸文壇的野心。她和陈企霞、馮雪峰把他們当时主編的《文艺报》变成了独立王国。一九五四年党和文艺界檢查《文艺报》工作中的錯誤，这就大大地触怒了他們。他們的"王国"是誰也碰不得的。从此，他們怀恨在心。他們的反党小集团的活动愈来愈露骨了。反革命的胡风也把他們当作可以爭取合作的"实力派"。一九五五年作家协会党組揭發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活动并对他們进行了不妥协的斗爭。当时，他們作了后来自称是"言不由衷"的檢討。正如陈企霞所自白的，他們心中充滿了"瘋狂的报复主义"。到了右派进攻的时候，他們的反党活动就达到了頂点。

这就是丁玲在南京、延安、北京的三个时期，在每个重要历史关头的表現。

現在再从历史上看一看馮雪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發展。馮雪峰也曾經为革命作过一些工作，但是他的濃厚的个人主义、無政府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級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党的組織性、紀律性經常發生矛盾。馮雪峰在他的檢討中用了兩句話来概括他和党的关系："得意时个人在党之上，失意时个人在党之外。"他在一九三六年从当时革命根据地的陕北来到上海，以欽差大臣姿态出現，一方面把胡风引为同党，另一方面对当时上海地下党組織給以极惡劣的宗派打击，造成了革命文艺事业的分裂。这就是馮雪峰在他的所謂"得意"时期干的一件大事。一九三七年，他因为党沒有滿足他个人的地位野心，就自动脫党而去，作了革命的逃兵。抗日民族战爭爆發，全国人心振奋，而他却离群索居，郁郁寡欢。从此就开始了他的所謂"失意"生涯。

一九四三年馮雪峰从上饒集中营出来，并沒有变得坚强一些，而是心情更灰暗，更消沉。他在这一年写出的那本題为《乡风与市风》的杂文集，充滿了空虛、寂寞、悲观、絕望的情緒。他看到的是人民群众的愚昧和麻木，是"奴性的卑賤的苟安"。他对整个民族丧失了信心。当时日本侵略者占領了我国大块地方并在我国土地上推行奴化教育。馮雪峰恰在这时提倡民族的"他化力"，主張民族文化的"他民族化"，宣傳民族文化"也可以被强奸产生嬰兒"（見《他化力》）。在这本書里，他还放肆地宣傳了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宣傳了封建阶級的"士为知己者死"和个人野心家的哲学。說什么"死之專一"而且只限于"知己者"，就是"除了表現对于所依存势力的忠誠之外，更是尊重着对于自己的独立意志的忠誠了"。而他說，这"是我們历史的一个胜利"。他还說什么"英雄們的野心，也正是有志的士人所要拥抱的那些正气之另一面的表現；同时，英雄們的野心一接触到人生的功利，实在是使德行賦有了新的生命"（見《談士节兼論周作人》）。这是說的甚么話呢？毋怪乎全国解放后，丁玲、馮雪峰、陈企霞等人大大發展了个人野心，向青年們大大宣傳"士为知己者死"，原来早就有了他們反动的哲学根据的。

馮雪峰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写的«有进無退»这本論文集里，宣傳个人主义的主观战斗精神，歌頌小資产阶級的瘋狂性，在許多地方，和胡风的口吻一模一样。我們知道，胡风是提倡瘋狂性、極端性的。馮雪峰也說今天的时代和社会，"要求着瘋子以上的大瘋狂者，要求着强者以上的强者，要求着大瘋狂者的肉搏，要求着最强者的反抗"（見«發瘋»）。当一九四五年苏联紅軍攻克柏林的时候，由于美国阴謀家和納粹匪徒的縱火，柏林一些地方变成了一片火海，馮雪峰不但不斥責敌人的暴行，却去贊美那"史詩般"的火獄，"史詩般"的恐怖。他把苏軍解放希特勒德国的胜利說成是"眞的恐怖的鞭子"；把解放了的柏林說成是"人类的恐怖之城"。这流露了他对于革命的恐惧和瘋狂的心理。这哪里有一点点共产主义者的味道呢？

馮雪峰在一九四四年發表了一篇題为«論友爱»的文章。这时他从敌人的集中营剛剛出来不久，但在这篇文章里，他沒有表現一点对于阶級敌人的仇恨，却反而强調宣傳什么"广大的人类的友爱"，說这是人的唯一的"根本的要求"，这已經很使人难以理解了。更加奇怪的是，他特别强調对朋友的"友爱"和"忠誠"，他說即使对一个想要叛党投敌的朋友，"假如不先对朋友或同志下劝告和阻止，却只將他的企圖当作情报似的东西向社会或团体告發，这对于社会或团体也許可說是忠誠的，但对于朋友或同志却是居心險惡，近于可怕"。显然在他的头腦里，只有私人友情的利益，沒有党和人民的利益。事实上，我們从馮雪峰前前后后的言行，只看到他对資产阶級的忠誠，却沒有看到他对無产阶級的忠誠；只看到他对自己、对自己的好朋友胡风、丁玲等人的友爱和忠誠，却沒有看到他对党对人民的忠誠。我在这里較多地引証了馮雪峰在一九四三一四五年这个期間所写的一些文章，为的是好讓大家看看在那烏云罩滿全世界的年月，这位"共产主义者"的眞实思想和情緒。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馮雪峰不但沒有感到兴奋，反而感到沮丧，如他自己所說，有一种像"小石子似的被踢在一旁"的心情，这就并不奇怪了。他用阴暗的眼光看革命的胜利，看一切新的事物。

1873

阴暗正是馮雪峰这一类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特征。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馮雪峰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更加处处感到抵触和厭惡。他的情緒越来越低沉，又越来越暴躁。而当右派进攻的时候，他的压抑很久的反党情緒就暴發出来。他和丁玲等人的反党結合，也就完全暴露。

丁玲、馮雪峰虽然有二三十年的党龄，但从他們的世界观和長期的言行看来，他們实际是党內的資产阶級的文学貴族，是党內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家。他們在敌人面前表現得十分脆弱，在革命內部却經常兴风作浪。他們拒絕按照党和革命的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反而要按照他們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我們的社会，而首先就要改造人民的文艺事业。

許多同志正确地批評了丁玲的“一本書主义”。这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兩种世界观的斗爭，是对待文艺事业的兩种根本不同的态度：究竟是把文学事业看成整个人民事业的一部分呢，还是把它当作个人獵取名利的手段呢？究竟是用前一种态度，即共产主义思想去培养青年作家呢，还是用后一种态度，即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去培养青年作家呢？

我們希望每个作家都写出好書，而且不止一本。沒有作品，还有什么文学事业呢？但“一本書主义”却是損害我們的文学事业的，而且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也决不可能产生出好作品。“一本書主义”者把写書看做滿足个人名利欲望的工具，以为写了一本書就可以伸手向人民要东西，高踞于人民之上。“有了一本書，誰也打不倒。”这就是他們的口号。在文艺界，这种人并不少：写了一本書，画了一幅画，拍了一部电影，有了一点名气就目空一切。个人的名望愈大，党和人民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就愈小。他們的思想感情离人民就愈远。他們覚得人民沾了他們的光，欠了他們的債。他們忘記了荣誉是人民給他們的。貪圖名利和驕傲自滿，就成为不少文艺工作者生活上和政治上墮落的重要原因。

“一本書主义”者把写書看得比一切都更高貴，好像作品只是依

靠个人的天才創作出来的。他們不了解，任何天才的創作，离开了当前人民群众的斗爭，离开了世世代代劳动人民所共同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积累，是不可想像的。只有劳动人民，只有那些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和生命創造历史的人們，才是不朽的。書的不朽也只是因为它眞实地紀录和描繪了劳动人民的丰功偉績于万一，表达了人民的思想和感情，說出了人民心里要說的話而已。古人講立德、立功、立言；首先是立德、立功，然后才是立言。沒有人民之德、之功，又那里有什么"言"可立呢？如果不能做人民的代言人，你的"言"又如何立得住呢？在人民面前我們永远也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驕傲。一个作家，如果从事写作只是为了賺稿費，为了想一举成名，如果写出一兩本小書就沾沾自喜，驕傲起来，这样的作家就未免太可憐，太渺小了。这样的作家就决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写出了一兩本書就用来当作反党的資本，那就更加不能容忍了。但是野心家們为了拉攏青年作为供他們驅使的工具，竟不惜利用青年的弱点，利用他們的缺少經驗和好胜心来向他們灌輸驕傲的思想，引导他們走上反动的道路。丁玲、陈企霞等人就是这样腐蝕青年的。这应該引为我們的教訓。

許多同志正确指出了馮雪峰的文艺思想和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胡风是一个混进革命文学队伍中来的反革命分子。他巧妙地隐瞞了他的反动政治經历，騙取了信任，搖身一变而为"左翼"作家，从革命文学內部来进行瓦解破坏的活动。而馮雪峰則始終支持胡风，并且在文艺思想上和胡风唱一个調子。早在一九三六年馮雪峰就反对向作家提倡馬克思主义世界观，認为强調世界观对創作的意义是"机械論的老調"。他和胡风一样对党的馬克思主义文艺路綫采取蔑視和嘲笑的态度。他們拒絕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原則。他們口中的所謂"大众化"，实际是用他們的資产阶級思想去"化大众"；他們从来不提作家应当如何努力与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却反复宣傳作家应当用甚么"主观战斗力"，实际就是用狂热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去"拥抱"現实，"改造"人民。他們一向輕

視文艺的民族傳統和民族形式。馮雪峰把作家对“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追求責罵为小市民性的“市儈主义”。当一九四五年我党在重庆对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时候，馮雪峰仍然站在胡风一边。他公开地为胡风辯护，反对党的文艺方針。全国解放后，党和文艺界委托馮雪峰以主編《文艺报》的重任。这时他虽然在口头上表示拥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綫，但实际上还是反对的。他曾力圖使《文艺报》成为宣傳他們一伙人的文艺思想和扩大他們个人威信的地盤。他在一九五三年为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起草的文学报告草稿，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提出了他的一套修正主义的理論，对解放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績全盤加以抹杀。他的报告沒有被采用。正在那时，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党要求文艺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克服和反对資产阶級思想；指出对于文艺上的新生力量应当积极加以扶植；对自己的成就不要自滿，也不要妄自菲薄；要相信我們的时代一定能够产生偉大的作品。党的意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馮雪峰等人却不听这些意見，还是繼續坚持他們的錯誤的看法。他們在《文艺报》这个独立王国一意孤行，对資产阶級唯心主义思想投降，对新生力量加以压制和輕視。党和文艺界不得不出来糾正《文艺报》的錯誤，并且改組了《文艺报》的編輯部。这是全国解放以后，馮雪峰在文艺路綫上和党的第一次明显的分歧。馮雪峰当时虽然公开做了一个檢討，但他和他那一伙人始終把《文艺报》的改組，看作党对他們的打击，而心怀不滿。他們总是企圖翻案，以便卷土重来。大鳴大放期間，《文艺报》編輯部的唐因、唐摯等右派分子一方面阴謀篡改《文艺报》的方向，另一方面密謀由馮雪峰挂帅創办所謂同人刋物；他們声言“要在文学上打天下”，要通过刋物“打开一个新局面”。可見，右派分子利用刋物来闖天下的企圖，是始終不肯放棄的。丁玲、陈企霞、江丰还計划在原定一九五七年十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公开制造文艺界大分裂的局面。反右派斗爭才使他們的阴謀全部归于破产。

現在可以明显地看出：丁玲、馮雪峰等人的墮落成为右派分子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們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世界观和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長期对抗的必然結果。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者和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人，要过社会主义的关是不容易的。他們勉强地过了民主革命的关，但到了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他們头腦中的个人主义就和社会主义無法調和了。在民主革命阶段，他們和党、和人民也并不是一条心。但是那时候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他們和党的矛盾还可以暫时緩和或掩盖。等到我国已經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資产阶級变成了革命的对象。革命鋒芒所向，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資产阶級思想的其他种种表現都在扫蕩之列，这时他們發現革命所反对的正是在他們身上濃厚存在的东西。他們如果不肯改造自己的思想立場，就必然和社会主义制度發生冲突。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社会主义制度愈巩固，他們的个人主义就愈沒有容身之地。他們和党、和人民的关系就必然要达到破裂的地步。吳祖光說組織力量愈龐大，个人的力量愈縮小。这句話当然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誣蔑。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抹杀个人的力量，而只是使个人的力量在同集体的力量相結合中得到正确的、充分的發揮。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个性是和集体相协調的个性，而不是和集体相对抗的个性。个人的才能、智慧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得到最圓滿的發展。但是如果把他所說的"个人"改成"个人主义"，倒是恰当的。要扩大社会主义，就要縮小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惡之源。

現在世界上存在社会主义体系和資本主义体系的对抗；国内資产阶級还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始終不渝地坚持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意識形态上的斗爭却是無可避免的。資本主义制度和文化虽然已經沒落和腐爛，但对于許多人还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徹底地批判資产阶級思想，仍然是今后相当長的时期內思想工作的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

1877

三　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路綫

由于阶級立場和世界观的不同，我們和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在文艺思想上是存在着根本分歧的。有兩条路綫，一条是：文艺为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眞实地表現群众的生活和斗爭而又为群众所理解和喜爱，提高群众的思想情感，鼓舞群众建設新生活的信心。这种文艺是促进社会的發展和进步的。这就是我們所主張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綫，也就是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綫。另一条路綫是：文艺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服务，而只是为少数人服务，只是为了表現自己，滿足个人名利欲望和迎合少数人的趣味，不是鼓舞群众的革命热情，而是沮丧群众的战斗意志。这种文艺对于社会的發展不是促进而是促退。这就是右派分子所主張的資产阶級的文艺路綫，也就是反馬克思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綫。

無产阶級的文艺观和資产阶級反动派的文艺观历来是互相斗爭的；社会主义文学就是在这种斗爭中成長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眞正劳动人民的文学，它吸引了一切为社会主义偉大目标所鼓舞、願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作家加入了这个文学的队伍，同时也不断地遭受了資产阶級文学貴族們的种种攻击、誹謗和嘲笑。二十多年来，我国無产阶級文学运动，曾經一面抗击反动統治者的血腥的迫害，一面同各种各色反动阶級的文学代理人进行尖銳的斗爭。我們粉碎了封建买办文学和法西斯文学，我們駁倒了新月派、第三种人等資产阶級文学派別的讕言。当时，正如魯迅所說，無产阶級文学运动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文学运动。沒有任何一个反动的文学派別、文学集团能够和它相抗衡。在全国解放后，我們又批判了《武訓傳》的反动傾向，批判了《紅楼夢》研究中的資产阶級观点，徹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他們的文艺思想，全面地批判了胡适思想。

資产阶級是不会放棄或停止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进攻的。在这次国际国內的反共逆流中，社会主义文艺又遭到了一次新的攻击。

修正主义者出来大显身手。他們一般地并不公开反对社会主义文艺。他們反对的方法比較巧妙。他們片面夸大我們文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借此把社会主义文艺塗上一臉污泥。我国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拾取了外国資产阶級反动作家的唾余，对苏联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加以詆毀。馮雪峰說苏联文学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精神还赶不上旧俄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編輯会議上的講話)。刘紹棠也鸚鵡学舌地說苏联文学在近二十年不如前二十年，說我国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以后的十五年来也退化了（在中共北京市委所召开的宣傳会議上的發言）。吳祖光認为解放以来的文艺工作比任何时候都糟。馮雪峰說我們的文艺作品"眞实性非常低"(第二次文代会报告草稿)。吳祖光把我們今天的文艺和社会都看成一片虛伪。他說在我們的文艺中看不到"眞心話"，看不到"心里想說的話"(«談后台»)。为什么作家不能說"心里想說的話"呢？据說是因为在我們的社会里沒有"創作自由"。所以秦兆阳說作家們"一举一动，总是左顧右盼，心神不安"，"不敢写""自己感到最激动的、最严正最尖銳的題材"，而只能写些"平平常常"的东西（見«日常談話录»，笔名鑒余）。

否定或貶低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說社会主义文艺不眞实，說在我們的社会里沒有"創作自由"，这就是資产阶級右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要論点。很明显，他們攻击的目标不只对着文艺本身，而是对着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我們应当怎样来估計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呢？

社会主义文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的文学。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能和它相比。历来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把工人、农民的劳动和斗爭当作作品的主題。眞正的劳动者，那些創造社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人，在过去的作品中沒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地主、貴族、商人、資产阶級及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代表人物占据了过去作品的絕大篇幅。这是不公平的。社会主义文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不合理的現象。为劳动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方針。它以無限的热情肯定和歌頌了工人阶級的偉大斗爭。它描写了

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間的新的关系、新的道德和风习，描写了那些逐步摆脱了旧社会影响的新的人物、新的性格以及他們对旧事物旧思想的斗爭。从来沒有一种文学能够像社会主义文学那样有力地肯定生活，肯定現实，那样坚定地相信人类，相信未来，相信人民的無穷的創造力。从来沒有一种文学在思想上和情感上能够像今天的文学这样徹底地解放，有这样乐观的精神，雄偉的气魄，远大的理想。我們的文学作为一种积极的精神教育的武器，受到了人民的最广泛的支持和热爱。現在一本較好的作品要發行十几万册或几十万册，一部較好的电影，观众达到几千万人次。这是过去的文学艺术事业根本不能比拟的。人民成了文艺的积极的主人；他們关心文艺，把文艺事业当作自己的偉大的創造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組成部分。作家不再是站在人民之上或人民之外的人物，而是人民群众中間的一分子，他們把密切联系群众，努力为人民写作，当作自己的神聖职責。这样的文学，难道不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先进最崇高的文学嗎？

社会主义文学的偉大成就，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西方的一些資产阶級作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內的某些修正主义者，利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大肆叫囂，說苏联文学已經"停滯"，說社会主义現实主义表明苏联文学"退化"了，又說社会主义現实主义不过是少数人"揑造"的口号，实际上这种文学是不存在的。他們中的一些人不但反对文学中的社会主义傾向，而且根本否定現实主义，認为現实主义是"过时"的方法，而醉心于时髦的現代主义及其它各种頹廢主义的傾向。他們的这种叫囂絲毫無損于苏联文学的光輝，而适足以暴露他們反动的資产阶級观点和偏見。苏联的文学艺术用先进的世界观和革命精神教育和鼓舞了全世界的讀者；它推动了一批一批的人走向革命，教育了一批一批的人成为新生活的建設者。苏联各民族文学的發展，是旧时代所夢想不到的。有些过去連文字都沒有的民族，現在已經有了自己的文学，自己的作家。还有甚么一种文学能对人类作出这样巨大的貢献呢？还有甚么一种文学

能有这样广大的群众基础呢？对于这种文学，誰能抹煞它的价值呢？無可否認，苏联文学是世界無产阶級文学的偉大的开拓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人类艺术發展的新阶段。

我国的文学，在共产党領导之下，从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最正确的創作原則，把苏联的作品当作自己的榜样。我們学习苏联的經驗，当然不应教条式地、机械地照搬，而应按照本国的具体实际，独立地、有分析地加以吸取。社会主义文学只能在自己民族的土壤上产生和發展，它必須批判地繼承民族的傳統，具有民族的风格。我們从来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由于我們的文学是和最先进的阶級、最先进的思想、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它在短短的期間就有了过去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巨大發展。右派分子說現在作品少了，戏也少了，一切都今不如昔。是的，那种为地主貴族、为資产阶級老爷所需要的文艺不但是少了，而且会完全淘汰。至于为劳动人民所需要的文艺，却不是少了，而是从来也沒有像今天这样多。这是除了閉着眼睛說瞎話的右派分子，誰都看得見的事实。我們的新文艺正在逐步深入到工厂、农村和部队。現在工农出身和实际工作干部出身的作家正在不断地涌現。从各兄弟民族中間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家。工农群众的业余文学創作越来越多了。农村剧团已經發展到几十万个，农民业余創作的剧本数以万計。右派分子当然看不起群众的創作，但是我們却从这个空前的普及規模上看到了我国文艺事业的未来。我們一貫重視文学艺术的普及工作，重視劳动群众的业余創作的大量發展。文艺的群众路綫保証我們的文学艺术能够达到普遍的繁荣和高漲。但是，我們从来不滿足于文艺事业已有的成績，因为它离人民所希望和要求于它的还很远。無可諱言，我們今天好的作品还太少，今天的作家中还很少有人能够赶上并且超过我們的一些偉大的先輩。許多作家还缺乏对于社会和时代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的能力。这是不足为奇的。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成熟，需要經过一个相当長久的过程。

社会主义文学还是比較年青的文学。苏联文学从高尔基一九〇

七年發表«母亲»算起，到現在不过五十年出头一点。我国新文学运动从"五四"到現在还不滿四十年；严格地說，我国文学明确地自覚地走上为工农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是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以后开始的，到現在才有十五年多一点。这比之有兩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和有四五百年历史的欧洲資产阶級时代的文学，时間就短得多了。怎么能拿衡量几百年、几千年中所产生的东西的尺度来要求几十年中所产生的东西呢？但是当我們的作家透徹地理解了我們所处的时代，和劳动群众眞正打成了一片，并且充分地掌握了优秀的文化遺产的时候，当文学有了巩固的新的群众基础的时候，社会主义文学一定能够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結晶化的程度上很快地赶上并超过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对这一点，我們从来是充滿信心；我們每天都在为这个目标創造必要的条件。

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圍內举行一次最徹底的思想战綫上和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給資产阶級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軍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給他們帶上的脚鐐手銬，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無产阶級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發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沒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縱队的無产阶級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縱横馳騁了。文学艺术也要建軍，也要練兵。一支完全新型的無产阶級文艺大軍正在建成，它跟無产阶級知識分子大軍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認为不正确。

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必須繼承过去文学艺术中的一切优良傳統，我們的作家必須向先輩学习。但是我們的文学艺术既然叫做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它就只能以共产主义世界观作为它的思想基础，因此，它必須像«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和"过去遺傳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徹底的决裂"。否則，就会像«宣言»中所批評的那些所謂"眞正社会主义"的詩人一样，写出来的作品名曰"社会主义"

的，而实际是資产阶級的。我們重視傳統，但决不是像鍾惦棐所說退回到过去的时代去。我們必須在新的思想基础上来繼承和發展傳統。我們的文学艺术应当以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人們，而不应当再向人們灌輸封建主义或資本主义的思想。馮雪峰劝告«詩刊»的編者，要他們把这个刊物办成十九世紀的或二十一世紀的，而不要办成二十世紀的。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叫我們的詩人脫离今天的实际，脫离当前人民的斗爭；就是叫我們只繼承十九世紀西方資产阶級文学的衣鉢，宣傳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而不要宣傳工人阶級的社会主义思想。修正主义者十分厭惡文学艺术表現社会主义思想，他們力圖否定社会主义現实主义文学艺术和过去一切时代的現实主义文学艺术的原則的区别。秦兆阳就是如此，他說："想从現实主义文学的內容特点上將新旧兩个时代的文学划分出一条絕对不同的界綫来，是有困难的。"（«現实主义——广闊的道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不可能有"絕对的"界綫的，但是模糊界綫，就是模糊对事物的認識，就是否認事物的本質的区别。秦兆阳的这些話，無非是否定文学艺术的阶級性，否定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革新意义。实質上，就是要用資产阶級的文学艺术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

我們应当怎样来看文艺的眞实性这个問題呢？毫無疑問，文艺必須眞实，不眞实的文学艺术是沒有价值的，是人民所不需要的。問題是：什么是眞实？作家、艺术家是站在什么立場和抱着什么目的来描写眞实？

首先，应当說，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是最眞实的文学艺术。因为工人阶級是最先进的阶級，它从来不害怕揭示生活的眞实狀况。只有剝削阶級，为了蒙蔽劳动人民的眼睛，才需要掩盖現实的眞象。正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眞实地表現了人民群众在劳动和斗爭中改造世界，同时又改造自己的雄偉过程，描写了推动社会前进的阶級斗爭和新旧斗爭的复杂現象。这种文学艺术打动了新时代的千百万群众的心灵。世界上还有甚么文学艺术比这更眞实的呢？

大家知道，文学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而現实生活中是存在着各

种各样的矛盾的。馬克思主义告訴我們：人类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之間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間的矛盾，这兩种矛盾就体現为生产斗爭和阶級斗爭，在阶級消灭以后則体現为新旧斗爭。毛澤东同志又特别指出在人与人之間的矛盾中必須严格区别兩种性質不同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和人民的敌人之間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我們的文学艺术在表現人民如何同他們的压迫者、剝削者作英勇卓絕的斗爭这一方面繪下了悲壯的震撼人心的画卷。但要表現人民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之后如何正确地处理他們自己之間的矛盾，如何摆脫長期旧社会遺留在他們身上的影响，如何正确地解决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如何讓先进克服落后，并帶动落后的人一同前进，这就在我們的作家、艺术家面前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創作上的任务和一連串新的問題，需要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文学艺术来解决。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就正是在这个問題上和我們糾纏。教条主义者看不見或者不願意承認人民內部的矛盾，就必然会走到文学艺术上的無冲突論，这当然是錯誤的。但是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故意模糊或掩盖人民同人民的敌人之間的矛盾，而把人民內部的矛盾，特别是被領导者和領导者之間的矛盾当作旧时代的被压迫的人民同反动統治者的矛盾来看待，把本来是人民之間的是非問題，夸大成为敌我的問題，这就是更錯誤，而且更危險得多了。他們認为文学艺术的主要任务就是暴露我們社会的缺点，揭發生活中的阴暗面。在他們眼中，似乎只有揭露阴暗面的作品才是"眞实"的，而"歌頌光明面"的作品就都是"粉飾現实"的，"不眞实的"。他們的所謂眞实是那种消极的、落后的、停滯的、死亡着的东西，他們不能或者不願意看到作为社会主义現实主流的一切生气勃勃的、强有力的、沸騰着的、前进着的东西，不能或者不願意用革命的、發展的观点来观察社会主义的眞实，否認革命的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他們主張作家自然主义地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去搜罗缺点，寻找黑暗，然后把它們加以放大，一件一件地陈列出来，讓人民看了丧气，敌人見了鼓掌，引起人們对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

的失望和怀疑。这就是他們提倡的所謂"写眞实"，他們所鼓吹的甚么"大胆干預生活"的眞正目的。

提倡作家、艺术家暴露人民的"黑暗"这种理論并沒有甚么新穎之处。早在十五年前王实味在延安就是这种理論的首創者，蕭軍、罗烽等人从而附和之，借口"太阳里面也有黑点"，假借所謂"魯迅笔法"，鼓动作家用当年魯迅对付敌人的那种"匕首""投槍"式的杂文来攻击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作品，就是这种主張的实踐。《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給了这种反动思想以严厉的批判。不料近一兩年来，在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冲击之下，在我国提倡写黑暗的論調又甚囂塵上，几乎成为一时的风气。刘宾雁就是在这种空气下成了名人。他們正是王实味傳統的一脉相承。显然，他們并不是想要認眞地来解决如何在作品中眞实地表現人民內部的矛盾及正确地批評生活中的落后現象这个問題，而是借此夸大人民內部的矛盾，顚倒是非，混淆敌我，企圖把文学艺术引到反人民的道路上去。

在我們的社会中是否存在着缺点和阴暗面呢？当然是存在的。缺点和阴暗面，不但現在有，將来也永远有，否則历史就不会繼續前进了。历史永远是在矛盾斗爭的过程中前进的，永远是在克服缺点和阴暗面的过程中前进的，旧的缺点克服了，新的缺点又会产生。在我国的目前时期，剝削制度基本上消灭了，但是，旧思想旧习慣的影响还是頑强地存留着；人民的經济生活和文化水平还沒有提到更高的程度；人民为着建設自己的新生活还須忍受和克服种种的难以想像的困难；官僚主义和各种脫离群众、違反群众利益的現象还是經常發生。我們当然不需要去掩盖这些生活中的消极的阴暗面。但是，必須看到，正是生活中的新的、积极的、先进的事物才是我們社会中的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六亿中国人民組織起来了，有了社会主义的覚悟，有了高度的紀律精神，这就是排山倒海旋轉乾坤的力量。眞正爱国的爱人民的作家、艺术家，誰能不为此而感动而鼓舞呢？只有那些在精神上和沒落阶級相联系的作家、艺术家

才不願看見我們生活中的这个偉大变化，不願承認新事物的强大的生命力，对着蓬勃發展的新的現实，他們所感到的，只是黑暗和缺点。有阴暗心理的人，看一切事物都是阴暗的，对于他們，阴暗就是唯一的眞实。他們害怕看到光明，社会主义的逼人的光芒，他們看了是很不舒服的。这完全是他們的阶級本能的反映。他們总是面向过去，留恋过去，把在过去地主資产阶級統治时代人們的生活和心理面貌当作一成不变的眞实，他們看不見或者不願意看見新时代人物的性格和相互关系的根本变化。文学应当深刻地挖掘人的灵魂，不应当把人的心理簡單化。但是时代变了，人物的性格和关系也变了，文学怎么可以照老样子去描写呢？具有集体主义思想和高度紀律性的人們在生活中不断涌現出来了，他們是新时代的英雄。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不相信在这新时代中，人的思想深处可以沒有个人主义，英雄可以临难不惧，內心沒有絲毫动摇。他們不相信这一切。“人不为己，天誅地灭”，“到处烏鴉一般黑”，这就是他們的哲学。如果作品中写了新生活、新性格的眞实，他們就認为是不眞实的，“理想化的”。新事物分明在生活中已成为大量存在，但他們却还是視而不見，仍然一心去寻找旧事物；而当新事物还处于萌芽狀态时，那就更不值他們的一盼了。我們批評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主要是由于这些作品对于我們时代的英雄的現实沒有能够作出有力的深刻的反映。它們把生活簡單化了。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却是相反，他們不滿意的正是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工农群众的新生活，而他們是不喜欢这种生活的。他們說生活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群众就是“教条主义”的，这就可見他們反对的并不是甚么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而是新生活的本身，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身。刘紹棠反对社会主义現实主义，認为作家不应当从“动”的观点而应当从“靜”的观点来观察和描写現实，这正是表現了他惧怕社会主义变革的資产阶級反动观点。

我們同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分歧，还不只是在于他們故意地不适当地夸大我們生活中的缺点和阴暗面，而更在于他們从資产

阶級个人主义的立場出發，常常把生活中正面的积极的事物当作坏現象，而把反面的消极的事物当作好东西。在他們看来，农业合作化是坏事情，应該反对，而富裕中农的資本主义自發势力是好的，值得同情；思想改造是不好的，坚持資产阶級思想是好的；个人服从集体是不好的，發展个人主义是好的；遵守紀律是不好的，自由主义是好的。在他們看来，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的人，是"衰退"的或者"庸碌"的人，而狂妄自大，目無組織的人，是有"朝气"有"才能"的。人們的立場不同，嗅覚視覚也跟着不同了。丁玲的《在医院中》和刘宾雁的《本报內部消息》，就是兩个最突出的标本，作者完全站在反党反人民的立場，歪曲了我們的現实生活，而把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者当作英雄来加以歌頌。可見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提倡暴露黑暗，只是暴露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的黑暗，而并不是暴露地主和資本家的黑暗。他們嘲笑和反对表現新英雄人物，原来也只是反对表現新的集体主义的英雄人物，而对于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英雄"，他們却永远也歌頌不完。

我們的文学作品是应該暴露黑暗的。既然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文学就应当既歌頌光明又揭露黑暗，就应当描写光明和黑暗的斗爭。文学不应当片面地反映生活。凡是足以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落后的現象，都应当加以批評和揭露。官僚主义就是这种現象之一，就应当揭露和批判。我們的文学作品应当成为和一切消极事物作斗爭的武器，成为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我們是反对無冲突論的。問題是从什么立場和为什么目的去进行揭露和批評。我們的作家应当站在正确的立場明辨事非，眞正分清什么是光明面，什么是阴暗面；不要有閒必录甚至幸灾乐禍地去渲染和夸大阴暗面，抹煞光明面，造成讀者对生活的曲解和失望。我們的作品应当描写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缺点和錯誤，当然也可以描写失敗和犧牲，但不应当使人看了灰心丧气，而是增添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我們对于現实是充滿信心的，所以我們的文学永远是乐观的。我們和右派分子、修正主义者在关于写黑暗的問題上的分界

綫就在这里。

無論是外国的法斯特，或是我国的馮雪峰，都把艺术的眞实性和政治的正确性对立起来，似乎一个作家如果有一个正确的政治立場，就不可能在艺术上保持眞实了。法斯特叛党以后就宣布他今后再"不能按照'正确'的来写作"。他要求在政治上犯錯誤的权利。馮雪峰也劝告作家不要首先考虑政治上正确或錯誤的問題。主張修改社会主义現实主义原則的秦兆阳說得更巧妙些。他說要作家腦子里具有社会主义的精神和願望，那"就無異于是說，客观眞实并不是絕对地值得重視，更重要的是作家腦子里某种固定的抽象的'社会主义精神'和願望，必要时必須使血肉生动的客观眞实去服从这种抽象的固定的主观上的东西；那結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脫离客观眞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傳声筒。"（«現实主义——广闊的道路»）按照秦兆阳的意思，"客观眞实"和作家的"社会主义精神"似乎是格格不入的，只有所謂"客观眞实"才"絕对地"值得重視，甚么"社会主义精神"和願望，頂多只是"相对地"值得重視罢了，在他看来，导致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妨碍作品的眞实性的，不是别的东西，原来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精神。他憎惡、討厭这个社会主义精神。要沒有这个"固定的、抽象的主观上的东西"，該多好呵！那时作家就可以講自己"心里想說的話"，就可以写"自己感到最激动的題材"了！当然，作家应当而且只能写"自己感到最激动的題材"。但使你最激动的是什么呢？为甚么群众中大量新的社会主义的事物引不起你絲毫的兴趣，而一个个人主义的知識分子在革命集体中的遭遇却使你兴奋得終夜失眠呢？作家应当眞誠坦率，把自己的思想用最明确最不含糊的形式表达出来。一个眞正站在人民立場的作家是决不隐蔽自己的观点的。但在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看来，一个作家如果講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拥护社会主义的話，那就不是講的"眞心話"，反之，如果講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話，那倒是"眞心話"了。他們自己又不敢直捷了当地講出这种"眞心話"来，因此講話就只好含糊其詞，一举一动，总是

"左顧右盼，心神不安"了，这眞是那些怀有鬼胎的人們的眞实心理的写照。

我們应当怎样来看創作自由的問題呢？在我国，文艺和科学事业是享有充分自由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就是这种自由的重要保証。我們的国家为文艺及其他各种書籍的出版提供了最优越的条件。根据宪法，国家只对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加以限制或禁止，因为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不容許的。而右派分子所盼望的，却正是出版这类作品的自由。

我們要求文学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而不是資产阶級的文学，要求文学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上等人"服务。对于資产阶級的作家、对于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来說，这的确是限制了他們的自由。他們不能自由地鼓吹資产阶級反动思想，不能自由地写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了，因为这样的作品会受到群众的指責和反对。但是，对于工人阶級的作家，对于願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作家来說，这不是限制他們的自由，而恰恰是扩大他們的自由。正是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崇高目的，使我們的作家能够摆脫資产阶級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束縛，和劳动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爭中取得無限丰富的創作源泉。这是創作上的眞正的自由。作家感到不自由，正是由于受到那种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的束縛，正是由于他不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他只能表現自己或自己周圍的少数人，因而他的自由是很小的。作家只有和时代和人民相結合，才能有眞正的广大的自由。

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認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不自由。馮雪峰曾經責备我們不尊重作家"創作的权利和自由"，对作家实行了"思想上的管制"，說我們要求作家为当前的革命任务而写作，是制造"奉命文学"。他忘記了偉大的魯迅就是把自己的作品称为"遵命文学"，他是以遵先驅者之命而創作作为自己的光荣的。当然，我們不应当把为政治服务狹隘地解釋为要求作家去

宣傳党和国家当前的每个具体的、个别的和只有暫时的局部的意义的政策，更不应当要求作家按照政策的条文写作。如果那样要求，是会有害于創作的，是錯誤的，因为那样"創作"出来的作品沒有人愛看，人們將說，我們与其看这种作品，还不如看报紙的社論了。人民所要求于文学的，显然是另外一种性質的东西。人民要求从文学中看到社会主义生活的广闊和丰富的画面，从那里面学会怎样認識和对待新的生活，而不是去寻求例如怎样調整物价、怎样預防傳染病之类的答案。但是，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所要求的"創作自由"，实际上却是要文艺脫离社会主义，脫离当前人民的斗爭，摆脫党的領导。他們一心要实行資产阶級的文艺路綫，党的領导当然会使他們感到"不自由"。因此他們总是用种种的口实和理由来攻击党对文艺事业的領导。

有些作家感到不自由，是因为他們的作品發表出来以后，常常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評，文字的和口头的，群众中来的和領导上来的，使他們感到有一股很大的精神的压力。压力总是不好受的。但我們也要加以分析。不講道理的、粗暴的批評，对創作是有害的。这种压力应当反对。另一种是正确而恰当的批評，包括領导和群众的意見，某些作家認为这也是压力。但这种"压力"，我們是不应当反对的。作品是通过艺术形式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給予社会以影响。它不能不受到社会輿論的評判。而無論是贊揚或者指摘都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我們需要健全的社会輿論，同时作家也要有不怕批評的勇气。对人民具有高度責任感的作家艺术家应当重視别人的意見，欢迎批評。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三月間召开的全国宣傳会議上說："徹底的唯物主义者是無所畏惧的。"我們大家都应当努力做这样的唯物主义者。

至于在作品的取材上，在表現手法和艺术风格上，作家应当有完全的自由，我們提倡写工农兵，决不是排斥作家按照不同的經驗、特長和兴趣写各种其他的題材。我們認为社会主义現实主义是最好的創作方法，但这只能向作家提倡，鼓励作家提高馬克思列宁主义

的思想修养，密切和劳动人民的联系，使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成为作家的血肉和灵魂，而不是向作家下一道强制执行的命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只能从每个作家具体創作实踐的結果中体現出来的，而不能主观地强求。在艺术风格上，我們鼓励多样性和个人独創性。

以上所述，就是我們同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在文艺思想上的主要分歧。可以看出，这个分歧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現在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看法上。修正主义者力圖使文艺脱离革命的政治。教条主义者簡單地認为只要有政治，就有艺术。他們忽視艺术創作的特点和技巧的重要。他們的公式是政治即艺术，实际就是取消艺术，这当然是錯誤的。修正主义者的公式則是艺术即政治；这是使政治服从艺术，实际就是使革命的政治服从于掩盖在艺术外衣之下的反革命的政治。教条主义者認为馬克思主义不但可以包括而且可以代替創作方法，他們以全体代替部分，有导致作家离开現实主义道路的危險。修正主义者則相反地認为創作方法可以包括甚至代替馬克思主义，他們是以部分代替全体；其目的就是誘导作家离开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的公式，应当是像毛澤东同志所說的，“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創作中的現实主义”。教条主义者虽然和修正主义者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場，但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他們总是把政治和艺术看成对立的或者等同的。馬克思主义者把政治和艺术看成对立的統一；把“政治和艺术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統一”作为創作的奋斗目标；以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統一而以政治标准为第一来衡量一切作品，这才是正确的。

我国文艺上的無产阶級路綫和資产阶級路綫的斗爭是由来已久的。这是文艺上兩条路綫的斗爭。無产阶級的文艺路綫曾經經历了它的幼稚的阶段，犯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及其它各种錯誤，到一九四二年毛澤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發表后，才奠定了坚固的理論基础，并且在实踐中完全証明了这条路綫的正确。

教条主义的錯誤，需要繼續加以克服。但目前更危險的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資产阶級思潮在工人阶級內部的反映，它的特点是打着馬克思主义的招牌，在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口实下来反对馬克思主义，反对党的領导。修正主义文艺路綫的主要內容就是否定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崇高使命，否定在阶級社会中文艺的阶級性，否定或歪曲民族的文化傳統，否定作家的思想改造，否定党对文艺事业的領导作用。二十多年来，我們和胡风、王实味爭的是这个問題，和馮雪峰爭的也是这个問題。馮雪峰和胡风的思想是一脉相通，代表一条修正主义的資产阶級路綫。（他們自己吹嘘代表什么現实主义正統，实际上他們代表的正是反現实主义的路綫。）修正主义路綫如果得了势，就会把我們的文艺事业引到資产阶級的方向上去，就会使文艺队伍陷于分裂。所以，我們必須在繼續克服教条主义的同时，將重点放在反对修正主义上。只有这样，我們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才能前进，队伍才能团結。我們揭露了丁玲、陈企霞、馮雪峰等人的反党活动，就是排除了文艺队伍的宗派分裂的危險因素，保障了我們的文艺队伍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紧密地团結前进。

* * *

文艺界的反右派斗爭取得了胜利，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順利發展扫清了道路。我們必須巩固这个斗爭的胜利。現在全国人民正处在生产建設的高潮中。我們要爭取在文学艺术事业上也来一个大躍进。我国人民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从事改造世界、改变历史面貌的偉大工作，他們的高度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勁在一切方面不可遏止地表現出来，也必然要在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意識形态上得到它应有的反映。劳动人民在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創造精神財富。工农群众对文化的迫切要求是前所未有的，他們的各种业余文化艺术活动正在大量地、蓬勃地开展。我們的文艺如果要达到一个新的躍进，就必須在更大規模和更深程度上和工农群众相結合，文艺作品要在量和質兩方面都能滿足群众的要求。

1892

毛澤东同志早就号召作家"長期地無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爭中去"。現在全国成千成万的領导干部和知識分子下乡上山，参加体力劳动和基層工作。文艺工作者也正在大批地下乡、下厂，建立自己生活的根据地，准备長期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作家在劳动中，斗爭中和工农群众長期結合，已成为我們文艺工作的根本原則。

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群众相結合，就是很好地体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个人才能和群众智慧的結合。我們的社会十分尊重作家艺术家的个人才能，因为只有高度發揮个人独創性，才能使我們的文学艺术丰富多彩。但同时我們始終認为个人才能是群众智慧的集中，个人才能如果脫离了群众智慧的基础，那就像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一样，决不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發展前途。只有眞正与工农群众結合，作家、艺术家的才能才会永不枯竭。

工人阶級的文艺工作者应該頑强地学习。人民不需要空头的文学家、艺术家。我們既要"紅"，又要"專"，既要掌握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要掌握高度的創作技巧。只有当我們的作家、艺术家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技巧上都达到成熟的程度，我們才能够有一支眞正强大的工人阶級的文艺队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学习，别無捷徑。我們要向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中国和世界的一切有益的偉大遺产和傳統学习。我們不只要在書本上学习，而主要地是在斗爭中，实踐中，在互相竞賽和辯論中学习。我們的作家、艺术家应当在創作上和理論上都有高度的勇气，敢于打破成規，大胆創造，敢于革新，敢于幻想，敢于批評。我們要把創造無愧于这个偉大时代的作品当作無可推卸的責任，我們一定要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

（原載"文艺报"一九五八年第五期）

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

列　宁

有名的成語說得好：如果几何学定理触犯了人們底利益，那末人們也一定要把它推翻的。触犯了神学陈腐偏見的自然历史理論，过去和至今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爭。馬克思学說既然是直接致力于啓發与組織現代社会先进阶級的事业，指明这一阶級底任务，并証明由于經济發展，現代制度必然要由新制度来代替，所以这一学說在其生命途程中必須用战斗来爭取每一步的进展，也就毫不足怪了。

不用說資产阶級科学和哲学，不用說这种專由官家教授按官家方式講授，借以愚弄那些从有产阶級出身的青年子弟并"教練"他們去反对內外敌人的科学和哲学了。这种科学根本就不願听見馬克思主义，却宣布說馬克思主义已被駁倒，已被毀灭。無論借駁斥社会主义来獵取名利的青年学者，亦無論拘守各种陈腐"体系"遺教的龙鍾老朽，都是一样努力攻击馬克思。馬克思主义的發展，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級中間的傳播与巩固，必然使資产阶級对于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頻繁，更加剧烈；但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場科学"消灭"之后，却反而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

就是在那些与工人阶級斗爭相联系，主要是流行于無产阶級的学說中間，馬克思主义也絕不是一下子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的。馬克思主义存在的头半世紀中（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就和那些根本上与它相敌对的理論进行过斗爭。在四十年代前半期，馬克思与恩格斯打破了那些站在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上的急进少年黑格尔派。四十年代末，在經济学說方面进行过反对蒲魯东主义的斗爭。五十年

代完成了这个斗爭：批評了那些在狂风暴雨的一八四八年显过身手的党派与学說。在六十年代，斗爭从一般理論方面轉移到更接近于直接工人运动的方面：把巴枯宁派从第一国际里驅逐出去了。在七十年代初期，蒲魯东主义者米别赫在德国出了一个短时期的风头，而在七十年代末叶，又有实証主义者杜林暫时显露过头角。但他們兩人对于無产阶級的影响已是非常微弱了。馬克思主义已經是無条件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其他一切思想体系。

到前世紀九十年代，这一胜利在大体上是已經完成了。就是在蒲魯东主义傳統保持得最久的拉丁語系諸国內，工人政党实际上也是把自己的綱領与策略建筑在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重新恢复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組織，即定期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立刻而且几乎沒有經过什么斗爭，就在一切主要問題方面都站到馬克思主义立場上来了。但当馬克思主义把一切多少完整而与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說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說所表現的趋向便开始来另找出路。斗爭底形式与誘因已經改变，但斗爭还是繼續着。馬克思主义存在的第二半世紀（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是从馬克思主义內部一个反馬克思主义派别所进行的斗爭开始的。

这个派别称呼为伯恩斯坦派，是因为以前的正統派馬克思主义者伯恩斯坦囂張得最厉害，并以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于馬克思学說的修改，对馬克思学說的篡改，即修正主义。就是在俄国这个因国內經济落后以及被农奴制殘余所蹂躪的农民人口占大多数，致使非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自然支持得最久的国家里，这个非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显然迅速地轉变为修正主义。我們的社会民粹派無論在土地問題上（全部土地市有的綱領），或在綱領和策略底一般問題上，都愈益以对于馬克思的种种“修正”，来代替他們根本与馬克思主义相敌对而自成一派的旧体系底那些日益消亡沒落的殘余。

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被击溃了。它已不是站在自己的独立基地上而是站在馬克思主义的一般基地上，以修正主义資格来繼續斗爭了。我們且来把修正主义底思想內容考察一下。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追随于資产阶級教授的"科学"尾后。教授們主張"回到康德那里去"，于是修正主义者也就跟在新康德派后面跑。教授們重复那些說过千番百次的反哲学唯物主义的神道主义濫調，于是修正主义者也就傲慢地微笑着，咕噜着(依据最近出版的教本逐字逐句咕噜着)，說唯物主义早已被"駁倒"了；教授們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付，聳肩蔑視辯証法，而自己却又宣揚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淺薄鄙陋一千倍的唯心主义，于是修正主义者也就随着他們跳到在哲学方面把科学庸俗化的泥坑里去，并用"簡單的"(而且平靜的)"进化論"去代替"狡猾的"(而且革命的)辯証法。教授們拿他們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統治地位的中世紀"哲学"(即神学)，以酬答他們所領得的官家薪俸，于是修正主义者也就依附于他們，努力把宗教变成为一种"私人事情"，当然不是对現代国家說，而是对先进阶級底政党說来是"私人事情"。

对馬克思学說所作的这些"修正"底眞正阶級意义根本就無須說明，因为这是不說自明的。我們只要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只有一位馬克思主义者从一貫的辯証唯物主义观点上批評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胡吹瞎說的鄙陋論調，——这位馬克思主义者就是普列汉諾夫。其所以必須坚决指出这点，是因为現在有一些非常錯誤的企圖，想以批評普列汉諾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借口来販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廢物㊀。

說到政治經济学时，首先就要指出，修正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所作的"修正"是更繁杂周密得多，他們企圖拿"經济發展中的新材料"来迷惑大众。他們說，生产集中以及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农业

㊀ 参看波格丹諾夫，巴查罗夫等人合著的"馬克思主义哲学概論"。这里不是分析这本書的地方，我此刻只要声明一句：在最近將来，我就要写几篇論文或一本特别小册子来指出，本文上关于新康德派修正主义者所說的一切，实質上也是針对着这些新休謨派和新柏克立派的"新"修正主义說的*。

* 列宁不久（在一九〇九年間）就写了"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一書，給了波格丹諾夫等修正主义者及其哲学老師阿万那留斯和馬赫一个歼灭性的批評。

方面全不發生，并且在商业和工业方面也發生得非常緩慢。他們說，現在危机已更少見，更微弱了，而卡特尔和托拉斯大概会使資本有根本消除危机的可能。他們說，阶級矛盾有緩和削弱下去的趋势，所以資本主义"崩潰論"是沒有根据的。最后他們还說，連馬克思底价值論也不妨按照彭巴威尔克观点来改正一下哩。

在这些問題上对修正主义者进行的斗爭，正像二十年前恩格斯与杜林进行的論战一样，使国际社会主义底理論思想有了成效卓著的活躍，根据事实和数字来把修正主义者底論据作了詳細的解剖，証明了修正主义者一貫粉飾現代小生产的事实。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农业方面，大生产在技术上与营业上比小生产占有优势的事实，是用不容辯駁的材料来証明了。但在农业方面，商品生产發展的程度比較薄弱得多，所以現代的統計学家和經济学家，通常都不会把农业方面那些表明农业愈益卷入世界經济交換范圍的特别生产部門（以至于單个生产手續）提出加以分析。在自然經济底廢墟上，小生产是專靠飲食無限惡化，經常挨餓，延長工作时間，使家畜質量及其飼养惡化，总之，是專靠家庭手工业生产所用以反抗資本主义手工工場的那些手段来支持的。科学与技术方面的每一进步，都必不可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坏資本主义社会內的小生产底基础，而社会主义經济学底任务就是要研究这一过程所表現的一切形式，往往是复杂而混乱的形式，要向小生产者証明，他們在資本主义統治时無法支持下去，小农經济在資本主义統治时沒有出路，农民必須轉到無产者底观点上来。从科学方面来說，修正主义者在这个問題上的过失，就是他們用膚淺的态度把某些随便抽出来的片面事实普遍化，却不顧及它們与整个資本主义制度的联系；从政治方面来說，他們的过失就是他們必然——不管是有意或無意——号召农民或推动农民去接受私有主底观点（即資产阶級底观点），而不是推动他們去接受革命無产者底观点。

在危机論与崩潰論問題上，修正主义底情形更是糟糕。只有在最短促的时期內，并且只有最近視的人，才会因受几年工业兴盛和繁荣所惑而想改造馬克思学說底基础。危机之沒有消除，是实际情形

很快就对修正主义者証明了的事实：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个别危机底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危机仍然是資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卡特尔和托拉斯是把生产統一起来了，但同时又显然使生产方面的無政府性日益加厉，使無产阶級生活的困苦以及資本的压迫日益加厉，于是就使阶級矛盾尖銳到空前的程度。資本主义走向崩溃的趋势，無論指个别政治危机和經济危机来說，或指整个資本主义制度完全崩溃来說，都恰巧是由那些最新的巨型托拉斯特别显著和特别广泛地表明出来了。不久以前在美国發生的財政危机，全欧洲失业人数可惊的增加，更不用說有許多标志指明其快要到来的工业危机，——所有这一切都使修正主义者不久以前的"理論"已被所有一切人忘却，似乎連許多修正主义者自己也把它忘却了。只有这种知識分子的不坚定性所給予工人阶級的那些教訓，才是不应忘記的。

講到价值論問題时所要說明的只有一点：就是除了一些非常模糊的暗示和贊嘆彭巴威尔克的論調而外，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絕对沒有拿出什么东西来，所以他們在科学思想的發展上，也就沒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在政治方面，修正派曾企圖眞正修改馬克思主义底基础，即阶級斗爭学說。他們說：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选制已把阶級斗爭底基地消灭下去，而使共产党宣言上所說"工人無祖国"这个老原則成为不正确的了。他們說，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由"大多数人底意志"占統治，所以就不能把国家看作是阶級統治底机关，也不能拒絕与社会改良派的进步資产阶級結成联盟去对抗反动派。

毫無疑义，修正主义者底这些反对意見，是个頗为严整的观点体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那些自由資产阶級的观点体系。自由派向来都說，資产阶級国会制度消除阶級与阶級区分，因为所有一切公民都同样拥有投票权与参政权。十九世紀后半期的全部欧洲史与二十世紀初期的全部俄国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非常荒謬。在"民主"資本主义的自由下，經济上的区别不仅不减弱下去，反而加强加

厉起来。国会制度不仅不把甚至最民主的資产阶級共和国也是阶級压迫机关的事实取消，反而將其明白揭示出来。国会制度帮助去啓發和組織广大民众，其人数要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者多过無数倍，——但国会制度以此所准备的并不是使危机与政治革命归于消灭，而是使国內战爭在政治革命發生时最高限度尖銳化。一八七一年春的巴黎事变与一九〇五年冬的俄国事变㊀，已非常明显地証明这种尖銳化是必然到来的。法国資产阶級絲毫也沒有躊躇，立刻就与民族公敌，与蹂躪其祖国的外国軍队勾結起来鎮压無产阶級运动。誰不懂得国会制度与資产阶級民主制度底必然內在辯証規律引向于比先前更激烈地用群众强力手段去解决爭执，那他就永远不能在这个国会制度基地上去进行原則上坚定的宣傳与鼓动，去眞正准备工人群众胜利地参加这种"爭执"的解决。在西欧与社会改良主义自由派实行联合妥协和联盟的經驗，以及在俄国革命中与自由改良派（立宪民主党）实行联合妥协和联盟的經驗，都已十分确鑿地証明这种妥协只能模糊群众意識，因为这种妥协不是加强，而是减弱群众斗爭底眞正意义，把努力斗爭的人与那些最不能斗爭、最动摇、最富于叛变性的份子混在一起。法国的米勒蘭主义，是在眞正全国的广大范圍內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試，它給了修正主义一个使全世界無产阶級永远也不会忘掉的实际估計。

修正派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最終目的所持的态度，是从他們經济傾向与政治傾向中自然得出的結果。"最終目的算不得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斯坦这句流行一时的話，要比許多長篇議論更能表明修正主义底实質。临时应付，迁就眼前事变，迁就細小政治变动，忘記無产阶級底根本利益，忘記整个資本主义制度，整个資本主

㊀ （一）"一八七一年春的巴黎事变"——一八七一年三月，巴黎工人实行起义，結果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級政府"（馬克思語），即巴黎公社；法国反动政府在普鲁士寇軍帮助下把巴黎公社沉入血海了。（二）"一九〇五年冬的俄国事变"——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工人举行武装起义，結果是被沙皇政府殘酷鎮压下去了。

义演变底基本特点，为謀暫时的实际利益或想像中的利益而牺牲無产阶級底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底实質中，也就可以明白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無穷繁杂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穎的"問題，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沒有預察到的变动，即令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內改变基本發展路綫，也必然会引起某种修正主义的。

修正主义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它在現代社会中有其阶級的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的現象。每一个稍有見識稍有头腦的社会主义者，都能十分明白：德国正統派与伯恩斯坦派間的关系，法国黑得派与饒勒斯派（現在尤其是布魯斯派）間的关系，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与独立工党間的关系，比利时普劳克尔与王德威尔得間的关系，意大利整体派与改良派間的关系，俄国布尔什維克与孟什維克間的关系，实質上到处都是一样，虽然按所有这些国家底現狀来說，彼此有极不相同的民族条件和历史特点。現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內部的"分野"，实际上現时在世界各国都已經是按着一条路綫进行着，这表明比之三四十年前已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內斗爭的并不是統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內部的一些同样的趋向。而現时在拉丁語系諸国表現为"革命工团主义"的"左的修正主义"却也都依附于馬克思主义，而加以"修正"：意大利的拉布里奧拉，法蘭西的拉薦德尔，开口閉口都說他們反对向来被人了解得不正确的馬克思，而訴之于現在他們了解得正确了的馬克思哩。

我們在这里不能分析这个修正主义底思想內容，它还远不如机会主义派的修正主义發展那样成熟，还沒有国际化，而且無論在那一个国家里都还沒有与社会主义政党作过一次巨大的实际搏战。因此，我們在这里只以分析上述那个"右的修正主义"为限。

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資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呢？为什么它的根源比民族特点的区别和資本主义發展程度的区别还要深刻呢？这是因为在任何資本主义国家里，都存在有一些与無产阶級并立的广泛的小資产者阶層，即小业主阶層。資本主义是从小生产中誕生

出来，并且經常从小生产中誕生着的：資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出許多"中間阶層"(工厂附屬物，如家庭包工，以及因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車工业和汽車工业需要而散布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也是不免要被抛入無产阶級队伍的。所以，小資产阶級的世界观当然也就往往在广大工人政党队伍中暴露出来。这种情形当然是不可避免，而且一直到無产阶級革命發生的时候还要繼續存在，因为若以为必須有大多数人口"完全"無产阶級化时才可实現無产阶級革命，那就是极錯誤的想法。凡現时我們往往仅在思想方面經历着的事情，即同那些修正馬克思理論的人进行的爭論；凡現时在实踐方面仅按工人运动个别局部問題暴露出来的事情，即我們与修正派間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發生的分裂——这在將来無产阶級革命發生时是工人阶級一定要在更大得無比的范圍內經历到的，因为無产阶級革命將使一切爭論問題尖銳化，將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于决定群众行动有最直接意义的各点上，將迫使我們在斗爭激烈时区分友敌，抛开那些惡劣的同盟者，以便給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革命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十九世紀末叶进行的思想斗爭，不过是無产阶級偉大革命搏战底序幕而已；無产阶級不顧市儈們如何动摇与懦弱，而向前迈进去爭取本身事业底完全胜利。

写于一九〇八年四月

(按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排印)

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批判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論

（見本書第八三四至八三八頁）

对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斗爭到底

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社論

我們党的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的决議，針对着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情况，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宣言中的观点，保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則，反对現代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任务。""同各国兄弟党一起，在政治上和理論上徹底粉碎現代修正主义，保衛馬克思列宁主义，保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統一，是我們党对国际工人阶級的神聖义务。"現在，反对以南共綱領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义的斗爭是已經开始了，但也只是一个开始。为了在政治上和理論上徹底粉碎現代修正主义，就需要把这个斗爭繼續进行到底。

这样来对待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不是"过火"了？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爭取和平的斗爭，会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这是需要答复的問題。

有些人可能以为，南共綱領即使是修正主义的，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最好也不要那样指明，以免把南共領导集团推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但是南共綱領之为現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之有利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这个事实并不决定于任何方面的任何批評，而决定于客观存在的南共綱領本身。在南共領导集团起草他們的綱領的时候，并沒有人指責他們是現代修正主义者，或者預先断定他們將提出一个如此集修正主义之大成、如此攻击社会主义陣营而如此保护美

帝国主义的文件。相反，就在南共领导集团拒絕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議、并且公开反对这个会議所通过的宣言的时候，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仍然对南共保持友好关系，并沒有同它进行爭辯。但是这一切并沒有阻止南共提出和通过自己的修正主义綱領。当南共綱領已經明明白白地違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則的时候，你不說它是修正主义，除了不利于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的覚悟以外，又能有什么别的結果呢？当南共綱領和南共领导集团的言論行动已經实际上帮助了美帝国主义，甚至美国的帝国主义报刊也已經毫不諱言“鉄托的利益在將来很長时期內將与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是唯一秘密任务的同伙”的时候，你不說他們是为帝国主义效劳，除了讓杜勒斯之流窃笑以外，又有什么意义呢？

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一切事物的基本出發点，就是按照它們的本来面目去認識它們。我們不贊成把南共綱領和南共領导集团描画得比本来面目更坏，但是我們也沒有义务和权利把它們描画得比本来面目更好。正是从这个立場出發，人民日报五月五日的社論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决議，才一再指出，在一方面，共产党情报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关于南共的决議是錯誤的，一九四八年六月情报局批評南共的方法也是有缺点和錯誤的，而一九五四年以来，以赫魯曉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糾正了这些錯誤，創議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并且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在另一方面，一九四八年情报局决議对于南共錯誤的批評，却是基本上正确的和必要的。基本上正确的和必要的批評，用了有缺点和錯誤的方法，这是可惜的，应該当作教訓的；但是形式同內容尽管不协調，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应該对正确的东西和錯誤的东西加以实事求是的分别对待，并且首先注意內容。現在的問題是，当苏共和其他有关的共产党采取积极步驟，消除了所有的缺点和錯誤以后，南共領导集团却企圖利用一九四九年的錯誤和一九四八年的方法上的錯誤，根本否認一九四八年批評中的一切正确的东西，并且

在各国共产党久已不提一九四八年的决議以后，在南共的代表大会上对这个决議大肆攻击。这样，我們就不能不再一次看看一九四八年的决議究竟說了些什么。

請看吧！这个决議批評南共領导机关“实行着一种脱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正确路綫”；批評“南共領导者抱着一种共产党員不应有的立場，由于这种立場，南共領导者开始把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混为一談，并把它对待資产阶級国家的同样态度对待苏联”；批評“南共領导者离开了工人阶級的立場，脱离了馬克思主义关于阶級和阶級斗爭的理論”；批評“南共領导机关修改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說”。这些批評是不是事实呢？难道南共領导集团不正是以自己的十年来的实踐，进一步証明了这个决議的正确嗎？对于这样严肃的問題，多說几次“任何人如果指望我們放棄我們在国际問題和国內問題上的原則性立場，那只是浪費时間”，难道就能表明自己有理嗎？由此可見，拿出一九四八年情报局决議来攻击各国共产党，对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是帮不了忙的；它不会压倒对于南共領导集团的批評，恰恰只能压倒南共領导者自己。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对于各国共产党的批評至今沒有作过而且也不可能作出什么認眞的答复。他們現在常用的武器之一是把这种批評說成是“干涉內政”。这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認眞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斗爭，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义不容辞的。进行这种思想斗爭，不但与国家的大小無关，而且与是否取得政权無关。即使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受着反动統治者压迫的一个小組，也沒有任何人能够剝夺他們进行这种思想斗爭的权利。这种思想斗爭同用强力或者阴謀的方法去干涉别国的內政毫不相干，同什么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等等毫不相干，用这些題目去轉移論点、进行詭辯和污蔑是可笑的。由南共領导集团来提出所謂干涉內政的控告，更是加倍可笑。难道南共不是首先在自己的綱領里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內政（这本来也只对它們本国“有約束力”）大談特談，并且加上了一系列惡毒的头銜嗎？南共

認为"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为什么别国就該只管自己呢？为什么南斯拉夫的一些較小的社会主义鄰国，例如阿尔巴尼亞和匈牙利，連只管自己的权利也要受到南斯拉夫的侵犯呢？好奇怪的邏輯！自以为可以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点灯，一受到反击，馬上就裝出一副可憐的"沒有平等地位"的模样……算了吧！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还有一种可憐的武器，說他們的这一套早就有了，为什么現在才这样批評？南共領导集团的这种修正主义观点确是早就有了的，这正是一九四八年情报局决議的根据。但是那时南共領导集团的修正主义观点还沒有系統化。在社会主义各国恢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以后，他們也从沒有像現在这样系統地宣布这种观点。从一九五四年到南共七大以前，各国共产党曾經多次同南共領导集团进行公开的或者不公开的爭論，大家知道，这种爭論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以后曾經达到高峰。这些爭論并沒有改变他們的立場，但是他們一再表示願意停止这些爭論，表示願意繼續保持以至增进同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南共領导集团虽然沒有参加莫斯科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議，却参加了六十四个共产党的会議，参加了和平宣言。这一切，曾經使各国共产党保持相当的希望。但是南共領导集团却再一次地背信棄义，以怨报德。他們片面地撕毀了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苏南历次会談关于扩大和加强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各国合作的协議，片面地背棄了和平宣言对于国际形势的原則立場，提出了一个徹头徹尾的修正主义的綱領。若干国家的共产党在南共七大开幕以前，曾經向南共提出同志式的劝告，建議他們刪去綱領草案中关于国际形势的显然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但是他們对于这些劝告的基本方面置若罔聞。相反，他們在代表大会上集中地攻击了慷慨地給他們以兄弟援助的苏联，攻击了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而对全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却竭力表示逢迎戴戴。这样，各国共产党在長期的仁至义尽的努力失敗以后，才給这伙可耻的背叛者以应有的反击。南共領导集团現在責备别人不用同志

态度对待他們，責备别人沒有遵守約言。試問：他們是想愚弄誰呢？有什么严肃的人能够忍受这种愚弄呢？

当前全世界人民的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衛和平。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斗爭，会不会妨碍各国人民保衛和平的事业？“紐約时报”六月一日的社論帮助我們答复了这个問題。它說：“在今后数月可能产生出乎意料之外的和現下还預見不到的事态發展，以致其他共产党統治的国家可能要求我們援助，而对我們来說，答应这种要求会是适宜的。……的确，最近几天貝尔格萊德和莫斯科的消息暗示，从我們自己的利益来看，过去美国在援助南斯拉夫方面所表現的灵活性是明智的。”看不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危險的人們請听吧！美国正在指望南斯拉夫的榜样会鼓励一些潜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的新的納吉，說不定“在今后数月內”这些新的納吉就会造成某种“出乎意料之外的和現下还預見不到的事态發展”，以致他們取得了政权，并且像南斯拉夫一样地向美国要求援助。这虽然是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幻想，但是从这里不难看出，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在美帝国主义的顛复計划中究竟有怎样的作用，而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爭对于保衛和平的事业又有怎样的意义。同时，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同一般的中立主义有怎样的不同：一般的中立国家起不了美国所要求的这种顛复作用，而且往往成为美国顛复活动的对象。反对南共的修正主义，不但是为了划清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界限，为了使所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們認清南共領导集团的本来面目，因而有利于巩固和平事业的核心——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工人运动；而且是为了使所有拥护和平的人認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認清战爭的危險在什么地方，这当然更加显著地有利于和平事业。

但是划清界限并不意味着断絕邦交。南共領导集团訴苦說，人們批評他們对美帝国主义的奴顏婢膝；就是强迫他們同美国断絕邦交。这不过是故意耍賴地把兩件不同的事混为一談罢了。他們用同样的方法吓唬人們說：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批評南共的修正主义，就

是重演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四年的历史，就是威胁这些国家同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但是这是吓不了人的。一九四八年以后的历史不会重演。只要認清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那末，他們对于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破坏就比較容易制止。退回到一九五四年以前的狀态是不正确的。無論如何，南斯拉夫的劳动人民是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可以同資本主义国家保持外交关系，为什么不可以同南斯拉夫保持这种关系呢？但是，既然南斯拉夫領导人自己不願意同社会主义各国建立兄弟关系，那末，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国家关系降为普通的外交关系，就是理所当然的，他們自己以及别人就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南共綱領在許多地方表明，南斯拉夫是贊助和平的，这虽然不足以表示这个綱領的馬克思主义性質，但是只要南斯拉夫願意这样作，我們相信，社会主义各国也一定会繼續在維护和平的問題上同南斯拉夫合作，犹如在这个問題上也能够同若干資本主义国家、若干資产阶級的政治力量合作一样。列宁在同机会主义者作斗爭的时候曾經这样引用馬克思："如果眞要联合——馬克思当时向党的領袖們写道——那末为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尽可締結条約，但决不要拿原則来講交易，决不要作理論上的讓步。"馬克思和列宁的这个指示也就是我們的行动的指南。我們認为，对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斗爭到底，在这里沒有可以讓步的地方。但是無論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同社会主义各国，或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各国共产党，今后仍然可以"締結条約"。至于究竟能否"締結条約"和締結怎样的"条約"，这將首先取决于南共領导集团在今后采取什么态度。

欲盖弥彰

——評鉄托六月十五日的演說

"人民日报"評論員

鉄托在本月十五日在拉宾發表了一篇演說。这篇演說除了对于各国共产党作了一番新的污蔑以外，对于它們針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所进行的严肃的批判，什么也沒有答复。鉄托以完全的沉默来对待这些根本性質的問題，例如：南共究竟有什么理由背叛它所参加的和平宣言，在自己的綱領中对于国际形势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南共究竟出于什么必要在自己的綱領中和代表大会上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而美化資本主义制度，攻击苏联、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攻击德黑蘭、雅尔塔、波茨坦的协定，而对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却加以辯护和称頌？当社会主义各国作出种种努力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的时候（这种努力实际上一直进行到南共七大以前，例如匈南会談就是一九五八年三月举行的），为什么南共要这样迫不及待地以怨报德？

原因無疑是有的，但是很难說出口。因此，鉄托只好在南斯拉夫人民面前設法找出一种解釋：原来各国共产党之所以反对南共的綱領，并不是由于它的綱領是徹头徹尾地修正主义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是由于某种早就組織好的阴謀，由于他們拒絕参加十二国共产党的会議和拒絕参加社会主义陣营，归根結蒂，由于他們"反对把世界分裂成各种陣营"！这样，关于他們的修正主义綱領的一切原則爭論，好像就可以一笔勾消了。

这正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战术的特点。

不过鉄托的这种轉移論点的办法并不成功。原則的爭論仍然逃

避不了，而且掩耳盜鈴，欲盖弥彰。南共拒絕参加十二国共产党的会議，提出这个解釋来对于鉄托决不有利。鉄托憑什么撕毁他在布加勒斯特会談中已經达成的协議呢？鉄托对于赫魯曉夫同志在索非亞提出的这个質問，为什么一个字也不提呢？鉄托把他們拒絕参加社会主义陣营作为各国共产党进行反修正主义斗爭的主要原因，这当然是信口开河。不参加社会主义陣营，并不等于一定要大事宣傳修正主义，大事攻击社会主义各国。但是無論如何，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却硬要拒絕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条战綫上，拒絕明明白白地站在反帝国主义这一边，硬要对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等量齐观，保持同等的距离和同样的"合作"，这总是一个奇談。世界上究竟有什么借口能帮助他們自圓其說呢？

"我們反对把世界分裂成各种陣营。"

"在目前这种紧張的国际局势中，同其他同样不屬于任何集团的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奉行建設性的和平政策，比参加这个陣营从而使已經紧張的世界局势更为加剧要有益一些。"

"我們認为，必須同一切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而不应該把我們自己局限于兩个陣营之中。这兩个陣营之間將会發生冲突，并且有朝一日可能会因为它們而爆發战爭。"

多么典型的叛徒的声音！反对把世界分裂成为各种陣营……听起来多像一份脫离共产党而向敌人投降的自首分子"反对把社会分裂成各种阶級"的悔过書！世界上既然有一系列帝国主义国家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存在，就不会沒有一定的陣营存在。就是爭取独立的民族，例如在北非和近东，也在一定的基础上形成了这样那样的联合。这个历史的必然性是不以鉄托或其他任何人的主观願望为轉移的。誠然，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彼此一致。但是这决不是說，一切为国际無产阶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不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在性質上根本相反，根本不能同日而語。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式的团結，是任何資本主义国家相互間所不可能有的，而这正是社会主义

必然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一貫地坚持解散一切軍事集团，并且一貫地坚持同一切資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但是为什么必須拆散自己的团結才能取消軍事集团和实現共处呢？眞理不正是相反嗎？按照鉄托的邏輯，社会主义国家而参加社会主义陣营就是使世界局势更为紧張，社会主义国家而不参加社会主义陣营就能使世界局势更为和緩，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在愈多的国家胜利，战爭就愈不可避免，而为了徹底和緩世界局势和避免战爭，当然应該使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参加社会主义陣营，取消社会主义陣营。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确乎沒有社会主义陣营，为什么希特勒德国也發动了对苏联的侵略战爭呢？这难道是“由于斯大林执行頑固和不必要的威胁性外交政策”，以至希特勒“不可能靠外交途徑达到自己的目的”嗎？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南斯拉夫甚至連社会主义的牌子也沒有挂，不是也遭到希特勒的侵略嗎？鉄托完全不顧这些基本的事实，硬說要和平就得避开帝国主义所反对的联合。在这里，鉄托不但沒有一点共产主义者的气味，而且也沒有一点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家的气味了。

鉄托宣傳的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团結起来就会造成紧張局势和战爭危險的論点，換成通俗的語言，無非是：劳动者們、被压迫者們、革命者們、社会主义者們呀，你們万不可把世界分裂为陣营，万不可把自己“局限于”陣营呀。你們应該同一切政治力量(管它是什么力量!)去“建立合作的关系”，这样对你們大有好处呀。据南共綱領說，这就是南斯拉夫式的“积极共处政策”，它是“生产力飞速發展的一种表現和一种需要，这种發展促进全世界事实上的联系，和各国經济紧密的相互依賴。这种政策体現出当代世界对广泛的經济合作，全面的文化、科学等合作的客观需要。因此，积极共处政策为世界情况的統一創造了必要的前提，社会主义的目的之一应該是世界經济的統一。”这一切多么美妙！而如果你們不識时务，不解散你們的团結，局势就会紧張起来，而最最重要的是，有朝一日發生冲突(只要保存陣营，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呀!!!)，你們就休想能够置身事外！

1911

我們不打算在这里討論各种中立主义者的立場。許多和平中立国家不但沒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破坏活动，而且同社会主义国家結成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它們在維护和平、反抗侵略和發展本民族經济的斗爭中，完全可以信賴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誼。鉄托分子跟一般的中立主义者不同，他們打着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号，混在国际無产阶級的队伍中間起着腐化、瓦解和顛复的作用，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坚决地揭露他們的眞面目。有人說，何必把鉄托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呢？但是如現在的事实所表明的，鉄托之所以坚持修正主义的亲帝国主义的立場，并不是因为有人赶他。而且看来無論如何，他也不会放棄中立或者社会主义的旗号，不会干干脆脆地站在帝国主义方面，因为他"懂得怎样做"才能保持他的可以討价还价的地位。因此，担心他跑到西方去而放松对他的揭露，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沒有好处的，正如因为害怕"刺激"帝国主义而不把和平力量团結起来，不去揭露战爭販子的阴謀，对于和平事业是沒有好处的一样。

讓我們再回到和平問題上来吧。我們从来認为，和平是必須坚决保衛而且是可以保衛的，但是只有在一切和平力量团結起来同战爭准备者的阴謀作頑强斗爭的条件下，这个目的才能达到。在这里，問題不仅是要坚决地反对战爭，而且要指明人民确有力量战胜战爭的威胁，要号召人民准备在战爭狂人硬把战爭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时候，就用联合的力量徹底消灭一切侵略者，徹底消灭产生战爭的帝国主义制度。沒有这种决心就不能制止战爭，万一侵略者竟敢發动战爭就將使人民处于惊慌失措的境地。而鉄托和鉄托分子指給各国人民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他們用战爭危險恐吓人們各人自扫門前雪，号召瓦解一切社会主义力量、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和一切反战爭力量的联合，号召人們同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建立合作，借以实現"世界的統一"，和……建立"社会主义"！任何客观的观察者都不难看出，鉄托分子的这种立場，不但不可能保衛世界和平，不可能援助朝鮮、越南的反侵略斗爭，而且也不可能援助埃及、叙利亞、印度

尼西亞、阿尔及利亞和黎巴嫩的反侵略斗爭。

鉄托为了进一步顚倒是非，竟把自己的投降政策同苏联的和平政策硬扯在一起，甚至把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援助同美国在一九二一年对苏联飢荒的救济加以比拟。在一九二一年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苏联政府就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向美国的以胡佛为首的帶着明显的政治目的的救济署进行了坚决的斗爭，不讓美国的救济活动脫离苏联政府的监督。列宁当时曾經这样描写帝国主义者利用苏联飢荒反苏的穷凶极惡："我不知道惡魔是否比現代帝国主义可怕。"正是由于苏联用革命無产阶級的态度来对待帝国主义国家，从来不幻想依賴帝国主义国家，所以帝国主义始終把苏联看作眼中釘，千方百計地反对和破坏苏联，并且死硬地拒絕苏联关于緩和国际形势的各項建議。但是鉄托之流却是怎样对待美国的援助呢？鉄托公开地謳歌美国的小麦和金元，并且以他們"懂得"無限期地依賴美国的援助来"維护独立"和"建立社会主义"而自傲。而美帝国主义者呢，也同样以他們"懂得"通过援助南斯拉夫来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而自傲。鉄托說："美国人給我們援助并不是为了讓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取得胜利。"問題沒有这样簡單呀。艾森豪威尔本月十八日說得清清楚楚：他將"給予那些对削弱苏联集团的团結有貢献的苏联集团国家以任何种类的援助"。那么，美国人是不是达到了目的呢？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在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納吉反革命集团的叛乱中，在南共七次大会和它所通过的綱領中，或者在最近匈牙利判决納吉反革命集团案件以后南斯拉夫的所謂抗議中，鉄托分子都充当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反苏反共的急先鋒。但是鉄托仍然硬說，他并沒有反对过苏联，支持过帝国主义，而且它的政策也就是苏联的政策。用鉄托自己的話說，"这种作法簡直是無耻到极点了！"

鉄托在他的演說中瘋狂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只能使我們感覚光荣。中国的古詩人屈原說得好："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受到修正主义者以至帝国主义者的贊賞才是可怕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南

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批判显然打到了他們的痛处，他們無法利用中南兩国关系的历史煽起人民的民族主义仇恨，因而不得不造出一些特别荒謬——因此也特别低劣——的謊言来作战。鉄托說我們批評他們是因为我們对他們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和平政策、共处政策感到不安”，是因为我們反对緩和世界紧張局势，因而“同西方最反动的战爭販子处于同样的地位”。但是任何人都可以提一个問題：如果同战爭販子靠攏的是我們而不是鉄托，为什么西方最反动的战爭販子杜勒斯之流对于鉄托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和平政策、共处政策”一点也沒有“感到不安”，而且还要大給其賞錢呢？鉄托又說，我們反对修正主义是因为我們內部有困难，是因为需要某种貸款。眞是三句不离本行！跪倒在泥塘里的侏儒拚命向立在高山上的巨人吐唾沫，怎样吐也只能落到自己的臉上。鉄托的这几句話，恰好替鉄托分子的面貌作了一幅絕妙的素描。

鉄托的煞費苦心的演說，就是用这样的一批駁不胜駁的謊言組成的。鉄托說我們沒有发表他們的“任何材料”，也許是这些謊言中最笨拙的一个。我們并不認为社会主义的报紙一定要发表修正主义者的長篇大論，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在一九五六年，我們全文发表了鉄托的臭名昭著的普拉演說和卡德尔的議会演說，不久以前出版了南共綱領的兩次草案全文，現在又发表了他的拉宾演說全文；而南斯拉夫报紙对于我們的文章却从来很少全文发表过。但是鉄托仍然可以大言不慚：“显然在道义方面我們比他們优越得多”！

鉄托吹嘘南斯拉夫人民同他是“一致”的，并且多方造謠挑撥南斯拉夫人民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誼。但是鉄托不能解釋，为什么早已在“消亡”中的南斯拉夫国家强力机关，最近忽然大肆逮捕眞誠的共产主义者。当然，在帝国主义还可以养活一批国內外的工人貴族的时候，这些工人貴族总还可以在相当的范圍內活动，总还会有人对他們保持希望。但是，西方的斜阳正在下墜，面向着西方的鉄托分子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的前途，难道是光明的嗎？

（原載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1914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

陈 伯 达

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以鉄托为首的南斯拉夫領导集团的修正主义作斗爭，是最近国际間的一件大事。这个斗爭是鉄托集团挑起来的。他們在自己提出的綱領中，向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举行了全綫的进攻，以为这样就可以削弱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陣地，制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得起来对付这个挑战，而且已經开始使挑战者碰得头破血流。同鉄托集团原来的設想相反，在这个斗爭中，各国共产党表现了偉大的团結一致。

必須从現代整个国际政治經济环境来观察問題，来揭穿鉄托集团修正主义的全部实質。

鉄托集团的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現象，是現代国际阶級斗爭的产物，是現代帝国主义者——特别是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的政策的产物。

第二国际时期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也是反映了資产阶級——帝国主义者的政策。但是，以鉄托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义或新修正主义，它的作用有别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出現在十九世紀末年，那时帝国主义还是統治世界的一个完整的体系，無产阶級專政的国家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而我們現在是怎样一个时代呢？这是一个無产阶級革命在九亿多人口中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已經形成、殖民主义体系已經瓦解和正在瓦解、帝国主义制度摇摇欲墜的偉大新时代，是毛澤东同志

所說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偉大新时代。在这样的新时代中，社会主义制度和資本主义制度之間的斗爭，各国無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的斗爭，已經成为你死我活的激烈的斗爭，这就必然給現代修正主义，即新修正主义，帶来新的烙印，新的特色。

馬克思和恩格斯还活着的时候，多次指出，英国資产阶級拿出了額外利潤的一小部分豢养一批工人貴族。恩格斯有一次給馬克思的信說道："最坏的英国工联会，它們甘願受那些被資产阶級收买或至少是領取資产阶級酬金的人們来領导。"大家知道，列宁在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激烈斗爭中，反复地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看法，提出了新的論証。列宁写道："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小資产阶級和工人阶級中間受帝国主义額外利潤收买而变成資本主义看門狗和工人运动破坏者的那些阶層。"

現在的情况又是什么呢？由于工人阶級已經在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政权，帝国主义者感到，單是收买本国一批工人阶級的叛徒已經不够了。除了在本国繼續保持这种收买的政策以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竭力要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寻找資产阶級民族主义的分子，寻找那些不稳定的分子，收买他們作为工具，以便破坏無产阶級專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团結。就是这样，美帝国主义者看中了南斯拉夫的領导集团，并对他們实行高价收买的政策。

根据美国报刊和南斯拉夫报刊的材料：美国給南斯拉夫領导集团的經济援助，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到一九五七年，已經达到十七亿多美元，其中有十亿多美元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給予的。另外，美联社报导，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美国許給南斯拉夫的軍事援助在十亿美元以上。还有，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济援助，估計有三亿美元。各项数字合起来，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資本主义世界对南斯拉夫領导集团的援助在三十亿美元左右。

鉄托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說，美援占南斯拉夫国民收

入的百分之四。由此可以估計，美援在南斯拉夫的国家預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或許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这是一件明明白白的事实：以鉄托为首的南斯拉夫領导集团不仅靠本国人民养活，而且靠大量的美援养活。除此以外，美帝国主义者大吹大擂的所謂"美国生活方式"，也經过美援輸进南斯拉夫的社会生活里面，目的是要力求腐蝕南斯拉夫人民。

据华盛頓邮报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載："以前激烈反对美国对南斯拉夫鉄托元帅的政策的西茨堡共和党参議員詹姆斯·弗尔頓說，購买美式电气用具的分期付款計划，正在把南斯拉夫人从共产主义者变为資本主义者。他是剛从鉄托的国家回来的。……他說：五一节游行眞是美国风貌，美国的坦克，美国的装备。那里有着巨大的美国影响……在人民中間，美国人是所有民族中最吃得开的。"

路透社記者本年五月二日从貝尔格萊德發出过一分長篇报导，他說，十年前南斯拉夫报紙，"象眞理报一样教条"，而現在却"常常想搞得同美国小报一样有趣味"。"馬克思主义者常常为經常在南斯拉夫报上出現的'大腿美'和美国式的特稿而吃惊。""南斯拉夫讀者可以讀到极其广泛的'人生报导'，其中包括关于犯罪和灾禍的坦率的并且往往是血淋淋的描述。"如此等等，說明了南斯拉夫一些主要的报紙已經变成"美国生活方式"的宣傳工具。

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識。不是别的，正是大量美援和"美国生活方式"的輸入，引起了南斯拉夫領导集团意識的变化，形成了南斯拉夫領导集团一套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决定了南斯拉夫領导集团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陣营、反本国社会主义的內外政策。

以鉄托为首的南斯拉夫領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和他們的內外政策，表現在南共綱領上，主要的是一些什么呢？

第一，在世界政治斗爭形势的問題上，鉄托集团提出了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議宣言根本相反的观点，他們否認現代世界形势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兩个不同的世界的社会政治經济体系的对立，和由兩个不同社会政治經济体系所形成的兩个陣营的对

立，否認宣言中所指出的“世界的發展取决于兩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賽的进程和結果”。他們完全混淆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兩个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区别，把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这兩个根本不同的世界政治經济体系，說成是“世界分裂为兩个敌对的軍事政治集团”，并且認为，“世界上分裂为兩个敌对軍事政治集团的后果，也是世界經济的分裂……从而阻碍世界統一的过程和人类社会的前进”。从鉄托集团的詭辯看来，仿佛在資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制度下，世界或世界經济本来就是統一的；仿佛資本主义国家从来并不曾从壟断資本掠夺最高利潤的利益出發而分裂为爭夺世界霸权的集团，也不曾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过你死我活的世界大战。鉄托集团認为，人类的出路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义制度。他們的方案是：可以由美帝国主义操縱下的联合国組織，“推动和促进各族人民之間的全面合作和互相接近，也就是使世界日趋統一”。

希望經过美国操縱的联合国組織去促进所謂“世界統一”，这是一种什么“統一”？这不就是鉄托集团向往美帝国主义企圖統治世界的“統一”嗎？

第二，鉄托集团声明，他們不屬于社会主义陣营。他們洋洋得意地标榜了所謂“超集团”的立場。

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实际証明：(1)他們置身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無产阶級队伍之外，不外是以反动的資产阶級民族主义代替革命的無产阶級国际主义；(2)他們的所謂“超集团”立場，不外是把自己放在适合帝国主义集团需要的立場上。

第三，在战爭与和平的問題上，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認为，現代战爭根源是壟断資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而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是保衛世界和平的核心力量。但是，鉄托集团却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而为帝国主义陣营的战爭政策充当辯护人。鉄托本人就是这样說的：“由于斯大林执行頑固和不必要的威胁性外交政策，西方大国看到，不可能靠外交途徑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断定只有显示实力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签訂北大西洋

公約、建立軍事集团的基本原因。”（見鉄托在南共七大的报告）鉄托集团显然是想做出这样荒唐的、最反动的結論：战爭威胁的根源不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陣营，而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陣营。

第四，根据列宁的科学分析，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發展的最后阶段，因而人类进到了無产阶級革命的时代。虽然無产阶級革命从十月革命以来已經在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帝国主义还沒有最后倒台，無产阶級革命时代并沒有过去。而依照鉄托集团的看法，現在世界已經跳过帝国主义和無产阶級革命的时代，因为“典型的資本主义社会制度已經成为过去”，資本主义各国都已經在实現着社会主义。鉄托集团这样反复地咀嚼着以下这些所謂“时代”的字眼：“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徑不可阻擋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进入一个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全人类日常实踐的內容和方法的时代。”“人类今天生活的时代，首先是基于社会主义經济关系的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形式的实施和巩固的时代。”由此，他們就得出結論：“社会主义思想不再主要圍繞着摧毀旧的、資本主义制度的問題轉圈子了。”就是說，世界各国的資本主义制度已經不存在什么要加以摧毀的問題，無产阶級革命的学說已經“过时”，这个学說只是所謂“教条主义者”的無的放矢。

第五，根据列宁的观点，壟断資本制“到处散布的都是統治趋向而不是自由趋向。这統治趋向的結果，便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發生全面的反动……。”而依照鉄托集团的看法，在資本主义国家中，壟断資本正在經过国家資本主义的形式和平長入社会主义，那里的国家資本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他們說，在資本主义国家那里，“国家日益监督資本，部分地限制私人管理資本主义財产的权利，并剝夺私人資本所有者在經济中和社会中的某些独立职能”。“壟断資本巨头在他們掌管的某些部門中日益丧失其原有的完全独立的作用，而壟断資本的某些职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轉交給国家。”“国家把經济中的重大作用夺取过来。”“国家作为劳动关系和財产关系、社会权

利和社会服务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調节者的作用也得到加强。”

鉄托集团的妙論，就是：壟断資本的国家机器，并不为壟断資本服务，而是超阶級的，并且在实行剝夺壟断資本的任务。

第六，因此，鉄托集团認为，在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級不需要打碎資产阶級的国家机器，即可以“將国家的机器变为社会的公僕”。在那里，工人阶級的任务，只是在于“对政权取得决定性的影响，并且根据自己的政治力量逐步地保証社会主义的發展”。

第七，鉄托集团既然那样美化資产阶級專政，当然也就极力丑化無产阶級專政。象一切反动派的口吻一样，他們認为無产阶級專政必然是“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国家极权主义”。

第八，馬克思主义者認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有兩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級形式。但是，鉄托集团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叫做“国家資本主义”，說这是“旧社会关系的最后反映”。他們認为，社会主义經济只有兩种所有制，即所謂“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他們的所謂“集体所有制”，就是讓直接生产者“自行决定有关产品的生产和总分配問題”。他們認为，“私有土地生产”也是“大型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一个組成部分”，小私有者也是“社会主义經济力量的一个組成部分”。

总之，鉄托集团把資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資本主义叫做“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叫做“国家資本主义”，而前者是他們所贊成的，后者是他們所反对的。鉄托牌的“社会主义”，是集体应該高于全民，而个人又应該高于集体。他們的口号是：“社会主义不能使人的个人幸福服从任何‘最高目的’”。他們的邏輯是：个人的利益可以放在集体和全民的利益之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应該服从集体和全民的利益；至于集体的利益，則更可以放在全民的利益之上，而不是集体的利益应該服从全民的利益。

第九，鉄托牌的“社会主义”既然那样古怪，实际上是資产阶級的“社会主义”，是帝国主义者容許的“社会主义”，它同馬克思列宁主义

所說的社会主义和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現的社会主义比較，根本是另一回事。因此，他們当然根本否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共同規律，反对国际無产阶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思想和一致行动，而把这种共同思想和一致行动，惡意地一律叫做"思想壟断"和"政治霸权"。

第十，从以上观点出發，鉄托集团敌視各国共产党。他們說："認为共产主义政党可以壟断社会主义运动的每种形式，并認为社会主义只有在这些党里，也只有通过它們才能体現出来的观念，在理論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踐中也是十分有害的。"又說，"某些共产主义政党……它們在本国不再是促进社会發展的革命的、創造性的推动因素"。

鉄托集团很瞧不起美国共产党。但是，历史終究会最后証明，坚持眞理的美国共产党現在虽小，却有眞正的生命力和偉大的前途；而鉄托集团現在虽然統治着南斯拉夫，誰能够担保他們的脚不被自己的修正主义所絆倒呢？

第十一，鉄托集团認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發展在近几十年来未能与社会事态和物質条件的發展相适应"。"在斯大林后期，世界工人运动……不仅停滯，而且倒退了。"

在鉄托集团的眼里，好象看不見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功，看不見以苏联为主力的反法西斯战爭的偉大胜利，看不見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資本主义各国工人运动的發展，也看不見偉大的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二，鉄托集团認为，"近几十年来馬克思主义思想落后于現代社会的發展了"。正如人民日报的社論所指出的，鉄托集团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的基本原則，一概叫做"教条主义"，而他們則自称为"教条主义的不可調和的敌人"，他們怎么有可能去領会馬克思主义發展或不發展的問題呢？他們既然看不見世界从十月革命以来在共产党領导下出現的一系列偉大事件，而且以反对所謂"教条主义"和反对所謂"实用主义的修正主义"为借口，說了一堆什么"人性"、"人的个性"、"个人自由"、"作为社会生物的人的眞理"、"人的精

神結構”等等反动囈語，怎么有可能找到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語言呢？

以上列举的十二点，并沒有包括鉄托集团的全部修正主义观点和他們的內外政策。但是，只就这些来看，已經够說明鉄托集团的修正主义是怎样地为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效劳了。

鉄托在南共七大的报告中說到德热拉斯，把他叫做修正主义者。鉄托說：“按照外界的命令和为了犹大所得到的那种銀幣，这些叛徒們写了污蔑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和現实的小册子。”可是，西德“每日鏡报”在四月二十二日的一篇文章中提得很不錯：“在这里，这一件事也不免是一个冷酷的嘲弄。因为这个綱領的基本思想是在几年前就在今天关在监牢里的德热拉斯起草的。”当然，德热拉斯和鉄托集团有一定的差别性，这个差别是：德热拉斯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都不披了，而鉄托集团却还要拿馬克思列宁主义做幌子。但是，鉄托是否想到，南共綱領的內容在实际上是德热拉斯“新阶級”这个小册子的再版呢？最好鉄托拿起德热拉斯的鏡子去照一照自己吧。

南斯拉夫人民在反法西斯战后，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可是在鉄托集团方針的支配下，不論在經济战綫、政治战綫或思想战綫，南斯拉夫都还沒有进行过認眞的、徹底的兩条道路的斗爭，还沒有解决国內誰战胜誰的問題。在那里的农村中，个体經济还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就是为資本主义复辟保存了土壤。

問題还不能單看南斯拉夫国內所有制的問題。对于南斯拉夫人民說来，更严重的問題是：美帝国主义的美元政策在南斯拉夫領导集团中起了作用，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發生了迷惑。

如前面所举的材料，美帝国主义对南斯拉夫的美元政策是从一九四五年开始的。在一九四八年以前，鉄托集团已經开始脫离無产阶級国际主义的軌道，形成反动的資产阶級民族主义，这是同美帝国主义的美元政策有关的，是美元政策在南斯拉夫得到的一种結果。但是，直到現在，在南斯拉夫人民和南共党員中，还有相当多的人并沒

有察覺到这点。

虽然南共綱領宣称"个人所有制"和"私有土地生产"也是"社会主义",但是,可以理解,南共領导集团并不一定希望,而且不可能一下子取消过去在革命中业已实現的某种公有制的形式。因为如果这样做,不仅会遇到南斯拉夫工人阶級和其他有覚悟的劳动人民的抵抗,而且南斯拉夫領导集团还将失掉其欺騙本国人民和扰乱国际視听的政治資本,以至会失掉在美帝国主义面前进行討价还价的政治資本。

鉄托集团的蛻化政策同南斯拉夫人民以及南共党内忠誠的共产主义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願望,有尖鋭的矛盾。因此,鉄托集团为要保持自己的統治,也就乐于保存某种公有制的形式。并且,只要鉄托集团繼續敌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繼續敌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美帝国主义者对于南斯拉夫保存某些公有制的形式,也都可以同意,而采取"不加干預"的态度。例如,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九日"美国新聞与世界报导"写道:"在慫恿現在是苏联衛星国(帝国主义者一直胡說八道,把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叫做"衛星国")的政府走向独立时——不一定是資本主义式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繼續支持鉄托主义。"杜勒斯去年八月六日在記者招待会上談到南斯拉夫的作用时說过,"有一个不被我們叫做'国际共产主义'或苏联式牌子共产主义所控制的共产党政权,这是可能的"。

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一些剝削阶級統治的社会里面,只要無害甚至有利于那个剝削阶級的根本利益,容許某种"公有制"的形式,并不是一件什么稀奇的事情。例如,在封建社会里面,保存某种乡村公社,某种公有制或某种自治的形式,这是相当普遍的。在資本主义社会里,股份公司也可以算是資本家的一种"公有"形式吧,甚至若干工人还可以在那种公司里面保持一些股票哩。可是,人們共知,那种形式并不妨碍而且反能够更加保証資本家得到最高的利潤。十月革命以后,反革命分子曾經想利用苏維埃这个組織形式,叫做"拥护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維埃";苏联实現农业集体化以后,有一些反革命分子也曾經想利用集体农庄这样的形式,叫做"不要共产党員参加

的集体农庄”。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說得很对：“一切都依这个形式包含有什么内容为轉移。”各种組織形式，不論是政治的也吧，經济的也吧，終究只是組織形式，問題是誰在那里主持，誰在那里領导？

正如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講演中所說的那样，修正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馬克思主义。听說在南斯拉夫，鉄托集团还容許人們挂起馬克思和列宁的象片。这个問題的性質也象前面的問題一样。鉄托集团的做法，就是要保存馬克思主义的若干辞句，而割棄它的革命內容。在工人运动有馬克思主义傳統的国家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可以按照資产阶級的利益，接受馬克思学說的某些部分，甚至是阶級斗爭的学說。列宁說过：“誰仅仅承認阶級斗爭，那他还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是沒有离开資产阶級思想和資产阶級政策范圍的人。以阶級斗爭学說来限制馬克思主义，便是割裂馬克思主义，曲解馬克思主义，使它成为資产阶級所可接受的东西。只有把承認阶級斗爭扩展到承認無产阶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但是，同那些承認阶級斗爭的机会主义者比較起来，鉄托集团还走得更远。他們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連阶級斗爭也加以抹杀了。

南共領导集团宣称，他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他們的修正主义立場，任何要想使他們改变立場的“做法”都是“幻想”和“徒劳無功”。同时，他們还宣称，他們不能“停止他們的爭論”，就是說，还要繼續向馬克思列宁主义挑战。由此可見，中止这个斗爭是不可能的。这个斗爭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有沒有好处呢？毛澤东同志說，在一定条件下，“坏事也可以轉变成为好事”。事物总是按照辯証法發展的。南共綱領集中了現代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成，也就会从反面教育南斯拉夫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者，使得人們能够进一步辨别什么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反馬克思列宁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爭中發展起来的。只要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現代修正主义进行毫不含糊、毫不調和的斗爭，就一定会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帶来良好的結果。 （原載“紅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1924

第五部分

关於中国的工業化道路，工农关系

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委、
市委和区党委書記会議上的报告）

毛　澤　东

（見本書第四一六至四三四頁）

1925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　泽　东

（見本書第四三五至四三七頁）

192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刘　少　奇

（閱讀第二部分）

（見本書第四五四至四六五頁）

关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議的报导

新华社三十一日訊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从八月十七日到八月三十日在河北省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議。各省、自治区、直轄市党委第一書記和政府各有关部門党組的負責人員参加了这次会議。

会議討論了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經济計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問題、商业工作問題、教育方針問題、加强民兵工作問題和其他問題。

会議指出：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的大躍进，將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六千亿斤至七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产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九十，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將达到一千斤左右；棉花將达到七千万担左右，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一倍以上。农业战綫的偉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綫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級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轉移到工业方面来。因此，会議决定，全国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書記，从現在起，就必須首先注意工业的領导，但是同时不应当放松农业的領导。

会議指出：工业的生产和建設必須首先保証重点。工业的中心問題是鋼鉄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鋼鉄生产的发展。根据当前全国人民对于鋼鉄的巨大需要和对于鋼鉄生产的巨大努力，根据鋼鉄冶煉設备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投入生产的情况，鋼鉄生产的飞躍发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按照今年二月第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議所通过的一九五八年国民經济計划，今年鋼产量是六百二十万吨，比去年增产八十五万吨，这个数字早已最

得不够了。今年五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議建議把今年的鋼产量增加到八百万吨至八百五十万吨。現在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嫌低。会議經过討論，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鋼，即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会議初步討論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經济計划的主要指标。会議指出：一九五九年是全国人民苦战三年的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在一九五九年，要求我国的工业和农业繼續用一九五八年的速度或者比一九五八年更高的速度前进，这样就可以保証在最短期間徹底解决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的生产和供应問題，并且在最短期間根本改变我国的工业落后狀态。

高速度的、大規模的經济发展，要求一方面充分发揮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严格保持全国范圍的建設事业的計划性、紀律性。会議認为：計划工作应該分級管理，各級地方組織应該保有适当的机动权；但是各級的計划都必須是統一的全国計划的組成部分，各級地方組織都必須在中央的集中統一的領导下，对国家計划共同負責，共同努力。会議討論了以深耕为中心的关于今冬明春的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措施，并且作出了决定。

会議热烈地討論了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問題。会議指出：把規模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規模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村生产飞躍发展、农民覚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設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組織形式，并將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層單位。人民公社的建立必須是在人民群众自覚自願的基础上，必須通过群众的鳴放辯論。

会議討論了关于商业工作的方針和教育工作的方針，并且分别作出了决定。会議还对加强民兵工作、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繼續开展除四害运动等問題作出了决定。

从八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三十一日，中央同时召集了由各省、自治

区、直轄市党委管工业的書記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議。在工业生产会議上，具体討論了加强各級党委对工业生产的領导和检查，加强各方面的协作，保証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鋼的生产計划，保証完成冶金設备、发电設备、重型机床的生产計划，大力加强銅鋁的生产，实行全民煉銅、全民煉鋁等項任务。

（原載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

1930

立即行动起来，
完成把鋼产翻一番的偉大任务

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論

最近举行的我們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議决定，为了适应我国农业大躍进的新形势，为了高速度地发展我国工业，我国今年鋼的生产量，要比去年翻一番，就是說从去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躍增至一千零七十万吨。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振奋人心的偉大号召。全力保証实現鋼产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鋼鉄工业是工业建設的基础，国家工业化离不了鋼鉄。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也依賴于鋼鉄工业的发展。今年我国工业建設，無論在規模和速度上都大大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一年，超过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总和的各項基本建設工程，和需要大批生产的机械設备，都要求供应大量的鋼鉄。今年农业丰收的結果，將有数以百亿元計的資金要購买生产資料，农村办工业的規模將大大超过以往的几个月。所有这些，都要求生产更多的鋼鉄。而且还必須預計到，明年是我国人民"苦战三年"的帶有决战性質的一年，我国工业和农业將有进一步的大发展。面对着这样龐大的需要，我国的鋼鉄工业在今年內显然必須有一个飞躍的发展。

鋼产翻一番，从五百多万吨剧升到一千多万吨，这样的規模和速度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我国的鋼产量在一九五二年只有一百三十五万吨，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从居世界第十八位上升到第九位，平均每年遞增了百分之三十一，五年共增加了四百万吨。今年一年的增長就要超过过去五年增長的总和。美国是資

本主义国家中鋼鉄工业最发达的，它的鋼产量在近四十年中从来沒有达到一年增長一倍的速度，就是最高产量年的絕对生产量，在正常的和平时期也从来沒有超过五百万吨。毫無疑問，实現鋼产翻一番，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有偉大的政治意义。人們將会看到：社会主义制度較之資本主义制度有多么無法比拟的优越性；英勇勤劳的中国人民，在我們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鼓舞下，無論在农业战綫上还是在工业战綫上，創造了多么难以想像的奇迹。

能不能实現鋼产翻一番？对于这个問題不是沒有人表示怀疑的。但是，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千多万吨鋼的生产任务一定能够完成。

实現鋼产翻一番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目前我国正在形成的全民炼鋼鉄的热潮。由于我們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采取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土法冶炼和現代化冶炼同时并举的方針，全国各地和广大群众充分发揮积极性和創造性，几个月来鋼鉄工业遍地开花。全国正在建設的現代化鋼鉄企业提出了投資省一半、速度快一倍、产量翻一番的口号；許多原有的鋼鉄厂由于发掘潜力而产量剧增。各地兴办的中小型鋼鉄厂比去年大大增加，并且陆續投入生产。全国广大农村和城鎮中新建的炼鉄土高爐在七月間达三万多个，到八月間又突增至十七万多个。办鋼鉄工业的神秘观点被打破了，人民群众的土办法和小高爐的作用发揮起来了，分散在全国一半以上的县份的貧富不等的鉄矿被采掘出来了。鋼鉄工业的队伍从过去的几十万人扩大到几百万人了。因此，今年以来鋼鉄产量逐月上升，特别是七月份以后。与此同时，为扩大炼鋼能力所必需的冶炼設备的制造，最近也开始大量增加，預計到九月下半月和十月上半月將大批投入生产，届时我国炼鋼能力將比現在增加一倍以上。而目前已有的現代化的鋼鉄厂、半土半洋的小高爐和十几万的土高爐还有很大的潜力，新建企业的建設进度还可以加快。所有这些，都表明大大增加鋼鉄产量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正因为这个緣故，党中央政治局在最近举行的扩大会議

决定号召全国人民为今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鋼的目标而奋斗。

当然，为了达到鋼产翻一番的宏偉目标，必須克服一系列的困难。为了迅速增加鋼的产量，必須保証生鉄的大量供应，保証冶煉設备的加速制造并尽早投入生产。負担今年生鉄产量任务將近一半的十几万个土高爐，目前有一些尚未投入生产，有一些生产还不够正常，有一些出鉄率比較低，或者产鉄質量不够好。冶煉設备的制造任务十分艰巨。冶煉原料和燃料的运輸也很紧張。为了克服这些困难，需要中央有关部門和各級党委在中央的集中統一的領导下，共同負責，分級管理，加强协作，保証重点，充分动員和发揮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尽最大努力完成今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鋼的偉大任务。

从今天起到年底只有一百二十二天了。一千零七十万吨鋼的任务必須完成，一吨也不能少。任务是繁重的，时間是紧迫的。古語說得对，“一寸光阴一寸金”。为了完成鋼产翻一番的任务，一小时也不能浪費。全党全民必須同时間賽跑，从現在起立即行动起来，鼓足干勁，苦战四个月。企业的負責人員必須身临最前綫，跟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共同想办法，共同負責完成每天的計划。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書記必須把領导鋼鉄生产当作首要任务，每个星期檢查一次生产的进度，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調动各方面的力量，組織各方面的协作，解决生产中的一切困难問題。我們相信，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只要我們加强党的領导和充分发动群众，一千零七十万吨鋼的偉大任务不但一定能够完成，而且一定能够超額完成。

1983

关于一九五八年十月至十一月全国工业書記会議的报导

新华社十九日訊　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工业書記会議十四日結束。会議总結了兩个月来以鋼为綱全民办工业的群众运动，并且对今冬明春的工业生产、交通运輸作了部署。

会議由薄一波同志主持，参加会議的有国家經济委員会、国家計划委員会主要負責人，中央各工业、交通运輸部門的党組書記，中央各有关部門負責人，各协作区主任、副主任，各省（市）自治区管工业的党委書記、副省長等一百二十七人。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長李雪峰也到会講了話。

会議自十月四日开始，大会在听取了薄一波同志"关于以鋼为綱在工业战綫上大搞群众运动"的报告以后，即轉入分組討論和大会发言。会議采取論虛和务实相結合的方式进行。

大会对兩个月来以鋼为綱全民办工业的群众运动給予极高的估价。認为成績很大，收获很多。运动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經驗，也提出了很多新問題。大家一致認为运动的巨大成就不仅表現在經济上，更重要的还表現在它的偉大的政治意义。找到了以鋼为綱在工业战綫上大搞群众运动的道路，这是我国工业建設高速度发展的正确道路。从此，我国工业化事业將由全国人民轟轟烈烈地来搞。通过运动，打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点，打破了消极平衡論、建立了以鋼为綱帶动一切的积极平衡論。煉鋼又煉人，就使全国人民都受到了多种鍛煉。由于工业下乡上山，农民大办工业，为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創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議批判了工业中的教

条主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結果，是党在农业战綫上大搞群众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又在工业战綫上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毛主席关于工业搞群众运动的指示，兩个月来已发揮了巨大力量。証明党指向那里，群众运动奔向那里，那里就获得胜利。

会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認为当前工业战綫上群众运动的特征，主要表現在兩个方面，即現代化企业的群众运动和“小土群”的群众运动。在現代化的企业方面，广大职工經过整风运动，共产主义精神大为高漲，眞正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劳动，对待整个企业，使企业出現了完全新的面貌。許多企业实行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和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兩参一改制度，使企业的管理工作有了革命性的轉变。因此，在生产上出現了空前未有的躍进局面。“小土群”方面，由于政治挂帅，广泛地发动群众，各級党委書記亲临前綫，指揮战斗，就战無不胜、攻無不克，在短短兩个月的时間內創造了惊人的奇迹。全国有六千万人投入这个战斗，数百万个新建煉鉄煉鋼土爐及其他小型企业和手工工場，星罗棋布，遍及全国大小乡鎮。这些小型企业和手工工場，已經成为我国工业战綫上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

“大洋群”和“小土群”奋战鋼鉄的結果，就使全国鋼鉄产量飞躍地增長起来。到十一月十一日止，全国已經生产鋼八百二十万多吨，鉄一千七百七十万多吨。十一月上旬鋼平均日产量比十月上旬增加一倍多，鉄增加兩倍以上。这样，不但完成今年的一千零七十万吨鋼的躍进計划有了可靠的保証，而且也为明年实現更大躍进打下了基础。

会議在討論到以鋼为綱的群众运动是帶动一切还是压倒一切的問題时，一致同意鋼是帶动一切，目前綱正在举，目正在張。在鋼鉄工业的帶动下，其他工业和交通运輸事业都有了很大躍进。机械工业到十月底止，全国已經生产出三立方公尺以上高爐七千六百零一套，本爐、电爐、轉爐四千四百多套，鼓风机三万六千八百七十二台，为冶金工业提供了年产生鉄和鋼各三千多万吨的生产能力。煤炭工业十月份生产七千万吨，比九月份翻了兩番。电力工业九月份全国发电二十五亿七千万度，十月份增加到二十七亿五千万度，电站原計划安

装八十四万匹，現在預計可以安裝到一百八十——一百九十万匹，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安装的总和。

在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挤了一些部門，但也不是全部挤掉。为了使有限的物資力量用在主要方面，在一个期間里对某些部門挤一挤，往后排一排是必要的。但根据运动的发展情况，必須根据确保重点和照顧一般的原則及时加以調整。在劳动力方面，过去几千万人上战場为一千零七十万吨鋼奋战是必要的，但目前已有条件和必要，把劳动力調整一下，在工业与农业之間和工业內部之間进行合理安排，做到工业农业双双躍进。站在群众运动之外，指手划脚挑毛病是不对的，不正視运动中的缺点和問題也是不好的。

关于"小土群"的認識，經过会議討論，認为大中小并举、土洋結合是我国工业建設中一个重要的方針政策。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建設的一批近代化的大企业，是我国工业的骨干，它在工业建設中已經起了很大作用。今后还要繼續建設一些現代化的大企业。

但是，我国是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国家，要高速度地发展工业，使我国工业遍地开花，仅仅依靠現代化的大企业是不够的，必須发动全体人民，特别是要把五亿农民动員起来大搞工业。这样，就必須从"土"的"小"的着手。实踐已經証明并且还在繼續証明，农民起来办工业的成績是巨大的。对"小土群"在我国工业建設上的作用要作充分的估計。把"小土群"看作仅仅是临时手段或"权宜之計"是不对的。"小土群"方針必須繼續貫徹执行，不能否定，而且要推广到其他工业部門去。

当然这种"小"的和"土"的工业，在发展过程中是会起变化的。有些小的会发展成为中的甚至大的，有些仍然是小的，有些甚至会被淘汰。在生产技术装备上，也会从低級到高級，从手工劳动逐步发展为半机械化、机械化。安于"小"和"土"而不去改造和提高它也是不妥的。

关于今冬明春工业生产安排，經过大会討論，認为以鋼为綱的工业战綫上的群众运动，正方兴未艾，为了把运动引向更高的阶段，还

要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在鋼鉄元帅的帶动下，要求各部門努力跟上去。已經暴露出来的矛盾要調整、解决。現代化企业的群众运动还要进一走开展，"小土群"煉鋼煉鉄在繼續发动群众努力生产、提高質量的同时，需要进行編整、巩固、提高工作。要求各省、自治区从現在起，就对"小土群"进行"五定"工作，即定点（定基地）、定型（确定优良爐型）、定組（讓爐子成双成对、成組成列，有的生产，有的檢修）、定員（把人員定下来）、定領导（領导机关要有分工，有分管工业的，明确領导关系），以便达到鋼鉄基地化、生产工厂化。

定点的原則是：（1）要根据矿石資源情况；（2）要有煤炭；（3）交通方便或將来可能方便；（4）劳动力的分布狀况；（5）符合各省区工业合理布局的要求。

"小土群"基地化、工厂化和工业的布局問題，是全民大办鋼鉄、工业遍地开花中提出的新問題。兩个月来几千万人大办鋼鉄，鋪开了上万的"点子"，当前应該根据各地的資源、交通运輸、劳动力等条件，来規划和着手建立基地和定点工作。

基地在一个省、区范圍內也应該有大、中、小之分，不要强求一律，目前应以中、小为主，运动的繼續发展也很可能形成一些新的工业城市。至于各地区內，特别是人民公社內的某些点，不宜过早集中。

大会提出在鋼鉄生产上当前迫切要解决的有兩个主要問題：第一、提高質量，尽多地把鋼軋制成材。为此，目前鋼鉄生产上的任务是要过好三关：（1）土鉄質量关。前一阶段注意数量多，注意質量少，这也是合乎客观規律的，沒有数量，也就沒有質量。但今天对土鉄应該有更高的要求：第一条要求含硫、磷的成份尽量降低，使洋爐子吃了能消化；第二条以能够使用和調出为原則；第三条要求生产大体稳定。（2）洋爐子吃土鉄关（主要是轉爐）。（3）要把鋼軋成鋼材。第二，要大力抓紧十八个重点企业的鋼鉄生产。这除了要求各大企业深入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发揮企业潜力以外，还要求产鉄多的省市將好鉄首先調給重点企业和机械工厂。

明年第一季度生产中最突出的問題是鋼材，大家認为解决的办

法有三：(1)抓軋鋼机的制造，大抓鋼材的生产；(2)降低鋼材的消耗定額，厉行节約；(3)根据輕重緩急、重中有輕、輕中有重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理分配，使有限的鋼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会議要求机械工业要把軋鋼机的生产和配套工作，作为今冬明春的主要任务来完成。首先应抓紧大軋鋼机的生产。要做到快制、快装、快运轉，保証軋鋼机及早投入生产早出鋼材。除軋鋼机以外，电站設备、机床、矿山設备、交通运輸工具(主要是机車車輛、汽車)也是机械工业生产的重点。

交通运輸部門为了迎接急剧增長的运輸任务，运輸組織工作必須提到重要地位。經常調剂車輛，改变各鉄路局之間車輛的畸多畸少情况。同时积极提高运輸狹窄地段的通过能力，按期完成京汉、津浦等鉄路复綫工程，扩建和改建車站和港口，与此同时，还要大搞"小土群"运輸。

至于其他工业方面，水利电力部今冬明春要开展全民办电运动；煤炭工业的生产，已有了很大的躍进，明年还要努力爭取更大的躍进；主要的化工产品、水泥、木材、石油、地質工作和輕工业，其中特别是紡織、造紙、鹽的生产和調运都要求有个統筹安排，以滿足国民經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完成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鋼的生产任务，为了迎接明年工业生产更大的躍进，会議最后要求全党要意志集中，計划統一，行动一致，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全国一盤棋，首先要保証一盤棋的胜利。

(原載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近十个月来农业生产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夏季大丰收和即將取得的秋季更大的丰收，已充分証明加强党的領导和政治挂帅，是作好一切工作，完成一切任务的基本保証。五亿农民在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爭，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总路綫宣傳教育运动等基础上所發展起来的政治覚悟愈来愈高。斤斤計較个人得失的个人主义或只顧本队、本社、本乡、本县的本位主义，已經大大削弱了；城乡协作，工农业协作，大公無私，互相支援的可歌可頌的共产主义行动，已經大大發展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最可珍貴的精神力量和物質基础。为着及时地总結經驗，发揚共产主义精神，保証一九五九年夏季和全年全面的更大丰收；为着就农业社的收入如何分配問題和是否建立人民公社問題进行鳴放辯論，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广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运动，是必要的。

（二）这个运动的內容应当是：总結和宣傳一年来农业生产大丰收的成績，具体生动地宣傳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偉大胜利，宣傳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胜利，总結和宣傳从去年冬季以来的农田基本建設、水、肥、土、种、密和田間管理等各項农业增产措施的經驗，总結一年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經驗，以及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加强組織性和紀律性的經驗，广泛宣傳这些成功的經驗，同时也要宣傳工业、文教和其他各項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空前大躍进，宣傳丰衣足食的規划，宣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幸福的前景。

1939

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揚"拔白旗、插紅旗"的共产主义风格，以無数大增产的实例，来大講特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徹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殘存的資本主义自发傾向，在人們的思想上繼續破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立共产主义。并且，引导群众回忆三年来"馬鞍形"的历史教訓，徹底批判"靠天吃飯"的"条件論"和"照着前人脚印走路"的"习慣論"，大破右傾保守、甘居下游的思想，大立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思想，使"观潮派"和"秋后算帳派"不仅在大丰收的事实面前啞口無言，而且在思想上徹底破产。应該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統統拔掉，把紅旗普遍插起来，使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更加深入人心。

(三)农业社的收入如何合理分配？如何由农业社轉为人民公社？是当前农村中人人关心的兩大問題。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时候，应該发动所有的农民，就这兩个問題展开鳴放辯論，并且引导农民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来解决这兩个問題。

今年的农业生产大發展，农业社的收入大增加，社員的个人收入一般也应該略有增加，但是不宜增加过多，主要是增加社的公共积累。公共积累要有一部分用来發展集体的文化、福利事业，但是，首先应該用于农业和社办工业的基本建設，扩大再生产，加速建設社会主义。社的公共积累，除了用来發展本社的生产事业和福利事业以外，还应該有一部分交由县以上的机关統筹举办地方性的和全民性的生产事业和福利事业。应該通过鳴放辯論，发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資产阶級思想。

工农商学兵合一，乡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現阶段建設社会主义的最好的一种組織形式，也將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層單位。应該通过鳴放辯論，使广大农民充分了解人民公社比原有的农业社具有更偉大的优越性，自覚自願地把农业社轉为人民公社，并且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来解决与轉为人民公社有关的各种經济問題，反对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四)在广泛宣傳大躍进、大丰收、大胜利，群情兴奋，干勁冲天的局

面中，結合进行党員团員的整风工作和整社工作，扩大农业社和生产队的規模，提高經营管理水平，坚持干部种試驗田、同社員一起劳动、参加生产領导生产的制度，广泛吸收社員参加社务管理，特别是田間作业管理，在办社工作中更加发揚群众路綫的傳統作风。大大表揚躍进中涌現出来的成批的又紅又專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把其中的优秀人物选拔到各个領导崗位上来，組成一支坚强的社会主义建設的骨干队伍，并且吸收其中的先进部分到党內来，增加党的新鮮血液。至于个别地方，少数乡社，整风反右不徹底，"五气"还沒有扫除，則必須認眞整頓，对屢教不改和有严重右傾保守思想还居于領导地位的，必須坚决撤換，保証全面大躍进。这样做，比孤立地整风整社，更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也更有利于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充分发揮运动的积极作用。

（五）运动自始至終，都应該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充分发揚民主，采取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报、現場会、展覽会等等形式，做到眞正从思想上解决問題，使这个运动眞正成为广大群众的自我教育运动。应該在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解放、覚悟提高、干勁更足的基础上，在一九五八年大丰收的基础上，制定出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更大躍进特别是夏季更大丰收的增产計划，以及水、肥、土、种、密、工具改良、田間管理等項增产措施的实施計划，制定出比較長期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漁"的全面的远景規划。通过这一切，掀起一个比一九五七年冬季以来更大的冬季生产高潮，爭取一九五九年夏季更大的丰收，爭取一九五九年全年粮、棉、油全面躍进，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

（原載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向技术革命的偉大目标进軍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人民日报"社論

中国的革命現在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新时期。从現在开始，全党和全民的主要注意力必須轉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来，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設成一个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技术革命的偉大目标，是我們党根据我国的具体历史情况提出来的。我国在过去八年多的时間里，經济建設有了偉大的成就，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我国的經济水平仍然很落后，我国人民的生活仍然不富裕。到一九五七年止，我国的鋼的年产量，还低于人口只有我国六十六分之一的比利时，发电量还低于人口只有我国一百七十分之一的挪威，水稻單位面积产量低于意大利，棉花單位面积产量低于秘魯。我国人民平均每人只有六百斤粮食，二十几尺棉布。这种情况，显然是同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我国地位极不相称的。迅速地发展經济，根本改变这种落后狀况，是我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迫切要求。如果說，在过去几年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話，那末，今天，在經济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基本上完成之后，党和人民已經有可能而且必須集中更大的力量用在社会主义建設方面了。要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当然需要不断地調整生产关系，也需要不断地使上層建筑适应于在发展中的經济基础，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迅速地发展生产力。技术革命就是为了使生产力

有一个飞躍的发展。

物質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历史本来就是生产的历史，是生产者不断地用新的生产技术創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去代替旧的生产技术、超过旧的劳动生产率的历史。采用新的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問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列宁早就說过："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已經解决由無产阶級夺取政权的任务以后，随着剝夺剝夺者的任务在大体上和基本上得到解决的程度，必然把創造高于資本主义制的社会經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又說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証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我們要战胜資本主义制度，創造比資本主义制度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就需要在技术上有一个大的飞躍，也就是需要发动一个技术革命。

技术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技术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把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內的全国經济有計划有步驟地轉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轉到現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使一切能够使用机器的劳动都使用机器，实現全国城市和农村的电气化；使全国的大中城市都成为工业城市，并在那些条件具备的地方逐步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的县城和很多乡鎮都能有自己的工业，使全国各省、自治区以至大多数專区和县的工业产値都超过农业产値；在全国范圍內建立一个以現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輸网和邮电网。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結合起来。"

这是一个充滿革命精神的宏偉的綱領。这是一个机械化的綱領，就是說，在工业中实行高度的机械化，把費力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大部分的手工业將因机械化而变为現代工业，农业劳动也最大限度地使用机器，这样，我国的机器制造工业，將不是現在这样

的每年只生产几万台車床，而是几十万台車床。这是一个电气化的綱領，就是說，無論在城市和农村，电力將是动力的基本形态，在工业、农业以及国民經济的各个方面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將广泛地应用电力，这样，我国的电力將不是現在这样的每年只有一百九十亿度电，而是几千亿度电。这也是一个工业化的綱領，就是說，我国將不仅有几十个大的工业城市，而且將有上百个中等的工业城市和上千个小的工业城市，我国將出現一个星罗棋布的現代工业网，乡村和城市的差别將比現在大为縮小。这样，我国的工业产值將大大超过到那时候已經比現在大好几倍的农业产值，我国的鋼鉄生产將比現在多一、二十倍，煤將多好几倍，石油和化学肥料將以几千万吨計，棉布將以几百亿公尺計，一切資本主义国家將被远远抛在我国后面。

由此可見，技术革命是一个規模怎样广大的革命。实現了技术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同技术革命相輔而行的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就能大大地提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就能大大地发展；我国的工业就能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間內赶过英国；我国的农业就能在提前实現全国农业发展綱要的基础上，赶过一切資本主义国家；我国的科学和技术就能在实現"十二年科学发展規划"的基础上，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到那时候，我国的面貌就根本改变了，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質基础就無可比拟地增强了，我国人民的劳动狀况和生活狀况就极大地改善了。

完成党的八届二次大会提出的技术革命的任务，当然不是一个早上的事情，而是一个比較長的时期的事情。那种認为这个任务是輕而易举可以一步登天的想法是不对的。但是，我們决不可以被这个任务的艰巨性吓倒，决不能把实現技术革命看作是遙远未来的事情。我們应当从現在开始来进行这个革命，而且应当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在尽可能短的时間內完成这个革命。事实上，目前全国展开的农具改革运动和技术革新运动，就是技术革命的偉大的开端，这个运动的更深入、更广泛以及逐步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將导向

1944

在农业、手工业和工业領域內的技术上的大飞躍。我們具备着一切必要的条件来实現技术革命，問題决定于我們能否充分发动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無穷無尽的創造力，我們就能够在比較短的时間內完成技术革命的艰巨任务。

我們的技术革命必須是一个群众运动。群众路綫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綫，技术革命也不能例外。沒有一个全民性的运动，我国的技术革命就不可能实現。当然，为了我国的国民經济轉到現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我們必須建立起一支又紅又專的技术專家的队伍，这个队伍包括大量的从工农群众中培养起来的新型的技术專家，也包括那些正在改造的在思想政治上多少帶着資产阶級色采的技术專家。我們需要有这样一支比現在强大多少倍的技术大軍。但是，如果以为我国的技术革命只能依靠專家，那就錯了。应該是在大量培养新專家和改造旧專家的同时，最广泛地发动群众，充分地发揮人民群众的聰明才智。目前我国各地展开的农具改革运动和技术革新运动証明，群众的智慧是偉大的，各地已涌現了千千万万的"賽魯班"、"賽諸葛"，出現了許多令人惊嘆的发明、創造和革新。事实表明，群众性的技术改革运动，是实現我国技术革命的广闊的道路。

技术革命要求把全国經济轉到現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这是完全必要的。沒有現代大生产的技术改造，就不可能根本改变工业和农业的落后狀态。在技术革命过程中，我們应当力求尽快、尽多地采用現代最新的技术。但是，这絕不是說我們可以不分步驟，在一切地方、一切部門、一切方面都一律要求馬上采用現代最新技术。我們所要求的技术革命，是有步驟有計划的。我們既反对右傾保守思想，反对不敢大胆发明和采用最新技术，同时又反对脫离实际的好高騖远。我們的技术革命的方針，是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充分利用現有設备，在城市和农村广泛地展开技术改革和农具改革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手工劳动适当地結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眞正做到多快好省。在整个技术革

命的过程中，必須貫徹多快好省的总方針，和这个总方針違反的一切做法都是不对的。由于我国原有的技术基础比較薄弱，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的技术改革应更加着重于群众的技术革新。因为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具有更大的迫切性和現实性，它能够使我国的技术改革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技术的发展沒有尽头，任何技术上的改革都能促进技术向更高的水平发展。我們采取这样的普及和提高相結合的方針，就能够把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充分結合起来，使技术革命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活动，技术革命的任务就能更快地实現。

为了实現技术革命，打破对技术的神秘观点是十分必要的。技术是劳动实踐的总結；它本来就是劳动人民多年实踐的成果，而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高不可攀的东西，技术的創造者是劳动人民。任何把技术神秘化的观点都是錯誤的。我們認为技术并不神秘，但是为了掌握技术，当然必須刻苦学习、刻苦鑽研。为了实現技术革命，全党必須努力学习技术，学习科学。一九四九年，毛澤东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里早就指出："严重的經济建設任务摆在我們面前。我們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閑起来了，我們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們去做。这就是困难。""我們必須克服困难，我們必須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間过去了八年多。八年来，我們有許多同志学会了一些技术，学到了一些科学，但八年来經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社会革命的問題上，許多同志还沒有可能来学习技术和科学。从現在开始，全党同志必須努力加强这一方面的学习。全国人民也必須掀起一个学文化、学技术、学科学的热潮，以便学会本領，攻破一切科学技术堡壘。沒有这样一支有文化、有科学技术知識的群众队伍，就不可能有眞正的全民性的技术革命。

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方面去，又可能忽視政治。因此，要特别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結合起来。我們的口号是又紅又專，这个口号是整个技术革命时期的口号。有人以为既然是技术革命开始了，那就

是"技术第一"。这种看法是錯誤的。技术是要人去掌握的。能不能掌握技术，能不能发展技术，决定于人。为了充分发揮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必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时，技术又是为政治服务的。技术政策、技术方針本身也是政治的一部分。政治不去挂帅，技术的发展就会迷失方向，降低速度。我們不要当空头的"政治家"，也不要当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因此，在技术革命中必須繼續加强党的領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兴無灭資"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貫徹到底。

技术革命的进軍号吹响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战斗任务开始了。我們要喚醒埋藏在地下几亿年的矿藏，要駕馭洪水、战胜天灾，讓大自然听我們使喚，为我們服务。我們要把工厂的烟囱遍布全国的大小城鎮，要使一切生产劳动的場地上都有机器的声音，要把电灯送到每一个深山小村。我們要登上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峰，要消灭貧穷和落后，使我們的人民过最幸福的生活。我們知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会遇到許許多多的困难。但是，我們深信，我們有中国共产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領导，有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有全国人民的团結一致，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支持，我們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一定能成功！全国人民夢寐以求的一个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定要实現！

1947

文化革命开始了

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人民日报"社論

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基本点之一，是在繼續完成經济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現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上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时进行文化革命。

現在我国經过了生产資料所有制和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几亿劳动大軍都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为建設社会主义而奋斗。人們在实踐中已經深刻地感覚到，要生产力进一步充分地得到發展，就要有文化，有技术。現在妨碍着生产力迅速發展的主要障碍是我国生产技术的落后和文化的落后。許多群众說："社会主义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群众已經迫切地感到掌握文化的必要了。

我們在最近几年来已經建立了成千上万个現代化工矿企业，生产技术已开始了重大的革新。但是六亿人民的絕大多数——农民和很多手工业劳动者，还是憑着体力和簡單工具在劳动。人們向往着机械化、电气化、工业化。要实現这个理想，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使全国人民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說过："必須認清，只有在現代知識基础上，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通曉这种知識，那共产主义就始終不过是一种願望而已。"这一句話对于今天的我們格外显得說到了痒处。

文化革命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文化翻身运动。在过去，剝削制度硬生生地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割裂开来。剝削阶級剝夺了劳动人

民学文化的权利，反过来却卑視劳动人民，把劳动人民說成“愚昧無知”。他們故作玄虛，把文化知識神秘化，使人們誤認为文化是高不可攀的东西。但是，即使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劳动人民仍然对人类文化的發展作了巨大的貢献。历代的發明家，大多数是出身于文化知識不高的劳动人民。如果劳动人民掌握了文化知識，理論和生产实踐得到了密切結合，那么，科学技术和整个人类文化的發展無疑更要迅速多少倍。在文化的堡壘面前；劳动人民的任何自卑心理和迷信观念都是沒有根据的。打碎剝削阶級用来吓唬群众的一切泥塑木雕的偶像，是动員群众向文化革命的偉大目标进軍的重要前提。

解放以来短短八年的时間，無論在經济方面或是文化方面，我們的努力已經大大地改变了我国原有的落后面貌。就从文化方面来說，現在全国各地已經普遍地开始了蓬蓬勃勃的文化革命的高潮。全国扫盲运动中已經出現了六千万人的扫盲大軍，全国已有一百五十六个县消灭了文盲，被称为“無文盲县”。以普及小学为中心的群众办学运动正在全国开展起来，目前江苏、浙江、河南、湖南、福建、江西、黑龙江等七省已經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另外根据二十三个省和自治区的不完全統計，已有一千零七十个县和市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学龄兒童入学的占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各地新办的中学数字也是惊人的，有十六个省市还举办了一百三十多所高等学校。許多新的科学研究机关也在各地成立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衛生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績。旧知識分子的改造和新知識分子的培养工作目前进展都比較順利。这个文化革命的形势完全不是孤立的，它同技术革命相輔而行，其目的就是为了最迅速地發展社会生产力。今后，只要我們發揮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精神，我們就一定能够实現文化革命的偉大目标。这里关鍵的問題是人人都要力爭上游，决心走在文化革命高潮的前头，实現文化革命的全部目标。

文化革命同技术革命一样，同整个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和任何革命事业一样，必須走群众路綫。在文化革命运动中，首先要調动全党的积极性，要全党来干。中央办，地方也办，要把中央力量和地方力

1949

量充分結合起来。中央地方都办，那就可以調动起各省、市、自治区、專区、县、乡的积极性。各級国家机关和党組織都必須注意調动全体劳动人民、全体知識分子的积极性。毛澤东同志教导我們說："只有領导骨干的积极性，而無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結合，便將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無有力的領导骨干去恰当地組織群众的积极性，則群众积极性不可能持久。"目前，凡是文化革命运动开展得好的地方，領导与群众已經結合起来。但有的地方，群众积极要求学文化，而領导落后于群众。也有的地方，領导干部重視文化，但还沒有把群众的积极性組織起来。任何革命运动，沒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是不可能轟轟烈烈地开展的。目前在文化科学工作者之中还有許多清規戒律在作祟。有人認为，文化教育事业只能由"国家办"。这种思想局限了文化事业的發展。仅仅由国家办，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都有局限性，而群众也办，就可以把群众的財力物力人力的無限潜力發揮出来。因此，正确的方針是把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充分結合起来。有人認为，文教事业必須有一定的規格，"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这是一种脫离群众脫离实际的观点。我們是为群众办文化，什么样的合乎群众的需要，什么样的就是群众的文化革命的正規。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文化組織，各种各样的文化事业，只要有需要和可能，都应当鼓励，妨碍群众利益的清規戒律应当一律取消。只有这样，才能多快好省地使我們的文化事业大發展而特發展。文化革命才能勢如破竹，节节胜利。

在貫徹群众路綫，进行文教事业的大發展中，要正确地对待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普及和提高是相輔相成的。目前我們既要普及，又要提高。我們国家的劳动人民中，还有很多人不識字，还有很多人达不到初級小学的水平，因此，很显然，我們应当大力普及。不普及，劳动人民不能掌握文化科学知識，生产力就得不到进一步的發展。当然，普及的速度，要看每个地方的具体条件，要建立在适当的基础上。在普及的同时，也要注意提高。八年来人民的文化事业已經有了相当的發展，必須繼續迅速前进。文化事业有了提高，我們才能在科学

1950

上、生产技术上大步前进，在十二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普及和提高，都是相对的，它們的具体結合要因时因地制宜。比如民办农业中学，最近有了很大的發展，这是普及；目前，在已經發展起来了的地方，在繼續發展普及工作的同时，就应該注意巩固和提高現有的民办农业中学。我們將在不断普及和提高的过程中，在十年至十五年內，建成一支强大的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級知識分子队伍。有这样一支工人阶級知識分子队伍的建成，工人阶級的革命事业才能得到巩固。

在文化革命大进軍的行列里，誰是領导者？是要党来領导，还是要專家来領导？我們說，必須由党来領导。政治是統帅，因为政治是解决人和人的关系的，是規定整个事业的目标和政策的。任何业务不能脫离政治，脫离党的領导。党的路綫和政策，是集中了最广大群众的經驗和智慧而制定，然后又經过党員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在同群众一起商量、研究、通过，再同他們一起去执行，并且准备根据实踐再加以考驗、补充或修改的。因此，文化工作和国家工作的其他部門一样，都必須由党来領导。

文化革命开始了。中国人民在取得所有制和政治思想战綫上的胜利之后，正在大踏步地向着自己的美好的理想、幸福的道路繼續前进。六亿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前进吧，在国家历史上的偉大的飞躍發展的时代，克服一切困难，夺取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先进紅旗！在十年二十年以后，像毛澤东同志說过的那样：讓我們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

1951

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

陈 伯 达

在繼續完成經济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現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領导、全面規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这些是党的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根据毛澤东同志建議所制定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所包含的几个要点。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証明：在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尤其是在充分地激发地方首創精神、群众首創精神方面，这些要点帶有非常偉大的革命意义。

从去年秋冬以来，在农村兴修水利和积肥的运动中，地方的、群众的高度首創精神的威力业已表現出来了。現在在地方建設中小工业的运动中，又再次表現出这种高度首創精神的威力。

根据国家統計局的材料，今年各級地方單位和农业合作社已經开工建設的各种中小工矿企业共八十多万个。这里特别值得說明的是：（1）其中在明年六月前可以建成的小高爐有一万二千六百八十座，可以增加煉鉄能力二千万吨；（2）其中在明年六月前可以建成的小型轉爐有二百多座，可以增加煉鋼能力一千万吨，相当于鞍鋼現有煉鋼能力的三倍；（3）其中兴建的中小型有色金屬开采企业有一千四百多个，它們在建成以后，就銅和鋁的产量来說，都將超过一九五七年全国的水平。……如此等等。

这样看来，只要在一年多的时間內，地方計划的中小工业的发展

規模，有不少部門，將赶上甚至超过第一个五年計划那样的全国規模。有些工业部門原来打算要等到一九六二年，即第二个五年計划完成时候才能够达到的产量，由于地方中小工业的大量发展，在今年就有可能达到了。

在农业方面，大体也已經可以看出，如果沒有大的自然灾害，今年一些主要农作物的收获量，也將达到或接近以前拟議过的第二个五年計划的最后一年的产量。

所有上述这些，就是在充分发揮地方首創精神、群众首創精神的条件下，我国社会生产力大躍进的面貌。

当然，可能性不等于現实性。但是，只要想想工农大众在我們党的領导下，正在以千百万倍的"愚公移山"的英雄气概，創造出許多劳动的新奇迹，想想各地方蘊藏着的無穷潜力，那末，我們便可以相信，前面所說的可能性一定会变成現实性。

总路綫和它所包含的几个要点，徹底地解决了我国国民經济的普遍高漲和高速度发展的問題，从而也在不断地革新整个的社会。

本刊这一期发表湖北鄂城县委会的"旭光一社用土办法办小小工厂"和"旭光一社是怎样領导和管理小小工厂的"兩篇通訊。兩篇通訊所叙述的，都是一个合作社中的新鮮事件。前一篇通訊主要叙述这一合作社怎样兴办了一系列的"小小工厂"，而又因此促进农业的发展；后一篇通訊主要叙述它怎样把农业管理工作同工业管理工作統一起来。这一个合作社的情况，是高度发揚地方首創精神和群众首創精神的一个光彩夺目的典型，在实际上是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經济普遍高漲的一个縮影。所說的"这些小工厂办得快、生产快、收效大"，恰好說明地方的、群众的首創精神在迅速实現全国工业化的斗爭中所將起的作用。通过这兩篇通訊，我們看到在大躍进中的中国，看到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这里的群众几乎全是一批生龙活虎般的、具有冲天意志的英雄好汉。他們敢想，敢說，敢做；而做起来，又善于傾听大家的意見，脚踏实地，合情合理，有条不紊。一句話，有理想，又有办法。用毛澤东同志的話来說，他們正在原来那个空白点

1953

上，“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圖圖”。

这一个合作社采取的做法，大体有如下所列：

（1）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層組織單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結合的人民公社。

（2）办工业的目的，是为着滿足整个合作社的需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而不是为着賺錢。

（3）因陋就簡，开始只办小型的厂子，以后再逐漸扩大。

（4）发展了一种所謂“万能人”的运动，亦工亦农。社員們既要学会农业全套技术，又要学会工业几項技术。“下田是农民，进厂是工人”。

（5）边干边学，到处“取經”。先求懂得一些普通的科学技术知識，再求逐步提高。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相結合。

（6）管理人員要学会管理，又要学技术，是干部也是工人。

（7）除了个别的特殊情况以外，工业和农业的工作都是記工分。一般是：工厂工分不能过高于农业，也不能低于农业，但又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根据工作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

（8）工业和农业的工作时間一样，如果晚上加班，就采取累进記分的办法，以資奬励。

（9）根据工业和农业相結合的原則，小工厂有常年奋斗的計划，又有分段执行的計划。

可以不可以說，这个合作社的所作所为，在实际上是指出了我国能够以史無前例的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够比較迅速地消灭工业同农业之間的区别以及腦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間的区别、从而为我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創造出順利条件的一种正确道路呢？我想，完全可以这末說。

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的著作里面，認为在徹底廢除私有制后，“超出社会最近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灾难，而且將保証滿足一切公民的需要，將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將創造出滿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經营生产和

1954

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將創造出这种新人来。”“由整个社会按照計划和为了公共的利益而經营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曉整个生产系統的人。”“教育可使年青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統，它可使他們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們自己的爱好，輪流从一个生产部門轉到另一个生产部門。”“……城市和乡村之間的矛盾也將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將是同样的人，而不再是兩个不同的阶級，这已由于物質的原因而成为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恩格斯当时所說的，是根据社会发展規律而提出的理想。可以不可以說，在我們党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照耀下，旭光一社是在現实生活中，具体地、逐步地实現科学共产主义創始人的这样的理想呢？我想，完全可以这末說。

兩篇通訊的題目，都很謙遜地写着“小小工厂”的字样。但是，这类同农业相結合的合作社的“小小工厂”，却具有無限的生命力，因为它們所代表的，是不可抵抗的、新生的、前进的力量，是共产主义的力量。

（原載“紅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三期）

1955

〔附一〕

旭光一社用土办法办小小工廠

中共鄂城县委会

在农业生产大躍进的日子里，湖北省鄂城县杜山乡旭光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兴办了顆粒肥料厂、农具制造修配厂、农产品联合加工厂和沼气发电站。这些小工厂办得快、生产快、收效大。仅仅一个多月，就生产了四万多斤顆粒肥料，制成和修理了各种农具、工具四百二十一件。联合加工厂也开始磨面。社里肥料缺乏的困难解决了，棉地底肥全部用上了自制的顆粒肥料，現在又在赶制水稻和棉花追肥的肥料。

这些小工厂既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增加了合作社的收入，減少了开支。原来計划买新式犁，每部需要十八元，小工厂自制的只要八元；棉花条播器原来准备購买，每部需要三十四元，現在小工厂利用三齿耘鋤改装的滾筒条播器，每部只要二元；顆粒肥料市价每百斤五元六角，小工厂生产的只要一元二角。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間內，社內就节省了四千多元。

办起这些小工厂也推动了农村的技术革命。在过去兩年多的时間內，全社仅发明和改进了十三种工具和操作方法，但在办起小工厂以后，兩个月內就发明創造了十二种工具。过去誰也沒想到运用动力工具，現在几个人只用了一个晚上的功夫，花了十二塊錢，就制成了一艘机帆船。正如农具厂厂長肖功梓同志所說："只愁想不到，不愁办不到。"小工厂还給社員指出了农村工业化的光明远景。有的老社員說："过去总在說工业化，实际上看不見，現在看来越走越近了。"

1956

这个社办了这些小工厂，沒有向国家要一文錢，一个人，一架机器，而是紧紧依靠群众，用穷办法和土办法办起来的。

这个社在办厂中坚持了三条原則：第一，根据社里的現有力量和資源，开始只办小型的，以后再逐渐扩大；第二，本着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針，不能單純为了賺錢；第三，应該办的工厂，也分清先后緩急，先办当前农业生产上急需的工厂。

依靠羣众合作，解决資金問題

他們在办厂中首先碰到的問題是，資金从那里来？

办这些小工厂需要三万五千多元，一九五七年社里提成的生产資金和公共积累虽然有四万五千多元，但这只能作为一九五八年农副业生产費用的开支。社管理委員会專門召开会議研究，决定从农业生产費用中暫抽出二千元作工厂費用，等到收割油菜籽以后再归还。但仅仅靠这笔錢仍然不够用。社主任胡昌璧同志記起了县委書記彭英同志的話："一切困难都能够依靠群众得到解决。"于是社委会决定依靠群众合作投資来解决資金問題，并且訂出了一个"合理作价，按价收买，分期付还，按月行息"的集資章程。

社員对办工厂、实現工业化，怀着無限热烈的期望，大家知道了社里的計划以后，非常高兴。他們唱着："柳树发芽年年青，我們社里一片春，一月要办三个厂，十步要当一步行。""农业社办农具厂，自己用来自己干。顆粒肥料眞正好，不浪費来不流散。沼气发电成本低，联合加工眞稀奇。机器夾米不用碾，机器軋花銀浪翻；机器里出細白面，自动磨来自动搬。石碓石碾要进博物館，放着不动供賞玩！"群众办工厂的勁头十足，听說缺乏資金和原料，大家都积极主动向社里投資。周啓荣把留了三年准备結婚时做桌子的木料都拿了出来。他說："結婚只是一人喜，办好工厂大家喜。"老社員陆垂志也把准备盖屋的一百塊錢向合作社投資，并且还积极动員别人說："过去老輩子人叫我們看破点，是說吃点、穿点，免得錢落到外人手；現在也

得看破点，把錢扣在手上有什么用，拿出来办工厂，实現工业化，兒孙幸福，我們自己也要多活几十年。”就这样，全社群众投資了五千多斤木料，二千多元現金。資金、原料缺少的困难初步解决了。

因陋就簡，白手起家

把資金筹集起来以后，有些人想起了城市那些大工厂的場面。社員胡云龙說：“要办，就要有个样子，把房子盖起来再說。”也有人想把厂房設备等所有問題都解决以后再动手开工生产。社委会发覚了这种求大求全的思想，認为是一个値得注意的傾向，便召开全体社員大会，社主任胡昌璧在会上对大家說：“我們的工厂就要开办了，錢只有这么多，又要盖房子，又要买机器，大家看該如何办？”社員們都議論开了，有的說：“房子总得盖一个才象样呀！”有的說：“那怎么行？孩子沒下地，先就起名字，工厂还沒办，先就盖房子。將来誰知道得花多少錢？”几个老农在一旁商量一陣以后，站起来說：“我們老头子有个意見，不知青年人同意不？”“說吧，老爹！”“生产搞得好，玩得才痛快，我看暫时把俱乐部騰出来办工厂，实現生产規划以后，再盖一个大俱乐部，又看电影又看戏。”就象事先醞釀好了似的，社員們一听，齐声拥护，一致同意这个意見。社委会接受了这个意見。但为了照顧社員休息时閱讀書报，以及节日的娛乐，把俱乐部搬进了一間小屋子里，原来的俱乐部就成了工厂的厂房。在因陋就簡的思想指导下，找了一間破茅屋，四圍糊上泥巴，能擋得住风雨，顆粒肥料制造厂的厂房也算建成了。

設备和工具大部分也由社員东拼西凑解决了。联合加工厂沒有石磨，社員梁海清就从几里路外的老家，把石磨搬来作价交給社里，陈裕暢也把心爱的石磨向社里投資。社員們还拿出了許多厂里需要的斧头、鋸等小工具，由社里統一作价。有些設备能借的就借，能代替的就代替。肥料厂要建洋灰晒台花錢太多，就用蘆席代替。錫焊工具沒有錫盤，就用瓦盆代替。另外，还采取了自做自用，現制現用

的原則，做成了拌肥板、漏斗、工具台等物件。只是自己实在無法解决的設备，象鉄絲、皮帶、帆布等，才花錢購买了一些。动力問題，也利用社里过去用得很少的五部柴油机解决了。为了节約柴油，降低成本，社里又办了一个沼气发电站，准备逐步用沼气作动力。这样設备問題就圓滿解决了。

从那里去找技术力量

技术力量从那里来？开始有的人主張要求县农业机械厂派几个技术工人来，有的人主張把社里在外当工人的抽回来。大家一討論，覚得这不是办法，因为农业在躍进，工业也在躍进，人派不来，也抽不回来。正在这个时候，城鎮各个工厂都提出了大力支援农村的口号，当地的樊口鎮上各个手工业部門还專門提出了要"技术下乡"。旭光一社听到这个消息，眞是喜出望外，当时就派了九个社員到樊口鉄业社学习修补膠輪車胎、焊汽灯、修整噴雾器等技术，派了一个社員到汉口学习沼气发电，派了五个社員到鄂城学习制造顆粒肥料，并且請县农业机械厂、樊口鉄业社、造船厂的机械工人、木工、鍛工到社里傳授技术。他們又和樊口鎮的手工业社建立了經常的关系，社里需要試制什么新工具，手工业社就派人作具体指导。鎮上的手工业工人，也經常主动地下乡指导，社員說："工人下乡，好比雪里送炭；派人学习，恰是錦上添花。"干部和群众办好工厂的勁头越来越大了。

社里也并沒有忽視自己原有的技术力量，把四个不太內行的木匠也組織起来，帶着生手拉鋸，刨木料。兩名能够使用动力机的社員，帶領大家学开机器。

在边做边学当中，采取了互相学习，取長补短的办法，从而出現了一个由工人、农民、学生結合起来大搞工具改革的热潮。农民肖功梓同鎮上的工人、武汉市下放参加生产的学生胡崇芬一起試制成功了履帶傳送器、机帆船、机动磨等各种工具。

懂得了一般的技术知識以后，社員还要求懂得更多、更深一些的

知識。于是社里政治、文化技术夜校的專修班也开办起来了，由技术較高的人担任教員。社里还以农民发明家肖功梓学会多种技术做典范，开展了一个“万能人”运动。經过社員討論，制訂了一个“万能”标准：男社員要学会农业生产全套技术、木工、鉄工、石工、泥瓦工、开动力机、修理、設計、飼养、航行十項；女社員要学会农业生产全套技术、勤儉持家、开动力机、用牛、修理、設計、飼养、針綫活、会計、演員十項。学会了五項的就授給“万能人”的光荣称号，并发給奬狀。一个轟轟烈烈的群众性的技术革命高潮在全社展开了，許多人都学会了簡單的技术，做到了：“下田是农民，进厂是工人”。第一批全社只有十三个“万能人”，第二批就达到了五十八个。

旭光一社就这样初步克服了缺乏技术力量的困难。

（原載“紅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三期）

〔附二〕

旭光一社是怎样領導和管理小小工廠的

中共郭城縣委会

旭光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最近办起了农具制造修配厂、农产品联合加工厂、顆粒肥料制造厂和沼气发电站等。这些工厂办起来了，究竟如何办好呢？这是一个新問題。旭光一社在实际工作中，經过不断地摸索，不断地改进，初步取得了經驗。

是干部也是工人，会管理也会技术

社管理委員会为了全面領导好生产，根据具体情况，把全社的工作划分成农业、副业、工业、財經四条战綫，每条战綫都有一个副主任参加領导。

开始办工厂的时候，有些干部想学大工厂的一套組織机構。有人說："工厂就得有厂長，有厂長还得有会計、統計……"。

会計配备起来了，但是，事情沒办到三个鐘头，就閑起来了；剛剛要走，又有人来找，于是，只好坐在那里等事上門。还不到三天，就引起了社員的反感。妇女队長殷美容不滿意地說："我們同社員一天干到晚，还要工作，他們坐在那里吃閑飯，看將来由誰負担。"在工业战綫的会議上，大家研究了殷美容的話，認为她說得很对。"生产队長同社員一道生产，还要参加領导工作，为什么工厂干部就不能这样做呢？"而且农具厂厂長肖功梓已經这样做了。大家决定学习肖功梓，要当干部，把工厂領导好，也要参加生产，通过生产来管理好工厂。肥

料厂厂長陆龙山学会制肥料，又学会記帳。联合加工厂厂長胡遐波学会了打鉄、鋸木料，还兼搞統計、会計。沼气发电站站長、农业机械站站長也都是技术較为熟練的技术員。这样一来，干部、工人、农民三者之間的界綫消除了。干部不要补助，在生产中又遇事帶头，深深地教育了社員群众。群众热爱自己的工厂，也热爱着自己的干部。

是工人也是農民，工分就是工資

工人的工資究竟如何定呢？高了，社員有意見，低了，誰也不願进工厂。自从"万能人"运动开展起来以后，社里出現了新情况，作到了工人就是农民，"下田就是农民，进厂就是工人。""下田一身黃泥，进厂双手油泥"。沒有什么工人、农民的界綫。因而，大家認为"工厂生产也是农业生产，工人工資就是农业工分"。这样，除了下放到社的拖拉机手是工資制以外，其余的工人全用記工分的办法和农业劳动同样参加分配。記工分的办法，根据具体情况各有不同。抽水机站工作固定，采取了常年包工的办法，承包社里的工分；七个抽水机手在具体工作中再按抽水时間定額記分。顆粒肥料制造厂常年一样生产，工作沒有多大变化，就实行按件計酬的办法。制成一百斤肥料，社里付給十分；厂里十六个人，再按积肥、拉車、晒堆、細篩、拌匀、制造等項不同工作分别定額計酬。农具厂和加工厂工作虽比較固定，但是缺乏經驗，就暫时根据技术高低按級記分，高的以农业最高五級活的定額为标准，每劳动一天記十二分，余类推。后来，有的社員反映个别人早上不出工，每天仍要十二分，不合理。于是，又改成按級按时記工。就是技术上按級别，出勤上以时間計算。比如三級定額是十分，早上就是一分半，中午四分，下午四分半，如早上不出勤，就少記一分半。有些試制的产品無法按件計酬，就只能按时記工，以后再逐步过渡到按件計酬。总的說来，工厂工分不能过高于农业，也不能低于农业。旭光一社在具体执行中掌握了三个标准：技术高的人，身体虽然弱，要保持有一个中上等劳动力的收入；身体强，虽然技

术不高，也要保持有一个中等劳动力的收入；至于身强力壮，技术又高的人，一般都要有一个上等劳动力的收入，或者稍高一些。这样一来，搞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人都沒有意見，大家說，“不管那里都是在社里生产，那里需要就上那兒去。”

農村的工厂，農村的制度

工厂剛办不久，就有少数人想搬用大工厂的一些制度。肥料厂的几个社員每天只工作八个小时，下午太阳很高就下了班，在厂子里打球，引起了广大社員的不滿。社員批評說：“到处都在大躍进，你們却在大躍退，这那象个样子。”

农业社的工厂，毕竟是社里的一个組織，不同于大工厂，但又不能完全同农业一样，怎么办呢？經管理委員会研究，認为建立一套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它要适合农村的情况，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經过討論，初步建立了几种制度：工作时間完全同农业生产一样，不能有絲毫特殊，如果晚上加班，就采取累进記分的办法，以資奬励。工作上一般需要的用品（如手套）由社供給；但由于在农业生产中，雨天用的斗笠、簑衣，都是农民自备，因此，工厂的工作服也采取自备的办法。此外，各厂还建立了产品檢定制度，以及材料入庫、产品出庫入庫、領料等制度。工厂替社員私人加工米面和修理农具，由管委会規定收費标准，工厂按三联單記帳，將来由社統一扣帳。肥料厂制出的肥料，定期向管委会报告，由管委会分配到队，憑票領肥料。其他工作和生活制度，是有什么問題解决什么，什么时候有問題，什么时候解决，不先做整套条文規定。总之，农村工厂的管理制度，要簡便易行，决不能一下子搞得过于复杂。

工厂生产計划服从農业生产

小小工厂也必須要有一个常年計划，才有奋斗目标。旭光一社

1958

首先根据农业生产的發展需要制訂了長年产品产量計划。有了長年計划，还必須分段执行。分段执行中，也是随着农业生产的行动，各工厂提出相应的具体的任务。比如在当前的夏收"搶四快"中，全社要求十天之內突击搶完，提出："千亩麦地作战場，鐮刀鎬担是刀槍，男女老少齐上陣，夏季丰收喜洋洋"的战斗口号。根据这个要求，农具厂提前三天修理和制造了二百四十多把鐮刀，一百二十多把鋤头，修理了三十八部噴霧器和十七部中耕器，裝起了十七部安全自动噴霧車。同时，还專門組成了修配小組，巡迴到各队修理农具。加工厂提出日夜給社員加工磨面。肥料厂保証要在追蕾肥期間每亩施足五十斤。农业机械站的脫粒組也提出十天突击小麦脫粒的任务。这样，就使得农村工厂眞正起到推动农业生产的作用。社員們到处張貼着大字报，口里唱着順口溜，歌頌自己办起来的小工厂：

"打仗要支援，割麦要快鐮，紅爐日夜干，生产赶上前。"

"加工厂，日夜忙，机动磨，轟隆响，磨的細面象白糖，节約劳力一万多，干得起勁吃得香。"

"肥料厂，日夜干，蕾前造肥要五万，保証棉麦增了产，小小工厂不簡單。"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原載"紅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三期）

农民問題仍然是根本問題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論

"在我国的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他們無論在革命斗爭中和建設工作中都是一支最偉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級只有依靠这个偉大的同盟軍，把他們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充分地調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农民同盟軍問題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設时期仍然是这样。"这是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中所說的一段話。这段話告訴我們：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农民問題仍然像过去在革命时期一样，是我們国家的根本問題。

大家知道，在过去長期的革命战爭中，毛澤东同志曾經不止一次地指出，农民問題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問題，中国的革命战爭实質上是农民战爭。这是因为，我国农民占人口总数六分之五，不論是反对国內敌人也好，反对国外敌人也好，主要地不能不是为着农民和依靠农民。沒有农民，要打倒强大的国內外敌人是不可想像的。过去我們党的有一些同志因为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偉大作用缺乏正确的認識，对于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工人阶級領导下的农民武裝和进行革命游击战爭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認識，曾經使革命遭受严重損失。只是在克服了这些錯誤以后，我国革命才一步步走向胜利。毛澤东同志一九四五年在"論联合政府"一書中講到农民問題的时候說：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將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設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設很多的近

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長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場的主体。只有他們能够供給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軍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农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現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

“农民——这是現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謂扫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众文艺，所謂国民衛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

在整个抗日战爭和人民解放战爭期間，正是由于党紧紧地依靠革命的农民的积极支持，中国革命事业获得了偉大的胜利，終于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而，在全国解放以后，尤其在进入有計划的社会主义建設阶段以后，有不少同志却忘記了毛澤东同志的指示，減弱了同广大的貧苦农民群众的联系。在爭取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的斗爭中，有些同志由于低估了广大貧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或者是怀疑中国农业能够迅速地合作化，或者是怀疑党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提出的全国农业發展綱要四十条能够迅速地实現。他們不相信农业能够很快增产，因而也就不相信中国的工业能够很快發展，并且把已經形成的躍进当作“冒进”来反对。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八年兩个高潮之間出現过一段發展比較慢的时期，就是同一部分同志的这种認識上的錯誤直接关联着的。

因此，現在来重新統一一下对于农民問題的認識，把农民問題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的极端重要性加以强調，是必要的。

我們所以說农民問題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仍然是根本問題，这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設同过去的革命斗爭一样，都是六亿多人民的共同事业，离开了五亿多农民，就是离开了主要的依靠。完全可以說，不把农民的积极性調动起来，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就全局来說，

1966

就必然是冷冷清清少数人單干，而不能轟轟烈烈大家一齐干。

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要求“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要求在建設現代工业的同时建設現代农业，这不但是为了使农业适应工业的需要，不讓落后的农业拖住工业，而且是为了使工业和农业互相促进，特别是使农业的迅速發展去促进工业的迅速發展。很多人都熟知工业能够促进农业，却不大相信农业能够促进工业，但是这正是目前我国活生生的現实。我国农业今年发生了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沒有見过的躍进：今天发表的夏粮增产三百五十多亿斤（比去年增加將近百分之六十）就充分說明了这一点。这个躍进迫使工业方面更多更快地供应各种各样的机器（包括灌溉、运輸、耕作、农产品加工等机器）、工具和藥械，更快更多地供应化学肥料、水泥和电力。这就不能不逼着冶金工业、机械工业、燃料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等工业部門統統加快步伐。而事实上，这些工业部門也就的确以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了起来。現在，人們再也不怀疑在工业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了，人們倒是在奇怪，过去在怀疑这个口号的时候为什么那样糊塗了。

工业的巨大发展不仅是受了农业的刺激，而且是由于工业分布得更加接近农村，接近农民，甚至直接得到了农民的参加——投入資金并且投入劳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所要求的中央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型工业并举，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为了調动农民群众对于举办社会主义工业的积极性。农民的积极性調动起来了，他們就能够直接地集資、集料、集人，用一种超級的高速度和省錢省料的办法来創办发展农业所需要的各种小型厂矿。今年春季以来，很多县份都在举办肥料厂，煤矿，电站，农具和农业机器厂，而且有不少县份开始煉鉄、煉鋼、煉銅、煉油，甚至自己生产了鉄軌和火車，自己兴办了鉄路。各种輕工业厂，也随着紛紛出現。不但是县县办工业，而且在許多地方已經向乡乡社社办工业發展。他們只要国家很少一点补助，或者完全不要国家一文錢补助，就自己办了起来。农民和农村在兴办工业方面的無穷潜力，現在的表現还不过是开始呢！

1967

农业的飞躍發展推动了国民經济各部門的飞躍發展，也推动了文化教育各部門的飞躍发展。当我們沒有注意到調动农民这个同盟軍的积极性的时候，这方面的發展是比較慢的。現在情形不同了：許多乡村已經扫除了青壯年的文盲，普及了小学教育。农民用自己的力量大量兴办小学、中学甚至办高等学校，使学校数目在短期內得到大量的增加。农民用半耕半讀、半工半讀、献錢献房、师生变工等各种独創的办法解决了办学中的許多困难，使这方面的工作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了。

在去年冬季以来的农业生产建設高潮中，我国数亿农民一方面在改造着客观世界，改变着我們国家的自然面貌和生产面貌，一方面也在改造着他們自己的思想認識，即主观世界。經过实踐，广大的农民对于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有了深刻的認識。他們中間現在出現了成千上万的創造发明家，創制了許許多多价廉物美、省工省料的新式农具和机械。他們中間也产生了許許多多的农业科学家，对于培育良种、制肥施肥、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和田間管理等，都研究出不少好的办法。这許多事实說明，我国农业現代化、农业技术革命和农村文化革命的偉大任务，决不只是靠国家的力量和城市的力量来完成，而是在很大范圍內要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誰还能怀疑五亿多农民的力量呢？誰还能怀疑五亿多农民在偉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呢？誰还能否認农民問題仍然是我国的根本問題呢？

兩种方針，兩种結果。低估农民同盟軍的重要性，片面地强調发展工业，結果是慢了农业，也慢了工业和整个国民經济国民文化；反之，充分調动农民的积极性，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結果是农业、工业、整个国民經济、整个国民文化进入万馬奔騰的黃金时代。也只有这样，才有眞正的群众路綫，才有巩固的工农联盟。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最近时期的发展中的根本教訓之一。

1968

多快好省地發展地方工业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論

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正在全国形成。不仅是全国各省，而且許多專区、县以至乡，都提出了积极的躍进計划：力爭在五年左右的时間內，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的总产值。很多地方在群众的热情支持下，說干就干，小型厂矿和电站雨后春笋地發展起来。这种办地方工业的积极性一經發揚，就像原子核分裂一样，产生了巨大的能量，使我国工业战綫上出現了一个万馬奔騰的新局面。

我国工业長时期以来处在落后的狀态中。从清朝同治年間官办制炮局（一八六二年）、江南制造局（一八六五年）开始，直到解放之前，不但重工业少得可憐，即便是輕工业也只是紡織工业稍为發达，整个来說，現代工业殘缺不全，基础极其薄弱，这是我国多年貧困、落后、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帝国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封建主义又重重束縛着我国近代工业的發展。解放以来，經过了三年恢复和五年建設，經过了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工业有了很大發展，許多新的工业部門建立起来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奠定了。但是，已有的工业水平，同我国作为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比較起来是极不相称的，即使就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来說也落在世界上許多国家后面。無論从国內或者国际形势来看，無論从經济或者政治情况来看，我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是尽快地發展工业，尽早地实現社会主义工业化。我国拥有丰富的資源和众多的人力，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已經建立起一批現代工业和已經积累了相当丰

富的工业建設的經驗，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对我国工业建設的援助，加上党的英明領导和人民群众的勤劳勇敢，我国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工业化的条件是具备的。問題在于怎样才能使我国工业化以最快的速度向前飞躍。

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重大問題。早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間，毛澤东同志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議上所作的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已經十分英明地提出了正确的原則。毛澤东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重工业和輕工业、农业的关系，要想尽快地發展重工业，就必須大力發展农业，就是說，提出了發展工业和發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原則。这就是說，在迅速發展工业的同时，必須迅速發展农业。这就使工业化在原料、市場、劳动力以及資金方面获得可靠的保証。至于工业本身如何才能迅速發展，毛澤东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發展中央工业（主要是大型企业）和發展地方工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原則。这个原則是毛澤东同志根据国内外工业建設的經驗，特别是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工业建設的經驗而提出来的。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我們着重注意了發展中央管理的工业，这是完全必要的，由于中央管理的工业的迅速發展，我国在短短的时間内已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这期間，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以及我們主观上对地方工业注意得不够，地方工业的發展是比較慢的。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对兴办大型企业是抓紧了的，但对中小型企业就注意不够了。过去有一种看法，認为只有大型企业是經济的，中小型企业不合算，实际上这是不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針的。当然，兴办大型企业是必要的，这是我国工业化的骨干，今后仍然需要兴办各种大型的現代化的企业，但是，只有大型企业是不够的，还必須大量举办中、小型企业。因为中小型企业投資不大，易于分散来办；建設时間較短，可以較快地投入生产。可以設想，今后在發展中央工业之外，把全国各地办工业的积极性統統調动起来，大办地方工业，在大型企业之外，还大量办中小型企业，我国工业就可以高速度地向前發展。

1970

毛主席所提出的工业建設的路綫，是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工业的路綫，是解放生产力的路綫。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这就是解放了对办地方工业的束縛；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这就是解放了对發展中小型企业的束縛！所有这些，都是相互結合、相互促进的。这是我国高速度地工业化的具体道路。

現在全国有二十几个省和自治区，一百八十多个專区、自治州，兩千多个县，八万多个乡。每个省和自治区、每个專区、每个县以至每个乡都办工业，全国加起来就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我們的一个省就比欧洲的許多国家大。欧洲的比利时，人口只有八百九十多万，面积只有三万多平方公里，但鋼的年产量达六百多万吨，我国今年才能赶过它。如果我国二十几个省和自治区都大家来积极办工业，奋斗十年、二十年，全国鋼产量沒有理由不达到較比利时大十倍、二十倍。

事实証明，要多快好省地發展工业，必須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要同时并举，就是說，除中央举办大型企业以外还要充分發揮地方举办中、小型企业的积极性。毛澤东同志提出的这个原則，已經为在一九五六年九月間举行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肯定了。一九五七年十月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又决定了改变工业、商业和財政的管理体制，把原来由中央管理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下放給地方。所有这些，加上整风运动反保守、反浪費的斗爭大大激發了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中央办大工业，省、專区、县、乡办中小型工业，在全面規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同时并举，也是办工业的群众路綫。

几个月来的事实表明：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一經發揮，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物質力量。根据初步統計，甘肅、山西、云南、貴州、湖南、河南等省，都計划把今年的工业总产值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上；全国地方工业今年增長的速度，可能达到百分之三十七以上。一向是比較貧瘠的甘肅省，人民为了兴办工业，在短短的数十天內，就籌集了比过去三年来国家对地方工业总投資还要多的資

1971

金。越是工业比較落后的地区，办工业的积极性就越高。人們可以看到，兴办工业这件事情是怎样的激动全国人民的心弦。

最近中央有关部門研究的結果，發展地方中小型工业的潜力是很大的，前途十分令人振奋。据估計，在那些資源条件（主要是煤和鉄）具备的县份，不用几年，完全有可能至少建設一个小的煤矿、一个小的化学肥料厂、一个小的煤煉油厂、一个小的煉鉄厂、一个小的水泥厂、一个小的电站，和一个机械联合修理厂。建設以上一批工厂，总共投資約为一千二百万元上下，以一个县来說，在五年左右或更多一点的时間內，筹集这笔資金并不是很困难的，可是有了这一批工厂，就可以做到这个县实現工业化。我国有兩千多个县，根据已知的資源情况，有煤矿資源的有四百多个县，有鉄矿資源的有二百多个县。如果每个县都建立起这样的工业，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就可以大大加快，就有充分可能提早把我們的祖国建設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地方工业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这是基本的）；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主要是加工农产品和生产土特产品）。为了实現这个任务，首先需要打破对于工业化的神秘观点，全党办工业、各級办工业，坚决走群众路綫。在县以下的各級干部中，应該提倡既要学会办社，又要学会办厂。各省、自治区应該在大力实現农业躍进規划的同时，爭取在五年到七年的时間內，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値超过农业总产値。

各地在規划發展地方工业的时候，应注意以下的几个問題。

第一，办地方工业需要全面規划，加强領导。应該根据各地区的資源情况和現有工业基础，对工业生产有一个大体的分工协作。不仅全国要有一个大致的規划，各省、自治区也要有一个大致的規划。同时，根据各地办地方工业的經驗，地方工业的布局一般要依托現有工业城市作为技术中心，选擇若干县城作为联結工业城市和各县地方工业的基点，并在地区之間、企业之間广泛建立协作制度，形成点面結合、大中小企业結合的工业网。各地可以根据当地

具体条件进行安排。

第二，發展地方工业应該貫徹执行勤俭办企业的方針，厂房設备应該因陋就簡，充分利用現有物力、人力，力爭少花錢多办事。

第三，建立新的企业，应該首先注意兴办为农业和为大工业服务的工业。为城乡人民服务的工业，应該根据資源和銷路的情况适当發展。新建企业的規模，一般应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县以下的工业基本上是办小型的，面向农村，为本县的农业生产服务。

第四，地方工业建設的資金，除了較大的重要建設項目主要由中央投資以外，其他一般建設項目所需的資金，主要应該由地方自筹来解决。地方資金的来源，主要依靠地方財政筹集，地方企业的內部积累，手工业合作社和农业社的积累。今年，由于农业社和广大农民投資于水利建設的資金已經为数很大，一般不宜再过多地向他們筹集工业建設資金。在筹集工业資金时，也要坚决貫徹执行發展工业必須和發展农业同时幷举的方針，不要因为集資办工业而减少对农业的必要投資。

第五，县以下地方工业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县营，乡营，县、社合营或乡、社合营，合作社营等形式。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用的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料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一般地說，农村中的小型工业，以采取县、社合营或乡营的形式为好。县营工业中最好有一个經营多种业务的联合工厂，这种工厂比較易于适应农业的季节性，可以灵活統一地調剂劳动力、使用技术設备和流动資金，幷且可以成为农村工业网的核心。

第六，在發展地方工业的时候，还要对現有企业的情况进行摸底排队，充分發揮現有企业的潜力，根据需要加以扩建或改建。同时，对于手工业也要进行整理和發展，首先应該注意發展为当地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手工业生产，其次还应当积极發展为国內外市場的需要的特种手工业产品。

第七，鑒于今年各地的財力、物力、人力要集中用于农业大躍

进，因此，今年各地可以多發展那些規模小、投資少、建設快、收效大，特别是制造改良农具、修配农业机械、开采有色金屬和小煤窑等小型企业；而对其它投資較大、技术較复杂的工业，今年应着重做好准备，在省和自治区内开始試办几个中小型企业，以便取得經驗，为今后大發展創造条件。

令人心花怒放的祖国工业化的美景已經展示在我們的前面。大躍进的成就已用鉄一般的事实粉碎了一切悲观論和怀疑論者的低調。我們应当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發展地方工业，讓地方工业在全国遍地开花，使我国尽快地实現社会主义工业化。

1974

偉大的一年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論

毛澤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著作發表一周年了。一年来我国形势的發展，充分証明了它的偉大的历史意义。

毛澤东同志的著作是發表在我国历史的轉折时期。一九五六年，我国取得了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这个胜利使我国进入了一个剝削阶級走向永远消灭、社会生产力可以空前迅速發展的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異常迅速，这說明了广大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迫切要求。但是新建立的社会秩序是不会馬上巩固起来的。在一方面，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兩条道路斗爭的重大成果，但是并不是兩条道路斗爭的結束。对于社会主义心怀不滿的資产阶級分子以及某些上層小資产阶級分子，在經济战綫上失敗了，但是还要在政治战綫思想战綫上繼續同無产阶級較量較量。这种迹象到一九五六年底一九五七年初已經逐步显露，而正确地对待这种矛盾已經提到無产阶級的議事日程上来了。在另一方面，在劳动人民內部，首先是在領导者同群众之間，由于旧时代的影响的遺留，由于新制度的还不完善，也存在着許多妨碍社会主义充分發揮威力的迫切問題，需要加以澄清。一九五六年某些国际事件的發展，特别是十月下旬的由納吉反革命集团所組織的匈牙利反革命叛乱，更加使人們覺得有正确認識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的根源、性質和解决方法的必要。

1975

毛澤东同志的著作答复了这些問題。根据毛澤东同志所提出的原理，党領导了全国人民的整风运动，这个运动大大提高了無产阶級和劳动人民的覚悟，从而大大加速了我国的社会發展。

毛澤东同志的著作从原則上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区别了兩类性質完全不同的矛盾——敌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这个論断具有重大的理論意义和实踐意义。

任何社会都必然有矛盾，都必然以矛盾为發展的动力，这本来是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也是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有一个时期，有些人曾經諱言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甚至否認这种矛盾的存在。这样，这些人就不得不在事实面前陷于被动和混乱。当然，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企圖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来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否定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根本上的团結一致。但是为了駁斥他們的誹謗，并不需要否認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問題是在对于矛盾加以科学的分析，使無产阶級的先鋒队得以根据矛盾的客观規律积极地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不断地把社会推向前进。我們国家一年来的一系列的重大發展，正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大談特談的結果；事实表明这并沒有阻碍了我們，反而保証了我們以最高的速度前进。

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区别为敌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这首先就給了形形色色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些人企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內部的矛盾故意歪曲成为敌我之間的矛盾，利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缺点和錯誤煽动人民起来"革命"。匈牙利的納吉分子、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分子和我国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就是这样作的。同时，他們又把眞正的敌我矛盾（包括他們自己同人民之間的敌我性質的矛盾）說成为人民內部的矛盾。他們的这些手法都曾經欺騙过一部分群众。毛澤东同志的著作指出了兩者的根本区别，提出了六項政治标准作为兩者的界限，并且指明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不同的阶級根源，这就使我国人民的反右派斗爭得到了有力的武器。

1976

但是区别两类矛盾的意义远不限于这一点。严格区别两类矛盾，还使那些有官僚主义傾向的、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对人民群众濫用强制方法而不依靠說服方法的人們处于非改正錯誤不可的地位，从而使無产阶級先鋒队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大大地加强了起来。在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一部分管理工作人員受資产阶級思想作风的熏染，同人民群众之間存在着隔閡，甚至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內部矛盾。这种危險的傾向是必須糾正的，而整风运动的經驗証明，对于絕大多数的工作人員說来，这种傾向也是完全能够糾正的。絕大多数的工作人員在整风运动中接受了群众的批評建議，克服了工作中的缺点，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驟打掉官气，深入群众，跟群众同甘共苦，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發。这样，他們在工作中就获得了充分的主动。他們作了群众的学生，因而就能作群众的先生；他們为群众服务，因而就能充分調动群众的积极性創造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們国家的政治面貌發生了极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我們国家的經济面貌也發生了极大的变化。

由此可見，正确地認識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正确地区别两类矛盾，正确地处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这些原則，对于我国一年来的反右派斗爭、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大躍进，起了怎样难以估量的作用。完全可以說，离开了毛澤东同志所提出的这些原則，全国人民就不可能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因此，党中央把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一个不可分的組成部分，这是完全正确的。

毛澤东同志曾經反复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这对于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新問題，对于我們党并不是一个新問題。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为什么对于許多同志好像是一个新問題呢？这是因为，在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級斗爭基本結束以后，人民內部矛盾更多地被人們注意了，而正在这个时候，却又有一部分同志忘記了历史的教訓，錯誤地以为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可以不依靠群众，可以不依靠政治，

2 028 3875 0

可以只依靠少数人的行政命令方法去进行的原故。这种思想的錯誤在过去一年我国的飞速發展的历史中已經暴露無余了。但是这决不是說，經过了过去一年的教訓，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理，就已經被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充分掌握，从此可以万事大吉了。事实决不是如此。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的思想影响不会这样容易扫清，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傾向不会这样容易克服。我們党的任务，我国一切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在已經得到的胜利的基础上，繼續为宣傳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而斗爭，繼續为巩固反右派斗爭和整风运动的成果而斗爭。只有这样，我們的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日趋巩固，我們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才能在依靠群众的基础上躍进再躍进！

1978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毛泽东哲学著作学习文件彙编　　（中册）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编
页数＝１２９１
ＳＳ号＝８０４０６７４２
出版日期＝１９５８年０９月第１版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改造我们的学习（代序）学习文件＆毛泽东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六章第四节“哲学上的党派和哲学上的无头脑者”）＆列宁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
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摘录）＆刘少奇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陆定一
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陈伯达
理论战线上的新气象（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
实践论学习文件＆毛泽东
第一部分　关于认识依赖于实践，认识论的唯物论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部分）＆恩格斯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第五章第二节“思辨结构的秘密”）＆马克思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部分）＆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一章）＆列宁
列宁在“哲学笔记”一书中论认识和实践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关于主观主义”部分）＆毛泽东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同志论从实际出发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科学历史摘要〕”部分）＆恩格斯
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科学并不神秘（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
土专家和洋专家的经验汇流（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
人的阶级性＆刘少奇
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
再论立场问题（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
第二部分　关于认识过程，认识论的辩证法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
“农村调查”的序言＆毛泽东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列宁
列宁在“哲学笔记”一书中论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辩证法〕”部分中“〔（乙）辩证逻辑和认识论。关于‘认识的界限’〕”）&恩格斯
反社林论（第一编第九章）&恩格斯
毛泽东同志论全面观点和从本质看问题
反对党八股（关于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毛泽东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
【附一】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
【附二】种试验田——又红又专的道路（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
一篇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
【附】中共湖北省委员会：依靠群众力量，排除万难，大兴水利
百闻不如一见（一九五八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
现场会议——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
第三部分　关于主观能动性，思想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思想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章第四节“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毛泽东
论持久战〔“能动性在战争中”和“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两部分〕&毛泽东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毛泽东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编者按语两则（“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和“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两文的按语）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三月三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刘少奇
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社论）
力争高速度（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谭震林
第四部分　关于改造主观世界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二十周年纪念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
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刘少奇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
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陆定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邓小平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
“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
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苏联真理报编辑部）
矛盾论学习文件＆毛泽东
第一部分　　关于两种宇宙观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
反杜林论（“引论”第三章“概论”）＆恩格斯
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十三章）＆恩格斯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四部分摘录）＆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辩证法”部分）＆列宁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关于辩证法的要素）＆列宁
再论职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政治与经济。辩证法与折衷主义”和“辩证法与折衷主义。‘学校’与‘机关’”两部分）＆列宁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反对诡辩论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辩证方法”部分）＆斯大林
Ｃａｎｔ　反对康德，或伯恩斯坦先生的精神遗嘱（第二部分）＆普列汉诺夫
第二部分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文摘录＆马克思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八部分摘录）＆毛泽东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一、二、三部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社报）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一章摘录）＆普列汉诺夫
在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第二部分摘录）＆柯庆施
工业也要“今年看明年”（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社报）
第三部分　　关于矛盾的特殊性

自然辩证法（“〔物质的运动形态。科学分类〕”部分摘录）&恩格斯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民族的、地方的特殊情况相结合

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部分）&斯大林

答阿·霍洛波夫同志&斯大林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一、二、三部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第四部分）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

学习和时局（第二部分）&毛泽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三节，第三章）&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第一、二、四部分）&刘少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第一部分）&刘少奇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关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步骤问题”）&刘少奇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四部分）

毛泽东论中国革命（“近代中国是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部分）&陈伯达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一般和特殊

第四部分　关于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列宁、斯大林论抓住历史链条的中心环节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部分）&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三节）&毛泽东

论军队生产自给，并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第五部分）&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日报编辑部）

新生力量一定战胜腐朽力量&于兆力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摘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第一部分）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编者按语一则（“谁说鹅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

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第一部分）&江华

第五部分　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第四章第四节摘录）&马克思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辩证法〕部分中〔（甲）辩证法的一般问题。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摘录）&恩格斯
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平衡’论”部分）&斯大林
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摘录）&斯大林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毛泽东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毛泽东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坏事能否变成好事？”部分）&毛泽东
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又联合又斗争的广泛统一战线”部分）&陈伯达
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

第六部分　关于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五节摘录）&马克思
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摘录）&列宁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部分）&毛泽东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根本立场部分）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
论党内斗争（第三、四、五部分）&刘少奇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第四部分）&邓小平
毛泽东同志论批评和自我批评
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第一、二部分）&邓小平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
论持久战&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论革命的辩证法&陈伯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习文件&毛泽东

第一部分　关于阶级斗争，民主和专政

共产党宣言（“资产者与无产者”部分）&马克思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底策略”两部分）&列宁
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五章第二节）&列宁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和“被剥削者能同剥削者平等吗？”两部分）&列宁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第三、四部分）&列宁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论权威&恩格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第四部分）&刘少奇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社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四部分）&周恩来
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邓小平
关于所谓“舆论一律”（“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中“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
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社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刘少奇
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第一部分）&柯庆施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
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第二部分　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马克思
社会主义从空想上科学的发展（第三部分）&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论社会主义基础和上层建筑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
哥达纲领批判（对于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一八九〇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恩格斯致亨·施塔尔肯堡的信（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第二部分）&刘少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第二部分）&刘少奇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编者按语一则（“劳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的按语）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七期社论）
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一九五八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社论）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
有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件（“红旗”一九五九年第一期社论）
发动群众打破陈规（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社报）
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的管理体制（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
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措施（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

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创举（一九五八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论）
【附】中共黑龙江省国营庆华工具厂委员会：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和业务改革经验的初步总结
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
第三部分　关于人民群众的作用，群众路线
列宁论人民群众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第五部分）＆毛泽东
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编者按语两则（“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和“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两文的按语）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的祝词
论党（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刘少奇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第二、三部分）＆邓小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第二、三部分）＆刘少奇
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
大企业必须大搞群众运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报）
驳工业战线上群众路线的怀疑派（“红旗”杂志评论员）
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种方法论”部分）＆陈伯达
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汉诺夫
第四部分　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新华社社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
“红旗”杂志发刊词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
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第二、三、四部分）＆邓小平
教育者必须受教育（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社论）
投入体力劳动——共产主义的大熔炉（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
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陆定一
陈伯达谈“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是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方法之一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范文澜

破除迷信&范文澜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周扬
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列宁
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
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斗争到底（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社论）
欲盖弥彰——评铁托六月十五日的演说（“人民日报”评论员）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陈伯达
第五部分　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工农关系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第二部分）&刘少奇
关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导
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关于一九五八年十月至十一月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的报导
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向技术革命的伟大目标进军（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人民日报”社论）
文化革命开始了（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人民日报”社论）
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陈伯达
【附一】中共鄂城县委会：旭光一社用土办法办小小工厂
【附二】中共鄂城县委会：旭光一社是怎样领导和管理小小工厂的
农民问题仍然是根本问题（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多快好省地发展地方工业（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
伟大的一年（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
附录页